郭建龙经典

·畅销·套装·

（共四册）

总目录

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
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穿越非洲两百年

The Collapse of the Flourishing Age
盛唐与安史之乱
时期的政治、
战争与诗
The Politics
ne Wars and the Poems during
盛世的崩塌
郭建龙 著
Prime Tang and
the Following Rebellions
一部全新视角下的
大唐帝国兴衰史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
如何让大唐帝国
由盛世坠入深渊?
从财政、军事、政治
三大维度，解开唐帝国
成败得失的密码
《汴京之围》之后，
郭建龙
“唐宋盛世双联剧”
第二部，
2022
重磅新作
俞敏洪、张宏杰、罗振宇、
蒙曼、施展、马伯庸、张明扬
诚挚推荐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7-01

ISBN：978754556791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楔子 盛世毁于战争
上部 盛世
第一章 血的开局
又一次政变
内斗不断的王朝
帝国早期的边患
混乱的财政系统
女皇帝的功与过
第二章 拨乱反正
寻找贤相
休养出的盛世
从鸵鸟政策到怀柔远人
读书人的科考往事
诗的进化
第三章 盛世阴影
贤相集团的更迭
战争与财政
聚敛集团的出现
文人的宦游时代
第四章 危局之成
贤相集团的覆灭
聚敛集团的内斗
脱缰的战争
土皇帝的职位
漂泊的诗人
第五章 战争前夜
权相的更迭
节度使的罪与罚
外族节度使
战争前夜的文人
被“逼”的叛乱

下部 崩塌
第六章 战争的开局
唐代的军事地理
安禄山之谋
大燕皇帝
河北的抵抗
又一次危机
绞杀与反绞杀
第七章 逃亡的皇帝
急转直下
太子的行踪
危急时刻
深陷战争的文人
构建反击基础
宗室之乱
第八章 血肉抗战
死守太原
再次失败的光复行动
血战睢阳
拯救罪人李白
第九章 从全局战争到局部战争
收复两京
重建朝政
差点儿结束的叛乱
纷争再起
再失东都
第十章 找不回的盛世
另一场叛乱的预兆
改朝换代
叛乱的终结
乱世开启
诗人之死
尾声 盛世的丘墟
附录
参考书籍
后记

《明皇幸蜀图》，唐李昭道（一说李思训）绘。此图描绘的是安禄山发动叛乱后，玄宗赴蜀避难途中的场景

《步辇图》，唐阎立本绘。描绘吐蕃使者向唐太宗求亲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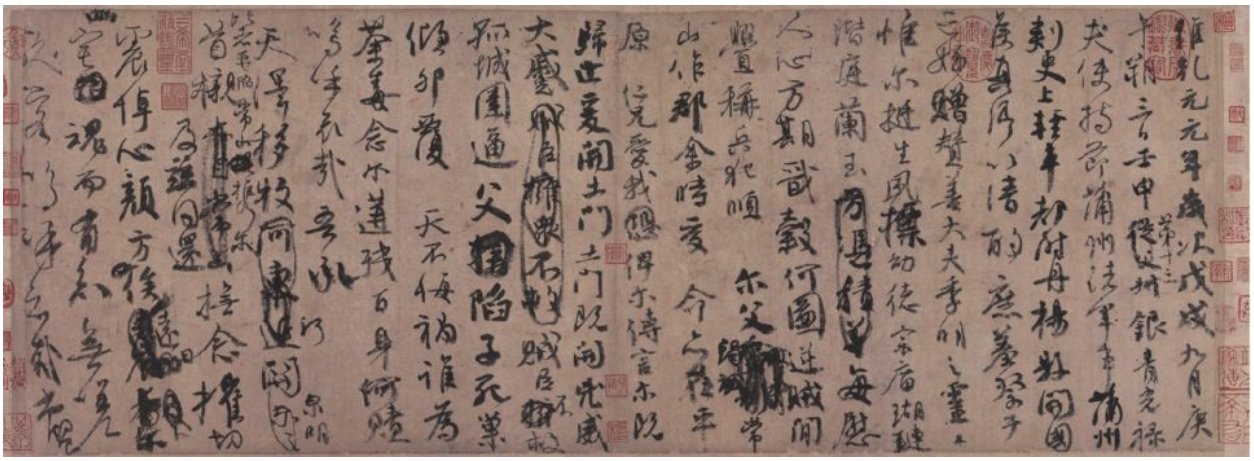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绘。描绘天宝十一年（752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及其随从盛装出游的情景

《长恨歌图》画卷（局部），日本狩野山雪绘。该画卷长达20多米，始于“杨家有女初长成”，终于“此恨绵绵无绝期”，描绘了春寒赐浴华清池、宛转蛾眉马前死、碧落黄泉寻芳魂等场景，完整表现了《长恨歌》的种种细节

《挥扇仕女图》，唐周昉绘。描绘深宫嫔妃与宫女的生活场景，展现了盛唐末期宫廷贵族的奢华生活

《簪花仕女图》，唐周昉绘。描写数位唐朝贵族妇女赏花游园的场景，工笔重彩，间以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

《上阳台帖》，李白书。此帖是李白于天宝三年（744年）所书草书，共25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祭侄文稿》，颜真卿书。此篇是颜真卿“抚念摧切，震悼心颜”之下的草拟之作

楔子 盛世毁于战争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雪山中，藏着一座巨大的自然丰碑，纪念中国唐代的盛世武功。

在如今中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之间，有一条世界上修筑难度最大的公路——中巴友谊公路。在世界上，它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喀喇昆仑公路。这条路经过塔什库尔干，从红其拉甫口岸出境，穿过巴基斯坦西北部陡峭多峰的喀喇昆仑山脉，再翻过一系列雪山，包括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南迦帕尔巴特雪峰，才会到达终点伊斯兰堡。这条路时而在雪峰下蜿蜒，时而在印度河冲出的悬崖上盘旋，险象丛生，风景震撼，任何走过这条路的人，都会心生敬畏，对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发出由衷的感叹。

但是，人们很少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人完成过更加复杂的穿越：一支军队选取了比喀喇昆仑公路更加难行的道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艰难的行军。

人们如果从中巴友谊公路上的重镇吉尔吉特（Gilgit）出发——不是沿着公路方向走，而是顺着一条同名的河流向西行走——这条河流的北岸过于陡峭，只能顺着南岸行进，经过几天的步行，就会到达一个叫作古比斯（Gupis）的城市。在它的对面，另一条支流从一个山谷里流出，汇入吉尔吉特河，这条支流被称为亚辛河（Acesines）。亚辛河流经的谷地（即亚辛谷地）内部非常宽阔，但在两河汇合的地方（即入口

处）却极其狭窄，由此让这个河谷成了一个世外桃源[1]。即便到了现代，亚辛河谷也以与世隔绝的文化著称，直到近年才逐渐有所改变。

人们很难想到，在唐代时，这里竟然是一条沟通吐蕃和唐代新疆的重要通道。当时的吉尔吉特被唐朝称为孽多城[2]，是小勃律国的国都。小勃律的国境一直延伸到亚辛谷地，当时从孽多城沿着吉尔吉特河（时称娑夷河）西行，到达古比斯之后，要经过一座藤桥进入亚辛谷地。这座藤桥的建造难度极大，需要一年才能修好，也是这条路上的关键所在。过了藤桥，行三十公里路，就到了亚辛谷地最重要的城市，城市与谷地同名，也叫亚辛，而在唐代，则被称为阿弩越城[3]。

过了阿弩越城，谷地一路向上，经过三天的行程，就到达了一道令人目眩的雪山之墙。这道雪山上有一个山口叫作达尔科特（Darkot）[4]，在唐代，则称为坦驹岭。达尔科特海拔近五千米，终年积雪不化，如果要通过那里，必须踩在万年不化的冰川之上，冒着随时掉入冰隙的风险才能成功。过了坦驹岭，就进入了另一条叫作耶尔洪（Yarkhun）的谷地。达尔科特所在的山岭是耶尔洪河谷的南界，人们必须从达尔科特下来，穿过耶尔洪河谷，再爬到北面的另一个巨大的山口巴罗吉尔（Baroghil），才能下到位于现在的阿富汗的瓦罕谷地（唐代称为婆勒川）之中。从瓦罕谷地可以进入中国的新疆，也可以前往中亚地区，甚至可以通往古代的葱岭——帕米尔高原。

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年—756年），吐蕃人为了进攻唐朝，决定建立西方的交通线，于是将一位公主嫁给小勃律国王，获得了这条路的通行权。他们的军队绕行数千里，来到西部拉达克（位于现在的印控克什米尔，当时属于吐蕃），再经过小勃律，翻越两座巨大的山口（达尔科特和巴罗吉尔），进入瓦罕谷地。吐蕃人在巴罗吉尔山口下面的连云堡（位于现在阿富汗的沙尔哈德附近）建立了前哨基地，利用这个基地，就能够控制瓦罕谷地，再进一步控制帕米尔地区，从而可以侵入新疆的西部，并控制整个南疆地区。由于这里距离唐代的中心长安非常遥

远，更何况大都是四千米以上的高地，唐军士兵很难在此行军，而对于习惯了高原的吐蕃士兵却没有障碍。因此，这条路从理论上来说已经处于唐朝辖区之外，唐军难以到达，但对吐蕃人来说却是坦途。[5]

然而，吐蕃人没有想到，唐天宝六载[6]（公元747年），一位将军硬是完成了一次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7]。这位叫高仙芝的将军率领士兵从新疆的库车出发，用了三十五天行军到疏勒（现喀什），又花了二十天，穿过昆仑山脉西部的高峰慕士塔格，来到了唐代驻军的最西戍所——葱岭守捉[8]（可能位于现塔什库尔干）。从葱岭守捉出发，唐军又花了二十多天，来到了现在的帕米尔河地区（唐代称为播密川），又二十多天后，到达一个叫作五识匿国（现塔吉克斯坦舒格楠）的地方，位于特勒满川（现在的阿姆河）[9]。

在这里，高仙芝将兵马分成三路，分别是从帕米尔河直插瓦罕谷地的北路军，由东方沿着瓦罕河行进的东路军，以及从阿富汗巴达克山地区前进的西路军。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10]，三路大军会聚在吐蕃控制的连云堡之下。

连云堡位于现在阿富汗的瓦罕谷地之中，在现在的萨尔哈德附近。当唐军到达连云堡时，堡垒内部的吐蕃士兵大约有一千人，而在堡垒之外还有依靠山势建立的一系列防御系统，驻有士兵八九千人。堡垒在瓦罕河南岸，而唐军驻扎在瓦罕河以北。由于地势高，瓦罕河在早晨时流量更小，高仙芝利用这个特点在早上渡过了河流，将吐蕃人击败，杀死了五千人，生擒千人。

如果仅仅打到这里，虽然也是一次巨大的军事胜利，但无法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行军之一，因为连云堡所在的道路依然是中亚丝绸之路上的一条常用道路，法显、玄奘等人可能都使用过。[11]但这也并不是说这里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到了这里，跟随高仙芝的人都已经害怕了，甚至就连皇帝派来的宦官监军边令诚都不敢再前进一步。从连云堡已经可以望见南面那死亡之地的巨型雪山，没有人认为能够爬上去，或

者活着回来。

但高仙芝认为，如果仅仅打败吐蕃的一支守军就返回，依然无法解决长期问题。因为吐蕃人依然可以经过大小勃律国源源不断地派来军队，借助地形优势从高处冲下来，利用唐军无法长期驻扎的劣势，夺回连云堡。只有攻陷小勃律这个国家，获得整个王国的归顺，才有可能断绝吐蕃的北进之路。高仙芝选择将边令诚留下，还给了他三千士兵驻守，将剩余健壮的人带走继续前进。

即便是现代人借助现代工具，如果想从瓦罕谷地的连云堡直接翻越两大山口，至少也需要四天时间[12]，但高仙芝的部队却用了三天时间，就已经站在了达尔科特的冰川之上。

只是，上到冰川顶上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更困难的。这个山口的北面较为平缓，而南面则全是悬崖峭壁，想要从山口南面下去，必须冒着生命危险，直下四十余里，才能到达安全的驻扎地。即便下到了底，万一战斗失败，就连逃的路都没有，士兵们除了死亡，不会有别的结局。

为了让士兵们放心，高仙芝又派了二十个人冒充小勃律阿弩越城的人，其余人装作是刚从南面过来的，向阿弩越城表示愿意归顺。士兵们这才跟着他战战兢兢下了达尔科特山口，进入亚辛谷地之中。

对高仙芝有利的是，此时的小勃律国王并没有住在更加遥远的吉尔吉特，而是住在亚辛，也就是阿弩越城。阿弩越城距离达尔科特只有三天的路程，并且就在同一条谷地之中。与此同时，当听说高仙芝在连云堡的胜利之后，吐蕃的军队也正从吉尔吉特方向赶来增援阿弩越。于是，阿弩越城就成了唐军和小勃律人争夺的核心。此时，双方的军事敌对变成了另一种较量：对于小勃律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躲过唐军的打击，固守阿弩越城，等待吐蕃救兵的到来；而对于高仙芝来说，目标则是要阻断吐蕃的军队，并胁迫小勃律国王尽快（赶在吐蕃援军到来之

前）投降。

在这场竞争中，唐军依然取得了胜利。一方面，高仙芝派遣士兵去招降小勃律国王，并将当地亲近吐蕃的首领杀死；另一方面，他派人前往吉尔吉特河（时称娑夷河）上的藤桥，将它砍断。由于吉尔吉特河的北岸过于陡峭，从吉尔吉特赶来的吐蕃人只能沿着南岸走，到了现在古比斯（亚辛河口）的位置，再经过藤桥渡过吉尔吉特河，进入亚辛谷地。前已提到，修建这座藤桥，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高仙芝的军队将原来的藤桥砍断后，即便吐蕃军队赶到，也只能望着对岸的情况却无法过河，眼睁睁看着高仙芝俘虏亚辛谷地之中的小勃律国王了。

高仙芝的胜利，也成了盛唐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场胜利。唐朝和吐蕃是当时的两大政权，它们控制的疆土加起来几乎与现在中国的领土相当，可它们却在遥远的位于崇山峻岭之上的边缘之地进行了一场代价巨大的战争。这既反映了唐朝国力的强盛，又表现出战争的无谓。

从高仙芝的武功来看，这次远征几乎达到了古代远征的极限，比自古以来任何一次行军都困难，也更加伟大。但是，如果从结果来看，这场远征又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军事效果——它产生的结果甚至还可能是负面的：由于高仙芝的远征过于令人瞠目结舌，他获得了唐玄宗极为丰厚的赏赐，并被封为安西四镇节度使。然而，担任节度使的高仙芝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野心和贪婪。到了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就在达尔科特行军三年后，高仙芝又发动了另一场无谓的战争，这次针对的是位于中亚地区的石国[13]。石国并没想和唐朝敌对，本来已经答应与唐朝言和，但高仙芝乘着对方不备，突然引军袭击了对方，将石国国王抓获。

这次战争让高仙芝获得了大量的财富[14]，他还可以在第二年将石国国王和之前所擒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等人一同献给皇帝。但是，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就在高仙芝献俘的那一年（公元751年），逃走的石国王子联合了西方的阿拉伯帝国（时称大食），向唐军发出了挑战。高仙芝率领三万人向西进发，进攻大食，当他们来到位于现在中亚

地区的怛罗斯[15]时，与阿拉伯帝国军队相遇。

作为东西方的霸主，唐朝和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王朝很少有过直接冲突，但这一次却是例外。在战争中，唐军几乎全军覆没[16]。

日后，人们认为这场战争决定了两国的国运，阿拉伯帝国从此更加强大，而唐朝却一蹶不振。但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又夸大了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对于唐朝来说，这只是众多西域战争的一场罢了，三万人的损失也不算多，且死亡的更多是联盟的西域诸国士兵，如果仅仅从战争规模来看，并不足以对唐朝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这场战争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

那么，这场战争对盛唐的结束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答案是有，但并不是导致盛唐衰败的唯一原因。为了弄清楚盛唐衰落之谜，我们不妨到另一个战场去看一看。

在云南大理下关镇西洱河边，至今依然耸立着另一座巨大的千年前战争的纪念品，同样也象征盛世没落的开始。

如今的苍山洱海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旅游地，但在1300年前，这里却是一个近乎独立的国家——南诏国的所在地。云南省的地貌由高原和山地间无数的小盆地（当地称为坝子）组成，每一个盆地都天然地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盆地周边的山就是这个地理单元的防御线。然而，在云南所有的盆地中，却有两个大型的盆地具有更加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们是位于昆明地区的滇池盆地以及位于大理的洱海盆地。这两个盆地中有两个大型淡水湖，两个湖的岸边都有大片肥沃平地，加上周边山岭的保护，使得这两个盆地分别成了古滇国（秦汉时期）和南诏大理国（唐宋时期）的摇篮。

其中，由于昆明所在的滇池盆地周边山脉不够高，距离中原更近，所以古滇国在汉代时就并入了中华文明之中。而洱海盆地地理上的独

立，成了地区文明延续的保障。

在这里，洱海东西向只有几公里，但南北向却有几十公里长。在洱海的东侧，是较为陡峭、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小山脉，西侧则是巨大的苍山山脉，但在苍山和洱海之间，却有一条十几公里宽的平地，这块平地就成了大理地区文明所在。

除了苍山和洱海的保护之外，在这块平地的北面，也是在洱海的最北端附近，苍山突然间向洱海靠拢过来，使得平地陡然变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关口，人们在这里修建了龙首关（也称上关）。而在洱海最南端，有一条河流从洱海向西流走，称为西洱河，人们在西洱河上修建了龙尾关（也称下关）。

于是，东有洱海，西有苍山，北有上关，南有下关，这片平地成了易守难攻之地，南诏和大理的都城，就建在这片平地上。

在下关西洱河的南面，有一座巨型坟冢，被人们称为“万人冢”，或者“天宝将士墓”。在距离万人冢直线距离几公里的洱海南岸，还有另一座巨型墓葬，被称为“千人冢”，埋葬的同样是唐军将士的尸体。而在原南诏国国都旧址的太和城附近，有一块巨大的石碑，被称为南诏德化碑，其中记载的正是这场战争的事迹。[17]

根据记载，这场战争同样是由唐军的边将引起的。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位于昆明地区的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奸淫了南诏王阁罗凤的妻子，导致阁罗凤起兵杀死了张虔陀。第二年，驻扎在四川盆地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进攻南诏，兵败。[18]

到了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唐朝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再次派将军李宓率领十余万人进攻南诏，唐军到达后，在西洱河边全军覆没。[19]

这次战争中，南诏王阁罗凤的表现反而更像君子所为，即便在获胜后，也刻了一块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说明，表明责任不在南诏

一方，而且未来如果唐朝能够有所悔悟，也愿意继续与唐朝交好。这块南诏德化碑如同是对所谓玄宗盛世的控诉和嘲弄，表明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道义面前也有不堪的一面。

事实上，天宝战争与怛罗斯之战一样，距离安史之乱只有一步之遥了，就在怛罗斯之战四年后，也就是天宝战争两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如果说，天宝战争与怛罗斯之战只是边疆地区的战争，不足以警醒盛世中的梦者，那么安史之乱的钟声就让他们无法装作听不见了。

就在人们为安史之乱而扼腕叹息，认为如果不是这次大型叛乱的发生，盛世就可以持续时，在之前发生的这些战争，却给出了另外的回答，那就是：即便没有安史之乱，所谓盛世，也早已经结束了。事实上，即便没有安禄山，玄宗所留下的政治隐患也会在短时间内导致另一个乱局。

当皇帝决定用武力炫耀盛世时，就决定了后续的结果：当唐朝的边将和节度使们掌握了足够的权力，当他们的战争足以让中央政府的财政失控，当皇帝的政令在节度使对地方的全权掌控中被削弱，盛世就已经毁掉了。

我们可以说，盛世毁于战争。但事实上，唐玄宗后期的战争之所以增加，节度使之所以出现，又是唐朝从建立之初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本书所做的，就是追寻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盛世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崩塌，以及盛世中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选择。不管是皇帝、宰相、武将，还是盛世中的普通人，他们共同导演和见证了这个盛世，又眼看着它崩塌，却没有人能够将它救下……

而这一切，又是从唐朝特有的皇室政变开始……

注释

[1]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描写了一个叫作香格里拉的世外桃源，中国人将之穿凿附会到现云南西北的中甸，但事实上，根据小说中明确的定位，香格里拉所在的

位置应该在巴控克什米尔山区，而最符合小说描述的地理特征的，就包括亚辛谷地。当然，这个地点本身是虚构的。

[2]参见《新唐书·西域传》。

[3]由于各书记载地名往往不统一，如不加说明，所用古地名都是依据《旧唐书》。

[4]近现代对于达尔科特探索最深入的，莫过于英国人斯坦因。他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新疆探险时，从英控印度出发，在山口的南北两侧都做了详细测量。

[5]本书作者曾经在巴基斯坦东北地区考察，并探访了吉尔吉特、奇特拉尔、马斯图季和斯卡都等地。这里至今依然和古代一样难以通行，仿佛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

[6]玄宗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下诏改“载”，据《新唐书·玄宗本纪》：“天宝三载正月丙申，改年为载。”故自此后不称“天宝×年”而称“天宝×载”，沿用至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

[7]参考了斯坦因著作《重返和田绿洲》第二章。

[8]“守捉”是唐朝边地驻军机构，主要分布于陇右道和西域。唐制边兵守戍者，大者曰军，小者称守捉，下有城、镇。

[9]参见《旧唐书·高仙芝传》。

[10]本书中的日期分成阿拉伯数字和汉字两种，其中阿拉伯数字的日期均为公历日期，汉字表达的日期均为当时采用的农历日期。

[11]关于法显和玄奘的道路，可参考本书作者所写的另一本书《丝绸之路大历史》第二部《信仰时代》。

[12]此时间系斯坦因的估算。

[13]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

[14]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至少包括瑟瑟（碧色宝石）十余斛、黄金五六驼等。

[15]位于现代哈萨克斯坦塔拉兹。

[16]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年》。高仙芝的行踪是有疑问的，因为他在长安面见皇帝，并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也是在同一年。

[17]三个遗址中，千人冢位于现大理火车站东面的地石曲，距离火车道很近，万人冢位于西洱河南岸不远处。德化碑在太和城，距离万人冢约十公里。

[18]战争的详情见《旧唐书·南诏传》。

[19]《旧唐书》载唐军在太和城北战败。但现在的两个巨冢都在太和城以南的西洱河南。从地理位置上判断，唐军应当是从南面经过昆明、楚雄等地前来，在西洱河南岸受阻，无法到达北岸，因此两个墓葬的位置与军事地理的推测是一致的。很可能千人冢是鲜于仲通第一次进攻留下的，而万人冢是第二次李宓进攻留下的。可能李宓进攻时唐军与南诏军有两次战斗，一

次发生在洱河以南，而另一次发生在北方的邓川，也就是说，他曾试图从北面进攻。李宓从北面进攻的说法亦见于南诏德化碑碑文。

上部 盛世

第一章 血的开局

又一次政变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一场政变的传闻正在大唐的朝堂之上愈演愈烈。根据传闻，政变的策划方是当朝皇帝的姑姑，也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政变的对象则是新任皇帝李隆基。[1]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参与政治最多的王朝，这要得益于李隆基的祖母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向世人展示，即便是女人，也可以在朝廷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成为至高无上的人间主宰。这是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女强人都没有敢迈出的一步。

武则天的尝试打破了这层壁垒，她的野心也传给了后来人。到了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当皇帝时，皇后韦氏做了一次尝试。她联合武则天宠信的女臣上官婉儿、以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武氏残余势力、以她兄长韦温为代表的韦氏家族势力，与女儿安乐公主一起，试图效仿武则天，控制中央政权。

她们首先针对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太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兵

杀死了武三思，最终却兵败被杀。[2]接着，她们又毒死了唐中宗，立中宗的儿子李重茂为傀儡，并由韦后以摄政的方式掌握了政权。[3]此时距离中国出现第二个女皇帝仅咫尺之遥。但是一位青年皇子发动的一场政变，却让韦氏家族功亏一篑。

这位青年就是临淄王李隆基，他联合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动了突然袭击，剿灭了韦氏家族，甚至连襁褓里的孩子都没放过。政变后，李隆基的父亲——也是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当上了皇帝，是为唐睿宗，李隆基也顺理成章被兄弟们推为太子。

在清理韦后的残余势力时，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与他们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可是，政变成功，太平公主又继承了武则天与韦后的野心，试图控制朝政，这就与作为太子的李隆基发生了冲突。

被拥立上台的唐睿宗性格温和，无力制止双方的争斗，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妹妹，他都不好出面制止。最后，他选择了靠边站，把皇位交给自己的儿子，退位当起了太上皇。这样做，也是想让儿子李隆基趁自己活着，赶快巩固政权。

然而，他的做法却激化了双方的斗争。两大势力集团都认识到必须先发制人，以便获得足够多的利益，否则，必然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太平公主到底有没有策划针对皇帝李隆基的政变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人们都认为这样的政变必然发生，只是看谁先动手。是太平公主成为中国第二位女皇帝，还是年轻的皇帝巩固李氏政权，就在于这场争斗的结果。

在当时，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李隆基已经成了皇帝，这就意味着他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支持。中国一直是一个男权社会，人们更加容易接受男性作为皇帝。强如武则天，为了当皇帝也是费尽心机，消灭了大量的政敌，才利用强力勉强压住了男人们的质疑。即便这样，到了她年老生病时，以张柬之为首的大臣集团还是找到了机会，逼迫她将皇位让

给了她儿子。[4]

但也不能因此小看了太平公主的力量，她的力量从一个事例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截至当年七月，皇帝任命的七位宰相中，只有两位是皇帝的人，太平公主的心腹则有四位之多，还有一位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她的人，只是独立性稍强一些罢了。

在唐代，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官僚阶层，就是一个被称为“宰相”的小集团。

唐代的宰相和汉代不同，不是只有一位，而是有数位之多。这些官员往往是由皇帝从整个高官阶层中选出来的，皇帝给他们加一个头衔[5]，让他们参与政事堂会议，也就算是宰相了。

宰相的数量时多时少，一般不少于两个。在盛世承平时代，两个宰相是比较稳定和高效的结构，可是，一旦到了权力关系复杂的时候，宰相的数量就会膨胀，以反映各方政治势力的需求。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就恰逢这样的复杂时期。这一年年初时，已经有了六位宰相，分别是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检校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中书令萧至忠。[6]这六个人中，除了魏知古之外，都是太平公主的人马。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担任宰相的高官虽然有派系之分，却并非都一无可取。他们中有的人趋炎附势，但也有正直的人士，只是因为唐朝复杂的派系政治，所效忠的对象不同罢了。同时，随着中宗和睿宗时期政治派系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他们也在改换门庭中不断地迷失。

比如，崔湜在他的官宦生涯中，先后依附于武三思、上官婉儿、韦后和太平公主，也因为这些人的举荐而数次拜相，可以称为政治上的不倒翁。[7]

而另一位宰相萧至忠则更加复杂，他曾经在政治纷争中保护过相王（后来的睿宗），有政治意识清醒的一面，却又先后依附于武三思、韦

后和太平公主，也是数次拜相。

更加复杂的是第三位宰相窦怀贞，他在官小时曾经以清廉著称，但当了大官之后，开始学会了朋党政治，依附于韦后，甚至娶了韦后的乳母为妻。当时人们称乳母的丈夫为“阿爹”，所以他就自豪地自称为“翊圣皇后（韦后的封号）阿爹”，时人称他为“国爹”。韦后失败后，窦怀贞又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加入了太平公主的势力。[8]

如果说前三个人还更多是负面的，同样拜相的岑羲则以正直著称。他为人廉洁，曾经在武则天死后，与武氏家族斗争，也曾在唐中宗时期力保过当时的相王和太平公主。但在政治上，他也不得不依附于韦后，之后又选择了太平公主作为保护伞，成了新皇帝（玄宗）的绊脚石。[9]

除了这四位紧紧依附于太平公主的人，第五位宰相陆象先则显得与众不同。他虽然被看成太平公主的人马，却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陆象先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陆元方的儿子，为人正直，但他担任宰相竟然是不倒翁崔湜的功劳。当太平公主想任命崔湜担任宰相时，崔湜却表现出高尚的一面，要求公主必须先提拔陆象先，然后才能轮到自己。太平公主这才勉强要求唐睿宗任命陆象先为相。由于是太平公主的授意，陆象先通常被认为是公主的人马。然而，陆象先却是一位“不识时务者”，他并没有去拜见公主，也没有参与公主的阴谋活动。[10]

在六位宰相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皇帝一系的，只有侍中魏知古。他曾经在相王府任职，而相王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因此，魏知古是当时少有的一心一意辅弼年轻皇帝（也是相王的儿子）的大臣。[11]

宰相层面上，皇帝居于五比一的劣势之中。在次一级的官僚中，太平公主也有着很强的实力。在这些官僚中，她的死党包括了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唐太祖李虎的曾孙）、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僧人慧范等人。甚至有传言说，太平公主试图

借助一位姓元的宫人在皇帝的营养品中下毒。[12]

在复杂的派系和传闻之下，新任皇帝与公主的死斗几乎不可避免，然而作为太上皇的睿宗皇帝却依然不愿意出手制止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皇帝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和公主缠斗了。

事实上，在前一年，皇帝的亲信与公主的亲信已经有了一次交锋，当时皇帝的势力中还有一人担任了宰相的职位，他就是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刘幽求在玄宗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就和右羽林将军张暐合谋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最初他们向皇帝汇报了这个想法，皇帝是赞成的。但张暐的保密意识并不强，之后他又将计划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谨慎的唐玄宗担心事情失控，只好向太上皇主动汇报了刘幽求等人的密谋。太上皇大怒，要杀掉刘幽求，幸亏有人将其救下，最后发配广州。[13]

对于这样的结果，太平公主的党羽崔湜等人仍然感到不满意，派人命广州都督周利贞在刘幽求到达之后杀掉他。这件事被桂州（现广西桂林）都督王晙知道了，为了救刘幽求，王晙顶住压力将流放犯扣下，不让他去往广州，这才救下了这位前宰相的命。[14]

这一次轻举妄动，损失了己方的一员宰相，也让年轻的皇帝看到了斗争的复杂性。而他的亲信依然催促着他赶快动手。其中最激烈的是一位叫王琚的人，他不断劝说玄宗赶快行动，玄宗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却暂时没有采纳他的提议，只是将他作为一枚棋子埋伏在那里。[15]

到了第二年六月，皇帝终于有机会了，他任命了一位新的宰相。这位宰相出自西北的军事将领之中，在与吐蕃和突厥人的战斗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兵部尚书郭元振。郭元振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成了宰相，并迅速地进入了皇帝的决策圈。[16]到这时，皇帝扳回了一局，在宰相层面上双方实力对比变成了五比二——事实上是四比二，因为陆象先虽然因为是太平公主举荐的而被算成是她的人，却并没有参与

她的阴谋。郭元振作为久掌兵权的将领，他的支持意味着军队对于皇帝的背书。

除了两位宰相和王琚等人之外，唐玄宗的阵营中还有两位亲王，分别是他的兄弟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这两位宗室的加盟对于皇帝的权威是一种加持。自从唐太宗以来，唐朝宗室子弟之间血腥的斗争不断重复，玄宗获得了宗室的支持，也意味着他可以团结李氏子弟，共同对付外姓的敌人。

此外，支持皇帝的人中还有一些掌握着宫廷守卫和内侍职责的人，他们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这些人虽然职位不高，却主导着宫廷之内的防卫，是必不可少的。[17]

到了这一年六月，关于双方冲突的消息纷纷传来，玄宗一派的人更是不断带来太平公主将要举事的消息。反对公主最激烈的王琚告诉皇帝，事情已经非常急迫，不能再拖延了。另一位曾经担任过宰相的高官，时任尚书左丞的张说当时在东都，也派人送给皇帝一把佩刀，意思是皇帝必须赶快做个了结。同样担任过宰相的崔日用，参与铲除韦后之后，因得罪了太平公主而被贬为荆州长史，恰好在长安向皇帝奏事，不仅劝皇帝赶快动手，还给皇帝策划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即先控制禁军系统，再铲除公主一党。[18]

到了七月份，宰相魏知古向皇帝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表示这个月的初四就是公主一党行动的时间。这个最后的信号让皇帝终于下决心行动了。[19]事后，我们只能得到皇帝一方的证词，表明公主事先策划了叛乱，而皇帝是为了挫败公主的阴谋，才不得不提前行动。这个证词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只是我们可以根据唐代频繁发生的宫廷叛乱来判断，不管证词是真是假，形势已经让双方的冲突必然发生，因此，追究皇帝证词的真实与否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叙述两者的图谋前，必须先看一下皇帝和太上皇居住的环境，以及朝廷的地理位置。

在武则天时期，武后长期在东都（曾改称神都）洛阳执政，直到她死后，中宗才将朝廷搬回了西京长安。唐代的长安主要有三大宫殿群，分别称为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三个宫殿群又由于在京城的位置，分别称为西内、东内和南内[20]。与前两者比起来，南内兴庆宫本来只是玄宗为藩王时的居所，规模较小，在政治上也不如前两者重要，这里先不提，先说前两个巨型宫殿群。

西内太极宫位于长安城的北面。作为京城的长安分成了三大区域，其中最外层的是正方形的京城，居住着三教九流。在京城的北墙之内，有一块区域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叫作宫城。宫城继承自隋朝的建制，就是太极宫。如果仔细分起来，太极宫又包括了三部分，分别是皇帝居住的太极宫（位于中间）、太子居住的东宫（位于东面）、容纳宫女和罪犯女眷的掖庭宫（位于西面）。

在太极宫的南面，是官员们办公的皇城，这里设立了中央政府的众多衙门机构，其大小也与太极宫相当。在皇城之南的京城其他区域，才是众多百姓居住的里坊。而京城之北（也是宫城之北），就是专属皇帝的广大禁苑，供皇帝游猎之用。

太极宫之所以称为西内，是相对于后来建设的大明宫而言的。太极宫是在京城的城墙之内，而大明宫则在城墙之外，处于城墙的北面偏东的位置，所以号称东内。

大明宫最早是唐太宗给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李渊建立的宫殿，但李渊没有住进去就死了。之后这项建设工程长期搁置，到了高宗和武后时期才又重启建设。高宗由于患有风湿病，希望居住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选择了处于更高处的大明宫。因此东内大明宫逐渐取代了西内太极宫，成了皇帝居住和听朝的所在。

武则天统治后期，由于她长期居住在洛阳，西京的宫殿都处于空置状态。中宗回来后，没有选择父母居住的大明宫，而是迁回了原为正宫的太极宫。

睿宗将皇位禅让给玄宗之后，却并没有将权力完全放给玄宗，而是继续充当着最后的拍板人的角色。他依然占据了太极宫的主体部分，只是将太极宫建筑群东部的武德殿让给了皇帝，供玄宗居住和办公之用。

太上皇规定，皇帝每天都要在武德殿临朝处理政务，而每隔五天，太上皇就会在太极宫的正殿太极殿临朝。这事实上表明，帝国的大事依然是太上皇在正殿做决策，只有一般性事务，才在偏殿武德殿内由皇帝决定。

从武德殿前往太极殿，需要经过武德殿的正门武德门和一道偏门虔化门，李隆基虽然做了皇帝，但和帝国的最高权威之间还隔着这两道门。

在玄宗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中，双方都必须考虑宫廷的地理布局，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迅速消灭掉对方，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首先看太平公主的策略。她的策略重心在两位党羽——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身上，这两人掌握着左右羽林军。玄宗继位之初的先天年间，在国都的北门外主要有四支军队，分别是左右万骑和左右羽林，号称北门四军，其中领导、掌握左右羽林的就是常元楷和李慈。

除了北门外的军队之外，在宫城以南还有一部分南衙军，这一部分军队可以由宰相窦怀贞调动。根据皇帝后来所言，太平公主是想趁初四这一天皇帝在武德殿上朝时，由常元楷和李慈从北面进入武德殿，将皇帝及其追随者一网打尽，而窦怀贞则从南面进入太极殿，控制太上皇，从而形成对朝廷的完全掌控。[21]其核心策略在于从南北两方同时进入宫城，还必须抓住皇帝上朝的时机，让他的党羽无法逃脱。可皇帝是否

会这样束手就擒呢？

既然太平公主主要依靠的是北门的左右羽林军，那么皇帝依赖的就是剩下的左右万骑了。左右万骑的指挥官号称龙武将军，而龙武将军王毛仲就是皇帝的死忠。要想以左右万骑对付左右羽林，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先发制人。

初三，也就是传说中太平公主起事的前一天，皇帝开始行动了。这一天上朝时，皇帝命令王毛仲取来马厩里闲置的马匹，率领三百名士兵，从他居住的武德殿出发，通过他和太上皇住所之间的虔化门，到达太极殿。

太极殿是太上皇上朝和举行大典的所在，在宫殿的周围，还有一系列的建筑，这些建筑容纳了唐朝官僚机构中顶尖的那一部分。在太极殿以东，是门下省、弘文馆和史馆的所在，而在太极殿以西，则是中书省和舍人院。在更靠南的位置，是皇帝当作内库使用的东西左藏库。[22]在宫城的正门承天门内，还有东西朝堂，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23]

王毛仲率领士兵首先到太极殿背后的北门，找到了两位羽林将军常元楷和李慈，出其不意将他们拿下，直接斩首，这就割断了太平公主与羽林军的联系，让她失去了北门军的指挥权。剩下的则是对付一群文官了。在解决掉羽林将领之后，王毛仲顺道突入了太极殿以西的内客省，将隶属中书省的两位官员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抓获。

到这时，太平公主最重要的羽翼还剩下四位宰相。宰相们办公的位置在承天门内的朝堂，王毛仲率领士兵向朝堂扑去。他们首先碰到了萧至忠和岑羲，将二人拿下直接砍了头。但是窦怀贞却没有立刻被找到，直到他们在附近的一条沟里发现了一具刚刚自缢的尸体，才确定这就是宰相窦怀贞最后的结局。愤怒的士兵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鞭笞。

太平公主系的最后一位宰相崔湜并不在现场，因此没有被当场杀死。到后来他被抓住时，皇帝已经控制了局面，不想再多杀人了。崔湜

在太平公主党羽中是最卖力的一个，皇帝却只判他流放到窦州（现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不过，由于公主的另一个党羽新兴王李晋在被杀之前出卖了崔湜，加之他勾结太平公主阴谋给皇帝下毒的事情传了出来，皇帝在他走到荆州的时候赐死了他。

在王毛仲率领士兵逐一消灭政敌时，作为宰相的郭元振也没有闲着。当政变发生时，太上皇在宫中听说发生了兵变，连忙跑到了宫城正门承天门的城楼上。由于唐朝宫廷发生政变过于密集，逃跑是老皇帝或者太上皇们都必须学会的本领。

太上皇之所以上城楼，是为了吸引南衙兵的注意。这就很可能让事情复杂化，而这时，就是掌握兵权的宰相郭元振出场的时机了。他连忙带上士兵，跟着太上皇来到了城楼上，向太上皇禀报皇帝正在锄奸，这么做一是为了让太上皇放心，不要反抗，二是避免太上皇召集南衙兵。

过了一会儿，处理完大事的皇帝亲自来到了城楼，劝父亲回去休息，不要担心。太上皇也明白该完结的事情都已经完结了，他的妹妹也保不住了，连忙顺势下了诏书，将事情归咎于已经死去的窦怀贞等人，并表示除了一小拨参与了谋乱的人之外，其余人等不予追究。

太平公主的党人中，被追究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薛稷、李晋等少数人。按照唐律，谋反是要牵连到家人的，但事实上，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从轻发落。

另一位宰相陆象先虽然被看成是公主党的，但是在李隆基继位之前，太平公主谋求废掉李隆基，陆象先不仅不服从，反而据理力争。这件事让玄宗皇帝记忆犹新，表示“岁寒知松柏”，暂时继续让他当宰相。陆象先也利用自己宰相的职位挽救了不少人。[24]

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太平公主的命运又如何呢？

政变发生后，太平公主逃入了山里，但在皇帝的穷追猛打之下，三天后，她不得不出来投降。这一次，就连她的哥哥也无法帮助她了。就

在政变的第二天，初四，太上皇宣布将一切权力让给自己的儿子，不再参与朝政，避居百福殿养老去了。玄宗皇帝从此完全掌握了军政大权。

失去了太上皇的保护，太平公主被赐死在家中。但对于公主，皇帝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仁慈，公主的儿子薛崇简因为劝说过母亲不要发动政变，不仅没有被处死，反而官复原职。

皇帝为了表明镇压太平公主的正当性，下令搜查公主府，从中搜出了大量的珍奇器玩，对于她掌握的牛羊马匹、山川土地也进行了清点，至于这些动产和不动产所产生的利息更是数年都还没有算清。[25]

初六，皇帝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这也表明他最终掌握了权力。

历史上往往将这次政变当成开元盛世的开局。然而，经历过政变的唐朝人却并没有这么乐观。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很难把这件事当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反而认为它只不过是唐朝无穷无尽的政变中最新的一个罢了。到政变发生时，唐朝这个建立不足一百年的王朝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在玄宗的祖母武后统治时期，这个王朝已经带上了衰老的特征，人们对它的信心并不强，反而见证了它不断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危机。武后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时期，朝政更是混乱不堪，看不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新的小皇帝有能力扭转乾坤吗？

到底是走向盛世，还是走向衰亡，往往只是一念之间。更何况，唐朝本来就有内乱和斗争的传统，这已经导致了数次生死之局。在叙述唐玄宗的选择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他接手的唐朝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才更能看清楚唐玄宗时代的发展和它的不足。

唐朝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三大类：没有底线的内斗，不断挤压中央政府财政空间的北部边患，以及混乱不堪的财政系统。

内斗不断的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疆域较大、时间持续较久的大一统王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为教训出现的。但这种史学观点往往忽略了下面的事实：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26]

唐开国不久，秦王李世民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他的哥哥（当时的太子）和弟弟杀掉，换来了皇冠。这次兄弟之间的杀戮也造就了唐代的内斗精神。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27]

但是，唐代却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国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亲信体系，结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

朝堂内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着两大政治传统。其中一支是从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纯粹的汉族文化体系。在秦和西汉时期，这个体系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有着激烈的内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安全感。可是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减少这种斗争对政权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权内部的权力制衡也增加了。这种传统的制衡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第一次失调，随之而来的崩溃造成了三

国时代的混乱。西晋初期，晋武帝试图恢复内部的制衡，进行文治。不幸的是，北方出现了另一政治传统：由游牧民族带来的更加有活力却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马背之上和战争之中，他们对政治的权力制衡和制度建设一窍不通，却个个能征善战，很快冲垮了西晋司马氏的重建工作[28]，将秉持秦汉以来文雅平和的政治传统的人赶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军事征服和强力为特征的政治体系。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弱的政治传统接近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统治传统却居于强势。这种北方政治传统由北魏传给了西魏，又由西魏传给了隋，最后被唐所继承。[29]

隋代时，开国势力依然以武将集团为主。而在王朝内部，不管是皇子之间还是大臣之间，必须靠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决定胜负。这种野蛮性是作为隋代重臣的唐高祖父子所熟悉的。而唐代又偏偏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新建设的朝代，它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将北朝以来的杀伐气也继承下来。

唐高祖后期，三个儿子的势力范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唐高祖并没有能力控制三个儿子，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只能试图在其中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随着三个儿子斗争的显性化，一次血腥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了，没有人会遵循点到为止的方针，必然需要取得对方的性命，才能结束。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在他的儿子和大臣之间，还会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系来，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杀掉对手为终结”的规则，而唐太宗在制止这些杀戮上依然无能为力。他本来想做一个仲裁者，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参与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们，让他们忘记杀戮的本性。他的事迹后来经过史臣吴兢的记录，变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以“唐太宗纳谏”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约束，而仅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我们可以将唐太宗时代和宋代最自由的宋仁宗时代做一个对比。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争吵的时代。如果宋仁宗实在忍受不了某个大臣，想杀了他，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老祖宗（宋太祖）时就已经禁止杀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无法杀他，因为皇帝没有这个权力。可是如果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惯例杀了这个大臣会怎么样呢？首先，皇帝会遭到谏官的反对。谏官由于知道皇帝无法下旨杀自己，一个个以和皇帝吵架为荣。在谏官的鼓噪下，从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杀死大臣是不妥当的，于是，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会被执行。这种遵守传统又互相制约的体系，让皇帝根本不会动杀死大臣的念头，最多将其革职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随着新旧党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并已经到了亡国之际，才出现了少量杀大臣的例子。[30]

但在唐代，皇帝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即便史官再称赞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实上，太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是有权力杀死任何人的；第二，他之所以不杀，不是因为不能，只是因为不愿意；第三，他听别人的意见，也不是必须听，而是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甚至有权杀死任何给他提意见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对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员感到不满，立刻发怒，要在朝堂之上将他斩首，但被太子劝住了。于是大臣长孙无忌立刻抓住机会恭维皇帝有个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维下，捡了个台阶下的同时，对太子也夸赞一番。[31]在这里，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而大臣们与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个易怒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既可以选择收敛自己的脾气，也可以选择不收敛。即便是善于直谏的魏徵（太宗自己树立的直臣的榜样），太宗也数次动过要杀死他的念

头。[32]

正是因为唐代缺乏对朝政中杀人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随便杀人，大臣和宗室之间胜者为王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内斗愈演愈烈。

在这种风气之下，唐太宗的儿子们也继承了和父辈一样的传统，在父亲还活着时就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唐太宗作为一个仲裁者显得手忙脚乱，家庭事务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这种斗争更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混乱一直持续到了高宗时代。在太宗的儿子中，太子李承乾因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谋反而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因为争夺皇位被贬，齐王李佑被赐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蒋王李恽自杀，越王李贞因为反抗武则天被逼服毒自尽。[33]

与皇帝的家庭悲剧相比，大臣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杀戮，还显得比较克制。为了表彰追随他打天下和夺权的功臣们，唐太宗在太极宫的凌烟阁中为二十四位功臣画了像，在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谋反罪杀掉了两个——侯君集和张亮。侯君集是因参与了太子的谋反而被杀。[34]至于张亮谋反，更像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件。当人们告他谋反时，唐太宗面对无力的证据也选择相信，只是因为张亮的养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势力而无法制衡。[35]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和儿媳妇（也是太宗的嫔）武则天时代，皇帝的权力更加没有限制。两人执政时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太宗的亲信大臣上官仪、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刘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即便在整个唐代，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也是个极其危险的群体。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36]，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罢相后惨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来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37]。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职也同样危险，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现代人

将武则天定义成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历史上，武则天除了丰功伟绩外，还是一个会玩弄手腕的女强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时代，以及她单独统治的时代，从整个唐代来看都属于酷吏时代。

中国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特征，当朝代建立后，恢复了和平，政府对民间的干扰不多，于是就会产生一次超级繁荣。但在超级繁荣时，官僚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却在加速，这种破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税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阶层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无法管理基层的官僚队伍。

到这时，皇帝就会采取措施，对官僚阶层进行约束，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时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来重整官僚队伍，同时由于皇帝的集权动作，使得民间经济发展也放慢下来，产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这个经济收缩和集权的时期在汉代对应汉武帝时期，在唐代就对应武则天时期，而在清代则对应雍正时期。但是一个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时代又总是会结束的，皇帝的集权举措也会暂时退缩，于是就有了经济的再一次发展，这在唐代就对应唐玄宗的开元时期。

武则天的酷吏时代是皇帝借助低层的酷吏，对官僚阶层进行的一次整肃行动。甚至到武则天死后，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都无力恢复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权仍然在酷吏与宫斗的剧情中颠簸，直到玄宗利用两次血腥的政变上台。到这时，唐代已经在浴血的内斗中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在这样的斗争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而与内斗相伴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外部局势。

帝国早期的边患

在中国几个大王朝的对外关系中，汉朝是一个幸运的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汉朝都只有一个主要的外部敌人[38]。作为对比，唐朝却是一个不幸的王朝，在它存续时，周边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隋唐政权本身继承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就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甚至隋唐时期的宗室和大臣，也多多少少都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在中原的北方和西方，也有着不少的游牧强权，在如今属于中国的内蒙古、新疆，蒙古共和国和中亚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争霸戏剧。

首先继承了匈奴霸权，可以被称为帝国的，是柔然[39]。人们也因此将柔然称为匈奴之后和突厥之前的第二游牧帝国。但是，柔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名气不大，主要原因是它的出现，恰好处于东西方强大政权的间歇期。在西方，罗马帝国已经崩溃，而在东方，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这导致周边文明没有兴趣记录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40]到了隋代中国再次统一后，柔然帝国却又已经衰落了，中国北方和西方已经是突厥帝国的天下。

唐代时，中国周边的敌人更加复杂，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不止一个。我们可以将周边政权概括为突厥系[41]、吐蕃系[42]、朝鲜系[43]，以及更加遥远的大食帝国。

在突厥帝国崛起之前，中亚地区除了柔然，还有一个叫作铁勒（即高车，后被柔然击败）的部族。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当中国北部还处于东、西魏的分裂状态时，突厥取代柔然成了西部的霸主。[44]

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突厥土门可汗击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北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突厥西半部的室点密可汗联合波斯，将中亚的另一个霸主嚈哒人（主要居于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击败。[45]在短短六年间，突厥人就在太平洋、里海、贝加尔湖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然而，也正由于疆域过于庞大，突厥无法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到了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这两部分在与隋朝的战争中继续分裂，东突厥向隋朝投降，西突厥则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

隋文帝对突厥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成功地维持了突厥的分裂状态。但到了隋末炀帝时期，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两突厥都重新崛起。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西突厥在射匮可汗的领导下完成了复兴，建立了西突厥汗国，形成了以中亚和西域为核心的强大游牧国家。

同样是在公元611年，东突厥也迎来了一位新的可汗——始毕可汗。在这之前，东突厥已经成了隋朝的臣属，但随着隋朝的衰落，始毕可汗加强了与隋朝的对抗。仅仅四年后的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为了应付突厥人煽动的北方边疆各民族起义，隋炀帝率军北上，却在雁门（现山西代县）被始毕可汗的数十万骑兵围困长达一个月，后由于援军的到达而解围。[46]这次事件也预示着中国北方的霸主，已经从中原转移到了东突厥。

到了隋末大乱，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起兵时，整个中国北方防线上各路诸侯几乎都以突厥人为宗主。除了李渊之外，向突厥称臣的军阀不下九人[47]，有的甚至还接受了突厥人的封号。事实上，李渊在起兵后，为了防止突厥以及他们的附庸在背后突袭，也备了大量的礼物，放低姿态向始毕可汗称臣，并向突厥许诺一旦获得了都城，他们只要人和土地，金银财宝都归突厥所有。[48]李渊父子依靠与突厥的和平，引诱突厥放弃对其他附庸的支持，占领了长安，最终统一了中原。

到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立刻感觉到出现了机会，在投降他们的汉人鼓动下，率领十余万人向长安进发。他们来到长安附近渭水上连接两岸的便桥以北，接下来，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故事。

按照这个故事所说[49]，刚刚即位的太宗李世民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来到了便桥以南，与突厥人隔水相望，太宗在马背上义正词严地指责突厥乘人之危，这样违背道义的事情怎么可能获胜？果然太宗的指责有了效果，第二天，感到理亏的突厥人前来请和，双方在便桥上斩白马而盟，之后突厥人回兵，放弃了进攻。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仁义之主”，唐太宗在突厥人回兵时并没有掩杀，甚至当群臣问他为什么不乘机袭击突厥的军队时，他还说了一大通道理。原来，突厥人来的时候，太宗已经派人抄了他们的后路，形成了夹击的局面，可以借此打败敌人，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突厥人才不得不选择了求和。而皇帝之所以不在对方归途中进行袭击，是考虑到自己刚上位，要与民休息，不要随便打仗。

通过这一段话，唐太宗仁义之君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样的说辞却可能掩盖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当时更强大的一方，突厥人之所以撤退，并非是感受到了唐太宗的仁义，而是因为接受了贿赂。[50]

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这次便桥之盟反而让唐太宗意识到，突厥人才是他最大的敌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唐朝开始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对付东突厥。与此同时，由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发生了冲突，导致东突厥内部发生了分裂，突利可汗投靠了唐朝。之后，各个部族纷纷背叛了颉利可汗，唐朝乘机出兵。在李靖、苏定方等人的率领下，唐军最终击败了东突厥。就在便桥之盟四年后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强大的东突厥就消失了。[51]

而西突厥也在和唐朝的战争与和平中起起落落，最终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唐太宗的儿子高宗皇帝击灭。

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唐朝面向突厥故地的四大都护府也逐渐建立了起来，它们分别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建立的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建立的安北都护府、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设立的单于都护府、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设立的北庭都护府。[52]

在这些都护府中，最重要的是面向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安西都护府。它所辖的区域内主要包括了四个军镇，最初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在高宗时代西突厥灭亡后，四镇又设在了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延伸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因此，安西都护府辖区也往往被称作安西四镇。到了玄宗时代，此地成为著名的安西节度使辖区。

在唐代初期，战争的对手除了第一突厥帝国分裂之后的东西突厥人之外，还有位于现在青海湖南岸的吐谷浑人，以及朝鲜系的三个国家，之后则是新崛起的吐蕃人和大食人。

吐谷浑原本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鲜卑人的一支，在流徙中来到青海湖南侧建立了国家。到唐朝建立时，吐谷浑已经存在了三百年。唐太宗即位后，也曾经与吐谷浑作战，双方战战和和。到了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西藏地区崛起的吐蕃击败了吐谷浑，将它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53]，于是吐蕃取代了吐谷浑的地位，成了唐代西南地区的心腹大患[54]。

根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族人源于一个叫作雅砻的部落。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松赞干布出生时，这个部落已经从位于现代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谷地出发，征服了苏毗、象雄，成了广大藏域的主人。[55]

松赞干布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新的赞普。在他统治时，吐蕃进行了大量的改革。除了统一藏域之外，他还迁都拉萨，创造了文字，并进行了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改革，将吐蕃从部落变成了一个集权式的国家。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朝的宫廷里第一次迎来了吐蕃的使者，唐太宗随即派遣冯德遐跟着使者前往吐蕃抚慰。随后，两个国家发生了初步冲突，但还是决定对对方采取友好的姿态。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选择了一位宗室女子，封为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这位女子就是文成公主。[56]

然而两国的友好并不持久，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的儿子唐高宗继位。第二年（永徽元年），吐蕃的松赞干布也去世了。继任赞普的是他未成年的孙子，而权力则落到了大论禄东赞的手中。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接受了吐蕃的敌人吐谷浑的附庸。不久，吐蕃决定对吐谷浑开战。未几，禄东赞去世。在和唐朝的关系上，他属于“鸽派”，他去世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越打越烈，吐蕃最终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战争也持续了上百年。[57]

除了吐蕃之外，唐朝在西方的另一个敌手是阿拉伯帝国，也就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大食。人们总是认为唐朝的崛起已经非常迅速，但阿拉伯帝国的速度却更加惊人。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等离开故乡麦加，去了另一座城市麦地那。这时的阿拉伯依然是一盘散沙。之后阿拉伯人开始了南征北战，从北非直达中亚，到了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人完成了对波斯的征服，最后一位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在波斯帝国东疆的古城木鹿（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附近被杀。到这时，仅仅一代人时间，西方就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经过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

但阿拉伯人并没有就此罢手。公元652年到653年，阿拉伯大军进攻吐火罗斯坦，征服了整个地区。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于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夺取了布哈拉，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获得了撒马尔罕。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和第二年，阿拉伯部队甚至接近了位于现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喀什噶尔（今喀什附近），也就是大唐时期的疏勒国的辖地。[58]

阿拉伯人与唐朝的实际军事接触很少，即使有怛罗斯之战，对唐朝的军事破坏也是有限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存在，又对唐朝的西域政策造成了足够大的影响，让中亚和西域地区的政权多了一种选择，也让唐

朝的征服难度加大。特别是阿拉伯人以宗教来同化中亚地区，其过程中产生的宗教连接让中亚地区在此后事实上与中华文明完全分离了。

不过，在唐太宗末年，吐蕃和大食只是崛起，和大唐王朝的冲突并没有全面爆发。唐太宗在他的一生中南征北战，将突厥系势力降伏，被誉为一代雄主。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声赫赫的皇帝到了晚年却差点儿因一个小国栽了跟头，明君形象险些毁于一旦。[59]这个小国就是当年坑苦了隋炀帝和隋朝的高句丽。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覆亡，但在唐太宗治下，也发动了三次对高句丽的远征。唐军的出征与隋炀帝的结局也很类似，劳民伤财，却突破不大，这证明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于战争问题的徒劳无功。[60]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第一次出征高句丽，十万大军在他的率领下向东北进军。最初唐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对方却采取了紧缩防守的策略，依靠着冬天严寒的天气击退了唐军。这一次，唐军的人员损失不大，但军马损失了80%。在中国古代，军马就是最重要的军事装备，而且由于中原气候不适合养马，军马的恢复周期特别漫长，最高保有量不过几十万匹。在战争中损失了八成的军马，即便在基本面上显示不输不赢，实际上已经是一次巨大的败仗。[61]

两年后，不甘心失败的唐太宗再次发兵。唐军水陆并进，攻击高句丽，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决定再派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他在陕州（河南西部与陕西交界地带，现三门峡市所在地）和山东半岛一带大量储存军粮，又在南方聚集了庞大的舰队。

出征高句丽的舰船要在四川境内制造，再顺长江而下，驶入东海，前往朝鲜半岛。另一部分则是将四川境内采集的木料沿江运至浙江一带

制造，但造船的钱出自四川，每艘船的成本大约为一千二百匹缣。

这一次军事准备给中国境内带来了持续的恶性影响。朝廷对四川加税引起了当地的骚动，邛州、眉州、雅州的本地人开始造反。为了镇压，唐太宗又从现在的甘肃、陕西、重庆、湖北一带调兵。于是，东征高句丽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调动。[62]熟悉历史的人可能已看到了隋末的影子。事实上，隋朝的衰落也恰好是因为隋炀帝不计代价地出征高句丽，却屡屡无功而返，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不过，唐太宗比隋炀帝幸运得多。这不在于他有多能干，而是因为，就在全国将要大乱时，他去世了。太宗死后，他的征服计划也随之搁浅。全国又进入了另一次休养生息阶段，唐代也避免了一次巨大的混乱。

高句丽又存在了近二十年，直到其国家内部出现了衰落，才在乾封三年（公元668年）被唐朝征服。

对于唐朝来说，太宗出征高句丽是一次巨大的教训。此前唐朝往往是利用合纵连横，并且必须等到对方的衰落期才出兵的。如果时机不对，即便是高句丽这样的小国都会对庞大的唐帝国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唐朝的军事力量甚至无法应付一个小国呢？答案不完全在于军事，而是在于隋唐以来不完善的财政制度。

与唐朝发达的社会和经济相比，唐朝的财政制度是极其落后的。当战争打破了财政平衡时，尽管皇帝想表现得英明神武，但财政却不允许。

混乱的财政系统

唐朝的财政系统继承自隋代，而隋代的财政系统又部分来自之前的西魏和北周。在这份传承的遗产中，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是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制度）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段持续的财政制度周期。第一次从秦汉开始，延续到三国、两晋，并结束于南朝。到了南朝逐渐衰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将军事劫掠式财政过渡到了定居式财政，并在北魏时由于文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而得以固定下来，之后传给了东、西魏，再由隋唐所继承。

在这第二段大周期中，以土地公有制和松散的财政为主要特征。北魏最初是从游牧民族转化而来，他们占领中原时，中原由于连年的战乱，无主土地非常多。而新兴王朝在建立新制度时，往往是从古代的典籍里寻找依据，根据儒家传统，认为春秋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所以北魏在进行财政固化时，发明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土地分配方法，叫作均田制。[63]

北魏、北周、隋唐的所谓均田制，是指人民出生之后，就可以从政府获得一份土地，由他们一辈子进行耕种，并上缴税收。他们死后，政府回收土地，以便能够把土地分给新出生的人。[64]

由于土地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就可以根据家庭情况来向这些土地收税。到了隋唐时期，财政制度进一步复杂化，形成了所谓的租庸调制度。

唐代的税制从账面上看显得非常公平，它分别以土地、人头和家庭三个统计项为单位，进行三个项目的征税。但是，在世界税收制度的设计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税制不能过于复杂，一旦税制复杂了，那么征收效率会非常低，不仅无法达到公平，甚至根本收不上来。而所谓的租庸调制就过于复杂。

根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时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调制的规定如下：

租：按照土地进行征缴的税收。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如果是一家之

主，还可以另外得到二十亩土地。在这些土地里，其中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十分之八是口分田。当受田人死后，他的世业田是由户主继承的，也就是属于私人田地，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进入分配池，重新分配给别人，这一部分就是公有田地。作为义务，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向政府缴税。

调：家庭手工业税。居住在各地的人们，根据地方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养蚕的地方每年每户上缴二丈绫绢，加上二两纯丝；不养蚕的地方缴纳布匹代替丝绢，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时再缴三斤麻。所以“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庸：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需缴纳代役钱，每天为三尺丝绢。如果政府今年有事，需要多征几天力役，那么多征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户调负担，多征三十天则租和调都要免除。每年最多使用力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由此，“庸”是以人头为单位的。

此外还有一些杂项规定，但基本税收就是租、庸、调三项。按照唐代的规则，每年都要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65]，而对于每户的财产也需要三年厘定一次[66]。

表面上看，只要做到查清土地、人口和家庭数据，就可以将税收平均分配于整个社会。但事实上，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里，政府是无法查清税基的。比如，唐代规定三年必须清查一次财产，一年必须分配一次土地，但这样的工作量即便到了现代依然无法完成，更何况是古代。这种税制最终必然导致官吏的懒政和胡乱征收，这又会带来人民的懈怠和抗税，增加财政税收的难度。

由于制度的复杂性造成的问题在隋唐以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

在隋代，隋文帝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为了查清税基，不惜采取弹压的方式和极其苛刻的政策，结果官员们为了讨好皇帝采取了虚报的做

法。隋代的土地数据出现了巨大的浮夸，土地上报数量和实际数量最多相差十倍[67]。这种浮夸导致皇帝按照夸大的土地数据征收税款，人民负担过于沉重，出现了严重的逃户事件[68]。而隋朝税收过重也最终压垮了其政权。

经过了隋朝的混乱，唐朝建国时恰好是人民占有土地、逃避户籍的高峰期。由于高祖采取了宽简政策，政府没有恢复隋代高效的行政机器[69]。加之隋朝分配土地时，许多流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到了唐朝初年，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进行分配，而在隋朝分到了土地的人也并不愿意在他死后将土地返还给政府。这样，土地分配制度慢慢地就执行不下去了。为了逃避土地返还和税收，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户籍，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是被政府回收，而是被私人偷偷在地下市场上买卖。

人们逃避户籍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托关系拿到僧道的户籍，有的人占用军籍，或者依靠豪族，充当色役，寻找一切可能的免税、免役机会。[70]

在土地市场上，由于私人出售土地的地下市场的形成，许多有权势的家族开始积攒土地，远超规定的额度。[71]到了唐高宗时期，土地的缺乏使得皇帝决定向地下市场开刀，回到“由政府回收土地再重新分配”的轨道上。他下令禁止买卖世业田、口分田。但皇帝的命令比不上利益，人们照样买卖不误。[72]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代的人口数据一直不如隋代清晰。这并不是唐代人口不多，只是政府查不出来。

隋炀帝时期，人口户数最高接近九百万户，人数则达到了四千六百万人。[73]

由于隋文帝定下的严格的制度，隋朝政府能够跟踪每一个人，不让他们游离于户籍之外。但是唐朝却做不到，根据唐代的统计，隋炀帝统计人口十年之后，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公元625年），人口下

降到只有二百万户。[74]也就是说，十年时间，人口“减少”了70%还多。当然，这样的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不是在战乱中死掉了，而是由于唐代的统计机构不合格，许多活着的人成了逃籍户，未出现在政府的花名册上。

唐太宗统治的巅峰时期，唐朝的户数也只有三百万户[75]，距离隋代的人口高峰（九百万户）仍然相差甚远。太宗的继承人唐高宗统治时期，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时，户口达到了三百八十万户。[76]

唐代查不清户籍和土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政府查不清，反而骚扰更少，征税机器的低效让民间经济受到了保护，促成了贞观之治。但坏处则是，由于政府找不到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税，唐代的税收一直不够用。

此外，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77]，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在籍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导致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20%左右。

由于税收不够，唐代玄宗之前的皇帝们都为土地问题头疼不已，屡屡下禁令不准买卖，试图回收土地，但总是没有效果。到了玄宗，他干脆默认了既成事实，彻底松弛了户籍和土地的管理。[78]

到这时，唐代的土地国有和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不仅无法执行，还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政府无法获得准确的土地和户籍数据，税收出现了混乱，造成了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就曾经感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的盛世，可是根据统计数据，天宝十四载的人口不过只有八百九十一万户，与隋代相当；而其中不需要缴纳税收的就有三百五十六万户，占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根据唐代规定，不需要缴税的只有鳏寡、残疾、疾病、奴婢、带有余荫权的品官后代，但这些人竟然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只能证明作假的人太多了。[79]

由于税制的不健康，唐朝皇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一直是费尽脑筋，由此产生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最奇怪的是唐太宗设立了一种叫作“捉钱令史”的官职。作为唐代最具雄才大略的皇帝，太宗见识了太多的人才，却在一种芝麻绿豆官身上不断地栽跟头，也表明钱这种东西给皇帝带来的困扰，就像对升斗小民一样复杂。

唐代皇帝解决政府财政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政府的正规税收总是收不上来，或者收不够，那么，不如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皇帝拨给每个衙门一些土地，再给他们一些现钱，让这些官府依靠经营土地和发放贷款获得收入，再利用这些收入来养活官员和维持政府运转。这样，实际上唐代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

那些由皇帝发放给各级衙门的土地和钱，就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这种制度最早出现在北魏，隋代继续使用。但后来由于隋代的财政充足，废除了公廨钱制度，官员不再搞经营。唐高祖则让公廨钱和公廨田制度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这样政府财政就可以不用负担那么多的行政支出。按照这个思路，中央政府给每一个部门配发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的铜钱，安排专门的人手去放贷和收租子。[80]

除了政府的公廨钱和公廨田（也就是办公经费）之外，就连养官也带有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职位授予他们一部分职分田。当官员换工作时，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但是永业田则可以一直保留并传给子孙。

官员的职分田和永业田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百姓的分田，通过这些土地，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俸禄，实现了官员的自我经营。

另外，中央政府最大的开支除了养官，就是养兵。在养兵上，唐高

祖也采取了懒政的做法——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农的制度[81]。由中央政府给每一支军队授予一定的土地，士兵们战时为兵，平常务农。务农时生产的粮食就可以充当军费，只有战争时期，士兵的生产跟不上军费所需，才会使用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来填补。

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军队和政府不依赖于财政收入，而是可以钱生钱、地生粮，政府既不用依赖复杂的财政安排，也不给民间增加压力。

这个制度设计得非常巧妙，但运转起来千疮百孔，主要漏洞在于：官府的经营永远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反而总是把老本亏光。

最早爆发的问题出在官员的俸禄上。还在唐高祖时期，官员就发现，虽然有了职分田和永业田，但这种方式仍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开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一环出了毛病，就有可能接济不过来而饿肚子。

接着出问题的是官员的职分田。随着官员的职分田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屡屡发生。

公廨钱也出了问题。在唐代初年，金融业并不发达，由于大部分人务农，借钱的只是少数的商人。由于市场小，借钱成本也很高，在唐初，借钱的年利率大约在百分之百。由于利率太高，人们借钱大都是短期使用[82]。

另外，放贷本是一个专业的工作，由非专业人士掌管时，不仅赚不到利息，就连本金都消失了。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积攒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各个衙门都会慢慢倒闭，官员也吃不上饭。

到了唐太宗时期，皇帝想了另一个办法：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富户每年从政府机构贷款，也必须交租金，这相当于变相逼迫他们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定向资助”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田补贴[83]。

这种新的定向资助，并不像是一个明君所为，可以视为唐代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黔驴技穷。果然此办法运行了三年，由于过于扰民，不得不取消了。但由于财政不足，唐太宗还得继续想办法，这次他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捉钱令史”。所谓“捉钱”，就是公廨钱，“捉钱令史”即专门管理公廨钱的办事员。每个政府机关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五十贯），通过向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资金流失，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盈利。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根据当时的经济和金融情况，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一年四万八千钱，折合年利率96%），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一个捉钱令史一年都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得到升官。

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太宗一朝，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人[84]，而捉钱令史就要六百多人，这显然是政府无法承受的。

在之后的岁月里，皇帝经过无数次折腾，公廨钱制度废除了四次又恢复了四次，仍然无法建立正规的财政系统，最后只好作罢。

由于官府无法产生足够的自我经营性利润，官员和军队依然不得不靠中央政府收税来养活，但税收又收不上来，唐代政府的税收问题就成了影响皇帝雄心的大事。

血腥的内斗、边疆强大的敌人、财政总是缺钱，这三大死穴就成了困扰唐代历任皇帝的心头病。

在唐太宗时代，由于整个官僚机构的规模不大，主要的花钱项在打仗上。但是，到了武后和高宗时代，随着养官成本的增加以及皇帝家族的浪费，唐朝就有了打不起仗的趋势。

恰好在唐高宗时期，唐代的宗室和官员由于武后的地位问题而争论不休。

于是，在征服高句丽之后，唐代的对外政策就出现了一次收缩，进入了另一个内斗严重、对外软弱的时期。但军事财政不足这个巨大的问题却被掩盖，到玄宗时代再次显现出来。

女皇帝的功与过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九月，唐高宗在内殿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参加的人有身为顾命大臣的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另两位宰相于志宁和李勣。他召集这些人来，是为了商量废立皇后的。

几年前，高宗皇帝的皇后王氏为了对抗受宠的萧淑妃，决定引入一位战略伙伴，名武珝[85]。这位战略伙伴地位极低，曾经是前任皇帝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被迫削发为尼。但她之前认识当太子时的高宗，当高宗发现她的踪迹，就决定把她领回来。王皇后觉得这位武才人可以让皇帝忘掉萧淑妃，于是同意了。不久，武才人晋封昭仪。

没过多久，武昭仪给皇帝生了儿子李弘，而皇后却没有生子，萧淑妃也已经失宠，于是这位战略伙伴反而成了皇后最大的敌人。

与此同时，武昭仪也展现出了作为女人的巨大野心。她善于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构建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中书侍郎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以及中丞袁公瑜等人。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和武昭仪一样，地位都曾经较低。他们都处于寻找靠山的阶段，显然将武昭仪当作下一个靠山。

反对立武昭仪为后的大都是太宗留下来的老臣，其中又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最有名。老臣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大都见证了高宗与王皇后的婚姻，并已经与王皇后家族形成了强烈的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

之下，老成持重的他们做了保守的选择，继续支持王皇后。

在这两派中，如果从道德标准来看，太宗的顾命大臣显然更占优势，而支持武昭仪的大都是道德感更随意的年轻人，他们并非因为道义而做出选择，只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这样的分野，就造成了人们对武后时代的批评。现代人往往将武后描写成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武后在做皇后和皇帝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登上权力舞台和留在权力舞台上。作为女人，她对于道德并不看重，甚至有些鄙视。于是武后时代可以看成是一个混乱的充满了权斗精神且缺乏长远目标的时代。

为了巩固权力，武后需要一批可靠的官员来取代那些反对她的人。要想选拔这些人才，显然不能从原来的世族大家中选择，因为他们都较为保守，不支持女人执政，所以必须从那些出身更加寒微的人才中选择。于是，武后不断地尝试选择新人，从而将唐代的人才制度强行扭转到另一个方向，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又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大事。

武昭仪的手段在和王皇后斗争时就显露无遗。她为了陷害皇后，甚至害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嫁祸于刚刚来看过新生儿的王皇后，从而导致了皇后失宠。接着，她又诬陷皇后的母亲玩弄巫术，使皇后的家人被驱逐。到这时，皇后距离被废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当我们看到武后的残酷时，也不应该离开时代背景。事实上，随着太宗皇帝的死亡，太宗在世时竭力压制的唐代内斗传统已经再次复活了。在高宗初期，大臣们就已经拉帮结伙，纠缠成一团。比如房玄龄的儿子、太宗的驸马房遗爱，就曾经卷入对高宗的宫廷阴谋，试图发动政变废黜皇帝。而审理这个案件的长孙无忌抓住机会，毫不手软，不仅杀掉了房遗爱，还牵连了一大群自己的政敌，其中既有大臣，也有不少宗室亲王。[86]高宗的哥哥吴王恪被杀时，对长孙无忌发出了诅咒，希望他在不久之后也尝尝灭族的滋味。由于唐代缺乏制度性约束和

人身保护，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是名臣还是奸臣，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对政敌的迫害甚至杀戮。

高宗皇帝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和李勣，希望与他们讨论换后的问题。褚遂良据理力争，甚至将头磕出了血，极力反对皇帝换后。与褚遂良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长孙无忌，而于志宁则选择了一言不发。只有李勣私下里向皇帝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问外人干什么。一语点醒梦中人，换后也就成了定局。[87]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皇帝终于下诏书，废掉王皇后，改立武皇后。所谓换后，在中国古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废后的命运。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被武后下令先各杖一百，再斩断手脚装入坛子，数日才死去，之后又被斩首。[88]这样的残酷行为也预示着武后在未来对唐王朝的制度性破坏。

从这一天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就成了武周代唐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武后依靠李义府和许敬宗两人对前朝老臣进行了系统性清理，并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首先被贬黜死去的是褚遂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许敬宗更是炮制了长孙无忌谋反案，以长孙无忌为中心，将他的故旧和家族连根拔起，完成了官僚系统的改朝换代。到了第二年，由于高宗皇帝的身体问题，武后得以全面掌权，成了唐帝国的实际控制者。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皇帝试图联合上官仪夺回控制权，不想武后提前获知了消息，将上官仪扳倒，更加稳固地掌控了局面。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初，武后和皇帝前往泰山封禅，这个仪式表明了武后对朝局的完全掌控。

在这个阶段，虽然文官系统被清理，但武官系统依然在有效运行。这个时间段也成就了高宗时期对外战争的顶峰，唐朝完成了对西突厥和高句丽的征服。唐代的吏治虽然经历了破坏，但依然在向前推进。

此外，武后虽然依靠李义府和许敬宗掌了权，但她也知道，可以依

靠他们清理对手，却不能完全依靠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佞臣来治理国家。因此，武后一方面限制佞臣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在设法将官僚系统的建设重新正规化起来。

首先被清理的是恣意妄为的李义府，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就在武后获得了对老臣的胜利不久，就首先将他贬官，让他“靠边站”了。至于许敬宗，在与大臣的对抗中，武后更离不开他的支持，所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许敬宗申请致仕，才离开朝廷。

两位权臣离开后，武后开始对官僚队伍进行正规化建设，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朝廷对官员的选任和提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这之前，唐朝由于官吏数量不大，并且大都出自名家，提升是相对混乱的，以和皇帝的关系远近为主。随着官吏数量的增加，必须有更强的制度支持，于是形成了官员的铨叙方法。在一个人当官之前，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职。官职的轮替也必须通过考试来完成。与此同时，武后还规定了两种特殊的考试。有的人的资历不够，但能力很强，就可以参加所谓“博学宏词科”（考三篇文章）或者“书判拔萃科”（考三条书判）考试，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越级获得更高的任命。[89]

这种正规化的官僚体制改革，在每一个朝代从前期向中期转型的过程中，都是必须经历的。到了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行也可以看作一次官员选聘制度的改革。

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可以作为武后执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唐王朝是内敛和修复性的。随着权臣离开，帝国的官僚制度步入正轨，能够得以掌权的既有裴行俭这样的世家子弟，也有狄仁杰这样依靠科考晋升的新兴人才。

在对外关系上，唐王朝的征战也是有限的。此时的西突厥和朝鲜地区都已经变成了残余的敌对势力，唐朝的将领不时征伐，却并没有将战

争扩大。与此同时，吐蕃和大食崛起的速度显然超过了唐王朝，但唐王朝与两者的矛盾还没有激化。

武后维持着正规吏治的同时，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她对家族势力的扶植，以及对自己的儿子（李氏太子）的压制上。她曾经试图提拔自己的外甥贺兰敏之，但由于贺兰敏之辜负了她的期望，最终她扶持侄子武承嗣出任。与此同时，她害死了长子——太子李弘，又废黜了继任太子李贤，表现出了极强的权力欲。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随后的权力调整又带来了一次王朝形势的失控。首先，高宗死后，武后并没有直接即位，而是采取了让儿子登基，自己垂帘的方式控制朝政。没想到的是，接替高宗的中宗立刻重用皇后韦氏的家族，武后大怒，废黜了他。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武后加速了让她的家人和亲信上位的过程。而一批拥护李唐的人们，以李敬业[90]和骆宾王为首，发动了针对武后的叛乱，试图将她赶下台。

李敬业的叛乱规模并不大，但这次事件却让武后产生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认为人人都在反对她，特别是那些李唐宗室。宰相裴炎由于与叛军的亲戚关系，也受到了牵连，从而造成了另一次对唐朝高官阶层的清洗。为了防止人们对她不利，武后制定了告密制度，并提拔了一连串的酷吏，用来强行为那些受怀疑的人定罪。其中最著名的酷吏是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以及男宠薛怀义，开始作威作福，唐朝的吏治也到了最腐坏的阶段。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李唐诸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联合发动了叛乱，但起兵的主力越王李贞在七天后即被镇压。这次起兵反而成了武后大肆杀戮李唐宗室的借口，也导致李唐宗室再也没有能力阻止武后登基。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武后终于改国号“唐”为“周”，开始了历史上的武周时代。武周时代又可以以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武则天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利用酷吏和佞幸巩固自己的政权，大肆杀戮李唐宗室和反对派。同时，由于酷吏在杀人的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民怨，到了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武则天将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杀死，结束了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时代。圣历元年武承嗣希望被封为太子未遂，武则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继承人。

这次选择铺平了在武则天身后权力重归李唐的道路，同时也让武周的最后几年陷入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宁静之中。武则天耽于享乐，崇信佛教，她的佞幸张宗昌和张易之兄弟为所欲为的同时，官员们却在积聚力量等待她的死亡。最终，官员们在她患病时，抓住机会逼迫她退位，让武周时期告终。

纵观武则天时代，正规的官僚系统受到了武后随意提拔的各类佞幸的冲击，这种冲击又由于唐朝固有的缺陷而被放大：由于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保护，官场上人人自危，不得不互相加害以求自保。

然而，武后时代又并非完全黑暗一片。事实上，由于她想要对抗太宗时代遗留的世族名臣，不得不使用科举制从寒门提拔新的官员，从而使得科举成了重要的入仕手段。这种制度的建设，为后来大量人才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当武后死去，人们急需通过大规模的拨乱反正结束这次混乱，回归到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之中。所谓正常的秩序，指的是：第一，避免再次出现武后时代那样大规模的杀戮；第二，避免酷吏上台；第三，将内斗和谄媚的官僚风气扭转过来。

在短暂的中宗和睿宗时代，显然这几条都没有做到，反而更加严重了。那么，到了年轻的玄宗上台后，这位皇帝有可能完成拨乱反正的重

任吗？

第二章 拨乱反正

寻找贤相

玄宗皇帝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宰相。在政变中，宰相集团一多半被杀，让人们又看到了一次政治混乱的序幕。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宰相就是掌舵人，一个政府是否宽容，是否秉公执法，除了皇帝之外，就在于宰相了。宰相的任命，往往是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唐代的宰相称号非常复杂，在唐初是三省长官担任宰相。唐代的中央官僚系统主要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也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而尚书省负责执行。在尚书省下又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六部就是中央政府的触手，负责具体的业务。最初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也就是说，从唐朝一开局，宰相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参加政务会议，负责政事的决策。

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是三省长官，但皇帝也希望他们参与政事，于是皇帝就会授给他们一些临时的官衔，比如“知政事”“参预政事”“参知政事”等。这些临时的官衔可以理解为一种使职（特使），即皇帝派他作为特使出席政务会议，这些人也因为这种头衔而被称为宰相。[91]

到了高宗、玄宗时期，以三省长官出任宰相的已经不多了，反而是通过各种加衔出任宰相的越来越多。此时的加衔也不再是“知政事”，而是更多采用“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两种加衔[92]。

除了加衔制，唐代的宰相群体人数也是不固定的，少时可以两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人。在早期，不管是什么头衔，在大部分时候，某位大臣要出任宰相，都必然是功勋卓著的。但是这种规矩在武后时期被破坏了，随着政治的混乱，“宰相”这个职位也受到了玷污，许多佞臣挤入了这个集团。再到中宗和睿宗时期，随着内斗的激烈，宰相又成了一种政治平衡的工具，关键看属于谁的派系，所谓的功勋反而成了次要的。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消灭太平公主一派时，他的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死于非命，皇帝开始考虑新的宰相人选等相关问题。

由于刚刚经过混乱的几十年，皇帝最需要的官员是那些宽宏大量、懂得照顾民间、采取宽松的政策让社会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人。幸运的是，不管是武后还是她的两个儿子，虽然任命了许多佞幸，但也任命了一批有操守的人。执政初期的唐玄宗也起到了表率作用，他率先自我约束，使得人们看到了恢复秩序的希望。

首先是官员的赦免问题。在玄宗刚执政时，许多官员都归属不同的派别。就像当初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要整合哥哥、弟弟的势力一样，唐玄宗也不能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甚至还需要根据个人的才能给予重用，才有可能让人们安心。事后来看，玄宗并不是一个善于宽恕的人，但他在最初执政时还懂得放权的道理，而担任宰相的陆象先也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步。

陆象先原本是太平公主提拔的宰相，但并没有依附于公主。皇帝送给陆象先一句话“岁寒知松柏”，表达了对他的信任。

铲锄太平公主之后，大臣们一直在要求对公主的党羽进行穷追猛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大批官员都要被追究责任，但最后的审理权落在了陆象先手中。他在审理案件时，将许多人暗地里保护了下来，使得针对太平公主集团的清理没有扩大化，为接下来的治理开了一个好头。[93]

但仅仅靠陆象先并不足以支撑起执政群体。既然宰相群体已经支离破碎，那么朝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寻找新的合格宰相。但是，到底任命几个宰相，又要用谁呢？皇帝也并不清楚，只能不断地试验。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就成了唐代宰相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

首先，原有的三位宰相相继去职。陆象先虽然受到了皇帝表彰，但他没有得到玄宗的欢心，处理完太平公主的党羽问题，他当月就不再担任宰相，而是被皇帝派往四川地区担任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94]这个官职并不低，在唐代属于平级调动，表明皇帝并没有惩罚他。但由于身处地方，陆象先显然失去了左右政局的能力。

下一个被清理的，是利用军权帮助皇帝获得了胜利的郭元振。他虽然是皇帝的亲信，却是武将出身，一旦恢复了和平，他担任宰相也是不合适的。三个月后，皇帝将其贬黜。皇帝的借口并不高明，只是因为在军事训练中士兵的军容不整，就将这位宰相罢免了。郭元振被流放到了偏远的新州，无法再参与朝政。

剩下的一位宰相魏知古，他虽然一直是睿宗、玄宗的嫡系，却由于缺乏才干而在一年后也被罢相。[95]

为了任命适合担任这个帝国最高级职位的官员，唐玄宗进行了一番考察。

首先入相的是张说和刘幽求。

武则天时代对唐朝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将科举作为一种入仕手段的作用大大加强了，由此让众多文人获得了当官和晋升的途径，这些人中就有张说。张说在武则天时期策试中举，最初被授予太子校书，后来转为右补阙，而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修撰《三教珠英》。张说不以行政能力著称，而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在武则天时期，他不肯依附于宠臣张易之构陷他人。[96]中宗即位后，张说先后拜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进入高官之列。睿宗即位后，张说由于担任了太子（后来的玄宗）的侍读，

受到了重用，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第一次担任宰相。

在睿宗时代，张说是太子的坚定支持者，曾经劝说睿宗避免宫廷斗争，尽快让太子监国。后来睿宗将皇位让给儿子，张说也是主要支持者。正因为这样，他得罪了太平公主，丢掉了相位，转为尚书左丞，被派往东都。但张说依然在为玄宗出谋划策，甚至给新皇帝献去佩刀，告诉他当断则断。玄宗根除太平公主势力后，也投桃报李，重用了张说，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十四日拜张说为中书令（即宰相），封燕国公。[97]

刘幽求，也是科举出身。在中宗末期，他参与了年轻的李隆基对韦后的政变，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由此在睿宗时代拜为宰相。但由于其后策划的针对太平公主的政变失败，他差点死于太平公主之手。玄宗除掉太平公主之后，想到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手下，于是再次请他出山，拜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98]

但是，这两人担任宰相后，很快就让皇帝感到不满意了。他们都是典型的文人，受到重用更多是因为和新皇帝的关系。从本性上来说，他们都具有武后时期官僚们的普遍特点，那就是善于斗争、精于算计。现在皇帝希望找到能够治理国家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才华出众，只要能够治国——可两人缺乏的偏偏就是决断力，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们的能力都是不足的。

到底谁有能力帮助皇帝治理这个经历了多年动荡的国家呢？皇帝看中的下一个人选，是一位经历了数朝的老官僚——姚元之。

姚元之原名姚元崇，字元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突厥人叱利元崇造反，武后对人的名字特别敏感，不愿意让大臣和叛臣同名，于是不准他再用“元崇”作为名字，以后把“字”当“名”，人们从此称他为姚元之。不想这个名字依然不顺，当玄宗确定了开元年号，姚元之又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年号冲突了，为了避讳，只好把“元”字去掉，但如果一个

人叫“姚之”，听起来也很奇怪，于是他又用回了本名，但是把“元”字省略了，改名为姚崇。[99]于是，姚元之（姚元崇）就以“姚崇”这个名字成了玄宗时期第一大名相。

姚崇比张说大十六岁，也是科举出身。由于年龄更大，成名更早，他在武后时代就担任过宰相。他之所以知名，在于敢承担责任。武后执政时，曾经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授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时施用酷刑。通过这种非常规手段，几乎让所有被陷害的人都屈打成招。而宰相们由于怕牵连到自己，往往闭眼不看这些酷吏的作为。当周兴、来俊臣都死后，武后反思这一段历史时，恰好是姚崇当宰相。他告诉武后，所谓谋逆大罪，都只是屈打成招，酷吏没有了，也没有人起来造反，这说明前面的谋逆之罪都是假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冤枉的。姚崇押上了身家性命向武后保证，宽容地对待大臣，不会导致大臣的反叛。武后被张柬之等人逼迫还政中宗时，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姚崇为武后流泪，他也因此遭到了贬黜。

到了睿宗时代，姚崇再次拜相，但由于他得罪了太平公主，又被贬到了地方任职，先后担任申州刺史、扬州刺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

他没有参与玄宗对太平公主的政变，但在武后和睿宗时期，姚崇都有着能吏的名声，他担任过兵部尚书，同时还兼任宰相，这使得皇帝认为他才是更加合适的宰相人选[100]。

但皇帝起用姚崇，却充满了困难。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开元名相都属于一个集团，他们团结起来与所谓的“聚敛集团”做斗争。但事实上，经过了武后时代，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相害、没有永久朋友的场所。官员之间戒备重重，后来人们认为的名相们，在当时都是斗争高手。他们你推我踩，掌握着斗争的精髓，甚至不惜置对方于死地。在玄宗初期，由于四个宰相刚刚死于非命，官员们更是缺乏安全感，拼命地阻止自己的敌人上台。

在开元名相群体中，最著名的冤家对头就是姚崇和张说。他们两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姚崇死亡，唐代的笔记中总是兴致勃勃地记载两人相争的故事。此外，姚崇和当时还在担任宰相的魏知古也算不上朋友。在当时的三个宰相中，两人都反对起用姚崇。

皇帝属意姚崇，首先让张说感到紧张。他连忙找人推荐姚崇担任河东总管，因为河东总管也是要职，对姚崇来说也属于重用，但姚崇一旦赴任河东总管，就无法担任宰相了。皇帝识破了张说的阴谋，同一年（公元713年）十月十四日，乘自己出门田猎时召见了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

姚崇担任宰相后，立刻展开了对张说的阴谋设计。十二月时，姚崇在皇帝面前告了张说一状。原来张说听到姚崇拜相，立刻去见岐王抱怨，试图将皇帝宠信的岐王拉入自己的阵营。不想这件事被姚崇知道了，于是他故意在皇帝面前瘸着腿走路，皇帝问他是不是脚有问题，他连忙接道：我不是脚有问题，而是有心病。他随即告诉皇帝，作为宰相的张说不应该去见亲王，这可能会把皇帝信任的亲王带偏了。

皇帝听后，在当月二十四日宣布罢免张说的宰相之职，让他去担任相州刺史，此时距离姚崇上台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与张说一同被罢免的还有另一位宰相刘幽求，而和姚崇关系不错的黄门侍郎卢怀慎则在第二天被任命为宰相。

这件事反映出姚崇是经过武后时代历练的人，他的斗争技术充满了技巧，只需要轻轻一拨，就让皇帝罢免了两位同僚。

剩下的宰相魏知古也不是姚崇的对手。魏知古原本只是一个小吏，是姚崇将他推荐出来，才一路飞黄腾达的。姚崇担任宰相后看不起魏知古，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远离了皇帝。魏知古为了自保，只好寻找姚崇把柄。第二年五月间，魏知古终于找到了姚崇的短处。原来，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东都，他虽为名相，两个儿子却有着纨绔子弟的一切特

征。他们听说魏知古到了东都，因为这人是父亲举荐过的，便立刻派人托魏知古办事，不想魏知古把姚崇教子无方的事情都上报了皇帝。

皇帝对姚崇儿子的作为很生气，但他没有明说，而是在一次谈话时问他有几个儿子，都在干什么。姚崇回答有三个儿子，但有两个是在东都，并说自己担心魏知古去了东都，这两个儿子会托魏知古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有德于魏知古。

皇帝听了姚崇的回答，反而认为是魏知古以怨报德。第二年（公元714年）五月二十五日，魏知古也被罢相了。

斗争高手姚崇不动声色地将三位宰相罢免，换上了自己人卢怀慎。他作为开元名相，也不得不依靠斗争经验才能保持在任上，恰好反映出唐朝官场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不管是亲王、皇子还是宰相，都是没有安全感的。由于唐代没有保护官员的法律，再大的官在下一刻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斗争高手才能保护自己。这个缺陷在盛世时期还显不出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斗争意识越来越强，为了自保，就不得不做出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行为了。

姚崇的搭档卢怀慎主要担任的是监察官和吏部职务，之前和魏知古在东都有过搭档的经历。[101]他为人廉洁，不置家产，但由于资历较轻，在成为宰相之后，将政事大权放给了姚崇，自己只是一个“伴食宰相”。[102]

唐代的群体宰相制度虽然看似稳定，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政治变幻莫测的时期，就会同时有多个宰相，比如玄宗初期就有七个宰相；一旦政治稳定了，宰相的数目就会下降。如果一个时期有一个宰相负责主要事务，其余宰相处于附属地位，那么这个时期的政治就更加稳定（也有可能是僵化，这主要是看这位主要负责宰相是否明智）。

皇帝在任命了姚崇和卢怀慎之后，似乎也确信宰相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他只需要两个就够了。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之所以效率高，其主

要原因就在于姚崇是负责人，而拥有自知之明的卢怀慎并不去争抢功劳。姚崇本来是一个强势的人，又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是另一位强势宰相和他搭档，必然产生严重的冲突，但面对弱势的卢怀慎，姚崇反而发挥出了最大的能力。

此外，姚崇用理政成绩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宰相。那么，姚崇的政策措施又有哪些呢？在一部传说是唐朝史官吴兢所做的文言传奇《开元升平源》中，有一个流传颇为广泛的故事，记载了姚崇被皇帝接见时，曾经提出十条著名的建议，只有皇帝答应这十条建议，他才愿意做宰相。[103]这十条建议大致如下：

一、改变之前的严刑峻法，以仁义为先。

二、休养生息，在三十年内不要进行对外战争。

三、宦官不准干预政事。

四、国亲不准干预政事，将名不正言不顺私自提拔的官员废黜。

五、远佞幸。

六、除了租庸调代表的正税之外，不准接受地方官员的进贡，不给他们横征暴敛的借口。

七、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奢侈浪费，不准造佛寺、道观、宫殿之属。

八、尊重大臣，待之以礼，不随便用刑和杀戮。

九、允许大臣特别是谏臣直犯龙颜。

十、外戚不准干预朝政。

这十条整体上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去除不合格的官员，包括宦官（第三条）、国亲（第四条）、佞幸（第五条）和外戚（第十条）；二是行仁政，这包括弃酷法、行仁义（第一条），待大臣以礼（第八条），允许大臣直谏（第九条）；三是避免战争（第二条）；四

是不要干扰民间经济，少花钱，这包括不要滥税（第六条）和不要建设形象工程（第七条）。

按照故事的说法，皇帝答应了姚崇的提议，所以他才担任了宰相。

但这个故事被司马光否定了，认为是后人编造的，并不存在姚崇和皇帝的这次对话。不过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唐玄宗初年所面临的问题。

玄宗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太宗以来的对外战争对财政的损耗太大，需要停止；二是对大臣过于苛刻，需要改变酷吏治国的现象，任用合格的官员，减少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和各种私下里的权力；三是减少对民间经济的干预和抽税，让社会自然修复。

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给整个社会以信心，让人们对未来可以预期，从而努力创造好的生活。

姚崇和卢怀慎的治理，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过多的内容。但姚崇在武后和睿宗时代已经担任过宰相，他的出山让人们意识到政治的混乱已经过去了。姚崇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官员，善于了解情况，将原本混乱的局面理顺。他还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的人事、马匹、储备等事都了如指掌。作为宰相，他对帝国的大小事务也都了然于胸，随时可以帮助皇帝处理各种事务。

在玄宗初年，需要的恰好是这样的一个官员，能够将瘫痪的吏治重新带上轨道，给人以信心。姚崇的功劳主要是将帝国带入稳定的态势，这是玄宗初年政治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

但姚崇的性格过于精细，皇帝有时还得纠正他的做法。比如，一次姚崇向皇帝上报了一群小官的职务，皇帝不断地抬头望着屋顶，不想理他。姚崇非常担心地离开了，皇帝这才让高力士传话，宰相应该是负责大事的，向皇帝汇报重要的事情即可，这种小官的屁事，哪里用宰相向皇帝汇报？[104]

另外，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姚崇非常能干，唐代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比如，由于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唐代官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造成官场上的互相倾轧。就在姚崇为相的这几年，原宰相刘幽求只是因为被贬官而发牢骚，就差一点被皇帝下狱，多亏了姚崇、卢怀慎等人搭救，才得以幸免。而御史大夫宋璟只是因为监刑时让人打板子打轻一点，就被人告状，贬为睦州刺史。这还只是皇帝执政前期不杀人的情况下。唐朝的官场争斗始终没有变，且时常发展得更加血腥。玄宗初年的争斗只是因为局势的稳定而弱化了，但是制约官场争斗的机制却并没有建立起来。

再比如，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缺乏财政收入，如果不开辟新的税源，如何解决未来的花费问题？边疆战事费用也始终是巨大的开支，玄宗并没有去抑制边疆问题，因此战争一直没有完全停止。[105]这些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并没有消除。

特别是姚崇本人也有着无数的问题。除了用智慧将原宰相张说和魏知古拿下之外，他的儿子也在不时惹祸。正因为这样，作为名相，姚崇在任的时间却并不长。到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初七，姚崇的副手卢怀慎因病离职，随即去世。卢怀慎死时，家里没有一点积蓄，只有一个老仆，他只好把自己卖掉来埋葬主人。

卢怀慎离职后，皇帝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替代他担任宰相。在源乾曜担任宰相时，姚崇也生了病。姚崇本人在长安并没有购买宅第，而是居住在罔极寺里，皇帝不断地派人去寺庙中看他，到最后又把他迁往住宿条件更好的国宾馆——四方馆里。

到这时，还看不出姚崇会失宠。但姚崇对于儿子和手下都没有看住，他的儿子不断地收取各种礼金馈赠，一位手下也接受了胡人的贿赂。姚崇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性命不保，只好提出辞呈。

卢怀慎死后不久，皇帝就批准了姚崇的辞呈（闰十二月二十七

日）。他在玄宗朝担任宰相的时间只有三年零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求他做出太多的成就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的作用远小于他的名声，他的功绩在于帮助玄宗稳定了局面，使得政治和社会恢复了秩序。

姚崇作为唐代排名第三的贤相[106]，只做了三年的宰相，后世的人都在为他打抱不平。其中最激烈的说法认为，玄宗时期政治环境比起太宗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恶化，太宗时期的贤相可以长期任职干到死，但玄宗时期，即便是贤相，地位也是不稳固的，皇帝在前一个月还难分难舍，下一个月就会让他走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官员们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难过了。如果坚持自我，不肯屈服于皇帝的私欲，就很难长期被皇帝信任。只有后来的聚敛集团发现投皇帝所好，帮助他解决财政和欲望问题，才能够长期留在台上。因此，贤相集团在玄宗初年的地位就是不稳固的。

休养出的盛世

对于开元初期的社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姚崇的两位宰相是宋璟和苏颋，两人恰好又组成了类似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

宋璟也是武后时期科举的获益者，武后对他颇为看重。这是因为武后为了与李氏对抗，不得不任用了一批酷吏，而为了对冲酷吏，还必须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这些官员由于自身的廉洁，让酷吏抓不住太多的把柄，同时他们又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行事风格，给了酷吏一定的行动空间，却又可以形成一定的制衡。到了武后后期，廉吏与酷吏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而宋璟就是武后培养的清廉官员的代表。

在张易之兄弟得势的时期，宋璟是极少数不肯讨好他们的人，他甚至向武后上书，要求惩罚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张氏兄弟的人，他更是嗤之以鼻。

到了中宗时期，宋璟又和权臣武三思不和，导致他被外放任职。他先后担任过并州长史、贝州刺史、杭州刺史和相州刺史。睿宗即位后，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这时开始，宋璟大力整治吏治，将各路权臣硬塞给中央政府的不合格官员清退。之后由于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楚州刺史，之后担任了魏州刺史、兖州刺史、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又迁任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这些地方官职同样属于高级官员，可见即使宋璟被贬斥，皇帝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玄宗即位后，宋璟回到国都，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心慈手软，命令打人板子时不要太用力，皇帝又将他贬为睦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广州都督。

好在前宰相卢怀慎辞职时推荐了几位称职的官员，其中就包括宋璟[107]，于是皇帝决定重用他。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皇帝要从西京去往东都，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西京留守。宋璟当时还在外地，皇帝让自己的宠臣、内侍将军杨思勗专程去迎接他。如果换成其他人，一路上一定会想方设法讨好这位贵人将军，可是宋璟在路上却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讨好或者好奇的举动。杨思勗回来告诉皇帝，让皇帝也对宋璟的沉稳惊叹不已。

到了姚崇罢相那一天，皇帝也免去了源乾曜的宰相职务，同时授予宋璟和另一位叫作苏颋的官员为宰相。

姚崇是一个善于做事的官员，而宋璟却是另一种风格，他知人善任，刑罚无私，敢于直谏。与此同时，和他一同担任宰相的苏颋又和宋璟是互补的。姚、宋都是武则天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苏颋却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苏瑰也在中宗朝担任过宰相，为一代名臣。作为世家子弟的苏颋虽然也经历过科考，但他在担任宰相之前，更多是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下。[108]

苏颋的角色有些类似于姚崇时期的卢怀慎，宋、苏二人形成了以宋

璟为主、苏颋配合的模式。这种配合模式在姚崇时代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用，到了宋璟时代依然奏效。宋璟刚正不阿，他的决断大都得到了苏颋的认同，而在和皇帝奏对时，苏颋又往往配合着宋璟的说法。两位宰相的一致性，让整个政治格局变得融洽。

宋璟任宰相的时代，是玄宗时期整个官场最为舒适的时代，甚至可以记下来的事情都很少。就算是流传下来的少量事件，因为都是“小事”，不涉政局，都显得并不重要。

比如，宋璟曾经跟随皇帝去往东都，在经过崤谷时，发现这里的道路狭窄失修，难以通过。皇帝想免掉河南尹和负责官员。宋璟担心如果免掉他们，以后皇帝出行，地方官员都会兴师动众，造成扰民，因此认为不应该免掉他们。

再比如，他曾经劝说皇帝疏远宠臣姜皎兄弟。他还废除了武后以来的密奏制度，要求大臣们上奏时，必须有言官在场，好纠正大臣们的说法。他还曾经建议皇帝禁止大臣随意增高坟头，因为坟头是和礼制相关的，而礼制必须是公平和统一的。

宋璟对家人的要求很高，他曾经专门写信，告诫其他官员们不要为他的亲人开后门，如果发现，就当严办。

但这些小事与开元名相的身份比起来，总是欠缺了什么，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而史书上给出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于小事，甚至“无事”的人。

然而，透过这段“无事”的时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可以说，姚崇理顺了整个官僚制度，将唐朝从武后以来的乱局中拉了出来，而宋璟所做的则是尽量让人们各行其是：一方面政府尽量少干预民间；另一方面皇帝也少惩罚官员。这让民间有了余粮，官员也感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是稳当的，不会因为各种小事被追究责任。唐代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安全感的，即便在太宗时期依然要担心被别人

陷害。而宋璟在执政期内，由于他正直和善于断案，让人们无法随意陷害别人，也让他们免于受到别人的陷害，使得玄宗朝早期不仅对民间有利，也成了唐代官僚阶层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宋璟“无事”，恰好就意味着不给民间添麻烦，也不随便揪官员的辫子。这种思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得以延续。虽然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多，四处插手的事情也愈加繁复，但正是姚崇和宋璟打下了底子，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使得皇帝即便想破坏也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开元盛世的基础。

然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三年零一个月。在任期间，他遭遇了一件贯穿唐代始终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事情，并由于这件事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下台。这就是货币问题。

唐代开国时期缺乏透明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他们继承的前朝税收制度也非常低效，导致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货币发行机构并不算强大。开元通宝发行数量不足，使得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态，这种现象叫作钱荒。[109]

与后来的宋代和之前的汉代相比，唐代的官方铜钱一直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铸造数量不足，而唐代到了玄宗时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矛盾就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中国古代，钱荒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民间偷偷铸造铜钱，这不仅仅是因为铸钱可以牟利，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满足市场对铜钱的需求。

最初，唐代采取了禁止民间铸造的政策[110]，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货币质量。

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则要差得多。由于政府的禁止，人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铜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就已经非常严重。高宗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次禁止都没有效果，只能听之任之，这件事就成了一种默认的潜规则。之后的唐王朝一直摇摆在禁止私铸和允许私铸之间。如果禁止，那么铜钱数量不足，就会出现钱荒；如果不禁止，那么这些劣币的出现就会驱逐良币，人们会把好钱都熔化掉改铸成劣币。

到了开元早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人们对钱币的需求越来越大，民间私铸行为愈发泛滥，这件事已经成了宰相必须应对的大事。

事实上，在皇帝的朝堂上，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既然民间缺钱而官方又无法铸造足够的钱币，就干脆放开让民间铸造，官方只规定铸造标准，所有符合标准的钱币都可以进入流通，这样就减少了劣币，同时满足了市场。[111]

而宰相宋璟和苏颋却代表了另一派——禁绝派。宋璟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要求市面上流通的钱都必须满足开元通宝的标准，如果不满足，哪怕是官铸钱磨损之后的，也都由官方收缴上来销毁掉。为了收缴这些劣质钱币，宋璟专门拿出来十万斛稻米，用它们来兑换民间的劣币，再交给少府监[112]毁掉。如果坚持这样的赎买政策，民间是不受伤害的，但官方却并没有长期这样做的资本，一是官方储存的粮食不够兑换钱币，二是民间会制造更多的劣币来兑换粮食。

宋璟的另一个把柄出现在都城以外。当时江淮地区劣质钱币名目繁多，除了官炉钱，还有民间的偏炉钱、棱钱、时钱等。宋璟派出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地区，挨家挨户查抄劣质钱币，如果不配合就要惩罚。除了严查之外，由于官方的税收都必须使用合格的钱币上缴，这就导致那些劣质钱币都沉在民间使用，当萧隐之再把这些劣质钱币收缴后，民间就没有钱可用了。这造成的局面就是人们无法做买卖了，物价也更加昂贵。随着民间积怨的增加，萧隐之被贬了官。

这些事情叠加起来，导致两位宰相受到了群臣的质疑，于是皇帝罢

免了他们的宰相职务。

姚崇和宋璟一直被中国历史记载为少有的贤相，但他们实际上担任玄宗朝宰相的年份都只有三年多。这说明在玄宗朝，官员任职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即便是良相，只要有一点失误，也会立刻被要求承担责任。

更有甚者，即便是前任宰相，也依然缺乏安全感。当宋璟之后，张说再次成为宰相时，姚崇不仅要担心张说对他不利，更担心他死后张说会对他的家族动手。

君臣之间、皇帝和宗室之间、大臣之间的争斗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在开元早期，斗争还没有那么血腥，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朝廷上的斗争，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官场的不稳定状态还会再次激化。

虽然姚崇、宋璟都离任了，但经过六年的制度清理和休养生息，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与之前内斗不断、社会深受影响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皇帝任命的宰相虽然性格不同，也带着或多或少的缺点，有着不同的派系和政策方向，但他们大都符合士大夫的标准，尽量让帝国顺畅地运行着，并努力让民间休养生息。这样的政策让皇帝、官员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帝国繁荣的福祉。

从鸵鸟政策到怀柔远人

唐朝开元盛世的到来，还和对外关系的转变有关。

在经过了太宗和高宗时期的南征北战之后，唐朝击溃了突厥势力，影响力直达中亚地区，同时在朝鲜半岛也灭亡了高句丽。但是，游牧民族并不会因为一两次战争的失败就整体消失。突厥系的东西突厥虽然灭

亡，但到了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东突厥的残余爆发了一次叛乱，这次叛乱持续了两年多，导致唐朝丧失了十八万四千九百匹马、一万一千六百头牛，八百余平民被杀害。[113]叛乱最终被大将裴行俭镇压，但是，残余势力却在一位叫作骨笃禄的人率领下，前往现在的蒙古国，建立了一个国家，史称第二突厥汗国（也称后突厥汗国）。[114]

这个新的突厥汗国时而与唐朝对抗，时而又选择和平，直到玄宗时期依然强盛，加上它的旁支突骑施和附庸奚、契丹，对唐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除了这个敌人之外，吐蕃也给中原王朝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吐蕃不仅灭亡了吐谷浑，武后时期，由于唐朝专注于对内斗争，放弃了扩张，甚至两度放弃了安西四镇，吐蕃又得以占领四镇。之后，由于西北的丧失对唐朝影响太大，武后不得不出兵再次驱逐了吐蕃人，重新占领了四镇。在更加靠西的位置，吐蕃则占据了位于现在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和斯卡都地区的大小勃律，将这里打造成进攻新疆西部的基地。

在云南地区，兴起了另一个势力：南诏。南诏时而依附唐朝，时而联合吐蕃，也成了唐朝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地缘角色。

在西方，阿拉伯帝国崛起，到了玄宗时代，它已经来到了中亚地区和印度，并截断了唐王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两大帝国的冲突也无法避免。

武后专心内斗，对于外事往往采取鸵鸟政策。一方面，她为了渲染自己的盛世，让许多居住在长安的外来人口扮演外国友人，将他们用在庆典上。另一方面，她对那些不友好的游牧部落的反应却往往是孩子气的，也是应激式的。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原本与唐朝友好的北方小部落契丹首领孙万荣和李尽忠叛变了唐朝。他们之所以叛变，是受不了营州都督赵翊的侮辱。这位都督性情刚愎，当东北地区发生饥荒时，他不仅

不赈济，还将酋长们当作奴仆一样呼来喝去。两位契丹酋长联合邻族奚人，起兵杀掉了都督，占据了位于现在东北地区的营州。[115]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而孙万荣作为他的前锋，与唐军展开厮杀。

武则天大怒。但她对这件事第一时间的处理，竟然是给孙万荣和李尽忠改了名，将孙万荣改为孙万斩，李尽忠改为李尽灭。[116]在接下来一年中，孙万斩和李尽灭带着滑稽的名字顽强地出现在史书中，他们两次大败唐军，杀死了唐军大将王孝杰，后来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在背后袭击了他们，帮助唐军将叛乱镇压了下去，这两位酋长死于非命。可是，营州却依然没有收复。

然而，默啜并非是出于帮助唐军的目的，而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很快，突厥人的扩张又超越了唐朝能够忍受的程度。在突厥人的不断骚扰下，武则天又气急败坏地将默啜可汗改为斩啜可汗。[117]

武后时代的对外政策在一次次的应激中摇摆，也表明唐代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收缩之中。

玄宗即位前，由于前两任皇帝（中宗和睿宗）都在处理内务问题，对外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唐朝与吐蕃、突厥两大敌人之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一段平静期。一方面，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前来求亲，唐睿宗经过权衡，答应了双方的联姻。[118]在吐蕃方面，由于金城公主的和亲[119]，唐朝承认河西九曲之地（青海境内黄河上游地区）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属于吐蕃，通过割让一部分争议地区，双方进入和平时期[120]。吐蕃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派人前来请求结盟。而奚、契丹与突厥帝国关系紧密，随着突厥与唐朝关系的和解，两部落也承认自己为唐朝的附庸。

这本来是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但玄宗刚上台，这样的局面就出现了反复。由于执政初期地位还不稳固，从形势上看，玄宗需要战功来产生政权的凝聚力。他上台后，首先拒绝了突厥默啜可汗的和亲请

求。默啜可汗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儿子提出和亲，这次得到了玄宗的同意。

然而就在这时，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却出现了恶化，并改变了唐和突厥的形势。这首先是因为延和元年（公元712年）三月，玄宗即位之前的一次人事任命。

奚、契丹与唐朝的交界主要在幽州。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该地二十年，在李尽忠和孙万荣事件后，一直采取了保守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久而久之，双方达成了一种军事平衡，这对于边境地区的人民非常有利。幽州大都督是该地的军政官员，在幽州城内还有民政当局燕州刺史。任刺史的李璡和薛讷关系不睦，于是把薛讷的行为报告给了户部尚书刘幽求。刘幽求于是推荐左羽林将军孙佺来取代薛讷。睿宗皇帝任命孙佺为幽州大都督，薛讷被调到了并州出任长史[121]。

孙佺到任后，立刻改变了薛讷不主动出击的办法，而是要寻找机会为国立功。在武后时期，虽然最后击败了奚、契丹，却无法完全消灭他们，皇帝最终只能对两个部族采取怀柔政策，营州也一直没有办法回归唐朝。孙佺认为只要能拿下营州，他就可以向皇帝邀功去了。他派遣步兵两万、骑兵八千前去攻打两部。在路上，唐军的四千骑兵先遣部队遇到了奚部的八千骑兵，唐军战败。此刻，原本准备去打胜仗的孙佺却退缩了，他虽然率领着主力部队，却不敢去救先遣队，也不敢说是来打仗的，只好向两部落谎称是奉皇帝之命来招慰对方的。他送上礼物，获得了对方允许，率军撤退。不想撤退却变成了溃退，一路上军队逃得连阵形都没有了，孙佺也被奚人抓住，送给突厥默啜可汗，默啜将他斩首。这件事让原本与唐朝维持和平的奚、契丹，变得与突厥人更亲近了。[122]

玄宗即位后，这件事情继续发酵。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初，玄宗派遣并州长史（原幽州大都督）薛讷进攻契丹，还命他兼任同紫薇黄门三品，也就是宰相职务。六月，薛讷率军六万进攻契丹，但在檀州外

的滦水山峡中遭到伏击。薛讷带数十骑突围。看到薛讷的逃跑行为，契丹人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作“薛婆”，于是薛讷也被免职了。[123]

这两场战争之后，奚和契丹两个民族眼看就要站到唐王朝的对立面。一旦产生了对立，很可能导致突厥势力的加强，甚至会有一场新的入侵。与此同时，吐蕃也开始了另一轮异动，于同一年袭击唐朝的临洮一带。如果处理不好，唐朝会在刚刚结束内斗之后，立刻陷入一场外部纷争。

此时唐玄宗的宰相明智地选择了息事宁人。不管是姚崇还是宋璟，虽然都不免参与局部性的冲突，但又都认识到最终还是要恢复和平，从而让帝国财政更加健康，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皇帝本人是一个热衷战功的人，但在统治的初期，他依然选择了相信宰相，放手让宰相处理问题。

与此同时，皇帝的武将也很争气。刚刚在北方战败的薛讷临时受命，在西方打败了吐蕃，斩首一万七千，获得马、羊二十万以上。[124]当战场取得胜利之后，玄宗皇帝立刻同意与吐蕃继续结盟，保持住了战胜成果，又维持了双方的“友谊”。

在契丹和奚的问题上，玄宗皇帝也选择了和解的姿态。由于后突厥汗国内部此刻突然出了问题，让奚和契丹无法投靠，玄宗皇帝乘机向两部落发出了和平倡议，甚至赐给他们丹书铁券[125]，获得了两部的归顺。不久前还在激化的形势突然之间又发生了逆转。

与此同时，后突厥的默啜可汗死了。在他死前，唐朝乘着突厥的衰落打了几个胜仗。他之后的毗伽可汗忙于内部整合，与唐朝虽然没有休战，但战争规模始终是可控的。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突厥人终于决定向唐朝求和。[126]

从这一年开始，唐朝又享受到了久违的和平环境。这种和平不是靠武后的鸵鸟政策达到的，而是建立在实力以及平等地位之上的。这样的

和平往往更加长久，并能赢得对手足够的尊重。

正是国际关系上的缓和，使得开元盛世有了基础。军事是古代政府最花钱的项目，战争一旦发生，政府总是很难取得财政平衡，不得不向民间加税。由于军事需求小，开元时期的前半段让民间获得了足够的休息。

读书人的科考往事

在玄宗时代前期，武后执政最大的成绩也开出了灿烂的花朵，那就是：通过科举大力提拔非世族出身的官员，替换那些依靠出身而上位的人。通过这样的换血，唐帝国解决了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阶层固化问题，加大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唐代的中国实现了更加完备的一体化。通过科举、官僚集权化等措施，身在广州的读书人必须远赴长安参加考试，又有可能被分配到遥远的西北去任职，在他一生的调动中，甚至可能踏遍全国的土地。这让当时的人们都不再从属于一个地方，而是将身份国家化了。

在叙述唐代的成就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机制的变迁。

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保持着活力，是因为从汉代开始，皇帝就试图解决阶层固化问题。在秦代之前，周代和诸侯国的官位往往是世袭的，不利于社会流动。秦代商鞅改革，为了富国强兵采取了一种极其功利化的做法：一个人如果不是贵族或者依靠纵横之术被皇帝看上的客卿（外国人），就必须通过种地和杀敌这两种途径，积累足够的积分来获得军功爵位，从而进入仕途。[127]

汉代皇帝为了给普通读书人留下上升的空间，采取了“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员从他的辖区内选择人才，上报给中央政府，由皇帝录用为官员。[128]这种制度的基本假设是，一个人如果足够优秀，那么他一定

首先在家乡获得名声，只要他在家乡足够优秀，那么到了国都的官场也会足够优秀。

这个假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基本成立的，因为当时每个地方的人口都是有限的，官员的确可以知道本地所有人才的状况。但是随着朝代的延长和行政效率的退化，察举制变成了一种官员们人情往来的工具。到了东汉时期，官员察举的人才一定出自大家族和官员的亲戚，于是阶层流动再次停滞。寒门再也没有机会出贵子，察举制也就无法起到增加人才流动性的作用了。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延康元年（汉献帝最后一个年号，公元220年），人们反思汉代察举制的问题，得出了结论：这种制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才的选择缺乏标准。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到底谁是人才，就只不过是官员口中的一句话而已。

当时有一种哲学上的风气叫作品评之风，不管是谈论人还是事务，都希望制定一定的标准将之分门别类。这种风气到了朝廷的人才选择上，就是由皇帝颁布一定的标准，将人才分成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在每一个地方设置一个叫作中正的官职，中正负责对该地区每一个人才进行打分，分高的人就可以送往中央当官。这种方法叫作“九品中正制”。[129]

现代人也许对这种方法持有异议，认为一个官员即便听说过，也不可能彻底了解本地区的每一个年轻人，这种复杂性的增加使得制度本身必然流于形式。但是，比起汉代来，三国时期的人口更加稀少，整个魏国也只有440万人[130]，不足现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地方的年轻人数量极其有限，官员与基层之间的联系也的确可以做到更加紧密，让官员对当地人才更加了解。

然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在打分的标准上，人分九等貌似客观，但要想对人进行区分，依然有很大的主观性。另外，由于行政效率问题和

信息不完整，最后成为受益者的，仍然是官员身边的人和那些大家族子弟。

魏晋和南朝，一直采取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结合的方式选拔人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制度最终失去了效力，在南北朝时导致整个南方陷入了僵化的贵族体系中，所谓世族时代就是这样产生的。

南北朝时期，在南方阶层固化的同时，北方由于战乱时间更长，社会结构更加碎片化，一旦重新统一，社会的流动性和给人才的机会都大于和多于南方。机会多，也意味着制度更加不成熟，但制度不成熟，也意味着还没有被一个利益阶层所把持。因此，北方的人才制度在最初显得有些粗糙，甚至怪诞，却又逐渐成长着，在人才选择上反而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北魏时期，每个州郡也设置了中正这个官职。与普通的察举制不同，此时报送的人才并不能被直接任用，而是由吏部再进行一次考核，只有等级在中上的，才可以授官。这次考核的加入，就使得人才选举有了科举的味道，也导致了北魏和隋唐的人才选拔制度与之前的制度分道扬镳。

另外，此时的考核采用了“策”这种形式，也就是考官提出一些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士子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士子们需要对现实有充分的了解。

北魏时期另一个现象则是文武官员的对立。随着军事扩张成为过去，武将不再受到重视，反而是在战争中没什么用处的文人受到了优待。文武的对立直到唐代仍然是一大问题，直至唐玄宗时期都没有解决好。

北魏孝明帝时期，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求将武官排除在铨选官员的资格之外。这一下捅了大娄子，武官们将怨气都撒在了他们一家头上，甚至张榜悬赏他们的人头。神龟二年（公元

519年），上千名羽林、虎贲将士来到尚书省，要求交出张彝的长子、尚书郎张始均，引起了骚乱。之后，他们烧毁张彝的府邸，把张彝抓出来拳打脚踢，老头儿第二天就死了。更惨的是，将士们抓住了张始均，将他直接扔进了火里活活烧死。朝廷斩了为首的八人，将其他人赦免，作为让步，从此武官又可以进入铨选系统了。[131]

当北魏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后，北齐的选官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北魏，却又有所发展。最大的发展是一种仪式感。地方察举的士人到了中央进行考核时，皇帝往往要亲自参加，穿上常服，乘着肩舆来到朝堂，士人们都来到堂下接受书面考核。如果士子的考卷中字有脱讹，就将他叫起来，立在座席后面作为惩罚；如果士子的书法过于拙劣，就要当众喝墨水；如果谁的文章写得孟浪，就把他的座席夺走，解除佩刀。[132]

喝墨水的做法看上去显得非常粗鲁，不像是皇帝应该做的，却又表现出皇帝的仁慈，与千年之后明清时代的滥杀相比，这样的做法甚至连肉刑都算不上。

北周时期，地方举荐变得更加制度化。当隋朝取代北周之后，中国选官制度的大转折就到来了。

隋代与前代的不同，主要在于中央对官员的任命权扩大了。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州郡的属官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也就是说，州郡长官可以任命属于自己的班子，地方低级官僚的任命权并不掌握在中央手中。到了隋文帝时，他将大小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了中央政府，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吏由吏部任命，而六品以上的则归尚书省任命。[133]到了唐代前期，州郡的属官（各种参军）和县级属官（县尉）都已经纳入了品级，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到这时，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数量大幅度扩充，使得政府必须考虑一种更加流程化的方法。

从汉代到南北朝的察举制显然只适合于小规模作业，不适合更大批量的人才“生产”。这就会呼唤新制度的产生。

中央收回官员任命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权力由此被削弱了。以前县官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县尉，现在连这个权力都没有了。这在后来就导致了唐代中后期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无法补充足够的底层官员，最终只好默许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一部分底层官员的任命工作。这种新的做法让许多人（比如本书中将提到的高适、岑参、杜甫等）受益，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地方长官（节度使）任命的职务。

由于需要大批的人填充职位，隋代对人才也比前代也更加关注。在北周时期，地方举荐人才分为三类，分别是明经（通经典）、秀才（博学多才）和孝廉（孝顺端正），隋文帝时期又增加了两科，分别是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皇帝又把科目增加到了十科[134]，其中一科叫作进士，到了唐代，这一科异军突起，成了科举的主角。

唐代建立后，这个缺乏制度创新的朝代在制度上基本继承了隋代，但它也有一些小的变革，比如建立了完善的遍布全国的学校系统。关于唐代的学校系统[135]，可以与现在的制度做个对比。现今从小学到高中，需要经过十二年的学习，加上大学四年，就是十六年的时光，然后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务系统。那么，在唐代，一个学生要完成当时的各门学科，需要花费大约二十年半的时间。[136]

唐朝的教材，是唐太宗时期制定的《五经正义》以及其他的儒教经典。那时最高的学问叫“通五经”，五经皆通，就是最高级的儒者。学生从《孝经》和《论语》学起，每一本书学习一年。这两门课属于学前班教材，学通之后，才能继续学习小学，当时叫作“小经”。小经的教材包括四部，分别是《尚书》《公羊传》《穀梁传》《易经》。前三本书每一本学习一年半，《易经》则要学习两年，一共是六年半。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学习的课程是“中经”。

中经的教材包括《诗经》《周礼》《仪礼》这三部书。三部书学习

的时间各是两年，加起来是六年。六年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学习的课程叫“大经”。大经的教材只有两本书，分别是《礼记》和《左传》。这两本书各学习三年，一共六年。

学前班、小学、中学、大学的时间，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年半。除了学习之外，学生还要参加一系列的考试，层层选拔，最终才被州郡官员推举到国都参加科考[137]。科考是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138]，录取后授予的就是“明经”出身。

这个出身，就是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行证。学生刚刚考中时，是待业状态，过上几年，皇帝就会授予他实际的职位。

当然，每个人的天资有别，不见得一定要学通所有的经典。于是，唐朝又设立了低一些的考试，可以通两经，也可以通三经，当然前途也比通五经要差。

如果仅仅看到这里，人们会以为，唐朝的科举已经开始束缚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花二十年时光背十一本书。但事实上，唐朝的科举是非常灵活的。

唐代是一个儒、道、释都获得尊崇的时代，明经出身其实在唐代并不受欢迎。一方面，由于自己姓李，皇帝追认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为先祖，便不断地想把《道德经》也加入到经典体系中；另一方面，朝廷又针对专门的人才开辟了许多绕过明经科的通道。

隋炀帝时期开辟了十科取士，而明经科只是其中一科，唐代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现代人如果想理解所谓的科目，可以将之理解成不同的专业，现代有物理、化学、电子、经济、医学等各种专业，而在唐代由于缺乏自然科学，各专业不是按照现代规则划分的，而是划分成明经科、秀才科、进士科、明法科、书科、算科等。其中，明经科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秀才科则要求博学多才；明法科针对法律人才；书科、算科是小科目，针对书写、算术等专门人才；后来还有史科和开元礼科，针对

史学和礼学人才。

除了明经科之外，其余科目大都不用学习儒家经典，而是针对他们专门的知识进行考察。在唐代初年，秀才科是最受欢迎的学科。因为它的地位高，而且绕开了那些教科书，更注重实务精神。首先，这科不需要在学校里学二十年的儒家课本；其次，在考试时，考官发五个问答题，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提问，考生只要针对五个问题写五道策文进行回答就可以了。

由于明经科大都是腐儒，而秀才科具有现代性，所以在官场上秀才科出身也比明经科出身更加受人尊敬。但秀才科到了唐太宗中期废除了，原因在于缺乏衡量的标准，五道问答题和临场发挥关系很大，不容易测出人的真实水平。由于秀才科也必须由州郡长官举荐，然后到国都参加考试，有人被举荐上来，考试却不合格，就会追究举荐人的责任，后来就把秀才科废除了。

秀才科废除之后，另一个科目进士科异军突起，成了整个唐代最受欢迎的科目。进士科继承了秀才科的简便性，甚至可以理解为进士科就是被废除的秀才科换了一个名字继续存在，最初它也不需要背诵儒家经典，只考几道策论。

由于进士科太受欢迎，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为了提高进士科的难度，朝廷规定学子必须学一门经史，才能接受进士科考试。但这样的难度比起明经科来，还是低了很多。到了后来，进士和明经两科就成了唐代科考的主流，而又以进士科机会最为珍贵，人们宁愿选择进士科而放弃明经科。

到了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武后和高宗终于想到了解决这个差异的好办法。在此之前，进士科和明经科考试都是以策问为主，这一年朝廷规定，增加一种考试类型叫作帖经，也就是填空题。在考策问之前，教官首先发一份考卷，上有十道填空题，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摘出的

句子，只有填空题过关了，才允许进入考试的下一环节——策问。[139]

但到了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政策又进行了调整，要求明经仍然要参加帖经考试，其中十题必须答对六题以上，才准进入策问环节。而进士科由于考的是才华，在策问之前，必须加试杂文两篇。这两篇杂文属于当时文人们常常需要写作的箴、铭、论、表之类，只有这一环节过关了，才允许参加策问。[140]

到了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朝廷将进士科的策问规定为三篇，这三道题的规矩就一直保持了下来。[141]

人们没有想到，就是永隆二年的规定造就了唐代诗歌的辉煌。在最早时，所谓的两篇杂文主要是一些实用性文体，比如箴、铭、论、表，但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开元年间，考试往往要求两篇中必须有一篇是赋或者诗，或者两篇都是诗赋。到了天宝年间，杂文就变成了诗歌的专享。[142]

就这样，在考试文体的变化中，诗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同明清时期，读书人在八股取士的影响下都擅长写八股文一样，唐代的士人们之所以擅长写诗，也来自考试的诱导。[143]

虽然之后唐代的科举还有过多次变化，但基本形式已经固定。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策问，而进士科有时候考帖经、杂文和策问，有时候只考杂文和策问，即便考帖经，其要求也比明经要低一些。比如，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就要求明经科帖经必须十题对五题，而进士科的要求是帖经十题对四题，然后就可以进行杂文和策问考试。[144]

那么，作为进士科考试核心的策问又是什么样的形式呢？策问并不是唐代的发明，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用来取士了。在考试时，最初是采取射策的方法，也就是有许多道题目，由士人随机选择一道来回答。到了唐代，为了考试的标准化，就变成政府统一出题，所有的人回答一样

的题目。

策问的题目可以是针对现实问题征求答案，也可以是针对古代的事情发表议论，这很像现代的议论文作文，但格式却比现在复杂得多。大部分的策文都是骈体的，要求对仗工整，其中四字句颇多，这就要求考生有组织文章的能力，并能迅速展现自己的文采。到最后，策文总是以“谨对”作为结束。[145]为了应付策问考试，唐代人甚至有教科书式的资料，这些资料中先假想许多可能的题目，再事先拟好稿子，这样做一是用于实战性的碰运气，二是唐代人有提前和考官打招呼的传统，去拜见考官时也可以投递此类文章。这类文章中，最著名的是白居易做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七十五道策文，在他的文集中都保留了下来，同时，文集中还保留了他历次考试的实战文章。[146]

进士科目如此受欢迎，考试的难度也就随之增大。根据史书记载，每年应考进士的不下千人，而通过考试的只有百分之一二，也就是总数只有一二十人而已。明经科的难度稍低，但也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通过考试。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士子拥入京城来参加考试。到了开元时期，天下太平，每年应考进士的多达两千人，即便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人之多。[147]参加考试的人录取率极低，剩下的人就成了长安的过客，在这里交友、吟诗、消费，然后回家。这些落榜的士人也成了唐代社会人员大流动中除了官员之外的另一大群体。

应考进士难度如此之大，要从进士进入仕途也并不容易。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官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通过考试、恩荫等各种途径获得了当官资格的人却很多。比如，唐代内外官员的职位一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五个，而拥有当官资格的却有十二万余人，这就牵扯到八九个人才能争夺一个官位的局面。[148]产生这种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隋代将所有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了中央，而事实上，许多偏远的州县空闲了职位，却只能等中央的任命，而中央却管不过来，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算任命了也不一定有人去报到，这样的职位就只好常年空着。到

了唐代后期，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节度使等可以自己选官，这拓宽了当官的途径，也就解决了一部分有资格的人无法当官的情况。

但在唐代早期，节度使选官这条路还没有开放，于是有资格的人只好等待任命。一旦通过了进士科、明经科等考试，士子们就拥有了当官的资格，但要轮到自己，还需要数年的等待。在他们等待的时间，政府是不发工资的。另外，一个官职也是有任期的，等到官员的任期结束，如果他是中央官员，就可以继续获得其他官职，可如果是外派的底层官员，那么他又要等待数年，才能有下一个任职机会。许多人一辈子可能只能当一两任小官，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待。[149]

可是唐代的制度又提供了一些别的方法跳过等待期，这些方法叫作制科和吏部试。进士科和明经科等常规科目的考试是户部或者礼部主持的，而有权授予官职的却是吏部。于是吏部就有举行新的考试的权力，这就是吏部试。

吏部试可以称为二次考核，已经通过了进士科或者明经科考试的人都可以参加，科目主要有“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等，测试的内容主要是诗赋，一旦通过了，可以直接授官，不需要等待。

除了吏部试之外，皇帝还会不定期举行一些特殊的考试，称为制科，所有通过制科的人也是不需要等待而可以直接授官的。比如，唐玄宗上台之前的景云三年（公元712年），唐睿宗除了设立进士、明经等常科之外，还设立了八种科目，分别是文可以经邦科、材可治国科、才堪刺史科、贤良方正科、道侔伊吕科、藻思清华科、兴化变俗科、怀能抱器科。[150]这些科目就属于制科，只要通过了，就可以直接授官。

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唐朝将科举贯彻到了民间的各个角落，让大批文人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做学问。而由于政府提倡文采和诗歌，于是，诗突然间走向兴盛，成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学问。

表1 唐代的学校制度[151]

隶属	名　　称	人数	入 学 资 格
中央学校共六种，隶属于国子监	国子学	300	文武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
	太学	500	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
	四门学	1300	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之子，共 500 人
			庶人之俊异者，共 800 人
	律学	50	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
	书学	30	
	算学	30	
特殊机构附校共两种	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	30	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
	崇文馆，隶属于东宫	20	
地方学校，隶属州县	京都	80	由州县长官决定，长史主持
	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	60	
	下都督府、中州、京县	50	
	下州、上县	40	
	中县、中下县	35	
	下县	20	

表2 唐代科举考试内容[152]

科目	内　　容	考 取 标 准
进士	时务策五道，以一部“大经”为题的帖文若干	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两者都算及第
秀才	方略策五道	根据文理打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这四等为及第
明经	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	根据文理打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这四等为及第
开元礼	大义百条、策三道	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散、试官员参加考试能够及第的，录为正式官员
（春秋）三传	《左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传》《穀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	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及第。及第后，没有出身的视同五经及第，有出身和有资历的官员，视同学究一经
史科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	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的，没有出身的视同五经、三传，有出身和有资历的官员，视为学究一经；三史皆通，给予奖励
明法	试律七条、令三条	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
书学	先口试通过，再笔试《说文》《字林》二十条	通十八条为及第
算学	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通过第一关。再考《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及第	
	考《缀术》《辑古》，录大义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通过第一关。《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及第	
童子	十岁以下，以五经和《孝经》《论语》为题，背诵其中文章十篇	通一经和《孝经》《论语》的，予官；七书皆通，予出身
弘文、崇文馆生	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	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及第

自从科考制度在高宗和武后时期完善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通过这个途径进入仕途。他们有的逐渐走到了高层，有的则变成了文坛领袖，

影响了一代文学风气。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包括如下这些人的名字：杨炯（显庆四年，659年，诸科）、李峤（麟德元年，664年，进士科）、岑羲（进士科）、魏知古（乾封元年，666年，进士科）、王勃（乾封元年，666年，幽素科）、苏味道（乾封二年，667年，进士科）、杜审言（总章三年，670年，进士科）、沈佺期（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宋之问（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张鹭（高宗上元二年，675年，进士科）、崔融（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马怀素（高宗上元三年，676年，词殚文律科）、魏元忠（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姚元崇（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卢怀慎（进士科）、张廷珪（仪凤二年，677年，下笔成章科）、苏颋（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宋璟（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源乾曜（进士科）、刘知几（开耀二年，682年，进士科）、陈子昂（嗣圣元年，684年，进士科）、郭敬之（郭子仪之父，嗣圣元年，684年，韬钤科）、张嘉贞（垂拱元年，685年，明经科）、裴耀卿（垂拱四年，688年，诸科）、张柬之（永昌元年，689年，贤良方正科）、崔湜（载初元年，690年，进士科）、张说（载初元年，690年，词标文苑科）、薛稷（天授二年，691年，进士科）、贺知章（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超拔群类科）、崔日用（证圣元年，695年，进士科）、崔沔（天册万岁二年，696年，贤良方正科）、刘幽求（圣历三年，700年，经邦科）、张九龄（长安二年，702年，进士科）。[153]

这份名单囊括了大部分玄宗前期的宰相，也有许多文坛领袖。正是在丰富的人才储备下，玄宗朝才有可能在短短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就达到了一个富裕而又和平的盛世时期。

诗的进化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唐朝辉煌的登科榜上迎来了一位年轻

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二十一岁的王维。

王维，字摩诘，他的家在河东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境内。他大约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有兄弟四人。与许多大器晚成的大家相比，王维在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

由于长安是国都，唐代的士人有游学长安以等待机会的传统。王维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在路过秦始皇陵墓时，他写下了此生流传最早的诗歌《过秦皇墓》，表现出不一般的早熟。人们耳熟能详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于他十七岁时。与普通文人不同的是，除了作诗之外，王维还擅长绘画，是唐朝有名的绘画大家，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交游面。

这位年轻的才子与弟弟王瑨一起在长安悠游于官宦之间，很快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诸王、驸马，都对他们开门相迎。[154]当时长安的风流人物之首，是唐睿宗的儿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玄宗和兄弟们见过了太多的骨肉相残，他决定要改变这种风气，善待兄弟，而兄弟们则放弃了对皇位的野心。双方达成的妥协，创造了唐代皇室少有的兄弟和谐时代。岐王曾经帮助哥哥登上皇位，而他本人满足于做一个文坛领袖，领导长安的诗酒气氛。王维也是岐王府上的常客，时而随岐王悠游两京，时而在国都郊区策马探访。此时的王维显得意气风发，为了迎合达官贵人们，笔调也大起大落，充满了时代精神。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十九岁的王维终于考虑起他的功名来。虽然他人在长安，但如果想参加进士考试，必须首先获得家乡所在州府的推荐。要获得州府的推荐，他必须参加州府的考试，只有名列前茅的人才能拿到推荐前往京城。王维的家乡在山西，但他的名声主要在长安，如果他回家考试，反而没有在长安的把握大。唐朝的政策是相对灵活的，王维在长安找了推荐人将他推荐给京兆府，参加了京兆府试，从而获得了推举资格。[155]

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二十一岁时，他考取了进士。[156]这一年中进士的一共有三十八人，在唐代算是人数非常多的一年。到了五月，皇帝亲自在含元殿举行策试，并赐给酒食。王维的仕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王维考取之后就立刻获得了重用，担任了太乐丞，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虽然我们不知道随即授官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与王维同年参加考试的另一位文人綦毋潜显然就没有这么走运，不幸落榜了。綦毋潜是虔州人（属于现在的江西地界），考试失利的他只好打好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他返乡的时候，得意扬扬的王维还写了一首诗送别他。[157]

如果王维按照这条极其顺利的路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成功的官员，但这个官员是否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却并不一定。但就在人们以为王维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遭殃了。

当时王维任职太乐丞，顾名思义，就是管理皇家祭祀和酒宴的官员。在当时，有一种黄狮子舞是专门给皇帝表演的，只有皇帝在场的时候才能看到。王维有一次在皇帝不在场时也私下安排表演了这个节目，于是被贬黜前往济州（位于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担任司仓参军[158]。按照唐代的升迁秩序，一个进士如果能够留在京城任职，意味着接下来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可是一个州府的参军却意味着远离了朝廷。只要离开了中央，一旦任期届满，就要遵守轮休的纪律，也就是不能马上担任下一个官职，这种轮休对于官员的生涯是极其致命的。

这年秋天，春天刚刚及第的王维尝到了官场的苦涩，悻悻然踏上了远去的旅程。这一次历练让唐朝少了一个成功的官员，却留下了一个优秀的诗歌苗子。

玄宗初年，唐代的诗歌依然处于起步期，老一代的诗人正在死去，

新一代的还没有到来。因此，在这个空档期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

在现代诗歌之前，中国的诗歌一直是格式化的，缓慢地进化着。

在世界各地，人类的诗歌形式在最早时都与音乐相关，但随着节奏和韵律的发展，又逐渐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的形式。中国的诗歌也不例外，最早的形式是以四言为主，但格式相对自由。比如，流传至今的先秦《击壤歌》就是以四言为主，而最后一句是七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159]

孔子曾将先秦诗歌搜集整理成《诗经》。《诗经》的诗歌大都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多言，但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四言的诗歌世界。这些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表明诗最初是与乐相匹配的。

孔子整理《诗经》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是中国诗歌的不幸，因为没有被他整理的诗歌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他所选择的诗歌，格式又过于固定，使得现代人无法确知先秦诗歌的形式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还是还有其他的形式。

《诗经》中的诗歌旋律简单，每一首诗都分成了若干相似的章节反复吟唱，每一章中的字词有许多重复，只有一部分字词被替换。这让先秦诗歌显得过于单调，其复杂度和完善形式无法与其他文明长篇累牍的史诗相比。

此外，有一些迹象表明，即便在中原地区，在《诗经》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诗歌，但是流传下来的过于稀少，无法窥得全貌。比如，当荆轲前去刺秦时，高渐离就送了他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60]这是一首带上了语气助词的七言诗歌。此外，还有一首可能出自先秦的诗句，"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161]，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抒情成分，显得更加特殊。但这样的诗句太少，因此早期的

诗歌品味是被《诗经》固化的。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除了西部的秦国和中原的五国之外，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个文化上比较特殊的国家——楚国。楚国并不是受周王分封而来的，本来就是南方的蛮夷国家。他们的语言与其余六国也有着一定的区隔，因此诗歌形式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却又保留着特殊性。

楚国的诗歌因为屈原的出现而得以保留。屈原活动于楚国衰微之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充满了牢骚，发泄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在形式上，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体却是那么标新立异，使得习惯了《诗经》重复体系的人们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着很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形式上，《楚辞》不同于四言格式的单调，而是更接近于人们普通的说话方式，每一句话的字数更多、容量更大，更加口语化，而且随着感叹词的应用，感情也更加饱满。以屈原的诗为例，他的句式大都比四言复杂得多，又有多种特殊的格式。其中一种以《离骚》为代表，前后两句中，前句是七个字，后句是六个字，前句中往往带有一个语气词“兮”，因此可以看作六言诗歌，也可以看作七言的探索形式。但这种格式的字数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时常会根据实际诗句有所变化。比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基本形式；“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前半句就变成了六字；而“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前半句就变成了八个字。[162]

屈原的另一种句式以《九歌》为代表，其前后两句都带有语气词“兮”，两句大都为六字，如果去掉语气词，实际上就是五言诗。当然五言也不是固定的，有的句子会酌情增减字数。比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基本句式，而“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前半句就减为五个字。[163]

此外，屈原诗歌中也有四言形式[164]，这表现出《楚辞》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人们的吟咏需求。

但仅仅是形式上，还不足以说明《楚辞》的丰富性。事实上，《楚辞》之所以让人们感到惊叹，还在于它内容的丰富程度。与《诗经》相比，《楚辞》在内容上可长可短，短的只有几行，长的却是普通《诗经》诗篇的几十倍。即便是同等篇幅，《楚辞》的内容含量也比《诗经》高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不断地重复和回环，这一点它不像是歌，而更像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这种方式让《楚辞》更加便于叙事。

而《楚辞》最令人惊叹的特点，还是它丰富的想象力。在《诗经》的诗篇中，由于教育的需要，孔子在选择题材时，大多采用了现实主义题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战争、生产、政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而《楚辞》却代表了中国人充满想象力的另一个天地。

在屈原的笔下，他一会儿陷入现实的苦闷之中，一会儿又遨游天际，与神仙同游。他还不断地将自己比喻成各种鲜花奇兽，而将敌人比作衰草败鸟。我们读《楚辞》，仿佛进入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这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创作原来也可以这么天马行空，产生出如此丰富绝伦的想象。

《诗经》与《楚辞》在想象力上的分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杜甫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想象力则通过魏国的陈思王曹植传递给了李白，使得李白的诗句中充满了绮丽瑰异的修辞。

秦汉更迭之后，中国的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种发展仍然与楚国的诗歌系统有关。项羽和刘邦都来自楚地，因此汉朝虽然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帝国，诗歌体系却受到了楚国传统的浸染。

当项羽被围垓下时，他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

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就是典型的楚语歌谣。而这首诗，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七言架构。虽然从内容上来讲它仍然属于《离骚》的六言体系，其中每句诗都至少有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兮”，但它从音节上来讲，却属于七言诗探索的一部分。

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典型的楚语七言诗。此类的七言诗在汉代一直流传，比如汉武帝也曾经做过数首类似风格的诗，其中的《柏梁诗》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七言诗祖，有人认为是联句之祖，因为这首诗是汉武帝和群臣以接龙的形式创作的。[165]此外，李陵也曾经有七言诗赠给苏武。

于是楚语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分成了两支：一是《离骚》所代表的骚体，后来变成赋的一种形式，称为“骚体赋”，后人往往有模仿的，作为诗歌的一个小分支，但并没有壮大；二是楚国歌谣分化出的七言歌谣，最终成了七言诗的先驱。

除了楚语体系之外，汉代最著名的文体是赋。所谓赋，是一种骈文形式，讲究对仗。除了旁支的骚体赋之外，汉代的大赋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堆砌，充满了对偶句，而对偶句又以四言为主，至于内容却显得很空洞。

汉赋对后世诗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偶。虽然后人对学习汉赋的铺陈不感兴趣，却将其对偶借鉴到诗歌之中，成了诗歌的一种基本构成。

虽然七言诗诞生更早，但汉代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五言诗。五言诗的诞生，又和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有关。

乐府是汉代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源于秦代，到了汉代继续沿用。汉武帝时，皇帝赋予了乐府在民间采集诗歌并谱曲的权力，乐府成了朝廷的正式机构。[166]乐府从民间采集并谱曲的诗就称为乐府诗。

汉代的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其目的多是为了表演，但表演的场合又是不一样的。最正式的场合是在皇帝郊庙祭祀时，这时演奏的歌曲多是三言和四言歌，为的是表现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但这些歌曲由于充满了陈词滥调，流传领域非常狭小，反而是另一种采自民间的五言诗歌得到了后世人们的喜爱。

五言诗由于诗句的字数（比四言诗）更多，表达的范围更丰富，甚至带有了小说的性质。这在内容上和三言、四言形成对比，三言、四言往往是赞词组成的，五言诗中则不乏叙事的精品。比如，五言乐府诗《陌上桑》就写了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拒绝官员（使君）调戏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则写了一位女子被婆家逼死，丈夫也自缢跟随的悲惨故事；《十五从军征》则是写了一位归乡的老兵，回家后却发现家中亲人已经都死去的故事。[167]

这类乐府诗的特点是，它们都很擅长讲故事，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宣泄作者的情绪。这和呆板的《诗经》比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

之后，乐府诗的曲调渐渐被人忘记了，但是歌词却屡屡被后世模仿。后世的模仿之作往往有同样的名字，而内容也彼此相似或者属于同一类型。此外，乐府诗已经有了押韵的概念，后世在押韵上也进行了模仿，使得乐府诗成了中国古诗的一种品类。

但是，有配乐的乐府诗毕竟是少数，后人模仿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当人们需要更自由的表达时，五言诗也就跳出了乐府诗的藩篱。文人们开始自由创作五言诗，不再托以乐府的名义。汉代时，五言诗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门类，从《诗经》、《楚辞》、乐府中独立了出来，成了品牌。

汉代的五言诗数量不多，却很有代表性。最著名的是已经不知作者的《古诗十九首》，苏武、李陵、班婕妤、卓文君、蔡文姬等人也都有五言诗传世。苏武、李陵的几首五言诗被人赋予了很高的地位，认为是

五言诗的鼻祖。[168]

五言诗虽然逐渐脱离了音乐，但与普通的文体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押韵，通过押韵来产生出韵律感，替代之前的音乐效果。

到汉末，五言诗仍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创作，当时的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编造谶纬、注释儒教典籍上，对文学的关注是有限的。

汉末三国时期，随着曹操父子三人的出现，诗歌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曹操时期的诗歌对于形式的要求还比较少，他本人既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的四言诗，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这样的五言诗。此外，还有数首杂言诗，每句的字数不固定，却又有一定的规律性。[169]这表明诗歌的形式到这时还是未定型的。

但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时代，诗歌的形制已经逐渐固定了。曹丕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当时人喜欢作的赋之外，诗则已经以五言为主。[170]曹植更是将五言诗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在这个时期，除了大量采用五言诗之外，诗的题材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从曹操开始，诗歌成了一个有意识追求个人体验和在场感的工具。汉代的乐府诗往往是一个故事，故事描述的对象与作者无关，而是一个特设的角色，一首诗写尽春夏秋冬，通过故事的设计来打动人。三曹的诗歌却有意识地加入了自我，比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自己的感悟出发，写尽心中的苍凉感。这种苍凉感是他本人的人生体悟，风景也是他眼见的，自我的在场感又被后来的诗人所效仿，于是诗歌成了更加私人化的存在。

曹丕则提倡诗歌的美感[171]，而要达到美感，则必须写自己的真实心情和真实风景。

真正将父兄的提倡付诸实践的是曹植。诗到曹植，书写的绝对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基于现实观察的动态过程。人们几乎能够根据他的诗歌还原出当时的场景。不管他写景色还是写人或事，都带着饱满的情感。此外，曹植将屈原以来诗歌中丰富的想象力继续发扬光大，其最著名的篇章《洛神赋》更是想象了自己路遇女神，与之发生精神恋爱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一方面想象奇特，另一方面场景描写又极真实，所以人们现在还在讨论洛神的原型到底是谁。

曹植对于中国诗歌最后的贡献在于押韵和平仄。在失去了音乐之后，诗歌更加讲究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顿挫呢？在汉代时人们并没有足够的意识。虽然在押韵上，人们已经有所体会，但即便到了西晋，人们仍然无法掌握平仄带来的诗歌韵律感。曹植却已有意识地通过炼句来产生韵律。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平仄的规则，但他的诗却自觉地采纳了押韵，并通过吟咏产生了平仄，与后世的平仄规则已经非常接近了。

晋代时人们曾经根据曹植的诗句来琢磨押韵与平仄，到了南北朝，终于产生了严格的诗歌规则，从而解决了诗歌的抑扬顿挫问题。

总结起来，到了曹魏时期，古诗的主流从四言变成了五言，而古诗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古诗以歌颂皇家或者描摹故事为主，之后的人们加入了个人的因素，强调个人的所见所思和主张，从而将诗歌变成了表达自我的工具。由于文人的重视，中国古诗（特别是五言）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

三曹之后，五言诗歌在主题上又有了数次变化。首先是竹林七贤，特别是以阮籍和嵇康的诗作为代表的哲理诗。其中阮籍的《咏怀诗》更是佳作。到了东晋，陶渊明将诗歌的主题用于山水田园和隐逸，使得诗歌的抒情意味更浓。

魏晋时期诗歌之所以能拓展出一片新的天空，在于人们摆脱了政治

的束缚，强调自我和反叛，从而发展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随着诗人的士族化和官僚化，另一种制约诗歌的因素也变得强大起来。

由于诗人脱离了实际生活，诗歌也逐渐变成了应酬和往来的工具。到了南北朝时期，诗人大都出现在达官贵人之中，他们将诗歌看成是一种装点身份的工具，人们之所以要作诗，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贵族阶层，与普通民众不同。

到这时，诗歌从强调内容变成了强调格式。对于内容来说这并不是好消息，但对诗歌在格式上的成型来说，却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南朝齐的永明时代（公元483年—493年），围绕着皇族竟陵王萧子良，聚集了一批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沈约、谢朓。他们发展了从曹植开始探索的诗歌音律问题，强调诗歌的音律、对偶和平仄。

汉代时五言诗与歌曲是融合的，当五言诗从歌曲中独立出来，如果要做到朗朗上口，必须首先从押韵上做文章。其次，人们从汉赋中学到了对仗，通过两个句子的对仗，就可以产生出韵律之美。声调的高低同样是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平仄问题。中古汉语有四音，分别是“平上去入”，只有四声错落开，才能产生出美感。

沈约等人讨论了一系列这方面的问题，制定了所谓“四声八病”的规则，其中四声指的就是“平上去入”四声，而“八病”则是诗歌在韵律上必须避免的八种问题。通过对“四声八病”的遵循，就可以产生出诗歌的音律美。在当时，符合这些规则的诗歌，被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诗歌虽然看上去过于烦琐，但这是人们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诗歌的韵律问题，并试图制定出规则来。这一点可以视为唐代诗歌的先声。

不过，当诗歌的规矩过多，而人们由于生活的匮乏，缺乏足够的题材时，就到了诗歌变成靡靡之音的时刻了。

到了南朝梁时期，在皇帝简文帝周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他们制作的诗被称为“宫体诗”。所谓宫体诗，是指强调诗歌的韵律规则，由宫廷大臣们应酬所作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规则上接近完美，但内容却极其贫乏。曹氏父子之后，人们作诗就开始强调要有真情实感和自我观察、体验，但到了宫体诗时期，题材最多的是爱情诗，且大都被编入了当时的一个集子《玉台新咏》[172]之中，这本书也就成了隋唐以前的诗歌课本之一。

到了这个时期，五言古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另外两种诗体也在此时进一步发展。如《玉台新咏》专门用一卷收录了早期和当时的七言诗，篇幅约占全书的七分之一。

还有一种非常短的诗歌，只有四句二韵，如果是五言就只有二十个字，七言也只有二十八个字。要在二十几个字内将内容表达完毕，需要较高的水平。这种短诗称为绝句。

经过了隋唐的改朝换代，诗歌迎来了唐朝的巅峰时刻。唐代人习惯将之前人们创作的诗歌称之为古体诗，而将唐代的诗歌称为近体诗。那么，唐代的近体诗与古体诗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诗体的严格程度。

唐初的人们写作的仍然是宫体诗，也就是古体诗的一种。宫体诗主要用于君臣之间或者大臣之间的应答，内容多是赞颂朝廷，或者寒暄凑趣，但在格式上又非常严格，有着押韵、平仄、对仗等要求。

唐太宗是唐代写宫体诗的大师，他的大臣们在皇帝的感染下，许多人都成了宫体诗高手。这个时期的大臣诗作中，有一个单独的品类——奉和诗。所谓奉和诗，指奉旨应和的诗歌，这样的诗充满了奢华辞藻，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到这时，诗歌就如同到了汉代末年，需要另一次革新，因为宫体诗题材的狭窄性已经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

盛唐以前对诗歌的改造可以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初唐四杰

和陈子昂对诗的内容的改造，第二个方向是沈佺期和宋之问对诗的形式的改造。他们共同创造了唐诗的起步阶段，定义了唐诗风格。

高宗和武后时代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之所以能够在唐诗上有所进步，是和他们的身世起伏相关的。早期的唐代宫廷诗人大都是高官显贵，他们的生活圈子狭窄，写诗更多是为了与皇帝应酬。而这四人的官宦生涯大都是边缘化的，骆宾王还因为反叛武则天而不知所终（也可能是被杀）。他们的生活圈子更广泛，从市井直到塞漠都有所接触，这使得他们在题材上脱离了宫体诗。他们的题材更偏向于羁旅、分离、边疆和险途，不再是应酬，反而像当初三曹对汉诗的改造那样，是从内心深处表达的真实情感。

到了陈子昂时期，他更是有意识地复古，反抗宫体诗，提倡兴寄和风骨，跳过齐梁的宫体诗，去寻找汉魏时期的悲怆和真挚。正是在这种思潮下，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才有了感动千年的力量。

真正令唐诗独具一格的，是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对唐诗格式的改进和定型。沈佺期和宋之问都是武后时期的大臣。从政治上说，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投机派，为后人所耻笑[173]，但唐代的官场除了容纳那些正人君子之外，也给投机分子留有生存空间，这使得后人虽然鄙夷他们的人格，却仍然将改造诗歌的功劳授予了他们。

在唐代以前，宫体诗已经对诗歌的格式进行了严格的设定，但这又过于限制了诗歌的体裁，加大了作诗的难度，使得人们把焦点都放在了诗歌的形式上而忽略了内容。但如果不讲求格式，又影响了诗歌的韵律，到底如何折中，这里一直存在着矛盾。

沈宋的最大贡献，是将一种新的诗体定型了，这个诗体就是律诗。律诗的格式固定，只有八句四韵，如果是七言就是五十六个字，五言只有四十个字。如果律诗只有一半，也就是四句二韵，就是一首绝句，所

谓绝句，可以理解为半首律诗。而唐以前的诗歌则不限定句数，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律诗和绝句都属于唐代人所说的近体诗，而唐以前的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诗等被称为古体诗（或者古诗）。一首八句四韵的七言诗可以是七言律诗，也可以是七言古诗。那么同为八句的律诗和古体诗区别何在呢？在于押韵、平仄和对仗。宫体诗也有平仄，但宫体诗的平仄更加严格，分“平上去入”四声，而唐代的律诗只区分平仄（上、去、入三声都算仄声）两声，这就改造了以前的音韵规则，减少了作诗的难度。

另外，律诗又制定了几个规则：粘、对、替。所谓粘，也就是相邻的两韵中，前一韵后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平仄必须与后一韵首句中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相同。所谓对，也就是同一韵中，前后句的第二、四、六个字的平仄必须相对。所谓替，指的是每一句的第二、四、六个字必须平仄相反。

这个规矩造就了律诗的节律感。我们可以认为，平仄和粘、对、替都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唐人摸索出的一种规则，因循这些规则创造出来的诗歌最朗朗上口。再加上押韵规则，以及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的要求，形成了律诗较为严格的格式感。一首八句的七言诗，只有符合了这些所谓的规则，才能被称为一首律诗，否则的话就是七言古诗。

至于绝句，可以取律诗的前两联，也可以取后两联，同样可以取中间两联，甚至首尾两联，组成的四句诗就是绝句。

由此，律诗和绝句终于定型，唐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事实上，许多诗人是各种诗体都作，李白是五言古诗的高手，同时在七古、五律、七律等各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成就。而杜甫出生稍晚，在律诗方面更加突出。

沈宋对于诗体的固定，加上唐代科考对于诗歌的促进，随着玄宗时代再次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让民间变得更加富裕，养活得起一个闲

适的文化阶层，诗歌的土壤就完全具备了。开元盛世还不是唐诗的高潮，只是它的起步。

只有当政治环境已经吸纳不了这么多的文人，并且随着社会的退化，一部分文人被迫将自己的目光从宫廷转向社会时，诗歌的盛世才真正到来。

第三章 盛世阴影

贤相集团的更迭

在开元初年，玄宗任命了一批贤相治理国家，他们虽然都有个人缺点，但整体上作为一个集团存在。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

宋璟和苏颋之后，唐朝的宰相制度又保持了十年的稳定，其特征依然是以两个宰相为主。偶尔多出几人或者空缺，但这种时候大都是过渡期，一旦过渡完成，依然是双宰相制。

宋璟和苏颋罢相后，皇帝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治所太原）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两人同领平章事，成为宰相。并州是唐朝的北都所在地，也是唐王朝的发家地，那里设立了一个大都督府，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所在地。大都督府的都督都是由李氏的亲王兼任的，但这些亲王大都不会去往驻地，而是继续生活在长安。于是，大都督府的二把手长史就成了实际上的负责人，并州长史相当于帝国北方军事上的首席，因此，将他调入长安担任宰相也是情理之中的。

在玄宗初期的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不是最著名的姚崇和宋璟，反而是源乾曜。

源乾曜也是进士出身，一直以干练闻名，在姚崇的搭档卢怀慎病重时，他曾经被皇帝选上来担任宰相，作为姚崇的副手。但干了没几天，姚崇就被罢相了，源乾曜将相位让给了宋璟等人。等宋璟罢相后，源乾

曜又被皇帝请回来担任宰相，他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正月接替宋璟和苏颋之后，直到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才被罢相，一共担任了近十年宰相。[174]

那么，源乾曜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长期任职呢？答案是他除了干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品格：能担事，同时放手少管事。

在宋璟担任宰相时，源乾曜担任京兆尹，相当于国都市长。这个官职本来就属于烫手山芋型的，富贵子弟云集长安，不管什么事，只要牵扯到权贵，都有被告御状的风险。当时，由于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云集，国都圈（关中平原）的粮食不够民众消耗，但要从内地运送粮食又非常困难，皇帝常常选择带着领导班子到东都洛阳居住一段。皇帝去洛阳时，宰相也要跟着同往，于是整个国都的事务都交给了京兆尹，而源乾曜的管理宽严相济，让皇帝感到满意。

有一次，皇家养的一只白鹰走失了，人们发现它死在灌木丛里。众位负责官吏害怕皇帝生气，只有源乾曜安慰众人，说白鹰是自然死亡，谁都没责任。他将责任担了下来，向皇帝解释清楚，事后也没有人受罚。

皇帝正是看上了源乾曜的宽容精神，才让他接替宋璟担任宰相。不管他的搭档如何换人，他始终在台上屹立不倒。虽然他的权力很大，但他永远谨慎地发表意见，甚至大部分情况下只附和别人的意见，只有少数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才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更像是曹参式的官员，喜欢萧规曹随，既然姚崇和宋璟等前任都已经打下了基础，那就继续下去。正是他的谨慎，让开元盛世得以延续。

另外，源乾曜一直注重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让那些依靠祖荫的官员让位。他上台不久，就以身作则，将自己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赶出了京城，派到地方任职，只留了一个在身边。在他的榜样作用下，文武大臣纷纷将自己的儿子、亲戚送出京城，形成了良好风气。[175]

源乾曜长期的搭档，最初是张嘉贞，之后是张说，最后是李元纮。[176]与源乾曜搭档的这三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而正是这些缺点，让我们看到了开元贤相的复杂性。

最早与源乾曜搭档的张嘉贞是以明经进士登位的，也是武则天时期选拔的人才。在仕途中，他以干练刻薄著称。然而张嘉贞却有着几道过不去的坎：第一道是他的兄弟张嘉祐；第二道是他的几位亲信；第三道是他常用酷刑对待所谓的贪官。[177]

张嘉贞的晋升主要靠帝国的文官系统，而他的兄弟张嘉祐则在武官系统中晋升，最后担任了金吾将军，但这个职位却和张嘉贞在皇帝面前的求情不无关系。张嘉贞本人干练有余、决断有余，但是容忍不足，在碰到源乾曜这位搭档之后，他立刻吃准了搭档的脾气，开始大包大揽起来。很快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亲信圈子，包括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这四个人聚集在张嘉贞的左右，常常在一起议论朝事，形成了另一个小政府。

正是张嘉贞的性格，让人们对他的议论不断，关于他贪污腐败的流言四起，但实际上他本人极其清廉。他退职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的田产，就连他的亲戚都看不下去，劝他考虑一下将来，但他表示自己担任过帝国最高职位，这辈子不会受穷的，而且即便准备再多的财富，如果子孙不争气，一样会被败光，不如不留。由于这种清廉的态度，加上急脾气，张嘉贞对于任何指控他腐败的言论都特别敏感。

开元十年，曾经有人控告洛阳主簿王钧为了获得御史的官职，给张嘉贞在洛阳修了宅子。这件事被玄宗知道了，命令将王钧杖杀。张嘉贞不仅不救他，反而暗地里指使人加快行刑。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史料过于简单，已经不可考，但从张嘉贞不治田产的态度看来，至少不是有意受贿，很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潜规则之中，他本人也并不认为违反了官场的纪律。但他对王钧的态度，表明了急于撇清关系的心情。[178]

除了促使王钧被杖杀之外，张嘉贞还经常运用杖杀手段解决问题。秘书监姜皎因为泄露了皇帝想要废除皇后的秘密，皇帝命令张嘉贞想办法找到姜皎的问题，将其治罪。张嘉贞开出的药方依然是打板子，导致姜皎身受重伤，死在了流放的路上。[179]而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后，皇帝询问到底怎么处置，张嘉贞又开出了打板子的药方。这次被张说拦住了，张说提出，如果现在乱打板子，那么未来这板子也许会打在退职之后的张嘉贞的屁股上。

张嘉贞一心防止腐败，不想最后依然因为腐败而倒台。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他的兄弟张嘉祐。张嘉祐担任将军后，成了腐败官员中的一位，事情被揭发后，张嘉贞感受到了压力。这时，张说给他出了个主意：既然掩饰不住，不如先承认兄弟的罪过，等皇帝接见时，再请求皇帝的原谅。张嘉贞听从了张说的意见。

他等待着皇帝的接见，不想皇帝见他认了罪，连见都不见，直接将他贬为幽州刺史。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正月，张嘉贞被罢相。张嘉贞对于自己的被免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兄弟的事情不应该牵连自己。特别是当他听说取代自己的就是张说时，更加生气了。第二年，他又被调回中央任职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皇帝宴请他和宰相们吃饭，张嘉贞当面和张说吵了起来，被老好人源乾曜给劝开了。

在源乾曜的搭档中，张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张说在玄宗时代刚开始时，也短暂地担任过宰相。到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也是以并州刺史的身份被授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因此，从这时开始到张嘉贞去职，帝国事实上有三个宰相。但张说最初是以管理军事为主，第二年四月他就兼任了朔方军节度使，到北面巡边去了。张嘉贞免职之后，张说才更多地承担起了宰相的职责。至于张说承担的军事职责，则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晙。玄宗任命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王晙随后被派往北方巡边，没有参与太多的决策。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底，王晙被人诬告谋反，皇帝虽然不认为他有罪，但为

了防范，还是将他罢相。[180]于是，双宰相制又在源乾曜和张说的搭档中运行了三年多。

张说是玄宗时代有名的大才子，主持过《三教珠英》的编撰，又帮助皇帝设立了丽正书院，但如果从个人品性来说，张说甚至比张嘉贞还差。除了与张嘉贞的钩心斗角之外，张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与姚崇的恩怨了。

他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拜相时，曾经试图阻止皇帝任命姚崇，不想姚崇上位后，立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张说贬斥了。张说第二次拜相的当月，恰逢姚崇去世[181]，于是民间就有了这样的传说。根据传说，姚崇死前已经知道张说又上位了，他担心自己子孙的安危，于是让儿子在张说来吊唁时，赶快投其所好，把家中的金银财宝都摆出来。[182]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看都不看，那么这个家就完了。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赞叹不已，就赶快请他写一份神道碑文，并用这些财宝当作润笔费。姚崇认为，张说为了得到财宝一定会说尽好话，但事后，他会后悔说了这么多好话，因为这样，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报复姚崇了。因此，他会以需要修改文字为借口，派人来要回自己撰写的神道碑文。姚崇嘱咐儿子们，一旦拿到张说的文字，就立刻去刻碑，并拿去见皇帝，让张说无法收回去，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家族。

根据传说，张说就这样被“死去的姚崇”算计了。这个传说虽然是编造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张说的人品是持保留意见的。

张说担任宰相期间，对于唐王朝的贡献主要是正面的。他虽然性格刻薄，但整体上又提倡施政宽容，特别看不起那些新崛起的聚敛之臣，并建议皇帝不要乱发动军事行动，这些做法都让玄宗盛世继续了下去。由于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他任上，玄宗时期的文学活动为之后的文学鼎盛打下了基础。[183]

张说在后世的争议之一，是为了封禅泰山而劳民伤财。正是在他的

主持下，玄宗皇帝效仿当年的高宗和武后，赴泰山进行了封禅。这次封禅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一月，皇帝从东都出发，来到泰山脚下。再骑着御马登山，其余的官员被留在了谷口，只有宰相和祠官陪同，所带来的卫士都在山下警戒。

这一次活动本来是张说增加威望的机会，不想，由于他选择的祠官大都出自亲信，而剩下的官员都不得上山，只有上山的人才得以加官，至于卫队，虽得加勋，却没有得到赏赐。这反而让组织者张说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威望不但没有增加，下官对他的怨恨反而加深了。

到了第二年四月，张说就被罢职了，直接原因是他得罪了几个他看不起的人。河南尹崔隐甫没有文化，皇帝想重用此人时被张说暗中劝住了。而张说更加看不起的是御史中丞宇文融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李林甫，这几个人在未来代表着另一股势力的崛起，他们属于一个叫作“聚敛之臣”的集团。

这几个人抓住了张说的软肋，控告他请术士占星，徇私纳贿，等等。皇帝于是派人将张说下狱。堂堂宰相转瞬之间成为囚徒。皇帝派高力士前往探视，发现平常仪表堂堂的张说蓬头垢面睡在烂席子上，用瓦片吃饭。皇帝动了恻隐之心，这才饶过了张说，仅仅将他罢相了事。但皇帝为了给他颜色看，还是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同党”杖杀，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张说之后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告终。这也表明，盛世时期贤相集团的影响力已经接近尾声。

接替张说的是户部侍郎李元纮。李元纮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宰相。他本人则是武后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又一位人才，崇尚简朴，性格正直，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才用他来取代喜好奢侈的张说。[184]

但是，到了李元纮执政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了。李元纮

是一位正直的人，他虽然身居高官，却并没有随着升迁而换到更好的住处，他的仆人和马匹也一直沿用。他穿着旧衣服，如果皇帝有了赏赐，就分发给族人。但正因为他的正直，反而让许多人受不了，因为那些人等着利用官僚系统的漏洞升迁。

而更麻烦的是，李元纮时期，帝国的财政已经不是靠节俭就可以治理好的了。皇帝特别需要钱，他利用一切机会赚钱，希望扩大官僚对土地的管控权，而李元纮却反对这样。这可能是造成他离职的重要却未被明说的原因。

在李元纮当政时代，皇帝又任命了一位叫作杜暹的官员为宰相，与李元纮、源乾曜构成了三驾马车。杜暹出身武将，虽然人品无可置疑，与李元纮一样清廉，却由于学问不行而受到轻视，与李元纮成了官场上的对头。开元十七年（公元728年）六月，皇帝以李元纮和杜暹的矛盾为借口，将他们三人全部罢相。[185]

从姚崇开始直到李元纮，每一个宰相都带着很多的缺点，有的性格急躁，有的无法约束家人，有的自身就有纳贿的“习惯”。除了源乾曜之外，他们任职的时间也都不长，最多只有四年，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符合士大夫的规范。他们都有着足够的正义感，虽然钩心斗角，但都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民间的干预，这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共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贤相集团。即便每一个人的任职时间都不长，但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内，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所产生的合力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发生。

与此同时，民间经济在休养生息中继续发展，使得开元时期的经济活跃程度早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太宗、高宗时期。

然而，就在人们已经习惯了享受盛世，八卦朝廷官员的斗争时，一股潜流却在逐渐发展，并最终成为盛世之下的阴影。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在李元纮、源乾曜和杜暹被罢相之后初露头角，又经过了六年，就

将玄宗时期的贤相集团彻底吞噬了。

战争与财政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唐帝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特殊的宰相。在此之前，帝国的宰相大都是由功勋卓著的文臣或者武将担任，但这一年，唐玄宗却任命了一位特殊的人物，他的身份既不文也不武，而是一位敛财之臣。他就是宇文融。

当宇文融获得这个职务后，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在讨论宇文融效应之前，不妨先看一看唐玄宗即位以来的军事和财政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既任命过姚崇、宋璟，也曾经任命过李林甫、杨国忠。

人们通常将张说当成文人，却忽略了他对唐朝军事的贡献。在他最后一次担任宰相之前，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张说曾经担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这是一种兼具文人和武将特征的职务组合，张说甚至在赴军职时还带着国史的本子，一路上边统兵边编撰书稿。

第二年秋天，唐朝的朔方节度使王晙由于担心一批投降了唐朝的突厥人有阴谋，将他们杀掉了。这次事件导致北方的许多部落都惊恐不宁，认为唐军杀降是一种不祥的举动，他们因此都有了叛离的心思。这本来是唐王朝的一场危机，但张说听说后，立刻带领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闯部落营地。作为唐朝北方地区的最高首长，他的到来让部落酋长们感到吃惊，连忙接待。副使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劝说他加倍小心。但张说却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担心他们想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所以不担心他们刺杀。大丈夫到了危险时刻要勇于搏命，这正好是我以死报效的时候。[186]正是靠这种精神，张说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将一次迫在眉睫的叛乱压制住了。

从这次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到，到了张说时代，贤相们依然以和

平为主来处理边境问题。

但张说也并非一味以和平处理问题。事实上，第二年北方首领康待宾反叛时，张说就率军击败了他。与康待宾一同反叛的还有党项人，张说却并没有追究党项人的责任，而是安置了他们。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张说回答说，不能靠把人杀光来解决问题。可见张说处理边事有刚也有柔。

张说担任宰相后，皇帝依然授予他朔方军节度大使的职务，让他去巡边。这时恰好又赶上康待宾余党的叛乱。张说镇压了这次叛乱，但同时，他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当时唐朝在边镇地区布置了六十万大军。张说却奏请将其中二十万人裁撤，让他们回归农业生活。这件事引起了皇帝的猜忌，但张说却回答：这些兵并没有战斗力，反而耗费了粮草，又无法务农，将他们裁撤是最佳办法。张说以自己全家的性命作保，换取了皇帝的裁军。

这次裁军，透露出唐王朝的一个痼疾。由于唐朝的财政问题一直不健康，事实上养兵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唐朝采取的府兵制名义上是兵农结合，但事实上兵不兵、农不农，既不能打仗，也不能务农，反而成了低效的代名词。

唐代的贤相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节流。也就是说，既然财政跟不上，那么就少用一些兵，节省财政。如果要少用兵，就要减少军事行动。因此，张说之前的宰相们大都不主张打仗，减少军事冒险。

当然，除了减少府兵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的配套改革，那就是增加职业军人。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作为宰相的张说采取了另一项改革：由于国都地区的兵以前都是从地方上抽调轮值的，缺乏战斗力，还总是缺额，张说建立了十三万人的职业军队来保护京师，这就是后来的彍骑兵。减少不能打仗的府兵，建立精兵队伍，就是张说改革的总方

向。

贤相们减少边境冲突的做法，对于玄宗盛世是非常有利的。但事实上，玄宗皇帝是一位喜爱排场，乐于花钱，不避讳打仗的皇帝。只是他在初期懂得放权，使得宰相们有了足够的操作空间。一旦承平日久，皇帝的内心就蠢蠢欲动了。到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玄宗皇帝对军功的渴望再次浮现。

这一次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五年前，当时吐蕃进攻了小勃律。小勃律位于现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附近，如果从新疆坐车翻越红其拉甫，沿中巴友谊公路（喀喇昆仑公路）进入巴基斯坦，就会经过吉尔吉特地区。这里地处偏僻，本来不是一个重要地区，但临近吐蕃。吐蕃希望将其拿下，以便通过这里的山路进入新疆的南疆地区。[187]

小勃律国王害怕吐蕃，连忙和唐朝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联络请求帮助，张孝嵩于是出兵四千，帮助小勃律打败了吐蕃。这次战争虽然获胜，却导致唐朝和吐蕃一直处于低烈度战争状态。[188]

唐玄宗和臣下谈起吐蕃问题时，大臣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张说为代表，他认为吐蕃与唐的连绵战争，已经造成甘州、凉州、河州和鄯州地区连年凋敝，即便获胜也是得不偿失，不如继续采取和平态度，接受吐蕃的表面服软，维持关系。但另一派以凉州都督王君㚟为代表。王君㚟作为武将是渴望打仗的，担心唐蕃维持和平，他就没有了战功。玄宗本人倾向于教训吐蕃，却碍于张说的面子无法做出决定，直到将王君㚟招入朝中，获得了他的支持，才决定采纳鹰派的意见。[189]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王君㚟深入敌军，与吐蕃交战并获胜，将俘虏献于长安。这次献俘更增加了唐玄宗的信心。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一月，吐蕃大将悉诺逻率军从大斗拔谷进入甘州地区[190]。王君㚟避开了他的风头，等对方疲惫之后跟在了后面。吐蕃人回军时恰逢大雪，冻死了很多士兵。王君㚟派人从小路绕到

吐蕃军队之前，烧掉了道旁的草。悉诺逻到了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时，由于没有粮草，马匹饿死了很多。王君㚟乘机派兵追击，击破了悉诺逻的后军，获得了一部分辎重马匹。

这次战役以唐军获胜告终，但唐军让对方的大部队撤退了，没有毕其功于一役。不过这样唐玄宗已经满意了，他封王君㚟为左羽林大将军，甚至他的父亲也受了封。

此刻，张说再次提出应该以和平为主，千万不要耀兵，但皇帝再次否决了他的提议。[191]

王君㚟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悉诺逻再次率军前来，这次他的目标是北方的瓜州，也是唐代进入新疆的门户之一。吐蕃人将其攻陷后，抓住了刺史田元献，此外还有一个人因为恰在城中也被俘，他就是王君㚟的父亲。吐蕃人为了羞辱王君㚟，将在瓜州抓住的一位僧人释放，给在凉州的王君㚟带了信，挑衅式地问他：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

王君㚟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对比，登城向西眺望哭泣，却不敢出兵。[192]

吐蕃人的事情还没有过去，回纥人又带来了麻烦。在第二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强盛时，有四部游牧民族来到甘州和凉州之间躲避突厥人的锋芒，其中一部叫作回纥。在王君㚟没有发达的时候，曾经被四部轻视，等他当了官之后，便向皇帝上奏四部难以管理，不如迁走。于是，四部的人颠沛流离，被送往异乡。

这一年的闰九月，四部中回纥部的一支人马决定报仇。这时恰好吐蕃人想与突厥人联合，就派出特使前往肃州以北的突厥地区。王君㚟听到了消息，率领精兵从凉州出发拦截吐蕃特使。当他们行军到甘州西南的巩笔驿时，埋伏的回纥人将他杀死，之后回纥人想把他的尸体带走送给吐蕃，却由于凉州兵的猛追，不得不弃尸而走。[193]

王君㚟的死亡不仅是唐朝的一次军事失败，还将国家带入了另一次危险的境地，这时的吐蕃、回纥、突厥等民族有了联合的倾向，对唐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到了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奚和契丹也加入进来，发生了又一次叛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唐朝再次抵御了吐蕃的进攻，逼迫其重新回归和谈，而突厥、回纥的情况也没有显著恶化，奚和契丹在经过数次战役后也进入了又一次和平时期。但从此之后，边境上低烈度的战争却一直没有平息，吐蕃、突厥、突骑施、奚和契丹等轮番给唐朝制造麻烦，使得边境的军事形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频繁的军事行动又给唐王朝的财政带来了问题。在之前，各位贤相们一直想压住的就是帝国的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但随着唐朝盛世的到来，各处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让帝国的国库变得左支右绌。

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扩张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194]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钱只包括士兵的口粮和衣服以及零花钱，如果将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再将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计入，那么军事开支要比能够统计出来的还要高得多。

除了养兵费用之外，开元中期的官僚阶层也越来越庞大，官僚集团的开支也成了问题。

唐代官僚系统的增长还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唐太宗早期，中央官僚的数量是七百三十人。太宗一代，养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员俸禄是十五万两千七百三十缗钱。[195]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加上办公费用，国家开支也不会过于庞大。

然而随后的高宗和武后时期，直到玄宗皇帝上台之前，是唐代官僚

系统膨胀最厉害的一个时期。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已经从最初的数百人扩张到了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比起太宗初年已经增长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有一千四百人的生力军进入官僚队伍，需要政府的财政供养。[196]

这还不算夸张，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数也并不庞大[197]，到了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年—707年），宦官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人[198]。到了玄宗时期，仅仅宫女就达到了四万人，带品的宦官已上三千人，更高级别穿紫衣的也有一千人。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员达到了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务员（吏）更是达到了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人，还有许多有了官员资格，但还没有授官的人[199]。

除了正规官员，唐代的宗室子弟也在呈几何级数膨胀，玄宗时期在这一块的支出也已经是天文数字。以他建立的收容皇族的十王宅和百孙院为例，十王宅每院配置四百名宫人，百孙院每院也有几十人，这个庞大的群体都必须由财政来养活。

皇族、官员子弟，以及各式各样的仆人、供养人等，长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需要供养的集团。官员有七万多人，宫人四万多人，再加上开元中期以后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军费连年膨胀，帝国财政入不敷出。

玄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200]这些根本不够开销。加之唐朝的财政系统是典型的常时财政，不具有扩充性，一旦到了战时，立刻会出现困难。更何况，唐代作为一个繁荣的朝代，其财政系统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属于非常不健康的。

即便在玄宗中期，如果从社会发展来看，已经是一次典型的盛世局

面，可是如果打开皇帝的账簿，却会发现一个岌岌可危的财政系统。当北边的战争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撑时，真正的问题就来临了。

那么，当皇帝财政吃紧时，他的官员（特别是贤相）是否能够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呢？

答案是否定的。

聚敛集团的出现

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源乾曜、张嘉贞、张说、李元纮等人所代表的贤相集团有着无数的优点，他们大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但这个特点也成了贤相们的缺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削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能够削减的数量是有限的，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皇帝除了削减开支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但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有着一个标准，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对民间盘剥。到这时，皇帝和贤相集团之间的蜜月期就过去了。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但不幸的是，由于文人阶层已经有了自己的选人目标，就连科举考试也只注重文采，不注重理财，这导致那些能够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的官员很难进入到高层，也就无法为玄宗皇帝服务了。

到底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群聚敛之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皇帝的需求。[201]

根据唐人自己的叙述[202]，聚敛之臣出现时，恰好是唐玄宗加大对外战争力度之时。战争扩大了，但战争经费却一直入不敷出，玄宗盼着

有人能够想出办法来帮助他。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一位叫作宇文融的监察御史突然毛遂自荐，向玄宗介绍了一套可以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203]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在玄宗之前，唐代的户籍制度一直不够精确，民间社会实际上瞒报了很多的税基（人口和土地）。唐代之所以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吸取了隋代的亡国教训。[204]隋朝统一全国，实际上是继承了北周、北齐和南朝陈三份国土，在这三份国土中，北周的户籍制度是相对完善的，而北齐和南朝的户籍制度却充满了漏洞。特别是北齐，也采取了从北魏传下来的均田制，人们在生下来之后从国家领得土地，种到死时再被国家收回去，而其他税收又是按照户来缴纳的。这种制度使得人们并不乐于申报死亡人数和实际拥有的土地，且为了减少户数，往往几十人上百人组成一个大家庭，这就减少了税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苛刻的方法，严格调查土地和人口，希望获得确切的数据来征收税款。不想，由于皇帝过于严苛，官员们摸准了皇帝的心思，纷纷加大了上报量，结果上报的土地面积超过实际土地近十倍。按照这个申报面积来收税，隋朝人民实际上被多征了十倍之多的税。这种重税使得隋朝成了短命王朝。

唐朝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从开国之初就没有建立过于细密的土地和户籍数据，宽容地对待逃户和瞒田现象。这样做使得民间经济由于税负不重而越来越发达，却使得财政收入总是不足。

根据宇文融的计算，逃户的人很多，这些人都不再向政府缴税，如果能够把这些人找出来，重新纳入户籍，就可以获得他们的税收，这叫扩户[205]。玄宗之前也曾扩户，但由于执行不力，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户籍外人口。宇文融认为自己有能力帮助皇帝将逃户的人抓出来，当这些人被纳入户籍开始交税时，也就增加了皇帝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采纳了宇文融的做法，于这一年二月份颁布法令，宣布扩

户。同时，他让宇文融担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并由宇文融指派了二十九位劝农判官[206]去往全国各地，一是统计逃户，二是统计土地。这次事件让民间受到极大的骚扰，但成果又非常显著。宇文融采取的措施是，对于新找到的户籍人口，首先免五年的赋税，可另一方面，他们必须立即缴纳一千五百文钱。这样做的结果是，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他已经找到了八十万的新户籍，相当于唐朝原有户籍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同等规模的土地。同时，由于每人上缴一千五百文钱，还获得了大约十二亿钱[207]，这相当于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这些钱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皇帝的私库。在唐代，中央政府的国库是左藏库，而皇帝还有两个私库，叫作大盈库和琼林库，一般政府的税收都是放在左藏库，而皇帝的花销则从两个私库出。宇文融将钱纳入私库，意味着皇帝不需要经过政府就可以直接动用，这些钱大都用于他的私人消费，还有一部分用于战争开支。

通过扩户，宇文融成了皇帝的亲信。由于他掌握着皇帝打仗的钱袋子，州县生怕得罪了他。他也是一个能干的官员，借机会走遍了全国。在皇帝的宠爱下，任何对他的做法表示异议的人都会被贬斥。[208]

对于宇文融的搜刮，并非没有反对者。比如，开元十二年扩户刚刚结束，户部侍郎杨玚就反对说，这样的做法既不公平，又让民间疲敝，虽然看上去得到了一些钱财，却无法弥补民间的损失。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结果却是，杨玚本人被从中央贬斥到地方任职。此刻，皇帝对财臣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官僚。

第二年，皇帝干脆让宇文融兼任了户部侍郎（原本属于杨玚的职位），让他另外又起了一摊事情：利用搜刮上来的税收开办“常平仓”，也就是反向操作，低买高卖，利用粮食差价赚钱。这样皇帝的搜刮生意就从税收转向了对物资流通领域实行国营的垄断政策。[209]

宇文融最大的对手是宰相张说。作为保卫官僚阶层价值原则的士大夫，张说对于这类“能臣”充满了警惕，认识到他们越能干，给皇帝搜刮

的钱越多，民间就会越凋敝。宇文融也注意到这个最大对手，于是先下手为强，在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联合李林甫等人将张说弹劾入狱，张说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宰相的职位。唐玄宗时代姚崇、宋璟之后最强大的价值捍卫者不在了。[210]

张说离职后，皇帝有一段时间厌恶宇文融乱结朋党，将他贬往地方，但他很快发现离不开这个聚敛之臣，重新起用了他。宇文融也明白皇帝的需求，又提出了新的建议：由于黄河在历史上不断决堤，那些黄河故道已经成了土地，却并没有计算进入帝国的耕地之内，宇文融就请皇帝在黄河故道开垦土地，作为官田挣钱。这样的做法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有限。可是宇文融在乎的不是效果，而是能不能让皇帝开心。

果然，皇帝的开心是无价之宝，到了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随着源乾曜、杜暹和李元纮同时离开相位，宇文融终于迎来了巅峰时刻。这个月，唐玄宗为了填补空缺，同时任命了两位新宰相，分别是兵部侍郎裴光庭（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上之前任命的主要管军事的宰相萧嵩，构成了新的三驾马车。

这三人中，萧嵩是以战功出身。他本人是世家子弟，不是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因此常常被人们认为文采不足，只是靠着资历深，不与人为敌，因此担任了宰相。

裴光庭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他的父亲是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将领——宰相裴行俭。作为名门之后，裴光庭看不起宇文融这样的钻营之徒，但皇帝偏偏配给他这样一名同僚。

在三位宰相中，宇文融属于拥有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新式人物。皇帝之所以这样配置，显示了他维持贤相集团与聚敛官员均衡的想法。离开了贤相集团，就无法保持民间的稳定，而宇文融带来的财政丰盈对于皇

帝的吸引力同样很大，只有双方都尽力，才能保证皇帝的所有需求。

贤相集团看不起宇文融，宇文融也看不起贤相集团，他自许只有自己可以帮助皇帝解决问题。被任命为宰相后，宇文融认为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认为只要能当数月的宰相，就可以让天下大治。[211]

不幸的是，他执政的道路并不平坦，这源于他对于一位皇族的妒忌。信安王李祎军功卓著，就在宇文融当宰相的当年，信安王组织了一场与吐蕃的石堡城大战，将敌人击溃，使得吐蕃决定向唐朝求和。[212]

当信安王回到长安时，宇文融首先安排人去弹劾他。不料信安王提前知道了消息，告诉了皇帝。当第二天宇文融安排的人去告状时，皇帝大怒，将宇文融贬斥。他只当了一百天的宰相就被贬，自然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宇文融倒台后，告状信立刻飞一般到来。皇帝由于国用不足非常想念他，甚至对着宰相裴光庭抱怨，说宇文融贬了之后，谁能来帮我？但在朝臣不断的告状下，皇帝又只好将他越贬越远，直到他去世。

宇文融被免职后，唐代的贤相集团又主持了几年朝政，萧嵩和裴光庭的搭档持续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随着裴光庭的死亡而告终。之后，萧嵩推举韩休担任自己搭档，但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两人一同离职。

于是，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唐王朝迎来了第二位能臣宰相，同时还有最后一位贤相。这位贤相就是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张九龄。他的搭档裴耀卿则是能臣中的特殊的人物，仕途与其他文官类似，但在作为上却又接近后期的聚敛能臣。

裴耀卿最大的功劳是帮助皇帝运输粮食。到了唐代，关中盆地显得过于狭小，自产的粮食无法满足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的需要，于是只能从江南地区通过运河系统、黄河转运到长安。由于路途遥远，运送粮食依然不能满足中央需求，皇帝只好定期去洛阳居住，避免粮食长途运输，

并节省长安的粮食。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主持了一项重大工程，以解决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213]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一路上要等待很久，比如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由于运河水浅，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由于水大，要等两个月时间，水小了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让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调头回去，分级转运，以提高效率。

另外，黄河的大部分地段都可以通船，只有三门峡一段过于艰险，难以通船。以前如果人们强行通船，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船只在这里沉没。如果不走这条路，又必须通过东都洛阳走陆路将粮食转运到长安。裴耀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粮食经水运送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十八里山路送到西库，再用水运从西库运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保证了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大大增加，从几十万石跳涨到平均一年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的消耗。到了唐玄宗后期，就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

裴耀卿个人野心不大，且接受的是传统的士人教育，没有投机钻营的表现。但他又是一个从贤相集团到聚敛集团的过渡体，做的工作是财政性的，还有一定的节操。但是，随着宇文融和裴耀卿这样的能臣上位，却出现了更多压榨民间的敛财官员。这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太府卿杨崇礼和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以及户口色役使王鉷、水陆转运使韦坚。

宇文融之后，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他从地方压榨财物。[214]杨崇礼是

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不肯变通、帮助民间减少损害，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之外，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财官员。其中杨慎矜发明了贡品折现和购买轻货制度。地方进贡的贡品在路途上不好运输，常常出现损坏，比如绸缎等在运输过程中会被污染，因此，杨慎矜命令地方按照货物的价值进贡现钱，而他再用现钱从当地购买更轻的土特产，运送到长安后再高价转卖，获得更多的钱财。由于农民出产的是粮食和布帛，如果要交现钱，必须先变卖这些产品，而变卖时间集中，不得不压价出售，使得农民的负担加重了不少。

水陆转运使韦坚的主要能耐在于挖河。之前的黄河运输只能到陕西华阴的永丰仓，之后由于渭河水浅，往往必须陆运。韦坚指挥挖通了一条与渭河平行的运河，可以将粮食直接运送到长安城。这本来是好事，但随着运河的挖掘，全国各地的良品纷纷被韦坚搜刮并运送到长安，加之他很懂得皇帝奢侈享受的需要，不断变着花样讨好皇帝，甚至把运河行船变成了一种节日狂欢。[215]

更甚的是王鉷，他善于搜刮财产，除了税收之外，甚至逼迫百姓缴纳运输贡品的钱，还故意高估运费，使得这笔钱超过了正贡的价格。正是由于搜刮得力，他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到上百亿，其他的财宝也有类似的数量级。和宇文融一样，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人仓库——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216]

从张说下台到裴耀卿和张九龄担任宰相，随着皇帝的财政饥渴愈演愈烈，聚敛之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左右，控制了唐代的朝政。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这个集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贤相集团。第二年，聚敛集团中的集大成者李林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了。

文人的宦游时代

就在玄宗的开元盛世达到高潮，并开始出现隐忧之时，唐代的文学却依然在积蓄着实力，向着顶峰攀登。

后世的人们总结文学与盛世的关系，得出结论：文学并不总是与盛世相伴，而是在盛世巅峰已过时才会到来。这种错位，是人的寿命长度造成的。虽然社会已经到达盛世，但正当年富力强的人却是在盛世之前接受教育的，只是教育资源的不足，使得他们的文采和能力在此时都没有达到高峰。而在盛世时期接受教育的人还没有足够成熟，都是些毛头青年，必须再给他们几十年，达到社会认知和资源的完善，才能创作出完美的作品。当盛世已过，进入乱世时，往往是这批文人各方面都接近巅峰之时，他们拥有足够的学问，又见过了世事沧桑，将所有的认知和感受付诸笔端，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进士及第后，本来有大展宏图的机会，却因为一点点小事而被贬往济州担任司户参军，这对于他的仕途是不利的，但对于一个诗人却是磨炼。直到五年后的开元十四年，他才从济州离任。之后，他在位于现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一带的淇水北岸短暂地当官，又舍弃了官职，在淇上隐居，直到开元十六年才回到长安。他在长安闲居数年，并以长安为中心，时而隐居，时而游荡，最远到达过四川和淮南地区。[217]

对于一位才华出众却无处施展的青年人来说，他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几年就在低级官僚和闲居的生涯中度过，这对他的性格和兴趣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济州时，王维除了公务之外，还与当地的各种人物相往来，也是从这时开始，王维有目的地接触了中国历史中最有名的两种化外之人：僧人和道士。

最初王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所接触。他曾经给济州的崇梵寺僧人写过诗[218]，也曾经见过道教一位在当时非常著名的人物[219]。在当时，东岳泰山上住着一位有名的道士。这位道士最大的特点是，他宣称自己活了上千岁，去过王母庐，见过孔子和墨子。这位被称为焦炼师的神人特别善于选择地方，除了泰山，他还去过嵩山，由于选择的地方好，见过许多有名的人物，比如李白[220]、王昌龄[221]、李颀[222]、钱起[223]等人都曾经给他写过诗，并对他时而千年、时而万里的经历赞叹不已。王维也不例外，他见到了这位有名的道士后也写下了诗篇。

王维在淇上做官时，早有意放弃官职去隐居，但因为兄弟和小妹需要照顾，不得不又坚持了一段时间。[224]在苦闷中，他依然向往着陶渊明式的生活，认为只要当个田舍翁，比当皇帝都感到满足。不久，他终于忍不住辞官了，日子十分清贫，他却感到非常快乐。[225]但在内心深处，王维又是矛盾的，即便在隐居时，他偶尔也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这体现了中国文人希望通过做官来实现价值的矛盾心情。[226]不久，他还是选择了去往长安居住，这也表明这位山水田园诗人并非是无欲无求的。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王维的妻子去世，因伉俪情深，王维选择了不再娶，从此孤独终身。也是在长安时，王维开始系统地学习佛法，成了唐代著名的信佛的诗人，对于功名利禄已经看得很淡。

但偏偏在这时，机会来了。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在嵩山隐居的王维突然接到了玄宗皇帝发的告身帖，将他任命为右拾遗。原来，宰相张九龄举荐了王维，使得他从等待任命的苦熬中解放了出来，也将他从隐居的山野带回了朝堂。[227]此时的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就在王维进士及第的同年，蜀地一位与他同岁的年轻人依然在隐居，他的名字叫李白。

与王维简单的身世相比，李白的身份要复杂得多。首先，人们对于

他的出生地就充满了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他出生在今天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碎叶城。

李白的祖上可以追溯到西凉的开国君主李暠，而李唐王室也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李暠。但显然他们不是出自同一个支系。到了隋末，随着天下大乱，李白所属的支系从西凉地区西逃，来到了碎叶城。此时，碎叶城尚属于异域，因此这一支李氏并不在唐朝的户籍上。唐高宗和武后时期，将碎叶城纳入了唐朝的统治范围。也是在这个时期，李白的父亲李客决定回归中原，带着家人踏上旅程。到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也是武则天退位这一年，李客来到了四川西部安家。[228]这一年李白已经四岁了。他到底是在何处所生，是父亲踏上旅程之后，还是在碎叶之时，已经无法考证。但现代人宁肯相信一个更加浪漫的故事，更乐于让李白出生在碎叶。

不管怎样，李白在四川地区度过了他的少年岁月。日后，为了增加他的传奇性，他自诩在十五岁时就已经可以观奇书，作赋可以比肩汉代的司马相如。[229]同时，他还学习了剑术，成为一名侠客。[230]甚至有人传说，他曾经在年少时杀过数人。[231]另外，传说他隐居在岷山地区时，曾经受到过州里的举荐，却并没有应举。[232]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依然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考虑到李白并不反对做官，一心希望立不世之业，是否会拒绝举荐，并不能确定。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宰相苏颋离开了中央，来到了四川任职益州长史，与李白有过交集，并感慨他可以比肩司马相如，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官半职。[233]

王维生在中原，这带给了他内敛的气质，即便是在逆境之中，也总是试图在悲伤中找到些许宁静与平和。而在李白所在的蜀地却是一个龙蛇之地，这里缺乏厚重的文化积淀带给人的束缚，反而更适合各种江湖人士生存。这种气质也在李白的身上有所反映，他喜欢说大话，憧憬做大事，张扬又不失才情。相比之下，王维的内敛促成了他对于佛教的推

崇，即便接触过道教，最终还是选择了远离。而李白的精神却与道教的“大话连篇”和游走于江湖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于是李白的文字总是从道教的汁液中寻求营养，充满着奇诡的想象力，简直就是一幅道教的神话画卷。

即便在对仕途的想象上，王维虽然赞同出世，却又想循规蹈矩按照规矩升迁，离不开官场的滋养。而李白却总是寄希望于某些虚无缥缈的机会突然降临，让他一步登天，立下奇功。他喜欢议论朝政，根本不管具体的细节，而是对整个官场充满了鄙视。这种态度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显露出来。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以不会生子为借口废掉了王皇后，改宠武惠妃，侠肝义胆的李白就作诗讽刺这件事，并为皇后流泪。[234]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在蜀地没有混出名堂的李白终于离开了这里，前往东部地区。在唐代，统一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之一在于，唐代的官员是接受中央调动的。他们不得不在全国的范围内游荡，这就形成了所谓宦游的风气，即人们一生中为了做官要在中国四处游走。与官员类似，唐代的文人也形成了壮游的风气，他们四海为家，携带着自己的诗歌文章游走于江湖，希冀遇到知音。因此，唐代可以说是中国旅游业最发达的朝代之一。

李白也顺应了这种风气，他仗剑离开蜀地，顺着长江而下，南达苍梧（现广西地区），东面经过金陵直达大海；之后，到了位于现在湖北地区的云梦泽[235]。在这里，文采飞扬的他被高宗时期一位宰相家族的成员看中了。在高宗前期有一位宰相叫作许圉师，他的家族在安陆，唐代的官员既有四海为家的传统，但也有在致仕之后不留在国都而是回老家的习俗。许圉师虽然贵为宰相，但他的家族根源依然在安陆。李白来后，这个家族将许圉师的孙女嫁给了李白，李白就在安陆安了家。[236]由于科举的作用，唐代虽然看重家族势力，但地方的大家族并没有完全封闭，他们对于李白这样的文人是开放的，并没有因为他是外地人而排

斥他。

从此李白在安陆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出手阔气，以豪侠闻名，认识了大批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

大约在他到安陆的第二年，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一位湖北地区的文人和他结识了，这人的名字叫孟浩然。孟浩然，襄阳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经常隐居在襄阳城外的鹿门山。[237]虽然淡泊名利，但他却是这个时期文人墨客的一大人际结点。襄阳位于从长安前往湖北的武关道上，这条路在当时全国道路系统上排名第二，仅次于连接两京的大道，几乎全国的官员和文人都要使用这条路[238]，而凡是经过这条路到襄阳一带的人莫不与孟浩然交往。李白以安陆为基地在南中国游荡时，也恰逢孟浩然在襄阳、扬州、宣城间漫游，两人由此相识。

两人当时都是布衣之身，相互有好感，他们曾经在江夏（现武汉）结伴游玩。之后，孟浩然去往长江下游的广陵，李白赋诗一首为他送行，成为千古绝唱。[239]对于孟浩然，李白一直心怀佩服，他称赞孟为“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240]

孟浩然虽然是隐士，却并不埋名，事实上，由于他表现得与世无争，当时的许多文人都是他的好友。除了李白之外，孟浩然和玄宗时期的进士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和王昌龄都是好友。之后，孟浩然又串起了王维、杜甫等人，可谓名副其实的交友达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在认识李白后的第二年，却突然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他放弃了隐居生活，前往长安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孟浩然的这个决定与他的好友王昌龄有关。王昌龄比孟浩然小九岁[241]，是山西太原人，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在开元十四年到十五年，唐朝的文人在科举方面迎来了一次巅峰时刻，开元十四年，著名文人储

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同时进士及第，到了第二年，王昌龄和常建又同时及第。[242]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和孟浩然相识。

在好友接连及第的刺激下，孟浩然决然地来到了长安应试。作为一个已经名满天下的人，他自己信心满满。但不幸的是，写田园诗与写策论是完全不同的，孟浩然不知是没有掌握这种需求，还是因为运气不佳，竟然落榜了。这次落榜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自嘲不应该出来自讨没趣。[243]

也就在这时，孟浩然认识了王维，唐代两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相聚了。王维当时恰好刚从淇上的隐居地回到长安，孟浩然已经在长安滞留了近一年时间，正要离去。王维对孟浩然有惺惺相惜之感，他正在系统地学习佛学，也恰好处于闲居状态，他也劝说孟浩然赶快回去诗酒牧歌，不必参与朝廷之事。[244]

这次科举失利，却成了孟浩然游历天下的机会。他从洛阳出发，经过汴水前往吴越地区，登天台山，宿桐柏观，泛镜湖，探禹穴，游若耶溪，上云门寺，礼拜剡县石城寺，一路来到了杭州钱塘观潮，再前往海上。这次游历花了他足足两年时间，直到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他才回到襄阳。

就在人们以为他已经失去了对仕途的兴趣，准备再次隐居时，孟浩然却突然又做了一个决定：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他再次决定前往长安求取仕途。

孟浩然第二次的决定又和王昌龄有关。就在前一年，孟浩然的这位好友再次参加了考试，这次他考的是更加高级的制科，在博学宏词科考试中一举中的。王昌龄的好运让孟浩然羡慕不已，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进京。

此外，孟浩然第二次进京还和一个人有关，这人就是荆州长史韩朝宗。作为地方官，韩朝宗担任荆州长史时就与李白和孟浩然相识。这一

年，皇帝为了体察地方的民情，设立了十道采访使，韩朝宗也升任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负责察举人才。韩朝宗首先想到了在襄阳颇有名气的孟浩然，以及在安陆的李白。

孟浩然在韩朝宗的引荐下，再次前往长安。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依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不得不再次离开。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人们也是猜测纷纭。

有传言说，孟浩然此次得到了张九龄和王维的重视，王维再次担任了官职，可以推荐别人了。一天，王维在皇帝的宫殿内值守，把孟浩然也带了进去谈天。这时皇帝突然来了，孟浩然急忙躲在了床下。王维不敢隐瞒，将床下有人之事告诉了皇帝。于是孟浩然得以见到玄宗，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次机会。皇帝命令孟浩然吟诵几首近作，孟浩然的一首诗中却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句话惹恼了皇帝，认为他污蔑自己，于是不予任用。[245]

另一种传言说，韩朝宗本来决定向皇帝引荐孟浩然，并约好了日期，但到了那一天，孟浩然却因为和朋友喝酒，放弃了与韩朝宗的约定，导致他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引荐了。[246]

这两种说法都很传奇，而最可能的情况则是孟浩然在长安缺乏更有权威、更得力的引荐人，在这个势利的官场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终只能怏怏离去。

韩朝宗对李白的影响，则是让他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决定离开安陆，到北方去闯荡一番。于是，李白的安陆时期也结束了。

唐代的文人关系网络极其发达，在后世人们惊为天人的各位诗人，大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纽带。除了孟浩然串起了大批的文人墨客，这样重要的人际结点还包括他的朋友王昌龄。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前后，王昌龄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岑参。

岑参出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他少年时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晋州度过，之后迁居河南府嵩山一带。二十岁时他来到了东都，希望寻找父亲的故旧。[247]他认识了时为汜水尉的王昌龄。之后不久，岑参又和高适、杜甫都有了联系，于是开元文人们的交游圈进一步扩大。

在当时，杜甫还是一位小角色，因此我们将他的出场放在更靠后的位置上。

在所有的开元文人中，高适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当时的文人都喜欢四处游荡，既可以陶冶身心，又可以增长见识。然而，除了李白之外，能够自觉自愿地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寻找自我存在的，就是高适了。

高适是唐朝的渤海郡人，他在他的父亲担任韶州（现在广东韶关一带）刺史时出生。高适生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比李白、王维稍小，但属于同代人，与年纪更大的孟浩然等则差了一代。

虽然高适出身官宦家庭，但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父亲去世），他的家庭很快就变得非常贫困了。他年幼时曾经在中国南部跟随父亲迁移，到了二十岁，到达国都长安——也许是和岑参一样，出于结交故旧寻找机会的目的。[248]但显然长安不是为这样一个地方小官的穷儿子准备的。他一无所获，只好离开了长安，从此寓居在梁宋地区（现在河南东部商丘一带）。这里，特别是宋州，未来成为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战场之一。

高适在这里以耕钓为生，他生性落拓达观，不拘小节，缺乏生计时甚至四处找人接济[249]，但这并没有耽误他的游学生涯。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游遍了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每到一地，总是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文人。他曾经在蓟门去见著名的诗人王之涣，却没有遇上[250]；也曾经在邯郸感慨当地游侠古风[251]。他的文笔壮丽，带着豪气，与当时盛行的无病呻吟和华丽辞藻毫不沾边。

但是，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时，高适依然是一头孤

狼，王维在长安，李白在安陆，孟浩然在襄阳，都还没有机会与这个贫穷但是胸怀大志、又落拓不羁的人交往。他看上去是那么独特，不像一个文人，反而更像一个等待机会的武士。

那么，像孟浩然这样著名的诗人落榜，是否就证明唐代的科举有问题呢？恰恰相反，在玄宗开元年间，科举制度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时期，给唐王朝选拔了大量的人才。

自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王维中举之后，许多文人和名臣都是通过科举上位的[252]。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代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崔颢进士及第。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未来的宰相、书呆子房琯在玄宗封泰山之前上书赞美皇帝的封禅，从而获得了张说的青睐而拜官。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诗人祖咏进士及第，而安史之乱后著名的理财专家刘晏当年只有七岁，却已经有了神童的名声，通过童子试被直接授予了秘书省正字的职务，成了一大佳话。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储光羲和綦毋潜进士及第。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著名诗人王昌龄和常建进士及第，王维的弟弟王缙（后曾任宰相）通过草泽自举科进入仕途。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安史之乱中的唐军将领贺兰进明进士及第，而另一位神童，在未来将发挥重大作用的李泌也同样在七岁通过了童子试。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著名书法家、安史之乱中的名臣颜真卿，以及另一位未来的宰相杜鸿渐举进士。王昌龄在七年前考取进士，由于不受重用，于是又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这一次被授予校书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著名诗人李颀和萧颖士登进士第。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除了颜真卿又考取了书判拔萃科，得以直接被授予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之外，在未来会成为唐朝一代忠臣的张巡也考取进士。

这些人进入仕途，或者成为一代文坛领袖，或者成为国家栋梁，在

未来的唐朝历史中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书籍分享公號：窃蓝书房】

第四章 危局之成

贤相集团的覆灭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底，皇帝任命了两位新宰相：裴耀卿和张九龄。这两人是典型的能臣（聚敛之臣）和直臣（贤相）的搭档。裴耀卿扮演的是一个能臣的角色，帮助皇帝处理经济问题，而张九龄则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

张九龄是武后末期选拔的进士，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进士及第。之前他在家乡就有着聪敏善文的名声，十三岁时就获得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的称赞。玄宗当太子时，张九龄又获得了他的称赞，被提拔为右拾遗。张九龄为人正直，曾经在吏部主持书判拔萃的考试。[253]

张九龄是张说的好朋友。他曾经叫张说防备宇文融等人，但张说没有听进去，这导致张说和张九龄同时被贬。但是，皇帝依然记得张九龄的才华，加上他风度翩翩，皇帝择人时总是以张九龄作为标准来衡量对方的风度。在当宰相之前，张九龄正在为母服丧。等他回来后，皇帝立刻任命他为宰相，与宇文融同列。[254]

张九龄当宰相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向长安押送了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肥胖魁梧，是个胡人，名叫安禄山。安禄山是张守珪的裨将，他曾经在与奚、契丹的战斗中打了败仗，张守珪认为失败的责任在安禄山，于是将他押送至京师接受处罚。张九龄在日后被人们提到最多的事情，是他坚决要求处死安禄山，但皇帝没有听从，而是原谅了安禄山，放他回去了。就因为这件事，皇帝后来很后悔没有听张九龄的话。[255]

唐朝笔记的传奇性质太浓，这件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张九龄在当时最著名的是他的刚正不阿，希望皇帝回到开元早期的明君行为上，贬斥那些不合格的权臣，不要随便提拔那些无才之人。他的做法可以说与之前的宋璟、张说等人一脉相承。

虽然裴耀卿更接近于理财官员，但至少也是一位相对廉洁的人，两人的配对可以保证皇帝的政策依然沿着开元贤相的路子走下去。

第二年五月，也就是任命两位宰相不到半年后，皇帝又任命了第三位宰相李林甫，于是事情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从世系上，李林甫可以算是皇亲，他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的舅舅是楚国公姜皎。李林甫非科举出身，他精通音律，最初任千牛直长这样的小官，玄宗初年姜皎得势时，让他当上了太子中允。李林甫又顺着姜皎的关系找到了姜皎的姻亲即侍中源乾曜，请求提拔，却被公事公办的源乾曜拒绝了。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林甫结交了玄宗时期的第一位聚敛之臣宇文融。宇文融也正好需要帮手，于是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之后，李林甫又担任过刑部和吏部的侍郎。宇文融提拔李林甫，目的是为了对付张说。果然李林甫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与宇文融合力将宰相张说扳倒。[256]

但宇文融随后的倒台并没有影响李林甫，他很快又有了新的靠山。这次的靠山是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武惠妃是杨贵妃出现之前的第一红人，她的最大目标是让儿子寿王挤掉当时的太子李瑛，成为皇帝的接班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惠妃也在招兵买马，积攒自己的势力，她将李林甫招入帐下。李林甫除了武惠妃这一条路之外，还善于结交各色太监和宫人，这些人在皇帝面前不断地说李林甫的好话。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皇帝终于将李林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了宰相之一。

李林甫上台后，立刻获得了皇帝的喜爱。他在宫中耳目众多，善于猜测皇帝的意图，因此，他的建议比起其他两位宰相来，更符合皇帝的口味。这里，就涉及一个宰相的职责问题。在贤相集团看来，宰相的职责是替皇帝治理好国家。但是，皇帝却越来越认为，所谓宰相，就是按照皇帝的意图做事的人。事实上，玄宗后期一直在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并按照他的意思办事的人。

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和私欲，皇帝的意图并不总是对国家有利的，贤相们依然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是皇帝应该支持的。这种矛盾导致了皇帝和贤相集团的冲突，只是不管皇帝还是贤相集团，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时，突然间有一个看透了这一切的人横空出世，他就有可能垄断皇帝的意图，长期占据宰相的职位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李林甫之所以长期把持宰相之位，并不是他有多厉害，或者多么残酷，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皇帝要从东都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张九龄两位宰相认为现在是秋收的季节，皇帝回京兴师动众，会影响农时，不如晚一点回去。但李林甫却认为长安、洛阳只不过是皇帝的东西宫而已，皇帝在两宫之间来往，不需要看时间，至于影响农时，可以考虑免除回京途经地区的租税。

同年十一月，皇帝和宰相之间再次起了冲突。皇帝想要重用一位武将出身的人——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张九龄等人主张牛仙客无功不应重赏，李林甫却认为皇帝可以自己决定赏赐和任命。到底是制度至上，还是皇帝的意志至上，双方的立场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异常明确，越来越缺乏模糊的空间。

皇帝选择了支持李林甫，也就必然会抛弃张九龄等人。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当年年底，李林甫就以张九龄包庇罪人为由，将张九龄贬斥了。继任宰相的正是牛仙客。[257]

牛仙客作为一位武将，不懂政治，于是，唐玄宗后期就进入了李林甫时代。

在这个时代，唐代的开元贤相们已经一个不剩，甚至宰相也不经常更换了。

人们在日后谈论玄宗时代，总是采取一刀切的二分法，将皇帝的前期和后期截然分开，前期的皇帝英明神武，后期的皇帝昏聩不堪。但事实上，皇帝并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在前期，他已经表现出极强的私欲和炫耀武力的虚荣心，只是因为拨乱反正的需要，不得不任命武后时期留下来的一批贤相，首先来稳定局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官僚集团的膨胀，贤相们只知道要求皇帝省钱和节制私欲，这已经不能满足皇帝的需要了。于是，聚敛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并取代了贤相集团。两个集团的交接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渐达成的结果而已。可以说，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的玄宗皇帝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在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宰相，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终于找到最适合的人选罢了。在他寻找的过程中，由于在初期无法突破官僚的限制让自己的私欲去干扰民间，从而无意中造就了盛世，可是一旦找到了那一双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手，他对民间的干扰骤然增加，盛世也就成了过去。事实上，中国不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帝，缺乏的恰是放手、不干扰民间的智者。这才是任何自诩为盛世的时期最需要警惕的。

李林甫与牛仙客的搭档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牛仙客去世才告一段落。之后，皇帝先后选择了李适之和陈希烈担任李林甫的搭档，直到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李林甫死亡，才不得不换了人。[258]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李林甫表面上满足皇帝的要求，但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官僚系统，迫使官僚们放弃了为官的原则，只以皇帝和宰相的意见为命令，不许有反对。这就将原本造就了盛世的官员基础破坏了。

贤相集团虽然不存在了，但聚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由

于缺乏道德标准，聚敛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远高于之前的官场的，他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皇帝的宠爱。李林甫除了满足皇帝的要求，还必须镇压聚敛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才能稳固自己的权力。

聚敛集团的内斗

李林甫为相的弊端，除了将官僚阶层从治理国家的阶层改造成为皇帝的工具之外，一个更大的弊端是重新将内斗的精神注入官僚和宗室之中。

由于唐代缺乏人身保护机制，不管是宗室还是官僚都可能出现“朝为天子客，暮入怨鬼坟”的情况，由此产生的人人自危，让唐代的宫廷斗争比其他朝代都显得激烈。只是玄宗在上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善待自己的兄弟、亲王、宗室，希望通过兄弟和睦来降低斗争的残酷性。在对待大臣上，虽然皇帝依然时不时祭出酷刑，但整体的残酷程度已经降低了很多，让人们渐渐忘记了武后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贤相集团内部虽然有时候也存在恶斗，但在他们心平气和时，总是试图减少酷刑，避免冤狱。许多贤相均以宽厚著称。

但是到了李林甫执政后，为了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他又重新将内斗精神找了回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的内斗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身了一段时间，只要时机合适，一个李林甫就足以将这种残酷性召唤回来。

李林甫上台后，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处理太子的问题。玄宗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二十三个活到了成年。他最初所立的太子是第二子李瑛（曾用名嗣谦、鸿），李瑛的母亲赵丽妃原本是一位歌妓，也是皇帝早期喜欢的妃子之一。与赵丽妃同样情况的还有皇甫德仪和刘才人，她们也分别为皇帝生下了儿子鄂王瑶和光王琚。太子瑛被选为东宫，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加之又是皇帝较为年长的儿子。[259]

随着武惠妃获得了皇帝的宠爱，赵丽妃等三人慢慢失宠了。对于另两位皇子来说还影响不大，但对于太子瑛，这意味着地位的不稳固。

果然，武惠妃生了两个儿子。她是一位有斗争经验的人，师法武则天，开始对皇帝施压，试图将太子换成自己的儿子寿王瑁。皇帝虽然暂时没有更换太子，但对于寿王的关心已经超乎其他皇子了。

太子瑛和鄂王、光王之前都受过宠，现在却遭到了冷遇，不免发点牢骚。不想这些牢骚都被武惠妃的眼线收集起来，报告给了武惠妃。而武惠妃又向玄宗哭诉，指责太子结党。到这时，事情就类似于太宗、高宗时期的皇子冲突，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宗室残杀。

所幸的是，此时的政坛依然处于贤相们的掌握之中。当皇帝有了废黜太子的想法时，宰相张九龄及时制止了他。他认为太子年长，又没有过错，鄂王和光王也足够贤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没有理由治罪，更没有理由废嗣。皇帝采纳了贤相们的观点，太子瑛的地位保住了。

但武惠妃并没有善罢甘休。这时，李林甫已经投靠了武惠妃，并借助她的帮助，逐渐爬到了宰相的职位上。李林甫和武惠妃勾结中官，让这些宦官不断地向皇帝吹风，报告太子将有谋反的举动。当皇帝听了宦官的报告，询问宰相李林甫时，李林甫一方面表现得不知情，另一方面却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别人不便参与。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故意为皇帝指出了一条路，让他摆脱其他官员的影响，一意孤行地满足武惠妃的意图。

皇帝最终废黜了太子瑛。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将废太子和鄂王、光王都赐死了。[260]这是在武后之后皇室中发生的又一次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事件。这个事件彻底复活了唐代残酷的内斗精神，容忍的美德成为了过去，也意味着官员和宗室再次丧失了安全感。

当内斗重新被激发之后，由于此时贤相集团已经被排挤得差不多了，聚敛集团内部开始显露出来，这必然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人都知道如何讨好皇帝，并且觊觎着宰相的位置，李林甫如果想长期执政，必须将他们一一剪灭。

首先进入射程的是水陆转运使韦坚。韦坚在天宝初年是仅次于李林甫的第二号聚敛人才。他最大的功劳是修通了一条水道，直接从黄河连接到长安城附近的渭水上，使得从关东地区运来的粮食可以直达长安。这项功劳让他获得了玄宗皇帝的赏识。

韦坚是一个崇尚华丽的人，善于制造节日的气氛来取悦皇帝。他导演的最著名的节目，是打造了一出一千多年前的春节联欢会，或者说一出“百船来朝”的精彩好戏，让整个长安的人都大开眼界。[261]他在长安城外浐水旁的长乐坡，皇帝的宫苑望春楼旁，挖了一个水潭直通浐水，又从渭水开来了三百艘船，停在水潭外，长长地一字排开，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船上的人南方装束，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衣袖宽大，与长安一带的着装绝不相同。

皇帝和大臣们坐在望春楼。到了表演时间，一声令下，歌声四起，三百艘小船如同活了一般排着队挨个儿从水潭经过。在每一艘小船上，都写着州郡的名称，还摆放着各地的土特产：广陵的锦、镜、铜器、海味，丹阳的京口绫衫段，晋阳的折造官端绫绣，会稽的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的玳瑁、象牙、珍珠、沉香，豫章的瓷器、酒器、茶具，宣城的空青石、纸笔、黄连等，始安的蕉葛布、蚺蛇胆、翡翠，吴郡的三破糯米、方丈绫，等等，应有尽有。

船上还有人唱着歌。船两侧是从京城找来的一百多个妇女，她们穿着鲜艳的服装，鸣鼓吹笛地配合着。当船队来到望春楼下，水陆转运使韦坚走过来，将各郡船上代表的贡品拿过来，呈给楼上的皇帝，让他分赐给皇亲贵戚和文武百官。然后他又送上了上百种食品，并命教坊边奏乐边表演，造成了君民同乐的联欢场面。

正是这种长袖善舞，让韦坚成了宰相职位的竞争者。韦坚的姐姐是惠宣太子妃，妹妹又是皇太子妃，而他的妻子是楚国公姜皎的女儿。姜皎提拔了李林甫，因此韦坚和李林甫本应该是同党。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关系也不错。但随着韦坚地位的提升，双方关系开始恶化，韦坚又与另一位宰相李适之友善。这就触动了李林甫的神经，他决定除掉韦坚。

在韦坚导演“百船来朝”的当年，他被提拔为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一系列的使职表明他受到了极大的重用。但也从这一天开始，李林甫逐渐剥夺了他的权力。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韦坚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表面上看升官了，但实际上李林甫将他的使职都剥夺了，交给了另一位聚敛人才杨慎矜。就这样，韦坚被架空了。又过了两年，李林甫终于等到了机会。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正月，韦坚和河西节度、鸿胪卿皇甫惟明夜间游玩，李林甫告发他作为皇亲和边将亲近，是为了谋立太子。这触动了皇帝的神经，他将皇甫惟明赐死，韦坚也被贬为缙云太守，六月，皇帝又贬韦坚为江夏员外别驾。

李林甫还借助这件事构陷了另一位宰相李适之，将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七月，韦坚又被流放岭南，他的三个弟弟和一个儿子也遭到了贬黜。到了十月，李林甫还不放心，又派人将他们全都杀死。

韦坚死后，李林甫依然将此事用为一次清除异己的时机，前后贬斥了数十人。韦坚的妹妹是皇太子妃，就连皇太子也吓得赶快和妻子离了婚。为了挖掘韦坚作为水陆转运使时的罪证，李林甫专门派人到江淮地区，连船夫都抓起来，不断地拷打审问，直到李林甫死时才停止。[262]

韦坚之后，轮到了接替他使职的杨慎矜。杨慎矜在李林甫和韦坚的斗争中是个中立派，并不想站边。但由于他的地位，李林甫也必须将他除去。在审理韦坚案时，李林甫起用了另一位聚敛人才王鉷，王鉷对杨

慎矜不配合揭发韦坚非常不满。韦坚案结束后，李林甫就怂恿王鉷继续构陷杨慎矜。

杨慎矜是隋朝宗室的后代，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李林甫和王鉷等人构陷他勾结僧人谋反。皇帝于是将杨慎矜和他的两个兄弟慎馀、慎名，以及所谓的同党都抓了起来。殿中侍御史卢铉审问“同党”太府少卿张瑄时，使用了酷刑，将其身体固定，在两腿处用木橛使劲拉扯他的身体，如果无限制拉扯，可以直接将他从腰部拉断。在一系列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之下，审判者终于拿到了“足够的”证据，杨氏兄弟三人也被赐死。[263]

在所有的聚敛之臣中，只有王鉷能够在李林甫的羽翼下长期存活。王鉷采取的方法是完全将自己变成李林甫的打手，投其所好。李林甫怎么伺候皇帝，王鉷就怎么伺候李林甫。不管是构陷杨氏兄弟，还是清除韦坚，都离不开王的身影。到了后期，王鉷已经成为仅次于李林甫的权臣，身兼二十多项使职。如果不出意外，在李林甫死后，将由王鉷继任宰相。然而，就在这时，情况却出现了变化，另一位权臣杨国忠的到来改变了形势。杨国忠不敢拿李林甫本人开刀，于是决定从王鉷入手。由于王鉷飞扬跋扈，导致他的把柄很多，只要打倒了王鉷，就可以限制李林甫。

杨国忠也知道普通的罪名不足以干掉王鉷，只有谋反之罪才能置他于死地。于是，历史就记载了这样一幕场景。

根据史书的记载，王鉷的弟弟户部郎中王銲，以及已故的鸿胪少卿邢璹之子邢縡形成了一个小团伙。这个小团伙不满足于让王鉷在李林甫死后接班，还想要加快速度。他们本来打算发动政变，杀死当时的宰相李林甫、陈希烈以及杨国忠等人，控制朝政。不想事情先泄露了。最初皇帝并不知道王鉷参与了阴谋，反而让他和杨国忠一起去捉拿邢縡等人。在捉拿时，邢縡等人边抵抗，边相互传话“不要伤了王大人”，这就引起了杨国忠的警惕，从而意识到王鉷也是叛乱者一伙的。[264]

由于史书缺乏反面的记载，后世也无法判断王鉷是否参与其中。但是，考虑情理，王鉷并没有发动政变的迫切要求。第一，他本来就是李林甫之下的第二权臣，根本不用发动叛乱，在李林甫死后就可以接班；第二，由于血统和威望，王鉷最多能指望的也就是担任宰相，他没有机会称帝。当时李林甫已经垂老，王鉷没有发动叛乱的必要。因此，在重重迷雾中，王鉷的这场叛乱反而可能只是李林甫与杨国忠两派内斗的结果，杨国忠需要一个借口拿掉王鉷，而最好也是唯一的杀招，就是让对方“叛乱”。

不管怎样，王鉷被赐死，让李林甫势力大损。不到一年，李林甫去世，上台的就是权相杨国忠。

当李林甫去世后，唐王朝的失衡已经愈加明显，整个社会向着失控滑去。但造成最大失控的还不是宗室和群臣之间的内斗，反而是皇帝的另一个爱好引起的连锁反应。

脱缰的战争

为了长期执政，李林甫对皇帝采取了纵容的态度，除了满足他的财政需求之外，对唐王朝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皇帝热爱战争的纵容。在这个时期，战争的烈度也随之增加。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唐朝的外交史上，这是耻辱的一年。当年三月，皇帝选择了两位女子，分别是外孙女独孤氏和外甥女杨氏，封为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分别嫁给了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

唐朝有公主和亲的传统，但“公主”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宗室和大臣的女儿。依靠公主和亲所产生的亲戚纽带，唐朝就和外族维持了和平。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皇室都有联姻的传统，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来说，与外族联姻意味着耻辱，但对于正常的关系而言，这是一种常态。唐代遵循了规矩，是一种开放的表现。而由于唐王朝的强大，

周边的民族也认可用皇亲国戚的女儿来代替皇帝的女儿。联姻本来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维持和平的方式。

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例外。到了当年的九月份，奚和契丹两王突然杀掉了两位公主，叛离了唐朝。两位公主作为和平的使者不过半年时间，就死于非命。[265]

契丹和奚这两个小民族之所以反叛，既是他们与唐朝长期恩怨的延续，也是唐玄宗耀兵政策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说是长期恩怨，是因为在武后时期，契丹和奚反叛武后，夺走了营州。因而，拿回营州就成了唐王朝的一个既定目标。玄宗和父亲睿宗先后发动了四次征讨契丹和奚的战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终依然无法重新获得营州的控制权。

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幽州大都督孙佺曾经想收复营州，却以惨败告终。

孙佺被俘后被送给了突厥人，最终被斩首。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亲政的玄宗为了报仇发动了第二次远征。这一次指挥大军的是名将并州长史薛讷，他率领六万人出击，却在滦水山峡中遭遇伏兵，唐军死亡十之八九。

两年后，由于突厥衰落，契丹和奚曾经短暂地投靠唐朝，让唐朝短暂地取回了营州。但又过了两年，一个叫作可突于[266]的契丹王子异军突起，不仅夺取了营州，还在十几年间成了唐朝东北方向的劲敌。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朝派出著名将领信安王李祎，大败可突于，却依然无法夺得营州的控制权。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幽州节度使薛楚玉派大将郭英杰进攻契丹，全军覆没。第二年，皇帝派著名将领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出击契丹，这才将可突于杀死，契丹和奚暂时投降了唐朝。但即便这样，营州依然没有收复。[267]

张守珪是安禄山的上级，这次战役也让他的名声达到了鼎盛。然而，问题也恰好出在了这一次次的胜利上。对外战争的胜利触发了皇帝的野心，于是边境地区并没有回归安宁，反而更加混乱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张守珪在一次镇压奚人叛乱时谎报胜利，最终被追究贬官。而在他离开后，契丹和奚依然时叛时附，这导致以幽州为中心的区域成了唐朝的一个战争热点。契丹和奚之所以如此摇摆不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实力变化，也是唐代的不明智政策造成的。

比如，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皇帝嫁给两王两位公主，本来是要招抚两个部落，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就应该采取怀柔的做法。但是，在中央层面上怀柔的同时，地方上却并没有同步。当时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刚刚又获得了范阳节度使的职权，他特别需要军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希望将事态扩大，正是这种权责的不匹配，让安禄山不断地发动小的边境冲突，掳掠契丹人和奚人。这些小冲突积累起来，终于造成了契丹人和奚人的反叛，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杀掉两位可怜的和亲女子。

契丹人和奚人的反叛，又给了安禄山进一步扩大权力的借口。唐朝为了维持战争，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钱，甚至允许安禄山自行其是，这就形成了事态的恶性循环。不过，皇帝却并不怪罪这种恶性循环，反而对边功和战争充满了兴趣，丝毫没有注意到，那嘎吱作响的战争机器一旦打开，就可能摧毁一切。战争并非直接通过暴力来摧毁唐王朝，而是通过拖垮帝国的中央财政，让皇帝不得不开辟新的财源，或者下放部分权力，从而侵蚀掉统一的政治和社会。

在唐玄宗时代的对外关系中，契丹人和奚人只是小角色，除了两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突厥人（以及后来兴起的回纥人和突骑施人）、吐蕃人（以及南诏人）、大食人等。

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突厥汗国之后，太宗时期曾经击败了东突厥汗国。但在武后时代，东突厥汗国的残余又建立了第二突厥汗国。第二突

厥汗国本身追求和平，但依然与唐朝发生了若干次战争。在玄宗初年，也是默啜可汗时期，双方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默啜死后，继任者毗伽可汗和他的弟弟左贤王阙特勤虽然也与唐朝发生过冲突，但两人依然是爱好和平的，加之这时恰好处于唐代开元贤相控制局势的时期，贤相们纷纷极力避免战争，减少财政开支，在唐和突厥之间就又形成了一次和平期。和平期内并非没有冲突，却依靠着双方的明智，控制住了耀兵的野心，从而达到了大治。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阙特勤去世后，唐朝派人吊祭，刻碑纪念双方的交往。至今，位于蒙古国哈拉和林之北的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268]依然诉说着当年两大强权所达成的动态平衡。这不是说双方都完全出于善意，而是因为互相牵制，最后都认定和平是唯一的保持双方稳定的办法。

毗伽可汗死后，他的儿子登利可汗继续与唐代维持着和平。然而，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登利在内战中被杀，唐朝于是在第二年（天宝元年）开始组织对突厥的征伐，派遣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进攻突厥，用时三年灭亡了第二突厥汗国。[269]

然而，灭亡了第二突厥汗国并没有给唐朝带来太多的利益，因为它灭亡后，唐军并不可能长期驻守于蒙古地区。在蒙古地区茫茫的草原之上，依然有许多别的部落等待着机会，其中最强大的是回纥人。当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人占据了哈拉和林丰茂的草原，成了唐朝的劲敌。回纥人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给唐朝的皇帝带来了新的耻辱。

除了回纥，还有黠戛斯（吉尔吉斯）、契丹人相继称霸。黠戛斯人后来迁徙到今蒙古国西北的吉尔吉斯湖附近，又迁到现俄罗斯境内的西伯利亚，最后来到中亚，成了现代吉尔吉斯斯坦人的祖先。契丹人则一直留在了北方，后来成了北宋的劲敌。

也就是说，唐代采取敌对的态度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不可能将他们赶尽杀绝，却大大消耗了自己的财力和物力。从长远来看，作为东亚最强大国家的唐朝依然只能选择贤相们主张的休战，才能够在维持区域和平的同时，也维持内部政治的稳定。

在西突厥汗国方面，自从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苏定方征服之后，西突厥汗国已经臣属于唐。但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时，突厥的一个别种突骑施人却取代了西突厥汗国，获得了西域的统治地位。到了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兴盛，突骑施人被突厥的默啜可汗击败，于是附属于突厥。然而默啜去世后，突骑施人在苏禄的率领下，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与大食和吐蕃联合，进攻唐朝的安西四镇。之后突骑施人时叛时附，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突骑施发生了内乱，唐军在大将盖嘉运的指挥下于第二年灭亡了突骑施。[270]

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突骑施灭亡后，填补了西部空白的是两位巨型的对手——大食和吐蕃，唐朝依然无法突破地理上的限制，反而增加了许多的军事开支。

当突厥（包括突骑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西方崛起的吐蕃人却成为了帝国最大的威胁。[271]

中心位于现代西藏的吐蕃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经过了一个盛世时期，开始向外扩张，它不仅占领了现代的西藏，还向西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它占领了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代，在北面则攻占了新疆的部分地区。

在吐蕃人全面扩张时，唐朝也恰好处于全盛期，吐蕃与唐朝在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有着军事对抗。吐蕃与唐朝的冲突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安史之乱后仍未终止。

除了吐蕃之外，云南大理地区的南诏兴起，给唐朝的西南边境带来了压力。[272]南诏时而称臣于吐蕃，时而与唐朝结盟。由于唐朝的边将对待蛮族往往采取高压态度，造成了地方的反抗，这一点在南诏也屡见不鲜。另外，南诏除了对唐朝的云南、四川地区造成压力之外，还从红河直下越南，对当时控制在唐朝手中的红河三角洲（现越南首都河内地区）造成压力，影响到了唐朝的两广地区。

大唐虽然是当时世界上崛起最快的国家之一，却不是第一名。事实上，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帝国用更短的时间、更快的速度，取得了比唐朝还要庞大的疆土。如果我们将唐帝国和大食帝国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在唐帝国西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正等待着它。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朝刚建立不久，先知穆罕默德逃离故乡麦加，去了麦地那，此时的阿拉伯人对世界来说还毫无影响力。八年后的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贞观之治刚开始不久，从麦地那出发的穆罕默德征服了故乡麦加。[273]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继任者是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他虽然只在位短短三年，却将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随后，他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叙利亚的进攻，这次进攻持续了八年。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于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继叙利亚之后，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征服之战持续了十几年，到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完全结束，最后一个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被杀。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总结，更加清晰地理解阿拉伯帝国的速度。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刚掌权，这时伊斯兰教还没有产生，先知穆罕默德还被认为异想天开。这时也恰好是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出发前往印度的时间。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在印度游

历了一番，刚刚返回长安，阿拉伯人已经扩张到了中东的广大地区。又经过了短短的几年，西方就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到现今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地域。

最后一位波斯王虽然被杀，但他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叫作卑路斯，他逃到了一个叫作吐火罗[274]的地方，希望在这里继续反抗阿拉伯人。[275]卑路斯逃到吐火罗之后，意识到仅仅靠这里是无法打败阿拉伯人的，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向遥远东方的唐朝求救。唐高宗收到波斯王子的求救信之后，与大臣们进行了分析，认为吐火罗距离大唐过于遥远，即便派兵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拒绝了。

公元652年（永徽三年）到653年，阿拉伯大军进攻吐火罗，征服了整个地区。但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时期，阿拉伯帝国陷入了内乱，吐火罗又争取到了独立，并把卑路斯接过去建立了统治。[276]公元661年前后（龙朔初），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占据了吐火罗。

这时唐朝行动起来，宣布建立波斯都督府，府衙设在了位于现伊朗境内一个时称疾陵城的地方，并宣布任命卑路斯为都督。唐朝建立波斯都督府并不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延伸到了伊朗。唐朝实行羁縻制度，为当地的统治者分封一些称号，就好像对方接受了唐朝的官职一样，但在管理上对方是独立的。

波斯都督府也并没有给卑路斯带去任何好处，阿拉伯人很快占领了这里，将他赶走了。卑路斯继续他的流亡生涯，最后来到了长安，接受了右武卫将军的官职，死在了长安。

阿拉伯人征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开始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于公元709年（景龙三年）夺取了布哈拉，公元712年（先天元年）获得了撒马尔罕。在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和714年，阿拉伯部队甚至接近了喀什噶尔（现中国新疆喀什附近），也就是大唐王朝的疏勒的辖地。[277]

阿拉伯势力虽然来到了中亚，但与唐朝的直接冲突直到天宝中期才偶有发生。但是，阿拉伯人又在中亚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使得唐朝无法通过征服将中亚民族收服。皇帝和他的将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无法获得成果。而阿拉伯人不仅将中亚的粟特人伊斯兰化，甚至还影响了整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人也伊斯兰化了，从突厥人分离出来的土库曼人、塞尔柱人、奥斯曼人先后继承了穆罕默德的理想。

玄宗后期，唐朝面临着吐蕃和大食（阿拉伯）两大敌人，虽然对弱小民族取得了一系列的战争胜利，但是从大的战略上却是得不偿失的。随着玄宗的统治的延长，帝国的财政却捉襟见肘。获胜的战争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后果：皇帝受困于财政问题，不得不下放财权给地方将领，于是制造出了唐代最大的怪胎官职，而这个官职又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节度使。

土皇帝的职位

在与外部国家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兵制已经腐朽到不能打仗了。

唐代的兵制经过了三次变化，其中后两次都发生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是高祖以来建立的府兵制。府兵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六十岁）。但当兵过于艰苦，不仅要打仗，还要在空闲时种地。随着盛世的到来，青年们已经吃不了苦了，他们纷纷逃离兵籍成了流民，或者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出路。由于政府招不够兵，许多士兵都已经白发苍苍，还在穿着军装守卫边防。

按照规矩，唐代还有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要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而这更增加了边疆地区的艰苦程度。[278]

兵制的第二次变化是在玄宗登基后不久。他对内外兵制都进行过一

定的改革，特别是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为数十三万的彍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由于皇帝只重视募兵了，府兵制更加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彍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护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身强体壮的就靠拔河、玩杂耍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穿甲胄，更别提打仗了。[279]

随着军队的退化，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另外组织部队，这一次，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这就是唐代兵制的第三次变化。

要了解节度使制度，必须首先了解唐代的边疆建制情况。[280]

唐代的边疆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防卫组织，这些组织既是军事机构，也承担着民政功能，其中大的组织单位称为“军”，其次是“守捉”“城”“镇”，而这些机构都隶属于“道”。道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不仅存在于边疆，在内陆也是划分各道的。道的军事长官叫大都督，负责和平时期的训练，在边疆地区的道，一旦到了行军打仗的时候，还会设立一个大总管来带兵出击。在道之下，边疆更低级别的民政机构“州”内也会设立都督这个职务，让他们平常带兵训练，而打仗时，皇帝会派一些使职前来领兵打仗。在这时，负责训练的都督（以及大都督）和负责带兵打仗的使职（以及大总管）一定不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人利用军队发动叛乱。

到了高宗时期，情况出现了改变。为了打仗方便，皇帝往往会给这些州（甚至各道）负责训练的都督们直接挂上使职，继续负责打仗。这些挂了使职的都督们，习惯上被称作“节度使”，也就是既“节度士兵的

训练”，又“带兵打仗”的使职都督。

但这时“节度使”只是人们的一种俗称，并不是官名，或者说只是一种临时称号。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往往会把使职交还给皇帝，又变成了普通的都督或者大都督。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当时皇帝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了凉州（甘肃省武威市）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这时的“节度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号，作为官职正式出现。[281]

那么这时的节度使又和之前的都督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区别在于，之前都督只负责军事训练，不负责打仗，而节度使是把训练和打仗的任务集于一身了。如果从边疆战争的角度上来看，节度使的出现可谓正得其时，因为比起再派一个人来，一个负责训练的将军更熟悉他的手下，让他领兵会让战争变得更加高效。

但节度使并非仅仅意味着训练和打仗，我们这里可以将之和管理民政的州刺史再做一个对比。之前的都督负责军事训练，而在地方上，依然有刺史负责民政。但边疆的节度使除了军事之外，甚至连民事也一起负责了。

此外，节度使的权力比简单的军事加民事还要大。之前，各地还有一个角色，叫作观察使，这是皇帝派往各道行使监察权（专门监察各地官员）的官员。观察使既不管军事也不管民政，专门向皇帝报告官员的问题，因此权力非常大，而边疆地区的观察使甚至也是由节度使兼任的。

所以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了任命权和监察权。[282]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对直接长官产生非常强烈的忠诚，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也就是说，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的土皇帝，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正式官员的一切权力都接管了。

可是，为什么皇帝要设立这样一个权力巨大的职位呢？训练和带兵打仗都属于军事权力，交给节度使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又要给节度使这么多的民政权和监察权呢？这就要从唐代的财政角度去考虑。

玄宗时代，由于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在边境地区已经采取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但是，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钱能养得起这些士兵。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以及募兵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提高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283]这些钱还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没有考虑军粮运输成本、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数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却使得边境的士兵占去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形成了严重的失衡。

内地军费可以减，可是边疆地区的军费只靠内地省下来的钱依然是不够的。为了解决军事费用问题，玄宗除了设立节度使之外，还必须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也就是说，节度使统兵，但他们的钱只有一部分来自皇帝的拨款，剩下的只能靠他们手中的民政权力，从地方上筹款解决。

这种做法非常符合宰相李林甫的心意，因为他要帮助皇帝筹钱来解决财政问题，但仅仅靠筹钱还不够，还得减少财政开支。如果财政开支减不下来，就采取将财政“隐性化”的做法，也就是让地方自行筹措开支。至于这种自筹开支造成的搜刮是否会引起民怨，已经不是皇帝要操心的了。

唐玄宗时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节度使类官员已经有十个，分别是：安西节度使（镇抚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使（辖现北疆地区，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治所在北庭，兵二万），河西节度使（辖现在的甘肃地区，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治凉州，兵七万三千），朔方节度使（辖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和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河东节度使（辖现在的山西北部，与朔方为犄角御突厥，统天兵、大同[284]、横野、岢岚四军和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和忻、代、岚三州，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辖今北京河北一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平卢节度使（辖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陇右节度使（辖今陕西西面的甘南、青海一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四州，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辖今四川西部和云南，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隽、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治益州，兵三万九百），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一万五千四百）。[285]

节度使的权限之大，使得他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战争，于是到了玄宗后期，战争也随之扩大。

但是，皇帝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到底如何才能保证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保持忠心而不发动叛乱呢？最初的解决之道，是派遣可靠的官员

去担任节度使，比如请一些退职或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这些宰相对皇帝足够忠心，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放给那些失败者。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了数次演化后，落入了胡人之手。

从能力上来说，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达成皇帝的一切需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完成的。他非常能干，在他的新办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不同民族的名将掌管起庞大的唐朝军队的同时，还由于他的节制不得不俯首帖耳，不敢作乱。

但能干的李林甫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他往宰相职位上堆砌了过重的权力，承担了过多的事务，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建立、精心维护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但他一离任，没有人能够在掌握如此重大的权力的同时，还做到滴水不漏。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会立即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李林甫建立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等李林甫死后，继任宰相的杨国忠没有威信，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漂泊的诗人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开元文人们迎来了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诗人李颀进士及第，王维则因为宰相张九龄的举荐，从嵩山隐居地回到了长安担任右拾遗之职。

李白在韩朝宗的鼓励下，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安陆，前往北方交游，这也是他自童年离开后，第一次前往北方地区。关于李白在北方的游历，人们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白曾经到过东都洛阳地区，与谯郡的元演结交，并在他的邀请下去了当时的北都太原府。在太原，李白在对方的盛情接待下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游山玩水、携妓看花的岁月，好不潇洒。[286]人们后来关于他的一个传说就和太原有关。据说，在他游太原时认识了一位低级军官郭子仪，当时郭子仪恰好犯了罪，被李白救了下来。[287]这件事很难说是真的，但有这样的传说，无疑增加了李白的传奇性，并为安史之乱后他受到轻判和赦免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之后，李白去了西京长安，结交了玉真公主和张说的儿子驸马督卫张垍，但他发现长安没有他的位置，于是离开了。接下来，李白的行踪就显得更加凌乱，人们所能确定的是，他最终带着家眷来到了齐鲁地区，在任城（现山东济宁）住了下来。在这里，他结交了徂徕山上的五位隐士，分别是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与他们日日饮酒沉醉，号称“竹溪六逸”。[288]

在开元文人中，除了李白，另两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前往长安参加了当年的科考。这两人是高适[289]和杜甫[290]。

高适这时已经三十二岁，第一次参加科考的他毫不意外地落榜了，但随性的他回到了宋州继续过贫困却悠然的生活。科考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结交了一群朋友，其中就包括两位年轻的朋友岑参和杜甫。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是武后时代著名文人杜审言的孙子。杜审言死后，他的家族渐渐没落，儿子杜贤（杜甫的父亲）只当到小官京兆府奉天县令。杜甫是襄阳人，但其家早已迁移到了河南巩县。我们并不知道杜甫年轻时的迁徙情况，只知道，到了二十四岁那一年，杜甫已经在吴越一带居住，并结交了一批当时的文士。也是在这一年，杜甫第一次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考试，以落第告终。

第二年，杜甫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涯，来到了齐地和赵地。接下来几年，杜甫或在齐赵，或在东都地区活动。与李白、高适等人想建立功业但并不执着于功业不同，杜甫显得更加传统，他的性格略显刻薄，缺乏气度[291]，对于当官看得也更重，这和王维的出世态度大不相同。而在作诗风格上，王维讲求天然之趣，李白更是天赋满满、出口成章，但杜甫的诗却更像是学院派风格，他注重当时刚刚建立的平仄和格律系统，对仗和押韵上更加严格，但也正因为过于注重文字，使得读者读起来感觉有些古板和深奥，缺乏李白等人的朗朗上口之感。

加之他的年龄较小，当开元诗人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子，杜甫的履历依然显得很苍白。也正是这个原因，关于杜甫的早期生涯，人们知之甚少，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大诗人。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随着李林甫得势，将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排挤出中央，玄宗时代正式进入了聚敛之臣控制朝政的权相时代。

张九龄离开相位后，被皇帝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于是来到了荆州地区，与孟浩然所在的襄阳比邻。张九龄立刻给孟浩然发去了邀请，请他加入自己的幕职，于是孟浩然终于出仕成为张九龄大都督府的从事。[292]这一段时间，也就成了孟浩然最接近朝堂的时期，同时也激起了他为苍生立功业的最后一点雄心。

然而张九龄此刻只不过是一个被皇帝贬斥的官员，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力。他能给予孟浩然的只有一点尊重，剩下的就是由孟浩然等陪着诗酒田猎了。时间长了，孟浩然也只能哀叹有心无力。[293]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孟浩然因为背疽发作，只好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秋请求返回襄阳养病，他的官宦生涯也就告终了。

但他作为文人结点的功能还存在着。大约就在同时，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遭难了。王昌龄虽然进士登第，还考取了博学宏词科，是学问上

的优等生，但他这一辈子依然郁郁不得志。他担任过汜水尉，后来有幸成为校书郎，本来这是一个适合升迁的官，不想他一直原地不动，最后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被谪往岭南，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了。[294]

作为一个交游广泛的人，王昌龄的贬黜也成了文坛的一件大事。在长安，岑参为他饯行送别。[295]一年前，岑参刚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他索性留在长安并成了家，等待新的机会。

王昌龄行至襄阳一带，自然见到了好友孟浩然。他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李白，又是一番诗酒唱和，依依惜别。[296]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王昌龄刚刚到达岭南不久，皇帝突然间因为加尊号而进行了大赦[297]，王昌龄又被从岭南招了回来。到达襄阳后，他又和孟浩然相遇，自然又免不了诗酒应酬。孟浩然的病本来已经快好了，经过了这一场折腾，终于大病不起，去世了。

孟浩然死后，王昌龄继续北行，回到了长安。这一次，皇帝给了他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到江宁（现在的南京）担任江宁丞。王昌龄只好兴师动众地再次从长安出发，前往江宁。岑参作为朋友，又一次为他送行。[298]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和李白可以被视为两个极端的存在：他们一个信奉佛教，另一个深受道家的影响；一个注重内敛和宁静，另一个追求波澜壮阔。玄宗时代的诗人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没有任何表明李白和王维有联系的故事流传下来，表明两人泾渭分明的兴趣和结交。但是，孟浩然同时是李白和王维的好友，两人都将其视为知己。李白很少向人表达崇敬，却对孟浩然赞不绝口，而王维本人是内敛的，在孟浩然面前却可以说点重话，甚至嘲笑他（也是嘲笑王维自己）一下。

在孟浩然去世前，李白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而更加真挚的情感则来自于王维。事实上，自从妻子去世后，王维为了追求宁静，与文坛很少有往来。张九龄举荐他再次当官之后，他除了学佛和偶尔隐居，剩下

的时间都在处理公务。但这一段时间，他的官职变化很大，曾经陪伴玄宗在两京间迁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使职至河西，顺势留在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节度判官。直到第二年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才返回长安继续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又是变化颇多的一年，他先是改任殿中侍御史，到了冬天，又接了一个差事。当时，虽然在大部分地区，地方官吏都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但岭南、黔中地区由于过于遥远，还有一部分六品以下的官员是由当地任命的，有时皇帝会派御史以上的中央官员作为知南选，前往南方监督选官。[299]这一年，王维被选为知南选，前往岭南、黔中地区。在唐代，要想去往岭南和黔中地区，最简单的路径就是经过武关和襄阳，从湘江流域前往。这就给了王维途经襄阳的机会。

到达襄阳后，他本来以为可以见到老朋友孟浩然，不想孟浩然已经在当年去世了。王维只好大哭一场，写下了一首诗作为悼念。[300]

从南方回来后，王维精研佛学，拾起了他半隐居、半做官的生活。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他在蓝田的辋川购买了一份产业，这就是有名的辋川别业。这所著名的别业成了诗人后半生托身的所在。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再次迎来了相聚的机会。这一次，以玄宗的一项政策为发端。

李唐的皇帝认为自己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因此，除了封老子为玄元皇帝之外，还试图在学术上引入老子的道教作为儒教的补充。玄宗在统治后期，更是装神弄鬼，供奉老子画像。[301]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皇帝干脆设立了崇玄学科目，要求各地在这个科目下设立生员，让他们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书籍，每年参加明经考试。[302]这次学科设置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道学的风潮，各地也纷纷举荐学道之人或者道士们去往长安应聘。

在会稽地区，有一位叫作吴筠的道士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当时，吴筠正在剡中和李白隐居，于是将李白带到京师，推荐给皇帝。[303]除了吴筠之外，李白到达京城后还结识了一批知己，最著名的是贺知章。[304]

贺知章恰好是会稽人，这一点也可能有助于曾经隐居会稽的李白去结识他。贺知章在武后称帝时期中进士，以文学闻名，在仕途上却并不受重视。但他得益于族姑之子陆象先，陆象先担任过宰相，对这位兄长颇为提拔，让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不甚重要的官职上安稳度过了一生。贺知章也不太在意自己的工作，他曾经担任丽正殿的修书使，但参与的书都没有写成。惠文太子死后，贺知章负责挑选挽郎，不想却摆不平各路关系，被门荫子弟堵了门，他只好蹬着梯子上到墙头上，露出头和外面的人说话，这在当时被传为笑柄。[305]

贺知章性格随和，大大咧咧，他的官运并不算差，担任过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他最后的职务是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人们习惯称他为贺监。

他为人旷达，喜欢谈笑喝酒，自称秘书外监，也就是首要职责是在长安诗酒戏谑，第二职责才是工作。他的书法与张旭齐名，又好说话，喜欢给人写字。贺知章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两首万世传唱的小诗。[306]

到了老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也就是认识李白的第三年，贺知章决定告老还乡，这件事竟然成了轰动长安城的大事，除了许多人请酒之外，就连皇帝也写诗送别。[307]考虑到他太老了，回去没有住的地方，皇帝还专门赐给他一汪湖水，供他养老之用。[308]

如果要选择盛世文人的代表，贺知章无疑是最佳代表。他生于唐朝发展的中间期，老来享受、赞美了盛世的无限好处，他也尽情地享用和赞美。他去世后，玄宗盛世又继续了十几年。

李白到了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读到《蜀道难》和《乌栖曲》，惊为天人，称之为“谪仙人”[309]，和吴筠等人一起将他推荐给皇帝。皇帝让李白待诏翰林，于是有了“李翰林”的称呼。这一段时间，民间对李白的记忆最丰富，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诸如李白醉酒之后，皇帝从酒肆将他拉出来，往他头上浇水，再命令他写诗，他竟然也能下笔成章；醉酒之后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子等。这些看上去如同小说一般的情节竟然窜入了正史。[310]而李白会外语，吓退了渤海国使者的故事更是在民间流传。[311]

李白对于自己被招入宫中也很期待，认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重用了[312]。但他到了宫中，虽然最初也很受赏识，但皇帝请他干的活儿却总是诗酒流连、歌功颂德，与政治无关，也就是说他只是个政治宠物而已。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也就是两年后他离开长安时，已经将自己比作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能哄皇帝快乐，却不会受到重用。[313]

人们事后复盘李白的境遇时，往往将他的不遇视为玄宗皇帝已经昏庸不堪的表征。但事实上，更多的问题可能出在李白的身上，另一部分则可以归咎于时机。

皇帝的大臣需要有实务经验，即便没有聚敛之才，也必须像贤相集团一样有一定的政治理念。但李白除了认定自己可以治国之外，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观念，这使得皇帝不能用他。另外，李白进京之后所结交的人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想要从政，则必须从一开始就结交从政的官员，通过策论等能够代表他政治理念的文章来获得推荐。可是李白进京之后，首先认识的是政治“吉祥物”贺知章，并迅速地与贺知章等人混在一起日日饮酒，这就将自己打造成了另一个“吉祥物”。但事实上，贺知章能够成为不倒翁和吉祥物，与他的亲戚陆象先有关，也和时机有关。因为他入职早，刚刚当上皇帝的玄宗也较为尊重他，才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诗酒流连。但李白入京时，皇帝早就变成了老皇帝，不再需要一个年轻的政治吉祥物了，也就不会再去给他机会了。

当然，李白在长安的时间也并不算白过，他结交了不少酒友，除了贺知章，还包括被李林甫排挤的宰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写草书的张旭、布衣焦遂，这八个人号称“饮中八仙”。[314]

在长安，李白接触的著名诗人还有王昌龄。[315]但李白可能并没有接触过王维。当时王维在长安任左补阙，除了隐居之外，就是与弟弟王缙，以及好友裴迪、王昌龄相往来，没有结交李白的文字证据。王昌龄与两大诗人都保持着友谊，却并没有让他们更加接近，这或许是文人相轻的唐代版本。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久久不得重用的李白离开了长安，再也没有回来。然而，这对于唐代文学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秋天，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相遇了。当时，李白四十四岁，高适四十一岁，杜甫三十三岁。事后来看，玄宗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位诗人就是王维、李白、杜甫、高适，除了王维没有参加之外，剩下的三位聚在了一起。此时的三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都一无所有。

李白虽然见过了皇帝，但最终却被皇帝放归，这几乎意味着他这一生很难再受重用。高适虽然还保留着入仕的机会，但概率不大，毕竟他已经四十一岁，除了以梁宋地区为基地四处浪游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经邦纬国的才能。在三人中，杜甫虽然年龄最小，但名声也最小，而且最看不开功名利禄，他还期待着能够金榜题名。日后，也是杜甫最怀念这次与高李的见面，毕竟对于另外两人来说，与同等级别的人交往并非难事。

关于他们的相见，人们猜测可能是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与在洛阳居住的杜甫相遇，之后他们相约游齐鲁，与梁宋之地的高适又约到了一起。

虽然无法还原他们游览的每一个地方，但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曾经

到过齐鲁地区的汶上[316]，以及位于现在山东单县的单父台[317]，也曾经到过高适居住的汴州，登古吹台怀古[318]。

离开两人后，李白此后十年继续漂泊。他曾经寄居在亲戚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处，又曾经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他的行踪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於，中至洛阳，南游淮泗，入会稽，还不时往来于齐、鲁、梁、宋间。高适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涯。杜甫则回到了东都。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的父亲担任了奉先县令，他跟着来到了长安，之后开始准备考试。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大机会。在第二年，皇帝下令举行一次制科考试，诏令只要有一项特长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次考试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括杜甫，以及另一位唐代诗人元结。

不幸的是，这一次考试是由李林甫主持的。他在民间的口碑太差，虽然已经控制了官场，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还没有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他害怕从地方来的新士子不懂规矩，将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于是劝说皇帝不要将这些乡野俗人招来。皇帝依然决定举行这次考试，下令让郡县官员认真选择，只有最优秀的才能送来。李林甫只好委托尚书省负责考试，由御史中丞监考，考试的题目是诗、赋、论都考，难度极大，结果没有一个人合格。李林甫于是恭喜皇帝，已经野无余贤了。[319]这样，也就没有人能够见到皇帝告他的状了。

这次虚假的考试不幸被杜甫赶上了，他又一次落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考。

至于高适，他依然在家乡苦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事实上，就在他们交游的那一年，比高适小十一岁的岑参也已经进士及第，更加反衬出这位中年男子的凄凉和落魄。

第五章 战争前夜

权相的更迭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天下最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320]

杨国忠的繁忙程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是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调研，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杨国忠的崛起又和他的妹妹杨贵妃有关，这就牵扯到了本书的又一个配角——但在许多其他的书中却是主角中的主角，也是玄宗之祸的主要背锅者。

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底或者第二年初[321]，玄宗宠爱的武

惠妃死了，玄宗在感情上陷入了一段空白期。直到有人告诉皇帝，寿王（武惠妃的儿子）的妃子、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氏可以代替武惠妃。于是玄宗给寿王另聘了妃子韦氏，先让杨氏当了女道士，号太真，然后召入宫中，直到天宝初，才封为贵妃。[322]

杨贵妃受宠时，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她的三位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她的哥哥（不是亲哥哥）杨钊（即杨国忠）也因此受宠。

在野史[323]中，充满了对杨贵妃香艳的描写，这一方面是中国禁欲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都以意淫的方式幻想着皇帝和贵妃的温柔乡，并将当时的名人（最著名的就是安禄山）也都编排进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玄宗之祸归罪于贵妃。

但事实上，杨贵妃的作为并没有超出其他的皇后或者妃嫔。在唐代，皇后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是一种常态而已。比杨贵妃的家族更会弄权的家族不在少数，最著名的就是武则天所属的武氏，以及韦后所属的韦氏。杨氏家族虽然出了杨国忠和三位夫人，但这些人大都是享受型的人，并没有对帝位产生野心，反而对皇帝颇为忠心，这可能也是玄宗放手让贵妃家族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因。

在杨贵妃家族中，唯一能够称得上野心勃勃的是杨国忠，他并不幻想篡夺皇帝的权力，却对李林甫式的权相位置颇为心仪。但所谓权相，也是皇帝的意图造成的，并非仅仅靠大臣的野心就能达成。皇帝总是需要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规训官僚系统，之前是李林甫，李林甫之后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唯一不确定的是最终谁去填补这个位置罢了。

如果按照亲缘来算，杨国忠的舅舅是武则天朝的宠臣张易之。[324]杨国忠本人不学无术，最初在蜀地的军队中混，后来投靠了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而这位节度使需要他，更多是因为当时杨太真已经受到了皇

帝的宠爱。

在章仇兼琼的引荐下，杨国忠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这也说明杨太真最初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提拔这位哥哥，只是后来帝国的传统让这位贵妃的家人飞黄腾达了。如果只是贵妃的家人，还不足以让他担任宰相，偏偏杨国忠又是极其善于钻营的人，他很快就投靠了李林甫，帮助李林甫清理了其他的聚敛集团成员，如韦坚、杨慎矜兄弟等人。当把这些人清理完毕后，唯一能够与杨国忠比肩的，只剩下了王鉷。

最后，杨国忠把握住机会，利用谋反案将王鉷干掉。在这个过程中，杨国忠也有了一批亲信，其中最著名的是边将哥舒翰。由于哥舒翰与安禄山的矛盾，也注定了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

清理了王鉷之后，杨国忠接替李林甫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这件事依然要等到李林甫死后才会发生。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但当皇帝前往华清宫时，他依然陪同。这表明这位老宰相的擅权之路充满了艰辛。果然，这一次从行加重了他的病情，自此他一病不起。在弥留时刻，他依然想从皇帝身上获得最后的宠幸，因为有人告诉他，见一见皇帝，能够给他冲喜。皇帝并不拒绝这么做，但左右却不让皇帝接触将死的人。皇帝只好让人将李林甫抬到院子里，他站在远处的楼上，遥遥地挥了挥手中的红巾。李林甫已经不能下床了，只好请人拜谢。

见过皇帝不久，李林甫又见到了刚刚从蜀地回来的杨国忠。杨国忠之前去了四川，派兵镇压南诏的反叛，大败而回，却向皇帝上奏获得了胜利，正在受宠的时刻。他亲自到家里去看望李林甫，并拜在床下。李林甫知道自己已经快死了，向杨国忠托付了后事。[325]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了整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大臣。这就有了本节开场的一幕：在很短的时间内，杨国忠就像李林甫一样，将所有的大权都揽在了身上。对于社会和普通民众来说，两人的作为几乎毫无区别，

都是一样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也满足着皇帝的私欲。整个社会依然在平稳地前行，就连边疆的几次败仗也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不为人所知。看上去一切都是没有变化的。

然而，人们却很少意识到，权力从李林甫向杨国忠的更迭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波澜不惊。事实上，虽然杨国忠接手了李林甫的一切权力，但他又没有实现李林甫那样的完全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边将问题。

玄宗初期的政策是由重要的大臣担任边将和节度使，这些人中，像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等人都可以从节度使直接担任宰相。为了抑制这些人的权力，也是为了让更听话的人掌握军队，李林甫扶持了大量的蛮族将领。这些将领对李林甫感恩戴德，也表现出了忠心。李林甫死后，表面上是杨国忠掌握了这些人的任命权，但事实上，杨国忠很难获得这些人的尊重。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必须将这些老节度使罢免，换上新的，这些新人才会对他表现出忠心。

而要清理老节度使，又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抗，就这样，这位最忙的宰相就在边将问题上陷入了无解的麻烦之中。

节度使的罪与罚

为了说明唐代的边将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切面，去了解玄宗不同时期的边将变化。在玄宗时代，北方的边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在玄宗担任皇帝的四十多年间，曾经在北方地区担任过节度使一级长官的人不过五十几人。特别是在开元前期，边将群体甚至比宰相都稳定，皇帝换宰相的速度比换边将还快。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这一年在北方边境地区担任长官的大都是功勋卓著的将领，以及与中央有联系的高级官员。负责安西的是名将张玄表和阿史那献，北庭由汤嘉惠和郭虔瓘掌管，而守卫河西的依然是唐代历史上首位节度使贺拔延嗣。陇右由鄯州都督杨矩主持。而在朔

方、河东和范阳的，分别是三位（在之前或之后）担任过宰相的高官——王晙、薛讷和宋璟。

这是玄宗朝前期的典型配置。在西北地区升任高官的大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既有汉人，也有少量汉化的胡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担任。而在某些地区，还会选择中央高官去担任职务，这样做除了保证地方的忠心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些高官调动资源的能力，保证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任职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也有机会到中央担任高官。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担任河西、陇右、朔方和范阳节度使的，分别是牛仙客（宰相）、张守珪（功臣、将领）、信安王李祎（亲王、著名将领）和赵含章（战将、功臣、信安王下属）。这时的节度使模式依然是亲王、宰相和功臣模式，表明盛唐时期的边将还没有失控。玄宗甚至比开元初刚刚开始设立节度使时，更加在意边将的人选，将边境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而守边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依然还有机会升任中央高官。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随着李林甫对宰相职位的把持，宰相和高官群体从边将的名单中逐渐消失，形成了专门负责边疆事务的将领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边将与中央官员已经彼此隔绝，事实上，担任河西、陇右和范阳节度使的王倕、皇甫惟明、裴宽都在中央任过职，但由于李林甫把持了朝政，他与汉人的边将集团又往往有着冲突，导致边将升任中央也受不到重用，有时还会有性命之忧（例如皇甫惟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开始有意识地重用胡人群体担任边将，由于这些人比起汉人边将更加听话，成了李林甫巩固权力的一种工具。在此时，担任安西节度使的是著名将领、羌族人夫蒙灵察，而担任平卢节度使的是安禄山。

到了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李林甫已经将唐代的边将群体进行了换代，这一年担任帝国北边将领的是四个番将，分别是担任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以

及担任范阳和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这四人中，有人始终忠于唐朝皇帝，而有的人则发动了叛乱，但不管怎样，手握重兵的番将控制了唐朝的边防，依然是唐朝即将出现问题的信号。之后，虽然偶尔有汉人担任边疆节度使，但唐朝的边疆控制权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央的手中。[326]

玄宗后期的边将中，最早应该提到的是在北方多地镇守过的张守珪。

玄宗早期的著名将领如郭虔瓘和郭知运[327]等人虽然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受皇帝节制的，不轻易言战，表达了盛世早期对战争的克制。但到了另一位名将王君㚟时代，由于他急于立功，与吐蕃人和回纥人发生了冲突。王君㚟表现出与玄宗执政后期相同的急功近利的特点，以失败身死而告终。[328]

第一个帮助玄宗实现了他的武功梦想的，是著名将领张守珪。[329]张守珪早年跟随郭虔瓘镇守西北，后来又在东北地区的幽州担任将领，对于边疆地区的局势非常熟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王君㚟战败身死，张守珪也获得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

由于王君㚟的死亡，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是处于下风的。张守珪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任务就是保住城池，但吐蕃的势头太猛，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就在他率领士兵们修城墙工事时，突然间敌人又来了。士兵们知道城池不够坚固，但是逃又没有地方可逃，人心惶惶之际，没有人考虑过长期的战略，只有张守珪不慌不忙，如同诸葛亮一般大摆空城计。他虽然没有打开城门这么嚣张，但在城上和将士们置酒作乐，表现得毫不担心。他的做法迷惑了敌人，让他们担心有埋伏，不敢进攻，只能撤走。张守珪这才放下酒杯，率军出击，击败了撤退中的敌人。这一仗树立了张守珪的威望，他被封为瓜州都督。张守珪继续率领兵民修缮灌溉设备和农田，让瓜州恢复了正常。

由于他的功劳，第二年他被授予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跻身高

级将领的行列。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这期间，张守珪与河西节度使牛仙客、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这三大名将共同支撑起了帝国的西北防线，将吐蕃死死压制，帝国重新回到了和平的轨道。[330]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守珪调任范阳，担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后又加封河北采访处置使。这一系列官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王”，这表明帝国的边疆军职权力有了失控的苗头，也是后来安禄山大权在握的前奏。

但是，张守珪本人并没有野心，他依然是唐朝中央政府忠心耿耿的大将。在他到达幽州时，恰好是可突于猖獗之时[331]，前两任幽州长史都拿可突于没有办法。张守珪却利用契丹人的内部矛盾，将可突于杀死，传首东都，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两年后，当张守珪本人前往东都时，他获得了隆重的接待，皇帝为他准备了一系列的欢迎仪式和赐宴，甚至亲自为他作诗。张守珪被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继续镇守东北地区。在幽州，皇帝也下令给他刻碑记功。

张守珪的待遇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之前，边关将领们以守成为主，王君㚟的命运依然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试图主动出击。但在张守珪之后，边将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了追求赏赐，纷纷开始主动出击。

事后，人们认为，张守珪对唐代最大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发掘了两个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根据传说[332]，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安禄山只是当地市场上的小混混，偶尔还偷牲畜，一次他偷牲畜时被抓住了，按照规矩应该被杖杀，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监刑的张守珪，大喊：“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而杀壮士！”这句话让张守珪留了他一条命，从此他成了张守珪旗下的捉生将，担任同一职务的还有史思明。

所谓捉生将，类似于以抓“舌头”[333]为目的的侦察兵。安禄山由于会多种语言，这项活计他干得得心应手，率领三五个人就能抓回十几个俘虏来。张守珪给他的人数翻倍，他抓的“舌头”也会翻倍。久而久之，安禄山就担任了张守珪的偏将，之后又成了张守珪的养子，因为军功加封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这段传说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有虚构之处。首先，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事情，按照上面的说法，他招纳安禄山必在该年之后。但是也是在同一年，张守珪派遣安禄山前往朝廷奏事[334]，也就是说他至少已经成了亲信。从情理上说，安禄山不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小毛贼变成节度使的亲信。

张守珪在没有晋升为高级将领时，也就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之前，曾经在幽州担任过游击将军，后来升为左金吾员外将军。很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发掘了安禄山，安禄山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渐升为张守珪的亲信，并跟随张守珪前往西北地区，后来又回了幽州。

另外，安禄山是否为张守珪的养子也是有疑问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作为平卢将军，讨伐奚和契丹失利，张守珪就曾经奏请斩首安禄山[335]，这显然不是父子关系能够做出的。这也表明，张守珪与安禄山只是上下属关系，安禄山以功绩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又因为失利而受到贬斥。虽然是张守珪发掘了安禄山，但这并不表示他有什么私心。

张守珪虽然没有太大的私心，但他毕竟也是一名将领，受到了自己建立的功绩的束缚。既然他因为军功而受封，并让其他将领学会了同样的套路，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被迫立更大的功劳，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否则就会被别人取代。唐代官僚缺乏保护机制的弱点又显露出来，一个人哪怕功劳再大、官职再高，一旦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就有可能瞬间倒台，并被对手陷害。要想防止这一点，就只能继续努力获得皇帝的欢心。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报应来了。这一次并不是张守珪的本意，而是他的下属立功心切，冒用了他的命令，甚至冒用了皇帝的命令，导致了灾难。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为了立功，命令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人马在湟水上与奚人作战，由于乌知义不想打仗，他们只好伪造了命令，逼迫他出兵。但这次战斗以失败告终。

这件事本身不是张守珪发动的，但作为领导的张守珪也难辞其咎。为了掩饰，张守珪只好谎报胜利。不想这件事被查了出来，皇帝派了宦官牛仙童前来查验。张守珪前面做了假，已经不可能回头了，只好贿赂了牛仙童，把这事儿归罪给白真陁罗，并逼迫他自杀了。

但这件事又成了连环套，第二年，张守珪贿赂牛仙童的事情又暴露了，这次皇帝杖杀了牛仙童，并把张守珪降职为括州刺史。

努力了一辈子，最终只领了个偏远的刺史，张守珪羞愤交加，到任不久就死去了。他的死亡，也表明在这个时期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将领，在皇帝面前依然无法做到全身而退。

张守珪被贬的第二年，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恰好是玄宗后期最重要的一位汉人军官升为高级将领之时，他就是王忠嗣。王忠嗣的遭遇，再一次预示着番将的崛起。[336]

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是一员西北地区的将领，曾经担任过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薛讷担任陇右防御使与吐蕃对峙时，王海宾曾经作为先锋参与其中。当时跟随薛讷的名将如云，包括了后来担任高官或者高级将领的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等人。在这些人中，又以王海宾最为勇猛。他在渭州西界的武阶驿与吐蕃对抗，杀敌无数。就在敌人越来越多时，王海宾急需救援，其余将领却妒忌他的军功，纷纷按兵不动，导致王海宾死在了阵中。但王海宾的战死却为战争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成就了薛讷的胜利。

之后，玄宗感慨王海宾的英勇，不仅追赠他为左金吾大将军，还把

他的儿子王忠嗣带入宫廷抚养成人。王忠嗣因此与后来的唐肃宗结识。他长大之后，与父亲一样擅长兵事，玄宗甚至夸奖他必然成为良将。

王忠嗣先后跟随了两员著名将领——后来的宰相萧嵩（时任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信安王李祎（时任河东副元帅），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足够锻炼。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河西节度使杜希望的重用下，王忠嗣在对抗吐蕃的战争中屡获奇功，并被提拔为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兼左羽林上将军等。

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忠嗣终于步入最高级别的战将之列，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使，加云麾将军。第二年，他被调到朔方担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改为另一位战将田仁琬担任。

一般情况下，一位战将担任节度使，他的任职也就到了最高阶，但对于王忠嗣来说，这却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年，王忠嗣继承了张守珪的传统。他善于用兵，不断地指挥自己的军队进行北伐。他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次击败了奚人，又击败了突厥人。在他的领导下，到了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北方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安定。王忠嗣也被封为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采访使，后又进封清源县公。

到了这时，王忠嗣已经同时兼任了两路节度使（朔方和河东）。这在玄宗时期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但也并不是说没有先例，就在一年前，另一位节度使安禄山刚刚以平卢节度使身份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主控现在的北京以东的燕山一带，而范阳节度使则主控现在北京周边至太行山一带，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以东的加上周边地区，直达太行山东麓，在当时都已经控制在安禄山的手中。

但是，王忠嗣的朔方和河东却更加重要。唐代的两京分别为长安和洛阳，而唐之北都设在了太原。河东节度使的驻地在太原，既是北都又

在洛阳北方，是控制东都的北方门户，而朔方主控区在长安以北，同样有着拱卫都城的作用。相对而言，安禄山所控的两个藩镇处于相对偏僻的角落之中。

与后来的将领不同，王忠嗣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并没有居功自傲，继续打仗。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位能够保持自控力并明白和平更加重要的节度使。一旦取得了足够的军事优势，王忠嗣想到的是在保持唐朝优势的情况之下，与北方和西方诸民族和平共处。他曾说，将军的能力要表现在控制力，而不是消耗财力去获得功名。[337]因此，他选择了随时做好军事训练，利用间谍摸清敌情，却不轻易发动战争的做法。他还是对后勤最重视的将领，在和平时期，发给将士的一弓一箭都要登记造册，不得遗失。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盛唐的边关进入了最后一个安定期。

王忠嗣的成就在第二年（天宝五载）达到了顶峰。这一年他不仅担任了河东、朔方节度使，皇帝还把陇右和河西节度使都给了他。这样他就成了北方四镇的节度使，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说，他已经达到了作为一员武将的最高峰，再也不可能有人超越了。

但此时，说他闲话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性。唐代君臣缺乏互信的传统很可能将他变成一个牺牲品。于是他坚决辞去了朔方、河东节度使，只担任新获得的陇右、河西节度使，放弃了自己的老根据地。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让皇帝放心，二是想在新的地方出点成绩。

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做法仍然不足以让他脱离毁谤。最大的问题出在皇帝和其他将领身上。虽然王忠嗣获得了足够的战功，不再渴望打仗，但其他将领在被他压制之后，急需战功来获得威望。而此时的皇帝早已完全忘记了休养生息的重要性，渴望着另外的胜利。

皇帝调王忠嗣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是为了让他打仗。但王忠嗣

却希望首先通过和平来控盘。王忠嗣的保守做法就同时得罪了皇帝和渴望战功的将领。首先，皇帝不听他的劝说，执意继续发动对吐蕃的战争；其次，另一名将领董延光在皇帝的授意下，准备进攻吐蕃的堡垒石堡城。

王忠嗣先是反对董延光出兵，后来接到皇帝的命令，让他去接应时，又不情愿出兵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董延光进攻石堡城失败后，顺势将责任推给了王忠嗣。嗅到了王忠嗣即将倒台气息的宰相李林甫乘机控告王忠嗣有意与太子联合谋反。这一切加在一起，导致玄宗皇帝将王忠嗣下狱，差点死在狱中。获救后，王忠嗣被贬，郁郁而终，死时只有四十五岁。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王忠嗣的悲剧性结局，也启发了另一个身兼数职的节度使安禄山。当他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不再像王忠嗣那样坐以待毙了。

外族节度使

王忠嗣不愿攻打的石堡城，被皇帝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其中的原因是，石堡城事实上是从唐军手中丢失的，而攻占了石堡城的吐蕃，是当时玄宗眼中最大的敌人。只有夺回石堡城，玄宗皇帝才能感觉到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快感。

石堡城位于现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乡石城山，至今遗址尚存。它位置险要，三面是悬崖，只有一面有一条小路可以上，是从西藏

经过青海腹地前往青海湖和西宁的要道。如果唐军占领了这里，意味着青海湖以南的腹地就向唐军开放了。反过来说，如果吐蕃人占领了此处，就拥有了居高临下的优势，成了唐军的劲敌。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之前，石堡城属于吐蕃，随着吐蕃与唐军的对峙，唐军著名将领信安王李祎率军攻克了这里，使得唐朝掌握了主动权，也逼迫吐蕃与唐朝议和。在这一回合中，唐朝占了上风。

然而，到了另一位著名将领盖嘉运时期，吐蕃再次兴起。盖嘉运在与突骑施人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担任了安西节度使，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盖嘉运在吐蕃的进攻中失利，导致石堡城失守。这次失利也让盖嘉运被罢官。[338]

盖嘉运之后，负责指挥唐军收复石堡城的，是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皇甫惟明发动了数次针对吐蕃的战役[339]，试图夺回石堡城，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却并没有收复这座皇帝最想拿下的城市。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皇甫惟明被李林甫害死，接替他的王忠嗣被皇帝寄予厚望。不想王忠嗣却倾向于采取和平方式，他降伏了更靠近唐朝的吐谷浑人，却对吐蕃人采取威慑战略。当皇帝询问他如何夺取石堡城时，他认为：石堡城的地理位置过于险固，如果硬性攻打，必然造成数万人的死伤才能攻克，对于唐朝，就算赢了也是惨胜。唐军的最佳策略是等待机会，待吐蕃内乱的时候再智取。

王忠嗣的观点是对的，但无法得到玄宗的认同，这才有了玄宗派遣另一员将领董延光去攻打的一幕。这次进攻不仅没有攻克石堡城，还让王忠嗣倒了台。

接替王忠嗣的就是大将哥舒翰。这也是唐代利用番将取代汉人将领的关键性一幕。哥舒翰是突骑施哥舒部落的后裔，在他父亲那一代就已经汉化了，他父亲曾经担任过安西副都护，距离高级将领仅一步之遥。

哥舒翰直到四十岁依然没有担任官职，只是在父亲的庇护下过着饮

酒任侠的生活。到他父亲死后，哥舒翰居住在京师时，由于受到了长安尉的轻慢，才发奋图强，回到了河西并在当地崭露头角。他担任过节度使王忠嗣的手下，在与吐蕃人的战斗中脱颖而出，数次击败吐蕃，他本人也节节高升，直到担任了节度副使。[340]

王忠嗣离职后，哥舒翰继任节度使。虽然他曾经力保王忠嗣不死，但在战略上，哥舒翰却放弃了王忠嗣的保守政策，开始积极备战。他首先在青海湖中的龙驹岛修建了应龙城，让吐蕃人不敢靠近青海湖。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皇帝朝思暮想的石堡城。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两节度使的军队，以及突厥人阿布思的兵马，再加上皇帝给他增派的河东、朔方兵马[341]，一共六万三千人，进攻吐蕃的石堡城。而吐蕃在石堡城中的兵力只有数百人而已，他们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滚木、石头等战备物资。唐军一来进攻，吐蕃人就利用地理优势进行防守。唐军伤亡数万人也没有攻克。数日之后，哥舒翰要将他的将军高秀岩和张守瑜斩首，两将请求再给他们三天时间，率兵拼死进攻。最终唐军以数万人死伤的代价，攻克石堡城并俘虏了吐蕃四百人。[342]

这场大战虽然所获不多，但皇帝依然非常满意，哥舒翰因此得到了不少赏赐，包括拜官特进、鸿胪员外卿，同时赐给布帛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哥舒翰俨然成了皇帝除了安禄山之外最欣赏的战将。宰相杨国忠也认准了哥舒翰，将他拉入自己的麾下。到了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哥舒翰被封为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后来又封为西平郡王。第二年又加封太子太保，再加三百户，兼御史大夫。

这样的赏赐与哥舒翰的实力并不相符。事实上，就在石堡城大捷的当年冬天，哥舒翰新建立的龙驹岛应龙城就出了问题。他曾经派两千人驻扎在岛上，依靠四面环水的地形，吐蕃无法攻克。不想到了冬天，青海湖封冻，吐蕃人乘机自冰面进攻，将驻守的两千人全部杀光。[343]这

也表明皇帝的进攻性策略是消耗巨大的。

可是，皇帝的欣赏，以及他本人的英勇表现，让他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于有人写了诗歌来歌颂他。[344]

哥舒翰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新任宰相杨国忠对安禄山的防范。王忠嗣倒台后，中央政府也需要一个人能够与安禄山抗衡。恰好哥舒翰与安禄山又有矛盾，作为外族将领，两人存在着直接的竞争。[345]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都需要将哥舒翰作为榜样，以牵制安禄山。

哥舒翰的根据地在陇右和河西地区。而在更加遥远的新疆地区（安西和北庭），还崛起了另外两位名将。

在盖嘉运丢失了石堡城之后，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夫蒙灵察的将领。正是在夫蒙灵察的手下，出现了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仙芝本是高句丽人，与父亲长期在西域为将，曾经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手下任职，都没有受到重用。夫蒙灵察提拔了他，直至使他担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346]

与哥舒翰取石堡城相同，高仙芝的功劳同样源于一个遥远的所在。在本书的《楔子》中，已经叙述了高仙芝对小勃律的袭击，这次袭击可以作为难度最大的奇袭而载入史册。但不幸的是，小勃律对唐王朝的统治几乎没有影响，使得这场军事冒险虽然伟大，却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可以说，这次奇袭反而助长了唐朝的自大，这才有了几年后的怛罗斯战败。怛罗斯之战的发起人依然是高仙芝，虽然战败，却并没有影响到高仙芝的地位，使得他能够在安史之乱初年继续发挥作用。

高仙芝凭借对小勃律的袭击取代了夫蒙灵察，而他的手下，就有后来领导唐军抗击安禄山的封常清。封常清长期作为副手跟随高仙芝南征北战，其中就包括了征伐小勃律的战役。随着高仙芝被调往河西节度，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封常清升为安西和北庭节度使。在这个位

置上，他有机会参与到安史之乱初期的战局之中。[347]

在唐代天宝末年，不管是安禄山为代表的东北军事集团，还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为代表的西北军事集团，甚至南方的其他边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好战。在对外上，他们更加频繁地打仗，高仙芝在最西面的边境与吐蕃（及其盟友）和大食作战，哥舒翰在青海地区同样与吐蕃作战，而安禄山则在东北地区与奚和契丹发生冲突。这些边将大都是胡族或者出身低微，只有通过战功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

由于缺乏了贤相集团的约束，皇帝也变得更加好战，他的情绪又得到了聚敛集团宰相们的顺从甚至鼓动。在云南地区，宰相杨国忠（作为蜀地的节度使）更是亲自策划了针对南诏的灾难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的军费从最初的二百万贯膨胀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了。

这种膨胀扩大了节度使的权限，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发动对外战争和对内叛乱，而在叛乱发生后，又让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去镇压叛乱。

战争前夜的文人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在家乡熬了大半辈子的高适突然间获得了机会。这一年，皇帝设立了有道科的制科。宋州刺史张九皋一直感觉高适是个人才，这次终于找机会将他推荐了上去。制科的好处是，一旦通过了考试，就可以立刻获得任命，而不用像进士科那样有个等待时间，于是，做了四十六年平民的高适突然得到了封丘尉的职位。[348]

封丘位于现在河南省的东北部，距今河北地区不远，这里在唐代时已经接近北方的边境辖区。作为县令的下属，县尉只是一个杂事众多的芝麻绿豆官，活在蝇营狗苟之中，这与高适粗放的性格并不符合。[349]

唐朝有征兵的活动，作为封丘尉的高适就接手了向北方边境送兵的职责。天宝九载（公元750年），高适接受县令的委托，前往清夷军（驻地在现北京以北的河北怀来）送兵，这里已经是燕山以北，属于安禄山的地盘了。高适在送兵来回的路上，见证了北方的荒凉与凄苦，此时，他满腹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种无奈。回到封丘后，他感慨自己不适合做地方的小官吏。[350]又在封丘待了不久，他选择了辞职，前往长安寻找机会。此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

随着边境地区节度使的设置，唐代文人的当官之路突然拓宽了一些。以前，人们只能等待中央政府的任命，而现在，在边境地区，节度使可以招募一些急需的人才，并授予职务。这一部分节度使任命的官员虽然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但他们的履历是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承认的。在未来，只要机会合适，节度幕府官还可以转成中央官。这条当官之路的拓宽，使得唐代的文人们突然多了不少的选择。在天宝年间，这条路刚刚打通；到安史之乱时，以及之后的中晚唐时代，则成为坦途大道，有时节度幕府官与中央官的待遇无异，甚至还更好。

高适到达长安之前，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刚刚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他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进士及第，担任了录事参军的职务，但在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他却选择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担任判官，走上了一条在幕府中担任文官的路子。岑参担任安西节度判官时显得如鱼得水，也让同样有志于四方的其他人看到了机会。

高适到长安之时，岑参已经从安西节度判官的职位上离职了，原因是节度使高仙芝刚刚在怛罗斯吃了败仗。但岑参带来的消息却让高适看到了机会，高适认为这样的一条路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可以避开无数小官职位的磨炼，直接担任他喜欢的军队职务。

恰好这时，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正在组建自己的班子，需要人才的辅佐，就把他招入旗下。高适由此担任了哥舒翰的掌书记。哥舒翰的幕府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高适先来到金城，又陪伴哥舒翰返回长

安。由于与哥舒翰相得甚欢，高适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职位。

回到长安后，他和朋友们一同登上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登高望远。与他一同登塔的除了岑参之外，还有在长安的杜甫，以及另两位文人薛据和储光羲[351]。

杜甫在长安也终于有了起步。在前一年的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皇帝举行了三场大的祭祀活动，分别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并在南郊合祭天地。[352]这一次杜甫抓住了机会，接连写了三篇赋，称为三大礼赋[353]，歌颂皇帝的祭祀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杜甫诗风已趋成熟。如果说他年轻时诗作还显得刻板，循规蹈矩，有时带着奉承的痕迹的话，在长安这么多年的打拼已经让他见惯了世态炎凉，笔锋也带上了苍凉之色。[354]但为了做官，他必须强打起精神，写出最俗套的文字来赞美皇帝。不管在哪个朝代，最好的文字不会出自公文，而皇帝欣赏的，也必然是最俗不可耐的文字。

不出所料，这三大赋果然获得了皇帝的称赞，他决定给杜甫一个机会。于是，杜甫在屡屡考试不中之后，利用溜须拍马的功力，获得了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并不意味着立刻授官，而是首先策试文章，文章合格之后，再报备有司，列入资格，至于何时当官，还需要等名额。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杜甫已经通过了考试，但还在等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才显得更加活跃，出现在大慈恩寺朋友的诗酒活动上。他得到官职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时，最初授的是河西尉，他不想去，推掉了，于是又给了他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355]的职位，他才接受了。但当他接受官职时，已经是安史之乱云起之时，不管当什么官，都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了。

高适接受了哥舒翰提供的职位后，往返于河西与京城之间。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四月，他恰好在长安，见到了出征南诏回来的李宓

[356]。史书中对李宓再出征时是战死还是战败而归有多种记载，但高适的诗表明李宓虽然战败，他本人还是回到了长安。

到了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岑参也再次选择了节度使的幕府，这次他进入了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幕中担任判官。封常清曾经是高仙芝的手下，岑参在高仙芝处任职时，想必与封常清是相识的。

到了安史之乱发生时，封常清被召回长安领导军队，岑参也就结束了与封常清晏游的生活，继续留在玉门关担任了北庭度支副使，按察边关的储备。封常清战败后，皇帝又命哥舒翰带兵，于是高适回到长安，担任了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两位诗人就这样介入了唐代的军事行动。

在安史之乱到来之前，还有一位奇人突然间进入了唐代的官僚系统。这位奇人并没有参加任何考试，他只是布衣出身。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大机会，很可能只是乡间的一个老头子。但是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不久，他的机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到来了。这个人就是张镐。

张镐，博州（位于现山东省聊城）人，文人出身，喜欢谈论军事和战略，却并不像当时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参加科考。他曾经拜历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为师，得到了吴兢的称赞。后来他来到长安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喜欢喝酒，只要有酒的场合，又有人邀请，他都会参加。也正是在长安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不少文人名流，但像他这样的人在国都并不少见，大部分的仕子一旦落榜，都有流落长安的经历。

但张镐幸运之处是，到了天宝末年，宰相杨国忠刚刚上位不久，需要培养自己的嫡系，为此，他号称要搜罗天下的豪杰，于是把张镐报了上去。张镐就这样稀里糊涂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杜甫也曾经在长安混迹多年，却只得到个补缺的机会，必须等待许久才得到实职。而张镐不在乎当官，却得到了权相的青睐，轻而易举跨越了数级。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布衣人士当上左拾遗只是第一

步，他从布衣跳到宰相，只用了不到三年。[357]

当安史之乱到来时，玄宗时期的文人们已经四散。李白游广陵，入秦淮，上金陵，最后留在了宣城。王维依然继续着他的半隐居半当官的生涯，他担任过吏部郎中、文部郎中、给事中，世事纷纭，对他的干扰并不大，不管什么权臣，都懒得去惹这位已经成名的才子。岑参留在了北方，高适回到了长安。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意识到即将爆发巨大叛乱。

唯一能够感觉到盛世已经成为过去的，反而是表现得最没有自我的杜甫。他通过给皇帝歌功颂德获得了一个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得到官职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回家省亲。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奉先县令，因此杜甫的妻子、孩子也都留在了奉先，正陷于困顿之中，连生活来源都没有。杜甫立刻赶往奉先，一是为了报喜，二是为了接济家人。也就是在这时，他写出了人生第一首万古传唱的杰作[358]。

杜甫的诗歌一直比较循规蹈矩，又显得有些干涩，这主要是由于他对于功名更加看重，缺乏李白式的洒脱。然而随着命运的变化，他的诗歌逐渐从给别人写，变成了给自己写，写自己的命运和观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诗歌文风一变，成了命运的代名词。

在他赶往奉先时，恰逢安史之乱爆发的同一个月，只是消息还没有传来。

为了赶去见家人，杜甫在十月寒天半夜离开京城。他的指头冻得生疼，浑身沾满冰霜。天蒙蒙亮时，他来到了骊山脚下。在他之前，皇帝已经带着群臣来到了骊山，享受着温泉的云雾蒸腾。御林军层层保卫着皇帝的安全，皇家乐队演奏的乐曲在远处都能听到。跟随着皇帝的达官贵人有着参加不完的宴会，皇帝的赏赐也多如牛毛，可以想象皇家宴会的金珠玉盘、香橙金橘。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几十年的盛世之后，这个社

会的分化已经无法掩盖，那脆弱的咔咔声已经响起，随时可能崩塌。

杜甫沿着河行走，又渡过了危桥，终于来到了奉先县。他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家人。但在进门的那一刻，他听到了屋内的哭声。原来他的小儿子因为缺吃少穿营养不良，刚刚死去。他本来获得了一官半职，可以改善家人的生活，但是他的小儿子却没有等到……

只是，他还不知道，即便有了这个小小的职务，他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因为在数千里之外，那场巨大的叛乱已经发端。

被“逼”的叛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像张守珪和王忠嗣等前辈一样，等待着被皇帝除掉，或是铤而走险，除掉皇帝换上自己。对于这个胡人将领来说，已经没有其他更加安全、和平的路可以走了。

安禄山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叛臣，但他的前半生却道尽了唐代胡人生活的艰辛。他的母亲是一位突厥的巫婆，可能就连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在生下安禄山之后，母亲才嫁给了一位叫作安延偃的胡人。[359]安延偃的弟弟是一位胡人将军，名叫安波注，安波注有两个儿子分别叫作安思顺和安元贞，因此，安禄山和安思顺又成了后天的堂兄弟。

开元初，安延偃家族衰落，安禄山和安思顺兄弟跟随另一个胡人将领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安贞节，来到唐代的岚州别驾处，得到收留。在这里，安禄山遇到了他的贵人，后来的节度使张守珪。[360]

张守珪先是救了他一命，之后，在张守珪手下，一方面，安禄山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另一方面，张守珪又会随时甩锅给他，在安禄山充任平卢将军时，因为战斗失利，就差点

被杀死。这也说明胡人在军中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他们在节度使的庇护下才能获得一定的职位，还随时可能遭杀身之祸。

最能说明安禄山命运的，是他和玄宗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之间的纠葛。张九龄任职时期，已经到了李林甫时代早期，李林甫为了抑制贤相们的势力，将节度使和中央官吏之间的旋转门隔断了。之前的退职宰相可以去边关担任节度使，也可以从节度使调任宰相，但李林甫为了避免有人和他抗衡，将这个传统废弃了。胡人将领纷纷得到提拔，作为李林甫的势力对抗贤相。作为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不是不知道李林甫的意图，因此他的策略就是坚决反对对胡人将军的任命，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胡人势力。

这本来是路线之争，李林甫的做法虽然带来了大祸，但张九龄的反对意见也并非全有道理，只是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利用唐代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机制这个缺陷，使出杀招来进行博弈。但在唐人的记载中，却将张九龄神话了，因为他反对李林甫任命的胡人将军就是安禄山。

根据史书记载，张九龄似乎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一次见到安禄山时，就认定安禄山是乱臣贼子。[361]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张守珪因为安禄山战败而要惩罚他时，又是张九龄坚决主张杀死安禄山，但皇帝没忍心下手。

这两件事让张九龄一直被人怀念，甚至有记载，就连皇帝在发生叛乱后，也怀念起张九龄来，后悔不已。[362]

到此时，安禄山已经有过两次性命攸关的时刻，却都扛了过来。更幸运的是，恰逢李林甫重用胡人的政策出台，加上他本人善于察言观色，于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他已经担任了平卢军兵马使。

第二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作为河北采访使到平卢考察时，安禄山获

得了他的欢心。这次安禄山被加封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除了这一串的官职之外，最重要的是，安禄山获得了皇帝的赏识。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皇帝把平卢军从幽州划了出来，单独设立了一个节度使辖区，任命安禄山为节度使，安禄山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帝国的军事高官[363]。

第二年，安禄山入朝觐见，获得了玄宗的重视，加封骠骑大将军。下一年，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成为帝国东北地区两大辖区的节度使，权位更重了。他离开长安时，皇帝命令宰相以下高官都必须亲自相送。

但这还不是安禄山受宠的高峰。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开始，在玄宗皇帝和李林甫的带动下，全国开始为安禄山疯狂。这里无法把安禄山受到的一系列礼遇都记载下来，如果相信唐人的记载的话[364]，只能简单总结为：李林甫和杨国忠两大权臣都以侍奉安禄山为荣，皇帝赐给他的财富、官职、宅第和宴会可谓皇家一般的待遇，超乎唐朝任何时期的任何大臣的。出现这样的疯狂，也预示着唐代中央官吏彻底失控，已经没有人能够提醒皇帝了。所有的大臣都只能顺着皇帝的意思，把事情做得更加过火，而皇帝在大臣的奉承下，也会做得比自己希望达到的程度更加过头。

安禄山显然也知道自己没有皇帝想象的那么好，这么多的赏赐砸过来，他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呢？

不幸的是，安禄山心中的恐惧并没有消除，就算皇帝赐给他铁券他也觉得并不保险。在唐代的官僚系统中，一个人爬得越高，他的危险也就越大，人们今天能够捧他，明天就能够棒杀他。为了证明自己无功不受禄，他必须做出足够的成绩，才能配得上这些赏赐。于是，在安禄山的掌控下，东北边境上战争频仍，甚至出现了安禄山主动诱杀熟番的情

况。在这种疯狂中，边疆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了。

但这依然无法为安禄山提供足够的军功来让人们闭嘴。对他最不服气的就是另一员边将哥舒翰。让哥舒翰不满意的还有安禄山的后天堂兄弟安思顺。安思顺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接替另一员大将王忠嗣担任朔方节度使，不久又调任河西节度使，到了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又调回到朔方担任节度使，直到安史之乱起。河西和朔方接近哥舒翰的地界，在哥舒翰看来，这就是安氏兄弟准备侵犯他的利益。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随着李林甫的死亡，杨国忠继任宰相。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吃肉喝酒的时光快要结束了。安禄山在长安时，杨国忠曾低三下四地搀扶他，却并不喜欢他，将他看成李林甫的人，需要除掉。哥舒翰才是杨国忠的人。

不要以为杨国忠反对的是李林甫任用胡人的政策。随着唐朝边疆将领的胡人化，谁也没有力量扭转这个政策。杨国忠想做的也只是换上一批听自己话的胡人罢了。至于安禄山，由于皇帝对他的恩宠过了头，即便他想表现出听话的姿态，杨国忠也不敢相信，因此杨国忠要对付的首要目标就是安禄山。毕竟在唐代的环境里，权位已极的人要么死亡要么造反，朝廷能做的就是在他造反之前把他解决掉。安禄山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命运。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并大胆地向皇帝进行了申诉，表示杨国忠要除掉他。[365]皇帝也解不开这个朝代的死结，他在年轻时曾经试图以身作则，避免群臣陷入死斗，但自从他在统治后期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已经无力再让任何人相信了。

皇帝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安禄山又加了官职和无数的赏赐[366]，希

望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够让他放心。人们将安禄山获得的赏赐一一列出，似乎是为了证明叛乱的责任全在安禄山，但他们不知道，由于缺乏内在的制度，不管多少外物，都无法改变人们内心的恐惧。皇帝赏赐的官职只是让安禄山叛乱更加容易罢了。

安禄山离开时，皇帝亲自到望春亭送行，将自己的衣服解下来给安禄山穿上。这个动作吓坏了安禄山，以为皇帝又要找借口将他留下。由此可见，双方的误会已经无法消除了。皇帝本该在安禄山离开前杀掉他，只要让他回去，他必然不会再来。可是如果杀掉安禄山，杨国忠又实现了他的阴谋。

安禄山逃离后，皇帝想给他加上宰相的头衔，最后一次示信于他，表明无意将他拿下。但由于杨国忠的干预，安禄山并没有获得宰相之衔。皇帝的善意反而成了他失宠的信号，加速了他的反叛。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的问题已经成了死结。他即将叛乱已经成了双方的共识，唯有皇帝还不想接受这个说法。不管怎样，安禄山都不可能再来见驾，并且长安和洛阳的任何动作都可能从事实上激起他的反叛。即便是皇帝想怀柔，但如果继续给他更多的权柄，也必然导致未来更大的危险。在这种两难之中，皇帝的不接受更多只是一种鸵鸟战术罢了。

作为宰相的杨国忠反而试图继续解决安禄山这个麻烦。他的方法是将安禄山和他的将军们调往中央，授予高官，同时解除他们的兵权。但这个办法被识破了，安禄山坚决拒绝再次前往长安，因为那意味着他必然会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在试探皇帝，他申请用三十二个番将取代汉将，皇帝和大臣们犹豫不决，摇摆之后，拖延了下来。

从表面上看，双方彬彬有礼，皇帝不时派人去抚慰，顺便打探情报，安禄山继续虚报着对外讨伐的功劳，让皇帝为他的武功感到欢欣。

但事实上，双方都知道，这样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长期维持了。唐代缺乏底线的内斗终于结出了最大的恶果，将所有人都纳入局中挣脱不开，只是看谁先动手罢了。

最后打破平衡的是宰相杨国忠，他派人逮捕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几个手下，安禄山通过在长安的儿子（也是人质）安庆宗获悉此事，认为这是要对他动手的信号。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反叛。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唐朝的玄宗盛世，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就此成了过去。

注释

[1]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

[2]参见《资治通鉴·唐纪·景龙元年》。

[3]参见《资治通鉴·唐纪·景云元年》。

[4]参见《资治通鉴·唐纪·神龙元年》。

[5]这一头衔，玄宗时期通常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关于唐代宰相的头衔，参见《新唐书·百官志》等。

[6]参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7]参见《旧唐书·崔湜传》。

[8]参见《旧唐书·窦怀贞传》。关于窦怀贞娶妻，《资治通鉴·唐纪·景龙二年》有更生动的描述。

[9]参见《旧唐书·岑羲传》。

[10]参见《旧唐书·陆象先传》。

[11]参见《旧唐书·魏知古传》。

[12]这种营养品叫作赤剑粉，可能是天麻苗磨成的粉。太平公主死党名单与阴谋同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

[13]参见《旧唐书·刘幽求传》。

[14]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先天元年》。

[15]参见《旧唐书·王琚传》。

[16]参见《旧唐书·郭元振传》。

[17]参见《旧唐书·玄宗纪》《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

[18]参见《旧唐书·崔日用传》。

[1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

[20]关于东内、西内和南内的描述，参考《唐两京城坊考》《雍录》。

[21]太平公主的策略见《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开元元年》引《太上皇实录》。

[22]参见《唐两京城坊考》附图。

[23]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

[24]参见《旧唐书·陆象先传》。

[25]关于政变的详细经过，参考《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旧唐书·玄宗纪》，以及各位大臣的本传。

[26]在武帝引起汉代衰落之前的盛世时期，汉代的内斗也不罕见，如高祖对功臣的清理、诸吕的乱政、七国之乱等。这和唐代的情况类似，即宗室和大臣缺乏必要的人身保护机制，使得激烈的斗争必然以一方的死亡为结局。

[27]宋代对政敌生命十分尊重，直到宋徽宗时期清理蔡京等六贼才出现了流血事件，而此种尊重在南宋得以加强。

[28]司马氏重建工作的失败，也有其内部斗争的原因，即晋武帝死后爆发的八王之乱。

[29]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分野也是经济分野。本书作者曾经从经济和财政角度解释了中国财政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的轮替，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30]北宋末年此类代表性事件是诛杀以蔡京为代表的六贼。这虽然是一场除奸行动，但依然可以视作一次对制度的破坏。

[31]参见《贞观政要·纳谏》。

[32]参见《贞观政要》和两唐书《魏徵传》。

[33]参见《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34]参见《旧唐书·侯君集传》。

[35]参见《旧唐书·张亮传》。

[36]《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是三百六十九人，其余统计有出入。

[37]参考《唐代高层文官》第五章。

[38]西汉时期，主要的边患是匈奴。东汉时期，匈奴逐渐衰落，边患变成了“羌乱”。

[39]亦有人认为，柔然人就是见于西方史籍中的阿瓦尔人，见白桂思《丝绸之路上的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第五章。

[40]记载柔然的中国正史是《魏书》和《北史》，到了统一的隋唐时代，柔然已经被突厥取代了。

[41]突厥系政权包括唐代初期从第一突厥帝国分裂而成的东西突厥帝国、唐代中后期的第二突厥帝国、回纥汗国、黠戛斯汗国，以及主要臣服于突厥系的奚和契丹，另外还有突厥的分支突骑施等。

[42]吐蕃系政权包括吐蕃以及与吐蕃有联系的南诏、大小勃律和吐谷浑等。

[43]朝鲜系政权包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

[44]参见《周书·异域传·突厥》。

[45]亦有人认为是木杆可汗击灭嚈哒，见《隋书·突厥传》。《旧唐书·西突厥传》则提到室点密可汗的功绩包括了击败嚈哒，室点密为土门可汗之弟。分析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一章第三节。

[46]参见《隋书·炀帝纪》《隋书·突厥传》。

[47]这九人是：渔阳郡高开道、河间郡窦建德、马邑郡刘武周（封定杨可汗）、朔方郡梁师都（封大度毗伽可汗）、离石郡刘季真（自封突利可汗）、榆林郡郭子和、五原郡张长逊（封割利特勒）、金城郡薛举、凉州李轨等。见旧唐书各自本传。

[48]参见《旧唐书·刘文静传》。

[4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武德九年》。

[50]参见《资治通鉴考异》相关讨论，司马光选择了与两唐书相同的说法，但民间却依然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51]参见《旧唐书·突厥传》。

[52]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置燕然都护府，后更名瀚海都护，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改瀚海都护为安北都护府。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置瀚海都护，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徙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关于四大都护府的存续和迭代，以及安西四镇的设置，可参阅《资治通鉴》、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等。

[53]参见《旧唐书·吐谷浑传》。

[54]吐蕃问题，亦可参阅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

[55]参见《红史》第九章。

[56]参见《新唐书·吐蕃列传》。

[57]参见《新唐书·吐蕃列传》。

[58]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十九章。

[59]参见《旧唐书·太宗纪》。

[60]参见《新唐书·东夷传》。

[61]关于军马问题，可以参考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以及张明扬《纸上谈兵》。

[62]参见两唐书的《东夷传》。

[63]关于均田制的描述，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亦可以参见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64]参见《新唐书·食货志》。事实上的均田制更加复杂，包括一部分永业田，也就是不回收的田地，具体内容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65]《新唐书·食货志》："凡收授皆以岁十月。"

[66]《旧唐书·食货志》："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

[67]参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七章。土地浮夸可能来自皇帝对土地分配的强调，由于地方政府拿不出土地来分给农民，只能在账面上作假应付皇帝，而浮夸的土地数据又刺激了税收的增长，使得民间受到压迫。

[68]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三章第二十九节："均田制度均授民以田，而逃户之多，乃以实行均田制度之北朝、隋、唐为最。"

[69]《旧唐书·食货志》："高祖发迹太原，因晋阳宫留守库物，以供军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

[70]《通典·食货七》："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

[71]《新唐书·循吏传》："（贾敦颐）永徽中迁洛州。洛多豪右，占田类逾制。敦颐举没者三千余顷，以赋贫民。"按，"永徽"是唐高宗的年号，只有六年，紧跟在太宗年号"贞观"之后，但从行文上得知，土地问题在太宗时期就已经恶化了。

[72]《新唐书·食货志》："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73]参见《隋书·地理志》。

[74]参见《通典·食货七》。

[75]参见《新唐书·食货志》。

[76]参见《旧唐书·高宗纪》。

[77]隋代征税数字见《隋书·食货志》。

[78]《新唐书·食货志》："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79]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

[80]《新唐书·食货志》："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81]参见《新唐书·兵志》。

[82]根据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整理，唐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的放贷年利率为100%，到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降到40%。见该书第二十八章。

[83]《新唐书·食货志》："（贞观）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84]《新唐书·百官志》："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

[85]武则天之名，见《新唐书·则天后纪》。

[86]参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87]参见《资治通鉴·唐纪·永徽六年》。

[88]参见《旧唐书·后妃传》。

[89]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二章的《读书人的科考往事》部分。

[90]李敬业，李勣之孙，袭爵英国公。李勣本姓徐，获赐姓李。李敬业叛乱后，武后夺其赐姓、爵位，故亦有称其徐敬业者。

[91]关于唐代宰相的使职问题，参考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

[92]参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93]《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元年》："时穷治公主枝党，当坐者众，象先密为审理，所全者甚多，然未尝自言，当时无知者。"

[94]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九年》。陆象先即便到了地方，依然以宽宏大量闻名。开元九年在担任蒲州刺史时，他审案不用肉刑。当他的录事质疑他的宽容时，陆象先表示如果非要用肉刑，不如先从这位录事开始。

[95]魏知古罢相还与和姚崇的冲突有关，见后文。

[96]关于张说不肯构陷魏元忠一事，见《旧唐书》与《资治通鉴》，但说法所有不同。《旧唐书》称是张说自己的选择，而《资治通鉴》则称张说是受了宋璟的警告，才决定不说谎的。

[97]参见《旧唐书·张说传》。

[98]参见《旧唐书·刘幽求传》。

[9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长安四年与开元元年的记载。

[100]参见《旧唐书·姚崇传》。

[101]参见《旧唐书·卢怀慎传》。

[102]开元二年还有一位将军，即和戎、大武节度使薛讷被授予宰相职务，但这是玄宗为了进攻契丹临时设置的，半年后，由于薛讷在军事上失败，就被除名了。真正负责事务的宰相就是姚崇与卢怀慎。

[103]引自《资治通鉴考异》，司马光认为这个故事是假的，是假托吴兢的名义而作的。吴兢最著名的作品是《贞观政要》。

[104]这个说法见唐李德裕笔记《次柳氏旧闻》。

[105]后两个问题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中还会详细展开论述。

[106]前两位是太宗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107]参见《资治通鉴》。其余几位是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等。

[108]参见《旧唐书·苏颋传》。

[109]关于唐代钱荒的问题，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以及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10]参见《新唐书·食货志》。

[111]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有后来的宰相张九龄，见《新唐书·食货志》。

[112]少府官制自秦汉始，各代所司内容不尽相同。隋时设少府监，唐延其架构，掌宫廷手工业产品制作。

[113]参见《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一。

[114]第二突厥汗国的历史亦可参考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

[115]参见《旧唐书·契丹传》。《资治通鉴·唐纪·万岁通天元年》作“赵文翊”。

[116]参见《旧唐书·则天后纪》。

[117]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圣历元年》。

[118]参见《新唐书·突厥传》。

[119]金城公主出嫁于景龙四年（公元710年）。

[120]参见《新唐书·吐蕃传》。

[121]由于并州大都督是由亲王兼领，亲王并不负责具体事务，实际负责的就是长史。这里的并州长史职务上相当于并州大都督。

[122]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先天元年》。

[123]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年》。

[124]参见《新唐书·吐蕃传》。

[125]参见《新唐书·契丹传》。

[126]参见《新唐书·突厥传》。

[127]参见《通典·选举·秦》。

[128]参见《汉书》《通典》。将察举制固定为制度的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129]参见《通典·选举·魏》。

[130]参见《通典·食货》。这方面讨论可以参考本书作者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31]参见《通典·选举·后魏》。

[132]参见《通典·选举·北齐》。

[133]参见《通典·选举·隋》。

[134]《隋书·炀帝纪》载十科举人诏书，其余内容参见《通典》。按，现代人普遍认为隋代发明了科举，却缺乏足够资料的支撑。没有资料记载隋代就有大规模的考试，而小规模的考试自古就已经存在。更符合事实的情况可能是，科举制度是逐渐形成的，隋代对后世的最大贡献可能在于中央垄断了官员任命权，由于官员需求数量猛增，倒逼中央必须采取考试的做法，批量选拔人才。

[135]关于学校和科举的探讨，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136]参见《新唐书·选举志》。

[137]大部分时间在长安举行科考，但在武后、玄宗时期，有时皇帝会在东都洛阳，则考试的地点也会随之到洛阳。

[138]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科考权力由户部考功员外郎转移到礼部侍郎，见清徐松《登科记考·别录上》。

[139]参见《通典·选举·唐》。

[140]参见《通典·选举·唐》。

[141]参见《登科记考·永淳二年》。

[142]参见《登科记考·永隆二年》。

[143]陈寅恪对此也有认识，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到了科举对于诗歌的影响。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唐代诗歌的两个繁荣期也对应玄宗与德宗、宪宗时期。

[144]参见《通典·选举·唐》。

[145]唐代许多策文保留了下来，《登科记考》就辑录了许多篇实战文章。

[146]参见《白居易集》卷三十、卷四十五到四十八。

[147]参见《通典·选举·唐》。

[148]参见《通典·选举·唐》。

[149]关于唐代士子任官的更多情况，参见赖瑞和的“唐代文官”三部曲。

[150]参见《登科记考补正》。

[151]本表取自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

[152]本表取自《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材料来自《新唐书·选举志》。随着时间的变化，唐代的考试要求也有一定的变化，本表主要依据《选举志》整理，并不能反映整个唐代的情况。

[153]根据《登科记考补正》整理。有的人参加过多类考试，这里只列出第一次或者主要的一次。

[154]参见《旧唐书·王维传》。

[155]明清时期，随着户口制度的加强，像王维这样在异地获得科考机会的情况已经不再可能。这样的事件在明清称为“冒籍”，但在唐代却是正常现象，亦可见唐代的开放。

[156]除了《唐才子传》称王维进士及第是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其余如新旧唐书均称是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157]参见《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158]参见《集异记》。

[159]参见《帝王世纪》。本书的古诗多转引自《古诗源》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160]参见《战国策·燕策》《史记·燕召公世家》。

[161]参见《古诗源》卷一。

[162]参见《离骚》。

[163]参见《九歌·云中君》。

[164]参见《天问》《九章·橘颂》等。

[165]参见《秋风辞》《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

[166]参见《汉书·礼乐志》。

[167]参见《乐府诗集》。

[168]明代周叙《诗学梯航·叙诗》中说：“苏李诸作而五言出。”

[169]参见《曹操集》。

[170]参见《三曹集·魏文帝集》。

[171]《三曹集·魏文帝集·典论论文》：“诗赋欲丽。”

[172]其编者徐陵就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173]关于沈佺期和宋之问的政治生涯，可参考两唐书中各自本传。

[174]参见《旧唐书·源乾曜传》。

[175]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八年》。

[176]还有两位短期担任宰相的王晙、杜暹，以及和源乾曜宰相任期有短暂交集的萧嵩。

[177]参见《旧唐书·张嘉贞传》。

[178]参见《旧唐书·张嘉贞传》。

[17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年》。

[180]参见《旧唐书·王晙传》。

[181]事实上，姚崇死于九月初三（丁未），张说拜相于九月十九（癸亥），这更说明下面的故事是虚构的。日期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九年》。

[182]参见《明皇杂录·卷上》。

[183]参见《旧唐书·张说传》。

[184]参见《旧唐书·李元纮传》。

[185]参见《旧唐书·杜暹传》《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七年》。

[186]参见《旧唐书·张说传》："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

[187]关于小勃律的记载，亦可以参考本书楔子部分的叙述。

[188]参见《新唐书·吐蕃传》。

[18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五年》。

[190]这条路也是当年隋炀帝伐吐谷浑之后进入甘州的道路，隋军因为道路艰险，损失甚众，见《隋书·炀帝纪》。现在连接青海西宁和甘肃张掖的高铁线路，就恰好通过当年的大斗拔谷。

[191]参见《新唐书·吐蕃传》。

[192]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五年》。

[193]参见《旧唐书·回纥传》《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五年》。

[194]唐·杜佑《通典》："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给衣则五百二十万，别支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

[195]参见《新唐书·食货志》。

[196]《旧唐书·刘祥道传》："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伤多也。……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

[197]《旧唐书·宦官传》记载，唐制有内侍省，官员六十名；另外设有五个局，各有宦官人

数不详。

[198]《旧唐书·宦官传》："中宗性慈，务崇恩贷，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硃紫者尚寡。"

[19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十一年》。

[200]参见《新唐书·食货志》。

[201]聚敛之臣问题，参考了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第五部分，以及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唐代部分。

[202]柳芳《食货论》，见《文苑英华》卷七四七。

[203]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九年》。

[204]隋代的财政大跃进，可参考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205]参见《新唐书·宇文融传》。

[206]"二十九位"的数据参见《通典》和《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为"十位"。

[207]参见《旧唐书·食货志》。

[208]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二年》。

[20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三年》。

[210]参见《旧唐书·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四年》。

[211]参见《新唐书·宇文融传》。

[212]见本书附录《玄宗时期稳定边防和对外战争大事年表》。

[213]参见《新唐书·食货志》《旧唐书·裴耀卿传》。

[214]参见《旧唐书·杨慎矜传》。

[215]参见《旧唐书·韦坚传》。《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也描述了韦坚组织的一次类似活动。

[216]参见《旧唐书·王鉷传》。

[217]王维的经历，根据《王维集校注》所附年表推知。其中淇上做官和隐居一节有一定的争议性。

[218]参见《寄崇梵僧》。

[219]参见《赠东岳焦炼师》。

[220]参见《赠嵩山焦炼师》。

[221]参见《谒焦炼师》。

[222]参见《寄焦炼师》。

[223]参见《题嵩阳焦道士石壁》。

[224]《偶然作》之三："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素有。几回欲奋飞，踯躅复相顾。"

[225]《偶然作》之四："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226]参见《不遇咏》。

[227]参见《新唐书·王维传》。

[228]参见《新唐书·李白传》，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志》。《旧唐书》误把李白写成山东人。

[229]参见《赠张相镐》其二。

[230]参见《上韩荆州书》。

[231]参见魏颢《李翰林集序》。

[232]参见《新唐书·李白传》。

[233]参见《新唐书·李白传》。

[234]李白为此事作诗《古风·蟾蜍薄太清》。

[235]中国古代位于湖北地区的云梦泽是一个著名的地理标志，但至今其主体部分已经完全变成了陆地，只剩下了少量的湖泊残迹。

[236]参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237]参见《唐才子传》卷二。

[238]参见《唐代交通图考》。

[239]《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40]参见《赠孟浩然》。

[241]王昌龄的年龄存疑，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将其出生日期定于大约公元690年。

[242]参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

[243]参见《留别王维》："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244]参见《送孟六归襄阳》："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245]参见《唐才子传》。

[246]参见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247]参见岑参《感旧赋序》。

[248]参见《别韦参军》："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249]参见《旧唐书·高适传》。

[250]参见《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

[251]参见《邯郸少年行》。

[252]后文所列举的科举名人名单，参考《登科记考补正》。

[253]参见《旧唐书·张九龄传》。

[254]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十一年》。

[255]参见《旧唐书·张九龄传》。

[256]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四年》。

[257]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十四年》。

[258]关于唐代宰相的变动，见附录《开元至大历初的宰相变动表》。

[259]参见《旧唐书·庶人瑛传》。

[260]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二十五年》。

[261]本故事见《新唐书·食货志》《旧唐书·韦坚传》。

[262]参见《旧唐书·韦坚传》。

[263]参见《旧唐书·杨慎矜传》。

[264]《旧唐书·王鉷传》等。

[265]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四年》。

[266]一作"可突干"。

[267]以上四次战争的描述参考了《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二卷第九章第三节。

[268]两碑所在地距离后来蒙古人的国都哈拉和林不远，所在的盆地也是蒙古西部最大的盆地之一。本书作者曾骑车考察该地。

[269]事见两唐书的《突厥传》，并参考了《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二卷第九章第四节。

[270]据《旧唐书·西突厥传》，亦参考了《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二卷第九章第六节。

[271]参见《旧唐书·吐蕃传》。

[272]关于唐代南诏的情况，参看唐代史书《蛮书》。

[273]参见美国东方学家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八章。

[274]现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以北、阿姆河以南，以巴尔赫为中心的地区。

[275]本段历史参考《新唐书·西域传》。

[276]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十六章。

[277]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十九章。

[278]《新唐书·兵志》："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

[279]《新唐书·兵志》："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280]参见《文献通考·兵考三》。

[281]《资治通鉴·唐纪·景云元年》："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除此以外，《新唐书·兵志》《文献通考·兵考》《唐会要》《通典·职官》均以贺拔延嗣为节度使第一人。

[282]《新唐书·兵志》："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283]《通典》："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给衣则五百二十万，别支则二百一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于此）"。

[284]玄宗时期的大同军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由大武军改名而来，最初是防御史，到了中唐才改为节度使。大同军治所在朔州（马邑），中唐以后治云州（现山西大同市）。

[285]参见《旧唐书·地理志》《文献通考·职官考》。

[286]这段经历参见李白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287]参见《新唐书·李白传》《唐才子传》。

[288]参见《唐才子传》。

[289]参见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序。

[290]《壮游》有"忤下考功第"一句。由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负责考试的职责转移到了礼部侍郎，而开元二十三年是最后一年由吏部考功郎负责组织考试，辅以杜甫游吴越的证据，可判断杜甫参加考试当为开元二十三年。

[291]两唐书的《杜甫传》都提及杜甫的性格问题。

[292]《唐才子传》与两唐书二人本传都提及此事。

[293]《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

[294]参见《唐才子传》。

[295]参见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

[296]参见王昌龄《巴陵别李十二》。

[297]《旧唐书·玄宗纪》载为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大赦。

[298]参见岑参《送王大昌龄赴江宁》。

[299]参见《新唐书·选举志》。

[300]《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301]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和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要求各地张挂老子像。参见《资治通鉴·唐纪》相关年份记载。

[302]参见《旧唐书·玄宗纪》。

[303]参见《旧唐书·李白传》。

[304]贺知章引荐李白事参见《新唐书·李白传》。

[305]参见《旧唐书·贺知章传》。

[306]贺知章留下诗歌（含断句）二十首，最著名的是《咏柳》和《回乡偶书》。见《全唐诗》卷一一二。

[307]贺监离开时，李白也奉旨写诗相赠，见《送贺监归四明应制》《送贺宾客归越》。

[308]参见《唐才子传》。

[309]参见唐代孟棨撰《本事诗》。

[310]参见《旧唐书》。

[311]参见《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312]《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313]参见《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

[314]参见杜甫《饮中八仙歌》。

[315]李白曾写有《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

[316]杜甫《奉寄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颇多。"

[317]杜甫《昔游》："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

[318]杜甫《遣怀》："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31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六年》。

[320]参见《旧唐书·杨国忠传》。

[321]根据《旧唐书》，事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二月。

[322]主要依据《新唐书》，太真父亲的官职依据《旧唐书》。

[323]参见《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等。

[324]参见《旧唐书·杨国忠传》。

[325]参见《旧唐书·李林甫传》。

[326]关于边将的变化，读者亦可参考本书附录中的《安史之乱前的十节度使情况表》和《安史之乱前的北方边境节度使任职表》。

[327]郭虔瓘先后任职于安西、北庭和河西，郭知运主要任职于陇右。

[328]王君㚟主要任职于河西与陇右，他的敌人主要是吐蕃人，以及正在衰落的突厥（包括回纥）人。

[329]参见《旧唐书·张守珪传》。

[330]张守珪此时的记载不多，其中一次出击可见《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十七年》。

[331]关于可突于的事迹，可以参考《旧唐书·突厥传》。

[332]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上。

[333]抓“舌头”是指从敌人占领区抓获活的敌人，用以获取信息。

[334]见后文的安禄山与张九龄故事。

[335]这件事同样与张九龄有纠葛，见下文。

[336]参见《旧唐书·王忠嗣传》。

[337]《旧唐书·王忠嗣传》：（忠嗣）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338]由于两唐书没有立传，盖嘉运被罢免之后的事迹也就无从得知了。

[339]以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和二年（公元743年）的战役最为著名。

[340]根据《旧唐书·哥舒翰传》。

[341]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八年》。《旧唐书》未提前几路兵马。

[342]关于石堡城之战的传闻很多，为了迎合大胜的形象，后人习惯称吐蕃同样损失巨大。《旧唐书》并未提及吐蕃的损失，《资治通鉴》的记录可能更加可靠，指出这场战争更大程度上是得不偿失。本书的数字取自《资治通鉴》。

[343]这场战役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八年》。

[344]《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345]两人之间的矛盾，《旧唐书》中有详细的描写。

[346]《旧唐书·高仙芝传》写得精彩异常，特别是高仙芝与夫蒙灵察的关系。

[347]参见《旧唐书·封常清传》。

[348]参见《旧唐书·高适传》。

[349]参见《初至封丘作》。

[350]《封丘作》："州县才难适，云山道欲穷。"《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351]高适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岑参有《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杜甫、储光羲分别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杜甫诗有注："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

[352]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年》。

[353]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

[354]例如《乐游原歌》："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355]右卫率府，又称太子右卫率府，是执掌东宫兵仗仪卫的机构。其下的胄曹负责武器装备，胄曹参军可能是一个掌管武器装备（或兼有管理储备职责）的官职。

[356]参见《李云南征蛮诗》。

[357]参见《旧唐书·张镐传》。

[358]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59]《安禄山事迹》中所引《安禄山墓志》则称安禄山祖父为安逸偃。

[360]根据《安禄山事迹》，关于张守珪与安禄山相遇之节，见本章第二节。

[361]发生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根据《安禄山事迹》："中书令张九龄见之，谓侍中裴光庭曰：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362]参见《旧唐书·张九龄传》。

[363]安禄山的职务还包括：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

[364]详情可参考《安禄山事迹》。

[365]参见《安禄山事迹》："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

[366]参见《安禄山事迹》："九日，加禄山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与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庄宅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闲厩、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群牧都使，度支、营田等使……二十六日，又加兼知总监事。"

下部 崩塌

第六章 战争的开局

唐代的军事地理

在叙述安禄山的军事战略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双方进行战争的战场情况[1]。

任何人拿起中国地图，首先都会被一片巨大的平原地区所吸引，这片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开始，向南涵盖了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苏北部等地区。再往南，虽然有一些小山的阻隔，但由于这些小山并非天堑，有一些孔道贯通，一旦过了这些小山，就到达了长江中下游平原、湖北和湖南组成的两湖盆地、江西的赣江谷地。这片区域是如此辽阔，成了古代世界最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在美洲发现之前，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区能和这片平原媲美。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在古代世界一直跻身于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富裕的国家之列。

在唐代之前的秦汉时期，这片巨大平地的北方区域（包括今北京、河北南部、山东、河南、江苏北部），以及湖北所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都已经很发达了，而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湘江和赣江谷地）依

然处于发展之中。到了唐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已经足以和北方媲美，构成了更加广阔的经济地理范畴。这片巨大的区域也是唐帝国的经济重心，离开了它，唐朝就失去了生命力。

然而，这片区域却有着极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虽然它经济发达，是帝国的农业中心，但由于它过于平坦，在军事上的价值却小得多。虽然地域广大，北方的骑兵却可以只用数天时间就从平原北部直达南部。而对于南方的防守方来说，要想在平原上抵挡敌人的机动部队，是非常困难的。

在军事史上，这样的地方有个名字，叫作“四战之地”，指的是四面平坦却缺乏战略防守点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容易成为各个野心家争夺的对象，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体系。[2]

唐朝灭亡之后，下一个统一王朝宋朝，正是将国都选在了这片平原之上，使得皇帝无法对北方的入侵做出有效的防御，最后金军南下，用闪电战攻克了宋朝国都，造成了北宋的灭亡。这恰好证明这片区域本身是不可防守的。[3]

然而幸运的是，这片区域却有一个附属性的地带做补充，就是在华北平原的西侧，巍巍太行山西面的一片高地，即现在山西省的所在。山西省是由一片山区中形成的几个小盆地组成的，每一个盆地都形成了一定的防御体系，使得山西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域。也就是说，和华北平原比起来，山西是一个农业不发达的地带，却由于它的地势，反而成了华北平原的屏障，因而要想保卫华北平原，必须首先占据山西形成防御。山西和华北是一体的，山西提供安全屏障，华北提供生存资料。[4]

从东汉光武帝以来，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山西的重要性，光武帝正是同时拥有了华北和山西，并由此获得了天下，而唐朝的开国者们也是从山西的太原（后来的唐朝北都）出发，进攻长安，从而获得天下的。

与华北、山西、两湖、长江中下游组成的东部区域相比，在西部还

有两个地区也非常发达，一片是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另一片则是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域关中平原（位于今陕西，也是唐朝国都长安的所在）。

关中平原在秦汉时期的重要性堪比华北。这主要是因为它开发早，更是因为它在军事上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关中平原除了出产粮食的平原部分之外，四周是一圈的高山，因此它也可以叫关中盆地。在它的南面是巍峨的秦岭，秦岭一直延伸到东面的华山和崤山，与黄河共同构成了东面的防御系统。关中平原的西面则是另一条著名的山脉陇山[5]，而在北面是不算高大的北山山系，加上北方黄土台地的干旱地区，形成了军事上的保护。

对应着这些山脉，关中平原一共有四个重要的关塞，分别是东面的函谷关（到了唐代则改在潼关）、东南面的武关、西南面的大散关以及西北方的萧关，这关中四塞成了保卫关中地区的关键。只要守好了这四个关口，关中平原就成了易守难攻的堡垒。[6]

秦朝和西汉都是依靠关中平原的战略地位，加上富庶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的小盆地），从而获得了逐鹿天下的优势的。

四川盆地在秦汉时期与中原的联系也很特殊，最初（秦代之前）它没有直接沟通中原的道路，首先要经过蜀道和汉中盆地，到达关中平原，然后才能从关中转向中原。至于从四川直接经过长江进入湖北的道路，则开通得比较晚，直到东汉时期还不是主流。然而到了唐代，四川已经不再是一个死角，人们更加习惯从四川经过长江和三峡进入湖北，而不仅仅是与关中相接了。[7]

在安史之乱开始时，人们要想从四川向关中运输货物，大都选择从四川顺江而下，先到扬州，再经过运河前往黄河，最后溯河而上，经过渭水到达长安。这等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绕了一个巨大的圈，但由于借助

了水力，反而比经过蜀道（汉中盆地、翻越秦岭的陆路）更加容易。只有在运送轻货或者人行路时才选择蜀道。

在唐代的战略交通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在扬州与长江相接，北上后经过淮河，再继续北上，与黄河相连。在唐代，江南的物产已经超过了北方，江南的粮食要经过扬州进入运河，再经过黄河的转运，才能到达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因此，江苏、河南等河淮之间的地区，就成了重要的战略地点，一旦被叛军攻克，就意味着无法从江南经过运河运送粮草到关中平原了。[8]可以说，这些地区起到的是枢纽性作用，将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与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连接了起来。

了解了军事地理之后，我们才能对安禄山的战略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

安禄山之谋

在反叛之前，安禄山已经被皇帝授予了三个地方的节度使，也由此占据了卢龙、范阳和河东三地，具体说来包括三部分：一是现在北京附近（范阳），二是现在北京以西的辽东地区（卢龙），三是现在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河东北部，当时的云州[9]）。

此外，在河北地区，安禄山还是河北采访处置使，有一定的监察权，也拥有着较强的控制力。但与节度使掌握了一切军政大权不同，采访处置使的权力要小得多，河北道所辖的二十五个州仍然由各州的民政长官控制，安禄山只有监察权。

但由于河北就在安禄山所控范阳的南面，只有通过河北，才能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与长安组成的轴心区域，因此河北就成了安禄山首先要控制的区域。

另外，与安禄山势力范围接壤的地区中，山西太原依然在唐军手中，从山西向西，黄河以西的河套地区，则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10]的控制区。前文已经提到，河北平原是一片四战之地，如果要想占据战略主动权，就必须同时占据太行山后的山西地区。唐朝由于掌握了山西与河套，无意之间就占有了战略地理上的优势。只要守住山西太原及其南面的附属地区，就把控了华北的屋脊，将叛军压缩在平原地带。

综合上述形势，安禄山制定的军事计划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战略才能。他的计划可以分成几方面：第一，保住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他对于“保护自己后勤”和“破坏敌人后勤”这两方面的强调，尤其显示出一个军事家的智慧。针对上述四个目标，具体的计划是：

第一，安禄山的大本营主要是云州、幽州、辽东一带，三地又以幽州最为重要。而对幽州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唐军在太原的基地。从太原到幽州，中间只隔着一座太行山。为此，安禄山一方面在太行山主要通道井陉布设了军队，防止驻扎太原的唐军从这里过境；另一方面派遣云州的军队进攻太原，期待攻克这座城市，彻底保证侧翼的安全。

第二，安禄山的基地是幽州，因此他要进攻的第一目标是距离较近的东都洛阳。从幽州到洛阳最重要的通道是隋炀帝开通的北运河永济渠，为了保证这条运河的安全，安禄山在运河沿线设下了重兵进行防守。

第三，在唐代，国都长安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唐代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淮一带，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虽然在秦汉时期是巨大的粮仓，可到了唐代，关中的粮食产量已经无法满足国都庞大的人口需求，只能依靠从江淮地区转运粮食来维持。从江淮转运粮

食到国都，主要通道是从淮河到黄河的通济渠（即大运河），一旦通济渠被截断，长安的粮食就会立刻陷入紧张。

此外，从长江到长安还有一条次要的运输通道，这条通道利用长江将物资转运到武汉地区，从武汉转入汉江，经过襄阳地区，最后到达陕西汉中，再从汉中走陆路，翻越秦岭，到达长安。次要道路需要经过陈仓道或者褒斜道，二者都是古代重要的通道，却并不好走，所以只是作为应急道路使用。

安禄山为了掐断国都长安的粮食供应，在进入河北地区后，就派人去攻占江淮，以切断大运河组成的主要通道，同时又向襄阳进军，以封锁次要道路。如果这两条通道被封锁，时间一久，长安也就不战而溃了。

第四，当军队到达黄河后，打闪击战，尽快攻克洛阳和长安。[11]

这就是安禄山的进攻方略。接下来就要看实施的情况了。

大燕皇帝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甲子），安禄山率领所辖士兵，加上他所联络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胡族军队，加起来一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在范阳宣布反叛。为了掩人耳目，他宣称是皇帝派了一位叫作胡逸的官员前来，带来密旨，要求他调兵去长安勤王，铲除杨国忠。[12]为了巩固他所辖的三个节度使辖区，他派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卫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卫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卫云州。这些将军率领人马连夜离开。

到了天亮，安禄山把剩余的军队集合起来，在蓟城举行了誓师仪式，以讨伐杨国忠的名义宣布进军。为了防止出现不同的意见，他下达了严格的军令，违令者斩及三族。

誓师之后，安禄山的主力军队向南进发，经过现在的河北地区，向洛阳前进。大军所过之处，烟尘千里，大地震动。唐朝自从建国统一之后，除了宫廷内乱之外，一般的战争都是对外战争，只有武后时期发生过一些针对武后、旨在恢复李唐王室的小型冲突。[13]整体上，国境内的人们已经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光，早就忘记了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了。安禄山大军所过之处，大部分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河北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安禄山作为河北道采访使对河北所有的州县都有着监察权，从这个角度，河北的州县不应该过度反抗。但人们又知道这是一次典型的叛乱，从忠于皇室的角度来看，不应该听从安禄山的调遣。

在最初的震惊中，大部分的州县都没有形成抵抗意识，而是望风瓦解了。各个州县的长官要么开门迎接叛军，要么逃走。那些既不想投降又不想抵抗的，一旦跑得晚了被叛军抓住，就会被砍头，以震慑其他的地区。进军中，安禄山为了激励士气，采取了不宽容的原则，对于敢于持异议的人往往直接杀掉，这也对河北的守臣们形成了压力。

除了河北之外，安禄山也意识到了山西的重要性，他早已派遣了将军何千年、高邈，率领人马前往太行山后，希望能够智取山西重镇太原。太原是唐王朝的北都，也是唐朝起家的地方，当初唐高祖就是率领着他的儿子们从太原出发，沿着汾河谷地进入陕西，从而取得天下的。安禄山一旦获取了太原，就可以复制唐高祖的路线，从山西直接打击陕西地区。

为了不惊动太原唐军，何千年等人带着二十个奚族的骑兵，以献俘的名义前往太原。初十，也就是叛乱的第二天，他们出现在太原城下，太原城的北都副留守杨光翙出城迎接他们。但不知为什么，很可能是杨光翙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何千年等人没能进太原城，只将杨光翙劫持，就离开了太原。安禄山控制太原的企图暂时没有得逞，反而将叛乱的企图过早地暴露了。

太原发现安禄山叛乱后，立刻将消息向都城长安传递。另外，黄河以外的东受降城也得到了消息，将情报快速送到了长安。

此时的皇帝正在长安城外的华清宫[14]，收到消息之后，依然不肯相信安禄山已经造反了。直到十五日，叛乱的消息不断地传来，皇帝终于不得不信了。杨国忠由于之前就屡次提醒皇帝说安禄山要造反，现在被证实了，显得扬扬自得。但是他也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低估了安禄山的实力。他认为安禄山造反并不是坏事，反而证实了他之前的观点，而且士兵们一定不想造反，安禄山要么吃败仗，要么被自己人杀掉，叛乱很快就会结束。

但不管怎样，皇帝终于开始做准备了。由于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派了特进毕思琛和金吾将军程千里两个人分别前往洛阳和太原，各自招募数万人进行防御。

到了十六日，皇帝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讨逆人选。这人就是安西节度使封常清。[15]封常清长期担任高仙芝的副手，以思虑缜密闻名。他当时正在长安，皇帝在华清宫接见了他，向他询问讨伐安禄山的方法。封常清献策表示，只要皇帝同意，他立刻前往东都洛阳募兵，然后从洛阳出发，向东进军，守住黄河一线，将叛军阻挡在黄河以北。叛军如果被压缩在河北地区的平原地带，就不难讨伐。

封常清对于黄河以及黄河的重要渡口河阳的把握是具有军事大局观的，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赞赏。第二天，皇帝就命封常清取代安禄山，担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封常清骑马前往东都洛阳募兵，很快他就招募到了六万兵马，来到洛阳以北的河阳，将河阳浮桥斩断，开始为防御做准备。

在历史上，要想从北方渡过黄河进攻洛阳，胜负手往往在河阳。所谓河阳，其实不是一座城，而是三座城。这里的黄河中间有一个小岛，小岛与黄河南北两岸都有浮桥相连，在南岸、北岸和小岛上各有一个城

池，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御系统。北方的进攻者来到黄河边，往往过不了河阳桥。可是，一旦他们过了河阳桥，守军要想守住洛阳，就非常困难了。[16]封常清事先断掉了河阳桥，也就断掉了叛军最可能过河的地点，之后，他就可以率军向东，在更加开阔的地方做防御了。

十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行进到了博陵（现河北定州）以南。他任命曾经的上司张守珪的儿子张献诚为博陵太守。在这里，何千年给他带来了礼物——北都副留守杨光翔。安禄山恰好需要立威，他历数了杨光翔与杨国忠的勾结之后将他斩首。

但就在这时，安禄山也受到了来自皇帝的重重一击。二十一日，从华清宫回到太极宫的皇帝对于安禄山的叛变依然震怒不已，他下令将安禄山留在京师的儿子安庆宗斩首，安庆宗的妻子荣义郡主也被赐死。这件事意味着皇帝与安禄山之间再也没有缓冲地带了。

这一天，皇帝还做了一系列重要的任命，他首先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调入中央，升为户部尚书，安思顺的弟弟安元贞也调入长安成为太仆寺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后天堂兄弟，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安禄山的阴谋，但安禄山的起兵却让皇帝警惕了起来，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朔方节度使一职则授予了原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郭子仪作为安思顺的下属，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大员，并将在未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17]

另一个影响了后来格局转变的事，是皇帝第一次在内地设立了节度使。原来的节度使都位于边关地区，是为了对外作战而设立的。这一次，皇帝看到河南地区恰好位于安禄山的进攻路线上，如果要防范安禄山，有必要在河南设立节度使，于是他将位于前线的陈留等十三个郡整合起来，设立了河南节度使，让卫尉张介然担任了首任河南节度使。此外，在一些郡中，如果恰好位于安禄山的进攻路线上，还设立了防御使。

在内地设立节度使在当时来看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也可能是最有效防御的手段，但之后分析，安禄山的叛乱并不必然导致之后的藩镇割据。事实上，在击败安禄山后，唐王朝依然有可能重建中央集权。但不幸的是，在内地设立节度使的政策将这个希望击得粉碎，唐王朝的盛世也因此而彻底终结。

二十二日，皇帝依然不放心帝国的防御系统，又任命了荣王李琬为元帅。同时，他又把西北地区的另一位高级将领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任命为副元帅。皇帝从自己的内府出钱，在京师从市井子弟中临时招募了十一万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号称天武军。

但这十一万人并没有全部出征。到了十二月初一[18]，高仙芝率领五万人向东出发时，这支军队是由天武军、飞骑、彍骑以及一部分西北边兵共同组成的。此刻的皇帝疑虑重重，他甚至连高仙芝都不放心，又派出了一位心腹宦官边令诚担任监军使。这支军队出发后，屯驻在陕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19]。

到这时，唐王朝的军队部署已经有了层次感。帝国的防御系统中，对敌的第一线设在了太原和山西（守将王承业、程千里等人）以及河阳到虎牢关一带的黄河南岸（封常清）。玄宗还将河南变成了节度使辖区（张介然），与封常清共同保卫东都洛阳。在东都以西，则是高仙芝率领的大军，在陕郡守卫，防止敌人通过河南与陕西之间的隘道，保卫长安的安全。

中央军队部署完毕，那么安禄山此刻的兵力又怎么样呢？

安禄山的策略是：首先，拿下河北。他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就负责监察河北道，与河北之间有一定的领导关系。其次，防止山西的唐军越过太行山打击河北地区。山西太原通往河北的通道主要在井陉，因此必须对井陉进行严密的防守。同时，对于山西不能只采取防御态势，还应该进攻，安禄山选择了从北方的云州向南方的太原进攻。进

行这几项计划的同时，安禄山的主力军队则继续南下，向两京推进。

此外，还需要说明一点，安禄山的主要进攻路线在河北地区，也就是黄河以北。如今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地带，就是当时的黄河所在。安禄山的目标是控制黄河北面、西面的所有地区，因为这里处于进攻路线上，也是隋代运河的所在地。但他暂时没有考虑获取黄河以东的山东地区（齐地），因为那里的战略地位并没有河北那么重要。他只求守住河北，保证河北免遭来自山东的唐军的袭击。

这样，整体形势就变成：叛军要拿下河北，同时在与山东接壤的黄河上采取守势，防止山东唐军对河北的袭击；叛军还要在太行山和井陉采取守势，防止唐军从山西进攻河北。至于叛军想打击山西，大都是从北方的云州发起进攻，而不是走河北。获得河北后，叛军继续向南推进，在河北与河南交界处的黄河上寻找渡河口，渡过黄河之后就可以迅速向东都洛阳进军。

对于河北，果然比较容易解决，早在安禄山到达博陵时，常山（现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就派长史袁履谦去迎接他，表示效忠。常山所在地，就在井陉口的东面，安禄山获得了常山，就可以防止唐军从太原方向进入河北。安禄山让颜杲卿继续留守常山，同时派遣将军李钦凑率领数千兵马前往井陉口。大多数河北郡县都采取了观望或者投靠安禄山的政策，这就让他放心地通过了河北，前往河北与河南之间的黄河地带。

要想前往黄河以南的洛阳，最便捷的渡河地点是洛阳以北的河阳，然而封常清早已经将河阳的浮桥烧掉了，这条路不通。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来到了灵昌郡（现河南安阳市滑县东）以北的黄河边，准备在这里渡黄河。[20]由于没有桥，渡河不易。但这时恰好是冬天，虽然河面还没有结冰，但安禄山却制造了一座冰桥。他的做法是找一些残破的小船，用绳子把小船连起来，横跨黄河，再在船和船之间塞上草木，形成了一道由草木和小船组成的漂浮的链子。第二天，围绕着链子的水都结了冰，就形成了一条冰做的浮桥，他的士兵就顺着这座冰桥渡过了黄

河。

过河后，叛军很快攻克了灵昌郡。安禄山的军队铺天盖地，又缺乏纪律约束，看上去如同成群的野兽肆虐着城乡。人们既不知道叛军的数量，也惊于他们的残忍，往往望风而逃。

接下来他们遇到的，就是新设立的河南节度使的治所陈留了。此时，首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刚来到这里不过几天时间，他想组织军队抵抗，但陈留的唐军早已经吓破了胆，不愿意抵抗。到了初五，陈留太守郭纳不顾张介然的命令，率众开城投降。投降的人有近万人之多，这些人以为只要投降就可以活命，不幸的是，也正是在这里，安禄山得到了儿子安庆宗的死讯，他大哭一场，决定将所有的投降将士都杀掉。近万人在街道两侧排开，被一一斩首，皇帝刚刚任命的第一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也被斩于军门。

陈留的失守，让皇帝的第一道防线崩溃了。

安禄山获得陈留之后，第二个目标是荥阳郡和旁边的虎牢关。在中国历史上，荥阳曾经是一座颇具战略意义的城市，它在黄河以南，距离黄河不远，同时又是豫东平原和豫西山地的分界点。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正是把握住了荥阳，才让项羽无法将他赶回到陕西关中地区，荥阳也如一把刀子，搅乱了项羽在东部的布局。从荥阳向西北面的黄河进发，在黄河边已经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地地貌，在一片台地上睥睨着黄河的，就是著名的虎牢关。唐初，秦王李世民就在这里将窦建德的部队击败，因此虎牢和荥阳就成了保卫关中和洛阳的又一道屏障。[21]

不过，唐玄宗时期的荥阳郡却要比传统的荥阳城大很多，它不仅包括了荥阳城，还包括了东面的郑州。天宝年间，唐玄宗对全国的地名做了一次全面的修改，将原来的州都改成了郡，而原本的郑州就改成了荥阳郡，所以这里的荥阳实际上指的是郑州城。[22]

大约在初七，安禄山的军队到达了荥阳郡，对唐朝不利的是，此时

的荥阳郡守军也被吓破了胆，许多士兵被外面的鼓声吓坏了，从城墙上掉了下来。到了第二天，士兵们早早开城投降，安禄山杀掉了荥阳太守崔无波，乘着势头派遣将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向封常清所在的虎牢关进发[23]。

从实力上说，在虎牢关对峙的两军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西北领军时，封常清所率领的士兵大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这些老兵是在与蛮族的较量中培养的战斗技能。但在此时，他并没有办法把西北士兵带来，只能就地招募新兵。这些新兵都没有战斗经验，甚至连训练的机会都很少。封常清接受任职只有短短的二十天，他要从长安赶到洛阳招募兵马，前往虎牢关做好守卫，还要训练士兵，时间显然是不够的。

此时，安禄山的军队却是身经百战，又恰好处于士气的高峰。唐朝的士兵们遭遇采取闪击战的安禄山军队，立刻陷入了绝境之中。刚刚一接触，安禄山就派出铁骑对唐军进行冲击，唐军立刻大败。

封常清丧失了虎牢，向洛阳方向逃去，一路上他收集残兵，在一个叫作葵园的地方做了二次防御，随后再次被叛军击败。溃军背后紧跟着追兵，一路上兵荒马乱，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时，他们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

到达洛阳城外，封常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洛阳城向东的方向有三个城门，封常清将他的残兵集结在东北方向的上东门外，与敌军对峙。但这一次又失败了。

十二日，叛军攻入洛阳城，唐朝的东都陷落了。到这时，距离安禄山离开范阳的根据地，才刚刚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叛军的士兵在洛阳城内烧杀掳掠，享受着征服了半个帝国的乐趣。他们丧失了纪律，反而给了封常清最后的机会。他在洛阳城再次搜集残军，展开了巷战。

洛阳城以洛水为界，城市分成了两部分，分别在南北两岸，中间有

数座桥沟通。其中皇帝居住的宫城位于城市的西北角，宫城以南是皇城，而在宫城和皇城的东面还有一个小城区叫作东城，东城的北面是一个叫作含嘉仓城的小堡垒，是洛阳的仓库所在地。

封常清在上东门外交战失利后，他的溃军进入城中向西逃窜。城内也有许多里坊，坊间都有墙，溃军一路上经过了几个里坊，来到了东城外的清化坊，这里是从洛阳到长安的驿道的起点。这个起点上有一个叫作都亭驿的地方，是千里驿站的第一站，也是人们饮酒送别的地方。[24]此刻，封常清在这里召集了溃军，再次与叛军作战，但依然失败了。

唐军再次向东逃窜，这就到了东城的东门：宣仁门。在宣仁门，屡败屡战的封常清又一次与叛军作战，还是失败了。

到这时，封常清终于认定洛阳已经守不住了，于是继续向西穿过皇城，进入洛阳城以西的西苑，再向西离开。此时已是十三日。封常清离开后，河南尹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战死。至此，洛阳之战落幕。

封常清逃离洛阳后，在河南地区，唐朝的军队还剩最后一道防线，那就是位于陕郡（现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高仙芝部队。事实上，封常清也希望与高仙芝会合后再做抵抗。高仙芝曾经是封常清的上司，两人在西北任职时，配合默契，因此两人如果能够联手并获得全权，假以时日，且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是有可能与安禄山抗衡的。

当封常清到达陕郡时，作为民事长官的陕郡太守窦廷芝已经渡过黄河，向北到河东地区（现属于山西）躲避，他的属下和人民也纷纷四处躲藏。但高仙芝的军队还在陕郡准备迎敌。

封常清见到高仙芝，向他提议说，安禄山的士气正处于高涨状态，唐军应该避开这个风头。陕郡并不是好的防守地，因为它面向河南的方向过于辽阔，而面向陕西的出口却很狭窄，这其实是对叛军有利、对唐

军不利的。唐军容易被敌人死死压在窄道上无法机动出击。一旦敌人攻克了陕郡，就可以长驱直入进入关中地区。

在唐代时，防守关中最险要的关口已经从函谷关转移到了更西的潼关。潼关是一个建在黄河南岸高地上的堡垒，堡垒本身就易守难攻，更何况它还有一个天然的附属系统，几乎是不可越过的：在堡垒的南面有一条巨大的沟壑深深地切入地下，叫作禁沟，敌人要进入陕西，要么攻克高处的潼关堡垒，要么就下到陡峭的沟底，再爬到禁沟的另一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守军只需要以少量的兵力守在禁沟的西侧，就可以消灭无数的大军。所以只要利用得当，潼关几乎是不可攻克的。[25]

但在封常清与高仙芝部队会合前，唐朝的军队竟然没有利用好潼关天堑。高仙芝驻扎在陕郡，潼关竟然没有人把守，这事实上意味着叛军只要通过压缩唐军的机动性，消灭掉陕郡的唐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关中地区了。封常清建议高仙芝放弃不易防守的陕郡，向西回到潼关，设立一条更加牢固的防线，只要唐军不犯大的错误，叛军根本无法攻克潼关，到时随着叛军士气的低落，才是收复洛阳，乃至进攻河北的时机。

高仙芝采纳了封常清的意见，于是拔营向潼关撤退。不想他的士兵也没有经过训练，不懂得如何有序撤退，加之已经丧胆，一听说要撤退，立刻你争我赶，变成了溃军。就在这时，叛军也赶到了，在他们的追赶下，唐军骑兵踩踏着步兵，步兵之间也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在将军们的努力下，唐军终于退到潼关建立了防守，叛军一时占不到便宜，就退回了陕郡。安禄山派他的大将崔乾祐屯驻在陕郡，随时准备再次进攻。这样，唐军和叛军就在潼关和陕郡一线，利用地形形成了稳定的对峙，双方暂时都无法再占对方的便宜了。

但在帝国东部地区，事情依然在麻烦之中：随着叛军的得势，东部更多的地方开始投降安禄山。其中包括位于中原的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以及位于北方的云州周边地区。

在西进的同时，安禄山还不忘向河南的东方进攻，试图将战线延伸到淮河地区，打通前往扬州和长江流域的道路。安禄山认为，如果占据了扬州，就等于彻底破坏了唐朝的粮仓，也等于获得了无限的供给。于是，他派了千余骑兵向睢阳[26]方向进攻。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此刻的他依然处于上升期，而捉襟见肘的唐王朝看上去已经日薄西山了。

然而，也就是在这时，唐朝中央的转机突然到来了……

河北的抵抗

早在大约上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安禄山离开博陵，率军前往藁城（现河北石家庄藁城区）时，守卫常山的太守是一位叫作颜杲卿的人。颜杲卿曾经是安禄山的手下，在河北任常山太守，常山也属于安禄山的监察区域。[27]此人有些特殊，他有个从弟叫颜真卿，恰好是东面的平原太守。与颜杲卿不同，颜真卿是正宗科班出身的中央官员，也是当时就已经很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被派到河北地区任职，只是因为他与杨国忠不睦，才被发放到了平原（现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任太守[28]。这样，颜氏兄弟就控制了河北道的两个重要城市。

安禄山发兵时，由于与颜杲卿曾经有上下级关系，并不担心这位属下。颜真卿虽然曾经是京官，但因为其从兄的缘故，也并没有被安禄山放在心上。但事实上，兄弟两人对待安禄山却是有区别的。

在安禄山造反之前，作为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就听说了他有反心，暗地里开始做准备。他加强了城防，疏浚了护城河，完善了本地的出工体系，储备好粮食，以备万一。不过，由于颜真卿是书生，他的作为可能没有传到幽州，也可能传过去了，但没有引起安禄山的注意。

安禄山反叛之后，当他的士兵来到常山境时，颜杲卿果然如同预料一般，派人到境上迎接安禄山，毕恭毕敬地让他的大军过境。由于颜杲卿的顺从，安禄山继续让他当常山太守。常山在河北是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它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井陉口，也是去往山西太原的主要道路。为了保险，安禄山还派遣另一位将军李钦凑率领数千人前往把守。

而平原太守颜真卿最初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与常山相比，平原是河北地区主要的粮仓，是后勤的必须。但它并不在从幽州向河南进军的必经之路上，所以安禄山的大军没有立刻来到这里。

平原在黄河以北，按照安禄山的战略，他需要的是河北地区，至于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区，暂时还没有考虑，只是采取防守态势，避免唐军从山东进攻河北，破坏运河通道并截断北京与洛阳之间的通道。安禄山以为颜真卿也是自己的人，向他下达命令，要求他率领平原和旁边博平（现山东省聊城市东北）的七千名士兵把守住河津，防止唐军进攻河北。不想，颜真卿收到消息之后，首先派遣平原司兵李平走小道向长安报告，将安禄山谋反的消息汇报给了皇帝。此时皇帝已经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安禄山谋反，正在感慨河北地区的二十四个郡竟然没有一个忠义之士，收到了颜真卿的消息，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在河北地区依然有人是忠于朝廷的。[29]

事实上，在河北地区愿意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并不多。以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为例，虽然他曾经是安禄山手下，并且在安禄山大军出动后也选择了归顺，但在他和长史袁履谦前往归顺，被赐金紫官袍之后，在回去的路上，颜杲卿指着袍子问袁履谦：穿这个干什么？两人会意，只是由于机会不对，在等待机会罢了。

到了十二月，安禄山攻克洛阳，被阻挡在潼关之外时，颜真卿终于做好了勤王的准备。他招募的士兵已经达到了万余人。在内部，颜真卿涕泣着声讨叛军，士兵们一个个义愤填膺，但此刻的安禄山却不知道平原勤王的消息。攻克了洛阳之后，安禄山命令自己的党羽段子光带着李

憕、卢弈、蒋清的人头，在河北诸郡之间展示。

十七日，段子光来到了平原郡，颜真卿毫不客气地将段子光腰斩，将李、卢、蒋三人的人头和用蒲草做成的身体拼起来，装入棺中埋葬，亲自祭奠。平原郡的做法鼓舞了河北的其他郡县。在景城郡（现河北沧州境内），安禄山任命了海运使刘道玄担任太守，景城郡的郡治设在清池县，郡下辖的县中还有一个盐山县，清池尉贾载、盐山尉穆宁一起斩杀了刘道玄，得到了五十多艘船的兵器。他们带着兵器和刘道玄的人头投靠了郡长史李暐，李暐将在郡中居住的安禄山心腹严庄的宗族抓了起来，全部斩首。

此外，河间郡的司法李奂杀死了安禄山派遣的长史王怀忠。而安禄山虽然向饶阳郡派遣了新的太守，但唐朝任命的饶阳太守卢全诚却不接受新来官员的替代。这些郡县每个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他们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进行调度。

在得到消息后，安禄山派遣张献诚率领上谷、博陵、常山、赵郡、文安五郡的士兵共万人去攻打饶阳，试图加强自己的统治。

我们可以把安禄山占领的幽州与洛阳之间的地带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地区，也就是安禄山战略中必须拿下的侧翼。山西地区的东方是太行山和河北，北方是安禄山掌握的云州，南方则隔着太行、王屋山与黄河以北的走廊地带相望，并威胁着黄河以南的洛阳。第二部分是河北西部，以颜杲卿的常山为核心的区域。这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的西面就是井陉和太行山，可以防卫来自太原的袭击；同时，它还位于幽州到洛阳最近的大道上。第三部分才是颜真卿守卫的河北东部。这里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给叛军提供粮食，并防范来自山东的袭击。第四部分是黄河以南（也是以东）的山东省境内。这里隔着黄河威胁着河北的安全，同时又可以通往淮河地区，形成对河南的压力。

颜真卿联合的抵抗安禄山的力量主要是在第三部分，也就是河北东

部的力量。而与河北一河之隔的山东境内（也就是第四部分），安禄山暂时还没有考虑进攻这里，但山东境内已经出现了勤王的军队，采取了主动的态势。在大部分官员都还处于遭遇叛乱的恐慌之中时，有两个地方的太守率先行动了，一个是东平郡太守李祗，另一个是济南太守李随。其中李祗是唐朝名将信安王李祎的弟弟，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吴王，山东地区大部分的抵抗力量都团结在了他的旗帜下。[30]

除了巩固山东地区之外，两人还派出军队，分别向西和向南前进。其中李随派人渡过黄河向西，击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博平太守马冀。而更重要的则是向南的战斗。安禄山已经占据了洛阳，他的下一步战略是向长安进军，推翻唐王朝。可是，即便推翻了唐王朝，如果不占据长江、淮河一带富庶的地区，就无法稳固政权。只有将江淮流域都收入囊中，才能建立更加持久的王朝。所以虽然他还没有占据长安，但还是先分出来一部分人马，对江淮地区做出了试探。如果唐军在江淮地区守卫力量薄弱，叛军也可能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淮河以北，最重要的地区在现在的商丘、徐州一带，特别是商丘，由于与洛阳更近，更是安禄山必须解决的首要目标。在当时，商丘叫作睢阳。安禄山派遣了亲信张通儒的弟弟张通晤为睢阳太守，去占领这个战略地点。不想，此时李祗和李随已经南下，一个叫作贾贲的小官[31]率领士兵向南进攻，将张通晤杀死，暂时阻止了安禄山的试探。由于叛军当时的重心放在了西进长安上，所以没有再向东进军。

事后来看，贾贲的一击是关键性的，正是因为他最早守住了睢阳，才有了后来雍丘、睢阳战役的可歌可泣，以及淮河以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绩，让安史之乱没有骚扰到南方的经济区域。

在幽州到洛阳的四个地带中，第三和第四部分是安禄山战略目标中比较靠后的两部分。决定他生死的是第一部分的山西特别是太原，以及第二部分的河北西部（常山）。既然第三和第四部分都有忠于唐朝的官员带兵抵抗，那么第一和第二部分又怎样呢？

事实上，第一部分的山西一直掌握在唐军手中，这里本来应该是安禄山最先拿下的地区，只有拿下了太原，拥有一片高地，才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彻底保护河北与河南的安全。在中国地图上，从幽州到洛阳的平原通道呈现一个巨大的型区域，型的起点是幽州，向南经过河北地区，到达如今的郑州一带，在这里形成一个拐点，拐向西方的洛阳，并以洛阳为终点。安禄山所占据的就是这个巨大的型走廊。但是，由于太行山的存在，这个走廊区域始终面对着来自西面高处的打击，只有将山西地区拿下，才能控制太行山。这道山脉如同一连串的堡垒，能够保证河北、河南的低地的安全。

安禄山的战略里也设计了打击山西的计划，但由于洛阳和长安两个都城吸引了他的目光，作为北都的太原却被他忽略了。虽然他也派出部队去进攻太原，但兵力过少，无法达成其战略目标。

从云州进攻太原的大将是高秀岩。如果高秀岩领会了太原的重要性，一心一意攻打太原，那么安禄山的战略意图也许是可以达成的。在太原以北有一座著名的山叫作句注山，也称为雁门山，这条山脉上有一组著名的关口，构成了大同和太原之间的防卫体系。在这组关口中，最著名的是雁门关（当时又称东陉关）[32]。唐军封闭了各个关口，将高秀岩挡在了句注山以北。高秀岩见进攻不易，没有坚持向南，而是选择了向西方进攻，这就减轻了太原的压力。太原这一重镇始终没有脱离唐朝的控制。

年底时，高秀岩进攻位于单于都护府（现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土城子）的振武军[33]，振武军属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管辖，这就把郭子仪这位在当时并不算有名的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

郭子仪率军打败了高秀岩，解救了振武军。与此同时，他还乘胜追击，攻克了更加靠东的另一座原本属于高秀岩的要塞静边军（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高秀岩原本希望威胁长安的北方，不想却让唐军乘胜威胁到了他的根据地云州，不得不派出薛忠义去夺回静边军。郭子

仪则派出了另一员大将李光弼，加上右兵马使高濬和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人逆袭，再次打败了叛军，将骑兵七千人坑杀（十二月十二日）。

这几次战役削弱了安禄山北方的军队，令叛军在云中地区的侧翼（西部）暴露给了唐军，而且唐军进一步围攻云中时，还派了一支两千人的骑兵队伍向南进攻了马邑（现山西省朔州市，当时大同军治所）。马邑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不下于云州，它比云州更加靠南，距离太原更近。在马邑与太原之间的关口是东陉关。太原的守军听说唐军已经获得了马邑，立刻打开了东陉关，使得太原与长安之间打通了一条绕过洛阳的通道[34]。到这时，安禄山要想再取得太原可谓难上加难了。

太原解围事实上是安禄山落败的第一个迹象。一旦无法获得太原和山西，河北与河南之间的型低地就永远是唐军打击的方向。这之后，唐军的许多战略部署都是以太原为中心或者出发点的。郭子仪也因为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战斗获得了御史大夫的加衔。

唐军巩固了太原防卫之后，河北地区的常山和井陉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这里是从太原进攻幽州或者截断安禄山首尾联系的关键位置。一旦唐军从太原经井陉出兵，必然造成安禄山后方的混乱。

守卫常山的是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而在井陉，安禄山派遣李钦凑率领数千人把守。唐军怎样才能突破井陉呢？

颜真卿起兵后，已经将河北的东部地区截断。早在他起兵的消息传到常山之前，河北西部的颜杲卿与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万德、内丘丞张通幽等人就在谋划起兵事宜。颜杲卿的策略并不限于考虑一个郡的事，而是首先派人联系上了在太原的王承业，希望与太原联合行动。颜真卿起兵之后，派人联系颜杲卿，并与之相约从东西两方面截断安禄山的供给通道，这样也可以缓解安禄山进攻长安的步伐。

恰好在这时，安禄山派他的将军高邈去往幽州继续征兵，从常山过去之后还没有回来。颜杲卿假装高邈带来了安禄山给李钦凑赏赐的命令，请守卫井陉的李钦凑带人到常山郡接受犒赏。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钦凑带了人来，颜杲卿准备了好酒好肉，还提供了歌妓，让袁履谦、冯虔等人好好招待李钦凑等人，将他们全都灌醉了。据当时人们传说[35]，为了吸引他们来，颜杲卿给每一位头领准备了帛三百段、马一匹、金银器各一组、美人各一人，其余的士兵一共赏赐帛一万段，还有歌妓数百人，在州府南面的焦同驿通宵达旦宴饮，直至他们全醉。李钦凑从此再也无法醒来，他的头颅当晚就被砍下，其余的人都被没收了武器，一一绑好，第二天全部斩首。安禄山在井陉的人马全部被解散。这样，唐军在打通了从朔方前往太原的东陉关之后，又打通了从太原前往河北的井陉口，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正在形成。[36]

二十二日，高邈从北方返回，到达藁城时被冯虔擒获。当天，又有一个使者——安禄山的副将何千年从洛阳过来，在南境被擒获。

何千年决定将功赎罪。见到颜杲卿后，他表示，常山郡的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不具有战斗力，因此应当采取的策略是加高城墙、挖深护城河，尽量以防守为主，而不要与敌人交战。只有等从太原方向的朔方官军来了，才可以与朔方军一起进攻。进攻的方向首先要放在河北地区，之后再向北，直捣安禄山的老巢幽州。

在当时，对常山威胁最大的是围困饶阳的张献诚的部队。[37]饶阳位于常山和平原之间，是颜氏兄弟的连接部。张献诚的部队是由团练兵组成的，战斗力也不强，却又比颜氏兄弟临时募的兵要强一些。

何千年继续献策，让颜杲卿不要与张献诚硬拼，而是散布消息说李光弼已率领一万精兵出井陉了。张献诚的团练兵显然不是朔方军的对手，听了消息自然就会解围而去。颜杲卿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果然张献诚在听说李光弼到来后，就率军离开了。颜杲卿进入饶阳城，并与平原取得了联系。

到这时，唐军距离胜利更进了一步：一条经过朔方、太原、常山、平原的拦腰锁已经形成，将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和东都洛阳截为两段。颜杲卿还趁着形势有利，派人到河北各郡进行游说，威胁说唐军已经到达河北，再不归顺就是死路一条。很快，河北十七个郡都再次归属唐朝中央政府，兵力达到了二十余万，只有范阳、密云、卢龙、渔阳、汲、邺六个郡还属于安禄山。

颜杲卿还不想罢手，他想直接拿下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当时守卫范阳的是节度副使贾循，随着安禄山的失势，贾循也在观望。颜杲卿派人前往劝说他投诚，与此同时，一位叫作马燧的人也在劝说他，跟随安禄山是死路一条，投诚反而能够获得重用。贾循同意马燧的看法，但他在犹豫不决时，机会已经失去了。[38]别将牛润容知道了贾循的企图，秘密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派亲信韩朝阳回到范阳，假装有事会见，却埋伏了人。等贾循一进来，就将他勒死，又灭掉了他的家族。巩固了范阳的控制权之后，安禄山派遣将领史思明、李立节率领万人进攻博陵、常山。就这样，颜杲卿没有办法毕其功于一役，让安禄山留下了幽州的基地。

但河北的反正显然影响了叛军，在前线的安禄山原本就要进攻长安，听说后防不稳，立刻停止了前进，派人回去夺取常山。

在通往长安的潼关防线前，叛军停止了进攻，在河北地区，叛军的通道已经被截断，军队分成了两部分，分别以老巢范阳和东都洛阳为中心。安禄山原想向东进攻淮河地区，也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唐军已经打通了从北方经过山西前往河北的通道，并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频频对叛军施压，在安禄山起兵仅一个多月后，唐军就已经占了上风，看上去获胜指日可待。

但就在这时，唐军再次发生了危机……

又一次危机

在对安禄山军队的围剿中，关键的一环是位于潼关的唐朝守军。

对于高仙芝的官军来说，最正确的布置是利用潼关天险，在这里采取守势，消耗敌人的耐心，缺乏训练的唐军也不至于失手吃败仗。之后，利用朔方更强有力的职业兵，经过刚刚建立的朔方—太原—井陉通道进入河北地区，截断安禄山的退路，再进攻其范阳老巢。最后，将他夹在河南地区的平原地带，这时，失去了老巢的安禄山迟早会束手就擒的。

这样的战略看上去并不痛快，却是最有效的方法。说它不痛快，是因为缺乏在国都长安附近杀敌取胜的豪迈；说它有效，是因为首先安禄山的失误是没有控制住山西，缺乏高处优势，又因为河北地区各位将领的誓死反抗，为朝廷赢得了先手，这使得唐朝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了。

但人们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皇帝的心理需求。已经垂老的皇帝一直有着统治世界的雄心，希望打仗，打痛快仗，打歼灭战。玄宗对安禄山的造反耿耿于怀，恨不能立刻将他消灭，怎么愿意等待更慢却更有效的做法呢？

事实上，洛阳刚刚丢失，皇帝就有些坐不住了。他采取了两项措施，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两项措施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皇帝为了对抗敌人，又在内地继续设立节度使。按照传统，内地的大都督都是宗室子弟担任的，这次他又将几个宗王封在了各地。皇帝在围绕着荆州的山南地区设立了节度使辖区，将永王李璘封为山南节度使，江陵长史源洧作为他的副手。原本就存在的剑南节度使授予了颍王李璥，蜀郡长史崔圆作为副手[39]。两个王暂时都不赴任，这叫作遥领。虽然这个措施看上去无害，但荆州地区处于战争的大后方，这么早就设立节度使，事实上就已经留下了未来藩镇割据的隐患。此外，永王李璘虽然暂时不出领职衔，但当后来玄宗逃亡之后，永王李璘出现在江南，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混乱。

皇帝的另一个措施是御驾亲征。但事实上唐朝已经不再像刚建立之时那样需要皇帝和儿子们一同上阵。此时的皇帝亲征不仅对战争无益，还会让事情更加复杂——人们为了保卫皇帝的安全，打胜仗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任务。

按照正史的记载，皇帝亲征的消息吓坏了杨国忠。因为皇帝出征后，后方要由太子监国，可是太子对杨家十分不满，可能趁皇帝不在时，对杨家动手。于是，他让妹妹们说服皇帝放弃了亲征的想法。[40]但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大臣们担心皇帝出征让事态更加复杂，进行了劝阻，以便让将军们在前方更加灵活地作战。

皇帝虽然不再坚持去往前线，但是他仍然不放心前线的将士，他的做法是派出自己的心腹去做监军。与许多朝代一样，皇帝的心腹最稳定的莫过于宦官。玄宗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得到了宦官高力士的支持。高力士虽然不干政，但其他的宦官深深地参与政治之中。当高仙芝领兵迎敌时，皇帝派出了一位叫作边令诚的宦官作为监军[41]，赐予他的权力甚至大过了主将。

封常清战败丢失了东都之后，退到了高仙芝的部队中，并提议封锁潼关，让河北的唐军断了安禄山的退路，再长久计议，而且在叛军疲惫之前，尽量不要与敌人作战。高仙芝根据自己的士兵素质判断，也认为这是最稳妥的方法。

作为已经吃过败仗，最了解敌人的将军，封常清想把自己的所见所想赶快报告给皇帝，以加强戒备。不想他三次上表，皇帝都不收，他只好亲自前往长安汇报，但在路上又被拦截。人们告诉他，他已经被撤职了，应赶快回到高仙芝部队中作为白衣人士，戴罪立功。

封常清怏怏回到部队之中。他不知道的是，还有更残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到了十二月下旬，皇帝对高仙芝迟迟不战已经极其不满意了。此时宦官边令诚又浇了一把油。边令诚本来只是监军，不负责指挥，却

屡屡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都被高仙芝否决了。此时，他看到了机会，向皇帝汇报，认为封常清屡吃败仗，又宣扬敌人的强大，动摇军心，而高仙芝则被吓破了胆，不敢进军。在当时，对于安禄山的轻视依然弥散在整个朝野，随着河北军情的好转，人们普遍认为他已经挺不了多久了。

皇帝听信了宦官的说辞，大怒，下令让边令诚斩杀高仙芝和封常清。

二十一日[42]，边令诚到潼关后首先去见封常清，展示皇帝的命令。封常清写了一封遗表，恳求皇帝不要再看轻敌人，随后饮药而亡。[43]封常清死后，边令诚将他的尸体放在一边，恰好高仙芝也回来了。边令诚带了百余持刀的士兵，叫他下拜，然后宣旨。高仙芝听了皇帝的命令，还想争辩几句。边令诚除了告他临敌而退之外，还告他克扣粮饷，他认为这是诬告。在士兵们的一片喊冤声中，这位当年名震西域的大将被斩首。这两人都是在西北地区屡经战火洗礼的战将，他们虽然也有各自的性格缺陷，但他们的军事才能绝不亚于后来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但不幸的是，由于安史之乱开场之时，皇帝恰好处于一个听不进正确意见的阶段，他们就在内耗中死于非命了。

两位主将被杀，导致唐军士气低落，宦官边令诚显然无法指挥军队，只好任命将军李承光暂时代职。这件事导致唐军中人人噤口不言，不敢再提出正确的战略。

可能就在主将被杀的同一日[44]，皇帝又任命了一位新主将，与高仙芝、封常清一样，也是一位西北地区的名将，他就是正在长安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战乱之前，哥舒翰与安禄山一东一西，互相看不起，皇帝认为，只有哥舒翰出马，才能与安禄山对抗。

哥舒翰抱病在家，屡次推辞，但皇帝最后依然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一共凑了八万人，再加上高仙芝的人马，号称一共二十万，甚至有传说是二十一万八千人。[45]哥舒翰领到的命令依然是号令天下，会攻

洛阳。但考虑到哥舒翰在生病，皇帝又给他配了几个副手，其中御史中丞田良丘担任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担任判官。在士兵中，还有一批少数民族兵，由一位叫作火拔归仁的将领率领。

与皇帝的期待相反，哥舒翰的军队前往潼关，依然采取了高仙芝的做法：固守潼关，等待敌人的士气枯竭。但不幸的是，作为病人的哥舒翰并没有能力统军，他本人以严格训练和严明的军纪著称，需要长期与士兵磨合，才能形成战斗力。但给他的士兵都不是他的嫡系，也不理解他的方法。如果他的身体是好的，依然可以依靠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当他卧病不起时，只好将军权交给了副手田良丘。但田良丘同样无法掌握这支军队，指挥权只好再次分割，其中骑兵部队交给了王思礼，而步兵部队交给了李承光。骑兵和步兵主将还不和睦，又引起了新的争端，虽为兵马副元帅但是个病人的哥舒翰无力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的军队事实上比高仙芝统军时更加没有战斗力，不可能与安禄山交战，唯一的方法依然是固守潼关，靠时间解决安禄山部队的士气问题，再利用山西—河北通道将安禄山部伍斩断，造成他的物资枯竭。

因此，哥舒翰并没有受心急的皇帝的影响，而是选择了继承高仙芝的打法。他坚守了数月，到了第二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做了试探性的攻击，派遣儿子安庆绪率军进攻潼关，被哥舒翰击败。哥舒翰的严防政策正在起到作用，这对一位还在病中的名将尤为不易。

更重要的是，哥舒翰的坚固防守给山西、山东、河北战场的唐军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于是，一场绞杀与反绞杀的大战在河北地区发生了。

绞杀与反绞杀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对他来说，这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对于叛军来说，日子却并不好过。

几乎在他称帝的同时，位于山东的济南太守李随率领数万唐军南下，来到了军事重镇睢阳。从这里，他们可以从侧翼进攻洛阳，对叛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睢阳到荥阳之间是豫东的平原地区，适合骑兵驰骋，只有到了荥阳才会有山区，但荥阳已经接近洛阳的东大门了。

初二，皇帝任命李随接替死去的张介然担任河南节度使。从设计上说，河南节度使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地方大员，他的新治所在汴州（现河南省开封市），下辖陈留、睢阳、灵昌、淮阳、汝阴、谯、济阴、濮阳、淄川、琅琊、彭城、临淮、东海等十三个郡，大都位于现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交界地带。除了李随之外，皇帝还有一个重要任命：一位叫许远的人担任了新的睢阳太守兼防御使[46]。日后，许远与睢阳的名字必定刻在平定安史之乱的丰碑之上。

虽然设立了河南节度使，但前期其辖区内的部分地方实际上是掌握在安禄山手中的。比如，灵昌和济阴（现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就是这样。但随着局势的改善，几位编外人员举起了义军的大旗，起兵夺取了济阴，杀掉了安禄山在济阴的守将。

但是，叛军占据了洛阳之后，还拥有着一步先手：他们有从洛阳经过南阳、襄阳进入江汉平原和两湖盆地的可能。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沟通南北的道路一共三条，其中从关中进入四川是西路，而从睢阳经过运河到达扬州是东路，至于中路，指的就是从洛阳经过南阳—襄阳隘道直达两湖盆地的道路。[47]一旦占据了两湖地区，就截断了四川和长江下游的联系，并且拥有了另外两条进攻关中的通道：从武关进入长安[48]，或者顺着汉江进入汉中地区，再抄后路进入关中。

为了防止叛军走这条路，必须在南阳地区设防，将叛军阻挡在南阳—襄阳隘道以北。正月初十，皇帝为此设立了一个新的节度使：南阳节度使。这个节度使的驻扎地在南阳郡，首任节度使是原来的南阳太守鲁炅。鲁炅带领着从岭南、黔中地区招募的士兵，加上原来的襄阳兵共五万人驻扎在叶县以北，卡住了安禄山向南方突破的道路。

到这时，大网已经扎了起来，潼关、南阳和睢阳如同三把大锁，阻止安禄山的叛乱向唐朝其他区域扩散。此时，决定安禄山命运的依然是河北地区。在河北地区，安禄山所剩的地盘也已经不多了，此时距离唐军收网的时候也已经不远了。

但就在这时，大网却出了漏洞，而且是关键的位置：山西与河北通道上的常山。

只要得到太原的配合，颜杲卿守卫常山本来并不算难事。更何况在常山起义之后，颜杲卿就已经联系了太原，看上去胜利十拿九稳。但问题恰恰出在了唐朝诸路兵马的协调问题上。

颜杲卿杀掉了李钦凑，又俘虏了何千年和高邈，他准备把这些人送往长安，于是派遣儿子颜泉明率领数人经过太原前往长安。在颜杲卿的手下，有一位叫作张通幽的将领，他的哥哥就是安禄山的心腹张通儒。他向颜杲卿哀求说，希望一起去长安献俘，这样皇帝知道了他的情况，就不会再因为他的哥哥而夷灭他的家族。颜杲卿一心软，同意了。

不想，张通幽到了太原，立刻与太原长官王承业勾结了起来。他劝王承业另外派人去长安献俘，把颜泉明等人都留了下来。在换人的同时，他们把颜杲卿的上表也偷了出来，换了一份，在其中贬低颜杲卿，将功劳都归于张通幽和王承业。

他们刚刚完成了偷梁换柱，颜杲卿的求救信就到了。原来，在他起义八天后，叛军一方史思明的军队就赶到了城下，此时颜杲卿还没有完成守备工作，只好向太原紧急求救。

刚刚窃取了颜杲卿功劳的王承业心怀鬼胎，决定不予理睬。于是，原本指望得到太原支援的颜杲卿变成了孤军奋战。守备力量不足的他支撑了三天，到了正月初八，常山就沦陷了。这次沦陷导致数万人被杀，颜杲卿和他的副手袁履谦被俘，送往洛阳。而此时，皇帝刚刚收到王承业的报捷信和俘虏，正处于兴奋之中。他将大部分的功劳归结到王承业

的头上，封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王承业手下封官的人更是达到了上百，颜杲卿只获得了卫尉卿的职务。皇帝不知道的是，他的命令还没有到达，城池就已经在王承业的故意忽略下陷落了。

颜杲卿被送往洛阳后，安禄山斥责他，自己亲手提拔了他，却遭到了背叛。颜杲卿说，是皇帝提拔了安禄山，却遭到了背叛。安禄山大怒，将他和袁履谦两人绑在洛阳的中桥上肢解，两人死前依然骂不绝口。颜杲卿的家属死亡者一共三十多人。[49]

常山的陷落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一旦丢失了常山，也就丢失了井陉，断绝了太原与河北的联系；失去了太原的帮助，河北诸城都很难抵御叛军的进攻。

史思明等人攻克常山后，立刻开展了掠地运动，出击那些反抗的郡县。在他的强力打击下，位于河北西部的邺城、广平（邯郸）、巨鹿、赵州、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郡又都被叛军控制了。只有饶阳太守卢全诚不肯投降，依然拼死抵抗。河北东部的河间与景城试图提供救援，都被叛军击败。

到这时，形势发生了对叛军有利的变化。但是，接下来，一位将军的出现，让形势再次摆动，变得对唐军有利了，此人就是李光弼。

常山陷落的第二天（初九），皇帝做出了两个决策。第一个决策，鉴于安禄山从洛阳对长安造成的压力，他将郭子仪从北方战场调回并命其率军前往洛阳。第二个决策，他已经意识到了山西与河北联动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山西对河北地区的支援。这两个决策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员变动。首先，郭子仪正在进攻北方的云中地区，对叛军占领的云州形成压力，现在只能撤回到朔方。由于郭子仪要负责东都洛阳，皇帝便命郭子仪再推荐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朔方经过东陉关前往太原，再从太原出井陉，进攻河北。郭子仪推荐的大将就是李光弼。

李光弼长期在朔方任职，先后经历了节度使王忠嗣、安思顺和郭子

仪，此时终于也步入了唐军的高级将领之列，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他率领万名朔方兵出发了。

二月初二，皇帝又加封李光弼为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此时，李光弼已经率军过了太原，向河北地区进军。在史思明的围困下，饶阳城已经坚守了二十九天。

二月十五日，李光弼带着蕃汉军队上万人，再加上从太原补充的三千弓弩手，出了井陉，来到了常山城下。此时，距离常山陷落已经一个多月。唐军再次出现后，常山的三千名本地团练兵并不想抵抗，他们把史思明留下的胡人士兵杀死，将叛军方面的守将安思义抓住，举城投降。

虽然收复了常山，但唐军并不能小看叛军的实力。事实上，就在常山投降的第二天清晨，一支两万人的叛军精锐骑兵部队就在史思明的率领下来到了常山城。他们本来在攻打饶阳，常山叛军投降之前，早已经将唐军到来的消息送了出去，于是在饶阳的叛军骑兵支援部队仅仅花了一晚上就赶来了。这也可以看出李光弼的部队处境是多么惊险，只要对方晚投降一天，就可以与援军夹击这支唐军部队，到时胜负就难料了。

常山是拿下了，但疲惫的唐军真的能抵御人数更多、更加强壮的叛军吗？所幸的是，安思义为了活命，已经将形势都告诉了李光弼。他建议唐军暂时不要硬碰硬展开野战，要依城固守，直到对方的士气低落下去。

李光弼首先进城布置好士兵的守卫工作，在叛军到来之前做好了准备。史思明直抵城下，在城东准备攻城。李光弼首先派出步卒五千人出城与叛军作战，希望让叛军离开城门。但叛军借着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依然在不断地靠近城门。李光弼只好派五百名弓弩手登上城墙，从城上向下放箭。这一次，唐军终于找对了方法，城下的叛军无法反制弓弩手，遭受了重大伤亡，这才稍有退却。

李光弼见弓弩奏效了，继续增加弓弩手到千人规模，分成四队轮流射击，这种轮换式的射击使得间隔缩到了最短，也最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发现不能短时间攻克城池后，叛军只好选择了扎营。在常山城东，有一条叫作呼沱水（即滹沱河）的河流，叛军选择了在河北岸就地休息，李光弼则趁着叛军疲惫时派出了五千兵马，在河的南岸组成方阵。

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步兵方阵莫过于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这种方阵由长矛军组成，所有的长矛军将矛对着同一方向，由于矛的长度远大于两排之间的间隔，后排的矛可以从前排士兵的腋下穿过，在阵前形成数层密密匝匝的矛阵。这种阵形对骑兵的震慑是巨大的，骑兵即便可以拨开第一层矛头，也会直接撞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上，被刺成刺猬。

李光弼的五千人也持着长枪，形成了类似的枪城阵，将长枪都对着叛军。在枪城阵之外，又有弓弩手协助。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三重防御：第一重是在两军之间的呼沱水，第二重是枪城阵的长枪的保护，第三重是枪城阵之后的弓弩手的射击。这种阵法比拼的不仅是蛮力，更是士兵的纪律性和勇气，这也证明了李光弼的军事训练有多么严格。[50]

叛军的数轮冲击都被李光弼的部队击退了，并且伤亡很大。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希望通过人数优势打破僵局。最早到来的叛军大都是骑兵部队，而后续的步兵还没有赶到。

但这一次，又是李光弼占了先手。原来，叛军有五千名步兵从饶阳赶来，他们已经到了常山下辖的九门县南面，一昼夜行进了一百七十里路。从常山到饶阳一共有二百三十五里，也就是说，只要再走六十五里路，叛军步兵就可以与骑兵会合了。

九门县的百姓将叛军步兵到来的消息告诉了李光弼。李光弼立刻派遣步兵、骑兵各两千人，偃旗息鼓，顺着河流前行，来到了叛军休息的地方。唐军到达时，疲惫的叛军正在吃饭，仓促之间无法应战，五千人被唐军一扫而光。[51]

这次奇袭之后，史思明意识到无力在短时间内攻克常山，只好率军退回了常山下属的九门县。到这时，李光弼正式在常山站稳了阵脚。事实上，常山一共下辖九个县，除了九门和藁城之外，其余的都已经回归了唐朝。

但是，不要以为此时的唐军已经占了上风。事实上，李光弼的军队依然人数太少，除了保卫住井陉通道外，暂时还不具备占据河北的条件。他和史思明在常山城外僵持了四十多天，等待着援军和机会。虽然河北战场是与叛军鏖战的主战场，但趁这时间，我们去看一下其他几个战场唐军的进展。

首先是河南战场。前文已述，在安禄山占据了洛阳后，曾经派人沿着大运河向淮河流域前进，却被贾贲在睢阳击败。之后，皇帝任命李随为河南节度使（驻汴州），许远担任睢阳太守兼防御使。

到了二月中，皇帝又任命吴王李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三月十五日，又命他取代李随担任河南节度使，并兼任陈留太守。[52]与此同时，贾贲再次立功，为皇帝拿回了雍丘，雍丘之后成了仅次于睢阳的抵抗名城。

雍丘位于睢阳的西北方，也在运河上，夹在陈留和睢阳之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最初，雍丘的县令是一个叫作令狐潮的人，他投降了安禄山。南方的淮阳军听说后，派兵前来攻打，却被令狐潮击败了，并俘虏了上百个淮阳兵。[53]令狐潮下令将这些人绑好，要将他们砍头。就在这时，叛军的将军李庭望突然来到了雍丘，令狐潮没有时间杀人，只好先把他们捆好，去见李庭望，准备回来再行刑。不想，淮阳兵中有人挣脱了出来，帮助其他人解开了绳子。他们杀掉了守城的人，占领了城池。恰好此时贾贲率领的两千人马也在附近，淮阳兵将贾贲引入了城中。令狐潮见大势已去，抛弃了妻儿逃走了。贾贲等人将令狐潮妻儿处死，表明自己抵抗的决心。

此时在贾贲的队伍中，已经有了另一个传奇人物——张巡。张巡原本是真源县的县令，谯郡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叛军，派遣当时在谯郡的张巡去迎接叛军。张巡走到半路，经过自己的辖区真源，率领吏民在当地的名胜古迹玄元皇帝庙[54]大哭一场，宣布起兵讨贼。张巡的手下有数千人，他带了其中精兵千人来到了雍丘，与贾贲会合。[55]

二月十六日，令狐潮杀了个回马枪，带人进攻雍丘，贾贲在与叛军作战时被杀，于是守卫雍丘的主将就变成了张巡。

到了三月初二，令狐潮率领一众叛军共四万余人，再次来到雍丘。由于敌人太多，这里本来只是一个县城的规模，雍丘人民面对大军感到害怕了。张巡却认为，敌人正是由于人数太多，反而会轻视这个小小的县城。只有出其不意地打击叛军，让他们吃几个败仗，让他们感到惊怕，城市才有守住的可能。

他率领千人在城门口集合，分成数队，突然开门之后冲了出去，出其不意地打了个胜仗。

不想第二天，叛军再次来攻城，而且这一次他们吸取了前次的教训，决定利用机械化装置辅助攻城。他们带来了上百门炮[56]，将城市围住。在炮石的打击下，城墙上的楼橹和城堞被击得粉碎，眼看就无法守城了。但张巡依然不肯放弃，他命士兵用木头在城墙上建了许多的木栅，继续躲在木栅之后御敌。

叛军开始爬墙，张巡命令士兵将易燃物品沾上油脂，点着后扔下去，毁掉对方的云梯。就在叛军专心爬墙时，他还派士兵出城与敌人厮杀。到了夜间，叛军睡着之后，张巡又派人袭击对方的营地，骚扰他们，不让他们睡好。

张巡在雍丘支撑了六十多天，前后经历战斗三百多次，小小雍丘成了叛军进攻的边界，他们始终无法突破这里，向更南方进军。这也避免了将唐朝的南方地区变成战场。张巡本人带甲而食、裹疮复战，直到敌

人再次败退。

除了以睢阳和雍丘为代表的运河、淮河战线之外，安禄山还可能向南方的南襄盆地和江汉平原进军。这里交给了南阳节度使鲁炅。鲁炅在叶县北设立了防线，一直抵抗到五月初四，后来抵挡不住，撤往南阳。叛军尾随鲁炅来到了南阳。[57]

为了保住南阳，皇帝进行了一系列任命。在之前，河南节度使与南阳节度使没有隶属关系，他们各自为战。为了便于协调各路大军，皇帝将原来的河南节度使吴王李祗召回了朝廷，派遣另一位宗室虢王李巨担任河南节度使。李巨还兼任着陈留和谯郡的太守，同时还统领着南阳节度使鲁炅以及两个南方更加遥远却提供了兵源的地区的长官——岭南节度使和黔中观察处置使[58]。

这样，防止叛军向南进攻的防线就都置于李巨的指挥之下了。皇帝意图使军事调遣和资源分配更加顺畅。十五日，李巨率军向蓝田方向出发，从关中沿武关道来到了南阳，他的出现使得叛军放弃了南阳。

在南阳和睢阳之间，还有一个叫作颍川的郡（现河南许昌），也处于叛乱区以南。皇帝任命了来瑱担任太守，此人作战英勇，阻挡了叛军，被称为来嚼铁[59]。

雍丘、颍川和南阳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唐朝的南方安全，虽然是防守性质的战役，却为河北主战场上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河北东部和山东地区，唐军也有了进展。河北东部的唐军领袖是平原太守颜真卿。颜真卿起兵后没有打开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军队都是民团组织，战斗力有限，很难与安禄山的正规军相抗衡。但一位叫作李萼的清河人却看到了一次机会，劝说颜真卿借给他六千兵马，前去进攻叛军占据的魏州（现河北邯郸市魏县）。

在河北地区，山西联系河北的通道最重要的是常山所辖的井陉道，但除了这条路之外，还有一条同样很著名的道路，那就是位于邯郸以西

的壶关道。壶关道经太行山上的重要关口滏口，在唐代叫崞口，连接的是山西的上党地区（现山西长治）和河北的邯郸。在战国时期，这条道路的重要性远超过井陉道，因为赵国的国都邯郸就在滏口的东面。秦国的将军白起之所以发起长平之战，就是因为长平（现山西省高平）所在的上党地区，是通往滏口的必经之路，只有获得了长平，才能打开滏口的通道[60]。

在安禄山起兵后，上党地区在唐军守将程千里的控制之下。程千里率领数万人[61]从上党出发，沿着这条路前往河北，却被叛军阻挡在了崞口。

与此同时，在平原郡的东南方，有另一个重要的郡——清河郡。清河郡在当时是一个巨大仓库（清河仓）的所在地。由于濒临运河，这里是南面的物资向北方边境调拨的关键性仓库，里面放置了三百余万匹布、八十余万匹帛、三十余万缗钱、三十余万斛粮食，甚至还有五十余万件武器装备。在之前，由于河北地区屡次易手，清河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因为清河夹在颜真卿控制的平原郡与叛军控制的魏郡中间，如果颜真卿不能帮助清河抵御叛军，那么它早晚会倒向叛军。

按照李萼的计划，他率领军队从平原郡出发，越过清河，直接打击魏郡，一旦魏郡被攻克，清河也获得了安全，接下来就可以进攻更加靠西的邯郸等地，打开崞口，将山西的唐军放进来。

李萼的计划很成功，他们顺利地占领了魏郡。接下来，本来可以顺势打开崞口，但唐军内部发生了一些协调问题，使得军事行动推迟了。

所谓协调问题，指的是颜真卿与处于山东地区的北海太守贺兰进明[62]之间的协调。贺兰进明率领五千人马渡过黄河，来平原与颜真卿合兵。作为书生的颜真卿并没有军事经验，在与贺兰进明合作的过程中，权力逐渐被贺兰进明架空了。在上报魏州之战功劳的时候，贺兰进明也压倒了颜真卿。颜真卿的手下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奖励，士气低

下，影响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但即便这样，贺兰进明依然向西夺取了平原郡西面的信都郡，与河北西部的李光弼形成了呼应。接下来，就看李光弼能否在常山击败史思明了。

到了三月底，李光弼已经在常山与史思明对峙了四十余日，由于史思明断绝了常山的粮道，城内开始缺乏马草。李光弼迫不得已，组织了五百辆粮草车组成方阵，前往石邑（由唐军控制）取草。所有赶车的人都穿上铠甲，车旁还有上千弩手护卫，在这个车阵面前，叛军没有占到便宜。车阵缓缓而行，叛军看到无法击破车阵，又想直接进攻石邑，但被石邑的守军击退。

李光弼这一次虽然获得了粮草，却由于人少，一是无法取得更大的突破，二是等粮草用尽，第二次会不会有这么幸运就很难说了。

就在这时，救兵来了。在派遣李光弼来河北时，皇帝将郭子仪调回了朔方，原本是想让他率军进攻东都。但随后，皇帝改变了计划，命令郭子仪精选士兵，继续支援河北地区。早在三月初五，郭子仪就率军赶往代郡，为东征做准备。

到了三月底，李光弼发出了告急信，郭子仪收到后，率领军队从井陉进入河北。四月初九，援军来到了常山城外。郭李的军队加起来一共有十余万人，大大超过了史思明。双方一接触便大打出手，战场选在了九门县的南面。史思明损失惨重，只好收拾余众，向东南方逃往赵郡，而另一位将军蔡希德逃向巨鹿。史思明北逃博陵，夺取博陵后，杀掉了这里投降唐朝的官员。

但不管史思明如何努力，郭子仪的到来已经改变了河北的战略平衡。在官军到来之前，河北各地由于不堪叛军的骚扰，已经各自组成了民团组织，占据了村镇自保，最大的组织可达两万人。官军到来后，他们纷纷与官军取得联系。

史思明逃窜后，郭李的部队迅速获得了人心。十七日，他们联手攻克了赵郡。两人之后的作为也体现了治军风格的不同。李光弼治军强调军纪，由于士兵们劫掠得非常厉害，李光弼坐在城门口，将士兵的掠获物一一索回，交还给当初的主人。郭子仪则更加仁厚宽容，他把生擒的四千叛军全部都释放了，只杀了一个安禄山任命的太守。[63]

李光弼随后进攻博陵，围困十天没有攻克。于是，郭子仪和李光弼退回常山附近的恒阳解决辎重问题。在这里，史思明又拼凑了五万人前来作战。

郭子仪指挥军队固守，以骚扰为主，直到叛军疲惫才出战。五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常山东面的嘉山摆开战场，这一次，唐军斩首了四万人，俘虏了千余人，史思明在逃跑途中从马上掉下来，头盔也掉了，靴子也丢了，只能一瘸一拐拄着半截折断的枪走回了营地。他率军逃回了博陵，被李光弼围困。

至此，唐军在河北的优势已经确立，河北的十多个郡再次反正，将守城的叛将杀死，倒向了唐军。

唐军这次胜利给安禄山的震动是巨大的。首先，随着颜真卿和贺兰进明在东部、郭子仪和李光弼在西部扼住了幽州和洛阳之间的通道，安禄山的部队已经首尾脱节了。如果他再继续以长安为目标进行攻击，郭李的部队就会从后面进攻他，如果他想返回幽州，也必须首先突破河北唐军的堵截。

安禄山十分犹豫，到底是进攻长安还是返回幽州。他在西部进攻长安的路上留下的兵力只有大将崔乾祐的部队。由于兵力分散，进攻乏力，很难再突破潼关。到这时，唐军在各个战场上都争取到了主动权。

如果此时唐军能够在河北战场获得彻底的胜利（此时距离战争开始不过只有半年时间），击败安禄山，唐玄宗开辟的几十年盛世或许还可以延续下去。一方面，可以派郭子仪等更加可靠的战将控制住边疆；另

一方面，虽然皇帝已经在内地任命了一些藩镇，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大藩镇还没有形成，皇帝完全可以凭借实力撤销这些藩镇，在内地形成集权式的和平。这样，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并不会解体，边疆的豪强安禄山和手握重兵的高仙芝、封常清也都已经灰飞烟灭，这甚至可能是对唐朝有利的。

但就在这时，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一次错误的决策葬送了一切优势，使得令人们怀念的盛世再也无法回来了。

第七章 逃亡的皇帝

急转直下

唐军在所有战场上都获得彻底的优势之后，事情之所以会突然变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最初始于唐军统帅哥舒翰的性格缺陷，他是一个好的将领，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安思顺的态度上。

安思顺也是唐朝北边著名的大将，历任河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在他担任朔方节度使时，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他手下的将领。虽然他与安禄山没有血缘关系，但由于安禄山的母亲改嫁而成为后天的堂兄弟。不过，与他的堂兄弟不同，安思顺对唐朝是忠心的，甚至在安禄山造反之前，还屡屡提醒皇帝注意安禄山的反状。安禄山起兵之后，安思顺再次入朝上奏，因为他的忠心，皇帝并没有追究他和安禄山的亲属关系，只是将他留在了京师，封为户部尚书。这样做有助于增加君臣互信，而这恰好是唐代最缺乏的，也是最需要的。

但不幸的是，安思顺在任节度使时，与同是一方大员的哥舒翰关系并不好。哥舒翰之所以与安思顺有隙，更多是受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的瑜亮情结的影响。

哥舒翰担任兵马副元帅之后，想到安思顺还在朝内，怕他对自己不利，于是抢先行动，让人做了一封假的安禄山书信，在潼关将这封信截留后，送给了皇帝。哥舒翰还不忘向皇帝上奏了安思顺的“七宗罪”，并请求皇帝杀掉他。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三月初三日，安思顺和他

的弟弟安元贞被皇帝处死[64]。

哥舒翰之所以这样做，根源还是唐朝的老毛病：无法给大臣们提供安全感，不进行斗争，就可能被别人斗死。他认为自己只是先发制人罢了。但哥舒翰对安思顺的做法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就是宰相杨国忠。杨国忠第一次体会到了哥舒翰的心狠手辣，开始防范他。

同样，按照唐代的人际关系原理，既然杨国忠开始防范哥舒翰，就会有人提醒哥舒翰防范杨国忠。哥舒翰手下大将王思礼担任起了这个角色，他请求哥舒翰向皇帝上表，将整个乱局归罪于杨国忠，必须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哥舒翰沉吟着不敢答应，因为他对皇帝没有把握，也可能是因为在对付安禄山的过程中，他曾经属于杨国忠的派系。王思礼进一步提出，如果担心皇帝不答应，不如派三十个骑兵去长安把杨国忠抓来，在潼关斩首激励将士。哥舒翰依然不敢同意，因为不经过皇帝同意而谋杀宰相，就等于他也造反了。

哥舒翰虽然没有同意，但杨国忠却听到了消息。他担心哥舒翰对自己不利，劝皇帝在长安把一些小官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又招募了一万人交给一位叫作杜乾运的心腹，让他屯军在长安东面的灞上，表面上是构建第二道防线，实际上却是防范哥舒翰。

哥舒翰听说后，也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请求皇帝，既然灞上军队是第二道防线，那么这支军队的最终领导权也应该交给他统一指挥。皇帝没有理由拒绝。到了六月初一，哥舒翰请杜乾运去往潼关述职，却找借口将他杀了。

整个事件体现出的，是统军的将领（哥舒翰）没有安全感，宰相（杨国忠）没有安全感，就连皇帝也没有安全感。他们缺乏不伤害对方生命的共识，只能互相防范，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内斗之中。

在斗争中，杨国忠表现得比较弱势，但他很快就等到了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葬送了他的对手，葬送了自己和家族众多成员的性命，也

葬送了唐王朝的盛世。

在这时，由于官军在河北、河南的胜利，安禄山已经将精力转移到了后方，暂时不敢觊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有人来告诉皇帝，在洛阳以西的陕州，与潼关遥遥相对，崔乾祐的军队只剩下了不到四千人，并且都是老弱病残不能打仗，连防范措施都没有。皇帝听了大喜，催促哥舒翰赶快出击。

哥舒翰上书表示不是出击的时候。他提出了正确的看法：在潼关，首要的目标不是一两场胜利，而是坚决避免失败。只要能够守住潼关，等敌人疲惫了，唐军也集结了更多兵力，再打仗不迟。远在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上书表示，潼关不可轻动，唐军首先应该攻击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到时他在洛阳的势力自然就会崩溃。

但是，这种正确的战略却遭到了宰相杨国忠的反对。杨国忠真实的心理，是担心哥舒翰权力过大会伤害自己，但他却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表示现在恰好是敌人没有防备的时机，如果不行动就会失去机会。杨国忠的说法正好符合皇帝的意图，于是他们共同逼迫哥舒翰出击。为了逼迫哥舒翰，皇帝派出的传令宦官相望于道，绵绵不绝。

六月初四，哥舒翰不得已，大哭一场，率军上路。

六月初七，唐军在灵宝（现河南省灵宝市）西原（现焦家寨附近）遭遇了崔乾祐的部队。如果是对历史有了解的人，听到灵宝心里就会一激灵。在潼关之前，关中地区的防御系统建立在一个叫作函谷关的地方。灵宝以北有两道数十公里长的平行小山，中间的峡谷如同一个箱子，因此号称函谷关。在秦汉时期，函谷关是著名的关中四塞之一，只要守住了这里，就保证了关中东境的安全。秦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函谷关功不可没。

但到了后来，人们又发现函谷关以西的潼关是更好的防守地点，于是函谷关慢慢被放弃，退出了历史舞台。[65]但函谷关虽然被放弃了，

却并不表示这里的地形不重要。

事实上，灵宝地区一直是陕西与河南之间的重要连接部。它本来只是南面的华山与北面的黄河之间的一小条平地，而在平地上还有数条小的丘陵带，将平地割得支离破碎。但是，这种地形在军事上却非常适合于打伏击。不管是陕西来的军队，还是河南来的军队，一旦遭遇伏击都很难全身而退。

在古函谷关区域以西，有一小片地方叫作西原。如果从陕西方向过来，在还没有到达函谷关区域时，就先到达了西原。西原的地形更加特殊，这里北面是黄河，南面是一道小丘陵，中间夹着七十里的隘道。隘道的西头还比较宽阔，形成一个小平原，随后逐渐收窄；隘道的最东头，从黄河岸边又起了一小条山丘，这条山丘和南面的丘陵形成了一个喇叭口状的关口，这个关口非常狭窄，士兵们列队通过都很困难。自然，这里是设伏的最佳地点。[66]

唐军到来时，最初表现得非常谨慎。他们知道崔乾祐肯定要打伏击战，但是他们又认为，即便叛军想打伏击也很困难。这是因为唐军总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人，而崔乾祐的人数太少，即便是伏击也很难弥平这样的差距。[67]

为了发现敌情，观察岸上的情况，哥舒翰和田良丘在黄河中乘船前行。当他们发现崔乾祐的兵马之后，见叛军人数不多，连忙催促着唐军赶快发起进攻。

唐军的分配是这样的：王思礼的前军有五万精兵，而庞忠等人统率的后军有十万人。由于狭窄的地方用不了这么多人，哥舒翰还分出来三万人到黄河以北，在北面的高处鸣鼓、助阵、观察。

双方的交战发生在西原较宽阔的西部小平原上。最初，崔乾祐的军队看上去只有一万多人，还军容不整，没有阵容，懒懒散散，这让唐军窃笑不已。到了交战时，叛军立刻逃走，更让唐军轻敌。他们在不知不

觉间就来到了东面更加狭窄的区域。

就在唐军越来越放松，快到东面的喇叭口时，唐军的队伍已经密密匝匝如同蚂蚁一般挤在了狭小的空间里。崔乾祐准备的精英部队开始从丘陵的顶部向下扔木头和石头。唐军阵营立刻大乱，开始互相踩踏。由于道路狭窄，他们连枪都施展不开。

哥舒翰军队的前面还有一些战车，用马拉着，试图对叛军形成冲击。但敌人在前面堆积了稻草，乘着东风点着后，反而让唐军的马车乱了套。唐军在混乱中以为烟幕后面都是敌人，不停地射箭，射了很久，到最后却发现烟幕后面什么都没有。混乱中，唐军自相残杀又死了不少人。

那么叛军跑到哪里去了呢？

在西原南山的东侧，就已经是古函谷关所在的峡谷了，从这个峡谷向南，可以绕过西原南山，来到唐军的后面（即西面）。唐军混乱时，崔乾祐已经让叛军的精锐部队骑马绕过南山，来到唐军身后，形成了前后夹击。这最后致命的一击，让唐军终于彻底崩溃了。唐军士兵或者在山谷中逃窜，或者慌不择路掉入黄河淹死，剩下的大都溃散了。

在黄河以北的三万人一看南岸的乱象，虽然没有遭到进攻，却也溃散了。哥舒翰只好带着数百骑兵逃走。他们向西逃到了位于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的首阳山，从那儿渡过了黄河，再渡过渭河，回到了潼关。

当他们回到潼关时，唐朝的溃军也回来了。在潼关之外，作为防御体系，还有三条宽两丈、深一丈的大沟[68]可以阻止敌人过来，但溃军慌不择路时纷纷跳进去，下面的尸体很快就把沟填满了，上面的人才逃进了潼关。经过清点，二十万大军此时只剩下八千人。

叛军也跟在溃军的身后来到了，他们甚至不用担心过不了防御沟，因为那里面早就填满了死人。

初九，叛军进攻潼关，一攻而下。关中最重要的关塞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拿下了。哥舒翰想逃回长安，却被他的将军们挟持着投降了崔乾祐。将军们之所以逼迫他投降，也可能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因为按照唐朝的内斗传统，一旦回到长安，他必然只剩下死路一条[69]。

潼关失守的当天，在潼关以北的河东，以及以西的华阴、冯翊、上洛等防区的士兵闻风而溃，将通往国都的通道留给了叛军。

也是在当天，哥舒翰麾下不断来告急，皇帝频频接见，却拿不出足够的人去救援，最后只派了一小部分人去潼关。在潼关与长安之间原本也设置了平安火，大约每三十里设一个墩台，到了夜间，如果平安，就依次放火直达长安，表示一切正常。[70]

这一天，平安火没有到。士兵们纷纷逃亡，已经没有时间去点火了。这时皇帝才开始真的着急了。初十，皇帝召集宰相议事。杨国忠本身也是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刚刚造反时他就已经派人去四川打点，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他提不出救国之策，只告诉皇帝，最好去四川避难。

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上朝，官员们惊恐不安，当皇帝询问他们有什么御敌之策时，所有的人都像遭遇了课堂提问，不敢吭声，还生怕点到了自己。只有监察御史高适提议，现在应该赶快招募士兵，在长安死守。他的声音激切，听到的人都受到鼓舞，但皇帝没有采纳。[71]

安史之乱发生时，高适还在遥远的河西地区。哥舒翰被任命为兵马副元帅后，作为哥舒翰手下的高适也被征召到长安担任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这才有了他朝堂之上的表现。[72]

散朝后，皇帝朝堂之上的情况变成小道消息传遍了长安的集市，于是人们纷纷开始准备逃跑。但是到底逃到哪里去，大部分人没有目标。

杨国忠继续让自己的姊妹劝说皇帝入蜀。到了十二日再上朝时，文武百官继续参加早朝的已经十无一二了。皇帝在勤政楼下命令说即将亲征，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了。皇帝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命，

让他们在自己亲征之后负责长安的防卫。由于之前颍王李璥已经被任命为不赴任的剑南节度使，现在皇帝也发布命令让他赴任，并为自己去往四川做准备。

当天皇帝还从城中的太极宫撤到了城北的大明宫。太极宫位于城内，要想逃走必须从北面出去绕路，否则就必须经过居民区，会引起人民的恐慌。而大明宫在城外，周围就是皇帝平常游猎的禁苑，从这里逃走很难被普通人发现。

当天晚上，皇帝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好六军，多给赏赐，又从皇家马厩中选了九百多匹马，做好准备。

第二天（十三日）一早，皇帝带上了贵妃三姊妹、皇子与王妃、公主、皇孙，加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亲近的宦官、宫人，悄悄地出发。他们从大明宫出来就是禁苑，禁苑将大半个汉长安城[73]包含在内了。从禁苑的西门延秋门出去后，就来到了郊外，接着渡过渭河上的便桥，就算离开了长安界。

在离开前，关于左藏库的财富问题，皇帝与宰相还有一次讨论。左藏库所藏都是皇帝的私家财富，却无法全部带走，按照杨国忠的意见，不如一把火烧掉，免得留给叛军。但皇帝却认为，就算烧掉了左藏库，叛军还是会从长安人民手中压榨出足够的财富，还不如将左藏库留下，让人民的日子好过一点。[74]

皇帝离开得神不知鬼不觉，大部分的官员都被扔在了长安，其中不仅包括提议抗敌的高适，还包括一心要做维摩诘一样达人的王维。

到了清早，文武百官中依然有人来到宫外等待上朝，宫门外的仪仗队依然保持着一个王朝的尊严。但出乎意料的是，等宫门打开，情况突然变了。从宫门冲出的宫人四处逃窜，皇帝离开的消息也散布开来。这时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四处逃走。流氓们乘机进入宫廷之中，将各种奇珍异宝盗走，甚至有人把驴都赶来，好驮更多的东西。

皇帝好不容易忍住没有烧掉的左藏库也在一把火中烧掉了。

留守官员一面救火，一面杀人，整顿好秩序。之后京兆尹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带上长安城门的钥匙，去见安禄山，将长安城拱手让给了叛军。

皇帝的幸运在于，安禄山已经被胜利吓坏了。他没有想到崔乾祐能够用这么少的军队击垮唐军的主力。之后，他反而变得优柔寡断，首先命令崔乾祐停止进攻，等待他的大部队，之后才派人进入长安。在长安进行掠夺和巩固，这一切又消耗了他的时间，使得护卫着皇帝的那支充塞着老弱病残的队伍得以从容地离开，完成了一次唐朝版的敦刻尔克撤退。

皇帝过了渭河继续向西，派遣宦官先行通知途经的各个郡县赶快迎接皇帝。中午吃饭时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咸阳东面的望贤宫。皇帝原指望有人前来迎接，不想前面去的宦官把消息告诉县令之后，县令和百姓立刻跑得一干二净，就连传信的宦官也跟着他们跑掉了。杨国忠只好自己掏钱买了几个胡饼送给皇帝充饥。当人心稍稳时，当地人终于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些夹杂着豆子的粗饭，给皇子皇孙们充饥，这群饿惨了的公子哥儿们立刻抢了起来，一会儿就吃光了，还嫌没有吃饱。皇帝为这些粗饭都付了账。

除了人不禁折腾之外，就连皇帝的御马也受不了，得了病。皇帝见大家没有吃饱，想把马杀了吃，但他的提议没有人同意。[75]这可能和时间不够有关。

父老乡亲们望着皇帝大哭，有大胆的人开始和皇帝说起了话，甚至怀念着玄宗早期的贤相集团，并感慨现在围绕着皇帝的都是小人。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所谓贤相与小人，都只是皇帝的需要罢了。皇帝装模作样表达了悔恨之情，但是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即便在未来，也没有皇帝能够将朝政恢复到当年贤相集团的面貌了。[76]

到了晚上，皇帝一行来到了距离京城八十五里的金城县（即始平县，位于陕西咸阳西北）。这里的县令也早已经逃窜，百姓也大都逃散了。他们走时过于匆忙，家中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士兵们就拿起炊具自己做饭吃。此时，跟随皇帝的人也出现了大量的逃亡。在驿站中休息时，由于没有灯，条件也不行，只好人压着人密密麻麻睡下，不再区分贵贱老幼。也是在这时，王思礼从潼关赶了过来，将哥舒翰被擒的消息带来，皇帝这才知道在潼关到底发生了什么。

皇帝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赶快北上去招兵，等待机会。王思礼见过皇帝一面就匆匆上路了。

十四日，皇帝一行来到了马嵬坡，将士们又饥又累，怨气很大。陈玄礼担心士兵们哗变，通过宦官李辅国与太子商议，把杨国忠作为事件的元凶除掉，但太子不敢这样做，也不敢告诉皇帝。跟随皇帝逃难的还有二十多个吐蕃的使者，他们恰好拉着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着什么。士兵们中立刻流出杨国忠和吐蕃人图谋造反的传言，有人对着他射箭，但只射中了马鞍。杨国忠策马逃跑时被士兵们追到了马嵬驿的西门杀死肢解，将他的头颅挑在枪尖上。[77]御史大夫魏方进试图阻拦士兵，也被杀死。一同死去的还有杨国忠的儿子杨暄，以及他的姊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韦见素被乱兵打破了头，但被人救下。

皇帝在驿站中听到了外面的喧哗，他的左右却告诉他那是杨国忠谋反。皇帝拄着拐杖来到门外，请求军士们散去。但是士兵们害怕日后被报复，不肯离开。陈玄礼乘机告诉皇帝，除非杀掉贵妃，表明杨家彻底倒台，否则士兵们是不甘就此罢手的。

皇帝沉吟了一下，表示会亲自处理这件事。他回到驿站，拄着拐杖低头而立。身边的京兆司录韦谔（韦见素之子）见他为难，当即跪下请他当机立断。皇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表示国家的事情无关贵妃，但这一次，就连高力士也劝他这不是考虑谁有罪的时候，只是为了救自己一命。皇帝这才命令高力士把贵妃带到佛堂，将她勒死。

在正史中，贵妃在死前到底说了什么，她是顺从，还是哀求，还是大义凛然，一概没有记录下来。对于写正史的人来说，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工具，她之所以成为贵妃，是因为皇帝的需要，她的死也是皇帝的需要，一切都不需要她自己开口。

死后，她的尸体倒还是有用的，因为必须把尸体展示给将士们，士兵才会继续接受皇帝的领导。

杨国忠被定为安史之乱的罪人也是有疑问的，虽然他自身有着很深的偏见和内斗特征，但杨国忠却是较早提醒皇帝安禄山会反叛的人。至于说他作为宰相作恶太多，事实上，他更多的是充当了一个权臣的角色，权力过重却使用不当。但权力过重也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唐玄宗的政策逐渐演化的结果。可以说，皇帝创造了太多不适合的职位，其中最不适合的有两个，一个给了安禄山，另一个给了杨国忠。只要坐到了这个职位上，唐朝所不可避免的内斗和对人身的威胁，自然会酿成最糟糕的结局。

十五日，皇帝离开了马嵬坡，他的高级朝臣中只剩下了韦见素一人，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也受到了提拔，成了御史中丞充置顿使。

皇帝一直想去四川，但将士们却认为路太远，而且是杨国忠过去的地盘，有的想去河陇，有的想去灵武，还有的想去太原，甚至有的想回长安。韦谔建议不如先到扶风再做商议。

关于皇帝和士兵的争执，实际上还和一个中国军事地理秘密有关。这个秘密就是：一旦一个王朝被迫离开北方，到了南方，它几乎是不可能再回到北方的。在历史上，不管是唐代之前的东晋，还是后来的南宋、南明，只要统一的王朝被北方势力赶到南方，就彻底告别了中原，只能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存在了。[78]

南方之所以无法反攻北方，在于南方的地理太破碎，而北方的地理利于防守。南方的地理结构是一条长江串起来的几个盆地和平原，包括

四川盆地、两湖盆地、赣江谷地（现江西）、江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这几个地理单元过于支离破碎，每一个都很难与北方抗衡，它们之间的联络又不容易，无法产生协同性。[79]

而北方的地理却非常简洁，有着巨大的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又有着山西高地的保护，并附带着地理结构完整的关中地区。一旦北方政权将华北、山西、陕西同时占据，即便南方政权能够进行北伐，甚至能够拿下华北，北方军队依然可以通过山西高地打击华北地区，让他们无法久守。[80]

玄宗皇帝放弃北方逃到四川，就可能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旦安禄山获得了华北和陕西，就很容易扫荡山西地区，从而掌控整个北方，到时就拥有了军事地理上的优势。即便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也只能作为南方的一个小朝廷而活着。

很可能皇帝再也回不到关中，这里的父老也就永久性地脱离了唐朝的庇佑了。

但是，玄宗皇帝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逃亡南方呢？这主要是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随着关中和华北失守，北方留给唐朝的只剩下山西以及西北的一些边角地带，皇帝在北方比在南方要危险得多。而四川虽然无法反攻北方，却是建立小朝廷的安稳之地。考虑到皇帝年纪已经大了，只要防守得当，四川撑上二三十年，皇帝就可以平平安安死在那儿了。

人们可以谴责玄宗皇帝的自私，却无法强迫他留下。但另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却要比玄宗皇帝大得多，那就是他的太子。按照正常情况，太子可以比玄宗多活很多年，如果去往南方地区，一旦玄宗去世，那么留给太子的必然是一个烂摊子，很可能撑不到太子也死去的时候，到时太子将作为一个亡国之君被记录在历史之中。只有看到了这一层，才会理解百姓苦苦哀求皇帝留在北方的意义，以及后来玄宗、太子的各自选择。

当皇帝向扶风逃走时，数千名父老乡亲的苦苦挽留，皇帝不胜其烦，只好留下太子抚慰百姓，自己先行离去，到前面等太子。不想等了很久也不见太子来，后来他的孙子广平王李俶到了，带来了口信，皇帝才知道太子决定不跟他走了，而是选择北上。他感慨万千，给太子留了两千兵马，自己离开。

按照史书[81]，劝说太子留下的是父老乡亲、宦官李辅国、太子的三儿子建宁王李倓等人，但很可能太子本人就不愿意跟随父亲入蜀。不管怎样，父子二人从此分开，也意味着玄宗皇帝从此脱离了政治的中心，太子担起了拯救国家的重任。我们先将玄宗的行程简单带过，再转回到太子的抵抗上来。

皇帝十七日到达岐山，十八日抵达扶风，十九日宿陈仓，二十日到达了散关道的起点大散关。二十四日，皇帝到达河池郡，也就是凤州。七月十二日，皇帝到达普安（剑州）。十八日，皇帝到达巴西（现四川绵阳）；二十八日，经过了几十天舟车劳顿的皇帝终于抵达成都，跟随他的官员和士兵只有一千三百人。等他到达成都时，太子已经掌握了权力，在北方领导着抵抗运动，玄宗皇帝和他代表的那个盛世都已成了人们的回忆。

太子的行踪

六月十五日，太子李亨离开了父亲，决定留在北方抵抗安禄山。但由于整个关中盆地的核心区已经陷落，唐朝在平原地方没有立足点，到底哪里才能成为更加稳固的统治中心呢？

他的儿子建宁王李倓提议说，可以选择的地方满打满算也只有两个。在陕西北边，黄河将北方区域分成了两块：一块是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河西和陇右两个节度使辖区；另一块在黄河以东的河套地区，主要是朔方节度使辖区。

河西和陇右以前是哥舒翰的领地，哥舒翰失败后，他带出来的防守潼关的大量士兵都投降了安禄山，剩下驻扎在河西的士兵虽然依然归属于唐朝，但他们的父兄子弟却可能已经投降，人心惶惶，所以这里是不能去的。

剩下的就只有朔方节度使辖区可以去了。太子在作为亲王时，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而现任节度使郭子仪是太子的熟人，而且距离他们出发的地方要比河西更近，因此这里是比较可靠的根据地，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往朔方。[82]

太子同意了儿子的看法，日暮时分，他们出发了。

但一路上并不太平。太子一行首先遇到的还不是叛军，而是潼关的溃兵。他们刚刚准备渡过渭河，就碰到了一大批溃军，双方互相不认识，发生了激战，死伤甚重。太子兵马击败了溃军之后，准备渡过渭河时，却发现没有桥，骑马的人只好找水浅的地方乘马涉过河流，而徒步的人却过不去了，只好散去。[83]

太子从奉天（现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上新平（现陕西省彬州市），一夜奔驰了三百里，但这也意味着大量的士兵和辎重都散掉了，剩下跟随着他的只有数百人。十六日到达新平后，发现新平太守已经逃走了，太子派人找到了他，将他斩杀。当天他们又赶到了下一座城市安定（泾州，现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其太守也逃走了，太子也将他寻到并斩杀。

十九日，太子来到了乌氏驿（现泾川县北），彭原太守给他送了衣物和粮食。在这里，太子补充了数百随从。当天到达平凉（现甘肃省平凉市区）后——这里是皇帝的养马场，太子得到了数万匹马。玄宗皇帝任命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王思礼也在平凉。在得到玄宗的任命后，由于河西乱了套，他没有去河西，而是在平凉等候，此时与太子会合了。获得了这些马，又有了将军的辅佐，太子稍稍感到安全一些了。他又招募了

五百人，暂时在平凉观望。一时间，太子在平凉的消息传出，离散的官员和将领们纷纷赶到这里。

几天后，得到太子消息的朔方留后（在郭子仪出兵后代理节度使）杜鸿渐等人认为平凉并不是一个好的屯兵之所，太子应该撤到更北方的灵武（现宁夏灵武市）去。灵武位于现在贺兰山和黄河的东面。在这里，由于贺兰山的阻挡，将来自东面的水汽都挡在了本地，在黄河岸边形成了一片如同江南一般湿润的绿地，适合种粮食。灵武的东面是沙漠，西面是黄河，是一个不易到达却适合作为后方的地方。而灵武又非完全封闭，处于朔方与河西之间，是一个可以联合西北地区的中心地带。到了这里，太子可以放心地联合西北的军事力量，组织反击，还不用担心安禄山跨越中间的沙漠袭击他们。

杜鸿渐等人并不在平凉，他们将朔方的军事力量、后勤状况的记录呈给太子。与此同时，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也派人来见太子，他们也认为去朔方（灵武属于朔方）是更好的选择，这帮助太子下定了决心。

当太子来到平凉以北，杜鸿渐甚至专门从朔方赶过来迎接太子。事实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由于缺乏不互相伤害的共识，即便是忠臣要想获得皇帝或太子的信任也是非常困难的。既然河西节度使王思礼和太子在一起，那么杜鸿渐就不敢进入平凉；但如果他不迎接太子，又无法让太子打消疑虑，于是杜鸿渐选择了来到平凉以北等待太子的到来。

到了七月初九，太子终于抵达灵武，这里也就暂时成了他组织反击的中心。此时玄宗皇帝还在蜀道所在的大山中跋涉，要在二十一天后才能到达成都。

但是，到达灵武之后，太子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反击，而是另一件事情——即位。根据史料记载，玄宗在和太子分开的当天，曾经有意让位给太子。[84]而在灵武劝进的主要是太子的亲信裴冕和杜鸿渐，理由

是：一是玄宗的意思，二是有利于反击。太子在拒绝五次之后才同意。

但是玄宗是否有传位意愿却是可疑的，更可能的情况只是形势造成的而已。逃跑的玄宗已经失去了人心，但是他却依然是一国之君；太子虽然留在了北方抗战，此时即位却对玄宗的权威是一种冒犯。在未来，玄宗感觉到太子威胁的时候，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对太子不利，即便不会杀太子，却可能对他的亲信动手。这一点太子是深有体会的。在他韬光养晦的几十年里，他屡屡受到玄宗的威胁。[85]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辅佐太子的人都不得不担心玄宗的报复，要想专心做事，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太子的地位足够稳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太子变成皇帝，把老皇帝变成太上皇，让玄宗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新的现实。

太子即便不想冒犯自己的父亲，但要想抵抗安禄山，即位是不可避免的。这既可以保护自己和大臣，也便于整合抵抗力量，让他们放心。唐代君臣之间的不信任是一把利剑，割裂了所谓的仁义道德，让双方都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

太子到达灵武三天后，十二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即位为皇帝，并任命了一批心腹，将太上皇的官僚系统边缘化。同时，为了宣示正统，他进行了改元，选择了一个表明自己更加正统的年号——至德。从此倒霉的天宝年号告终，玄宗天宝十五载变成了肃宗至德元载。

太子成为皇帝之后，解除了人们对太上皇的恐惧，于是前来灵武投靠的人越来越多，这里终于有了行在（皇帝暂居的所在）的模样。而太子的即位非常及时的另一个证据是，当他即位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太上皇的玄宗皇帝依然在逃亡的路上发号施令。他的号令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如果不是肃宗和他的官员及时处理掉，甚至会酿成大祸。如果肃宗皇帝优柔寡断，晚一点即位，那么太上皇乱政的命令会对唐朝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太上皇对国家造成的最大损害发生在肃宗继位四天后。这一天玄宗发布命令，任命太子（已是肃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即四地的总节度使）——这一点没有问题，但他还任命了另外三个儿子：永王李璘担任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担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珙担任武威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这就相当于把全国分成了四部分，其中太子所领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三部分足以与之抗衡。这是防止太子擅权的一种做法，却把全国的指挥权更加零散化了。

不过好在盛王和丰王都没有赴任，只有永王李璘去了任所，这导致能够挑战太子的只有永王一人，之后所发生的永王之乱就是由此种下的根源。这也改变了李白接下来的命运。

这一天，太上皇还继续下达命令，建立了山南东道节度使、岭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将江南道分成了江南东、西二道。[86]这些做法进一步弱化了朝廷的权威，为未来的藩镇割据留下了隐患。[87]

肃宗继位一个月后，到了八月十二日，他的使者才到成都，将玄宗皇帝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消息带到。我们已经不知道玄宗皇帝的真实感受，史书给我们留下的描述是：太上皇听了高兴无比，表示“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88]。但不管太上皇怎么“高兴”，直到四天后的十六日，他才接受了现实，发出了诏书，同意当太上皇，将政事交给了儿子，但表示皇帝依然必须将国家的消息告知他。

两天后的十八日，太上皇派出自己的嫡系大臣韦见素、房琯、张镐、崔涣等人带着传国玉玺去见肃宗，表明他到这时终于认命了。

太子解决了统治权的问题，但他面临的更大的挑战依然是来自叛军的攻击。人们之所以对他充满了期待，是指望他能够光复两京，完成中兴。但在他即位时，唐朝却处于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两京失陷，就连曾

经光复的河北地区也再次陷落，唐朝曾经差点儿镇压了叛乱，现在重新变得遥不可及了。

危急时刻

日后复盘来看，安禄山一定会对自己攻克潼关之后的作为懊悔不已。六月初九攻克潼关后[89]，他由于担心兵力不足，命令崔乾祐等人在潼关停留了十天，等后续部队跟上了，才命令孙孝哲进取国都长安。

此时的长安早已经被溃兵和乱民掠夺一空，甚至连皇帝的左藏库都已经烧了。更可惜的是，玄宗皇帝早就过了散关，进入了茫茫蜀道之中，而太子也早已经到了平凉，等待官兵的集合。即便这样，孙孝哲在占领了长安之后，还是没有拟定像样的西征策略，反而陷入了破城军队通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中——他们开始了对城市的劫掠。

士兵们劫掠的是金银财富，而统帅们看中的则是文武百官、宦官、宫女等。安禄山要求，每发现数百个官员、宫女等，就要一起押送到洛阳去。那些未随玄宗和太子离开的官员的家属都会被杀死，安禄山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

大量的官员在被押送到洛阳后，投降了安禄山。其中最著名的是与杨国忠一同担任宰相的陈希烈，以及前宰相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也是驸马）等人。这些肯投降的官员重新得到了任命，比如陈希烈和张垍就都担任了大燕的宰相。与此同时，安禄山为了给儿子报仇，还展开了两场复仇行动。在七月中，安禄山指示在长安的孙孝哲在崇仁坊残杀了玄宗的姊妹霍国长公主、永王妃侯莫陈氏、义王妃阎氏、陈王妃韦氏、信王妃任氏、驸马杨朏，以及杨国忠、高力士等人的党羽，一共八十三人。崇仁坊位于皇城东面景风门外，靠近尚书省的选院，它的西南角又和东市相连，所以安史之乱前，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文人墨客，昼夜喧嚣，灯火不绝。这里有一个院落叫作礼会院，凡是公主或郡主出嫁，都

要在这里举行仪式。玄宗逃走之后，那些受到冷落的王室成员都聚在了这里，比如霍国长公主，她与丈夫离婚多年，没有再嫁，皇帝也没有将她带走。这一批人在崇仁坊被抓后，都被折磨致死。[90]

十七日，安禄山再次下令将抓获的皇孙和郡主、县主二十余人杀害。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随着两都的陷落，唐朝大势已去，即便玄宗退到了四川，也只能做一个偏安的小政权。如果仅仅是唐朝的故吏这样看，那么对安禄山是好事，但是就连安禄山本人以及他的将军们都这么看。这就导致叛军在长安作威作福，只占领了附近的一些城镇，却没有进一步扫荡西部。

此外，安禄山本人留在了洛阳，将洛阳作为他的都城，因此长安在他的规划里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这也给西部忠于唐朝的势力留下了空间。

二十六日，一支忠于唐朝的民兵部队袭击了被安禄山军队占据的扶风，杀死了两百多人。二十八日，陈仓令薛景仙又进攻扶风，杀死了叛军的守将，夺取了扶风。这些小型的战斗都表明，叛军在长安以西的控制力非常弱，这就给唐朝留下了一条通道，连接起了南面的四川和北面的朔方。[91]

不过，虽然叛军在西部犯了错误，在东部的河北地区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潼关失守之前，郭子仪和李光弼在河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扫尾阶段，大部分的郡都已反正。潼关失守时，李光弼正在围攻博陵。可是，随着潼关丢失的消息传到河北，李光弼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放弃了围攻，向南撤退。他且战且退，与郭子仪会合后，率领军队从井陉撤回了山西地区。他们只留了少量的人守卫景城、常山等地。

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原本想袭击安禄山老巢范阳，但不想史思明在击

退了郭子仪、李光弼后迅速回军，将刘正臣击败。颜真卿原本等待着与郭子仪、李光弼会合，见他们离开，不得不独自抵抗。

当安禄山在洛阳经营时，河北地区就成了史思明的狩猎场。郭子仪到了太原后，被肃宗皇帝紧急召往灵武，他率领五万军马前去。这支军队的到达让皇帝第一次感到了力量，却削弱了山西的实力。李光弼在太原只能以守成为主，无暇东进。而山西的削弱又导致没有人能够救河北了。

八月初十，史思明攻克了九门县，杀害了数千人。二十日，攻克藁城县。九月初一，史思明围困赵郡，初五攻克赵郡，之后又拿下了在河北西部最重要的常山郡，杀死数千人。

在获得了河北西部之后，安禄山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四十多日。到了十月上旬，史思明率军与尹子奇会合，将河间攻克。随后他们攻克了景城，招降了乐安。当他们进攻东部的中心平原郡时，颜真卿知道打不过对手，于十月十八日放弃了平原，渡过黄河向南逃走。

史思明以平原为基地，进攻清河、博平等地，并一一拿下。接下来他又招降了信都。最难攻克的城市是饶阳，事实上，安禄山的军队已经数次围困饶阳，却始终无法拿下。但到这时，饶阳已经成了孤城，再也无力抵挡叛军。城陷后，史思明招降未果，将饶阳的守将张兴锯死在木头上。

在攻破每一个城池的过程中，叛军都将城内所有财物、女人掳掠一空，凡是壮年男子都被抓壮丁，老弱病残则全部杀死，一个不留。

到饶阳攻破后，河北地区唐军已经完全被叛军肃清。当颜氏兄弟起兵反对叛军时，史思明只带来了三千人马，之后他与颜氏兄弟、李光弼、郭子仪，以及唐朝各个郡中军队轮番厮杀，直到河北完全被他占领。这也可以看出，从谋略上讲，史思明是远超安禄山的。他的军事策略甚至超过了唐军主将郭子仪和李光弼，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

安史之乱进入到史思明阶段之后，战争的难度反而加大了。

协助肃清河北唐军的叛军大将尹子奇继续渡过黄河，率领五千骑兵横扫了现在的山东地区，这个地区当时属于北海郡。之后，尹子奇想从北海郡向南进军，直达淮河、长江流域。但就在这时，唐朝获得了北方同罗人的帮助，袭击了叛军老巢范阳，尹子奇才率众北归。

尹子奇的撤退让唐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位于雍丘和睢阳的张巡。叛军获得河北之后，本来有机会扩大战果。如果他们迅速南下，占据淮河和长江流域，那么给唐朝剩下的地盘就非常有限了。而尹子奇的北归让唐军在南方得以巩固防线。

但是，当叛军意识到他们浪费了机会时，又杀了回来。这时的唐军南方防线，特别是睢阳的张巡和南阳的鲁炅，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呢？

首先看鲁炅所在的南阳地区。早在潼关丢失之前，鲁炅的军队已经从叶县撤往了南阳，在南阳构筑了第二道防线。他在南阳抵抗到第二年的五月十五日，才撤往下一个防御点——襄阳。[92]这种步步为营的战法让叛军始终被阻止在南襄隘道上，无法继续向两湖地区前行。这不仅仅是土地的得失问题，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鲁炅守住南阳的更大的意义。那就是，襄阳掌握在唐军手中，可以让皇帝建立起另外一条连接关中与江南的通道，否则唐朝就分崩离析了。

鲁炅的南阳经受住了考验，而更加重要的地方是雍丘和睢阳的张巡防线。一旦这里被叛军突破，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长驱直入淮河地区，再从淮河地区借助运河通道直下扬州，完成对唐朝江南地区的征服。在唐朝已经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四川一带的益州虽然足够富裕，但比不过扬州所在的长江地区的财富。叛军若是获得了江南，就意味着最富裕的江南和华北将置于他们掌握之下，同时他们还控制着关中的平原地区，唐军即便掌握了一些战略地点，却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要想反攻就更加不可能了。因此，淮河地区极为重要，由此才引出了张巡可歌可

泣的故事。

长安城还没有陷落时的五月份，投靠了安禄山的令狐潮（原雍丘令）再次进攻雍丘。到太上皇到达成都时，双方已经相持了四十多天。在这期间，雍丘对于朝廷的消息一概不知。

首先得到玄宗消息的是令狐潮，当他听说玄宗皇帝已经去了四川，立刻写信给张巡。这件事在张巡的军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有六位高级将领[93]找到张巡，表示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可收拾，甚至连皇帝都不知死活，不如投降。张巡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第二天，他在大堂之上设立了天子的画像，瞒着六人率领士兵们朝拜，慷慨激昂处，人人都流下了眼泪。张巡这才把六人找来，痛斥他们忘记了大义，将他们斩首。

张巡与令狐潮的斗法甚至可以称为攻城和守城的教科书案例。当城上没有了箭，张巡就在夜间用稻草人伪装成士兵，放下城去，远处的敌人以为他们乘夜间偷袭，连忙射箭，“草人借箭”就帮助张巡获得了数十万支箭。等到后来张巡再放人下去时，敌人以为又是草人，在一边大笑不已，不想这一次放下去的却是五百名敢死队士兵，他们乘叛军不备，大败叛军，将叛军追出了十余里。

张巡治军极其严格，他的大将雷万春在城上和令狐潮喊话，脸上中了六箭，却岿然不动。[94]

张巡数次击败令狐潮，擒获了不少人马。对于俘虏，他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把远道而来的胡兵全部杀死，因为认为他们是侵略者；近处被胁迫参军的都放回，不予惩罚。这样的做法让周围的百姓纷纷赶来参军。

张巡的战略眼光非常敏锐，不仅守卫雍丘城，还注意到了周围的敌军。八月份，叛军派出李庭望率领两万余人袭击宁陵、襄邑，他们夜间驻扎的地点距离雍丘只有三十里。张巡率领三千士兵偷袭，杀死敌军一

大半，李庭望只好仓促逃离，放弃了进攻。

十月初四，令狐潮再次率领万余骑兵进攻雍丘，被打败后离开。

十二月，叛军终于有了收获。在久攻不下之后，他们首先在雍丘以北设立了营寨，断掉了张巡的粮草，之后派出了数万大军包围，而张巡的部队到了后来只剩下千余人。唐军在河北和山东的失利，也给了张巡新的压力。十二月，随着叛军扫荡山东地区，鲁郡、东平、济阴等地接连沦陷。叛军顺着山东地区南下，向着雍丘袭来。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两万人，试图进攻雍丘以东一百二十里的宁陵，从后面包抄张巡。这一次，张巡终于被迫离开了雍丘，但抢在敌人前面到达了宁陵。宁陵与更东面的睢阳已经不远，雍丘和宁陵都属于睢阳下属的县。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联络后，双方联军在宁陵西北，与叛军战斗，斩杀了万余人。敌人再次逃窜。

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叛军大将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十三万人进攻睢阳，许远请求张巡援助，张巡率领三千人从宁陵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共凑了六千八百人。他们与叛军大战十六日，擒将六十余人，杀死敌兵两万余人。

就这样，张巡放弃了雍丘和宁陵，与许远在睢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保卫战。在更东方，则是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所在的彭城，也就是现在的徐州。彭城位于睢阳的后方，只要睢阳还在，彭城就不会受到威胁。只要彭城在，河南的旗帜就还没有倒。因此，到了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底，虽然安禄山的叛军占领了很大一部分郡县，但由于攻不破睢阳，唐军依然牢牢地守住了淮河防线。[95]

深陷战争的文人

对于唐朝而言，最幸运的是，安禄山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更多的是被形势推到了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在唐朝的内斗中没有能力

全身而退。他对唐朝君主的羡慕，缘于他在唐玄宗宫廷中看到的歌舞升平。

获得了两京与河北，但在南方受阻之后，安禄山并没有进一步做消灭唐朝的残余势力的计划，反而开始学着玄宗享乐起来。

在大燕朝中，安禄山杀掉了能够找到的唐朝宗室为儿子报仇，对于唐朝投降的官员则给予优待。这是因为安禄山所建立的大燕也同样需要官僚，身为武夫的安禄山无法找到足够的统治人才，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在获得对方效忠的基础上，保留唐朝的官僚架构和人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安禄山虽然造成了战乱，但从统治上，他对唐王朝的政治有着强烈的继承性。

唐玄宗的宫廷是唐代歌舞艺术发展的高峰，每一次安禄山去长安时，皇帝都会用歌舞宴乐款待他，于是他记住了唐朝的教坊系统，羡慕那些鼓吹、胡乐和杂耍。宫人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以及马戏、珍禽异兽的表演，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6]

攻克长安后，他一方面让士兵不断地搜刮长安的宝物，另一方面几乎将整个教坊系统打包带到了东都洛阳：包括乐工，也包括会杂技的马匹、犀牛、大象，还有各种乐器、戏服。教坊系统到了洛阳后，安禄山把同样从长安带来的唐朝臣工集合起来，欣赏表演。

在东都洛阳城的西面，是皇帝游猎专用的禁苑。禁苑周长一百二十六里，其中有一个东西长五里、南北长三里的水池叫作凝碧池，这个池子是隋炀帝所建，池子的设计模仿了大海，其中设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小岛，还有一座叫作龙鳞宫的宫殿建筑。[97]

就在凝碧池上，安禄山大宴群臣，让乐工表演助兴。乐工们一个个面带悲伤，而士兵们扶刀而立，随时准备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到后来，一位叫作雷海青的乐工再也忍不住了，他把乐器扔在地上，向着西方痛哭。安禄山大怒，把他绑起来肢解了。

这件事对于宴席上的群臣震动很大。而最受影响的，是本书中一位常客——王维。

玄宗皇帝仓皇离开长安，大量的臣工都没有来得及跟随，就被皇帝抛弃了。随后叛军到来，专门把那些跟随皇帝逃亡的大臣的家属杀死，这让留下的群臣再也不敢逃亡了。

担任给事中的王维就是没法逃跑的大臣之一。[98]叛军到来后，为了不被抓，他只好立刻进入了装病状态，吃下泻药，装作得了痢疾。整整十天时间他粒米未进，服药时间则可能长达十个月之久。

但即便这样，叛军依然怀疑王维在耍花样，怕他逃走，将他囚禁了起来。随着大臣们纷纷被押往洛阳，王维也不例外，在一片兵戈之中被迫上路。

到了洛阳之后，王维被囚禁在洛阳以南龙门镇附近的菩提寺中，不得已接受了安禄山的任命。[99]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群臣时，王维并没有参加。但他却听说了这件事，对于乐工的做法感慨万千，又为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这位维摩诘的信奉者陷入纷纭的世事时，不仅做不到随心所欲，甚至连保全自己都是奢望。

在洛阳，唯一与王维关系密切的是他一生的挚友裴迪[100]。与王维是在任官员不同，裴迪此时恰好没有担任官职，也就不被安禄山所关注。作为平民百姓的裴迪可以自由出入，他经常来看好友王维。两人在一起诉说对于未来的惶恐时，王维才敢于吐露一点自己的心声。

一次，在裴迪来访时，王维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从内容到风格都只能算是平庸之作，与王维巅峰时期的诗歌有着天壤之别。但在王维活着时，它却成了最有用的一首。[101]王维在诗中除了描写东都洛阳的荒凉之外，还感慨，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到皇帝。也正是这一句话，成了他没有屈服于叛军的见证，在日后帮助他摆脱了通敌的嫌疑。

此外，他还向裴迪感慨，希望摆脱这一切，归向桃花源。[102]这位

当时著名的诗人不断地出世，却总是舍不得官场的利益，再次陷入了尘网之中。

与王维一样倒霉的还有杜甫。安史之乱前，杜甫获得了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当年十一月叛乱爆发后，他正在奉先县的家人处。到了第二年五月，四处兵荒马乱，他从奉先前往白水的舅家（崔少府）投靠。[103]次月，长安失陷，杜甫又从白水赶往鄜州。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他连忙从鄜州向灵武赶去。[104]

由于肃宗当时的草台班子缺乏人才，凡是在他即位初期赶到灵武的官员都得到了重用。如果杜甫能够早点赶过去，就是他的一个机遇。不想，倒霉的杜甫在路上碰到了安禄山的军队，陷入了叛军之中，无法前往行在了。杜甫被叛军押回了长安，他的妻子却留在了鄜州。[105]但杜甫的官职又不够大，不足以让叛军将他带到洛阳，于是他就滞留在长安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杜甫不断地思念着家人，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诗歌带上了悲壮的色彩，出现了巨大的升华。当望着长安的月夜时，他想到的却是鄜州的月也应该是一样的，但只有妻子一人独自在看，至于自己何时才能和家人团聚，则未可知。[106]

他时时刻刻思念着亲人，各地战争的消息又不断地传来，他盼着唐军打胜仗，却又由于身陷叛军，听到的总是战争的惨烈，让他更加无助。官军在西面打了败仗，他为那些死去的官军哀悼时[107]，恨不得有人给他带信，好告诉官军敌人的兵力，也告诉官军仗该怎么打[108]。他最著名的诗句之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写于这个时期。对于一个与家人隔绝的囚徒来说，家书抵万金，是他最深刻的体会。[109]

直到第二年，杜甫才有机会逃离长安，继续去投奔皇帝，只是这时皇帝已经不在灵武，他的官位大都填满，杜甫最好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

构建反击基础

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最重要的因素，是让人们在混乱之后能够感受到安全和秩序。能否建立一套秩序，是安禄山是否可以取得合法性的关键。但是，安禄山在洛阳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政府，虽然他从长安“搬去”了很多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处于观望和恐惧之中，没有为他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在长安，由于只是掠夺式的占领，人们在经过了最初的惶惑之后，立刻怀念起李唐的统治。安禄山没有继续从长安出发扫荡南北，更是给了李唐组织反击的机会。

这时在成都的玄宗已经无法指望了，唐朝组织反击只能依靠新皇帝肃宗以及辅佐他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除了郭子仪、李光弼以及另一位战将仆固怀恩之外，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是给皇帝提供战略的李泌，而另一位是提供财政基础的第五琦。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李泌一样神秘莫测，游走于官宦与江湖之间，人们甚至认为，他进入官场不是有求于皇帝，反而是皇帝欠了他。

从学问上说，李泌与李白有相似之处。在唐代，由于皇室的提倡，道家学派一直是一支显宗，许多人都会受到道家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李白与李泌。在李白的诗篇中，充斥着奇诡的想象，时而上天，时而入地，但这些内容的大部分来源，都是道家所传的仙境与神仙，这表明李白在知识层面上从道家汲取了大量的成果。

李泌也是道家出身。相较于李白，他的优势在于，他本人是世家子弟。[110]玄宗时期，他曾经在东宫陪伴过太子，之后由于恃才傲物，被杨国忠等人排挤，脱离了官场，在颍阳地区隐居，依然是一副道家风范。

安史之乱爆发后，已经成了皇帝的太子缺乏辅佐人才，将李泌紧急

招到了灵武。由于之前就互相了解，双方很快进入了合作状态，甚至达到了出则并辔、寝则对榻的程度。皇帝想要任命李泌当宰相，但他不要官职，只表示自己是皇帝的朋友。直到后来，由于李泌一直穿白衣，与穿黄衣的皇帝一起时，人们都对这个没有官职的人感到好奇，皇帝才给李泌穿上了紫袍，并强迫他接受了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李泌的权力也很大，军务和四方的奏报都要先送给李泌，让他判断轻重缓急再呈送皇帝，甚至禁门的钥匙也都由李泌掌管。[111]

与李泌作为对比，同是持道家思想的李白却并没有享受到如此崇高的待遇。他同样怀有云游四方、归取功名的想法，也同样恃才傲物，不肯屈服于权贵。当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恰好在南方云游，就在叛乱发生之后的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李白至少周游了宣城、溧阳、剡中、庐山等地。洛阳被叛军占领后，李白的儿子李伯禽被隔在了山东地界，他还曾托人去照看一下自己的儿子。[112]

但由于没有途径能将他带到皇帝面前，他只能在南方空叹息。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太上皇封的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节度都使——永王李璘。永王是太上皇任命的负责国土四分之一的大人物，从地位上，虽然在太子之下，却远在其他人之上。

永王也听说了李白的才干，专门征召他担任幕僚，这种身份事实上与李泌在肃宗处也不相上下。这也是李白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机会。但不幸的是，随着太子变成了皇帝，永王这样的一方大员突然成了皇帝的拦路虎，于是原本正常的任命就变成了兄弟阋墙的起因。再后来，我们还会看到站错了队的李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李泌由此进入了正史的本传，并由司马光摇旗呐喊，而李白则只能在正史的边角料《文苑传》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更多关于他的线索只能在野史以及他的诗中寻找了。

那么，李泌到底有什么样的才能，让肃宗皇帝对他如此看重呢？

李泌的作用主要有三个：第一，协调皇帝的家庭关系；第二，稳住

皇帝的心，让他敢于承担如此艰巨的平叛重任；第三，提出军事战略。但有些正确的军事战略却没有被采纳。

肃宗并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人选，由于他的父亲过于强势，这位太子的前半生都是在小心翼翼的避祸思维中度过的，生怕被父亲废黜甚至杀掉。一旦登基，这位新皇帝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也并不擅长，以至在唐朝自始至终存在的宗室内斗中迅速迷失，落入了一系列的陷阱之中。

比如，皇帝在他的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之间取舍不定。广平王就是后来的皇太子、代宗李豫（原名李俶），是嫡长子，而建宁王却更有才干，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大。[113]皇帝在如何对待这两个儿子上犹豫不决，反而是两个儿子之间没有芥蒂，相处十分融洽。最终李泌帮助皇帝确定了以广平王为主，却又能够发挥建宁王优势的策略。此外，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非常微妙，太上皇身在成都，生怕儿子害自己，而皇帝又担心父亲在四川搞分裂，到底如何取信，李泌也提出了减少太上皇的疑心的意见。

皇帝本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有了李泌这个贴身伙伴，才能迅速做出重要决策。关于李泌的战略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讲。

李泌对于皇帝非常重要，但是皇帝也得依靠其他的人辅佐。除了郭子仪、李光弼等有军事才能的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到，那就是新一代聚敛之臣的代表人物——第五琦。

在和平时期，一个聚敛之臣对政权的危害是巨大的，他能够帮助皇帝聚敛大量的钱财，却让民间陷于凋敝。但在战争时期，皇帝的开销大增，已经顾不上民间的死活，最重要的是开足马力，将民间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吸入战争机器之中。这就不是那些道德之臣或者军事将领能够做的了，必须依靠一批专门的人才。

在太上皇入蜀之后，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向四川派去了一名叫作第五琦的官员。第五琦曾经是聚敛之臣韦坚的手下。韦坚死后，他变成了贺

兰进明的幕僚。安禄山叛乱后，由于贺兰进明最初在河北地区没有战功，太上皇要追究他的责任，是第五琦用金钱招募了一群敢死队，这些人攻城略地，帮助贺兰进明获得了信都。贺兰进明需要派人到成都向太上皇邀功，于是想到了第五琦。[114]

第五琦到了成都，决定离开贺兰进明另谋高就。他告诉太上皇，现在是打仗的时候，最重要的莫过于财政，而他本人就是能够让军队财政无忧、不缺物资的人才。太上皇对于聚敛之臣的能力了如指掌，大喜，立刻拜他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到了十月，第五琦又见到了肃宗皇帝，皇帝封他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115]

那么第五琦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够让两位皇帝如此看重他呢？

原来，第五琦最想解决的，是如何沟通江南地区与灵武之间的物资交通。唐朝的抵抗军力主要分布在陕西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地区，而唐朝的粮仓却位于江南地区。在叛乱之前，江南地区的粮食要想运到长安，只需要从扬州经过运河前往黄河，再通过黄河经过三门峡进入渭河，最后就可以到达长安。这条路是如此方便，甚至有时候四川的货物都不走四川和陕西之间的陆路（蜀道），而是顺着长江而下，先到扬州，再送往长安，相当于围着中国绕了一个大圈。

可一旦战乱到来，这条路就断了。由于这条路要经过河南进入黄河，而河南的许多地区都已经成了战区，被叛军占领了，叛军就掐断了原来的粮道。一旦江南的粮食无法运送到西北，西北地区的军事实力就大打折扣。

如果要解决军事后勤，首先要再打通一条不经过叛军控制区的新道路才行。第五琦要寻找的就是这条道路。他发现，从长江中游即现在的武汉地区，经过长江的另一条支流汉江，可以上行到南襄盆地的襄阳，从襄阳继续沿汉江上行，可以到达四川与陕西之间的汉中地区，从汉中地区走陆路，就可以把货物送到陕西西部的扶风地区。而这里就已经是

肃宗的唐军控制区了。

这条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安禄山的叛军在占据了长安之后，不再向西进攻扶风地区，一旦占领扶风，这条路也就断了。所幸的是，叛军一开始的确占领了扶风，却被陈仓县令薛景仙击败了。薛景仙占领的扶风，成了唐军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可以说，是薛景仙和第五琦共同支撑起了唐朝的后勤工作。[116]

第五琦除了帮助皇帝解决通道问题之外，还想出了种种办法帮助他筹钱。比如，这条新路由于有一些陆路行程，运力比不上之前的大运河，第五琦就想办法把江南的重货换成更加值钱的轻货（重量轻、价值高）上路。皇帝仍然缺钱，第五琦就设计了盐法，将食盐的生产从民间收归国有。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朝代都由官方垄断食盐生产，将食盐价格提高，从而获得足够的税收。唐朝前期是少数不实行盐业专卖的朝代，这对民间经济的活跃非常有利，但到这时，第五琦帮助皇帝建立了盐业专卖，唐朝盐业从此之后也成为国有行业。[117]

第五琦还帮助皇帝设计了乾元重宝钱币。这些钱币的面值更高，含铜量却减少了，从而可以帮助皇帝筹款。[118]但这种做法却搅乱了金融市场，造成了后期物价飞涨。不过在战争时期，这一切弊端都必须忍受。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除了战场区域内的直接损失之外，战场之外的区域所承担的金融动荡、税收加重，也是造成一个社会解体的重要原因。

解决了后勤问题与组织问题，皇帝还需要考虑援军。唐朝能够作战的军队都出自北方边境，而北方边境的部队，东半部的军队都归了安禄山，西半部的军队大都在哥舒翰一战中被击溃了，剩下的虽然服从皇帝的领导，却有很大的观望姿态。比如八月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接到皇帝的命令，要求他带领五千兵马去往灵武，他就想采取观望的态度，被他的手下段秀实抢白了一通，才决定发兵。[119]这样的情况说明，许多将领对于唐朝能否支撑得下去是有疑问的。

唯一完整的军队，就是郭子仪的朔方军。郭子仪和李光弼曾经在河北地区作战，潼关失守后，他们立刻离开了河北，郭子仪率领五万军队去见皇帝，李光弼则率领不到一万人守卫太原。他们的军队虽然完整，士气正旺，却数量有限。

要想与安禄山的胡汉混合部队作战，必须引入更多的兵源。这时，皇帝想到了请北方胡族助阵。

皇帝最早对胡族的招募竟然来自叛军内部的一次叛乱。安禄山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同罗和突厥部落的胡族士兵，在攻克长安后，他们驻扎在长安城外皇帝的禁苑之中。但安禄山的将军们在长安不断地搜刮，却并没有惠及这些胡族士兵。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两族的五千名骑兵们在将军阿史那从礼的率领下，盗窃了马厩中的两千匹马叛逃了。这些士兵并没有很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在朔方地区，安置着许多投降了唐朝的胡族部落，被称为熟番，于是希望到这里加入熟番，割据一方。

皇帝听说了阿史那从礼的军队到来，并没有感到惊慌，而是派人去招降这支部队，将他们变成了勤王军的一部分。许多人都选择了投降，但是阿史那从礼却依然有一批追随者，继续实施他们的割据计划。

朔方是郭子仪的领地，大部分熟番很难跟随一支陌生的流浪部族，但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阿史那从礼。到了九月中旬，阿史那从礼已经聚集了数万人。皇帝派遣郭子仪去镇压他们。九月十七日，郭子仪的大将仆固怀恩击败了这支军队。十一月十一日，郭子仪与回纥的联军又彻底击垮了他们。

除了招降了一部分同罗军之外，皇帝还和其他的胡族取得了联系。比如，八月初，北方的回纥可汗和西方的吐蕃赞普也都得到了唐朝发生叛乱的消息，并分别派遣使节前来，表示可以帮助皇帝讨伐安禄山，皇帝对他们表示了感谢。这也是回纥第一次出现在唐军的友军名单中。

同样是九月十七日，皇帝任命豳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

仆固怀恩一起到回纥请救兵。同时，他还把唐军在费尔干纳谷地（当时为拔汗那国属地）的军队召回，一路上经过西域的各个绿洲国家，招募军队前来援助。这支由安西、北庭、拔汗那、大食诸国组成的联军，于第二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一天赶到了凉州一带。

十月二十一日，仆固怀恩与敦煌王回来了，敦煌王除了带回回纥的使者，还带回了一位新妻子。她是回纥可汗的女儿，这表明他们的进展是顺利的。皇帝将她封为毗伽公主，并优厚地款待了回纥使者。到了十一月初八，郭子仪就和回纥的援军会合了，击败阿史那从礼的就是这支联军部队。

皇帝与吐蕃的联合则进展不大。事实上，到了年底，吐蕃利用唐朝羸弱的间隙进攻边境地区，占据了青海一带的土地。[120]

此外，皇帝的援军还会从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到了年底，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出现在皇帝面前，它竟然是由一位国王率领的。原来，于阗王尉迟胜听说了消息，把国家交给他的弟弟领导，自己则率领五千人跨越数千里来援助唐朝皇帝了。

这些军队的到来让唐军逐渐积聚了反攻的力量。

灵武虽然是一个可以躲避敌人进攻的地方，但由于距离前线较远，在反攻中并不利于第一线指挥。随着安禄山军队停留在长安一线不再向西，长安的西部地区，特别是扶风一带已经具有了安全性。这里位于平原地带，是个进攻长安的前线基地。到了九月十七日，随着君臣上下乐观情绪的积聚，李泌建议皇帝离开灵武，将指挥基地设在扶风。这样一是便于指挥，二是离长安更近，让人民看到皇帝的勇气。

皇帝于十七日离开灵武，二十五日已经到达了庆州的安化郡，皇帝将这里改名为顺化。

十月初一，皇帝从顺化出发，初三到达了彭原。就是在彭原，皇帝安排了第一场试图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只是这场军事行动不是由郭子

仪、李光弼指挥的，而是由一位叫作房琯的人。

房琯是唐朝名相房玄龄的本族，他的父亲房融也曾经担任过宰相。在安史之乱时，房琯的职务是宪部侍郎[121]。玄宗皇帝逃离长安，房琯和名相张说的两个儿子一同去追玄宗，但走了没多远，张氏兄弟舍不得家业回头了，后来两人都在安禄山占领的洛阳担任了高官。只有房琯誓不回头，进入了茫茫的蜀道，在普安郡追上了玄宗皇帝。[122]

他的忠心得到了回报，玄宗皇帝将他晋升为宰相。当肃宗皇帝登基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太上皇决定派几个人带上宝册等象征皇帝的信物去见儿子，这几个人包括房琯、韦见素、张镐、崔涣等人。他们北行到达顺化时，肃宗皇帝已经来到了这里，于是碰到了一起。众人将宝册献上，皇帝推辞过后，将宝册放在了别殿朝夕供奉，既表示接受，又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在这几个人中，韦见素之前是杨国忠的人，所以皇帝并不待见。可是房琯作为一介书生，却一直有着很好的名声。房琯习惯于慷慨陈词，以天下为己任，很快就超乎众人之上，得到了肃宗皇帝的宠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还有张镐。在安史之乱前，他因为杨国忠的举荐刚刚当了官。安史之乱发生后，他一路跟随太上皇去了成都，又被太上皇派到了皇帝身边。皇帝出于对太上皇的尊重，也给他授予了宰相官职。于是，这位刚刚当官不到三年的人就幸运地跻身帝国最高级官僚行列。[123]

作为书生，房琯虽然位高权重，却得不到将领们的信任，他本人提拔的也大都是没有实务经验的书生，对自己看不上的人不屑一顾。很快，他和从北海来到这里的贺兰进明起了冲突，被贺兰进明告了一状，称太上皇将天下分成四块，只给肃宗一块，就是房琯出的主意。

眼看肃宗皇帝要疏远自己，房琯决定发起一次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来获得更大的恩宠。肃宗皇帝也希望尽快夺回长安，以争取主动权，双

方一拍即合，将其余将领晾在了一边，制订了军事计划。

在房琯版收复长安的计划中，房琯担任使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漳两关兵马节度等使，又自己选择了副手，任命御史中丞邓景澄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这些人大部分是书生，缺乏带兵经验，但房琯却信心满满。

出发时，房琯将军队分成了三军，其中裨将杨希文率领的南军从宜寿（现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向长安进发，刘贵哲的中军从武功出发，而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的北军从奉天出发。其中中军和北军为前锋。这三路大军事实上都位于长安的西侧，相距只有不到百里，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展开三路大军，很难起到夹击的效果。

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的前哨已经到达了长安西面渭河上的便桥。第二天，他们终于和叛军将领安守忠的部队相遇了，地点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双方列阵后，房琯想到了古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使用的阵法——车阵。他排出了两千辆牛车，中间夹杂着马匹和步兵，一同向敌人移动。

叛军方面不断地顺风鼓噪，惊吓到了拉车的牛。接着，叛军开始放火，这不仅烧毁了牛车，还让牛横冲直撞，唐军复杂的阵形中还夹杂着人和马，于是乱成一团，再也看不出阵形。

战国作战使用车阵，更多是一种无奈，因为没有马镫，骑马是非常困难的。一旦骑马的技术进步了，人们就慢慢地抛弃了战车，选择更加有机动性的骑马作战。房琯作为书生，不知道车战早已经过时，还将牛车与行动迅速的马匹混合编队，导致马匹也丧失了机动性，而牛车也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反而因为对方放火成了软肋。这一切，都可以看到这位书生有多么迂腐。

这次战斗导致唐军死伤四万余人，只有数千人撤退回去。到了二十三日，唐军的南军也到了，房琯率领着南军与叛军作战，再次失败，他

的两位将军杨希文和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唐军收复长安的首次战役在食古书生的领导下完败。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史思明率领的叛军横扫了河北，唐军的收复行动再次陷入低潮。

更麻烦的是，皇帝还没有来得及组织反攻，唐朝宗室的老毛病犯了，皇帝在平叛的同时，还有两场家事要解决。

宗室之乱

肃宗皇帝并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之所以留在北方，只是因为他不想承担父亲失去国家带给他的后果。他的政策大都是在大臣的辅佐下做出的，大臣们有时为了做事，甚至不得不排除他的干扰。在远方的太上皇也给他制造着危机，于是，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又叠加了两次唐朝宗室的内部纠纷。

首先是肃宗皇帝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的问题。广平王作为长子，后来被封为太子，而建宁王却是最英勇善战的一位皇子。肃宗作为太子跟随父亲来到马嵬坡时，就是建宁王劝说父亲不要去四川，而是北上。在北上途中，建宁王一直守在父亲身边血战，只要父亲没有吃饭，建宁王就会感到悲伤。之后，建宁王也率领军队在陕西西部多次打败叛军。[124]如果是按照唐朝传统，广平王与建宁王争宠，会产生极大的矛盾，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不同，两位皇子之间并没有矛盾，反而互相体谅，共同为唐朝的复兴而努力。

但两人的地位也并非没有冲突。事实上，在九月时，肃宗按照传统，要让一位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他本意是想让最适合的建宁王担任，但大臣（包括李泌）都认为应该由长子广平王担任。肃宗认为，广平王未来就是太子（当时他还没有成为太子），不需要军事职务，但其他人劝说，为了巩固太子的位置，必须让广平王任大元帅。这件事虽

然反映了两者的地位在大臣中的争议，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两位皇子之间有隔阂。

两位皇子关系融洽本来应该是唐王朝的幸运，但肃宗皇帝身边除了李泌等大臣、郭子仪等将军之外，还有两类人——女人和宦官。

自从他作为太子北上时，一位姓张的妃子（被封为良娣）和一位叫作李辅国的宦官就寸步不离、忠心耿耿跟随着他。张良娣一路上就寝时都想着挡住太子（肃宗），避免晚上有人偷袭他。到了灵武之后，她产下了一个儿子，三天后就起床为战士缝衣服了。[125]

虽然李辅国与张良娣对肃宗忠心耿耿，却又带着当时后宫与宦官普遍都有的毛病——权斗。张良娣爱慕虚荣，李泌劝谏她要简朴，因而得罪了她。而建宁王和广平王由于与李泌关系密切，也受到了牵连。建宁王性格耿直，更是不知道掩饰。他曾经试图帮助李泌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娣，被李泌制止了。

张良娣有儿子之后，由于两位皇子论资排辈都在自己的儿子之前，她更加将两人视为对手，与李辅国联合，要将两人除掉。

不久，在大臣中突然兴起一股请求将广平王立为太子的运动。皇帝听说后，也同意了。但李泌却看到了其中的危险：肃宗称帝虽然得到了玄宗太上皇的追认，却依然被许多人视为擅自称帝，如果他再绕过太上皇立太子，势必引起太上皇一派的敌视，也给广平王树立了许多敌人。广平王本人在李泌的提示下，也坚决推辞，不当这个太子，躲过了祸患。

陷害广平王不成，接下来，张良娣等人在建宁王处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向皇帝告状说，建宁王由于没有当上大元帅，对广平王恨之入骨。皇帝这一次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大怒之余，竟将建宁王赐死了。这样的结局不仅表现了肃宗皇帝的摇摆性格，还表明，即便在战争时期，唐朝宗室的各个皇子依然是没有安全感的。

广平王对于弟弟的死亡一直耿耿于怀，当他克复两京之后，让李泌去向皇帝报捷时，还让李泌为弟弟申冤，李泌也让皇帝明白了不能再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广平王即位后（即代宗），多次追封这个弟弟，首先追赠他为齐王，到了代宗晚期，甚至追谥他为承天皇帝，表明代宗对于这个弟弟的惋惜。[126]

除了北方两位皇子的事件外，对平叛军队影响最大的，还是南方的另一位宗室永王李璘的叛乱。这个麻烦实际上是太上皇给肃宗皇帝造成的。玄宗在南逃四川的路上，由于还不知道太子已经即位，便按照自己的构思任命了几位宗室王担任地方长官。

在玄宗的构思下，太子（肃宗）并没有权力指挥全国军队，而是只负责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玄宗在全国的其余地区任命了几个听从自己节制的节度都使，其中永王李璘负责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西西道，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丰王和盛王都没有赴任，他们负责的地方都听从了肃宗的调遣，只有永王李璘赴任了，于是就给肃宗皇帝造就了一片飞地。[127]

从根子上说，永王的赴任并非是他本人的错，而是玄宗造成的。可是一旦就任之后，永王就很难将自己重新置于肃宗的支配之下了。按照他的理解，他和肃宗应该是平等关系，肃宗负责北方，而他统领南方，他们共同向四川的太上皇负责，由太上皇作为总指挥。

永王和北方的肃宗一样开始招兵买马，于是唐朝的有效统治范围内，除了肃宗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竞争性的永王政权。

永王李璘是玄宗的妃子郭顺仪的儿子，由于母亲早亡，肃宗将他留在了身边，常常抱着他睡觉。他跟随玄宗入蜀，在路上得到了任命。作为四道节度都使，他的行政所在地在江陵（现在的湖北荆州）。这里在第五琦重塑了运粮通道后，已经成了天下之重心，江淮地区几乎所有的

税赋都要从这里沿着汉江谷地发往北方。永王李璘所辖的部队达到了数万人规模，这也是一支消耗巨大的军队。永王李璘本人缺乏远略，但他的儿子襄城王李偈野心勃勃地聚集了一批谋士。这些人并不把肃宗皇帝的登基当回事儿，认为成都的玄宗才是真正的皇帝。

当天下大乱之后，江陵地区已经成了天下的中心，这里的土地完整，物资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为什么要听从偏远的北方的肃宗领导呢？如果从江陵顺江而下，占据长江下游地区，再加上四川的太上皇，就构成了东晋领土的规模。与之相比，肃宗的领土却支离破碎，比起永王台面上的实力要弱很多。[128]

永王的看法并非毫无依据，却忘记了肃宗在两方面的优势：第一，除了叛军之外，全国最好的军队都掌握在肃宗手中，他还能通过北方联络胡族帮忙；第二，肃宗作为太子登基虽然仓促，却获得了太上皇的事后认可，这就使他在名义上接近正统，更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戴。

肃宗皇帝听说了永王在江陵的所作所为，立刻想到要将永王征召到身边。但根据李唐王室的内斗传统，永王也一定知道自己去了必然受到压制，这只能加快他脱离中央政府。

肃宗和永王的钩心斗角还直接影响了两位诗人的命运，一个走了好运，另一个遇到了坏运气。

走好运的是高适。

在长安陷落时，玄宗逃走，根本没有人通知高适——皇族逃跑时，无暇顾及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但高适是一个善于把握时机的人，在叛乱蔓延到长安之前，他独自从长安出逃，前去追随玄宗。他没有像玄宗一样走遥远的散关道，而是抄了秦岭的一条近道——骆谷道。于是他在河池郡（现陕西宝鸡市凤县）追上了玄宗，这里甚至还没有到达汉中地区。由于玄宗离开时，对潼关失利的情况还不甚了了，高适慷慨激昂地叙述了潼关的情况。虽然他曾经是哥舒翰的属下，但玄宗不仅没有追究

他的责任，反而对他的忠勇印象深刻，提拔他担任侍御史。

到了成都，玄宗任命几位皇子担任节度都使时，已经成为谏议大夫的高适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将国家分成几部分交给各个皇子并不是好主意，但玄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永王紧锣密鼓地准备军队时，江陵长史李岘一看大事不好，以疾病为借口离开了江陵，昼夜兼程赶到肃宗皇帝所在的北方。见到肃宗后，李岘将情况说明，并提到最初高适曾经反对永王的任命。

肃宗皇帝立刻派人到成都将高适带来，向他询问计策。高适将南方地区的重要性陈述给皇帝，并告诉皇帝，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永王之间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了，但皇帝也不用担心，永王是必定要失败的。[129]

到了十二月，皇帝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设立了淮南节度使。节度使的行政中心位于长江下游和运河交界的广陵（现江苏扬州），领有十二个郡。高适被任命为首任节度使。高适此时已经身兼数职，从中层官员升任为高级官员。他是大唐的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都督必由亲王担任，而实际上的负责人就是长史）、淮南节度使。一同设立的还有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有汝南等五个郡，来瑱为节度使。皇帝命令他们和江南东道节度使韦陟一起防范永王。三道节度使相约共同出兵，会师于安州（现湖北安陆）。

高适高升时，在庐山的李白却不幸卷入了这场兄弟之争。李白在南方的名声响亮，永王决定将之召入麾下。

作为山野人士的李白对政治动向并不明了。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爱国者、一个试图建立功名又不得其门的人。他的儿子李伯禽留在了山东地区，作为父亲，他思念儿子却见不到。作为一个爱国者，他并无反心，当太上皇到达成都后，他立刻写了十首诗歌赞美成都和太上皇[130]，诗中充满浪漫主义的精神，看不出国家正在遭受危机，反而可以

看出蜀道的壮丽、人民的欣喜和太上皇的豪迈。

到了永王召他入幕时，他不仅没有意识到皇家争斗的残酷，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成就功名的机会。满怀壮烈的李白随即写了十一首诗歌，对永王进行了全方位的讴歌。[131]此时，永王正率军从长江中游的江陵东下广陵，这件事被肃宗皇帝认为是永王的反叛行为，但在李白看来，永王只不过是出兵去攻打安禄山罢了。他在诗中把永王写得极其豪迈，这只是诗人的夸张说法，却被人当成是拥护永王称帝。

但事实上，李白是知道两位皇帝的存在的，他只是把永王看成是东晋的谢安这样的人。他认为，安史之乱就是东晋永嘉之乱的一次翻版，也就是北方的胡人作乱，将王室赶到了南方，只有永王这样的人才能如谢安一般定住乾坤。李白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位贤王的到来，翘首期盼永王收复失地。[132]

他对于政治的无知，与好友高适对于政治的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经一起喝酒的两位平民，一位已经成了高官，另一位依然是一介书生。

但到了永王的反状已经明确时，李白也意识到了危险。永王此时将他带在身边就有了胁迫性，当进军到中途时，李白逃走了。[133]

到了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终于率军东下。当他刚刚出发时，众人对于他的意图并不知情，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谋反。李白也仅仅将这次行动当成是向北进攻叛军的转场。永王的军队从江陵出发，沿着长江而下，向广陵进军。广陵恰好在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从此处北上，可以沿着运河进入淮河地区，并到达安禄山正在围攻的睢阳地区。

然而，永王这次出发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皇帝也不可能命令弟弟率领大军北上，即便这不是造反，也是争功。皇帝连自己的儿子建宁王都不肯相信，听信诬告赐死了他，更何况是一个潜在的皇位争夺者

呢？

永王的进军显然受到了沿途官员的质疑，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吴郡（现江苏苏州）太守、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李希言发去牒文，询问永王的意图。永王也许是因为意图被识破了而愤怒，也许是对有人阻止他建功立业而愤怒，不管怎样，永王选择了不回复，反而分兵去攻击李希言所在的吴郡。吴郡位于长江以南，不在北上路线上，永王此举就可以被认为是谋反了。

此外，广陵依然是永王的主要目标，但广陵也不肯接纳他，于是永王也派遣军队袭击了身在广陵的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袭击的军队出发后，永王的主力军也到了长江上的重镇当涂（现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在这里，他们击败了李希言和李成式派来的部队，引起了江淮地区的震动。

到这时，永王完全露出了造反的面目。但是，历史依然是不明确的，到底是永王一开始就有反心，还是在众将对他的防范之中大开杀戒？这依然是争论不清的。

此时的高适、来瑱、韦陟三节度使已经在安陆会师。安陆接近永王在江陵的基地，而永王本人这时已经到达了长江下游的当涂，距离广陵不远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在人们以为永王已经锐不可当的时候，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二十日，永王在与朝廷军队僵持了近两个月后却失败了。事实上，自从占据了当涂之后，永王就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甚至连高适等三节度使的兵力都没有用到。平定永王之乱的，主要是位于广陵的李成式。他一方面派军队把守江上各个要地，另一方面派人在长江沿岸大张旗帜，永王从城上往水面上一望，发现四周都是对方的旗帜，不由感到了紧张。

让永王更措手不及的是本方的叛逃。在永王的将军中，大将季广琛

本来就以为是去进攻安禄山的，一路上却发现处处受到自己人的阻挡。季广琛意识到自己并非是去救一个王朝，而是与这个王朝为敌。他也知道一旦仗打起来了，在战场上被擒获，必然就没有活路了，只有在没有打时逃走，才能够活命。于是，他率领自己的部队撤走了。

失去了一部分军队的永王更加担心了。到了晚上，他望见四处的火炬，以为皇帝的军队已经过江了，于是带领家属逃走。不过，到了白天他发现对方还在对岸，又回来收拾军队，一起南逃。这一来一去之间被对方所乘，将他的军队击溃了。

永王带领残军向着鄱阳湖方向逃去，准备顺着赣江逃往两广地区，却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抓获并杀死。

轰轰烈烈的永王之乱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肃宗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从宗室层面上，再也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了。攘外必先安内，到这时，他才能更加放心地对付叛军，部署对两京的收复。

他首先获得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第八章 血肉抗战

死守太原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初六，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天清晨，位于洛阳的大燕朝廷突然发布了一则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逝了。这个消息是由他的儿子安庆绪发布的。在这一天之内，安庆绪首先宣布父亲留下遗诏，立自己为太子，接着立刻登上了皇位，将父亲安禄山尊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禄山时代就在一片混乱中落幕了。

事后，人们才知道，安禄山并非是自然死亡。事实上，在他刚刚起兵不久，就由于身体过胖引起的一系列病变，出现了视物困难。夺取洛阳之后，他更是连看都看不见了，加上肥胖引起的皮肤病，让他更加痛苦。

这位瞎子皇帝忍受着剧烈的病痛，苦苦支撑着，在原本应该继续进攻时，他选择了死守两京，将外围区域完全放弃。随着病情的加重，安禄山性格暴躁的一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的大臣、侍从和儿子都成了他发脾气的牺牲品。

在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大燕国的丞相严庄。安禄山在统治后期深居简出，其余的大臣已经很难见到他的面，外面的一切奏章都要靠严庄传达。严庄虽然在外人面前显得大权在握，但安禄山对他却一点都不客气，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

在侍从中，安禄山最亲近的是一个叫作李猪儿的宦官，这人也不幸成了挨打最厉害的人。

而在他的儿子里，由于安禄山当时宠幸一位姓段的妃子，一直想把这位妃子的儿子安庆恩立为太子，这就让他的长子安庆绪感到了压力。

安庆绪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公子哥儿，严庄眼见安禄山的病情加重，就与安庆绪密谋，认为机不可失，要赶快动手了。安庆绪顺水推舟，将决定权推给了严庄。加上他们联合的李猪儿，安禄山身边的人都已经背离了他。

在正月初五的夜里，严庄和安庆绪带领士兵来到安禄山帐外，让李猪儿带着刀进去。安禄山在屋里看不见东西，就时时把刀放在枕头边上。李猪儿进去后，二话不说直奔床头拿刀，对着安禄山胖大的肚子就是一刀，这一刀直接把他的肠子捅了出来。安禄山感觉到有人来杀自己，慌乱中试图去摸刀，却摸不到了。他大喊一声“这一定是家贼干的”，由于流血太多，很快就死了。

他死后，安庆绪和严庄进去，在他的床下挖了个数尺深的坑，将他的尸体用毯子一裹就埋了。

第二天，当安庆绪宣布父亲病死时，人们虽然感到有些突然，却没有人对这位大燕皇帝表现出更多的忠诚，很快接受了安庆绪这个新皇帝。帮助安庆绪登基的严庄，也由此当上了冯翊王，总揽了大燕帝国的军事和行政大权。[134]

安禄山在起兵不到一年两个月，当大燕皇帝也不过只有一年，就死于亲生儿子的阴谋。这个叛臣在军事上的成果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从北方的幽州出发攻占了两京，迫使唐朝皇帝逃离了国都，并截断了唐朝至关重要的从广陵到长安的交通线。但是，他战略上的弱点又在什么地方呢？

他最显著的战略弱点有两个：第一，在攻克长安之后没有再接再厉，剿灭唐朝的余脉，导致唐肃宗领导的军队东山再起；第二，也是最直接的，是他放弃了对太原的争夺，这是导致他无法控制北方全局的关键。

在控制面积最大时，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是由平原、低地组成的形区

域，这条区域从幽州向南到郑州附近转向西方，经过洛阳直达关中的长安地区。这个形区域大都位于华北平原上，只是在洛阳和长安之间，包括了一些黄河与秦岭组成的狭窄通道（与周围比起来依然是低地）。由于缺乏制高点，安禄山的叛军一直处于唐军从高处的打击之下。

这个形区域（也可以视为一个箱体）由于过于狭长，很容易被唐军从首尾进行打击，而叛军则在这个长长的箱体上分布过于稀疏，容易陷入“顾头不顾尾”的境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拿下太原，获得山西高地，并建立起幽州经过太原到达长安的通道。一旦这条路建立起来，脆弱的形区域就变成了稳固的三角形，以幽州、洛阳（或郑州附近）和长安为三个顶点的同时，太原作为最长边上的一个巩固点，可以同时支援三个顶点。中国北方的军事地理秘密就隐藏在这个稳固的三角形之中，一旦获得了这四个点（三个顶点和一个巩固点），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从战略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到时唐军想反击，难度也要大得多，很可能中国会再次陷入南北分治的状态。[135]

安禄山在早期曾经试图拿下太原，但随着两京的陷落，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南方，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太原，使得李光弼以不到一万的人马就守住了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点。而叛军一方面陷入两京的享乐之中，另一方面陷入形箱体所组成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给唐军留下了机会。

那么，安禄山死后，在新大燕皇帝的领导下，他战略中的这个缺陷会得到弥补吗？

事实上，安禄山在死去之前，最后一项重要的命令就是围攻太原。这可能是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试图弥补之前的失误。而策划人可能是他的宰相严庄。他死前，进攻已经开始。叛军一共派出了四路大军向太原进军，试图攻克这个北方最重要的战略据点。[136]

这四路大军分别是：史思明从位于河北地区的博陵出发，经过井陉

进攻太原；蔡希德从南方出发，翻越黄河以北的太行陉，直插上党地区，再进攻太原；高秀岩在北方的云州向南进攻，翻越雁门关（东陉关）所在的句注山，进入太原盆地；还有一支军队由牛廷介率领，从安禄山老巢范阳出发，这支军队可能也是和史思明的军队一样翻越井陉，只是两者的出发地不同。四路大军加起来有十万之众。

这样，这四支大军就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困了太原城，只有西面茫茫的云中山、吕梁山一侧，由于属于唐军的势力范围，叛军没有涉足。不过这一侧的军事重要性较低，只要把唐军赶出太原盆地，哪怕他们借助西面逃往朔方，对河北和叛军的威胁也就降到了最低，形不成战略威慑力了。

李光弼守卫的太原城只有不到一万人，而且这一万人大都是地方团练组成的乌合之众，至于精兵，早已经被郭子仪带到了朔方。[137]叛军的十万精兵对唐军的一万杂牌军，这样的兵力对比下，李光弼能够守得住吗？

事实上，唐军和叛军双方都认为太原是守不住的。叛军对于自己获得太原城信心满满，甚至已经憧憬起攻克太原之后，可以借此向西进入朔方、河西、陇右等地，将北方的唐军扫荡干净。而唐军的将领们充满了恐惧，即便最大胆的人，也只能提出死守太原，加高城墙，等待援军，这样或许还有一点希望。

但李光弼却否定了他的将军的提议，他认为，太原城的城墙有四十里长，这样的长度就是要统一修缮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战斗还没开始时，就把士兵和民工弄得如此疲惫，是不值得的。唐代的太原城位于现代太原的西南面，在现代晋祠的东北方向不远处。这座城池是贞观十一年时由李勣所筑。这里由于是唐代的北都，也修有皇帝的宫殿，称为晋阳宫。宫殿群所在的宫城周长二千五百二十步，高四丈八尺，而外围的城墙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长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城墙高四丈。[138]唐代的“步”是唐太宗规定的一个丈量单位，

长度恰好是他左右各走一步的长度，每一步等于五尺，三百步为一里。唐代的里大约相当于四百五十米，根据这样的折算，太原城的城墙事实上已经在五十里以上了。[139]

虽然太原城墙太长无法面面俱到地防守，但城墙又是防御的重心所在，不能不做准备。为此，李光弼选择了动用人力、物力更少的方法：在太原城外挖深护城河，把其中薄弱或者深度不够的地方挖深，把里面的泥带回城内做成砖。这样，敌人来攻打时，就可以利用护城河增加敌人进攻的难度。只有等敌人进攻之后，才能看出哪里的城墙薄弱。一旦发现城墙确实损坏了，再用砖块进行快速修理。这种动态的修理，比起在敌人到来之前的统一加固更省力，也更加有针对性。

此外，李光弼对叛军的攻城器械尤其重视。由于叛军远道而来，他们的攻城器械也是在河北地区准备好的，要一路上长途运输到太原城外，押送物资的部队却只有三千人。李光弼打听到了这支部队的路线，派人将押送部队尽数杀死，将攻城器械毁掉。失去了攻城器械的叛军围困太原一个多月，依然没有办法攻克。

到了后来，李光弼与史思明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一种攻守游戏，双方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对于攻方来说，守方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够用。为了利用对方的缺点，史思明精选了一批骑兵部队，让他们与大部队反向行动。大部队从城东进攻，他们就偷偷向城西移动；大部队在南，他们就在北。这样做，是指望唐军在应付大部队时，将其他方位的兵力抽空，给这支骑兵部队以可乘之机。唐军要想不留漏洞，唯一的方法就是打运动战，哪里有险情，就往哪里调动士兵。而运动战要求唐军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警戒系统，能够迅速发现敌情。幸运的是，李光弼恰好以治军严格、警戒严密著称，史思明的游骑兵虽然不断地寻找唐军的漏洞，却没有一次成功。

对于守军来说，唯一的战略就是尽量让敌人远离城墙。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李光弼本人擅长发挥每个士兵的优势，他在士兵中发现了

几个善于挖地道的人，于是地道战这种战术成了唐军的重大依靠。叛军来到城下，仰起头来准备进攻，突然大地打开了一个洞，将几个叛军士兵拽了下去，过了一会儿，这几个叛军士兵已经出现在城头上，被守军斩首示众，他们的头颅被抛下来，吓得进攻方叛军胆战心惊。原来，唐军已经在近处打通了地道，只是用木板掩盖住，只等着叛军前来了。地道除了可以拽落敌人的士兵，还可以把对方的攻城器械毁掉。

不仅是近处的地道，唐军的地道甚至直接打入对方的大营之中。李光弼伪装成投降的样子，从城门内派出数千士兵去缴械。但就在他们靠近叛军时，叛军身后的大营突然地陷，在叛军的慌乱中，原本说要投降的唐军突然间发动了进攻，叛军大败。

除了地道之外，唐军的大炮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杀伤了大量的叛军，这也是李光弼从士兵中发掘出的技术人才做的。

在双方的斗智斗勇中，太原攻防战僵持了一个月。直到安禄山的死讯传来，叛军乱了阵脚。安庆绪决定将史思明调回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作战。到了二月份，李光弼将蔡希德击败，斩首七万余级，彻底解了太原之围。

与此同时，回到了范阳的史思明发现自己的地位已经变了。在安禄山时代，史思明只是一员得力干将，与唐军在河北周旋，并占了上风。安禄山死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范阳的主人。安禄山在世时，将掳掠的大量物资都打包运回了范阳，这使得范阳成了他统治下最富裕的地点。史思明的才干远在安庆绪之上，又得到了大量物资，安禄山的死亡也让他的效忠链条断裂了——他不用再听从安庆绪的。从此之后，叛军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集团，分别是位于范阳的史思明集团以及位于洛阳的安庆绪集团。这两个集团表面上维持着臣属关系，却越来越显露出裂痕，这就是唐朝可以利用的时机。

就在李光弼取得了太原防守战胜利的时候，唐肃宗也于二月初十来

到了凤翔[140]。他到这里是为了筹划另一次反攻的，目的依然是收复两京。

再次失败的光复行动

随着唐军守住太原，并将叛军压缩在低地地带，开展反击的机会到了。

但在唐军内部，到底如何进攻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呼声。第一种声音是以李泌为代表的。早在房琯第一次进攻长安失败后，李泌就向皇帝提供了一道新的战略方案。这个方案充分利用了叛军只占据了从范阳到长安的形低地这一特点。

由于李光弼帮助唐军控制了太原所代表的山西高地，山西的后方又是郭子仪所在的朔方，因此，从朔方出兵进入山西，就拥有了多重可能性。利用山西，唐军既可以从北方攻击叛军的老巢范阳，又可以南下进攻长安，还可以从中路进攻洛阳。李泌的战略充分利用了这种对于唐军有利的战略条件。他提出，安禄山军队中能打仗的只有几员大将而已，其中史思明和张忠志主要在范阳和河北地区，而安守忠和田乾真则在长安。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叫作阿史那承庆的将领跟随安禄山（现跟随安庆绪）在洛阳。皇帝如果命令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进攻河北，郭子仪从冯翊进攻河东地区，那么就可以将叛军中范阳、河北和长安的四员大将死死锁住。河北是范阳的咽喉部位，而河东是长安的咽喉部位，一旦两地被卡，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时，如果不让郭子仪轻易地进攻黄河以南地区，而是给叛军留出长安、洛阳和范阳之间的通道，郭、李在两头不断地袭击，就可以让敌人在这个形箱体中疲于奔命。到敌人完全疲惫时，再派一支人马[141]进攻叛军的老巢范阳，只要范阳被拿下，叛军就无处可去、分崩离析了。[142]

这种做法可以端掉叛军的老巢，一劳永逸地解决叛乱问题。但是，皇帝必须忍受的代价是，战略在一开始就忽略了长安和洛阳两京，并不想尽快收复它们，而是利用它们的位置，将叛军锁住，消耗他们的兵力。直到范阳被捣毁后，叛军没有了根据地，唐军最后才拿下两京，将叛军一网打尽。这显然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因为首先攻克两京更能振奋唐军的士气。

另一种意见是，唐军在经过整顿之后已经非常强大，同时又拥有山西高地的优势，因此完全可以迅速拿下两京，获得足够的政治优势。至于叛军被驱逐出两京之后的动向，以及他们的老巢范阳的情况，都等以后再考虑了。李泌也指出，这一种做法，虽然唐军最初也可以收复两京，但由于唐军中大都是西北兵，不适合留在两京地区，必然会撤走。在唐军的主力撤走之后，退回到河北的叛军必然再回来，形成长期的拉锯战。

但皇帝显然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他的政治考量超过了军事战略考量。

不管是采取哪一种战略，唐军首先都需要获得一块掌握在叛军手中的土地：河东地区。[143]在如今的陕西、河南、山西交界地带，从北方来的黄河突然向东转了个九十度的大弯，在现在的山西境内形成了一片三角形的突出地带。这个地带南沿靠近黄河处，有一片狭窄的低地，是现在山西省芮城县所在地，再往北就是著名的中条山。过了中条山，在吕梁山与汾河以南，又形成了一片盆地地貌，包括现在的山西运城市、永济市、临猗县直到北方的河津市、稷山县。在中国历史中，这个盆地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为从这里既可以顺着汾河去往太原，也可以向西越过黄河进入陕西，还可以翻越中条山从芮城县进入灵宝和三门峡，进入河南。

在唐代时，河东恰好位于两京的中间位置。当年哥舒翰守卫关中时，唐军从潼关出发后，除了在黄河南岸进军，也有一部分兵力部署在

黄河北岸。当唐军被击溃后，崔乾祐指挥的叛军顺便渡河到北岸占据了河东地区，使得这里变成了叛军的据点。

如果唐军要进攻两京，首先必须拿下河东。到了一月底时，郭子仪派人潜入河东城，劝说当地的士兵起义。二月初，郭子仪率领人马从洛交（现陕西延安市富县）向河东进发，又分出来一部分人马进攻位于陕西境内的冯翊。二月十一日，河东城内的内应献城，崔乾祐被一路追杀，但逃走了。唐军获得了桥头堡河东，也由此扼住了长安的咽喉。[144]

接下来，皇帝和李泌的分歧就出现了。到底是留下两京最后解决，还是以河东为跳板继续蚕食关中，并尽快进攻长安？皇帝选择了后者。

与李泌利用整个北方地区作为沙场的宏大战略不同，皇帝的战略简单得多。他只想利用关中地区进行一次攻坚战，夺回长安，之后再沿着传统线路出潼关进攻洛阳。为了进攻长安，皇帝准备了两个方面的行动，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长安城。

在东面，是郭子仪的军队，以河东为基地，首先进攻潼关，将关中叛军的退路截断，然后可以瓮中捉鳖将其消灭。而这恰好是李泌想要避免的局面，李泌主张留出潼关，不截断叛军的归路，让叛军在长安、洛阳、幽州组成的箱体里疲于奔命。如果将潼关阻断，关中的叛军没有了退路，势必拼命死战，唐军即便拿下，也得不偿失。

而在西面，是另外几位唐朝将军，领兵驻扎在长安以西的平原上，与东面的郭子仪完成合围。西面的将军是：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扎在武功，兵马使郭英乂驻扎在东原，另一位将军王难得驻扎在西原。东、西两原都在武功附近，这就意味着这三路大军和当初房琯的进攻一样，依然是分布在狭窄的锋面上，起不到三路并进、钳形攻势的作用。

不过由于唐军的兵力更强，如果东西两路能够配合得当，依然有可能对长安一攻而下。但这时，叛军先动手了。

二月十九日，守卫长安的叛军将领安守忠进犯武功，他首先遇上的是郭英乂。在激战中郭英乂的脸颊中箭，受伤而逃，唐军大败。而在西原驻扎的王难得看到东面打起来了，并没有派军救援，而是逃走了。两员将领逃走后，作为主将的王思礼只好退军到凤翔，重新构筑防线。敌人的游兵直打到距离凤翔只有五十里的大和关。由于皇帝就在凤翔，这次进攻也让凤翔感到了极大的震动，连忙加强了防守，防止敌军再来进攻。[145]

这等于在唐军的进攻还没有展开时，叛军就已击败了唐军的西路军。那么，唐军的东路又怎样呢？

事实上，唐军的西路军一吃败仗，东路军就不得不被动地策划进攻，牵制敌军，免得他们进攻皇帝所在的凤翔。二十二日，郭子仪派出他的儿子郭旰、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从黄河以北的河东出发，按照事前制定好的战略，渡过黄河向潼关进军。他们的进攻最初非常顺利，三员大将渡过了黄河，占领了潼关，斩首五百级。

但接下来，李泌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由于潼关位置过于重要，在洛阳的安庆绪立刻派人前来救援，不惜代价也要夺回来。这一次郭旰等人终于支撑不住了，在丢下了万余具尸体之后逃离。其中李韶光、王祚战死，另一员大将仆固怀恩抱着马头靠马浮渡过渭河，再从陕西地界渡过黄河，才回到了河东地区。

这两次战败意味着皇帝合围长安战略的破产。但唐军依然没有放弃，因为郭子仪还掌握着河东地区，而西面的唐军也只是后撤，等叛军撤退时，他们就会继续进攻。叛军的兵力并不足以同时应付两方面的唐军。

事实上，叛军更加在意的是郭子仪在河东的军队，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过于重要，随时都可以发动新的进攻夺取潼关。

三月二十三日，占据长安的安守忠又做了一次尝试，率领两万骑兵

进攻河东，却被郭子仪打败了，斩首八千余人，俘虏五千人。这次胜利让唐军再次看到了希望，皇帝封郭子仪为兵马副元帅，让他再次组织进攻。

四月份，郭子仪率领军队进行调动，从东面的河东将一部分军队调往西面的凤翔，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必须从长安城北面不远处过去。叛军将领李归仁认为这是一个袭击唐军的机会。十三日，在长安以北的三原县境内，李归仁率领五千铁骑试图截击唐军。不想郭子仪已经派出大将仆固怀恩等人预先设置了埋伏，几乎将叛军杀光，李归仁狼狈逃窜，甚至不得不下河游泳逃走，才回到了长安城。

这次胜利又加速了唐军的进攻步伐。郭子仪并没有继续前往凤翔，而是将凤翔方向的一部分由王思礼负责的军队也调了出来。东路军的郭子仪和西路军的王思礼在长安西北方的西渭桥合军了。西渭桥又称便桥，在咸阳附近，是长安渭河三桥中最靠西的一座。[146]过了桥，他们驻扎在了渭河一条支流潏水的西面。叛军在安守忠和李归仁的率领下，驻扎在京城西面的清渠。

两军遥遥相望，准备了七天。到了五月初六，安守忠撤走了。郭子仪一看对方撤了军，立刻全力压上，发动了进攻。叛军回头来战，用九千人排出了一道长蛇阵。这种阵形容易被对手从中间攻击斩为数段。但郭子仪没有料到的是，叛军选择排阵的都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就在唐军攻击时，叛军的两翼突然间利用骑兵优势向中间包抄，将唐军围困在中间。

这次战斗以唐军大败告终，除了士兵之外，郭子仪的将领和官员也有不少被叛军抓住，物资更是丢失殆尽。他只能撤往武功。唐军第二次试图夺回长安至此完全失败。[147]

唐军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尝试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唐军已经获得了河东地区，皇帝的军队也可以自由地出现在长安的北面和西面，大

量的兵马聚集，使得攻克长安只是早晚的事。战争真正的胜负手是郭子仪夺得河东。

如果将安禄山之乱分成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应该划在潼关失守之前，当时唐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只要守住潼关，就可以利用山东、山西以及南方的围追堵截，逐渐消耗叛军的实力，将其击败。但安禄山攻破潼关导致皇帝出逃之后，战争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叛军居于上风，而唐军已经被打散了，只是因为叛军没有乘胜追击，新皇帝才重新聚集起了军事力量和物资。这个阶段是叛军由盛而衰、唐军逐渐积攒势头的阶段，甚至房琯所做的反攻尝试，也可以划在这个阶段。到了郭子仪夺得河东时，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虽然唐军第二次进攻长安失败，但双方的相对均势，已经变成了唐军的战略优势，暂时的挫折无法改变唐军的整体优势。

在这个阶段接近结束时，安庆绪的叛军在做着最后的突围尝试。他们进攻太原无望，就将更多的兵力放在了突破南方的两个防御点睢阳和南阳上。因为只有突破了这两个点，才能破坏唐朝的经济优势，截断襄阳的物资转运线路，防止北方的唐军从江南获得资助。于是，这个阶段也成了睢阳压力最大的时候。

血战睢阳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五月十五日，镇守南阳的鲁炅终于支撑不住了。他已经在南阳坚守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叛军派出武令珣和田承嗣两员大将相继来攻，都被鲁炅挡在了城外。[148]由于南阳城地理位置重要，敌人也不敢越过南阳向南进攻襄阳，只要襄阳安全，那么从襄阳经过汉江前往汉中的道路，以及从襄阳走陆路经过武关前往长安的道路就是开放的。

但守卫南阳一年并不容易，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鲁炅就已经弹

尽粮绝了。城里的食物都吃光了，一只老鼠都卖到了数百钱，饿死的人处处皆是，活着的人还必须继续守城。南阳的物资供应本应该从邻近的襄阳调拨，可是襄阳城的守军担心叛军拦截，不敢援助南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派出了一位宦官曹日昇前往南阳抚慰。曹日昇从汉江走水路到达襄阳后，襄阳太守魏仲犀却进行阻拦，因为前方有危险，他不敢让朝廷的使者去冒险。而此时，在华北地区已经站不住脚的颜真卿，也恰好通过这条路去往凤翔，在他的劝说下，魏仲犀才放曹日昇上路。

曹日昇带着十骑从叛军的军营中穿过——由于事发突然，叛军纷纷避让，他们成功穿过敌阵来到了城下。城内的守军本来已经绝望了，见有人来访，欢欣鼓舞将他们迎入城中。之后，曹日昇又回襄阳组织了一支千人的运粮队，将粮食从襄阳运入南阳，才帮助鲁炅又支撑了数月。

到了五月十五这一天，即便有襄阳的帮助也已经支撑不住了，鲁炅带着剩下的数千人从城中突围而出，向襄阳奔去。田承嗣派人在后面追赶不及，追了两天，回到了南阳。

但叛军得到的只是南阳这座空城。唐军又转移到了下一个阵地襄阳继续抵抗。鲁炅争取到的这一年时光非常重要，因为这恰好是唐军和叛军盛衰转换的一年。在一年前，叛军势头极盛，而到了一年后，即便他们想进攻南方，也失去了锐气，不可能将触角伸入两湖盆地了。这条决定了唐王朝生死的补给线也得以保全。

与鲁炅的主动撤退不同，在睢阳的张巡和许远所经历的战斗则更加多样化。

这一年的三月，叛军将领尹子奇进攻睢阳，此时张巡已经从宁陵来到了睢阳城，与许远共同守卫这座城市。张巡负责军事，而许远主要负责后勤，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

睢阳城的兵并不多，张巡把将士们集合起来，痛心地告诉他们：既

然受国之恩，死节就是应该的。他唯一不甘的是无法为将士们争取更多的赏赐，让为国卖命的人感到心寒。他说这话，是由于之前他曾经向负责河南地区的虢王李巨请求赏赐，李巨只给了他一些空名告身，没有给其他赏赐。唐朝此时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告身，因为皇帝为了鼓舞将士，几乎到了滥发告身的地步。他发出去了许多在和平时期非常珍贵的名号，比如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等，至于中郎、郎将，更是数不胜数，甚至有异姓封王的。由于名号太滥，大将军的告身只能换顿酒喝，就连普通士兵杂役都可以穿上高官的金紫衣服。[149]唐朝吏治的败坏到此时已经登峰造极。

张巡的鼓励让将士们激情澎湃，他随即杀牛犒军，吃饱之后全军出战。敌人看到他们开城之后出来的士兵不多，纷纷嘲笑。张巡亲自执掌大旗，率军冲向敌阵，将他们击溃。这一仗，唐军杀死了三千多人，将叛军赶出了数十里。

但敌人人数太多，当晚就回来继续围城。双方你来我往，一天出战数十次，变成了持久战。在长期的抗战中，张巡展现了极大的智慧。为了迷惑敌人，他有时敲响进军鼓却并不出击，甚至在夜里不停敲鼓，让敌人休息不好，又不能放松，到了白天反而出兵进攻，最辉煌时，能够杀死对方五千余人。

在张巡营中有一位神射手叫作南霁云，张巡和他谋划如何射死尹子奇。但他们不认识尹子奇，尹子奇也在阵前做了伪装。突然间，从守军中射出一支轻飘飘的草箭，射中了一个叛军士兵，由于草箭太轻，没有杀伤性，这个士兵兴奋地捡起箭来，跑到尹子奇处汇报，告诉他城中已经没有箭了。说时迟，那时快，士兵刚和尹子奇说话，突然间一支箭飞来，正中尹子奇左眼。原来这是张巡的计谋，用草箭去发现尹子奇的位置，再让南霁云射杀他。

尹子奇虽然没有死亡，却失去了左眼，只得退兵。[150]

七月初六，尹子奇卷土重来。如果说睢阳城前几次因为粮食充足，依然可以抵御敌军的话，这一次，他们却遭遇了内部人带来的混乱。

在许远的安排下，睢阳城原本一直不缺粮食。许远准备了六万石的粮食，足够守城之用。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从大方向上看，就会发现睢阳只是河南节度使下辖的一个郡而已。河南节度使不仅管辖现在河南、安徽、江苏北部，还包括了山东黄河以东的许多地方。当时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听说睢阳粮食充足，下令许远将粮食分出一半，运给更靠北方前线的濮阳和济阴。许远并不想分粮，但作为他上司的李巨执意要求他这么做。[151]

如果这些粮食有助于守卫两郡，倒也无所谓，不幸的是，济阴刚刚获得粮草不久就投降了叛军，叛军拿着来自睢阳的粮草开始进攻睢阳。与此同时，睢阳城的粮食在大量消耗之后却不够用了，将士们每天都只能分到一合米，唐朝的一合相当于0.1升，相当于现代的二两到三两。这样的粮食完全不够吃，士兵们只好把纸张、茶叶、树皮等掺杂在米里充饥。在城外的叛军不仅粮食够吃，兵力也是源源不绝，而在城内，随着士兵的死亡，兵力逐渐枯竭了。

睢阳围城战的后期，城内只剩下了一千六百名饥肠辘辘、贫病交加的士兵。城内对于智斗的倚重更大了。张巡为了弥补人员的不足，不断地采用火攻、器械等，将敌人的进攻打断。到最后，敌人也意识到城内的人快饿死了，他们改用围困的方法，在城外挖了三条壕沟避免城内的人逃走，等待着城内彻底失去战斗力。

八月份，守城的士兵还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分开守城，一人负责东北，另一人负责西南。他们和将士们吃着一样的食物，终日在城墙上，没有工夫下去休息。

虽然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但睢阳城并非是孤城。在当时，睢阳周边的城池有许多还掌握在唐军手中。比如，七月份时，当时的河南节度

使贺兰进明[152]就曾经在现在的山东境内打了几次胜仗，连克高密、琅琊等地，杀死了两万余名叛军。

到了八月份，睢阳的周边就有许叔冀在谯郡（现安徽亳州），尚衡在彭城（现江苏徐州），贺兰进明在临淮（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这些地方都在睢阳的身后，受到睢阳的保护。特别是位于临淮的贺兰进明，他原本是掌管这片土地的河南节度使，虽然此时皇帝已经派出另一位官员张镐取代他，但张镐还没有到达，皇帝的消息也没有传来，行使职权的依然是贺兰进明。作为一方长官，贺兰进明本应该调配这一方的资源支持睢阳，只有睢阳安全了，后方的这几个城池才有安全可言。但这些人都没有援助睢阳，也没有送出物资，睢阳的士兵眼看支撑不住，张巡只好派出大将南霁云带着三十骑兵突围而出，去临淮请求贺兰进明帮助。

南霁云出城后面对着黑压压数万敌人，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奋勇出击，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通道，突围后清点人数，发现只损失了两人。到达临淮后，南霁云见到了贺兰进明。贺兰进明却认为睢阳已经是死城，就算出兵也没有意义了。

张巡和南霁云等人只知道打仗，却不知道政治的复杂性。原来，身为节度使的贺兰进明不仅要考虑战场因素，还要考虑官场争斗，内斗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甚至要比外部的打击还可怕。贺兰进明与唐朝宰相房琯是一对对头，作为东部的主将之一，贺兰进明本该受到重用，但作为宰相的房琯曾经利用职权，只给他不重要的位置。贺兰进明也并不是软弱之人，他乘见到皇帝的机会告了房琯一状，这导致房琯逐渐被边缘化，丢了宰相。[153]作为反击，房琯在皇帝任命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之后，又请皇帝给他任命了一个不服从调派的副手许叔冀担任都知兵马使，两人在朝廷的加衔都是御史大夫，相当于是平级，于是许叔冀进驻谯郡，名义上是帮助贺兰进明，事实上既不听调遣，又起到了监视作用。[154]

贺兰进明既需要注意敌人的动向，还要担心旁边的许叔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根本不敢分兵去救援睢阳。援救睢阳的机会就这样在唐朝诸位大将的互相防范中流失了。

在贺兰进明与许叔冀出现矛盾时，还有一个人试图调和两人的矛盾，他就是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适。高适认为要想守住河淮地区，就必须同仇敌忾，放弃恩怨才能做到。他分别给贺兰进明和许叔冀写了信[155]，请求贺兰进明援助睢阳地区，又请求许叔冀放弃恩怨，同心抗敌。高适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他的职位和远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与贺兰进明是好友[156]。但他的热心并没有带来回报，贺兰进明与许叔冀的紧张关系直到他离职也没有解决。

贺兰进明不仅不分兵，还想把南霁云留下。南霁云面对着美味佳肴无心下咽，他慷慨悲痛地诉说着睢阳的惨状，咬下了一根手指交给贺兰进明，然后离开。

南霁云又到宁陵，在这里得到了三千援军。他于闰八月初三夜间，率领援军准备突入睢阳城，到达城下时，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等他们入城后，三千人已经只剩下一千人了。城内的将士听完南霁云的诉说，知道这已经是他们最后能够得到的援助，都放声大哭起来，却依然坚守死战。

他们又坚守到了十月，城中不仅没有粮食，甚至连茶叶和纸都被吃光了，麻雀、老鼠都绝了迹。为了活命，将士们只好将战马杀死吃马肉，马肉吃光之后，张巡不得不采取了一个令他充满了争议的做法：他把自己的爱妾杀死分给将士吃掉。之后，吃人之风在城内蔓延，先是吃女人和家奴，之后老弱病残都被杀死吃掉了。按照史书[157]的说法，那些即将被杀死吃掉的人，即便知道自己必死，却都没有逃走。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本来就逃无可逃了，所有的人都知道必死无疑，只寄希望于多支撑几天，也许多一天，就有援军到来的希望。

事后，在唐肃宗的朝廷里，对于张巡是否应该封功充满了争议，反对者最重要的借口，就是他曾经吃人。他的友人李翰为他据理力争，又亲自写了他的小传，获得了皇帝的赞许，才平定了非议。

张巡和许远曾经想过逃走，但最后放弃了，决定坚守待援。但援军一直没有到来，十月初九，当敌人开始登城时，城内只剩下了四百守军，还大都因为饥饿与病痛无法行动。张巡向着西方朝拜，表示已经尽力了。他和许远被抓住后依然痛骂，尹子奇用刀撬开他的嘴巴，发现他只剩下三四颗牙齿了。尹子奇把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杀害，将许远带到了洛阳。

睢阳城失守时，新的河南节度使张镐依然在路上。

张镐从布衣开始，在风云际会中经过三年就担任了宰相，但由于他是跟随玄宗，并被玄宗派到肃宗身边的，在担任宰相的过程中却并不顺利。比如，肃宗信佛，即便在行在，周围也围着大批和尚，一天到晚香火缭绕，钟磬并鸣。张镐就上奏说要想修福要靠治理好国家，而不是靠滥用和尚。[158]这样的说法虽然是事实，却并不讨好皇帝。在经过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后，整个皇室更倾向于任用听话的权相，对于直臣并不感兴趣。过了一段时间，肃宗就给张镐找了个好去处，他并没有直接罢张镐的宰相，而是巧妙地宣称张镐有文武之才，而战场上正好需要这样的人，于是给了张镐一个兼职，以宰相的身份兼任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把他从自己身边打发走了。

张镐倒是很高兴，于是带着新的身份前往就职。在路上，他听说了睢阳的情况，不仅加速赶路，还在没有到达时就发布了命令，命浙东、浙西、淮南、北海等节度使立刻发兵前往救援，同时获得命令的还有谯郡太守闾丘晓[159]。此外，谯郡还驻扎着许叔冀的部队。

然而当命令发出去之后，这些人有的驻地太远不及来救，而近处的人也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只是眼睁睁看着睢阳陷落。特别是闾丘晓，作

为张镐的部下，他本来应该唯命是从，事实上却完全搁置了张镐的命令。

张镐赶到时，睢阳已经在三天之前陷落了。后人由此认为如果张巡再多支撑三天，就可以获得援助了。但如果理解了唐代内部的争斗，就会明白，即便能够多支撑三天，刚刚到达的张镐同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进行援助。

最后能做的只是寻找一个替罪羊。许叔冀等人位置更高，很难追究，于是责任就落在了不听命令的谯郡太守闾丘晓的头上。张镐命令将他杖杀，作为对不服从者的警告。

杖杀闾丘晓，还为一桩诗坛公案画上了句号，这看上去更像是唐朝文人的一次报复事件。安史之乱爆发后，著名诗人王昌龄来到了谯郡，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刺史闾丘晓，被闾丘晓杀了。[160]

这段公案充满了模糊性，比如，史书上都没有记载为什么闾丘晓要杀死王昌龄，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有其他仇恨。王昌龄虽然一辈子漂泊，只担任过一些小官，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死亡让文人们感到愤怒，只是因为处于乱世时期，无法对闾丘晓追责。

在为王昌龄抱不平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高适。此时高适依然是淮南节度使，虽然闾丘晓不在他管辖之下，但他依然有一定的能力为王昌龄申冤。[161]巧合的是，作为河南节度使的张镐与高适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文人的同情，因此很可能高适是通过张镐来为王昌龄报仇的。

闾丘晓死前，曾经苦苦哀求张镐，以上有老下有小为由，请求留自己一命，张镐只是冷冷地回答："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162]"这也表明这是一次文人集团对军阀的痛快淋漓的复仇。

在守卫了一年多之后，雍丘、睢阳等地最终陷落，叛军打开了通往淮河地区的道路。但是，人们事后复盘时发现，他们的抵抗有着无比重

要的意义，这座小小城市的顽强抵抗，为唐军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就在睢阳陷落时，唐军最重要的攻势已经完成，西京长安也已经收复了。也就是说，就在张巡牵制了对方大量兵力的时候，唐军对于西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

但在叙述官军的总攻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另一位重要文人的命运。他有心救国，却不幸被打成了叛徒。

拯救罪人李白

永王叛乱对于李白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位不懂政治的诗人，不小心被胁迫着参加了永王的行伍，虽然他最后逃走了，但皇帝追究起责任来，依然认为他参与了叛乱。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五十七岁的李白遭遇了牢狱之灾。他先是逃亡到彭泽，但最终被抓到，关进了浔阳大狱之中。他心怀天下，但天下却并不需要他。如果按照谋反的罪名，他将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时，李白不得不放下文人的傲慢气质，他一方面写信给妻子哭诉[163]，另一方面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帮助他的人。在他认识的人中，高适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他和高适、杜甫曾经畅游齐鲁，饮酒作诗，当时三人都还没有做官，可谓布衣之交。

更合适的是，高适本来就是皇帝派来平定永王叛乱的主将之一。前一年十二月，他刚刚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可谓一方大员。永王被镇压后，高适就驻扎在扬州，与人们诗酒应和好不热闹。[164]浔阳距离广陵（扬州）并不遥远，这意味着高适如果想救李白，会是整个事件最简单的捷径。

但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让高适知道李白的处境呢？

恰好这时，一位张秀才正要去见高适，李白连忙写了一首诗，表面

上是送张秀才，实际上是让张秀才告诉高适，赶快救自己出去。[165]这首诗显得有些低三下四，将高适比成张良，在谈笑间就解决了永王的问题。但是，他又带着一点矜持，并没有主动提出请高适帮忙，只把这一行泪写入诗中，表明自己的希望。[166]

人们不知道高适是否收到了这首诗，但是李白作为当时著名的文人被捕，且关在高适的辖区，即便没有这首诗，高适也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他沉默以对，没有证据表明他帮助了李白。当年的友情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

也许孤傲的李白并不适合高适的胃口，反而是略显婆婆妈妈的杜甫更能和高适搞好关系。事实上，到了后来，高适一直与杜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却很少与李白往来。

李白寻求高适的帮助失败了。但他并没有仅仅依赖这一条关系。他寻求帮助的人还包括江南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李白向崔涣写信求救。[167]宋若思恰好带兵三千人去往河南地区。[168]途经浔阳，崔涣和宋若思经过审讯，认为李白的罪行不大，于是做主将他放了出来。

但到这时，李白依然是戴罪之身，只是暂时被放了出来而已，相当于现在的保释。能够决定是否给他免罪的只有皇帝。宋若思一面将李白留在幕府之中，另一方面赶快上书皇帝，表示这个人可用。

李白跟随着宋若思去过九江、武昌，他承担了宋若思的文书的角色，不仅在宋若思的要求下向皇帝写了信，一是说明自己的罪责不重，二是请求皇帝重用自己，还帮助宋若思写信请求皇帝迁都金陵（江宁）。[169]为了让自己更加安全，李白还给当时担任河南节度使的张镐写了信，既是赞美张镐，也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情况，请他替自己向皇帝求情。[170]

但这一切都没有换来皇帝的原谅。第二年（公元758年），皇帝下

令将李白流放到夜郎。甚至有传说，因为当初李白访问太原时曾经帮助过一位不知名的军士，而这位名叫郭子仪的军士又恰好变成了汾阳王，正是郭子仪的担保，才让他免除死罪，改判流放。[171]这种说法不管真假，都增加了李白的传奇性。

但不管怎样，在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时，李白再次踏上了流放的行程，经过洞庭湖，顺着长江沿三峡而上，到达巫山。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还没有到达夜郎的流放地，突然间接到了赦免的消息。

但是这次赦免不是单独因为他，而是皇帝这两年的行动特别多，举行了数次普及性的大赦。比如，前一年的二月就因为改元而大赦，四月又因为南郊祭祀举行过大赦。到了十月，因为册立太子，肃宗更是大赦天下。第二年三月为了对付旱灾，肃宗又下旨流刑以下的赦免，流刑以上的降等。[172]李白到底是因为哪一次大赦而被赦免已经不重要，但不管怎样，他自由了。

第九章 从全局战争到局部战争

收复两京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安禄山叛乱爆发不到两年，唐军在经过两次失败之后，再次做好了进攻长安的准备。这一天，皇帝请参加战役的将军们吃饭，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主导进攻的郭子仪：事情能否成功，就看这一次了吧？

郭子仪斩钉截铁地回答：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当天，郭子仪率领先锋部队出凤翔，向着长安进发。[173]

二十六日，唐军驻扎在武功地区的将领、御史大夫崔光远与叛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天，崔光远派出两名将领，率领两千人进攻长安以北的中渭桥，这里距离长安城已经很近了。他们杀敌千人，逼迫对方放弃了中渭桥，又乘胜追击到了北面禁苑的苑门，距离长安城只是一步之遥了。但就在这时，叛军驻扎在武功的军队听说唐军的进攻，选择向长安方向逃窜。这支军队在禁苑以北遭遇了唐军，在冲突中，他们将两位唐军将领中的一个杀死，另一个擒获，送往洛阳。这一场战斗唐军先胜后败，损失了两员战将，但它对于唐军的意义在于，叛军在武功地区驻扎的军队都已经撤回了长安。也就是说，长安以西已经没有叛军，任由唐军驰骋了。

郭子仪之所以对胜利如此笃定，除了准备充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获得了一支生力军，也是最英勇善战的部队之一——回纥人。

在唐代的北方，回纥已经取代了突厥，成了最强大的民族。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回纥可汗屡次与皇帝交通信息，表示可以派遣军队帮助唐朝皇帝。但是，直到这一次，郭子仪才让皇帝下了决心，邀请回纥人前来助阵。回纥此时的可汗称为怀仁可汗，他命儿子叶护以及将军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人前来助阵。[174]

但是，回纥的助阵又是有代价的。回纥人到达凤翔后，皇帝不仅酒肉招待，还要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回纥虽然兵少，但由于战斗力强，要求并不低，皇帝甚至与他们约定，只要攻克了长安，皇帝只要土地和人民，而所有金帛和女人归回纥。[175]皇帝之所以这么恩宠回纥人，是因为他也意识到唐军的战斗力的确有限，之前即便是郭子仪在与敌人交锋中，也很难保证一定会占据上风。

肃宗的准太子广平王李俶与叶护一见如故，两人约为兄弟，广平王是兄长，叶护是弟弟。

十月十二日，广平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离开凤翔。唐军一共有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其中回纥人有四千，还有不少西域他族的部队。唐军到达扶风之后，郭子仪又约见了回纥部队，招待了他们三天。叶护不断地催促进军，他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招待过后，郭子仪让他们上路，每天给回纥人的供应是两百只羊和二十头牛，加上米四十斛。[176]

唐军这次的进军速度并不快，而是稳扎稳打，避免混乱。二十五日，所有部队都已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才来到了长安以西的香积寺，在香积寺以北沣水东面扎下阵营。香积寺的位置在南山子午谷正北微微偏西，沣水以东，交水（唐代也叫永安渠）以西，距离汉代上林苑内的昆明池不远。[177]

唐军的布阵分为前、中、后三军，分别由李嗣业、郭子仪和王思礼指挥。敌人的十万大军则在唐军的北面排开。

首回合是由叛军将领李归仁挑起的，他率部出阵挑战，被唐军击退，于是唐军乘胜追击，来到了敌人大部队的阵前。就在这时，叛军的大部队在号令声中突然压上，又把唐军赶了回来。唐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在敌人压迫下开始退却，阵形大乱，眼看就不可收拾了。但幸运的是，随着唐军出现混乱，他们丢弃了不少辎重，吸引了叛军士兵前去抢夺，这就给了唐军重整的时机。

作为前军将领的李嗣业一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认定如果不拼死抵抗，军队就会被消灭在这里，他脱掉铠甲，赤膊上阵，拿着长刀站在阵前，不管是人是马，只要撞到他的刀头，全都被砍倒。杀了数十人之后，李嗣业率领人马全都执长刀，排成一道墙，齐头并进，一路砍杀，所向披靡。在他的带领下，唐军奋勇向前，逆转了局势。[178]

叛军一看形势不好，立刻采取了第二招——包抄。他们派出一支骑兵部队，试图从东面包抄唐军，从后面发起袭击。唐军发现后，由朔方左兵马使仆固怀恩带着回纥兵前去迎战，将包抄的敌军部队砍杀殆尽，这次局部战斗让敌人丧胆。

这就到了唐军进行反包抄的时候了，发动包抄的依然是李嗣业。他带着一部分回纥人冲到叛军的后方，与前方的唐军形成夹击。

双方的战斗从中午时分直杀到天黑，唐军斩首六万余级，叛军的尸体填满了沟壑，最后剩余的叛军借着天黑逃回了长安城。

当天夜里，杀红了眼的仆固怀恩依然不肯放弃，他不断地向主帅广平王请求乘夜发动攻击，因为叛军大将李归仁和安守忠都是骁勇善战之人，既然他们败了，就必须乘胜将他们擒获。否则，哪怕唐军夺回了长安，只要两人逃走了，一旦他们重整军队，依然可以成为唐军的心腹之患。[179]

广平王没有经验，并未答应仆固怀恩的请求，而是叫他赶快休息。到了第二天一早，当唐军再想进攻时，却发现对方已经逃走了。

二十八日，唐军终于回到了西京长安。这时距离长安丢失已经一年多。当初唐玄宗逃走后，叛军没有乘胜追击，唐军得以重整。而这时，唐军也没有乘胜擒获对方的大将，同样留下了隐患。

攻克长安之后，按照皇帝与回纥人的约定，回纥人是有权将长安城的财富劫掠一番的。但长安在叛军的手中本来已经恢复了安定，如果唐军刚刚攻克了长安就开始劫掠，给百姓留下的印象就是政府军还不如叛军。到底怎样才能让回纥人放弃约定呢？

解开问题死结的是广平王李俶。他亲自来到了叶护的马前，对叶护深深一拜，将他的担忧说了出来，如果在长安劫掠，消息传到东都，那么东都洛阳的百姓势必不愿意回归，甚至会和敌人并肩抵抗。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即便回纥人要劫掠，也必须等东都拿下之后。

叶护没有想到广平王会给自己下拜，连忙下马还礼，答应暂时不对长安进行劫掠。广平王之拜与叶护的还礼，都被人民、士兵看得一清二楚，广平王拯救长安的故事也流传了开来。

叶护和仆固怀恩没有率领回纥人以及其他西域士兵进城，而是从南面绕过了长安城。长安南面诸门是安化门、明德门和启夏门，到了东南角，回纥人又向北经过了城东的延兴门、春明门和通化门，最后扎营在浐水的东面。他们绕了半个长安城。城内的百姓时刻关注着胡人的部队，直到确定他们不会进城才放心。

广平王则带人进入长安，逗留了三天，之后留下虢王李巨作为留守，自己则率众东进：他们接下来要攻打的是潼关和东都。

广平王留在西京时，郭子仪已经率众东进，追击敌人直达潼关，一路上斩首了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和弘农两个郡。[180]

敌人还有一支部队是驻扎在武关的，经武关可以从关中的长安直达襄阳地区。敌人占据长安之后，为了防止襄阳之兵，也派人把守武关。到了十月初八，王难得率领的兴平军也上奏皇帝，他们已经肃清了武

关，从长安到襄阳的道路由此也开通了。

叛军放弃武关之后，接下来的防守地点在陕城，即如今三门峡的陕县。这里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秦岭余脉，与潼关遥相呼应，是陕西与河南之间的重要通道。陕城以西就是著名的函谷关所在，而哥舒翰的部队就是在函谷关以西不远处遭到覆灭的。

由于唐军进攻太快，原本在陕西的叛军将领张通儒一路上没有形成防御，直接退到了陕城才设防[181]。张通儒保陕城的消息传到了洛阳，安庆绪立刻在洛阳征兵，由权臣严庄率领，来到陕城与张通儒共同防守。此时叛军的队伍依然有十五万人，与唐军的人数相当。

双方的布阵是这样的，在临汾盆地南部有一个叫作曲沃的小城，这里大约在当年哥舒翰兵败地点附近，也位于双方战线的后方。广平王李俶就驻扎在这里。潼关往东，在陕城以西有一个叫作新店的地方，这里是双方战线的交汇点。在新店的南北各有一条小山岭，叶护派出大将藏在南山之中，而叶护本人和郭子仪则在南山以北的谷道内扎营。叛军的部队更靠近北山，身后紧紧贴着山地，处于半高处，从而形成了保护。

郭子仪与敌人在新店相遇后，双方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敌军背面有山的保护，又位于高处，他们将郭子仪向西驱赶，眼看唐军就要撤退了。

但就在叛军向西追赶唐军时，埋伏在南山谷地之中的回纥人渐渐地被甩到了叛军的身后（东面），回纥人从南山中出来，借着尘埃掩护向叛军射箭。叛军看不清尘埃背后有多少士兵，只知道回纥人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与唐军其余部队形成了包抄。在这样的局势下，叛军迅速崩溃了，除了留下漫山遍野的尸体，剩下的人在向东撤退中，连陕城都无法进入，而是直接逃回了洛阳。就这样，唐军攻占了洛阳的最后一道屏障——陕城。广平王和郭子仪到陕城安抚民众，而仆固怀恩带着骁勇善战的回纥兵继续向东进攻洛阳。

十月十六日，严庄将防御失败的消息带回了洛阳。当天晚上，安庆绪收拾人马离开洛阳，向河北地区逃窜。在临走前他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俘获的唐军将领杀害，守卫睢阳的许远则死在了偃师[182]。

十八日，广平王率军进入洛阳，兵不血刃，洛阳获得了解放。此时距离唐军攻克长安不过二十天的时光。但接下来还有一个未解的问题。当初皇帝与回纥人约定，攻克长安后，回纥人可以劫掠一番，被广平王劝止后，条件变成了回纥攻入洛阳可以劫掠。现在，洛阳已经回到了皇帝的怀抱，也到了皇帝将洛阳的财富给回纥人的时候了。

事实上，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回纥人已经开始了劫掠。广平王由于前面的许诺，虽然心中充满了厌恶，却也不便说什么。这一次，是东都父老的智慧挽救了这座城市，他们主动提出贡献一批罗锦，数量达到上万匹，相当于四千回纥兵每人能够分到两匹多。最终回纥人同意了这一条件，才没有继续掠夺。

关于唐朝皇帝允许回纥人抢劫的事，已经争论了上千年。但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的。唐朝作为定居民族，已经学会了通过收税的方式从民间抽取足够的资源来养活官僚集团，但作为游牧民族的回纥人，依靠的却是另外的体系。在回纥体系中，人民不需要缴纳固定的农产品，他们在广大的草原上分片放牧，回纥可汗和他的官僚集团有着自己的草场和牲畜，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也就不需要人民的贡献了。

那么，官僚与人民的关系又体现在哪里呢？对于人民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官僚在国防上的保护，给自己提供安全的放牧环境；而对于官僚而言，他们需要在打仗时，人民提供免费的兵力供他们驱使。援助唐朝的回纥兵虽然是可汗征召的，但并不需要可汗发工资，可汗可以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多的士兵。但为了保持士兵的忠诚，可汗必须允许士兵在每一次胜仗之后进行掠夺，这些战利品就是士兵们唯一能够得到的财物报酬。

回纥士兵之所以帮助唐朝皇帝攻打叛军，也是指望着战胜后可以掠夺。当攻克了洛阳之后，他们认为劫掠是战争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而对于定居政权的唐朝则显得有些不可接受了。[183]

当回纥人从洛阳回到长安时，皇帝亲自率领百官迎接，表达了最隆重的欢迎和谢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回纥人离开时，皇帝又封叶护为司空、忠义王。而更重要的是，他规定每年都要给回纥人二万匹绢。虽然岁币要到宋代才成为常态，但其开端却根植于唐代对回纥的政策之中。

引入回纥兵的代价并没有一次性清算，而是一直持续了好几位皇帝，直到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崛起[184]，将回纥赶出了蒙古高原，回纥的影响力才衰退了。

回纥在唐代的长期强势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

第一，唐代有与胡族和亲的传统，但所谓和亲的公主，大都不是皇帝亲生的女儿，而是宗室女子，甚至是干女儿。比如，仆固怀恩的三个女儿[185]都被封为公主嫁给了回纥人；嫁给吐蕃的文成公主则是宗室女[186]。

在唐代，真正的皇帝女儿嫁给胡人的只有三次，都是嫁给回纥人。第一次就发生在唐肃宗收复两京之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十七日，皇帝在册命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之后，将自己的幼女宁国公主嫁给了可汗。由于这是第一次皇帝的亲女儿外嫁，父亲亲自将她送到咸阳，晓以大义，公主慷慨而行，表示“死且无恨”。[187]公主出嫁到了回纥不久，可汗就死了。按照回纥人的规矩，可敦是要殉葬的，公主以自己是汉人，应该遵守汉人的风俗为由拒绝了。但她将脸划破，血泪交融地大哭了一场，方才过关。由于她没有儿子，最后侥幸回到了唐朝。[188]

宁国公主之后，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和宪宗的女儿太和公主都嫁给

了回纥可汗。其中咸安公主遵从回纥的风俗，老王死后嫁给新王，一共嫁了四位可汗，最后死在了大漠。太和公主是在穆宗时出嫁，她恰好赶上了回纥的崩溃。回纥人被黠戛斯人赶离了位于蒙古高原的摇篮后，黠戛斯人将公主送回唐朝，路上又被已经进入唐朝边境暂居的回纥人截留。最终她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长安，死在了家乡。[189]

三位公主的父亲分别是中唐时期的三位雄主肃宗、德宗和宪宗，表明唐朝君王对于这支外来友军的依赖性。皇帝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赖他们。

回纥人对于唐朝皇帝如此重要，他们得到特殊的待遇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史书中，充斥着回纥人在长安不受法律约束的例子。比如，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闰正月初五[190]，有十五个回纥人不知什么原因进犯皇城的含光门，甚至突入了鸿胪寺，看门的人却无可奈何。而回纥人在唐朝境内的劫掠甚至杀人，地方官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盛唐时期不会出现，但在中唐之后却成了常态。[191]

叛军逃离洛阳后，唐军对叛军的清剿并没有立刻停止。十月二十日，郭子仪派遣大将攻取了黄河上的河阳，以及黄河以北的河内（现河南沁阳一带），从而控制了通往河北的道路。安庆绪最倚重的大臣严庄也投降了唐军。由于唐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全国各地，当地的人们纷纷揭开了抗争的大旗，叛军陷入了左支右绌之中无法抵挡。刚刚战胜了张巡、占领了睢阳的尹子奇也在陈留被人杀死。他赢得了一场血战，却无法在另一场混乱中存活。

安庆绪跑到了河北的邺郡，当他到达时，仅剩下三百骑兵和不过千人的步卒跟随。此外，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投奔了常山、赵郡、范阳等其他城市。很快，田承嗣、蔡希德、武令珣等人纷纷从其他地方赶来，这才又凑够了六万人。于是河北地区成了安庆绪控制的主要区域。

到了十一月初，河南、河东地区已经扫荡殆尽，除了河北之外，只

剩下北海、云州还掌握在叛军手中。

到这时，唐军距获得全面的胜利只剩下最后一步。但就在这时，对于皇帝来说，战争已经成了次要的问题，他考虑的是重新获得长安之后，如何调整与太上皇的关系，以及如何安排群臣与将军们重新组建朝廷。显然，他的转向过早了。

重建朝政

收复长安之后，对于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军事，而是家庭关系。

整个收复战役中，在成都的太上皇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给皇帝添了许多的麻烦。收复后，皇帝首先担心的是，太上皇一日不回来，就可能给帝国多带来一些麻烦。

唐朝宫廷有父子反目、钩心斗角的传统，甚至许多次内斗都必须以一方的死亡作为结果。太上皇到达成都后，任命了不少官员，虽然他也主动向新皇帝示好，让这些官员到北方见新皇帝，可是毕竟没有人知道这位太上皇和皇帝一旦重聚，是否能够平衡好权力。

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太上皇完全放弃权力，让皇帝独揽朝政，但没有人有充分的把握认定他会这么做，而太上皇本人也不确定儿子会不会对他不利。唐朝宗室纷争的传统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彼此信任，只能预先进行防范，而他们的防范又会被对方解读为冒犯，最终激起双方的敌意，让事情无法收场。[192]

但如果太上皇不回来，处于皇帝身边，在成都就会出现另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早晚会和长安的朝廷出现冲突，甚至反目成仇。这样看来，父子之间情况极其微妙，不管太上皇回来还是不回来，由于双方无法建立互信机制，都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

从皇帝的角度看，是希望太上皇回来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朝廷的分裂。但是太上皇到底是把避免分裂放在首位，还是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一个已经放弃过整个帝国的老人会在意所谓的分裂吗？皇帝又要怎样才能取信太上皇呢？

在刚刚收到攻克长安捷报的九月二十九日，皇帝除庆祝收复都城之外，还派人给身在成都的太上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请太上皇回京继续当皇帝，而自己将回到东宫继续当太子。

如果了解唐朝的内斗传统，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封非常不合时宜的信。当了皇帝的肃宗身边已经聚集了大批亲信，一旦皇帝放弃皇位，让位给父亲，太上皇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朝臣，必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政策，可如果换人，又必然引起宫廷内的阴谋和内斗，造成父子反目和宗室血案。太上皇也必然会意识到，儿子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许诺，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回去而已，其余的都不能当真。这封信事实上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发出了父子内斗的第一个信号，作为聪明人的太上皇必然会察觉到这个信号，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继续留在成都，形成割据局面，避免被儿子及其党羽害死。

在攻克长安时，李泌是跟在广平王身边的。皇帝将他召回后，把给太上皇的信给李泌看了一下，李泌立刻意识到这封信会让太上皇强化割据之心，不会再回来了。作为补救，他请皇帝以群臣的名义给太上皇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详细叙述了群臣在马嵬坡留下太子，并在日后劝进的来龙去脉，表明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太子有意去争夺皇位。信中还以群臣的口吻描述了皇帝对太上皇的思念，请太上皇回长安，以便皇帝尽孝。这封信再也没有提到皇帝退位给父亲，只是通过父子亲情暗示，请太上皇回长安颐享晚年，只要太上皇不参与政治，皇帝不会对太上皇做出不利的事情。[193]

这两封信一先一后到达了成都，太上皇看了第一封信，立刻意识到这是内斗的信号，回信表示，请皇帝把剑南（四川）让出，他准备在这

里养老，这事实上就是宣布了割据的局面。太上皇的回信于十月十八日返回凤翔，皇帝见信大惊。就在他惊魂未定时，太上皇的第二封信到了。原来，太上皇最初也只看到了第一封信，后来看了“朝臣”上的第二封信，意识到父子之间暂时可以取得互信，他决定以国家为重，回到长安。虽然太上皇可能对未来依然有疑虑，但这种疑虑不至于让他做出激烈的举动，而是宁愿相信皇帝，碰一下运气。

除了解决太上皇与皇帝的纠纷之外，李泌还试图调和皇帝与未来太子的关系。鉴于皇帝有听信妃子（未来皇后）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的“前科”，甚至因此杀死自己最有才干的儿子建宁王，李泌以武后和她的儿子们的故事提醒皇帝，他的儿子是有限的，不能一个个都杀掉。这个提议保护了未来的太子广平王，也就是将来的皇帝代宗。

在帮助皇帝解决了家事之后，李泌提出离职。他在肃宗皇帝最危急的时候前来帮助，又在皇帝刚刚克复两京时就选择离开，与其他宰相的内斗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安史之乱时期的诸位宰相级官员中，李泌（事实上他没有在肃宗时期担任宰相，而是到了德宗时期才拜相）和张镐如同两股清流。他们一个通晓世事、屡出奇策，另一个刚直不阿、爱惜人才，虽然都执政不长，但因继承了玄宗早期的贤相传统，被人们所铭记。

在离开肃宗之后，李泌前往衡山修道。但这只是他漫长的传奇生涯中的第一步，在代宗和德宗时期他还会在关键时刻回来帮助皇帝，表明了他在朝堂和山海之间的适应能力。只是后面的部分由于与本书无关，他的传奇也就暂时离开本书读者的视线了。[194]

十月十九日，皇帝终于离开了他的凤翔行在，向长安进发。在同一天，他派出韦见素去四川接太上皇。

二十二日，皇帝来到了咸阳东的望贤宫[195]，在这里他得到了东都洛阳的捷报。第二天，皇帝进入西京长安，此时距离他们离开长安已经

一年多，距离房琯组织的第一次反攻也有一年了。那一次皇帝本来以为能够回来，战争却又拖拖拉拉进行了一年，唐军才终于有了突破。不过，获得了两京的皇帝怎么也想不到，八年的安史之乱只不过才刚到第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不过只有两年而已。这也可以看出唐军的脆弱，以及唐朝的官僚系统被破坏的程度。

长安的百姓欢呼雀跃，到二十里外迎接皇帝，许多人都喜极而泣，以为会回到盛世之中。他们不知道，这个皇帝和当年的玄宗皇帝已经有了区别。很快，加税和货币贬值的厄运都会纷纭而至，皇帝不这样做就无法渡过难关。[196]

皇帝没有去城内的西内太极宫居住，而是来到了城外北方的大明宫。这也表明了皇帝的谨慎，不敢完全相信长安的百姓，毕竟在城外的大明宫更加安全一些。在大明宫，那些曾经投降了叛军、担任大燕官员的人都被迫光着脚、摘掉头巾在含元殿前站着，等待皇帝的裁决。皇帝到达后，他们在兵士的环卫下给皇帝叩头。他们的命运在下文还会谈到。太庙已经被叛军烧掉了，皇帝无法祭拜，只能素服对着遗迹哭了三天。

也是在同一天，太上皇从成都出发，踏上了回归的道路。

十一月初，广平王和郭子仪都从东都回来了。皇帝对郭子仪表示感谢，感慨整个国家的再造都有赖于这位以宽宏为主的将军。从军事谋略上来讲，郭子仪吃过不少败仗，对军队的控制和运用也比不上李光弼，甚至不如仆固怀恩，但郭子仪的宽宏和坚韧却是唐朝再造过程中最需要的。正是他在肃宗最危急的时候率兵前往灵武，才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局势。也是他一次次失败后又一次次继续努力，才有了克复两京的功业。更重要的是，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人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却无法解决唐朝君臣互相猜忌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一直困扰着各位将领，让他们除了与敌人作战，还必须互相防范，避免被自己人杀死。皇帝任命宽宏大量的郭子仪作为副元帅，恰好解除了

人们的担忧，所有将领都认为在郭子仪的手下不会被埋没，也不会遭到报复，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打击敌人，将互相怀疑的诡异气氛暂时清除了。

十一月初十，太上皇终于来到了凤翔，跟随他的士兵有六百余人。他走的时候仓皇，回来的时候凄凉，所有的人都在庆祝伟大的胜利，只是这个胜利和太上皇无关，他只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老人而已。

为了表示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太上皇把他的士兵都送到了郡县听命。皇帝则派出了三千名骑兵表示欢迎。太上皇之后的行程很缓慢，直到十二月初三，他才来到咸阳。皇帝则在望贤宫等候自己的父亲。到这时，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年多以前，太子是那么弱势，甚至担心自己能否活到即位那一天；如今，新皇帝的地位已经稳固，担忧自己未来的反而变成了太上皇。

二人自然也免不了表演一番。太上皇在望贤宫的南楼之上等待皇帝，皇帝没有穿象征皇帝的黄袍，而是穿了一件当太子时的紫袍，骑着马，第一眼见到南楼时就下马，步行到楼下。唐代臣下见皇帝的礼节除了拜之外，还要做一种特殊的舞蹈动作，现在这种动作已经失传了。[197]皇帝对着楼上拜舞。太上皇从楼上下来，抚着皇帝哭泣，皇帝则抱着太上皇的脚呜咽着。

接下来，太上皇向人要来了黄袍，亲自给皇帝穿上。皇帝则不断地磕头拒绝。太上皇表示，这是天数，皇帝已经得了人心，而他想要的，只是安度余年。皇帝这才接受下来。

老百姓也在承担着本分的表演，他们先是在仪仗队之外围观赞叹。当仪仗队移除后，他们前来拜谒，并表示见到两位皇帝真是太幸福了。

上殿时又是一番推辞，太上皇不肯居于正殿，又是皇帝亲自扶他登殿。吃饭时也是皇帝先品尝，表示没有事，再送给太上皇吃。

后世的史臣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这一幕幕礼节，是为了彰显教化，表

明君臣父子的礼数。[198]但后人看到的却是父子两人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以免引起对方的戒心。他们越表现得彬彬有礼，越容易让人看到背后的剑影刀光。

这一切礼节还没有结束。初四回程时，皇帝亲自给太上皇试马，又扶他上马，为他牵笼头，走了几步，太上皇这才制止了他继续步行。于是皇帝骑上马在前面带路，他不走在正中，而是走在一边，把中间的驰道让给父亲。太上皇感动地说："我当天子五十年都不算贵人，今天当了天子父，才真的算是贵人。"一句话道出了他心中的不甘与酸楚。

太上皇从长安西北角的开远门进入大明宫，登上正殿含元殿抚慰百官，之后前往长乐殿感谢九庙主，痛哭一场之后，离开大明宫，来到了号称南内的兴庆宫，这里是他当太子时的宫殿，规模比太极宫和大明宫小得多，但之后由于扩建过，也号称是皇宫，被称为南内。太上皇以后就在这里居住。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在不停地上表请求避位，请太上皇执政。每一次上表，太上皇就离权力的舞台更远一点。他就这样被儿子半孝敬半逼迫着永久性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皇帝返回长安之后，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投降叛军的官员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在形势面前，很难完全判断孰是孰非。

在太上皇逃跑时，几乎瞒住了所有的官员，许多人在等待上朝时才知道皇帝已经跑了。从这个角度看，是皇帝首先抛弃了自己的大臣，只顾逃命。

但也不能说这些官员毫无责任，毕竟还有一部分人逃走了。但这种逃走，又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听说皇帝逃走后，在后面紧跟着皇帝逃走的只是少数，这些人后来由于追随有功，大都升了官。大部分官员却在家庭和皇帝之间犹豫不决，他们都不知道皇帝逃到哪里去了，就算想跟着，但追不上，也只好回来了。大部分人在惶恐和犹豫中把时间错过

了，再想离开长安，也不知道去哪里。等叛军到来后，就把他们一窝端了。

安禄山虽然想杀掉皇帝，但他更想建立一个政权，这样一来，自然也离不开官员。所以，安禄山对于唐朝的官员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把他们带到东都去当官。

这些官员在东都惴惴不安地判断着形势。安庆绪撤退时，由于过于匆忙，也没有办法带他们走，只是将三十几个俘虏杀死了事，其他的官员大都获得了自由。但随后这些自由的官员就被唐军抓了起来。

这些官员以原来的宰相陈希烈为首，一共有三百多人。他们穿着素服向广平王请罪，广平王将他们带到了西京。负责审判他们的是御史中丞崔器。不幸的是，崔器是一位性格刻薄的官员，在安史之乱之初，作为奉先令的他也曾经当过俘虏，做过短期的伪官，之后因缘际会在肃宗处得到了重用。这样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会对其余担任过伪官的人下死手。[199]

果然，除了上文提到的在迎接皇帝回京时，罚这些伪官磕头之外，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崔器将这些人押往大明宫的朝堂请罪。朝堂在含元殿的东西两边，分别称为东朝堂和西朝堂，是皇帝接见群臣的所在。请罪完毕，崔器将他们全都收进了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之中。

接下来就是鉴别工作，首先找出来的是那些不肯为叛军所用的气节人士。比如一位叫作甄济的人，安禄山没有反叛时，甄济曾经在他手下任职，后来他觉察到了安禄山的野心，就辞官不做了。安禄山反叛后，为了逼他出山，派将领蔡希德带了两个刀斧手去，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出山，甄济把脖子伸长了等待他们下刀，蔡希德也不想伤害他，只好回去说他真的病了。安庆绪时期，甄济被胁迫到东都，但他依然不肯做官。等广平王破了东都，甄济立刻去拜见广平王。皇帝认为甄济忠心耿耿，于是把他供在三司衙门里，三司在审判那些罪臣时，让这些罪臣

一一向甄济拜一拜，作为对他们的羞辱。[200]

除了甄济这种不肯投降的之外，其余的人也做了区分，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或者因为家在附近被胁迫的，只要能坦陈实情，都会获得宽赦。安禄山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也得到了宽恕，因为他虽然做了叛军的官，却利用职务保全了不少百姓。

对于剩下的人怎么处理，意见分成了两派。皇帝任命的主要审判官员除了御史大夫崔器，还有三人，分别是兵部侍郎吕諲、礼部尚书李岘和殿中侍御史李栖筠。其中崔器和吕諲为一派，主张叛变投敌者都应该判死罪。而李岘和李栖筠为另一派，认为皇帝更应该讲求宽恕，特别是现在仗还没有打完，叛军中许多人已经没有了斗志，只等机会投降朝廷，如果过分惩罚这些官员，会让那些还在叛军中的人感到恐惧，不敢投降唐军。[201]

皇帝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将这些官员按照轻重程度分成了六等，其中第一等当众斩首，第二等赐自尽，第三等打一百杖，剩下三等则是流贬。十二月二十九日，积极配合安禄山的官员，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共十八人被斩首于城西南的独柳树下。陈希烈作为宰相投降了敌人，他与其余六人被赐死于大理寺。[202]第三等杖刑的人则受刑于京兆府门。

在受刑的人中，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原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这两个人曾深受太上皇喜爱，张垍还是当朝驸马，不想最后都投靠了叛军，张垍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张均则被任命为中书令。按照定罪，两人也应该是死刑，皇帝却想救下他们。可是太上皇对这两个人的印象过于深刻，坚决要处死两人。肃宗以张说曾经保护过他们为由，救下了驸马张垍，但张均却无法救下了。[203]

在涉罪的官员中，还有一位本书常常提到的人物——王维。

在唐代的官僚系统中，王维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安禄山授予他给侍

中，也算不上显达的官职。但唐军攻克东都后，王维也和其他的官员一起被抓起来，送往西京，与郑虔、张通等人一起关押在宣阳里的杨国忠旧宅里。[204]这三个人都擅长画画，当时宰相崔圆恰好处于权势高峰，借此机会让他们给自己画画。

王维的幸运在于：第一，他在东都被迫参加凝碧池宴饮时写了一首诗，其中“百官何日再朝天”一语让皇帝颇为动容，也证明他虽然身陷敌营，却并没有忘记正宗的皇帝。第二，此时，王维的弟弟王缙已经崭露头角，官至刑部侍郎兼北都副留守，他用自己的官职作保，请求以刑部侍郎赎取哥哥的罪名。[205]

王维在忐忑中等待着对自己的裁决。直到第二年初皇帝给他复了官，让他担任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他才真的相信自己被赦免了。欣喜若狂的王维也忘记了所谓佛法，迫不及待地写了谢表，表达自己的感激，并再次忏悔了自己的罪过。[206]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也表达自己不仅免罪还复了官的得意心情，在他的眼中，连大自然都是那么媚俗式的可爱，“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207]。从这时开始，他又过上了悠闲的官员生活，早朝时，为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208]而感到自豪。

自然，其日常也少不了官场上的应酬，以及烹葵看竹的时光。总之，王维的生活突然间恢复了他惯常的状态，他依然在官僚与隐逸的夹缝中优哉游哉，仿佛安史之乱没有发生一样。

在皇帝收复两京后，度过了一段潇洒日子的除了王维，还有另一位诗人杜甫。皇帝回到长安后，立刻举行了大明宫早朝。这样的早朝被视为政府恢复正常的标志。参加早朝的文人除了王维，还有杜甫、贾志、岑参等人，他们都供职于两省，成了同僚，于是诗词往来也成了常态。

那么杜甫又是怎么成了王维的同僚的？原来，在从长安的叛军中逃走之后，杜甫听说皇帝在凤翔，立刻也来到凤翔找到了皇帝（至德二载

四月）。虽然比不上那些跑到灵武去伴随皇帝的大臣，但杜甫也得到了皇帝的奖励，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209]

杜甫在庆幸自己找到了皇帝的同时，另一个巨大的恐惧却向他袭来：他和妻儿被迫分离已经近一年时间了，他们还活着吗？他们又是靠什么生活？特别是听说叛军最残酷时，连鸡狗都杀光了。就算躲过了杀戮，他们又吃什么、喝什么？杜甫在凤翔刚刚获得职位时，还不好意思开口提省亲。他从长安寄出的信已经十个月了，却没有消息返回。他战战兢兢地从凤翔继续发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虽然盼着有家信来到，却又越来越害怕收到家信，害怕收到坏消息。[210]

到了当年秋天，他才终于获得了家信，得知家人无恙，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八月份，他终于请假前往鄜州去探望家人。一路上他徒步而行[211]，经过一片片的废墟，终于回到了鄜州。当他突然出现时，妻子、孩子都没有准备，竟然都吓坏了，随后纷纷垂泪。街坊邻里感慨着站满了墙头。他们说话直到深夜，就像做梦一样。[212]

当初逃难时，女儿饥饿到咬他，儿子更懂事一些，但为了填肚子，跟父亲要那些不熟的苦李子充饥，想到这里杜甫感慨万分。[213]

十月，随着皇帝收复了西京，杜甫也得以回到长安，继续担任左拾遗。除了自己任职之外，他还帮助了另一位老朋友岑参。[214]

安史之乱开始时，岑参还在北庭。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春末，岑参知道了内地的情况，也赶了回来，恰好是皇帝在凤翔之时。到了六月份，杜甫已经担任了左拾遗，他上书皇帝推荐岑参，让岑参得到了右补阙的职位。到了冬天，岑参跟随皇帝回到长安，杜甫也探亲回来。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中书舍人贾至和王维。

大明宫早朝是皇帝恢复统治的象征，于是贾至、王维、杜甫和岑参四人纷纷写诗纪念这个时刻。首先写诗的是贾至[215]，随后王维、杜甫和岑参各自奉旨和诗[216]，虽然这些作品无不是应酬之作，但作为特殊

时期的见证，依然形成了一段佳话。

不过，与其他三人比起来，杜甫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就在他春风得意时，祸端却早已经在一年前埋下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杜甫刚刚来到凤翔跟随皇帝，当时皇帝因房琯进攻长安不利大怒，决定罢免房琯。这件事情和杜甫并没有关系，但杜甫却自认为是房琯的朋友，上疏表示不应该罢免房琯。整个过程听起来有些像司马迁和李陵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司马迁丢掉了自己的生殖器。这件事也让肃宗皇帝大怒，他要将杜甫交给三司审问，追究刑责。虽然唐朝已经没有了胡乱割人生殖器的习惯，但贬官甚至流放看来是免不了了。幸亏当时喜欢文人的张镐是宰相，他出手相救，皇帝才作罢，将房琯贬到地方当刺史，暂时没有追究杜甫的责任。

但如果以为皇帝将这事忘了，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二年，皇帝回到了长安，杜甫在做了几个月的左拾遗后，收到了皇帝的斥书，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只享受了几个月的好时光，就被迫离开了长安。[217]

在唱和的四人中，杜甫和贾至[218]被贬官外放。或许是命运让杜甫必须在漂泊中记录这个时代。

差点儿结束的叛乱

唐军攻克了两京之后，已经将全局性的叛乱变成了局部性的战争。皇帝控制了长安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整个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河南近乎全境。只有河北与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掌握在叛军手中。在叛军占领的据点中，称得上强硬的只剩下了三个：安庆绪控制的邺城（以及其所在的相州）、史思明控制的范阳以及高秀岩控制的云州。

在这三个据点中，邺城位于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上，是收复难度最小的，而范阳和云州恰好就是后世燕云十六州[219]的两个中心地带。到了北宋时，因为失去了云州和燕州（幽州），中原地区相对于北方的游

牧部落成了弱势，从而一直担心来自北方的攻击。北宋的灭亡也和失去燕云十六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史思明和高秀岩如果联手，或者投向北部的游牧民族契丹、回纥等，都会对唐朝构成巨大的祸患。李泌曾经想先攻克范阳和云州，最后再解决两京问题，即首先获得战略要地，将敌人吸引在战略上不那么重要却很富裕的两京地区，最后再一网打尽。既然皇帝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那么在攻克两京之后，随着叛军向范阳的回流，他们形成割据势力的可能性大增。

如果安禄山还活着，那么唐军受到的威胁更大，因为安禄山能够指挥得动范阳的史思明和云州的高秀岩，形成三地联动。可是安禄山之死将史思明等人的效忠解除了。安庆绪杀死了父亲，却没有父亲的威望，这就给了史思明独立行事的借口。如果能够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唐朝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来结束叛乱。

到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一个现成的机会出现了。安庆绪崩溃后，大量的军队向范阳涌去，叛军之间的对抗加剧了。

首先去往范阳的是李归仁率领的叛军部队，包括了大量的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部族武装，加上其余的精兵一共数万人。他们一路上烧杀劫掠，守卫范阳的史思明听说他们来了，立刻开始准备防守。等这些溃军到了范阳境内，史思明派人前往招降，并让他们停止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其中曳落河、六州胡等部族投降了史思明，加入了他的范阳守军，而同罗部则不肯投降，被史思明出兵击败后，从范阳旁边掠过，向燕山以北退去。

刚刚解决了李归仁溃军的问题，安庆绪又派来了另一支人马——大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的部队。他们这次带来了五千精兵，借口是要从范阳基地征兵，前往河北地区对抗唐军。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都是名将，史思明不敢大意，但如果他允许两位将军征兵，就意味着承认了安

庆绪的领导地位。可是，在当下，范阳的实力已经成了叛军中最强的一支，而安庆绪的能力却不足以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如果史思明承认了安庆绪的领导，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命放在了一个不合格的人手中，迟早会被杀死。作为安禄山手下最有能力的将领，史思明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吗？

就在这时，史思明的判官耿仁智提醒他，安庆绪已经如叶上的露珠，败亡是早晚的事情，如果史思明能够看清形势，投靠唐朝，帮助官军打败安庆绪，那么他们之前的罪过会被既往不咎，还可以继续担任唐朝的重臣。[220]耿仁智的提议打动了史思明，他开始准备起义。

安守忠和阿史那承庆到来后，史思明立刻率领数万人将他们阻挡，两军相隔一里左右停住。史思明派人去告诉阿史那承庆等人，将士们都很欢迎他们的到来，但由于边兵怯懦，担心出事，因此请双方都放下兵器一起言欢。

阿史那承庆等人听从了史思明的劝告，将兵器放下。史思明将他们带入内厅，尽情叙旧，一片祥和。阿史那承庆不知道的是，史思明已经暗地里派人将北上士兵的武器都收缴了，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送给粮食盘缠遣散。这些事做完了，当阿史那承庆第二天一早从灯红酒绿中清醒时，已经成了史思明的俘虏。

解除了威胁之后，史思明派将领窦子昂带上降表，以所部十三郡八万人的名义向唐王朝投降。在云州的大燕国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听说后，也立刻选择了投降。

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长安，将降表奉上，皇帝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就连他的七个儿子也都封了官。之后，皇帝派出宦官李思敬和史思明的故旧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慰，并派史思明进攻安庆绪。乌承恩的父亲乌知义曾经担任平卢军使，史思明曾经是乌知义的手下，受到乌知义的善待。乌承恩去后，成了史思明的心腹。

史思明归降后，立刻将常山和井陉控制，帮助唐朝打通了从太原前往河北的道路，乌承恩也一路上宣布诏令。于是，河北地区大燕国控制的州郡纷纷投降，除了安庆绪所在的相州之外，都回归了唐朝。河北之外，安庆绪唯一的据点是山东的北海，到了第二年二月初，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也支撑不住，投降了唐朝，皇帝任命他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

这是唐朝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机会，除了相州之外，其余地方都在名义上服从了唐朝的统治。只要唐王朝运用得当，安史之乱完全可以提前五年多结束，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虽然唐朝内部已经有了许多节度使，中央权力已经被削弱，但只要战乱结束，那么社会经济的恢复依然可以让人们有着不错的生活。[221]

也应该看到，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安禄山原来的下属史思明和高秀岩等人依然有很强的控制力。特别是史思明，除了他控制的范阳之外，他的儿子史朝义还担任了冀州刺史，他的两位将军分别担任恒州刺史和博州刺史，加上河北的将领大都和他有渊源，事实上，他控制的区域依然是广大的。

这就又回到了唐代那个有名的悖论：一旦一位将领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在唐代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在后来的宋代，由于宋太祖的策略，宋代的将军和大臣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即便他们权力再大，皇帝让他们放弃时，他们依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回家做一个富裕的地主，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皇帝杀掉。

可是在唐代，史思明就不那么幸运了。不管是之前的张守珪和王忠嗣，还是后来的安禄山，当他们的职位过多、权力过大时，都没有办法安全地降落，不是在内斗中倒台，就是发动了叛乱。到了史思明时代，如何安置他依然是无解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史思明离职，给他一个和平富裕的结局。但这样的做法超出了唐朝的系统，不可能做到。他即便真的忠心于朝廷，也很难

逃脱两种宿命：一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失去权力—皇帝依然担心他的党羽—他被追究掌权时的责任—被皇帝杀死”；二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不敢放权—与朝廷对抗—被剿灭”。

最先提醒皇帝要防范史思明并解除他的权力的，是当时的宰相张镐。在收复两京之后，被皇帝派去兼任河南节度使的张镐也因为有功加封了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但皇帝依然不想让这个还挂着宰相头衔的刺头回到自己身边，下诏让他留守汴州，继续追剿安禄山余党。不想张镐并不识趣，他是一位勤勉、不肯趋炎附势的官员，虽然也无法解开这两个链条，但他又能看到在唐代的政治体系下，史思明的存在是危险的。他在史思明投降之初，就写信给皇帝，表示史思明的归附只是暂时的，因此皇帝必须警惕，做好准备，逐渐剪除史思明的权力。同时，他又告了自己的手下滑州防御使许书冀一状，请求皇帝将他免职。但不幸的是，皇帝此时需要史思明的投降。另外，皇帝宁愿相信自己的宦官——他派遣的宦官都在说着史、许两人的好话。这让皇帝认定张镐是个无用且烦人的刺头，于是罢了他的相职，让他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个官职也很重要，却让皇帝在中央上摆脱了张镐。[222]

第二个提醒皇帝的人是李光弼。李光弼也意识到史思明的权力太大。由于唐朝官僚系统的局限性，李光弼也没有办法和平地解除史思明的权力，于是他给皇帝献出了一条暴力的计策，也就是做局杀死史思明。

李光弼计划中除掉史思明的人选是乌承恩。他劝说皇帝秘密授予乌承恩范阳节度副使的职务，又给另一员叛将阿史那承庆赐予铁券，让这两个人除掉史思明。此时的阿史那承庆还不知道李光弼和乌承恩的计划，自然也不知道皇帝想让他杀死史思明，他根本没有机会亲自做出选择，就被强塞了这个使命。

乌承恩投靠了皇帝之后，在范阳军营不断地寻找目标，偷偷劝说将

士们反对史思明。他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进入军营去策划。这些事情传到了史思明的耳中，他最初还不介意，不相信乌承恩会背叛自己。但有一次乌承恩去了长安，回来时带来了宦官李思敬。史思明多了个心眼，安排乌承恩住在自己的府中，偷偷在他的床下藏了两个人。乌承恩的小儿子也在范阳，史思明安排他去见乌承恩。深夜，乌承恩见四处没人了，偷偷地将计划告诉了儿子，并告诉他事成之后，自己就可以成为范阳节度使。

话音刚落，史思明安排的人从床下钻出，将乌承恩父子抓住。从乌承恩身上又搜出了给阿史那承庆的铁券以及李光弼的信，信上提到，只有事成之后才能给阿史那承庆铁券。此外，还有一份数百人的名单，记载了史思明心腹下属的名字。

史思明见到这些证据，立刻大怒，他召集将士，对着西方大哭，控诉皇帝的无情无义：明明是自己带着十三万人投降，才让皇帝有机会结束战争，不想战争还没有最终完结，皇帝已经开始谋算着杀他。[223]

他杀了乌承恩等人，并上书皇帝要求惩罚李光弼。

日后，人们常常责怪李光弼，认为是他的计谋失败，让安史之乱死灰复燃，再次扩大。但我们应该看到，唐朝的政治体系下，史思明问题已经成了死结，迟早会爆发：不是以对唐王朝有利的方式，就是以唐王朝更加被动的方式。李光弼的做法虽然看上去卑鄙，却是争取上风的做法，至于是否成功，则带着很强的偶然性。

但这件事同样不能只归罪于史思明。逼迫史思明造反的，与当年逼迫安禄山造反的局势同出一辙，由于他们的权力太大，已经超出了唐王朝的制度设计，除非他们死亡，否则是不足以让这个系统满意的。

纷争再起

史思明杀死乌承恩是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距离他归顺唐朝只有半年时间。但他没有立刻反叛，这给了唐军与安庆绪继续作战的时间。

在皇帝处理家事和叛臣时，安庆绪依然在做困兽之斗。他的地盘最小时缩水到只剩下相州，最大时也没有越过太行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仅仅局限在山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如果不是唐军的战斗力不强，他早已经被绞杀了。但由于唐朝此时的第一任务是安抚皇室、群臣和百姓，使得安庆绪得以重新获得了相州周边的一些地区。

三月份，安庆绪攻克了清河和平原郡。四月，他派军攻打了位于太行山以南和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但没有获胜。叛军由于对攻克的州县以杀戮为主，甚至连自己原本的部曲也不能幸免，因此士气越来越低落。

到了九月初，安庆绪手中依然掌握着七郡六十余城。所谓七郡，指的是汲郡、邺城、赵郡、魏郡、平原、清河与博平。由于河北地区是粮仓，通过掠夺，叛军的军粮也是充足的。

不过，安庆绪本人不堪到连朝政都不亲自打理，而是交给了亲信大臣高尚、张通儒等人，这些人又善于争权、钩心斗角，导致纲纪大乱。最有才华的将军蔡希德被张通儒杀死，后来张通儒又任用刚愎的将军的崔乾祐，使得军中大乱，许多原本隶属蔡希德的士兵偷偷逃走了。

鉴于叛军羸弱，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皇帝在处理好各项问题之后，决定派遣阵容庞大的唐军，对安庆绪所在的邺城发起最后的进攻。这里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军事的变化。在玄宗之前，所有的军队理论上都是由皇帝派遣的直辖官员指挥的。到了玄宗时期，北方边境的节

度使获取了军事指挥权和征兵权，使得他们指挥的士兵对节度使本人产生了忠诚，却对皇帝更加疏远了。

皇帝为了对抗安禄山，不得不在内地任命更多的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都拥有一定的兵权。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直辖军队可以攻打安庆绪，要想发动进攻，就必须使用节度使的军队。

皇帝为了进攻邺城，一共动用了九个节度使[224]和一位兵马使的军队：一开始，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军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这七个节度使加上平卢兵马使董秦等部，一共凑了二十万人；之后皇帝又感觉还不够，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带兵前往助战。

自从军队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就产生了另一个难题：之前皇帝可以任命一位兵马大元帅（或者副元帅）统领所有的军队，但这些节度使的军队一般只对节度使本人效忠，九个节度使从职衔上来看是并列的，到底由谁来指挥联军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指挥官应该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即郭子仪。但皇帝认为郭子仪和李光弼战功相当，很难互相隶属，所以决定不再设置元帅。这样，九位节度使虽然兵力众多，却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造成唐军作战困难重重。

更不幸的是，皇帝这样做还有他自己的私心，他是为了能够深入掌控战争的进程。既然没有元帅，皇帝为了和军队取得联系，就设置了一位观军容使，全称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由一位宦官鱼朝恩担任，这位观军容使就成了实际上的战争领导者。虽然皇帝任命他是为了自己控制军队，但由于战场离长安太远，事实上皇帝是控制不了这位宦官的。

最初，唐军的进展颇为顺利。十月，郭子仪率领兵马从杏园渡过黄

河，向东到达了卫州西南九十里的获嘉县。在这里，他遭遇了安庆绪的将军安太清，双方大战一场，唐军斩首四千级，俘虏了五百人。安太清率众逃入卫州城，继续与唐军对峙。初七，郭子仪一面派人向皇帝报捷，一面继续紧跟安太清，将卫州城团团围住。

其余诸路兵马也逐渐赶到，其中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枣（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北）渡河，加上李嗣业的部队，都和郭子仪在卫州城外会合了。

卫州城已经是邺城的门户，不容有失，安庆绪连忙调集了七万大军，分成上、中、下三军，分别由崔乾祐、安庆绪本人和田承嗣率领，试图解卫州之围。

郭子仪采取了围坚打援的做法，寻找了一块满是墙垣的地方，派了弓弩手埋伏好。他本人则率军出击，假装不敌，将叛军吸引到了这里。唐军矢如雨下，敌人无法突破，只好转身逃走，郭子仪一见敌人逃了，连忙调转方向追击。这次战斗郭子仪不仅击败了安庆绪，还抓获了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将他斩首。由于叛军援军被击败，最终卫州也被唐军拿下。

获得卫州之后，郭子仪马不停蹄地紧随着安庆绪来到了叛军的巢穴邺城。此刻，唐军又有数路兵马赶到，他们是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的部队。安庆绪率领余众与唐军在邺城外一个叫作愁思冈的地方大战，又战败了。

这几次战斗，叛军加起来损失了三万余人，几乎丧失了一半军队。加上城外唐军的重重围困，安庆绪眼看就支撑不住了。他连忙向位于幽州的史思明求救。

史思明如果没有再次谋反，也许叛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随着李光弼图谋史思明计划的暴露，情况已经变了。史思明等待了几个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如果继续作壁上观，也许等唐军处理完安庆

绪，接下来就会北上来解决他。可是如果去帮助安庆绪，也可能徒劳无功把自己搭进去。史思明会怎么做呢？

最初，史思明在观望。这时，安庆绪给他开出了条件。安庆绪建议：只要史思明出兵，安庆绪就将皇帝让给他。这个条件不足以让史思明心动，但是继续等待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不救安庆绪，唐军攻克了邺城，唇亡齿寒，史思明到时候再反抗就晚了。他决定先派李归仁率领一万人到邺城以北六十里的滏阳，驻扎在那里继续观望后来的战况。

到了十一月份，形势再次出现了变化。唐军崔光远部攻克了魏州，继续压缩河北的空间。到这时，史思明终于认定不能再等了，一旦唐军获得了整个河北，自己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兵分三路：一路走邢州、洺州，一路走冀州、贝州，另一路从洹水县前往魏州。

十二月，史思明的大军已经到了魏州城外。崔光远派大将李处崟出战。史思明击败了李处崟，将他追回城内。叛军还和唐军打起了心理战，边追边扬言：是李处崟招我们来的！崔光远听后将李处崟腰斩。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城内唐军的士气，崔光远也只好逃往汴州。十二月二十九日，史思明攻克魏州，杀死了守军三万人。[225]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安禄山称帝两周年，史思明在魏州称王。他在魏州城北的空地上修筑了一座祭坛，自称大圣燕王[226]。

由于急于称王，史思明实际上给了唐军可乘之机。李光弼认为，史思明按兵不动是为了等唐军疲敝，再利用精锐部队发动奇袭，击败唐军。要想破除这个计策，唐军必须主动出击，由最精锐的朔方军进攻魏州，将史思明困在那儿，剩下的部队加紧进攻邺城，尽快击败安庆绪。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支叛军合流。

唐军如果有一个元帅可以做最终的决定，不管这个元帅是郭子仪还是李光弼，都可能会采用这个计策。但由于唐军缺乏元帅，而行使监军

职能的鱼朝恩却不想听从将领的意见，李光弼这个最优策略反而被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一个多月。到了二月，唐军还在继续围攻邺城。此时邺城已经接近山穷水尽。邺城之外有一条河叫作漳水，为了尽快击败敌人，唐军在城外筑了两道墙，墙里墙外共挖了三条河，又把漳水的河水引过来，灌入城中，让整个邺城成为泽国。城内的居民为了避水，只好搭高架生活，井水也被污染了，粮食也吃光了，一只老鼠都卖到了四千钱。马更是只能吃马粪和筑墙时掺到墙里的麸皮。外面的唐军知道城内的窘境，以为攻克邺城只是早晚的事情，但这座城市却苦挨过了整个冬天。城内叛军唯一的指望，就是在魏州的史思明。

奇怪的是，唐军的九路大军围在城外久攻不下，竟然没有人想办法去进攻魏州的史思明。鱼朝恩只是观军容使，不是元帅，但他有足够的实权，却并不想负责指挥，其余的人则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调动另外八支部队。唐军就这么奇怪地在城外等待，而城内想投降的人由于水太深也出不来。

直到二月下旬，养得膘肥体壮的史思明军队才从魏州出发，向邺城袭来。他的将军们领着兵马并没有首先接近唐军，而是在距离邺城五十里的半径内各自找地方驻扎。每个营设立了三百面鼓，不断地敲击震慑唐军。最初他们和唐军的战斗以骚扰为主，每一个营出五百精兵，每天到城下劫掠，只袭击唐军的小股部队和辎重。只要唐军大部队一出来，他们就归营。这批骚扰部队有时候白天出来，有时候晚上出来，让唐军无法预判，越来越疲劳。

更让唐军感到苦恼的是辎重问题。事实上，在安禄山叛乱之后的几年，随着唐朝经济被破坏，民间的粮食供应已经大成问题。由于政府税收造成的金融问题也显现了出来。在前一年七月，第五琦就给皇帝出主意，制造了一批大钱叫“乾元重宝”，这种钱比普通的开元通宝只是稍微重一点，却以一当十。事实上，这种方式是皇帝利用货币贬值[227]从民

间搜刮财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更是扰乱了民间的金融市场，进一步造成了混乱。第二年九月，朝廷更是发行了以一当五十的乾元重宝大钱，进一步掠夺民间。

唐军本来就由于粮食生产和金融的混乱，有着严重的辎重问题，史思明更是看到了这一点，专门对唐军的辎重下手。唐军的粮食大都通过水路从江淮地区或者山西地区运来。史思明就让士兵装扮成唐军士兵，在碰到唐军的运粮队时，故意刁难他们，故意杀掉运送粮草的老百姓，甚至烧掉粮草，让唐军的粮食运输队伍充满了恐惧。最终，唐军的粮食供应也跟不上了。

史思明做好了这一切，才决定与唐军决战。三月初六，唐军步骑一共六十万人在安阳河的北岸列阵，史思明只率领了五万精兵，与唐军遥遥相对。唐军的九路大军见到叛军，都以为这只是一些散兵游勇，毕竟双方人数相差太多了，就没有太在意。

不想，史思明突然间率军出击，直奔唐营。首先和叛军接战的是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的部队，在战斗中，双方死伤相当，不分上下。鲁炅被敌人的流矢射伤后，郭子仪率军从他的背后顶上。

按照史书的说法[228]，就在郭子仪布阵未毕时，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天地间一片昏暗，人们距离咫尺却看不清对方。在大风的袭击下，双方的军队都受到了巨大的惊扰，唐军向南方溃败，而叛军向北方溃败。双方扔掉的武器辎重堆满了道路。按照史书，击败唐军的不是叛军，而是这一场有如天意的大风。但如果仔细看后来双方的表现，就可以认定，即便没有大风，唐军的士气也早已居于下风，迟早会被击败。

之所以这样说，是从双方崩溃之后的表现来判断的。首先看叛军。叛军崩溃后，溃军一直向北逃到了邺城西北两百余里外的沙河，在这里史思明得以重整军队，回到邺城以南。在战争中最难控制的就是溃军，一旦崩溃，往往意味着将领们无法再找到他们重新整编，整个战役也就

结束了。史思明的叛军虽然溃逃了两百余里，却最终能够重新找回，表明他们虽然也乱了套，但并没有彻底乱套。那么，与之相对的唐军表现又怎么样呢？

唐军的溃逃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首先看郭子仪的军队。他所在的朔方本来在北方，但由于士兵只能向南逃，这些溃军一路奔逃到黄河边、洛阳以北的河阳，将河阳桥斩断，避免追兵到来。之后，他们进入洛阳城，一查，原来的上万匹战马只剩下了三千，十万套的武器几乎丢干净了。东都洛阳的人民一看溃军到来，吓得纷纷逃入山中，就连东都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也逃走了。在东都惊魂未定的郭子仪原本想放弃洛阳，前往陕城和潼关守卫——相当于放弃东都，只保西京，这就回到了安禄山之乱最初的形势了——好在有人劝说他不要撤那么远，郭子仪才派人回到河阳城进行守卫。[229]

除了郭子仪之外，其余的唐军节度使也大都无法收拾局面，一直退到了自己的辖区才停下。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两支部队由于纪律严明，得以全军而退[230]，但他们也不敢在河北逗留，而是尽快回到了自己的辖区。

关于这次失败，有一个人却似有预感，那就是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华州距离长安不远，也在连接长安和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杜甫被从长安贬出担任华州司功参军时，恰好是郭子仪等将领率领大军讨伐安庆绪的时间。杜甫望着过境的大军，似乎感到了一丝危机，他如同预言般写下“奇兵不在众”这句话。[231]不久，这些大军在相州被史思明击败，证实了杜甫的说法。只是杜甫只能远远地望着这一切，无法参与其中。

九节度使的失败，预示着唐朝未来的局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节度使的兵往往花费巨大，作战能力却有限。当然节度使也知道自己的兵是有问题的，他们所谓的作战往往是阳奉阴违，战争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皇帝缺乏直辖军，只能依靠节度使，于是唐朝后期就变成了战

争频仍、耗费巨大，却总是徒劳无功的局面。皇帝要想摆平节度使，往往依靠的不是武功，而是合纵连横以及妥协。[232]

然而，更悲惨的是，为了抵御史思明的进攻，皇帝还必须设立更多的节度使，这就使得唐朝进一步碎片化，导致了中晚唐时期不可避免的中央失能。

史思明解救了邺城之后，首先的任务不是进攻唐军，而是解决内部问题。他以结盟为由，将安庆绪诱出邺城，以为安禄山报仇为借口，将安庆绪斩首。与安庆绪同死的还有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到这时，史思明完全合并了安庆绪的势力。这意味着大燕政权完全从安氏转手到史氏，也表明安史之乱进入了后半程：史思明父子的时代。

史思明的势力范围依然是在河北地区，最南方是安太清占据的怀州，最北面则是史思明占据的范阳，中间的连接部，则是他的儿子史朝义所占据的相州。

四月初，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完成了从燕王到皇帝的身份转变。

日后，人们说起安史之乱，所谈论的往往都是安禄山时期的事情，比如哥舒翰失守通关，颜氏兄弟和张巡等人的抗战，明皇迁蜀和返回，肃宗北上灵武，以及收复两京。对于叛乱后期的史思明父子阶段却总是叙述甚少。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安禄山在叛乱之前和皇帝家族的纠葛，戏码更加充分，而史思明父子却缺乏安禄山的戏剧性。史思明是一个标准的将领，从作战角度，他的谋略不在郭子仪和李光弼之下，但除了作战之外，他的性格是模糊不清的，也缺乏各种小道消息。唐人对他几乎无话可说，也就忽略了。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安禄山叛乱所引起的是一场全局性战争，安禄山的战略包括了整个华北地区、关中平原，甚至有向淮河和两湖盆地扩

张的可能性。加之他攻克了两京，逼走了皇帝，使得唐王朝陷入了彻彻底底的危急时刻。而史思明即便再能征善战，他所接手的也是一个缩小的控制区。到了他的时期，所谓叛乱只能算是一场局部战争，唐朝付出的只是华北地区直至洛阳周边。史思明丧失了山西北部，在山东地区也没有作为，最多时他只是攻占了东都洛阳。在这个区域之外，唐朝的社会经济都在正常运行，虽然税收更高，人民生活也更加艰苦，但由于没有战乱波及，华北地区之外的人民甚至感知不到战争了。各路节度使虽然参加了战争，但他们只是把军队带到了华北参加战斗，失败了就撤出，胜利了就挤压叛军的地盘。这种战争从任何层面上看，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拖了八年，但唐朝人感受最深的，是安禄山攻克两京的那段时间。皇帝收复了两京，即便战争还在进行，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只是战争对于唐朝行政的腐蚀作用依然存在，皇帝设立的众多节度使，最终必然成为皇帝的大患，使得帝国行政趋于解体。

唐军与史思明的“局部战争”模式，也可以从唐军缓慢的军事准备看出来。九节度使失败四个月后，皇帝才将郭子仪撤职。兵败后，皇帝首先认识到唐军没有元帅的弱点，让郭子仪以朔方节度使的身份领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担任观军容使的宦官鱼朝恩不喜欢郭子仪，提请皇帝换人，于是到了七月份，皇帝把郭子仪召回了长安，任李光弼为兵马元帅兼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不敢担任元帅，而是奏请皇帝根据传统，让一位亲王（赵王李係）担任元帅，他本人只担任副元帅。

要想让郭子仪离开他的军队并不容易，这并不是说他本人不想离开，而是士兵们不想放他走。他们哭着请求宣旨的中使不要让郭子仪离开。最后，郭子仪只好欺骗士兵，说他只不过是去送一下中使，乘士兵不注意，他才骑马离开了。

十七日，李光弼带着河东五百名骑兵进入了东都。他没敢在白天入

营，而是乘夜间进入。士兵们喜欢为郭子仪打仗，是因为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虽然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却能够让士兵们为他心甘情愿地拼死搏杀。同样出身于朔方军的李光弼则采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指挥风格，在他的手下，士兵们是被纪律和恐惧感支配的，但也正因为他令行禁止和赏罚严明，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优于郭子仪。[233]

接管了朔方军的李光弼立刻改变了郭子仪形成的风格，开展了治军运动，要求一切都有条不紊，号令严整。士兵们并不喜欢他，一直怀念郭子仪，却又不得不遵守他的法令。最能体现其中矛盾的，莫过于左厢兵马使张用济的事件。[234]

张用济是郭子仪手下的猛将加功臣。九节度使的军队崩溃后，是张用济率领五千人马占据了河阳[235]，又在黄河的南北两岸修建了两座新城，这才阻挡了叛军对河阳的进攻，也防止了叛军攻打洛阳。

张用济本来是唐朝的功臣，同时他对郭子仪忠心耿耿，对李光弼乘夜间进入朔方军营充满了鄙夷，认为李光弼作为一个朝廷猛将，竟然害怕自己的士兵。张用济甚至想组织军队反抗李光弼的接管，但被仆固怀恩和另一名将领康元宝劝住了。他们认为，是朝廷免掉了郭子仪，如果张用济违抗命令，很可能会害了郭子仪。张用济权衡再三，决定应李光弼的召唤，单骑到李光弼营中拜见。与此同时，李光弼却带了上千人迎接他，在见到张用济后，李光弼以张用济没有按时到来为理由将他直接斩首，把河阳将领换成了自己的心腹辛京杲。

李光弼斩杀功臣张用济也让其他的将领胆寒。接下来拜见李光弼的是大将仆固怀恩。李光弼引仆固怀恩刚刚坐定，突然手下报告说有五百名蕃兵到来，李光弼听后脸色大变。仆固怀恩走出去，故意斥责这些番兵：叫你们不要来，你们偏不听。李光弼劝解他说士卒跟随将军，也没有错误，下令赐予这些番兵酒肉。[236]

虽然李光弼不见得想杀仆固怀恩，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在唐朝

要想取得上级的信任有多困难，如果稍微防范不到位，一位将军很有可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被自己人斩杀。

再失东都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在范阳休整完毕的史思明决定大举南下。他派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自己率领大队人马以东都洛阳为第一目标，发起了进攻。从史思明的进攻也可以看出唐朝军事的无力，在数个月的时间内无力组织一次像样的进攻，只能等待兵肥马壮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史思明的进攻策略也超出了唐军的想象。唐军的主要防守区域在山西以及洛阳地区，但史思明的进攻却和当年的安禄山有相似之处：他首先派兵南下，直接以现在河南开封的汴州为第一中间点，攻克汴州之后再折向西方进攻洛阳，这就绕过了唐军主要防守的河内与洛阳之间的地带。

为了进攻汴州，史思明更是派出了四路大军，选择了四个渡河地点。其中，令狐彰率领的五千人马在黎阳过河取滑州，而剩下三路分别是从濮阳过河的史思明自己的部队，从白皋过河的由其子史朝义带领的部队，以及从胡良过河的周挚部队。这些军队过河后，再一起向汴州进攻。

史思明出发时，李光弼正在黄河的各个渡口巡逻，他听到消息后直接去了汴州，要求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抵抗半个月，只要能够支撑半个月，他就能率领其他地方的救兵赶到。得到了许叔冀的许诺后，李光弼回到洛阳搬兵。

但不幸的是，许叔冀并没有做到。李光弼离开不久，史思明就杀到了，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许叔冀和他的手下全部投降了叛军。只有一位叫作田神功的将领是诈降，抓住机会斩杀了对方几位将领之后，逃回

了唐军。[237]

获得了汴州的史思明立刻转向西方，攻克了郑州。

在叛军进攻时，李光弼也征集了他在洛阳以西的部曲，准备向东迎击敌人。但在到达洛阳后，却传来消息，叛军已经离开郑州，到达了洛阳以东的旧洛阳地区。在洛阳坐落的伊洛平原上，唐代的东都以东，是汉魏时期留下的旧洛阳城，两者并不重叠。[238]叛军的前锋已经到了旧洛阳一带的石桥。

李光弼召集了东京留守韦陟，他们商议过后，认定洛阳已经不可能抵抗叛军的进攻了，要想保全，最好的方法反而是放弃洛阳。但在放弃洛阳之后去哪里的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韦陟等人认为放弃后，应该向西撤到陕城和潼关地区进行防守，这是当年哥舒翰和高仙芝的策略。而李光弼则认为，如果撤到陕城和潼关，意味着放弃了五百里的防守，在洛阳地区最好的防守不在洛阳，却在洛阳以北的河阳。

河阳最初只是黄河中的一个小岛，守军就在小岛上修筑了一个小城中潬，之后又在黄河的南北两岸构建了两个小城，即南城和北城，这样，河阳三城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守体系。更难得的是，河阳以北距离山西的太行山不远，太行山之后的山西高原还掌握在唐军手中，一旦河阳无法守住，完全可以从这里撤退到山西地区。[239]如果叛军攻克东都之后去攻打潼关，由于河阳位于洛阳之北，即便叛军占领了洛阳，河阳也会成为叛军背后的一枚钉子，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面对来自背后的威胁。

两人商量的结果，是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员向西进入关中地区避难，河南尹李若幽则率领老百姓到山里避难，将洛阳变成空城。即便叛军占领，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守卫。李光弼本人则率领士兵带上所有的战略物资（主要是油和铁）北上河阳。

他们出发时，敌人已经到达石桥，李光弼也选择了从石桥北上。夜

间为了赶路，唐军燃起了火把徐徐前进，敌人跟在身后，不敢袭击他们，直到将他们目送到河阳。驻守河阳的唐军只有两万人，粮草只够十天而已。

但李光弼计策是成功的。史思明到达洛阳后，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沉吟良久，决定不进城，而是在汉魏故城的白马寺一带驻扎。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安禄山时期出现的占城之后的军队腐化问题。

除了在白马寺驻扎之外，史思明还在河阳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月城，防范李光弼的部队。于是，河阳这座跨越黄河的小城，就成了战争的中心。

十月，史思明亲自率领军队进攻河阳城。李光弼守河阳的过程，与当初张巡守睢阳一样，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故事。[240]

刚刚到达时，史思明就派出了猛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刘龙仙为了表示轻视，把右足翘到马脖子上坐着辱骂李光弼，这种单兵式的挑战虽然无关乎大局，却对士气有着很大的影响。按照规矩，守城的人也应该派出一员猛将与之对战，获胜的一方就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如果不敢应战，对方的谩骂就会对士兵造成心理压力，让他们抬不起头来，甚至怀疑自己的将军。

李光弼决定应战，但他不会亲自前往，而是询问左右谁可以出战。仆固怀恩想出战，却被他制止了，作为大将如果有个闪失显然是不值得的。最后，有人推荐一位叫作白孝德的安息胡人裨将，白孝德本人也愿意前往。李光弼问他需要什么支援，他回答，只需要五十个骑兵作为后援，也请大军多弄出点声响来提气。至于杀敌的过程，他一个人就够了。

白孝德持着两根矛，骑在马上懒洋洋出了城门，河阳城在河中，他必须从滩头的河水中蹚过。仆固怀恩看到白孝德出门的架势，连忙说赢了。李光弼问他为什么，仆固怀恩认为，见到白孝德闲适的样子，就知

道他已经有了万全的计策。

刘龙仙见白孝德一人前来，很是轻视，他准备做出冲击，但白孝德摇手示意他等一等，仿佛不是来打仗的。直到两人只有十步的距离，才说上了话。刘龙仙还是在谩骂，而白孝德静静等待着他骂完，瞪眼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对方回答不知。

白孝德回答：我白孝德也！

刘龙仙张口骂他。白孝德冲上去提矛就刺，城内的五十名骑兵也跟了出来，城上则大声鼓噪着。刘龙仙原本准备用箭，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绕着河堤奔驰。白孝德追上他，乘他反应不及，将他斩于马下，割下人头带回城内。[241]

这一回合以守军的完胜告终，也将叛军的士气打压了下来。

史思明为了提高士气，也为了震撼城内的守军，每日将自己拥有的千匹良马放出来在黄河南岸的水中清洗。为了显示马多，这些马被循环利用，不断地轮流展示。李光弼在军中找了五百匹母马，把它们的小马驹留在城内。等史思明洗马时，李光弼让人把母马赶出，母马思念马驹，一时间马嘶不已，引得史思明的良马全都蹚过黄河，向河阳城游去，被城内的守军尽数带走。

河阳城之所以被李光弼选中，是因为连接黄河两岸的浮桥，这让李光弼既可以进入河南，也可以进入山西，还可以在河中间守卫。史思明决定毁掉守军的浮桥。他派出了数百艘战船，前面导以火船，准备用火船烧掉浮桥，再利用后面的战船进攻城池。李光弼准备了数百根长杆，杆头绑着铁叉，铁叉外裹着不易燃烧的毡子。用这种长杆把火船抵住，过一会儿，火船就烧光了。这种叉子还可以抵住战船，再用大炮瞄准战船将它击沉。

既然直接进攻不利，史思明开始考虑另外的战术：截断对方的粮道。他在黄河以北的河清县驻军，试图截断唐军北方的粮道。李光弼则

驻军在一个叫作野水渡的地方防止叛军偷袭粮草。

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带人离开了野水渡，回到河阳城，在野水渡只留下了一千兵马，由一个叫作雍希颢的将领带领。在离开前，李光弼告诉雍希颢：在叛军的阵营中有三员勇将，分别是李日越、高庭晖和喻文景，今晚史思明必定派他们之中的一人领兵来劫营，如果贼兵来了，不要与他们打仗，如果他们投降，就带他们到河阳来。

雍希颢对于李光弼的话不甚了了。但当晚，叛军真的来了。来的大将是李日越，带了五百个士兵。敌军到达后，雍希颢果然闭门不战，只和他打嘴仗。李日越询问了一些问题，得知李光弼已经不在这里，守卫这里的是雍希颢，守军只有一千人。得知这些，他决定投降唐军。这让雍希颢感到吃惊。但他记得李光弼的话，于是将李日越送到了河阳城李光弼处。李光弼善待了李日越，不想不久之后，另一员大将高庭晖也来投降了。

原来，史思明认为李光弼不善于野战，善于守城。当他听说李光弼在野外的野水渡，立刻派李日越前去劫营，并下了死命令，让他必须抓来李光弼，否则就不要回来。

李日越听说李光弼已经离开了，担心回去受到惩罚，只能投降。在他投降后，由于受到了优待，比他更强的高庭晖听说后就也来投降了。

接连的失利让史思明意识到，要靠智取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剩下的就只有硬攻了。前文说过，河阳城实际上是由三座城池组成，北岸的北城、南岸的南城以及位于黄河中间小岛上的中潬。这三座城池只要有一座丢失，黄河两岸的交通就断了。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潬，它处于沟通两岸的关键位置。

李光弼把守卫中潬的责任留给了自己，而守卫南城的则是大将李抱玉。李光弼给李抱玉的指令是：只要能够守满两天时间就够了，两天之后，他必然率军来给南城解围，如果两天之后不来，那么李抱玉可以投

降叛军而不受惩罚。

李抱玉果然认真地守卫起南城来。在防守过程中，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眼看南城就要陷落，李抱玉连忙对敌人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啦，给我们点时间，明天就投降！敌人听了大喜，收兵等待。不想第二天李抱玉修好了城池继续抵抗，敌人大怒，又开始了攻击。但由于敌人失去了先手，被李抱玉出奇兵夹攻击败了。

李光弼本人对中潬的守卫更加严密，由于这里的重要性，他在城外又设立了高高的栅栏，栅栏之外挖了两丈深的壕沟。敌人借人多势众，带着攻城器械直逼城下，将城池三面的壕沟填出了八条大道，又顺着八条道在木栅栏上开出了八个门，供军队进出。在敌人填壕围栅时，城内守军的指挥官荔非元礼却并没有阻止，而是等敌人做好了道路，再率军利用它杀出。由于敌人太多，荔非元礼杀了一阵，决定回到栅内休息一下。李光弼以为他吃了败仗，气得要拿他斩首。荔非元礼休息过后，再次重整军队，将敌人击败。

中潬的险情过后，敌人再次向北城集结，李光弼立刻率领人马前往北城救援。北城的人更少，在敌人最多的西北隅，守军也只能集结三百人而已。在这里人人死战，李光弼甚至自己都准备好了匕首，以备在落入敌手之前自尽。

在战斗中，李光弼依然不忘纪律性。大将郝廷玉是守卫西北隅的将领，一次李光弼看到他在往回退，立刻派人去取他首级。使者提着刀到了他的面前，郝廷玉吓得连忙大叫：是我的马死了，回来换马！仆固怀恩父子在战场上也稍微后撤了一点，就见使者提刀来取他们的人头，吓得连忙转身继续作战。

靠着拼命的精神，李光弼终于守住了中潬和北城，史思明此刻仍然在进攻南城。李光弼押着北城的俘虏向他展示，史思明这才知道对北面两城的进攻都已经失败，不得不撤军。

李光弼对于河阳城的防守是如此关键，让唐军得以腾出时间来组织其余地区的防御。史思明本来有机会在夺取东都之后继续向西进攻，却由于河阳城的存在，不得不花了大量精力对付这个后方的据点。就这样，袭击战变成了拉锯战。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后半段和整个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就是在这样的拉锯中度过的。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唐军击败了史思明进攻陕城的部队，使得长安的防线得以稳固。

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斩首三千余级。三月，李光弼在怀州城下击败安太清。四月，在河阳城的西面水边击败了史思明，斩首五千余级。

当进攻战变成了拉锯战，史思明这才进入了东都。虽然东都在半年前已经被攻占，但由于李光弼只给他留了一座空城，价值不大。只有进入拉锯战阶段，他才考虑经营这座可以作为国都的城市。

直到当年年底，除了一些小的拉锯战之外，双方没有爆发很大的战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僵持，一方面是因为军事的均势，而另一方面则是双方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破坏。唐朝发行的两种重宝让民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混乱，皇帝屡次改动两者与开元通宝之间的比值，还屡屡下达法令严惩私铸的人，却依然无法禁止民间对两种大钱的私铸和抵制。[242]而在史思明一方，为了筹集军费，也发行了顺天元宝和得壹元宝，都是一钱当百钱，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比唐朝控制区还严重。

虽然战事出现了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的朝堂平静了。事实上，安史之乱的恶果已经显现，唐朝的宗室和中央政府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除了史思明的叛乱，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其他叛乱。

第十章 找不回的盛世

另一场叛乱的预兆

与史思明的战争长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唐朝中央政府和皇室都乱了套，根本没有精力去镇压史思明了。这种制度的失调，可以认为是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部分。

首先出问题的是太上皇的安置问题。

从蜀地回来后，太上皇选择了他当太子时的藩邸即南内兴庆宫居住，皇帝本人则住在了城外北面的大明宫（东内）。两人都没有住原来的皇宫太极宫（西内）。皇帝为了见太上皇方便，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之间修建了一条夹道，也就是在城墙内又修了一道墙，两墙之间有一条小道专门供皇帝使用。这样，皇帝可以不接触外人，走夹道从大明宫到兴庆宫拜见父亲。有时候，太上皇也会从兴庆宫到大明宫去看一看。

并没有证据表明太上皇干预朝政，但他有时候还是会找回一下曾经作为皇帝的自尊。在他身边还有一群服侍他的人，主要有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王承恩、魏悦，他离不开的高力士、玉真公主，以及以前服侍过他的一些旧宫人和梨园子弟。这些人帮助太上皇建立了一个具有自我欺骗性的小环境，他们为太上皇奏乐娱乐，仿佛还在太平盛世。

太上皇还喜欢到长庆楼去，这座楼在兴庆宫的南面，再往南就是外面的大道。从长庆楼就可以看到大道上熙熙攘攘的景象。人们看到太上皇出现在长庆楼，都会驻足观望，有人还会大呼万岁，太上皇听到喊声，就会给这些人赐酒。

对于长安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怀旧的场所，让人们怀念起当年盛世的繁华与和平。太上皇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帮助人们怀念过去的老古董的角色，并不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但这件事却给了李辅国机会。太上皇执政时期，李辅国只是宦官中的一个小角色，被太上皇诸位宠臣轻视，但他却由于跟随肃宗而飞黄腾达。李辅国听说太上皇在兴庆宫怡然自得，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李辅国向皇帝上奏，认为兴庆宫过于方便与外界交通，不如把太上皇迎接到无法与外界交流的深宫大院去，进一步限制他，也避免他“造反”。皇帝没有听从李辅国的建议。但李辅国依然将兴庆宫的马匹削减，原本三百匹马的规模，他拿走了绝大多数，只留下了十匹。太上皇即便知道这是李辅国的作为，也无可奈何。[243]

之后，李辅国进一步请求皇帝让太上皇移居西内太极宫，但皇帝依然拒绝了。不过，接连两次挑拨父子关系后，李辅国已经骑虎难下，只要不拿掉太上皇，他的地位就不再稳固。

到了七月，皇帝生病了，李辅国的机会来了。十九日，李辅国假颁皇帝诏书，将太上皇迁往西内。他故意带了五百名士兵拿着武器，在睿武门见到太上皇，以兴庆宫地势太低，秋天容易进水为由，请太上皇离开。太上皇吓得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高力士见状连忙斥责李辅国，但高力士也知道对抗不过这位权臣，只能将太上皇扶好，陪着他前往西内。

太上皇在西内住在了甘露殿。为了进一步控制他，李辅国只给太上皇留下了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护卫，陈玄礼、高力士等人都不得留下。太上皇只能忍气吞声，表示他这样也好，离开了繁华的地带，身居大内，省得小人离间父子，这是防微杜渐。

李辅国的作为也激起了朝臣们的愤怒，以刑部尚书颜真卿为首的官员们纷纷上表，请问太上皇起居。李辅国任命颜真卿为蓬州长史，外放

了[244]。

为了太上皇而被外放的不止颜真卿一人。太上皇迁居不到十天，二十八日，高力士被流放巫州，王承恩被流放播州，魏悦被流放溱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

其余宫人陪侍也纷纷换班。高力士服侍了太上皇一辈子，却在年老时被迫离开，这样的结局让许多人心寒。太上皇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心头不快，慢慢地生了病。他的儿子当朝皇帝的身体也不好，既然两人都生了病，父子之间的往来就渐渐断绝了。

皇帝对于李辅国也不满，但由于他性格懦弱，加之身体不好，已经很难在不引起宫廷骚乱的情况下将李辅国除掉了。掌权宦官从高力士变成李辅国，这也是唐朝后期宦官擅权的一个转折点。

表3 截至公元763年的藩镇表[245]

名称	治　所	辖　区	说　明
北庭	庭州（现新疆乌鲁木齐）	天山北路	710年置安西都护四镇经略大使，后增置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使。718年改安西都护，领四镇节度使。727年分为北庭、伊西二节度使。731年合并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742年改为北庭、伊西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
安西	安西（现新疆库车）	天山南路	
河西	凉州	凉、甘、肃、伊、西、瓜、沙七州	711年置
卢龙军	幽州	幽、蓟、营、妫、檀、莫等州	714年置幽州节度使，741年改范阳节度使，763年称卢龙节度使
陇右	鄯州（现青海乐都）	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诸州	717年置。763年没于吐蕃
西川（剑南西）	益州（现四川成都）	益、彭、蜀、汉、眉、嘉、邛、简、资、茂、黎、雅诸州	717年置剑南节度使，领二十五州。757年分为西川、东川节度使
东川（剑南东）	梓州	梓、遂、绵、剑、普、荣、合、渝、泸等州	

续表

名称	治　所	辖　区	说　明
朔方	灵州（现宁夏灵武）	灵、夏、盐、丰等州	721 年置
河东	太原	太原、石、岚、汾、代、忻、沁、朔、蔚、云等州	723 年置
福建（威武军）	福州	福、泉、汀、建、漳等州	733 年置福建经略使。758 年改福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760 年改福建节度使
平卢淄青	青州	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曹、濮、徐、兖、郓、德、棣诸州	756 年置青密节度使。761 改淄青节度使，与平卢节度使合并为平卢淄青节度使
淮西（彰武军）	蔡州（现河南汝南）	蔡、光、申三州	756 年置
汴宋（宣武军）	汴州（现河南开封）	汴、宋、亳、颍、曹、陈诸州	756 年置河南节度使，后改汴宋节度使。785 年改宣武军
泽潞（昭义军）	潞州（现山西长治）	泽州、潞州	756 年置泽潞沁节度使。780 年改昭义军节度使
淮南	扬州	扬、楚、滁、和、舒、庐、寿、濠等州	756 年置，辖区屡有增减
河中（护国军）	蒲州（现山西永济）	蒲、晋、绛、慈、隰五州	757 年置
山南东（忠义军）	襄州（现湖北襄阳）	襄、郢、复、邓、安、随、唐诸州	757 年置。763 年号忠义军
荆南	荆州	荆、沣、朗、郢、复、阳、夔、峡、忠、万等州	757 年置荆澧节度使，后改荆南节度使
振武军	单于都护府	绥、银、麟、胜诸州及受降城	758 分朔方置
浙江西（镇海军）	润州、杭州	润、苏、常、湖、杭、睦等州	758 年置浙江西道节度使，亦称江南东道节度使。781 年称镇海军
浙东（义胜军）	越州（现浙江绍兴）	越、睦、衢、婺、台、明、处等州	758 年置
宣歙（宁国军）	宣州（现安徽宣城）	宣、歙、池三州	758 年置宣歙绕观察使，后改为宁国军节度使

续表

名称	治　所	辖　区	说　明
江西（镇南军）	洪州（现江西南昌）	洪、虔、江、信、吉、袁、抚等州	758年置洪吉都防御团练观察处置使。764年更名江南西道观察使。783年改为江南西道节度使
陕虢（保义军）	陕州	陕州、虢州	759年建保义军
邠宁（靖难军）	邠州	邠、宁、庆诸州	759年置
同华	同州或华州	同州、华州	759年置镇国军节度使。763年罢。784年于华州置潼关节度使，于同州置奉诚军节度使。793年合为华同节度使
鄂岳（武昌军）	鄂州（现湖北武昌）	鄂、岳、蕲、黄、安、申、光诸州	759年置鄂岳团练使。765年升级为观察使。806年升级为武昌军节度使
凤翔（兴平军）	凤翔	岐、陇、秦诸州	760年置兴凤陇节度使。后将陇右节度使合入
鄜坊（保大军）	坊州（现陕西黄陵）	鄜、坊、丹、延四州	760年置
永平（义成军）	滑州	滑、濮、郑三州	761年置滑卫节度使。763年改滑亳节度使。772年改永平节度使。785年改义成军
成德军	恒州（现河北正定）	恒、冀、赵、深等州	762年置
相卫	相州（现河南安阳）	相、卫、邢、洺诸州	763年置
天雄军（魏博）	魏州（现河北大名）	魏、博、洺、贝、相、卫诸州	763年置
山南西	梁州（现陕西汉中）	梁、洋、集、壁等十三州	763年置

太上皇之事还好处理，更令皇帝感到头疼的是另一场叛乱，这种叛乱在玄宗早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但在安史之乱后却层出不穷。如果说安

史之乱是盛世的终结，那么这一场新型的叛乱就预示着乱世的开篇。

在唐代早期，地方民政与军事的指挥权是分开的，因此，地方长官很难发动叛乱。只是到了安禄山时代，才由于在边疆地区实行了军政和民事合一的节度使制，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叛乱。但为了镇压安史之乱，皇帝在内地也设立了大量的节度使，全国大大小小的节度使将近五十个，这导致内地这些军事和民政合并的长官已经有了割据的实力。

在肃宗时期，内地节度使们还没有完全发现自己的能力。但一场叛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军事、民政合一的怪胎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唐代的淮西地区是一片重要却很难管理的地区，它控制了运河，成了长安与长江流域的关键性节点，影响着中国著名的漕运系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为了防御安禄山，皇帝在这里设置了淮西节度使，治所在蔡州。[246]到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却感到苦恼无比，因为他有两个令人不安的节度副使，分别是兼领御史中丞的李铣，以及兼领宋州刺史的刘展。李铣的特点是贪暴不法，而刘展虽然能征善战，却为人刚愎自用，很难相处。

王仲昇首先向皇帝报告了李铣的罪名，将他诛杀，但在处理刘展时，却困难重重。刘展除了担任节度副使，还是宋州刺史，有一定的兵权，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引起他的反叛。加上王仲昇处理李铣时已经惊动了刘展，想要拿下他就更难了。

王仲昇只好向皇帝汇报，除了把刘展描绘成一个刚愎的人之外，还造了一首歌谣“手执金刀起东方”。所谓“金刀”，就是一个刘（劉）字，中国古代一直信奉谶纬，这句歌谣恰好符合刘展造反之说。

王仲昇把汇报信交给了监军使邢延恩，让他带回朝廷。邢延恩又汇报给了皇帝。皇帝对于这种刚愎自用的军阀怀着天生的恶感，在王仲昇、邢延恩等人的影响下，也决定除掉刘展。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事

实上，直到这时，刘展并没有做任何反叛之类的事情，但皇帝却已经决定除掉他，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君臣相害事件。

如果这件事放在玄宗时代，那会非常简单，皇帝只要下个命令就足够了。但到了肃宗时代，由于军权的丧失，拿下刘展反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邢延恩出了一个主意，他认为刘展有兵在手，必须把他调离军队，才能拿下。因此，皇帝可以假借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其他地方。

为了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个官还不能小。在淮西以南，有三个节度使辖区，分别是淮南东道节度使、江南西道节度使和浙西节度使。皇帝曾经设立了一个叫作江淮都统的官职（驻地扬州），同时统领这三个节度使辖区。江淮都统是一个类似于大都督的职位，统领着二十二个州，不可谓不重要。在刘展之前，担任江淮都统的是李峘。皇帝决定任命刘展为江淮都统，把他调离，乘他在路上的时候，命令原来（也是真正的）江淮都统李峘将他拿下，与李峘一同受命的还有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247]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时，邢延恩获得了皇帝授权，又赶回淮西，将皇帝的诏书交给刘展，请他去赴任。不想刘展看完诏书就哭了起来。他最早只是陈留参军，因为安史之乱带来的机会，在几年内就爬到了节度副使领刺史的位子，已经属于骤贵，每一天都在考虑如何守住这个有些德不配位的职位。现在突然间又升到了不可想象的职位上，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在暗害他。

邢延恩见刘展起疑，赶快解释让他收起怀疑。作为防范，刘展要求先得到江淮都统的印信，而不是等到了地方再交接。邢延恩只好先骑马飞驰到扬州，从李峘处借来了印信，交给刘展。

刘展获得印信后，一面谢恩，一面派人四处招揽故旧，让他们随自己一同赴任。他还给三个节度使都发去了公文，让他们遣使迎接，送上户籍和土地册。这一切做完后，他又做了一件彻底打碎了皇帝计谋的事

件：决定率领自己在宋州的亲兵七千人一块去赴任。

这样，皇帝原本设计的假戏就变成了真戏。刘展不仅有诏书，还有印信，同时三道节度使也都知道自己的上级换人了。有了这一切，他就随时可以签发文书，征缴那些不肯服从他的人。

邢延恩一看把事情搞砸了，只好骑马跑到李峘处，与李峘、邓景山等人发兵拒绝刘展。他们声称刘展造反，而刘展又说是邢延恩等人造反，他的文书上都盖上了印，导致周围的官员们分不清到底是谁造反。

当刘展进军时，李峘自知不敌，率军从扬州撤到了黄河南岸的润州（现江苏镇江），与节度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等人驻扎在京口。而邓景山则率领万人驻扎在扬州以北、淮河流域的徐城县（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境内），处于抵御刘展的前锋位置。

刘展此时还不完全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本人是员猛将，虽然脾气古怪，但如果利用得当，是维护王朝的好帮手，现在却被硬逼着成了叛军。一路上他治军严整，许多守军一见他就躲避。他日夜兼程赶到徐城县附近，见到有军队阻拦，连忙派人去问这是什么军队，敢阻挡朝廷的命官。邓景山也不好回答，只是不放他们过去。两军对阵，刘展还在大声呼喊：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不要和我对着干！

刘展派遣两员猛将孙待封、张法雷出击，邓景山一触即溃，只好和把事情搞砸的邢延恩一同逃往寿州（现安徽淮南市寿县）。刘展略过寿州，引兵直入扬州，再派遣军队向着东西两个方向扫荡，将皇帝授予他的地盘拿下。

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原来的江淮都统李峘。李峘此刻正在润州的京口屯兵。在京口，紧临着长江的是一座叫作北固山的小山，这里是防御长江的重要据点，从三国时期，就有许多军事故事发生在这里。李峘的军队就依靠着北固山驻扎，紧紧盯着江面，防止敌人从长江江面过来。他们还在长江江面插了许多木头，阻挡敌人的船只。刘展一方面派人在长

江对岸的白沙驻扎，一面点了许多灯火，不断地击鼓，让对方以为他们随时可能进攻，消耗着对方的士气。

之后，他派人从上游渡过长江，袭击了镇江上游的驻军点下蜀，这就是要包抄的节奏了。李峘的军队听说敌人已经渡过长江，立刻崩溃了，李峘本人也逃往宣城（现属安徽）。

十一月初八，刘展乘李峘逃走，攻克了润州。之后，昇州经过一定的抵抗，也投降了刘展，当时的江宁（现江苏南京）就属于昇州。到了十二月，刘展又派人进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逃走，于是李峘只好再次逃往洪州（现江西南昌）。

与此同时，李峘的副使李藏用率领七百人来到苏州，又在当地招募了两千人抵抗刘展。刘展获得宣州之后，继续派人进攻苏州，将李藏用击败。李藏用一直跑到杭州才稳下来。

就这样，江浙地区的苏州、湖州、润州、常州、宣州等纷纷陷落。李藏用占据了杭州，并派人守住余杭，与刘展周旋。刘展的大将屈突孝摽攻陷了濠州、楚州，大将王晅攻陷了舒州、和州、滁州、庐州等地，直到寿州刺史崔昭将他们阻挡。于是双方以寿州和庐州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

然而到这时，也是刘展扩张的极致了，因为皇帝派来了另一员在安史之乱中锻炼出来的将领——田神功。

田神功曾经在史思明南下时抵御了叛军，后来被任命为平卢兵马使，恰好率领五千人驻扎在任城（现山东济宁）。这里虽然距离淮南地区路途遥远，却是能够找到的最近的政府军了。邓景山和邢延恩出逃后，一面请皇帝派田神功帮忙镇压刘展，另一方面主动联系田神功，许诺给他大量的金帛和女人，这些财富终于打动了田神功和他的部队。于是在皇帝还没有下诏时，田神功就率军南下了。到了彭城（现江苏徐州），皇帝的诏书才姗姗来迟。

直到听说田神功来了，刘展才表现出了慌张。他从广陵率领八千兵马与田神功作战，这一次，他终于被击败了，向南撤退到天长县（现安徽天长），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只好南渡长江。过江时，只有一个人跟随着他。

田神功进入扬州和楚州，按照他和邓景山的约定，他的军队果然进行了大肆劫掠。扬州是唐朝最富裕的都会，作为商业中心的它，财富甚至超过了长安。在这里，一个商业繁荣的标志，是有数千人的外国商人存在。商人们在这里已经融入了本地的生活，成了唐朝江南社会的一部分。但正因为他们的富裕，也就成了田神功掠夺的首要对象。此外，扬州城内有许多金银窖藏，为了寻找这些财富，军队把城市的地面都掘了一个遍。[248]

安史之乱原本只涉及黄河流域，不管是叛军还是政府军都没有借口对南方进行掠夺。而永王之乱由于发生时间早，当时各路军阀还没有形成，破坏性也是可控的。反而是刘展之乱和田神功的部队，对唐朝的南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自从刘展遭遇了第一败，他的军队就开始了崩溃的节奏。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他的军队还试图继续向东南扩张，进攻李藏用占据的杭州。但在拉锯战之后，李藏用将他们击败，这导致大将孙待封逃走，而常州又投降了唐军。

正月二十一日，田神功派人向西扫荡刘展在长江以北的部队。二十五日夜到二十六日，田神功兵分三路渡过长江进攻刘展，刘展击败了田神功亲自率领的一支，却被另外两支军队击败。

刘展本来可以继续向东南逃走，但作为军人的他却认为，如果事情不济，早晚也是死，既然每个人都有父子之情，又何必多杀人家的父子。他慷慨出战，被射中了眼睛，倒地后被斩首。

刘展死后，他的军队很快作鸟兽散，大部分将领投降了唐军，士兵

解散。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将领孙待封投降了曾经的对手李藏用。[249]

刘展虽死，但他引起的骨牌效应依然在继续。他的前任江淮都统李峘不想承担失守的罪过，把责任都推给了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后者被革职流放了。田神功升了官，迁徐州刺史，而坚守杭州的李藏用担任了浙西节度副使，后来又被新任江淮都统崔圆授予楚州刺史的职务。

但唐朝将领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倒台。

由于刘展之乱和田神功的劫掠，许多城市的仓库都已经空了，当战乱结束后，皇帝立刻派来人清点仓库。所谓清点仓库，并非只是查看仓库内的储备，而是要求储备必须与账册对上。可是在战争中，许多储备已经消耗或者被劫掠，却没有工夫去整理账目，账目和储备不符是必然的。可是，问题的死结在于，只要两个数据对不上，皇帝就要追究责任人的罪过。

许多将领在经过刘展之乱后，再次体会到了朝廷的威严。为了不受惩罚，他们甚至变卖家产，填上账目的缺值。李藏用作为楚州刺史、浙西节度副使，也在这一波倒查账目中苦不堪言，甚至私下里后悔这么卖力镇压刘展。结果他的下属兼仇家告状称他谋反，又先下手为强，袭击了他，将他斩杀。这位忠心耿耿保卫唐朝的将领死在了轰轰烈烈的清册运动中。

李藏用死后，崔圆为了掩盖事实，只好编派他造反的情节。他的手下大都选择了配合。这次，唯一不肯说李藏用谋反的，就是当初刘展的大将孙待封。崔圆大怒，将孙待封斩首。

在孙待封死前，众人都劝他说几句李藏用的坏话保命，但他叹着气说：我最初跟随刘展，是奉诏前去就职，最后却落得个谋反名声。李藏用灭掉了刘展，今天也落得个谋反的下场。人人都成了谋反，还有没有个完结！我宁肯死，也不想诬陷那些没罪的人！

李藏用从灭亡刘展到他自己灭亡，只有九个月时间，从他升官节度

副使到死亡只有不到三个月。

刘展和李藏用的结局，说明了安史之乱后期将领们的困境，哪怕他们尽忠职守，哪怕他们击贼有功，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刘展本身并没有罪过，却遭到了皇帝的欺骗；而李藏用忠心耿耿，却对付不了帝国官僚系统的极致压榨。[250]

有了刘展、李藏用以及更多人的例子，唐代的封疆大吏们终于意识到，要想获得安全，并不是信任皇帝就足够了。他们必须学会怀疑皇帝，构建起另一套有别于中央的制衡系统，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从这时开始，节度使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再是升官，因为升官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必须做三件事：第一，练兵，牢牢掌握住军队，只有这样才能保卫自己。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地盘都太小了，不足以应付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第二手，联保。几个节度使可以通过婚姻或者其他纽带，形成互相保护的结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对抗皇帝。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有限，但皇帝在对付任何一个时，必须掂量一下值不值得。最后一手，则是世袭。唐朝一直试图避免地方势力形成世袭集团，但节度使要想获得安全，必须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权力，才能在自己老了之后，不被皇帝清算。[251]

可以说，节度使这样做，消解了朝廷的权力，却是被唐朝人人自危的权力结构所逼迫的，他们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刘展和李藏用。当然，并非人人可以做到上面三点，于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这种节度使的起起落落，成了唐朝中后期的特点。

刘展叛乱虽然是安史之乱的结果，但作为战争又是独立的。就在唐朝想方设法镇压刘展时，与中原的史思明的对峙还在继续，并不时出现危机。

改朝换代

安史之乱的第六个年头，唐军与叛军双方都进入了疲惫状态。这可以从两者近一年的静止对峙中看出来。史思明占领洛阳之后，再也无力将自己的控制力推向南方，甚至连小小的河阳城都无力封锁。反过来看，史思明占据的是缺乏高地的平原地带，如果无法继续扩张，就很容易被唐军从高处击败。但是，唐军却无力利用自己的军事地理优势将史思明赶走，表明唐军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史书虽然告诉我们李光弼在河阳保卫战中占了上风，但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李光弼守住了河阳，却在整体局势中依然不敢乐观。他只是勉强保住了唐朝在东部的一个据点而已。加上刘展叛乱所造成的影响，唐军对史思明叛军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

决定双方下一步战局的依然是政治。自从玄宗以来，出现了向外派遣宦官担任监军使或者观军容使的情况，一批野心勃勃的宦官就成了皇帝的耳目，进而成了真正的主帅。在玄宗时，影响战局的是宦官边令诚，他杀死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从而改变了唐军原本正确的策略，使得局部之患变成了全局性的脓疮。[252]到了肃宗时期，除了宦官的名字换成了鱼朝恩之外，中官扰乱战局的问题依旧。

日后，人们将唐朝军事上的失败大都归咎于宦官，但这可能又过度了。宦官监军只是唐朝官僚制度设计中的一环，这一环节不是针对某件具体的事件，而是要在系统中起到了分散权力的作用。即便这一次不出事，只要系统存在，唐朝早晚会出现军中权力冲突的问题。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随着双方相持的时间加长，一股流言传了过来：据说史思明驻扎在洛阳的军队大都是北方燕地的人，他们思乡心切，人心涣散。观军容使鱼朝恩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判定这是一次进攻的时机。但鱼朝恩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李光弼的赞同，他对于自己的军队更加了解，认为唐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进攻的程度，当前阶段，依然要以守成为主。

公正地说，李光弼和鱼朝恩的争论是两种军事思路之争，这两种思路并没有本质上的对错可言。李光弼批评鱼朝恩，认为唐军没有做好准备，他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是，如果给唐军更多的时间，唐军就能做好准备吗？事实上，随着唐朝疆域被节度使们瓜分，唐军作战能力已经被削弱，如果不是叛军出问题，即便给唐军再多的时间，也很难做好准备。

能够说明李光弼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的，还有另一员大将仆固怀恩的态度，他赞同鱼朝恩的观点。作为一员军事统帅，仆固怀恩的进攻更加大胆，与李光弼的小心翼翼形成对比。但仆固怀恩同时也是一名合格的军事将领，他对鱼朝恩的赞同更多是出于军事选择，而不是意气之争。[253]

最终拥有决定权的依然是皇帝，从长安前往河阳的中使络绎不绝，让李光弼最终只能同意作战。他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卫河阳，自己则和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与鱼朝恩和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会合，准备一起进攻洛阳。

二十三日，双方在洛阳以北的邙山对阵。此时名义上负责指挥的是李光弼，但鱼朝恩却处于监督的地位，权力是在李光弼之上的。再加上两路大军配合得并不协调，这一切可能导致了后来的问题出现。

双方配合不协调最终表现在了选择布阵的地点上，李光弼希望依托于地理上的险阻来布阵，更靠近山区，而鱼朝恩却选择了在平原上布阵。双方正在争执时，阵形还没有布好，敌人就行动了。唐军很快崩溃，死亡数千人，兵器辎重几乎丢了个干净。

由于无法制止住溃军，两路唐军只好分开逃走。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渡过黄河，向山西境内的闻喜（位于绛州）撤退，而鱼朝恩和卫伯玉则逃往了西边的陕城。更为可惜的是，由于军队的崩溃，唐军辛苦守了一年的河阳城也不可能守住了。李抱玉听说了洛阳的失败，连忙收拾人马

弃城而去。叛军一鼓作气拿下了河阳、怀州。

由于整个东部都陷入了叛军之手，关中的皇帝慌忙调兵守住陕城。到这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有了当年安禄山进攻潼关之前的样子。那么，唐军能够抵御叛军的进攻吗？

事实上，两者的形势又有巨大的差别。五年前，安禄山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冲击力，而此时的史思明军队虽然可以打胜仗，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锐气。他们疲态尽显，内部问题重重，即便获胜也很难扩大战果了。

而更决定了叛军命运的，是他们内部的巨大裂痕，这让他们不仅失去了机会，还失去了最有能力的统帅。

史思明与李光弼本来是一个类型的统帅，他们都讲究严格治军，甚至显得有些苛刻，在作战中也更加讲究谋略。不管是安禄山时代两人在河北的对峙，还是史思明称帝后两人在河南的对峙，双方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技巧。表面上看，李光弼在具体的作战任务中微占上风，但在整体形势上，最后都是以史思明压倒李光弼而告终。

如果是史思明继续率领军队，即便无法击败唐军，但至少可以支撑更久，甚至在局部战役中继续占据上风。然而，史思明的优势在于他严谨的性格，劣势在于他过于苛刻，让下属受不了了。由于他对犯了错误的将领过于严酷，其手下人人自危，其中感觉最深的，是他的儿子史朝义。

史朝义的性格有些像当年的安庆绪，为人谦恭谨慎，受士卒拥戴。然而史朝义优柔寡断的性格也和安庆绪一样，使得史思明并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是更加宠爱他的小儿子史朝清。他让史朝清守住老巢范阳，而把史朝义带在身边，甚至屡次想杀掉这个儿子。

在击败李光弼向关中挺进时，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作为前锋从北道袭击陕城，而史思明自己则率领大军从南道进军。从陕城到东都的道路，

被崤山分成了南北两道，这两条道称为崤山南道和北道，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254]

到了三月初九，史朝义到达了北道上的礓子岭（也叫礓子阪），在这里他被卫伯玉的部队击败。史朝义担心父亲惩罚他，又接连几次进攻，都失败了。等两军会合后，史思明感叹这个儿子不中用，想要按照军法处置。十三日，史思明命令儿子依靠着山势修筑一座三角城储存军粮，做长远打算，给了他一天时间修城。不想史朝义又没有完工——墙上没有涂泥。史思明见到后大怒，立刻监督左右涂泥，在他的监督下，属下须臾之间就做完了。这些事叠加起来，让史思明感叹，只要拿下了陕州，就一定要杀掉这个不中用的儿子。

当晚，史思明在一个叫作鹿桥驿的地方休息，而史朝义则住在了驿馆里。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与史朝义合谋，在夜间袭击了史思明。史思明听到动静后翻墙骑马逃走，被射中了手臂，从马上掉了下来。当听说是自己的儿子造反后，他感慨儿子动手太早了，应该让他攻克长安之后再动手。

史朝义抓住父亲后，决定退军。他们撤退到了一个叫作柳泉的地方，将史思明勒死，尸体裹在毯子里带回了洛阳。在安史之乱中，这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军没有死在阵前，反而被儿子杀死。[255]

史朝义即位后，首先对付的不是唐军，而是清理史思明的残余。他首先杀掉了史思明的大将周挚，之后派人去范阳杀死了弟弟史朝清和他的母亲，以及其他不肯降服的几十人。范阳城内大乱，两派互相攻击，持续了数月，死亡数千人。如果此时唐军能够进攻范阳，叛军这座最后的堡垒或许早就不存在了。

由于史朝义无法服众，即便在洛阳周边，他也很难指挥得动驻扎在各个州县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叛军几乎陷入了瘫痪。

随着史思明的死亡和叛军的瘫痪，唐军的机会到了。四月二十一

日，青密节度使尚衡击败了史朝义的军队，斩首五千余。二十三日，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部队。五月，唐军令狐彰（原史思明大将）击败史朝义将领薛岌。

五月十四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史朝义在范阳的军队。六月初一，时任青密节度使的能元皓击败史朝义将领李元遇。

军败东都的李光弼也没有受到追究，皇帝依然任命他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共八道行营节度。

但此刻的唐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除了刘展的叛乱之外，各处的叛乱也纷迭而至。四月二十八日，位于四川的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他杀死了虢王李巨，并击败了东川节度使李奂，自称梁王，改元黄龙，设立百官，以绵州为龙安府。五月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和东川节度使李奂共同攻击绵州，十六日杀死了段子璋，终结了叛乱。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二月[256]，河东节度使辖区作乱。原来的节度使王思礼死后，继任节度使管崇嗣由于过于宽厚，导致军粮的流失，被皇帝免了职，又任命了一个严苛的节度使邓景山，于是将士们造了反，皇帝只好进行了安抚，派遣辛云京接任节度使。就在皇帝为了太原（河东）焦头烂额时，绛州又出现了乱情。皇帝只好请出了郭子仪，任命他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由他出面将叛乱的将军们斩杀，这才平定了太原和绛州的叛乱。

与此同时，党项、奴刺等边疆民族也不断地趁火打劫，进攻唐朝边境。[257]

在这一系列的骚动中，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无力与史朝义全力作战，导致双方各有胜负。而对唐王朝影响最大的，还是肃宗皇帝和玄宗太上皇的先后去世，这让唐朝民众再次看到了宫廷斗争的影子。

事实上，在三月（建辰月）十一日，郭子仪领军离开长安时，皇帝就已经病得不轻，不再接见朝臣。郭子仪想见皇帝也受到了阻拦，他坚持要见皇帝最后一面，表示自己已经很老了，这次很可能死在外面，不见皇帝不会瞑目的。皇帝只好将他招入卧室，再次郑重地将河东的事情委托给这位肱股之臣。

就在皇帝的身体日益垮掉时，先去世的却是太上皇。四月（建巳月）初五，太上皇驾崩于西内的神龙殿。这位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盛世的皇帝，到了晚年却被叛乱逼迫着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长安后，又在几个宦官的欺负下度过了苍凉的余生。在他死时，几乎所有他珍惜的一切都已经逝去，不管是他宠信的宰相李林甫，还是美丽的杨贵妃，都已经先他而去，甚至连伺候了他一辈子的高力士也流放到遥远的巫州。高力士后遇赦返京，但他才走到朗州就听说了太上皇的死讯，号泣着呕血而亡。[258]

太上皇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尸体被迁到了西内的正殿太极殿，群臣在这里为他送行。但就在这时，一场宫廷阴谋又随之而起。

这次阴谋的两位主角曾经有过联合，分别是肃宗皇帝的皇后（当初的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他们在分别担任太子妃和东宫宦官时为了权力而联合，此时两人都已经获得了无比的尊贵和权力。随着太上皇的离去和肃宗的病重，他们到了决斗的时候了。

李辅国作为唐朝第一个大权独揽的宦官，有着掌控一切的欲望，而这恰好触动了皇后的利益。皇后决定联合越王李系、宦官段恒俊等人除掉李辅国，他们选择了两百多名孔武有力的宦官，给他们穿上盔甲，试图于十六日发动攻击。皇后计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将太子控制住，以便在肃宗死后能够掌控局面。当时皇帝由于病重，已经授予太子监国之权。

而李辅国一方的盟友则是另一位宦官程元振。程元振打探到皇后的

密谋，告诉了李辅国。于是在皇后召见太子，试图控制他的时候，李辅国先下手为强，控制了太子，将他安排在玄武门外的飞龙厩。当夜，他们提前派人将越王、段恒俊等百余人抓获，粉碎了皇后的图谋。

由于有太子在手，李辅国利用太子的命令，逼迫皇后离开皇帝，迁居于别殿。当时皇帝还没有死，皇后就在他的身边寻求保护。使者拿着太子的命令逼迫皇后离开，将她和身边的人一起囚禁在后宫之中。

皇后离开患病的皇帝之后，这位倒霉的皇帝又撑了一天，到了十八日，他终于在宦官和皇后的夹逼之下死了。李辅国随即杀死了皇后及其密谋的参与者。当年肃宗还是太子，决定北上灵武时，张良娣日夜守候在他的身边，甚至希望用自己的身躯保护肃宗免遭暗害。她有着唐代后宫女人都有的无数缺点，对肃宗却挚爱无比，到最后，她的生命只不过比肃宗长了不到一天。

肃宗死亡当天，李辅国拉上太子接见群臣，哭诉老皇帝已死，恭贺新皇帝万岁。

二十日，太子急匆匆即位，是为代宗皇帝。[259]

李辅国由于护卫太子有功，颇为自得。他居功自傲，甚至直接对皇帝说：你只要在禁中居住就行了，外事交给老奴来处置[260]。最初时，新皇帝由于根基不稳，给了他极大的荣耀，甚至称他为尚父。作为宦官，他官至司空兼中书令，一时风头无两。

但如果仅仅把李辅国的擅权当作理所当然，那就错了。事实上，唐代宗是唐代最后一位锐意限制宦官的皇帝。代宗之所以不得不用李辅国，是因为李辅国手中有兵权，而刚刚即位的代宗担心他作乱，不敢动他。在拿掉李辅国之前，皇帝必须选择帮手。

皇帝选择的帮手是另一位宦官——飞龙副使程元振。程元振参与了李辅国的密谋，也参与了杀死皇后的事件。虽然他也是宦官，但比起根基深厚的李辅国，皇帝更易掌控他。李辅国荣任“尚父”仅一个多月，六

月十一日，掌控了局势的皇帝，就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的职务，用程元振取代了李辅国的军职，让李辅国搬到外第，不再参与皇帝的军国重事。

李辅国被拿下，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感觉到新皇帝的开局不同以往。李辅国也体会到了皇帝的手段，不久他又被罢黜了实权性的职务中书令，只得了个有待遇却没有实权的博陆王。他更感到屈辱的是，皇帝在不断调整他职务的过程中，他还得进宫道谢。有一次，他见到皇帝后，连忙哽咽着说：老奴伺候不了郎君啦，自请到地下伺候先帝去。

皇帝表面上安抚了他，却并不打算放过他。十月十七日，在外第居住的李辅国家里突然遭到盗贼光顾，这些盗贼见到李辅国，挥刀将他的头连着一条手臂削了下来。按照行刺的惯例，刺客只需要带走死者的人头，但由于这次充满仇恨的砍杀，他们不得不把李辅国的一条手臂也带走了。

到底是谁干的，又是谁指使的？人们众说纷纭，但皇帝显然对李辅国的死亡感到“悲痛”，不仅给他雕刻了一个木头头颅，还赠予他太尉之衔把他埋葬。

皇帝对于李辅国的处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距离他将宦官集团剪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宦官集团，代表人物除了程元振之外，还有在肃宗时期就受到重用的鱼朝恩。两人时而斗争时而联合，共同把持了朝政。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吐蕃人突然进攻长安，将皇帝再次驱离了长安城。吐蕃之所以能够进入长安，是因为程元振隐瞒了吐蕃入侵的消息，导致皇帝没有准备。这给了皇帝流放程元振的借口。在流放途中程元振被仇家杀死。

程元振死后，鱼朝恩却走了好运。由于在吐蕃来时抗吐蕃保卫皇帝有功，鱼朝恩的权力越发扩张，甚至超越了当初的程元振。直到大历五

年（公元770年），皇帝才和宰相元载联手杀死了鱼朝恩。[261]

皇帝与宦官的斗争持续了八年，才由皇帝和他的正规官僚系统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即便这样，胜利也是短暂的。代宗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德宗皇帝由于遭到藩镇的联合反叛，大臣们纷纷逃走。德宗皇帝又意识到，只有宦官对他是忠心的，于是宦官再次回归权力中心。中晚唐时期，宦官和皇帝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局面，他们共同联手对付正规官僚系统，又不时发生内部的争斗。

代宗即位后，除了与宦官斗争，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由于肃宗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破坏很大，代宗及时扭转了父亲的一系列最招致民怨的政策。肃宗时期发行了两种大面值的钱币，这两种钱币由于含铜量不足，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五月十四日，登基不满一个月的皇帝下令，不管是这两种钱，还是原来的开元通宝，都只能以一当一流通。这实际上是重新承认了开元通宝的货币地位，使得民间金融的乱象得以扭转。

除此之外，他还任命了一位能吏刘晏担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负责经济和金融工作。[262]也是从这时开始，税制和税收问题进入了皇帝的视野。之前唐代实行的租庸调制度过于复杂且难用，需要新的税制。虽然推出新税制还要等很久，但这至少说明皇帝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除了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在军事上，新皇帝比起老皇帝更加懂得放权的道理。老皇帝虽然任命了很多节度使，却又不敢相信他们，于是派出了很多宦官做监军，造成指挥系统的不畅。新皇帝刚上台控制不了宦官，程元振等人甚至制造冤案杀掉了曾经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263]但只要皇帝能够控制局面，他就选择相信将军们，让他们放手发动军事行动。至少在最初，皇帝的这种意图是能够贯彻的，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唐王朝结束安史之乱的时机到了。

叛乱的终结

代宗即位后，首先的挑衅竟然来自史朝义。唐朝皇帝的更替让他也看到了希望。在这之前，史朝义和李光弼在徐州、宋州地区对峙，多次被李光弼击败。他向太原境内的进攻也被李抱玉击败。

史朝义听说肃宗皇帝已死，想利用唐朝皇权交替的混乱进攻。但他本人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击败唐军，于是他想到了另一步棋：联合北方的回纥人一同进攻唐朝。

此时的回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肃宗皇帝交好的毗伽阙可汗已经死了，他的长子叶护曾经参加过收复两京的战役，但也已经死去，回纥人拥立了可汗的另一个儿子，是为登里可汗。

史朝义要做的就是让登里可汗相信唐朝的混乱足以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利益。登里可汗也的确上了钩，听了史朝义的游说，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南向进攻。

这支回纥大军本来是想偷袭，却遇到了唐朝前往回纥出使，争取重修旧好、征讨史朝义的使者。使者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赶回去汇报皇帝。就这样，登里可汗在唐朝的争取下，又从信心满满变得犹豫不决。

决定了登里可汗态度转变的是他的岳父仆固怀恩。在登里可汗为王子时，他的父亲曾经代他向皇帝求婚，皇帝封仆固怀恩的女儿为公主嫁给了他。仆固怀恩见到登里可汗，不仅劝他放弃进攻唐朝，还劝回纥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264]

那么，回纥人是否是真的想帮助唐朝呢？并非如此，从回纥人后来的作为，就可以看出来，回纥人出动大军只是一次打劫行为，他们并不在乎是帮助史朝义进攻唐朝，还是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他们在乎的是带领十万大军对中原进行一次洗劫，获得足够的战利品——不管是帮助哪一方作战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掠夺就可以了。

这一点在回纥人南下到底走哪一条线路上反映得淋漓尽致。

回纥人被史朝义诱骗出发后，首先来到了现在的山西忻州，并在这里接受了唐朝的提议。既然要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按照回纥可汗的意思，这支军队要从汾河南下，越过蒲关进入关中地区，再从关中经过潼关，直接攻击洛阳。这条线和回纥人第一次走的路线接近。可是，这条路事实上绕了个大弯，要从忻州去往洛阳，最近的路是走上党和太行陉（天井关），根本不用进入关中。更何况，由于关中地区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没有处于战乱，回纥的十万大军如果经过，不啻一次兵灾。

于是，皇帝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回纥可以换一种走法，从忻州经过太原附近，直接从井陉出去，进入河北地区，再从河北前往洛阳。这条路也不是最近路线，但皇帝却有着很明确的算计在内，因为河北地区许多地方还是由叛军掌握，回纥掠夺得越厉害，对叛军打击越大。

但这种方式对回纥人不利，事实上是让他们自己在敌对地区想办法补充给养，皇帝就不负责回纥人的给养问题了，登里可汗拒绝了。

唐朝再次建议回纥人走最近路线，即直接顺着太行山西麓，走现在的上党地区直插河阴（今郑州以北偏西），再前往洛阳。这条路对叛军来说打击也非常大，不仅可以直接进攻洛阳，甚至还可以将叛军斩为两段。但是，这条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所过地区过于贫瘠，不利于掠夺。回纥人也拒绝了。

双方你争我争，最后折中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回纥人先经过汾河河谷前行，到河东地区后转向南方，从现在三门峡以北，也是当时陕城以北的大阳渡（茅津）过河。唐朝在这里有一个叫作太原仓的巨大仓库，可以供应回纥人吃饭。到了这里，回纥人再和其余诸路大军配合进攻，不耽误接下来的掠夺。[265]

回纥问题解决后，接下来是派遣其余人马。这时在南方的台州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李光弼正在对付这一次叛乱[266]，朝廷在选择人手上并

没有考虑他。除了任命长子雍王李适担任元帅之外，皇帝还想任命郭子仪担任副元帅，负责出征。可宦官们对于郭子仪心怀妒忌，郭子仪也担心受到宦官的迫害，坚决推辞。加上回纥人到来所产生的协调问题，最后皇帝选择的是登里可汗的岳父仆固怀恩。

十月，皇帝任命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于原职之外，加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驻军节度行营。为了表示对仆固怀恩的信任，皇帝甚至在二十一日送行时，让仆固怀恩带上母亲、妻子等家眷，这主要是考虑让他们去见一见可汗的妻子（仆固怀恩的女儿），更是向仆固怀恩表明皇帝的信任。一般情况下，将军出征后，他的家人就成了皇帝的人质，只要将军叛逃，人质就要下狱。

此时雍王李适已经到了陕州，而回纥人则驻扎在陕州的黄河以北，双方隔着大阳渡口相望。李适带领数十骑随从前往黄河北岸见回纥可汗，双方随即发生了争执，因为回纥可汗认为自己是与唐天子平等的，而作为臣子的李适应该向他拜舞。争执的结果是回纥人放过了李适，而将他随行的几个官员各打了一百鞭子。这些挨鞭子的人中，当晚就有两人去世。这种争执也反映出回纥人与唐朝的真实关系。

二十三日，西路大军从陕州出发进攻洛阳，而其余唐军也各自前往。除了雍王李适作为大元帅留在了陕州，其余的将领中，仆固怀恩和回纥兵作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从渑池进入洛阳。潞泽节度使李抱玉则从河阳向南。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位于现河南开封境内）前往。

到了二十六日，仆固怀恩等军到达了洛阳以西的同轨郡。此时洛阳的叛军已经听说唐军来了，阿史那承庆劝说史朝义：唐军不可怕，回纥军却不可挡，不如退守河阳。史朝义不肯答应。

二十七日，唐军来到了洛阳北郊，并分兵去取黄河以北的怀州，次日就攻克了怀州。

三十日，唐军在洛阳北郊的横水布下了战阵。叛军在城北也有数万人，他们为了抵御唐军，早早地布下了一些栅栏，希望阻挡唐军的骑兵。仆固怀恩本人在叛军栅栏西面的平原地带布阵，又派遣骑兵与回纥人从南面绕过去，自东北方攻击敌人，双方夹击，将敌人击败。

史朝义听说北面告急，连忙派精兵十万，也是他所有家底去解救，在昭觉寺布开了战阵。唐军快速地袭击了叛军，虽然杀死了不少人，却并没有冲垮对方的阵容。鱼朝恩也派遣了五百名弩手，依然无法攻破敌阵。

叛军采取了一种战术：人人持有盾牌，一旦唐军进攻，他们就举起盾牌，既可以阻拦对方的冲击，也可以阻挡弩箭，更避免了自己的阵形被冲乱。唐军的镇西节度使马璘眼看战情告急，连忙冲到敌前，夺下对方两个盾牌，掀开了一个缺口，率军冲入敌阵。当后面的人跟上之后，这才打乱了敌人的战阵。

敌人失去了阵形，连忙撤退。他们一路上在石榴园、老君庙等地试图组织反击，却都失败了。在一个叫作尚书谷的地方，填满了叛军的尸体。唐军一共斩首了六万人，俘虏了两万人。史朝义只能率领数百人向东逃走。

仆固怀恩进入了洛阳和河阳，把回纥人留在河阳城，派自己的儿子仆固玚带着朔方军追击史朝义。他们在郑州打了胜仗，逼迫史朝义逃到了汴州，汴州拒绝接纳史朝义，他只好继续逃往濮州。

仆固怀恩在前方打仗时，后方却已经开始了掠夺。最初的掠夺是回纥人干的，他们进攻中原不是为了帮助唐军或者叛军，而是为了抢东西，既然已经胜利了，就到了抢劫的时候了。回纥士兵们进入洛阳烧杀掳掠，洛阳百姓死亡上万人。抢掠引发的大火，更是数十日不灭。他们把东西都放在河阳城看好。回纥人抢夺过后，朔方军和神策军也都忍不住了，他们互相宽慰着说，洛阳是敌境，应该予以打击，于是纷纷撸起

袖子开始抢劫，之后又扩大到了整个河南。他们烧房子，抢衣物，抢夺过后，人们就只好穿纸做的衣服。

在后方发生大规模有计划的劫掠时，前方依然在追赶着史朝义。到了十一月，史朝义从濮州以北渡过黄河前往卫州。仆固怀恩攻克滑州之后，紧紧跟随着他。叛军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加入了史朝义，凑了四万多人继续打，又被仆固玚击败，被赶到了昌乐（现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西北）以东。史朝义在这里又纠集了魏州的兵马继续作战，再吃败绩。

在他们打仗时，叛军的其余将领纷纷投降。邺郡节度使薛嵩率领相、卫、洺、邢四州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率领赵、恒、深、定、易五州投降。

他们之所以投降，与仆固怀恩的招降政策有关。为了减轻作战压力，尽快取得胜利，仆固怀恩希望史朝义的大将投降，断绝他的出路。为了让这些人投降，必须让他们安心，不用担心事后被杀，这就要给他们留下出路：让他们官居原职，不派人取代他们。

以薛嵩为例，他本人向唐军的李抱玉部投降。李抱玉随后就进入了薛嵩的营地，开始安排人手取代薛嵩的将领。但仆固怀恩却认为一旦这些人被取代，这支军队就失去了作战能力，而这些被取代的将领也不再有安全感，因此以上级的名义制止了李抱玉的行动。[267]

新皇帝代宗也意识到了唐朝的君臣之间互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的问题，也在考虑怎样增强大臣和将军的安全感。很可能仆固怀恩是了解了皇帝的意图，才这样做的。

但他这样做，又让那些习惯了内斗的将军们感到不适。不满的除了李抱玉，还有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他们都向皇帝做了密奏，报告仆固怀恩这样做是想造反，仆固怀恩与辛云京的矛盾就是这样肇端的。

皇帝还是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封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把他

的名字改为李宝臣。而郭子仪也肯定了仆固怀恩的功劳，建议皇帝封他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仆固怀恩继续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先到了贝州，又去了临清，在这里仆固玚击败了史朝义从衡水拉来的三万人。此时回纥人也到了，双方再次在深州的下博决战，史朝义失败后来到了莫州，并困守于此达一个月之久。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大将田承嗣眼看莫州守不住了，劝说史朝义亲自去往幽州征兵，自己则死守莫州。史朝义同意了，率军五千突围而出。不想他刚走，田承嗣就投降了[268]，还把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送给了唐军。

在史朝义的身后，唐军紧紧跟随，再次击败了他。史朝义逃到范阳，这里虽曾经是叛军的老巢，但这时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递出了降表，在等待结果。守卫范阳城的是兵马使李抱忠。史朝义想进范阳，李抱忠却不敢放他进去。史朝义到这时才知道田承嗣已经投降了唐军。他恳请李抱忠给他点吃的，李抱忠在城东给他准备了食物。在他吃饭时，他麾下的范阳士兵也离他而去了，剩下的只有数百名胡人士兵跟随。

离开范阳后，史朝义唯一能做的，就是越过燕山去往茫茫北方。他先到了广阳（也就是檀州，现北京密云），广阳也不开门，于是他选择了折向东南，准备进入辽东地区，也就是奚人和契丹人的地区。他来到了一个叫作温泉栅（可能在今河北省滦州市西北）的地方时，已经完成了从叛军到唐军转变的李怀仙追击到这里[269]。史朝义已经无路可逃，只好跑到路边的树林中自缢而死。李怀仙将他的人头割下，送往长安。

影响后世中国达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收场了。

乱世开启

安史之乱以史朝义的灭亡为终章，但它引起的余波却再也无法平息。人们常常感叹皇帝因为采纳了仆固怀恩的计策，招降了史朝义的大将，封他们为节度使，而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是造成后来藩镇割据的原因。

除了前面提到的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之外，皇帝还封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这些河北地区的节度使在未来发起了多次叛乱，甚至引起了规模巨大的泾原之变，让德宗皇帝再次逃出了长安。[270]

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招降他们，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皇帝想打仗，疲敝的唐王朝也已经没有力量了。如果这些人继续反抗，那么安史之乱或许还要持续很多年。没准又出现一个安禄山或史思明，将事态扩大。最容易的方法还是招降他们，给他们安全感。

安全感，也是仆固怀恩痛定思痛之后的抉择。在李光弼刚刚接替郭子仪掌握兵权时，仆固怀恩为了防止李光弼把自己杀掉，甚至不得不带着军队去见李光弼。

事实上，唐朝在经过了安史之乱后，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便是将军和节度使也无法幸免。最典型的就是来瑱，来瑱是安史之乱中守卫襄阳的重将和功臣。他最初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封为开府仪同三司、颍国公，之后又任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可是由于他的权力太大，加之他本人不愿意离开襄州，导致皇帝对他猜忌。皇帝先是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来削弱他的权力，又想用对付刘展的办法来对付他，派人出兵进攻他，不想反而被他击败了。来瑱并不知道这是皇帝的计策，还专门到长安向皇帝谢罪自己擅自动兵。皇帝表面上给他升官，暗地里，却让与来瑱有仇的权臣、宦官程元振告他谋反，再痛快淋漓地把来瑱除掉了。[271]

来瑱作为功劳巨大的高级将领和重要节度使，可以被皇帝任意算计，被宦官任意陷害，更增加了地方大员们对安全感的反思。他们反思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有兵权，并且要掌权到死，传给儿子或者指定继承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势力太小，还要拉帮结派，形成联保。这种做法只是为了寻找一种均势，避免自己被灭亡。至于这种均势是否破坏了中央集权，则是节度使们来不及考虑的了。

之所以说安史之乱末期，唐王朝已经山穷水尽，除了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之外，还有外患的原因。

回纥可汗的十万兵马依然在为非作歹，四处抢劫，甚至有人闯入了长安的皇城内。由于回纥兵的威名，长安的卫兵竟然不敢拦截。到撤退时，回纥兵依然四处抢劫杀人，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不仅仅是回纥人，更大的威胁来自西南的吐蕃。就在安史之乱结束没有多久，当年七月，一支吐蕃的军队突然出现在甘肃地区，他们攻克了兰州、廓州、河州、鄯州、洮州、岷州、秦州、成州、渭州等地，将整个河西、陇右降服，又侵入大震关，对关中地区形成威胁。早在之前，吐蕃人趁着唐朝的动荡，已经侵入了青海，甚至进入了新疆地区，成了西部的重大祸患。

不可思议的是，如此严重的军情，皇帝竟然一直不知道。原来宦官程元振将消息截留了，没有告诉皇帝。直到十月，吐蕃侵入泾州，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后，带领吐蕃向长安赶来，当吐蕃人过了邠州之后，皇帝才听说了这件事。

十月初二，吐蕃进攻距离长安不远处的奉天、武功，引起了长安的震动。皇帝立刻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让赋闲已久的郭子仪担任副元帅，赶往咸阳。

郭子仪仓促之际，只找到了二十名骑兵，他带着这二十人飞骑赶往咸阳，此时吐蕃率领的吐谷浑、党项、氐、羌联军二十万已经过了渭

河。郭子仪派人回长安寻找增援，竟然被程元振阻拦。初六，吐蕃击败盩厔守军，渡过便桥，来到了长安郊区。第二天，皇帝仓促之间逃离了长安，这次他不是向西，而是向东逃去，去往陕州，一路上各个官府的人员都已经逃走，没有人伺候皇帝，甚至有人在阴谋造反，接应吐蕃。[272]

吐蕃事件发生时，由于宦官程元振的擅权，众多掌握兵权的节度使非但不敢率兵前来，反而担心被程元振迫害而装作看不见，其中就有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英雄李光弼。

初九，吐蕃进入长安，在一群叛臣的帮助下，立原汾王李守礼的孙子李承宏为皇帝，建立了百官制度。所幸，吐蕃的进攻是以劫掠为主，同时郭子仪发现唐朝的溃军大都顺着武关蓝田道跑到了武关附近，于是到武关征集了溃军。在他的带领下，唐军又恢复了信心。加之郭子仪用少量的兵士制造了大军正在到来的声势，吐蕃人在掠夺之后也不想留在长安。二十一日，在进入长安只十二天之后，吐蕃人就离开了长安。

吐蕃人虽然离开了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其对四川西部的劫掠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让唐朝失去了川西的松州、维州、保州等地。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是高适，由于他无法挽救败局，导致皇帝将西川和东川两节度使合二为一，任命严武担任长官。严武的就任，也成就了一段佳话，那是杜甫在成都最得意的日子。

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皇帝才回到长安，他一共离开了两个多月。这次吐蕃入侵事件，也反映出唐朝是多么脆弱。如果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那么随着吐蕃的进攻，史朝义在东面呼应，将对唐朝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吐蕃的进攻只是唐朝遇到的问题之一，而更大的问题依然是君臣之间无法达成互信，以及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

唐朝结束安史之乱的三大功臣是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除了

郭子仪得以善终之外，剩下两人在战争结束后都受到了猜忌。李光弼晚年在徐州掌兵，虽然皇帝已经赐予他铁券，但在吐蕃之乱中，他却由于担心宦官的迫害而不敢勤王。吐蕃之乱结束后，皇帝想消除李光弼的疑心，授予他东都留守的职务。但李光弼却担心到了东都就脱离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推辞了，依然经营自己的徐州，甚至想利用江淮地区的赋税来自给自足。

皇帝知道李光弼的疑心太重，于是将他的母亲接到了京师善待，又给他的弟弟李光进封官，让其掌握禁军，最后给李光弼继续封官。但这都无法消除李光弼的疑虑。李光弼之所以这样，并非完全是因为他的疑心太大，而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掌握朝政的是宦官鱼朝恩。即便皇帝试图解开这个死结，但只要皇帝身边围绕的还是那些人，迟早有一天，回到长安的李光弼会成为鱼肉。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李光弼在徐州郁郁而终，时年五十七岁。[273]

掌权较早的李光弼尚且如此担心，那么更加张扬、起步更晚的仆固怀恩，就更有理由担心了。

事实上，仆固怀恩比郭、李等人更注意君臣互信问题。在安史之乱后期，他也试图帮助那些降将放下心理包袱，继续让他们治理河北地区，打消他们对朝廷的疑虑。但到了最后，仆固怀恩却发现自己又掉入了这张罗网之中，由于过于想打破原来的朝堂秩序，建立另一套规则，他被其他的将领当作异类，甚至将这看作他造反的先兆。于是，即便他不想造反，将领们的流言也逼迫着他去实现这个流言了。

最早举报仆固怀恩的是位于山西地区的李抱玉和辛云京，甚至史朝义还没有败亡，他们的举报信就已经上交皇帝了。等仆固怀恩彻底平定了史朝义叛军，事情反而对他更加不利了。

辛云京对仆固怀恩的仇恨在收复东都的战役还没有开始就产生了。在回纥刚刚进入中原时，由于回纥是受史朝义的诱惑而来的，皇帝为了

将回纥争取过来，派遣仆固怀恩到太原与回纥人相见。驻扎太原的辛云京担心仆固怀恩与回纥可汗联合，就紧闭城门不肯出来迎接，也不给补给。仆固怀恩并没有在意，带着回纥绕过城市南下，完成了对洛阳的收复。等史朝义灭亡后，又是仆固怀恩将回纥礼送出境，再次路过太原，辛云京还是闭城防守，不和他说话。对于辛云京的敌意，仆固怀恩愤怒异常，他一面上报皇帝，一面让军队绕过了太原，在太原以南的汾州、榆次、祁县、沁州、晋州等地驻扎。

此时皇帝又派遣了一位宦官骆奉先前往太原监军。骆奉先原本与仆固怀恩友善，双方互称兄弟，但这一次他到达太原后，收了辛云京的贿赂，辛云京让他向皇帝汇报仆固怀恩要联合回纥造反。

骆奉先回长安途中，从仆固怀恩的汾州大营路过。仆固怀恩立刻将他带回家中拜见母亲，两人一块儿喝酒。仆固怀恩的母亲乘机责备骆奉先不应该耍两面派。

为了让兄弟放心，仆固怀恩喝了很多酒，甚至为骆奉先跳起了舞，他们互相赠送礼物，看上去很亲近。第二天仆固怀恩还不过瘾，希望骆奉先再住一天，骆奉先执意要走，于是仆固怀恩把他的马藏了起来。不想这被骆奉先当作要杀他的信号，到了夜间，连忙跳出城墙逃走。骆奉先的举动让仆固怀恩也吃了一惊，连忙把马还给他，让他上路。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八月十三日，骆奉先回到了长安，随即向皇帝上报仆固怀恩谋反。与此同时，仆固怀恩向皇帝报告辛云京和骆奉先勾结。

皇帝依然选择做和事佬，他不相信仆固怀恩谋反，因为如果仆固怀恩要谋反，一定会趁回纥兵还在的时候，绝不会轻易送走强援。他依然在试图解开这个困扰着唐朝所有官员的死结，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安全感。

但辛云京和骆奉先的告状让仆固怀恩感到委屈。这个汉子在安史之

乱中，家族一共有四十六人死于平乱，他的女儿为了唐朝，作为公主嫁给了回纥人，加上他还有帮助皇帝说服回纥，收复洛阳，平定河南、河北的功劳，可谓对唐朝忠心耿耿。仅仅从战功上讲，他已经超出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依然无法避免受到猜忌。他越想越委屈，提笔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看作诉说了唐朝文武官员们集体的冤屈，他们已经在互相猜忌中度过了一百多年，却依然无法摆脱这道魔咒。[274]

他提到因为辛云京关闭城门不给回纥补给，让回纥可汗震怒，自己是如何委曲求全才哄走了回纥人，不想却被辛云京等人告了状。他认为自己有六大“罪状”：第一，帮助先帝扫清黄河河曲的同罗叛乱；第二，他的儿子仆固玢被同罗俘虏，逃回后，他公正无私地将儿子处斩，为了国家不要亲情；第三，他的两个女儿为了国家远嫁回纥，为国和亲；第四，他的儿子仆固玚为国效命；第五，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招降了史思明河北的将领；第六，他请来了回纥人帮助唐朝，又安全地送走了回纥人。

然而功劳越大，他越没有可能平安落地，所有的人都盼着他出事。即便现在他想回长安也很困难，因为士兵们已经知道有人在陷害他们的将军，不肯放他走。仆固怀恩依然希望能够去长安面见皇帝，请皇帝派人邀请他进长安，他好有借口离开。

到了九月，皇帝按照仆固怀恩的请求派人去见他，仆固怀恩抱着来人的脚大哭一场，准备跟来人一同离开，却被手下士兵阻止了。仆固怀恩想派儿子进长安，士兵们也不同意。到这时，事情越来越向着失控滑去，不管是皇帝还是仆固怀恩都无法处理了。

吐蕃人入侵长安让仆固怀恩事件暂时搁置了起来，等吐蕃人走后，皇帝再次想解决这个问题。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初八，皇帝派遣颜真卿去宣慰仆固怀恩，想让他回长安。颜真卿却认为这样做是徒劳无功。他指出，事实上绝大部分官员都知道仆固怀恩是冤枉的，只有四人（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认为他有罪，但就是这四人掀

起的风浪就已经让事情无法收场。如果皇帝还逃亡在陕县，以勤王的名义召集仆固怀恩，他一定会应召而来。可皇帝已经回了长安，仆固怀恩没有了任何理由前来长安，也不会来了。

不过颜真卿给皇帝提供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仆固怀恩作为朔方节度使，手下士兵大都是郭子仪时期的，只有重新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兵才会舍弃仆固怀恩，回到他们的老领导麾下。

当皇帝想重新任命郭子仪的消息传到营中，仆固怀恩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郭子仪获得了任命，自己的军权就烟消云散了。他冒险一搏，决定解决自己的仇敌，于是向太原发起了进攻。然而，随着士气的低落，以及部队中胡人士兵和汉人士兵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仆固怀恩不仅没有攻下太原，他的儿子仆固玚还被部下杀死——这位在歼灭史朝义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将领就在内乱中死去了。仆固怀恩听说儿子死去，加之郭子仪重新担任朔方节度使，甚至连他的母亲都责怪他不应该造反，他率领三百人向西渡过黄河，北走返回朔方，山西的战局顷刻烟消云散。

仆固玚的头颅被送到了长安，引得人们纷纷向皇帝道贺。但此时，皇帝依然想和平解决，他责备自己信不及人，才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甚至下令将仆固怀恩的母亲接回长安，好好奉养，让老人善终。

仆固怀恩占据了北方的灵州，随着郭子仪对北方局势的掌控，仆固怀恩的势力被大大削减。但即便这样，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和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接连两年，仆固怀恩还是以他的回纥可汗岳父的身份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联合回纥与吐蕃两军，两次进攻唐朝。

第一次（广德二年七月），他引回纥、吐蕃十万众直达陕西北部的宜禄和邠州，之后又进逼奉天，郭子仪先是闭城不战，后于十月初七突然列阵让敌人措手不及，仆固怀恩主动撤退。

第二次（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

项、奴刺数十万众入侵，他自己却于九月初八突然暴病而亡。仆固怀恩的死亡让唐朝失去了一个大敌。郭子仪随后选择了联合回纥进攻吐蕃的策略，化解了这次迫在眉睫的灾难。

唐朝与仆固怀恩的恩怨，以仆固怀恩的死亡而告终。他的死讯传到皇帝耳中，皇帝依然坚持认为“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275]但真正让仆固怀恩无法回归的，不是他的左右，而是唐朝特有的官场文化——让所有人都无法获得安全感，只能靠互相伤害求得自己的生存。

在三大名将中，只有郭子仪获得了善终，这和他待人宽宏有关，也和他在灵武勤王时所获得的地位有关，更和他不参与众人的阴谋有关。即便是程元振、鱼朝恩等对他最忌惮的宦官，也只是建议皇帝不要给他军权。郭子仪不能制止这样的官场争斗，却超然于外，首先向众人展示自己是无害的，其次也告诉众人，要想伤害他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伤害。但是，在安史之乱时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郭子仪，其余的人都陷入明争暗斗之中无法自拔。郭子仪的存在变相告诉人们，在唐朝的官场上要想做到不受伤害有多难。

诗人之死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就在安史之乱结束前一年多，诗人王维去世了。王维晚年的日子过得相当平静，几乎没有再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在他被从东都带回并虚惊一场之后，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复了官。他首先被授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在同一年又改授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秋天又官拜给事中。伪官事件对王维的影响，是他把自己的辋川别业布施给僧人，这里在他死后将变成寺庙，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依然归他享用。[276]到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他转为尚书右丞。第二年春天，由于他的弟弟王缙被授予了蜀州刺史，王维嫌弟弟做官去得太远，于是上表皇帝，请求以自己的职位换取把弟弟调回京城。皇帝并没有收回他的官职，但也把他弟弟调了回

来。

王维晚年的交往圈子不大，除了他终生的道友裴迪之外，另一个交往对象是严武。严武也是世家出身，以门荫授官。和高适一样，严武也担任过哥舒翰的判官，后来得到了侍御史的职务。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他跟对了人，到灵武去找肃宗，因此一路高升。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严武得到了京兆少尹的官职，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277]严武在京师交游甚广，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维、杜甫和岑参[278]。

严武性格刚烈残忍，但对诗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耐心。在京师，王维晚年与严武以诗应答，好不热闹。[279]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严武官封河南尹，又来与王维道别，他可能是王维最后的访客之一。[280]到了当年七月，王维去世了。他的弟弟王缙检点哥哥的诗文，发现开元之前的诗稿留下的很多，但天宝之后的连十分之一存世的都没有。[281]

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安史之乱，王维早已经功成名就。与李白相比，他也更加有优势，因为除了是著名诗人之外，他还是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之一。即便日后李杜的名声日隆，但王维依然是唐代排名前五的诗人，足以与白居易一争高下。他是一个属于和平与宁静的人，世间的纷纭是与他无关的，他只是不小心坠入凡尘罢了。

王维死后仅仅一年，盛唐时代诗人两大高峰中的一个——李白，也去世了。

李白在流放夜郎被赦免之后，他的巅峰时期也早已过去。他也是一位盛世诗人，不管是否有安史之乱，他都会成为唐代诗人中最耀眼的那一颗星。安史之乱添加了另一颗耀眼的星星（杜甫），他的光芒甚至盖过了王维，却丝毫无损于太白之星。

在李白流放遇赦前，他在洞庭湖一带遇到了前中书舍人贾至。贾至曾经在长安与王维、杜甫、岑参等人唱和，但自从杜甫倒霉后，贾至也倒了霉，被外放汝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岳州司马，于是遇到了李白。李

白被赦免后，又回到了岳州，再次遇到了贾至，两人诗酒应答，成了李白晚年少有的佳话。

之后李白一直在南方游荡，他去过江宁（金陵）、宣城、历阳、当涂等地。战争在继续，他除了鼓励一下遇到的将领之外，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他的从叔李阳冰担任了当涂令，李白前往投靠[282]。在当涂，李白由于饮酒过度去世[283]。人们传说，他死前所作的《临终歌》概括了他的一生[284]：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在唐代的诗人中，高适和李白处于仕途的两个极端。李白自始至终为一介平民，即便与皇帝亲近了一段，但由于不甘心当一个政治宠物，很快就离开了，连一官半职都没有捞到。但到了近五十岁还一无所有的高适，却突然成了高级官僚，这与李白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不要以为高适成了高级官僚，就得以自在了。事实上，他的位置极端不稳固。在李白向他发出求救信的那一年，也就是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表面上看高适担任了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但他感到危机重重。就在当年年底，他写下了一首诗，暗喻那些想整他的人不要那么心急。[285]

高适的感觉是正确的，到了第二年，高适就被皇帝贬为太子少詹事。其原因是宦官李辅国认为高适太敢说话，担心坏了自己的事。[286]高适的贬官也反映了安史之乱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经过这次战争，皇帝从此再也不需要那些贤相和直臣了，他需要的只是三类人：一是亲近的太监，二是李泌这样的纵横家，三是理财专家。不管是张镐还是高适，都不符合皇帝的胃口。

高适回京的途中，特别去了他生活半生的睢阳，去祭奠为唐王朝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张巡和许远。[287]回京后，他与杜甫依然保持着联系。

但是，高适在京的时间并不长，这牵扯到四川地区的局势。在安史之乱前，四川属于剑南节度使的辖区，自从太上皇从四川回到长安之后，皇帝为了防止四川地区出事，将剑南节度使辖区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分属东川节度使和西川节度使。这本意是为了防止叛乱，另一个借口是防止吐蕃的入侵，但这种做法却让四川进入小叛乱和入侵不断的阶段，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高适被外派担任彭州刺史，不料在赴职的路上，竟然遭到了乱兵的劫掠。[288]到任后，他上疏将两节度重新合并起来，却并没有受到重视。[289]高适到达彭州时，杜甫也刚刚在成都安顿下来，于是两人恢复了联系。[290]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梓州副使段子璋起兵反叛，杀死了虢王李巨，并将他的上级东川节度使李奂打败，李奂逃到了成都。高适率领州内的士兵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在成都会合，击败了段子璋。这件事之后不久，杜甫和高适的一位熟人严武就担任了西川节度使，但很快，严武被召回了长安，继任者就是高适。[291]

这是高适一生中另一次高光时刻，但是这个时刻依然很短暂。第二年代宗皇帝即位。高适在这一年击败了四川地区这一轮最后一个反叛者剑南兵马使徐知道。[292]由于杜甫在战乱时选择了避难梓州，他们又分开了。

高适的地位本来应该是稳固的。但不久，他就由于与吐蕃打仗无功，还损失了松、维二州和云山城，被皇帝召回了。[293]取代他的又是严武。此时，皇帝再次将东、西川合为一道，称为剑南道，严武成了统一的剑南道的节度使。杜甫再次回到了成都，但再也没有见到高适。

高适回到长安后第二年即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就去世了。他死时获赠礼部尚书，谥号“忠”，也算是盛唐诗人中少有的文武双全之人。但他的诗歌大都是在没有闻达时写成的，到安史之乱后他更深入地参与

政治时，已经很少写诗了，他成功地从诗人转变成了政治家。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皇帝回到长安后，岑参与杜甫、王维、贾至等人在长安互相唱和，好不热闹。但随后杜甫离去，贾至也被贬为岳州司马。岑参在第二年升任起居舍人。但不幸恰逢宦官李辅国专政的高峰时期，李辅国看不惯这些不听话的文臣，于是在出任起居舍人仅仅一个月后，岑参就被外放为虢州长史，离开了长安。[294]

他在虢州极不适应，直到三年后才找到机会来到潼关担任节度判官，之后跟随着雍王李适（后来的德宗）进入东都洛阳，这时也恰逢安史之乱结束。

后来，岑参在长安又待了两年。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川再次发生了变乱。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了[295]，继任的是一位叫作郭英乂的将领。严武虽然刚愎自用，却能压得住蜀地的豪强，郭英乂比严武更加蛮横、无所忌惮，到任后首先杀死了大将王崇俊，接着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终于逼反了西山兵马使崔旰，崔旰从西山率领麾下五千余众袭击了成都，将郭英乂击败。郭英乂逃往简州，后又逃往他处，终被普州刺史韩澄杀死。[296]

这次事件导致四川再一次陷入了战乱。杜甫在严武主政四川时住在成都，此时也离开了成都，去往云安。

这件事对岑参也是有影响的，这一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嘉州刺史，但随着四川大乱，岑参滞留在梁州。第二年（公元766年），朝廷任命宰相杜鸿渐担任山南、剑南等道的副元帅，入蜀平乱。杜鸿渐到任，崔旰刚刚又打了一个胜仗，将山南西道节度使兼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击败。杜鸿渐不得不采取了怀柔的做法，要求朝廷不要惩罚崔旰，而是给他封官，于是在他的姑息之下，四川暂时获得了和平。[297]崔旰被赐名为崔宁，之后担任过西川节度使，并在北方和西方边境长期为将，保卫了唐朝的边疆安全，直到唐德宗时期被权相卢杞害死。[298]

岑参此时已经进入杜鸿渐的幕府，职衔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他再次赴任嘉州。到了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他离职时，四川又发生了叛乱。原来，担任了节度使的崔宁到长安述职去了，泸州刺史杨子琳乘机袭击了成都，却被崔宁的妾任氏招募的几千人击败。杨子琳的军队溃散后，来到了四川东部，阻断了岑参的归途。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底，岑参死在成都。

岑参在成都度过最后的岁月时，杜甫却在东向逃难的途中，他们虽然都在四川，却由于战乱的原因错过了见面的机会。见识过盛唐的诗人大都已经死去，只剩下杜甫还在苦苦挣扎。虽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他依然在逃难，因为四川乃至全国各地都已经进入了不稳定时期，即便大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小的战乱却不可能避免了。杜甫的一生仿佛注定要见证唐代的繁华和离乱，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记录下中国伟大的盛世的崩塌过程。

在叙述杜甫后期的遭遇时，我们不得不把时钟回调到他被贬出长安的时刻，看一看这位唐代小官的陨落过程，以及唐代最伟大诗人的升起过程。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杜甫从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离开长安时，他骑马从金光门经过，突然想到一年前他正是从这个门偷偷出去，逃脱了叛军的羁押，前往凤翔寻找皇帝的。他感叹自己已经老了。[299]在长安的最后时分，恰好高适从江南贬官担任太子詹事，还没有回到长安，杜甫给他寄了信，表达了思念之情。[300]

到了冬天，他又从华州前往东都公干。他将自己所见所想全都付诸笔端，由此我们现代人才能看到安史之乱中更加丰富的民间景象。

在他的笔下，既有那些即将前往战场送死的士兵[301]，也有对在济州失联的弟弟的思念，以及得到弟弟消息后，自己的消息却无法送达的惆怅[302]，更有得知从弟死在异乡的悲伤。[303]

当九节度围困相州时，虽然他也有隐忧，但还是热情地赞颂即将来到的胜利，盼着未来的和平。[304]当节度使们兵溃的消息传来，杜甫恰好在东都，在他赶回到华州的途中，写下了最伟大的丧乱之诗——“三吏”和“三别”。

杜甫以诗人的眼光，望着因为军败而造成的民间的流离失所。在新安，随着壮劳力都已经在上次征兵中离开，这里的官吏只能选择剩下的半劳力（中男）再次出征。在潼关，由于担心叛军再次进攻关中地区，这里的官吏在紧急加固城池。在石壕村，官吏们在晚间抓人，就连老妇人都带走了。不管是新婚，还是垂老，男人们都被迫上了战场，与亲人分离，年轻的妻子还在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年老的妇人却知道再也见不到丈夫。那些逃兵乘战败之后的混乱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却发现家园残破，连亲人都找不到了。

杜甫回到华州，日日哀叹不已，但这依然不是战争带来的最终结果。当年由于战乱引发了大饥荒，到最后，就连杜甫也不得不弃官离开，只是为了给家人寻一条活路。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杜甫弃官向西，翻越陇山到了秦州境内的西枝村。他的目的是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躲避战乱。[305]但是偏远地区依然避不开战乱，杜甫经过一个古战场，望着被蝼蚁当成了窝的人类白骨，意识到边疆地区也是不安全的，因为皇帝的好大喜功，唐朝与外族发生战争也影响了边疆。[306]这是盛世时期所掩盖的满地萧然。

在秦州时，杜甫依然记得被放逐的李白，不由自主地怀念着当初与他的壮游。他为李白的生不逢时感慨万千，但他又如同预言般地相信李白的诗歌必然流传千秋万世。[307]他不仅怀念李白，还怀念着已经死去的贺知章、孟浩然，以及身在河南的两位弟弟。与此同时，他还与高适、岑参、严武、贾至等几位友人保持着联系。

他原打算在秦州的西枝村寻一块土地建一座草堂[308]，但由于整个

北方都在闹饥荒，他在同谷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秦州。也许是因为高适担任彭州刺史、严武担任巴州刺史[309]，他决定到四川境内寻找和平的所在。

经过了漫漫的蜀道，在年底时，他到达了成都。他立刻与在彭州的高适取得了联系。[310]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杜甫开始寻找住处，他看上了浣花溪旁的一块地[311]，在这里盖了草堂。草堂修建如此顺利，与杜甫的一系列故人的帮助有关。除了高适、严武等人，当地的官员也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位姓王的司马还提供了钱财资助。朋友的帮助使得常年奔波的杜甫终于感受到了温暖，这段时间也成了他一生中少有的舒适时光。

解决了温饱的杜甫又开始忧国忧民，他有拜访诸葛祠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也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豪情。

杜甫初在成都的生活是闲适的，与当年他在路途上的艰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高适往来应酬。此时，王维的弟弟王缙任蜀州刺史，距离成都也不远，杜甫与王维的好友裴迪也取得了联系。[312]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严武和高适先后担任了西川节度使，作为他们的朋友，杜甫与他们诗酒应答。第二年严武离开时，杜甫甚至将他送到了绵州。美好总是短暂的，西川兵马使徐知道的造反又一次打破了杜甫的宁静生活。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徐知道造反后，刚刚送走了严武的杜甫仓皇间无法回到成都，只好至梓州停留[313]，直到冬天，才有机会将家人迎接到梓州。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结束了安史之乱，在梓州的杜甫也开心地流下了眼泪，并开始规划自己的回程。他希望从三峡直达荆州地区，再北上襄阳前往洛阳。[314]但这个规划却没有

成为现实。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再次来到成都，杜甫也终于回到成都居住。这一次，他进入了严武的幕府担任节度参谋，严武为他申请到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加衔，并赐绯鱼袋。这个官职也就成了杜甫最后的官职。但所谓工部员外郎并非他的实际职务，他只是个位于成都的节度使参谋而已。

事实证明，杜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人才，他只做了半年，就放弃了，还是回到了草堂。日后有人编排出他倨傲惹怒了严武的故事，但这可能并不符合事实。

曾经与杜甫在长安诗酒唱和的贾至，在杜甫贬官华州的时候也被贬官岳州司马。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贾至就被皇帝召回去官复原职了，后来又担任了尚书左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担任吏部侍郎，进入高官阶层，又担任过京兆尹、御史大夫、兵部侍郎等职，是文人中少有的高官。[315]

而杜甫自从华州弃官之后，已经逐渐跳出了对官场的渴求。他为朋友当官感到欣喜，但自己再也没有去主动追求过官职。他此时追求的是自我，以及家人和朋友的安康。他宁肯对着雪山和小鸟吟哦，也不再愿意为了当官而牺牲自己的个性了。在梓州期间，他并非没有机会。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时，皇帝曾经下令给杜甫京兆功曹的官职，但杜甫却没有应召，他知道所谓的功业并不属于自己，他更倾心于南国的浮云和钓竿。[316]

到了成都，严武给他授职半年后，杜甫却宁肯选择隐居，而不再参与政治了。

真正让杜甫的生活出现了变化的，是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他的两大保护伞严武和高适的相继去世。高适死于长安，而严武则死于成都任上。整个四川地区再次大乱，杜甫不得不再次踏上了逃难的行

程。[317]

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杜甫的苦难却并没有完结。他计划前往潇湘地区，至于具体到哪儿，怎么生活，都已经无法细究了。[318]

接下来，杜甫就如同是一片飘萍，顺着长江而下。他没有最终的目的，只是走一步看一步，与他同时代的朋友都凋零得差不多了。虽然依然能碰到人照顾他，但所谓的挚友却不存在了。由于老了，他也不想回到长安，但他又还活着，还要用他的笔对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和个人命运做最后的记录。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杜甫离开了他钟爱的成都草堂，再也没有回来。他带着家属东下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天，他到达了夔州。[319]由于夔州都督的盛情邀请，杜甫在夔州居住了两年，直到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才离开。

在夔州的两年中，杜甫写了大量回顾性的诗歌，回忆他的一生，以及与李白、高适等人的交往，还有他见过、听说过的大量名臣将相。他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将想到、看到的一切都写成了诗。[320]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他再次出发，出三峡到了江陵，秋天移居公安县。他穷困潦倒，已经接近生命的尾声，却依然要忍受世情冷峻。在三峡以东地区，由于缺乏熟人，杜甫的生活更加艰难。到了冬天，他来到岳州。贾至当年就是被贬到岳州，最后又被召回宫廷。李白也曾经在流放和返回途中经过岳州，但此时李白早就死了。杜甫走到岳州时，几乎走投无路了。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他选择了从岳州向南的道路，经潭州（现长沙）到了衡州（现衡阳）。湖南夏天的酷热击败了他，于是他在夏天再次回到了潭州。这时，病痛加剧，他似乎得了轻微的半身不遂。[321]他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住在舟中。

到了第二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又经历了最后一次战

乱。湖南兵马使臧玠杀了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杜甫只好乘舟再次回到衡州，从衡州继续前往郴州去投靠他的舅家崔伟。到达耒阳后，他停泊在方田驿。到了秋天，他再次坐船北上，死在了湘江之上。[322]

甚至连他死的地点都充满了争议。有的人认为他到达耒阳时，耒阳令给他送去了酒肉，没想到久未饱食的他吃得太多，一顿饭之后就死了。[323]有的说由于湘江水涨，杜甫五天不得食，耒阳令给他送去食物时已经找不到他了。[324]但不管怎样，人们普遍认同杜甫死于困顿之中，也并没有试图将他的死浪漫化，就像李白之死那样。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就这样消逝了，留下他的诗歌，以及对一个盛世消失的惋惜之情。

注释

[1]唐代的军事地理，可以参考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第十二章，以及《资治通鉴》《中国历代战争史》等相关章节。

[2]河北军事地理，见清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3]唐朝之后的宋朝就由于定都在这片平原之上，缺乏必要的防御体系，被金国迅速击破。关于此段历史，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汴京之围》。

[4]山西的重要性，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九。

[5]陇山的北方是可以看作同一山系的六盘山，它们构成了关中平原西北部的屏障。

[6]关中平原的军事价值，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

[7]四川与中原的交通情况，参考《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

[8]武后和玄宗早期，都因为黄河的运力不足，朝廷只好在两京之间迁徙，以减轻往长安运送粮食的压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河体系和粮运系统对唐朝的重要性。

[9]唐代的云州即现在的山西大同一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为云中郡，安史之乱后又改为云州。为了避免混乱，本书中皆称云州。

[10]安禄山起兵后，皇帝用郭子仪取代了原来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见下文。

[11]安禄山时期的战争形势，也可以参考《读史方舆纪要》卷五。

[12]参见《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天宝十四载》引《蓟门纪乱》。

[13]参见《旧唐书·李敬业传》《旧唐书·骆宾王传》等。

[14]皇帝此次去往华清宫，也就是杜甫在诗中所记录的那一次。

[15]参见《旧唐书·封常清传》。

[16]河阳的军事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冲突中就得到了很大的体现，特别是东西魏之间的争夺，河阳三城更是成了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战略点。唐代之后，河阳的地位开始衰落。

[17]郭子仪一直认为安思顺是被冤枉的，因此在事后为安思顺争取平反。这表明郭子仪与安思顺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

[18]此时按照阳历，已是公元756年1月7日。

[19]陕郡是从河南进入关中盆地的第一道屏障。如果洛阳失守，那么叛军与官军下一个战略点将在陕郡，陕郡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点在潼关。

[20]唐代之后，军事家面临的一个现实是，随着架桥技术的进步，单纯的河流已经很难构成天堑式的防御体系。之前黄河还可以被认为难渡，这也是为什么河阳的地位如此重要，但之后，河道上任何平缓的地带都可以渡河，仅仅守河阳意义就不大了。到了宋代，金军对于黄河的突破更是易如反掌，黄河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防御价值。

[21]关于楚汉相争以及李世民的虎牢关之战的详细内容，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22]关于天宝年间地名的更改，见《新唐书·地理志》。

[23]不幸的是，由于黄河防线不再构成天堑，荥阳和虎牢关逐渐丧失了战略重要性，导致在唐代之后的战争中，很少在这里发生决定性的战役。而两地战略地位的丧失，就是通过安史之乱才发现的。

[24]关于都亭驿的作用，参见《唐代交通图考》。

[25]本书作者亲自考察了禁沟的防御体系，这条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的禁沟至今犹存。关于潼关军事地理亦可参考《读史方舆纪要》。

[26]睢阳的战略地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随着运河系统的加强，其地位也在提升，到北宋时期，更是被提为南京。

[27]参见《新唐书·颜杲卿传》。

[28]参见《旧唐书·颜真卿传》。

[2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四年》。

[30]参见《新唐书·李祗传》。

[31]他的职务是单父尉。

[32]在更西面，还有宁武关，但由于过于偏僻，并没有受到重视。

[33]进攻振武军，目的是从北面威胁长安。但由于军事目标的不专一，既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又影响了对太原的进攻。

[34]长安—太原道的开辟，足堪比拟战国时期秦赵的战争。当时，赵武灵王开辟了一条绕过河内的通道，经过北方的包头一带，从北方打击秦军。这条通道本来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却由于武灵王的死亡而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35]参见《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天宝十四载》引《河洛春秋》内容。

[36]这条通道可以从长安出发，经过北部的朔方到达太原，再从井陉口进入河北地区，将安禄山军队截成两截，因此是官军最重要的军事通道。

[37]十二月中，原唐朝任命的饶阳太守卢全诚拒绝了安禄山任命的新太守，导致安禄山派张献诚进攻饶阳，见前述。

[38]见《旧唐书·马燧传》："燧说循曰：'禄山负恩首乱，虽陷洛城，必当夷灭。公盍建不代之功，诛其逆将向润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禄山西不能入关，则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虽善之，计不时决，事泄。"

[39]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记载李璥的节度使职是在玄宗离京后授予。

[40]持有这一观点的史籍中，最典型的是《资治通鉴》。

[41]事实上，唐代的监军使出现得更早，高仙芝出征小勃律时，就有监军使的参与。

[42]参见《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天宝十四载》引《玄宗实录》。

[43]参见《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天宝十四载》引《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

[44]是否为同一日并不确切，有的史书记载的日期更早，司马光考订后，认为很可能同一天既下令杀人，又进行了新的任命。只是诛杀封、高二人可以立刻办理，而人事和军队调动需要时间。

[45]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中》。

[46]参见《旧唐书·许远传》。许远的曾祖是高宗时的宰相许敬宗。在担任睢阳太守之前，许远因为待罪遇赦，没有实职，因此这是战争时期的特别提拔。

[47]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48]这条路就是汉高祖灭秦的路线。

[49]参见《旧唐书·颜杲卿传》。颜杲卿的妻女关在常山狱中，被李光弼救出。

[50]从理论上说，轻骑兵无法对抗组成枪城阵的重装步兵，只有重装骑兵才能形成穿透性冲锋，但直到宋金时期，北方民族都没有装备足够的重骑兵来突破重装步兵方阵。

[51]《资治通鉴》详细地叙述了这次战役，将其中的战略意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52]之后，李随再未在历史中出现，原因未知。

[53]参见《资治通鉴考异·唐纪·至德元载》引《肃宗实录》。亦有一种说法称，令狐潮要杀的是不服从的百姓，而不是淮阳兵。

[54]即老子庙，唐朝皇族以老子为祖先，封老子为玄元皇帝。

[55]参见《旧唐书·张巡传》。

[56]唐代和北宋的炮指的是投石车，并非使用火药的火炮。

[57]参见《旧唐书·鲁炅传》。

[58]《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中记为黔中节度使，但黔中地区当时应该没有成为节度使辖区，见胡三省音注。

[59]参见《旧唐书·来瑱传》。来瑱的父亲长期在西域任职，也担任过节度使。来瑱作为唐代藩镇变革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死亡也预示着皇帝与藩镇之间信任关系的恶化。

[60]长平之战的遗迹至今可见，详情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61]参见《资治通鉴》。李萼的说法是十万，但恐怕有些夸大了。

[62]贺兰进明是安史之乱中较为复杂的人士，除了对抗叛军之外，还掀起了数次内斗，见下文。作为唐代的才子，他在两唐书中没有传，但在《唐才子传》中有小传。

[63]两人的治军风格，亦可参照新旧唐书《传赞》对他们的评价。

[64]具体过程见《旧唐书·哥舒翰传》。《全唐文》载有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是郭子仪请求为安思顺平反的上表。

[65]函谷关退出历史舞台，还和中国的统一形势有关，随着隋代的统一，中国内部的关口重要性下降，让位给了更加靠北的雁门关等。关中地区对关东的防御也随之收缩，才有了用潼关取代函谷关的必要性。

[66]这里的地形和以下的战争过程，系根据《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并结合作者的实际考察得出。

[67]根据杨国忠的情报，崔乾祐只有四千人。这个情报是错的。但虽然他手下不是几千人，可满打满算也就三万人，与唐军人数依然是相差悬殊的。人数情况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

[68]这里的描述根据《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无法确定三条大沟具体位于现在何处，但其中一条应该是禁沟。

[69]哥舒翰后来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为了保命，他在东都试图帮助安禄山说降各路军队，不成。后被杀害。根据《旧唐书》，是安禄山杀了他。根据《新唐书》，叛军丢失东都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此时安禄山已死）带他渡黄河北归，最终也杀死了他。

[70]根据《唐六典》。

[71]参见《册府元龟》卷四七七。

[72]高适的情况可参考附录中的年谱。

[73]参见《雍录》。汉长安城在唐长安城的西面，在当时依然有遗址存在。

[74]关于皇帝离开最详细的记载，来自于《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和《安禄山事迹》。

[75]《资治通鉴考异·唐纪·至德元载》引《唐历》。

[76]不管是肃宗、代宗还是德宗，虽然一面批判玄宗时期的聚敛集团，但他们的任命，依然首先考虑的是聚敛才能。到了德宗之后，事情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

[77]参见《旧唐书·杨国忠传》。

[78]南方攻打北方，只有极少数胜利的例子，一是朱元璋从南向北击溃了元朝（事实上元朝已经自动分崩离析了），二是20世纪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79]最早尝试从南方统一北方的是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和蜀汉政权，他们发现了南北三条通道，但都以失败告终。之后南朝进行了大规模尝试，但发现南方由于过于破碎，无法同时利用三条通道进攻北方。到唐代，南方军事地理的不足已经普遍为人所知。

[80]中国南北军事地理的差异，可参考《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81]参见《旧唐书·肃宗纪》和《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

[82]哥舒翰辖区继承自王忠嗣，而郭子仪辖区继承自安思顺。由于主将的关系问题，两大区域本身也有一定的矛盾。

[83]本处以及下面的行程叙述，都采自《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

[84]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司马光非常擅长捕捉这些有益教化的故事，太子如果不得到皇帝的同意，就不利于教化了，所以他一定会记载这些皇帝有意让位之类的传言。

[85]玄宗后期的宗室斗争再次激化。由于武惠妃的受宠，玄宗皇帝曾经杀掉了太子瑛。现太子得位后也屡屡受到李林甫等人的干扰，对于皇室内斗的传统深有体会。

[86]山南东道领襄阳等九郡，岭南领南海等二十二郡，江南东道领余杭诸郡，江南西道领豫章诸郡。

[87]唐朝在北方设立节度使是为了平叛，但在南方设立如此众多的节度使却是不明智的，这也导致了唐朝进一步的碎片化。

[88]这又是司马光选择了有益教化的说法之后，给我们留下的记载，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新旧唐书都没有记载太上皇的这句话。

[89]司马光在六月戊申的《考异》中又提到克潼关的日期是初八，但从其叙述的顺序性上看，依然可能是初九。

[90]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三。

[91]日后，唐代新建立的交通运输线改为从两湖经过汉江到达汉中，再翻越秦岭从陕西西部进入朔方。安禄山没有将这条交通线截断，导致南方的物资依然可以到达肃宗军队，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

[92]事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

[93]《新唐书》说这六位大将都是开府、特进的高官，但雍丘本不是大县，不应该有这么多高官。另一种说法是六员大将应该是早就投降安禄山的将领，被令狐潮派来劝说张巡。后一

种更合理，但从字面意义上，似乎又是前者。存疑。

[94]参见《新唐书·雷万春传》。

[95]张巡与许远的保卫战，可参看《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旧唐书·张巡传》《旧唐书·许远传》。

[96]关于唐代的教坊系统，可参考《教坊记》。

[97]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98]记载此时王维事迹最详细的莫过于他自己写的《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祕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其中提到了他本人的遭遇。文见《王维集校注》卷十一。事见《旧唐书·王维传》。

[99]参见《明皇杂录·补遗》。

[100]王维一生中有大量的诗歌是写给裴迪的，到晚年在终南山隐居时，他交往的少数人中依然有裴迪。

[101]参见《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02]参见《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安得舍罗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

[103]参见《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104]参见《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105]根据《彭衙行》，杜甫将妻子留在了鄜州一位叫作孙宰的故人处，之后独自前往灵武途中被掳。

[106]《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107]《对雪》："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108]《悲青坂》："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109]参见《春望》。

[110]参见《旧唐书·李泌传》："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

[111]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载》。

[112]《赠武十七谔》序："门人武谔……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予。余爱子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

[113]广平王与建宁王的境遇，见《旧唐书·代宗纪》。

[114]参见《旧唐书·第五琦传》。

[115]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载》。

[116]《资治通鉴》分别记录了薛景仙和第五琦的功劳。

[117]盐业专卖直到公元21世纪才结束，在漫长的专卖年代里，中国历代王朝都靠盐业给王朝提供了庞大的税收，甚至有的朝代（宋朝）以盐作为准备金发行了钞票（盐钞）。具体细节见《宋史·食货志》，以及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18]参见《新唐书·食货志》。

[119]参见《资治通鉴》。《旧唐书·段秀实传》记载皇帝要求节度使梁宰发兵，但梁宰首鼠两端，段秀实便劝说副使李嗣业响应皇帝的命令。

[120]《资治通鉴·唐纪·至德元年》载：吐蕃占据的城市包括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以及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等城。

[121]宪部侍郎即刑部侍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改，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复名刑部侍郎。

[122]参见《旧唐书·房琯传》。

[123]参见《旧唐书·张镐传》。

[124]参见《旧唐书·承天皇帝倓传》。

[125]参见《旧唐书·肃宗张皇后传》。

[126]参见《旧唐书·承天皇帝传》。

[127]参见《旧唐书·永王璘传》。

[128]这些只是台面上的实力。但事实上，仅仅从地理上说，永王所在的南方军事地理支离破碎，几乎不可能成为反攻安禄山的基地，只有与北方的肃宗地盘呼应起来，才能产生足够的战略重要性，压迫安禄山所占据的河北、河南地区。

[129]参见《旧唐书·高适传》。

[130]即《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131]即《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132]《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五："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133]《为宋中丞自荐表》："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

[134]见《安禄山事迹》下卷。《资治通鉴》和两唐书大都采纳了该书的说法。

[135]华北平原的弱点，从东汉开国之战起就一直被反复提及。光武帝正是通过获得山西高地上的立足点，解决了华北的不利之处。而唐代开国时也是利用山西高地以最快的速度直捣长

安。更显著的例子是金灭北宋的过程，他们占据了太原，使得北宋的河北地区再也无法守卫。

[136]由于时间不详，到底是谁策划的太原之战依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太原战役可能发动在安禄山未死之时，而高潮则在他死后。此系根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推测。

[137]关于此次战役的描写，可以参见《旧唐书·李光弼传》，亦可以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

[138]以上数据参见《新唐书·地理志》。

[139]关于古代长度单位与现代的换算关系，参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附录。

[140]凤翔即原扶风，因肃宗的到来而改名为凤翔。

[141]李泌建议派建宁王去，建宁王当时还没有被皇帝杀死。

[142]李泌的战略须充分利用山西地势居中的特点，以及华北平原的不利地形，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战略，足以与秦灭六国战略，汉高祖、汉光武统一战略，吴蜀从南方反攻北方战略，蒙古人绕道云南间接进攻南宋的战略相媲美。这些战略中，只有李泌的战略没有被采纳，而吴蜀反攻战略以失败告终，其余均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

[143]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位置可以锁死长安、洛阳之间的关键地带。战国时期的秦魏相争、北朝的东西魏大战，都主要发生在河东地区。

[144]获得河东地区，表明唐军与叛军实力的正式反转，此时距离叛乱爆发只有一年多。

[145]《旧唐书·肃宗纪》没有记载这次进攻，《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记载颇详。

[146]参见《雍录》卷六。

[147]参见《旧唐书·郭子仪传》。这一战导致郭子仪被降职，降为左仆射，但事实上，他的指挥权并未受到影响。

[148]关于镇守南阳的困难，参见《旧唐书·鲁炅传》。

[149]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

[150]对于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人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详细了许多，引用材料也更丰富，表明宋代对忠义之士的推崇。

[151]《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都持这个说法，但从虢王的角度上来讲，这样调拨粮草可能并不是错误，因为他不能预见济阴的投降。

[152]参见《旧唐书·李巨传》。原河南节度使李巨已经转为太子少傅。

[153]参见《旧唐书·房琯传》。房琯给贺兰进明的是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被贺兰进明告状。

[154]许书冀与贺兰进明的矛盾，参见《新唐书·张巡传》。

[155]参见《与贺兰进明书》《与许叔冀书》。

[156]高适与贺兰进明时有诗文往来，现在保留下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书信之外，还有《酬

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以及存疑的《和贺兰判官望北海作》。

[157]参见《资治通鉴》和两唐书。

[158]《旧唐书·张镐传》："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

[159]两唐书作豪（濠）州刺史，当为亳州，即谯郡，司马光《考异》中对此有考证。

[160]参见《唐才子传》与《新唐书·文艺传》。

[161]参见《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

[162]参见《唐才子传》卷二。

[163]参见《在浔阳非所寄内》。

[164]参见《广陵别郑处士》《登广陵栖灵寺塔》。

[165]李白诗《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序中明确表明自己在浔阳狱中。

[166]《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167]参见《上崔相百忧章》《狱中上崔相涣》。

[168]参见《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169]参见《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170]参见《赠张相镐》。

[171]参见《新唐书·李白传》。

[172]参见《新唐书·肃宗纪》。

[173]《资治通鉴考异·唐纪·至德二载》引《汾阳家传》与《肃宗实录》。

[174]请回纥助阵的另一个原因是，唐军的实力已经非常孱弱，即便是有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但他们的战斗力都无法与游牧民族的骑兵相比，仅仅靠唐军，可以形成对峙，但很难收复失地。具体讨论见下文与史思明的战争。

[175]《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处士庶指的是百姓，而"子女"一词则意义不甚明确，本书理解为女子，亦有可能包括一部分回纥需要的青年。

[176]《旧唐书·回纥传》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亦有引用。

[177]参见《雍录》卷十。

[178]关于此次战争最好的描述，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

[179]仆固怀恩的作用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也是在这场战役中，仆固怀恩成长为足以与郭、李相比的一代名将。

[180]潼关虽然有利于防守从东面河南方向来的军队，但对从西面陕西方向来的军队防守能

力有限，加之唐军的追击，叛军没有在潼关形成有效防守。

[181]陕城由于函谷关地带的存在，对于河南和洛阳来说，反而更能防御来自山西的军队。

[182]参见《新唐书·张巡传》。许远是睢阳之战唯一被带回洛阳的将领，至此，睢阳之战的功臣全部死亡。

[183]中国游牧民族的劫掠式财政，在北魏、金朝和元朝都有充分的体现，这种财政在民族兴起时能够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不过，一旦从劫掠式财政向税收式财政转移，游牧民族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于是就到了他们衰落的时候了。

[184]黠戛斯人即现在的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流浪民族，一千多年来，他们从蒙古高原中部迁徙到西北部，之后进入西伯利亚，最后流浪到中亚的山区。他们在唐代后期将回纥人赶入现代的甘肃和新疆地界。

[185]参见《新唐书·仆固怀恩传》。怀恩自称有两个女儿远嫁。怀恩死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他的幼女又被封为崇徽公主嫁往回纥。

[186]见两唐书的吐蕃传，以及《唐会要》卷六的和蕃公主条。

[187]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乾元元年》。

[188]参见《新唐书·回纥传》。

[189]参见《唐会要》卷六，并参考《资治通鉴》。

[190]七月改元广德。

[191]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广德元年》。更多例子见代宗大历七年（772年）的记载。

[192]由于唐代传世文献不多，且都经过了唐人浪漫的过滤，太上皇与皇帝的关系很少被人讨论，不像宋代那样，靖康时期太上皇和皇帝的关系被朝臣们公开讨论且能流传下来。但从《资治通鉴》中，人们依然能够嗅出其中的不信任来。

[193]对于李泌的态度，新旧唐书也有很大的区别。《旧唐书》将之当成一个普通的朝臣进行记载，而《新唐书》中则采集了大量的故事，将之描述成类似于诸葛亮的贤相。当然李泌的功劳是非常大的，而调解皇帝父子的故事就采自《新唐书》，并被《资治通鉴》沿用。

[194]李泌的故事见《新唐书·李泌传》，关于他的人生际遇，可以与李白对比着来考量。

[195]参见《雍录》卷四望贤宫条。

[196]参见《旧唐书·第五琦传》《旧唐书·刘晏传》等。第五琦帮助皇帝制定了加税方案，以及货币贬值和盐的专卖制度，使得唐代的低税时期成为过去。这次税制改革，直到德宗时期刘晏等人推出两税法，才得以固定下来。

[197]这个动作到了宋代依然是君臣之间的主要礼节，但之后失传。

[198]参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年》。司马光抓住机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展示了大量的细节。

[199]参见《旧唐书·崔器传》。

[200]参见《旧唐书·甄济传》。

[201]参见《旧唐书·李峘传附岘传》。

[202]参见《旧唐书·陈希烈传》。陈希烈本应该斩首，皇帝开恩才改为赐死。

[203]这种说法的来源是《资治通鉴》。另一种说法（《旧唐书》）是，张垍死于贼中，而张均本该处死，最后在肃宗的保护下，长流合浦郡。

[204]参见《新唐书·郑虔传》。

[205]关于这方面讨论，可参见《王维集校注》附录年谱。

[206]即《谢除太子中允表》。

[207]参见《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

[208]参见《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209]参见《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

[210]参见《述怀》。

[211]《徒步归行》："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

[212]参见《羌村三首》。

[213]参见《彭衙行》。

[214]参见《为补遗荐岑参状》。

[215]《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216]分别是：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217]见两唐书的杜甫传，以及《唐才子传》。

[218]贾至被贬官后遇到了李白，本书后文还会谈到。

[219]燕云十六州丢失于后汉的石敬瑭，并在整个北宋期间一直归于辽国，使得辽国有了随时进攻宋朝的基地。辽国利用这一区域获得了北宋的岁币，辽宋维持了百年的和平。

[220]耿仁智说服史思明的故事，两唐书都有记载，其中《新唐书》说得更有情节性，但本文取《旧唐书》更朴素的版本。

[221]事实上，中晚唐时期的军阀割据虽然加强了对民间税收的盘剥，但由于政府控制力的减弱，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新技术（如印刷等）和外贸方面。人们由于更加怀念集权的玄宗时期，忽略了这些方面的进步。

[222]参见《旧唐书·张镐传》。

[223]关于史思明被逼，《新唐书》将之归于皇帝，而《资治通鉴》则归诸李光弼。

[224]各节度使辖区，见下一章的表格。关于邺城之战九节度使，此处依《资治通鉴》所载，与两唐书有所不同。两唐书所载九节度使为：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鲁炅、李奂、许叔冀、董秦、季广琛。详见两唐书《肃宗本纪》。

[225]对于史思明与九节度在河北的战争，我们依然只能参考《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内容都相对简略。

[226]注意，史思明称王并非称帝，意味着从安氏向史氏的权力交接依然没有完成，为接下来史思明与安庆绪的交往留下了机会。

[227]唐代的货币贬值，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新唐书·食货志》。

[228]即《资治通鉴·唐纪·乾元二年》。

[229]两唐书都详细描写了郭子仪的败局，但对于洛阳城中的百姓只字未提。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却并没有避讳。

[230]参见《新唐书·王思礼传》。

[231]参见《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232]参见《旧唐书·德宗纪》。最典型的政治战争发生在唐德宗时期。

[233]郭李的性格对比，也导致了双方不同的结局，关于他们的评价，见《旧唐书》两人的本传。

[234]参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235]也是他本人提出的计策，见《资治通鉴·唐纪·乾元二年》。

[236]《新唐书·李光弼传》记载有出入，只说仆固怀恩先期到达，未提其他。这里依据《资治通鉴》。

[237]许书冀在张巡守睢阳时就受到质疑，并被两任节度使举报，却依然无恙，直到此次投降叛军。他的经历也表明皇帝对于地方军阀控制力之弱，这在玄宗时代是难以想象的。田神功虽然忠于唐朝，但在日后，他利用了皇帝的孱弱，在镇压刘展之乱（见本书后续）时为自己牟利，也可以看作未来军阀的生存模式。田神功事见《旧唐书·田神功传》。

[238]关于旧洛阳城，最好的描写来自《洛阳伽蓝记》。

[239]从河阳经过河内地区，有通往山西上党地区的太行陉通道，也有通往汾河流域的白陉通道。

[240]参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241]参见《旧唐书·白孝德传》。作为猛将，白孝德最后做到了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善终。

[242]据《新唐书·食货志》，乾元重宝面值最初是开元通宝的10倍，重轮乾元钱与开元通宝的比值是50，也就是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三者的比是1∶10∶50，之后改为10∶30∶50。乾元三年（公元760年）这一比例改为10∶10∶30，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改为1∶2∶3，之后又下令废除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钱。

[243]高力士和李辅国同列《宦官传》，前者作为第一个受宠晋升高位的宦官，后者作为第一个弄权的宦官，共同塑造了唐代宦官时代的起点。

[244]参见《旧唐书·颜真卿传》。事实上，颜真卿刚刚从外贬中回来，就因为太上皇事再次被贬，亦可见此阶段忠义大臣们的处境是很艰难的。

[245]参考《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二卷第十三章第二节宪宗初年各藩镇一览表，并根据两唐书进行了校正。原表列出了四十九个藩镇，这里只选取了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之前建立的藩镇，并将一部分位于岭南、黔中的藩镇省略。除了本表列出的之外，其余藩镇名称为：沧景（横海军）、易定（义武军）、徐泗（武宁军）、陈许（忠武军）、东都（佑国军）、怀卫（河阳军）、泾原（彰义军）、盐夏（定难军）、湖南（钦化军）、黔中（武泰军）、岭南（清海军）、邕管（岭南西）、容管（宁远军）、桂管（静江军）、安南（静海军）。

[246]淮西地区与史思明被镇压之后留下的河北四镇，是唐代最难管理的节度使辖区，在日后，大部分的藩镇叛乱都和这些地方有关。

[247]参见《旧唐书·李峘传》《旧唐书·邓景山传》。

[248]参见《旧唐书·田神功传》。

[249]刘展之乱最详细的记载来自《资治通鉴·唐纪·上元元年》。

[250]李藏用和孙待封的事迹不见于两唐书，只有《资治通鉴》记载了这件事。

[251]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河北四镇，他们的世袭和联保策略，保证了皇帝不敢轻易清算。甚至几个节度使联手，就可以造成整个王朝的危机。

[252]根据《资治通鉴》，边令诚在安禄山进攻长安时纳叛军入城，后逃往肃宗处被杀。

[253]《资治通鉴》习惯于将一切归为意气之争，完全站在李光弼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更应该看到争论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双方秉持的军事理念的差异。

[254]南北两道的具体线路，可参考《唐代交通图考》。

[255]在史思明之死上，《旧唐书·史思明传》写得活灵活现，可能是当时人流传的实录。

[256]根据皇帝前一年的命令，以前一年十一月为建子月，而这一年二月称为建卯月。

[257]五月党项寇宝鸡，六月寇好畤，第二年奴刺寇成固、梁州等地，见《资治通鉴·唐纪·宝应元年》。

[258]参见《旧唐书·高力士传》。

[259]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谓代宗，即世宗皇帝，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讳，改称代宗皇帝。

[260]参见《旧唐书·李辅国传》：“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261]参见《旧唐书·鱼朝恩传》。

[262]参见《资治通鉴》。时间在六月二十七日。

[263]参见《旧唐书·来瑱传》。

[264]关于回纥人与仆固怀恩的关系，参见《旧唐书·回纥传》。

[265]参见《新唐书·回纥传》。

[266]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宝应元年》、两唐书《代宗本纪》。叛乱首领叫袁晁，叛乱八月爆发，十月攻克了温州、明州，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告结束。

[267]仆固怀恩的做法被《旧唐书·薛嵩传》斥为已有二心，但这可能只是他迅速获胜的策略。

[268]参见《旧唐书·田承嗣传》。田承嗣之后被封为魏博节度使。

[269]参见《旧唐书·李怀仙传》。李怀仙被封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270]关于泾原之变及其原因，可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271]参见《旧唐书·来瑱传》。

[272]参见《旧唐书·吐蕃传》。

[273]参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274]《资治通鉴》和《旧唐书》均全文收录这封长信，但《新唐书》依然将仆固怀恩列为叛臣之首。

[275]参见两唐书的《仆固怀恩传》。

[276]王维晚年的官职依据两唐书，但年月根据的是《王维集校注》所附年表的考证。

[277]参见《旧唐书·严武传》。

[278]岑参写到严武的诗有《使君席夜送严河南赴长水》《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虢州南池候严中丞不至》等。

[279]参见《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等诗。

[280]参见《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

[281]参见《旧唐书·王维传》。

[282]参见《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283]参见《旧唐书·李白传》。

[284]又作《临路歌》。

[285]参见《见薛大臂鹰作》："寒楚十二月，苍鹰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云霄万里高。"

[286]参见《旧唐书·高适传》。时间则根据《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

[287]参见《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

[288]参见《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

[289]《旧唐书·高适传》载有该上疏。

[290]参见《赠杜二拾遗》《人日寄杜二拾遗》。

[291]参见《旧唐书·严武传》《旧唐书·高适传》。

[292]参见《贺斩逆贼徐知道表》《请入奏表》。

[293]参见两唐书《高适传》。

[294]参见《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宫诸故人》。

[295]参见《旧唐书·严武传》。

[296]参见《旧唐书·郭英乂传》。

[297]参见《旧唐书·杜鸿渐传》。

[298]参见《旧唐书·崔宁传》。

[299]《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300]参见《寄高三十五詹事》。

[301]参见《观兵》。

[302]参见《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

[303]参见《不归》。

[304]参见《洗兵行》。

[305]参见《贻阮隐居》。

[306]参见《遣兴》。

[307]参见《梦李白二首》："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同时期杜甫关于李白的诗作还有《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308]参见《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

[309]参见《旧唐书·严武传》。严武因为房琯事被贬为巴州刺史。

[310]参见《赠杜二拾遗》《酬高使君相赠》。

[311]参见《卜居》。

[312]参见《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313]参见《相逢歌赠严二别驾》："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全唐诗》收录，与《杜诗详说》诗名、用字有些微不同。

[314]参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315]参见《旧唐书·贾至传》。

[316]参见《奉寄别马巴州》。

[317]参见《闻高常侍亡》《哭严仆射归榇》。

[318]参见《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319]参见《移居夔州作》《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

[320]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回顾自己一生的诗篇《壮游》。

[321]参见《清明二首》："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

[322]他最后的诗作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323]参见《旧唐书·杜甫传》。

[324]这种说法见罗宗强《唐诗小史》。

尾声 盛世的丘墟

安史之乱三百多年后，北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闰二月二十日，一位叫作张礼[1]的人来到了长安这座前朝名都游玩。

此时距唐代灭亡一百多年，经过了五代十国几十年的混乱之后，中国历史又开始了另一个稳定期——北宋，并度过了另一个伟大的盛世——仁宗盛治。北宋的政治中心移到了东部的汴州（开封），这里成了新的东京，而唐代的东都洛阳成了北宋的西京。那么，唐代的西京长安又怎样了呢？

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里，伟大的长安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它的名字。在唐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控制了皇帝的军阀朱温（也是后梁太祖）将皇帝挟持到东部，长安随之失去了这个令它凌驾于万城之上的名字，被改为佑国军。后梁篡位后的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长安所在的京兆府被改为大安府。

两年后，佑国军又被改成了永平军。

后梁被后唐灭亡后，后唐的皇帝（实际上是沙陀人）自认为继承了唐朝的正统，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又把名字从永平军改回了西京。但是，后唐的努力只带来了关中地区的回光返照。后唐灭亡后，中国的政治中心永久地离开了关中地区。到了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西京又被改为晋昌军，后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又改成了永兴军。到了宋代，长安这座名城就一直以永兴军这个古怪的名字存在

着。

除了名字之外，这个当年伟大的国都在面貌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百年前那座巍峨的城市已经不在了。长安最早的毁坏是在黄巢起义时，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突入长安，当时的皇帝唐僖宗逃走了。虽然皇帝依靠着沙陀人的帮助将黄巢赶走击败，但长安城的宫室却毁坏殆尽[2]，甚至连皇帝都不想回到这座城市。宰相王徽花了一年时间，才将毁坏的大明宫修整出点样子，让皇帝草草地迁了回来。[3]

不想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刚刚恢复了平静的长安由于宦官田令孜和军阀王重荣、李克用（后者是沙陀人，也是后晋之祖）发生了冲突，李克用等人带兵再次进入长安。田令孜在带着皇帝逃走之前，下令放火烧掉宫城以阻止对方的进攻，这次放火的结果，是整个宫城建筑群几乎尽毁，只有昭阳和蓬莱两宫没有被毁。[4]

到了朱温东迁，国都长安已经是第三次遭劫，这一次，朱温就连普通人家都没放过。由于朱温根本不打算回到长安，他下令所有的百姓都跟着迁走。与人口强制迁移对应的，是对于房屋的毁坏。为了带走建房的木头，他们把房子扒掉，把木材扔进水里，顺流而下，到了下游再捞起来使用。[5]

经历了一次次的灾难，到了北宋时期，永兴军（长安）的城区面积已不足唐代的十分之一。唐代庞大的长安城包括了带有城墙的京城，以及在京城之内的宫城和皇城。其中宫城是皇帝的宫殿群，而皇城则是中央政府各大衙门所在地。宋代时，宫城已经毁掉了，那些雄伟的宫殿，不管是最早的权力中心太极宫，还是充满了宫斗和浪漫故事的大明宫都已经不在了。而原长安京城范围由于过于庞大，宋代没有足够的人口去填满，人们就居住在原来的长安皇城之中，皇城的城墙和城门就成了城界。

由于城北更加荒凉，张礼的游玩范围主要是在南城。唐朝长安皇城

的南面一共有三个门，中间是朱雀门，东面是安上门，西面是含光门。[6]安史之乱后，皇帝甚至连“安”字都不愿意听，于是将安上门改为先天门。张礼从先天门出了城。他首先探访的是唐代的兴道和务本两坊。唐代时的这两个坊紧挨着皇城，在它们的南面还各自排着八个坊，因此这里是京城中普通人居住的最繁华的地方，有着大量的旅馆。但是，到了宋代，这两个唐代曾经繁华的坊只是作为城外的乡村集市（草市）来使用，除了集市就是农田了。

唐代京城内的房屋大都不存在了，但每个坊之间的墙和门，有的还保留着。张礼从务本坊的西门出去，进入了西南面的开化坊。在这里，他到了一个叫作圣容院的地方。在唐代，这里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大荐福寺。这座寺庙最早建立于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当时正处于高宗去世、武后还没有称帝的时候。到了景龙年间（公元707年—710年），宫人们集资修建了一座塔，是为荐福寺塔，这座塔在宋代还保留着，甚至直到今天还在，它就是著名的小雁塔[7]。

继续向南，经过永乐坊及其附近的玄都观和大兴善寺之后，张礼来到了著名的大慈恩寺。大慈恩寺最著名的遗迹就是大雁塔（慈恩寺塔）。除了这座由唐玄奘初建的塔[8]之外，以大雁塔为起点还有一系列的唐代人文遗迹。大雁塔位于晋昌坊，它南面的通善坊内有一个叫作杏园的地方，杏园的东南是著名的曲江池。这里本来只是一个天然的小池子，后来引来了黄渠的水，使得曲江成了长安著名的风景。曲江的东侧，就是一组宫苑建筑，被称为芙蓉苑，也是皇帝的南苑。

大雁塔、杏园、曲江、芙蓉苑等，在唐代文人中非常有名，这是因为它们和唐代科考的风俗有关。每一年，当科考完毕张榜之后，当年上榜的举子们都会举行一系列的宴游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场，分别是曲江宴、杏园探花宴和慈恩题名。[9]

曲江宴游从中宗时期开始，到了玄宗时期最盛。由于科考是在春天，这也是曲江最美的季节。最初，那些考中的进士在这里请客，安慰

那些落榜之人。之后，曲江慢慢地成了及第进士们宴游的场所，并且曲江宴游越来越流行，成了当时一大盛事。进士们携伎看花，饮酒行乐，好不热闹。

曲江宴游结束后，又轮到了杏园宴。杏园宴的主要节目是“探花”。进士们从同门中选出两位年轻的探花郎，遍游长安，四处采花，长安城的所有名园都打开园门，让他们看遍。

杏园探花宴之后，进士们再次来到大雁塔下，在这里进行慈恩题名。从中宗神龙时代以来，进士们就有请一位书法好的人，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大雁塔下的习惯。

由于这里是著名的游乐区，不仅是进士们，就连普通的文人也喜欢到这里游玩。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慈恩寺塔就迎接了岑参、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等人，他们同登慈恩寺塔，纷纷写诗纪念。

到了宋代，慈恩寺塔经受过重重磨难，它曾经的十层在兵火过后只剩下七层，在后唐时期又进行了重修。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唐代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一位僧人在修缮大雁塔时，把塔身内外都用灰泥涂抹了一遍，导致唐人的题字都被掩盖了。不过，幸运的是，战火反而让僧人涂抹的灰泥剥离，又露出来了内部的题字，张礼就看到了孟郊等人的题名。

登上慈恩寺向南望去，就是曲江、杏园、芙蓉园等地，在唐代，这里是文人墨客、文武官员们最喜欢的游乐宴饮场所，唐代后期曾经对曲江的亭台楼阁进行过重修。北宋时期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宫观的遗迹，只是已经荒烟蔓草，再无人光顾了。

离开曲江，就接近了唐代京城的边缘，这里有称为“京城南三门（从东向西）”的启夏门、明德门和安化门。张礼从启夏门的废墟中走出，来到了南郊。南郊是帝王们祭祀的场所，有唐代的三个祭坛——百神坛、灵星坛和圜丘。其中前两个已经毁坏了，只剩下圜丘还保持着完

整。

继续向南，在一个叫作仇家庄[10]的地方，张礼发现了两处墓葬。一处属于高宗时期的宰相长孙无忌，他见证了武后的擅权，并死于唐朝君臣的钩心斗角。另一处属于本书的重要人物之一郭子仪。但张礼可能弄错了，因为郭子仪被埋葬在长安西北的肃宗陵墓旁，这里的墓可能是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的，也可能是郭子仪家族成员的墓地。

继续往南就是韦曲和杜曲两条小河，这里曾居住着韦氏和杜氏两大家族。在唐代，这两大家族人才辈出，被称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是，到了北宋时，这里已经人烟稀少，不管多少英雄豪杰，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缝隙之中，他们的后代也早已散在了别处。

张礼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画卷。在两百年前，长安是帝王之都，这里车水马龙，聚集着天下的豪杰和文人。他们有的享受了盛世，有的经历了乱局，但他们可能都认为长安的大幕是永远也不会落下的，他们都不相信那美丽雄伟的宫殿会成为废墟，并被埋入地下。

但是，仅仅一百多年后，长安就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北宋时期的汴京迅速取代了长安，成了全国最繁华的所在，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大都市。

当张礼游览长安时，他的心中一定在拿长安与汴京比较。他会发现，与汴京的繁华比起来，长安只是一个偏远的小镇。作为天下之中，汴京经历了著名的仁宗盛治。人们常常以为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顶峰，但如果从经济上看，宋代的仁宗时期，比唐代还要发达得多。但仅仅过了四十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和二年（公元1127年），金人的两次围城，就让汴京这座“永恒之城”追随长安而去了。

注释

[1]张礼，浙江人，生平不详，他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一部《游城南记》。

[2]参见《新唐书·田令孜传》。长安城宫室大约毁坏了百分之七十。

[3]参见《新唐书·王徽传》。

[4]参见《新唐书·田令孜传》。

[5]参见《旧唐书·昭宗纪》。

[6]参见《唐两京城坊考》。

[7]小雁塔位于开化坊南面的安仁坊的西北角上。

[8]玄奘最早建造的是印度式佛塔，称为窣堵波，该塔在武后长安年间焚毁后重建成今天的建制。

[9]参考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一章。

[10]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家族的所在地。

附录

开元至大历初的宰相变动表[1]

年	月　日	变动情况	在职宰相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正月乙亥	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魏知古、陆象先、崔湜、岑羲、窦怀贞、萧至忠
	六月丙辰	兵部尚书郭元振授同中书门下三品	魏知古、陆象先、崔湜、岑羲、窦怀贞、萧至忠、郭元振
	七月甲子	中书令萧至忠诛，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诛，左仆射、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自杀	魏知古、陆象先、崔湜、郭元振
	七月	中书令崔湜追赐死于荆州	魏知古、陆象先、郭元振
	七月乙亥	尚书左丞张说为检校中书令	魏知古、陆象先、郭元振、张说
	七月庚辰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按察使	魏知古、郭元振、张说
	八月癸巳	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知军国重事	魏知古、郭元振、张说、刘幽求
	十月癸卯	郭元振流于新州	魏知古、张说、刘幽求
	十月甲辰	同州刺史姚元之（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魏知古、张说、刘幽求、姚元之
	十二月癸丑	刘幽求罢为太子少师，张说贬为相州刺史	魏知古、姚元之
	十二月甲寅	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②	魏知古、姚元之、卢怀慎

② 开元元年十二月，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中书省改为紫微省，门下省改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开元五年九月，中书、门下省及侍中皆复旧名。

续表

年	月　日	变动情况	在职宰相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正月甲申	和戎大武诸军节度使薛讷授同紫微黄门三品	魏知古、姚元之、卢怀慎、薛讷
	五月辛亥	紫微令魏知古罢授工部尚书	姚元之、卢怀慎、薛讷
	七月	薛讷除名	姚元之、卢怀慎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			姚元之、卢怀慎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十一月己卯	黄门监卢怀慎去官养疾	姚元之
	十一月丙申	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姚元之、源乾曜
	闰十二月己亥	姚元之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刑部尚书宋璟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颋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宋璟、苏颋
开元五至七年（公元717年—719年）			宋璟、苏颋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正月辛巳	苏颋罢为礼部尚书，宋璟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源乾曜、张嘉贞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九月癸亥	天兵军节度使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源乾曜、张嘉贞、张说
开元十年（公元722）			源乾曜、张嘉贞、张说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	二月己酉	张嘉贞贬幽州刺史①	源乾曜、张说
	四月甲子	吏部尚书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源乾曜、张说、王晙
	十二月庚申	王晙贬为蕲州刺史	源乾曜、张说
开元十二至十三年（公元724年—725年）			源乾曜、张说

① 《新唐书·张嘉贞传》称“出为幽州刺史”，开元年间幽州已改为邠州，故似当从

《资治通鉴》及《旧唐书》为幽州。

续表

年	月　日	变动情况	在职宰相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	四月丁巳	户部侍郎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张说、李元纮
	四月庚申	张说罢中书令，仅为尚书右丞相	源乾曜、李元纮
	九月己丑	碛西节度使杜暹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李元纮、杜暹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源乾曜、李元纮、杜暹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	十一月癸巳	河西节度使萧嵩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李元纮、杜暹、萧嵩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	六月甲戌	李元纮罢为曹州刺史；源乾曜罢侍中，仅为左丞相；杜暹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嵩、裴光庭、宇文融
	九月壬子	宇文融贬汝州刺史	萧嵩、裴光庭
开元十八至二十年（公元730年—732年）			萧嵩、裴光庭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三月乙巳	裴光庭薨	萧嵩
	三月甲寅	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萧嵩、韩休
	十月丁巳	萧嵩罢为右丞相，韩休罢为检校工部尚书，京兆尹裴耀卿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前检校中书侍郎张九龄起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裴耀卿、张九龄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五月戊子	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			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	十一月壬寅	裴耀卿罢为左丞相，张九龄罢为右丞相，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授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林甫、牛仙客

续表

年	月　日	变动情况	在职宰相
开元二十五至二十九年（公元737年—741年）			李林甫、牛仙客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七月辛未	左相牛仙客薨	李林甫
	八月丁丑	刑部尚书李适之为左相	李林甫、李适之
天宝二年至四载（公元743年—745年）			李林甫、李适之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	四月庚寅	李适之罢为太子少保	李林甫
	四月丁酉	门下侍郎陈希烈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林甫、陈希烈
天宝六至十载（公元747年—751年）			李林甫、陈希烈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	十一月丁卯	李林甫死	陈希烈
	十一月庚申	御史大夫、判度支事、剑南节度使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①	陈希烈、杨国忠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			陈希烈、杨国忠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	八月丙戌	陈希烈罢为太子太师，文部侍郎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门下省事	杨国忠、韦见素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			杨国忠、韦见素
天宝十五载/至德元载（公元756年）	六月丙申	杨国忠死，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韦见素、崔圆
	七月甲子	玄宗授宪部侍郎房琯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宗授河西行军司马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韦见素、崔圆、房琯裴冕

① 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至德初复旧。

续表

年	月　日	变动情况	在职宰相
	七月庚午	上皇授蜀郡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韦见素、崔圆、房琯、崔涣 裴冕
	正月	宪部尚书李麟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韦见素、崔圆、房琯、崔涣、李麟 裴冕
至德二载 （公元757年）	三月辛酉	韦见素罢为左仆射，裴冕罢为右仆射。宪部尚书致仕苗晋卿为左相	崔圆、房琯、崔涣、李麟、苗晋卿
	五月丁巳	房琯罢为太子少师，谏议大夫兼侍御史张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崔圆、崔涣、李麟、苗晋卿、张镐
	八月甲申	崔涣罢为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	崔圆、李麟、苗晋卿、张镐
乾元元年 （公元758年）	五月戊子	张镐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崔圆、李麟、苗晋卿
	五月乙未	崔圆罢为太子少师，李麟罢为太子少傅，太常少卿王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苗晋卿、王屿
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三月甲午	兵部侍郎吕諲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	苗晋卿、王屿、吕諲
	三月乙未	苗晋卿罢为太子太傅，王屿罢为刑部尚书，御史大夫京兆尹李岘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侍郎第五琦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吕諲、李岘、李揆、第五琦
	五月辛巳	李岘贬为蜀州刺史	吕諲、李揆、第五琦
	十一月庚午	第五琦贬忠州长史	吕諲、李揆
上元元年 （公元760年）	五月丙午	苗晋卿为侍中	吕諲、李揆、苗晋卿
	五月壬子	吕諲罢为太子宾客	李揆、苗晋卿
上元二年 （公元761年）	二月癸未	李揆贬为袁州长史，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苗晋卿、萧华
	四月己未	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苗晋卿、萧华、裴遵庆

续表

年	月　日	变动情况	在职宰相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建辰月[1] 戊申	萧华罢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元载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苗晋卿、裴遵庆、元载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正月癸未	京兆尹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苗晋卿、裴遵庆、元载、刘晏
	七月壬子	雍王李适兼中书令	苗晋卿、裴遵庆、元载、刘晏、李适
	十二月乙未	苗晋卿罢为太子太保，裴遵庆罢为太子少傅，检校礼部尚书李岘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载、刘晏、李适、李岘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	正月乙卯	李适为皇太子	元载、刘晏、李岘
	正月癸亥	李岘罢为太子詹事，刘晏罢为太子宾客，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载、王缙、杜鸿渐
永泰元年至大历三年（公元765年—768年）			元载、王缙、杜鸿渐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十一月壬申	杜鸿渐以疾辞位，许之	元载、王缙
	十一月丙子	尚书左仆射裴冕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载、王缙、裴冕
	十二月戊戌	裴冕薨	元载、王缙
大历五至十二年（公元770年—777年）			元载、王缙

① 上元二年九月，诏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月建是古人干支纪月的一种方法，十二月建为：一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间未，

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

安史之乱前的十节度使情况表[2]

名　称	治　地	统　摄	兵　力
安西节度使	龟兹	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	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
北庭节度使	北庭都护府（现新疆乌鲁木齐）	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	兵二万人，马五千匹，衣赐四十八万匹段
河西节度使	凉州（现甘肃省武威）	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	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衣赐岁百八十万匹段
朔方节度使	灵州（现宁夏灵武）	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	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匹，衣赐二百万匹段
河东节度使	太原	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	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岁百二十六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
范阳节度使	幽州	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	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
平卢军节度使	营州	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	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陇右节度使	鄯州（现青海省乐都）	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	兵七万人，马六百匹，衣赐二百五十万匹段
剑南节度使	成都	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	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七十万石
岭南五府经略使	广州	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	兵万五千四百人，轻税本镇以自给

安史之乱前的北方边境节度使任职表[3]

年份	安西	北庭	河西	陇右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	张玄表	汤嘉惠	贺拔延嗣（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	杨矩（鄯州都督）		薛讷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	张玄表	汤嘉惠	贺拔延嗣	杨矩		薛讷	孙佺 宋璟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张玄表 阿史那献	汤嘉惠 郭虔瓘（都护）	贺拔延嗣	杨矩	王晙（朔方副大总管、安北大都护）	薛讷	宋璟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阿史那献 郭虔瓘（七月命）	郭虔瓘（改安西） 汤嘉惠		杨矩	王晙（改并州）	薛讷（正月入相）王晙（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	郭虔瓘（改河西） 汤嘉惠	汤嘉惠（改安西）	杨执一 郭虔瓘	杨矩（卒） 郭知运		王晙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汤嘉惠 郭虔瓘		郭虔瓘（改安西）	郭知运		张嘉贞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	郭虔瓘			郭知运		张嘉贞（置天兵军，授之天兵军大使）		

续表

年份	安西	北庭	河西	陇右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郭虔瓘			郭知运		张嘉贞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	郭虔瓘 张孝嵩			郭知运		张嘉贞		张敬忠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张孝嵩		杨敬述	郭知运	齐丘	张嘉贞（正月入相） 张说	王晙（九月授幽州都督、节度河北诸军大使）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张孝嵩	张孝嵩	杨敬述 王君㚟 （兼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事）	郭知运 （十月卒） 王君㚟		张说 （九月入相）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	张孝嵩	张孝嵩	王君㚟	王君㚟	张说（节度大使，四月命）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	张孝嵩 （迁太原尹） 杜暹		王君㚟	王君㚟	张说（二月诏拜中书令） 王晙（五月命，十二月贬蕲州刺史）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杜暹		王君㚟	王君㚟	王晙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	杜暹		王君㚟	王君㚟				

续表

年份	安西	北庭	河西	陇右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	杜暹（九月入相） 赵颐贞		王君㚟	王君㚟	王晙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赵颐贞		王君㚟（闰九月败没） 萧嵩	王君㚟 张志亮	王晙 信安王李祎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	赵颐贞		萧嵩 牛仙客（太仆少卿，判凉州别驾事，知节度留后事）	张志亮 张守珪（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			牛仙客（进授节度使）	张守珪	信安王李祎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			牛仙客	张守珪	信安王李祎		赵含章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牛仙客	张守珪	信安王李祎		赵含章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牛仙客	张守珪	信安王李祎		赵含章（六月，赐死） 薛楚玉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田仁琬		牛仙客	张守珪（改范阳） 贾思顺	信安王李祎		薛楚玉 张守珪	

续表

年份	安西	北庭	河西	陇右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田仁琬	刘涣（四月，谋反伏诛）	牛仙客	贾思顺	信安王李祎		张守珪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			牛仙客	贾思顺	信安王李祎		张守珪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		盖嘉运	牛仙客（迁朔方行军大总管）崔希逸		牛仙客（十一月入相）		张守珪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盖嘉运		崔希逸	杜希望（留后）			张守珪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盖嘉运		崔希逸 李林甫（五月遥领宰相）	杜希望 李林甫（五月遥领宰相）		牛仙客（二月遥领宰相）	张守珪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	盖嘉运		李林甫 萧炅	李林甫 杜希望		牛仙客	张守珪（六月，有罪贬括州刺史）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盖嘉运		杜希望	萧炅		王忠嗣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	夫蒙灵察		杜希望	皇甫惟明	王忠嗣	王忠嗣（改朔方）裴宽（四月命）田仁琬	王斛斯（七月命）李适之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夫蒙灵察		王倕	皇甫惟明	王忠嗣		李适之（入为御史大夫）裴宽	安禄山

续表

年份	安西	北庭	河西	陇右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	夫蒙灵察		王倕	皇甫惟明	王忠嗣		裴宽	安禄山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	夫蒙灵察		王倕	皇甫惟明	王忠嗣		裴宽（入为户部尚书） 安禄山（三月兼）	安禄山（三月兼范阳）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	夫蒙灵察		王倕	皇甫惟明	王忠嗣（二月兼河东）	王忠嗣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	夫蒙灵察		王倕 王忠嗣	皇甫惟明（正月败播川太守） 王忠嗣	王忠嗣（正月兼陇右、河西节度使，仍领朔方、河东二镇，移镇凉州，判武威郡事）	王忠嗣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夫蒙灵察 高仙芝		王忠嗣（十月召还，贬汉阳太守） 安思顺（十一月命）	王忠嗣（十月解） 哥舒翰（十一月命）	王忠嗣（四月解） 安思顺（十一月改河西）	王忠嗣（四月解）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	高仙芝		安思顺	哥舒翰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	高仙芝		安思顺	哥舒翰	张齐丘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	高仙芝		安思顺	哥舒翰	张齐丘（八月贬济阴太守） 安思顺（兼领）	韩休珉	安禄山（五月封东平郡王，八月兼河北采访处置使）	安禄山

续表

年份	安西	北庭	河西	陇右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			安思顺（改朔方）	哥舒翰	安思顺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				哥舒翰	安思顺	安禄山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			哥舒翰（五月陇右兼）	哥舒翰（五月兼河西八月封西平郡王）	安思顺	安禄山	安禄山	安禄山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	封常青（三月兼北庭）	程千里 封常青（三月命）	哥舒翰	哥舒翰	安思顺	安禄山	安禄山（二月加左仆射兼闲厩使）	安禄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	封常青（十一月入朝）梁宰	封常青	哥舒翰	哥舒翰	安思顺（十一月入为工部尚书）郭子仪	安禄山	安禄山（十月举兵反）	安禄山

玄宗时期稳定边防和对外战争大事年表[4]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

六月庚申，幽州都督孙佺[5]率军三万，与奚首领李大酺战于硎山，败死。

此前，幽州都督为薛讷，二十多年来一直采取了怀柔的政策，薛讷仇人向刘幽求请求调走薛讷，换来了孙佺。孙佺立功心切，试图通过出击，夺回在武后时期丢失的营州，却全军覆没。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贡。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秋七月丙辰，突厥默啜可汗子杨我支向玄宗求婚。丁巳，皇帝许以蜀王之女南和县主。

十二月甲午，吐蕃求和。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正月甲申，薛讷率军出击契丹。

二月，突厥默啜可汗派遣其子同俄特勤率军进攻北庭都护府，右骁卫将军郭虔瓘将其击败，斩同俄于城下。

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攻克碎叶等镇，俘获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其部落二万余帐投降。

七月，并州大都督府长史薛讷与副将杜宾客、崔宣道等召集军队六万人，在檀州道的滦河遭遇奚、契丹等敌人，被击败。薛讷等屏甲遁归，减死，除名为庶人。

八月乙亥[6]，吐蕃进攻临洮军，又游寇兰州、渭州，掠走大量牲口。皇帝再次授予薛讷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等防御吐蕃。

冬十月甲子，薛讷破吐蕃于渭州西界武阶驿，斩首一万七十级，马七万余匹，牛羊四万头。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

二月，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句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跌思太等，各率军从突厥阵营相继来投靠，前后总两千余帐。

四月庚申，突厥部三姓葛逻禄归附。

十月辛酉，嶲州蛮骚扰边疆，右骁卫将军李玄道伐之。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二月辛酉，吐蕃进攻松州，廓州刺史盖思贵防守。

二月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击败吐蕃。

夏六月癸酉，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斩其首送京师。默啜哥哥的儿子小杀被立为可汗。

是夏，回纥、同罗、霫、勃曳固、仆固五部落来归附，皇帝将之安置在大武军北。

七月丁丑，吐蕃请和。

八月辛未，奚、契丹降。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

三月丙寅，吐蕃请和。

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击败吐蕃。

十一月己亥，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来朝，玄宗把宗女永乐公主赐给他做妻子。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二月壬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王晙进攻突厥。

夏五月，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卒。

十一月，突厥抓获单于副都护张知运。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

春正月，吐蕃遣使朝贡。

三月，渤海靺鞨郡王大祚荣死，其子武艺嗣位。

六月戊辰，吐蕃请和。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秋九月，突厥欲谷进犯甘、凉等州，凉州都督杨敬述被他击败，突厥人掠契苾部落而归。

秋九月壬申，以御史大夫王晙为兵部尚书兼幽州都督，黄门侍郎韦抗为御史大夫、朔方总管，以抵御突厥。

十一月辛未，突厥进犯凉州，杀人掠羊马数万计而去。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二月丙戌，突厥请和。

夏四月庚寅，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起兵反叛，攻陷六胡州，占据长泉县。兵部尚书王晙发陇右诸军及河东九姓讨伐。

秋七月己酉，王晙破兰池州叛胡，杀三万五千骑，执康待宾。辛酉，集诸酋长，斩康待宾。

八月，兰池胡康愿子骚扰边境。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

夏四月丁酉，封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郁于为松漠郡王，奚首领饶乐都督李鲁苏为饶乐郡王。

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前往朔方军巡边。

六月癸卯，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嫁给奚首领饶乐郡王李鲁苏。

秋八月丙戌，岭南按察使裴伽先上言，安南土著首领梅叔鸾等攻围州县，皇帝派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进击安南叛众。

九月，张说擒康愿子于木盘山。皇帝下令将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移动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被搬空。

九月癸未，吐蕃进攻小勃律，北庭节度使张孝嵩击败之。

十二月，突厥请和。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冬十一月，五溪首领覃行璋[7]反，皇帝派遣镇军大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平之。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

春正月癸亥，改封契丹松漠郡王李召固为广化王，奚饶乐郡王李鲁苏为奉诚王，并下令封宗室外甥女二人为公主，嫁给两位番王。

二月庚戌朔，邕州獠首领梁大海、周光等据宾、横等州叛乱，皇帝派遣骠骑大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伐，将它们杀死。

三月壬寅，宗室外甥女东华公主出嫁契丹李召固。

夏四月辛丑，在定、恒、莫、易、沧等州设置军，以防范突厥。

十一月甲戌，突厥遣使来朝。

十一月辛丑，渤海靺鞨遣其子义信来朝，并献方物。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㚟在青海湖之西击败吐蕃，虏辎车、马羊而还。

九月丙子，吐蕃进犯瓜州，抓住刺史田元献以及王君㚟的父亲，杀掠人吏，尽取军资仓粮而去。

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派遣其大臣梅录啜来朝。

闰九月庚子，突骑施苏禄、吐蕃赞普围攻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走之。

闰九月，回纥部落杀王君㚟于甘州之巩笔驿。皇帝下令检校兵部尚书萧嵩兼判凉州事，总兵以御吐蕃。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

春正月乙卯，春、泷等州獠首领（皇帝封的羁縻官）泷州刺史陈行范、广州首领冯仁智、何游鲁叛乱，派遣骠骑大将军杨思勖讨平之。

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击败吐蕃。

春正月甲子，黑水靺鞨遣使来朝献。

秋七月，吐蕃进犯瓜州，刺史张守珪击破之。

秋七月乙巳，检校兵部尚书萧嵩、鄯州都督张志亮，攻克吐蕃大莫门城，斩获数千级，收其资畜而还。

秋七月丙辰，新罗王金兴光遣使贡方物。

八月辛卯，萧嵩遣杜宾客在祁连城进攻吐蕃，大破之，获其大将一人，斩首五千级。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

二月丁卯，嶲州都督张审素攻破南蛮，拔昆明城及盐城，杀获万人。

二月甲寅，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率众攻克吐蕃石堡城。

三月戊戌，张守珪在大同军与吐蕃人大战，败之。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

五月，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主李召固，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也跟随着叛离。但奚王李鲁苏选择了逃奔唐朝。皇帝下嫁给契丹王和奚王的两位公主，即李召固妻子东华公主陈氏及李鲁苏妻子东光公主韦氏一起投奔了平卢军。同时，皇帝下令幽州长史赵含章率兵进攻契丹和奚。

六月丙子，命令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为副，率十八总管进攻契丹及奚等，但没有成行。

冬十月戊子，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猎献方物请降，许之。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去世，皇帝下诏吊唁。

三月乙酉朔，御史大夫崔琳使于吐蕃。

九月辛未，吐蕃遣其国相论尚他硉来朝，请求在赤岭互市。皇帝许可。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春正月乙卯，以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率兵讨奚、契丹。

三月，信安王李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

五月戊辰，信安王献奚、契丹之俘，皇帝在应天门接受了俘虏投降。

九月，渤海靺鞨进犯登州，杀刺史韦俊，下令左领军将军盖福顺[8]发兵讨伐。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春正月己未，工部尚书李嵩出使吐蕃。

闰三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等进攻契丹，败于都山下，郭英杰死亡。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六月乙未，皇帝派遣左金吾将军李佺于赤岭（日月山）与吐蕃分界立碑。

六月壬辰，幽州长史张守珪将奚、契丹俘虏献给皇帝。

十二月乙巳，幽州长史张守珪发兵讨契丹，在战场上斩杀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传首东都，其余叛奚散入山谷。皇帝立其酋长李过折为契丹王。

是岁，突厥毗伽可汗死。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

冬十月戊申，突骑施进犯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十二月，新罗遣使朝献。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

春正月，吐蕃遣使献方物。

春正月丙午，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击破突骑施。

八月甲寅，突骑施请和。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二月，新罗王金兴光卒，其子承庆嗣位，皇帝派遣赞善大夫邢璹摄鸿胪少卿，前往吊祭老王，册立新王。

二月癸酉，张守珪在榛禄山击败契丹余众，杀获甚众。

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军进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崔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吐蕃军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三月，吐蕃进犯河西，左散骑常侍崔希逸将其击败。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攻克吐蕃的新城，将这座城池改为威戎军。

九月庚子，于旧六胡州地置宥州。

九月，益州长史王昱率军进攻吐蕃安戎城，官军大败，王昱弃甲而遁，兵士死者数千人。

是岁，渤海靺鞨王大武艺死，其子钦茂嗣立，皇帝遣使吊祭并册立新王。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

秋七月，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在碎叶城将突骑施击败，在贺逻岭将突骑施王吐火仙俘虏，送到京师，威震西陲。

八月壬午，吐蕃进犯白草、安人等，河西、陇右节度使萧炅将之击败。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三月壬子，权判益州长史章仇兼琼攻克吐蕃安戎城，分兵镇守之。

五月癸卯，吐蕃试图夺回安戎城，被章仇兼琼击败。

十二月乙卯，突骑施酋长莫贺达干率众内属。

是岁，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来告丧。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

三月，吐蕃、突厥各遣使来朝。

秋七月，突厥登利可汗死。

八月乙未，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被封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十二月丁酉，吐蕃入寇，攻克廓州达化县及振武军石堡城，节度使盖嘉运无法收复。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八月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汗之孙、登利可汗之女，相与率其党属来降。

九月辛卯，皇帝登临花萼楼，派出宫女招待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赏赐不可胜计。

十二月戊戌，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在青海湖击败吐蕃。

十二月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打败吐蕃渔海、游弈军。

十二月，朔方军节度使王忠嗣和奚人战于紫乾河，将其击败，并顺势进攻突厥。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

四月己卯，皇甫惟明攻克吐蕃洪济城。

十二月壬午，海贼吴令光进犯永嘉郡。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

二月丁丑，河南尹裴敦复、晋陵郡太守刘同昇、南海太守刘巨鳞击破海贼吴令光，平定永嘉郡。

秋八月丙午，九姓拔悉密叶护打败并斩杀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

正月丙戌，王忠嗣败突厥于萨河内山。

三月壬申，皇帝封外孙独孤氏女为静乐公主，嫁给契丹松漠都督李怀节，封外孙杨氏女为宜芳公主，嫁给奚饶乐都督李延宠。

九月，契丹及奚酋长将两位公主杀死，带整个部落反叛。

九月甲申，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唐军战败，副将褚直廉[9]等死难。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击败小勃律。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

六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获赐实封及铁券。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

三月，朔方节度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北筑横塞城。

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进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闰六月，改石堡城为神武军。

十月，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进攻云南。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

夏五月乙卯，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由此开始。

是岁，云南蛮陷云南郡，都督张虔陀被杀。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

正月戊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抓获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

二月丁巳，安禄山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

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六万讨伐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唐军大败，死于泸水者不可胜数。大将王天运死，云南都护府陷。

七月，高仙芝与大食（阿拉伯）战于怛罗斯城，败绩。

八月，范阳节度副大使安禄山与契丹战于吐护真河，败绩。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

三月，朔方节副使、奉信王阿布思与安禄山一同讨伐契丹，阿布思与安禄山不合，于是率领部下叛逃到了漠北。

六月壬午，御史大夫兼剑南节度使杨国忠败吐蕃于云南，克故洪城。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

六月，阿布思部落降。

九月甲寅，葛逻禄叶护抓获了阿布思。

九月己亥朔，陇右节度使、凉国公哥舒翰进封西平郡王，食实封五百户。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

春正月己亥，安庆绪献俘于行在。

春正月乙巳，加安禄山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等。

三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击败吐蕃，光复了河源九曲。

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粮尽退兵时，为阁罗凤所擒，全军覆没。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

三月壬午，安禄山在潢水击败契丹。

十一月丙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兵十余万，反于范阳。

盛唐著名诗人大事简表[10]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

孟浩然生，襄州襄樊人，在南郭外有薄田。青年时慕汉庞德公，与张子容隐居于襄阳县东南鹿门山。

长安元年（公元**701**年）

王维生于蒲州猗氏县。

李白生，可能生于其父迁蜀之前，或者于碎叶，或者于迁蜀途中某

地。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高适生。

孟浩然十六岁。王之涣十七岁。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李白五岁，能诵六甲。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

颜真卿生。

王维九岁，已能写诗文。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

李白十岁，通诗书，观百家。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

杜甫生，为杜审言孙。

宋之问流配钦州赐死。

高适九岁，曾游浙闽。由于其父曾南宦韶州，故应是随父同游，但日期无法确定是中宗末或者睿宗朝，还是玄宗初[11]。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姚崇开始为相。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

岑参父植为仙州首任刺史。

岑参生于仙州。

王维十五岁，离家赴长安，此后几年大部分时间在长安。

孟浩然二十七岁。王昌龄十八岁。

李白十五岁，好剑术。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

默啜可汗死，天下安定。

姚崇罢相。宋璟、苏颋同平章事。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

正月，皇帝驾幸东都。

王维十七岁，在长安，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孟浩然二十九岁，游洞庭，作岳阳楼诗献张说。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

冬十一月，皇帝还西京[12]。

贾至生。

王维十八岁，在长安，间至洛阳。

杜甫七岁，开始作诗。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

岑参五岁，始读书。

高适十六岁，初游长安[13]。

元结生。

王维十九岁，在长安，七月赴京兆府试。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

岑参六岁，随父至晋州（父任晋州刺史）。

宋璟、苏颋罢相。源乾曜、张嘉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维二十岁，参加吏部考试，落第。经常跟从岐王李范等游宴。

李白二十岁，性倜傥，曾杀数人。礼部尚书苏颋贬为益州长史，见李白。李白师从东严子数年，郡守举二人考有道科，未中。

杜甫九岁，开始写大字。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

王维二十一岁，春进士及第，调太乐丞。不久因犯事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秋离京赴任。

綦毋潜落第还乡，王维送之。

李白二十一岁，隐居岷山之南。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

二月，皇帝至东都。

王维二十二岁，在济州。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

正月，皇帝经晋州去往并州。

三月，皇帝还西京。

崔颢进士及第。

岑参九岁，开始作文。

高适二十岁，离长安回梁宋[14]。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十一月，皇帝至东都。

岑参十岁，父卒。

高适二十一岁，寓居梁宋，耕钓为生。

祖咏进士及第。

王维二十四岁，裴耀卿任济州刺史，王维仍然居济州。

李白二十四岁，为废后王氏而作《蟾蜍薄太清》，奠定了他对政治的讽喻态度。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

十月，皇帝封泰山。

李白二十五岁，出游襄汉，泛舟洞庭，至金陵、扬州，还到过汝水、云梦，为许圉师孙婿，于是在安陆住了十年。

王维二十五岁，在济州见祖咏，赋诗。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

严武生。

储光羲进士及第。

崔国辅进士及第。

綦毋潜进士及第。

王维二十六岁，暮春，离任济州司仓参军。

孟浩然三十八岁，漫游于襄阳、扬州、宣城间，结识李白。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十月，皇帝还西京。

王昌龄三十岁，进士及第，补官任秘书省校书郎。

常建进士及第。

王翰此年前后任仙州别驾。

王维二十七岁，官居淇上。

孟浩然三十九岁，受王昌龄及第影响，冬赴京师长安，准备应举。此前登第的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和王昌龄都是孟浩然的好友。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

孟浩然四十岁，游长安。应进士试，落第后滞留长安，冬离开[15]。

岑参十四岁，从晋州迁居河南府王屋县青萝河畔。

王维二十八岁，隐居淇上。秋还长安。冬孟浩然离开，有诗赠王维。

王维曾向玄宗推荐孟浩然，玄宗也听说过孟浩然文名，但由于孟浩然上给皇帝的诗里有“不才明主弃”之语，不为皇帝所喜，放还[16]。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

岑参十五岁，迁居登封县太室山下。

王维二十九岁，在长安，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

孟浩然四十一岁，这一年和下两年，孟浩然自洛阳经过汴水往游吴越，登天台山，宿桐柏观，泛镜湖，探禹穴，游若耶溪，上云门寺，礼拜剡县石城寺，至杭州钱塘观潮、浮海。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

皇帝宠宦官高力士与杨思勗等，皆封三品将军。

高适二十八岁，北游燕赵。

陶翰进士及第。

王维三十岁，等候选用，闲居长安。

李白三十岁，文章成就，拜访过卿相显贵。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十一月，皇帝至东都。

杜甫二十岁，游吴越。

高适二十八岁，秋，北上蓟门，过魏州。又至巨鹿、真定，出卢龙塞。

薛据进士及第。

王维三十一岁，妻亡，不再娶，孤居一室。

杜甫二十岁，游吴越，可能之前去过晋地。

孟浩然四十三岁，除夕在乐城与张子容相会。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十一月，皇帝经潞州去太原。十二月还西京。

岑参十八岁，迁居少室。

高适二十九岁，冬日自蓟北归。

孟浩然四十四岁，北归襄阳。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

刘长卿进士及第[17]。

刘沓虚进士及第。

王昌龄三十六岁，举博学宏词科，授汜水尉。

高适三十岁，至邯郸。夏至漳水上。至卫州。归宋州。

王维三十三岁，房琯为卢氏令，王维有诗赠之。约在此年以前游过蜀地。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正月，皇帝至东都。

四月，李林甫与张九龄、裴耀卿同为宰相。

皇帝宠道士张果，好神仙。

颜真卿进士及第。

阎防进士及第。

薛据为涉县宰。

王维三十四岁，闲居长安。秋，赴洛阳，献诗张九龄求汲引，旋隐于嵩山。

高适三十一岁，在宋州。

岑参二十岁，至东都献书阙下，并拜谒故旧。

岑参与王昌龄交游，最早始于是年。

李白三十四岁，在这年以前见荆州长史韩朝宗。此年，韩朝宗升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

孟浩然四十六岁，再上长安求仕，未果返乡。另外，采访使韩朝宗曾想推荐孟浩然，与之约期赴长安，但因为故人至，孟浩然放弃了与韩朝宗的约会，从而得罪了韩朝宗，失去了机会。这件事当发生在此年或数年之后[18]。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

正月，皇帝在东都五凤楼设宴。

李颀进士及第。

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赴举不第，留洛阳。

高适三十二岁，赴长安应制科，不第[19]。

李白三十五岁，游太原，识郭子仪于行伍之中。与谯郡元参军携妓游晋祠。寻至齐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会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岑参二十一岁，出入嵩、洛间，与杜甫、高适始交游。

王维三十五岁，春隐于嵩山。不久拜右拾遗[20]，至东都任职。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

冬十月，皇帝还西京。

张九龄、裴耀卿罢相，李林甫为中书令，把持朝政。

岑参二十二岁，出入嵩、洛间，有时居缑山。

高适三十三岁，归宋州。

王维三十六岁，与玄宗同回西京。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

太子李瑛赐死。

杜甫二十六岁，东游齐赵。

王维三十七岁，从右拾遗迁监察御史。夏，奉命出使河西节度。后入河西节度使幕府，为河西节度判官。

韦应物生[21]。

岑参二十三岁，居少室。

孟浩然四十九岁。尚书右丞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让孟浩然在他的幕府为从事。孟浩然陪张九龄在南纪城狩猎，泊舟渚宫，多处游览。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

李亨为太子。

岑参二十四岁，赴举长安，落第而归。

王维三十八岁，河西节度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也返回长安，可能仍旧任监察御史。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

王昌龄四十二岁，谪岭南。

岑参二十五岁，赴长安，居天门街西岑氏旧宅。岑参成家当在本年

之前。

秋日，岑参为王昌龄饯别。

秋日，孟浩然背疽发作，归襄阳养病。此年孟浩然曾写诗送王昌龄。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杨贵妃入玄宗宫。

王昌龄四十三岁，从岭南回，不久授江宁丞。

孟浩然五十二岁，与王昌龄晏饮，疽发而卒。

岑参二十六岁，与弟岑乘居长安。

冬，岑参送王昌龄去江宁。

王维四十岁，改任殿中侍御史。冬，奉命知南选，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经过襄阳时哭孟浩然。

李白四十岁，此前曾作诗数首应答孟浩然。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

高适三十八岁，游淇上[22]。

杜甫三十岁，还东都。

岑参二十七岁，春从长安出发，北游河朔，秋冬返回少室。

王维四十一岁，春，自岭南北归，经过润州江宁县瓦官寺，拜谒璿禅师。归长安后隐居终南山。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

南十节度使以备边。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

王维四十二岁，任左补阙[23]。

王之涣卒。

李白四十二岁，游会稽，在道士吴筠的帮助下，被征至京，供奉翰林。太子宾客贺知章与他一见如故。吴筠北征，与此前一年皇帝立崇玄学有关。

岑参二十八岁，春日返京，秋七月又东出关，游大梁。

刘单进士及第。

丘为落第[24]。王维有诗送丘为落第。

贾至为单父尉。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

李白四十三岁，与贺知章等为酒中八仙之游。

岑参二十九岁，年初归长安，作《感旧赋》。

张谓进士及第。

王维四十三岁，约在是年与王昌龄、王缙、裴迪在青龙寺（在长安新昌坊）昙壁上人院雅集赋诗。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

三月，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李白四十四岁，赐金放归，与杜甫、高适游于梁宋。李白此后十年的游览范围大致是：寄居从祖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然后游历四方，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於，至洛阳，南游淮泗，再入会稽。在鲁中安家，因而时常往来齐鲁

间，前后十年中在梁宋待的时间最久。

岑参三十岁，于赵岳榜进士高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

高适四十一岁，春游大梁，不久返回睢阳（天宝元年宋州改为睢阳郡）。秋日在单父与李白、杜甫相会，三人曾至大梁后返回睢阳。秋末东游于楚地。

王维四十四岁，仍任左补阙，开始经营蓝田辋川别业。

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与李白、高适游。祖母死，归葬偃师，杜甫作墓志。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

八月，册封杨贵妃。

岑参三十一岁，春日给假省亲，游览淇上，不久带家人入京。

高适四十二岁，至临淮郡涟水县。不久回睢阳又陆续至鲁郡、任城县、东平郡。

王维四十五岁，改任侍御史，出使榆林、新秦二郡。在南阳郡与神会和尚长谈一番。

杜甫三十四岁，在齐州。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

杜甫三十五岁，其父任奉先县令，杜甫出入长安。

岑参三十二岁，在长安，与杜甫族亲杜位交游。

高适四十三岁，在东平，不久去往济南郡历城县。秋日至渤海之滨后至淇上，从事农耕。又到过楚丘、濮上。冬日居淇上。

王维四十六岁，转库部员外郎。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

皇帝下令通一艺者入京考试，李林甫一人都未录取。

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高仙芝征小勃律。

王昌龄五十岁，于此年前后贬为龙标尉。

杜甫三十六岁，应制举落第，因为李林甫一人未录。

元结二十九岁，应制举落第。

岑参三十三岁，在长安，与李翥等交游。

高适四十四岁，春日在卫滑一带。春秋间自卫州渡过黄河到梁宋地暂住。

天宝七载（公元**748**年）

杨国忠受宠。杨氏姊妹受宠。

高力士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

卢纶或生于此年。

岑参三十四岁，在长安，与颜真卿交游。

高适四十五岁，在睢阳，与陈兼、贾至、独孤及等交往。

李益生。

李嘉祐进士及第。

包何进士及第。

卢纶或此年生。

王维四十八岁，可能于此年迁库部郎中。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

高适四十六岁，举有道科，授封丘尉。

岑参三十五岁，转右威卫录事参军，到安西幕府任判官。

王维四十九岁，为萧嵩作挽歌。

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偶尔去东都。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

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赐爵东平郡王。

高仙芝自安西出征。

岑参三十六岁，在安西。秋日出使武威，冬日返。

高适四十七岁，春日与同僚游汴州篷池，秋日送兵至清夷军（现河北怀来）后去往蓟北，自清夷军返回居庸关。

王维五十岁，母丁忧，离朝屏居辋川。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

高仙芝兵败怛罗斯。

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兵败南诏。

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

杜甫四十岁，献《三大礼赋》，待制集贤院。

孟郊生。

钱起进士及第。

岑参三十七岁，春日自安西至武威，滞留至夏。高仙芝兵败后，于六月还京，居住在杜陵别业。

高适四十八岁，北使归来，春日行至燕赵境上。后至瀛州河间、冀州信都故辟阳城。不久返回封丘。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

李林甫卒，杨国忠为相。

封常青封安西节度使。

王维五十二岁，守丧期满，任吏部郎中，吏部改为文部后，任文部郎中。

高适四十九岁，秋日弃官由封丘赴京后至河西担任哥舒翰掌书记。不久至金城。曾往返西京[25]。

岑参三十八岁，年初赴河东一游，秋归嵩、洛访旧。

岑参与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同登慈恩寺塔，各有诗。这是安史之乱前文人的一次盛会。

杜甫四十一岁，皇帝召他试他文章，列入选官之列。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

杨国忠与安禄山不睦。

张继进士及第。

高适五十岁，为哥舒翰掌书记。四月前在长安，知李宓伐云南事。不久返回河西。

杜甫四十二岁，有送高适诗作。

岑参三十九岁，夏日在石鳖谷居住，携弟与杜甫游渼陂。

颜真卿调任平原太守。

王维五十三岁，李峘任睢阳太守，王维送之。李岘任魏郡太守，晁衡回日本，王维都曾相送。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

李宓伐南诏，全军覆没。

元结进士及第。

韩翃进士及第。

李白五十四岁，游广陵、秦淮、金陵，至宣城。

崔颢卒。

岑参四十岁，春至醴泉扫墓。四月受封常青邀请为北庭节度判官，六月至北庭。九月、十月，送、迎封常青军，作诗。

高适五十一岁，在河西，皈依佛教。后至昌松县。有诗赠颜真卿。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

十一月，封常青被召至长安。十二月，封常青兵败，与高仙芝被斩于潼关。

杜甫四十四岁，授河西尉，未赴任，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前往奉先（不是避乱）。

王昌龄五十八岁，约于此年被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26]。

岑参四十一岁，在北庭，春献诗封常青，夏、秋随封常青晏游。冬日，至玉门关考察边关储备，时为北庭度支副使。

高适五十二岁。哥舒翰北征讨贼，高适至长安任左拾遗，转任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

王维五十五岁，转任给事中。

李白五十五岁，在宣城。

天宝十五载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

哥舒翰败，被俘。

六月，安禄山攻入长安。

七月，玄宗至普安郡（现四川剑阁）。肃宗在灵武即位。

王维五十六岁。六月被俘，服药装病，却被看守无法逃遁。后被送往洛阳拘于菩提寺。八月赋诗宁碧池，九月被迫担任安禄山的给事中。

杜甫四十五岁，到白水依附崔氏舅，又自鄜州去追随玄宗，陷于叛军中。

李白五十六岁，永王李璘反。李白自宣城到溧阳，又到剡中，又到庐山。永王李璘为江陵府都督，充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重视李白，征召他为府僚佐。永王擅自带兵东下时，胁迫李白同行。

高适五十三岁，哥舒翰败后，自骆谷向西逃，至河池郡（现陕西凤县）见玄宗，陈述潼关大败。任侍御史。随玄宗至蜀郡（现成都），任谏议大夫。十一月，永王李璘反后，肃宗召高适，高适说李璘必败。十二月，高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肃宗命他与淮西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共讨李璘，在安州（现湖北安陆）会师。

岑参四十二岁，年初由玉门关返回北庭。

李白与高适分别加入敌对两方。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

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

张巡、许远守睢阳。

二月，肃宗至凤翔。

永王李璘兵败而死。

九月收复长安。

十月收复东京。肃宗返回西京，史思明带手下十三郡投降。

十二月，上皇还京。

杜甫四十六岁。四月自叛军中逃脱，至凤翔任左拾遗。由于上书救房琯惹怒肃宗，但由于宰相张镐相救，获免。八月，杜甫被放还鄜州省家。十月，他随皇帝还西京。

李白五十七岁，永王兵败，李白逃到彭泽，被关在浔阳狱。宣慰大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请李白参谋军事，上书搭救，没有结果。

岑参四十三岁，春末东归，夏日至凤翔。六月杜甫等推荐他任右补阙。冬归长安。

高适五十四岁，试图救援睢阳没有成功。为王昌龄鸣冤。

张镐杖杀闾丘晓。

王维五十七岁。十月，唐军收复东都后，把他与其他伪官押回西京，与郑虔、张通等关在杨国忠旧宅。十二月，王维因为凝碧诗免罪。王维弟王缙官位渐渐显赫。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高适五十五岁，因谗言，由淮南节度使贬为太子少詹事[27]。与杜甫相唱和。五月，过睢阳祭奠张巡、许远。夏日在洛阳。

杜甫四十七岁。任左拾遗，六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冬天，离任，到东都。

王维五十八岁。春复官，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后改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秋任给事中。冬把辋川庄布施出去，等他死后改为寺。

李白五十八岁，流放夜郎，从洞庭沿江而上至巫山。

岑参四十四岁，在长安。

贾至、王维、杜甫、岑参等都参与了大明宫早朝的唱和。

六月，房琯外贬，严武连坐被贬巴州刺史，后任东川节度使。

储光羲被贬岭南。

六月前，严武为京兆少尹，与王维往来。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正月，史思明称帝。

三月，九节度使攻打史思明兵败。

九月，史思明占领洛阳，十一月攻打陕州。

宦官李辅国掌权。

高适五十六岁，五月任彭州刺史。于蜀山中被乱军劫夺。至彭州，十二月有诗赠杜甫。

李白五十九岁，遇赦，可能得益于郭子仪的搭救。在江夏、岳阳休息后，返回浔阳。

杜甫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回华州。由于关中大饥，七月弃官，经过陇州，暂住秦州。在西枝村寻地建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在同谷住了不到一个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

岑参四十五岁，三月由补阙转起居舍人，四月出任虢州长史，五月赴任。

储光羲卒。

贾至贬岳州司马。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

杜甫四十九岁，已自秦川入蜀，住在成都浣花溪，建草堂。

高适五十七岁，转蜀州刺史。

岑参四十六岁，在虢州。

王维六十岁，转尚书右丞[28]。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

史朝义杀史思明。

严武为河南尹。

王维六十一岁。初春，河南尹严武来访。弟王缙从蜀州刺史回任左散骑常侍。王维七月卒。

岑参四十七岁，在虢州遇严武。

高适五十八岁，在蜀州。正月有诗赠杜甫。五月带兵与东川节度使李奂、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共攻绵州，斩段子璋。崔光远大肆劫掠东川，被免，死。

李白六十一岁，游金陵，往来宣城、历阳二郡间。

杜甫五十岁，居成都草堂，曾去蜀州之新津、青城。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玄宗、肃宗卒。代宗立。

六月，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不久入朝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

七月，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八月被李忠厚所杀，剑南悉平。

李白六十二岁，李阳冰为当涂令，前往投奔，十一月以疾卒。

杜甫五十一岁，由于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杜甫携家前往梓州避难。冬，复归成都，迎家眷至梓州。十二月前往射洪南之通泉。

岑参四十八岁，年初迁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驻潼关。十月，为雍王李适掌书记，至陕州。随军东进，月底至洛阳。

贾至复为中书舍人。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安史之乱平。

十月，吐蕃攻陷长安。年底吐蕃退。

高适六十岁，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出战吐蕃无功。不久松、维二州及云山城失陷。

岑参四十九岁，春日任祠部员外郎，秋改考功员外郎。

贾至迁尚书右丞。

杜甫五十二岁，在梓州。春，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是岁，有诏补京兆功曹，不赴。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

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

高适六十一岁，为刑部侍郎，还长安，转任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

杜甫五十三岁，春自梓州赴阆州。严武再镇蜀，春晚杜甫还成都。六月严武上表为他请职检校工部员外郎，为剑南节度参谋，赐绯鱼袋。

岑参五十岁，在长安。迁虞部郎中，赴太白山巡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

四月，严武卒。蜀中大乱。

高适六十二岁，卒。赠吏部尚书，谥曰忠。

杜甫五十四岁，正月辞幕府归草堂。五月，乘船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云安，居住在那里。

岑参五十一岁，转库部郎中。十一月，出为嘉州刺史，滞留梁州。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

元载擅权。

颜真卿驳元载，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司马。

杜甫五十五岁，春，居住在夔州。秋，住西阁。

岑参五十二岁，以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入杜鸿渐幕。二月从长安出发，七月至成都。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

岑参五十三岁，春居成都，夏日赴任嘉州。

杜甫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迁居赤甲。三月迁瀼西。秋迁东屯。未几返回瀼西。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

杜甫五十七岁。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至岳州。

韩愈生。

岑参五十四岁，年初由嘉州至成都，不久返回。六月罢官，乘船回嵩洛。为盗所阻，留戎州。冬日归成都。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岑参五十五岁，客于成都，年底卒。

李益进士及第。

杜甫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潭州。不久去往衡州。夏，因怕热返回潭州。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

杜甫五十九岁。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兵变至衡州。打算投奔郴州舅氏崔伟，至耒阳，停泊方田驿。秋，船行至荆楚，不幸病亡路上，停灵岳阳。

注释

[1]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整理。本年谱追寻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间的宰职变动，关注点是每一人出入宰相，但在宰相职位内部的调整则不再一一列出。表中日期据《资治通鉴》。

[2]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整理，本表也见于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3]本表依据万斯同《唐镇十道节度使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唐代使职的名称长期不固定，特别是在一个使职出现的初期，万表以职务的实质性划分，将一部分有实职、名称却未必为节度使的官员也划入其中。另外，唐代有请诸王兼职的传统，节度使也不例外，但

大部分情况下亲王都是不赴任的，万表有时不列此类职务，而是列出实际负责的副大使、长史的名字。此外，剑南节度使和岭南观察使的变动并未列出，只列了北方边境上的八道节度使。

[4]本编年以《旧唐书》为底本，辅以《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外交往只列出了与相邻政权的交往关系。

[5]据《资治通鉴》。《旧唐书》作孙俭。

[6]根据《新唐书》定为八月。

[7]《新唐书》作覃行章，为溪州首领。

[8]《新唐书》作盖福慎，《资治通鉴》作葛福顺。

[9]《新唐书》记为褚諲。

[10]岑参、高适、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活动年份都有多种说法，本书择而从之。其中岑参年谱采于中华书局《岑参诗笺注》。高适年谱采于中华书局《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王维年谱采中华书局《王维集校注》。李白年谱采中华书局《李太白全集》。杜甫年谱采中华书局《杜诗详注》。孟浩然活动年代尤其不易得，现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孟浩然诗集笺注》整理。部分事件与诗人本人无关，但与各诗人经历、境遇有关，故亦列出。

[11]根据《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12]《岑参诗笺注》为冬十月，据《资治通鉴》改。

[13]根据《岑参诗笺注》，年龄根据《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改。

[14]根据《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与《岑参诗笺注》尤异。

[15]《岑参诗笺注》有“冬反襄阳”之句，据《孟浩然诗集笺注》改。

[16]见《新唐书·文苑传下》。

[17]据《岑参诗笺注》，但刘长卿生平并不清晰，因此，他的及第时间也有可能比这晚得多，最迟可能达安史之乱前。

[18]据《新唐书·文苑传下》。

[19]另一种说法是当年的制科考试在洛阳。

[20]《岑参诗笺注》系于前一年。

[21]《韦应物集校注》定于两年前。

[22]根据《岑参诗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未提及。

[23]《岑参诗笺注》云由补阙迁库部郎中。

[24]《岑参诗笺注》称丘为进士及第。

[25]《岑参诗笺注》定高适为哥舒翰掌书记于下一年。

[26]《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定于次年。

[27]《岑参诗笺注》定为前一年。

[28]《岑参诗笺注》定为前一年。

参考书籍

一、史书政书类书

［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97

［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唐］吴兢.贞观政要.岳麓书社，200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64

［唐］李林甫等，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14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

［唐］杜佑，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2016

［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

［宋］马端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

［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本书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95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劳格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提名考.中华书局，1992

张忱石.唐尚书省郎官石柱提名考补考.中华书局，2018

［清］徐松，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华书局，2019

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增订本）.中华书局，2019

周祖譔，胡旭等.历代文苑传笺证.凤凰出版社，2012

［宋］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2016

［宋］王应麟，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凤凰出版社，2017

二、笔记资料类

赵俊玲辑.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2018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

李时人等.全唐五代小说.中华书局，2014

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刘尊明等.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陈元龙编，许结点校.历代赋汇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18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13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00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2003

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编.大唐创业起居注（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唐］崔令钦等，吴企明点校.教坊记（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

［唐］封演，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

［五代］王仁裕/［唐］姚汝能，曾贻芬点校注解.安禄山事迹，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

［唐］苏鹗等，吴企明点校.苏氏演义（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

［唐］赵元一等，夏婧整理.奉天录（外三种）.中华书局，2014

［唐］朱景玄，吴企明校注.唐朝名画录校注.黄山书社，2016

［元］辛文房，孙映逵校注.唐才子传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张进等.王维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4

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

三、唐代及关中地理资料

［唐］李吉甫，贺次君注解.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唐］李泰，贺次君注解.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

［唐］樊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2018

［清］顾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顾祖禹，施和金/贺次君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清］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2004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12

［宋］程大昌，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2002

［清］徐松，张穆注解.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

［唐］韦述/［唐］杜宝，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中华书局，2019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06

［汉］赵岐，陈晓捷校注.三辅决录 三辅故事 三辅旧事.三秦出版社，2006

［汉］王褒等，陈晓捷辑注.关中佚志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

［汉］辛氏/［晋］潘岳，刘庆柱辑注.三秦记辑注 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

［清］毛凤枝，李之勤校注.南山谷口考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

［宋］张礼，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

［唐］玄奘/辩机，范祥雍汇校.大唐西域记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宋］王应麟，傅林祥点校.通鉴地理通释.中华书局，2013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中信出版社，201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四、诗文诗话集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7

［清］沈德潜选，闻旭初标点.古诗源.中华书局，2017

［清］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杜文澜辑，周绍良点校.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

［宋］洪兴祖，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15

［三国］曹操等.三曹集.岳麓书社，1992

［三国］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12

［三国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7

［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清］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2018

［晋］陶潜.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7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

［明］高棅编纂，［明］汪宗尼校订，葛景春/胡永杰点校.唐诗品汇.中华书局，2015

［清］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宋］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唐］杨炯，祝尚书笺注.杨炯集笺注.中华书局，2016

［唐］骆宾王，陈熙晋笺注.骆宾王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唐］沈佺期/［唐］宋之问，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17

［唐］孟浩然，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唐］常建，王锡九校注.常建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7

［唐］李颀，王锡九校注.李颀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8

［唐］高适，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

［唐］岑参，廖立笺注.岑参诗笺注.中华书局，2018

［唐］王维，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9

［唐］杜甫，［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

［唐］李白，［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2011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岳麓书社，1997

［唐］白居易，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

［唐］杜牧，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3

［唐］韩愈，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唐］韩愈，［清］方世举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愈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9

［唐］刘禹锡，陶敏/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9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唐］韦应物，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唐］李商隐，冯浩注解.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唐］张籍，徐怀礼/余恕诚整理.张籍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

［唐］李贺，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

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五、今人研究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中华书局，2017

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中华书局，2011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鹭江出版社，2018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鹭江出版社，2019

罗宗强.唐诗小史.中华书局，2019

罗宗强.李杜论略.中华书局，2019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9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8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中华书局，201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

后记

本书的尾声写了长安的废墟。后人看到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地点，如今却已经变成荒草丛生之地，遥想当年的繁华景象，不由得心生感慨。这样的体会部分来自我自己的经历。

1986年，我跟随祖父母离开了云南玉溪的住所，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和一天的汽车，回到了山东，那一年我只有九岁。由于路途遥远，我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回去看一眼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但我想错了。二十年后，我辞去了在上海的程序员工作，开启了属于我的漫游时代，当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童年的住处。于是，我循着残存的记忆，一路打听，来到了那片距离玉溪城区只有七公里的祖父单位旧址。

是的，那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祖父的单位早已离开了那里，搬到了玉溪城内，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空房子。我能够找到祖父的办公楼——那栋楼上了锁，里面传出犬吠声。距离办公楼不远就是住宅区。在我记忆里，当年的住处是宽敞的，但现实中它却只是狭小的三间房，已经没有人居住，被租给了当地人养猪，一头头肥猪在我当年的住处戒备地望着外面的陌生人。

我所上的幼儿园原本是一座庙宇，现在也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功能。我就读的小学变成了工人居住区，因为那儿开了一个不知做什么的工厂，恰好需要安置工人。祖父的整个单位最神秘的所在是一片实验室，

曾经堆满了各地的矿石和化石，现在却成了那家工厂的办公室。

事实上，这些房子和我记忆中的形象都有了区别，许多都已经破旧，有的甚至已经倒塌。在我心里，这里曾经是另一番景象：屋子里住着熟悉的人，食堂里熙熙攘攘，我和小伙伴们在操场上飞奔，或者看一场露天电影。地点没有变，但人都消失了。

在那儿，我不断地搜寻着童年的痕迹，在一根柱子上发现了当年我的涂鸦，在另一面墙上有我写下的字句。二十年后，它们依然还在，这证明我没有找错地方，但我又知道，我再也回不去当年了。

那种再也回不去的感觉将伴随我终生。而我更怀念的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早在1996年年初就双双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大学一年级。从一岁半，我就一直跟随他们生活，直到离开他们去上大学为止。不想，我第一次远离他们只有不到半年，甚至没有等到第一个寒假，他们就不在了。

他们的离开让我意识到，我以前的世界不会再回来了，而我在余生中能做的，只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和教导继续生活下去。那时，我才开始思考他们到底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只有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给了我多大的财富。

在跟随他们生活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教育我不要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思考，压缩心中的物质欲望，用最小的代价去生活，用最大的努力去满足自己的兴趣。直到今天，我的亲人朋友依然为我节俭的生活习惯感到惊讶，仿佛我是闯入这个消费时代的陌生人。还有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每天都像没有明天一样忧心忡忡地去做事，总是试图把进度提前，多做一些。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看过电视，除了偶然知道的几个喜欢的歌星，对现代的演员已经完全陌生。在周围的人看来，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祖父母给我的财富，我将终生感谢他们。是他们教会我，一个人必须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活着，并坚

持到死亡的那一刻。

《盛世的崩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生活”的人的最新作品，它不是第一部，也必然不是最后一部。

在我的规划中，《盛世的崩塌》与另一本书《汴京之围》构成了一组“唐宋盛世双联剧”。这两部书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绚烂的朝代，唐代是因为它的武功，而宋代则是因为它的文治。

在《汴京之围》中，我集中写了北宋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一年的情况，去追寻北宋亡国的原因。而在《盛世的崩塌》中，我考察的则是唐代的开元盛世以及之后的安史之乱。本书写作最大的目的，是想探讨唐代的开元盛世是怎么兴起，又是因何而衰落的。按照我的意图，是想写一部关于这个时段的全记录，让现代的读者体会当年唐人的生活和经历，看到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形成一幅全景画。所记载的人物除了皇帝、宰相、高官、武将之外，还有文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特别是诗人），通过对这些人的描写，我想将盛唐和叛乱全面地展现出来。

但是，任何写作都必须有足够的资料。与宋代的文献相比，唐代由于处于印刷术的早期，书籍的印刷还没有完全普及，导致唐代的文本流传下来的比宋代少得多。另外，与宋代的资料比起来，唐人的记载更加天马行空，往往更具传奇性，却缺乏史实依据，因此，使用起来也必须加倍小心。

这些原因就导致我在写作时只能依赖更少的资料，主要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官方资料。这一点，决定了《盛世的崩塌》不可能像《汴京之围》那样更加细节化。但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它更加注重写全景，并更加注重分析背后的原因。

除了探寻究竟之外，我也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充分的思考，并意识到，一个盛世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和民间达成了一定

的互信，尽量不要互相伤害，这样节省了互相防备的成本，并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促进民间经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而一个盛世的结束，往往源于政府大把地花钱，其中花钱最大的项目往往是战争或者对外关系。如果不知道克制，一味地炫耀盛世武功，往往适得其反，由于财政花费过度，必然通过加税或者让渡中央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就会造成整个政治的失衡，从而导致盛世的崩塌。这个规律不仅对古代社会有效，即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避免战争、克制地选择和平，并通过放松民间管控来改善经济环境，在社会中产生互信的基础，至今依然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看似简单的教条，却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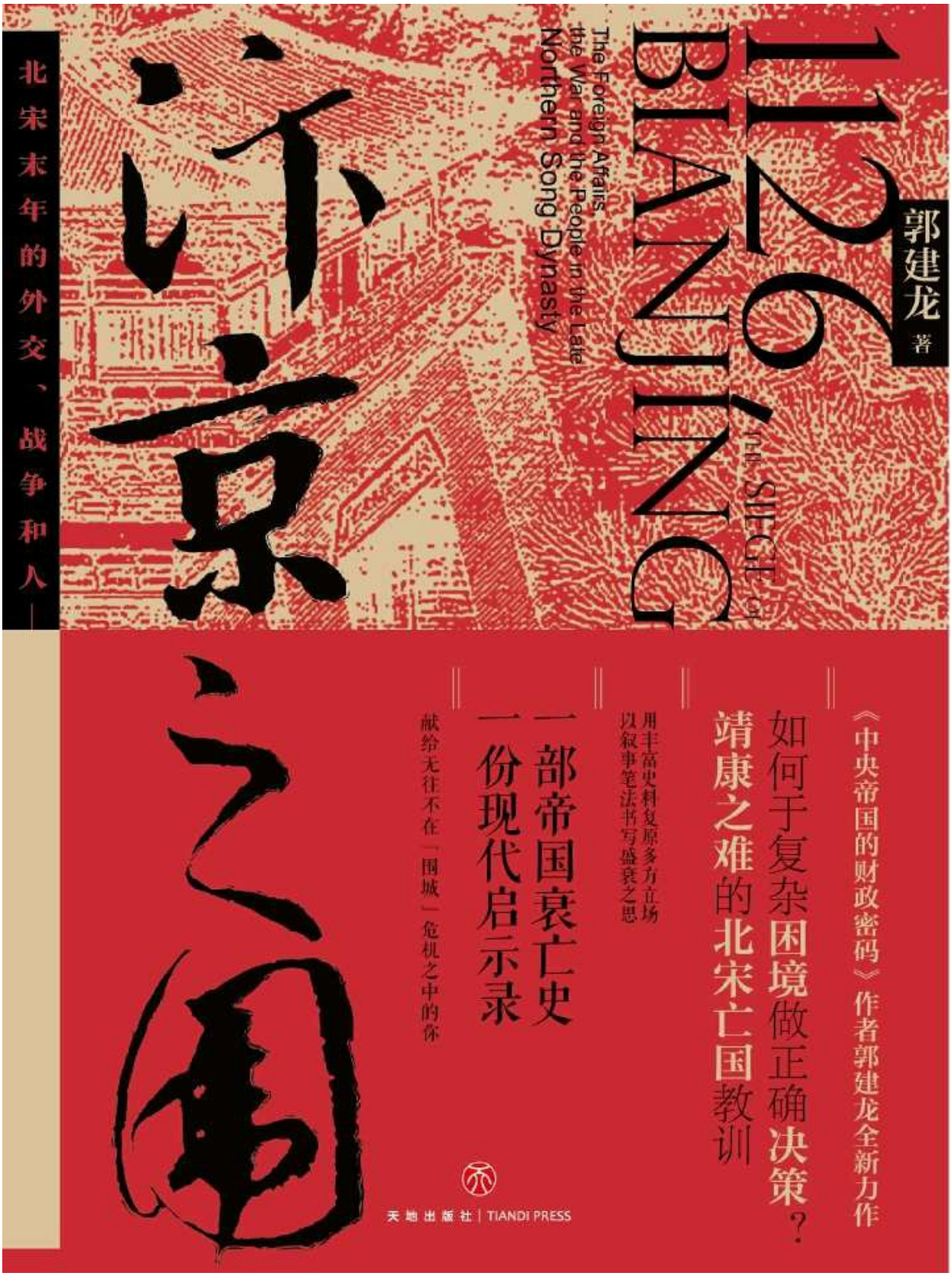
感谢我的编辑团队，董曦阳、张根长、李博、李栋、魏姗姗，以及众多帮助过本书出版的编辑、印制、市场和营销人员。

感谢文学锋、谷重庆、秦旭东、周杭君。

感谢我的妻子梦舞君。

感谢我的祖父母郭宝成和李玉萍。

创作本书时，恰逢新冠肺炎肆虐之时，本书的资料准备于2018年，动笔于2020年春天，草稿2021年2月春节之前完成于大理风吼居。


沦京之围
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BANLING
THE SIEGE OF
The Foreign Affairs, the War and the People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郭建龙 著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郭建龙全新力作
如何于复杂困境做正确决策？
靖康之难的北宋亡国教训
用丰富史料复原多方立场
以叙事笔法书写盛衰之思
一部帝国衰亡史
一份现代启示录
献给无往不在「围城」危机之中的你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ISBN：978754554944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楔子 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三年
第一部 伟大的胜利
第一章 繁荣之后
第二章 北方游牧区：衰老与新兴
第三章 最危险的和约
第四章 各怀鬼胎
第五章 买来的胜利
幕间 另一个版本的收复燕京
第二部 战争与和议
第六章 从和平到战争
第七章 闪击战
第八章 遗患无穷
第九章 战争无厘头
第三部 汴京失陷
第十章 再起波澜
第十一章 战端重启
第十二章 汴京失陷
第十三章 艰难的谈判
第四部靖康之难
第十四章 惊天之变
第十五章 大楚政权
第十六章 战争中的女人
第十七章 撤离
画外音 百姓真的在乎帝王吗？
第十八章 还政赵氏
尾声 消失的艮岳
附录
后记
参考书目

楔子
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三年

在缺乏机械的古代，即便是皇权，在自然面前仍然是渺小的。

在颐和园中，有一块叫作青芝岫的巨大北派太湖石。这块石头长8米，宽2米，高4米，重量大约为30吨，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风摆在乐寿堂前的庭院里。当年，这块石头发现于距离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良乡。如今，一个中型吊车和一辆重卡，可以轻松地将它运送到陆地上的很多地方。

但在并不遥远的清代，还只能利用人力、畜力和简单机械，30吨的重量就成了巨大的负担。最初发现石头的人为了移动它而倾家荡产，只好弃置道旁。乾隆皇帝也是动用了皇权的力量，才将石头移入颐和园中。

但如果是一块更大的石头呢？

比如，大约在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1]，从南方的太湖中就发现了一块巨型太湖石，大约有15米[2]高（约合五层楼），需要近百人手牵手才能将其环绕。凡是见过这块石头的人都会被它巨大的规模惊到，不由自主产生崇拜之情。石头也不是移往几十公里外，而是从太湖到千里之外的北宋首都汴梁（现河南省开封市），当时的人们又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

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作朱勔的人，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能够推断出朱勔是如何做到的。

最好的太湖石是出于太湖水中，保留着水流冲刷的痕迹，这块大石也不例外。当人们潜水发现石头后，会绑上绳索，清掉淤泥，用大船将石头拖出水。但用船拖的办法对小石头都非常不易，更何况是大如居民楼的巨石？

普通的船已经不够用了。根据记载，中国古代淡水中的船只最大载重量为2000石，实际使用载重量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500石，大约折合30吨，只能勉强载得动青芝岫规模的石头，对于更大的则无能为力。[3]

为了移动这块石头，必须建造更大的专用船只才行。

船建造完毕，将石头拖出水，才是运输的第一步。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保护石头。在运输中难免磕碰，但太湖石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身上布满了孔洞，让人们充满了浪漫的遐想。一旦这些孔洞损坏，价值就打了折扣。为了避免损坏，必须首先用胶泥将石头上的孔洞填上，外面再用掺了麻的胶泥敷上厚厚的一层，做成圆圆的球形，放在阳光下晒结实了，才能继续运输。[4]

这么重的石头陆路运输是不可能的，只有继续走水路。接下来，必须用大木头做成滚轮，将石头装船。运输船从太湖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河段，从江南河北上进入长江，从长江岸边的江都（现江苏省扬州市）进入京杭运河的淮扬河段。从运河转入淮河，再顺着淮河的支流泗水北上，到达徐州附近水域。在徐州，石头将开始它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难的旅程。

北宋时期，从徐州到达首都汴梁的河段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小河：汴河。

汴河的历史很长。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值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项羽有一次议和，双方约定以一条叫作鸿沟的小河划定边界。鸿沟其实是一条人工运河，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由魏国开凿。魏国的首都在大梁，也就是后来的开封（汴梁），魏国通过开凿鸿沟，将黄河的水引到首都，再向南汇入淮河。另外，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早就有一条春秋时期吴国开凿的运河邗沟（后来成为隋代大运河的淮扬河段），鸿沟—淮河—邗沟就沟通了长江和黄河，而汴梁（大梁、开封）就成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著名城市。

鸿沟经过千年的演化和修整，到了北宋就成了汴河。北宋时期，汴河的流向是从荥阳附近的黄河将水引入，经过首都汴梁，再向东汇入泗水，通过泗水的自然河道进入淮河。[5]

汴河是宋代交通的大动脉，承运了绝大部分供应朝廷的粮食（漕粮），占全国总运力的80%以上。[6]由于漕粮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承担着养官和养兵的重任，汴河也就成了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

北宋著名文学家沈括的哥哥、龙图阁直学士沈文通曾经作过一首诗，反映朝廷对东南漕粮的依赖："漕舟上太仓，一钟且千金。太仓无陈积，漕舟来无极。畿兵已十万，三垂戍更多。庙堂方济师，将奈东南何？"[7]

虽然汴河运力如此重要，可这条河流却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水太浅了，许多河段只有不足两米深，宽不过十几米。[8]站在运河边，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条小河沟竟然是整个中央帝国的经济命脉。

不仅水浅，由于冬天黄河结冰，运河失去了水源，所以只能在春天之后使用。在汴河中运送漕粮的船也很难借助水力航行，许多时候只能靠纤夫拉船——在运河两侧都设有专门的纤道，禁止人们占用。这对于船的载重量更是巨大的限制。

更麻烦的是，运河上有许多桥梁。大部分是传统的平桥，桥洞非常

低。除了平桥之外，汴河上还有不少拱桥。北宋发明了另一种不需要桥墩的桥——虹桥，如同一座彩虹从此岸飞到彼岸。拱桥和虹桥比起平桥来，可以通行更大的船只。

但即便是虹桥和拱桥，拱高最多也只有十几米。比如，著名的赵州桥拱高只有7.23米。建于明代的杭州拱宸桥，已经算古代最高的桥之一，其桥高也只有16米。桥这么高，还得益于河足够宽，如果河很窄，那么桥洞将只有几米高。[9]

汴河上的桥大都只能允许不大的漕船通过，装载巨石的特殊船如同是一个庞然大物，能够挤进小小的汴河已经不易，更别提通过这些桥了。

除了桥之外，汴河还经常从城市中通过。北宋时期的许多城市都有水道，让河流穿城而过，在城墙上专门开有水门供船只通过。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送城内的物资。

但城市的水门也往往只有几米高，依然无法通过巨石。

到底怎样才能保证石头的运输呢？这一点并没有难倒朱勔，他可以动用整个中央帝国的人力、物力来保证任务完成。

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船太重、汴河狭窄，朱勔动用了数千民夫在岸上拉纤。经过桥梁时，将桥梁拆除，到了城市的水门，将水门上的城墙扒开豁口，保证船通过。[10]

几个月后，这块巨大的太湖石终于在“百折不挠”的精神下被运到了北宋首都汴梁。

当时的汴梁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帝宫城（也叫大内）。内城在外城的中央，而大内又在内城的中央。汴河从外城穿城而过，经过两个水门，分别是西水门和东水门。从西水门到东水门外七里的地方，一共有十三座桥梁，其中有三座桥是虹桥，可以通船，其余的都是平桥，无法

通船。[11]因此，到了汴梁城外，必须从船上卸下巨石，依靠畜力运送进入首都。

石头进入首都时，恰逢北宋首都汴梁的一个建设高峰期。在位的皇帝宋徽宗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大内本来是皇帝的宫殿和帝国官僚的办公区，但宋徽宗却总感觉大内不够用，于是开始大面积挤占内城的区域。

宋徽宗对于建筑的喜爱与道教有关。他刚即位时缺乏男性继承人，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告诉他，这是因为京城东北角太低了，需要稍微垫高一点。宋徽宗照着做了之后，突然间男丁兴旺起来。这片垫高的地方，就成了一片皇家园林。[12]从此以后，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加上他本人对建筑的喜爱，建设规模也越来越大。

八年前的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在大内正北方，内城之内，落成了一个大型的宫殿群延福宫。[13]在建设这个宫殿群时，宋徽宗采取了竞争性做法，让五位宦官[14]同时负责建造，他们互不隶属，争先恐后地尽一切努力叠山垒石，将延福宫打造成了人间仙境。

延福宫落成后，宋徽宗对宫殿的需求更大了，于是继续扩大建设，将另一个宫殿群上清宝箓宫与延福宫打通，扩建京城、修缮诸王府邸。[15]

到了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徽宗最野心勃勃的工程终于上马了，这个工程叫作艮岳。[16]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艮岳建成，它立刻成了中国皇家园林的最高峰。即便后来的颐和园、圆明园等虽在规模上取胜，但艮岳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质和精雕细琢的用心，仍然是无法超越的。

艮岳原名万寿山，在内城的东北角，北宋汴梁人口稠密，但内城的东北区域却清理出了一片周长十余里的区域。区域的中心是几座人工的小山，山上怪石林立、古树参天，亭台楼阁移步换景，珍禽异兽前所未

闻，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精心打造的，堆满了从全国各地运送来的珍贵观赏石材。

朱勔运送来的那块巨石移入园区后，被放在水中浸泡，将土皮泡掉，露出本来的面貌，在巨大的孔洞中还专门放了雄黄和炉甘石，因为雄黄可以将蛇蝎驱走，而到了阴天时，炉甘石可以制造出云雾缭绕的效果。[17]

石头立刻成了艮岳园林的中心，它被放在山丛中的一片平地上，皇帝甚至专门给石头修建了一座亭子。大石如同一个巨大的君王在睥睨着世界，周围还有上百块小一些的石头，如同臣子一般围绕着它。

园林之中除了石头之外还有许多古树。宋代人最喜爱的树种之一是桧树，园子里最著名的两棵桧树就在大石旁边：一棵高耸，所以叫“朝日升龙”；另一棵横卧，叫“卧云伏龙”。[18]这也是朱勔帮助皇帝从外地运来的，其中一棵可能来自浙江。

现在浙江海宁著名的安国寺（宋时属于盐官县）内，宋代时曾经有两棵桧树，是唐代出使西域的高僧悟空大师栽种的。朱勔打听到这两棵树之后，经过察看制订了移植方案，他决定那棵大一些的树用海路运输，小一点的走河运。不幸的是，走海运的大树由于遭遇风浪，和船一起沉没了，只有小一点的到了京师。[19]

巨石旁的两棵树都挂了用玉做成的牌子，牌子上的字是用金填的。至于大石头，待遇比两棵树更高，皇帝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昭功敷庆神运石”。皇帝还不满意，又给它封了个爵位，号称“盘固侯”。[20]

石头封了侯，皇帝也没忘记送石头的人。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六月，皇帝正式给朱勔加官晋爵。朱勔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史。[21]宋代的节度使已经不像唐代那样是独霸一方的诸侯，却也是只有有功之人才能获封的大吏，一个人因为运送石头而被封节度使总有些

说不过去，但皇帝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刚刚灭掉了辽国，将燕云十六州中最重要的城市幽州（即燕山一带，现在的北京）还给了北宋，皇帝借口朱勔参与了收复幽州的行动，所以封官。

不仅朱勔被封官，就连他的子孙也都有封赏。他的几个儿子里，汝贤封为庆阳军承宣使，汝功封静江军承宣使，汝翼封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汝州封明州观察使，汝楫封华州观察使，汝明封荥州刺史，儿子汝文和弟弟朱绩封阎门宣赞舍人，就连孙子辈都受到了封赏，分别封为阎

门宣赞舍人或者阎门祗候。一家人大大小小全是官，这在流行荫庇制度的宋代也都属于少有。[22]

巨石获封盘固侯时，恰好是北宋疆域最大之时，在当时被鼓吹为盛世。与其他朝代不同，北宋的北方边境上，由于被辽国（契丹）占去了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稳固的边境线，各位皇帝都耿耿于怀，却由于军队战斗力不强而不敢发动战争。但这一年，宋徽宗却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收复了燕山以南的幽州，达到了王朝边境的极致。

宋徽宗叫这块石头“神运石”，也反映了皇帝对于老天眷顾的感激之情，与收复幽州的运气相比，拆掉了多少桥梁，毁掉了多少城墙，都是不重要的。

宣和五年的北宋也是一片盛世，歌舞升平，人民仍然生活在一片灯红酒绿之中，军队和官僚沉浸在收复幽州的狂热里，皇帝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接受着恭维。

宰相蔡京将社会的繁荣概括成了一个词：丰亨豫大，用来形容北宋末年的盛世景象。[23]他说的并没有错，即便南方因为朱勔、蔡京、童贯等人的压榨出现了一些反抗[24]，但整个北宋社会仍然是繁荣的。汴梁朱雀门外的夜市还是那么发达，大相国寺的市场一如既往车水马龙，大内皇宫外不远处，就是妓女扎堆的鸡儿巷。从官员到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一片和乐之中，仿佛这样的盛世还会持续万年，没有危机，没有贫

穷，有的只是欢乐与舒适。

然而，这种盛世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给石头封官加爵之年，已经是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此时，距离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已经不满四年（实际上只有三年半）。

当帝国一百多年的敌人辽国消失时，北宋的君臣拍手相庆，在他们看来，敌人的消失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辽国消失后，刚刚兴起的女真人占据了北方。这个民族与相对更文明的契丹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也不需重视，由于北方太贫穷，他们仰仗着北宋每年的“岁赐”苟且活着。

但三年后，出乎所有人意料，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女真政权利用斩首行动攻陷了汴梁，一切戛然而止，北宋灭亡了。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时间。

那么，在这三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盛世瞬间灭亡呢？那些庆祝盛世的官僚和百姓又是如何面对茫茫的未知？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这短短的历史一瞬，寻找背后的历史细节，剖析可能指导当下的经验与教训……

【注释】

[1] 本书中的年份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公历年份，以汉语数字标识皇帝纪年。月份和日期大都是阴历，故用汉语数字标识，个别已经换算成公历的日期改用阿拉伯数字。

[2] 僧祖秀《华阳宫记》：“独神运峰广百围，高六仞，锡爵磐固侯。”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刃，宋尺约31厘米。另据《宋史·朱勔传》：“尝得太湖石，高四丈。”后者比前者的数值稍小。亦有资料记载其为五丈。此处取平均数，大约为15米。

[3] 《天工开物·舟车》：“粮船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采巨木楠为上，栗次之。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头阔六尺，底梢阔五尺，头伏狮阔八尺，梢伏狮阔七尺，梁头一十四座。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使风梁阔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深四尺五寸。两廒共阔七尺六寸。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交兑每只止足五百石）。”

[4]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远必有损折之虑。近闻汴

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胶泥实填众窍，其外复以麻筋、杂泥固济之，令圆混，日晒，极坚实，始用大木为车，致放舟中。’直俟抵京，然后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

[5] 《宋史·河渠志三·汴河上》：“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

[6] 《宋史·河渠志三·汴河上》：“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7] 沈文通《漕舟》，引自《宋文鉴》卷十八。

[8] 《宋史·河渠志三·汴河上》：“（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

[9] 其余有据可查的桥包括：古月桥、广济桥、通济桥、通圣桥、卢沟桥和单桥。其中，古月桥拱高4.95米，全长31.2米，宽4.5米，属石质虹桥，位于现今浙江义乌，始建于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广济桥、通济桥和通圣桥拱高分别为5米、4米和5.5米，均为位于现今江苏省东台县的宋代古桥；卢沟桥高10米左右，位于现今北京市丰台区；单桥高12米，位于现今河北沧州。

[10] 《宋史·朱勔传》：“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

[11] 参考《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

[12] 关于这段传说，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见《汴京遗迹志》）记载，道士指出需要加高的地方在内城的东北角，这里后来建立了万岁山，也就是艮岳。而根据《宋史纪事本末·道教之崇》记载，加高的地方在内城的西北角，宋徽宗在这里建立了上清宝箓宫，而艮岳在此宫的东方。考虑到汴梁的地形，第一种说法可能更接近真相，故采用。

[1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四年》。

[14] 指童贯、杨戩、贾详、何诉和蓝从熙，号称“延福五位”。

[1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六年》。

[1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七年》。

[17]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

[18] 参考《汴京遗迹志·卷四·山岳》。

[19] 方勺《泊宅编·卷三》。

[20] 参考《汴京遗迹志·卷四·山岳》。

[2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五年》。

[22] 参考《墨庄漫录》。

[23] 参考《宋史·蔡京传》。

[24] 这里主要指的是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的方腊起义。

第一部 伟大的胜利

第一章

繁荣之后

四十二年不识兵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仁宗逝世，入葬永昭陵。[1]

不知多久之后，在永昭陵的墙上，有无名氏题写了一首诗：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2]

这首诗刻画出了中国帝制史上的高峰。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从表面看，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加上性格有些优柔寡断，大事自己不做主，而是交给宰执们去处理，为人低调到好像不是一个皇帝。[3]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诗酒流连、浅斟低唱，不以武功闻名。所以诗中说“边将无功吏不能”。

但就在这碌碌无为中，中国社会繁荣的时代却悄然来临。由于民间

受到的干扰最少，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舒适，老百姓不用担心自己受穷，更不用担心来自官府的骚扰。而官员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了话而掉头，即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仁宗朝由此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之一。

仁宗死时，整个都城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男女老幼哭成一片。据当时七岁的邵伯温回忆，当死讯传到西京洛阳，城中军民妇孺，都向着东方号泣，烧纸的烟尘遮住了太阳的光辉。[4]有人从汴京带来消息，说整个京师自发罢市悼念，数日不绝，乞丐小儿都在大内前，边哭边烧纸钱。有人在去往四川路过的深山里，竟然看到路边汲水的女人也拿着白纸哭泣。

这些人之所以痛哭，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在怀念一个时代。

中国皇帝在死后会被追赠一个谥号，表明后世对他的评价，之前“好”皇帝流行的谥号是“文”“武”“明”“章”等。到了宋仁宗，对他心怀感激的大臣们却想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谥号，以表明他的特殊性，于是提出了“仁”字，所谓“为人君，止于仁”[5]，一个“仁”字，表明了一个时代的宽宏大度。宋仁宗之后，各个朝代才出现了各自的“仁宗”[6]，但更多只是照葫芦画瓢，谥号一致，却缺乏了他的实质：宽容和不干扰民间。

不仅宋仁宗，整个宋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宽容时代。唐代的太宗纳谏带着很强的装模作样的痕迹，事实上，唐代宫廷和大臣之间内斗频繁，常常要置人于死地。宋代的皇帝却并不是装的，从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帝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仁慈的基因。

宋太祖称帝三年后，就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层小间里立了一块碑，每年皇帝祭祀太庙，或者新皇帝登基，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带领皇帝入内，对着石碑焚香、拜祭、默诵，将其中的嘱托牢牢记住。直到北宋灭亡，这石碑上的文字才流传了出来。石碑上只有简单的三条文字。

由于北宋继承了后周柴氏的江山，第一条内容是关于柴氏的，要求北宋皇帝不得对柴氏子孙用刑。就算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赐他自尽，不能公开处刑，也不准株连家属。

第二条是针对官员和读书人的，要求后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提意见的人。

第三条表示如果有人违背了前两条，就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7]

宋太祖以身作则，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他的作风不仅影响了后代，也影响了宋代的群臣。比如，以军纪严明著称的大将郭进曾经担任西山巡检，负责进攻位于现在山西的地方政权北汉，曾经有人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不仅不相信，还把诬告者绑起来交给郭进处理。

郭进也没有杀这个人，而是留他在军中。直到有一次与北汉作战，郭进把这人叫来，告诉他：这次派你去打仗，如果你打败了，就干脆投降北汉吧；如果打赢了，我上奏皇帝给你加官。这人非常感动，誓死力战，得胜而还。[8]

有宋太祖的榜样在先，北宋的皇帝们大都遵循了祖训，不随便杀人，尽量不干扰民间，这种作风持续了上百年，到宋仁宗时期达到了高峰。

宋仁宗不仅对大臣和人民仁慈，即便对敌国，同样保持着谦让的作风。仁宗驾崩后，他的死讯传到了辽国，使者报信的一路上，老百姓无不聚在一起哭泣，辽国在位的皇帝是辽道宗，当他听到了消息，也大哭着抓住使者的手感慨说："四十二年不识兵矣！"[9]

辽国感谢宋仁宗也是有道理的。宋仁宗时代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有的战争还打得很窝囊。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这一年，西夏人李元昊自称皇帝，随后双方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小小的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接

连击败宋军取得大捷，最后宋仁宗只好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西夏向宋称臣。宋朝通过赎买的方式让西夏给了个面子。[10]

在宋夏战争时，辽国也趁火打劫，以军事相威胁，希望从北宋获得好处。宋仁宗为了避免打仗，派大臣富弼去谈判，富弼不辱使命，经过谈判，以较优惠的条件达成了和解。[11]之前，北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是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次又增加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双方的和平。

富弼归来后，宋仁宗想重重地赏赐他，但富弼谢绝了，表示自己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不敢要求赏赐，只希望能够避过未来的指责。但宋仁宗还是很高兴，授予他资政殿学士。[12]

果然不久后，有人就向皇帝上书：“富弼没有功，反而有罪。”宋仁宗不仅听不进去，还说只要能避免战争，有利于人民，不敢爱惜财物。

对方反问：“难道财物不是来自人民吗？”

仁宗表示：“财物的确来自人民，但这些财物不是一日取来，也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困顿，而战争不管输赢，却可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方继续反问：“这样会造成辽国的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要你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

仁宗回答：“如果对社稷有利，我怎么敢爱惜一个女儿？”[13]

事实证明，辽国并没有贪得无厌，在新增了岁币之后，双方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才有辽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识兵矣”。[14]

盛世下的隐患

当北宋君臣试图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榜样时，事实上，仁宗时代的繁华背后，许多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在未来可能成为政权和社会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三冗”问题。由于宋太祖是靠政变上台，对政变推翻的后周政权一直很优待，不仅没有随便杀害后周的宗室、官员，反而让他们继续当官发财。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性，北宋一直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加上要养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国家财政一直不够用。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统称。

在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时期，士兵大约为91.2万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9 785人。到了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125.9万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15 443人。到了仁宗的继承人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与裁员，士兵人数终于降了下来，为116.2万人，但是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3/10。[15]

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四项收入的27%、85%、86%和84%。[16]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专卖制度也更加发达。[17]只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税之外，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民间的发达掩盖了较高的税收。

宋代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的原因同样与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关。为了避免军阀坐大，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约地方的三个方法：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18]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许多副属性的监管措施，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

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19]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官僚体系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但是，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唐代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就耕地养活自己。而宋代采纳募兵制，招募而来的都是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要中央政府发工资的。[20]

募兵制的缺点是养兵成本大，优点则是军事素质更强。可是，由于宋太祖设立了复杂的调兵规则，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军上了战场还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没有忠诚度。结果，虽然采取了花费巨大的募兵制，但战斗力反而比府兵制还低，打仗总是吃败仗。

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两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梦。宋仁宗一生受人称颂，唯独在战场上被小小的西夏打败，成了毕生的污点。

“三冗”问题与军事问题，也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久而久之，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宋代的官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保守派。这一派认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都在于北宋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皇帝过于重视实务经验，但对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军民离心。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统一起来。

另一派可以称为实务派。这一派强调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订策略。比如，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就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战斗力不强是军事问题，就考虑如何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减少指挥层级，落实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忠诚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宁缺毋滥。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在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中，充斥着道德说教。[21]《资治通鉴》将王朝兴衰的主线与皇帝的道德感强弱密切关联起来，皇帝有德，社会就繁荣，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时候。这样的划分在现代来看，显得有些荒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来，却是真理。

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

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时期，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除了“二程”这样的死硬派，大多数人其实是兼而有之。比如，名臣欧阳修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即便范仲淹，也同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只是他不光强调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实务对政权的影响。

与西夏战争战败后，为了解决财政花费巨大，但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宋仁宗决定进行一次改革。他选中的改革者就是实务派的范仲淹。

针对皇帝的要求，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22]

简单说，中国历代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的不匹配，收入少，花费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减少花费，要么增加收入。由此可以划分成两类改革：一类是以减少财政花费为主的改革，另一类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改革。

减少花费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的总产出是一定的，政府如果收多了，那么民间留存的财富就会减少，所以必须抑制政府多收税的冲动，减少冗官冗员，减少财政花费。

增加收入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政府积极的手段，可以将整个社会财富的饼做大一点，这样政府的收入也增加，民间财富也增加。

范仲淹不相信政府能够把饼做大，他的十项措施暗含着这样的看法：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收税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考虑问题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取收入，而只应该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第三，解决政府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解决政府的快速膨胀问题，把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所以，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要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宋仁宗同意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但在执行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23]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们佩服不已。特别是这个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言论触怒权贵，被放逐了很多年，他此次上台是深得人心的。范仲淹接受重任后，较为正直的官员富弼、韩琦等人也随即受到重用，与范仲淹一起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对他们的政策报以极大的掌声。

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执行。但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24]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宋代的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尽量集中交给改革派，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范仲淹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肯于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主动申请外调，改革不了了之。

范仲淹的改革是宋仁宗时期最后的机会。他本人是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是保守派和实务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一旦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从实务派中就分离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小派别。

宋仁宗后期，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已经变成了是否需要改革。在这之前，即便保守派也认定需要改革，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派认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就已经完美了，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实务派却看到了社会的问题，赞同改革。

但在实务派内部，又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认同减少财政花费的改革，以范仲淹为代表，这一派系可以称为温和实务派。范仲淹失败后，另一个更加认同增加财政收入的派系在逐渐形成，这一派可以称为强硬实务派。

宋仁宗去世时，北宋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强硬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在保守派一方，得势的也是强硬保守派。两派的中间力量都逐渐失势，北宋的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

商王世系与党争

由于仁宗没有儿子，他指定宗室子弟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皇位继承人。[25]宋仁宗有个叔叔（即他父亲宋真宗的弟弟）叫赵元份，封为商王。赵元份的第十三个儿子叫赵允让，封为江宁节度使。赵曙就是赵允让的儿子，被仁宗收为养子。从这时开始直到灭亡，北宋的皇帝世系就从真宗一系转到了商王一系手中。

赵曙（后世称他为英宗）是一个过渡性的守成的皇帝，对于养父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的修改，仍然重用仁宗时代的大臣。英宗担任皇帝不

满四年就去世了，将宋朝江山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日后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要出名得多，他就是以改革著称的宋神宗。

宋神宗出生在仁宗盛治期间，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子弟，突然间被提到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又幸运地在十九岁时就当了皇帝。在历史上，老人往往更加具有守成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比改变重要的是首先要保持这个时代的延续；年轻人却总是喜欢变革，神宗将自己处的时代视为理所当然，他看到的不是成就，而是问题，希望通过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26]

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激进实务派王安石来实现他的改革梦想。

与范仲淹的改革不同，王安石改革对减少政府花费毫无兴趣，而且强调由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指导民间经济，在政府的努力下，将经济做大。他认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是政府也可以多收租税，而民间也更加富裕。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27]

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他的改革措施大都以失败告终。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

英宗时期，仍然沿用了仁宗留下来的大批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带有温和的改良思想，又带着一点保守精神。他们即便赞同改革，也是希望减税和减少管制。当王安石采纳了大政府的行动时，官员们普遍反对。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必须依靠另一批人，他强烈地排挤前仁宗朝官员，打压异己，将一群年轻的官僚送上了最高官员的职位。

不幸的是，这批官员大都缺乏有力的道德支撑，他们唯一的兴趣是攫取权力，这使得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一次大换血。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官场上有一批历史名臣，如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等，他们全都被排挤走，换

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几位权臣，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这些权臣后来被称为新党，他们把新党之外的人，不管是极端保守派、温和保守派，还是温和实务派都叫作旧党。

这次换血，让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更麻烦的是由此出现的党争。为了和新党（极端实务派）对抗，在原来的老官员中崛起了一支最保守的力量，原本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实务派彻底靠边站。这支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

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掌了权。如果说王安石是不遗余力地排挤旧党，那么司马光就是不问是非地摒除新党。当双方都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只是以党派站队时，北宋的官场彻底走向了衰落。

新党和旧党的争执还表现在了对外战争上。仁宗和英宗时代，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主导了对西夏的用兵，最终虽花费巨大，却徒劳无功收场。

这次用兵还导致了新旧党在军事上的分歧。从此以后，新党大都是主战派，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换取功名；旧党大都是主和派，即便面对敌人的入侵，也希望采取不抵抗政策换取和平。

这两派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北宋后期的军事路线。北宋后期，常常由主战派主持政局。在和平时代最大的智慧是如何避免战争，但这个智慧是主战派没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试图把和平的国家拉入到战争轨道，并导致了与北方的冲突。

可一旦战争爆发，北宋的军队总是无法获胜。一两个败仗之后，主战派下台，换成了主和派。不幸的是，当主和派上台时，却往往是战争的硝烟已经升起，必须依靠军队去保卫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时，最大的智慧是如何全面调动军事力量打胜仗，可这个智慧是主和派缺乏的，他们不仅不加强防御，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拖前方将士的后腿，造成军队更加被动。

对于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原则都应该是：不轻易言战，战则必死战。但北宋却正好相反，最需要和平时主政的是鹰派；最需要抵抗时，在台上的却是鸽派；这种错位让北宋无力应付一场全局性冲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后，北宋的政局在新旧党之间震荡。继位的宋哲宗没有亲政时，主政的是宋英宗的皇后高氏，高太后贬斥了新党，重用旧党的司马光。司马光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新党。

不想八年后的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亲政的宋哲宗立刻想起了父亲当年的理想，将新党人物纷纷召回，将旧党贬斥。新党的章惇、曾布等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政治中心，将旧党名单搜罗了一下，全部贬官。[28]在党争的背景下，北宋的政治局势已经失控。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没有活着的儿子，只好让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初年，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政。向太后支持的是旧党，于是北宋的官场再次大换班，章惇等新党被贬斥，旧党回归。

但宋徽宗从心里更加认同他的父亲宋神宗。宋徽宗继位不到一年，向太后死了，徽宗立刻掉转马头，继续重用新党。此时，新党逐渐被一个叫作蔡京的人所把持，他成了宋徽宗最倚重的大臣。[29]

为什么新党在屡次被贬之后，还总是能够回到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新党旧党已经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了。

在斗争中，旧党已经极端化成一群道德狂人，极度缺乏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新党却已经进化成一群理财专家，能够用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找钱。

徽宗的父亲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在改制后的几

年增加了，还比改制前增加了很多。[30]到了徽宗时期，在短短的20年里，官员数目比元祐时期又增加了数倍。[31]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人，[32]比起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33]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时，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奢侈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位高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声色犬马，全都涉猎。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建筑和园林专家，建设了不少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珍稀的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统称为花石纲）。他的任何一个小爱好都足以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当这么多的爱好聚集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国家也难以承受了。

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与宋徽宗的胃口匹配。于是，皇帝越来越陷入对蔡京的宠爱无法自拔，至于旧党的道德楷模们，由于没有实务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总是给皇帝制造麻烦。

崇宁三年（从公元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开支。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成熟，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钞票使用。

所谓交子，就是以金属货币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每一张交子背后，都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理论上，一贯交子可以随时兑换一贯金属货币。

所谓盐引，是以盐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理论上，每石盐引也可以随时兑换一石盐。

在蔡京之前，交子只在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他扩大了交

子和盐引的使用范围，将之变成全国发行，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这时的交子和盐引已经无法兑换对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和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蔡京的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民间的怨声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于是宋徽宗采取了一个历代王朝都会的方法：利用对外矛盾来化解民意，将人民的不满从国内引到国外去。

在宋代，整个社会的心中有一道伤疤迟迟不能愈合，那就是北方的辽国。不管是历代皇帝还是平民百姓，都记得契丹占据了汉人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经过了上百年的和平，当年英勇的契丹国家也已经到了衰落期，于是，一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策划在宋徽宗的主导下上演了……

【注释】

[1] 参考《宋史·仁宗纪》。

[2] 参考《能改斋漫录》。

[3] 参考《后山谈丛》。

[4] 参考《邵氏闻见录》。

[5] 《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6] 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帝）、清仁宗颙琰（嘉庆帝）。

[7] 参考《避暑录话》。

[8] 参考《涑水纪闻》。

[9] 参考《后山谈丛》。

[10] 参考《宋史·夏国传》和《西夏书》。

[11] 参考《宋史·富弼传》。

[12]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疏》，见《宋文鉴》卷四十五。

[13] 参考《东轩笔录》。

[14] 有人传说辽道宗做太子时，曾经混在使节之中来过北宋首都汴京，宋仁宗知道他来了，不仅没有扣押他，反而善待他，带着他游览大内，甚至见过皇后。直到太子快离开时，仁宗才向太子交心："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后要时时记住我们的友谊，爱护老百姓。"见《邵氏闻见录》。

[15] 参考《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16] 蔡襄《论兵十事》，《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四项收入的具体数据为：钱36 822 541贯，绢帛8 745 535匹，粮26 943 575石，草29 396 113束。四项军事开支的具体数据为：钱9 940 147贯，绢帛7 422 768匹，粮23 170 223石，草24 980 464束。

[17] 关于宋代财政，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8] 参考《宋史·赵普传》。

[19] 参考《宋史·职官志》。

[20] 参考《宋史·兵志》。

[21] 参考《宋史·司马光传》和《资治通鉴》。

[22] 参考《宋史·范仲淹传》。这十项改革纲领，出自范仲淹的奏章《答手诏条陈十事》。

[23] 《宋史·范仲淹传》："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24]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25] 参考《宋史·英宗纪》。

[26] 参考《宋史·仁宗纪》。

[27] 参考《宋史·王安石传》。

[28]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绍述》。

[2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

[30] 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相差三十几年）的官员情况做了对比——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

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遍举也。

[31] 《宋史·食货志下一》："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32] 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馀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馀员。"《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政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

[33] 《宋史·食货志下一》："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馀仰朝廷应付。'"

第二章
北方游牧区：衰老与新兴

最成功的盟约

后晋出帝开运四年（公元947年）正月初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迁的君主正在收拾行装，开始他的动荡人生。[1]

这时，恰逢契丹大举南下，灭了五代的后晋王朝，后晋少帝石重贵（后世称他晋出帝）被辽国剥夺了皇帝称号，封为负义侯。

辽国太宗耶律德光下令，石重贵和他的家族、后宫必须北上，离开汉人的土地。与他同行的有皇后冯氏、弟弟石重睿、儿子石延煦和石延宝，以及宫女五十人、宦官三十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官四人、厨师七人、茶酒司三人、仪鸾司三人、六军士二十人。后晋大臣中，赵莹、冯玉、李彦韬等人也跟随。

在跟随者中，还有一个人，即少帝的母亲——皇太后李氏。辽太宗考虑到山高路远，李氏年纪大了，本想把她留在汉地，但李氏拒绝了好意，要和儿子一同启程。

在游牧民族中，一个部落被征服后，部落首领就会被胜利者带走。带走他们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消除未来的抵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虐待。

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被带走的人只是换个地方生活。他们仍然被认为是血统高贵的人，甚至可以与胜利者家族通婚，在新地方还能担任高官，只是不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部落罢了。

契丹对于晋出帝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们上路后，经过数月的跋涉，经过幽州（现北京）向东，从现在的山海关附近北上，到达黄龙府（现吉林省农安县）。于黄龙府西北方的怀密州短暂停留之后，就被送到了南方的辽阳，那里是辽国气候最好的地方，也是辽国五京之中的东京。

契丹人还企图与晋出帝进行皇族联姻，辽世宗耶律兀欲的妻兄禅奴舍利看上了晋出帝的女儿，向晋出帝提亲。这在游牧民族中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汉人却总是看低游牧民族，认为这会污染自己纯洁的血液，晋出帝拒绝了。但辽世宗仍然强行征召了这位女子，送给了禅奴舍利。

中国皇族的血统就这样融入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中，也可以作为一百多年后更大规模事件的预演。

事实上，辽国到了五代时期，已经不算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政权，它已经被汉化了。在五代的后唐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采取了汉人的生活方式。但此时的契丹人还保持着对汉民族的警惕性，担心汉民族的软弱侵蚀了契丹人的善战基因。

一位后唐的使者姚坤曾经访问过契丹，当时恰好后唐发生了内乱，后唐庄宗在内乱中死去。阿保机感慨庄宗之死，表示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听说庄宗有宫婢两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庄宗死后，阿保机立刻全家戒酒，把鹰犬都放走，乐官遣散，避免陷入庄宗的局面。[2]

汉民族幸运的是，契丹不管如何防范，仍然是游牧民族中最温和的一支。

后晋是石重贵的养父石敬瑭所建。石敬瑭曾经是后唐大将。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由于后唐皇帝不信任他，石敬瑭向契丹求救，希望契丹帮助他对抗后唐。

辽太宗耶律德光立刻派遣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大军前来帮助。[3]

契丹大军从太行山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地界）一路南下，但到了上党（现山西长治附近）之后，契丹军队就不再前进了，辽太宗对石敬瑭说："我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帮助你，现在大功告成了。如果契丹军队继续南下，会让黄河以南的人民感到恐慌。你就自己率军南下吧。如果你怕自己应付不了战局，我会派五千骑兵把你送到黄河，至于是否让他们渡河，都随你了。一旦你进入洛阳，我就立刻撤军北返。"他又赠送给石敬瑭二十匹宝马和一千二百匹战马，发誓子子孙孙勿相忘。他还提醒石敬瑭不要辜负了功臣。

此刻的契丹表现得彬彬有礼，比起中原的一团乱局，仿佛是一股清流。

但契丹在帮助石敬瑭的过程中，也享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为了让契丹出兵，石敬瑭将卢龙道（也就是幽州地区）和山西的雁门关以北都割让给了契丹。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以臣礼见契丹皇帝，称他为父亲。

辽太宗免掉了石敬瑭的臣礼[4]，但进贡与土地却笑纳了。

归入契丹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的幽州地区，以及太行山以西和雁门关以北的云州地区。幽州地区的州县有幽州、蓟州、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顺州，由于位于燕山以南，又称"山前诸州"。雁门关以北的州有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和蔚州，这些州又称为"山后诸州"。两地加起来一共十六州，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来历。[5]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十六州，特别是山前诸州，成了后来南方王朝的心病。

在中国华北地区有一条天然的防线叫燕山山脉，北方的游牧民族过了燕山，就一马平川可以直达中原腹地。所以历代王朝都把边界设在了幽州以北的燕山山脉。石敬瑭丢掉了山前诸州，意味着燕山已经成了契

丹的境内山，契丹兵马从幽州出发，不经过任何险阻，就可以进攻南方王朝。

除了这十六州之外，在燕山以南还有营州（现河北昌黎）、平州（现河北卢龙）、滦州（现河北滦县），这三州是后唐同光初年（公元923年）契丹从幽州军阀刘守光手中夺取的。[6]三州靠近渤海，与山海关相邻，位置也很重要。后来后唐灭掉了刘守光，夺得了幽州，却没有从契丹手中拿回营平滦三州。

当契丹获得了十六州之后，营平滦三州和十六州共同构成了辽国侵占的汉地疆土。但由于来源不同，到了宋金交涉时代，还引起了不小的外交纷争。

契丹和后晋最初各自遵守了约定，但当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决定抛弃父辈的约定时，契丹大举入侵，后晋灭亡。

灭了后晋之后，由于契丹无法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在各地的反抗声中不得不退回北方的十六州界内。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经过了后汉，进入了后周时期。雄心勃勃的周世宗意图组织北伐[7]，收复十六州，后周的军队向北收复了最南面的瀛洲和莫州[8]，但就在这时，周世宗死了。他死后，后周被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推翻，历史就进入了北宋时代。

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契丹与北宋维持了表面的和平。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宋太宗并吞了位于太原的北汉，又想乘胜进攻契丹，夺回幽州，于是宋辽战争再起。

宋辽战争打了二十五年，双方各有输赢。[9]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再次大规模入侵，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逼迫下御驾亲征，在澶州与敌军遭遇。这时双方由于连绵的战争都已经打累了，于冬天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10]

澶渊之盟规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边境线不做变更，北宋每年支付给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盟约之一，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北宋虽然出钱才购买到和平，但是岁币不到每年收入的百分之一，与打仗相比，仍然是最划算的做法。

契丹也是一个好邻居，由于地处北方，土地贫瘠，必须依靠北宋的岁币才能建立起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契丹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岁币和燕云十六州，在百年的时间内，除了仁宗时代宋夏战争时试图趁火打劫之外，没有给北宋制造太多麻烦。即便那次趁火打劫，也被富弼化解，只是增加了十万两银和十万匹绢的岁币罢了。

正是因为双方长期的和平，北宋才得以安全地发展经济，保持了长久的繁荣。与此同时，契丹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宋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之前，中原王朝对外打交道必须以臣服为代价，可宋辽之间却是兄弟国家，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在这种平等地位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礼仪。

比如，每年双方都会互派两次使者，一次是在皇帝生辰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年初正旦时。除了这些例行的出使之外，皇帝驾崩、即位，等等，也都要互派使节吊唁、祝贺。

出使也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11]

以辽国来访为例。每年辽国国使一入北宋疆界，北宋一个外官和一个内官组成的搭档（称为接伴使）已经在等着他们了。内官负责提供帐篷、饮食，外官负责联络与沟通。在边境附近的白沟驿，要设宴款待使者。到了路上的贝州（现河北省清河县），需要赐给使者茶、药各一银盒。到了大名府（现河北省大名县），再次设宴。最后，当使者来到了京郊，开封府判官要亲自迎接。到这时，接伴使的任务完成，将使节交给馆伴使。

馆伴使是皇帝从台省官员或者诸司中选取的，负责辽使在京期间陪伴，直到辽使离开国都，踏上回程为止。

馆伴使在郊外一个叫作班荆馆的地方迎接使者，这里是专门为款待使者设立的国宾馆。而更加正式的国宾馆设在了城内的都亭驿。在都亭驿，发给使者金花、银灌器和锦被，供他们在首都期间使用。

到了朝见日，皇帝对各位使者更是大肆赏赐。给正使的赏赐有：金涂银冠、皂罗毡冠、衣八件、金默鞢带、乌皮靴、银器二百两、彩帛二百匹。给副使的赏赐有：皂纱折上巾、衣七件、金带、象笏、乌皮靴、银器一百两、彩帛二百匹、鞍勒马各一匹。其余的从人也各有赏赐，礼物的档次分成上节（十八人）、中节（二十人）、下节（八十五人），但整体而言都很丰富。

朝见完皇帝，回到馆舍，又要给正使粳、粟各十石，面二十石，羊五十头，法酒、糯米酒各十壶，副使秔、粟各七石，面十五石，羊三十头，法酒、糯米酒各十壶。

如果使者在出使期间碰到了节日，还另有封赏。

到了使节离开时，皇帝要在长春殿赐酒五行，再赐给正使盘裘晕锦窄袍及衣六件、银器二百两、彩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罗窄袍及衣六件、银器一百两、綵帛一百匹，还有金束带、杂色罗、锦、绫、绢百匹。其余人士各有赏赐。

将要出发时，又赐给银瓶、合盆、纱罗、注椀等。近臣们在班荆馆送行，开封府推官继续送到郊外。到这时，馆伴使的责任就结束了，再派来时的接伴使充当送伴使，一直送到边境。

使者的礼物都这么丰富，皇帝之间的馈赠更是复杂。简单说，宋朝送给辽国的礼物以金银锦缎茶叶为主，辽国送来的礼物中也有大量的金银，但更多的却是北方产的毛皮制品和山货。[12]

双方每年两次，你来我往地维持着和平。他们的交往已经非常现代化，不像是古代两个国家的往来。

但这种交往对于契丹却有一个致命危害：随着汉文化的侵袭，契丹贵族逐渐南方化，辽国军队变得越来越不会打仗了。就在这时，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却在更遥远的东北地区产生。

从肘腋之患到心腹大患

这个新兴民族诞生于辽国疆域的东北部。

在五代之前，契丹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国家，占据了位于燕山和阴山以北的土地，这里大都是草原地区，只有在如今的辽宁辽阳一带，有部分耕地的存在。

在五代的后唐时期，契丹从辽阳出发，越过了松岭和黑山，进入了燕山以南，占据了营州、平州、滦州，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山前地区。

到了后晋，契丹又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十六州，疆域推到了燕山以南的幽州地区。在现在的山西境内，则越过了阴山，推进到了雁门关以北，与南方宋王朝隔着雁门关对峙。

这时，游牧的契丹变成了定居的辽国。在它的疆域内也有了几大粮食产区，分别是最早的辽阳，后来获得的营平滦三州，以及最后得到却最富裕的幽州和云州。辽国之所以必须牢牢地把持燕云十六州，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些土地，就失去了国家两个最大的粮仓。

但如果从地形上看，辽国的疆域又显得极其碎片化，很难称之为一个成熟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组成总是和地理相关，往往拥有一个核心的平原地带，再加上环绕着平原的山地和森林。但辽国却是个例外，几条山脉将它的领土分裂成互相隔绝的几个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缺乏连接，很难成为一个整体。

这些山脉包括：东西向的燕山、阴山，南北向的太行山、大兴安岭、努鲁尔虎山、医巫闾山、松岭、黑山。由于这些山脉的存在，一旦出现战争，各部分国土之间很难协防。为了管理这些破碎的领土，辽国不得不采取五京制，也就是在不同的碎片上一共设置了五个都城，这五个都城各自负责自己片区的防御。

北面的上京临潢府（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位于大兴安岭山麓，是辽国的发源地，同时也负责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蒙古人、奚人等。

中间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的大明镇）位于大兴安岭、燕山、努鲁尔虎山、松岭四大山脉中间的空地上，是连接所有土地的交通要道，这里负责沟通四方领土。

位于东面的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是一个富裕的地带，这里主要防御的是高丽地区的少数民族，后来又防御东北的女真人。

至于幽州，就成了辽国的南京析津府（北京西南），它的防御主要针对南方的北宋，同时也是主要的产粮地，更是皇帝最常驻扎的地方。

同属于十六州的大同府（云州）则成了辽国的西京，主要防御西方的西夏，同时也和北宋的山西部分接壤。

辽国虽然已经成了集权国家，但它的集权程度远远达不到汉人的标准。比如，北宋也有五京，可是北宋的官僚系统都设在了东京汴梁。辽国的官僚机构却设在了不同的都城，燕京是负责财政收入的三司所在地，因为这里最富裕，离北宋也近，便于接收岁币。西京是转运司所在地，也是因为与北宋接壤。中京由于位于中间，是负责财政开支的度支部所在地。上京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设置了盐铁司。东京是契丹较早的粮仓，也是辽国赖以发展的大本营，这里设立了户部和钱铁司。[13]

这样的五京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问题的，共同组成了辽国的防御体系。但是，当一个新兴民族崛起时，人们却发现，辽国的防御体

系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它的东北边境。

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巨大的平原，我们现在称之为东北平原。辽国的东京辽阳府位于东北平原的南部，从辽阳府往北上千公里，都没有大的山脉阻隔。在现在的黑龙江省境内，北宋时期还是森林密布、河流纵横，这里是东北平原的北部，属于辽国的边地。但在这里，却有一支叫作女真的部族生活着。

日后，这个部族会在他们的发祥地附近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在会宁府旁是一条叫作按出虎水（现在叫阿什河）的小河，这条河向北流淌，汇入著名的黑龙江。与按出虎水平行，在西面的还有来流水（拉林河）和混同江（松花江）两条河流，它们最终都汇入黑龙江。

女真最早时就在这些河流附近活动。这里已经属于辽国的边地，辽国设立了黄龙府（现吉林省农安县）对该地进行管辖。一部分女真人已经被驯服了，并被移到了东北平原南端的辽阳以南，称为熟女真，可以视为辽国的子民。但还有一部分女真人没有被同化，他们虽然也臣服于辽国，但领导权其实还在部落首领手中，在仪式上臣服但实际上并不服从，他们仍然居住在女真故地，被称为生女真。[14]

虽然汉人习惯于将契丹和女真都称为北方的蛮人，但事实上，两者从人种到地域上都是有区别的。辽国起源的区域在中国的正北方，与早期的匈奴、柔然和后期的蒙古重合，契丹人与这些民族的亲缘关系也更近一些。[15]女真人则起源于中国东北方的东北平原，从人种上与前面几个种族是有区别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蒙古人对契丹人比较友好，却对女真人充满了仇恨。

女真人最早的祖先可能是周代的肃慎氏[16]，到了北魏，称之为勿吉，唐代称之为靺鞨。[17]靺鞨一开始有七支，经过合并成为两支，分别叫作粟末靺鞨与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居住在东北平原的南方，黑水靺

鞨居住地更加靠北。

后来，粟末靺鞨率先崛起，在唐代建立了一个叫作渤海国的国家，而黑水靺鞨成了渤海国的附属部落。

五代时期，契丹人征服了渤海国，将渤海国所在的辽东地区变成了东京管辖区，黑水靺鞨也就变成了辽国的附庸。此刻，他们已经改称女真，熟女真与生女真的分野也形成了。

辽庆二年（公元1112年）二月，辽国皇帝天祚帝到北方的春州（长春州的简称，现吉林省乾安县北）游猎，之后继续向东行，到了混同江去钓鱼。[18]这里已经接近生女真的地界，按照规矩，皇帝到来，方圆千里的部落首领都要来朝拜。

在东北的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头鱼宴的风俗，每年春季捕获的第一条鱼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需要祭祀祖先，请客吃饭。当部落首领们赶来时，恰好赶上了这一年的头鱼宴。皇帝请客时，要请各个部落首领表演节目。首领们纷纷上台献技，但轮到一位中年的女真人时，他却拒绝了，表示自己不会表演，只是笔直地站立着望着前方。

天祚帝劝了他几次，但这人都不服从。皇帝打听了一下，他是生女真完颜部首领乌雅束的弟弟阿骨打。皇帝有心杀掉阿骨打，但被北院枢密使萧奉先劝住了。后来阿骨打和兄弟们陪伴皇帝打猎，由于精通猎术，获得了皇帝的欢心，这件事告一段落。

日后，天祚帝一定会后悔没有杀掉阿骨打。因为这有可能是辽国控制女真的最后机会。这时女真部落的士兵只有千人上下，还无力与辽国对抗。阿骨打虽然只是首领的弟弟，但一年多以后，乌雅束死了，继承女真首领职位的就是阿骨打。

女真部落实行勃极烈制度。[19]所谓勃极烈，就是女真领袖的称号。阿骨打即位后称都勃极烈，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在都勃极烈之下，还有谙班勃极烈，可以理解为皇储。之下又有国论勃极烈，汉语称之为

国相。此外还有阿买勃极烈、昊勃极烈等。最大的几个勃极烈组成类似于国务会议的委员会，负责商讨国家大事。

在勃极烈之下的民事官员叫勃堇，如果统辖范围更大，就叫忽鲁，意为大勃堇。军事官员称为猛安和谋克[20]，猛安相当于千夫长，谋克相当于百夫长。谋克的副手叫作蒲里衍，之下又有阿里喜。

阿骨打成为都勃极烈后，由于他即位前与辽国的矛盾，加上辽国皇帝喜欢打猎，不断地要求女真部落贡献一种极其罕见的鸟——海东青，一种猛隼类的鸟，擅长抓兔子。人类想抓住它，非常困难。辽国的不断索求，让女真人苦不堪言。此外，辽国与女真之间常常因为接纳对方的叛徒问题而争吵。阿骨打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战争。

此刻的女真还只是蜷缩在来流水流域的一个小部落联盟，阿骨打清点了人数，他本部的兵马加上盟友的一共只有二千五百人。以这样的兵力，只够攻打辽国的一个边城。在来流水和东面的混同江之间，有一个小城宁江州，这里成了辽金战争爆发的地点。

阿骨打首先把兵力集中在来流水西岸的小城廖晦城，集结完毕，渡河进入辽境。他们遇到一支由渤海人（也是女真人的近亲）组成的部队，将这支部队击败。这场小胜让女真人信心大增，于是杀向宁江州。

辽国天祚帝正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庆州（现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听说了这件事，以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部落的造反，不以为意，只派少量的人去增援，但增援部队并没有起到作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十月，阿骨打攻克了宁江州。虽然这只是女真的一次小胜利，却因其是金辽战争的第一场战役，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对女真来说，这场战役把他们的疆域从来流水东岸扩张到了混同江东岸，但是如果把这小片土地放到辽国的整个疆域中，就会发现这片地方还是太小了。

女真的战斗力已经让天祚帝开始重视他们。只是，辽国的君臣还没

有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天祚帝虽然准备集结十万人对付女真，可由于集结过程太拖拉，前期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到达现场。这一万人驻扎在黑龙江北岸的出河店（现黑龙江省肇源县），与阿骨打隔着黑龙江相望。

辽军由于是契丹人、奚人组成的联军，且来自不同的地方，士气并不高。与之相比，阿骨打的军队由于刚打了胜仗，显得生龙活虎。他一鼓作气，率军乘黎明渡江，将辽军击溃。

这次战役让阿骨打控制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后来，女真在这里设立了肇州，也就是肇兴之地。之后，阿骨打转战黑龙江南岸，在斡邻泺（现吉林省大安市南查干湖）再次击败辽军。此时，女真的军队达到了万人之众，成为一支劲旅。

与女真迅速崛起的声势相比，辽国却继续走在下坡路上。战争中由于皇帝的赏罚不明，辽军士气低落到了极致，这年十二月，辽国位于东北地区的宾州（现吉林省农安县靠山镇广元店古城）、祥州（现吉林省农安县万金塔乡）和咸州（现辽宁省开原市东北）都背叛了契丹，归顺了女真。

这三个州的归顺，让阿骨打实力大增。宾州和祥州还在混同江附近，但咸州却已经达到了现在辽宁境内，处于东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女真人第一次走出了混同江流域，来到了辽国在东北地区的腹心，从肘腋之患变成了心腹大患。阿骨打也乘机于公元1115年初称帝，国号大金。[21]

但是，阿骨打此时控制的地域还是有问题的，他的主要控制区仍然在北方，咸州虽然已经靠南，但属于孤城一座，在咸州和混同江根据地之间，还有许多辽国的城池并没有被征服，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黄龙府。

称帝后的阿骨打立刻率军进攻黄龙府。但这一次，辽国却改变了做

法，决定对黄龙府进行全力支援，避免像以前那样分散兵力，被各个击破。

天祚帝派来二十万骑兵和七万步卒前来增援黄龙府。为了稳扎稳打，辽军企图采取链式封锁，利用持久战将阿骨打绞杀。辽军试图在东北边境发展屯田，设立一系列的军屯，与金军长久对峙。只有这样，才能降低金军的冲击力，这也可以看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和平，辽国已经丧失了冲击力，必须依靠中原式的防守来遏制对手。

当二十多万辽军带着大量的屯田农具赶到时，也就到了阿骨打的一个关键时刻。到底是女真的冲击力取胜，还是辽军的链式绞杀战成功？这不仅影响一场战役的成败，还决定了未来的战争形式。

最终，阿骨打的冲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乘辽军立足未稳，立刻发动进攻。首先被击溃的是辽军的步兵，当骑兵看到步兵失败了，立刻选择了逃走。结果辽军屯田未成，反而将农具都丢给了阿骨打。日后，金人从渔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到了九月，阿骨打终于攻克了黄龙府，这意味着整个东北平原的北部都已经掌握在了女真人手中，辽国已经丢失了东京辖区的一半土地。

不过辽国仍然有机会限制金国的发展。由于刚刚获得了大片土地，金国对于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力并不强。辽国天祚帝此刻已经完全惊醒，意识到如果不加重视，善战的女真人将可能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他决定御驾亲征，向金国进攻。

从辽国剩余的领土到达金国控制区，一般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从西面的上京出发，另一条是从南面的东京出发。天祚帝的军事部署分成两个方向，天祚帝亲自率军七十万从东京向北进攻，驻扎在黄龙府以南一个叫作驼门（现吉林省农安县南五十里）的地方；他的驸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剌等率领五万骑兵、四十万步兵从上京向东进攻，驻扎在斡邻泺。

如果这双面夹击的战略成功，那么即便无法歼灭阿骨打，至少可以将他们赶回到混同江以东去，收复前期丢失的黄龙府、宾州、祥州、咸州等地。

但这一次的战略却被辽国内部的叛乱打碎了，辽国大将章奴认为现在的皇帝无能，希望另立一个更加贤明的皇帝，他选择了越王耶律淳。耶律淳是辽兴宗的孙子，天祚帝是辽兴宗的重孙子，本来是亲戚。耶律淳本人也并没有篡位之心，却被章奴推向了前台。

章奴一谋反，在前线的天祚帝立刻偷偷回师，去解决内部问题。阿骨打抓住机会追击辽军，赢得了这次皇帝与皇帝的对决。

到这时，金国的后方基地正式成型，阿骨打占领了东北平原的北部，向南可以进军辽国的东京辽阳府，向西可以进军辽国的上京和中京。更重要的是，金军的士气要比辽军旺盛得多，两国交战中，金军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辽军则是屡战屡败。

金国叛乱对辽国的影响还反映在经济上。辽国本身就不是一个经济特别发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想要保持战斗力，必须让士兵自带粮食，亦农亦兵。可是随着辽国的汉化，养兵的成本越来越高，战斗力却在下降。一旦开战，军事花费的大增，将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人们的生活迅速变糟。在接下来几年，辽国饥荒和叛乱不断，进入了解体的节奏。

与此同时，新兴的金国却处于一个养兵成本很低的时期，士兵们不需要兵饷，依靠抢劫来获得食物和财富，[22]他们唯一的冲动就是打更多的仗，抢更多的财富。此消彼长之间，国运已经变换。

在两国的对峙中，南边的北宋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不幸的是，北宋此时掌权的恰好是主战派。

统兵的宦官与主战的叛徒

对于北宋来说，选择只有两种：要么选辽国做邻居，要么选女真做邻居。

辽国已经与北宋交好了上百年，军事实力已经减弱，更希望维持和平，从形势上来看，是个更好的邻居。女真作为新兴民族，性格是不可控的，一旦成为邻居，更加危险。不过，以辽国自己的力量已经很难抵御女真了，如果要让辽国挺住，北宋必须给予辽国帮助——不仅是物资上的，还包括军事上的。

但北宋君臣和民间却迟迟不忘所谓的十六州之耻。事实上，从北宋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十六州就没有属于过宋朝，但自认为继承了正统的北宋君臣却一直将十六州当成是自己的疆域，憧憬着有一天拿回来。如果要拿回十六州，现在的确是个好时候。更何况，辽国已经腐朽了，即便帮助它，也不一定能够抵御住女真。

到最后，是支持辽国还是进攻辽国，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的焦点。

此刻，掌握北宋军事大权的是一个名叫童贯的宦官。[23]与宋辽之间的长期和平不同，北宋与西夏却总是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除了宋仁宗时期失败的宋夏战争之外，在英宗、神宗、哲宗时代，双方都发动过战争。西夏成了北宋主战派的主要宣泄口，一旦主战派上台，必然爆发或大或小的冲突。

宋徽宗上台后，也恢复了对西夏的用兵。童贯由于与蔡京交好，被皇帝派到西北区监军。北宋和唐朝一样，有用宦官做使职的习惯。所谓使职，就是不属于正常的官僚系统，只是临时派去帮助皇帝做事的。童贯在做监军时，帮助北宋在西北打了几个胜仗，皇帝一高兴，授予他实职，各种头衔突然间如同雪花一样飘落到他的头顶：领枢密院事，掌管武信、武宁、护国、河东、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九镇；为太傅、泾国公……于是，一个宦官就成了北宋军队的掌门人。

童贯一直不忘自己是靠武力获得如此众多的荣耀，他成了北宋朝野最大的主战派。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九月，北宋派遣一个使团前往辽国，正使是端明殿学士郑允中，童贯自请担任副使，去勘察辽国的军事情况，看有没有机会对辽采取行动。

在这次出使过程中，一位叫作马植的人在卢沟附近要求见童贯。[24]马植本是辽国的世家，当过光禄卿，却由于犯了错误，受到了国人的排斥。他决定帮助北宋颠覆辽国，夺回十六州。

此时，女真人和辽国之间虽然有了小摩擦，却还没有公开决裂。马植却敏锐地观察到女真人的崛起，认为北宋如果联合女真人，是有可能灭掉辽国的。

童贯听了马植的策略，大喜过望，让他改名李良嗣，躲过了辽国接伴使的耳目，带回了北宋。

宋徽宗对马植的策略也很感兴趣，赐他姓赵，于是马植的本名已经很少人提及，反而是以赵良嗣的名字被历史铭记。[25]赵良嗣告诉皇帝，即便经过了一百多年契丹的统治，幽州地区的百姓还在热切地盼着被北宋收复，王师一到，百姓立刻会欢欣鼓舞，帮助赶走契丹人。

对于童贯和赵良嗣的策略，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最典型的意见认为，辽国是北宋的屏障。北方游牧民族众多，经常冲击南方，有辽国在，北宋就不用担心他们。一旦没有了辽国，北宋就必须直接面对这些游牧民族，很可能陷入战乱不断的境地。更何况女真比起辽国来更加不可控。

但这时女真和辽国之间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北宋与金国之间也没有直接通路。赵良嗣的建议是从北宋的莱州乘船渡过渤海，再从辽东半岛登陆，前往女真。这条路以前曾经畅通过，女真曾带着马匹乘船到北宋境内来贩卖。不过在赵良嗣提建议时，路已经封闭了。辽东半岛处于辽国的占领之下，就算从山东半岛浮海过去，还是辽国的地盘，无法与女

真人直接联系。

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联合女真的战略被暂时搁置了起来。赵良嗣就这样被冷落了五年……

【注释】

[1] 参考《奉使辽金行程录》中《晋出帝北迁记》。《晋出帝北迁记》由后人根据《契丹国志》《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文献通考》等书整理而成。

[2] 参考《奉使辽金行程录》中《姚坤使辽》。《姚坤使辽》由后人根据《资治通鉴》《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等书整理而成。

[3] 参考《通鉴纪事本末·石晋篡唐》。

[4] 臣礼免掉了，但石敬瑭仍然需要称辽太宗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5] 燕云十六州对应于现在的地名，见本书插页图二。

[6] 参考《辽史·太祖纪》。

[7] 参考《新五代史·周世宗纪》。

[8] 瀛洲和莫州回归后，到了宋代，人们口中的燕云十六州变成了幽州、顺州、檀州、蓟州、景州、涿州、易州（以上为山前七州）和云州、应州、蔚州、朔州、寰州、武州、新州、妫州、儒州。

[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宋史纪事本末·契丹盟好》。

[10] 参考《宋史·寇准传》。

[11] 参考《契丹国志·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

[12] 参考《契丹国志·南北朝馈献礼物》。

[13] 参考《契丹国志·州县载记》。

[14] 《女真传》，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引。

[15] 参考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和《蒙古帝国史》。

[16] 《竹书纪年》称之为息慎，《史记·五帝本纪》同。《金史纪事本末》有考异。

[17] 女真起源参考《金史纪事本末·帝基肇造》《大金国志·金国初兴本末》。

[18] 以下战事根据《金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与《宋史纪事本末》。

[19] 参考《金史·百官志》。

[20] 参考《金史·兵志》。

[21] 参考《金史·太祖纪》。

[22] 金国在熙宗时代才开始尝试给士兵报酬，向职业化转变，见《金史·兵志》。

[23] 参考《宋史·宦者传》。

[2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复燕云》。

[25] 参考《宋史·赵良嗣传》。

第三章
最危险的和约

和战之争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是金国和阿骨打收获最大的一年。

这一年正月，辽国发生了内乱，由于不满东京辽阳府留守萧保先的苛政，一位叫作高永昌的渤海人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叛乱。[1]东京辽阳府原来属于渤海故地，是辽太祖阿保机用了二十多年才攻克的。虽然贵为五京之一，但契丹人和渤海人之间的矛盾仍然不时激化。

正月初一夜里，高永昌和十几个同伙喝醉了酒，带着刀翻过了府衙的围墙，来到了大厅。他们借口外面有人造反，前来汇报，直接向侍从询问东京留守的居处。高永昌找到东京留守，将他刺杀，然后逃走。

萧保先死后，当时恰好在辽阳府的户部使大公鼎和东京副守高清臣控制了局势，四处搜查作乱的渤海人，查到了数十人，将他们杀死。不幸的是，这些被杀的并不都有罪，有的只是在恐慌中被枉杀的。这件事传开后，更多的人加入了造反的队伍，附近的州县也出现了乱局。

初三这天，造反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东京辽阳城外，大公鼎叫他们离开，但没有人听从。

初五时，城里终于乱了，有人乘风放火，有的偷开城门，大公鼎等人只好率领残部逃走。辽阳府落入了叛军之手。高永昌成了叛军的头目，自称大渤海皇帝，他乘机占领了辽东地区的五十多个州。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女真活动的范围在东北平原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和黑龙江一带，而南部的辽宁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阿骨打和他的大金国还无法染指。女真没有得到的土地，却被高永昌一次出其不意的叛乱拿到了手中。

高永昌唯一没有得到的地区，是位于现在辽宁沈阳的沈州。这里是辽国宰相张琳的家乡，皇帝派遣张琳亲自部署防守，才防止了高永昌得手。

五月份，就在张琳与高永昌鏖战时，突然传来消息，女真人应高永昌之请，于五月二十一前来助战，率领女真的是女真西南路都统阇母。

渤海人本来就是女真人的远亲，高永昌寻找帮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张琳却以为这只是高永昌释放的假消息。

到了五月二十一那一天，女真人果真出现了。张琳被这出乎意料的帮手吓住了，只好逃走，沈州被女真人占领。

不过女真并没有把沈州交给高永昌，而是自己占领了。不仅这样，女真人击退了辽国燕王耶律淳的进攻后，还对高永昌发起了进攻，将他击败杀死。女真人的野心到这时展现无遗，他们不仅想要东北平原北部，还想获得整个东北平原，从而向辽国全境扩张。

经过辽国的这次叛乱，女真人乘人之危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女真的胜利曲折地传入了北宋的耳中，于是，主战派又开始跃跃欲试了。第二年（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初，边将不断地上报，说在宋辽边界处的易州（现河北省易县）出现了频繁的军事调动。主战派将之认定为辽国将要对北宋有所行动。

童贯也被皇帝从西北调回，开始准备应对北方的事态。[2]

童贯准备军事行动时，恰逢北宋财政处于一个花钱的高峰时期。就在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宋徽宗答谢道士给自己带来儿子的上清宝

篆宫刚刚修建完毕，皇帝雄心勃勃地开始准备他一生中巨大工程的顶点——艮岳。

由于钱不够花，蔡京等人也在不断地给他开辟新的财源。就在公元1116年，在另一个宦官杨戩的帮助下，宋徽宗开始建立一个叫作公田所的机构。所谓公田，原本是指属于皇帝的田庄。在北宋初年，有不少田地是没有主的，但到了末年时，所有这些无主的田都已经被人耕种。宋徽宗时期，皇帝和大臣们突然开始打这些土地的主意，将它们化为公田，要求农民必须缴纳租金，也就是公田钱，才准予耕种。

不仅是公田钱，在丈量土地时也做了手脚。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宋徽宗为了多收钱，做过一次变革，将长度单位做了变更。之前人们使用普通的“尺”，但皇帝以符合礼仪为借口，将尺的单位缩小，推行“乐尺”。所谓乐尺，是根据礼乐的要求重新设计的长度单位，一乐尺比普通的尺稍小，结果按照普通尺计算出来的一亩，换算成乐尺的亩，就变成了1.08～1.09亩。通过单位换算，北宋的土地亩数就可以多出来8%以上，由于每亩的税率不变，从理论上，皇帝的税收就可以增加8%。

在缴纳公田钱时，也必须按照乐尺的亩来缴纳，更加重农民的负担。[3]

童贯负责北方事务时，人们为了讨好童贯，不断地将辽国的消息传到朝廷。有人透漏燕山以南的易州和霸州都有军事调动。[4]

童贯不断地催促皇帝赶快起兵。他不仅通知了河北地区的将帅做好准备，还动用了中央禁军。到了二月中旬，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北上。经过占卜师的占卜，三月上旬的某个黄道吉日，成了大部队出发的日期。

但在出发前，皇帝却犹豫了。在几个月前，皇帝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去往辽国，正使是一位名叫陶悦的人，他的职务是司封员外郎，出发前皇帝又给了他太常少卿的头衔；副使是来自霸州的李邈。按照约定日

期，这个使团已经接近回来的时候，宋徽宗下令童贯暂时不要发兵，而是等着外交使团回来后，再根据情况做最后的判断。

二月二十五，使团回来了。刚进国门就碰到了童贯，童贯让陶悦第二天先到自己府中汇报一下，再去找皇帝。[5]

第二天，陶悦准时来到了童贯的府邸。童贯首先问陶悦："听说辽国已经准备入寇，对吗？"

陶悦对童贯的问题很吃惊，表示并没有看到辽国入侵的迹象。在路上，他们每天都按照计划行进，没有听说入侵，也没有被要求改变道路，一切都很正常。由于他们走的是宋辽之间的大道，如果辽国在做军事准备的话，他们在道上必然能看到。辽国如果不想让他们看见，会寻找借口请他们改走小路，免得和军队遇上。既然没有改道，在大道上也没有军事调动，就证明辽国并没有准备入侵。

童贯还不死心，说这只表明使者走的路上没有军事调动，其他地方也许已经调动了。

陶悦很不识趣，继续反驳，表示虽然听说女真和辽国在边境上有冲突，但燕山以南的内地一切正常，人们的耕作、生活都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有听说大批的军事行动。至于所谓霸州和易州的情况，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总之，辽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陶悦的说法，辽国并没有针对北宋的军事行动，童贯就没有理由出兵。

童贯不死心，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试图让陶悦改口，甚至侮辱他获得了辽国的好处。陶悦正色回答："像我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因为对方的厚礼隐匿敌情呢！"[6]

童贯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第二天，使臣上奏皇帝，宋徽宗下诏，将已经出发的禁军召回，北伐之事暂时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好几年，直到五年后陶悦死了，北伐还没有踪影。

但北宋与女真的联系却在这段时间建立了起来。

三国的外交大竞争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在苏州（现在辽宁大连金州）附近的海域，有两艘大船悄悄离岸，向着茫茫大海漂去。它们的目的地是高丽（今朝鲜），却由于海流的原因，漂到了北宋境内登州（山东半岛北端）附近的驰基岛，这里有宋军士兵驻扎。

从两艘船上下来二百多个人，为首的叫作高药师、曹孝才，以及僧人郎荣，其余的都是他们的亲属。

士兵们将来人送到了登州知州王师中处。由于朝廷主战派占了多数，皇帝将北方各地的官员都换成了主战派，王师中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高药师的供述，他们来自辽国的苏州。那里已经被金兵占领，除了金兵之外，高永昌死后的溃军也退到了海岸上，北方已经一片大乱。

如今，苏、复（现辽宁瓦房店西北）、兴（现河北承德）、潘（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同（现辽宁省开原市中固镇）、咸（现辽宁省开原市）诸州都已经被女真攻克了。这就意味着，从北宋到女真之间除了隔着大海，已经没有了辽国的阻碍。[7]

在更早的时候，女真人曾横穿渤海海峡，从苏州到登州（现山东半岛蓬莱）登岸，用马匹换取汉地的生活物资。但女真人这么走，大都是在辽国控制辽东半岛之前，随着辽国灭了渤海国，这条路就断绝了。高药师等人的到来，是海路重开之后的第一批。

七月初四，王师中将消息上奏给皇帝。皇帝与蔡京、童贯等人讨论后，令王师中派遣人手，由高药师带领，再次渡海，以买马的名义去见

女真的头目，看有没有和女真联合攻打辽国的可能性。

王师中奉命逼迫高药师回辽东。不想到了八月初十[8]，高药师的船又回来了。原来，他们坐船远远地看到了北面的海岸，岸上站了很多士兵，他们不敢上岸，只好掉头回来，报告说女真不让他们北上，还差点杀了他们。

王师中将事情报告给皇帝，宋徽宗大怒，将高药师等人贬斥到边远之地。

但与金人联系的念头一旦唤醒，就不会再轻易消失。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终于派出第一个正式使团前往女真的地界。

由于上一次的失败，宋徽宗命令童贯一定选择更加勇敢的人前往，童贯将任务再次派给了王师中，王师中选择了一位叫作马政的人。马政官封武义大夫，与他同行的还有平海指挥军员呼庆[9]，呼庆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会说北方语言。和他们同去的有将校七人、兵员八十人，[10]带路的仍然是高药师和曹孝才。

同行的还有马政的儿子马扩。马扩在当年春天的春试中，刚刚通过了武科的殿试，被授予承节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谕。

他们接受命令的时间是二月十八，[11]下海出发的日期是闰九月初六。[12]使团刚到渤海北岸，就被巡逻的人抓住。金兵由于从来没有听说过北宋使节，将物品全都夺走，数次想要杀害他们，马政和呼庆不停地解释，才让士兵相信他们是使节。金兵将他们绑起来，押送着走了十几个州，才到了阿骨打所在地阿芝川的来流河畔，这里距离他们的出发地已经三千里了。

阿骨打的助手是他的侄子粘罕（汉名完颜宗翰，金名粘没喝，但宋朝人习惯于称他为粘罕，或者称国相）和兀室，以及长子斡本。

在马政与儿子出使金国时，另一场外交竞争也在平行地进行。事实上，除了北宋与女真取得联系之外，女真的敌人辽国也在与它议和。

女真与辽国的议和始于金太祖收国三年（公元1117年），此时女真已经获得了辽国的东京辽阳，占据了东北的大片江山。一位叫作杨朴[13]的人给阿骨打出主意，说自古英雄开国，必须首先获得大国的册封。阿骨打派遣使者去辽国请求册封。辽国本来就损失了大片的土地，加上又出现了大规模饥荒，正想与女真议和，见对方使者来请求册封，立刻派遣了议和使前往。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阿骨打接见马政前后，与辽国的谈判也处于紧锣密鼓之中。最初辽国派遣耶律奴哥作为议和使节，还没敢提册封。但此时耶律奴哥已经知道所谓“册封”并不是臣子向君主请求封赏，而是一个新君主让另一个老君主给自己加冕，承认他的优势地位。这可以从阿骨打提出的要求中看出来，阿骨打要求：辽国皇帝必须称阿骨打为兄长，同时，将辽国的上京、中京和兴中府都交给金国，再派遣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作为人质，并把之前的信符、往来信件等带有等级特征的物品都还给金国，方才能够谈议和。[14]

且不提其他的要求，只看金国对于土地的要求。如果辽国真的把上京、中京和兴中府（现辽宁省朝阳市）割让，就意味着辽国丧失了东北全境、北方草原地带，剩下的只有燕云十六州和西北方的沙漠地区，变成一个夹在宋金之间的小国家，随时会被灭亡。这样的条件等同于辽国向金国彻底投降。

耶律奴哥往返于辽金两地，又把金国使节胡突衮带到了辽国。阿骨打又提出了新条件：这一次不需要人质，也不再要上京和兴中府两个地方，同时还削减了辽国向女真的供奉。但是，辽国皇帝必须称呼阿骨打为兄长，并且用汉人的礼仪册封金国皇帝。

对于辽国天祚帝而言，这样的条件仍然是太苛刻了，双方因此处于

僵持之中。

与辽国的坚持不同，北宋使者却似乎更加好说话。

马政使团的首要目的是建立联系，并没有制订具体的目标。阿骨打答应联合攻辽，使团的目的就达到了。接着是双方互派使者，制订具体的合作条款。

金太祖收国四年底，阿骨打留下了马政使团的六个人（史书留下了其中两人的名字：王美、刘亮）作为人质，又派遣了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散都、生女真勃达三人，带着礼物，与马政使团一道返程。

十二月初三，使团到达了登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春正月，他们回到了京城。金国使臣待了十余日，宋徽宗和蔡京等人商议，决定与金国联合进攻辽国。

不过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用什么礼节对待阿骨打？这个问题让皇帝和大臣们有些犯难。按照规矩，如果是平等的两国之间的交往，皇帝的书信应该称之为“国书”；如果是对下级，皇帝应该使用诏书。皇帝派遣马政和金国使臣一道回去，同去的还有副使赵有开，以及王师中的儿子忠训郎王瑰。赵有开建议，女真的体量只相当于中国的节度使，他们既然接受了契丹的封爵，自然也更加愿意接受大宋的封赏，所以用诏书就可以了。

皇帝征询金国使臣李善庆的意见，由于不懂礼仪，李善庆表示尊重皇帝的意思。于是，在给阿骨打的信中，皇帝用了诏书的格式。

使团出发后，赵有开到达登州后就得病死去了。恰好在这时，传来了金国与辽国议和的消息。这一年，辽国封金国国王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

当宋徽宗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追上使团，让马政不要去了。只派呼庆将女真使者护送回国。

但北宋得到的消息是有误的，实际上，辽国虽然愿意封赏，但阿骨打未必愿意接受。一方面，他感觉这个称号太低了；另一方面，与北宋联合伐辽显然是更好的决策。

正当北宋使臣前往登州时，经过漫长的拉锯和七次出使，辽国终于答应了阿骨打的条件，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派使者来到了阿骨打所在，同意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

阿骨打派遣受封使乌林答赞谟去辽国迎来了册表。但他随即发现，辽国的册封文件中并没有称他为兄长，在使用金国的名称时，没有加上“大”字，显得很轻慢。同时，东怀国的名号也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东怀”，就是“偏远的东部小国感怀大国的圣德”的意思。他拒绝了册封，还差一点腰斩了提议请求册封的杨朴。[15]

双方再次开始扯皮，辽国使节萧习泥烈和金国使节乌林答赞谟恢复了来回奔波。双方又因为各种小问题扯皮了一年，关系最终破裂。

从请求册封，到彻底拒绝，从金太祖收国三年到金太祖收国五年，这三年是阿骨打的关键期。起初，他还没有信心成为一代霸主，还想与辽国共存。正是马政等人的出使让阿骨打看到了彻底消灭辽国的希望，从此以灭辽为己任。

阿骨打与辽国扯皮时，还在等待着北宋使节回来，却只收到了金国使节归来而北宋使节未到的消息。阿骨打将一腔怒气发在了护送使节的呼庆头上。呼庆告诉阿骨打，一方面北宋使者意外病死，另一方面也是听说了辽金议和，宋徽宗才放弃了遣使。

阿骨打不听他的辩解，将他留置了六个月，才放他回去。[16]

送呼庆回去时，阿骨打告诉他：首先要求结盟的不是女真，而是北宋；女真已经获得了辽国的数州，本不需要联合北宋，之所以接受邀请，只是为了交朋友；但北宋不再遣使，只派一个低级官员来，不写国书，反而送了份诏书来，已经表明北宋在反悔了；反而是女真一直在遵

守约定，甚至不惜拒绝了辽国的封赏。

阿骨打还安慰了呼庆：毁约的责任并不在呼庆，他也只是接受派遣来的；他希望呼庆回去后见到皇帝，转告宋徽宗如果想要继续结好，就尽早派人持国书前来谈判；如果只是带一份给臣下的诏书过来，那就不用谈了。

他还给宋徽宗写了一份简单的书信：契丹修好不成，请别遣使人。

海上之盟

阿骨打不知道的是，在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到底谁占上风还不一定。几乎在同一时间，女真东面的高丽国派人来求医，宋徽宗派了两名医生去提供帮助。医生带回来的消息却是：高丽全国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认为女真是虎狼之国，必须赶快做准备。他们建议北宋皇帝千万不要和女真交往。

与此同时，一位叫作安尧臣的官员（他是前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安惇的族子）上书表示反对与女真联合进攻辽国。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祸端，往往是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那一刹那。北宋之所以不和契丹争燕云十六州，也是考虑用土地换和平。既然已经维持了上百年和平，一旦重启战端，往往会得不偿失，让原本已经疲惫的民间更加无法承受。

另外，辽国已经是一个开化、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北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辽国没有了，换成更加野蛮和勇猛的女真，那么北方就再也没有和平可言了。

宋徽宗最初同意了安尧臣的看法，还封了他一个承务郎的小官。但随后，在蔡京、童贯等人的主导下，皇帝再次偏向了战争。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二十六，呼庆离开了阿骨打营地，

日夜兼程赶回宋境，从行之人甚至有冻掉手指的。第二年正月，呼庆赶回了京师，将阿骨打的书信传到。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二月初四，宋徽宗再次向女真派去了使节。[17]这次派出的，就是当年童贯从辽国带回来的赵良嗣。赵良嗣的职务是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在宋朝已经待了快十年，当选择出使人选时，童贯再次想到了他。他的副使还是忠训郎王瑰。赵良嗣没有带任何皇帝的文书，但皇帝让他便宜行事，一定要签订有效力的和约。

马政的第一次出使主要是为了建立联系，赵良嗣出使的目的却更加明确，他显然更了解女真需要什么，事情的关节在哪里，他的出使也成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也是宋金夹攻辽国的起始点。

三月二十六，赵良嗣从登州出海，经过了几个小岛，在四月十四到达苏州关下。他去的时候，恰好是女真兵分三路进攻辽国上京之时。赵良嗣从咸州出发，和阿骨打会于上京城外的青牛山，与女真大部队一起观看了进攻上京的经过。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辽国使臣萧习泥烈。

辽国天祚帝正在北方的胡图白山狩猎，听说后，派遣耶律白斯不等人率领三千兵马驰援。但阿骨打并没有把这当作大事，他对两位使臣说："你们先看我怎么打仗，再决定该做什么。"

五月十三，女真的进攻从黎明开始，到了巳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已经结束了，大将阇母首先攻克了外城，内城守将挞不野一看大事不好，立刻投降了。

女真的强悍给赵良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方再次在龙岗相见时，赵良嗣立刻和阿骨打谈起了联合出兵的问题。

根据赵良嗣本人的回忆，他首先提出双方夹攻辽国，由于燕云等地是汉人的旧地，灭辽之后，双方分配辽国土地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辽国的上京、中京和东京这些在燕山以外的土地都归金国，而南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以及附属的州县，应当归属于北宋。[18]

阿骨打同意了赵良嗣的要求。但他仍然摆了个架子，表示辽国已经被金国击败，原则上，辽国的土地都是金国的，但为了感谢南朝皇帝的好意，且燕州又本是汉地，所以同意把燕云交给宋朝。

不过，由于攻打城池时不免首先要占领，对于应该交割给南朝的土地，金国可能会先占领一段时间，一旦完成灭辽任务，就引兵离去。

双方进一步确认，在联合灭辽时，北宋的兵马先攻打南京析津府，而金国则从北方绕道去攻打西京大同府。

由于上次宋徽宗听说女真要和辽国议和，就把马政召回去了。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赵良嗣专门要求，金国和北宋都不得单独与辽国议和。他这样做，实际上是防备金国的做法，但到后来，却由于宋徽宗试图联合辽国残部，反而成了金国进攻北宋的借口之一。

在谈判的空隙，双方吃过饭一起游览了上京府，参观了辽国的宫殿。阿骨打与宋使骑马并肩从西偏门入，经过各大殿，最后在延河楼饮酒作乐。心潮澎湃的赵良嗣感到上百年的耻辱正在自己的手中消解，他写了一首诗来纪念这次议和："建国旧碑胡日暗，兴王故地（契丹起家之地）野风干。回头笑谓王公子（指他的副手王瑰），骑马随军上五銮。"

作完诗，双方继续谈判，这就遇到了一个关键点：北宋到底要出多少钱，才能获得这个合作伙伴？

赵良嗣最早提出，给金国三十万岁币，换取与金国的和平共处。阿骨打却说：辽国没有割让燕云之地，北宋每年还要支付五十万给他们；金国把燕云还给北宋，只能获得三十万，这很不公平。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每年也给女真五十万（其中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相当于把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

谈判快结束时，赵良嗣特意强调了几个问题：第一，西京云州（大

同）也是汉地，必须和燕州一起交付给北宋。阿骨打同意了，表示金国出兵西京，只是为了擒获辽国皇帝，只要擒拿了阿适（辽帝小名），就把西京给宋朝。

接下来赵良嗣要争取的是一块土地。在现在北京以东的河北地区，有三个州，分别叫作营州、平州、滦州，这三个州和其他州不同，不是在后晋时期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而是在更早期就已经归属了契丹。赵良嗣想把这三个州也争取过来。但这一次，他失败了。女真大臣高庆裔告诉他，他们讨论的是燕地，这几个州都自成一路，不在讨论范围内。

即便没有争取到营平滦三州，但作为一个使臣，赵良嗣已经做得非常完美。

在他离开之前，与阿骨打约定：女真军队在当年八月初九开始进攻西京，北宋也在同时进攻南京；如果北宋需要金国帮助夹攻南京，那么金国应该选择从平州松林前往南京东北的古北口的路线，而北宋选择从宋辽边界附近的雄州前往白沟的进攻路线。

双方还约定：只有宋军按时抵达，并配合夹攻，和约才成立，否则和约就作废。这一点，也成了日后金国在交割中刁难宋朝的借口之一。

阿骨打派遣二百骑兵护送宋使离开，但当赵良嗣过了铁州，阿骨打突然又派兵把他们追了回去。原来金国内部发生了牛瘟，影响到了军事规划，很难按照约定在八月初九发起进攻，因此改到第二年再发动进攻。从阿骨打如此周折地改期，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此次约定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与之后宋朝屡次玩弄协议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次离开时，赵良嗣再次强调了几点：第一，南北夹攻时，金军主要进攻西京，在南京方面，为了避免两军误伤，北兵先不要过松亭、古北、榆关（也就是燕山山脉）之南；第二，这个界限到时也可调整，但必须双方同意之后再调；第三，不准单独与契丹讲和；第四，西京主要由女真负责进攻，但距离北宋更近的蔚州、应州、朔州，北宋可以进

攻（女真并没有答应这一条，只说有待讨论）；第五，交割城池时不得收取赎地费；第六，完成交割后，在榆关以东设立市场，满足双方的商品交流。

在送宋使回去之前，女真还专门把俘虏的一位辽国官员（盐铁使苏寿吉）交给了赵良嗣，因为苏寿吉是燕地人，既然燕地要交还给宋朝，苏寿吉就应该送给宋朝处理。马政出使时留下的六个人质也被准许回去。

历史甚至留下了两国往来的文字。阿骨打让使臣带给宋徽宗的信件，经过简化，大意为：

> 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盖缘素昧，未致礼容，酌以权宜，交驰使传。赵良嗣等言，燕京（注意，国书上只写了燕京，没有写西京）本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若将来贵朝不为夹攻，即不依得已许为定，具形弊幅，冀谅鄙悰。[19]

另外，阿骨打还特意提出，虽然转交燕地，但如果是因为最近打仗从其他地区跑到燕地避难的人民，并不能归属北宋，必须送还给金国。

女真由于人口稀少，一直对人口问题给予最高级别的重视，打仗的目的除了掠夺财物之外，就是掠夺人口。他们很明白，只有人口迅速增加，才能带来更强的国力。

宋朝皇帝后来的回信大略是：

> 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远承信介，特示函书，致讨契丹，逖闻为慰。确示同心之好，共图问罪之师。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依与契丹旧数，仍约毋听契丹讲和。[20]

另外，宋徽宗也确认了女真拥有索回逃亡人民的权力。

赵良嗣此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但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和约也成了北宋的紧箍咒和女真人不断指责北宋违约的依据。

另外，双方对于和约的关注焦点也是不同的。阿骨打关注的焦点有两个：第一，北宋给辽国的岁币必须转移给金国；第二，双方约定夹攻辽国，但如果北宋没有按照约定完成夹攻，那么所有的协议都作废。

北宋关注的焦点却是另外两点：第一，金国不得与辽国讲和；第二，金国在夹攻辽国燕京时，不得越界，以免抢了北宋的果实。

两者关注的焦点又是有矛盾的。比如，如果在攻打燕京时，金国兵马先到了，按照北宋的观点，金国必须等待在边界之外，不能单独进攻燕京。等北宋的兵马从南面逼近之后，才能相约夹攻。可是按照女真的观点，一旦北宋兵马没有赶到，就是没有按照约定完成夹攻，那么所有的条约作废，女真可以单独进攻燕京，也不用将战果移交给北宋。

这样的理解在另一份文件中看得更加清楚。在以金朝观点记录的文献集《大金吊伐录》里，第一篇文字就载明了阿骨打当初谈判合约时的看法。其中写到，按照金人的理解，双方的和约意思是：夹攻燕西二京（现在的北京和大同，当时的燕云地区），随得者取地。[21]意思就是，只要有实力，就一起夹攻，如果没有实力攻克，也就没有资格获得土地。

女真人的看法更符合人之常情，相约夹攻并不保证北宋获得土地，只有能够打胜仗才可以。日后，双方的焦点就放在了谁更有资格获得土地，以及北宋要出多少补偿上。

赵良嗣离开时，金人还专门叮嘱他，这一次不要再耍花招，不要搞小动作，双方都必须遵守约定，回去后请北宋皇帝早日批准和约。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七月初六，赵良嗣返程。与他一同的还有金国大使锡剌曷鲁勃堇，以及副使大迪乌高随。两位使者带着国书，与赵良嗣于九月初四来到了北宋首都的国门。皇帝将他们当作新罗人接见，以掩人耳目。

九月十八，皇帝写好了回信，请金国使者启程，与金使同行的是北

宋使者马政和他的儿子马扩。

皇帝给阿骨打的信比较简单，其大意在上面已经引用。但由于双方的信件都过于简单，有许多细节没有说清楚，宋徽宗又专门写了一个事目（备忘录）交给马政，在事目中，他列举了一些没有在双方国书上写明，却必须弄清的事。比如，赵良嗣虽然与阿骨打口头约定，所谓的燕地也包括了西京的大同一带，但国书上写的只是燕地，是否包括西京，需要再次找阿骨打确认。

日后来看，这个事目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国书，将双方关注的焦点都摆了出来。

宋徽宗的事目一共列举了三件事，如下：[22]

第一，燕京一带必须包括西京在内。因为阿骨打曾经口头上告诉赵良嗣，他对西京不感兴趣，攻打西京只是为了抓住辽国皇帝。一旦抓到了，西京就没用了，到时北宋愿意拿去就拿去吧。

北宋所谓的燕云十六州从地理上说，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燕京及其从属的州，这些州都位于燕山以南和太行山以东[23]，是和北宋联系最紧密的州，也称山前诸州。阿骨打在国书里已经毫无疑义地许诺，只要北宋夹攻，女真不会与北宋争夺山前诸州。山前诸州包括燕州、涿州、易州、檀州、顺州。

第二部分是西京以及从属的州，这些州位于燕山以北或者太行山以西，也称山后诸州。包括云州、寰州、应州、朔州、蔚州、妫州、儒州、新州、武州。这些州是由金人负责进攻。按照赵良嗣的说法，阿骨打已经在口头上许诺给北宋了，只要拿到了辽国皇帝，就还给北宋。这些州里又有三个州距离北宋更近，分别是蔚州、应州、朔州。赵良嗣希望由北宋来进攻三州，金人没有表示可否，只说可以进一步讨论。宋徽宗希望马政能够和女真落实这三个州由北宋攻打。

第三部分是单独的，早期丢掉的营州、平州、滦州三个州。这三个

州女真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应。宋徽宗也忘了谈三州的事，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应该包括在燕地这个概念里。这一点，也成了后来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

宋徽宗备忘录里的第二条，是声明一下，之所以同意给金国这么多岁币（与辽国等价），必然是将西京及从属州包括在内，才能给到这么高。如果不包括，自然也不会给这么多。

第三条，宋徽宗怕女真人耍滑，专门提到所谓夹攻，必须是北宋出兵燕京和蔚州、应州和朔州的同时，金军也攻打西京。如果金军耍赖没有攻打，或者没有赶到，北宋没有义务遵守条约。他要求马政此行带回双方夹攻的确切日期，双方好做准备。

皇帝的备忘录已经将所有的模糊点都一一列出（除了忘列营平滦三州），如果马政此去能够将所有这些细节敲定，双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夹攻辽国了。

但在这时，事情起了变化。这不是一方出了问题，而是双方都感觉无法守约了……

【注释】

[1] 参考《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

[2] 参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3] 参考《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4] 《使北录》："贯又云：'已有人据易州……今已围霸州……'"

[5] 《使北录》，由《奉使辽金行程录》从《三朝北盟会编》中辑出。

[6] 《使北录》："悦辈士人，岂以礼数稍厚，遂隐虏情也！"

[7]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七年》："丁丑，高药师等兵船至海北，适遇女真逻者，不敢前，复回青州，称已入蓟州界，女真不纳，几为逻者所杀。"该书同时指出，另有记载高药师第二年正月初三回。

[9] 《三朝北盟会编》等书记为呼延庆。

[1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11]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四月二十七。

[12]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九月初九。

[13] 参考《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1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另据汪藻《裔夷谋夏录》，阿骨打提出了十大要求，从礼制到割地，到要求得到北宋岁币的一半。

[15] 参考《裔夷谋夏录》。

[1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参考《燕云奉使录》。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史补》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0] 以上两篇文章都是简版，更完整的版本在《三朝北盟会编》中有记载。

[21]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22] 《三朝北盟会编》，根据《大金吊伐录校释》引用。

[23] 燕山和太行山是中原和北边的天然分界线，如果北宋越过这道界限，就更有利于保护中原，甚至对北方民族形成威胁，所以宋金的争论焦点会在这里。

第四章
各怀鬼胎

渔猎民族的生活与外交

关于女真人的生活，最生动的记述来自马政的儿子马扩的记载。[1]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末，马政使团来到了金太祖阿骨打的营地。他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正是这时，马扩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真最生动的记载。出身武学的马扩也让女真人大开眼界。

之前，渔猎的女真人对文人治国的北宋怀有很深的偏见，认为南朝（即北宋）只会文章，不会武艺。马扩反驳说，宋朝也有会武功的人，文武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阿骨打让人拿来弓箭，想试一试马扩的身手。他指着一处积雪给马扩当目标，马扩立刻张弓搭箭，连续两发，全都射中。金人对这个武学出身的青年开始有了好感。

接下来，宾主双方上马打猎。在打猎途中，阿骨打传令，如果有野兽出没，女真人不得射第一箭，这个权力必须留给北宋使者。

当他们来到森林时，从林子里跳出来一只黄獐，马扩毫不犹豫一箭毙命，阿骨打拍手叫好。马扩由此获得了一个称号“也立麻力”，翻译成汉文，就是“善射之人”。

获得了女真人尊重的马扩也有机会与他们同甘共苦，深入观察他们的生活。

女真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就连金太祖也居住在帐篷中，只是偶尔有一两间简陋的屋子，可供皇帝暂时休息。行军时，阿骨打就坐在一张虎皮上。

女真人最喜欢的活动是围猎。他们分成部落，通过抽签决定出发顺序，两骑之间相距五步到七步，整个队伍有一二十里长。作为皇帝，阿骨打总是在队尾殿后的位置。

这条线状的队伍将一片地区围拢起来，逐渐收缩，直到首尾相接组成一个圆圈。在围拢之前，如果有野兽从圈内窜出来，人人都可以争相射杀，但如果有野兽从外面向里面窜，则必须请金太祖先射。

队伍首尾相接后，如同蛇一样继续穿插着形成一条螺旋线，直至密密匝匝二三十圈，随着内部区域的缩小，里面的野兽四散逃窜，被金人射杀。

马扩敏锐地观察到，金人在战场上的排兵布阵也大都是从围猎演化而来[2]，这个马上民族之所以善战，在于马背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猎获完毕，阿骨打铺开虎皮坐下，众人将猎物做熟了，开始吃饭。金人的餐食除了粳饭之外，还有盐渍的韭菜、野蒜、长瓜，剩下的都是各种肉食，煮熟的、烤的、生吃的，如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蛤蟆等。金人用随身携带的刀子边割肉边吃，显得极其原始。

马扩同时还注意到，虽然阿骨打还保持着极端的朴素作风，女真的子弟们却已经开始追求奢华生活。阿骨打不盖宫殿，不要人伺候，但他已经从辽国上京俘虏了不少乐工，在屋外演奏音乐助兴，那些贵族子弟学着玩乐，阿骨打也不以为意，装作看不见。

阿骨打的最重要的谋臣，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粘没喝。粘没喝的汉名叫作完颜宗翰，而北宋的人们习惯上称他为粘罕。粘罕是国相撒改的儿子，他在金国侵宋的过程中，是最坚决也是功劳最大的，但在接见北

宋使节时，他们父子也对马扩赞赏不已，“善射之人”的名号就是撒改提议的。

从马扩的记载来看，金人和宋使打成一片，仿佛是一家人那么亲近。但事实却总是让人惊诧。

实际上，马政出使的任务完全没有完成。

马政一行来到金国，他们发现宋徽宗备忘录中列在首要位置的事件都被金人否定了。

比如，阿骨打承认燕地数州已经许诺给北宋，由北宋进行收复。但当马政谈到西京和山后诸州时，阿骨打却表示没有这回事。

阿骨打的否认也让这件事成了千古之谜——女真到底有没有将西京所代表的山后诸州许诺给北宋呢？

如今，支持正方观点的原始文件只有赵良嗣本人所写的《燕云奉使录》，其中记载，当赵良嗣提出燕地也包括了西京和山后诸州时，阿骨打声称只要捉拿了辽国皇帝，就把西京交给北宋。[3]其余的文献都是引用他的回忆录，不能算是一手资料。

关于山后诸州，金国与北宋的国书上并没有记载。之后，金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那么，当初阿骨打到底是否许诺了西京呢？

最大的可能是双方的确讨论了西京的问题，但由于是非正式场合，阿骨打说完之后并没有当回事，忘记了。赵良嗣反而将这句话记住，写入了回忆录。阿骨打的本意是只还燕京和山前诸州。另外，当时女真刚刚获得了辽国的上京，还没有时机考虑更多的地理问题，也没有理解西京的重要意义。

宋徽宗反而更加注重西京，听赵良嗣汇报后，一定要澄清西京问题。当马政再带着这个问题回到阿骨打处，阿骨打已经更加了解了西京的重要性，加之这个问题并没有写入国书，即便在非正式场合提到过，

也可不作数。

阿骨打甚至跟他的手下谈到，女真要想强大，必须占据山后诸州，以及获得燕地的人民。否则怎么制衡北宋？如果达不成协议，连山前诸州也一并拿过来，大兵压境，北宋又有什么办法？

反而是粘罕劝说阿骨打，宋朝之所以疆域如此广阔，一定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还是要和它搞好关系为上。

在马扩所写的吃肉饮酒背后，实际上是刀刀见血的国际关系较量。而之所以送他们去打猎，也是不和他们谈实务，只是吃喝玩乐罢了。

这里就有一个国际上的外交问题：在谈判中双方都会做无数的许诺，到底哪些许诺可以当真？哪些许诺说过就需要忘记？

答案是：只有写入正式文件的，才是双方必须遵守的。口头承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能被赖掉。更何况许多许诺都只是说一下，甚至说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

除了西京和山后诸州，马政的另一个问题是营平滦三州，阿骨打也一口否决了。这样，宋金的协议就变成了只针对燕京和山前诸州。

关于夹攻的日期也没有定下，由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定论，金国再次派出原来的使者与马政一并去往北宋，继续谈判。

但这时，不仅金国内部对和谈出现了疑虑，就连北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夹攻辽国已经不是宋徽宗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两场突如其来的起义震撼了北宋朝廷。宋徽宗一直重用朱勔等声色犬马之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太大恶果。但在最关键的时刻，报应来到了。

主动权拱手相让

宣和二年十月，也就在马政到达金国营地时，在东南方的睦州（现

浙江淳安），一个叫作方腊的人决定起兵对抗北宋政府。

睦州坐落于山谷之中，物华天宝，是个富裕之地。方腊是当地一个家境不错的商人，拥有自己的漆园，这样的人本来是北宋社会的中流砥柱，却由于朱勔的花石纲受到了骚扰。

由于皇帝将搜刮东南方物的特权授予了朱勔，他的造作局不断地从各地获取皇帝喜爱的东西。从一块石头到一棵树、一个盘子，任何他看上眼的东西都不惜一切代价拿到。不好运输的，就把人家的院墙、大门拆掉，将院子刨空。所谓送给皇帝也只是借口，这些东西只有少部分真的运到了汴京，其余大部分都落入了朱勔父子的腰包。人们送朱勔一个称号：东南小朝廷。[4]

除了自己受到骚扰，方腊发现周围的受害者也越来越多，对花石纲充满了怨气，于是决定联合民众一同起兵。他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带有很强的道教色彩。[5]

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已经占领了杭州，郡守赵霆弃城逃走，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被杀，起义军纵火六日。由于有着明确的仇恨目标，方腊的军队将所有能抓住的官吏都折磨致死，要么乱箭齐射，要么肢解、掏出肥肠，要么将人熬油。第二年春天，又攻陷了婺州、衢州、处州，骚扰了秀州。

北宋为了镇压方腊，已经无力进行北伐，于是，联金攻辽的事情退居二线了。皇帝原本派出童贯准备北伐事宜，从西北与西夏接壤的环庆路和鄜延路（现陕西和甘肃一带）调来了更加善战的士兵。但这些士兵来到中原，并没有北上，而是突然被调到了南方，在童贯的率领下去镇压方腊了。

方腊起义，一共破了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平民死亡二百万以上。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四月，方腊事件终于平息。抓住方腊的就是后来的名将韩世忠。他当时只是参与镇压的将军王渊的一名裨将。但

方腊事件中获益最多的，却是宦官童贯，他的名声更加响亮了。

在宣和三年二月，北方的宋江也起兵反对朝廷，在海州（现江苏连云港）被张叔夜击败。

这两次起义的时间都不长，却由于发生的时间太敏感，直接打乱了宋朝的经济计划。本来北宋的财政就捉襟见肘，不断靠加税筹集北伐资金。皇帝却不得不把钱重新分配到镇压起义上，影响了北伐。另外，北宋灭亡后，当南宋高宗逃到东南，那儿正是方腊曾经起兵的地方，原本储存着大量的粮草，却由于镇压方腊耗光了，让原本孱弱的新政权更是举步维艰。

同样是宣和三年二月，在二月二十七这一天，金国使臣锡剌曷鲁与大迪乌高随，随着出使金国的使节马政等人，在登州登陆，准备前往汴京去完成外交使命。但在登州，他们却被守将滞留了下来。原来，守将知道掌管与金人和议事宜的童贯已经调往了南方，如果这时将金使送往京城，只会让他们看到朝廷的一片混乱景象，不如等童贯结束了征讨，再安排他们进京。

金使并不知道北宋的情况有了变化，对他们来说，滞留使臣就意味着对和约的背叛，他们非常愤怒，甚至想不经过守将的安排，徒步到京师去。

宋徽宗迫不得已，才下诏让马政等人引金使到京师等待。

五月初一，金使到了京师国门，由于童贯还没回来，接待金使的是国子司业权邦彦，以及观察使童师礼。对于如何处理金使，大家意见也不一致。由于北伐与谈判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童师礼认为应该以辽国知道了他们的和约为借口，将金使打发回去，不再理睬。但权邦彦却认为这样是北宋违背了和约，给金国留下了把柄。既然事情由童贯负责，不如就等童贯回来再做决定。于是，金使又在京师等了三个多月。[6]

八月份，童贯终于回来了，但童贯的意见又和当时的宰相王黼不合。经过一番争议之后，宋徽宗终于采纳了宰相的意见，用一封模棱两可的信将金使打发了。这封信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它几乎什么都没说，但也没有否定和约，等于将皮球踢回了女真一方。[7]

不过，这招看似不错的棋，却留了一个死穴。宋徽宗含糊地应承说同意最初的讨论，而没有指出双方的矛盾之处。在女真人看来，就是大宋皇帝同意了阿骨打的意见，即北宋只谋求燕京和山前数州。如果和约从此失效，宋金再也不联系了，倒也无所谓。可一旦和约重启，北宋有求于金国，就意味着自己已经理亏了八分，再想争取利益就难了。

另外，宋廷也没有再派使者，只是将皇帝的书信交给金使，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让女真人感到北宋的悠忽不定，不像是诚实的人该做的。

八月二十，金使离开了京城，宋徽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他不知道，就在他忙于镇压方腊叛乱时，战争的天平已经再次倒向了阿骨打。

突然加速的灭辽竞赛

天祚帝保大元年二月，辽国的宫廷斗争达到了高峰。辽国天祚帝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习泥烈是昭容所生，次子晋王敖卢斡出自文妃，剩下两子（秦王定和许王宁）出自元妃。

在四个儿子中，最贤能的是次子晋王，文妃也深受爱戴。这引起了更受宠的元妃的猜忌。元妃和哥哥枢密使萧奉先污蔑文妃和姐夫达曷里、妹夫耶律余睹谋反，天祚帝于是杀死了文妃和达曷里，一年后又赐死了亲生儿子晋王。只有耶律余睹逃走了。

耶律余睹逃到了金国，受到了皇帝阿骨打的重用，成了金国重要的谋臣。在耶律余睹的帮助下，金国进攻辽国的计划更加清晰。

但即便到了这时，金国仍然没有发起进攻。阿骨打等待的是北宋的消息。他没有违背与北宋夹击辽国的誓言。

十一月，出使北宋的使臣终于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宋徽宗的信件，却没有带来新的使臣。阿骨打一看就明白：北宋又爽约了。

他立刻下令对辽国的中京发动进攻。在耶律余睹的引路下，由阿骨打的弟弟国论勃极烈吴乞买（后来的金太宗），以及将军粘罕、兀室率领，进攻中京。第二年正月十三，辽中京陷落。[8]到这时，金国已经占领了辽的上京、东京和中京，掘了辽国皇帝的祖坟，接下来，就是向辽国仅剩的两京，也是燕云十六州的核心区——南京和西京——前进了。

对于金国更有利的是，辽国的天祚帝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就在失去中京的同时，天祚帝首先想到的是逃跑。如果他留在南京（燕京），等阿骨打打过来，他连逃跑的地方都没有，辽国的疆域本来就是一块疆界不甚清晰的区域，只有西北方才有更广阔的部落区域供他隐藏。于是，天祚帝将南京事务交给了燕王耶律淳，宰相张琳、李处温，自己则逃往了燕山以北的鸳鸯泺（现河北省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听说耶律余睹成了带路人，他杀掉了亲儿子晋王，随后在白水泺（现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被金人击溃，又逃往了西北部的云中地区（即大同附近），又从云中逃往一个叫作夹山的地方（可能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面大青山）。金人一直尾随他，将云中、朔州、蔚州等地都拿下，西京也在四月份被拿下，金国获得了辽国的西部地区。

在燕京留守的李处温见天祚帝只知道逃跑，与诸位大臣商量另立皇帝，参与的人有都统萧干，以及大臣耶律大石（后来西辽的建立者）、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人，他们一同来到耶律淳的府邸，请耶律淳即位。

耶律淳并不情愿当皇帝，但在众人的哀求下，勉为其难登上了宝座，号称天锡皇帝，将远方的天祚帝降为湘阴王。

此时的辽国实际上分裂为两部分，分别是天锡帝控制的燕云地区，以及天祚帝名义上控制的西部、西北、西南，但这些地区主要是各个蕃部，并不是直属领地。至于上京、中京和东京地区，大都已经陷入女真之手。

四月，即天锡帝即位一个月后，首先想到要和北宋搞好关系，毕竟宋辽已经维持了百年的和平，他们也并不知道宋金的外交情况。天锡帝派出宣徽南院事萧挞勃也、枢密副承旨王居元，到宋辽边界的白沟，希望得到北宋的承认。但北宋以天祚帝还活着为由，拒绝承认天锡帝的政权，将辽使赶了回去。[9]

宋徽宗之所以不承认天锡帝，是因为他也在准备进攻辽国。金国迅速进攻时，宋徽宗首要的任务是润色他的御制《艮岳记》。随着艮岳接近完工，需要一篇特别的文章来纪念它。就在辽中京即将陷落时，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正月初一，宋徽宗完成了《艮岳记》，将这片皇家园林吹嘘得天花乱坠。[10]

十三天后，辽中京陷落，宋徽宗才想起来，必须尽快出兵燕京，才能避免落在金国后面。一旦金国首先攻克了燕京，北宋想要拿回来就困难了。

三月十七，金国从西北方给北宋代州的守军发来了军牒，声称金国已经占据了山后地区。由于辽国的居民纷纷从金国占领地区逃往北宋境内，金军发牒，要求北宋边境守军不得收留难民，否则后果自负。[11]

军牒传到皇帝处，更增加了出兵的急迫性。

四月，就在天锡帝派遣使臣前来时，宋徽宗却派遣童贯任宣抚使，率领十五万兵马北上收复燕京。这一仗，是北宋能否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关键。

大军定于十四出兵。宋徽宗从斋宫的端圣园中出来观看出兵仪式，他给童贯的命令分为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指的是如果燕京人民列队

欢迎北宋的军队，宋军就乘机顺利拿下，恢复旧疆土；中策是，如果辽国天锡帝再识趣一点，向大宋称臣，就保留他的藩王地位，这等于是收复了旧土，但燕京还是交给契丹人统治，只是恢复了名义统治权；所谓下策，就是燕京人民不想回来，天锡帝也不想称臣，那很可能就陷入僵持局面了。[12]

四月二十三，童贯驻军前线的高阳关。

五月初九，宋徽宗任命蔡京的儿子蔡攸作为童贯副手。蔡攸显然是去分功的，因为他认为这次战役只是一次走过场，大宋必胜无疑。五月十二，在辞别皇帝时，正好有两个貌美的侍女站在皇帝身边，蔡攸请求说："等臣得胜归来，希望陛下将她们赏赐给我。"如果在平时，索要皇帝的女人是死罪，但宋徽宗却笑了起来，没有责备的意思。[13]

五月十三，童贯将前线大军分成了两路，东路军的中心在雄州，由名将种师道指挥，屯扎在前线附近的白沟；西路军的中心在广信军（现河北保定徐水区西），由另一位著名将领辛兴宗指挥，屯扎在范村。

在所有的将领中，最著名也最有经验的是老将种师道。[14]种师道长期在西北方与西夏对峙，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并不赞成与辽国作战，认为宋辽已经息兵上百年，不应该挑起战端。但他仍然遵从了童贯的调遣，率兵上阵。他名义上是指挥官，却处处受到童贯的节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指挥军队作战。

雄州知州和诜向童贯献策，他认为燕京人民早就欢迎宋军驾到了，应该以攻心为原则，降下黄榜和大旗，告诉人们攻打辽国是不得已，并严明军纪，不准抢杀，如果辽国守军能够率城投降，就授予节度使的官职。

童贯听后大喜。为了贯彻这条计策，童贯派了张宝[15]、赵忠两位使臣前往燕京，劝说天锡帝投降。天锡帝将两人砍了头。另一位使臣赵翊被派往了易州，希望劝说那儿的守军史成投降，被史成抓起来送往燕

京，随后也被砍了头。

既然天锡帝不识趣，就只有兵戎相见了。

五月，童贯派遣名将种师道率兵逼近。辽国开始感到恐慌。但童贯仍然没有做好出兵的心理准备，宋军也没有越过两国边界。童贯还是希望通过压迫，让天锡帝投降。他再次派遣了一位使臣前往燕京。童贯选择了数次出使金国的马扩，希望借助他的视野劝说辽国服从。鉴于前面几位使臣刚刚被斩杀，使臣已经成了高危职业，但马扩还是欣然前往。

马扩这次出使充满了惊险。在离开前，他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对童贯请求了三件事：第一，严肃军纪，不要让士兵抢财物，也不要接受下属的供奉；第二，不要杀降，攻心为上；第三，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在乎使者的安危。

五月十八，马扩过了宋辽分界的白沟，到了新城（现河北高碑店），辽国派接伴使迎接。也是在同一天，辽国大将耶律大石率领两千骑兵屯驻新城。

马扩出使的路上有上百燕京父老询问他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叫作刘宗吉。

刘宗吉夜间求见马扩，告诉他辽国看似嚣张，但其实军力有限。比如这次出军，号称两千骑兵，实际上只有四军大王（统帅契丹、渤海、奚、汉四军）萧干的三百多骑兵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其余还有六七百军马，但都是纨绔子弟，没有打过仗。这些军队都在白沟北岸结营，士兵很懒散，马也是散放的。如果宋军得到消息，能够迅速掩杀过来，就能把这部分辽军精锐打败。

刘宗吉希望马扩给他写几个字，好到宋军阵营将消息传递过去，立一大功。马扩立刻照办，不仅写了字，还将童贯送的新鞋分出一只来交给刘宗吉做信物。

由于刘宗吉的情报，马扩更有了底气，前往燕京也更加理直气壮。他在燕京城内和辽国大臣们激烈地辩论着，甚至告诉他们，大军压境，只在旦夕，一定要认清形势。

但这种说法最初还管用，后来似乎辽国人不在乎他的恐吓了。马扩这才听说，原来宋军已经吃了败仗，刘宗吉已经死了。

回溯到五月二十六，种师道的部队遭到了耶律大石的袭击。之前，他在白沟之南驻扎，当童贯得到了刘宗吉的情报，听说辽军非常弱小之后，逼迫种师道赶快过河侵入辽国的领土。

种师道迫不得已，只好在蓝沟甸过河。但他的军队刚刚过了一小部分，就遭到了耶律大石的袭击。裨将杨可世的部队是损失最严重的，其余的部队只好回到了白沟之南。刘宗吉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杀的。[16]

五月二十九，耶律大石和萧干派遣使者责备种师道毁约。种师道自知理亏，便向童贯请示该怎么办。童贯慌了神不做指示，北军越过边界杀来，南军向雄州且战且退，由于风雨大作，士卒惊走，互相践踏死者也不少。[17]另外，西路军在范村方向也吃了败仗。

这两场败仗，将宋军的无能展现给了辽军。

马扩在燕京恰逢种师道（杨可世部）的第一次失败，他感到了性命之忧。他立刻强词夺理告诉辽人：我是为了和平目的来的，刘宗吉找我，是想投降大宋，作为大宋的使臣，我自应该为他牵线搭桥写封信，有什么错？杨可世的军队是来纳降的，不是来打仗的，在渡河过国界之时就已经领受了不可作战的命令，所以才会被不明就里的辽军打败。辽军自以为得胜，实际上是杀了不少为和平目的而来的宋人。

马扩自以为必死，他在忐忑中等了三天。五月二十九，突然来了一位叫作王介儒的官员，宣布将他放回，并一路陪同他前往宋境。

在路上，王介儒和马扩的谈话成了解读边境地区人民心理的一把钥

匙。[18]

王介儒看到路边村庄一片兵荒马乱，感慨说："两国太平了上百年，白发老人都没有见过战争，一旦兵戈再起，能不悲伤？！你们总是说燕京父老都在怀念大宋，殊不知自从契丹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燕京父老对辽国难道没有感情？"

马扩争论说："大宋之所以夺燕京，是因为金人打过来了，皇帝为了救燕京父老，不得不收复它。"他把大宋比作燕人的亲爹，大辽比作燕人的养父，责备燕人不能只看养父，不顾亲爹。

虽然离开了燕京，但马扩的危险还没有过去。当晚在新城住下，王介儒突然告诉马扩，在白沟的四军大王萧干突然要求见他。于是，马扩最危险的时候来到了。萧干已经知道了是马扩推荐刘宗吉来攻打自己的，这下报仇的时候到了。

幸运的是，萧干为了准备与种师道的战事，抽不出时间来，只好让耶律大石代替他见了见马扩。耶律大石也指责宋军不守信义，但没有加害马扩，将他放走了。

马扩一路上最想不通的地方就是，根据观察，辽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宋军又有十几万大军，只要掩杀过来就势如破竹直捣燕京。但为什么宋军的军事行动一直犹犹豫豫，没有全力而上呢？到了童贯处，他发现了真相。

在童贯处，当马扩向他汇报时，他的属下都站在周围咬牙切齿，恨不能立刻杀了马扩，比契丹人都激动。

原来，当种师道遇到抵抗之后，童贯及其属下立刻害怕了，责怪马扩传递了错误情报，才死了这么多人。他们以为辽军还很强大，不敢出兵攻击，只一味采取拖延战术。又为了推卸责任，向皇帝上报，说契丹人很强大，所以才吃了败仗。

替罪羊也都找好了。根据童贯命令，种师道于六月初三退守雄州。他是一位合格的将军，虽然吃了败仗，却尽量保持了军队的完整，不至于大败。所谓败仗也只是因为受到了童贯的干扰，无法按照自己意图作战导致的。但种师道成了替罪羊，被迫退休。受到处罚的还有雄州知州和诜，以及高阳关守侯益，因为他们不断地宣称辽军很弱小。这和童贯的论调正好相反，童贯吃了败仗之后一直宣称辽军很强大。

在一片汹汹声中，马扩保全了性命。童贯没有指责他，反而偷偷安慰他，但让他保持沉默，不要再拿辽军弱小的说辞来迷惑人。

六月初六，童贯将辽使王介儒送回。临走前王介儒还耿耿于怀指责北宋出尔反尔，燕京人民已经习惯了在大辽生活。

六月十二，皇帝下令班师。宋军第一次收复燕京之战在一片乱糟糟中落幕。这场战争没有达到收复燕京的目的，反而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宋徽宗的财政又不够用了，只好加了酒税和买卖田宅的契税，[19]北宋人民的负担加重了。

第二个更加危险。当宋军出征的消息传到了女真耳中时，皇帝阿骨打已经占领了西京。在燕京的问题上，阿骨打却犹豫不决。由于宋徽宗送回了他的使者，却并没有指定夹攻的日期，那么，金军是否应该进攻燕京呢？

如果不进攻燕京，一旦北宋军队拿下了燕京，就有可能以燕京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金军没有提供帮助为借口，不再支付岁币。如果金军抢先攻下了燕京，把宋军排除在外，就占领了整个辽国。阿骨打的眼中看到的是北宋的岁币，他更愿意用燕京去换取众多的金银、布帛和奢侈品。

他决定再派一个使团到北宋询问情况。这个使团于五月十八从金军营地出发，使团成员包括徒孤旦乌歇、高庆裔等人。[20]阿骨打给宋朝皇帝的书信中专门强调了大金的武功，并说明燕京的天锡帝耶律淳已经

派人去请和，大金只是碍于与北宋的和约在先，才没有同意，他希望北宋皇帝告诉夹攻的日期。

使臣需要先到高阳关去见童贯，再去京师见皇帝。也因为这样，路上行程花了更长的时间，直到九月初三，他们才进入国门见到了宋徽宗。

就在女真使团在路上时，传来了另一个消息：大辽天锡帝耶律淳在南京去世了。

天锡帝即位不久，在六月就得了病。[21]恰好这时，天祚帝在西北方突然决定召集人马返攻燕京，他收复了朔州、应州等西北州县，天锡帝听说后，病情加重。但天祚帝的攻势并没有维持太久，金军就夺回了朔州和应州，将他再次打回了西北的夹山。不过天祚帝再次远离并没有给天锡帝帮上忙，他六月二十四就去世了。

天锡帝死后，燕京政权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宰相李处温想投降北宋，并事先做了准备，但另一个权臣萧干捷足先登，抢先立了天锡帝的皇后萧氏为皇太后，天祚帝的次子秦王为皇帝，权力掌握在萧后和萧干之手。他们杀掉了李处温，继续与北宋对抗。

萧后和萧干对汉人不信任，这让辽国上下更加离心离德。宋朝也乘机让童贯和蔡攸重新治兵，由于种师道已经辞退，这次带兵的是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22]

虽然天锡帝去世带来了好机会。可是，宋朝国内却弥漫着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比如，刘延庆虽然接受了带兵的命令，可是他私下以为，最好稳重一点，不要进军，干脆让女真的兵马进入居庸关，攻克了燕京，我们再用岁币把燕京买回来，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收复失地，才是万全之策。[23]

在这种论调的笼罩下，宋徽宗和大臣们与金国使臣相周旋，他们达成了互不追究以前失约的共识，决定将和约继续推行下去。皇帝和大臣

们对金国使节大献殷勤，允许他们在皇帝的宫殿里享宴。九月十八，宋徽宗下令由赵良嗣担任正使，马扩担任副使，从登州海道出发，与女真使者一道启程，履行最后的约定。

宋徽宗在国书中仍然采用了模糊战术，继续表示一切都依照前约。但在事目中，却有了不少变化。首先，他仍然强调要燕云所有州县（包括山前、山后诸州）都一并收复；其次，他解释道，宋军已经打了不少胜仗，只是为了守约，才没有占据燕京；最后，宋徽宗又在进军次序上让了一步，以前是让金军必须在关外等待宋军收复燕京，不准入关，但现在表示只要是双方夹攻，谁先进攻燕京都可以，不管谁攻下来，北宋都照样会向金国缴纳岁币，隐藏的意思是，哪怕金国收复了燕京，也必须卖给北宋。

这些观点放在一起是矛盾的，一方面宣称自己大胜，另一方面又指望金军收复燕京。马扩看完大吃一惊，大叫大事去矣。

宋徽宗更画蛇添足的是，在事目中还尽力诋毁西夏，说西夏帮助了辽国的天祚帝对抗金国，希望将战火引到西夏去。这种做法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金国更看不起。

不管怎么说，皇帝这次看上去是想尊重和约精神。但实际上，九月十八，皇帝刚把金使和宋使送上路，几天之后他又改变主意，决定依靠宋军自己的力量完成收复。促使皇帝做出改变的，是另一件事：九月二十三，也就是使臣出发五天后，突然传来了辽国大将郭药师投降北宋的消息。[24]

【注释】

[1] 《茅斋自叙》，原出于《三朝北盟会编》，但现在《奉使辽金行程录》做了一个很好的辑本，本书首先参考该书的记录。

[2] 《茅斋自叙》："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

[3] 《燕云奉使录》："良嗣问阿骨打：'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则并西京是也？'阿骨打

云：‘西京地本不要，止为去拿阿适，须索一到，若拿了阿适，也待与南朝。’”原注：阿适，天祚小字。

[4] 参考《宋史·佞幸传》。

[5]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

[6] 《三朝北盟会编》引《北征纪实》：“时童贯捕方腊，宣抚东南未归，而女真使人同马政等复至。时上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有旨谕女真使人可复回也。”

[7] 《三朝北盟会编》：“八月，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远勤专使，荐示华缄，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谕。惟夙惇于大信，已备载于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兵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顺履清秋，倍膺纯福。今孛堇曷鲁、大迪乌回，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三年》。

[9] 参考《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中》。

[1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四年》。

[11]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吊伐录校补》。金国清楚人口的价值，战胜之后首先要的是人口，其次才是土地。

[12] 参考《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中》《三朝北盟会编》。

[13]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14] 参考《宋史·种师道传》。

[15] 《茅斋自叙》作张宪。

[16] 根据马扩的记载，这次战斗可能发生在更早的三天前。

[17] 参考《独醒杂志》。

[18] 参考《茅斋自叙》。

[1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四年》。

[2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1] 参考《契丹国志》。

[22] 参考《宋史·徽宗纪》。

[23] 《茅斋自叙》：“仆时随宣抚司在河间，窃闻刘延庆与幕府议：‘持重不可进兵，使女真军马先入居庸关，收下燕京，然后多以岁币赎之，此为万全。’”

[24] 《宋史·徽宗纪》：“甲戌，遣赵良嗣报聘于金国。己卯，辽将郭药师等以涿、易二州来降。”

第五章
买来的胜利

摇摆的军事与外交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辽国发生高永昌内乱，金国乘机将辽国东京一带收入囊中。辽国为了报仇，成立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号称“怨军”。怨军的士兵来自辽东地区，名称是向金国报仇的意思。郭药师是怨军的一名统帅。

在与女真的战斗中，怨军并没有展示出作战素质，反而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发动了叛乱。在这场叛乱中，郭药师和辽国朝廷站在了一起，将同伴镇压。

在辽国君臣讨论中，到底如何处理怨军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两位大臣耶律余睹和萧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主张。耶律余睹担心怨军以后还会闹事，提议将怨军解散，乘机杀光，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萧干建议保留怨军，只是将它拆为四个营，分别由四人统领，郭药师是其中之一。

天锡帝耶律淳即位时，怨军改名为常胜军，郭药师部也调到了与宋军对垒的涿州。随着萧太后掌权，对汉人和非契丹人越来越不信任，作为汉人的郭药师决定投降宋朝。[1]

九月，萧干从燕京来到了涿州，郭药师害怕他是来处理自己的。于是和同伴们商量投诚。他们在宴会上甚至劝说萧干也投诚。萧干知道了他们的意图，连忙逃走了。郭药师觉得事不宜迟，率领精兵八千、铁骑

五百，与易州（易州有五千人马）守将高凤[2]一起投降了宋朝。

经过屡次败仗之后，北宋不费一兵一卒，突然获得了涿州和易州，这对宋徽宗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大喜的同时，皇帝立刻宣布发兵燕京，依靠北宋自己的力量消灭残辽。郭药师这支生力军也被编入了刘延庆的部队，他们从雄州出发，前往新城。

鉴于宋军实力增强，皇帝确信不靠金军也一样可以获胜。到底要不要金国出兵，又成了问题。

恰好在这时，有消息传来，阿骨打已经不在东北地区，而是到了北方的奉圣州（即新州，现河北省涿鹿县涿鹿镇，距离北京已经不远），出使的人就不用渡过渤海去找他了。宋徽宗连忙下命令，让使者改道。

赵良嗣和马扩已经到了距离渤海湾不远的青州，得到新的指示，重新折回去，从济南渡过黄河，经过河北地区的邢州、洺州，通过井陉进入山西，抵达代州的朝谷寨。

除了命令使者改道之外，宋徽宗还留了个心眼，请赵良嗣注意战争形势的变化，如果宋军已经占领了燕京，就不要让金兵入关；如果还没有占领，说明仅仅靠宋军对付不了辽国，就请金兵入关夹击。

十月二十一，使者过了宋金边界。十月二十二，在应州之南见到了元帅粘罕。十月二十三，粘罕只准两人各带一个从人，骑马赶往奉圣州，路上经过蔚州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人烟。由于战争爆发，加上金国时常在边境掳掠人口，当地人基本都已经逃走了。

十月二十六，宋朝使者见到了阿骨打，将国书交给了金国皇帝。

十月二十七，金国派出皇叔蒲结奴和二太子斡离不（他的汉语名字是完颜宗望，但当时宋人的记载往往称他的金文名字斡离不，或者直呼二太子），与宋朝使者展开谈判。谈判的场地在一个毡帐之中，气氛显

得剑拔弩张。金国首先谴责宋徽宗几次三番抵赖，拖延和约，最后亮出了底牌。这次，他们同意将已经拿下的西京交割给北宋，但同时，金国决定出兵燕京，亲自将燕京拿下，至于是否将燕京交给北宋，还要看情况再说。

赵良嗣听了顿时错愕不已，他据理力争痛斥金国反悔协约，并表示，如果不给燕京，北宋是不会接受西京的。与燕京比起来，西京由于地处雁门关外，已经比较偏僻，地位自然要差很多。

谈判不欢而散。根据马扩的猜测，金国之所以提出归还西京却不归还燕京，是因为他们听说北宋大军已经到达了燕京城下，准备进攻了。金国不想让北宋得到燕京，于是利用西京转移北宋的视线，好出兵迅速占领燕京。

到底金国的计策能不能得逞，就要看北宋能不能迅速占领燕京了。

十月二十八，宋金继续谈判。令人惊讶的是，金国突然又撤回了前一天的提议，改为：西京和山后诸州不再归还，只归还燕京和山前六州二十四县。所谓燕京六州，指的是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其中涿州、易州已经在北宋手里，所以，金人实际上只给燕京和其他四州。

为什么一天之内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是：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已经打进了燕京城。消息传来，金国知道燕京已经到了北宋之手，他们已经没有了进军理由，只好决定将附近六州割给北宋，但西京却不会再给了。

同时，金国提出要求，即便得到六州，北宋也必须交足岁币，并把所有的难民都遣返回金国界内，所有的物资都必须归属金国。

虽然谈判仍然很艰难，但知道宋军打进燕京城，赵良嗣还是兴奋不已，他作诗一首：

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

马扩则劝他冷静一下，毕竟使命还没有完成。

事实证明，郭药师的常胜军战斗力比起宋军来强了很多。这个刚投诚的人一心想要立功表现，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不参与宋军的钩心斗角，一切只从战争的逻辑去考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夺取燕京。

就在两位使者与金人周旋时，刘延庆、郭药师部队已经从新城出发前往涿州，另一支部队由刘光世（刘延庆之子）、杨可世率领，从安肃军出易州，与前军在涿州会合。

宋军一共动用了五十万兵力，他们来到了燕京南面的卢沟河畔。辽军统帅萧干在距离燕京城十里外扎营，与宋军对峙。[3]

刘延庆并不愿意打仗，一心指望从金军手中赎买。他的军纪很差，在良乡遭到了萧干的袭击，躲入军营避战。

这时，郭药师看到了辽军的问题：辽军一共不过万人，倾巢而出与宋军对垒，这说明燕京城必然已经空了。他大胆提议亲率五千精兵，奇袭燕京城，同时请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作为后继。

刘延庆同意了这个作战方案，派郭药师和大将高世宣、杨可世一同率领六千兵马，趁半夜渡过了卢沟河。到了天明，军马已经赶到了燕京城外，常胜军统帅甄五臣率领五千骑兵从迎春门夺门而入，郭药师也跟着进入燕京。他一边指挥巷战，一边派人找萧太后，让她投降。到这时，燕京城已经成了宋军的囊中之物。

探马把消息带到了北方的奉圣州，让阿骨打和他的大臣们感到沮丧的同时，也让宋使高兴。

但宋使不知道的是，也是在同一天，由于刘光世的后继部队没有赶到，郭药师等人差点在燕京全军覆没。萧太后并没有投降，而是赶快找

人通知良乡的萧干，萧干立刻派三千精兵赶回增援。高世宣死难，郭药师在损失了一大半人马后，与杨可世从城墙上吊绳逃走。第二天，萧干又故意泄露消息给俘获的宋军士兵，说辽军有数倍于宋军的援军赶到，举火为号进攻。

萧干故意让这个宋军俘虏逃走，把消息传给刘延庆。这位宋军的最高统帅相信了。当看到火起，立刻烧营逃走，在百余里的逃亡之路上布满了宋军的尸体和盔甲。辽军追到涿水才退回，宋军一直退到了雄州。从宋神宗以来，北宋就在边境上储存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以为战备之需，这一次丢失殆尽，即便宋军想再组织一次进攻，都没有能力了。[4]

在这次战争中，唯一问心无愧的是郭药师，他的一腔热情被宋军内部复杂的关系牵制，最终变成了泡影。就算是输了，他还是在尽心尽力地保卫北宋江山。萧干击败了宋军后，再接再厉，于十一月二十七攻陷了属于涿州的安次、固安两个县。十二月初三，郭药师击败了萧干，收复了两个县。[5]如果没有郭药师，宋军将崩溃得更加彻底。

攻克燕京，漫天要价

宋军吃败仗的消息并没有马上传到金军大营。他们还在写国书并送回北宋使者。按照金军规划，由于之前宋朝屡屡违约，西京和山后诸州都不准备还给宋朝。营平滦三州是更早的刘仁恭父子交给契丹的，也不会交还。北宋为了山前六州，必须每年付给金国岁币五十万。金军从山西回北方时，北宋必须提供方便，借给金军道路。山前六州的汉人归属于北宋，其余各族人以及所有物资都属于金国。

这些条件被写在国书里，交给金国使者撒卢母、李靖、王度刺，与北宋使节一同送回。

但就在北宋使节准备离境时，金军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北宋使节只能回去一个，另一个必须留在金军大营作为人质，以防止宋军占领燕

京之后，守住各个关口将金军拒之门外。

马扩请求留下做人质，赵良嗣与金国使者一同回去。马扩成了金军进入燕京城的最佳见证人。

事实上，偷偷请金军进攻燕京的，还是宋朝的童贯和蔡攸。由于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夺回燕京，他们秘密派遣一个叫王环的人从太行山的飞狐陉去往金军营地，请求阿骨打出兵攻燕京。

阿骨打即将出兵时，也恰是金国使臣到达宋廷的时刻。于是，在军事和外交两条线上，宋金都在做着激烈的争夺。

在外交上，赵良嗣与金国使者于十一月初三从金军营地出发，十一月二十一到了汴京。十一月二十五，宋徽宗接见了金使。之所以推迟接见，很可能是因为金国的要求让北宋难堪，皇帝在商量对策。

金使已经和宰相王黼吵了起来，王黼还想争取一下，将西京和营平滦三州拿回，但金使说这样简直没法谈，双方分歧太大，只是白白地往返。

王黼认为，当初宋朝认定要获得燕云十六州所有土地，才答应给金国那么多岁币。如果无法获得全部州县，岁币也应当相应减少。

到后来，宋徽宗比王黼开通一些，决定将西京问题搁置，也不减少岁币，但希望金国也能退让一步，把营平滦三州还给北宋。西京至少还有个雁门关可以对峙，营平滦三州就在华北腹地、燕山之南，显然更加危险。

但金使强调，这三个州金国要用来做关口，不可能让出来。

到最后，金国没有再做出任何退让，宋徽宗却在国书中做了如下让步：第一，西京和山后诸州别做讨论，意味着已经无法收回了；第二，燕京的非汉人、各种物资，金军可以取用，北宋只要土地，但具体怎么执行，还需要讨论；第三，岁币不减，照常支付。但宋徽宗仍然希望获

得营平滦三州，既然这超出了使者的许诺范围，就请送给金国皇帝定夺。

在国书上，宋徽宗又耍了小花样，声称辽国再次派人来投降，但北宋为了与金国的信誉没有应允。但这样的花样恐怕只能增加讽刺色彩而已。事实上，辽国的确到金国去递降书了，九月二十七，萧太后就曾派人去金国投降，被拒绝了。赵良嗣上一次出使，在金国的营地还碰到了辽国的使者，国相蒲结奴当着赵良嗣的面对辽国使者说：我们已经把你们的南京许给了北宋，回去告诉你们的太后，不要再和北宋打仗了，免得百姓涂炭。[6]

十二月初三，宋徽宗叫赵良嗣、周武仲担任使者，与金使一并离开。出发前，他还念念不忘营平滦三州，告诉赵良嗣要跟金国算经济账，这三个州物产不丰富，但防御开支大，就算拿在手里也是入不敷出。三州的产出无非是一些桑麻之类，如果金国看重，不妨在岁币上再加五万匹绢、五万两银，算是给金国的补偿。[7]

使者离开汴京三天后，即十二月初六，金国占领燕京。留在金国军营的马扩做下了最生动的记载。[8]

金军是在十二月初一经过妫州和儒州的，初五到达居庸关时，辽军已经弃关逃走，留下了空空如也的关口。

马扩与阿骨打一起行军，阿骨打在路上还不忘调侃宋人。他对马扩说："契丹国土我已经取走了十分之九，剩下燕京的一分土地，我已经让兵马从三面都围困住了，只留下一面让宋军进攻。可北宋怎么就拿不下来？一开始听说你们已经过了卢沟河，进了燕京，我还挺高兴。燕京是南国故地，你们拿回去，分界完毕，我们就回去享受太平。不想都统刘延庆一夜之间就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扩只能回答，由于留在金军营地，他对后来的事并不清楚。不过兵家进退是常事，就算一时失败，后面还有胜算。

阿骨打很好奇北宋皇帝对刘延庆会怎么处理。马扩认为如果刘延庆真的失败，就算官再大，也要军法处置。

但可惜的是，马扩说错了。刘延庆虽然暂时贬官，但随后仍然担任镇海军节度使，并没有受到什么军法处置。

十二月初六，金军进入居庸关，摆好军阵。阿骨打与完颜宗干的兵马面向南方，其余军马在其他三面竖起大旗。粘罕以下将官穿着盔甲分列两行，东西向相对而立。阿骨打把马扩找到跟前，问他："燕京是许给北宋的，城内的汉人归北宋，其余的归金国。我现在差人入城招降，你敢一起去劝降汉人吗？"

马扩跃跃欲试。但到了晚上，萧太后在萧干的护送下逃走了。与此同时，有消息传来，宋军听说萧太后逃走，又开始行动起来想攻城。阿骨打大怒，马扩反而劝他，这座城反正是要还给北宋的，谁先谁后并不影响。阿骨打才又消了气。事后，宋军也没有进一步行动。

第二天金军进兵时，辽国还想抵抗，但阿骨打宣谕城内，只要投降，不杀一人。城内抵抗的决心就随风而散了。

辽国大臣们集体走出丹凤门，来到城外的一座足球场（球场）内，阿骨打穿着军服接受了朝拜，众人高呼万岁。[9]辽臣等待着他的降罪，但他却说："我看到城头上大炮的遮盖都没有解开，这表明辽国无意抵抗。"于是赦免了所有的辽国官员。[10]

从马扩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虽然宋金双方由于沟通不畅，误解不断，加上各自防范之心很强，但阿骨打基本上遵守了宋金的海上之盟，一心想将燕京还给北宋。同时，阿骨打也不是嗜杀之人，对辽国的降将懂得宽大处理。

就在进入燕京的当天，阿骨打把马扩放回，派了五百骑兵护送，还把辽国抓获的北宋将官胡德章送还。在临出发时，粘罕元帅还派人捎来口信，请马扩转达，童贯曾许诺给他数头水牛，现在是时候找十头水牛

送过来了。马扩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与金国人分手的。

金人对马扩的友好，源自他们对一个勇士的尊重，但对赵良嗣他们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马扩虽然表现得像个勇士，但与金人谈判时却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反而是赵良嗣每一次都兢兢业业据理力争，试图为北宋多争取一些利益。

赵良嗣十二月初三离开汴京，由于路途已经大幅缩短，他十二月十五就到达了金军的营帐。这一次，他的任务是争取营平滦三州。另外，既然是金人打下了燕京，如何移交，如何保证金人得到燕京的物资和非汉族居民，都是需要具体商讨的。

赵良嗣还没有到达，就注定要扮演恶人的角色，只是这个恶人毫无权力，不仅要受到金人的指责，还会受到北宋皇帝的埋怨。

在会见时，赵良嗣刚刚提到希望金国将营平滦三州交给北宋，阿骨打就愀然作色表示："如果你们非要谈营平滦三州，那就连燕京都不给你们了！"

谈判不欢而散，赵良嗣想谈其余问题，都找不到人了。四天后，阿骨打叫人把已经写好的国书交给赵良嗣，派人和他一同回去。赵良嗣这才看到金人已经做了安排，对于取燕京的补偿是这样的：既然北宋无力靠自己的力量夺回燕京，那么土地可以收回，但燕京土地产生的租税却必须留给金国。

至此，北宋想依靠金人收复燕京，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显而易见了。最初双方约定的是夹攻，但是金人不过燕山界，由宋军收复；后来宋军吃了败仗，金人收复了燕京，这已经不是夹攻了，金军已经不需要遵守协定。在这种局势下，金国仍然愿意交还燕京，这已经占据了道德优势。但力气不是白出的，自然需要犒劳一下。

只是这个犒劳太大了，所谓燕京的租税，类似于金人收取赎城费。不过赎城费是一次性支付的，但租税却要一直支付，直到宋朝灭亡。

由于无法与金人谈判，赵良嗣与金国使者李靖、王度刺等回到北宋。这次出使显得极其屈辱，不仅西京丢了，营平滦三州也无法拿回，还多了一项燕京的租税。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正月初一，赵良嗣和金使回到了国门。与赵良嗣一起来的，还有被金人释放的马扩。马扩在童贯处做了停留，等赵良嗣回来后，被童贯一并送回了首都汴京。

赵良嗣带回的消息让宋徽宗君臣感到意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宋金和议的流变，最初，宋徽宗指望金人归还燕云十六州（包括营平滦三州），北宋支付的代价是把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这的确是好事。但随后发现金国只愿意交还燕京六州，不包括西京，更不包括营平滦三州。宋徽宗经过思想斗争，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但金国突然之间又加码了，要求燕京六州的财产、非汉族人口都必须交给金国。宋徽宗试图接受这个条件，但请求金国将营平滦三州作为补偿赐给北宋。金人不仅不给营平滦三州，又提出新要求，要北宋把燕京的租税都给金国。

这层层加码，让宋徽宗感到不舒服。

但如果站在金国的立场上看，这也不是不可理解。金国始终没有答应将营平滦三州交给北宋，金国到底有没有答应交还西京，也是值得怀疑的。可能只是双方信息沟通的误会，让宋徽宗误以为包括了西京。按照约定，燕京应该由北宋自己拿回，可实际上北宋没有能力，只好由金国代劳。如果当初金国不与北宋结盟，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争议地属于金国。既然结盟给金国带来了这么多麻烦，那么多收一点酬劳费也是无可厚非的。

赵良嗣原本指望立大功，却把北宋拖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不过，与赵良嗣一同出使的马扩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在与宰相王黼谈话时，将这种不断退让答应金国要求的做法称为“无策”，连“下策”都算不上。这样下去会让金国越来越看不起，层层加码，即便求来了土地也守

不住。更好的做法是，哪怕少拿回一些土地，也要厉兵秣马，把土地守住。因为未来金国一定会进攻北宋的，现在已经不是获得土地的问题，而是守住国家的危急时刻。[11]

宋徽宗与大臣谈过之后，仍然决定答应金人的要求，把燕京的租税交给金国。但是，他提议，把每年的租税变成固定金额的岁币，也就是在原来议定的五十万之外，再增加一定的比例。到底增加多少合适？宋徽宗心目中合适的数字是每年十万，最多二十万。[12]加上原来的五十万，北宋向金国的进贡每年将为六十万到七十万。

金国使臣李靖一看宋徽宗这么好说话，立刻要求北宋先把去年的岁币付掉。王黼认为去年北宋还没有获得土地，不应该付岁币。但皇帝禁不住使臣的请求，松口同意了。[13]于是，北宋又增加了一笔五十万的支出。

金国使臣大获全胜后，宋徽宗派遣赵良嗣、周武仲、马扩三人再次前往金国，这一次要商议的是具体的租税额度。

正月初五，使者们离开汴京。正月二十五[14]，赵良嗣、马扩等人来到了燕京西南一处废寺中。金国的将领们在城南纷纷占据了最好的馆舍，却把宋使放在了废寺里，架个帐篷给他们住。[15]

与赵良嗣谈判的主要是兀室。兀室告诉赵良嗣等人，宋徽宗提议以每年十万作为燕京租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连一个大县都赎不回去。

兀室拿出准备好的两张纸，一张上写着两百年前的租税总额，每年四十万贯铜钱，但两百年后，燕京的租税已经增加到了四百万贯。另一张上写着除了正规税赋之外的其他杂税，为六百万贯。就算只按照六百万贯计算，宋徽宗许诺的十万银绢也过于渺小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辽国的岁币是以银和绢来支付的，每年二十万两银和三十万匹绢，而老百姓的税是以铜钱支付，合六百万贯铜钱。在宋代，一两银大约相当于一贯铜钱，因此，六百万贯大约相当于六百万

两。

兀室的说法让赵良嗣和马扩大吃一惊，他们据理力争。第二天，兀室传来阿骨打最后的定夺：每年增加岁币一百万贯铜钱（西京问题不谈）。这一百万贯可以折纳成其他物资支付，但价值上不应低于一百万贯。同时，金国虽然将燕京归还，但是从关外到关内的两个关口榆关（今山海关）和松亭关（燕京通往辽中京的要道）必须保留在金国手中。这意味着宋徽宗原来以为只需要每年二十万两银加三十万匹绢就可以买回燕京，现在要多花一百万贯铜钱，相当于增加了一百万两白银！让金人帮助攻打燕京的代价太大了！

赵良嗣不敢决定，只能再次要求请示宋徽宗。第二天，阿骨打送别宋使时，强调一百万贯不可更改，哪怕想变一点，就不要再派使臣来了。

从赵良嗣和马扩的经历，似乎可以判断，索要租税上最积极的是急于表现的兀室。阿骨打最初可能并没有想到能够从北宋要到这么多钱，但宋徽宗的一次次软弱，让他意识到，只要继续强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兀室的算计、宋使的配合，让阿骨打也变得越来越强硬，也让北宋变得越来越尴尬。

由于阿骨打要在二月初十离开燕京，北宋使节只有十几天时间回去与宋徽宗商量。赵良嗣和马扩决定留在雄州，派快马将金国的国书送给宋徽宗。他们就在雄州等待回信。

二月初六，皇帝的回信到了：听从金国的要求。

但皇帝在给赵良嗣的信中，仍然想争取一下山后诸州和西京，如果争取不到，就别做一段商议（即让步）。

峰回路转的西京问题

二月十一[16]，见到了兀室后，马扩提醒赵良嗣，是时候提对山后诸州的要求了。赵良嗣怪马扩多事，认为现在不应该提山后诸州的事，而是应该把燕京和山前诸州的事情敲定。至于如何应对皇帝，可以在汇报上写已经力争过了，但没有结果即可。[17]

马扩不赞同赵良嗣的说法，还是对兀室提出了西京问题。兀室消失了三天，让宋使们战战兢兢。但随后他带来了好消息：阿骨打同意将山后诸州还给北宋。并告诉宋使，需要再增加一些答谢，但只限于当年，不是每年都要。

这是北宋收复疆土最接近成功的时刻。如果能够顺利交接，意味着北宋将燕云十六州（除了营平滦三州）都收复了。由于阿骨打答应得太痛快，甚至有人感觉这是不真实的。

比如，《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里就说，所谓金人想归还西京，只不过是赵良嗣说谎。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金人不归还西京，赵良嗣历次出使换来的结果是：只得到了燕京六州，丢失了西京、山后诸州和营平滦三州，甚至得不到榆关和松亭关（这意味着金人可以随时打回来），阿骨打还要带走燕京大部分的人口，只留下空城，支付的岁币却翻了三倍。如果是这样，赵良嗣简直可以称为北宋的罪人。

可是如果加上西京就不同了，虽然代价高昂，能够收复大部分土地，他仍然不失为一个英雄。

从这个思路出发，赵良嗣有造假的动机。

另一个证据是，金国皇帝给大宋皇帝的国书中并没有提到西京。如果他的确应允了，应该会在国书中有所提及；如果没有提，就意味着金国皇帝并没有许诺。

但另一方面的证据又表明赵良嗣并没有撒谎。不仅他本人所写的回忆录（《燕云奉使录》）上记载了这件事，就连马扩的回忆录（《茅斋自叙》）中也谈到了金人要还回西京，并认为是由于西京距离金人起家

的东北地区太远，无法远程控制，还不如做个人情送给北宋。

另外，在另一本书《大金吊伐录》中，也收录了金人的国书。虽然在正式的国书中，并没有写明归还西京，但国书往往还有附件，当时人称为“白劄子”，皇帝在国书中没有言明的话，往往会在白劄子中写明。

在一个白劄子中，阿骨打明确提到了西京问题，将西京、武州、应州、朔州、蔚州、奉圣州、归化、儒州、妫州，以及诸州的人民，都归还北宋。[18]由于这本书是金人整理的，宋人造假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可以视为赵良嗣和马扩果真争取到金人承诺的证据。

金人之所以愿意归还西京和山后诸州，除了地远不易控制之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阿骨打可能最初并没有想到能够从北宋得到如此多的岁币，既然北宋答应得很爽快，他也决定做出更大方的举动。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如果对方慷慨，他也会投桃报李，如果对方斤斤计较，他也会锱铢必较。第二，作为第一代领袖，阿骨打在骨子里还有一种乡愁，他不愿意离开东北地界。消灭了辽国，已经使他心理上得到满足的极限，由于西京太远，他也不知道西京有什么用处，与其留一块不知做什么的土地，不如做个人情送给盟友。

阿骨打既然答应了归还燕京和山后地区，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交割与誓书问题了。由于辽帝还没有抓到，山后诸州的问题暂时搁置，燕京是首先要交付的。

在接收燕京之前，宋徽宗就已经任命了宋朝管理燕京的官员。他将燕京改名为燕山府，最初想任命蔡攸担任燕山府长官，但蔡攸知道燕京比汴京危险得多，宁肯待在首都，并向宋徽宗举荐了另一位官员尚书左丞王安中，让其担任燕山府路宣抚使。同时，宋徽宗任命资政殿学士詹度为燕山府安抚使，作为王安中的副手。燕京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拥有兵权的郭药师手中。

燕京行政权力的实际分工是：王安中担任文职长官，郭药师和詹度

作为副手，但由于郭药师掌握了兵权，地位在詹度之上。

在送王安中前往燕山府时，宋徽宗从大内拿出了大量的珍宝古玩金玉，交给詹度，要他在官府中布置，用奢华装饰来震慑女真人的嚣张气焰。[19]

所谓誓书，就是和约文本。古代的和约上有一个条款，签约的双方必须发毒誓，即必须说出如果己方破坏合约，将遭受何等天谴。对于誓书中诅咒部分，女真的要求是：由于誓书是万年遵守的条约，双方在发誓时一定要拣重要的说。[20]

二月二十八，为了展现对交割燕京的重视，阿骨打派出了最亲密的大臣宁术割去汴京安排最后的流程。宁术割在当时正受重用，知军国之事，又是西路都统使。在金国进攻辽国过程中，辽国曾经向西夏求助，西夏派兵支援辽国，被金国打败，指挥战役的就是宁术割。

与宁术割同行的除了宋朝使者，还有前几次出使宋朝的王度刺和撒卢母。金人对北宋的礼仪已经很熟悉，高庆裔对赵良嗣千叮万嘱，一定要让宋廷照顾好宁术割。宁术割对宋朝的皇帝宴会很感兴趣，希望宋廷能用最高礼仪的春宴招待他。[21]

三月初五，宁术割来到汴京。他不仅享受了皇帝的春宴，还以归还西京为借口继续请求赏赐。于是，宋朝又许诺了两千栲栳绿矾，并给他二十万的赏金。宁术割还嫌少，继续请求，但被宋徽宗拒绝了。

在背后，宋徽宗埋怨说：金人这样不断地索要赏赐，还要强起人户，要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啊！

三位北宋使臣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赵良嗣表示女真人就是有些唯利是图，其他的还好，请皇帝暂时忍耐；马扩表示这是因为本朝的军事太弱，兵不立威，只能任人宰割，暗示皇帝需要加强武备；周武仲则认为，只有靠宋徽宗的宽大仁慈，让阿骨打心服，才能以德服人，减少边患。

不管怎么说，金人对宋徽宗的勒索已经到了后者所能忍受的极限。

三月初六，宋徽宗派特使吏部侍郎卢益，与常使马扩、赵良嗣，随宁术割等人回访金国，完成最后的手续。他们带着宋徽宗的国书、誓书等，等待金国的批准。

在誓书的最后，宋徽宗对于违约责任进行了三方面的界定，分为自身、子孙和社稷：苟违此约，天地鉴察，神明速殃，子孙不绍，社稷倾危。[22]这已经是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最恶毒的诅咒。

在国书中宋徽宗对金国皇帝也已经改了称呼，以前的国书都写“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这次改为“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大圣皇帝阙下”[23]，“大圣”两个字是金国皇帝给自己加的尊号，宋徽宗这样写，表示对这个尊号的承认。但为了挽回面子，宋徽宗还在国书中夹了个白劄子，表示这是为了两国交欢，等宋朝皇帝也自上尊号时，金国也应该这么办。但对方是否会遵守，宋方能否得到同等对待，显然都是尚不可知的。

三月十八[24]，卢益、赵良嗣、马扩等人到达涿州。但金人只允许宁术割等金国使节回去，却把北宋使节阻挡在涿州。

金国另派兀室、高庆裔等人在这里等待，要求先看北宋的誓书。他们不断地挑拣誓书上的小毛病，又指出誓书写得不工整。[25]卢益等人只好说，这是宋徽宗皇帝亲手所写的，就是为了对女真表达尊重。但他们仍被要求将誓书送回重写。这样折腾了三四次，金人才放行，进入下一关。

三月二十六[26]，北宋使节到达燕京，金国派遣李靖、刘嗣卿负责接待。这一次最大的改变，则是金国对于礼仪的重视。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没有消灭辽国时，阿骨打仍然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连固定的居所都没有，居住在帐篷中，对使者的接待也非常

粗放。但自从进了燕京，他们在辽国投降官员的帮助下，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礼仪系统，从游牧王朝迅速转变为带有汉文化色彩的礼仪王朝。

宋使到达后，首先持着笏板跪下，捧着国书，进入寨门。[27]到了阿骨打帐前，朝北站立。阎门官传旨，首先请的是国书，将手持国书的使者引入帐内。使者跪下奏事，向大金皇帝请安。奏毕，先拜谢，再站起来，听大金皇帝向大宋皇帝问好，接着又是跪谢，站起来之后，由阎门官带出大帐，到帐南面朝西站立。

接着请的才是大宋的使者。阎门官将卢益和赵良嗣等引入。使者们向北站立，先持着笏板跪拜五下，对皇帝祝福，再拜两下。由首席使者卢益发表讲话，讲完后又拜五下。大金皇帝慰问使者，慰问完后继续拜五下。

然后是礼物展示阶段，使者将北宋的礼物自西向东一一拿进来请大金皇帝过目，再将礼物拿出到第二重门外，北向站立。阎门官接着让使者再拜两下，然后宣布皇帝对使者的赏赐。使者跪谢完毕，又被带回到大金皇帝面前，北向站立。阎门官发出指示，又是五拜谢恩。皇帝赐茶酒，使者再五拜，然后由阎门官引到帐西等待。

接着进入了酒宴阶段，金国国内的官员分别礼拜，请大金皇帝饮酒。皇帝一共饮五杯酒，每饮一杯，所有的人（包括宋使）都必须拜谢。

饮酒完毕，又是各五拜谢恩。

这套复杂的礼仪背后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北宋皇帝和官员总是期待着金人灭辽之后，会回到东北地区继续游猎生活，但随着汉化的影响，金人已经迷恋上了汉人的礼仪和生活，他们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礼仪完毕，接下来仍然是复杂的外交活动。北宋已经将当年的犒军钱都交给了金人，也按照阿骨打的意思修改了誓书，这两方面再也找不

出毛病。但还有一条：誓书中规定，双方不得将对方的叛将叛民留下。

金人拿出了一个名单，上面列着的是出身于燕京地界逃往北宋的辽国官员，金人认为这些人都应该属于金国所有，请北宋归还之后，才肯交还燕京。这份名单上，列着辽国名臣赵温信、李处能、王硕儒、韩昉等人。

这个要求让宋使非常为难，按道理，北宋有责任保护这些投降官员的人身安全，如果将他们交出去，会失了人心。但如果不交，金人就拖着不肯交割。

马扩等人的意思是不交。金人回师的日子已经临近，归心似箭的金人也在燕京留不长了，不如拖延等待。但一心想立功的赵良嗣却主张将这些人交还。

在赵良嗣的坚持下，北宋将赵温信抓住交给了金国。四月初五，赵温信被移送金国，在移送之前，他在北宋使臣面前长跪不起。赵良嗣只能去安慰他：大丈夫生死皆有道，生亦为民，死亦为民，借你一身熄两国的兵灾，你是做了大好事。[28]金国并没有将赵温信治罪，而是授他官职为金国服务。但其他人由于没有被掌握在北宋朝廷手中，暂时无法抓获。

另外，由于双方约定，除了燕京等地的原住民之外，其余在战乱时期从北方逃来的人，都必须移交给金国。因此北宋必须制订一个户口册，将所有移交人员列入。但由于甄别困难，这个户口册迟迟无法编好，也引起了金人的不满。[29]金人表示，如果无法按时移交逃亡者，可以让宋朝将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交给金国，以代替逃亡者。

这个方案更不可能，因为郭药师已经成了北宋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如果没有他的常胜军，宋军根本不可能守住疆土。北宋官员典检文字李宗振[30]提到了一个替代方案：用燕京的老百姓来代替常胜军。他认为，这样既保住了军队，在燕京父老被赶走后，又可以拿他们的土地来

供养军队，可谓一举两得。[31]

金人立刻同意了，他们最看重的就是人口。他们将燕京地区的富裕人家（家业一百五十贯以上的）三万户都集中起来带走。这次事件，几乎将燕京地区的社会中坚尽数拔走，留给北宋的是一座座难民聚集的空城，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更麻烦的是，金人告诉那些被带走的人，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是因为北宋政府将他们抛弃了，以交换郭药师的军队。北宋政府虽然获得了土地，却彻底丧失了人心。

将燕京父老带走后，金人利用最后的机会要求从北宋借粮二十万石，获得了赵良嗣的口头应允后，交割终于开始了。[32]

燕京的回归

按照双方约定，四月十一，北宋官员先到燕京，军队来到卢沟河南岸下寨等待。

同样是四月十一，赵良嗣、马扩离开燕京南下。四月十三使节到达雄州时，北宋的军队仍然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为了防止突发意外，他们将马扩留下，让赵良嗣等人回京都汇报。马扩将和宋军一道进入燕京。

赵良嗣也就是在这时退出了宋金政治的中心。他和马扩两个人几乎见证了收复燕京的整个过程，从最初渡过渤海去与金人联盟，到最后接受金人的种种刁难，想尽办法完成一个使者的使命。

在两人中，马扩属于相对超脱的角色，他由于出身武学世家，更加受到阿骨打等人的尊重。他认定只有坚强的军事后盾才能保证北宋获得足够的利益，一旦没有军事，仅仅靠使节的周旋，虽然也能争取一些利益，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让步。

他虽然更强调对金人不要过多退让，但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马扩

起到的作用却不大，因为北宋军队实在无法成为使节的后盾，金人的步步紧逼、北宋皇帝的退让，让他的理想付诸东流。

在使团中，主要的决定者和负责谈判的反而是赵良嗣。赵良嗣由于是与金人结盟的首倡者，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他对军事并不知情，只知道通过外交手段来为北宋争取利益。他全心全意为北宋服务，争取哪怕一点一滴的利益。

马扩从最初就没有对燕云十六州的整体形势形成概念，反而是赵良嗣每一次与金人谈判，都将燕京和西京，以及营平滦三州提出来，希望帮助北宋收复全部疆土。

也正因为这样，金人对超脱的马扩更加尊重，对兢兢业业的赵良嗣却充斥着不满。这从反面也说明了赵良嗣的成功。

但同样由于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赵良嗣的长袖善舞虽然为北宋争取到了燕京，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注定了他这一生的悲剧。

一旦收复燕京完毕，赵良嗣也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皇帝为他加官光禄大夫。同时他也遭受了所有官员的唾弃，直到今天仍然被人咒骂。

虽然宋军在战争中没有表现出夺人的气势，但在进入燕京时，却是威风凛凛的，足以压过金国的嚣张气焰。

四月十四，马扩与北宋统制官姚平仲、康随[33]等人率领所部兵马一同进入燕京，在他们之后则是北宋的大部队。大部队打前阵的是李嗣本率领的五万来自河东地区的兵马，其次则是种师中、杨可世率领的陕西兵马，郭药师率领的常胜军从新城方向进入燕京，童贯、蔡攸率领的大军则敲锣打鼓跟在后面。殿后的军队是马公直率领的河北、京畿兵马。

北宋兵马之多，甚至差一点引起了内乱，[34]当郭药师率领常胜军

赶到时，李嗣本的河东兵已经进了城。常胜军大都是东北人，带着蛮族的特征，河东兵在城墙上一看到常胜军，以为是金人打回来了，立刻乱了套，逃走的逃走，骚乱的骚乱，郭药师连忙前往安抚，这才避免了误会。

但就是这支宋军，在金人面前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就在李嗣本还在卢沟河驻扎时，首先进城的姚平仲已经和金人对上了。由于金人在和使节打交道时尝到了好处，继续用傲慢的语气对待宋军。姚平仲和康随见到阿骨打时，粘罕还想表现一下，质问最初商定的交接日期是四月十一，宋兵为什么晚来了几天。

姚平仲回答："晚来几天，是礼仪之道，请元帅不要再生事端。"

当时种师中也已经到了料石岗，杨可世也厉兵秣马，准备一战，号召士兵们为国战死。

粘罕环顾四周，发现两百里范围内全是宋军，只好收起了气焰。阿骨打也命令金军退避三十里，让各路宋军进城。

燕京城残余的百姓们纷纷上街，欢迎宋军。他们感慨："契丹即灭，大金归国，王师入城，重见天日。"

入城的宋军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按照攻城的惯例，城池攻下，即便饶恕百姓的性命，也要允许胜利者对城市进行劫掠。此刻的金军还是一支没有军饷的部队，士兵们的收入就来自于胜利之后的劫掠。

对于财富的渴望，是士兵激励自己的最佳手段。金军已经将所有能够搬动的东西全都洗劫一空，城市中布满了丘墟，狐狸的身影处处可见。宋军获得的，只是一座空城而已。

四月十七，宋军正副元帅，太师、剑南东川节度使、领枢密院事、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司童贯，少傅、镇海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宣抚副司蔡攸率领大军前来，王师收复燕京达到了高潮。

然而，金军仿佛还想找麻烦。四月十九，金人使者将燕京等地的地图送来。由于使者携带了金国皇帝的圣旨，按照规矩，童贯和蔡攸应该跪拜接受。金使撒卢母直接要求童贯跪下。这个要求让童贯和蔡攸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堂堂的宋军元帅，刚刚到达收复的国土，首先要做的竟然是跪拜。

仓促之间马扩出面打了圆场，向撒卢母表示，按照道理的确需要跪拜，但出于灵活的需要，请免了这道礼节。比如，大宋皇帝如果给金国元帅粘罕写信，按照道理粘罕也应该跪拜，但出于人情则必须免掉。依靠马扩的灵活，童贯才避免受到羞辱。

【注释】

[1] 参考《燕云奉使录》。

[2] 参考《契丹国志》。

[3] 参考《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中》。

[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复燕云》。

[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6] 参考《燕云出使录》。

[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8] 参考《茅斋自叙》。

[9] 参考《契丹国志》。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史愿《亡辽录》。

[11] 参考《茅斋自叙》。

[12] 宋徽宗的筹码详细为：只许银五万两、绢五万匹；如不允应，便添十万，仍议西京在内；更或不许，西京别作一段；犹不允从，添绫二万，入二十万数；更或不允，绫在二十万数外。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1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4]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马扩《茅斋自叙》记载为初八，日期不对，不采纳。

[15] 参考《大金国志校正》。

[16] 参考《燕云奉使录》。

[17] 参考《茅斋自叙》。

[18]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19]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0] 参考《燕云奉使录》。

[21] 春宴是皇帝花宴的最高礼遇，也是辽国当年无法享受的礼遇。见《铁围山丛谈》。

[22]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3]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24] 根据马扩的记载，也可能发生在三月十六。

[2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6] 根据马扩记载确定日期。

[27] 关于这段礼仪，参见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2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0] 也有人说是参议宇文虚中。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茅斋自叙》，《奉使辽金行程录》未见这段文字。

[32] 这次许诺记载得非常不详细：赵良嗣是否答应；如果答应了，是否报告给了皇帝；皇帝如果知道，是否告诉了地方官员；到底许了多少，都存在疑问。但又有证据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口头约定。比如，《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十六篇，宋徽宗就提到了十万石的粮食，准备从内地腾挪五万，河北路准备二万，河东路准备三万，一共十万，七月初一前备齐。这十万应该属于赵良嗣许诺的范围。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王安中《入燕录》。但该书提到，赵良嗣也一同进入燕京，存疑。

[34] 参考《茅斋自叙》。

幕间
另一个版本的收复燕京

北宋收复燕京可以视为一次外交的胜利，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在几乎没有军事支持的情况下，依靠几名外交人员，就让蛮族的女真人将打下的燕京交还给北宋，这已经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情。

但在北宋官场，却长期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收复燕京的故事。这个版本因为四月二十二童贯的一篇奏章而广泛流传。我们根据这个奏章，可以整理出完全是另一个面目的燕京之战。[1]

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由于预感到辽国即将败亡，宋徽宗派遣使者前往金国通好，相约共同灭辽。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辽国天祚帝逃窜，耶律淳篡位。燕京人民伸长脖子等待着归附北宋。宋徽宗顺应民心，下诏童贯出兵招抚。童贯派遣使者晓谕耶律淳投降。

由于耶律淳首先败坏了宋辽百年合约，童贯兵分两路，东路由雄州，西路由安肃、广信，进兵讨伐。

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二，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五，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九，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八月十四，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八月二十一，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八月二十九，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九月初一，宋军大胜。

宣和四年九月初九，宋军大胜。

在这一系列的大胜期间，还乘势展开了心理攻势，广贴文榜，招纳降将。

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三，在童贯的感召下，辽国大将郭药师起义，率领涿州投降。

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宋军发兵易州，几乎杀尽了城内的所有契丹人，将易州占领。

宣和四年十月初四，宋军攻克牛龙、玉田等县，以及景州、蓟州等州，只有燕京还有待收复。辽国萧太后请降，宋军没有接受。

宣和四年十月十八，宋军到达燕京城南的良乡，杀退辽军。

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童贯遣奇兵攻入燕京，杀死敌人上万，燕京老百姓欢欣鼓舞。辽国四军大王萧干连忙救助，才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五，宋辽大战于卢沟河，辽军逃回燕京城保命。

宣和四年十二月初二，契丹倾尽全部人马来犯永清一带，宋军大获全胜，辽军尸横遍野，再也无力对抗宋军了。萧太后乘机逃走。

宣和四年十二月初五，金国乘燕京空虚之时，经过居庸关，与宋朝大军夹攻，收复了燕京。

宣和五年四月十七，童贯率领大军接管燕京。

如果没有后来的靖康之战，那么宋朝的正史上将按照童贯的叙述，在一片胜利声中记录下宋徽宗的丰功伟绩。童贯在叙述完历史之后，不忘将宋徽宗与历代的武功做了对比。周代时攻打蛮族猃狁，只打到了太

原；汉代击匈奴，只是在渭河上做文章。显然，宋徽宗打到燕京的功业已经超越了历代。

除了童贯的贺表，几乎所有的宋朝官员都忙着祝贺。太宰王黼也上表称贺，多为奉承文言。[2]

当然童贯也知道燕京并不太平，他们只在燕京象征性地驻扎了不到半个月就离开了。四月二十八，童贯、蔡攸撤离，将燕京防务留给了詹度。郭药师的常胜军和河北兵守护着松亭、古北与居庸等关口。阎门宣赞舍人刘逸担任景州知州，惠州团练使杨可升担任檀州知州，忠州防御使任完晓担任蓟州知州。

在送别童贯时，詹度特别作了一首《平雁诗》送给他：[3]

长亭春色送英雄，满目江山映日红。剑戟夜摇杨柳月，旌旗晓拂杏花风。行时一决平戎策，到后须成济世功。为报燕山诸将吏，太平取在笑谈中。

这首诗的第二句似乎预示着后来岳飞那首著名的词。

童贯撤回后，宋徽宗更是大肆封功。童贯晋封为徐豫国公，[4]蔡攸晋封少师。宰相王黼晋封为太傅，总治三省事，赐玉带。在收复燕京中功劳最大的赵良嗣也没有被忘记，晋封为延康殿学士。没有记录表明赵良嗣是否预见到君臣的狂欢，但他私下里比较悲观，预测这次收复，大概只能保持三年的和平。[5]他上书表示希望隐退，买一点田地过日子就足够了。他还指望有人见到正在耕地的他，能在背后偷偷议论一句："这就是平燕的首谋之人，现在不图富贵，在家种田，这是天下多大的美事啊！"但皇帝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坚决不许他引退。[6]

马扩担任了武功大夫兼和州防御使。[7]他还在不断提议，要加强防御，必须修缮城池，招抚流民，训练军士，流转无主田地。据马扩计算，燕京地区是足够富裕的，只要四十万缗费用和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建起比较牢固的防御系统，再通过招兵、种田，解决军费问题，燕京就稳固了。[8]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狂欢。

在一片狂欢中，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叫郑居中，曾经反对过对辽作战，由于他身居高位，也被封赏为太保，但他立刻上书表示自己没有功劳，不接受晋封。

在受封赏的人中，也包括了将石头“盘固侯”送到汴京的工程师朱勔，他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史。

就在宋朝君臣狂欢时，他们没有料到，撤退的金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化。在金国，那些恋家的老人正在退出权力中心，而更加野心勃勃的下一代正成长为中坚力量。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也见到了南方的繁华。

在这些人中，粘罕是最重要的一位。粘罕原来一直主张与北宋保持和平，但随着北宋越来越软弱，他更加倾向于强硬。在交割燕京和山前六州的问题上，他就主张只承认北宋对涿州和易州的占领权，因为这两个州是郭药师投降时就带给北宋的，其余地方一概不交给北宋。

阿骨打否定了粘罕的提议，认为海上之盟既然已经答应了，就不要违背。但他同时留下了一句话：“我死了，就随便你们了。”

在三月二十六，阿骨打向北宋使节展示那复杂的礼仪时，敏锐的马扩已经发现阿骨打病得不轻。到了当年（公元1123年）五月[9]，阿骨打就去世了。

阿骨打在世时，金国向北宋移交山后诸州的工作虽然面临着重重波折，但仍然在进行之中。六月十一，金国按照计划，要将朔州、武州和蔚州交给北宋。但由于阿骨打的去世，移交工作骤然中止。[10]

阿骨打的去世，为宋金和约画上了一个休止符。鹰派上台了。

【注释】

[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宣和录》。

[2] 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3]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 宋徽宗虽然封赏了童贯，但对他的作为却是极为不满的。因此，在当年七月初八，就让他退休了。

[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6] 参考《宋史·赵良嗣传》。

[7] 参考《续资治通鉴》。

[8] 参考《茅斋自叙》。

[9] 根据《大金国志》《宋史》。《金史》作八月戊申。从后来张觉叛变的日期来看，应该是五月份。

[1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第二部
战争与和议

第六章
从和平到战争

一位降将带来的艰难抉择

谁也没有想到，对宋金和议的考验竟然来得这么快。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北宋刚刚从金国手中获得了燕京，五月底，一件让人难以抉择的事情出现了。这和一位叫作张觉[1]的将领有关。

张觉是辽国时期的平州人[2]，中过进士，在金国进攻辽国前后，担任辽兴军（即平州）节度副使。恰逢有人发动叛乱杀掉了节度使，作为节度副使的张觉被推举出来继任为节度使。天锡帝耶律淳死时，张觉已经预感到辽国必败，所以准备起后路来。他召集了五万人和上千匹马，暗地里训练着。萧太后占据燕京时期曾经派一个叫作时立爱的人来替代他，被他拒之门外。

金国拿下了燕京。由于燕京要还给北宋，只有张觉所在的平州，以及附近的营州和滦州是金人一直不肯放弃的。这三个州还在辽国将领手中，而平州又是三州中最重要的一个，金国人决定招降张觉。

当时，辽国的大臣左企弓、康公弼等人都已经投降了金人，他们都认识张觉。阿骨打询问张觉的状况，康公弼认为张觉虽然狂妄，但缺乏智谋，不如首先把他稳住，然后慢慢处理。如果直接对他用兵，是逼迫他立刻造反。于是金国任命张觉继续担任平州节度使。

康公弼亲自前往平州劝说，张觉决定投靠金国。

在辽国尚存时，燕京是国家的南京。但后来燕京还给了北宋，所以金国就将平州设为南京，张觉作为南京主官，也被授予了象征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五月，大金皇帝完颜阿骨打去世，继承帝位的是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吴乞买即位后，将辽国的大臣都送回到原辽国境内的南京（平州），其中有四位最主要的大臣分别是左企弓、曹勇义、虞仲文和康公弼。

张觉却已经决定叛离金国。在当时，残辽势力的发展恰好进入一个小高潮期。残辽势力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在西北，天祚帝又在大漠之南聚集力量开始进行军事骚扰，而在东北，辽国大将萧干跑到了奚人的地盘上自称皇帝，随时想打回燕山以南。五月十四，张觉试图与残辽势力联合，于是将四位大臣抓起来，宣判十大罪状后将他们杀掉，举起了叛乱的大旗。营平滦三州纷纷脱离了金国的控制。[3]

张觉的叛乱给刚刚生效的宋金和约带来了两大麻烦。第一个麻烦是，当初金国将许多燕京地区的老百姓带走，重新安置在了平州地区，张觉下令这些老百姓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回到他们的家乡。百姓们于是拖家带口重新踏上了归家之路，回到燕京的家后却发现，他们的土地都已经分配给了郭药师的常胜军，成了军屯土地。没有了土地，老百姓有的

就近安置，有的跑到了更远处，脱离了官方的户籍。

老百姓不知道，宋金和约有关于追踪因战争逃散的难民的协议，不管是哪一方的人民逃到对方的领地，对方都有义务将其送回。按照协议，这些从平州逃回的百姓都必须送还给金国，可困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方法，北宋政府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回来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第二个麻烦是关于张觉本人的。张觉叛离金国后发现，残辽势力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如果不想被金国击败，必须投靠更大的靠山。张觉派出了几位说客前往燕京长官王安中处，试图说服北宋接纳他。

如果北宋接纳张觉，就意味着彻底背离了宋金和约。和约中规定，双方的疆界不得变更，也不得接纳对方的叛将。

可如果不接纳张觉，问题也很严重。因为他有着近十万兵马，处于山南的腹心之地，如果和北方的萧干联合，就成了北宋的一大隐患。即便金国最终击败了张觉，那么平州依然是插入北宋腹地的一把尖刀，金国随时可以从这里进攻北宋。当初赵良嗣苦苦哀求阿骨打，就是为了获得营平滦三州，现在三州竟然摆在了眼前，可谓机不可失。

王安中不敢私自做决定，只好将张觉派来的李安弼和高党送往了汴京。在汴京，李安弼和高党作为说客，与原来辽国宰相李俨的儿子李处能（已经改名为赵敏修，在宋朝担任延康殿学士）一起劝说宰相王黼，王黼又告诉了宋徽宗。于是，皇帝心动了。

在北宋官场内并非没有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出使金国最多的赵良嗣。[4]虽然赵良嗣在谈判时很想得到三州，但现在他认为，朝廷刚刚与金国签订协议，不应该立刻背信弃约，而应该首先处理好内部问题，等实力足够强大了再说。

对于反对意见，宋徽宗并没有听进去。他给燕京副守詹度写了

信，[5]谈到最好的策略是坐山观虎斗，先让金军与张觉斗一场再说。但随后他写了第二封信，让詹度偷偷地招纳张觉，但表面上必须装出不与张觉勾结。

六月初五，张觉秘密派人投降。与此同时，金国也在行动。金国虽然不知道张觉已经投降北宋，却派来了军队准备镇压。率军的是金国大将阇母。六月二十一，阇母的军队到达平州一带。

由于平州的防卫最坚固，阇母首先率领两千人马到达营州城外。不过随后他发现营州城也做了很好的防卫，守军人马众多，准备充分。反而是金军的士兵太少，很难获胜。阇母于是在城门上写下“今冬复来”几个字，就撤退了。

金人的主动撤退被张觉渲染成一次大捷，派他的弟弟上报给宋徽宗。宋徽宗大喜，立刻授予张觉泰宁军节度使，并且是世袭的。

皇帝的诏书由李安弼带回给张觉，另外，宋徽宗还用金花笺御笔写了一封信，交给张觉的弟弟，让他亲自转交张觉。

宋徽宗做这些事，并没有与他的大臣商议。外廷大多数官员都不知道，只有少数人听说了。赵良嗣此时又站出来反对，坚持不应该毁掉盟约，甚至请求斩了李安弼。这个请求给他招来了祸水，他被贬官了。

不幸的是，赵良嗣的说法是正确的。七月初十[6]，当李安弼返回时，满面春风的张觉率领官员来到城外迎接。他没有想到，金军已经打听到了他今天要出城，乘他接旨的工夫发动了袭击，将张觉和平州城隔开了。张觉虽然没有被金军抓住，却无法返回城内，只好向燕京方向逃窜。

逃窜过程的慌乱之中，宋徽宗的圣旨不巧被金军得到。日后，这道文书就成了皇帝违反和约的铁证。

金军虽然将张觉赶走，围困了平州，却暂时无法攻克。他们转而攻

打营州，这次得手了。张觉的母亲、妻子等家属都在营州城内，被金人全部抓获。[7]张觉的弟弟原本跟着他逃往了燕京，听说母亲被抓，立刻回了营州，被金人抓住。他不仅没有救下家人，甚至连宋徽宗的亲笔信也被金人得到了。

金人围困平州达半年之久，才将其攻克下来。在这半年里，北宋的军队如坐针毡。他们本不应该对平州城兄弟部队的困境熟视无睹，可是又得装作不违背宋金和约，无法对平州城内守军提供帮助。更有甚者，当金军缺乏粮食，他们还得帮助金军解决后勤问题。

直到第二年初，金军将营平滦三州都拿下，才向北宋发来通牒，要求北宋将张觉等降将送还。[8]

北宋一开始送了个假首级给金军，被识破了，你来我往又拖了数月，才在九月份[9]将张觉杀死，把首级用水银泡起来，送给了金国。

张觉事件影响最大的，是郭药师和他的常胜军的士气。

张觉被金军驱赶时，是郭药师收留了他，给他改名为赵秀才，藏在了常胜军之中。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八月十五，郭药师收留张觉不久，就打了一个大胜仗。解决了辽国对北宋最后的威胁：自称大奚皇帝的萧干。四军大王萧干在保卫燕京的战争中，是让宋军吃苦头最多的人。自从逃往东北后，他一直想打回来，不断地对内地发起进攻。六月时，他曾经从卢龙岭方向越过燕山，攻破景州，杀掉了守将刘滋、杨伯荣，又在雁门镇打败了常胜军，攻陷了蓟州。[10]萧干眼看就要进攻燕京，但八月十五，郭药师率军在峰山大败萧干，斩首三千人，俘虏数千人，将他逐回了卢龙岭，守住了山前地区。

由于损失了大半兵力，从此以后，萧干一蹶不振，于第二年初被部下所杀。正月初六，河间府知府詹度获得了萧干的首级，确认他已经死亡。

常胜军几乎是宋军之中唯一能够打仗的部队，却因张觉之死而人心涣散。

王安中接受皇帝密旨，逼迫张觉自杀。张觉不肯屈服，王安中不得不将他行刑，整个过程都被常胜军将校看在眼里。郭药师甚至悲愤地说："如果他们要的是我的头，又该怎样！"

此后常胜军也变得懒散了。

宋朝方面也知道常胜军不再可靠，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三月，在山西方向的宋军建立了另一支部队——义胜军，是为了防御常胜军而组建的。[11]由于义胜军待遇更好，许多常胜军的士兵偷偷跑到义胜军去入伍。郭药师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开始用墨汁在士兵面上刺青，这让常胜军内部更加乱套了。

张觉的死亡也并没有将所有麻烦消除。由于他放走了大量的民众，金军以索要难民的名义继续向北宋施压。不仅在燕京地区，就连山后地区，也有许多民众从金人控制区逃往北宋区域。他们无孔不入，即便想遣返，也不可能找到。

到后来，北宋突然发现，宋金协议是一个根本无法完全执行的协议，只能靠双方的谅解来维持。一旦打破了谅解，就必然会产生纠纷。张觉事件已经打破了互信的基础，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张觉事件的另一个影响，是让宋金之间的山后诸州交割成了泡影。

宣和五年七月初七，宋军在山西方向的统帅换了人。之前山西一直是童贯的地盘，由于童贯在收复两京的战争中让宋徽宗很失望，皇帝在燕京派王师中取代了童贯。等燕京稳住后，又在童贯的大本营动手，派遣一位叫作谭稹的人取代了他在山西的职务。

谭稹来到山西时，这里的情况也很复杂。首先，金人已经许诺将西京和山后诸州还给宋朝，但在阿骨打活着的时候比较积极，阿骨打一

死，事情就拖了下来。随着张觉事件的发生，金人更是借口北宋首先破坏了协议，不再移交山后诸州。

但山后诸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了几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西京，也是整个山后地区的中心，是金人最不愿意交还的地方。第二个区域是西京以北的诸州，这些州大都位于现在河北省张家口一带，已经靠近草原，金人容易控制。但在第一、第二个区域之外，还有第三个区域，这个地区更加靠南，与北宋接壤，却距离金国的东北本土非常遥远，不容易控制。第三个区域的代表就是朔州、应州和蔚州这三个州。

事实上，金国最初攻克西京时，这些州都选择了投降。但金人从西面调兵去攻打燕京时，已经没有精力控制它们，这三州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地位。

谭稹到任后，对三州进行了招降，它们都归顺了北宋。河东地区的大将李嗣本乘机进驻三州，并运送物资防守。

可惜的是，在李嗣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金国负责西部事务的元帅粘罕突然来到了西京，金军大举进攻击败了李嗣本，三州又都被金军占领了。

张觉事件之后，北宋收复山后诸州的希望更是彻底破灭了。

按下葫芦起来瓢

从结果上论，宋徽宗收留张觉已然违背了和约；从技术上论，金国境内老百姓不断逃亡，也让北宋无法遵守和约。

但双方的外交活动仍然在杂音不断的背景下继续进行。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金国的贺正旦使来到汴京，向北宋皇帝庆祝新年。几乎同时，向北宋宣告金太祖死亡的告哀使也到了。金国使节于宣和六年正月初六离开。[12]作为两国往来的礼仪，宋徽宗为阿骨打

的去世穿上丧服，停朝五日，同时派出贺正旦使和吊慰使前往金国。[13]

在双方友好的表象下却暗流不断。除了双方你来我往地为了张觉事件拉锯之外，宣和六年三月，另一个冲突又起来了，这一次是因为一笔模棱两可的粮草问题。

在一年前燕京交割的最后关头，金国突然又让北宋提供二十万石的粮草，为了不节外生枝，赵良嗣被迫答应下来。

虽然这次约定可能是口头约定，没有写入文件，但有证据表明宋徽宗是知道这件事，也同意了的。粮食也可能已经完成了部分交割，也可能拖延下来。[14]但即便宋徽宗知道这件事，却并没有告诉后来的山西统帅谭稹。

现在，金国派使者到山西找到谭稹，要求将去年的许诺兑现。此时的山西正在为军需不足而发愁。恰好这时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又发生了一次地震，加之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从其他地方大刮免夫钱（代役钱），连自身问题都控制不好。听到金国的要求，谭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金人告诉谭稹，这是当初赵良嗣许诺的，谭稹反问，赵良嗣的口头许诺算是凭证吗？[15]

但谭稹的强硬缺乏必要的军事后盾，也就在这时，金人开始进攻朔、应、蔚三州，同时将飞狐、灵丘两个县夺走。飞狐是连接山西与河北的主要通道之一，丢失了飞狐县，意味着宋军在防御上又一次丢失了重要阵地。

鉴于谭稹的失败，宋徽宗再次决定更换山西的统帅。这次被起用的，就是上次被放弃的童贯。

八月初九[16]，童贯重新上台，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招降辽国天

祚帝。在与金兵的斗争中，宋徽宗并没有吸取教训，加强本身防御，反而醉心于外交活动。他重新想起逃亡中的辽国天祚帝。此时，天祚帝还在西北一带活动，在游牧部落中依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结交了天祚帝，就能从侧面对金国施压，减轻北宋的压力。

宋徽宗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一位西域僧人带给天祚帝，获得回信后，又下了诏书，对天祚帝待以皇弟之礼，还赐予宅邸千间、女乐三百人。[17]

宋徽宗醉心于宋辽联盟，却没有意识到，辽国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联合辽国只能引起金国的进一步愤怒。

十一月三十[18]，由于双方矛盾的积累，童贯派遣保州广胜安肃顺安军廉访使马扩、知保州辛兴宗两人前往云中府拜见元帅粘罕，试图解决山后诸州归属及战争难民去向等诸多问题。[19]

马扩此时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军事主义者，他屡次呼吁朝廷加强防卫，打造一条坚固的防线，以抵御金军的入侵。

到了金军营帐，粘罕却并不在云中，接待他们的是代理元帅兀室。双方在极不友好的气氛中见面。兀室为了压制宋使的威风，首先要求他们按照参拜皇帝的礼仪拜见元帅，马扩与他据理力争，结果兀室拂袖而去，将使者留给了高庆裔。

高庆裔告诉马扩，金军重新攻克山后几个州，是为了防止叛乱。交割问题也已经搁置，只要难民问题不解决，北宋违约风险仍在，金军就不可能继续交接。

马扩回到太原，立刻向童贯报告，请求赶快进行军事准备，因为金军已经加强了飞狐、灵丘等战略要地的防务，同时开始训练军队。但童贯却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马扩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但童贯所要应付的局面却复杂得多。

事实上，北宋的财政在交割完山前诸州之后，已经出现了崩溃的征兆。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一个王朝将要崩溃，首先归咎的是天灾。人们总会在史书上发现，战乱年份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有天灾，只是在繁荣时期，一次天灾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毁灭性打击，皇帝放些粮食，亲戚救助一下，不知不觉间就把天灾应付过去了。只要天灾没有产生巨大影响，史书就可能不去记载。

但如果一个王朝政权正处于下降期，那么天灾发生后，可能社会力量不足以救助灾民，就会产生更多的次生灾害，造成重大损失，这时史书才会记载下来。

从最初组织军事行动（虽然惨败收场，但钱没少花），到赎买燕京，加上金人留下的近乎空旷的城市，要想发展必须首先投入财政支持。由于花费了太多的财力，北宋提高了税收，结果，民间抵抗天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

宣和六年记载的灾祸有如下几种：京师、陕西和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两河、京畿、浙西地区发大水；西北的环庆、邠宁、泾原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更大规模的则是山东、河北地区的盗贼肆虐。所谓盗贼，其实是因为搜刮粮草过甚，加上连年凶荒，引发饥荒，榆皮野菜吃光后无以为继，饥民只能落草为寇。其中最大的几起寇乱：山东的张仙聚集了十万众；河北的张迪聚集了十万，高托山更是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余一两万的更是不可胜计。[20]

大大小小的寇乱让北宋无暇顾及北方问题，也让北宋对金国的防御系统迟迟无法建立，于是，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就成了北宋政府迈向败亡门槛的一年。

许亢宗使团观察记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正月二十六[21]，一个大型使团从汴京出发，前往金国皇帝的行营，去祝贺金太宗吴乞买的登位。

其实，吴乞买登位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宣和六年五月[22]就已经派人来宣告登基。六月时，宋徽宗就决定派遣一位叫作许亢宗的官员（他的职位是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担任国信使，去金国祝贺吴乞买登基。许亢宗的副手是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童绪。

除了道贺的使命之外，在恰逢宋金冲突激化之前，他的出使也带有查看金国是否有出兵的意图。这次出使的文献记载被保留了下来，其中不仅详实记录了古代外交出使规则，还着重描绘了金国早期社会市民生活景况。

除了正副使节之外，这个庞大的出使团队还有八十人，其中士兵三十五人，其余是各种杂官使役，包括一名医生和两名翻译。

人员之外，是庞大的车马队，包括载杂物的车三辆、载杂物的骆驼十匹、大小马匹十二匹。礼物则有御马三匹，用涂有金银的鞍辔装饰；象牙、玳瑁鞭子各一条；涂金半钣八角饮酒斛（带勺和盖）两只；涂金半钣八角银瓶（带盖）十个；涂金大浑银香狮（带座）三只；着色绣衣三袋；果子十笼；蜜煎十瓮；芽茶三斤。

使团从正月二十六离开汴京，到八月初五回到京城，一共用了七个多月，单程四千二百七十里。其中在原来宋辽边境以内一共一千一百五十里，行走了二十二程。使团到达宋辽旧土白沟之后，在新得到的燕京地区和金国境内又走了三千一百二十里，一共三十九程，最终到达位于金国上京（现黑龙江阿城）附近的冒离捺钵，见到了金国新皇帝吴乞买。即便中间不休息，使团也需要六十一天才能到上京，计算来回，在路上就需要四个月时间。

许亢宗离开了白沟之后，经过新城、涿州，在第三程到达良乡。良乡的老房子曾因战火蔓延损失殆尽，但已经有数千户人家重新回来建设

家园，又有了繁荣景象。

第四程，许亢宗渡过卢沟河进入燕京。当时还没有著名的卢沟桥，只有一座浮桥连接两岸。燕京城内早已恢复了繁华，市场里百货丰富，庙宇繁盛，欣欣向荣。

但是，从第五程（当天到达潞县，位于现在的北京通州）开始，许亢宗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当年燕山大饥荒，竟然有人在死人身上插杆签，当作可以吃的肉来售卖。郭药师的常胜军吃得还不错，但是其他杂牌军（牙兵）就形销骨立了，按照许亢宗夸张的说法，戍兵已经死了十分之八左右。由于上下互相欺骗，皇帝无从知晓这里的惨状。

不过，许亢宗也提到，朝廷已经开始想办法利用漕运解决当地的饥荒问题。回程时，饥荒问题已经得到缓解。

第六、第七、第八程，经过三河市、蓟州到达玉田县。玉田县刚刚在四个月内遭受了三次劫掠，军民被屠杀，守燕山的王安中只好建了一座新城。

到第十程时，许亢宗已经经过了韩城镇向北到了清州。宋金的边境就在韩城以东十余里的地方。金人在这里立的边界并不在沟堑上，只有高两三尺的两个小土坎。两界中间有一里宽的空地，不准人耕种。金人的接伴使就在边界上等待，宋使先投牒过去，接伴使再投牒回来，然后请宋使过界，必须邀请三次才上马。上马之后，立于界上，两个使者互相换牒，拿着鞭子作揖，这才算结束礼节。

中国古代从关内前往辽东地区向来走的是燕山山脉上的各个关口，如古北口、松亭关、居庸关等，很少经过山海关（榆关）这个靠海的关口。其原因是山海关的形成时间比较晚，一直是海边泥泞的滩涂，并不适合行军。但到了宋金时期，交通要塞山海关已经成型。

金代山海关称为榆关。到第十四程时，许亢宗使团从营州出发，经过六十里行程，到了榆关，再从榆关北行四十里到达润州（今秦皇岛海

阳镇）。在榆关许亢宗感慨万分，他感慨的是，从关外进入关内一共有五条路，其中居庸关可以通大车，松亭（通往辽中京）、金坡（应该为易县以西的紫荆关）、古北口只能通马，榆关畅通后已经可以通车。其余还有十八条小道只能走人，因此利用价值不大。

要想限制北方士兵进攻北宋，必须将所有的关口都占据，但实际上，北宋只占据了西面的三个，东面两关丢失，特别是山南的营平滦三州丢失，几乎注定了宋朝的悲剧。

从榆关过境，只十几里就是一片塞外风光，表明已经出了汉文化区。山内五谷百草森林水果，无所不有，山外则是黄云白草山黑水浊。

经过了三十九程，终于到达了位于黑龙江阿城境内的捺钵，许亢宗使团住在了国宾馆。这个国宾馆只是三十几间的大茅舍，土炕上铺着锦绣貂皮被子。许亢宗待了两天，才获准朝见。

皇帝的行宫距离国宾馆还有十里路，中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只有数十家居民散落其间。接伴使说快到了，许亢宗竟然什么也看不到。又向北走了百余步，才发现一个土城堡，城堡高丈余（三四米），围了三四顷地，大约合二十万平方米。这就是皇城了。

土城堡里帐篷和房舍错落其间，房舍都是新建的，有的还没有盖好。中间的大殿叫乾元殿，是木头盖成的七间房，连屋顶都没有建好，只是盖上了瓦片，用泥补上缝隙。不过大殿已经有了象征皇家威仪的鸱吻（木头做的）。大殿的台阶高四尺多，台阶前一个方阔数丈的土坛，叫作龙墀。

要想到达大殿，必须经过一个叫作山棚的建筑群，山棚是用各种石头垒砌的园林建筑，做成了仙佛龙象的形状，种有松柏，还弄了几个会口技的人在附近学鸟叫。如果将山棚与宋徽宗的艮岳做个对比，会让人对金人的简陋感到吃惊。虽然山棚简陋，却起了很不错的名字，左面叫桃源洞，右面叫紫极洞，中间叫翠微宫。

这是金人学习汉文化的早期阶段。金国人之所以要招揽燕京地区的人，就是为了寻找工匠。许亢宗在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兴修这个建筑群。另外，金人对于礼节的痴迷简直让人感动，皇帝不断请许亢宗大吃大喝。第一天请吃饭时使用了各种金银酒器象牙玳瑁，也有从各地掠夺的教坊人士演奏作乐。第二天赐酒果锦帛。第三天是花宴，吃喝时夹杂着各种杂技表演助兴。第四天是王公大臣们请客。第五天终于到了辞行时，但还是要吃喝赏赐。

第六天，宋使回程，仍然按照来时的路返回。

但是，回程时许亢宗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金人似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他们在向南部边境转运粮草，调拨兵马。他找到汉人出身的居民询问情况，对方也毫不隐瞒地告诉他，金人就要入侵宋朝了。

回到汴京，他想立刻将这个最具军事价值的情报上奏给皇帝，却听说皇帝已经下达了命令：凡是敢妄言边疆事务的，流徙三千里，罚款三千贯，遇到皇帝的大赦也不赦免。于是许亢宗的消息并没有送到宋徽宗耳中。[23]

他八月初五回到汴京时，距离金国后来发兵已经不足四个月了。

在许亢宗去往金国的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初，发生了一件大事，也预示着宋金两国向战争更靠近了一步。

二月初，金国终于把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抓住了。关于抓捕过程，有不同的说法，但最典型的说法认为，天祚帝之所以被抓，和北宋的乌龙助攻有关。[24]

之前，天祚帝躲到西北的夹山之中不肯出来，由于山高水远，金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但宋徽宗接受了童贯的建议，决定招抚天祚帝，一开始只是写信，后来改成了诏书，把天祚帝当成弟弟对待。天祚帝虽然愿意投靠北宋，但在夹山与北宋边境之间，横亘着金国的疆土。金国在西

北的元帅是粘罕，善于用兵，只要他在，天祚帝就躲在夹山不敢出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粘罕突然回东北述职去了，代理元帅是兀室。天祚帝认为这是好时机，于是带领他的契丹、鞑靼人马，以及后妃和两个儿子秦王、赵王，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向宋境赶来。

他们刚从夹山出来，来到云中（大同附近），兀室立刻率军断掉了他们的归路。天祚帝才知道这只是金人布的一个局。粘罕也突然回来了，率军堵住前路，再追袭天祚帝，将他的大部队截住俘获。只有少数人跟随天祚帝逃到了一个叫作小斛禄的部族之中。小斛禄在去往西夏的路上，所以，天祚帝最终的目的地可能是西夏。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天祚帝被抓与北宋没有关系，是天祚帝想趁粘罕不在，率领三万到五万人马发动一次突袭，失败了逃亡到小斛禄。[25]

不管哪种说法，天祚帝最后都来到了小斛禄这个部族中。

在小斛禄，天祚帝的命运又有不同说法。有的说，小斛禄非常忠诚于辽国，因为儿子和妃子都被金人抓住，为了保护天祚帝不被金人俘获，天祚帝率领少数人马继续逃亡。[26]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小斛禄出卖了天祚帝，将他的行踪报告给了金军。[27]

天祚帝离开小斛禄之后，继续向西夏逃亡。为了防止他向北宋逃，金军在宋金边境地区驻扎大军，每三十里设一百骑，防止他穿过火线。[28]同时，金军派人到童贯处，威胁说，知道宋军和天祚帝是勾结的，如果天祚帝去了北宋，两国和约立刻失效。童贯当初是招抚天祚帝的推手，现在害怕了，只好偷偷下令，一旦有契丹人过境，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兵，立刻杀死，再送给金国。[29]所幸的是天祚帝没有进入宋境，否则连命都保不住了。

天祚帝想投奔西夏，但西夏却不敢收留他。[30]他最后被金军娄宿的部队追上。

关于抓住天祚帝的场景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已经形单影只，骑着一匹马，带着两匹轮替马，单身逃亡，被金军围住，只好下马说："我就是辽国皇帝！"金军将他捆起来时，他还呵斥说："你们竟敢捆绑皇帝！"[31]另一种说法是娄宿骑马来到天祚帝面前，跪下请求皇帝原谅，请他喝酒，让他以为不会被杀，这才投降。[32]

不管哪种说法符合真相，天祚帝的被俘都意味着残辽势力的彻底瓦解，也让金国腾出手来面对北宋问题。[33]

由于获得了天祚帝的残余地盘，金国的国境已经遍布中国北方，它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只是一个东北的小部族了，看待问题也不再站在东北本位上，云州也不再被看作是遥远的地方。到这时，北宋就危险了。

风雨前夜

在北宋，最着急的人是马扩，他不断呼吁要重视金国问题，赶快建立强大的防御体系，以应付金国的进攻。

作为北方防线负责人，童贯也并非不着急。他的苦恼比马扩知道的还多得多。除了金人问题，郭药师的常胜军也成了隐患。自从张觉死后，郭药师总是担心自己也会被北宋朝廷出卖，他也变得不可靠了。常胜军作为一支特殊部队，花费的钱财比普通部队高得多，他们骄横跋扈看不起其他军队，也看不起朝廷。可是北宋又必须依赖这支军队，因为它几乎是北宋唯一能够打仗的部队。山西虽然建立了义胜军，但在与金人的对抗中并没有显出能力。

前一年十一月时，童贯询问马扩应该怎样对付常胜军，马扩回答，在河北方面，只有常胜军能打仗，一旦朝廷离开常胜军，河北就守不住了。可常胜军却不再可靠，万一造反，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反制它。考虑到常胜军只有三万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陕西、山西、河北地区

挑选十万人，由三个骁勇善战的将领率领，分别驻扎在河北地区的燕京、广信军（或中山府）和雄州（或河间府）。打仗时，四军（三军加常胜军）一起行动可以增加战斗力，平常又可以用三倍的兵力防范郭药师叛乱。[34]

童贯认为这是好办法，但是十万人太难找了。

他最终还是采纳了马扩的提议。宣和七年三月二十九，童贯从山西地区前往河北地区，名义上是犒劳常胜军，实际却将河北地区分成了四大战区，中山府由辛兴宗负责，真定府（现河北正定）交给了任元，河中府杨惟忠负责，大名府王育负责。但在士兵上，只能招募逃兵和流民，其战斗力仍然不可知。

童贯犒劳常胜军时，郭药师也恩威并施。童贯还没有进入燕京界，郭药师已经率领数骑在易州边界等待，见到童贯，倒头就拜。童贯连忙说："你现在的官职也是太尉，和我的官职平级，不用拜。"郭药师却回答："太师如父，我只是在拜父亲。"

虽然对童贯很敬重，郭药师却想让童贯知道只有他的军队才是有战斗力的。他们骑马来到一片荒地，童贯正在迟疑，郭药师一挥大旗，突然从漫山遍野间冒出许多士兵，铁甲反射着日光，不知到底有多少。这件事让童贯清楚，以后还是必须依靠郭药师的部队。[35]

整个下半年北宋境内都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不管是马扩、童贯，还是其他人都预感金人还会再来，又无可奈何地做着注定不够充分的准备，自欺欺人地希望还有时间。

九月二十四，一个好消息传来：金人又派出了一个使团来到汴京，这个使团名义上是向大宋皇帝汇报，辽国天祚帝已经被抓住了。虽然天祚帝在二月份被俘，但由于准备出使需要时间，现在才来告捷也并不算晚。也许，只要对方还愿意派使节来，就不算坏事。[36]

这个使团从六月份[37]出发，九月底才到汴京，速度并不快。皇帝

还是好好地招待了使团，直到十一月初八，才将使团送回。

北宋君臣松了一口气，却不知道，这已经是金国在和平时期最后的使团，目的就是在刺探情报的同时，稳住北宋君臣的心。

与此同时，金军的大调动仍然在进行中。在北宋的边境地区，已经可以看到金人的军队。警报接连不断地传来：九月二十四，位于山西的河东地区奏报，粘罕军队正在调动南下；十月初五，位于河北的中山府探报，金国国相粘罕与副都统耶律余睹带兵来到蔚州柳甸，在这里举行了阅兵仪式；十月十八，金国军马一万五千人，加上从河东、辽东选派的其他民族士兵一万人，来到平州和云中府两地驻扎，这两地在宋金边界的最东端和最西端；十月二十一，中山府继续奏报，除了在云中府等处，在更近的蔚州和飞狐县等地，也出现了女真军队在征集粮草。[38]关于金人入寇的奏章一共一百七十余通，却都没有引起重视。[39]

一切都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入侵一触即发。

但此时的宋徽宗一面接待着金国的使者，一面在准备十一月十九盛大的南郊祭祀活动，没有人敢告诉皇帝正在发生什么。[40]

最后关头，童贯仍然吃不准金人的意图，十一月十一[41]，他派马扩和辛兴宗两人前往云中去见金国元帅粘罕，探查一下金人是否有意南侵。作为掩护，两位使者名义上是去协商山后诸州的归还，童贯建议金国只用归还蔚州和应州，其余的州县北宋就不要了。

当时山西隆德府的义胜军有三千多人投降了金军，还有不少人逃亡。北宋花了很大的力气培养的这支队伍，曾以为可以与常胜军匹敌，实际却没什么用处，甚至还给北宋制造麻烦。马扩等人一路上逆行于义胜军的溃军之中，于十一月二十一到达边境，又待了几天，才被允许见粘罕。

当马扩等人提出童贯的建议时，粘罕笑着说："山前山后都是我家的地盘，不仅不会归还，你们还需要再割几座城池才能赎罪。"

此时，粘罕已经下决心入侵北宋了。马扩猜测，在擒拿了天祚帝之后，粘罕还在犹豫不决。但义胜军的叛变，以及常胜军中的几个叛徒让金国看清了北宋的底细。[42]除了隆德府的义胜军之外，在易州，有一个常胜军首领叫韩民义，由于和上级搞不好关系，率领五百人投靠了金国。韩民义告诉粘罕，在常胜军中，只有最大的首领郭药师还忠于宋朝，其余的人由于张觉事件的影响，已经对北宋离心离德了。

在宋军的部队里，金军最忌惮的就是常胜军。得到了这个情报，加上部下的劝说，粘罕终于下定了决心。

另外，在金国还有一个庞大的辽国降臣群体，他们是劝说金国皇帝征宋的死硬派。由于女真长期地处偏远，对中原地区还不够了解，地理知识很多要靠辽国人（包括契丹人和汉人）给他们补充。辽国自从被征服之后，降臣竟然迅速地上升为金国的另一个贵族群体，他们以统治者的心态看待北宋，他们曾经的土地、庄园等也已经并入北宋，只有攻宋才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早期投降女真的契丹人耶律余睹，其次则是两位在金国担任了宰相的汉人高官刘彦宗和时立爱。再次是低一级的官员缔里、稿里、特离不、王芮、铎剌、乙信、特可、九哥、马五、耶律晖、毛曷鲁、三宝奴、杨天吉、萧庭珪等。

在游牧民族的文化观念中，将被征服者的妻女抢去当老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被当作一种快速实现血缘融合的最好办法，也是消除敌对的手段。辽国天祚帝被俘后，金人的两大元帅（他们兵分两路进攻北宋）都用这种方法和天祚帝结了亲。东路元帅斡离不娶了天祚帝的女儿金辇公主，西路元帅粘罕娶了天祚帝的妃子元妃。

当两大民族在血缘、君臣关系上都在融合时，辽国的降将们就成了金人攻宋的最佳推手和帮手。[43]

马扩应该感到幸运，由于他与金国将领的关系不错，粘罕派人将他

护送回宋境。而另几位北宋的使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就在马扩出使的同时，还有两拨宋朝使者在去往金国的路上。一拨是北宋派去的接伴使傅察和蒋噩，他们本来是去接金国的贺正旦使的。每年春节，两国都要互派的使者叫作贺正旦使，对方使节一入境，就必须派本方使节去接待，这就是接伴使。在宋金战争没开始时，傅察等人按照规矩早早地在边境地区的蓟州玉田县韩成镇等待对方的贺正旦使。但对方使节并没有来，反而是十一月二十八，从河北进攻的金军元帅斡离不攻破蓟州时，将使团抓获。蒋噩投降了金军，傅察却由于不肯向金人参拜而被杀。

另一拨宋使是回庆使贺允中和武汉英。当金军告擒天祚帝的使节离开时，宋徽宗派人前往祝贺，就是回庆使。金军使节完成了任务之后，于十一月初八离开汴京，恰好在金军入侵之前出境了。但与他们同行的回庆使却在十一月二十八被斡离不抓住，那时斡离不刚好攻下蓟州。贺允中被关了起来，而武汉英则干脆投降。

马扩等人回去时，粘罕连书信都没有给他，而是告诉马扩，金军给童贯写的信已经在路上了。

粘罕给童贯的信写于宣和七年十一月三十，语气非常不逊，直言不讳地说："两朝之事，若不互相融会，须至战争。"[44]

在另一封给北宋宣抚司的信中，更是列举了北宋多次违背誓言的事实，拖延下去讲道理已经没有意义，只有动用军队一条路。[45]

在另一封出兵檄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当初北宋迎接平州的张觉，是图金国的土地，而现在金国伐宋，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图北宋的土地。宋徽宗如果想讲和，只有一条路，就是以黄河为界重新划定领土。[46]如果北宋接受这个条件，相当于不仅没有得到所谓的燕云十六州，就连整个河北、山西地区也会失去，只留下无法守卫的黄河南岸广大平原。

这些信件由使者王介儒与撒卢母带给童贯。在金使到达之前，马扩

已经回到了太原，他告诉童贯，应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了。就算到了这时，童贯仍然不肯相信战争已经打响。直到第二天金国使者到来，他还要好好地招待金国使者。

看完信之后，他问使者："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使者撒卢母回答："军已兴，何告为？"[47]

宋金之战就在北宋君臣的手忙脚乱和金国将领的精心准备中打响了。

【注释】

[1] 关于张觉的名字，有两种说法，《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等写作张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写作张毅。但两者读音相同。

[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 参考《宋史·赵良嗣传》。

[5] 《三朝北盟会编》记为六月初二。

[6]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7] 蔡絛《北征纪实》。

[8]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十七篇。

[9] 根据《东都事略》。

[10] 参考《契丹国志》。

[11]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12] 日期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将金使的离开定为正月二十九，相差甚远。

[13] 校书郎连达夫为正使，武略大夫张 为副使。

[14] 见《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十六篇。

[15]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6]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史》记载是八月十一。

[17]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8]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19] 参考《茅斋自叙》。

[2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1] 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22] 根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3] 参考《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2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5] 参考《茅斋自叙》。

[26] 蔡絛《北征纪实》。

[27] 参考《契丹国志》。

[28] 参考《北征纪实》。

[2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0] 参考《松漠纪闻》。

[31] 参考《北征纪实》。

[32] 参考《契丹国志》。

[33] 天祚帝被封为海滨王，送长白山，一年后死亡。

[34] 参考《茅斋自叙》。

[35] 参考《北征纪实》。

[36] 根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为了迷惑北宋，金军在前后还派出了两个使团（一共三个），第一个是报谢通好使团，第二个是告庆得天祚帝使团，第三个是贺天宁节（宋徽宗生日）使团。三个使团一撤，战争随即开始。

[37] 参考《大金吊伐录校补》。

[3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0] 参考《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

[4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2] 参考《茅斋自叙》。

[43] 参考《大金国志》。

[4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十九篇。

[4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篇。

[4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一篇："昔彼纳平山，是图我疆，今伐汴宋，是图彼地。兹所谓出乎尔，反乎尔者也。若赵佶深悔前非，听命不违，则虽云无外，且未深图，止以黄河为界，聊报纳叛之由。是知自黄河以来，皆系我民。"

[47] 参考《茅斋自叙》。

第七章
闪击战

钳形攻势与制敌之道

宋金边境从山西延伸到河北，大致以燕山划界，分别称为山前和山后地区。另外，在河北地区，由于金军占领了营平滦三州，已经进入了山前的地界。

在宋代，从山后进入中原，一般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西线）是从塞外经过山西的大同（云州，云中）南下，从雁门关穿越句注山之后进入太原盆地，然后从太原盆地继续南下，穿越太岳山的南北关，进入上党地区，如今的上党地区最著名的城市叫长治，在宋代称为隆德府。再从上党经过现在的晋城以南的天井关翻越太行山余脉，到达黄河北岸的济源、沁阳（宋代称怀州）一带，然后渡过黄河，向汴京进攻。这条路需要翻越一系列的山脉和高地，行军并不容易，对于防守方非常有利。[1]

第二条路（东线）则是从河北地区南下，经过华北平原，渡过黄河，向汴京进攻。这条路对于金人更加容易，因为它主要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宋军的防线主要靠平原上一个个城市之间互相支援，缺乏地理上的防御屏障。不过，金人如果想要从这条路进攻，必须首先翻越燕山山脉占领燕京，才能进入华北平原。另外，营平滦三州也给金人提供了另一条出兵线路。不管是占领燕京，还是从营州出兵，难度都比第一条线路低很多。

两条线路之间隔着巨大的太行山脉。太行山脉之间有八条孔道，称为太行八陉，其中主要有三条孔道可以沟通两条进攻线路。

金人的进攻策略也是围绕着这两条线路展开。具体安排是：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次子斡离不掌管东路军。攻克燕京后，斡离不把枢密院建在了燕京，由一个辽国的投降官员刘彦宗担任书记官，刘彦宗对北宋非常了解，是金国内部最强力的主战派之一。

金国元帅粘罕掌管西路军，枢密院设在了云中府（金人占领西京后设立云中府），由一位叫作时立爱的官员掌管书记事务。[2]

当时金人内部称这两个分别位于燕京和云中的枢密院为“东朝廷”和“西朝廷”。

负责东路的二太子是晚辈，军事经验相对不足，性格也较为和善，又很好色，与西路的国相比起来更好打交道。国相在和辽国作战时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他曾经对北宋也比较友善，但在和北宋打交道的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强硬派，同时，他对地理非常熟悉，知道金国必须控制哪些地理枢纽，才更加有利于未来的扩张。

在进攻线路上，友善的二太子选择了容易进军的东路，而经验丰富的国相要啃西路的硬骨头。这对于宋军是一种幸运，他们只要借助地理优势抵御老辣的国相，就容易对付二太子的兵马。因此，宋军在战争中并非毫无胜算。

另外，既然东路是宋军地理战略上的薄弱环节，就应该加强东路的防御，避免被金军利用。在战争刚打响时，还在童贯营中的马扩就提出了一个策略。

他的策略强调：河东（即西路，山西通道）路险，地多关隘，士兵熟悉战斗，金军很难长驱直入。但河北（东路）就不同了，在雄州、霸州旁边还有水塘保护侧翼，在广信军、中山、保州（现河北保定）一

带，全是平原坦途，金人最怕的是位于燕京的常胜军，可一旦常胜军出了意外，金人一定顺着大平原长驱直入，直达黄河，并与西路形成策应。

在兵法中，进攻的最佳策略就是形成多路协同的钳形攻势。进攻方很少会选择单路冒进，总是选择两条或者多条通路，齐头并进，如同一个钳子的两条或多条腿，将目标紧紧夹住。但要做到钳形攻势，必须两个钳腿形成策应，互相减轻压力，又共同打击敌人。如果没有策应，这样的钳形攻势就是死的。

金人进攻的东西两路就是钳形攻势的典型应用，而太行山上的通道，就是两个钳腿的策应点。马扩意识到，在河北的真定存在一个关键点，真定距离太行山道的紫荆关通道和井陉通道都不算远，这里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只要长期坚守，就可以防止金人的两路取得联系，又可以牵制敌人的东路军。敌人只要占领不了真定，就不敢轻易南下，即便南下，也要面临被侧翼袭击的风险。[3]

马扩的意思是，请童贯一方面死守山西（西线），另一方面将主战场放在河北（东线），以真定为基地防止敌人东路军的推进，并乘机决战。

事实上，不见得一定是真定，只要宋军能够进行有效组织，实施守土抗战，不轻易放弃一城一池，那么敌人虽然可以占领一部分城池，但总会有城池没有被攻克。金军必须绕过这些坚固据点继续前进，当他们的战线拉得足够长时，后勤就必然会出问题。另外，金军要守住已经占领的城池，也需要花费兵力，经过一段时间后，金军的兵力必然不够用了。后勤出问题，兵力又不足，到时宋军反击，金军必败无疑。

对于宋军来说，要想熬到反击，最关键的是下定抗战的决心。

童贯虽然赞同马扩的计谋，却并不打算由他本人亲自实施。身在太原的他想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快回到汴京。他认为汴京才是安全的地方。

于是，北宋就在童贯的心猿意马中迎来了金军的进攻。

长驱直入

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一[4]，金军的东路军攻破檀州。檀州位于现北京密云一带，已经到了北京盆地，越过了燕山。

十二月初二[5]，金人东路军攻克蓟州。

十二月初五，西路军金国使者到达太原，向童贯下战书。

十二月初七，宋军统帅童贯决定从太原回汴京。童贯是宋徽宗防御金国最依赖的人，之前几乎所有的策略都和他有关，如果他留在山西或者河北指挥抵抗，北宋的军心会很快稳定下来，但他决定离开，军心涣散就一发不可收了。在他走之前，太原守卫张孝纯和儿子张浃曾经劝说他留下，他回答："我只是受命宣抚，不负有守土的责任，如果要宣抚司守土，还要你们干什么？"

他鼓励张孝纯好好坚守，等他到了京城，会立刻派兵马来策应。言外之意是如果他童贯留在这里，反而对整个战局是没有好处的。[6]

张孝纯只好感叹童贯平常耀武扬威，关键时期却胆小如鼠。他对儿子说："罢了罢了，咱们父子死守吧！"

就在童贯决定南逃的当天，东路的郭药师却和金人打了一场生死大战。由于金军已经获得了檀州和蓟州，距离燕京已经很近，郭药师屯兵燕京东郊已经二十余天。他在十二月初二准备出战，可宋军中有人对他不放心，让他不要单兵突进，等待另两位将军张令徽和刘舜仁，然后三军一起出击。

十二月初六，三路军马集结完毕，并进到燕京东面的三河一带，三河附近有一条河叫白河，宋军在西岸，金军在东岸。郭药师的兵马戈甲锃亮，队伍整肃，连金军都感到有些发怵。

半夜里，郭药师率军渡过白河。金军立刻迎上，阻止他们继续前进。第二天一早宋军与金军摆开了战阵。宋军在西面，北翼是张令徽和刘舜仁的军队，南翼是郭药师。金军在东面，北翼是二太子斡离不，南翼是其他人的部队。

郭药师的军队不愧为常胜军，鏖战三十余里，将面前的金军击退，他们到达了金军的寨子，却发现没有带火种无法将对方的营垒烧毁。

就在这时，传来了宋军北翼败退的消息。张令徽首先被击败逃走，接着刘舜仁也被击退了。郭药师听说后，只好率军撤回，失去了全胜的机会。

双方战斗的烟尘远在燕京城都可以看到，白河距离燕京大约有八十里，据当时在城上的许采[7]记载，站在城东城墙上，向着白河方向望去，尘埃如同云气遮蔽天空。很久之后，张令徽首先逃回，过了一会儿，刘舜仁也到了。直到晚上，郭药师才回到了城内，三人互相诋毁，争吵不休。根据统计，郭药师最核心的所谓“硬军”三百人，只剩下一百二十人活着回来。

但不管怎么说，金军也损失惨重。这场战斗以双方势均力敌，各遭遇损失而告终。这至少表明，宋军的战斗力并不比金军差，只要组织得当，燕京是可以保住的。接下来就看双方怎样部署了。

十二月初八，童贯按计划离开太原南逃。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参议宇文虚中，机宜范讷、王云、宋彦通等人。

同日，马扩离开太原，前往真定参与防守。他从童贯处要来了一个命令，允许他在中山、真定一带招纳三万人，在真定参与防守。[8]

到这时为止，事情还都在意料之中。但突然之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郭药师投降了！

不过，回头复盘，会发现整个事件中，郭药师可以被人指责的地方

并不多。反而是如果他不投降，就摆脱不了死于非命的命运，而且很可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己方叛徒之手。

就在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夜里，驻守燕京城东北门的守将决定投降。他想拿郭药师当作见面礼，还专门询问："你们是要活的郭药师，还是死的郭药师？"[9]

这件事被郭药师发现了，他随后还发现，事情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投降这么简单，背后的大头目实际上是当天吃了败仗的张令徽和刘舜仁。也就是说，当天的败仗是已经注定的，不管常胜军死多少人，花多少力气，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宋军中复杂的关系让这个只懂打仗的汉子感到无助。他的性格的确有很多问题，比如过于纵容他的军队；与别人无法相处；虽然投降北宋，却保留了很多辽国的习俗，不肯被宋军同化；等等。但他在投降之前，至少打仗从来没有懈怠，可是从北宋的皇帝到将军，却无一不对他充满了防范，还不断地预言他会惹麻烦，或者搞叛乱。即便这样，他还是在尽全力与金人打仗。

当宋军内的叛军要将他的人头送给金人时，事情终于起了变化。郭药师决定，与其让别人将自己的人头送过去，不如自己将个人和整支军队都送过去。

他给金人写了降表，又召集燕京城的官员蔡靖、吕颐浩、李兴权、沈琯在家开会，人来后，他宣布投降，将众人软禁。蔡靖想要自杀，被人拦下。郭药师表示投降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能和在座之人一样保全节操了，说完痛哭流涕。

当晚，燕京四处起火，士兵们开始劫掠。这座以巨大代价换回的城池，在宋军手中只保留了两年，就再次，也是永久性易主了。

第三天，金军进入燕京城，在休息四日后，斡离不离开燕京，继续南进。蔡靖被留在了燕京，帮助维持燕京秩序，其余官员中吕颐浩、李

兴权、沈琯、杜时亮、陈杰五人被带在军中，以便随时起用。郭药师也率军跟随斡离不离开，成了金军入侵的帮手。

由于燕京失守，整个河北地区一片乱象。[10]泾州[11]守将郁中正被金人囚禁，景州守将吴震从海道逃走，蓟州守将高公干率领卫队南逃，檀州守将徐杰也在逃窜之中，顺州守将林良肱还在向燕京方向移动，涿州守将葛逢更是在这之前就逃亡了。易州守将黄烈在逃出城时，从城墙坠下摔断了左脚，人们就把他的右脚也折断，死了。

就在河北地区乱套时，山西地区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童贯逃走前后，金军已经开始针对北宋边境地区展开了行动。

北宋山西地区的中心在太原，金国的西部中心在云中（大同）。太原和云中之间分布着北宋的北方防线，而又以四个州最为重要，它们是朔州、武州、代州和忻州。朔州与大同在同一个盆地之中，是对云中最好的牵制，武州位于朔州的西南山区之中，地理位置居高临下，构成朔州防线必不可少的高地。过了朔州，就到了中国历史上一道著名的关口——雁门关。雁门关之南是代州和忻州，这两个州也是太原的北方门户，一旦北方入侵者占领了这两个州，顺着一条谷地就可以到达太原城的最后一个防守点石岭关。过了石岭关，就是太原城了。

这四个州中除了宋朝的军队之外，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义胜军，是当初谭稹驻守山西时，利用原来辽国地区的汉人建立的部队。这支部队本来应该战斗力更强，其装备好到甚至让常胜军的统领郭药师都羡慕。但随着时间推移，土著汉人与宋朝官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义胜军除了消耗大量物资，找了不少麻烦之外，并没有帮上忙，甚至还成了祸害。

金军首先进攻的是距离大同最近的朔州，朔州守将孙翊是一位既忠诚又有勇气的官员，但当他出战时，城内的义胜军立刻开城投降，朔州失守。随后，武州也因为义胜军的投诚而丢失。[12]

拿到了朔州和武州之后，金军通过雁门关，于十二月初七来到了代州城下。与代州同时被围困的还有代州南边位于代州与忻州之间的崞县。

代州守将李嗣本和崞县守将李翼都选择了死守。这一次，就连金军也认为不会再像前两次那么顺利，一定会有一场大战。但不想三天后，代州城内的义胜军故技重施，将李嗣本抓获，举城投降。

十二月十一，金军派遣李嗣本到崞县劝降，被李翼射走。金军意识到暂时无法攻克崞县，率兵绕过崞县，继续南下。

宋军方面，随着金军南下，也开始准备加强防守。

宋军的防御策略是这样的：在崞县以南的盆地中，还有一个重要城市忻州，忻州南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通往太原的最后一个关口——石岭关。整个太原以北的防御由位于太原的大元帅张孝纯负责。张孝纯决定让各个城市各自为战，但首先必须保卫住石岭关，只有这样，太原才不会受冲击。一旦石岭关安全了，再派兵北上，寻找合适的机会与金军决战。

十二月初九，宋金两军在代州和崞县还没有决出胜负时，张孝纯就已经布置好了石岭关附近的人马。把守关口的守将叫王宗尹，张孝纯一面让王宗尹死守，一面派人去增援他，并做好反击的准备。

张孝纯派去增援石岭关的将军叫冀景，但冀景担心危险，不愿意北上。张孝纯为了让冀景同意，又派遣了八千义胜军增援。义胜军的首领叫耿守忠。张孝纯以为这样冀景就会同意了，不想冀景还是拒绝。但这一次，张孝纯强迫他动身了。

冀景心不甘情不愿地到了石岭关，他信不过耿守忠的义胜军，于是将义胜军继续派往石岭关以北，去与金军决战。他的策略是：自己的部队必须处在义胜军的后方，否则，义胜军万一投降金军，自己就被包围了。

耿守忠率领义胜军来到了忻州以北的忻口，寻找与金军的作战机会。但这时，他又回头来找冀景，表示自己的部队都是步兵，希望冀景拨出一部分骑兵给自己。冀景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拨了一半骑兵给他，不敢把另一半也交出去。

耿守忠获得了骑兵之后，并没有继续向北寻找金军，这个缺乏纪律的部队已经失控了，人马乱七八糟向石岭关赶来。冀景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弃关逃走了。耿守忠占领了关口，随即投降了金军。石岭关失守了。[13]

金兵长驱直入，赶去抢占石岭关。经过忻州时，忻州守将贺权一看大事不好，立刻大开城门，奏乐欢迎金军的到来。金军大喜，决定不进城，继续赶路到了石岭关。

十二月十七，石岭关以北的最后一个北宋据点崞县也失守了。这一次，仍然是义胜军干的，义胜军在崞县的首领崔忠发动叛乱，引贼入城，李翼被俘殉节。金军长驱直入，来到了太原城下。太原以北的土地永久性失守了。

石岭关失守时，北宋汴京的大臣们竟然还不知道金兵入寇的消息。至于消息后来如何传到汴京，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初，燕京的蔡靖曾经发了一百七十多篇告警，但这些告警传入宋徽宗手中就断掉了，皇帝并没有把它们拿给外廷官员去讨论。他这么做，一是对郭药师和守卫部队有足够的信心，二是害怕影响了盛大的南郊祭祀活动。

活动结束后，宋徽宗继续将所有的警报消息捂住。但随着金人入寇，零零星星的消息终于开始在汴京的官场和民间散布开来。

十二月初九，北宋的两位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终于坐不住了，他们面见皇帝，请求皇帝将报警信交给外朝讨论。[14]两位宰相拿到报警

信，都倒吸一口凉气，但随即决定不能告诉外人，而是在高级官员中先讨论出个结果，再通报其他官员。人们每天看着高级官员心事重重地去开会，到了夜里才回来，都知道出了大事，猜测纷纷，又没有确定的消息。

十二月十二，中山府知府詹度接连发了三封报警信，传入汴京后，人心惶惶，朝野大惊失色。[15]可是，皇帝和宰相们仍然没有正式通报，继续每天开会讨论。

十二月十六，童贯从太原归来，事情终于捂不住了。可是朝廷仍然没有拿出像样的决策。到底应该怎么办？是痛击，还是服软？郭药师投降的消息传来，甚至没有人敢于相信，官员们都顺从皇帝的意思，继续讨论封郭药师为燕王，拥有世袭的权力，[16]仿佛这样掩耳盗铃，就可以抵御金人的入侵了。

不管北宋君臣如何慌乱，金军的入侵步伐并没有停止。斡离不的军队最初的目标是收复燕京地区，并入侵河北地区。可自从郭药师投降后，这位降将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立刻将北宋的虚实都告诉了二太子，于是从这时开始，金军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十二月十四，斡离不决定以汴京为目标，发动长途奔袭，郭药师率领两千人马为先锋。同时规定，途中路过的州县一律不得随便杀戮。

在前期，金军的攻击是面状的，也就是一路扫过所有的州县，以夺取土地为原则。从这时开始，金军开始了线状攻击，如果某个州县暂时拿不下来，就绕过去继续前进，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北宋首都。

十二月十八，斡离不的军队已经到达保州、安肃军，但没有攻克。十二月二十一，金军兵围中山府，中山府守将詹度进行了防御，保住了这个重要据点。

临阵换帅

在与群臣商量对策的日子里，宋徽宗确实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是取经自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那就是——逃跑。

十二月二十，宋徽宗封他二十六岁的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在宋代，开封牧是一个不常封的职位[17]，宋代早期的太宗、真宗都曾经当过开封牧，之后就长期空缺了。首都行政职能归于一个叫作开封知府的职位，即便是知府，也必须加一个“权”字，称为开封权知府，也就是暂且充任知府的意思。

宋徽宗这次拾起开封牧的职位，实际上是想让他的儿子赵桓守卫汴京，自己已经做好了溜走的准备。

如果皇帝溜走，把守卫首都的重任留给太子，肯定会引起巨大的恐慌，也向人们表明朝廷并没有信心守住这里。这等于是在金军没有到来之前就扰乱了军心。

此时，一位叫李纲的人出场了。

李纲在汴京保卫战之前并不出名，由于性格原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还曾因言论被贬七年。宋徽宗封儿子为开封牧时，李纲的职位是太常少卿。[18]他在十二月二十二[19]夜晚去拜访给事中吴敏，询问吴敏接下来的情况。他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皇帝走了，事情就麻烦了。当然，皇帝要走，别人是拦不住的，唯一的机会就是他离开前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而不仅仅是让太子当开封牧。这就像当年唐明皇被安禄山逼到了四川，太子却北上灵武继续抗战。唐明皇退位给太子，让他有了足够的号召力，否则，仅仅以太子的身份，是不足以让天下感到安心的。”

吴敏同意李纲的看法，第二天立刻求见宋徽宗。

就在吴敏求见宋徽宗之前，皇帝本人似乎也觉察到了问题所在，已经走出了第二步。十二月二十一，皇太子入朝时，宋徽宗将只有皇帝能够使用的排方玉带送给了太子，这可以视为他要让太子负全责的标志。[20]

十二月二十二，宋徽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从汉代就形成的儒教哲学是建立在“皇帝是天之子”的基础上的。作为天之子，皇帝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犯错了，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天罚，甚至改朝换代。但在历史上又有几次著名的罪己诏，比如汉武帝末年对自己滥用兵戈的罪己诏[21]，以及唐德宗在泾原兵变中被赶出长安后发出的令人心酸的罪己诏[22]。宋徽宗的罪己诏和唐德宗的一样，将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请求人民原谅，并恳求各地赶快来勤王，以免社稷不保。

罪己诏并非宋徽宗本人所写，而是一位叫作宇文虚中的大臣写的。宇文虚中当初是海上之盟的重要反对者，当初主推海上之盟的是宰相王黼和枢密使童贯，反对的人数众多，宇文虚中是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一个。他因此惹怒了王黼，从中书舍人被降为集英殿修撰。后来童贯选择宇文虚中当参议官，跟随他前往太原。这次童贯逃回，又把宇文虚中带了回来。

此时，宋徽宗向宇文虚中道歉，后悔没有听他的话，并询问应该怎么办。宇文虚中表示，首先应该发罪己诏，将所有弊端革除，等人心回转，才能胜得了金军。宋徽宗连忙叫他去写罪己诏。宇文虚中从袖中抽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草稿，原来他没有等皇帝的命令，就私下里先写了个草稿。[23]皇帝也来不及提出质疑，立刻叫人在京城四处张挂。

在罪己诏中，宇文虚中将皇帝骂得淋漓尽致，似乎将几十年的积怨都发泄了出来。其中将皇帝形容为：

> 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靡侈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24]

另外，罪己诏中提出了十项整改措施，大多是减少奢侈的做法，并没有涉及具体如何抵御金人。只是希望大家广开言路，献计献策，同时号召天下方镇都赶往京师，勤王驱敌，皇帝给大家准备了赏赐和职位。

十二月二十三，火上浇油的是，群臣此时才把金国的伐宋檄文给皇帝过目。檄文是金国使臣交给童贯的，但童贯一直不敢给皇帝看。直到这一天，宰相李邦彦才决定给皇帝过目。

这时人们也想起来，金人在发兵之后，派了两位使臣前来宣战，大臣们却不敢引见给皇帝。宋徽宗知道使者来了，也不敢见，只好让大臣们接待。使者见到大臣，立刻表示金军已经兵分两路前来讨伐，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以及大臣蔡攸等都目瞪口呆不敢发话。当他们问，北宋应该怎样做，金国才肯息兵时，使者答到只有割地称臣一条路。大臣们不敢做主，好言好语将使者劝走。[25]

皇帝看过檄文，又联想起使者的宣战，终于决定退位。他派遣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军，将自己退位的消息带过去，向金军求和。李邺要求带三万两黄金前往，朝廷已经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将祖传的两个金瓮（各五千两）熔化掉，制成金牌让李邺带走。[26]

就在十二月二十三当天，宋徽宗在一片乱哄哄中完成了传位。宋徽宗由于积劳成疾，突然间病倒，于是把太子召到了病榻之前，命人给毫无准备的太子穿上御衣。太子吓得连忙躲避，哭着不敢接受。宋徽宗表示，如果他不接受，就是不孝。太子反驳说如果接受了更是不孝。

就连皇后也来劝说，太子还是不干。众人挟持着太子前往福宁殿即位，一路上太子抗拒着不肯走，几至气绝，于是人们连忙找太医来，等他醒了又拖着他走。太子来到了福宁殿，宰相高官们都已经在等候，将他强拉入殿完成了即位仪式。[27]

人们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强拉上大位时，整个帝国大厦正处于危机之中。他的父亲随时准备逃走，大臣们议论纷纷，不知道怎么办。更麻烦的是，一次思想危机正在首都上空盘旋。宋徽宗时期，指导皇帝思想的是变了味的主战派，比如童贯决定与辽国开战，收复燕云十六州，只是由于战斗力不强，这些主战派不得不采取了坑蒙拐骗的手段，

以赎买方式从金国手中收复了燕京。反对童贯等人的大都是主和派，认为不应该与辽国为敌，而应该遵守长期的和平协议。

现在，随着宋徽宗的倒台，主战派已经失势了。事实证明，当初主和派的建议更加可靠。可宋徽宗下台时已经是大敌当前，又如何才能恢复和平呢？

到底是靠战争将金人赶走，还是通过议和祈求新的和平？事实上，皇帝的班子里一直不乏祈求和平的人。比如，宋徽宗最后派去的使节李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七，李邺归来并对金军的战斗力赞不绝口，表示金军“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敌也”。[28]可是如果不抵御金人的进攻，和平已经不可能了，经过形势的转换，更加积极的主战派反而更能拯救北宋。

让一个刚上位的青年人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恐怕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的大臣班子了。

幸运的是，在宋徽宗下台前任命的几个官员都主张抵抗。宇文虚中虽然当初批评朝廷不该破坏与辽国的和约，但此刻却主张抵抗。在他的坚持下，皇帝下令召集西北方向熙河路经略使姚古，以及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前来勤王。西北的士兵由于长期与西夏对峙，是宋军之中最有战斗经验的，如果北宋还有人能够抵御金兵，必然出自西北。[29]

皇帝还任命了吴敏担任门下侍郎，让他和宇文虚中共同负责召集勤王军队。吴敏立刻行动，召集被贬斥但是经验丰富的种师道前来勤王，同时还召集了一位叫何灌的将领。又由于吴敏与李纲的关系较好，他向皇帝推荐了李纲。这就给后来李纲的上台打下了基础。

北宋更换皇帝时，金军的进攻仍然在持续。十二月二十五，金军攻占庆源府（现河北省赵县）。

十二月二十七，金军占领信德府（现河北省邢台市）。在两次进攻中，郭药师的常胜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金军是传统部落制的，每一次打完，都要进行一番劫掠，士兵们要靠抢劫战败者获得生活资料。郭药师的军队却已经职业化，他们纪律严明，不滥杀无辜，最多只是稍微取点财物。

郭药师对平民仁慈，对他的前主子却足够心狠。十二月二十九，更换皇帝的消息传到了金军营中，二太子斡离不听说后，担心宋朝有了防备，犹豫不决。郭药师却劝说二太子继续进军，表示南朝未必有防备。[30]

在西路，金军也于十二月二十七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北宋对西路的防御错漏百出。不仅前期朔州、武州、代州、忻州和石岭关迅速丢失，到了金军合围太原后，又错失两路救援人马，分别是朔州守将孙翊，以及府州守将折可求的兵马。[31]

孙翊前来太原，是因为他所在的朔州已经投降，把他关在了城门外，他只好带领两千兵马前往太原。来到太原后，由于守将张孝纯不敢开门，孙翊在城外与金军鏖战两日，全军覆没。[32]折可求则是率领两万兵马从与西夏接壤的麟州、府州赶来，在交城被金军击败。

如果北宋有一个好的将领统筹全局，在粘罕进军太原时，守将折可求和孙翊等人的部队集中起来，直捣粘罕在云中的老巢，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是有可能逼迫粘罕回军的。

虽然没有击退粘罕，但幸运的是，张孝纯守住了太原，并没有让粘罕的西路军更进一步。这也减轻了汴京的压力，在京城的宋军只需要对付河北的金军东路军就可以了。

宋钦宗上台后，首先要做的是改元，徽宗的年号宣和已经用了七年，钦宗与大臣们经过商议，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的意思，定年号为“靖康”。[33]于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激烈的靖康之年到来了。

逃亡的皇帝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一，金兵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浚州。在几天前的十二月二十六，皇帝曾派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率领七千兵马守卫浚州，步军都指挥使何灌率军三万守卫黄河。[34]当时何灌就想尽办法留在后方，他劝说宰相白时中，汴京才是更需要他的地方，不要把他派往前线。但白时中还是让他出发了。[35]

正月初一[36]，金军在郭药师的先导下到达浚州城外，梁方平并没有想抵抗，而是率军向黄河南岸撤去。一旦过了桥，他立刻下令将黄河上的浮桥烧掉。由于仓促放火，数千宋军没有来得及过桥就淹没在了河中。

在黄河南岸陈军三万的何灌一看梁方平逃走，也立刻开始逃窜，黄河南岸的宋军也逃得一个不剩。

正月初三[37]，在没有宋军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开始从容不迫地用找到的十几艘小船渡过黄河，到初六才渡河完毕。[38]在此期间，如果南岸有宋军把守，完全可以击败渡河的金军。何灌的逃跑，让宋军丢失了最佳获胜的时机。这和宋徽宗长期不设防政策有关，他把燕京交给郭药师的常胜军、山西交给童贯后，在首都地区找不到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将领，贪生怕死的人占据了高位，导致了黄河失守。

黄河失守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就在当天夜里（初三），宋徽宗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夜间二更左右，宋徽宗的车驾从通津门水路出城，跟随他的有皇后、皇子、帝妃等人，护驾的士兵由平凉军节度使范讷掌管。

最初皇帝乘船，后来感觉船太慢，改乘肩舆，又嫌肩舆太慢，临时征用了几艘搬运砖瓦的快船由皇帝乘坐。[39]路上饿了，只好跟开船的要个饼，分着充饥。一夜行走了上百里，到了南京（现河南省商丘

市），才进州府休息，找到了被子，换来了驴骡。

从南京到符离后，宋徽宗再次坐船顺泗水而下。在这里，宋徽宗碰到了也跟着逃亡的宇文粹中（宇文虚中的哥哥）、童贯、高俅等人，这才有了伴。童贯率领三千兵马护驾，一路到了扬州，各种皇子皇孙在路上被安置了一批，并没有都跟着他到扬州。

高俅以三千兵马扼守淮河，防止金兵赶来。扬州父老们恳求宋徽宗不要渡过长江，可是太上皇早已被吓破了胆，将皇后留在了扬州，自己渡江到了镇江。

宋徽宗逃亡之后，北宋首都汴京上下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主张海上之盟的前宰相王黼也暗地里载上家产老婆孩子开始了逃亡。文武百官中也有很多人偷偷地逃走。此时，年轻的新皇帝的动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人劝说皇帝也学他的父亲，逃到江南去避难，有的建议他去往关中，[40]而新皇帝想的则是到底如何稳定人心，惩罚那些逃亡的大臣。

在新皇帝刚即位时，他的确做了两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第一，惩罚之前的那些主政者，也就是所谓的“六贼”；第二，任命主战派开始防卫。

在宋徽宗时代是不可能惩罚官员的。由于一切政策最终都出自皇帝，如果惩罚当时的大臣，就是否认皇帝自己，所以，宋徽宗即便知道他的大臣不好，也不可能惩罚他们。但他一下台，他的儿子却并没有这样的包袱。除了父亲本人不能惩罚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可以追究责任的。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就在钦宗皇帝刚上台不久，一位叫作陈东的太学生就已经开始发难。[41]他将宋徽宗时期的宠臣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人称为“六贼”，上书请求皇帝将“六贼”诛杀。

在陈东所列的六人中，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其中蔡京执政最长，曾经数次出任宰相。他最大的功劳是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由于北宋财政花费很高，政府常常缺钱，别人都无法帮助皇帝找到足够的钱，只有蔡京能够完成任务。他在任上进行了许多财政和金融改革，直到现代，各级政府仍然在学习这些经验。蔡京最令人愤恨之处是他遵从皇帝的意思，迫害那些元祐派（旧党）的大臣。加上执政时间太长，党争不断，蔡京成了皇帝要处理的首要目标。

王黼和大宦官童贯被列入“六贼”，主要是因为与金人结盟的政策失误。

朱勔是一个典型的宠臣，以运送和搜刮花石纲出名，从而导致整个东南方的疲敝，造成了方腊叛乱，让北宋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

大宦官李彦以在西北地区搜刮田产出名。事实上，这也是宋徽宗的财政需要，要将更多的土地从民间搜刮出来，好收税。

另一个大宦官梁师成并没有做太多的恶，他自称是苏东坡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是苏东坡的侍婢，送给别人后生下了他。[42]作为宋徽宗的宠臣，他的地位很高，蔡京尊重他，童贯和他互为攻守，王黼当初被提拔也多亏了他，他自然被列入了“六贼”之中。

陈东在上书中痛斥“六贼”，实际上是要将宋徽宗所有的恶政都归咎于他们。[43]除掉他们，会产生人心大快的感觉，从而把大家都团结在新皇帝周围。

陈东上书时，宋徽宗还在汴京，大家心里有数，却并没有附和。可宋徽宗一上路，陈东再次上书，就到处理“六贼”的时候了。

首先倒霉的是逃跑的王黼，他被剥夺了家产，搜出了数万亿的宝贝，最后贬斥永州，在路上被杀死。其次是李彦，由于背景不深，也被抄没家产赐死。梁师成因为立太子有功，暂时被钦宗保护，但没出一个月，也被赐死了。

帮助皇帝运送花石纲的朱勔被放归田里。蔡京和童贯撑得时间久一些，但这一年没有过完，“六贼”就都已经死了，算是给群臣一个交代。[44]

陈东这样的太学生义气方刚，年轻气盛，放在现代的政治分野中可以算是年轻左派。这样的人可以去摧毁，却无法去创建。在靖康元年正月，最现实的问题是，怎样组织防御才能够击退金军的入侵？这个问题就不能靠太学生去完成了。

所幸的是，宋徽宗临走前留给宋钦宗一个优秀的大臣。到李纲登场的时候了。

【注释】

[1] 马扩曾经谈到两条路的优缺点，参见下文他的建议。

[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 参考《茅斋自叙》。

[4]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许采《陷燕录》记载为十一月二十六。

[5]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认为是十一月二十八。

[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7] 参考《陷燕录》。

[8] 参考《茅斋自叙》。

[9] 参考《陷燕录》。

[10] 以下记述根据《陷燕录》。

[11] 根据《陷燕录》，泾州在西北地区，不知为什么窜入此处。

[12] 河东战斗过程见《三朝北盟会编》。

[13]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4] 参考《北征纪实》。

[1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6] 参考《北征纪实》。

[17] 参考《文献通考》。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根据《靖康传信录》推知，因李纲自述吴敏见皇帝为二十三日。

[2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1]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22]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宇文粹中《承训录》。

[2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要录》，以及《北征纪实》，综合之。

[2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3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张汇《金虏节要》。

[3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3] 参考《铁围山丛谈》。另《三朝北盟会编》载诏书中有“发施仁政，怀日靖四方之志；经文纬武，图永康兆民之功”语。

[3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5] 参考《宋史·何灌传》。

[36]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定于正月初二。

[37] 参考《金史·太宗纪》。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沈琯《南归录》。

[39] 李纲《靖康传信录》。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封有功《编年》。

[41] 参考《宋史·忠义传》。

[4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另一个大臣高俅则自称苏东坡的小史，见王明清《挥尘

录》。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一。徽宗宣和七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

[4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群奸之窜》。

第八章
遗患无穷

孤城守将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宋钦宗在吴敏的推荐下见到了李纲。在奏对中，李纲总结了金军出兵的五大欲求，认为他们的军事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是：第一，称尊号，获得北宋的尊重；第二，索还逃亡者，加强人口；第三，要求增加岁币，获得更多收入；第四，要求犒师，即一次性的物资赔偿；第五，割地。

他认为第一、第二项，对于北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应该满足对方；第四项一次性赔偿，对北宋来说只是一次性支出，也可以尽量满足对方。

但第三项，由于宋徽宗许诺的岁币已经很高，加上是持续性支出，每年都要交，所以不能轻易许诺再增加岁币。至于第五项，更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是土地丢失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北宋将失去屏障，未来守不住。

李纲建议皇帝在这个指导原则下与金军展开较量，同时不要懈怠军事上的准备。[1]

第二天，宋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是李纲第一次跻身于北宋重要官僚行列，但仍然不算是最高的宰执级官员，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宋代官阶最高的几位官员称宰相，还有几个副宰相称为执政，共同组成最高官员群体。

正月初四，金军正在渡河的消息传到京城，宋徽宗已经离开，宰执级的官员都在劝说宋钦宗赶快逃走。他们大都认为[2]，宋钦宗离京之后的第一选择应该在襄阳一带。

为什么是襄阳？这就要从中国的地理结构谈起。在中国，秦岭—淮河将国家分成了南北两部分，沟通这南北两部分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分别是从陕西入四川的西路（也叫蜀道），从淮河到长江流域的东道（宋徽宗逃亡时所走的道路，运河也修建在这条路上），以及从河南中部经过南阳、襄阳到达湖北、湖南的中路。中路位于三条路中间，而襄阳又在中路的中间，所以被认为是中华的地理中心，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如果宋钦宗逃到这里，比起宋徽宗逃到江南要好看一些，同时也可以说是为反攻做准备。[3]

除了襄阳，也有人建议西去长安组织反攻[4]，也就是选择西路。

如果能进行有序组织，皇帝撤离首都也不算是错误的选择。在全局性战争中，首先要保证的是皇帝的安全，因为皇帝就是指挥系统的最高首脑。其次，等皇帝撤离了，还要对整个首都的平民进行有组织的疏散。平民撤离完毕，军队再入驻，展开顽强的防守，守住都城，并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反攻。

由于金军兵马并不算多，只要组织得当，是可以利用上述策略将他们击败的。

但这样的策略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现实却是，由于金军来得太快，朝廷仓促准备，一旦皇帝出走，不仅无法组织有效的平民撤离和军事防御，反而会导致后方的大混乱和战线的崩溃。可以想象，只要皇帝一离开，溃兵立刻就会逃离，把平民丢下不管，而平民由于缺乏有效组织，很可能会出现一次踩踏式的大悲剧。溃军和难民还会冲击其他区域，北宋的军事将彻底瘫痪。

因此，考虑到实际情况，要想组织有效反击，皇帝不仅不能离开首

都，还必须负起责任，鼓励士兵，防止哗变。

李纲作为兵部侍郎，在宰执们开会时并没有资格参加。但他越级来到了开会现场与宰执们辩论。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果皇帝逃走，哪怕是去襄阳，整个大宋江山也就完蛋了。在他的鼓励下，皇帝终于决定留下。

为了让李纲在未来可以参加国务会议，皇帝问下属，宰执级官员中是否还有空缺？恰好尚书右丞有缺，皇帝就现场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虽是执政级官员的最低一档，却让李纲有权参加国务会议了。

直到正月初五，皇帝仍然处于摇摆之中。他的日常用品甚至都已经装车。李纲煽动了禁卫军，让他们表示坚决不走，再以此胁迫皇帝，让他明白即便上了路，也有可能被军队抛弃。皇帝决定不走之后，李纲又用皇帝的名义去强迫大臣留下。[5]他几乎是凭借个人的力量威逼利诱，才将整个朝廷留在了京城。

当天，皇帝在李纲的半强迫半说服下来到了宣德门慰问士兵。皇帝只是象征性地露一下面，李纲与吴敏却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在士兵面前大声朗读着事先准备的檄文，每读一句，下面都激动地应和着，直到所有人感慨泪下。

汴京被弃城的危险暂时过去了，但接下来，是怎么守城的问题。由于承平日久，人们不仅忘记了怎么守城，甚至连守城的工具都没有了。我们不妨看一下李纲时代的北宋汴京城是什么样子的。

北宋汴京城包括内城和外城两座城墙，内城（也称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修建于唐朝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外城（也称新城，罗城）修建于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6]

根据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定都汴京时，曾经对城墙进行过一次改造。这次改造的图纸最初是由宰相赵普设计，设计方案颇有唐代风

范，城市街道横平竖直，坊市燕然，但宋太祖看了大怒，立刻让赵普重新画了一张图，图上曲曲弯弯，到处是不合几何学的地方。于是，北宋的首都看上去如同一个委屈的古怪城市，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到了宋神宗时期，曾经试图对城市进行改造，但最后也没有改成，只是增加了一圈女墙作为保护。

宋徽宗大建宫室的时期，终于有机会将首都美化一番。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改造工程开始，将原来不平的地方都拉直，并扩大了一部分，于是首都外城的周长扩大到了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重修之后，首都的确漂亮了很多，但由于城墙过于笔直，反而容易受到攻击。金人的大炮在四面轰击时，会引起大规模倒塌。[7]

汴京城墙的内城墙一共开了十二个门，东城墙三门：靠北的叫望春门（旧曹门），往南分别是丽景门（旧宋门）、角门子；南城墙三门：中间的叫朱雀门，东面的叫保康门，西面崇明门（新门）；西城墙三门：从南往北分别是宜秋门（旧郑门）、角门子、阊阖门（梁门）；北城墙三门：中间景龙门，西面天波门（也叫金水门，传说中的杨家将的府邸号称天波杨府，就在这个门旁），东面安远门（旧封丘门）。

汴京城的外城墙更加复杂，一共十二个陆城门和八个水门，陆门分别是：东城墙两门，南朝阳门（新宋门），北含辉门（新曹门）；西城墙三门，南顺天门（新郑门），中开远门（万胜门），北金耀门（固子门）；南城墙三门，中南薰门，东宣化门（陈州门），西安上门（戴楼门）；北城墙四门，从东往西分别是长景门（陈桥门）、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外城由于有三条大的河流贯穿，又形成了八个水门，供货物进出，每个水门里都有铁闸，随时可以放下，防止外面的敌人偷袭。其中汴河上水门分成南北两个，称为大通门和宣泽门，下水门南北分别称为上善门和通津门，惠民河上水门叫普济门，下水门叫广利门，广济河上水门

叫咸丰门，下水门叫善利门。[8]

为了御敌，外城的城门大都带有三层瓮城，扭头开门。所谓瓮城，指的是一个城门不是一道单门，而是在城门位置修建一个与城墙同高的围子（即瓮城），围子上开两个门，一个门对着城内街道，一个门对着城外，人们要从城内出到城外，要先经过内门进入围子里，再从围子经过外门到达城外。敌人来进攻，即便攻破了外门，也只是进入围子里，反而更容易被守军从瓮城城墙上瓮中捉鳖发动攻击。汴京的瓮城是三层，意味着有三个门，更加稳固。

所谓扭头开门，是指瓮城的内外门不是正对着的，人们从城内的街道先经过内门进入瓮城，瓮城里的路要转一个九十度的弯，再通向外门。这种扭头门的设计是为了避免攻城方的大炮直射，也是增加攻城方的难度，加强守卫实力。

不过，御道上的四个门——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由于皇帝经常使用，都修的是直门两重，这四个门就成了防守方最薄弱的环节。

在城墙外，有一条宽十余丈的护城河，名叫护龙河。河两岸遍植杨柳，粉墙朱户，禁止行人往来。[9]城墙上每隔百步就设一个马面，所谓马面，就是比城墙更宽，向城外突出的墙体，由于更厚，不仅可以抵御炮火的攻击，也更容易对付城下的敌人，避免形成死角。马面上有战棚，以及躲避弓箭的女墙。城墙内有专门的牙道种植了树木，每两百步有一个武器库。在首都有一个机构叫京城所，专门负责武器与城墙的维修。

这种看似非常专业的设置，还是只存在于理想之中，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当李纲和宰执们争吵时，京城所负责人陈良弼立刻跑了过来，向皇帝报告首都是守不住的。[10]因为宋徽宗修筑城墙时只考虑了美观，没有想到京城会遭受攻击，因此将城墙的防御功能减弱了。

改造时拆掉了用于防御的木制塔楼（楼橹）[11]，考虑到天下太平的局面，楼橹迟迟没有修复，就是有一些旧楼橹，也由于改造工程采取了新式墙面，和旧楼橹的制式已经不合拍了。旧楼橹比较大，在城墙上无法放置，可如果截成两个，又太小了。虽然京城还存着不少木料，但需要五千木匠一个月才能建好。[12]

更麻烦的是，在城东的新宋门外，有一个叫作樊家冈的地方，这里由于接近皇家禁地，在开挖护城河时深度不够，成了防守的最大薄弱点，再补挖已经来不及了。

京城所的人都没有信心，李纲又该如何处理呢？

短兵相接

从正月初五皇帝决定留守，到正月初八金军到来的这几天，成了李纲唯一能利用的空档期。他立刻将全城动员起来，由于汴京已经一百多年没有遇到过战争，市民早已适应了和平的生活，动员起来可以，但要教会他们干什么，却并不容易。

在人员上，李纲给每一面城墙配备了一万两千名正规军，同时有大量的保甲、居民和厢兵来为正规军服务。正规军按照每百步配置在城墙上。为了避免人多杂乱，他还专门安排了宗室、武臣、从官等为提举官，负责协调指挥，避免混乱。由于城门是最难防守的地方，就由中贵、大小使臣分别领兵把守。

由于防御器械缺乏，制造器械也成了重要工作，汴京城准备的器械包括多种，除了马面上的战棚之外，还有保护城墙的毯子，重新给城墙装上大炮和弓弩，运送大量的砖石做炮弹，砖石也可以用于修补城墙缺口。当敌人爬墙时，必须放下檑木将他们滚下地面，同时还要预备火油和火炬烧他们的云梯。

除了城墙防御系统，李纲又准备了四万兵马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军，每军八千人。军队内部设立大小官员（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层层负责，抓好部队的训练工作。

在城外，也有两个战略性地点必须加以防御，它们是位于城东新宋门外的樊家冈，以及同样在城东的东水门外的延丰仓。

樊家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城外的一片高地，同时又是护城河最窄的地方，李纲派遣了五军中的后军驻扎在樊家冈，防止敌人靠近。

延丰仓是汴河边的一个大仓库。汴河上的漕船从南方来到，首先经过东水门，所以东水门一带就成了仓库最密集地所在。从南方来的漕粮许多就储存在这些仓库中。比如城外的延丰仓[13]、顺成仓，东水门内的广济仓、富国仓、广盈仓、万盈仓、永丰仓、济远仓。除了东水门内外，在整个汴京城的仓库一共有五十多处。[14]

作为城外最重要的仓库之一，延丰仓里存粮（粟豆）还有四十万石，考虑到四处勤王的军队正在赶来，当他们来到城外时，要从这里获取粮食，所以必须派兵把守。[15]李纲派遣了五军中的前军专门把守延丰仓。剩下的三支军马则放在城中，作为机动部队使用。

正月初七，金人已经来到了汴京城外，他们首先向着城西北方的牟驼冈扑去。

牟驼冈是城西北角一片如同沙堆的高地，三面环水，靠着一个叫作雾泽陂的水塘。[16]牟驼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是皇家御用马匹的马厩，养着两万多匹马。[17]当年郭药师曾经受邀在牟驼冈打过球，知道位置的重要性。一旦获得了牟驼冈，不仅解决了马匹问题，还解决了饲料问题。正是在郭药师的带领下，金军才将北宋的皇家马匹一网打尽。斡离不兴奋地对带路的宋降臣沈琯说："南朝真是没有人，如果他们有一两千人守卫黄河，都不可能放我们过来。"

从这一天傍晚开始，金军发动了对汴京城的攻击。由于他们占领的

牟驼冈位于京城西北部，因此城墙的西面和北面成了最主要的进攻区域。

首先被进攻的是位于西面的水门宣泽门，俗称西水门。这道门建在汴河的上水方向。在一个城市里，除了陆路城门之外，水城门往往是防御最薄弱的环节。陆门大都有瓮城和几道门，但水城门只有一个水闸，平常将水闸拉起，就可以通船，到了夜里（或者需要防御时）将水闸放下来。

如果外面进攻的人能将水闸破坏掉，就可以通过水道入城了。

当然，守城者知道水门比较薄弱，也会采取反制手段。比如，为了给水门提供额外的保护，在水门两侧建了两条与城墙垂直的墙，将河岸夹住，这就是所谓的拐子城。需要时，守城的士兵可以站在拐子城上向下射箭，这样就扩大了防御纵深，不用等到对方攻到城下再防御了。

针对宣泽门，金军派出了数十艘小船，顺着汴河水而下，在船上放火，试图将闸门烧毁。李纲听说后，立刻派遣了两千人的敢死队，登上拐子城，一旦火船顺流来到拐子城区域，士兵就用长钩把火船钩到岸上，再用石头将船砸毁，避免它们靠近水闸。

为了进一步减缓火船的速度，他们还在水中安置了杈木，火船受杈木阻挡，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如果火船能够突破杈木，又避开了长钩，阻拦它们的最后一道关卡是——蔡京家的假山。由于缺乏石头，李纲下令将蔡京家的假山都搬来，扔在水门前的水里，作为最后的阻挡。火船撞到假山上，就无法靠近闸门了。[18]

经过李纲的固守，金军损失了百余人，却无法攻克水门。

但敌人的撤退只是暂时的。正月初九那一天，李纲去向宋钦宗汇报时，突然又传来金军进攻北面四门的消息。汴京北面四门从东往西俗称陈桥门、封丘门、酸枣门和卫州门。由于距离牟驼冈最近，成了下一个袭击目标。

当天早上六七点钟，敌人就开始集结，发动进攻，其中酸枣门受到的攻击是最多的。

李纲立刻向皇帝请求再派一些禁卫军中的神射手，跟随他一同去守城。由于汴京太庞大，从大内到酸枣门，竟然有近二十里，路上街巷纵横，李纲生怕自己还没有赶到，城门就已经失陷。所幸当他赶到时，金军刚渡过护城河，用云梯攻城。李纲立刻命令援军上城，用弓弩射杀攻城者。

当他在酸枣门内时，突然发生了一幕令人恐慌的情景。从城门楼上突然间扔下了六七颗人头，这些人头都是宋军的，不是进攻的金军的。

李纲立刻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奸细。

如果是没有经验的指挥官，会认为杀得好，但李纲却敏锐地意识到坏事了。城内的守军开始滥杀，往往不是真的有奸细，而是恐慌的表现。战争中，士兵们往往也非常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开始防范一切人，由于过分疑神疑鬼，到最后会对身边的人都信不过，将杀戮扩大化。

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谣言很快就会散布开来，人们会以为处处都是奸细，那时就要开始逃跑了。到了这一步，事情就必然失控，也意味着城池无法守住。

幸亏李纲知道这个道理，他上了城门，将几个杀人的士兵抓住斩首，并下令：

凡是声称抓到奸细的，必须亲自带着人到长官处，说清楚为什么指证他是奸细。如果不经过程序，擅自杀人，就是滥杀无辜，要立刻斩首。

控制住了守城者的恐慌，李纲率领官属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此时宋军士兵的士气已经扭转，越战越勇。针对攻城者的不同手段，守军也

采取了不同的防御层次，分成远、中、近三个层次。对远方的金军，用威力巨大的床子弩和坐炮对付；对中间的金军，用神臂弓和强弩射击；已经开始登城的，用普通的手炮和檑木将他们滚下。

由于登城最需要的是云梯，李纲针对对方的云梯也做了安排，派了敢死队缒城而下，将对方的云梯烧毁了十几座，又斩杀了负责指挥的十几个金军将领。

宋军分辨金军到底是士兵还是将领是通过对方耳朵上的装饰来区分的：将领大都有金耳环，而普通士兵没有。

进攻持续到下午五点多，金军死亡数千人，才陆续撤了回去。酸枣门已经被射成了刺猬，守城的士兵也有伤亡。

最大的伤亡是何灌，这位将军从黄河南岸逃回后，参与了汴京守城，死在城下。

经过这次战斗，防守一方的信心大大增强。金军号称三十万人[19]，但根据宋军的估计，最多也就六万人，其中一半左右还是其他部族的友军，女真军队不超过三万。[20]按照这样的消耗，对方是不可能支撑长久的。同时，各地勤王的部队迟早会赶来，也就是说，只要再支撑一两个月，金军就必然要撤退。

当晚，皇帝大行犒赏，从内库中送来酒、绢、银等物品，受伤的人赏赐更加丰厚。守城者的士气已经达到了最高。

但就在这时，战争却戛然而止，正月之内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攻防战，士兵们再次懈怠了下来。原来，战争只是让金军感到了困难，却让宋钦宗感到了恐慌。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议和，于是，汴京围城战变成了一场外交运动……

外交大溃败

就在金军刚到城下的那一天，正月初七，李纲率领军民守卫水门时，城内的宰相李邦彦和少宰张邦昌也没有闲着，他们准备派使节去见斡离不元帅，名义上是去犒军，实际上是打探消息。

他们选择了一个叫作郑望之的人，郑望之担任尚书驾部员外郎，正在去选马的路上，突然被人叫住。原来是兵部尚书路允迪派人来找他，让他到开国务会议的都堂去商议事情。

都堂里一片混乱，郑望之径直走到宰相李邦彦的办公室，发现除了李邦彦，其他的阁僚也在。当场，李邦彦任命郑望之为出使金军的大使，副使则由一位叫作高世则的人担任。

郑望之还想推辞，但众人不由分说将他们推上马，送到西面的开远门[21]，把他们放在筐子里缒下城墙。城外，何灌的军队正在布阵，听说使者来了，立刻找了个嗓门大的，渡过护城河，对着金军阵营大喊，让对方也派人来谈判。

很快金军阵营里走出一个紫袍人、一个白袍人。紫袍自称太师，名叫吴孝民，是个北方汉人；白袍自称防御，是个金人。于是谈判在阵前进行了一夜。

原来斡离不也在等待着谈判的机会。自从宋徽宗刚退位时派李邺前往金军，在邯郸遇上斡离不之后，北宋再也没有派过其他使节。与西路的粘罕不同，斡离不在军事经验上不足，一路上还曾经犹豫是否要回师。幸运的是他碰上了郭药师，才在对方的劝说下一直来到了北宋首都。但到底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未知数，一旦打不下来，孤军深入就可能遭受最严峻的惩罚。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逼迫北宋皇帝签一个新和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斡离不到达城外的第一天就派出了吴孝民使团，不想却正好和北宋的郑望之使团遇上。

吴孝民与郑望之谈判时，首先安慰对手，表示斡离不听说宋徽宗退

位了，就已经做好要和平的打算，就当是双方做一场买卖，之后就各自回家。

经过郑望之询问，吴孝民说出了买卖的实质：北宋割让河北和山西，以黄河为界，并支付一定的犒军金帛。

郑望之答道这哪是买卖。他举了个例子：有人想卖一匹绢，要价三贯，买家愿意出两贯五六百文，卖家让再加一两百文，最后成交。这叫买卖。金军又要金帛，又要割地，却没有任何回报给北宋，这不叫买卖，叫强取。[22]

双方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只好进城再谈。吴孝民等人住进城内接待外国使团的都亭驿，已经是四更天。

第二天，皇帝见到了吴孝民使团。吴孝民表达了金军的主张，并请求派使臣前往金军军营逐条谈判。李纲担心派去的人太软弱，立刻表示他愿意前往，[23]但皇帝拒绝了，派遣了同知枢密院卿李棁担任正使，郑望之和高世则担任副使，与吴孝民一道前往金军营地。

临行前，皇帝嘱咐连连，又派人带了一万两黄金和酒果，吴孝民不断地催促启程，但上马时，已经日落多时，从开远门（万胜门）出去走了一两里就天黑了，到金军营地已经是一更多。斡离不短暂地接见了使者，使者跪地膝行到了他的面前。[24]他只是不断地指责宋人败盟，没有谈正事就让使者先休息，第二天再说。

正月初九，谈判与战斗同时进行，李纲在战场上击退了金军，但使团却在谈判桌上沦陷了。

当初，李纲想要亲自出使的意思是：他知道由于勤王军队没有来到，必须与金人谈判，但他希望使者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步，什么地方不要轻易让步。比如，上尊号、一次性赔偿、边民问题都可以让，但领土与岁币问题都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不能随便吐口。金人正处于虚张声势的讹诈期，如果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只会让他们更加看不起，在未

来变本加厉，也不利于勤王军队到来之后的行动。

皇帝不让李纲出使也是有理由的，他认为李纲过于刚烈，担心他出事。[25]但李纲又担心李棁过于软弱，会吃大亏。

皇帝与李棁等人谈时，也给出了自己的底线。在他所列的事目中，包括了如下的建议：第一，金国境内过来的人口一律返还金国；第二，金军撤兵；第三，不能以黄河为界，但可以考虑给金人一定的租税，也就是增加岁币，在与郑望之等人商量时，他认为可以增加三五百万（之前的规模是一百五十万，包括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而辽国时期的岁币是五十万），但在列事目时，他写的是最多可以增加七百万；第四，一次性的赏军钱银五百万两（岁银的二十五倍），绢五百万匹，金五十万两（与大臣商量时他提的也是三五百万银，事目上实际已经提高了很多，也已经接近他能够筹措的极限）。[26]

事实证明，李纲的担心是正确的，李棁果然过于软弱了。

正月初九，金军参与谈判的是契丹人萧三宝奴、耶律忠和汉人张愿恭。双方引经据典，打了半天嘴仗。最后，萧三宝奴提出了要求：金军士兵不像宋军，平常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还采取部族制的做法，金国皇帝需要打仗，就从部族征兵，部族的兵都是义务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战争中依靠合法地抢劫，来获得收入。如果要息兵，必须让所有的士兵获得一份犒赏，才有可能。

到底犒赏多少呢？萧三宝奴计算：粘罕的西路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斡离不的东路军三十万人，一共五十万人。每个人两锭银、一锭金才能打发。他们都听说汴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钱多得花不完，认为这点钱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换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数目是多么庞大，五十万锭金、一百万锭银，换算成两则是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相当于岁银的二百五十倍），也就是宋钦宗设立上限的十倍。宋钦宗的上限，已经是能够搜刮

的极限，提高十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作为副使的郑望之还敢与金人争论几句，而作为正使的李梲却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被金人嘲笑为女人。[27]

当天，金人再派使节[28]与郑望之、李梲等人回到汴京城内。他们带回来的要求有好有坏：第一，不再要求以黄河为界，改为只割河北、山西地区的三个镇——太原、中山、河间（当然，除了三镇，更北方的燕京地区已经被金军占领，也不会还给宋朝）。第二，宋钦宗许诺加岁币七百万贯，金军只要求加两百万贯（含之前宋金和约中规定的一百万贯，也就是此次增加的只是一百万贯）。第三，释放了一批燕山等地被俘的将领。这是金军让步的三个条目。但同时，第四，犒军物品却大大增加，除了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之外，还包括马牛骡各一万头，骆驼一千头，杂色表缎一百万匹，里绢一百万匹，书五监。[29]第五，由于宋朝在以往的和约中信用不良，要求提供亲王作抵押，跟随金军过了黄河就放回，再要求提供一名宰相执政级（宰执）官员，等三镇交割完毕再放回。

正月初十，萧三宝奴等使节见到了宋钦宗，将书信交给皇帝。皇帝读罢，看了一眼身边的吴敏，问道："如何？"吴敏回答："事无可奈何，再商量吧。"[30]

在除了李纲之外的宰执的要求下，宋钦宗答应了所有条件。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金人所要求的金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由于交割需要时间，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将金军要求的人质送往金军营地。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自告奋勇，愿意去金军大营做押，同时选派了少宰张邦昌作为宰执级别的官员做押。

在北宋君臣一丝不苟地执行金人的要求时，只有一个人质疑是否有必要这么做。李纲反对说，金人要的金银根本就没办法凑齐，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燕云地区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中原地区的门户，虽

然叫三镇，但大小实际上已经是十几个郡，只要三镇丢失，就意味着整个河北、山西地区不可守了。一旦山西、河北丢失，整个中原就不复存在。割掉三镇，等于是间接地灭了国家。

这一点，那些宰相难道看不到吗？不是看不到，是不在乎了，他们只在乎这几天的危险，想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先把眼前的事对付过去，没有一个人有更远的打算。

李纲的建议是：不要着急凑钱，割让三镇的诏书也不要着急发，先和金军拖延，不要留把柄。再拖个十几天，等勤王大军一到，不管是否凑齐，三镇是否割让，金军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都会撤离。

但宋钦宗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只想快点摆脱出来。他也不让李纲辞职，但又只让李纲负责守城事务，更重要的和谈则交给了几位主和派的大臣。

正月十二[31]，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等人在正午时分离开首都，前往金军大营。他们是去做人质的，赵构是亲王，张邦昌的少宰已经属于宰相级，符合金军的要求。随从有北宋使节李邺、高世则，他们持皇帝的新和约（誓书）前往。

康王作为人质期间表现得不卑不亢，金人对他也以礼相待，斡离不表示如同见到兄弟一般。[32]

斡离不经验不够丰富，也不够凶狠，年轻且有些好色，当北宋几乎完全答应了他的条件，他也立刻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对立刻能到手的财富更加看重，对所谓岁币倒不是那么在乎，于是决定将北宋的岁币减去一百万贯，恢复到出兵之前的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钱一百万贯。[33]这相当于北宋岁币这一块就减去了，剩下的只是高额的一次性赔偿费用，以及割让三镇。

但这两条都不容易完成。

首先，在三镇交割上，皇帝催促中书省向山西、河北地区下令，由三镇的官员向金军交割，不得延误。李纲数次争辩，但皇帝和其他大臣一心想着让金军赶快撤离，希望尽快完成。

直到皇帝的誓书发出，李纲才确信无法挽回了。不过他最后还是留了一手，利用手中的军权，将发往三镇的交割命令扣下了。只要接不到命令，三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皇帝卖了，就会继续抵抗下去，只要抵抗，就有希望。[34]

官家议和，百姓遭殃

宋钦宗与金国的东路军谈判时，金国的西路军还在围困太原，甚至越过太原南下，希望打通西线。

宋钦宗给西路军统帅粘罕写了信，请求他停止进军。皇帝派出使者宋彦通和郝抃，让他们带着给粘罕的信，首先前往斡离不的营地，请求斡离不派人跟随他们一同去往山西，把书信交给粘罕。

斡离不同意了，在信使往来间，又免去了北宋赔偿的一万头牛。[35]作为回报，宋钦宗写信敦促太原守军不要抵抗。因此，虽然李纲按住了交割三镇的命令，但交割太原的诏令还是通过金人发出了，其余两镇被搁置了起来。

金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战争赔偿问题。虽然免去了一部分岁币和一万头牛，但剩下的还是要尽快交割。由于金人军队都是义务兵，需要靠北宋的赔偿作为工资，他们规定了高昂的军事费用，不说其他小项，最大的两项是金五百万两和银五千万两。

就在宋钦宗决定答应金人要求的当天（正月初十），皇帝先下了一道诏书，表示要卧薪尝胆，避正殿，减常膳，做出表率。接着第二封诏书就是针对官员和人民的了，皇帝表示为了凑够给金军的犒军钱，已经

连宗庙里的器具都拿出来了，为此，王侯和官员也必须以皇帝为榜样，将家里的金银器皿交出来。如果仍然不够，就号召普通民众上交国家，帮助皇帝渡过难关。

第二封诏书还只是号召性的，第三封诏书就是强迫性和事务性的了，其中进行了详细规定，要求诸王的金银绢帛，各种内官（道官、乐官、伎术、五司）的金银，都必须尽快缴纳到元丰库。元丰库是平常放置帝国闲钱和杂钱的仓库，如果皇帝有一些非常性的项目，就从这里开支。[36]其余的机构，包括各种宫观寺庙、负责皇帝吃喝的六尚局，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送到日常开支的左藏库。[37]如果有隐藏或者转移的，都要受到相应的制裁。等两库的金银收集完成后，再一并转交给金军。

到这时，皇帝对人民还算客气。宫廷机构、内官上缴金银是强迫性的，而对人民只是号召性的，并没有强迫性质。

随着官方金银的上缴，宋钦宗立刻意识到他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关于这个错误有多大，在几天后的数据中会有反映，这里先设一个疑问。

当皇帝和官员的金银上缴后，宫廷第一次发出了强迫民间缴纳银两的诏书。[38]诏书中表示，朝廷议和，只是为了让金军不烧杀掳掠，为此需要付出大笔的金银。在皇帝和官员上缴后，数额差距仍然较大，因此，皇帝权且“借用”京城内所有金银。城内持有金银的人，限于当日将金银缴纳入左藏库，如有隐瞒，朝廷可没收家产。人民可以互相告发，并获得告发财产的一半。

另外，卖官措施也出台了。在汉代，中国卖官鬻爵是一种皇帝增收的正常手段，但自从科举制成了主流，卖官已经逐渐退出了市场。但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皇帝不得不祭出了法宝，表示缴纳金银多的人，可以酌情安排成为官员。

正月十二，由于金银相差太多，宋钦宗开始定点定目标处理。首先

进入目标的仍然是皇帝的内官，内官作为一个群体承担的额度是金一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由专人负责监管。

其次是对贪官开刀。宋钦宗继任后，一直对如何处理父亲留下的大批宠臣犹豫不决，找出各种理由敷衍，但在财政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动手了。皇帝下令将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高俅、王宪、彭端、刘宗元等人抄家，将各家储藏的金银全部拿走，缴入元丰库。敢于隐藏的军法处置，勇于告发的获得一半财产。

在皇帝的政策下，从官府到民间都掀起了一波反腐热潮。这些官员当政时，人们不敢二话，但打死老虎的人却总是不乏其人。

除了内官和贪官之外，在社会上也有一些金银大户，他们也成了皇帝定点处理的目标。在汴京有着大量的声色场所，皇宫大内的东北角，就是妓女云集的鸡儿巷，皇帝在寝宫里甚至都能听见外面卖唱卖笑的嘈杂声。在整个汴京城还分布着几十处红灯区。红灯区的老鸨和头牌们都积攒了不少金银，因此也成了皇帝的目标。

在这些人中，最大的目标就是与宋徽宗传出绯闻（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杜撰）的李师师，其次则是数位同等规模的经营户。她们的财产也一并被抄收，充当了金人的犒军钱。

除了红灯区，另一个传统上的金银大户是金银匠群体，以及曾经为皇帝服务、得过赏赐的僧道医药群体，皇帝也下令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正月十五更是要求所有得过金玉赏赐的人都返还，不限于僧道医药群体）。

正月十七，由于担心民间缴纳不够踊跃，皇帝特别任命了一批踊跃缴纳金银的民间人士为官员。

经过了多日的搜刮，到了正月二十，缴纳的金银终于有了一个数目。到这一天为止，北宋政府总共得到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金人要求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也就是说，经过多日劳动，

北宋大大小小官员和民间一共完成了黄金任务的百分之六、白银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四。[39]

由于缺乏经济统计，也许在制定目标时，金军对于北宋首都有多少黄金根本没有概念，宋钦宗也不知道到底能获得多少黄金，双方达成的协议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好像一个人让邻居（他的家产只有十万）给他十亿，邻居居然毫不犹豫答应了，还签了保证书，但到最后自然执行不了。这怪谁呢？

宋钦宗和大臣们慌成一团。他们把这次失误怪罪于那些商谈和约的大臣，当初出使金军营地的是李梲和郑望之，于是两人成了替罪羊，被罢了官。[40]但替罪羊可以找，事情还是要做，皇帝唯一能做的，是出台更加苛刻的搜刮令。

当民间的富裕团体被搜刮一空，剩下的就是普通民众了。正月二十，宋钦宗下诏，这篇“著名”的诏书首先描绘了民众凑不够金银的可悲下场：如果凑不够数，金兵必然攻城，将男人全都杀光，女人全都抓走，房子全都烧光，金银财物全都拿走。[41]很难想象一个皇帝竟然会在自己的首都这样吓唬老百姓，这也说明皇帝实在没有办法了。

接着，皇帝提出要求，为了避免进入诏书中描绘的地狱场景，大家必须把金银全都贡献出来，如果有隐瞒，就抄家、惩罚；如果上缴，可以当官；如果告发，就获得财产的三分之一；如果知情不告，按照隐瞒一并处罚。

正月二十二，皇帝又想出一招：派出使节前往金营说明情况，由于金银数量不足，希望用其他宝物折纳，交给金军。但是前面的使节已经被罢官了，谁还敢步他们后尘？不得已，皇帝在时隔五天后，再次找来李梲、郑望之，让他们出使金军营地。

郑望之等人进了金军营地，两天后才被送到了牟驼冈。斡离不由于打球着了凉，不肯见他们，是王汭接待了他们。在和王汭的谈判中，郑

望之提出金银是凑不够了，只能用宝物充数。王汭觉得可以，让北宋去准备各种宫廷宝贝。[42]但这并不是来自斡离不的答复，只是王汭的个人决定。

斡离不虽然没有见宋使，但还是给了个回答，他并没有提是否可以用宝物折纳，但表示可以减少一定的犒军钱。减少量是：金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百万两减少到四百五十万两），银减少五十万两（总数五千万两减少到四千九百五十万两），表缎和里绢一共减少十万匹（总数二百万匹减少到一百九十万匹）。[43]

宋钦宗只能在一片模糊之中，一面搜刮民间金银，另一面准备宫廷财宝。

经过这一轮的催缴，皇帝终于又凑了金二十余万两、银二百余万两。到正月二十八时，一共搜刮到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表缎等四十余万匹。[44]到这时，皇帝已经确定不可能再完成金银任务了，就只有依靠那些其他的宝物充数。在李纲的劝说下，皇帝也将搜刮金银的诏书撤了下来。[45]

正月二十九，皇帝带领郑望之等人于宣和殿查看宝物。所有的珠玉都已经放在了笼匣中。作为“六贼”之一的梁师成还没有被赐死，留在皇帝的身边，举着一个螭龙玉杯感慨：“这一个玉杯工价就是几千缗！”皇帝回答：“这种东西不知有什么用，留不得了。”

二月初一，皇帝派遣李梲和郑望之押着宝贝前往金军营地。这些罕见的珠玉、犀角、象牙平时深藏于深宫之中，现在都被摆在了野地里。金军太师耶律忠前来交割。他们在野地里拿出账册，有人将珠宝一件一件抬过来，一一核对。

耶律忠询问每一件宝贝的价格。郑望之回答：“这都是无价之宝，没法估价。”

一位辽国降官提醒郑望之，价格是折纳金银的基础，现在就应该尽

量往高里估价。于是郑望之尽量将价格估高，报告给金人。估价完毕，耶律忠回去与斡离不商量后，斡离不决定第二天接见北宋使节，并宣布新的优惠政策。[46]

李梲和郑望之等人住了一晚，他们与在金军营地做人质的康王和张邦昌住在了一起。

但突然间，事情又起了重大变化：就在当天晚上，宋军突然向金军营地发动了袭击，这场袭击，也标志着宋营中的另一股力量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但他们的努力却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如果成功，将金人全歼于黄河南岸；如果失败，让皇帝的宝贝一去不复返的同时，宋金和约也毁于一旦。

但宋军的进攻将走向哪个结局呢？

【注释】

[1] 参考《靖康传信录》。

[2] 以张邦昌与白时中为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前录》。

[3] 关于襄阳的地理位置，可以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4] 指蔡絛。见《北征纪实》。

[5] 参考《靖康传信录》。

[6] 赵德麟《侯鲭录》。

[7] 岳珂《桯史》。

[8] 根据《宋史·地理志》《汴京遗迹志》《东京梦华录》综合。

[9] 参考《东京梦华录》。

[10] 参考《靖康传信录》。

[11] 这里所谓的楼橹，应该就是战棚，即放置在城墙马面上的塔楼，可以覆盖更远，并抵御敌人的木制塔楼的攻击。

[1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3] 《东京梦华录》记为元丰仓，应该就是李纲所记的延丰仓。城外还有一个大仓库顺成仓，顺成仓桥就是以这个仓库命名。

[14] 参考《东京梦华录》。

[15] 参考《靖康传信录》。

[16] 参考《靖康传信录》。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

[20] 参考《靖康传信录》。

[21] 《靖康城下奉使录》为安远门，安远门是内城的城门，在北墙东侧，使节出的应该是外城门，酌情改为外城西面的正门开远门。

[2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23] 李纲的回忆录和其余的书有矛盾，他记述金人使者前来发生在初九的战事之后，但其余书记载发生在初七战事之后，初九战事之前。

[24] 李纲语。

[25] 参考《靖康传信录》。

[2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六篇。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宋史》记载为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为高永、张愿恭、萧三宝奴，《大金吊伐录》记载为高永义、张愿恭、伯哩（应当是萧三宝奴）。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三十八篇。

[30]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31] 《三朝北盟会编》等书记载为正月十四。但根据《大金吊伐录校补》中的记载，正月十二是更加可能的日期。

[3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二篇。

[3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一篇。

[34] 参考《靖康传信录》。

[3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四十六篇到第五十三篇。

[36] 参考《宋史·食货志》。

[3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8] 本篇及下面几篇诏书出自《靖康要录》。

[39] 参考《靖康要录》。李纲记载为金三十万两、银八百万两，可能有误。

[40] 使节被罢官发生在正月十七。

[41] 大金为见其数未足，复遣使臣谕意，难为退军，兼恐兵众犒赏不均，必至怨怒，却来攻城，男子尽杀，妇人驱虏，屋宇焚烧，金银钱物，竭底将去。

[4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43] 正月二十四，见《大金吊伐录校补》《三朝北盟会编》。

[4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五篇。

[45] 参考《靖康传信录》。

[46]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第九章
战争无厘头

主战派得势

就在宋钦宗拼命搜刮金银，试图满足金人要求时，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来。

正月十五之后，就已经有小股兵马来到汴京，每天到达万人以上。作为汴京城防主官的李纲每天都要派遣统制官召集队伍，划分营地，拨给粮草兵器。一方面文官敛财敛得精疲力竭，另一方面武将也忙忙碌碌地应付援军问题。

正月十六[1]来了一支规模大一些的部队，统制官马忠从京西招募的士兵赶到了。他们在西城墙最南侧的顺天门（新郑门）外[2]遇到了一支金军，将他们杀败。与此同时，北宋将军范琼也从京东方向过来，驻扎在了距离金军大营不远的地方。

在援军到来之前，金军四处掳掠，肆无忌惮。自从吃了马忠的败仗，才开始收敛一些，不敢单独行动了。

正月二十一[3]，最重要的援军到了。这一日到了几位经历过战阵的将军：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他们率领着西北地区泾原路、秦凤路的军队赶到。除此之外，陆续到来的还有鄜延路的张俊、韩时中，环庆路的汪洋、马迁，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熙河路的姚古、秦凤路的种师中也在赶来。

援军兵马号称达到了二十万。[4]这时的军事形势也就起了变化。金军主要驻扎在城西北方向的牟驼冈，而勤王军马大都也驻扎在城外，各个方位都有，最近的就在金军营寨的不远处。

大批兵马到来后，宋军首先面对的是指挥问题。之前的防御指挥权交给了城内的李纲，既然大部分军马在城外驻扎，那么到底如何统御这些人马，谁来负总责？

李纲的意思是，应该由原来的指挥机构，即他指挥的行营使来统一管理，种师道是将军中经验最丰富也最能打仗的，就让他当行营副使，掌管城外兵马。这样，一旦战争发生，决策和信息传递的顺序是：从皇帝到李纲，从李纲到种师道，从种师道再到城外其余将领。

但由于李纲升迁太快，宰执们大都不服他，于是皇帝与众位大臣商量过后，决定另立一个宣抚司，叫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司，所有城外兵马都交给这个宣抚司领导。由种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充任副手（都统制）。不仅新来的勤王军队由这个宣抚司领导，就连李纲在城外的部队也划归宣抚司统领。李纲曾经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军，其中前军和后军驻扎在城外的东面，这两军归属宣抚司节制之后，李纲的行营司所能指挥的就只有左中右三军而已。

这样的做法，好处是给了城外的宣抚司以足够的灵活性，但坏处是由于指挥权的不集中，在战争中容易出现混乱。事实上，李纲已经被架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城外宣抚司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各个将领时常各自为政，给指挥带来麻烦。

不谈指挥问题，援兵一到，首先展现的还是强大的震慑力。种师道决定对金军形成压迫态势，他将勤王军主要驻扎在城市东北面和西南面的两个军寨中，对位于西北的金军形成围堵之势。

由于两寨的修建，汴京的东南角成了最安全的角落。有了军队的保护，种师道命令将东城墙南侧的新宋门和南城墙东侧的陈州门打开，作

为军事和民用的通道。从此首都不再是封闭的，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是生活正常化的表现。

虽然皇帝已经祈求和平，但对金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种师道在后两天（正月二十三）[5]，立刻在板桥组织了一次战斗，将金军击败，并乘夜间焚毁了马监的东廓，接近了金军营地。这次战斗让金军更加忧心，西路军迟迟打不通通道，孤军深入的东路军如果坚持下去，会不会被宋军的勤王部队消灭？

显然，如果长期驻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冲突。李纲曾经估计金军不过六万人，而勤王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到最后，金军会淹没在宋军的人海战术之中。最好的策略，莫过于见好就收，金军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赔偿，又签署了极其有利的和约，只要能够安全退回北方就是胜利。

从这时开始，金军对金银和宝物的移交越来越重视。

在北宋的朝廷内，随着勤王军队的到来，那些求和的大臣也在加紧行动。如果金军最终被勤王军击溃，就意味着他们主持的求和工作是错误的，这些大臣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众撕成碎片。只有让金军尽早离开，才能证明他们的求和是正确的，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北宋君臣也越来越配合金军的赔款移交工作。

于是产生了奇怪的一幕，一方面，军事将领们变得越来越高调，另一方面，北宋的搜刮工作也在加速，皇帝由于参与了求和，甚至眼都不眨就将祖宗传下的财宝尽数献出，换取金军赶快离开。当皇帝舍弃的东西越多，求和的大臣们越赞赏皇帝的大公无私。接下来皇帝更是将各种美食、珍禽、驯象送给金军，甚至女人都送过去为金军服务。在一封信里，斡离不甚至感谢皇帝送了百余个歌舞伎给他，并表示不忍心让这些人离开父母之邦，等用过后，离开时会还回来的。[6]

但皇帝又和大臣不一样。江山是皇帝的，大臣永远只是职员，不管

送什么，大臣都不会眨一下眼。可皇帝虽然接受了大臣的恭维，却会偷偷地心疼丢失了那么多珍宝和土地。

与此同时，金军犯了一个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对于金银的渴求过于强烈，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皇子和帝姬（公主）的墓葬都刨开，把殉葬品洗劫一空。[7]这终于触怒了皇帝，加上勤王军队给了他勇气，他变得偏向鹰派了。

主战派的看法也逐渐左右了皇帝。种师道一到京城，就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京城周长八十余里，金军怎么能围得住？城高数十丈，粮食可以支撑数年，哪能攻下来？只要城内扎寨，城外严兵据守，勤王之师都来了之后，几个月就让金军困顿了。到时候只要他退，就和他打，和议干什么？三镇和燕京都不用割让。

主和派的李邦彦反驳说，当初讲和不是因为没有兵吗？

种师道说，“战”和“守”是两种概念，“战”需要真正的士兵，但“守”就不一样了。京师有数百万老百姓，他们不能“战”，却可以参与“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兵，怎么说没有兵？[8]

正月二十七是一个大雾天，这一天宋钦宗召集了李邦彦、吴敏、种师道、折彦质、李纲等人开会。李纲更是提出了完整的战略，他认为现在宋军与金军数量的比例已经是十比三。金军孤军深入，应该采取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办法，将黄河渡口等要道守住，再断绝敌人的粮道，用重兵把敌人围起来。宋军甚至不用主动出击，金军如果有游骑出来，就袭击一下，但如果他们大部队出来求战，宋军就坚壁不战。在都城坚壁不战时，宋军却可以分兵去收复河北地区丢失的土地，断绝金军的归路。等金军主力疲惫了，粮草殆尽，再逼迫金军将三镇和誓书归还，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北归。等他们渡黄河到中途时，再动用所有力量给予毁灭性打击。[9]

李纲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由于还有两路兵马姚古和种师中

没有到，决定再等一等他们。综合考虑，宋军决定选择一个吉日——二月初六——发起行动。

虽然大计已定，但到了二月初一晚上，突然一支宋军出现在了金军营地前。难道进攻提前了吗？这要从一位叫作姚平仲的将领说起。

劫营

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是北宋著名将领姚古的养子。从西北出发的姚古也响应了勤王号召，但由于路途遥远，当时还没有赶到。

姚平仲曾经跟随童贯参与了平定方腊叛乱的战争，他自认为功劳很大，却被童贯压制。这次到京后他又提起了当年的战功，宋钦宗对他刮目相看，屡次单独找他谈话，并许诺他一旦立功，立刻给予重重赏赐。[10]

当众人定下二月初六发动进攻的策略，姚平仲却担心自己在众人的行动中显现不出来，如果能够提早单独行动，擒获了斡离不，那么他就成了稳定北宋的最大功臣。

姚平仲与步将杨可胜两人将想法告诉了宋钦宗，竟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于是他们议定，于二月初一夜间率先发动进攻。这件事不仅瞒着李纲，就连城外的指挥官种师道也并不知晓。

虽然指挥官不知晓，但民间却早就知道了。

劫营的日期是由一位术士楚天觉通过占卦决定的，占卦时消息就已经泄露。京城家家户户都知道皇帝要在二月初一打仗了。另外，皇帝还在开宝寺树立了三根大旗，上面写有御前报捷的字样，这是为了胜利后庆功准备的。外城北面的正门是封丘门，这里距离金军营地最近，门上提前搭建了皇帝驾临的阁楼，是为了检阅俘虏用的。这些准备让京城的人们充满了期待，人们纷纷等待着胜利的消息。[11]

到了晚上，劫营开始，姚平仲和杨可胜率领七千兵马，向着六万金军的大营冲去。到了大寨，却发现寨子大半是空的。金军从寨外将宋军包围，于是劫营变成了突围。姚平仲比较幸运，突围而去，杨可胜却被俘了。

姚平仲劫营时，在金军做人质的康王、张邦昌，以及出使未回的李梲、郑望之等人正在寨子的某处睡觉，突然间外面人嘶马鸣，四处火起，有人来报宋军劫营。康王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到了，金人会将人质杀掉以报复宋军。

在旁边的郑望之反而劝说康王不要紧，不须恐慌。如果宋军赢了，金人不敢随便杀人质，如果宋军败了，康王作为人质已经半个多月，自然不可能知道劫营的事儿。康王听他说得有道理，才放心一些。[12]

当天晚上，镇守城内的李纲正好有病，请假在行营司休息。到了半夜，皇帝的亲笔信突然到了，信里说，姚平仲已经起事，大功就要告成，请李纲率兵到封丘门策应。李纲吃惊的同时写了个札子，表示自己在生病，况且大家都在按照原定日期做准备，现在突然发生战斗，都措手不及，拿不出兵来。

不想短短一会儿，皇帝的传令官竟然来了三次，越来越急。李纲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带着他仅剩的三个军出城。此时，参与了劫营的范琼、王师古等人正在北门外被围困，李纲连忙加入战团，在幕天坡鏖战，击退了金军。当金军再次进攻时，他又用神臂弓将金军击退。[13]

第二天早上，斡离不紧急召见康王等人质。在召见地放了数百面宋军旗帜，都是劫营者留下的，还有被俘的数十名宋军。张邦昌赶快声明，这可能是某一支勤王的军队，为了向皇帝邀功才这么做的，皇帝可能并不知情。

恰好，被俘的杨可胜在准备劫营时，与皇帝商量做了安排，他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揣在身上，信上表示他瞒着皇帝出击是为了立大功，等

胜利后请求皇帝给予封赏。如果他死了或者被俘，金人从他身上搜到信，会以为皇帝是不知情的。现在这封信与张邦昌的说法吻合，竟然真起到了作用。

康王和张邦昌摆脱了嫌疑，但出使的郑望之却没有这么容易了。斡离不接见他们后，将郑望之单独留下，送去了一位叫作“都统国主”的将领处。康王和张邦昌都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了，纷纷向他告尘世最后一别。

郑望之跟随着向导在金军大营的营栅里穿梭，营地里的道路曲曲弯弯，直线距离十几里，曲线距离却走了六七十里。

郑望之到了都统的营地，穿过两边卫士的刀枪丛林，才见到了都统。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北宋求和，你是首来谈判之人，既然今天以兵相加，你也免不了一死。”他以为郑望之参与了劫营阴谋，强迫他将整个策划过程说出来。

郑望之竭力辩白，表示自己不会自寻死路，如果事先知道，又怎么会在劫营当天还留下？既然他没有参与阴谋，又能说出什么？

都统将郑望之留了一夜，第二天才放了回去。郑望之重新见到康王和张邦昌，才知道康王为他流了不少泪，以为他死了。即便在金军内部也传言，都统叫他过去不是善意。[14]

击退了金军的进攻，李纲回到行营司，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罢官了。皇帝下令，将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位罢免，甚至连行营司都撤销了。只是任命蔡懋担任守御的职位，接收李纲的军队。

怂恿皇帝罢免李纲的是宰相李邦彦。主和派将姚平仲全军覆没的消息带给皇帝，李邦彦乘机向皇帝表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说皇帝并不知情，是主战派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擅自行动。他甚至主张将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绑了送给金军。[15]

皇帝也慌了神，虽然他否决了将李纲和种师道送给金人的提议，但还是罢免了李纲。[16]

二月初三，李纲正要进崇政殿见皇帝，在殿门口听说自己被罢免了，于是来到浴室院等待自己的处罚。对李纲进行讯问的是他的后继者蔡懋。经过讯问，蔡懋才知道原来姚平仲并没有全军覆没，劫营的士兵一共损失了千把人，而李纲的救援部队损失更小，只有百余人。姚平仲本人也并没有死亡，而是突围后担心种师道治他偷偷行动的罪，所以溜走了。所谓全军覆没的消息是不准确的，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没有加以核实就相信了，匆匆做出了免职李纲的决定。

蔡懋把消息带给皇帝，皇帝也觉得是自己对不起李纲。毕竟皇帝对姚平仲劫营是知情、鼓励甚至参与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反而不知道。现在出了事，还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赏赐了李纲白银五百两、钱五十贯。能够赏赐这么多，在缺金少银的时代已属不易。按照皇帝的意思，先让李纲下野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金军一走再重新用他。[17]

除了面对大臣的压力之外，宋钦宗要处理的还有金人的愤怒。

二月初三，出使金国的使者郑望之等人被放回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金国的使臣张恭礼，他带来了一封充斥着嘲笑口吻的信，信中故作不知情地谈到遭到一支情况不明的军队的袭击，这支军队气势汹汹前来，战败后又灰溜溜逃走，金军请求宋钦宗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8]

宋钦宗接待金国使节之外，还会见了郑望之。他听了郑望之的叙述，不断地说“错了，错了”。[19]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就如何处理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种师道的意见，姚平仲劫营的确是错误的做法，但这个错不是选择了军事对抗，而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行动。既然前面错了，金军以为宋钦宗

会服软，那么继续进攻就成了另一种出其不意。再说姚平仲的损失也不大，宋军实力并没有被削弱，所以不如发动兵马对金开战，将他们打服再说。

而另一种意见，也是大多数主和派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与金军讲和，花了这么大力气，就不好再反悔。不然，即便不说实力上，面子上也是过不去。

当金人使节质问时，宋钦宗一是磨不开面子，二是吓破了胆，立刻选择了和谈，他屈服了，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全力讲和。他回书承认了姚平仲事件，并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是姚平仲本人以及一些与他关系不错的宰执（暗指李纲）发动的，姚平仲已经逃走，宰执已经被免，事情过去了。

皇帝写好了回信，却发现找不到人当使者了。由于出了这么多事儿，担心去往金军营地遇到危险，北宋的大臣们都不愿意当使者。

此刻，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正在城外的汴河边带兵，由于勤王之师太多，有许多小分队无法安置，特别是东南来的兵。由于太上皇的干扰，东南兵没有大规模集结，只有一些小部队零零星星到来。宇文虚中出城集合了两万左右的东南兵。他听说朝廷有难，将军队交给别人带领，自己坐在筐里吊入城内，接受了前往金军营地出使的任务。[20]

宇文虚中到达金军营地后，发现这里的气氛剑拔弩张，他在金兵的包围下坐了四个时辰才见到了康王等人，第二天才见到斡离不。他来回于宋金两营达三次之多，金人一定要北宋割让三镇才肯退兵，宇文虚中甚至痛哭流涕，都没有争回三镇。[21]

在他最后一次出访金军营地时，除了携带常规文书之外，还带上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这些诏书曾经被李纲扣押，但由于李纲已经离职，没有人能阻止这些诏书发出了。[22]当初李纲扣留它们，是希望等勤王大军到来后，逼迫金人同意不要交割三镇。现在勤王大军已经到

达，但割让诏书和地图不仅无法扣下，反而更加轻易地送了出去。

到这时，意味着金军所有目标都已达成。他们需要三镇，现在已经拿到了割地诏书和地图；他们需要大量的赔偿，汴京城已经被搜刮一空，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物了。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安全地撤离。

宋钦宗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害怕强大的金军，但金军却对宋军的勤王部队感到忌惮。如果继续驻扎下去，即便双方再有诚意和谈，宋金军队之间早晚还是会有冲突。只要金军失败一次，就可能再无翻身之地。姚平仲的劫营是给金军提了个醒，让他们意识到该离开了。

但问题是，即便要离开，也必须防范宋军的袭击。事实证明，康王和张邦昌并不足以让宋军放弃抵抗，需要有更大的抵押品，才能让宋军不敢行动。

在二月初五的回书中，金军元帅要求宋军更换抵押品。把康王和张邦昌领回，换成皇帝的亲叔叔越王，并在太宰李邦彦和枢密吴敏中选一人来抵押。李邦彦是最高文官，吴敏是最高武官，以前抵押的张邦昌只是少宰，显然级别还不够。[23]金人认为，以越王和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保，金军可以安然渡河回军，不至于被掩杀。

李邦彦是最大的主和派，如果他能被抵押出去，也算是得偿所愿。但就在斡离不写文书时，李邦彦还是宰相，当文书送达宋廷时，李邦彦已经不是宰相了。

群体事件

北宋朝廷本来已经焦头烂额，二月初五，汴京城内又发动了一场底层士大夫和民众的动乱，让宋钦宗更加手足无措。

这场动乱的原因是李纲被罢职。虽然种师道可能没有被罢职，但当时都城内的传言大都指种师道和李纲一块儿被罢免，主战派已经全部下

台。

就在几天前，人们还盼着皇家军队打胜仗，但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加上之前皇帝对民间搜刮金银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民愤，而劝说皇帝停止搜刮的恰巧是李纲，这给他积累了足够的口碑。

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名太学生的上书。这名太学生叫陈东，当初也是他不断地上书要求惩治“六贼”，导致宋徽宗的亲近大臣下台。陈东的做法很有宋朝士大夫的特点，由于宋朝皇帝不杀谏官，于是士人们对多大的官都没有敬畏之心，该骂就骂。从政治谱系上说，他们属于实务经验不足的年轻左派，在当权者看来，是找麻烦的，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理想主义又的确能够逼迫皇帝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避免社会彻底板结。

二月初五，陈东联合在京城的数百位学生来到了宣德门外，跪在地上，要求将一封信传给宋钦宗。[24]信中的要点是：第一，他们把皇帝的大臣分成社稷之臣和社稷之贼两类，社稷之臣主要指的是李纲，而社稷之贼则包括了当时大部分宰辅，比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第二，指出一场小败说明不了什么。虽然败仗与李纲无关，但在当时的宣传下，大都认为是李纲的策略导致败仗，太学生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太学生已经意识到李纲是受人陷害，更何况，像童贯等人闯的惊天巨祸，皇帝都还没有完全追究，反而对李纲痛贬，这说不过去。第三，希望皇帝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等人，贬斥李邦彦等人。让李纲继续守卫京城，让种师道率兵进攻金军，获得完全的胜利。

太学生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于是更多的人来到宣德门外。当天，在皇帝宫前已经聚集了数万人，他们鼓噪着不肯离开，表示除非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复职，否则不走。

群体事件正在进行中，大臣们散朝的时间到了。群臣从东华门恰好

走到了群体事件现场，李邦彦也在内。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对着他大骂，直斥他的罪过，更有人冲上去脱掉了他的靴子。眼看自己就要挨揍，李邦彦吓得赶快逃走了。

皇帝命人将陈东等人的上书收进去，过了一会儿传来旨意，表示众人的话很好，一定会施行的。

既然皇帝答应了，有的人就准备散伙。但另外的人立刻意识到，政府的许诺除非当场办，否则一定做不到。他们鼓动大家留下，要亲眼见到李纲和种师道，确信他们已经复职了才走。一会儿，掌管军事的吴敏走了出来，告诉大家，李纲因为用兵失利，暂时罢免。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等金兵一走就立刻复职。

从朝廷的安排也看出来，宰执们已经倾向于不折不扣地接受金军的要求，先把金军糊弄走了再说。在金军走之前，李纲是不能复职的。

这种回答让众人不满意。天色渐晚，人们把开封府的登闻鼓也搬来了，放在东华门外不断地敲，鼓敲坏了，就用声音代替，山呼震地。

开封府尹王时雍是负责首都治安的官员，也来劝说太学生们，说他们这么做是胁迫天子。太学生回答，以忠义胁迫天子，比用奸佞胁迫不是好多了？

众人想揍王时雍，他只好也逃走了。

守卫宫殿的殿帅王宗濋只好向皇帝汇报，告诉他如果不听从民众的呼声，今天就要发生民变了。

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来了，太学生和民众拉住他不让走，除非他去向皇帝汇报给李纲复职。耿南仲只好答应下来，众人怕他说假话，便围住他，只给他留出一条路，就是进宫廷去的路。[25]耿南仲见到皇帝，皇帝让他传旨召李纲来。

李纲在浴室院，一千多人前去迎接他。皇帝不得已，只好写诏书给

李纲复职。

李纲还没有赶到，皇帝派遣了一位内官朱拱之前去宣谕。由于诏书还没有写好，就让朱拱之人先走，诏书随后送去。但朱拱之刚刚到民众前，有人立刻将他围住撕成了碎片，他成了民变的第一个受害者。[26]

这时情况更乱了，有人已经大声喊“杀死内臣无罪”。于是人们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十几个人，将他们杀死，肝肠取出，脑袋砍掉挂在竿子上。到这时，民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一旦见了血，人们就会失去理智，事情也很难用和平方法收场了。

这时，李纲已经赶到了皇帝面前，向皇帝请罪。宋钦宗已经顾不上许多，连忙给他复职，担任尚书右丞，兼京西四壁守御使。李纲立刻前往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民众，这才平息了一场民变。[27]

李纲上台之后，立刻改变了前任（只在任了几天）蔡懋的做法。因为金军又在这个门附近集结，准备攻城器械，他当晚便睡在了西面的水门咸丰门上。城内虽然也有炮和床子弩，但蔡懋下令，谁敢开炮就惩罚谁，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李纲反其道而行，规定将士们自行决定开炮，只要打中就是重赏。

将士们的积极性一下子提了起来。第二天，金军来试探攻城，被将士们击退。

由于民变，除了对外不利，京城内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比如，那些在民变中杀死内官的并不是普通民众，本来就是当地的流氓头目，在社会混乱中，这些流氓变得更加猖獗，杀人、抢劫层出不穷。士兵们也不好好守城，反而借机报复平常对他们不好的官长，甚至杀死他们。军队纪律也不好，士兵偷拿老百姓东西，看哪个平民不顺眼就当奸细滥杀。这些罪行中有的是不可原谅的，有的却是乱世时期的自然表现，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迟早会酿成大祸。

李纲也毫不手软，以诛首恶的方法将社会上的流氓头子干掉，对军

队的不法现象更加严厉，一旦发现立刻处理。[28]在李纲的努力下，汴京的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金人撤离

李纲重新得势，宋钦宗的心情却是无可奈何。这是北宋建政以来第一次民间将权力从皇帝和大臣手中抽走，由民众决定谁来做官。皇帝此时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只想表现得软一点，将金人哄走，却又不得不任命一批主战派的大臣上台。

他的矛盾心情，在给斡离不的书信中反映得淋漓尽致。[29]由于金国索要李邦彦和吴敏两人之一，皇帝二月初六回信时顺便发了牢骚，他说，昨天城中数万军民闹事，痛骂宰执，杀了好几个宦官。许多宰执都离职了，太宰李邦彦请求退休，门下侍郎赵野请假不来上班了，中书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都已经被罢免了执政的职位，枢密李纲贬到了大名府（这里他撒谎了）。现在大半官员都缺位，宰执之中只剩下枢密吴敏、新任左丞耿南仲、新任枢密宇文虚中，以及李梲四人还在任了。

一个皇帝对敌军将领承认民变，并将高官的任免和盘托出，这也可以看作宋钦宗一种别样的牢骚，表明这并非是他所愿，也表明他已经无计可施，请敌人原谅。

关于斡离不要求将宋钦宗的亲叔叔越王当作抵押品，宋钦宗表示这有违情理。他恳请用自己的同母弟弟肃王将康王替换回来。康王和皇帝虽然同父，却并非同母所生。肃王作为同母兄弟，显然与皇帝关系更加密切。但皇帝希望，肃王只送金军渡过黄河，一旦过河安全了，金军就遵守约定将他放回。

至此，金军的所有战略目的都已经达到，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大量的犒军钱，以及安全的回军通道。李纲和种师道虽然复职，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又不能否定，主战派的威慑是金军退军的必要条件。姚平仲劫营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加速了金军的撤离。之前的斡离不仍然慢条斯理地与北宋谈着条件，时不时免一点赔偿金作为恩惠。但劫营之后，斡离不已经不再纠缠于赔偿金了，北宋也没有交付给他更多的钱。二月份，斡离不最关注的是怎么安全地回去，因此人质问题成了最主要的谈判点。

姚平仲劫营八天后的二月初八，金军开始撤回。由于担心大军的安危，金军的撤离非常迅速，初八当日，斡离不写文书告别宋钦宗，二月初九便将康王送回，[30]二月初十就已经拔营离开。[31]原本以为他们在渡过黄河时会遇到困难，但金军早已做了准备——架好了浮桥，一天之内就渡河完毕了。

金军的离开也将宋军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激化。在主和派看来，金军离开是他们充分斡旋的结果，也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如果不是主和派坚持和平方针，也许汴京城就会血流成河，如果不是主战派从中作梗，事情还会顺利得多。

但在主战派看来，各地勤王军队已经二十多万人，这些军队只有少数人参与了一点点抗金作战，其余的人虽然满怀热情，却还没有动手，就听说皇帝选择了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认为，仅仅因为姚平仲的一次小小的失利，就彻底放弃武力解决，的确是太窝囊了。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李纲，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人。比如，在燕京被俘的沈琯被金人放回之后，在二月初十见到李纲，立刻提出建议。由于他在金军大营里待过，对金军的实力知根知底，他说，金军不过只有五万人（比李纲预计的还低），能打仗的只有万把人，其中二太子斡离不营只有两千骑兵，郭药师的常胜军有三千骑兵，诸营的步兵也只有三万多人。这些人还并没有都过河，只有一多半的人在河南地区。总体上金军与宋军相差悬殊，完全应该立刻袭击金军。[32]

李纲接纳了沈琯的提议，向皇帝报告。与此同时，种师道也要求在

金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袭击。[33]但他们的建议都被主和派给挡了回来。

李纲还不甘心，又拐弯抹角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在北宋初期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时，辽国侵入北宋的领土，虽然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但在辽军离开时，北宋仍然用大部队“护送”他们离境。在宋军的护送下，辽军走得特别快，也没有办法进行掠夺。李纲提出应该按照澶渊之盟时期的规矩，派大军将金军护送出境。[34]这次他的提议终于得到了答复。

李纲得到了皇帝的许可令，立刻派兵十余万，分数路出击，他下的命令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只要各路将帅找到时机，就毫不犹豫地进攻金军。宋军急不可待地行动了，他们在邢州和洺州之间追上了敌人，双方相差只有二十余里。

就在宋军摩拳擦掌准备扑向敌人时，事情突然又出现了变化。原来，金军的西路军有消息了。

粘罕率领的西路军在前期势同破竹，但到了太原就被张孝纯阻挡住了，迟迟不能南下，使得金军的钳形攻势难以形成，只有东路军到了汴京城下，西路军一直无法配合。但到了正月十九，一位义胜军的首领刘嗣初却投降了金军，帮助金军夺取了太原以南的平阳府（现山西省临汾市）。[35]粘罕决定绕过太原，先向南进军，攻陷了威胜军（现山西省沁县南），控制了重要关口南北关（现山西省灵石境内），进军并攻克了位于上党高原的隆德府（现山西省长治市），最后围攻了曾经发生过著名的长平之战的高平。一旦高平失陷，粘罕就可以冲过天井关关口，从山西高原下到黄河边的平原，有可能再次发动对汴京的攻击。[36]

被吓破了胆的宋钦宗立刻下令将那些围堵东路军的宋军召回，让他们赶快想办法对付粘罕。

但事实上，宋钦宗并不用担心粘罕的进攻。由于粘罕并没有攻破太原，太原就如同在他背后的一枚钉子，只要粘罕继续孤军深入，太原就

可以在后面打击他的后勤、辎重和援军，切断他的归路。

种师中还提到，其实并不用把军队召回到黄河边，而是从河北地区越过太行山，从侧翼包抄粘罕，将其包围起来进行全歼。[37]

指挥对东路军追击的李纲也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就不会冒险，必然会自动撤退，根本不用管。[38]

在众人的劝说下，宋钦宗终于决定不撤回追击东路军的宋军。但在这一来一回之间，金军已经走远了，宋军将士也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懒得继续卖命。

果然，不久之后，金军的西路军也撤退了。

皇帝任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扎在滑州；姚古为制置使，兵援太原；种师中为制置副使，驻军河北、山西之间，援助中山、河中地区。双方的对峙线回到了燕京以南的河北地区，以及太原以北的山西地区。

到这时，金军通过这次战争得到了太原以北的所有领土，以及河北地区的燕京地区。另外，二太子斡离不通过协议在名义上得到了太原、中山、河间三府。只是撤退时，这三个府还都掌握在北宋手中。如果北宋愿意遵守协议，就必须派人去把三镇交割给金军，这也意味着金国已经深入到河北平原和山西中部。

但是，既然金军已经撤退了，宋钦宗还真的愿意交割吗？到底是遵守和约，还是放弃和约准备战争，这位年轻的皇帝该怎么选择呢？

【注释】

[1]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传信录》记为正月十七八到达。《皇宋十朝纲要》《宋史》记为正月十八。《三朝北盟会编》记在正月二十。

[2]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传信录》作郑州南门外。

[3]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传信录》作正月二十。

[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5] 参考《东都事略》。

[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四篇。

[7] 参考《靖康传信录》。

[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9] 参考《靖康传信录》。

[10] 参考《靖康传信录》。

[11] 赵甡之《中兴遗史》。

[12]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13] 参考《靖康传信录》。

[1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5] 参考《靖康传信录》。

[16] 李纲被罢免时，种师道有没有被罢免却有争议。《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等书记载，种师道也遭到了罢免，但《靖康要录》《种师道行状》《宋史》等书记载种师道没有被罢免。现取后者。但外界传闻种师道也一同被罢免，因此才有后来汴京人民要求李纲和种师道复职事件。

[17] 参考《靖康传信录》。

[18]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八篇。

[19] 参考《靖康城下奉使录》。

[20]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21] 参考《靖康要录》。

[2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五十九篇，《靖康传信录》。

[2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六十一篇。

[2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5] 参考《靖康要录》。

[2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参考《靖康传信录》。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六十二篇。

[30] 参考《东都纪略》《宋史》等。

[31]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2] 参考《南归录》。

[3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4] 参考《靖康传信录》。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要录》。

[36] 参考《靖康传信录》。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中兴姓氏录》。

[38] 参考《靖康传信录》。

第三部
汴京失陷

第十章
再起波澜

太上回銮

金军虽然撤离，却给宋钦宗留下了三个问题。其中两个和人相关，一个和地相关。

和人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安全问题。肃王本来是替代康王前往金军营地做人质的，按照双方约定，一旦金军退兵，就会将肃王送回。

二月十二，当金军渡黄河时，皇帝派出使臣王俅前往金军营地迎接肃王，但考虑到当时情况危险，金军并没有答应。

金军在河北地区时，皇帝第二次试图要回肃王。[1]但由于李纲、种师道等人坚持军事打击，斡离不更不敢将肃王放回。于是，肃王就成了靖康年间第一个被金军带走的亲王，再也没有回到中原故土。

肃王最初被扣押在燕京的悯忠寺，[2]一年后，徽、钦二帝作为俘虏也开始了屈辱的北行，肃王在燕京加入了他们，被送到了五国城。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月，肃王死在了五国城。

肃王北狩最大的受益者是康王。如果不是姚平仲劫营，很可能康王会作为人质被金军带走，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南宋高宗。在肃王怆然离去时，康王却接受了一系列的荣誉，就在二月初十金军退兵的当天，康王被封为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康王。[3]

肃王离开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需要回来，他就是宋徽宗。[4]

金军来到时，满怀艺术天赋的宋徽宗躲到了南方。最初的恐慌驱散后，他将扬州作为自己的驻地安定下来。太上皇一到扬州，东南方立刻乱了套，援助汴京的勤王军大都来自西部，东南部的军队没有一支到达，其原因在于太上皇在扬州断掉了与首都的联系，截留了通往首都的租税，并阻止了东南的勤王之师。他的做派并不像一个退位的皇帝，竟有将北宋政权一分为二之势。

既然金军走了，按道理，他应该回来。但对宋徽宗来说却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的儿子到底会怎样对待他？

在历史上，太上皇都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七岁）被文成文明太后逼迫退位，将皇位让给了他儿子元宏（孝文帝）。但由于年轻的太上皇不肯完全放弃权力，最后被太后毒杀了。唐太宗逼迫父亲唐高祖退位，因为他杀死了哥哥和弟弟，成了不二的接班人。唐高祖郁郁退位，度过了九年的孤独光景，但至少还是个善终。唐玄宗与宋徽宗的情况最像，都是在大敌当前时逃跑，将御敌的责任留给了儿子，唐玄宗退位后也脱离了社会中心，变成了寂寞老人。

宋徽宗意识到，回到首都汴京，等待他的一定不是鲜花和赞美，而是耻辱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他在是否回汴京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

他一天不回汴京，宋朝的权力中枢就会紊乱一天。首先，太上皇身边还跟着童贯、蔡京等大臣，如果太上皇不回来，皇帝甚至担心他会被这群人挟持在南方另立中央，北宋分裂成南北两部分。

其次，太上皇本人也不想回来，而是想到西京洛阳去，在那儿不受儿子的管制，可以继续自由自在，这也意味着北宋将分裂成东西两部分。

再次，哪怕太上皇回去，如果他不肯安分守己当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儿，总在背后对儿子的决策指指点点，那么北宋的朝廷同样是分裂的。

如何解决太上皇的问题，成了皇帝和大臣们关注的焦点。按照开封府尹聂昌的看法，不如带兵去把太上皇周围的奸臣都处理掉，太上皇就不能不回来了，这等于是强迫他回来。聂昌的提议被李纲阻止了。

李纲认为，给足太上皇面子，同时劝说他放弃权力，才是最优选项。于是，在北宋最需要加强防卫以免金人再来之时，作为主战派的李纲却首先被派去解决太上皇的问题。

李纲在与太上皇的商议中，提出让太上皇让出大内禁中，毕竟他已经不是皇帝，禁中是给现任皇帝居住的。但皇帝将皇家园林撷景园改为宁德宫，请太上皇居住。

为了让太上皇感到受尊重，皇帝还要时时请安，并允许太上皇和太后在必要的时候进入大内。

太上皇在李纲的劝说下，终于回到了京城，这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北宋的朝政不会走向分裂，而是统一在年轻的皇帝手中。人们有理由期待皇帝能够励精图治，重振宋朝的威望。

太上皇回銮后，对宠臣的清理也到了最后阶段。如果要让太上皇彻底交出权力，必须将蔡京、童贯等太上皇的身边人都处理干净。只有太

上皇失去了这个圈子，才真正失去对政治的干预能力。

太上皇的宠臣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满足宋徽宗私欲和财政需要的能臣，比如蔡京在筹措帝国财政方面用尽了全力，而朱勔则负责替宋徽宗运送花石纲；第二类是那些倡导联合金国打击辽国的人，比如童贯一直是主战派，却由于打不了仗，变成了赎买派，也就是用金钱换取金军帮助，这一派人可以称为变质了的主战派。

在前期的运动中，失势的官员都已经被清理了，比如王黼、梁师成等人；但跟随宋徽宗去往南方的宠臣群体，包括蔡京、童贯、朱勔等人还没有清理，这次就轮到了他们。蔡京、童贯、朱勔都是在这时被处理掉的，他们或者在流放时死亡，或者被杀。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是最冤枉的，那就是首先倡议联金攻辽的赵良嗣。

赵良嗣于三月二十七被诛杀。[5]本质上来说，如果宋军足够强大，那么赵良嗣的计策是可以成功的，北宋能够获得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但由于宋军过于软弱，作为使臣的赵良嗣只好一次又一次和金人周旋，才获得了燕京。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就不会有燕京的交割。

拿到燕京之后，如果宋军加强防御，也不至于再次丢失。赵良嗣曾经希望引退，不再参与政治，可是宋徽宗不同意，他只好留下来，不想风云突变，功臣瞬间变罪人。

斡离不退兵后，赵良嗣承受了无尽的谩骂，在铲除奸臣的声浪中被赐死。他还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留下了无尽的骂名。[6]近千年来，替赵良嗣说话的人不多，但也有人质疑他不仅不应该被列入奸臣传，反而应该正名。[7]

和约遭遇执行难

除了两个人事问题，最复杂的还是土地问题。直到金人离开，皇帝和大臣才意识到，他们为了赎买和平，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金钱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一下子给予过多的战争赔偿，必然会导致下一场战争。金军士兵薪酬是掠夺制的，他们拿不到固定薪水，到底有多少收获，全看战场上抢多少东西，获得对方多少赔偿。宋钦宗付给二太子斡离不的赔偿让金人开了眼界，自然会让另一路元帅，也就是粘罕和他的西路军眼红不已。就算斡离不已经满足了，粘罕也必然会煽动另一场战争，来满足自己的军队对于财富的渴求。

既然另一场战争必然到来，那么决定胜负的关键，就要看北宋能否防御得住。

不幸的是，宋钦宗发现，如果要防止敌人的下一次进攻，就必然要占有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是山西的门户，粘罕之所以占领了更靠南的隆德府和平阳府，却又不得不退回北方，就是因为太原还在宋军手里，可以随时袭击金军的后续部队。河间是东路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而中山位于河北与山西之间，是沟通两地的要道，一旦中山丢失，也意味着金军的东西两路军可以方便地沟通协调，形成策应，到时就不像前一次那样东路军孤军冒进了。

宋钦宗虽然向金军许诺了三镇，但金军却遭遇了典型的执行难问题。皇帝的割地使到了三镇，请求他们配合交割，但三镇不仅不执行，反而加紧了抵抗。

比如中山、河间两镇，当斡离不回师时经过这两个地方，被抵押的肃王，以及割地使张邦昌等人亲自到城下宣读皇帝的诏书，请求他们遵守法令，但都被城上的士兵拒绝了，甚至他们用弓箭石块将说客逐回。[8]

金兵离开后，宋钦宗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劝说他不要遵守条约。因为只要执行条约，就是宣判北宋王朝的死期将近；不执行，大不了是拼

个你死我活。相比较而言，还是不执行更有好处。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祖师爷杨时就上书表示，三镇“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9]。这样的三镇必须固守，不可丢弃。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说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说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答应了根本无法执行的条件，现在只好反悔了。

就在金军撤离不久的二月二十五，[10]皇帝派遣工部尚书王云等人出使金军，就提出了另外的建议：希望金军允许北宋保留三镇，但同时，北宋增加一定的岁币，作为三镇的租税交给金国。[11]

这件事金国没有回复。于是，北宋官员开始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既然要违约，就必须首先证明是金人先违约的。斡离不回军时曾经在磁州、相州、大名一带掳掠，杨时认为金军没有和平撤离就是违约，他建议皇帝以此为借口不执行协议。杨时还认定，金军最初答应（是否答应是有疑问的）到黄河就释放肃王，但迟迟未放，也是违约。[12]

另外，皇帝还可以在西路军找借口。由于金军的两路存在协调问题，东路军已经撤退，西路军还在南下占领隆德、平阳等地，这也是违约。

如果仔细琢磨这些借口，不得不说，宋钦宗如果以此为借口，的确是有问题的。关于释放肃王问题，金军从来没有答应到黄河就释放他，只是宋廷的一厢情愿罢了；金军在河北的掳掠是战争中无法避免的混乱，即便统帅想制止，也无法完全避免；西路军南下更多是古代通信的时间差问题。粘罕向南进军时，并不知道协议已经签署，也就无法停止进军。当然，如果说金军将协议执行得不折不扣，也不确切。

如果宋金双方能相互谅解，这一切都不是大事。可一旦有一方不准备谅解，而是寻找机会推翻协议，那么利用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就成了唯一的途径。

三月十六，皇帝向三镇下发抵抗的诏书，他宣布由于金军首先摈弃

盟约，宋军不得不抵抗。皇帝采取主战派的主张，首先罢黜那些参与了和谈的官员，在本书中一度占据了主要舞台的李邦彦、李棁、李邺、郑望之等人同时丢了官，与赵良嗣的区别只是他们没有被杀掉。可见，在宋朝从事外交工作也是危险的职业。

皇帝派遣种师道、姚古和种师中三员大将去支援三镇。这一次他显得信心十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13]。

宋朝皇帝前后不同的态度首先给粘罕的西路军带来了混乱。粘罕占据了隆德、平阳，但无法拿下太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收到宋金议和的消息，协议中包括割让太原，宋朝甚至派来了一个叫作路允迪的割地使。粘罕意识到这次进攻不可能更进一步了，捞到太原也不错，于是下令退军，北归去接收太原。

到了太原城下，路允迪帮助金军招降太原，但太原守将却表示，他们收到了皇帝的最新诏书，与路允迪的说法恰恰相反，诏书不仅不是让他们交割太原，反而是要求更加坚决地抵抗。[14]粘罕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一面命人继续围攻太原，一面率军北上休整。

四月，一个更好的机会似乎出现在了宋钦宗面前。这个机会是由一个金人的使团带来的。

由于北宋不想交割三镇，金国派遣了一个使团，由萧仲恭与赵伦带队前往宋廷，催促交割事宜。[15]但宋钦宗并不想交割，将使团留置了下来，不放回金国了。

使团的首领萧仲恭是一位辽国的降将，与辽国另一员大将耶律余睹很熟悉。耶律余睹在金军中担任监军，是非常重要的武职官员。北宋的接待使了解到，萧仲恭似乎对金国并不满意，经过交谈，更进一步知道耶律余睹也过得不顺心，这两人对金国并没有太多忠心。

经过与萧仲恭等人的商讨，宋钦宗决定不再扣押萧仲恭，放他回去。皇帝亲笔在黄绢上写了一封信，封在蜡丸中，交给萧仲恭让他转交

给耶律余睹，招降他反对金国。皇帝暗地将山西许诺给耶律余睹，只要他反金，他可以在山西建立一个与北宋友好的世袭政权，相当于宋金之间的一个屏障。[16]

北宋君臣满怀期待地将萧仲恭等人送走，等待耶律余睹的答复。如果这两个人决定反对金国，那么山西一带的压力就会降下来，北宋可以对付河北一带的金兵。

宋钦宗没有想到，他犯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错误。宋徽宗曾经试图招降辽国天祚帝，被金军截获了他的圣旨，成了金国攻宋的一个好借口，这已经是很大的教训。到了儿子宋钦宗，又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还同样留下了文字把柄。

在这之前，宋钦宗一直在金人面前与父亲撇清关系，表示以前的错误都是老皇帝犯的，老皇帝已经退位，新皇帝不应该承担以前的责任。但这件事之后，金人已经明白这父子两人秉性是多么相似，就连做事的风格都一样。

萧仲恭并没有想投靠北宋，他之所以答应，只是因为北宋不让他回去，他需要找个策略离开。[17]耶律余睹更没有谋反的意图，他甚至不知道北宋皇帝会给他写信。于是两人共同将宋钦宗的蜡丸绢书上交给了金人。从这时开始，金军基本上放弃了对北宋的指望，开始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宋金之间的对决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逼近了。

老将离去

既然宋钦宗也准备依靠军事解决，除了招降耶律余睹之外，在自身军事准备上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四月时，针对金军可能再次南下的形势，李纲向皇帝上书提出了八

项建议。这八项建议都是针对北方战备的，分别是：

第一，唐代藩镇虽然导致了安史之乱和后期的地方割据，但由于北宋的最大问题是指挥权不统一，军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可以考虑在北方边境地区建立一批藩镇，让藩镇负责带兵，并征集军粮，给予世袭的权力，保卫边疆。

第二，王安石时代建立了保甲制度来训练民兵，但后来保甲制度时废时兴，名存实亡，作为非常时期，应该考虑恢复保甲制度，利用人民对家乡的忠贞来保卫国土。

第三，战争中以军队最为重要，军队中又以战马最为重要，由于金军几乎将马匹都掳掠一空，因此，养马乃当务之急，需要政策扶持和指导。

第四，河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池塘沼泽遍布，但到了北宋时期，由于人们开荒种地，将河北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华北平原。没有池塘沼泽，河北就彻底丧失了防御手段，因此，需要恢复一定的池塘沼泽，以备军事防御之需。

第五，河北、山西的城池坏了很多，需要大修。

第六，免除战乱区的租税，尽快恢复生产。

第七，尽快想办法吸引商贩，用市场经济的做法解决河北、山西地区的粮草问题。

第八，之前朝廷筹措军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盐税和盐钞，北方地区的盐主要出自山西解州的解池，但宋徽宗初年解池被水冲了，朝廷规定从南方海边运盐代替解盐，从此北方军费受到了影响，现在应该恢复从解州供盐的制度，不要让南方盐运到北方来。[18]

这些措施有的是军事的，有的是经济的，但整体上都是为了战争服务。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条都是非常

必要的措施，第一、第八条虽然看上去会让现代人产生抵触，但仍然是很必要的，第四条工程太大，恐怕很难实行。

宋钦宗表面上答应了大部分改革，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全都搁置了，没有对战争产生任何的帮助。

五月，对宋军的打击来到了。金军退师后，宋军在河北、山西地带的防御主要依靠三个人，分别是种师道、种师中与姚古。五月初七[19]，由于种师道过于年迈，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在三位战将中，种师道经验最丰富，他的离职让宋军少了一员统帅级的人物。

剩下两员将领中，姚古负责山西地区的防务，粘罕退军后，姚古收复了太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宋军想要解围太原，却屡屡无法成功。

金军对于太原的封锁做得很好。太原虽然在张孝纯等人的坚守下固若金汤，但金军在城外却筑起了障碍，将整个城池困在了中央，彻底断绝了城内与城外的联系。在金军围困汴京时，虽然汴京防御力量不足，却一直是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金军在汴京城外的西北角，外界的物资和人员却利用东南角的城门进出。与汴京不同，太原完全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物资彻底中断，粮草匮乏到了极点，这逼迫着宋军必须赶快援救太原。

姚古从太原的西南方出发，去解救太原危机，没有成功。宋军不得不考虑利用种师中在河北的军队。种师中率军护送斡离不离境之后，大军停留在河北地区的大名府附近，皇帝给他的新任务是从河北穿越太行山的井陉关进入山西境内，从东南方进军，与姚古的部队形成钳形攻势，夹攻太原外的金军，将他们赶走。

种师中穿越井陉后，到达了平定军（现山西省平定县），接着又克复了寿阳县（现山西省寿阳县）、榆次县（现山西省晋中市），距离太原已经是咫尺之遥了。

但种师中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选择了占领这些据点的同时，继续

以太行山以东的真定（现河北省正定县）为基地驻扎。

种师中不急于进攻，北宋朝廷却等不及了。恰好这时，传来情报说金军大部队已经回北方度夏，只有一些散兵负责畜牧养马。按照宋代的指挥制度，虽然种师中与姚古都是一方大将，但制定战争决策的机构却是汴京的枢密院。当时负责枢密院的是知枢密院事许翰，他是个爱纸上谈兵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逼着种师中与姚古赶快进攻，如果不进攻，就治他们“逗挠”（怯阵不敢作战）之罪。[20]

“逗挠”之罪在军事上是严重的罪行，甚至可以判处死刑。种师中本来是希望稳扎稳打，既然已经接近了太原，就不妨停一停，制定一个更加可行的计划再上阵。否则不仅无法打败金军解放太原，反而连已经获得的城池都可能丢失。但在许翰的逼迫下，他不得不感慨着率兵前进。

按照许翰的策划，除了种师中一道，姚古也要从西路进军，形成夹击。[21]由于夹击讲求速度和时间，种师中不能带太多的辎重，尽量轻装向太原前进。

种师中先到了寿阳县境内一个叫作石坑的地方，遭到了金将完颜活女的袭击。事实证明，金军主力北归的消息是错误的，他们留了足够的人马在南方，只是隐藏了起来，好吸引宋军进攻，进行伏击。

种师中与完颜活女打了五仗，其中赢了三场，败了两场。他突破了金军，继续经过榆次来到了距离太原只有百里之遥的杀熊岭。

按照军事规划，当种师中来到榆次时，姚古也应该率领军队来到太原附近，双方建立联系后共同进攻太原。但姚古手下有一位叫作焦安杰的统制，宣称粘罕从北方回来了，进攻太原已经不可能了。听到这个消息，姚古选择了按兵不动，因此并没有与种师中合兵。到这时，就只剩下种师中孤军奋战了。

更麻烦的是，出于速度的需要，种师中并没有携带足够的粮草，队内已经发生了饥荒，每天每人只能分得一勺豆子，这样持续了三

天。[22]五月十二[23]，金军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刻展开了进攻。

金军首先进攻种师中右军，将其击溃，前军也跟着逃走。种师中率领中军奋战，用神臂弓将敌人击退。到这时，种师中还能稳住阵脚。

北宋的军队有一个习俗，打仗时为了让士兵卖命，必须当场给予丰厚的赏赐。弓箭手击退金军后，向种师中要赏赐。但库吏却告诉种师中，由于轻装上阵，没有带奖励士兵的物品，数来数去，只有十几个银碗，显然不够用的。[24]战士们听说这个消息，意识到宋军已经既无粮草，也无财富，继续打下去除了死亡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纷纷逃走，将种师中抛弃了。

战斗打了一上午，最后只有百人左右的团队跟随着种师中，直到战死。在死前，还有人劝说他突围而去，但他拒绝了，力战而死[25]，时年六十八岁。

种师中死后，金军继续进攻姚古的部队，将姚古击回了隆德府。

这场战役以北宋损失一员大将、太原解围失败告终。当失败的消息传回京都，汴京的官员虽然无力帮助前线打仗，在追责上却无比用力。瞎指挥的许翰被免了职[26]，谎报军情的统制焦安杰也被李纲砍了头。

作为山西一路统帅的姚古也承担责任，被免去了军职，送往广州安置。到此为止，原本防卫北方边界的三员大将最终以种师道辞职、种师中战死、姚古免职为结局。最有战争经验的三员大将都因为指挥系统的紊乱而去职，将防卫北方的重任留给了更加没有经验的人。

最无力的主战派

种师道、种师中、姚古之后，在首都，主和派突然间又成了主流。此刻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叫作耿南仲的大臣。他表示老将死的死退的退，朝廷已经没有能打仗的将军了，劝说皇帝交割三镇才是上策。

此时首都主战派的领袖是李纲。李纲是个典型的文臣，只是在汴京保卫战时期依靠满腔热血临时担任了指挥角色。按照他的本意，知道自己不善于带兵，一旦军人接手防务，自己就退出武职。

但耿南仲等人对皇帝的喋喋不休让李纲义愤填膺，他争论说三镇不能交割，必须守住。不想耿南仲立刻做了个顺水人情，请李纲担任武职，去北方帮助皇帝守住三镇。

宋钦宗也在为没有人能打仗感到发愁，听了耿南仲的建议，立刻下令，任命李纲担任两河宣抚使，接替种师道的角色；同时任命刘韐作为李纲的副手，接替种师中的角色；解潜担任制置副使，代替姚古的角色。

防卫北方的三驾马车换成了李纲、刘韐和解潜。后两者都是有战功的武将，只有李纲是个文臣。

李纲知道自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政治对手要将他清洗出京都的策略，所以才想出这样的办法。在争辩无果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上任。[27]

他上任时，宋军已经越来越混乱。种师道时期，由于老将军是武职出身，还有足够的威信保持军队的稳定。李纲作为文人在首都有很高的威望，但在军队中却说不上话。更复杂的是，宋钦宗曾经信誓旦旦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但种师中死后，皇帝在耿南仲等主和集团的劝说下，又没有那么坚决了。他让李纲上任，并不是信任李纲，而是让李纲尝试最后一次武力保卫三镇，如果还不行，就要彻底倒向主和派了。

朝廷中的主和派虽然暂时不敢完全反对武力，却三心二意，出工不出力。全军上下都知道朝廷的情况，对李纲等人更是阳奉阴违，使得军队指挥彻底失控了。

这一切，就注定了李纲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任务就是战败并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战败会被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主和派屡屡提及，成

为必须寻求和平的证据。

但在七月初，皇帝还没有最终倒向主和派，还在尝试着采取强硬主张。一方面，他继续清理宋徽宗身边的大臣（蔡京、童贯等人都是在这个月死亡[28]），另一方面，分别遣使前往金国皇帝、左副元帅粘罕（两次）、右副元帅斡离不处，坚决要求用租税代替割地，请求免于割让三镇。[29]

在战争准备方面，李纲进行得并不顺利。皇帝让他担任宣抚使，是想让他完成两个任务：第一，解太原之围；第二，守住北方防线。皇帝的目标明确，可是又给了李纲多少资源呢？

首先，在李纲没有离开汴京时，皇帝给他招募了两万兵，但由于金人已经将马匹掳掠殆尽，士兵没有马可以骑。李纲请求皇帝从民众手中买马，估计可以搞到几千匹，但刚发出文告，开封府就以骚扰民间为由请求终止了。

李纲将两万人分成五支军队，每军四千人，恰好河北发生了叛乱，于是派左军去镇压。右军又拨给了副使刘韐，给李纲剩下的只有一万两千人。出征前，李纲请求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军费，朝廷最后总共只给了二十万。

原本定在六月二十二出发，但由于事情过于仓促，李纲请求延期。这被当作他害怕了的表现，于是，他只好仓促于六月二十五出发。出发前皇帝倒是做足了功课，在紫宸殿和琼林苑分别赐宴，期待这支一万两千人的兵马凯旋。

七月初，李纲来到了河阳。河阳是连接山西和洛阳的黄河渡口，也是西路防卫的最关键地点之一。他在河阳停留了十余日，为的是训练士兵，让这支仓促组建的队伍有战斗能力。另外，由于宋军军纪败坏，有逃跑的，有抢劫的，有偷窃的，李纲都采取严格的军法加以惩戒，从而提高了士气。

接着他进入怀州。怀州夹在太行山和黄河之间，战略地位更是无可置疑。在怀州，李纲要解决的是缺马问题。对于古代军队来说，再高的士气也无法代替马匹。这时有一个人叫张行忠，他提议说，整个国家都没有马了，但还有另一个办法：人怕马，但马怕车。他设计了一种战车来对抗金军的骑兵。每一辆车由二十五人操控，配备有弓弩、刺枪和盾牌，组成车阵可以抵御马匹的冲击。李纲非常感兴趣，叫人造了千余辆车，在怀州练兵。[30]

李纲造车之举是值得商榷的事件，这说明他知道宋军的弱点在哪里，也想去解决，但他的做法是否能解决，却没有结论。在大敌当前时，大规模推广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笨重器械，并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方法。

李纲造车的行为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满，宋钦宗想要的是尽快解太原之围，而李纲反而在后方迟迟不进。皇帝下诏将招募的士兵全部解散了。也就是说，李纲花费的所有心血都归于流水。失去这支一万两千人的小军队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兵的统帅，实际上被架空了。

接着皇帝开始越级指挥，他不断地催促各地的将领集结，一同去解太原之围。这些将领包括：宣抚副使刘韐，制置宣抚副使解潜，查访使张灏（太原守将张孝纯的儿子），勾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他们制定计划，于七月二十七从各路进军，其中刘韐、王渊负责平定军和辽州（现山西省左权县）两路，解潜和折彦质负责威胜军一路，张灏、折可求负责汾州（现山西省汾阳市）一路，范琼屯南北关。

皇帝的思路还是和上一次种师中、姚古联军一样，希望从不同方向同时进攻，压迫敌人直至太原城下。上一次种师中虽然到了，姚古却没有赶到，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指挥权的不统一，两路军是并列关系，互不隶属，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统帅。这一次，宋钦宗自认为能够担当这个统帅，但由于距离遥远，所有的将领都听从皇帝的，就意味着所有的将领都自行其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出师之后，刘韐最先遇敌，被金人击溃。解潜是最积极的，他从山西南部向北到达南北关，与金军相遇，双方大战了四天，不分胜负。但由于其他所率部队各路都没有跟上，无法牵制金军，金军得以调来援军。解潜由于没有后援部队，所率部队最终崩溃了。[31]

作为名义主帅的李纲由于没有兵，也没有指挥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军失败。

八月份，张灏、张思正、折可求等与金人轮番相遇，发生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当宋军战败的消息传来，位于山西的威胜军、隆德府、汾州、晋州、泽州（现山西省晋城市）、绛州的老百姓纷纷开始逃亡，他们不再信任宋军的保护，担心金人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都割走，于是渡过了黄河，向南方撤离。[32]

这一系列失败也成了皇帝再次转向的节点，从这时开始，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军事行动却又搁置了下来，皇帝下令不得轻易进兵，从湖南来的援军也被按下。

由于李纲无法指挥战争，他再次被免职，皇帝强迫已经退休的种师道出山接替他。

李纲走上了他漫漫的贬职之路。他先是被封为扬州知州，但随后又被安置到了建昌郡（现江西省南城县），还没有走到地方，又被发配到了更远的宁江（现重庆市奉节县）。当“靖康之耻”最后结局来临之时，他已经脱离了舞台的中央，无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了。

李纲是有一定优势的，他擅于鼓动士气，并有着坚决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肯和金军妥协。他在第一次汴京围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个作用又存在着一定的夸大。事实上，他只率军抵抗了两天，宋钦宗就和金军讲和了，并做出了无法挽回的巨大让步。李纲既没有机会继续与金军作战，也没有机会阻止皇帝让步。后期等种师道等勤王军到来后，李纲就被边缘化了，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

李纲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但在军人中间却一直被看成是外来的生手。在宋代的军事体制下，李纲不可能找到施展的舞台。更何况他坚决主战的态度也让许多主和派看不惯，于是，主和派和军人集团都不喜欢他，集体排斥他。他的离开是必然的，即便留下也会毫无作为。

接替李纲的种师道虽然是名将，但等他上任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老“光杆司令”没有带一兵一卒前往河阳。在那儿，他碰到了金国使节王汭。他从使节的言辞判断，金军又要进攻了，于是立即上奏皇帝。此时北方的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了，形势比前一年还要严峻，种师道上书请求皇帝移驾长安。长安位于关中的四塞之地，又是种师道的根据地，金军很难进攻那儿。当汴京没有了皇帝，反而更加容易保卫。

但他的建议被斥为逃跑主义，没有被采纳。十月初，病重的种师道交出了兵权，由刘韐代替，刘韐还没有出发，又换成了范讷。[33]在这一系列的换人过程中，老将军种师道撒手人寰，他享受了皇帝给予的最后哀荣，也不用再为风雨飘摇的北宋皇朝送葬了……

【注释】

[1]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王俅在中山府望都县追上了肃王，但金军以还没有交割三镇为借口拒绝放回。

[2] 陆游《老学庵笔记》。

[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 关于宋徽宗回銮的描写，最好的是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本部分就根据他的回忆录整理。

[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6] 参考《宋史·赵良嗣传》。

[7] 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就试图为赵良嗣正名。

[8]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9] 参考《宋史·杨时传》。

[10] 参考《宋史·钦宗纪》。

[1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篇。

[12] 参考《宋史·杨时传》。

[1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四篇。

[1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五、七十六篇。

[1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1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八篇。

[17] 参考《金史·萧仲恭传》。

[18] 参考《靖康传信录》。

[19] 参考《皇宋十朝纲要》。

[20] 参考《靖康要录》。

[21] 《宋史纪事本末》，还有一路叫张灏的也同时出击。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靖康小雅》。

[2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5]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26] 参考《靖康要录》。

[27] 参考《靖康传信录》。

[2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七十九到八十二篇。第八十三篇是粘罕拒绝的回书。

[30] 参考《靖康传信录》。

[31] 参考《靖康传信录》。

[32]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3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第十一章
战端重启

太原失陷

宋钦宗还在为战和问题而感到头疼时，金人已经帮他做出了选择。由于皇帝不肯割让三镇，加之试图招降耶律余睹，被金人认定是比他父亲更加顽固的皇帝，且言而无信，和约对他如同废纸。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十四，金国两路元帅共同发出了问罪书，[1]随即兵分两路，向南方进攻。

此时的金国军事组织架构已经有了调整。在第一次进攻中，由于缺乏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两路元帅各自为政，缺乏沟通。这次，他们采纳了辽国降臣刘彦宗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叫作元帅府的机构，[2]元帅府中分为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一共七人。

都元帅负责协调，而真正出兵的仍然是左右副元帅。左右之分，仍然以山西、河北两路划分。其中都元帅由谙班勃极烈（即太子）斜也担任，左副元帅粘罕，右副元帅斡离不，左监军达懒，右监军兀室，左都监阇母，右都监耶律余睹。

金军已经出发，在战场上屡吃败仗的宋钦宗却更加依赖外交手段了。

他派出了一系列的使臣前往金军各个大营继续谈判。在这些使臣中，著作佐郎刘岑临时封了太常少卿的官职，担任去往大金国皇帝处的国使，由阎门宣赞舍人马识远作为副手。宗正少卿宗泽前往右副元帅斡

离不大营。秘书少监李若水前往左副元帅粘罕营地，相州观察使王履是他的副手。[3]

在这些使者中，李若水的记录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4]

李若水于八月二十四出发，他经过河北，从井陉翻越太行山到达山西。在过井陉前，他先到了斡离不的营地。当时宋金之间的冲突有四方面：第一，三镇交割问题；第二，上次没有缴完的赔偿金问题；第三，辽金地区叛逃北宋的官员处理的问题；第四，岁币问题。

斡离不和李若水见面时，没有谈岁币问题（岁币缴给金国国库，跟他关系不大），就连三镇问题都表示可以再讨论，他关心的还是直接给他的钱，也就是没有缴完的赔偿金，另外对叛逃官员问题也有所关注。

到了九月初一，李若水等人翻过太行山，来到了粘罕所在的太原府榆次县，这里曾经是种师中收复过的地方，现在却成了金军西路军的临时大本营。李若水发现粘罕对于赔偿金和叛逃官员不感兴趣，对三镇问题却极其重视。

这也可以看出两个副元帅的经验，斡离不关注的是短平快的来钱项目，而粘罕却看重土地，知道只要有了土地，钱财是早晚的事情。

宋人一直分不清两个元帅到底谁是老大，谁是老二。李若水在出使时也想弄明白，他发现宋人由于和斡离不打交道多，往往以为斡离不在粘罕之上，但实际上，双方各有优势和劣势，又互相猜忌。斡离不在第一次进攻北宋中功劳更大，他担心这次进攻粘罕会获得更多的战功，因此倾向于和谈，但第一次没有获得足够战果的粘罕却更渴望战争。

李若水在粘罕营地停留了五天，获得了粘罕的四次接见。元帅对宋使的态度很好，赐酒赐肉，临行前还给了不少礼物。他们甚至谈起了粘罕的家庭，他的家人都被辽国害死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小女儿。

在畅谈中，粘罕却拒绝了李若水的谈判请求。他不肯将三镇还给北宋，而是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让李若水带回：他要的是战争。

其实，李若水的遭遇是不难理解的。就在李若水到达金军营地的第三天，也就是他和粘罕第二次见面时，一件大事已经发生：粘罕攻克了太原，这座坚守了将近一年的城市陷落了。

太原之围从前一年十二月开始，持续了二百六十天。太原城墙长四十里，异常坚固，在守将张孝纯的带领下，做到了全民皆兵。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性都参与了守城；有的为了构筑工事，不惜把房舍拆掉。可以说太原是靖康之战中最顽强的城市。[5]

金人用木头构筑的工事环绕城墙一圈，将城市围住，断绝了内外的交通。如果仅仅攻城，太原几乎是牢不可破，可一旦缺粮，就成了大问题。从太原城内偶尔能跑出几个去往朝廷求援的信使，他们往往都瘦得皮包骨头。朝廷也接连两次派军队救太原，却都失败了。于是，宋朝大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太原一天天被围困下去。[6]

为了攻打太原，金人也想尽了办法，根据当时人们的回忆，金人动用了炮石、洞子、鹅车、编桥、云梯、火梯等攻城器械，整体数量达到数千，但是都一一被太原守将化解。[7]

所谓炮石，实际上是体格巨大的发石车，金人将三十个发石车并列，每块石头大如斗，在统一号令下齐发入城，摧毁能力惊人。城内总管王禀命人在重要建筑和楼橹上覆盖装着糠的布袋，减少石头的冲击力，即便被击破，由于损伤较小，修复起来也容易。

发石车不成，金人就改用另外的手段把城壕填平。金人也做了巨大的如同特洛伊木马的大架子车（叫洞子），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生牛皮，外面再裹上铁叶，城上的弓弩不可能穿透。士兵躲在架子车里面，带上柴薪、土木等，推着架子车来到城壕边。他们先将大木板和柴薪放到城壕里，上面再铺草，最上面用土木填平，这样就把护城河解决了。可

是，由于草、柴薪、木头都怕火，王禀就用火攻的方法阻止金人填满城壕。

金人的鹅车是鹅形状的大车，比城墙都高，人藏在里面，推着车靠近城壕。由于鹅嘴是前倾的，正好可以越过城壕搭到城墙上。城内也做了类似的鹅状楼宇，与敌人接战。甚至把大石头放在对方的鹅嘴上，由于鹅车重心不稳，就会被压倒。

云梯、火梯等是用来爬城和焚烧城上设施的工具，下面都有轮子，可以推到城墙下。但王禀都一一想办法破解。

依靠这些工具，金人没有打进去。

真正让太原城防出现漏洞的是缺乏粮草。城内的人先杀牛马骡驴，其次把所有的皮制品都吃光，接着将所有能找到的草根树皮等都扒尽了。最后，人们开始吃人，先是吃死人，然后将羸弱老人吃掉。即便这样，太原城里的人还是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守城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九月初三[8]，粘罕军攻破了外城，而守军早就在内部建了另一道内城城墙，于是守军都退到了内城。但遗憾的是，由于士兵们饿得实在没有力气了，他们拿着武器倚在城墙上，竟然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将自己杀死。

王禀率兵抵抗，突围而出，金军紧追不舍，他只好带着太庙中的宋太宗画像投汾河而死。[9]

主帅张孝纯和他的另一个儿子张浹被俘后，金人要求他们投降，张孝纯拒绝了，等待被金人杀死。金人当着他们的面将三十多员副将杀掉，张孝纯父子依然面不改色，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粘罕佩服张孝纯是条汉子，没有杀他，叫人把他押往了北方。

太原作为北方屏障的意义不亚于燕京，它的失守，意味着山西一路

已经开放了，金军随时可以南下黄河，不管是西进洛阳还是东袭汴京，都不会再有大的障碍。

更可怕的是，太原是在宋军的眼皮底下丢失的。宋军还有十几万大军在周围救援，却谁都过不去。如果说第一次汴京之围的失利是因为援军没有到，那么太原失守则意味着宋朝的军事体制彻底落后于金朝，即便有援军，也打不过金军。

宋朝的军事体制落后不在于将领的军事素养，因为他们也有很好的将军，如种师道、种师中、张孝纯、刘韐、折可求等，当年的郭药师也曾经全心全意帮助皇帝守卫燕京。但由于指挥系统的紊乱，将军们很难有权力调动起全局资源，来组织一场战争。

金军的行动指挥由两路元帅全权负责，他们可以调动一切资源为战争服务。但宋军调动资源要得到皇帝的允许，而皇帝又是受身边的宰执控制的，宰执还包括主战派和主和派，在一系列的扯皮中，几乎不可能做出及时的决策。

在战争中，每一位将军都只是一路兵马的将领，指挥不动其他的兵马。就算设立了一个更高级的统帅，几乎所有的下级将军也不把这个统帅当回事，因为他们除了受这个统帅领导之外，还有无数层级领导的节制。

一旦将军打了败仗，宋朝的言官立刻发动弹劾，不惜把他们逼上绝路。言官无罪，将军不赦。当将军打了胜仗，宋朝的宰执立刻考虑通过升官将他们的带兵权剥夺掉，到最后仍然是树大招风难以自保。

总之，宋太祖设计的这个系统曾经和平运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遇到了金军这个克星，其中隐藏的千疮百孔突然就暴露了出来。

太原丢失的连带效应直到一个多月后还能看出来。在太原丢失之前，宋朝还派遣了一位叫作王云的人到金国皇帝处谢过。[10]王云十月十八才回到汴京，当时太原已经丢了一个半月。但王云带回来的却是好

消息：金国皇帝似乎松动了，不要求三镇土地，只要三镇的赋税，并给金朝皇帝上尊号，表示臣服，再派康王前去议和，就可以了。[11]

这件事让宋钦宗激动了一番，讨论了半天如何上尊号。但事实上，金国皇帝许诺出自太原失陷之前，金国人也已经厌烦了战争，所以才会想拿一笔钱就算了。可是王云回来后，太原失陷的消息传到了金国皇帝耳中，他又改变了态度，因为金国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等宋钦宗再次将王云派遣去金国，金国人已经不认可前面的许诺，不可能再交还三镇了。

这件事的误会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初，宋钦宗还真的要派康王去谈判。康王甚至出了国门上了路，只是后来路上出变故，中途折回，才没有白白地去当俘虏。[12]

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太原失守半个月内，竟然没有人敢告诉宋钦宗。群臣再次进入了事不关己的状态，大家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希望拖下去。[13]金军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快速进军。

金军攻克太原时，李若水恰好从河北到山西，再从山西南部返回北宋控制区，一路上经过了两个府，两个府级建制的军，七个县，四个镇或者塞。在这个区域内已经没有了北宋的兵马，金军的营地倒是看到了数十处，这意味着金军已经对山西北部地区实现了实质性控制。更让人伤心的是老百姓，一路上大部分地区的官舍民宅都已经被烧毁，家具窗户都没有完整的了。只有井陉、百井、寿阳、榆次、徐沟、太谷等地还能看见百姓的身影，但已经是蕃汉杂居。老百姓对金人的勒索和税赋疲于应付，如同乞丐一般。

还有一些人不甘心受奴役，他们上山扎寨，变成了山大王。但金军的镇压也是严酷的，只要抓住这些人，必定杀掉。[14]

长驱直入

半个月后，宋钦宗终于收到了太原失守的消息。群臣们不得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宋军失败的原因也在探讨议题之中。指挥权不统一，将军无法调动足够的资源，这个问题一再被提及，以宰相何㮚为首的官员们都在思考如何解决。

九月二十三，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15]这个办法是这样的：在之前，北宋以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市）、西京河南府（现河南省洛阳市），以及位于南襄盆地内的邓州为中心，设立了四个总管，这四个总管虽有职衔，但负责的事项并不清晰。

何㮚等人提出，给这四个总管加上元帅的头衔，将全国的领土都归入到四个总管的管理之下。所有在总管府辖区内的军队都受总管的节制，同时，总管还有征发物资、决定军事财政的权力。

这相当于将全国划成了四个节度使辖区，四大节度使既负责军事，也负责财政养兵。这是对北宋原有政治结构的一种颠覆。北宋一直采取对官僚制约和限制的态度，将军事、民政、财政等权力切割成小块，分配给各级官员，而现在四大总管在辖区内几乎拥有了一切权力，比当年安禄山在唐朝的权力还大（当然只是名义上）。

皇帝同意了何㮚的建议，在九月二十七下达诏书，任命总管。[16]具体分配是这样的：位于北京大名府的北道总管负责河北东路、京东东路，总管由赵野担任，副总管是颜岐；位于南京应天府的东道总管负责京东西路、淮南东西路，总管是胡直孺，副总管是朱胜非；位于西京河南府的西道总管负责京西北路、陕西、京兆、秦凤、环庆等路，总管是王襄，副总管是张杲；位于邓州的南道总管负责河南道、京西西南路、荆湖北路等，总管是张叔夜，副总管是高公纯。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议与李纲的提议做对比。在给皇帝上书时，李纲认为由于宋朝官僚权力太分散，根本没有办法抵抗金军，因此建议在北方边境地区设立世袭的节度使藩镇，让他们帮助北宋保卫边境。这个建

议有着极大的副作用，一旦赶走了金军，节度使会尾大不掉，直至出现问题。当时皇帝觉得提议太极端，所以没有采纳。

但李纲被罢黜没有多久，在全国设立四大区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个提议也带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这是在帝国内部（不是边境）建立“节度使”制度。宋朝一直防范官员尾大不掉，采取这种做法，也说明是无奈之举。

只可惜，这个制度实行太晚，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反而是南宋初期各大将领们为了抵御金军，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个制度，才使得岳飞等将领有了足够的权力组织战斗，将金军赶离了南方地区。

这样看，这个制度是有威力的。当然，一旦金军撤走，宋高宗立刻想办法削弱将领们的权力，更不惜杀死岳飞求和，这也与宋朝一脉相承的对官僚制约、防止他们尾大不掉的政策有关。

北宋的制度变革正在进行中，金人的进攻也在继续。

十月初五，金军攻陷了真定府，吉州防御使、本路兵马都钤辖刘翊战死，[17]这是金军的东路军获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真定府位于河北平原的西端，接近太行山脉，距离太行山道的紫荆关通道和井陉通道都不算远，这里城池坚固，粮草众多，只要长期守卫住这里，就可以防止金人的两路取得联系，又可以牵制敌人的东路军。

当初马扩向童贯提出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守好真定。马扩离开童贯后，还跑到真定参与防守，却与真定的守将刘韐发生了矛盾，差一点被当作间谍杀死。[18]

刘韐虽与马扩有些矛盾，但在守城上却是一员悍将。刘韐手下有总管王渊、钤辖李质，三人的合作坚不可摧，将真定打造成了华北地区的坚固堡垒。[19]半年多以前斡离不第一次进攻时，就绕过了真定南下进攻汴京，如果宋钦宗不是那么渴望和谈，而是派遣勤王军进攻斡离不，真定一定会成为敌人后方的一枚钉子，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但宋钦宗

的软弱最终让金人安然撤离。

到了太原围城时期，由于皇帝无将可用，任命李纲接替种师道的同时，也把刘韐调走担任李纲的副帅。刘韐把他的两个得力下属也带走了，真定交给了一个叫作李邈的人，李邈的副手就是刘翊。

金人第二次出兵时，斡离不首先攻打广信军和保州，都没有攻下。斡离不于是绕过了这两座城，继续南下，越过中山攻打真定。金军最初攻打北城墙，被刘翊击退，于是又移到东城墙攻打了两天，还是不能攻下。夜里，金军将军队和攻城器械偷偷移回到北城墙，乘守军不注意，一拥而上。刘翊自杀身亡，李邈被捕。

斡离不抓住李邈后，并不打算杀他，金人有使用降将的传统。金人让他给斡离不下跪，他拒绝了，赐酒他也不喝。但斡离不一直对他很尊重。由于李邈拒绝跟随金军南下，斡离不把他送到了北方的燕京。[20]负责燕京的辽国降将刘彦宗已经成了高官，刘彦宗劝说李邈顺从金国，又想给李邈按照金人的方式剃头发。李邈干脆剃了个光头表示要当和尚。刘彦宗见李邈不会投降，只好上报了另一位元帅粘罕，粘罕命令将李邈杀掉了。[21]

在斡离不攻克真定时，粘罕的西路军更是取得了重大突破。

得到太原后，接下来是汾州。[22]汾州本来就粮食短缺，兵力疲弱，知州张克戩尽力守城。朝廷派遣了两支援军从隆德府和平阳府两个方向驰援汾州。但援兵还没有到，汾州就在十月初十陷落。[23]张克戩南向焚香遥拜，引刀自杀，一家死者十八口。

汾州陷落后，金军继续沿着汾河谷地南下，接下来要攻打的就是平阳府了。按照估计，平阳府的北面有一道山岭，叫作回牛岭，这道岭将临汾盆地和太原盆地分开，如同一道墙壁一般笔直而上，是最佳防守据点。朝廷派遣了一位叫作刘琬的人防守回牛岭。但同样是因为军粮不足，回牛岭的守军每天只有两升豌豆或者陈麦，士兵们私下里抱怨

说："就这两升麦子就想让我们卖命？"[24]

金军来到后，看到回牛岭的地势，感慨如果对方准备足够的弓箭和石头，这怎么能攻打下来。不想金军一到，回牛岭的宋军自动溃散，于是金军乘胜追击。

身在平阳府的刘琬一听回牛岭丢了，连忙逃走，平阳府也丢了。

金军除了向南进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通两路军队之间的联系。两路军之间隔着太行山，只有几条孔道可供交通之用。最好的孔道是位于真定和太原之间的井陉，由于真定和太原都已经被金军占领，只要打通了井陉通道，两军之间就可以沟通，避免一年前那次进攻出现过的不协调。

为了打通井陉，粘罕从西面的太原首先进攻寿阳，在寿阳他受到了激烈的抵抗，暂时无法攻克，于是移兵到东面的平定军继续攻城，不想平定军也不投降，粘罕自己竟然打不下来，只好等东面的斡离不出兵，两方夹击才攻克了平定，打通了井陉。

这几个地方虽然看上去不大，却让金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比如，金军在攻打寿阳时，虽然城市很小，但由于守军的死守，粘罕竟然损失了上万人。粘罕攻打平定时损失了三千人马，与斡离不合围平定，又损失了两三万人。

小小的寿阳和平定竟然成了金军损兵折将最厉害的地方，这件事引起了金军的反思。他们在内部也有过一次讨论：到底是扫平山西、河北重要，还是先进攻首都汴京重要？

右监军兀室认为，既然已经获得了太原和真定两大重镇，就应该乘机先扫平河北和山西（合称两河地区），然后再进攻汴京。如果不扫平两河，万一攻打汴京不力，两河也都保不住。上次斡离不打到汴京，进不去，反而失去了河北，就是这个道理。

但粘罕认为汴京是天下的根本，得不到汴京，两河怎么都不可守，因此应该尽快进攻汴京。他舒展右手做抓东西状，举了个例子，说："这就像运臂力取物，先抓住汴京，再往回一捞，就把两河也抓住了。"[25]

经过讨论，粘罕的策略得以采纳，于是金军加紧向南进攻，将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一拿下，距离黄河已经是一步之遥。

攻克隆德府是在十月十七。[26]隆德府曾经在这年春天被粘罕攻克，后来被北宋收复。这一次，为了加快速度，粘罕并不想耗费太多的精力在隆德府，他兵临城下，让守城方派人出来谈判。通判李谔出城，粘罕告诉李谔说："我去攻打赵皇帝，这次就不攻你的城了，回去派人贡献点犒军的酒肉马料来，我们就乘夜赶路。"

李谔同意了粘罕的条件，回到了城里和众人商量。知府张有极招来了百姓代表，没想到代表们却反对这样做，表示如果犒军，就跟拜降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更愿意抵抗金军。第二天一早粘罕又喊话要求李谔履行协议，被守城的人骂了回去。李谔试图劝说众人不要这样，却被砍伤了面部。

粘罕当即下令攻城，当日城陷，金军入城烧杀掳掠一番，乘兴继续前进。

他们继续攻克了泽州，泽州之南就是太行山通道，也就是天井关的所在地，出了天井关，就下太行。翻过太行山，就到了黄河岸边，渡河既可以去洛阳，也可以下开封了。

康王单飞

十一月初八，宋钦宗在延和殿主持了一次考试。考试的参加者是帝国最高级的文武官员，一百多人，每人发了纸笔要求笔试作答，题目

是，到底要不要交割三镇？

这次考试的背景是，出使金国的李若水等人回来了，带回的消息并不好，金人不同意只收赋税免除交割土地，坚决要求土地交割三镇。与此同时，太原和真定（属于中山）都已经被金军占领了，即便抵制交割，也必须从金人手中夺回来。

考试结束，根据统计，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应该交割，剩下以范宗尹为首的七十人赞同交割。双方的理由都很明确，一边认为是祖宗之地不可丢，另一边则强调眼前形势。[27]

虽然人少，但在何㮚等人的坚持下，宋钦宗决定不交割三镇，任事态自由发展。随后唐恪请求皇帝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偷偷逃到西京去，前往陕西等地避难，将太子留下守城。宋钦宗没有学他父亲逃走，决定以死捍卫社稷。这一次，就连退休的宋徽宗也没有离开，由于离政权中心较远，宋徽宗已经失去了当初灵敏的嗅觉，也没有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只能随儿子留在京城。

但宋钦宗的放任策略并不能阻止事态的恶化。十一月十二，粘罕的西路军经过山西来到了黄河北岸。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与之隔河对垒。[28]另外，还有签书李回率领的一万人巡视黄河。[29]

金军派出了数十骑兵前来探查，探子们发现黄河南岸有大量的宋军，连忙回报说，由于宋军有准备，很难短时间内渡河。

金军统帅完颜娄室却认为宋军虽多，但不一定非需要打仗才能定胜负。他决定采取威慑战略，通宵达旦地在北岸敲击战鼓，敲了一晚上，第二天再派人去探查时，发现南岸的宋军已经彻底消失了。

十一月十三，金军西路军渡河完毕，才发现原来不仅是黄河岸边的兵逃走了，就连守城的兵都没了踪迹。最大的逃兵是北宋的西道总管王襄（驻地在洛阳），这位被皇帝赋予极大权力，号称守卫全国四分之一

土地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守城，反而逃走了。另外，在黄河北岸最重要的防御城市是河阳城，这座城就在黄河边，守将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就这样，金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阳和西京洛阳。几天前，唐恪劝说宋钦宗经过洛阳逃往陕西，现在这条路已经被断掉了，就算皇帝想逃，也只能向南逃走。

几乎与西路军同时，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也在寻找渡河地点。最初他屯兵庆源府城下，庆源府的都统叫王渊，王渊手下有一位叫作韩世忠的统制官，王渊派遣韩世忠从西北门出去袭击敌人，杀死了数百人。[30]这是韩世忠脱颖而出的一次战斗。

斡离不绕过庆源府向南移动，宣抚使范讷率领五万兵马驻守滑州和浚州，斡离不看到宋军有防备，于是从恩州（现河北省清河县）经过古榆渡前往大名府，从李固渡这个渡口过了黄河。[31]渡河时，金军甚至找了一船官伎，在月下奏乐鼓励士兵。[32]

十一月十四，皇帝收到了金军两路大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曾经坚定的心又动摇了。他决定派遣康王出使斡离不军，这一次不再矜持，许诺割让三镇，并给金国皇帝上尊号。

由于康王出行需要时间来准备，皇帝害怕夜长梦多，先派遣李若水、王云、马识远等人前往粘罕军前报信，将情况尽快说明。李若水更是比其他人早出发。

李若水马不停蹄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怀州，遇到了金人大军。金人派遣萧庆、刘思接待他。他告诉对方，皇帝已经同意割让三镇，负责交割的工部侍郎王云、武功大夫马识远已经在路上了，他是先来报信的。

当天，粘罕接见李若水，责备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得知王云还有几天就到，表示让李若水安心等几天，并让人送来了羊肉和酒。一切看上去还有转圜的余地。

但第二天，粘罕再次见到李若水时，情况出现了变化。他告诉李若

水，已经派出使者去往宋廷，这一次不是要求割让三镇，而是要求北宋必须把河北、山西全境割让给金国，双方以黄河为界，签订新的条约。[33]

李若水还在争取以交割三镇为限，但谈话间，突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割地使王云到达磁州时，当地百姓把他当作奸臣打死了！

关于王云如何被杀，情况是这样的。

其实李若水前脚离开首都，第二天（十一月十五）金人的使者就已经到了汴京。他们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割三镇，而是以黄河为界了。[34]这说明粘罕是早在李若水到达金军营地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见到皇帝时，使者王汭也大言不惭，直指北宋朝廷是“奸臣附暗主”。皇帝吓怕了，想答应割让河北、山西，但遭到了何㮚等人的反对，朝廷商议过后，决定继续派康王前往金军营地谈判，仍然以交割三镇为条件。

陪伴康王的人包括王云、耿延禧、高世则等，所以，王云不是像李若水说的那样前往粘罕军交割，而是与康王一起前往斡离不军。

王云十月刚出使金国归来，他回程时曾经到过真定府战场。当时斡离不让他观看了攻克真定的整个过程，他印象深刻。

十一月十六，王云和康王离开首都时，回望着首都的楼橹，告诉康王：“汴京的楼橹天下所无，但当初真定的城墙比首都的还高一倍，金军让我观看他们攻城，不过一会儿工夫就攻克了，所以，楼橹再高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

康王没有回答。

康王等人离开时，百姓阻塞了道路，希望他们留下，用武力守城。但他们还是出发了。一行人离开后，京城大部分城门都关闭了，只留下

了东水门和南墙东面的陈州门。[35]

十一月十七，康王到达滑州；十一月十八，到达浚州；十一月十九，到达相州。在康王的背后，跟着粘罕的四百铁骑，他们从怀州过来要抓北宋的使团。金军骑兵碰到当地人，当地人都说康王已经走远了，追不上。金军不死心，继续追，问了几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回答，这才悻悻而归。[36]

十一月二十，康王到达磁州。[37]磁州和相州与王云有些渊源。当王云十月份从金军营地返回时，路过这两个州，与守将谈到，金军这次进攻比起上次还要凶残，必须尽快做好准备。他劝两城守将赶快坚壁清野。所谓坚壁清野，就是将城外的百姓和粮草全部带入城中，关闭城门，进行坚决抵抗。

王云的策略起到了作用，金军听说磁州和相州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就绕过了磁州和相州，选择别的路前往汴京。[38]但百姓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愿意清野，因为这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家，带着细软逃难。其次，由于金人绕道走了，百姓反而认为不离开家也没事，王云的清野只起到了骚扰民众的作用。于是王云成了百姓眼中的恶人。

磁州知州是一位叫作宗泽的老将。作为主战派官员，他一刻也没有放松战备。为了节省朝廷调拨的军粮，他在磁州组织民兵，平常耕地种田，积攒粮食，打仗时将人召集起来就可以上战场。宗泽给康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试图阻止康王继续北上，认为当初肃王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不希望康王步其后尘。

康王犹豫不决时，宗泽提议他到当地一处名胜古迹去占一卦，磁州有一个崔府君祠（也叫嘉应侯庙），纪念的是东汉人崔子玉。在去往崔府君祠的路上，百姓们又开始阻拦道路，希望康王不要北行去见金军。

王云告诉百姓，康王不是北行，只是去拜庙。在康王一行中，由于王云比较活跃，这就与百姓发生了冲突。同行的人（包括宗泽）都劝他

小心一点，不要过于抛头露面。这时，突然有人认出了王云，开始纷纷传言：这就是当初要求清野的人，他一定是奸细。

在庙里，宗泽听到了外面的喧嚣，他请求王云跟随他，不要单独行动，但王云认为自己是朝廷官员，不会有事。

从庙里出来，他们发现有人已经把王云的马偷走了，只好给他临时调了一匹低级官员的马。王云与耿延禧、高世则等人先后骑行。

再到后来，事情更失控了，道旁有的百姓身带刀子，他们拉住康王的随从，挨个儿问谁是王尚书。等问到王云时，知道他就是王尚书后把他拖下马来直接杀死了。

由于民情过于汹涌，康王知道王云死了，却也不敢指责民众，只好听之任之。百姓们杀掉了王云还不满足，继续拦住康王，告诉他几十里外已被金军占领，如果再前进，就回不来了。

康王率众回到了磁州。进了城，事态才恢复控制。宗泽将一位闹事的头领斩首，平定了这场骚乱。[39]而百姓的苦苦哀求让康王更加犹豫了。

与此同时，相州知州汪伯彦也来了消息，告诉康王他走后金军在背后追击，试图截获他。[40]到这时，康王才进行了综合判断，认定继续前进已经意义不大，除了当俘虏之外，谈判已经不可能了。

当天夜里，康王和随从从磁州出发，换了一条路，没有惊动任何人，向南回到了相州。随后康王写信汇报给皇帝，解释了不再北行的理由，等候皇帝裁示。[41]这个决定让金国少了一个普通的亲王俘虏，却让南宋多了一个开国皇帝。

在相州，康王碰到了一位叫作岳飞的人。岳飞家就在相州汤阴，他出身寒微却胸怀大志，文可读《左传》《孙吴兵法》，武可以挽硬弓，曾经跟随刘韐在真定抵抗，现在又投在了康王名下，成了日后一名重要

战将。

也正是在相州，康王逐渐拥有了独立性，变成一个抵抗金军的领袖。

第二次围城

十一月二十一，金国使节杨天吉、王汭、撒卢母再次来到了皇帝的宫廷，要求以黄河为界重新划定两国疆界。[42]宋钦宗终于吓怕了，没了别的选择，只好仓促答应下来。

但接下来，双方在到底谁当割地使的问题上发生了剧烈争执。金国使节认为，上一次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派遣了张邦昌和路允迪作为割地使，前往三镇通知交割，但这两人级别不够，他们的官阶都是临时提拔的，没有足够的威望，到了城外喊不开门，守将也不听从。他们希望这一次皇帝一定要派更加亲信的人，喊得开门才行。

但对北宋官员来说，不是谁够有威望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当使者。使者已经成了一项高危职业，特别这次出使必定留下千古骂名。事后，人们不会记得是宋钦宗被迫割让黄河以北土地，只会记得是谁充当了割地使，当了金人的帮凶。几乎整个官僚系统中的官员都不愿意出面。

唯一愿意接受任务的是陈过庭，他认为“主忧臣辱”，既然事已至此，就只好面对。其余重臣中，唐恪、冯澥不说话，耿南仲表示自己太老了，不能承受舟车之劳，聂昌以养亲为借口推辞。

皇帝下令奖赏忠贞的陈过庭，赏赐他不用当割地使，而是派遣聂昌和耿南仲两人前往。在朝廷中，耿南仲是最大的主和派之一，几乎破坏了主战派的所有努力，此时皇帝派他前往，也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奖赏。[43]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趟非常危险的行程。由于社会底层对皇帝和金军的怨恨已经爆发出来，想要交割黄河以北，不管是什么样的亲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耿南仲跟随金人王汭北上，主持在河北地区的交割，但到达卫州时，当地人要把金国使节杀掉，王汭连忙逃走，耿南仲也跟着逃脱了。耿南仲逃到了康王所在的相州，避免了死亡的命运。

聂昌就没有这么走运了。闰十一月十五[44]，聂昌来到了绛州城下，要求守城官军投降，向金人交割城池，被拒绝了。聂昌拿着诏书坐在筐里登上了城墙，向官军展示诏书，表示自己是真的割地使。钤辖赵子清毫不犹豫杀掉聂昌，挖掉他的眼睛，将他煮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四，北宋首都汴京迎来了第二次围城危机，金国东路军元帅斡离不率领兵马在一年之内再次来到了开封城下。

数天前的十一月十五[45]，根据梅执礼的建议，宋钦宗已经下达了清野诏书，他甚至专门任命梅执礼担任河东、北京、京畿清野使。根据诏书命令，几个地区的人民都拖家带口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北宋一时人心惶惶，还有人趁火打劫，发生了不少抢劫事件，官方捕杀了三百多人，才恢复了一点秩序。后来清野进行到十一月十九，宋钦宗突然又取消了清野诏，这一来一回之间，金军已经来到了。[46]

而在十一月十七，传闻金军侦察兵已经渡河了，执政大臣们都不敢相信，于是殿前司派出一个叫作马纲的人前去侦察。十一月十九夜间二更，马纲回报金人果然渡河了，可是大臣们仍然不敢相信，又派出使臣刘词带领三百兵马从封丘门出去探查。十一月二十，刘词派人回报：他们到达陈桥（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所在）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证明敌人真的来到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汴京城外一个叫作刘家寺的地方还放着五百多

门大炮，没有收入城中。[47]按照朝廷的规划，原本要在秋天举行一次大阅兵，阅兵的场所就在城东北五里的刘家寺。皇帝派人往刘家寺运送了大量的炮，等待阅兵时使用。[48]

金军来了，阅兵自然举行不成，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始为这些炮到底该谁负责而吵架。既然是大炮，就该由兵部负责，可是兵部说，大炮属于枢密院，应该由枢密院负责运入城内。枢密院又说，炮不属于我，但它自有所属。原来这些炮不是由外廷运过去的，而是由属于皇帝内廷一个叫作军器监的衙门运过去的；这个衙门的主管官员刚刚因罪去职，群龙无首，就没有人管炮的事儿了。

既然没人管，总要分配一个衙门负责。于是想让掌管守御的京城所收炮，京城所却推给了兵部下属的驾部，驾部又推给了同属于兵部的库部。库部还没有来得及推脱，金人已经到了城下。

北宋官员众多，其实有许多官员愿意做事，但由于制度的制约，许多人闲着帮不上忙，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幕幕荒谬场景出现。其中有的人痛心疾首，有的人只是以看热闹的心态调侃着这架笨拙的官僚机器。比如，著作郎胡处晦就干脆写了一首长诗嘲讽这种乱象，引得人们纷纷传唱：[49]

> 天边客子未归来，玉关九门何窄塞。大臣裂地过沙场，铁骑凭河又驰突。官呼点兵催上门，居民哀哀闾巷奔。请和讳战坐受缚，乌用仓促徒纷纷。黄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树长险难恃；官军观望敌如烟，筏上胡儿履平地。大臣持禄坐庙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儿笑呼一弹指，公卿状如鹿与獐。明明大汉亦有臣，谁谓举国空无人。贾生绝口休长恸，用者不才才不用。

十一月二十四，斡离不的东路大军再次来到。他们原本还会驻扎在去年的驻地牟驼冈，但自从他们离开后，皇帝派人掘开了汴河，将牟驼冈四周淹没成了烂泥地。金军只好另外寻找地方。正好刘家寺有许多大炮，斡离不把刘家寺当作他的指挥中心，将大炮尽数占有，并掉转炮口，对准了城内。[50]

斡离不来到时，北宋汴京城的防卫到底准备得怎样了呢？

种师道接替了李纲，他听说太原和真定都已经丢失，建议皇帝经过西京到长安去避难，被拒绝后，他向位于邓州的南道总管，以及位于长安的陕西制置司发出了勤王令，让他们尽快赶到汴京。

但种师道随后就死了。之后，主张和平的唐恪、耿南仲、聂昌等人认为，既然要议和，就必须表现出诚意，如果军队太多，只会激怒金人。再说，如果几十万军队都跑到首都，到底怎么供养他们都是大问题。当时，军队的哗变已经屡见不鲜，比如滑州本来是个坚固的城市，连金人都选择暂时避开，却因为哗变，守将被杀死了。[51]

本来，南道总管张叔夜和山西制置司钱盖已经召集兵马在路上了，又被聂昌等人拦了回去。张叔夜的军队回到了房州、安州、复州等地，陕西军马更是回到了遥远的秦凤路和熙河路。等金人真的来到时，汴京周围几乎看不到勤王军马的身影。

好在张叔夜是个聪明人，宋钦宗一看不好，传给他一个手札，他立刻搜集了三万人又赶来了。他赶在金军扎营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二到达了汴京，一路上还与遇到的敌人交战，歼灭了数百人。[52]张叔夜从南薰门进入首都，参与了汴京保卫战。

此外，位于长安的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范致虚也派兵勤王。由于事发突然，他派前锋部队先行，并抽出另一军去保卫先帝的陵墓，自己也在赶来。

除了这两支军队之外，剩下的就要靠首都原来的防御力量了。但是，与金人在北方交战的过程中，首都的卫戍部队大部分已经被派到河北和山西的前线，且被金军击溃了，剩下的军队人数不仅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这些兵马满打满算也只有不到七万人，大部分是弓手。[53]

负责防御的殿前司只好将这七万人分成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分出一万人作为预备队，这一万人又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其中前军驻扎在

顺天门（西城墙靠南的城门），左军、中军驻扎在五岳观（在南城墙内东侧，南薰门和陈州门之间），这三军由姚友仲统领；右军驻扎上清宫（内城旧宋门内），后军驻扎封丘门（北城墙东数第二门），由辛康宗统领。

第二部分，剩下的五万七千人负责守卫城墙，分属于四壁守御。其中东壁守御孙觌，西壁守御安扶，南壁守御李擢[54]，北壁守御邵溥[55]。

在任命官员时，皇帝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宋朝特色。四壁守御官任命完毕，他又任命了总体负责的官员，其中孙傅担任都提举，是总负责人，王宗濋担任副职的都统制，刘延庆、范琼两人则负责协调四壁守御。

三天后，皇帝又任命四壁提举官四人，担任四壁守御的副手。东壁提举辛永宗，南壁提举高材[56]，西壁提举张扬，北壁提举刘衍。又设立了守御司，孙傅改为守御使，王宗濋为守御副使，郭仲荀、卢益为提举守御司十办公事，也就是守御司的办事员。

这官制已经够复杂了，但皇帝还嫌不够，又任命刘延庆为提举四壁，刘韐是他的副手。于是又加了一层官职。但这还不够，每壁又从文武官员或者宗室中选择一人作为同提举，每一个城门从宗室中选择一人担任司启闭，可以称为门插官。另外，每个门又有不知道多少弹压统制，以防止出现的混乱。

有人以南城墙为例，统计过能够对南城墙进行指挥的宋朝官员，[57]其中掌管四壁的都守御是孙傅，提举有李擢、郭仲荀、乔师中，统制有王燮、姚友仲，统制官有高材、范琼、何庆彦、石可宝、李湜，其余临时派遣的统制、统领官不下十几个。每一个统制下有三四个使臣、四五十个效用。每一个使臣每天的工资是八百文到一贯，效用三百文到五百文，充斥着官员的门生故吏。还有来镀金的朝廷权贵及内侍

们，不参与打仗，却参与抢功。

官员多了，士兵太少显然是不行的。除了正规军，朝廷又招募了不少杂牌军。京城里应试的武举人、太学生里的主战派，都被皇帝临时授予官职参与守城。士兵则是从城内平民中选择，找那些习过武的，编入部队，派往前线。

金军到来后还没有开始进攻，汴京城内反倒先乱作一团。十一月二十五，京城的十一个城门，包括南薰门、陈水门、固子门、万胜门、西水门、封丘门等，都燃起了熊熊大火。[58]到底是谁纵火，已经无法查证了，很可能是城内趁火打劫的人。

大火发生后，引起了城内官员的恐慌，于是一场大规模搜捕奸细的运动就此展开。同时朝廷禁止百姓登城，搜捕时也连累了不少无辜。[59]这场搜捕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一批勇武的群氓将太尉辛康宗杀掉。直到将为首的五人抓起来腰斩了，才平定了民乱。由于军队不够，皇帝还得借助这些人的帮助，只好又废除了百姓不许上城的命令，同时又开始招募那些市井闲人参军。

招募市井人士的职责交给了两个宰执级官员。其中宰相何㮚负责招募各种奇门遁甲人士，建立了一支叫作“奇兵”的部队；枢密院孙傅招募忠义人士。在他们的招募下，大量的商人、无业游民、能人异士都加入了宋军。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叫作郭京，他声称可以撒豆成兵，遁形。他投入到何㮚帐下，引得人们一片欢呼，仿佛看到了救星。

到了十一月二十七，金军发动了第一次袭击，攻击的地点是东城墙的汴河下水门通津门（也叫东水门）。[60]在第一次汴京保卫战时，金军由于驻扎在西北方，所以主攻点放在了北城墙和西城墙，这两个地点没有太多薄弱环节。守军最怕的是东城墙，这里的新宋门外有一个叫作樊家冈的地方，护城河比较狭窄，是城防最薄弱的地方。但第一次汴京保卫战金军放过了东城墙，对南城墙也没有太多骚扰，甚至南城墙的城

门一直在开放，人们还可以进进出出。

第二次汴京保卫战，由于斡离不驻扎在了东北方，他第一次攻城就选在了东城墙，这就让城内官员更恐慌了。

不过第一次进攻并没有取得进展，范琼击退了敌军，焚烧了金军的营地，进攻暂时被搁置了。

闰十一月初一，金军再次攻打广济河的下水门善利门，统制姚友仲率领一千五百神臂弓前去援助，再次将金军击退。[61]

到这时，虽然进攻地点有变化，但金军的进攻和宋人的防守仍然是按照第一次围城战的套路进行，只要皇帝下决心防御，汴京围城战仍然有可能以城门坚守和勤王军的到来为结局。

但就在这时，一个与第一次战争完全不同的因素出现了，并且将成为决定整个战争走向的关键，它不仅使得宋军守城的难度加大，也让宋钦宗和他的大臣们从心理上彻底崩溃：粘罕的西路军到来了。

【注释】

[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八十四篇。

[2] 《三朝北盟会编》定于四月十五。

[3]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 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

[5]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6] 参考《靖康要录》。

[7]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封有功《编年》。

[8]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9] 参考《靖康要录》。

[10]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八十七篇。

[11] 参考《中兴遗史辑校》。

[12]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1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4] 参考《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

[15] 参考《宋史·钦宗纪》。

[1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参考《茅斋自叙》。

[19]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赵子砥《燕云录》。

[21] 张汇《金虏节要》。

[22]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2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9]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0]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2] 参考《宗忠简公遗事》。

[33] 参考《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

[3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5] 参考《靖康要录》。

[3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7]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注明是十一月二十一。

[38]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9] 参考《宗忠简公遗事》。该书还说他们检索王云的包裹，发现了他通敌的证据。未可

信。

[4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2]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3]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4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45] 参考《靖康纪闻》。

[4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7] 参考《中兴遗史辑校》。

[48] 参考《靖康要录》。

[49] 参考《靖康纪闻》。

[50] 参考《靖康要录》。

[5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5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5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54] 参考《靖康纪闻》作李擢。

[55]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56] 参考《靖康纪闻》作高特。

[57] 《靖康纪闻》，有的官职与上文不合，表明宋朝人也分不清这些官职。

[58] 根据《瓮中人语》与《靖康要录》。

[59] 参考《靖康纪闻》。

[6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61] 参考《靖康要录》《宋史·钦宗纪》《瓮中人语》。

第十二章
汴京失陷

合围

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初二，粘罕的军队一面向北京首都汴京奔来，一面对黄河北岸的怀州展开了最后的攻击。

怀州的北方就是莽莽太行山，这里是联结山西与河南的要道，只要怀州不拿下，金军在西路就无法获得完全的控制权。

怀州的知州叫霍安国，在他的领导下，宋军成功地阻挡了金军的进攻。两路金军本来约好在汴京会师，粘罕却比斡离不晚到了近十天，主要就是怀州守军的缘故。但随着金军攻势的加强，怀州岌岌可危，被攻克是旦夕之间的事。

危急关头，霍安国除了想到防守，还想如何以攻为守，不坐以待毙。他找到了部将范仲熊[1]，请求他于当晚率领两百余精锐之士从城墙上吊下去，袭击金人的营寨。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金人的帐篷要放火烧掉，制造混乱；第二，要毁掉金人的大炮。与一年前相比，金人此次进攻最大的改变是对于大炮和攻城器械的运用，它们让宋朝的守军吃尽了苦头。只要将金军的炮处理掉，怀州就能多撑一段时间。

夜间，范仲熊率军下城，发现对方人数实在太多，想不惊动他们实在困难。直到夜里三更结束，才摸到了炮座，他派了十几个人放火，希望这场火能引起对方的混乱，好继续劫营。

但不幸的是，金军并没有出现混乱，而是将劫营的人围住了。于是

偷袭变成了白刃战，宋军勇士们边杀边寻找出路。到了天亮时，他们集结到城下，重新被吊入城内，去时两百多人，回来时只有二十四人。

这一天白天，突然有人喊："东南方向来救兵了！"据说，东南方出现了宋军的白色旗帜，霍安国立刻让范仲熊整理军马，准备开北门迎接援军。但就在这时金人却突然加紧了进攻，一瞬间已经上了城墙，将金军的黑旗插在了城楼上。怀州就这样失守了。

来救援的白旗部队并不是宋军的正规军，他们没有进城，而是眼看城丢了，也就慢慢散去了。

范仲熊与金军展开了巷战，最终被俘。他被押到了金军将领骨舍郎君的面前。与人们传说的青面獠牙的金军不同，范仲熊在被俘后的遭遇恰恰反映了金军战术素养的另一面。

骨舍首先责备范仲熊不懂得顺应潮流，但他很佩服范仲熊的英勇。范仲熊一心求死，可骨舍就是不杀他，还许诺饶他一命。骨舍还嘲讽说："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不像你们宋人说话没有信誉，既然饶了你命，就是饶了你命。"

他让范仲熊回去寻找知州霍安国，好一起见粘罕元帅。范仲熊被押着在城市里转悠，去了州衙，又到了城北，都没有找到霍安国，于是又回到了骨舍处。在这里他见到了泽州的一群降将。比起怀州，泽州更早被攻克，这些人投降后成了金人的座上宾客。不久范仲熊得到消息，霍安国也被抓到了。

第二天，金人押解范仲熊等人出了南城门，走了两三里，就来到了粘罕的营帐。粘罕坐在银交椅上，让怀州官员站在他的面前。知州、通判、钤辖、都监、部队将领站在第一行，第二行是外来支援的鼎澧路的部队将领，第三行是州官，第四行是监官，第五行是县官。

粘罕问众人，到底谁不肯投降？霍安国应声而出表示不降，第一行的人也都不肯投降。粘罕让他们面向东北拜金国皇帝，他们也不肯拜，

于是这些人被脱去衣服绑了起来。

第二行鼎澧路的将士为了活命，立刻检举说范仲熊是主要抵抗者，于是范仲熊和一个县官张行中也被拖了出来绑好。

其余的人由于官小，都释放了事，连投降都不用。可见金军并没有滥杀。

那些绑起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粘罕下令将他们杀掉。

就在行刑前，粘罕突然看到范仲熊没有一丝慌张，连忙问他怎么回事。范仲熊将前一天骨舍郎君饶他一命时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特别强调“金人说话一句是一句”。粘罕听了笑起来，道声“不敢当”，就下令将范仲熊释放。其余的人，包括知州霍安国、济州防御使兵马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 、都监张谌、都监于潜、鼎澧路兵马钤辖沈敦、同统领鼎澧路兵马张行中，以及南道部队将五人，一同遇害。

从宋军的回忆录可以看出，金军并没有滥杀无辜，只是惩罚了一小批抵抗最坚决的人。粘罕作为金军中最觊觎北宋领土的统帅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不会滥杀。

但在战争中，的确无法避免基层士兵的滥杀行为，特别是金军依靠抢劫来获得财富，如果不抢，打仗就成了没有收获的事。对落后文明的军队而言，都必须经历从劫掠制变成俸禄制的过程。可是一旦完成了俸禄制的转型，军队最勇猛的时期也就过去了。

闰十一月初二[2]，粘罕的前军已经到汴京城下。十一月初三，这支部队在寻找安营扎寨的地点。

粘罕并没有与斡离不合兵，而是找了另一个地方独自屯驻。斡离不的刘家寺在城市的东北方，粘罕就选择了城市南方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所谓青城，是宋代的斋宫。在明清两代的北京，京师城南有天坛用

于祭天，城北有地坛用于祭地，宋代也有类似于天坛和地坛的地点——郊坛。郊坛附设有皇帝斋戒的场所，这个场所就叫作青城。在汴京城南五里左右的叫作南青城（在南薰门外），用于祭天斋戒，城北的叫作北青城（在封丘门外），用于祭地斋戒。

青城最初的制式很简单，由于宋初提倡简朴，只是用布围起来的一个小丘。宋徽宗时代，朝廷变得更加奢侈，才建造了永久性建筑与防卫系统。[3]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人李祯曾经写过一首《青城怀古》进行嘲讽，认为奢侈换来的只是耻辱，反而宋初的简洁维持了安宁。诗写道：[4]

> 炎宋尚简质，郊丘布为墙。九门谨阖辟，万卒严周防。暂置弗劳杵，权施岂须隍。绵延逮宣政，骄盈更典章。版筑易缕制，墉壕固金汤。衮龙狩沙碛，泥马奔钱塘。奢侈谅宜戒，播辱尤所伤。陶匏荐明水，维馨仰前王。

在宋代，青城与艮岳都属于“大梁十迹”[5]。祭祀时非常热闹，首先皇帝坐玉辂到青城斋戒，骑兵围在斋宫外，士兵们紫巾绯衣素队有千余人，在外面环列，每一支军队配备一支乐队。负责巡逻的是行宫巡检。第二天，皇帝从青城出发前往郊坛，郊坛在青城西面一里左右，有三重围墙。从外墙东门进入，到第二重墙西南设一个大的遮幕（宋人叫幕次），叫作“大次”，皇帝在这里换祭服，戴二十四坠的平天冠，着青衮龙服，佩玉佩。到了坛前，又有一个小幕殿，称作“小次”，里面有皇帝的御座。

“小次”后面就是祭坛，坛高三层，共七十二级台阶。坛面方圆三丈左右，有四条踏道。坛上主祭的是昊天上帝和太祖皇帝。在道士、音乐、歌舞的陪伴下，皇帝三次登坛祭拜，然后结束。[6]

西路军到来后，看上的就是这个皇帝祭祀斋戒的场所，将其作为指挥部。

粘罕选择青城，使得汴京的形势更加复杂。第一次围城战时，金军

只在西北驻扎，即便战争时期，汴京城的东南城门还是可以开放的，金军并没有达到完全围困的目的。但这一次粘罕驻扎南面的青城后，两路金军一南一北控制了汴京的通道，进出城就困难了。

事实上，对于汴京而言，南方通道比北方通道更加重要。汴京的东南方是汴河流出的地方，也是漕粮进出的关键水道，这里也是城市防守最薄弱的环节。上一次斡离不没有利用这个薄弱点，这一次两路大军并进，就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粘罕到来后，金军的准备工作加速。上一次围城战缺乏攻城器械，斡离不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一次他们在太原等围攻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不仅带来了军队，还一路上劫掠了不少百姓，逼迫他们跟随着做工程。从斡离不到来的那一刻起，金军就不断地准备攻城器械，特别是炮架和鹅车。[7]

另外，他们采取了进攻太原时摸索出的封锁技术，除了刘家寺和青城两个大寨之外，还在四面城墙外临河的位置扎了很多小寨，如同一条锁链将城市封闭了。

金军封锁了首都，汴京城里从士兵到普通百姓都感到紧张。皇帝必须做出一定的姿态来鼓舞士气。在第一次围城战中，李纲不断地请求皇帝到城墙上鼓舞士气和犒赏士兵，这一次李纲虽然不在了，但皇帝还是想和上次一样登城督战。于是，从十一月二十九，到闰十一月初三，这四天皇帝分别来到了汴京城的东、南、西、北城墙上犒军。每到一处，除了慰劳将士，还许诺升职，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慰劳时，皇帝穿上了铠甲，健步如飞，只让几名内侍跟随，没有带卫队。他显得很坦率，不避讳自己的担心，将士们也感同身受，对他充满了同情。他不进御膳，和士兵吃一样的食物。皇后和宫人亲自用私房钱做了衣被，让他送给将士们，这让士兵们感极而泣。

凑巧的是，这四天都下雪，更增加了皇帝的悲壮感。

但也有士兵在给皇帝添乱，比如，宰相何㮚招募的“奇兵”。所谓奇兵，是指拥有各种异能的部队，他们由一位叫作王健的统制直接管理。这一天，金国来了一批使节，奇兵部队认为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他们将十几个金使的随从杀死，制造了一次外交纠纷。王健阻止他们时，他们连王健也一块儿打了一顿。最后，太尉王宗濋[8]只能出面将几个首恶杀掉，才平定了奇兵的骚乱。[9]

也就在这时，宋钦宗才想起了一年前抗战时的李纲。李纲虽然军事能力一般，却有着足够的激情去带动周围的人们，跟着他一起抗争。虽然他人有些敏感不好打交道，但在与主和派的争执中却一直坚持着，不肯屈服。

李纲现在在哪里？他正在从湖南前往重庆的路上，是被皇帝贬过去的。闰十一月初二[10]，皇帝发出诏书，封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匆匆派人去召回数千里之外的李纲。如果汴京城能够支撑足够久，李纲也许能够赶来帮助皇帝解忧，但前提是汴京城必须抵抗足够的时间。

攻与守的较量

从闰十一月初二开始，已经合军的金军展开了另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这次的攻击从善利门（东北水门，广济河下水门）开始，逐渐转移到通津门（东水门，汴河下水门）和宣化门（陈州门，南城墙东门），以东城墙为主，绵延至南城墙东侧。这说明金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情报，找准了汴京城的弱点。

城上守卫部队的指挥官主要是统制姚友仲、殿前太尉王宗濋以及提举四壁刘延庆。闰十一月初二，金人对善利门的进攻是被姚友仲率领神臂弓击退的；闰十一月初三，金人改攻通津门，又是姚友仲从前军里选择了一千人赶往支援，杀死了不少敌军。

从闰十一月初四到初六，金人对三个门都展开了攻击，箭发如雨，城墙如同刺猬一样处处是箭。敌人的大炮也损坏了许多楼橹建筑，形势一度非常危急。又是姚友仲想出了对策。他在敌人进攻的两个水门处构建了一道新的防线。当河流通过水门后，在城外，有两道垂直于城墙的墙面，夹着水道向外延伸了一段，这段城墙号称拐子城。金军第一次围攻汴京时，曾试图火攻水门，拐子城就起到了延伸防线的作用。这一次，姚友仲在距离城墙三十步外，将河两岸的拐子城用砖石砌在了一起，又形成了一道墙。金军如果从水门来，必须首先过了这道墙，然后进攻城墙，这就加大了难度。这实际上是把拐子城变成了一个新的瓮城。

有了这新的拐子瓮城，战斗一直持续到闰十一月初七、初八，金人在进攻水门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当姚友仲防御金军进攻时，如何以攻为守主动出击，也是守军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可以延缓敌人的进攻。出击的任务就交给了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濋。初七，王宗濋率领牙兵一千人下到了城外，与敌人交战，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统制官高师旦战死。

除了王宗濋与姚友仲之外，刘延庆也是一位颇有经验的战将。他也参与了内外城防。每到晚上，刘延庆就组织士兵向城下扔柴火，用来报警，也可以烧云梯。北宋曾经制造了一种规模巨大的炮，号称九牛炮，能够将庞大的磨盘都发射出去。宋军将九牛炮布置在东城墙上轰击金军从远方靠近的云梯，人们甚至给这门大炮封了个“护国大将军”的称号。[11]

在战斗中，北宋虽然挫败了金军的进攻，但对方还是逐渐占据了上风。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北宋军队太少，只有不到十万人，面对金军准备充分的几十万大军，即便打消耗战也打不起。第二，金军的攻城器械派上了用场。首先用上的是北宋留在刘家寺的大炮，这些大炮被金军搬到了东城墙外，数日之内，数百架大炮立在了各个城门之

外，对城内形成了极大的威胁。[12]敌人最大的炮能够释放一百斤的炮弹，射程五十步，能将城墙的楼橹击碎。[13]为了对付这类大炮，守城者在楼橹上覆盖糠布袋、湿马粪等，城墙上也加盖可以减缓冲击的覆盖层，但仍然无法完全抵御敌人大炮的威力。

另外，金军和进攻太原一样，准备了大量的火梯、云梯、编桥、撞杆、鹅车、洞子之类的器械。强攻起不到作用时，金军对攻城器械的依赖就更强了。

闰十一月初九[14]，金军首次在护城河上造桥。汴京的护城河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护龙河。金军采取的方法是：首先将木筏推入水中，浮在水面上；其次，向木筏上抛撒树枝，形成更厚的漂浮层，再在树枝上覆盖席子，席子上就可以盖土了，这样的桥叫作“叠桥”。当整段护城河都被叠桥覆盖时，金军就可以沿着叠桥直冲到城墙下。如果城墙之上的宋兵试图用炮对付叠桥，由于上面覆着厚厚的土层，炮是打不透的。[15]

一旦叠桥造好，接下来的工具就要用到火梯、云梯和编桥了。火梯是用木头搭造的梯子，与城墙上的楼橹差不多高，下面有轮子可以推行。但这个梯子却不是上人的，而是浇上油，推到城墙下，搭在城墙的楼橹上，乘机放火。由于楼橹都是木头造的，在火梯的攻击下容易被烧掉，也就损害了城墙上的战斗力。

云梯和编桥的高度与城墙差不多，也有轮子可以推行，用来协助士兵爬上城墙。

为了避开城墙上的炮弹，将士兵运送到城墙下，金军使用了洞子。洞子如同一个个尖顶窝棚，木头制造，前后裹上湿毯子、生牛皮和铁皮，大炮无法打透，也不容易着火。洞子顺序相连可以从远处一直连到城墙下，士兵就在窝棚里钻来钻去，不用暴露出来；到了城墙下，士兵可以借助云梯爬城，也可以挖地道直接进入城中。

在城内的宋军也准备了一定的器械来对付攻城者，最常用的叫作撞杆。这是一种依靠冲撞来毁坏对方器械的机械。一条大木头裹上铁皮，遇到对方的云梯等，就用铁头将它撞烂。通过这种方式，一共毁掉了敌人数十架攻城器械，暂时没有落得下风。

闰十一月初十，皇帝再次登城慰问守军，当天他来到了东城墙，这里是受攻击最严重的地区。第二天，他继续在城墙上活动，早上先到了北城墙西面的安肃门（卫州门），之后前往东城墙南面的朝阳门（新宋门）。在这里，金军意识到皇帝来了，连忙放箭，甚至将箭射到了皇帝面前的旗帜下方。

城上将士不想在皇帝面前丢面子，立刻派遣三百多军士下城出战，杀敌数百。等他们回来，皇帝高兴地封了几十个人为官。

随后，敌人加强了攻击，制造了百尺高的望台，也就是瞭望台，可以窥探城中的情况。为了摧毁城墙上的防御，更是用大炮释放带火的炮弹，用来击碎楼橹。云梯、鹅车、洞子也纷纷被推了上来。

宋军意识到如果只是被动防御，那么，对方的攻城器械会越造越多，由于城外的空地更大、资源更丰富，城内迟早无法与城外抗衡。事实上，宋军不仅人员奇缺，就连炮弹资源都不足。城外有无数的石头可以使用，可是城内的石头却是有限的。到了闰十一月初八这一天，城内炮弹已经不够了。宋钦宗检点了一下城内各处，发现石头最多的就是他父亲的杰作艮岳。这里几座小山几乎都是石头制作，虽然石头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但古代的大炮却并不在乎石头是不是圆的，只要通过杠杆扔出去就可以。皇帝下令，从这一天开始，城内的炮弹就从艮岳选取。[16]

炮弹以及作战物资的匮乏，让守城者认识到只有先发制人，派军出击将城外的器械烧毁，才有可能改变战争态势。

金军再次进攻南城时，张叔夜与范琼率领人马出击了，他们向着敌

营冲去，但目标却对准了金军的炮车。不想宋军战斗力不强，刚刚看到对方的铁骑就开始逃亡。这一仗以宋军损失上千人为代价。这次失利使得宋军士气低落。

更要命的是，从闰十一月十一开始，又连下了三天大雪，守城的士兵连武器都握不住了。宋钦宗一面继续犒军，他穿着军装露出双手，与士兵共患难，算是给他们一些鼓舞；一面为了表达地主之情，甚至让人去往金人的营地送了酒食，这也表现了古代战争温情的一面。[17]

闰十一月十四，通津门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外金军的一员裨将，人们纷纷传闻死者是数次出使大宋的王汭，开始庆祝，后来才知道是一位叫作刘安的将军。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宋军击毙的最高级金军将领，大家把好消息带给了皇帝，皇帝高兴地宣布，赏赐那位发炮的指挥官一条金带，再封他为武功大夫。

为了鼓励大家多杀金军，皇帝又拿出另一条金带，加上一张不填名字的委任状，挂在了待漏院旁，表示谁能杀死金军裨将一员，就奖赏给谁。

同一天，皇帝再次行幸营地。他来到了东水门，发现东水门外的护城河已经快被金军填上了，原来这里的河面结了冰，金军乘机在河上架了板子填了土。皇帝非常不满意，询问守城的将领是谁，他罢免了这位叫作李擢的官员（官职是提举），任命田灏取代他。[18]

当皇帝继续来到朝阳门，恰好碰到一队金军在攻城。城上的三百多守军要求下城与金军交战。他们下城后，有两个持盾的人特别勇敢，两人杀了五六十个敌人，但其余的兵士由于害怕却没有跟上。皇帝连忙叫人前去援助，不想却没有人敢于应战，只能眼睁睁瞅着两人被金军杀死。这件事也反映了宋军士气的低落。[19]

之后的几日，金军的进攻仍然激烈，守城的将士们也没有太大的漏洞。但一股不安的情绪却在蔓延。人们发现金国和北宋的使节来回穿梭

于营地与城市之间，他们来去显得很神秘，于是，关于和谈的风声又出现了。人们回想起上一次和谈之后对于首都的搜刮，再次担心起来。人们不知道皇帝会不会再次将他们出卖，他们的抵抗到最后会不会归零，变得毫无意义。宋军的士气更低落了。

针对这种情况，一位叫作丁特起的太学生写了一封信给皇帝，表示到底是战是和，应该尽早决定，不要打打停停，最后两头都没有好的结果，反而成了大患。统制官姚友仲也写了一封奏札，向皇帝表示既然不想打，就议和吧。

不幸的是，这两封信都没有收到皇帝的回音。[20]姚友仲又想起当初金军刚来时，他就呼吁尽早发动攻击，乘敌人立足未稳将其击溃。但皇帝只是让他守，并不采纳他的建议。根据综合情况分析，皇帝又开始讲和了。

另外，勤王的部队也都没有到。想起第一次围城战，数十万勤王军齐聚城下换回的只是一个屈辱的和议，这次没有兵，到底能换回什么？北宋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边打边谈

北宋与金人的议和，从金军围城之前就已经展开。李若水在粘罕处时，粘罕已经派人（杨天吉、王汭、撒卢母等）到汴京，要求割让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经过讨论，宋钦宗同意了金军的要求，于十一月二十二回书，并派遣耿南仲与聂昌前往河北和山西地区交割。[21]

在宋钦宗的书信中，还应金人的要求，特别指出对几位“误国大臣”的处理，本书中提到的人物包括：

蔡京，责授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已死。

童贯，责授节度副使，吉阳军安置，已诛。

王黼，责授节度副使，卫州安置，已诛。

李纲，责授节度副使，夔州安置。

吴敏，责授节度副使，涪州安置。

马扩，昨任真定府路廉访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湖南安置。

张孝纯家属，闻在徐州或南京。

皇帝还给河北、河东的人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这封信回顾了历史，表示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和平。如果河北和山西的人民在金国统治下能够安康，那么就跟做大宋子民没有什么区别。到了最后，还用了现代人写信时流行的问候语，询问说："冬天好冷啊，你们还好吧？"由于这封信非常重要，因此全文引在这里：

敕官吏军民等：顷者有渝盟约，致大金兴师。朕初嗣位，许割三镇，以酬前恩。偶缘奸臣贻误，三府不割，又间谍大金功臣，再致兴师。使河北、河东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

夙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灵锋镝之祸，使斯民复见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讲两国之好。是用黄河见今流行以北，河北、河东两路郡邑人民，属之大金。朕为民父母，岂忍为此，盖不得已，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其勿怀顾恋之意。应黄河见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开门，归于大金。其州府官员兵人，即依军前来书，许令放回南地。速依今敕，勿复自疑。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22]

关于需要交割的城池，宋钦宗也做了详细列表。在山西地区（河东路）包括岢岚军、隰州、保德军、宪州、火山军、忻州、辽州、太原府、汾州、怀州、宁化军、平阳府、石州、平定州、绛州、威胜军、泽州、隆德府和代州，共十九城。

在河北地区包括浚州、卫州、相州、磁州、洺州、邢州、赵州、真定府、中山府、永宁军、深州、祁州、北平军、河间府、莫州、安肃军、顺安军、广信军、雄州、保定军、信安军、保州和霸州，共二十三城。

皇帝一共列出了四十二个地方，到了枢密院继续细化，又加上了八个城池，分别是河北路的永静军、冀州、恩州和青州，以及河东路的岚州、慈州、河阳府和河中府。[23]

这也说明，不管宋军抵抗得多么壮烈，不管汴京保卫战的结果如何，实际上，皇帝已经在协议中将国土割给了金国。那些山西与河北地区的人民和军队实际上都在与空气作战，而这给国家、给自己都带不来任何结果，他们被抛弃了。

但这次交割却以悲剧收场，前往山西交割的聂昌被愤怒的人民杀死，交割河北的耿南仲也逃跑了，没有完成任务。这个任务本来就没法完成，而聂昌在要求各城开门时态度还过于傲慢。他表示，宋朝官军就应该听命令，叫守就守，叫弃就弃。既然皇帝让交割，何必还坚守呢？抵抗不仅死很多人，剩下的也脱离了生计，更麻烦的是，误了交割，造成京城危险，守城者不仅不是功臣，反而是大大的罪人。[24]他说得过于难听，最终把命搭了进去。

宋朝皇帝的服软也并没有让金人停止进攻，由于他们已经到了黄河边，不可能空手而回，只有继续进军。

当然进军需要借口，粘罕的借口是，鉴于以前宋朝的不良记录，这次只要交割没有完成，就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他吃准北宋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五十座城市交割的任务。

斡离不的借口是：鉴于宋朝的不良记录，这次必须是皇帝亲自出面签订的和约才能算数。

另外，斡离不与粘罕对待宋朝的态度还有区别。斡离不虽然先到，但由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次与宋钦宗打交道，对于宋廷的态度更加温和。粘罕上一次没有分到战利品，就更加坚决地要求进军，同时，他作战经验更丰富，在逼迫宋朝割地问题上更是寸步不让，步步紧逼。

虽然斡离不更加友好，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反而是粘罕，所以，金军第二次的汴京围城战比第一次更加积极。

但两位元帅又有各自为政的一面，存在着不协调现象。比如，双方在外交上本来应该是一个声音，统一派出使团，但事实上，元帅们却没

有协调好，各自派出了使团。使团的不统一增加了事情的混乱，也影响了宋军的判断。宋朝君臣一直认为二太子一方是做决策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国相一方才是最终拍板的人。

粘罕十一月二十一派出使团之后，十一月二十七，又派出杨天吉、王汭和撒卢母使团继续商讨交割土地与其他和约条款问题。[25]

十一月二十八，斡离不派出的使团也到了，使节名叫刘晏。[26]粘罕派出的使团以逼迫为主，而斡离不的使团则以告知为主。刘晏在都亭驿休息后，将金军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表示与上次不同，金军两路兵马都杀到了，底线诉求是请皇帝出城会盟。刘晏对皇帝的态度很恭敬，对北宋的情况颇为同情，让皇帝感到放心。他的情报也很重要，因为刘晏来时，国相粘罕还没有杀到首都城下，刘晏出使两天后西路军才到了青城。刘晏其实帮助北宋提前两天知道了粘罕的动态，但宋军并没有加以利用。

闰十一月初四，粘罕又派出了使团，使者是萧庆、杨真诰[27]和撒卢母。[28]与刘晏的恭顺不同，这个使团态度非常傲慢。不过，他们传递的消息都是一致的，要求皇帝亲自出城会盟。宋钦宗在刘晏的劝说下有意与元帅见面，但见了粘罕使团的傲慢，又开始担心了。三天后，皇帝才接见了萧庆等人。宰相何㮚向金使表示，按照规矩，皇帝只有到三年一次的祭祀时才会离开首都，平常都居住在大内，如果金军坚持这个要求，和约就无法达成。

萧庆离开两天又回来了，初九，他带来消息，仍然需要皇帝亲自出城。这一次与上次不同，又附加了一条威胁，表示在金军攻破城池之前，如果皇帝出城议和，那么两位元帅仍然当他为皇帝，按照臣子见皇帝的礼节对待他。一旦城破，皇帝就不再是皇帝，而是俘虏，到时候就不要指望礼节了。[29]

金军的威胁让皇帝恐慌，但他还是不肯出城。为了与金军继续沟

通，在第二天他派遣了一个使团，由都水监李处权和右司郎中司马朴率领，前往金军营地。[30]使节出城后，却被金军挡住了去路，不接受他们出使。[31]

虽然谈判不顺利，但双方却并没有断了联系。闰十一月十四，粘罕再次派出萧庆、杨真诰、撒卢母前来，他们先是要求皇帝出城，遭到拒绝后放宽了条件，表示不用皇帝亲自出城，而是派遣宋朝宰相，以及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亲王做人质就可以了。[32]

宋朝宰相一般不止一个，但在当时，担任宰相的却只有何㮚。何㮚听了脸色大变，但好在宋钦宗以宰相只有一个，需要料理帝国事务，不便出访为由拒绝了，改为其他人出访。至于亲王级人物，金军首先想到的是太上皇宋徽宗。宋钦宗连忙拒绝了，表示这不符合礼法。金人接着要求太子出质，但太子只有几岁，显然也不合适。最后，萧庆要求派出越王、郓王或者其他亲王两人共同前往。[33]

宋钦宗同意派遣越王做人质。越王带着拯救帝国的使命整装待发，粘罕在城外排好军队，等待他出城。不想到了城门口的越王一看外面的阵势，吓了回来，说什么也不出去了，皇帝只好作罢。[34]

四天后，闰十一月十八，宋钦宗与大臣们还在商量，最终还是派不出合格的人选。闰十一月十九，皇帝决定派遣两位官员，叫作冯澥和曹辅，临时封他们为宰相，再派了两个姓赵的宗室子弟赵仲温、赵士说，冒充亲王前往金军营地。[35]这次派遣终于激怒了粘罕，四人来到军前，粘罕设酒款待他们，行过三通酒，一句话不说，就把他们打发了回去。[36]

两天后，闰十一月二十一，宋钦宗再次派四人前往金军，第二天，四人又回来了，带来的消息还是必须由宰相何㮚与两位亲王为人质。[37]

到这时，议和之路似乎走入了死胡同，皇帝不愿意他的本家去送死，也不想亲自前往金军营地。而金军营地也不着急催着他们议和，因

为他们的攻城器械已经大批量到位，每天大炮一开动，将源源不断的石头投入城内，都能造成数十人的死亡。[38]大炮引起的减员和恐慌，已经让城内损失了百分之五六十的兵士，眼看就无以为继了。[39]随着谈判陷入僵局，金人更是加强了进攻。

闰十一月二十，在宣化门出现了一次重大险情。[40]宣化门旁边有一条惠民河，金军原本在河的北侧驻扎，他们通过一座叫作陈桥的桥梁来到了河的南侧，利用攻城器械向宣化门进军。

其中有三个人带着金军的黑旗已经登上了城，如果有更多的人上来，就意味着城池将要失守。听到消息后，姚友仲和都统制王燮立刻率领数十骑兵与上百步兵到城外和敌人接战，击退城下的敌人。城上的几个金军由于缺乏后援被杀死了，而城下的金军也退回到桥北的鹅车和洞子之中躲避。

宰相何㮚听说了险情，也立刻赶过来察看。但不想宰相一来，情况反而恶化了。金军又从洞子和鹅车里出来，冒着城上如雨的矢石，想继续爬城。宋军也有六七百人下到了城外，准备与敌人决战。两兵相接，宋军突然溃散，被金军赶得四处乱跑。

城上的人看得清楚，金军虽然进攻，但并没有后继部队跟上，也就是说，只要打败了他们的第一波进攻部队就是胜利。城上的人赶快大喊着把消息告诉城下的溃军。但溃军已经收不住势头了，只能败下阵来。

两岸都在猛放大炮和弓箭，宋军有数百人死伤。在城下还有不少陷马坑，原本是宋军挖了为金军准备的，不想逃跑时慌不择路，反而有近百宋军陷入其中。金军看了哈哈大笑，一场战斗就在笑声中结束了。宋军虽然阻止了金军登城，却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闰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双方仍然在寻找攻守之道，金军在各个城门发动攻势，双方损失都很大。

闰十一月二十三，宋军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地点仍然是在宣

化门外。这一天，统制官范琼率领千人出战。他们下到城外，奋勇前进，将金军赶过了惠民河。宋军士气高涨，决定继续追击。他们没有采取过桥的线路，而是直接从冰面上过河。在距离北岸还有十余步时，冰面突然开裂，大批士兵掉入河中。惠民河并不是一条大河，还不至于淹死太多人，但金军一看宋军出现了混乱，立刻回头掩杀，将在河中挣扎的宋军杀死。这一次战斗，宋军就损失了五百多人，士气受到很大打击。[41]

从这一天开始，汴京城内外又下起了大雪，大雪昼夜不停，一直铺了几尺厚，这更增加了守城与攻城的难度。

从闰十一月二十到二十三，汴京城墙险情不断，似乎也预示着金人逐渐找到了攻城的诀窍。宋军士气越来越低落，仿佛支撑不下去了。进攻大部分发生在粘罕的区域，斡离不区域内反而相对平静，也表明两位元帅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

闰十一月二十四，仿佛是为了印证这样的判断，金军的东路军元帅斡离不又派他的使者刘晏来了。斡离不显然知道金军的总攻就要开始，他这时派使者前来，是告诉宋钦宗应该赶快做决定。斡离不甚至连写封信的工夫都没有，只是让刘晏口头带信：金军的总攻就要开始了，如果皇帝感觉还能支撑，就全力抵御，不要考虑留后手了；如果感觉不行了，就赶快答应金国条件，要么亲自出城议和，要么派亲王、宰相出城，否则一切都迟了。[42]

刘晏的善意提醒还没有结束，进攻就开始了。这次的进攻仍然在宣化门方向，敌人推来四架火梯，试图烧毁城墙上的楼橹。城墙楼橹都有编号，其中“字”字号楼橹不幸成了金人的主攻方向。[43]

城上用撞杆对付城下的火梯，摧毁了其中三架，但有一架却成功地点燃了三座楼橹，一部分金兵乘着混乱登上了城墙。但他们选择的地点却不对，上城后，恰好位于三座燃烧楼橹的中间，前也是火，后也是

火，过不去了。姚友仲率军乘机反攻，将他们逼下了城墙。由于天冷水结了冰，无法救火，三座楼橹也化作了灰烬。

另一处，宋军放火牛烧毁了金人的一个洞子，洞子燃烧时，反而将宣化门附近的两座楼橹点燃了。金人也借助火势上了城墙，被宋军击退，损失了上千人马。

到这时，城壕都已经被金人填成了高地，城墙上发生了恐慌，不管下面有没有敌人，发射的弩箭和炮弹数以百计，大部分都只是对空发射。有人如果制止士兵，劝他们不要浪费弹药，就会被指为奸细杀掉。金军在城下先避一避，等宋军发射的间隙，捡城上射下的弩箭和炮弹，反射回城上。城墙已经伤痕累累，最初还有人修，但因为修城的人大都被炮弹砸碎了脑袋，或者被弓箭射死，人们连修理都不敢了。[44]

金军攻势的加强，印证了刘晏的提醒。

闰十一月二十五，大雪仍然没有停止。前一天，皇帝没有给刘晏答复，安排他住在了驿馆内。第二天，刘晏仍然在都亭驿等待着结果。到了下午，突然间驿馆外乱成了一团，人群吵吵嚷嚷向驿馆聚集。到底出了什么事？看门人告诉刘晏，金军已经入城了！

就在说话的工夫，一群百姓已经冲破了驿馆的防卫，向刘晏冲了过来。刘晏吓得大叫：我是为了你们好，才来通报的，不要杀我！[45]

这成了他最后的遗言，愤怒的百姓冲上来，将他抓住撕成了碎片。这位对宋朝怀有好意的使者就这样死于非命。[46]斡离不也许想不到，他出于善意派使者前来提醒宋钦宗，但皇帝却没有能力保护使者。在混乱中，人们已经失控了。

刘晏在死前听说城已经破了，这是否符合事实呢？

装神弄鬼

闰十一月二十四进攻之后，宋军阵营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极点。金军在各方面的组织能力都强于宋军。比如，金军进攻城墙死亡人数在两千人以上，他们能在当天就把尸体全部移走处理掉，这既避免了士兵们看到尸体之后出现恐慌，也表现了对烈士的尊重。

但金军攻城时杀死了宋军三百五十多人，尸体就在城上，却没有人收尸。直到第二天士兵们仍然可以看到死去的战友，这些人破脑贯胸的惨状一直在眼前晃来晃去，提醒着活人，等他们死后也会变成这样。

北宋给予守军的赏赐也不到位。王宗濋许诺给士兵委任状、金碗等，都没有兑现，这让士兵们以为皇帝让自己卖命，却不想出足够的买命钱。[47]

到了闰十一月二十五，宋朝君臣都知道不能指望这些士兵了。于是，他们转向了最后一支神秘部队，也是最厉害、最无敌，一定要留到最后使用的那支军队——何㮚招募的“奇兵”——以及一个叫作郭京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宗教传统从东汉末年开始，源源不绝一直持续到现代，那就是道教。所谓道教，与哲学上的道家并不是一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理论，强调一种来自“玄”或者“无”的自然观，在社会上强调简单，减少政府干预，回归自然状态。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虽然号称来自道家哲学，也强调到自然中去放纵自己，但在组织上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变种，强调对于君臣礼法的遵从，是一个听话的宗教。他们总是依附于统治者，希望统治者在吃鸡时能够分一块鸡腿给他们，而他们崇尚自然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实际上是为了入世。[48]

比如，道教中一大分支全真教，在创始人王喆（王重阳）时期，由于天下大乱，他选择了隐藏起来；但他的弟子丘处机（长春真人）就不一样了，当成吉思汗需要长生不老药时，立刻找到了丘处机，他随即放弃了所谓的隐逸，万里迢迢从中国山东到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去

见成吉思汗，试图分一块肉。但由于他“没有长生之药，只有卫生之道”，成吉思汗不感兴趣，把他打发回去了。[49]

道教的组织化和对权力的崇拜接近于汉代的儒教，但它又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叫作“法术”。儒教从来不重视法术问题，但道教的法术却是五花八门，大致分为炼长生丹、堪舆和奇门异术三类。炼丹又分为炼外丹和炼内丹。所谓外丹，就是用雄黄、水银加上各种矿石，炼成金丹，服用后就可以长生不老。所谓内丹，也叫练气，在唐代盛行，就是什么实物都没有，只要练习吐纳，就可以在体内形成内丹，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由于内丹比起外丹更加简单，所以内丹的流行程度逐渐压过了外丹。

所谓堪舆，指的是道教的一些“实用”技术，主要是勘察风水等。

所谓奇门异术，则包括得更加广泛。最典型的是清代末年的义和团，人人都声称可以刀枪不入，但他们一旦进入战场，就迅速倒在了欧洲人的排枪之下。也许现代人对于义和团相信超能力到不怕死的地步感到吃惊，但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奇门异术作为一股暗流，始终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便皇帝也会相信有所谓的仙丹、奇门异术，他们盖宫殿、建坟茔也都会找道士去堪舆。

在道教中，炼丹属于较为上乘的功夫，特别进入到练内丹阶段，就已经无法验证真伪了，不用担心被戳破。堪舆属于中乘功夫，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但又不把它当作很神秘的事情。奇门异术属于下等道教，因为它可以被验证，比如义和团，弄得不好，不仅面对西方的排炮就把性命搭进去了，还会贻笑千年，聪明人自然要避开这个坑，只有愣头青才会走上奇门异术这条狭窄的路。

宋徽宗时期，恰好是一个道教的高峰期。宋徽宗本人号称“道君皇帝”，全称是“教主道君皇帝”。他在位时更是大肆建筑道观，如玉清和阳宫、上清宝箓宫等，而且他尊崇了许多道士，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官

僚系统都更加迷恋道教。[50]

宋钦宗末期权力最大的两位大臣，宰相何㮚与枢密院孙傅都是道教信徒，他们自然相信道教的理论，对奇门异术也不陌生。他们担当汴京城的守卫工作后，寻找这些奇门异术之徒，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奇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招募，并隶属于何㮚的。

奇兵中，最重要的一个头目名叫郭京，他属于道教系统中的草根和无赖一类，属于“下九流”。他号称会李药师的法术，擅长“六甲兵法”。这种兵法使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做起法来可以生擒两位金军元帅。郭京的手下还有不少神人，比如刘宗杰、傅临政等人，有的号称“六丁力士”，还有“北斗神兵”“天关大将”等。[51]

还没被朝廷招纳时，郭京就聚集了汴京城的上千无赖，在天清寺修炼“六甲兵法”。金军来了，北宋朝廷缺乏士兵，就把他招来授了个成忠郎，隶属于何㮚的奇兵。

最初郭京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但随着北宋士兵的短缺，郭京手下一万二千奇兵就逐渐显出了重要性。这时，他的官已经升到了武翼大夫，朝廷显然是要指望他出战了。

郭京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也变得更加大言不惭。他表示，只有在朝廷最危急的时候，才用得着奇兵出击。只要没有到这个时候，他就根本不用上阵。

郭京的名声越传越大，人们称呼他的时候，都恭恭敬敬叫他“郭相公”。他所招募的人也不以身体条件为基础，而要看是否有自己的一套神秘学的理论。只有和他的“六甲兵法”合拍的人才会被招募。有一位卖线的，郭京一见到他就授予将军的职位，因为卖线的“相”很符合他的胃口。另一位叫作刘无忌的卖药道人，因为会头朝下倒立泥中乞讨，也被郭京招募了。有个正规军的武臣愿意当他的裨将，他拒绝了，说：“你正月就要死了，怎么可以当我的裨将？”

人们问他这样的兵怎么打仗，他就回答：“我的兵不用打仗，只管去砍头就行了。”

金军进攻越来越激烈，郭京却越来越镇静，他号称可以在三天之内将敌人打跑，直追到阴山脚下。

闰十一月二十五，北宋的军队实在抵挡不住金军的进攻了，宰相何㮚与枢密院孙傅请求郭京，这已经是最危急的时候，再不出兵金军就打进来了，郭京才决定在当天出战。

他出战时的规矩很多，先在城墙上挂了天王旗，号称可以让敌人丧胆。之后大开宣化门，派他的人马出战，他自己留在城头上指挥。

汴京城的士兵百姓一听说郭京出战了，纷纷来到城墙上，向下张望，看他怎么打仗。观望者达到了数千人，跟着起哄的还有数千人。[52]郭京一看，连忙命令所有的人都下去，就连守城的将士也不准待在城头上。只有张叔夜率领着数百精兵在宣化门瓮城的城头上做护卫。

平常打仗时，城内的士兵往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出城作战，一部分爬到城墙上满弓待守。开启城门后，出城作战的士兵们列队走出城门，与敌人厮杀，城墙上的士兵要随时注意城外的动向。如果胜利了还好，但如果失败了，在败军退回城内的过程中，城上的守军就显得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拿捏准时间，让过败军，再用弓弩将敌人射回。败军进城后，立刻关闭城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敌军不会乘着混乱进入城中。

郭京让守卫者下了城墙并离开城门，城内的人就无法观察到外面的战况了。整个京城的命运就交给了他的“六甲兵法”。一旦失败，敌人就会乘机进城，守军无法做出快速反应阻止他们。

这个命令在平常可能会被守军拒绝，但整个城市都把希望放在郭京肩上时，就必须承受这种风险。于是，守军们没有抵抗就都服从了。

六甲奇兵出城后，郭京本人留在城头上指挥，将外面发生的一切报告给城内翘首等待消息的人们。很快，他的消息传来：奇兵先锋已经与敌人接战，得到了数百战马。人们听到消息兴奋不已，继续等待着好消息。

过了一会儿，听到消息说奇兵缴获马匹已经数千之多，又一会儿，奇兵已经攻占了敌人的壁垒。郭京的好消息不断，但突然间，城门砰然而闭，人们才意识到刚才的好消息都是假的。

事实上，奇兵部队刚出城，就碰上了敌人的数百骑兵，金军的铁骑一下子将奇兵冲散，一瞬间战斗就结束了。

由于吊桥上压了太多的尸体，留在瓮城上的张叔夜的士兵拽不起吊桥，只好在慌乱中将城门关闭。郭京在城门关闭前的一刻，率领剩余奇兵冲出了城，号称要亲自下城作法，打败敌人。他出城后，乘着乱急匆匆向南逃走。由于当时金军正集中火力攻城，并没有重视这支逃兵，这个汴京城最后指望的“大救星”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53]

离开汴京后，郭京带着残兵一路南奔，还宣称自己可以撒豆成兵，撒草为马。第二年二月份，郭京到达襄阳时，围绕在他周围的还有三千余人。在襄阳，他把军寨驻扎在了一个叫作海子头的地方，他本人则居住在一个寺庙里（洞山寺）。在这里，他找了一个赵姓的宗室，想将他立为皇帝。

襄阳的宋朝官员制置使钱盖、西京总管王襄，以及统制官张思正试图制止他，但郭京不听。恰好在这时，奇兵在汴京保卫战时的作为被流亡的人们口口相传到了这里，郭京的光环褪去了，宋朝的官员对他也不再客气。张思正率军袭击了郭京，将他俘虏，在送往宋高宗行在的途中，由于受到了土匪的袭击，张思正为安全起见将郭京杀死。这一天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二。[54]

再回头看郭京离开之后的汴京城。由于城门关闭及时，金军并没能

顺着城门进来。但随后，他们开始利用云梯爬城。由于事出仓促，金军的准备也并不充分，他们只有一架云梯，可供五十人同时上城。可实际上，只有十几个人登上了城墙。[55]如果按照平常的守卫标准，这十几个人很快就会被守军杀死。但不巧的是，守军大部分都已经被郭京赶下了城。到这时，守军们还没来得及重新回到城墙上，少数城墙上的人见敌人来了，不是作战，而是转身逃跑下城。

十几名金军首先将城墙上的楼橹点燃，引起了更大的混乱。这时，更多的金军也上了城，将他们的黑旗插得到处都是。

城内的百姓一看见黑旗和大火，都大声喊："金兵已经上城了。"

当大约三百金军上城后，他们分成东西两队沿城墙向两边攻击，将城墙上的守军清除，并利用箭弩压制对手。大量的宋军被压制在城墙下，无法收复城墙的控制权，他们将武器抛弃，四散于城中，成了溃军。

与此同时，金军在城外的铁鹞子骑兵已经待命完毕，一旦城门大开，就迅速向城内杀来，到这时，宋军已经不可能再夺回外城的控制权了。

在四面城墙中，南面最先崩溃，其次是东西两面，只有孙傅守卫的北面城墙抵抗时间最长，到第二天才陷落。[56]

金军占领城门之后，统帅们要求士兵占据城墙，暂时不要下城参与劫掠和厮杀，但他们并不能完全保证军队的纪律。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宋朝溃军已经成了首都的最大公害。他们逃下城墙后，开始对城内进行大规模劫掠。百姓们苦不堪言，他们一方面听说城墙失守，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溃军的骚扰，这座和平了一百多年的城市已经不懂得何为战争，却又不得不承受其最深的打击。

尸体铺满了道路，其中有汴京城的保卫者太尉姚友仲。作为第二次汴京保卫战中的主要指挥官，姚友仲尽全力守卫了汴京一个月。如果没

有他，汴京城早已陷落。但他最后没有死于金军之手，却死于溃军手中。

除了姚友仲之外，张叔夜下城后被乱军砍了三刀。金军焚烧通津门时，宦官黄经臣向皇帝的宫阙两拜后投火而死。统制官中，还有何庆言、陈克礼在与敌人对抗中死亡。北宋官员中还有中书舍人高振力战至死。[57]

在新城中，数百金兵来到了醴泉观，这里是一队宋军的驻扎地，宋军人数远远多于金军。但一听金军来了，宋军却迅速崩溃逃走，加入了乱军。[58]公卿大夫都换上粗布衣服，逃到小民家里躲藏。

官员、使臣、士兵、宦官都成了受害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到了晚间，除了北宋的溃军，金人中纪律不好的散兵也下到了城中开始掳掠。汴京城四处火光冲天，百姓哭声震地，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59]

这些劫掠大都发生在外城，而汴京城的内城（旧城）暂时仍然掌握在宋军的手中，所有的内城城门都已经关闭。但在内城的东城墙中门丽景门（旧宋门）有一个水门，人们就顺着水路进入旧城之中。

旧城内也已经乱成了一团，最大的争议在于皇帝的去留。即便金人攻破了外城，守卫皇帝的部队还有一万多人，马匹数千。张叔夜虽然受伤，但他还是率军力战，让金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接下来的四天，他一共杀死了两员金（耳）环贵将。汴京城陷落的当天，张叔夜手中还有两万兵马，加上卫戍部队的一万人，足以保卫皇帝冲出重围。

在这些部队和军官中，最积极的是指挥使蒋宣和李福。他们甚至冲到了祥曦殿，见到了皇帝，催促他赶快逃走。但奇怪的是，宋钦宗竟然并不想走，蒋宣甚至冲上去抓住了皇帝的衣服，想强迫他离开，皇帝吓得大叫："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做！"

蒋宣恳请皇帝离开，但皇帝找个借口就钻进了内殿。一直守在皇帝身边的秦桧出来，委婉地问蒋宣："你们这样护驾，真的能够保证皇帝

安全地逃出去？”

秦桧的问话让众人沉默了，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军队就此散去。[60]为了让蒋宣安心，皇帝封他为防御使，意思是不会秋后算账。但不到二十天，皇帝就下诏诛杀了蒋宣、李福等人（十二月十三）。[61]

在城陷后逃走的还有北宋大将刘延庆、刘光国父子。在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刘延庆的失职，造成郭药师无法夺回燕京城，这也成了宋金关系的转折点。金军曾经问马扩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但事实上，刘延庆虽然被贬黜，但到了汴京保卫战时又被委以重任。

城陷之后，刘延庆也和张叔夜一样劝说皇帝离开。皇帝拒绝后，刘延庆带领兵马匆匆离去，宣布要先为皇帝夺回一个城门供逃跑之用。他和儿子刘光国率领兵马直扑西城墙中门开远门（万胜门），夺门而逃。[62]

在城池失陷的当天夜里和第二天早上，万胜门就这样四敞大开没有人管，城内的溃军和百姓听说万胜门开了如同洪流一般向万胜门冲去，从这里逃走的有数万人。兵民出城后不知道该去哪里，就向南走，到了皇帝的别苑琼林苑里。在这里，刘延庆父子也在整理军队，准备继续逃走。

闰十一月二十七，在琼林苑聚集的兵民竟然达到了十几万人，刘延庆带领这些人一同逃生，他们向西经过普安院，遇到了金军的铁骑。刘延庆鼓励大家拿出死拼的精神来突围，但士兵和民众都不敢答应。刘延庆只好让他的儿子刘光国率领五十骑兵到金军阵前转了一圈，金军没有袭击他们。刘光国回来后，刘延庆继续鼓励人们前进，这些已经被绑上了战车的人迫不得已，只好向前冲去。他们在金军铁骑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刘延庆和儿子刘光国都死在了乱军之中。[63]

据称，刘延庆是在金明池中淹死的，而刘光国带着王黼的爱妾张氏

逃跑，逃了十余里被敌人追上，只好先将女人杀死，再自杀了。[64]

【注释】

[1] 范仲熊的回忆见他写的《北记》，转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 参考《宋史·钦宗纪》。

[3] 参考《梦粱录》。

[4] 参考《汴京遗迹志》。

[5] 参考《汴京遗迹志》。大梁十迹：夷门，古城，吹台，隋堤，上源驿，愁台，陈桥，艮岳，青城，官渡。

[6] 参考《东京梦华录》。

[7] 参考《靖康纪闻》。

[8] 也有书写作王宗礎，现统一为王宗濋。

[9] 参考《靖康纪闻》。

[10] 根据《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为闰十一月初三。

[1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2] 参考《靖康纪闻》。

[13] 参考《避戎夜话》。

[14] 根据《靖康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为闰十一月初八。

[15] 参考《靖康纪闻》。

[16] 参考《续资治通鉴》。

[17] 参考《靖康纪闻》。

[18] 参考《靖康要录》。

[19] 参考《靖康要录》。

[20] 参考《靖康纪闻》。

[2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三篇。

[2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四篇。

[2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六篇。

[2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五篇。

[25] 参考《靖康要录》。

[26] 参考《瓮中人语》。

[27]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〇七篇中，杨真诰作杨真干。

[28] 参考《瓮中人语》。

[29] 参考《瓮中人语》。

[3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1] 参考《瓮中人语》。

[32] 参考《瓮中人语》。《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一篇。

[33] 参考《靖康要录》。

[34]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3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三篇载，赵士说为宋钦宗皇伯。

[3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3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8] 参考《靖康纪闻》。

[39] 参考《续资治通鉴》。

[40] 参考《靖康纪闻》。

[4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2]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

[43] 参考《靖康要录》。

[44] 参考《靖康要录》。

[45] 参考《靖康要录》。

[46]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8] 关于道教的讨论，可以参见作者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49] 参考《长春真人西游记》。

[50]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道教之崇》。

[5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要录》。

[52] 参考《靖康纪闻》。

[53] 参考《靖康要录》。

[5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55] 参考《靖康要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载只有四人。

[56] 参考《靖康纪闻》。

[57] 参考《宋史·钦宗纪》。

[58]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59] 参考《靖康纪闻》。

[60] 参考《靖康要录》。

[61] 《三朝北盟会编》，一同诛杀的还有一个叫作卢万的人。

[62] 参考《朝野佥言》。

[63] 参考《中兴遗史》。

[6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第十三章
艰难的谈判

下风口的谈判

皇帝之所以不想离开，是将希望重新放在了和谈上。他宁肯相信金军，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军队了。在确定和谈策略之前，他的心理历程也经历了数次的变化。

当城市刚刚被攻破时，皇帝已经乱了阵脚，他号召全民抗战，要把汴京城的武器发给平民，让他们打金军。但此刻，宋军的士兵其实不少，只是都成了溃军无法利用，军人尚且如此，平民怎能打仗？许多人将发下来的兵器直接丢弃，后来连兵器都发不下去了，因为宫廷内的官员都逃走了。

当天晚上，只有景王赵杞、梅执礼、秦桧、谢克家等少数几个人守在皇帝身边。[1]众人讨论的结果是既然城破了，除了与金人和谈，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皇帝派遣景王赵杞、谢克家、李仔出使金军营地。

由于二太子斡离不对宋朝更加友好，景王和谢克家没有去粘罕营地，而是去往刘家寺的二太子营。他们坐着筐从城上吊下，只带了一两个侍从就出发了。[2]当天斡离不见到他们，表示他们级别不够，至少需要正宰相何㮚来见，才能开启谈判。[3]

第二天（闰十一月二十六），李若水的到来更坚定了皇帝求和的信心。李若水出使粘罕营地商讨割地，由于金军进攻太快，出使没有结果的他跟随粘罕的军队回到了汴京城外。粘罕告诉李若水，五百里内都已

经是金军的兵马，皇帝已经无处可逃，让他带信给皇帝，快派人来和谈。[4]

李若水见到皇帝，将粘罕的话传到。他还表示金军即便攻破了汴京城，由于无法持久占领，最终不得不退兵，对方的要求只是割据河北、山西，并不要求灭亡北宋。皇帝听说后，派遣宰相何㮚与济王赵栩作为请命使，前往粘罕营地，请求金军的宽大。[5]

何㮚见到粘罕，受到了对方的质问，到底谁是决定抵抗的主谋，何㮚回答是他本人，与皇帝无关。

粘罕继续问："以前数次要求宰相（何㮚）前来谈判，为什么一直不来？"

何㮚回答："不肯来是为了社稷，今天来是为了生灵。"

粘罕感慨他是忠臣，没有继续追究，[6]甚至安慰何㮚等人说："自古有南即有北，哪一个都不能缺少。只要肯割地，一切都好说。"

但在另一件事上，双方的分歧却很大。就在宋使放松警惕时，粘罕却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要让太上皇亲自出城与金人对话。

宋徽宗自从当了太上皇，政治敏锐度差了很多，他在宫殿里又惊又忧，却并没有和上次一样选择在围城前逃走。金人要让宋徽宗出来，似乎带着谁把事情搞砸了，谁就负责的意思。

按照汉人的看法，太上皇是绝对不能出来的，但按照游牧民族的看法，大军已到，主帅相见谈判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太上皇是一切事情的肇始，他不来收拾残局谁来收拾？粘罕直接表示：

> 尔家太上（皇）事事失信，弗亲出城，便须出质妻女，此外更无计议。[7]

不管让太上皇出城，还是质押皇太后和公主，都是不可能的。宋使做不了主，只能带着金使回到城内向皇帝汇报。

除了这个正规使团，当天皇帝还先后派遣御史中丞秦桧与右司员外郎司马朴前往金军营地犒劳一番。[8]

就在外交工作展开的同时，京城内的混乱还在扩大。人们最初的恐慌和震惊过去了，城内的犯罪率飙升。与此同时，虽然金军的两位元帅一直不让军队劫掠，但金军中不守纪律的行为也越来越多。

闰十一月二十六凌晨开始，就有大量的居民集中到了宣德门。这些居民本来是响应皇帝发武器的号召来的，但来了之后，形势却失控了。人们开始不断地诉苦，询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皇帝是否有应对计划。到最后，皇帝不得不亲自出来接见他们。但皇帝出来后，形势没有好转，反而引起了极大的骚乱。

一位叫作王伦的人（宋初宰相王旦的后代）乘机要求皇帝给他封官，好让他解决这些群众的难题。他在市井之间颇有威望，在获封吏部侍郎后，请众人先不要喧闹，听皇帝讲话。众人都知道他的威望，暂时停止了吵闹。

皇帝乘机与市民展开了对话，甚至撸起袖子露出手腕，帽子还不小心掉了下来，还与百姓打成一片。众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皇帝会不会逃走，然后将百姓留给金兵去蹂躏。宋钦宗表示自己绝不会抛弃这里的宗庙，誓与汴京城共患难。说到激动处，皇帝与百姓们相拥而泣。[9]

但皇帝的承诺并不能让百姓感到真正的安心。从闰十一月二十七开始，金军中有三三两两的人从城墙上下来，进城劫掠。他们并不杀人，只是劫财。真正杀人的反而是宋军中的游兵散勇，他们是纪律最糟糕的军队。

百姓们从城东跑到城西，又从城西跑回城东，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很多父子、夫妇由于无法互相提供保护，相约一起自尽，河道附近堆积着大量的尸体，还有公卿贵族穿着布袍，用泥土涂面，尽量打扮成乞丐模样。[10]

在所有战争中，一座城市被占领后，最难以避免的就是火灾。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法军刚占领莫斯科城，整座城市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将城市烧得精光。到底谁放的火，到现在都无定论。金军占领之后的汴京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只是规模较小一些。

平日里，首都汴京有着严格的防火措施。每一个街区（坊）里的小巷，每三百来步就会有一个军巡铺。军巡铺相当于派出所，每个铺有五个人，夜间巡逻，白天维持治安，当然也管火灾报警。在城市的高地上又有砖砌的望火楼，楼上专门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了百余名士兵，又储藏着各种救火用具。一旦出现火灾，望火楼立刻派人骑马报告给城里的厢军、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由官府和军队出力灭火，不用百姓参与。[11]

但在非常时刻，这套制度已经没有人去运转了。

金军攻城时点燃的是城楼，到了闰十一月二十六晚，城内的五岳阳德观、马草场、葆真宫发生了大火。这火到底是谁放的，到底是金军还是溃军，已经无法确认了。闰十一月二十七，金军对城市中的富户进行劫掠，大火吞没了云骑桥附近宋徽宗的妃子明达刘皇后家、神卫营蓝从熙[12]家、孟昌龄家，一路烧过来，烧毁的房舍不计其数。

也是从这时开始，另一个战争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也出现了，那就是掳掠妇女。

在金军两位元帅中，粘罕目标明确，更加坚定，给宋王朝的压力更大；斡离不对宋朝更加友好，却又带着花花公子的性格。这一天，斡离不派人进城抓走了七十多名妇女供他享用。[13]

闰十一月二十八，宋徽宗的另一个刘皇后——明节刘皇后——家也遭遇了火灾。宋朝的两大学术机构太学和律学更是被洗劫一空。

关于城中的混乱，宋金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金军闰十一月二十六就朝城内发文，要求城内百姓不要害怕，要安居乐

业，两国正在讲和。金军的告谕让老百姓感到心里安定一些。作为回应，开封府也于闰十一月二十八发榜，要求文武官员、秀才、僧道率领百姓到金军营地去犒劳，谢他们不杀之恩。百姓为了保命，纷纷捐钱捐物，给金军运送牛和酒的人群在道上络绎不绝。

与此同时，开封府也承担起治安官的责任。整个汴京城治安最差的地区是外城和内城之间，外城城墙已经被金军占领，但内城城墙还在宋军手中。内城的治安还不错，但外城处于宋金两军的夹缝地带，因此成了劫掠的高发区域。劫掠者中的确有金军，但大部分劫掠者其实是北宋的地头流氓和兵痞，他们把头发一削，就冒充金军，四处干坏事。开封府向金军取得谅解后，立刻四处出击，抓了数百位参与劫掠的人，将他们拉到大街上直接砍头。开封府的强硬态度让局面从失控状态稍稍恢复了一些秩序。

砍头还带来一个副作用，每杀一个人，他们的尸体在瞬间就会被剥尽，甚至连肉都会被割光。原来城内已经缺粮了，许多人不得不靠人肉充饥，还有人四处贩卖人肉，这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14]

在汴京城，饥民最多的地方是大相国寺。这里曾经是首都最繁华的地方，每月举行五次盛大的交易会，号称“万姓交易”。[15]交易期间，从飞禽走兽、宠物家畜，到日用家什、建筑材料；从武器弓箭、马鞍车轴，到糖果点心、瓜果时蔬，再到衣服鞋子、书籍文物，应有尽有，但在金兵围城期间，相国寺的集市没有了，周围拥来了无数的饥民，他们在寺庙的走道里号呼哭泣，一片悲惨景象。[16]

皇帝亲临

在开封府尽力维持治安的同时，宋金的和议仍在进行中。闰十一月二十七，宋使济王赵栩和陈过庭来到金军营地请求怜悯（求哀）。

闰十一月二十八，秦桧、李若水来求和。粘罕还是要求太上皇和皇

子作为人质。使者无法做主，只好回去禀报。皇帝沉吟一番，表示作为儿子不可能将父亲交出去，如果金人一定要让太上皇出去，那么作为儿子的皇帝只好亲自代替父亲出面了。[17]

闰十一月二十九，宋钦宗做了最后的努力，派出郓王率领十一个亲王（燕王、越王、郓王、景王、济王、祁王、莘王、徐王、沂王、和王和信王）前往金军营地，但金军拒绝见他们。[18]不过这一天粘罕却接见了何㮚，见面后首先就问："太上皇和他的老婆女儿，到底谁来？"何㮚语塞，只好回去禀报。[19]

这时，皇帝已经知道，除非自己出去，否则达不成协议。当天皇帝下诏书表示将亲自前往金军营地。在准备了一天之后，闰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即闰十一月三十，皇帝车驾启动，前往金军大营。

清晨，皇帝带了三百随从前往金军大营，跟随他的官员有何㮚、陈过庭、孙傅等人。[20]曹辅和张叔夜则负责留守，暂时掌管缺了皇帝的内城。他们计划从南薰门出城，到青城去见国相粘罕。但南薰门城楼已经被金军控制，大门紧闭。在皇帝的身后，跟随着汴京城的百姓父老，他们纷纷拿出了金银锦帛，想献给金军，好换取皇帝的平安。即便皇帝离开后，这一天老百姓都在不停地送东西，希望金人信守诺言把皇帝送回。

到了南薰门，城上一人自称统制，大声喊道："奏知皇帝，若得皇帝亲出议和公事，甚好，且请安心！"

宋钦宗要下马，城上金人纷纷避开，表示这里不是下马的地方。皇帝只好在马上继续等待。城上有人告诉他，已经派人去通知粘罕，请皇帝等待一下，外面在清理道路。

皇帝等了大约一个时辰，城门开了。金人的铁骑塞满了瓮城。他们阻止了三百随从，只让少数人通过，将皇帝夹在中间，裹挟而去。

前往青城途中，金人又要求皇帝走慢一点，前方在安排他住宿的行

宫。又等待了一个多时辰，他们才到达青城的斋宫外。皇帝又想下马，但被告知请他骑马进去，到了斋宫侧面的一个小空地才下马。

粘罕派人告诉皇帝，二太子斡离不还在城东北的刘家寺，赶不过来，所以皇帝必须在斋宫住下来，等第二天再谈。对方还询问皇帝是否准备了被褥，如果没有，他们也可以帮忙准备，但怕皇帝不习惯。

当天晚上，皇帝住在了青城的斋宫之中，环绕他的都是金兵。金军派乌凌葛思美作为皇帝的馆伴，陪伴他度过漫漫长夜。[21]

在城内，官员、士兵、百姓都在等待皇帝的归来。但到了傍晚，有人拿着黄旗从南薰门进来，他带来了皇帝的亲笔信，表示金人已经答应议和，但事情没有了结，所以皇帝今天回不来了。众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散去。[22]

皇帝亲自出城，对于金人与宋人的意义是不同的。作为游牧民族的金人并不把皇帝亲自出城当回事，他们的首领以前常常冲锋陷阵，谈判更是亲自参与，既然攻克了首都，皇帝亲自参与谈判自然是最起码的礼节。

但对于集权帝国的子民，皇帝出城却是极大的稀罕事。宋朝的皇帝就如同是蜂巢里的蜂王，他们只躲在柔软的巢穴中，不会冒任何风险，更不可能直接前往敌人营地。金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对于宋人却是奇耻大辱。这可以看作是文明冲突的一部分。

十二月初一，官吏百姓再次云集南薰门，焚香开道盼着皇帝回来，但到了晚上，皇帝还是没有回来。只有一人拿着黄旗出现，他又带来了皇帝的亲笔信，表示和议已经成了，但礼数未到，所以还需要再待一晚。[23]众人再次散去。

事实上，这一天皇帝根本没有见到两位元帅。这天他被留在斋宫，唯一的任务就是写投降书（降表）。从金人对降表的重视程度，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从北方蛮荒之地走出来的。最初，皇帝让孙觌起草了一

份，主要意思是称藩与请和，这份草稿交给粘罕后，被立刻否决了。粘罕派人前来指导了不下四次，但写出来的粘罕都不满意。粘罕要求降表必须是对偶格式的，必有文学性。孙觌和吴幵互相推诿着都不肯写，皇帝催促他们快点动手。于是，孙觌、吴幵再加上何㮚一块儿商量着将投降书写了出来。皇帝看完后，甚至夸奖他的大臣写得好，如果不是平常勤加练习，现在哪能写出如此优雅的投降书。

不想这份草稿送给粘罕，对方还是不满意，传令来传令去又改了好几遍。粘罕的意见有的非常具体，比如，文中提到了大金皇帝和大宋皇帝，但粘罕保留了大金皇帝，将大宋皇帝删去了，只准大宋皇帝称“臣”。又把其中的“负罪”改为“失德”，“宇宙”改为“寰海”，等等。宋朝皇帝与宰相如同小学生一般诚惶诚恐，满足了老师的所有要求，才得以通过。[24]

由于这篇降表非常重要，因此值得将全文录于此，经过数次修改，降表是这样写的：

臣桓言：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仰祈蠲贷，俯切凌兢，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窃以契丹为邻，爰构百年之好；大金辟国，更图万世之欢。航使旌，绝海峤之遥；求故地，割燕云之境。太祖大圣皇帝特垂大造，许复旧疆。未阅岁时，已渝信誓，方获版图于析木，遽连阴贼于平山，结构大臣，邀回户口。虽讳恩义，尚贷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犹夸大其土地。致烦帅府，远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迁，微臣因时而受禅。惧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请和；屡致哀鸣，亟蒙矜许。

官军才退，信誓又渝：密谕土人，坚守不下，分遣兵将，救援为名；复间谍于使人，见包藏之异意。遂劳再伐，并兴问罪之师；又议画河，实作疑兵之计。果难逃于英察，卒自取于交攻。尚复婴城，岂非拒命？怒极将士，齐登三里之城；祸延祖宗，将隳七庙之祀。已蠲衔璧之举，更叨授馆之恩。自知获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

伏惟皇帝陛下，诞膺骏命，绍履鸿图。不杀之仁，既追踪于汤武；好生之德，终俪美于唐虞。所望惠顾大圣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绝之绪。虽死犹幸，受赐亦多。道里阻修，莫致吁天之请；精诚祈格，徒深就日之思。谨与叔燕王俣、越王偲，弟郓王楷、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楞、和王栻，及宰相百僚、举国士民僧道耆寿军人，奉表出郊，望阙待罪以闻。臣桓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天会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25]

十二月初二，金国元帅们终于与宋钦宗相见了。当天还没有见到元帅时，金人突然又想让太上皇出城，皇帝再三陈述，金人才感于皇帝的仁孝，答应太上皇不用出来了。

接下来是投降仪式，粘罕已经命人将斋宫里象征皇权的鸱尾都用青毯包好，墙壁上有画龙的地方也都遮挡好。在北方设立了一个香案，这才请宋钦宗进来。

宋钦宗到来时，两位元帅亲自到门口迎接，双方都在马上。皇帝把降表交给粘罕，粘罕接过来，双方作揖后，进入斋宫。皇帝的马在前，两位元帅的马在后，之后是随从。

到了香案前，皇帝下马立在案前。粘罕把降表交给手下，请他们将表文读一遍，皇帝向北拜了四拜，表示臣服。

跟随皇帝的人都唏嘘不已。一位叫作王嗣的随驾人员观察到，此刻天上竟然下起雪来。其实雪已经下了很多天，从汴京城还没失陷时起，就已经大雪纷飞，现在下雪并不奇怪。但是，皇帝北拜时，雪只是在青城下了，在汴京城内则没有下，宋人给这雪也赋予了象征意义。

拜完，双方各自道谢。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在斋宫相见，双方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推让着主客位，最后，皇帝坐了主位，两位元帅坐在了客位。

三巡酒过后，他们开始了正式交谈。元帅在谈话中主要谈到了太上皇，接着是皇帝，以及金军出兵的缘由。谈完话之后，皇帝将从府库中带出的金帛送给两位元帅。粘罕看到这个举动笑了，表示他们邀请皇帝是来谈大事，这种小事就算了，更何况，城打下来了，从理论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金军的。他叫皇帝将带来的东西分给金军将士就可以了。

在谈话过程中，对方以粘罕为主，斡离不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而已。这也可以看出来，战争与议和的主导方是粘罕。

金人所谓的大事，其实就是投降。既然投降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要把北宋皇帝的降表送往遥远的北方，请大金皇帝定夺，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所以，接下来会有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谈话之后，粘罕表示天已经不早了，不应该让城内久等，他们送皇帝上马离开。[26]一切都显得彬彬有礼。

在皇帝举行投降仪式时，城内的官吏和百姓又已经在南薰门内集合，他们摩肩接踵，比起前两天人数更加多了。从南薰门直到宣化门，道路的两侧都布满了香案，由于化雪，路上泥泞不堪，但为了通御车，人们专门拉来了新土，迅速将路铺平了。

皇帝投降完毕归来，刚到城门外，就有人认出了他的黄伞盖，市民欢呼沸腾，将消息传遍全城，山呼之声感天动地。见到皇帝后，许多人激动不已，涕泗横流。马车上的皇帝也哭了，到了州桥，手帕已经湿漉漉容不下更多眼泪，连话都说不出。郑建雄、张叔夜拉住马号啕大哭，皇帝也揽辔而泣。到了宣德门，皇帝才平定情绪，说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万民了！"他的讲话引起了另一波悲怆的哭声。

皇帝进了内城，外面的人群才逐渐散去，在首都的街坊里巷都在传说着皇帝的情况，人们高兴得如同获得了新生，处处都在烧香拜佛谢天谢地。[27]

第二天（十二月初三），皇帝下诏命令文武百官、僧道父老到金军营前致谢。人们走到了南薰门，请求金人批准出城。金国元帅却表示谢谢人民的好意，但军中不便逗留，心意领了，人不必来。

人们庆幸皇帝的归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与皇帝一同归来的，还有几位金人，为首的就是曾经的使节萧庆，他们常驻尚书省。这是北宋在行政上丧失自主权的起始。

就在人们去金军营地道谢被阻的那一天，金人还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在河北的康王召回。皇帝于是派遣曹辅去找康王，[28]私下

里，他和太上皇谈话时，还谈到金人表示想另立贤君，康王是合适的人选。康王的母亲韦妃恰好在，连忙表示这只是金人的计策而已。

那么，为什么不管是金人，还是北宋皇帝，都对远在河北的康王如此重视呢？

康王避难

就在汴京还没有陷落的闰十一月二十二，远在相州的康王突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名叫秦仔，声称官位阎门祗侯，是从汴京来的。见到康王后，秦仔从顶发中掏出一块黄绢，康王认出这是宋钦宗的御笔。黄绢上的字是：

檄书到日，康王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副元帅，速领兵入卫王室，应辟官行事，并从便宜。[29]

康王看后哽咽不已，向着朝廷方向跪拜，让在场的人嘘唏不止。

事后，人们根据这一幕创造了不少传说。比如，有人记载，康王在当天曾经和臣僚谈起过他的一个梦，在梦中，他的兄长宋钦宗脱掉了御袍披在了他的身上。他刚说完，秦仔就来到了。这个梦加上宋钦宗的诏书，赋予康王以合法性，让他继宋钦宗之后成为皇帝。[30]

事实上，宋钦宗派出的四个人都带着书信前往相州，以免有的人到达不了。他这么做，采纳的是侍御史胡唐老的意见。胡唐老认为，在宋徽宗所有的儿子中，除了被金人上次掳走的肃王之外，其余的都在京城。只有康王如同上承天意一般恰好身在相州。他本来是去出使金国的，却被人民阻挡而没有去成，流落在相州。现在，康王几乎成了朝廷唯一的希望。皇帝应该拜康王为兵马大元帅，号召全国勤王，解救危局。

按照规定，宋朝的宗室不得过度参与军事，拜康王为大元帅已经触

犯了这个禁忌。宋钦宗和大臣们犹豫不决，有人表示授予元帅都困难，何况还要加上“大”字。胡唐老力争说，局势都这样了，还这么珍惜“大”字干什么！宋钦宗这才写信给康王，拜他为大元帅。

十二月初一，当皇帝正在前往金军营地的路上时，康王在相州设立元帅府，成了全国抗金中心。[31]

此时的康王是宋徽宗诸子中唯一一个没有在汴京的亲王，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在金人即将吞并的河北地区。他的出现，打乱了金人的军事部署，因此，金人在解决完汴京问题后，必然要打败康王，才能算彻底征服了北宋朝廷。

皇帝正是应金人的命令，才派曹辅去相州找康王，叫他回汴京。

幸运的是，曹辅到了相州，康王却已经离开了。曹辅只好回汴京报告说没有找到。那么，康王到底去了哪儿？

原来，十二月十四，康王已经从相州到了北宋的北京大名府。大名府从距离上离汴京更远，但它与相州之间隔着黄河。北宋末年由于黄河改道，大名府已经到了黄河以南，与汴京之间没有大的水流隔开，是更好的勤王基地。加之冬天黄河结了冰，康王能够顺利渡过黄河。

投降之后，皇帝与康王的联系也没有中断。金人知道北宋皇帝喜欢把密信写在黄绢上，再装到蜡丸里，每一次使节出去，金人都会仔细地搜寻蜡丸。但皇帝又发明了新的方法，将文字用白矾水写在使节的袖子上，到了地方，用特制的水浸泡一下，就能够显影了。宋钦宗利用科技手段，躲过了金人的检查。

但宋朝的事情往往是有幸运就有不幸，不幸的是，康王的身边也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主战派以副元帅宗泽为首，主和派的首领叫作汪伯彦。

宗泽主张尽早解汴京之围，向更南方的开德府（即澶州，现河南省

濮阳市）

进攻；而汪伯彦则认为不管是开德府还是大名府，都距离前线太近太危险，作为大元帅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他主张前往更东面的东平府（郓州，现山东省东平县）。康王咨询大臣的意见，众人大都赞同安全选项。于是，十二月十九，康王又从大名府离开，去东平府避难了。[32]

在金军控制汴京的时间里，这位天下兵马大元帅一直如同一盏明灯，寄托着大宋的最后希望，只要他还没有被抓住，人们就觉得大宋江山还有指望。但他又只是一盏灯，怎么也无法变成熊熊烈火，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眼睁睁看着金军继续在汴京城横行无忌。

除了康王之外，其余的勤王队伍也不顺利。在汴京还没有被攻陷时，南道和西道也准备救援，范致虚与西道总管王襄、陕西制置使钱盖，率领十万人马驰援。到了颍昌时，听说汴京失陷，王襄和钱盖就回去了。

范致虚不想回去，就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路统帅王似、熙河路统帅王倚，率领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前来。他们分成水陆两军首先向西京河南府（洛阳）杀来。但范致虚本人不知兵法，他过于信任一位叫作赵宗印的和尚，这位和尚大言炎炎，其实也不会打仗。军队出了武关，到了邓州的千秋镇，突然遇到了金军洛索的部队，金军一冲，大军立刻溃散，死伤大半。王似、王倚、孙昭远只好率军回到了陕西，范致虚收拾残兵去往潼关。[33]这支勤王军队从驰援变成了防守，以不让金军进入陕西为目标了。

索求不已

在首都汴京，与金军的交涉仍然在继续。皇帝出城到底与金军达成了什么协议，除了递降表之外，还干了什么，这件事一直是个疑问。

比如，既然打败了，肯定要犒军，上一次汴京保卫战，皇帝与斡离不协商的数字是五十万锭金、一百万锭银，换算成两则是五百万两金、五千万两银。

那么这一次金军动用了两路大军，到底需要支付多少战争赔款呢？

与上一次皇帝早早地宣布了赔偿数额不同，这一次，赔偿数额却只在少数人中流传，平民百姓一直被蒙在鼓里达一个月之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只有一个：赔偿数额实在太庞大了。

十二月初三，金军的索赔文书到了。根据文书，皇帝答应的数字是：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折合成两，则是一亿两金、十亿两银，同时还需要绢帛一千万匹。[34]与上一次相比，金银的数字增长了二十倍，即便上一次，最后也无法凑够，那么增加之后的数字更是无法完成的。

但皇帝不得不做出姿态，开始向百姓筹款。当然，首先需要做出姿态的是皇族和大臣，于是，皇帝要求大臣将家里的金帛都拿出来，诸王、内侍、帝姬也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为了更快速地获得金银，皇帝还下令开设一个购买金银的机构，用钱钞从民间购买金银。很快，金价涨到了五万枚铜钱一两，银价涨到了三千五百枚铜钱一两。[35]北宋的金银价格与铜钱的兑换比例是长期稳定的，金大约是一万枚铜钱一两，银为一千枚铜钱一两，此刻已经翻了好几倍。

为了加快搜集金银的速度，朝廷在原有开封府尹徐秉哲的基础上，又任命了另一位兼领府尹王时雍，让他与徐秉哲一起搜刮金银，并由御史监督数目。[36]从这时开始，开封府突然成了一个重要的机构，金人提出的要求大都由这个衙门完成。事后，人们会看到，虽然打仗不行，但在执行命令上，开封府却是一个如此高效的机构，在它的帮助下，金军可以将首都的最后一滴血榨出来。

十二月初四，为了更精确地了解汴京到底有多少财富，金军驻扎在城内的代表开始检视府库，调查账目，以确定开封城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物资。与此同时，开封府尹贴出文告，要求富豪之家必须将所有金帛上缴。[37]

十二月初五，金人的索求继续加码。这一天又提出了三个新要求：第一，向金军供应一万匹马；[38]第二，开始交割河北和山西地区；[39]第三，出征将士面对的最复杂问题是性需求问题，要求皇帝提供一千五百名少女劳军。[40]

为了凑够马匹数目，开封府贴出文告，要求御马和民间马匹都必须交出，否则全家受军法惩戒。文告鼓励人们互相告发，告发者可以获得三千贯钱，官员中，执政、侍从、卿、监、郎官都只准留一匹马，其余交出。这项命令让开封府一共凑了七千多匹马，虽然不足万匹，但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是从此以后，士大夫都只能骑驴、乘轿、徒步，骑马的人基本没有了。[41]

关于交割问题，皇帝也服从了，他派遣陈过庭、刘韐、折彦质三人，分别前往河北和山西进行交割。[42]除了金人已经攻克的，北宋手中还有四十个州左右在河北与山西地区，仅仅依靠此三人很难快速完成交割。为此，皇帝又让吏部选择了文武官员各二十人，随金军前往河北和山西地区交割，这四十人又由陈过庭等人进行统筹。[43]

金人索要的少女，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但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宫中的低级女侍（宫嫔），许多宫嫔不肯出宫，四处躲藏，实在躲不过宁肯跳水自杀。[44]

好不容易把十二月初五过完，初六又来到了。这一天，金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将所有兵器上缴。[45]在首都失陷时，由于溃兵们将兵器到处丢，许多都被百姓捡走了。[46]于是，勤快的开封府又发出了新的文书，要求百姓将武器都交出来，一并运送出城。运送武器的工作持续

了好几天，才全交给了金军。[47]

到这时，金军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宋军失去了马匹和武器，就再也没有了抵抗的能力，除了任人宰割，不会再有其他的结局。

彻底解除了首都的抵抗之后，金军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是战争赔款，北宋朝廷一直在加速筹集，但仍然没有完成；第二是河北、山西地区的交割，陈过庭已经于十二月初七出发，但其余每个城的使节还没有出发，要完成交割也并不是那么简单。[48]以上次的经验来看，不管有没有圣旨，守将往往会拒绝交割，继续坚守。而金军也不可能长期驻扎在开封城外，毕竟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迟早会出现短缺，到时如果没有完成交割，就可能在回程遭受打击。

为此，金军又想了一个新的办法。经过检点，河北、山西地区仍然控制在北宋手中的还有四十五个州，这四十五个州各有守将，如果将守将的家属控制住，对方就不敢反抗了。

十二月初九，金军提出要求，北宋政府必须将河北、山西守臣、监司的家属交出，由金军带着前往各城池做人质。只有守臣完成交割，才可以将家属领回。除了守臣的家属之外，金军还索要二十几位奸臣的家属，这些奸臣包括蔡京、童贯、王黼等人。已经投降金军的张孝纯、蔡靖、李嗣本家属也在索要之列，为的是将他们送往北方与降将们团聚。再加上主战派或者曾经参加过战斗的李纲、吴敏、徐处仁、陈遘、刘韐、折可求、折彦质等人的家属。[49]其实早在上个月的二十八，金军就对北宋使臣们提过这些要求，只是到现在，才正式以命令的形式发到城内。[50]

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许多人的家属可能并不在本地。但开封府还是按照金人的要求将在京的家属（能找到的）都招到了开封府的院内。十二月十二，这些人开始集结于开封府。由于手续的关系，这些人被弃置在院子里多日，官员们急着

把他们招来，却并没有做好招待的准备，连饭都不管，随处安置。家属们在饥寒交迫中呼号着，这让外面听说了他们遭遇的人们更加愤怒。他们本来是国家的功臣家庭，却由于皇帝的无能，成了金人的抵押品。不仅这样，就连在北宋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

但这件事一直被拖下去了，直到第二年二月初仍然还没有结束。

除了交割之外，最麻烦的就是金人索要的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其中绢是最容易满足的，因为金人在核查库房时，已经知道皇帝的库房中有一千四百万匹绢，索要一千万匹，皇帝是出得起的。[51]从十二月十三开始[52]，皇帝下令，军民将内藏的元丰库、左藏库、大观库所有的绢帛都搬出来，送到南薰门，移交给金军。[53]

十二月十五，大规模搬迁继续。[54]开封府的组织工作不错，原本保家卫国的军队和民兵都当起了搬运工，负责打仗的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专门派人监督搬运，还用旗帜区分各个队，防止放错了地方。就这样，一天才搬了十万匹（百分之一）。

十二月十六、十七，搬运继续。金军对绢的质量检查得也格外严格，轻的、旧的，一概用墨水标记，拿回退还。现在浙江的丝织品全国闻名，但在金人看来，浙江的绢由于过于轻，反而不适应北方的需要，他们将浙绢退回，要求更换成重的。据说，两位元帅还为此生了气，责怪北宋不认真。

十二月二十，还没有交割完毕，金人已经非常不耐烦，打骂交割使臣的事情时有发生，许多人不愿意参与交割工作，推不开的，只好带一些大蒜、砂糖、刺绣、花藤做礼物，和金人搞好关系，求他们高抬贵手。到了第二年，即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二，绢这一项才算交割完毕。[55]

除了绢之外，金人的要求中还有很多小项目，比如书籍。金天会四

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二十五[56]，元帅府发出命令，要求宋朝提供国子监的书籍，以及汉文的藏经。金人的品位还不低，指名要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以及《资治通鉴》，却将王安石及其同党的学说全部抛弃。[57]

这件事又交给了开封府，皇帝的意思是，尽量满足金人的好学之请，不过国子监的书并不全，有一部分必须外购。皇帝要求，去书店买书必须付钱，可是开封府执行时，只是派人将书店的书搜走了事。[58]

文化产品除了书籍，还有各种古玩，于是，十二月二十八又轮到古玩遭殃了，北宋的皇家器皿都登记在《秘书录》里，金人得到了这本册子，按图索骥，要求皇帝提供册子里的古玩。

绢、书、古玩等交割虽然麻烦，却还可以执行，到了金银的交割程序，执行就比较困难了。

十二月十一，由于金银筹集速度太慢，皇帝又下了诏书，表示金人不烧杀抢掠已经是恩赐，要求全城的公私、权贵、豪富都将金银交出来，即便皇后的金银也不能留。踊跃缴纳的可以授官，抗拒的严惩。[59]

十二月十二，根据皇帝的圣旨，开封府出台了具体的办法。表示准许百姓告密，告密者可以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奖励。其中不乏见风使舵者，一位叫作陈行的人立刻前往开封府，将自己经营的和乐楼内的金银捐了出来，他果然得了官职。

十二月十三，开封府四处出击，大街上要么是各种吆五喝六的办事员，要么是被抓的嫌犯。就连宋徽宗的郑皇后宅子也被查出来隐匿金银，皇后父亲和祖父的封赏被追夺。[60]当天，金人还来要走了五十个酒匠和三千瓶酒，开封府也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十二月十四，开封府开始挨家挨户入户搜查，特别是那些金银铺子，有时一个铺子就能搜出成千上万两的黄金。市民也逐渐踊跃缴纳黄

金。

十二月十九，御史台、大理寺和开封府联动机制已经运行得纯熟。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行政、司法和监察权联动。在西方讲究行政与司法的分离，互相制约，但中国政府做大事时，总是以行政为主导，让司法和监察都予以配合，所以，一旦做事，都是行政、司法、监察联席的。这一次行政司法联动的打击面很大，按照惯例，打击一般是针对老百姓的，但这一次，贵戚、权贵家族，即便官至承宣、留后，妇人中封爵至恭人、夫人，只要不缴金银，也一并戴上枷锁带走，毫不留情。[61]

为了表示人们的金银不是白缴纳的，皇帝会装模作样发给人们一些纸钞，算是买卖不是抢夺。每一两黄金，皇帝会给茶钞或者盐钞三万二千，一两银子给两千二百。

由于宋朝的各级政府也可以参与经济活动，各地政府也在京城设有类似于驻京办的机构，不过当时的驻京办只负责买卖土特产。这些机构好不容易到京城赚了点钱，现在也必须全都交出。皇帝赐给大臣的金带，也全部收回。

就在皇帝命令开封府开足马力催促人们上缴黄金时，金人也在观察到底能够从汴京获得多少金银。由于绢的数目是入账的，所以一目了然，既然账上有一千四百万匹绢，金人索要一千万北宋是拿得出的，所以绢的事情好办。但金银藏在民间，数目是未知的，所以金人才会直接提出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的要求。

随着事情的发展，金人已经对金银的数量有了了解，认定整个北宋都不可能有这么多黄金了。于是他们修改了数目。十二月二十四，元帅们通过信件向汴京城发来了新的命令，这封信最重要的目的是催促人们赶快完成任务，而在金银的数量上，也从最初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新要求是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62]金的数量是最初提出的十分

之一，银是四分之一。

如果与不到一年前的第一次围城战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金是上一次赔偿（五十万）的两倍，银（一百万）是五倍。

上一次要求的金银换算成两，则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最终皇帝东拼西凑，交给金军的只是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再加上皇帝的各种珍玩。

而这一次要求的赔偿数目比上次还多，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修改之后的数目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金人的这个举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可视为一种友好的表示；二是为了不让宋人过于绝望，让他们感到能够完成任务，从而加快交割速度。

不管怎样，在催促之后，金银的交割工作果然加快了速度。十二月三十，在绢还没有完全到位时，首批金银的搬运工作起步了。在南薰门的大道上，搬运工络绎不绝，整座城市骚动起来，人们望着如山的宝物感慨叹息。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二，随着运绢的结束，人们将金银搬到城门口。正月初三，金人开始检验金银的成色，不合格的退回，开封府又把不合格的金银运回去，重新熔铸。城中的百姓喜欢看热闹，跟着搬运人员来回地跑，人数甚至达到了上千。在城门上的金军一看上千人跑来，以为出了大事，连忙拔出刀剑准备迎战，后来才弄清楚状况。[63]

伴随着第一次交割而来的，是开封府的第二轮催逼。直到正月初九，开封府仍然想尽办法从官员和民间压榨出更多的金银。他们按照官阶大小制定了一个名单，宰执以下每个官员都有指标，如果官员上缴数量和指标相差太多，就立刻捉拿敲打一番，直到对方愿意缴纳更多的金银为止。在金银面前，所有的官员都丧失了尊严，他们的生命甚至抵不

上一两黄金。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又起了变化。

两位元帅对皇帝仍然保持着表面的友好，开封府干得热火朝天，皇帝也以为只要尽量满足金军的需求，就能维持和平，保住赵宋的半壁江山。

一场更大的变局却已经在酝酿之中……

【注释】

[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五篇。

[3] 《南征录汇》引刘同《寿圣院札记》。

[4] 参考《中兴遗史》。

[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一六篇。

[6]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7] 《南征录汇》引高有恭《行营随笔》。

[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9] 参考《中兴遗史》。

[10] 参考《中兴遗史》。

[11] 参考《东京梦华录》。

[12]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中兴遗史》等写作蓝从家。

[13] 参考《瓮中人语》。

[14] 参考《靖康纪闻》。

[15] 参考《东京梦华录》。

[16] 参考《靖康纪闻》。

[1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8]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19] 《南征录汇》引克锡《青城秘录》。

[20] 参考《瓮中人语》。

[21]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22] 参考《中兴遗史》。

[23] 参考《靖康纪闻》。

[24] 参考《中兴遗史》。

[25]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三〇篇。

[26] 根据《靖康纪闻》《避戎夜话》等。

[27] 参考《靖康纪闻》。

[28] 参考《靖康纪闻》。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里的引文是简版，另《三朝北盟会编》载有全文。

[30]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3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3] 参考《续资治通鉴》。

[3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与《续资治通鉴》。

[35] 参考《续资治通鉴》。

[3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7] 参考《靖康要录》。

[38] 参考《瓮中人语》。

[39] 参考《宋史·钦宗纪》。

[40]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41]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引《泣血录》。

[42] 参考《宋史·钦宗纪》。

[43] 参考《靖康要录》。

[44]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45] 参考《瓮中人语》。

[46] 参考《靖康纪闻》。

[47]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48] 参考《靖康纪闻》。

[49] 《靖康纪闻》，名单根据《三朝北盟会编》有补充。

[50]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51]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二八篇。

[52] 这一天（十三），金人还要求将属于河东（也在黄河以北，但传统上比较独立）的蒲州、解州都割让给金国，皇帝同意了。见《瓮中人语》。

[53]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

[54] 参考《靖康纪闻》。

[55] 参考《靖康纪闻》。

[56] 《瓮中人语》记为十二月二十五，《靖康纪闻》记为十二月二十三，《三朝北盟会编》记为十二月二十六。

[57] 参考《靖康要录》。

[58] 参考《靖康纪闻》。

[59] 参考《靖康纪闻》。

[60] 参考《靖康纪闻》。

[61] 参考《靖康纪闻》。

[62]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二八篇。

[63] 参考《靖康纪闻》。

第四部靖康之难

第十四章
惊天之变

永离龙庭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初一，原是汴京城最热闹的时候。在以往的春节，开封府允许全城狂欢三天（关扑），官民从早上开始串门庆贺，街上摆满了食物、果实、礼物等，人们唱歌跳舞游戏，度过一年的开端。

在一些特殊的商业地段（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州南），都扎着彩色的棚子，里面铺陈着各种喜庆的商品（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加上歌舞表演，显得热闹非凡。晚间人们聚赌、游戏、宴会，就连妇女都盛装参加。即便贫民，也都穿上干净衣服把酒言欢。

在皇帝的宫廷里还要举办正旦大朝会，皇帝坐在大庆殿里，选四个高个子士兵站在殿角，号称“镇殿将军”。各国的使节们都来到大殿庆贺，百官、读书人也都参加，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也会派人来供奉礼

物。[1]

但这一年，人们却没有太多心思庆祝。皇帝只是简单地出行，去了太上皇所在的延福宫行礼拜谒。[2]然后，皇帝派人前往金军营地贺岁。与此同时，金国的两位元帅也没有闲着。他们首先派了二十一人到大相国寺烧香敬佛。实际上，这些人在四天前的十二月二十七也到大相国寺拜过佛。[3]

另外，金人派遣了真珠大王以及另外八个人前来贺岁。[4]北宋派往金军营地的是礼部侍郎谭世勣，但金人以官小为由拒绝了，朝廷只好又派遣济王、景王前去，这才被接纳。

除了官方的道贺之外，百官、僧道等也来到了南薰门外，请求向两位元帅致谢。但元帅们表示心领，就请他们回去了。[5]

金人对于汉人习俗的痴迷，也令人颇为意外。比如，汉人文化中，正月最热闹的还不是春节，而是元宵节。从冬至开始，开封府就负责在大内外的宣德楼对面扎下了彩棚，商人们占据了御街两廊。玩杂技的、变戏法的、卖东西的、玩猴戏的，应有尽有，热闹如同大集。正月初七，人们开始张灯结彩，等待正月十五要大闹五天。这是一年里节日的高潮时刻，整个汴京也成了不夜城。[6]

金人对于汉人的灯俗非常感兴趣，到了初九就要求北宋将彩灯列入贡品。开封府总是能把事情做得好上加好，一接到命令，立刻把景龙门外的灯全都搬走，送给金人。金灯、琉璃、翠羽、飞仙之类应有尽有。金人感觉还不过瘾，于是开封府又将京城内道观、佛寺和店铺的灯都搜罗走了。[7]

金人用这些灯将大营装扮一新，在正月十四时，甚至专门允许城里的人上到城墙上观看。[8]由于城墙已经被金军占领，平常是不允许人们上去的。

从贺岁到要灯，看上去似乎金人的情绪已经缓和，他们对宋文化充

满了好感，一旦获得了黄河以北的领土和战争赔偿，就会离开。

但就在人们逐渐放心下来时，正月初八这一天，金人又提出来，让皇帝再出城一趟。这次出城的目的是给金国皇帝加徽号。

这件事发生得有些突然，其实最初是宋钦宗先派遣何㮚与李若水于正月初七这一天访问金军营地。[9]皇帝的目的是乘着金人松动，再请求他们减免一些金银。金人没有答应，却邀请皇帝亲自前来。[10]元帅们表示，农时临近，他们也快要撤走了，希望皇帝去给金国皇帝加个尊号。北宋使者把消息带回来，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李若水甚至认为，如果皇帝亲自前去要求减免一部分赔偿，对方是有可能答应的。[11]

与北宋使者一块儿来的金国使者却说皇帝不去也行，比如，一个叫作高尚书的金使就表示，皇帝如果不想去，叫亲王和最高大臣同去也可以。

到底要不要出去，宋钦宗也犹豫不决。[12]

当天，太上皇、太上皇后也来看皇帝，一家人其乐融融。宋钦宗突然大发感慨，认为作为皇帝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如果能够替百姓减少一点灾难，就不要吝惜自己的身体。他决定亲自前往金军营地。[13]既然出过一次城，再出一次又何妨？

正月初十清晨，皇帝的车驾出现在了南薰门。这次出行极为低调，甚至许多内侍都不知道他的离开。虽然低调，但皇帝在出城之前还是做了准备，他因筹办金银数量不足，将开封府尹、少尹各降三级，算是给金人一个交代。他还携带了一部分金银同行，表现出充分的诚意。

另外，他任命枢密使孙傅为留守兼太子少傅、礼部侍郎谢克家兼太子宾客、户部尚书梅执礼担任副留守，并让皇太子监国。他秘密嘱咐孙傅，万一有事，孙傅就辅佐太子掌管全局工作。[14]与皇帝同行的则包括了何㮚与李若水等人。

虽然皇帝是秘密出发，但还是有百姓得到了消息，他们在城门口等待，攀住了皇帝的车，请求他留下，以防金人的阴谋。护卫皇帝的是范琼，他请求百姓放手，表示皇帝当天去，当天就能回。之所以必须去，也是为百姓的性命考虑。

仍然有人不肯放手，范琼持剑斩断了攀车人的手指，杀掉了几人，皇帝才得以出发。[15]

认为皇帝不应该出城的还有张叔夜。直到最后，张叔夜都拉住马苦苦哀求，放声痛哭，引得周围哭声一片。但皇帝去意已决，回头用张叔夜的字来称呼他，并说：嵇仲努力！[16]

城门外，金军列队等待，他们见皇帝的卫兵太多，请一位叫作王球的人带回了七百三十四名侍卫。[17]

皇帝去了粘罕的营寨青城之后，人们继续在城门口等待，但到了晚间车驾没有回来。这和第一次皇帝出城的情况类似。那一次，皇帝离开后当天也没有赶回来，而是在第三天才回到城内。这一次，皇帝也让一位叫作王孝杰的人带回来一封信，表示金军首脑还没有到齐，必须等来日议事，所以只能第二天回来了。[18]

第二天（正月十一），人们再次来到城门口等待皇帝的归来。但到了中午时分，有人带回消息，金人因为移交的金银太少，将皇帝扣留了。只有城内拿出更多的金银，才能赎回皇帝。

借着这个事儿，开封府请求人们踊跃上缴金银，好让皇帝快快回宫。

不过，到了傍晚，又有消息传来，说粘罕等人留下皇帝只为金银，最快明天就能回来。

就这样，人们一天天带着希望等待，到了晚间又陷入失望。他们事后才知道，在金军内部，对于事情的判断已经有了变化，所以，皇帝第

一次出城和第二次出城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第一次车驾出城时，金人觊觎的无非就是河北和山西的土地，以及充足的犒军钱。他们以为这两样东西都不难得到，只要北宋皇帝一声令下就可以了。

但经过一个月，两个目标都没有达成，北宋社会反而向着颓败分裂方向滑去，就连皇帝的命令都无法执行。于是，金人有了三方面的顾虑：第一，无法完成土地交割；第二，无法获得足够的金银安抚军队；第三，北宋的社会乱套，让金军失去对京城的控制。

关于土地交割，虽然早在十二月初，宋钦宗就派遣陈过庭、刘韐、折彦质三人分别前往河北、山西进行交割。但事实上，直到十二月十八，陈过庭等人才真正出发，之前他们虽然先到了两位元帅的大营，却由于元帅们的想法太多，迟迟没有出发。[19]

金人原本想让北宋朝廷将各位北方城市守将的家属都交出来，再带着家属一起去交割，只要守将肯交出城池，就把家属还给他们。皇帝同意了，开封府也迅速去部署，却由于找不够人而屡屡耽搁，加上当时最要紧的事务是筹集金银，找人的事情直到下一年还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金人只好让陈过庭等人匆匆上路去碰运气。

可运气并不好碰。以在深州的交割为例，宋朝派往深州的交割使是欧阳珣，他本来应该帮助金军劝说城内放下武器，但到了城下，欧阳珣反而大喊："朝廷被奸臣所误，我来就是为了死在这儿，你们都要尽忠报国！"金军将欧阳珣带到燕京烧死，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得到深州。一个多月过去了，金军只得到了石州一个州。[20]

河北的交割之所以麻烦，还因为有一个康王。金人已经屡次三番地要求皇帝将康王召回。即便康王性格并不适合解救朝廷的灾难，但只要他还在河北地区活动，就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让河北守将们不肯放弃抵抗。

在金人的要求下，皇帝曾经派曹辅去相州找康王，却没有找到。到了新一年的正月初二，金人再次迫使皇帝派遣中书舍人张澂前去寻找康王，把他叫回来。就连皇帝的诏书，金人都亲自改了好几遍。[21]为了防止皇帝与康王串谋，金人还派人与张澂一起出发。

但不巧的是，金人这一次又收到了错误的情报。当时宗泽在开德府抵抗金军，为了鼓舞士气，他拉起了大旗，表示康王在开德府。这个消息传到了汴京，于是金人让张澂前往开德府寻找。

事实上，胆小的康王并不在开德府，而是逃到了更加安全的东平府躲藏了起来。张澂和监视他的金人来到了开德府城下，城上的士兵告诉他们，康王不在这里，至于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张澂只好和随从返回汴京复命。[22]

找不到康王，河北地区交接便无法完成，金人的不满日增。

至于另一个问题——金银的交割也不顺利。北宋用了半个多月才完成了绢的交割，至于金银，连收都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割完毕，更是一个未知数。金人只好加强了对皇帝的逼迫，以纵兵掳掠相威胁，让他加快速度。

更麻烦的是，随着金人加强了对皇帝的逼迫，首都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烈。皇帝第一次从金军营地归来后，金军、皇室、人民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金军没有掳掠，城市也还完整，同时皇帝答应了金军的一切要求。但到了执行时，三方都经历了巨大的不安与痛苦。金人的痛苦在于土地与金银交割的遥遥无期，人民的痛苦在于皇帝的苦苦相逼，而皇帝最为痛苦——金军在压迫，人民在反抗。

当皇帝催缴金银过重时，人民暗地里就用行动来对付他。十二月十五，官方最重要的几个衙门发生了火灾，大火从尚书省爆发，火势迟迟得不到控制，波及了祠部、吏部和刑部。为了平息火灾，人们把尚书省的牌子都拆下来投入火里，这才“镇”住了大火。[23]

到底这场火灾如何爆发，已经无从知晓。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心怀不满的人民放了一把火。

火灾的阴影并没有散去，到了十二月二十五[24]，又一起火灾烧毁了开宝寺、天宁寺，并波及了周围五百家民宅。这一次大火可能与金军的催缴文书有关。在一天前，金人向汴京城发信，将赔偿金定为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金人以为大幅减少赔偿金，已经算是对北宋的恩赐。但人民的感受却恰恰相反，在之前，皇帝并没有将数额公之于众，这是人民第一次知道赔偿金额。他们被庞大的数额吓住了，从这时开始，北宋子民人心彻底散掉。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一天之后的开宝寺大火是人为放火，但很可能与此有直接关系。

为了挽回人心，皇帝也推出了不少举措。除了在金银方面加紧搜刮，坚决不松口之外，在其他方面皇帝却想表现得仁爱。比如，十二月二十二，天降大雪，厚达尺余，城内的柴火都用完了，皇帝担心人民受冻，下令将艮岳万岁山开放，人民可以进入园中砍伐树木御寒。其实开放艮岳的前一天，皇帝已经命令有计划拆毁一批政府房舍，将木柴交给人民，但这批房舍里的木材有限，只好把最美丽的皇家园林也开放了。

宋钦宗一声令下，人们纷纷入园，多时能达到上万人。当年宋徽宗从全国运来的珍奇树木就这样被当作柴火砍掉了。

不过，皇帝的好心却并没有换来回报。由于京城逐渐进入无政府状态，皇帝开放园区很难惠及普通民众，反而成了流氓豪强觊觎的对象。当人民砍伐了树木，准备运出时，都被有组织的军事和半军事团伙夺走了。

普通人不仅没有得到柴火，反而闹出了人命。十二月二十三，万岁山的“毁灭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天，不仅万岁山的树木不留，就连宋徽宗精心设计的亭台楼阁也都尽数拆毁。由于没有纪律，许多人在房屋倒塌时没来得及逃出，就被砸死在里面，这样的死者有上百人之多。为

了抢夺木柴，互相斗殴致死的也有数百人。尸体也没有被浪费，瞬间被刮成了白骨，肉都被拿去吃了。开封府最后不得不出面杀掉了为首的五个人，秩序才稍稍恢复了一点。

对万岁山的破坏持续到十二月二十九，直到什么都没有剩下，才告结束。一代盛景只存在了几年时间，就毁于一旦了。[25]

汴京城的混乱让金军更加担心，害怕无法实现之前制定的两个目标，这是他们决定扣留皇帝的直接原因。那么，皇帝在出城之后又遭遇了什么呢？

宋钦宗在正月初十出城，首先被带到了青城斋宫西庑的三间房子里，在这里，他被告知两位元帅没有到齐，请他暂时留下。分给他过夜的房间是斋宫端成殿的东庑。由于金人准备不足，皇帝甚至连卧具都没有，只能在土床上铺了戎席，将就着住下了。皇帝宿舍的周围用铁索与外界隔开。

就是在这里，宋钦宗感觉到了不祥的气氛，除了向汴京城军民发出诏书，表示办完事就回去之外，他还给大臣们发了一封秘密诏书，这封诏书直接要求王若冲、邵成章等人护卫皇太子到宣德门，将大事掌管起来，这就有了托孤的含义。皇帝还秘密要求闾门宣赞舍人符彬持着诏书到北道总管司（负责河北等地），要求地方将领各自保卫国家领土，不要受金人摆布。[26]

正月十一，皇帝继续被留在了青城，他做出安排，减少卫队，只留了三百人跟随自己，其余人都回城。陪伴他的大臣们也大都回到了城内，只留下了九位必须在场的官员，分别是郓王赵楷、宰相何㮚、执政冯澥、执政曹辅、翰林学士承旨吴幵、吏部尚书莫俦、中书舍人孙觌、尚书礼部侍郎谭世勣和太常少卿汪藻。

从皇帝的安排来看，他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这只是他的直觉，其实他还是指望能够回到城内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连

两位金国元帅都不知道。

宋朝皇帝的投降书是正月初三传到位于东北地区的金国皇帝（太宗吴乞买）手中的。金太宗与群臣讨论，既然赵氏两位皇帝都这么言而无信，不如废黜他另立别人。初五，这个讨论还在进行之中，大臣知枢密院事刘彦宗上表，请求还是立赵氏当皇帝，可以换人，但不要换家族。这个提议被金太宗否决了。[27]也就是说，直到正月初五，金国皇帝还没有发出信息，即便发出了，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五天之内，就将诏书从东北传到汴京。所以，宋钦宗出城时，就连两位元帅也不确定是否要废黜宋钦宗，他们只是嫌宋朝做事慢，将皇帝扣押了，逼迫城内加快筹款速度。

两位元帅虽然不确定事态如何发展，但对宋钦宗的态度又有所区别，其中二太子斡离不是同情宋钦宗的，希望他继续当皇帝。但粘罕却更加老辣，他在给皇帝的信中的确提到了废黜赵氏皇帝，另立新君的意思。[28]所以，邀请宋钦宗出城，又可以看作是粘罕的预防性措施，一旦金太宗回信中有废黜赵氏的旨意，就可以立刻执行。

失控的首都

由于皇帝被扣押，汴京城内筹集金银的速度果然加快了。一方面，向城外搬送金银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开封府再次加紧了搜刮，又增加了二十四位侍从郎官，加入了催缴大军。

出于人们对皇帝的感情，许多人是自愿缴纳的，比如，有贫民听说皇帝有难，自愿缴纳金二两、银七两，只要能够救回皇帝。[29]

对于不愿意缴纳的情况，开封府就只好采取强制措施，他们无非还是拿皇亲国戚、官员、内侍、僧道、技术、倡优等最可能有金银的人家做文章。在摊派过程中，家家户户必须都走一遍，不准有遗漏，搞得汴京城内鸡飞狗跳。开封府还专门列了一个可能藏有金银的人群的单子，

这些人包括："御史台文武百官、亲王、公主、王时雍僧道技术放出宫，开封府戚里、医药人、百姓、老娘诸王彭端公吏，曾经只应优倡之家，及两军祗侯，曾在行局祗应倡人入内，内侍杨戩贾蒙等下勾当使臣曹刚大宗正司宗室之家，曾遭遇辇宫，大小园子曾遭遇兵级东门司嫔妃等龙德宫大内黄院子卫尉寺幕士。"[30]

正月十四，按照之前的说法，皇帝最多离开五天就会回来。人们又早早地到城门口等待皇帝的归来，但没有等到皇帝回来，等到的只是两榜文书，一榜是开封府的限期文书，给定的最后期限是正月十五，另一榜是金军文书，表示如果金银不到位，就纵兵掠夺。

在平常年份里，正月十五是最热闹的一天，但这一年却过得冷冷清清。城内缺乏粮食饿得人吃人肉，灯也被金军拿走了，皇帝也不在城内，金军还威胁随时掠城。

正月十五，皇帝来信，表示自己在金军营中住得很不错，帐幄、饮膳、炭火、什物一应俱全。事实上，当天晚上元帅们还请皇帝去刘家寺看灯，金人把从城内索要的花灯都挂在了刘家寺，寺内有两万多盏灯，还有歌舞表演。真珠大王设也马和宝山大王斜保亲自护送皇帝从青城到刘家寺。寺内一共有九桌酒席，堂上三席，堂下六席，坐满了金军的高官显贵。[31]虽然元帅们没有和皇帝搭话，但从邀请其入席这件事情上看，似乎不是坏迹象。

跟随皇帝的官员待遇也不错，金人对他们很礼貌。

可金银不到位，皇帝就是回不去。当时的官方舆论不能一味逼迫人们交出金银，就拐弯抹角采取了另外的说法，官方宣传机器不断强调人们应该感谢老天爷派来个圣君。这个圣君前往金军营地，是代大家受过，让汴京城免遭劫掠。圣君这么爱护大家牺牲自己，真是比宋仁宗都更加贤明。为了救这个圣君，大家也应该多出力（缴纳金银）。

不管官方怎么宣传，还是有人看不出宋钦宗哪一点像个圣君。著作

郎胡处晦又写了一首《上元行》来讽刺圣君，大家纷纷传开：

> 上元愁云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风。六龙驻跸在草莽，孽胡歌舞葡萄宫。抽钗脱钏到编户，竭泽枯鱼充宝赂。圣主忧民民更忧，胡子逆天天不怒。向来艰难传大宝，父老谈王似仁庙。元年二年城下盟，未睹名臣继明道。都人哀痛尘再蒙，冠剑夹道趋群公。神龙合在九渊卧，安得屡辱蛟蛇中？朝廷中兴无柱石，薄物细故烦帝力。毛遂不得处囊中，远惭赵氏厮养卒。今日君王归不归，倾城回首欲悲啼；会看山呼声动地，万家香雾满天衣。胡儿胡儿莫耽乐，君不见望夕欷歔东北角。[32]

戏谑归戏谑，但人们的担心还在加重。种种迹象表明，皇帝被扣留，并非仅仅因为金银那么简单。比如，正月十三，一位叫作王宗沔的官员随同金人入城，边走边哭，让见到的人们都感到惊讶。[33]据说，皇帝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后来又传说王宗沔和金人是来“窥伺”帝姬的。宋徽宗曾经推行了新的制度，他的女儿不准叫“公主”，而改叫“帝姬”。金人窥伺帝姬，自然是要和亲。[34]

对于大部分农耕民族或者国家而言，和亲问题永远是最伤自尊的问题。被征服的国家或者民族可以将财富都交给征服者，可一旦女人或者女儿被征服者享用，都会被视为奇耻大辱。

但偏偏游牧民族习惯于在战场上抢夺女人，并把占有对方女人当作理所当然。而被征服者也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哭天抢地，反而把女儿嫁给征服者当作一个延续血脉的机会。比如，辽国灭亡后，大量的辽国女人（甚至皇帝的妃子）都归了金人，也没有人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后来的成吉思汗，也有自己老婆被别人抢走的经历。成吉思汗将老婆抢回时，老婆已经怀了孕，生下了术赤，成吉思汗毫不介意，仍然将术赤当作自己的长子。

金人与宋人在女性问题上的尖锐冲突，也让事情更加具有了悲剧色彩。

到了正月十六，金人与宋人的冲突加剧了。由于皇帝老是不回来，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开始自行其是。其中思想最极端的大都是京城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集体来到宰执所在的都省，提议说大家都想给金人写封

请愿书，请金人将皇帝送回来。

执政者一听这也是个办法，就答应了，让他们分头去写。但太学生们把请愿书都写好后，执政者却开始担心这个法子没有用，又反悔了。

在太学生中，有一个叫作徐揆[35]的人，他不顾执政者的禁令，独自前往南薰门，将请愿书交给了守门者。守门者将他放到马上带出城，见到了两位元帅。[36]徐揆与两位元帅发生了争吵，最终被杀。

除了徐揆之外，给金人递请愿书的还有太学生汪学海，以及进士段光远。[37]

但这些文人有一个毛病，他们习惯于掉书袋，在请愿书里引经据典，比如，徐揆引用了《春秋》里的两个例子证明金人为了修养道德，应该及时收手，让皇帝回去。汪学海更是长篇累牍，让人读起来都累。这样的文人请愿除了自己送死之外，起不到什么效果。

当太学生请愿的消息终于传到宋钦宗耳中，他只是淡淡地回了一条手札："此事岂口舌所能下！"[38]

正月十六，也是宋朝军队悲伤的一日，这一天宋军大将刘韐自杀。刘韐是足以与种师道、姚友仲并列的战将。他出道于西北地区，参与了西夏战争，也加入过征方腊之战。他最著名的战功是守真定。作为河北地区最重要的堡垒，金军从第一次侵宋时就想得到真定，正是刘韐的坚守，让真定没有沦陷。不仅守住了城，刘韐还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因为其他城市都选择闭门死守，让城内挨饿，刘韐却正常地开闭城门，让百姓自由出入，所以粮食从来没有匮乏过。也是因为守真定，刘韐得到了金人的尊敬。

第二次金军入侵，刘韐被调离了真定，导致真定的失守。汴京城被攻破后，刘韐与陈过庭、折彦质被委任为割地使，本来是要派往河北的。但金军却留下了刘韐，将其余的人派走了。刘韐之所以被留下，是因为金军的枢密院使韩政年事已高，金军知道刘韐能打仗，希望将他招

降，让他担任枢密院使，也相当于军队的最高级官员之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金人是一个善于运用敌人将领的民族，不管是辽国还是北宋，只要是人才，就不拘一格委以重任，从不在乎他之前有没有反抗过金军。

韩政拜访了刘韐，希望他接受金人的任命。刘韐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却在回屋后，写了一封信给汴京城内的儿子，表示绝不事二主，安排信使偷偷投递出去。他将门窗关闭后，上吊自杀了。[39]

接下来的几天充满了不确定性，开封府逼着人们上缴金银，金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屡屡进城骚扰。

金人对城内的袭击事件有：正月十六，金军将新宋门内的神卫营烧毁；[40]正月十七，金军声称遭到了袭击，下到曹门内掳掠，城内的五岳观着了火，不知是金人还是宋人干的；[41]正月二十一，许多金人到城内抢劫，有的被城内的百姓杀退；[42]正月二十七，新宋门到曹门大火，不知何方所为。[43]

另外，皇帝何时归来也成了谜。正月十七，皇帝又向城内写信，表示快回来了，但在回来之前想和金人打一场球。又过了几天，这场球一直没有开打，皇帝也没有回来。每一天，城里的人们都从早到晚在宣德门和南薰门之间烧香点火做些法事，盼着皇帝归来。时间长了不免让人悻然。

正月二十，皇帝再次向城内重申，是天气一直没有晴，等晴天了打一场球就回来。

正月二十二，宋钦宗又发了一次信，还是同样的话。

正月二十六，宰相何㮚也传回了消息，除了说皇帝等天晴即回，还表达了对老百姓的怜悯，表示皇帝为了城内生灵时常哭泣。[44]

天气也好像与人们开玩笑，这么多天一直是阴雪不止，凄凄冷冷，

冷得让人受不了。另外，正月二十一，给金国皇帝加徽号的任务也完成了，金太宗吴乞买已经变成了“崇天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45]当初叫皇帝出城，就是以给金国皇帝加徽号为借口。现在目的已经达成，似乎皇帝只需要等晴天做一次球星就可以归来了。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还令人感到高兴，那就是，开封府终于不再催逼黄金了（暂时的）。原因在于，正月十九这一天，开封府算了一下征收来的黄金，有金十六万两、银六百万两[46]，距离任务完成还遥遥无期。开封府将数据报给金军后，暂时没有催促人们继续缴纳金银，而是等待金军做出决定，到底下一步该怎么办。当官的突然不催金银了，城内老百姓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47]

但城内的人不知道，在金军大营里，一次新的博弈正在展开。由于金银数目与期望值相差甚多，金军开始考虑在其他方面寻找补偿。既然金银不够，就用其他有用的东西来代替。宋钦宗不得不一一答应金军的要求，他们的索取也是五花八门。

正月二十五，金军开始索取皇帝的宫廷用品，包括玉册、车辂、冠冕等带有皇帝标识的东西。另外，还要求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伶人、技艺、百工、诸色）数百人。[48]

另外，金军还索取了一部分皇帝的女官（内夫人）、倡优，以及童贯、蔡京、梁师成、王黼等人家中的声乐人。即便已经出宫或者从良的，也都要抓回来送给金人。开封府派遣人员四处抓捕，挨家挨户搜索，以免有遗漏，大街上充满了号恸之声，久久不绝。[49]

但这些可怜的女人并不是白白被抓走，她们都担负着帮助皇帝还债的任务。比如，一个宫女的价格是银五百锭，一个歌女价值银二百锭，一个普通民女的价格是银一百锭。[50]每抓一个人，皇帝的账单上就勾销相应的银两。

正月二十七，抓捕内夫人、倡优的工作继续，金人又增加了索要的

东西，包括皇家典礼使用的物品，比如，皇帝祭祀上天用的仪物、法服、卤簿、冠冕、乘舆等。金人同时索要一些官员，包括台省寺监的官吏、通事舍人、内官等。由于金国主流文化正在从游牧文化变成帝国文化，需要大量的公务员为他们服务，这些人都是去金国担任公务员的，所以就连他们的家属也要一并带走。另外还有各种奢侈品，包括犀角象牙、宝玉、药石、彩色帽幞、书籍等，大包小包，人担车载，源源不断地向金军营地运送。[51]金人还要了五十个内侍，但晚间又退回了三十六个，只留下了伺候过太上皇的十四个。[52]

正月二十八，蔡京、王黼、童贯家族的女性四十七人被送到了金军营地。之前金人要的是伺候蔡京、童贯等大臣的女人，现在直接要他们家族的女性了。此外，皇后的后冠、御马的装具也被送往金军营地。[53]

正月二十九，金军索取代表汉文化中儒教精神的物品，包括大礼仪仗、大晟乐器、太常寺礼物等，甚至连博戏的工具都在掠夺之列。[54]这一天也是金人追捕内夫人、倡优的高峰时期，将她们抓住后，首先送到教坊择优录取，录取了的就送往金军营地。除此之外，皇亲国戚的侍女们也都遭了殃，甚至连送女人的车都不够用了。大街上哭声撼天动地。这一天还移送了内官二十五人，百工、技艺千人。

正月三十，金人继续索取八宝、九鼎等皇权象征物，以及负责技术工作的官吏，包括将作监的官吏、尚书省的吏人、秘书省的文秘、国子监负责印刷刻板的人，以及负责宗教事务的阴阳传神待诏等。

这一天，一队被押运上路的女人正好经过南薰门，那儿聚集了大量等待皇帝归来的官员，女人们高声大骂："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大臣们被骂，连话都不敢说，把头避过去不敢看这些女人。[55]

二月初一，金军命令将集结多时的河北、山西诸州守臣的家属送

出。这时没有投降的州还有三十六个。[56]到回程时，金人要靠这些人胁迫守将们投降。

这一天涉及的移送名单包括：应修内司、东西八作司、文思院、后苑作工匠、唱探营人、教坊乐工等。[57]

表 金军索取名单[58]

名　目	数　量
画工	百人
医官	二百人
诸班百戏	一百人
教坊	四百人
木匠	五十人
竹瓦泥匠	三十人
石匠	三十人
走马打球弟子	七人
鞍作	十人
玉匠	百人
内臣	五十人
街市弟子	五十人
学士院待诏	五人
筑球供奉	五人
金银匠	八十人
吏人	五十人
八作务	五十人
后苑作	五十人
司天台官吏	五十人
弟子帘前小唱	二十人
杂戏	一百五十人
舞旋弟子	五十人
金辂玉辇法物、法驾、仪仗、驾头、皇后玉辇、宰相子弟车、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衣服、御驾、御鞍、御尘拂子	
御马	二十匹
珊瑚鞭	两条

名　目	数　量
御前法物、仪仗、内家乐女、乐器、大晟乐器	
钧容班	一百人，并乐器
内官脚色、国子监书库官、太常寺官吏、秘书省书库官吏、后苑作官吏、五寺三监大夫、合台官吏、左司吏部官吏、鸿胪寺官吏、太医局官吏、市易务官吏	
大内图、夏国图、天下州府图、尚书省图、百王图、宝箓宫图、隆德宫图、相国寺图、五岳观图、神霄宫图、天宁寺图	
本朝开国登宝位赦书旧本、夏国奏举书本、红笺纸	
铜古器	二万五千
酒	一百担
米	五百石
大牛车	一千
油车	二千
凉伞	一千
太医局灵宝丹	二万八千七百贴

二月初二，开封府继续完成金人的任务，这一天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天文馆的浑天仪，三馆太清楼文籍图书、国子监的书版，以及数万斤丝绵。

二月初三，男女乐工、医者出城。稍微有名气的技术人才都无法逃脱被抓走的命运。[59]

二月初四，佛经、道经的书版出城。到这时为止，能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金人完全可以用他们掠取的东西，到北方重新建一个首都。这也可以看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不同，游牧民族打仗除了为金钱，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技术人才。由于他们缺乏技术，又羡慕南朝的舒适生活，就必须把技术人才带走，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本来金人掠夺完毕，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这一天出了一件大事，让汴京百姓再次回到了苦难之中。

前一天送去金军营地的技术人才中，有一位内官蓝诉、一位医官周道隆和一位乐官孟子书，三人报告金人，请求回去拿东西。原来，他们把黄金隐藏在了家里的地下，想等混乱过去了就取出来。不想，金人要将他们永久地带离汴京，再也回不来了，他们请求回来将金银挖出带着上路。元帅听说汴京城还有金银，大怒，立刻清查出城人士的行李，又发现了许多金银。[60]他们立刻又派人去蓝诉等人的家中挖掘，发现地下果然都藏着金银。

想到此时汴京交出来的金只有百分之一，银十分之一，表缎十分之二，只有绢完成了任务。元帅立刻命令开封府回去继续搜刮金银。二月初六，开封府只好贴出新告示要求上缴金银和马匹，[61]从这天开始，汴京城进入了第二次搜刮运动之中。

但汴京城里的百姓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了，他们更关心的是皇帝会怎么样。这里必须回溯一下皇帝的遭遇。

废黜赵氏

正月二十八，长时间的阴雪天气终于结束了，天气久违地转晴了。人们纷纷想起作为球迷的皇帝只要打一场球就可以回到城内。既然天晴了，皇帝回归的日子也就到了。

不仅仅是普通人这么想，就连御史台也早早地要求文武百官到南薰门接驾。官员出动了，百姓也纷纷到场，一时间热闹非凡。

但皇帝没有出现，就连个消息也没有传来。第二天，更多的人聚集在南薰门外等待着奇迹的发生，但奇迹始终没有发生。

从这天开始，人们每天都指望着皇帝会突然出现。也许当金人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走了，就会把皇帝释放。

到了二月初五，传说皇帝已经打完了球，就要回来了。又有数万人

聚集在城门口等待。到了晚间，又有消息说皇帝次日就回。初六，人们又聚集起来等待，但皇帝还是没有回来。

不仅皇帝没有回来，就连另一个该出现的人也没有出现。从皇帝出城那天起，每天都会派一个叫作王孝杰的人往来通信，风雪无阻，但这一天，王孝杰没有来。[62]一时间说什么话的都有，观点各异。开封府为了制止谣言的传播，不惜杀掉了一个人，这才将所有人的口封住了。[63]

二月初七，金人突然开始修理陈州门，人们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谣言越来越多，传闻前一天金人在许多地方与百姓发生冲突。到了中午，有数十辆来自皇家的车子，车后都带着巨大的行李包袱，从皇宫里出来，经过南薰门出城离开了。跟随着的还有许多老宦官与内侍，看上去都郁郁寡欢。就在人们惶恐不知所措时，突然有告令传来，人们才知道刚才出去的竟然是太上皇。根据告令的说法，由于金人长久不放皇帝回来，太上皇只好出城亲自去求情。

当天晚上，民情汹涌，胆大一点的纷纷拿出武器，防止金人打来。开封府等官衙不怕金兵，只怕百姓闹事，对于百姓的弹压也加剧了。留守司召集百官开会直到二更。

二月初八黎明，留守司再次召集百官开会。由于百姓拿武器的太多，留守司随后发出榜文，要求百姓不得带武器上街，如果抓住就要治罪。但这一次，政府的威信没有了，百姓们即便看到了榜文，也无动于衷，大街上处处都是武器。

这一天，继续有车子不断地出城，据说都是各个亲王以及他们的家属。

随后，人们在南薰门外发现了一张榜单，上面写着：金国皇帝二月初四加徽号，初五移寨，初九接受朝贺，初十，皇帝就可以还“明兴”。[64]这似乎说明太上皇和皇帝是为了朝贺金国皇帝才没有回来，一

旦朝贺完毕，就有可能归来。但榜单又有不可解之处，比如“明兴”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们纷纷猜测不已。

但不一会儿，突然传来消息，这个榜单是假的，贴单的人已经被抓住了。晚上，开封府发出文告，太上皇出城，百姓不得借机生事，而应该各保一方。

直到二月初九的早晨，官府才羞羞答答贴出告示，人们这才明白：原来金人已经决定废黜赵氏皇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正在经历一个没有皇帝的混乱时代。

事实上，在二月初六那一天，就在人们怀着期望等待皇帝归来时，金人就将皇帝废黜了。

最早猜到金军要废黜皇帝的是一位叫作司马朴的官员，他的官职是虞部右司员外郎。在第一次汴京围城时，他曾经奉命出使，斡离不详细询问他的家世，知道他的外祖父是宋代名相范纯仁，范纯仁又是名臣范仲淹的儿子。斡离不对他刮目相看，尊重有加。到了第二次围城战，司马朴已经成了兵部侍郎，由于他受到斡离不的尊重，也成了陪伴皇帝的人选之一。斡离不与司马朴谈话时，常常将机密的消息透露给他。在一次交谈时，斡离不曾告诉司马朴，他不想废黜皇帝，但另一个元帅粘罕却心怀这样的打算，现在只能等金国皇帝的诏令，看上面说什么了。[65]

司马朴把消息说给了其他人，众人将信将疑，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等待。

从时间上来看，两位元帅于十二月初将北宋降表送往北方，正月初，金太宗做出了废黜北宋皇帝的决定，到二月初，这封重要的诏书终于来到了汴京城外。金太宗的《废国取降诏》是这样写的：

> 敕赵桓：省所上降表，汝与叔燕王俣、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举国士民僧道、耆寿军人，于十二月二日出郊，望阙称臣待罪事，具悉。背义，则天地不容，其孰与助？

败盟，则人神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先朝开国，乃父求好，我以诚待，彼以诈欺。浮海之使甚勤，请地之辞尤逊。析木版图，第求入手；平山伪诏，曾不愧心。罔天罚以自干，忽载书而固犯。肆予纂绍，犹事涵容。迄悛恶以无闻，方谋师而致讨。犹闻汝得承位，朕望改图。如何复循父佶之覆车，靡戒彼辽之祸鉴。虽去岁为盟于城下，冀今日堕我于画中。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与；构军前之二使，本以间为。惟假臣权，不赎父罪，自孽难逭，我伐再张。将臣多激怒之心，战士增敌忾之勇。息君犯五不韪之罪，丧亦宜乎；晋师有三无报之名，倍犹未也。以是济河航苇，降汴燎毛，人竞覆昏，天莫悔祸。谁肯背城而借一，果闻举族以出降。既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条件，并已宣谕元帅府施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66]

元帅们收到诏书时，恰好是和宋钦宗打球的那一天。二月初五，宋钦宗终于和两位元帅打了一场球。皇帝的随从包括何㮚、冯澥、曹辅、郭仲荀等四人。

在球场旁，皇帝面向西坐，两位元帅面向东。他们对皇帝都表现得很尊重，皇帝说话时都起身聆听。喝了几轮酒后，斡离不进入场内打球。但就在这时，一位叫作蒲鲁虎的将领突然持着刚刚收到的金国皇帝的诏书来到了球场，元帅们匆匆将酒席撤掉。

宋钦宗离开时，乘机提出了回城的要求。粘罕的态度突然冷淡了下来，呵斥说："你还想去哪儿！"

送皇帝回斋宫住处的是二太子斡离不。与粘罕不同，斡离不与宋钦宗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在一年前就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这一次送行，斡离不显得很是眷恋，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快到时，他在马上冷不丁说了一段女真话，皇帝听不懂，有人将这段话翻译给他，二太子说的大意是："这就是天命！"

之后，金人的记载与宋人的记载出现了偏差。按照宋人的说法，皇帝继续请求二太子放他回去，斡离不表示，第二天国相还要见他，到时候再说。[67]回到住处，国相果然派人来邀请，皇帝试探着又谈到了要回城，那人随意安慰了一下，给他留下了希望，以为第二天就可以归去了。

而按照金人的说法，斡离不偷偷告诉了皇帝，已经决定要废黜他了。吴开、莫俦等人赶快跪下，请求二太子想办法，表示只要斡离不帮忙，不管要什么人什么物，都会照办。斡离不表示可以一试，但必须要三位帝姬，以及王妃、嫔御各七人。吴开等人让皇帝签字作为凭证。[68]

斡离不赶到青城国相寨，与粘罕商议。原来，金国皇帝除了一道明诏之外，还有一道暗诏，明诏要求废黜赵氏，但由于担心事态复杂化，同时又发了一道暗诏，请两位元帅便宜行事。这就给不废黜赵氏留下了可能性。

另外，在是否废黜赵氏的问题上，粘罕也有过反复。最早他想废掉皇帝，但在斡离不的劝说下，又改变过想法。斡离不认为，在宋王室中，康王还没有被抓住，还在北方逃亡，他的号召力甚至比现在的皇帝还大。由于与康王打过交道，斡离不认为康王比起现在的皇帝更加强硬，虽然宋徽宗的儿子们都太过文雅胆小，但如果非要选出一个人来，还是非康王莫属。如果废掉宋钦宗，那么天下的人都会听康王的号令，到时候事情将更加复杂，还不如留下这个傀儡，让康王失去正统性，甚至可能在未来利用宋钦宗将康王诱捕。[69]

粘罕听取了这种说法，决定不废黜皇帝，并在正月二十二给金国皇帝写了一封表，送往北方，这封表还在路上。

不想，粘罕后来又改了主意。

粘罕之所以再次想废掉赵氏，一是因为开封府搜刮金银不力，经过数次搜刮之后，竟然还有人在家里的地下埋藏了大量的金银；二是因为好色的斡离不偷偷得到了宋朝的茂德帝姬，将其占为己有，还把她藏了起来。粘罕知道这事儿后，认定斡离不有私心。这两件事让他在二月初四又改变了态度，决定还是废黜赵氏。[70]

二月初五夜，斡离不去找粘罕，再次提出保留赵氏，粘罕当即反

对，并质疑斡离不的私心。他认为，废黜赵氏可以大大削弱南方，给未来留下并吞机会。蒲鲁虎在旁边也帮腔说，坐镇北方的都元帅斜也与粘罕的意见相同，斜也的官职比两位元帅（实际上是副元帅）更大，把他抬出来，让粘罕的主张更加有说服力。

斡离不愤然表示，南伐的首谋是他，这事必须听他的。并表示宋朝皇室不能像辽国皇室那样对待。他说话虽然激烈，但说完话没有等结果就离开了，他的离开可以看作是放弃了。毕竟粘罕的权力比他大，而且粘罕还有斜也的支持。

斡离不离开后，萧庆劝说粘罕，考虑到宋钦宗比康王懦弱，不如保留下来对抗康王。粘罕也不愿意与斡离不有争执，让萧庆去找宋钦宗，告诉他如果肯归诚，就保留他的帝位。但到底什么是“归诚”，并不确切，需要讨论才能决定。

不幸的是，萧庆到斋宫去找宋钦宗时，又发生了误会。可能考虑到萧庆是粘罕的人，宋钦宗更愿意与斡离不谈，总之，那晚萧庆没有找到机会与皇帝和大臣们谈论“归诚”之事。宋钦宗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第二天（二月初六），宋朝与金国的记录再次统一了起来。早上使者要求皇帝去青城寨，所有官员必须跟从。皇帝刚出门，突然被要求撤掉象征皇家的黄屋，他感到有些吃惊。皇帝要乘马，使者说，国相不让乘马。他们步行到了帐前，皇帝要登台阶而入，使者又表示，国相不让登阶。[71]

在帐外，面向北方设了一个香案，随官都在远处排立。粘罕安排皇帝望着香案拜了两拜，由萧庆读了金国皇帝的诏书。宋钦宗这才确切地知道自己被废了，他不仅回不去汴京城，还可能连在北宋都待不下了。所有的官员也都吓傻了，他们只会磕头，请求金军收回成命，但粘罕拒绝了。[72]

粘罕让萧庆和刘思扒掉皇帝的龙袍，把衣服都扯裂了，何㮚等人目

瞪口呆反应不过来，李若水上前抱住皇帝，厉声说："这贼乱做！此是大朝真天子！你杀狗辈不得无礼！"[73]

金人将李若水带下，囚禁起来。事后，李若水与粘罕争辩曲直，大骂粘罕背信弃义，几乎被打死。金人中有人感慨李若水是个壮士，想要救他，劝说他识时务，可以受到重用。李若水以绝食作为回答。粘罕还不死心，最后又见了一次李若水，才下令将他敲杀。他死于二月二十一。[74]

金人日后感慨，他们灭辽时，辽国死节的大臣有十几个，但灭宋时，死节的只有李若水一人。[75]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李若水等人的判断失误，让宋钦宗轻易出城，才成为人质，李若水之死，更像是一种赎罪行为。

人们往往以为，战争的结果只有并吞一种方式，事实上，另一种方式可能更常出现，那就是将原来的君王废掉，换一个听话的人当君王。这种方式不仅见于其他国家，就连汉人也经常使用。

比如，汉唐时期在西域对付不听话的小国国君，就经常采用这种做法。在东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常常采用。在世界上这种方式更常见，比如法国入侵墨西哥，要找一个奥地利王子去当墨西哥皇帝。

为什么不直接占领？主要考虑到统治成本太大。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占领区的人民不会屈从于侵略者，只好采取间接方式，找一个听话的人做代理。这个听话的人独自行使行政权，但又承认战胜者的宗主权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在战争之始，金国的目的就是占领河北、山西地区，这两片地区紧挨着金国国土，是可以控制的，也是必须控制的。但由于北宋太大，更广阔的陕西、四川、两湖、江西、淮河、江浙、两广等地区已经超出了金人的控制能力，不可能一下子吞并而不产生副作用，最好的方式是寻找一个听话的人来担任汉族皇帝。

所以，斜也和粘罕赞成的“换人”做法，并不是特例。

但是，放到具体的环境里，赵氏下台之后，到底换谁呢？显然不能换一个金人，金人没有威望，立不住。只有从宋人中寻找一个人选才行。除了皇室之外，最有威望的人一定出在大臣里，要在大臣中选择，还不能选一个对金人有敌意的。到底要选谁呢？

元帅们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宋朝的大臣们，让他们自己推选。同样是在二月初六这一天，元帅们已经写好了请宋朝大臣推举贤王的命令。[76]

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取得废皇帝的配合。因为接下来，必须将皇帝的所有家族成员都弄出城来带走，这才不会妨碍未来的新皇帝执政。将不听话的人以及家族全部带走，剩下的人就好说话了。另外，只有前皇帝同意了，大臣们才能放开手脚配合金人的工作。

虽然废黜皇帝的过程非常突然，但宋钦宗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不得不配合金人的要求。他给汴京的留守孙傅写了一封信，他请孙傅配合金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请太上皇和家族成员尽快出城。[77]

有了废皇帝的信，金军也随后下令：太上皇和宫眷们必须在七天之内出城，大臣们也必须在同时间段内完成推举新皇帝。

金国皇帝的诏书、元帅府请群臣选举新皇帝的信、宋钦宗请皇族出城的信，三份文件统一交给了吴开和莫俦两人，由他们带回城中。邓珪率领内侍百余人也赶快进城，将后妃、帝姬、王妃等牢牢看住，以免逃走。[78]

金人的命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在前两天，这一震动却只限于帝国的最高层官吏。因为孙傅、王时雍、徐秉哲、范琼等人把消息扣住了，没有向下传达。

孙傅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大惊失色，他立刻写信请求元帅们收回成

命，他表示，太上皇和诸王等都可以按照要求送走，但请将皇帝还回来。这封信于二月初七发出，石沉大海。于是孙傅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一次只要求立一个姓赵的皇帝即可，如果不想从宋徽宗诸子中选择，可以选择宋神宗的子孙们。

二月初八，孙傅又发出了第三封，请求立一个姓赵的皇族即可，他还写了另一封信，要求不要将皇太子请出城去，让他留下继续监国，直到选出新的皇帝。二月初九又发一道。初十再发两道。[79]

但这些信都没有换来金军的同情，他们反而更加催促城内，尽快送出皇室、选举新君。[80]

金人咄咄逼人，宋朝的大臣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到底是尽忠于赵氏，还是满足金人的要求？

事实证明，大臣对前朝的忠诚是短暂的，以王时雍、徐秉哲、范琼为首的留守官吏们最担心的是，如果完不成任务，金军会毁灭掉汴京。他们的家属都在城内，一旦金军屠城，谁都跑不了。最好的方法，还是尽快满足金军的要求，将赵氏老小全都送出去。[81]

关于太上皇宋徽宗如何出城，还有一番故事。二月初七大臣们请宋徽宗出城时，并没有告诉他赵氏江山已经被废黜了。当天早上，宋徽宗的住所来了四位官员，他们是李石、周训、吴幵、莫俦。四人见到太上皇，表示皇帝带来了消息，金人一定要见太上皇。

四人继续说，皇帝和金人经过谈判，金人做了让步，可以让太上皇不出城，而是到南薰门附近的厂舍里，在那儿向金人上请求书，请皇帝归来。请求书送到两位元帅那儿，走一下过程，金人就会把皇帝放回来。

他们还特别提醒太上皇，金人并没有恶意，反而希望成全一件好事，希望太上皇配合。还有人传了皇帝的话："爹爹娘娘请便来，不可缓，恐失机宜。"

太上皇沉吟良久，充满了怀疑，他问道："军前没有变动吧？你们没有隐瞒什么吧？你们不要因为小事而误了我的大事，如果有变，告诉我，我好早做准备。"

李石等表示，如果有假，愿意承受万死。

太上皇抱怨说，当初金人围城，皇帝不让他离开，又不让他参与决策，什么事都不让他知道，才到了现在这一步。他再次请求李石等不要隐瞒他。李石表示没有隐瞒。

太上皇这才请人去找他的妻子太上皇后。找到太上皇后之后，他们都换上道服。太上皇退休之后大都穿道服。在前往南薰门的过程中，又有大臣姜尧臣劝说他不要去，怕有诈。但太上皇表示，既然金人要求他只到门头不用出城，那就去看看吧。

张叔夜也劝说太上皇不要去，恐怕一去不复返。太上皇正在犹豫的工夫，负责押送的范琼却拦开了张叔夜，太上皇只好上路了。[82]

他自己也知道事情不好，但还在说，如果能够用老命把皇帝换回来，保住社稷，那就算死了也值得。周围的人都大哭起来。

为了防止万一，太上皇将常用的御刀交给了一位叫作丁孚的侍从，让他跟随左右。他们坐着肩舆从延福宫出来，经过晨辉门，前往南薰门。

在城门外，两位元帅派了上万骑兵，从南薰门一直排到了青城和刘家寺两寨，元帅们亲自驻扎在南薰门瓮城下。[83]

中午，太上皇来到了南薰门，金人将他围住，他才知道果然有变。丁孚已经被金人架到一边，将佩刀收走。太上皇就这样被金人带到了青城的斋宫。[84]两位元帅讽刺太上皇："你不让和亲，现在所有人都成了俘虏，你还有什么脸见人？"

太上皇在青城见到皇帝，父子相拥大哭。

除了太上皇，按照金人的要求，后妃、嫔御、诸王、王妃、帝姬、驸马，也就是赵家父子二代的直系亲属和家庭都必须全体出城。[85]于是，二月初七，除了太上皇夫妇，还有郓王以下三千人，包括诸王妃、公主、驸马等出城。[86]

二月初八出城的有：其余诸王、与皇帝接近的宗室、曹张两公主、鸿胪少卿康执权和元当可、光禄少卿范寅敬、少府少监苏余庆、军器少监徐天民、将作少监冯时等人。[87]

后妃、诸王还可以乘车坐马，乳妪婢使只能步行。这时百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见到此番景象都很害怕。但也有人猜到了些什么。太上皇出城那天，在西角楼有两个百姓试图拦住太上皇的车驾，没有做到，过了一会儿，燕王来了，两人将燕王拦住问道："大王家的亲人都走了，一城生灵又怎么办？不如留下一个以存国祚。"

燕王哭着回答："大金要我，教我奈何？"

两人回答："百姓愿与大王一处生死，如何？"

范琼听说了，命令将两人抓住斩首。[88]

二月初九，皇帝被废的消息终于捂不住了，宣德门外贴了黄榜，宣布了这件事。这也是范琼最紧张的时刻，他怕人们闹乱子。他大声安慰人们说这不要紧，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你们只是少了个主子，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这就像军营里，姓张的来管，叫他张司空，姓李的来管，叫他李司空。你们军民百姓都快回去干活儿，照管好家里的老小才是正道！"[89]

范琼说的道理放在现在来看也不过时，但在当时却人人自危，下午街道上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夜间巡逻的不下万人，一是百姓感觉不安全，自发巡逻；二是官家害怕闹事，也组织巡逻。

既然百姓已经知道了，孙傅乘机组织了又一轮请愿。百姓代表们在城门口请求放回皇帝，金人拒绝了。[90]

二月十一，皇后和太子出城。[91]皇太子出城是城外的皇帝和太上皇邀请的。他们前一天来信表示希望爷孙三代团聚。太子等人分别乘坐五辆车，从南薰门出。其中太子与皇后同车。孙傅作为太子的监护人一路哭着跟随，要和太子一起前往金军营地，到了城门口，被范琼死死拦住。开封府徐秉哲向众人解释说："这是不得已呀，少了一个人都是我的责任！"

在皇太子出城前，一位叫作吴革的人见到孙傅，向他出主意，要求将皇太子留下。孙傅表示金人不会罢休。吴革的计策是：找一个像太子的孩子上车，出朱雀门后，找一些百姓叫他们装作想截留太子，乘机将孩子摔死在车下。再把孩子的尸体交给金军说太子死了。把真正的太子设法转移。孙傅没有胆量这么做所以告罢。[92]

出城后的皇族并没有受到良好的待遇。直到二月三十，皇帝写信给两位元帅，请求给予必要的饮食和衣服，金人才通知开封府将皇帝的日常衣服送出。人们听说了无不声泪俱下。[93]

【注释】

[1] 参考《东京梦华录》。

[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 参考《靖康纪闻》。

[4]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5] 参考《靖康纪闻》。

[6] 参考《东京梦华录》。

[7] 综合《靖康纪闻》与《靖康要录》。《靖康纪闻》记为正月十二。

[8] 参考《瓮中人语》。

[9] 参考《靖康纪闻》。

[10] 参考《瓮中人语》。

[11] 参考《靖康要录》。

[1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3]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

[14] 《三朝北盟会编》引《靖康遗录》，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5]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6]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17] 参考《瓮中人语》。

[18] 参考《靖康纪闻》。

[19] 参考《靖康纪闻》。

[20] 参考《续资治通鉴》。

[2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2]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

[23]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瓮中人语》记为十二月十四，恐误。

[24]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纪闻》。《瓮中人语》记为十二月二十四。

[25] 参考《靖康纪闻》。

[2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靖康要录》。

[27] 参考《金史·太宗纪》。

[28] 《南征录汇》引赵士先《毳幕闲谈》。

[2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0] 引自《靖康纪闻》。

[31] 《南征录汇》引李东贤《辛斋笔记》。

[32] 参考《靖康纪闻》。

[33] 《三朝北盟会编》引《靖康小录》。

[34] 参考《瓮中人语》。关于和亲与女人的问题，见“第十六章 战争中的女人”内容。

[35] 《靖康纪闻》写作何揆，其余书都写作徐揆。

[36] 参考《靖康纪闻》。

[37]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三五到一三七篇。

[3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发生于正月二十七。

[39] 参考《靖康要录》。

[40] 参考《瓮中人语》。

[41] 参考《靖康纪闻》。

[42] 参考《靖康纪闻》。

[43] 参考《瓮中人语》。

[44] 参考《靖康纪闻》。

[45] 参考《靖康纪闻》。《靖康要录》中没有“敦仁体信”四字，同时“偃武”作“成武”。

[46] 参考《瓮中人语》。根据《靖康要录》银只有二百万两。

[47] 参考《靖康纪闻》。

[48] 参考《瓮中人语》。乐工的具体名目根据《靖康纪闻》补充。

[49] 参考《靖康纪闻》。

[50] 参考《开封府状》。

[51] 参考《靖康纪闻》。

[52] 参考《靖康要录》。

[53] 参考《瓮中人语》。

[54] 《靖康纪闻》记为正月二十八，《瓮中人语》记为正月二十九。

[55] 参考《靖康纪闻》。

[56] 参考《瓮中人语》。

[57] 参考《靖康要录》。

[58]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标为正月三十，但从内容看，这份名单有可能是金军索要的总名单的一部分。

[59] 参考《瓮中人语》。

[60] 参考《靖康要录》。

[61] 参考《靖康纪闻》。

[6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63] 以上与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均出自《靖康纪闻》。

[64] 全文为："崇天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初四册立，初五移寨，九日受贺，十日还明兴。"

[65] 《南征录汇》引《屯翁日录》。司马朴生平根据《宋史·司马朴传》。

[6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三九篇。

[67]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68] 参考《南征录汇》。

[69] 《南征录汇》引《毳幕闲谈》。

[70] 关于斡离不与茂德帝姬之事，见"第十六章 战争中的女人"内容。

[71]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72]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

[73]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与《三朝北盟会编》。

[74]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75] 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之后自杀者如张叔夜、何㮚、孙傅在"第十七章 撤离"中还有叙述。

[76]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四〇篇。

[77]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四一篇。

[78] 参考《南征录汇》。

[7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四二到一四五篇，第一四八到一五〇篇。

[80]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四六、第一五一篇。

[81] 参考《中兴遗史》。

[82]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83] 参考《南征录汇》。

[84] 参考《北狩见闻录》。

[85] 参考《瓮中人语》。

[86] 参考《靖康要录》。

[87] 参考《靖康要录》。

[88] 参考《中兴遗史》。

[89] 参考《中兴遗史》。

[90]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四七篇。

[91] 参考《瓮中人语》。

[92] 参考《中兴遗史》。

[93] 参考《靖康纪闻》。

第十五章
大楚政权

宋朝版本的选举

旧皇帝已经被废黜，接下来是寻找一位新皇帝。如果宋代人到了现代，熟悉了现代的选举制度，就不会为寻找新皇帝感到为难。但在当时，所有的皇帝都是靠自己打江山或者继承的，和平选举一个新皇帝还是新鲜事。

到底该选谁呢？在这之前，大家都是同僚，一起向旧皇帝跪拜，突然有一天，旧皇帝消失了，要从同僚中选出一个人来，从此以后要向他跪拜，大臣们总感觉很别扭。更何况谁也不敢毛遂自荐去当这个皇帝。即便有人想当，也担心无法服众，没有好下场。

不过金人已经催促了好几次，这个任务不完成也不行。

二月十一，群臣们召开会议，大家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完成任务，连话都不敢说，怕惹祸上身。根据后来的传说，当大家都沉默时，突然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他的大意是："既然在场的人都不敢当皇帝，不如选一个不在场的人，应付金人的逼迫。"大家一查，担任过宰执的大臣中，张邦昌不在现场。原来，皇帝出城后，张邦昌正月十五出使金军营地，也被金军留下没有回来，从此，这位前少宰就无法在朝廷替自己推辞了。众人一听都说好，就纷纷选举张邦昌担任新一任皇帝。[1]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张邦昌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是群臣

们敷衍塞责的结果，而是金人有意选他。

在斡离不第一次进攻汴京时，要求一位宰执和一位亲王做人质，康王和张邦昌慷慨赴行，在当时被视为一宗壮举。姚平仲袭击金军营地时，两位人质实际上已经有了生命危险，只是由于张邦昌与金人关系不错，又会解释，才躲过了被杀的命运。

斡离不北归后，张邦昌成了主和派。他担任了河北路割地使，坚决要求皇帝遵守协议，甚至请皇帝下诏敦促交割，结果得罪了大臣们。大臣们上奏将张邦昌贬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让他脱离了权力中枢。[2]

但张邦昌的“政治面貌”却引起了金人的好感，他是担任过宰执级的官员中最友好的一位。

与现任宰执何㮚、张叔夜、孙傅等人相比，张邦昌都有明显优势。张叔夜、孙傅对于金人的敌意过大，何㮚的执行力不行，让金人不放心。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徐秉哲属于执行命令的酷吏，在民间威望太差。彻底投靠金人的范琼只是一条忠顺的狗，变不成狮子。从各方面看，张邦昌都是新皇帝的最佳人选。

二月十一选举时，还有另一种说法可能更符合事实。选举当天，已经有消息说，金人对张邦昌最满意，希望城内能把他选为皇帝。官员们开会时知道今天必须选出一位皇帝，否则脱不了身。当人们保持沉默时，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见事情僵住了，连忙偷偷询问出使过金军营地的王时雍，金人到底最喜欢谁。王时雍告诉宋齐愈，元帅们最喜欢张邦昌。宋齐愈立刻将“张邦昌”三字写在纸上，出示给大家。由于有人带头了，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纷纷表示同意，于是张邦昌就被定下了。[3]

在当天给金人的信中，虽然是以留守孙傅的名义写的，但实际上，孙傅并没有参加会议。皇太子出城时，孙傅要跟太子一起出城，被范琼

拦截。当晚他就睡在了城门下，等待金军允许他出城陪太子，从此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了。另一位大臣张叔夜也没有签字。所以，送给金人的报告上就少了这两位最重要大臣的签名。

二月十二，金人将孙傅与张叔夜两人带到青城，询问为什么没有签字。张叔夜后到，一见面，金人就告诉他，孙傅由于不肯签字已经被斩首了，如果他不肯签，也会被斩首。但张叔夜表示宁肯死也不签。[4]

事实上，孙傅并没有死，金人只是想逼迫张叔夜罢了。二月十三，金人将孙傅的家属带走，决定带他们北上，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回过汴京城。[5]

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大臣，城内的官员首领换成了吏部尚书王时雍和户部尚书梅执礼。其中王时雍由于与金人直接对接，更是主导者。

二月十三的任务是写一份公开的推戴状，不仅要有文武百官的签名，就连百姓代表也要联署。其中百官赴秘书省签字，士庶僧道的代表去朵楼，军民代表赴大晟殿。[6]推戴书是军器少监王绍起草的。[7]为了防止别人不好意思签名，王时雍首先做了表率，大笔一挥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剩下的人一看，也都服从了安排。

但这一次又有一个人拒绝签名。这个人由于后来名声太坏，甚至人们都不愿意提他反抗金人这件事，而且流传着各种版本，说明他是歪打正着出了名，这个人就是秦桧。

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宋代有一个官僚阶层叫作谏官阶层，他们平常属于最激愤的人群，动不动就要给皇帝提意见。在百官签名推戴新皇帝时，谏官们议论，作为帝国的良心，不能不发声就让事情过去了，他们决定起草一封信给两位元帅，要求立赵氏的后裔为皇帝。信写好后，开始联名。恰好秦桧是御史中丞，也就是御史台的台长，官阶最大，就把他排在了第一个。但秦桧本人却并不情愿，只是因为同僚的胁迫，不得不签。[8]这封信于二月十三送到了两位元帅手中，元帅们大怒，之前他

们已经下令禁止谈论立赵氏，竟然有人还敢冒犯。二月十四元帅派人将秦桧捉拿归案，从此秦桧也离开了都城。[9]

当然这个版本只是激愤之辞，从现有的证据看，人们更倾向于，秦桧的确反对了立张邦昌为皇帝，并写了信拥立赵氏，才被金人捉拿归案。[10]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秦桧的这封信注定了他要和皇帝一起被金军带到北方，这才有了后来他的返乡与担任宰相。可以说，南宋高宗的一系列事件都发端于秦桧这一天的“英勇之举”。

金人在确定了新的皇帝之后，却并没有立刻将张邦昌放回。汴京城又经历了混乱的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里，他们不断地催促着城内将还没有发送的人和物资送出，并希望榨取更多的金银。

如果说，粘罕在没有废黜赵氏之前，对城市还带着一点怜悯，那么现在最后的一丝怜悯已经褪去，变成了撤军之前最后的勒索。

二月十二，金人索要六部人吏出城，[11]他们不缺官，但是缺更加专业的吏。

二月十三，继续要求将宗族男女与十位学官、三十位明经送出城。[12]学官和明经可以提高金人的文化修养，为接管中原做充分的准备。对于三十位明经，金人给了很高的待遇，送上了聘礼，当作老师去尊重，城内官员也送给每人三十万的置装费。三十人都是自愿报名的，最踊跃的是福建人、四川人和浙江人，他们受到了文化阶层普遍的嘲笑，却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家乡距离都城遥远，本身就没有被那么强烈的忠君伦理束缚。这三十人直到二月二十[13]才出城完毕。

金人对这三十人的要求是，不要你们作大义和策略，而是要作乡土方略利害，要实用性的东西。三十人于是纷纷将山川险隘、古人攻占的地理因素等写出来，交给了金人，它们成了日后金军进攻宋朝全境的依据。[14]

二月十四，司天官、内侍、僧道、秀才、盐吏、裁缝、染工、木匠、银匠、铁匠、阴阳、技艺、傀儡、影戏、小唱等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出城。这些人一共运送二十天才结束，[15]每一天都有号哭的人们与无动于衷的官吏。

二月十六，后宫才人出城。[16]

二月十七，何㮚、高俅的家属，以及跟随皇帝在城外的随官的家属出城；[17]记载宗室情况的宗正玉牒、内库藏银出城。[18]这些天一共运送了宫嫔以下一千五百人，亲王二十五人，帝姬和驸马四十九人。[19]

二月十八，由于绢有多余的，金人让再送四百余万匹绢出城。景阳宫的钟，以及遗漏的宫嫔、皇族出城。[20]这一天金人又索要牛车千辆。[21]

二月十九，金军希望弄一批通佛经的和尚过去，有了上次明经的经验，和尚们踊跃报名。有数十人报名，金军最后留下了二十人。[22]他们要和尚，是因为他们认为寨中鬼魅太多，想请和尚作法。[23]

二月二十，金人亲自进入内廷，搜去了大量的珍宝器皿。五代以来历朝皇帝从江、浙、蜀等地收集的奇珍异宝，以及宋徽宗二十多年积累的各种文物珠玉，到此时终于被席卷一空。二月十八要的牛车也派上了用场，一路络绎不绝，国人感慨万分，不敢正视。[24]也从这一天开始，新一轮的搜刮金银又起步了，原因在于，金人从出城人员的行李中发现了太多的金银，认为城内官员没有尽到责任。

二月二十一，为了测试城内还有没有金银，在城内设置了几个卖米的场所，一两金购买米一石四斗，一两银购买米一斗。由于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们纷纷拿出金银来买米，于是又收上来许多金银。这件事更让金人感到恼火，增加了对城内的压力。他们丧失了风度，径直进入后宫，看到有人胳膊上带着金银钏，一把撸下就走。[25]

二月二十二，为了防止还有隐匿赵氏宗亲，以二月二十五为期限要求将他们都交出。[26]金人由于掌握了宗室谱牒，几乎没有遗漏下任何一个近亲宗室。如果不是康王提前离开，可能宋徽宗的所有儿子女儿就被一网打尽了。

二月二十三，开封府再送上金七万五千八百余两、银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余两、表缎四万八千四百匹。[27]

二月二十四，金军点名要两位太学生，名叫黄丰和杨愿，可能是前面出城的三十位明经向金人透露，这两人是太学生中最为出众的。但黄、杨并不想出城，辞以疾病，金人竟然同意他们留下了。[28]他们属于少数金人想要但没有要走的人。

二月二十五，由于金银不足，终于出人命了。为了搜刮金银，皇帝曾经在城的四周设立了四个官员，分别负责一面城墙（及其附近住户）的金银收集工作，他们分别是东壁提举户部尚书梅执礼、南壁提举开封府尹程振、西壁提举礼部侍郎安扶、北壁提举工部侍郎陈知质。此外，还有四名辅助官员，分别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和王候。他们挨家挨户进去发掘了一遍，仍然无法凑足。八人中，以梅执礼的威望最高，他建议，既然无论如何无法凑足金银，不如给城内百姓留一点希望，直接告诉金人，任务已经完不成了，作为官员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当他们的信到达了金军营地，不巧，恰好金人发现人质中携带了大量的金银，加上从二月二十一开始，通过出卖粮食又得到了一部分金银，这证明八位官员的说法是错误的，汴京城内还有大量的金银。[29]

这一天傍晚，八人被带到了元帅面前。一元帅询问为什么金银不足，四位主官均表示的确找不到了。

元帅大怒，问谁是负责人。其余的人战战兢兢，只有梅执礼表示，四人都是负责人。

元帅命令将四位副手各鞭背五十下放回。胡唐老被打死，其余三人号泣着回到城内。梅执礼等人为副手求情未果。

副手走后，元帅让四位主要负责人骑马离开。他们回到南薰门附近时，突然被人叫住，原来元帅的命令到了。他们下马后，被要求跪在地上，依次被杀，头被砍下，让家人用金银赎回，身体扔在了城门口，直到一天后才有人敢收尸。[30]

关于四人之死，金人却有另外的说法。在元帅们煞费苦心地从汴京城敲诈金银时，北方的宋军已经逐渐集结在了康王的名义之下。当时北方城池的占领情况如下：宗泽占据了澶州，闾邱升在濮州驻扎，黄潜善在曹州，赵野、范讷在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市），向子野屯巨野，何志同屯许州。这些将领曾经商议要一同来汴京与金人决一死战，却由于心不齐，加之担心金军从城墙上进入城市，造成破坏，只能在远处观望。

康王的军队虽然不足以进攻，却让金军感到害怕，担心回去时受到攻击。他们听说汴京城内的四壁提举官已经成了康王的内应，提举官表面上帮助金军筹集黄金，实际上却收留残卒，准备乘康王打过来时做内应。金人杀掉四位官员，就是防止他们帮助康王。[31]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已经无法考证，但至少金军是相信这样的说法的。这也表明金军的占领已经接近尾声了。

二月二十六，开封府推出新规矩，按照官员职级分成九等，每等各摊派一定的金银数目，平民分成三等，也各有数目。[32]比如，最高一级，两府、尚书的摊派是金二十两、银五百两、表缎三十匹。[33]

二月二十九，金人派人到普净寺，这里藏了朱勔家的许多书画，并到油衣库取走什物，再将太医局的玳瑁和药材拿走。[34]

除了不断地搜刮之外，金人的纪律已经乱了套。金军不再满足于在城墙上搜刮，他们下到城内抢夺、搜查，也因此制造了不少事故和火

灾。比如，二月二十三，封丘门、陈桥门被金人焚毁。二月二十八，保康门被焚毁，火势一直蔓延到延宁宫。三月初八，烧毁了天汉桥，并波及周围民屋百余家。[35]

随着搜刮进入尾声阶段，政权交接的大戏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以九族换取一城生灵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初一，这一天是大喜的日子，在金军营地里的张邦昌终于要回城了。

在送张邦昌回城的过程中，金军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张邦昌不会被杀死。他们早早地向城内放了风：交割的时候是个活的张相公，如果交割之后他死了，不管你们找什么借口，都是你们杀了他。金人没有明说后果，但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屠城。

城内的官员们最犯愁的，是应该按照什么礼节迎接这个“未来的皇帝”。最后决定，既然他还没有登基，还是按照宰相的规格来接待。御史台查了一下旧例，发现宰相入城，百官也应该到门口迎接，他们通知所有官吏必须于这一天的下午未时（一点），准时到南薰门迎接太宰张邦昌。

时辰到，公相们聚集在城门口达数千人，观看的百姓又有数万人。为了防止出现意外，范琼、汪长源等统制官领兵分列左右，从州桥到城门下如同两道铁墙一般。直到申刻（三点），张邦昌才赶到，文武百官站在城门内迎接，金人铁骑将他送到城门口，不入城，把他交割给范琼后，拨马就回。

当晚，张邦昌并没有进入皇宫，而是住在了尚书省内。不过由于他不是一般的宰相，照顾他的从员很多，有郎官十员值夜班，后来又增加了十员掌管各种事务，还有使臣十五员负责传递各种消息。[36]

在尚书省安顿下之后，百官们按照金人的意思请求张邦昌当皇帝。

不想张邦昌回来后，立刻宣称病了，连饭都不吃。众人把他逼急了，他就反问说："你们都怕死，就趁我不在把这个名头送给我，这不是来害我吗？我要答应了，不是大祸临头吗？"[37]

人们原本以为，张邦昌在金军营地时早就答应了当皇帝，现在才发现，张邦昌是刚刚知道这件事。在金军营地时，最初他对于百官推戴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后来，元帅们把百官的推戴信给他看，他大惊失色，表示这可不行，如果逼迫他，只有自杀一条路。

金人只好换了一个办法，表示准备立赵氏太子为皇帝，由张邦昌当宰相，监督盟约的执行。张邦昌这才答应了进城。[38]金人的意思是，只要骗张邦昌进了城，就可以利用宋人来劝说他。

三月初二，金军再次来信催促，表示给城内三天时间立张邦昌，否则立刻屠城。整个城市都慌了神，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一个病号的手中。三月初三，为了争取时间，百官们只好说张邦昌已经答应了，三月初七这一天就可以登基。

可另一面，张邦昌还是不吃东西，硬撑了四天。人们逼急了，他就拔出佩刀来要自杀，吓得人们赶快将他拦住，哭着说："相公你怎么在城外不死，偏跑到城里来死？你这不是害了一城的生灵吗？"

又有人劝说："相公你先权且当一下皇帝，等金人走了，你到底要做伊尹（将皇位还给赵氏），还是做王莽（将皇位据为己有），这都全在你自己。"

事出无奈，张邦昌只好答应下来，表示自己是以九族性命换取一城人的性命。[39]

当大部分人都谄媚地等待着张邦昌担任皇帝时，也并非没有反对者。在所有反对者中，最有能力的是以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为首的一

群青年军官。吴革曾向孙傅提议不要将太子送给金人，而是换一个孩子，在送出城的过程中将孩子摔死冒充太子的尸体，再把真太子偷偷藏起来或送走。但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这一次，吴革等人密谋于三月初八这一天发动政变。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范琼等亲金将领，由于范琼掌握军队，也是最配合金军的人，要想政变成功，必须首先将范琼等人杀死。杀死城内的亲金将领后，就可以争取城内所有军队和百姓的支持。然后，再命令军队从所有城门出城，列成两个主要战阵，与刘家寺和青城的金军两营对垒，劫掠金军营地，将二帝迎回。他们还制作了蜡丸送出城外，期待与城外的勤王部队里应外合。[40]

参与谋划的还有吕好问、马伸、张所、吴伦等人。一位叫作左时的人写了三封檄书，第一封指责金人侵略，第二封指责百官贪生怕死，第三封指责人民不反抗。从这三封书信中，也可以看出策划政变的是一个激进团体。

吴革等人之所以制定这个方案，是因为这时恰好有消息，四方勤王的人马快赶到了。金军的大部队都派到四方打仗去了，留在寨内的只有不满万人。这就给了城内可乘之机。

但即便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方案可行性也很小，要想从戒备森严的金军营地中将二帝救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也可以看作北宋武将阶层做出的一次绝望挣扎。

但接着，意外就出现了。在吴革等人做准备时，有人探得消息：有五十辆车从青城出发向东走了。吴革立刻想到这是金人把皇帝转移了，恸哭不已。如果皇帝离开了，那么一切策划都失灵了。

但实际上，吴革的猜测是错误的，皇帝一直在青城待着。可这个错误消息的确影响了吴革的准备工作。[41]

到了三月初六凌晨，有内官听说张邦昌三月初七就要登基，已经坐不住了，他们杀掉了妻子及其他家人，烧毁了居所，聚集了数百人，一

起找到吴革，表示当天就要起兵。这时密谋已经公开化了。不过，吴革还是冷静地询问："如果提前举兵，城外的援军得不到通知，不是坏事了？"

来人告诉吴革，就算没有城外的援助，城内大约有五千士兵和数十万百姓可以参与。吴革考虑到事情已经暴露，不得不发，只好披甲上马，向北面的咸丰门杀去。到了金水河，已经是黎明时分，周围都是范琼的人。

范琼并没有强行攻打吴革，而是叫人假装吴革的同党，把他骗下马，和他的儿子一起，出其不意将他斩首。吴革死前颜色不变，破口大骂。他死后，与他起事的数百人都被杀戮在金水河畔。[42]

伴随着范琼镇压了起事，三月初七，册封大戏正式登场。

这天一早，大风，有日晕，百官、僧道都来到了尚书省，等待张邦昌出来。张邦昌从尚书省门口痛哭着上马，到了西府门，假装头昏要摔倒了，立在马上待了一会儿，回过神来，继续痛哭。到了午时，有人将他引到了宣德门的西门阙下马，进入幕后，在那儿他继续哭泣，但没有耽误换皇帝的衣服。

金人派遣了五十多个使者，带着数百随从骑马赶到。正使是特进尚书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三千户、食实封二百户韩资政，副使是荣禄大夫、行尚书礼部侍郎、提点大理寺、护军、谯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曹说。礼直官是东、西上阎门使韩企先。持册命前来的人是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知御史中丞、上护军、彭城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刘恩。宣读册命的是枢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卫尉寺卿、上轻车都尉、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张愿恭。持皇帝印玺的是中大夫、行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太原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王企中。将印玺供奉给皇帝的是枢密院户房主事、银青荣禄大

夫、检校工部尚书、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轻车都尉、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李忠翊。

从这复杂的官名可以看出金人对于宫廷礼仪学习的迅速。金人赐给张邦昌的礼物如下：玉册（册匣、册床、行马一对）、金印大楚皇帝之宝（宝匣、宝床、行马一对）、红罗窄袄子、平面玉御带（纯金龙口束子、锦箱全）、银褐中单、乌纱幞头（衣匣、衣床、行马全）。[43]

使者们穿着红衣，拿着册封文件。张邦昌从幕后出来，在御街上朝着北面拜谢，舞蹈。在隋唐两宋时期，官员拜见皇帝除了跪拜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叫作舞蹈，可能是官员向皇帝做一些代表尊敬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了“舞蹈”这个名字。

张邦昌向北舞蹈，表明他认可金国的正统身份，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也只是金国的附庸。

接着他跪下接受册宝。金人册封他为大楚国皇帝，接受北宋的半壁江山。首都也不再是汴京，而是迁到了金人暂时不感兴趣的长江流域，以金陵（现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城。

张邦昌拜谢之后，金人作揖别过。到这时演的是“册命”一出戏。

金人退走后，由原来宋朝的文武百官接着演“朝贺”一出戏。百官从宣德门进入，穿着赭红色的袍子，张着红盖。张邦昌也步行从宣德门，经过大庆殿，到文德殿。在殿门口，有人给他送上皇帝专用的辇子，但他拒绝了，继续步行入殿。

他没有坐皇帝的正座，而是叫人在西侧又放了一把椅子坐下，接受了百官的朝贺。不过百官要下跪时，他立刻传令，表示自己是为了生灵才这么做，并不是真要当皇帝，请不要拜。但王时雍还是率领百官拜过，张邦昌一看连忙转身面向东拱手站着，表示没有接受。

整个仪式过程中，大部分人都哭丧着脸，表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有一小部分人却欣然而为，他们是王时雍、吴开、莫俦、吕好问、范琼、徐秉哲等亲金大臣，张邦昌当皇帝后，必须依靠这些人才能维持统治。[44]特别是王时雍，每次向张邦昌汇报，必定以“臣启陛下”开篇。[45]在官职上，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开、莫俦皆为权枢密院，吕好问为权门下侍郎，徐秉哲为权中书侍郎，范琼是负责保卫皇帝的殿帅。[46]

在城内，人们给几位大臣起了外号，王时雍被称为“卖国牙郎”，吴开、莫俦主要负责传递消息，所以称为“捷疾鬼王”。[47]

当天，消息传到青城的宋徽宗耳中，太上皇立刻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定了，他必定被金人裹挟而去，正伤心的他泣下沾襟。第二天有人向他献了两句诗：“伊尹定归商社稷，霍光终作汉臣邻。”意思是张邦昌必定会把皇权交还赵氏，太上皇边读边骂：“等他把社稷还回来，我已经跑到比龙荒还北面的地方去了！”[48]

为了表示无心当皇帝，张邦昌还做了一系列的规定。虽然皇宫主人换成了他，他却只当一个皇宫的暂时保管人，不登正殿，又罢去了繁复的皇家礼仪规定。对于皇帝起居的大内，更是连门都不进，直接在各个门上贴了封条，写上“臣张邦昌谨封”。他不受通常的朝拜，百官见他不用山呼万岁，谈话时也从来不说“朕”这个皇帝的专用名词，而是用“予”来代替。由于有人将他的命令说成“圣旨”，他还专门下了一道命令（三月十二），规定不准说圣旨，只准称“中旨”；如果是当面得的命令，叫“面旨”；要发往四方的，称作“宣旨”；手诏则称作“手书”。总之避开一切可能让人误会的称谓。

只有一个场合，张邦昌不得不继续演戏，那就是金人在场的时刻。有时候，张邦昌穿着常服与宰执们议论，双方以名字相称，突然间，金人来了，他就立刻进去换上皇帝的服装。就连卫士都说：“以前戏子演杂剧时都装作假官人，今天张太宰就是这样的一个假官家。”

不过，金人对他却非常有礼貌，元帅们下令，金使觐见张邦昌必须按照以前对待宋朝皇帝的礼仪。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在即位之前是张邦昌朝金人鞠躬，现在金人都是在台阶下拜见张邦昌。张邦昌有些不习惯，告诉金国使者可以随便一些，金使表示如果不这样，回去元帅会杀了他们。[49]

在张邦昌与群臣们演戏时，金军却开始准备撤离了。他们的军队也是各个部落拼凑的，到了夏天急着回北方。但在离开前，还需要做最后一次尝试，看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于是，张邦昌登基之后邀请金人庆祝了几天，吃喝一番[50]，到了三月十二，就继续干正事儿了。

三月十二，金军将景灵宫席卷一空。景灵宫是皇帝祭奠天神和祖宗的所在，里面各种祭祀用品不少，金人将之卷走。

三月十三，劫掠宗庙。

三月十四，席卷内藏库。[51]

但这些还只是常规动作，金人最想要的还是金银，他们决定最后试一把。在开封府上报给金军的户口册中，注明汴京城一共有七百万户，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按照每户三人（很保守）来算，就是近两千一百万人，放在现代也是世界特大城市。可事实上，北宋末期全国总人口也只有五千万左右，比如，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统计，是户两千零二十六万四千三百零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人。具体到东京开封府，是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两千九百四十人。[52]这个数据与上报数字差了二十多倍。

金人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口，只有这么一点金银，于是决定采取摊派的办法再搜刮最后一遍，按照七百万人户来分摊金银。开封府明知道没有这么多人，却又不敢明说，只好把数额摊派在二十六万户的头上，结果，即便是最贫穷的家庭也摊派了金三十锭、银二百锭。

不想这件事产生了反作用。大家一看这已经成了胡闹，干脆连理都

不理，金人威胁不交就屠城，可人们已经不怕死了，都威胁不动。另外，大家似乎捏准了金人的心态，既然已经准备撤离，他们的心思更多应该放在如何安全地撤退上，不大可能屠城了。[53]

这件事僵持到了三月十四，老百姓不配合，金人没有面子，大家都怨开封府做了傻事。最后出来收场的就是新任皇帝张邦昌。三月十四，张邦昌写信给金军元帅们，请求豁免金银，他表示进城之后察看一番，发现民间真的很穷了，榨不出来了，也希望元帅们给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留一点家底。[54]

三月十五，张邦昌亲自前往青城与元帅们会晤，他带着七件事前往：第一，不毁赵氏的陵庙；第二，不要继续搜刮金银；第三，汴京城墙上防御用的楼橹不要拆掉；第四，既然定都金陵，但要等那边建设完毕，三年后再搬迁；第五，金军于五日内班师回朝；第六，张邦昌的国家叫大楚，他就叫大楚皇帝，不再另立庙号；第七，他需要犒赏军民功臣和大赦，但这个国家已经一穷二白了，需要金军支援一点金银作为犒赏之用。元帅们全都答应了下来。[55]

张邦昌见元帅们答应了，又提出了新的请求。他提议金人扣押的官员已经太多了，带回去也是累赘，不如放回一些，他的名单上包括冯澥、曹辅、路允迪、孙觌、张澂、谭世勣、汪藻、康执权、元可当、沈晦、黄夏卿、郭仲荀、邓肃，以及太学、六局、秘书省中用不着的官员。金军也答应了。

但张邦昌提出的另外五人，金军没有答应，他们是何㮚、张叔夜、孙傅、秦桧和司马朴，这些人大都是反对废黜赵氏的，他们必须与赵氏一同前往北方。他们的家族成员只要能抓住的也全部在迁移之列。

直到三月二十三，金人将释放人员送回时，才正式发布告示，宣布豁免了剩余的金银。[56]这一天放回的人有数千之众，除了官员，还有百姓、僧道等。[57]张邦昌作为一个傀儡政府，对于汴京城的保护却比

宋朝两位皇帝还多。

那么，金军一共从汴京城榨出了多少金银呢？这也牵出了汴京围城史最悲惨的一幕……

【注释】

[1] 参考《靖康要录》与《大金国志》。

[2] 参考《宋史·张邦昌传》。

[3] 参考《玉照新志》。也有记载是宋齐愈出使金军营地，回来将张邦昌名字写在纸上，没有询问王时雍环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 参考《中兴遗史》。

[5] 《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

[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7] 参考《靖康要录》。

[8] 参考《挥尘余话》。

[9]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五七篇。

[10] 参考《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1] 参考《瓮中人语》。

[12] 参考《靖康要录》。

[13] 参考《靖康纪闻》。但《纪闻》记载索要明经是在二月十八。

[14] 参考《中兴遗史》。

[15] 综合《瓮中人语》与《靖康要录》。

[16] 参考《瓮中人语》。

[17] 参考《靖康要录》。

[18] 参考《瓮中人语》。

[19] 参考《靖康纪闻》。

[20] 参考《瓮中人语》。

[21] 参考《靖康要录》。

[22] 参考《靖康纪闻》。

[23]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24] 参考《靖康要录》。

[25] 参考《靖康要录》。

[26] 参考《靖康纪闻》。

[27] 参考《瓮中人语》。

[28] 参考《靖康纪闻》。

[29] 参考《中兴遗史》。

[30]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31]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32] 参考《靖康纪闻》。

[33] 参考《靖康要录》。

[34] 参考《靖康要录》。

[35] 参考《瓮中人语》与《靖康要录》。

[36] 参考《中兴遗史》。

[37] 参考《大金国志·楚国张邦昌录》。

[38] 参考《朝野佥言》。

[39] 参考《大金国志·楚国张邦昌录》。

[40] 参考《中兴遗史》。

[41] 参考《中兴遗史》。

[42] 《三朝北盟会编》引《伪楚录》。

[43]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六三篇。

[44] 综合《靖康纪闻》《大金国志》《中兴遗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三朝北盟会编》等。

[45] 参考《中兴遗史》。

[46] 参考《大金国志》。

[47] 参考《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48] 参考《北狩见闻录》。

[49] 参考《大金国志·楚国张邦昌录》。

[50] 参考《靖康纪闻》。

[51] 参考《瓮中人语》。

[52] 参考《宋史·地理志》。

[53] 参考《靖康纪闻》《中兴遗史》。

[54]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六七篇。

[5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5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57] 参考《靖康纪闻》。

第十六章
战争中的女人

卖妻女还债的皇帝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十五张邦昌前往金军营地会晤时，还带去了一份由开封府撰写的报告，这份报告之详细，让人们对开封府和徐秉哲的工作能力竖起了大拇指。

在了解报告正文之前，先看其中给出的上缴金银数字。报告指出，在第二次汴京围城期间，开封府一共向金军供奉金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两、银七百七十二万八千两。[1]

这里可以把数字与第一次围城战做个比较。第一次斡离不围城，共获得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也就是说，第二次金军人数更多，还是两路大军合围，开出的价码也更高，获得的金银却比上一次少得多，只有上一次的一半左右。

这说明，汴京城的财富在上一次围城之后还没有恢复。对于这个数字，东路军元帅斡离不是无所谓的，他已经在上一次捞够了钱，也拿够了宝贝，但西路军元帅粘罕却有足够的理由不满意。上一次由于他没赶到，没有分到钱，这一次他是最后的决策人，而且地位在斡离不之上，在攻打城市时，粘罕的西路军也更卖力，反过来，斡离不既没有出太多的力，甚至还带着点同情给宋朝通风报信。

粘罕和士兵们之所以这么卖力，就是因为汴京城内巨大的财富在吸引着他们，他们在脑海中无数次将财富的数目放大过，没想到最后获得

的还没有上次斡离不多，总数少了一半，军人数量增加了不止一倍，攻城的开销也大了很多，每个人到手的财富可能只是上次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到手的财富这么少，那么怎么才能安慰这些远道而来的士兵呢？答案是一个历次战争都存在的秘密——女人。

事情要从斡离不得到的一个女人谈起。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九，两位元帅曾经索要奸臣蔡京、童贯、王黼等人的家属。在移交家属时，有一位蔡家的婢女归了二太子斡离不。这位婢女姓李，她曾经是宋朝公主茂德帝姬赵福金的侍女（金人习惯称之为福金帝姬），茂德帝姬嫁给了蔡京的儿子蔡脩。蔡脩被皇帝送给了金军，茂德帝姬作为公主，回了娘家，不会被遣送。

斡离不以前曾听宋朝使节邓珪提起过赵氏公主们的美貌，早就馋涎欲滴，这时正好找李氏来核对一下。李氏立刻告诉斡离不，最美的就是她曾经的女主人——茂德帝姬。带有点花花公子性格的斡离不立刻提出和亲要求，但没有收到答复。[2]

到了第二年正月初八，宰相何㮚前来请求减少金银数目，两位元帅都不同意，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粘罕还是希望宋朝先完成前面约定中的哪怕任意一项，再讨论其他项目的减免；而斡离不却明确提出，除非皇帝答应和亲，否则免谈。[3]

正月初十，皇帝来到青城，但两位元帅却迟迟没有相见。元帅们授意使者萧庆向皇帝提出了新的建议，包括：亲王、宰执各两人作为人质，皇帝使用的冠冕、车辂、宝器两千具，并希望将岁币再增加银绢二百万两匹。这些还都属于常规要求，更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元帅们提出新的要求：女人。

首先的要求是，北宋提供民女和女乐各五百人，同时，必须提供两位赵氏宗族的女子（实际上必须是帝姬）送给两位元帅，进行和亲。

宋朝的大臣争辩了很久，最后还是不得已答应了。[4]

但在暗地里，斡离不还有更深的打算。他派遣杨天吉、王汭与北宋代表吴开、莫俦交涉，提出在遣送家属时，虽然送来了蔡京的儿子蔡儴，但蔡儴的妻子茂德帝姬却没有在列。帝姬既然已经出嫁，自然算是蔡家的人，理应遣送。如果不送来这位帝姬，就谈不成和议。皇帝也只好答应，写信进城，要求遣送茂德帝姬，并告知城内他已经答应了和亲。[5]

正月十三，元帅们又想明白了，既然是和亲，到底选哪个帝姬就需要自己选择，否则宋朝可能找两个既不好看也不受宠的帝姬，随意打发一下。皇帝只好派王宗沔入城找太上皇协商，王宗沔边走边哭，让城内的百姓们胆战心惊。[6]

但这一次，太上皇拒绝了和亲，茂德帝姬也没有遣送。

正月十四，太上皇的意见传了回来，皇帝只好再找元帅们商量。在帝姬的选择上，不方便将已经嫁了人的帝姬送出来。按照汉人的规矩，一个女人通常只能嫁一次人，即便有例外，也大都是丈夫将女人休掉，或者丈夫去世，既然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就不能随便将帝姬再许给别人。[7]

但随着情况的恶化，女人迟早是保不住的。正月二十二，萧庆与吴开、莫俦等人终于谈定了最后的条件，这个条件也将宋朝的公主们打入了深渊。具体条件如下：

第一，太上皇不用出城，也不用跟金人北行，但是，必须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人质。

第二，金军承诺不占领黄河南岸与汴京，但必须将帝姬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交给金军，同时承诺每年增加岁币五百万两。

第三，原定的亲王、宰相和河北地区守臣的家属都必须尽快交割。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定的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必须在十天内交割完毕，如果无法按时完成，就必须将皇家的女人们作价卖给金军，以充金银之数。具体的价格是，帝姬和王妃每人一千锭金，宗姬一人五百锭金，族姬一人二百锭金，宗妇一人五百锭银，族妇一人二百锭银，贵戚女一人一百锭银。[8]

也就是说，只要无法完成金银的缴纳数目，几乎所有赵氏的女子都无法幸免于难。从前一个月的征缴情况看就很明显了，金银的数量是注定无法凑够的。既然这样，皇帝为什么会签这个出卖了所有女人的协议？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也许他并不知道开封府筹措了多少金银，还差多少；也许隔离太久的他已经对一切都不在乎了，只求早点解脱，不管什么条件都可以签字。

正月二十八，是金军营地狂欢的一天。根据宋金协议，北宋需要将八千女人送入金军营地，这项工作从正月二十五开始，开封府给抓到的每一位女性都穿上漂亮的衣服，送往金军营地。到正月二十八，已经有五千位女性被送到金军营地，金军选择了三千处女收下，将其他的退回来要求更换，国相粘罕自己留下了数十人，剩下的分给了各位将领，官职在谋克以上可以分数人，官职在谋克以下分一到二人。

粘罕分得了数十人，那么二太子斡离不又如何呢？斡离不获得了更大的收获——茂德帝姬入手了。由于太上皇不同意和亲，如何把茂德帝姬送给斡离不泄欲，成了开封府的要紧事。这一天，恰好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伎各二十四人要送往刘家寺，开封府就把茂德帝姬冒充歌伎送往了皇子寨。茂德帝姬最初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做了交易，见到斡离不后面如蜡色，浑身战栗。斡离不是个软心肠的人，连忙让原来伺候过她的李氏出来安慰帝姬。李氏款款相劝，乘机将她灌醉送入了斡离不的房中。

也是从这时开始，金军的秩序荡然无存。由于军官们每人都分到了女人，士兵们却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进城劫掠。按照元帅们的规矩，士兵必须在城墙上不能下去，但进城消遣已经成了惯例，即便在大白天，城里也有大摇大摆毫不避讳的金兵。

牺牲茂德帝姬本来是为了解救皇帝，但不想这件事是斡离不背着粘罕做的。到了二月初四，斡离不私吞茂德帝姬的消息被宋朝使臣邓珪不小心泄露给了粘罕，粘罕大怒。[9]

之前，粘罕虽然想废掉皇帝，但在斡离不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不再强调废赵氏，而是希望将赵氏变成藩国。但听说了斡离不私藏茂德帝姬之后，加上发现汴京城还藏有不少黄金，粘罕改变了态度，决定废黜皇帝。[10]

男人之罪女人偿

二月初六，皇帝被废黜；初七，太上皇出城。随着太上皇出城的还有大量的宗室女子。这时，由于金银数量不够，皇帝与元帅的对赌协议也已经生效，这些宗室女子事实上都被皇帝卖给了金人，只是她们本人还不知道罢了。

在出城时，太上皇还请求元帅们不要动那些已经嫁人的女人，但元帅们只同意让他保留自己的妻妾，其余的人他管不着。[11]

同样是从二月初七这一天开始，北宋灭亡就到了最悲惨的一幕：北宋朝廷用女人的身体来偿还男人的债务。

当天夜里，粘罕宴请金军诸位将领，他命令宋朝宫廷的宫嫔们换上歌伎的衣服出来表演，还间坐在男人中间劝酒。有的女人不愿意做，其中有三位分别姓郑、徐、吕的宫人明确拒绝了，粘罕命令将她们斩首示众。她们的英勇换不来一个留名的机会。当天夜里，又有一人用箭镞戳

喉自杀而死，只是为了不受辱，但她连姓氏都没有留下。[12]

二太子斡离不的营地也好不到哪儿去。事实上，早在二月初四那天，就有烈女张氏、陆氏、曹氏不肯屈从于二太子，被用铁杆串起来竖在营前，三天才死绝。斡离不号称菩萨太子，标榜不轻易杀生，对待北宋君臣也更加仁慈，但对女人上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怜悯。

到了二月初七，更多的王妃帝姬被送入刘家寺寨子里，斡离不就指着三人的尸体，告诉她们如果不服从这就是后果。见惯了太平的女人们吓得只求饶命。

斡离不让茂德帝姬出面安慰她们，让她们宽衣解带洗浴完毕，再换上歌伎的衣服伺候宴席。[13]

除了一开始大批被送来的女人之外，有很多女人藏到了民间。但开封府用超高的效率将她们一一揪出，因为只有完全找到了她们，才能让金军早点离开。

二月初八又有王妃帝姬六人被送往金军营地，二月初九、初十有九人被押解到刘家寺。这一天，二太子与一位姓朱的妃子的对话最能反映妇女的遭遇，这位朱妃只有十三岁，不肯屈服于二太子，于是斡离不说："你是一千锭金子买来的，怎么敢不从我？"

朱妃问道："谁卖的？谁拿了金子？"她得到的回答是皇帝把她们卖了充犒军钱。

朱妃仍然倔强地说："谁犒军，谁就抵债，我的身体怎能受辱！"

二太子反驳说："你们皇帝当初不也是从民间选宫女数千人？今天你们灭了国，你就只是民妇，按照规矩入贡于我，也是本分，更何况还是抵债！"

朱妃无奈闭嘴，伺候她的小宦官请娘娘自重。但最终小宦官却不堪丧国之辱自杀了。[14]

二月十一，除了朱皇后、太子、柔嘉公主（属于宋钦宗）出城入青城寨之外，还搜出来四位王妃、帝姬送入刘家寺。[15]

关押宋朝俘虏的地方主要有两个。国相的青城寨主要关押两位皇帝，以及亲王的家人，还有重要的大臣，他们被押在斋宫之中。二太子的刘家寺寨则主要关押其他不那么重要的人，大量的王妃、帝姬都被送到了这里，他们被关在刘家寺寺庙群中一个叫寿圣院的地方。另外，两地都有大量的女人随时供将领们享用，青城寨装不了这么多人，粘罕又让人在旁边建了一座木寨（二月十四建成），让童女、宫女、新来的宗戚妇女住进去。[16]

由于人数众多，条件艰苦，加上各种虐待，俘虏出现了大量死亡的现象，即便宗室也不例外。二月十五，宋徽宗的儿子建安郡王赵楩在青城斋宫去世。恰好这时有一个叫李浩的人被误抓了过来，他长得有点像相国公赵梴，宋徽宗想让李浩冒充相国公，让相国公找机会逃走。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只好让李浩继续冒充相国公，而真的相国公顶替了建安郡王。他们都被金军带往了北方。[17]

二月十六，妇女集结完毕，两位元帅下令那些分配给金军将士的妇女脱下汉装，换上金人的衣装。有些女人在家就已经有了身孕，元帅们专门派医生为她们打胎。[18]

二月十七，粘罕在青城寨宴请斡离不，他们从宋朝供奉的女人中选择了三千人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之后又将一千四百人赏赐给将士。两位元帅身边各有上百人。[19]这些妇女并非都很悲惨，只要服从了元帅，她们立刻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赏赐，穿着秀曼光丽的衣服，戴着紫色的头巾，装饰着金色的束带。[20]此时的金军营地才有了征服者的感觉，寨子里堆着如山的金银宝物，将士们拥抱着各色的美人，军纪坏到了极致。

第二天，斡离不在刘家寺宴请粘罕，号称太平合欢宴。在座的不仅

有金军的重要将领，还把宋朝两位皇帝、皇后也请去了。宾客们上午巳时（九点）入座，粘罕、斡离不、阇母、讹鲁观、谷神（兀室）、阿懒、挞懒、蒲鲁虎、设也马、斜保十人，加上太上皇、郑太后、宋钦宗、朱后，坐在堂上，每席两人，其余三十二位将领坐在堂下。

金军将领斜保请斡离不找二十位妃姬，以及三十二位歌伎劝酒。这二十人原本都是宋徽宗的人，现在却成了金军的盘中餐。她们一上场，两位皇帝和两位皇后立刻要避开，却被粘罕制止了。皇帝们不情愿地一直坐到曲终席散，才获准离开。

在离开前，斡离不突然请求太上皇将富金帝姬嫁给金军将领设也马。太上皇表示，富金已经有家了，按照中国传统，一女不嫁二夫。太上皇的话让国相大怒，他当着太上皇的面，让将领们每人挑两位出场的妃姬带走。

反而是宋徽宗的皇后郑太后看到自己的侄媳妇在堂下，连忙跪下请求粘罕，表示自己不参与朝政，也不想连累家人，请求国相不要叫人挑侄媳妇。粘罕点头同意，郑太后救下了侄媳妇。[21]

不过，五天后，国相又命令将领们将领走的妃嫔还回来，算是优待太上皇。大部分将领遵从了，只有真珠大王设也马与宝山大王斜保没有归还。[22]

在所有妇女中，康王的母亲韦贵妃与妻子邢氏受到了特殊对待。由于康王还没有回来，金人不断地催促他回京，也将他的妻母从青城寨斋宫调往了刘家寺的寿圣院，斋宫囚禁的大都是高官显贵的家庭，刘家寺大都是皇帝的妃嫔。

随着金军的蹂躏，寨中死亡的妇女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不乏有地位的。开封府把郓王一个妃子王氏送到刘家寺，王氏立刻选择了自杀。[23]二月二十，身处于青城寨的信王妃不堪凌辱，选择了自杀。[24]二月二十四，仪福帝姬生病，获准到刘家寺寿圣院休养。[25]二月二十

五，另一个帝姬——仁福帝姬——死在了刘家寺。二月二十八，贤福帝姬死于刘家寺。三月初七，保福帝姬死于刘家寺。[26]三月十三，由于皇帝的女儿太少，甚至在金军中还引起了纷争。比如，在二月二十六，万户赛里派遣千户国禄都给元帅府写了封信，表示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十七岁的柔福帝姬（名叫多富）订了婚，下过了聘礼。柔福帝姬被关押在帅府中，赛里请求元帅将帝姬释放，好让野利娶了她。

两位元帅很纳闷，帝姬们在深宫大院里，出城后又被严格地控制在刘家寺的寿圣院，野利到底有什么机会见到她们，又怎么会下过聘礼呢？他们把柔福帝姬找来询问，原来在出城那一天，柔福帝姬的轿子坏了，几位下了城的金军将她抓到了旁边的民居里，一人自称是北国大王的弟弟，送给她一个香囊。这个人就是野利，香囊就被当作了聘礼。野利还号称只要柔福帝姬跟了他，就和在汴京一样有享不完的荣华。

元帅们大怒，野利不仅违反了不让下城的命令，而且还抢夺帝姬，他们把野利押到南薰门斩首。[27]野利到头来不但没有得到公主，反而丢失了性命。

最详细的皇帝后宫报告

对于女人的抢夺到了三月十五基本上告一段落。这一天，新皇帝张邦昌拜访元帅时，也带去了一封开封府写的最终报告。这份报告成了汴京城女人们遭遇的最佳写照。

平日里，人们对于皇帝后宫的女人虽然充满了好奇，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她们姓甚名谁。人们提到她们时，只是提称号而已，比如郑皇后、乔贵妃、崔淑妃、王德妃、韦贤妃，等等。至于更低级的妃嫔们，她们在历史中只不过是一粒不值得标记的尘埃。

偏偏靖康之耻将宋徽宗的宫廷彻底打开，金人在收集皇帝的妃嫔时一丝不苟，加上又有一个执行力强大的开封府做后盾，将皇帝的后宫硬

生生做成了标本展现在后人的面前。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每一个女人都是有名字的，比如，宋徽宗除了五个后妃之外，还有嫔三十一人，分别叫金弄玉、陈娇子、月里嫦娥、申观音、金秋月、朱素辉、左宝琴、新刘娘、李珠媛、萧金奴、席珠珠、朱桂林、曹柔、周镜秋、徐散花、林月姊、王月宫、阎宝瑟、任金奴、林菱香、余羞花、王三宝奴、郑媚娘、蒋敬身、陆娇奴、毛朱英、黄宝琴、陈大和、秦怀珊、奚巧芳和江南春。

此外还有四十一位宠婢、六十七位婢，细心的开封府将她们的名字一一登记在案。[28]这些千娇百媚的名字对应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平常，她们都被淹没在庞大的集权帝国机器之中，不配有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军的入侵，让她们从历史的角落中走出来，至少留下了一个记号在史书中。

表 开封府移送皇室名单[29]

皇室名单	皇室称谓及年龄	与宋徽宗亲属关系及其命运
皇子二十三人，另有二人早殁，康王构（二十一岁）逃脱，后为南宋高宗	郓王楷，二十七岁	徽宗第三子，天会八年六月二十六殁于韩州
	肃王枢，二十六岁	徽宗第五子，天会八年十月殁于五国
	景王杞，二十四岁	徽宗第六子
	济王栩，二十二岁	徽宗第七子
	益王棫，二十一岁	徽宗第八子
	祁王模，二十岁	徽宗第十一子，天眷元年八月十一殁于五国
	莘王植，二十岁	徽宗第十二子
	徐王棣，十九岁	徽宗第十四子
	沂王楈，十八岁	徽宗第十五子，天会十年七月伏诛于五国
	和王栻，十七岁	徽宗第十七子，天会六年九月为其兄楈谋害
	信王榛，十七岁	徽宗第十八子，天眷二年六月十九殁于五国
	安康郡王榥，十六岁	徽宗第二十子
	广平郡王楗，十五岁	徽宗第二十一子
	相国公梴，十五岁	徽宗第二十三子
	瀛国公樾，十三岁	徽宗第二十四子，天会九年四月十八自戕于五国
	建安郡王模，十三岁	徽宗第二十五子，天会五年二月十五殁
	嘉国公椅，十岁	徽宗第二十六子，天会八年九月殁于五国
	温国公栋，九岁	徽宗第二十七子
	英国公橞，八岁	徽宗第二十八子
	仪国公桐，七岁	徽宗第二十九子
	昌国公柄，六岁	徽宗第三十子，天会十年十月殁于五国
	润国公枞，五岁	徽宗第三十一子
	韩国公相，三岁	徽宗第三十二子

皇室名单	皇室称谓及年龄	与宋徽宗亲属关系及其命运
近支亲郡王七人	濮王仲理，晋康郡王孝骞，平原郡王孝参，和义郡王有奕，永宁郡王有恭，燕王俣，越王偲	
帝姬二十一人，另有六人早殁	嘉德帝姬，玉盘，二十八岁	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三年十二月殁
	荣德帝姬，金奴，二十五岁	入挞懒（完颜昌）寨，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二年封夫人
	安德帝姬，金罗，二十二岁	靖康二年十月二十六殁于多昂木寨
	茂德帝姬，福金，二十二岁	天会六年八月殁于兀室寨
	成德帝姬，瑚儿，十八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洵德帝姬，富金，十八岁	嫁真珠大王设也马为妃
	显德帝姬，巧云，十七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顺德帝姬，缨络，十七岁	入云中御宅，天会十五年殁于五国习古国王寨
	仪福帝姬，圆珠，十七岁	入兀术寨
	柔福帝姬，多富（嬛嬛），十七岁	入洗衣院，天会十三年入盖天大王寨，遣嫁徐还，皇统元年亡
	保福帝姬，仙郎，十六岁	殁于刘家寺
	仁福帝姬，香云，十六岁	殁于刘家寺
	惠福帝姬，珠珠，十六岁	嫁宝山大王为妾
	永福帝姬，佛宝，十六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贤福帝姬，金儿，十六岁	殁于刘家寺
	宁福帝姬，串珠，十四岁	入讹鲁观寨，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元年封夫人
	和福帝姬，金珠，十二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令福帝姬，金印，十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华福帝姬，赛月，九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皇统元年封次妃
	庆福帝姬，金姑，七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皇统元年封次妃
	纯福帝姬，金铃，四岁	天会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皇孙十六人	太子谌，郓王子三，肃王子二，景王子一，济王子二，益王子一，邠王子一，莘王子二，仪王子二，徐王子一	

皇室名单	皇室称谓及年龄	与宋徽宗亲属关系及其命运
皇孙女三十人	柔嘉公主，郓王女六，肃王女二，景王女二，济王女七，康王女五，益王女一，祁王女二，莘王女二，徐王女二	
徽宗后妃五人	郑皇后	从徽宗，天会八年九月初五殁于五国
	乔贵妃，四十二岁	从徽宗，流五国
	崔淑妃，三十六岁	从徽宗，流五国
	王德妃，三十五岁	靖康二年六月初四殁于燕山
	韦贤妃，三十八岁	高宗母，入洗衣院，天会十三年遣五国，绍兴十二年四月归宋
徽宗嫔三十一人	金弄玉，陈娇子，月里嫦娥，申观音	入讹鲁观寨
	金秋月，朱素辉，左宝琴，新刘娘	入萧庆寨
	李珠媛，萧金奴，席珠珠	入葛思美寨
	朱桂林，曹柔，周镜秋，徐散花，林月姊，王月宫，阎宝瑟，任金奴，林菱香，余羞花，王三宝奴，郑媚娘，蒋敬身，陆娇奴，毛朱英，黄宝琴，陈大和，秦怀珊，奚巧芳，江南春	从徽宗，入五国
徽宗宠婢四十一人	新王婕妤，小王婕妤，周春桃，狄金奴，邵元奴	从徽宗，入五国
	曹小佛奴	入葛思美寨
	奚拂拂，裴宝卿，管芸香，谢吟絮，江凤羽，刘蜂腰，刘菊山，阎月媚，朱柳腰，俞小莲	入洗衣院
	莫青莲，叶小红，李铁笛，邢心香，姚小娇，罗醉杨妃，程云仙，高晓云，小金鸡，邢小金，卢袅袅，周河南，景樱桃，何羞金，辛香奴，徐癸癸，朱凤云，冯宝玉儿，芮春云，曾串珠，顾猫儿	入诸郎君寨
	邱巧云，郭小奴，方朝云，卫佛面	道殁

皇室名单	皇室称谓及年龄	与宋徽宗亲属关系及其命运
徽宗婢六十七人	李春燕	归张邦昌为后
	陈桃花，杨春莺，郭佛迷，曹大姑	入真珠大王寨
	郑佛保，谢三奴，任玉桃，吴阿奴	入宝山大王寨
	霍小凤，何青凤	入高庆裔寨
	郑巧巧，张小花	入耶律余睹寨
	王猫儿，刘白古，张好郎，孙心奴	入兀室寨
	费兰姑，吴富奴，朱燕姑，刘鸳鸯	入娄宿寨
	沈金男，马兰廋	入刘思寨
	韦月姑，张贝姑，卫福云，刘阿奴，文杨妃，王赛莲，刘月奴，乔瑞芳，黄朱红，张月仙，向袖云，彭佛哥，梁温和，王剪云，吴端姑，钟大宝，王月奴，杨吉保，叶金姑，恽花云，张花媚，王金姑，李巧郎，黄观音，李双飞，姜银铃，徐春罗，曾四面，田倩云，李仙桃，荀玉虎，顾小郎，褚观音，潘玉儿，任蕙卿，刘春芳，王红奴，芮二南，王杏林，纪男郎，汤三姑，邢柳姊，汪和姑，于一剪红	道殁十一人，余入云中御寨
钦宗后妃二人	朱后	从钦宗，流五国
	朱慎德妃	从钦宗，流五国
钦宗嫔十人	郑庆云，狄玉辉	从钦宗，流五国
	刘月娥，何凤龄，郑月娥，薛长金	入真珠大王寨
	卢顺淑，戚小玉，韩静观，鲍春蝶	入宝山大王寨

皇室名单	皇室称谓及年龄	与宋徽宗亲属关系及其命运
钦宗婢二十七人	曹妙婉，卜女孟，席进士，程巧，俞玩月，黄勤	殁于水
	卫猫儿	自刎
	徐宝莲，姜田田	病殁
	顾顽童，芮秀，严莺簧	入宝山大王寨
	杨调儿，陈文婉	敕赐真珠大王
	朱淑媛，田云秀，徐钰，许春云，周南，何红梅，方芳香，沈知礼，叶寿心，华正仪，吕吉祥，褚月奴，骆蝶儿	入洗衣院
另有皇子妃三十四人，亲王妃十八人，王女二十三人，驸马八人		

表 汴京女子换钱表[30]

项　目	单　位	收　益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	人准金一千锭，帝妃五人倍益	金十三万四千锭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	人准金五百锭	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	人准金二百锭	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四百零四人，宗妇两千零九十一人	人准银五百锭	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两千零七人，歌女一千三百一十四人	人准银二百锭	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一十九人	人准银一百锭	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合计	金六十万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不过，开封府将她们登记下来，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为了将她们移交给金军。开封府之所以这么卖力地抓捕这些女人，是因为她们担负着“卖钱”的重任。宋钦宗曾经与金军签过对赌协议，完不成筹集金银的

任务，就将女人卖给他们。

那么这些女人到底有多值钱？按照开封府的计算，帝妃五人的价格是每人五千锭黄金，王妃、帝姬、公主四十六人的价格是每人一千锭黄金，加起来就是十三万四千锭黄金。开封府花了巨大的力气，才一共凑了四万九千五百二十锭黄金，这还是金军减少之后的数目，卖掉五十一位后妃公主换来的金子，就已经是上缴黄金数目的两倍半还多。

除了五十一位后妃公主之外，还有一万一千五百零六名妇女被皇帝卖给了金人，一共（加上后妃公主）换回来金六十万七千七百锭、银两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与之对比，金人要求的战争赔款是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筹集的真金白银折合金四万九千五百二十锭、银一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锭。也就是说，卖人收入占了赔款的一半以上。真金白银只能凑够赔款的一小部分。

但即便加上卖人收入，最后仍然不够赔款数额，依然欠缺黄金三十四万两千七百八十锭、白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31]这些还不上的钱，就只好靠张邦昌求情，由金人将其赦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汴京城不是由皇帝救下的，而是由女人们和张邦昌联手将它带出了深渊。

【注释】

[1] 参考《开封府状》。

[2] 《南征录汇》引《雏凤清声》。

[3]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

[4]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5]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

[6] 这一天还再次提出来让太上皇出宫，还是被皇帝挡回去了。

[7]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8]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和《行营随笔》。

[9]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行营随笔》。

[10]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行营随笔》。

[11] 参考《南征录汇》。

[12]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13]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

[14]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

[15]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16] 《南征录汇》引《毳幕闲谈》。

[17] 《南征录汇》引《毳幕闲谈》。

[18]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

[19]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20] 参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21] 参考《南征录汇》。

[22]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23]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24]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25] 《南征录汇》引《雏凤清声》。

[26] 《南征录汇》引《屯翁日录》。

[27]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28] 参考《开封府状》。

[29] 参考《开封府状》和《宋俘记》，均出自《靖康稗史笺证》。

[30] 参考《开封府状》，出自《靖康稗史笺证》。

[31] 参考《开封府状》。

第十七章
撤离

部署撤退

既然张邦昌成了新皇帝，金军也获得了大量的女人和战争赔偿，剩下的就是撤离问题了。

元帅们本来还指望完成河北与山西诸城的交割，但从新的形势来看已经很困难。康王在外集结了越来越多的人马，他们虽然都不攻打汴京，但依然是金军的巨大威胁。两支金军在外待了太久，军纪逐渐失控，如果再不走，一次不经意的败仗，就可能产生雪崩效应，到时候就收不住了。康王占据的地区大都在河北，看来，只好借助下一次南侵，加上张邦昌的配合，才有可能完全控制河北地区。

金人对于步步为营的蚕食战略一点也不陌生。通过第一次汴京围城，金国获得了燕京地区，并逼迫宋朝承诺割让三镇。由于金军撤退后宋朝不肯交割三镇，给了金军借口以发动第二次进攻，将三镇掌握在手中，并逼迫南朝（宋、楚）承诺割让整个黄河以北地区。如果南朝再不履行协议，金军可以以此为借口发动下一次进攻，到时候，黄河以北就会正式落入金人囊中。

但对于元帅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才能安全地回到北方？入侵时他们依靠的是闪击战，但撤退时金军已经变成了另一支军队，他们带着大量的金银珠玉锦帛，马上驮着的是女人不是战士，每个人都带着发财的冲动和对女色的贪婪，他们不想打仗，只想多活几年好

好享受一下。这时候的金军最不愿意碰到的就是北方的宋军。这些宋军有的是康王的正规军，有的只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报国雪耻，而是金军巨大的财富。当然，北宋强盗们如果能碰巧将太上皇和皇帝救下来，那这一辈子升官发财就不用愁了。

到底怎么才能避开这些军队，金军也做了一定的部署。

早在立张邦昌之前的三月初四，粘罕的弟弟阿懒（汉名完颜宗宪）就押着一千零五十车书籍礼器等上路了。阿懒是金人中最有文化修养的士人，在攻克汴京之初，当别人都蜂拥而上争夺财物时，只有阿懒瞄准了城内的书籍。元帅们向北宋索要书籍，大都是应阿懒的要求。这些书籍送往北方之后，可以帮助新兴的国家制定规章制度和礼仪，但要把它们运送往北方也是一项大工程。根据粘罕的指示，阿懒押着书籍作为先行部队，在车头插上北宋皇帝皇后的旗帜，让人们以为是皇帝启程了。[1]

如果康王有实力，一定会袭击阿懒的队伍。只要康王放过了这支队伍，阿懒能够安全到达北方，就证明河北的道路不用担心。

阿懒的出发，还造成了汴京城内的误会，在城内的吴革正在准备起兵，突然听说青城寨内有不少车辆出发，以为皇帝被送走了，吴革大哭起来。[2]这件事也打乱了城内义兵的部署，三月初六提前起兵，又很快被镇压。

另一方面，金军也开始清扫归去的道路，三月初十、十一、十二连续三天，金军与康王的部队在开德、兴仁、濮州、千秋镇、南华一带接连遭遇，金军都以获胜告终。其中南华之战更是摧毁了宗泽精心组织的车阵。[3]由于宗泽是康王的主力战将，他的失败也说明康王还没有实力抗击金军。

康王考虑更多的是金军走后的秩序重建，并不想将金军截留在内地。三月十九，他的军队收复了西京洛阳，[4]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

们不打算与金军直接对抗，而是首先将处于金军控制边缘的地区收复，等金军撤走，再回头占领中心区域。

到了三月十八，阿懒已经过了河北区域，他派人回来报平安。既然打着宋朝皇帝的旗号都没有遭到阻拦，表明这一路是安全的，两位元帅从这一天开始下令整装待发。当天，张邦昌请求宴请两位元帅，元帅们都有事情，派设也马和斜保前往。[5]

金军的撤离开始加速，这也影响了宋钦宗，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在三月二十一写信给城内，要求他们服从于新主子。但他又请城内可怜可怜老主子，送一点上路钱吧。前皇帝索要的不多，只要一点厨房用品，加上三千贯现钱。三月二十二，元帅府又赠予太上皇三千两白银、表缎四端、火燎头笼（取暖用）四具。[6]

张邦昌也加紧活动，请求释放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大臣之外，还请求将赵氏的帝姬和诸王夫人遣返，但都被拒绝了。他一共救出了宋朝大臣十一人、妇女儿童三千人，这已经是他能力的极限了。[7]

太上皇的皇后郑太后也乘机救下了娘家人。三月二十七当粘罕与太上皇相见时，太上皇穿着紫色的道服，戴着逍遥巾坐着轿子来到了寨门口。他与元帅相见后，要求元帅将出嫁的帝姬留下，没有获得批准，反而是郑太后再次表示，自己的娘家人不参与政治，请求将他们留下。元帅答应了。这是郑太后第二次救下自己的娘家人。就连金军也说，皇后口才好，进退有度，加上容止雅丽，所以能够得到元帅的尊重。[8]

三月二十五，元帅们下令，诸军三月二十八下城离开。到了三月二十六，金军的前军就已经上路了，这一天，多昂帜烈率领两万士兵，押着宗室和驸马家属三千余人，以及大量的金银表缎车辆上路。[9]

三月二十六，城外火光冲天，金军开始将营栅烧毁，做拔营的准备。[10]

三月二十七，宋钦宗望着他再也见不到的汴京城行了告别仪式，他

伏在地上大哭，天地为愁，城震有声。[11]

这一天，城内的张邦昌也采用天子的仪卫和法驾，但浑身穿着象征丧礼的白色，来到南薰门和五岳观两处，出城设立香案，率领百官和士庶（他们也穿着白色），大家一起痛哭着送别太上皇和皇帝。[12]

三月二十八黎明，宋朝的俘虏们开始移营。首先是把青城的一部分俘虏都合并到刘家寺；太上皇、诸王和驸马被押解到了刘家寺与亲人们相见。粘罕也来到了刘家寺，斡离不请太上皇吃了个饭。

由于宗室夫妇（王妃和诸王、帝姬和驸马）是分开押送，太上皇的到来也给了夫妇们最后见面的机会。王妃们从寿圣院出来与诸王相见，帝姬们也来拜见父母和夫婿。当晚，太上皇住在了刘家寺。这一天，金兵也按照计划从城墙上下来，将城门防卫交给了大楚的军队。张邦昌立刻派遣户部尚书邵溥接收城墙，赶快进行修理。[13]

张邦昌穿着赭袍，张着红盖，出南薰门设香案谢恩，并饯别两位元帅，到中午才回城。路上的人们感慨万分，一边是老天子离开，一边是新天子招摇。[14]

第二天凌晨三更，刘家寺拔寨。

斡离不的军队一共分成了七支，俘虏们夹杂在七支军队中一同北上。其中官员和辎重在第二军，太上皇、诸王、驸马在第三军，郑太后、宫廷妇女在第四军，王妃、帝姬在第五军。讹鲁观和萧庆担任都押使，一共有车八百六十余辆。[15]他们走河北地区北上。

四月初一，国相粘罕退师，军队分成五支。其中第一军押朱后，第二军押三千给金国皇帝的贡女，第三军押各色匠人三千家，第四军押宋钦宗。他们和来时一样，从山西北上，再前往燕京。[16]押送宋钦宗的队伍从新郑门向北，每过一个城角，钦宗皇帝都掩面号泣。诸王们各自乘车，但更小的亲王、驸马、宗室都只能徒步而行了。城内的士大夫们肝胆欲摧，却毫无办法。[17]

金军启程前，还给张邦昌送了一件大礼，他们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减岁币一百万贯铜钱、银绢二十万两匹。

虽然谈判中金军屡次要提高岁币，但谈判最后的协议中却并没有提高额度。这说明女真人还是一个靠掠夺维持、对持续性财政没有太多概念的民族。

在给张邦昌送大礼之前，宋金岁币是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铜钱一百万贯。减去赦免的额度，每年的岁币额只有银绢三十万两匹了。[18]这个数量与北宋给辽国的岁币一致，甚至少于宋金灭辽之后的协议数量，是南朝可以承受的数额。

金军定这个额度，表明他们的克制，也表明他们真心实意要和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搞好关系，前提是张邦昌足够听话。

虽然大楚没有维持长久，但是这次减免却带来了持续性的好处——从此以后，南宋与金国的岁币谈判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基本上摆脱了徽、钦二帝许诺的高昂岁币。

金军撤离后，汴京城的人民如同得到了重生，他们纷纷登上城墙，观看着外面的景色，人群如蚁集鳞次。伴随着皇帝离开的惆怅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是喜是悲。

对于城墙的修理也在加速，最主要的四壁的楼橹在金军到来时毁损严重，这些都必须赶快修好，以免下一次战争中再次遭殃。

范琼领兵到金军营地转了一圈，发现金军营地遗弃的宝货、表缎、猪羊、米面不计其数，秘阁书籍，狼藉泥中，金帛被人如同粪土一般踩踏。[19]夹杂在物品中间的，还有不少老幼病残妇，范琼将他们一并带回城内。这些老幼病残妇夹带着大量的米面金帛，指望着靠它们度过最初的艰难岁月。但到了城门口，守城的士兵立刻将他们的物品抢夺一空。[20]

张邦昌也派户部去收集了一番，单象牙一项就收集了二百担之多。[21]

融入北方的血脉

北去的徽、钦二帝逐渐消失在南方人民的视野之外，只有少数人与其偶遇。曾经在怀州抵抗金军的范仲熊有幸最后一次见到了宋钦宗。四月初四，粘罕回军到郑州，决定将范仲熊与那些原籍在黄河以南，但战争时恰好在黄河以北的人们送归南朝，他将范仲熊释放。在释放前，范仲熊看到几位内侍和妇人，他们把一个瘦子夹在中间，这人就是被称为少帝的宋钦宗。范仲熊连忙礼拜，向少帝表示自己位卑才浅，无力扭转乾坤，让皇帝受此奇耻大辱。但皇帝冷漠得连话都没有回。[22]

太上皇宋徽宗表现得大度些，在北迁的路上，他遇到了曾经的辽臣（也是曾经的宋臣）郭药师、张令徽等人，郭药师拜见太上皇，并表示既然昔日是君臣，现在也必须持君臣的礼节。但他为自己开脱，的确是力所不逮，不得不投降，请太上皇赦免他。太上皇大度地表示："天时如此，非公之罪，何赦之有？"[23]

除了这少量的记载，两位皇帝就走出了人民的视野。

但关于宋俘的记录并没有消失。虽然南方人见不到他们，但北方人对此也有记录，更何况，伴随两位皇帝北去的人中不乏文化精英，他们将之后的事情记录了下来。[24]

根据金人记载，北宋俘虏大的批次一共分成了七批。[25]俘虏中一共有皇帝的妻子等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工匠）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入寨后死亡散失两千人，释放了两千人，起行的有一万四千人。

到达燕云之后，男人只剩下十分之四，女人只剩下十分之七。是死

是活，已经无法推敲。

表 宋俘发送情况[26]

批次	人数	典型代表	发自何处，启程日期	金军押送官员	典型遭遇	存亡情况
第一批	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	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郡王	青城国相寨，三月二十七	阇母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四月二十七抵达燕山，居仙露寺。 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七月迁通塞州，十二月迁韩州。 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七月迁咸州，四郡王跟从宋钦宗行。 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十一月迁上京，男性编充兵役，女性守把宫院	到燕山时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男丁无考。到韩州时存男妇共九百人。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十一月只剩五百人
第二批	三十五人	徽宗妻韦氏，相国、建安两子，郓王、康王的妻妾、女儿，富金、嬛嬛两帝姬	刘家寺寿圣院，三月二十八	设也马，赛里，国禄，阿替纪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五月二十三入上京洗衣院	
第三批	三十七人	钦宗妻妾。珠珠帝姬。柔嘉公主	青城斋宫，四月初一	斜保，赛里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四月十八抵燕山，居愍忠祠。十月与徽宗会合	
第四批	一千九百四十余人	徽宗，燕、越、郓、肃、景、济、益、莘、徐、沂、和、信等十二王，安康、广平两郡王，瀛、嘉、温、英、仪、昌、润、韩八国公，诸皇孙，驸马，徽宗妻妾，奴婢	三月二十七从斋宫与青城移至刘家寺。三月二十九	讹鲁观，萧庆，葛思美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五月十三抵燕山，居延寿寺。十月迁中京，居相国院。 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八月迁上京，居元帅甲第。十二月迁韩州。 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七月迁五国城	迁韩州途中和王殁

批次	人数	典型代表	发自何处，启程日期	金军押送官员	典型遭遇	存亡情况
第五批	帝姬、王妃等一百〇三人。侍女一百四十二人		刘家寺寿圣院，三月二十九	斡离不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五月十九抵燕山，居皇子寨	
第六批	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工匠）三千四百十二人		青城国相寨，四月初一	谷神（兀室），挞懒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五月二十七抵燕山。分其半至上京	到燕山时，实存贡女二千九百人，诸色目一千八百人
第七批	钦宗等十二人。侍女一百四十四人	钦宗，太子，祁王，缨络帝姬	青城国相寨，四月初一	粘罕，高庆裔，耶律余睹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六月初二抵云中。七月初十抵燕山，与徽宗会合	

在这七个批次中，第二批次是比较特别的一批，包括了康王的母亲（徽宗妻子）韦氏和康王妻子邢妃。在徽宗诸子中，只有康王逃过了劫难，也成了金军最窝心的隐患，将他的妻子母亲作为人质，可以有效地防止康王生事。因此，其他批次都是首先送往燕云地区，逗留了很久，再重新安置到更北方，只有第二批次只在燕京短暂逗留，随后立刻送往更遥远的上京。[27]

押送第二批次的是真珠大王设也马和千户国禄、千户阿替纪，除了康王母妻之外，还有郓王之妻朱妃，富金、嬛嬛两帝姬，以及相国公赵梴、建安郡王赵楩等。这一批一共只有三十五人，却用了五千精兵进行护送，也表明对人质的重视。

在护兵中，有一位叫作成棣（一名王昌远，是医官王宗沔的儿子）的翻译官记录了路上看到的一切，让我们对人质押运有了直观认识。[28]三月二十八中午这一批次从刘家寺寿圣院上路后，就听说百里外有宋兵，由于人们认定康王一定会救他的母亲与妻子，护兵们也是战战兢兢。偏偏被押的女人由于骑不惯马，不断坠马，提不起速度来。

路上兵灾痕迹犹在，大部分的房子都已经被烧毁，尸体露在外面已经腐朽，白骨累累。第一天晚上，金军将人质安置在了一个破寺里，外面围着士兵进行保卫。设也马等人不忘喝酒吃肉一番，才纷纷睡去。

三月二十九，邢妃和朱妃以及两位帝姬因为骑马损伤了胎气，暂时无法骑马了。他们在寺里又住了一天，到四月初一，宝山大王斜保押着钦宗妻朱后、朱慎妃和珠珠帝姬加入进来，宝山大王押送的是第三批次，也就是说，第二、三批次暂时合并了。

在这一队中，押送官之一千户国禄是一个好色之徒，他想亵渎朱后，被宝山大王斜保抽了一鞭而作罢，但随后又开始骚扰嬛嬛帝姬，和她乘坐一匹马。到胙城时，要过黄河，前六批次[29]都赶到了一起，由于听说河北有宋军，他们都暂时不敢过河。在闲暇中，王成棣向俘虏们询问宫中之事，得到的消息是太上皇最好色，每五天到七天必须用一个处女，幸一次进一阶，到他退位时，遣散的宫女竟然有六千人之多。郓王懦弱，康王好色如父，侍婢中常有死亡的。只有少帝钦宗是个好人，他不近声色，作为皇帝只有一位妃子、十位夫人，得幸的其实只有三位。听说了这些，两位大王对朱后的态度明显好转，平常的举止也更加尊重了。

四月初四渡河，第二、第三批次在黄河以北遇到了盖天大王赛里。赛里是个耿直的汉子，看见千户国禄与帝姬同马，立刻将他杀掉了，尸体扔进河中。

赛里从此与第二、第三批次同行。但赛里也是个好色之徒，他首先

企图骚扰嬛嬛帝姬，被制止后，又开始逼迫邢妃，逼得邢妃要自杀。

路上仍然满目疮痍，比如四月初六到达丰乐境内一个村子里，村子的房子已全部毁掉，在院子里倒埋着男女二十多具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

四月十八一行人到达燕京，住在了愍忠祠内。第二、三批是最早到达的两批，也是燕京第一次看到俘虏前来。燕京的妇女们见到俘虏，如同见到了宝贝，纷纷按照金人的礼节行抱见礼。宋朝女人没有见过这种行礼方式，显得很窘迫。

真珠大王设也马看上了富金帝姬，将富金帝姬带回府邸休息去了。宋朝的公主就这样与金国的大王联姻。但此时的他们仍然不合礼法，至于仪式，要到上京之后才补办。

第三批到了燕京就暂时不再前行，宝山大王和盖天大王都留下了。但真珠大王押解的第二批却还要赶往上京。他们在燕京流连了六天，到了四月二十四终于启程继续赶路。赶路的速度也加快了，每天都有一百五十里，就连王成棣都有些受不了，更何况女人们。

四月二十八，出长城，之后沙漠万里，没有人烟。四月三十到达海云寺，这里是一个许愿很灵验的地方，女人们纷纷请王成棣帮助写字许愿，希望未来能够还乡。离开海云寺，也就离开了渤海湾，进入了东北地区茫茫的草莽之中。

五月十六，俘虏们抵黄龙府，五月二十三，终于到达了上京。路上一共有九位女人死亡，有名号的是康王妃田春罗，肃王的二女和三女，康王的大女，宫嫔徐金玉、沈知礼和褚月奴等。

由于真珠大王生病，十几天后的六月初七才正式拜见皇帝。当天黎明，真珠大王让韦妃等人下车进入御寨，朝臣分列左右，大王引众人登乾元殿，大金皇帝坐正位，他的后妃也同在殿上（这与宋朝礼仪有明显区别），但是坐在侧面。

韦妃等人学着金人的方式，跪右膝、屈左膝，称为胡跪，向皇帝致意。皇帝的后妃连忙下来抱住韦妃等人的腰部并让她们起身，赐坐在殿旁。

退朝后，皇帝开了两桌宴席，分别是在殿左宴请韦妃等人，以及在殿右宴请相国、建安两皇子，他的后妃六人陪韦妃，郎君四人以及真珠大王、阿替纪、王成棣等人陪两王。宴会结束后，诸人对着御座谢恩，胡跪两叩。

之后，皇帝将女人们都做了分配，其中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四人分给真珠大王设也马为妾，郡国夫人陈桃花、杨春莺、邢佛迷、曹大姑四人也给了设也马，但她们级别不够，只能当侍婢。

剩下的人，包括康王母赵韦氏、郓王妃朱凤英、康王妃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肃王大女和四女、康王二女，以及宫嫔朱淑媛、田芸芳、许春云、周男儿、何红梅、方芳香、叶寿星、华正仪、吕吉祥、骆蝶儿等人被送进了洗衣院（又称浣衣院）。

不幸的是，金人的记录中从来没有解释洗衣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这给后人留下了遐想空间。有人认为洗衣院是一个皇家妓院，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一个类似于唐朝掖庭的地方，皇帝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女人，暂时无法安置的，都送到洗衣院。她们在洗衣院里可以充作女侍，也可以被皇帝享用。

当皇帝有了新的安排，就从洗衣院将她们带出来重新分配。以康王的母亲韦氏为例，她先进入洗衣院，后来又从洗衣院出来，跟随徽宗到了五国城。南宋与金讲和后，韦氏被送回了南宋。柔福帝姬赵嬛嬛进入洗衣院后，又被送入盖天大王寨，后来嫁给了一位叫作徐还的人。

两位男性——相国公和建安郡王——则被送回燕山居住。

分配完毕，众人谢恩。韦妃等人被送进了洗衣院，之后才到了最高潮的项目——真珠大王娶亲。

真珠大王带着八位女子回到他的寨中，皇帝已经派遣女官先到了府邸，主持纳妾礼。他赐给大王黄金一百两、马十匹、表缎十端，每个女人还得到了一套金国的国服。真珠大王谢恩完毕，由女官引大王上座，新来的八位妾和婢向大王胡跪两叩，之后引入内室，卸去衣装，打开门帘，请大王入内合卺。

在真珠大王春宵一刻时，女官取金国国服挂在府邸门口，这是告诉外面的人们这里有喜事，快来祝贺。申刻（下午三点），真珠大王从内室出来，他完成了六个人的合卺，于是取了六套国服送给已经合卺的赵富金、徐圣英、杨调儿、陈文婉、陈桃花、邢佛迷，引导她们坐到中庭，与祝贺的客人相见。至于还没有合卺的杨春莺、曹大姑，则穿上旧衣服坐在外间。当客人们享受着全猪宴时，远来的汉人女子就这样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中。

在汉人看来，这或许是悲伤的一幕，但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却很正常，他们没有“一女不事二夫”的习俗，反而认为女人应该接受更强者的保护。在游牧战争中，强者将战败者的女儿夺走，战败者并不以此为耻辱，反而认为他们的女儿找到了更好的去处。在人类的基因传播中，女人总是比男人更加漂泊，也传播得更遥远。

次日，真珠大王带着他的新欢们朝谢皇帝，并见到了韦妃，他得到消息，郓王妃朱凤英和柔福帝姬赵嬛嬛已经被皇帝宠幸过了。

在宋俘中，还有三位大臣值得一提。张叔夜有可能是第六批[30]启程前往燕京。一路上，他以绝食相抗议，只饮一点汤水维持生命。在金人要立张邦昌时，他就曾经表示，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死而已。[31]但为什么他还不死？原因是，他要亲自跨过那道北宋的界河。五月十六，俘虏们跨过了白沟，这道界河曾经隔开了北宋和辽国，宋徽宗之所

以联合金人，就是为了夺回界河以北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折腾，界河早已经变成了黄河，但在北宋大臣的心中，真正的界河还是白沟。

跨过白沟，就意味着离开了祖国。张叔夜已经虚弱到站不起来，只能躺在车上，车夫告诉他，过河了，他突然坐起仰天大呼，之后不再说话。第二天，他扼住喉咙而死，时年六十三岁。[32]

与他一样死亡的还有大臣何㮚，何㮚没有死在路上，到了燕京才绝食而死，时年三十九岁。[33]另一位大臣孙傅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二月死于北方。[34]

皇帝的结局

在所有的宋俘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徽、钦二帝，而其中又以太上皇宋徽宗的记载最为详细。[35]宋徽宗是第四批上路的，他的儿子钦宗被国相粘罕带着，走更加艰辛的山西道路，太上皇在二太子斡离不的关照下，从河北直接进入燕京。由于斡离不对宋朝相对友好，两者打交道也比较多，太上皇在路上受到的照顾还不错。

三月二十九，第四和第五批人员同时上路。四月初一到胙城时，因为听说黄河北岸有宋军，几乎所有批次的人员都在排队等候，太上皇在这里又见到了第二、第三批次的韦妃、朱后等人。警报解除后，由于韦妃等人要被送往上京，在排队中处于优先级别，太上皇只能含泪目送韦妃、相国公、柔福帝姬等人先行。

过黄河后，到了四月初七，金军终于忍不住欲望，押送官葛思美将后宫的曹氏盗入手中。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太上皇令肃王告诫后宫不要随便离队，免得自取其辱。但整体上，金人对太上皇还是很有礼貌，甚至派王宗沔等三人专门照料。随着连日的风雨，许多女人选择到金军营中避雨，这些人大都遭到了奸淫。

四月十六，在一个叫作都城店的地方，太上皇遭到了一次重大打击，他的儿子燕王俣死了，尸体只能装在马槽里。燕王夫人和儿子想让金军允许他们归葬，金军却让他们把尸体烧掉，将骨灰带上路。

这一路的兵灾的痕迹也是很明显，在柏乡，瓦砾尸骨纵横。队伍中有牛马倒毙，立刻有人上来争相割牛马尸体充饥。只有金人吃着肉、喝着酒、弄着管弦、抱着女人，恣意取乐。

第四、第五批次到了真定，一共待了八天，斡离不在这里与太上皇打球、喝酒，不亦乐乎。在真定旁边就是中山，当时中山还没有投降，斡离不请太上皇来到中山城下，说道："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

守将陈遘认识太上皇，大惊痛哭。但一位叫作沙振的提辖害怕陈遘听从了太上皇的命令，大喊："道君皇帝怎么会在这里，一定是金人之诈！"他鼓动大伙儿杀掉了陈遘，继续守卫中山不肯屈服。[36]

四月三十，斡离不决定将第四、第五批次分开，太上皇所在的第四批先行，于五月十三到达燕京，第五批次于五月初四出发，五月十七到达燕京。

太上皇住在了燕京的延寿寺内，时常与斡离不打球、喝酒，日子过得还不错。延寿寺位于现在北京前门琉璃厂东侧，距离燕山城不远，交通方便。但其余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第一批次的宗室三千余人，四月二十七活着到达燕京的只有一千数百人，还十人九病，其余的都死在了路上，他们居住在更远的仙露寺。而第六批次的贡女三千人、吏役工匠三千人，于五月二十七到达后，活着的分别只有二千九百人和一千八百人，这些人分了一半前往上京，剩下的男人自谋生路，女人大都卖作娼妓。

另外有人统计，在历次战争中，金国掠夺的宋朝男女不下二十万，大都是带到地方，让工匠们自谋生路，官僚和贵族子弟降为奴隶，放马

做饭，时常挨打，不到五年就只剩下十分之一。女人如果分给大户人家做妾还有生路，如果分给小官或者士兵，大部分也都成了娼妓。有个铁匠曾经花八两金子购买了一个娼妓，竟然是亲王的孙女、宰相的侄媳妇、进士夫人。[37]

太上皇既然在延寿寺，这里就成了宋朝俘虏们心目中的圣地，帝姬王妃们辞行时都会路过这里。

宗室子弟一般住在愍忠祠，比如，七月初七，第二批次的相国公和建安郡王从上京被送回了燕山，就住在愍忠祠内。他们已经各自娶了一位新夫人，相国公娶了耶律氏，据说是一位契丹公主，建安郡王娶的陈氏原本是金国皇帝赐予设也马大王的内夫人，被设也马又送给了郡王。这也可以看出，赵氏宗室子弟很快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他们不再在乎什么礼法规矩，迅速地融进了北方更加宽松的婚姻规则里。南方的血统和北方的血统迅速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后代将被视为金国的子民。

另外，富金帝姬（正式的名称叫洵德帝姬）已经嫁给了设也马大王，此时也回到了燕山，同样住在愍忠祠。

七月初十，少帝钦宗也来到了燕山，住在愍忠祠。少帝的行程要比太上皇更加艰难。太上皇有斡离不照顾，不至于太受苦，少帝在粘罕的队伍中却没有享受太好的待遇。粘罕让他穿青衣，戴着毡帽，乘黑马，时时让人监视，朝天大叫号泣，都会被呵止，少帝憋闷坏了。但他还算幸运的，同批次其余的人开始还有马骑，马死了就只好步行，走慢了就挨鞭子。

晚上睡觉，少帝与其余的人挤在一起。过太和岭时，由于山高，少帝被绑在马背上过山。经过一路颠簸，六月初二，少帝才到达云中，休息了三天后继续赶往燕京，于七月初十到达燕山。[38]

少帝、相国公都在愍忠祠，倒是容易见面，但与太上皇见面就不那么容易了。

相国公与设也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请求设也马帮助他们与太上皇相见。设也马和斜保大王都已经成了太上皇的女婿，于是带上了洵德、惠福两个帝姬，加上相国公、建安郡王、少帝等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块到了昊天寺作斋，再把太上皇和太上皇后，以及诸王叫来，大家伙儿一起热闹了一整天。这可以说是太上皇到了燕京后少有的开心时刻。

七月十六，借着郑太后得病的空当，设也马率领赵氏诸人一起到延寿寺问候，顺便把祁王、相国公、建安郡王都调到了延寿寺，让他们照顾太上皇夫妇，把少帝留在了愍忠祠。

但到了八月（也有说六月），情况出现了变化，二太子斡离不突然着凉去世了。关于他的死亡有不同的说法，有说他打球完毕用冷水洗澡着凉了，有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攻宋途中获得了大量的美女，在声色犬马之中离世。[39]但不管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作为太上皇最大的保护神，他的死亡让赵氏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九月份，由于康王在南方称帝并反金，金国皇帝意识到燕京距离南方还是太近了，于是下令将赵氏宗族迁往更北方的地区。

九月十三，太上皇眷属千余口、少帝眷属百余口离开了燕京。在燕京还留有濮王等一千八百余人住在仙露寺，当时宗室子弟竟然有衣不蔽体的。太上皇离开时，将金人赠送的一万匹绢，分了一部分给他们。

金人这一次要将他们送往中京，距离燕京九百九十里。十月十八，他们到达了中京，住在了相国院里，这里是辽国时期的官员府邸。中院住金军将领，东院住太上皇，少帝住西院，由于地方不大，其余的人只能住在外面。

中京已经比燕京萧条了许多，甚至连日用品都只能每两个月从燕京调过来。

金人为了养活这个庞大的赵氏家族，没少费心血，他们虽然是赵氏

悲剧的始作俑者，却并没有存心虐待，只是环境所迫，无法养活这么多闲人罢了。

中京还不是两位皇帝的终点。到了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皇帝们被一位本书的老熟人害得再次背井离乡，这位老熟人就是马扩。

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进攻真定府时，参加守卫真定的马扩在真定西山的和尚洞被俘。他早年出使金国建立的关系起了作用，由于他作为使者给金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军将他视为一位勇士，斡离不决定赦免他，并要授予他官职。马扩拒绝了，表示只愿意回家养活老母，斡离不又要送给他土地，马扩表示种地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开一家酒馆，斡离不同意了。

但马扩心中仍然想抵抗金军的入侵，于是又偷偷参加了河北地区另一支抵抗军。位于真定以南的五马山上，有一支赵邦杰领导的部队。马扩借着送丧的机会，带着家人上了五马山，他们找到一个伪称是徽宗儿子信王的人，借着他的招牌开始了反金斗争。[40]

马扩联合了真定府获鹿县知县张龚、燕山府潞县知县杨浩、玉田僧人一行、中山刘买忙等人，谋划进攻真定、燕山、易州、中山等地。不想事情泄露了，金人担心马扩等人的举动与两位皇帝有关，又决定将他们从中京迁到距离燕京一千五百里的通塞州，给他们分了一千五百顷土地，让他们种地养活自己。[41]

不久，金人再次改变了计划，将两位皇帝召往了上京。

之前，两位皇帝在燕京时，有人怂恿过金国皇帝举办一次盛大的献俘仪式，这个仪式曾经在辽国灭亡时举办过，但刘彦宗上表认为这样不好，加上斡离不等人的保护，两位皇帝没有受到骚扰。到了（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刘彦宗死了，[42]斡离不也不在人世，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再次请求金国皇帝举行献俘仪式。这一次，两位宋帝逃脱不了一番羞辱了。

八月二十四这天一早，数千名金军闯入了二帝所在的上京营帐，这里关押着皇帝、皇子、妃子、公主等一千三百人。士兵们逼迫着他们到了金国的宗庙外，将皇帝和皇后的外袍剥掉，换上民服，外裹羊皮，其余的人，不管是驸马、嫔妃、王妃、帝姬还是宗室妇女，全都赤裸上身，只披一件羊皮，手执一条羊皮绳。

金军首先将二帝引入幔殿，在这里举行一种叫作牵羊礼的投降仪式。按照仪式，二帝应当将手中的羊皮绳递给受降人，表示自己就像一只羊一样任他宰割。如果对方兴起，还可以将绳子拴在俘虏脖子上牵着走，但二帝的牵羊礼并没有那么失分寸。殿上设了一个紫色的锦帐，里面放了上百件宝器，演奏着金人的音乐，金国皇帝和妻妾、臣仆向祖宗两次胡跪，之后是宋朝俘虏们胡跪。金国皇帝亲手宰杀了两只羊，供在殿里。

祭祀完宗庙，俘虏们又被押到了御寨，金国皇帝登上乾元殿，妻妾、大臣们站在一旁，宋朝俘虏们在他面前跪下，等待着宣诏。诏书宣读完毕，众人都得到了赦免，赐给了两位宋朝皇帝新的爵服，后妃们也换上了金国服装。之后，金国皇帝将上千位妇女分别赐给了亲近的侍卫，她们这时仍然是赤裸着上身。

金国皇帝没有动宋朝皇帝的正妻，却将他们的妃嫔大都带走了。韦妃、邢妃等三百人留在了洗衣院。

当夜，少帝的正妻朱后由于禁不起如此的羞辱，上吊自杀，被救下后又投水而死。

羞辱还没有结束。十月二十五，太上皇被封为昏德公，少帝被封为重昏侯。到这时，已经是对两位北宋君主侮辱的极致了。

十月二十六，金国皇帝决定上京也不让昏德父子待下去了，他们这一次被发配到韩州，并于十二月二十六到达。[43]

与此同时，留在燕京的宗室一千八百人已经死了一半，只剩下九百

人，就连为首的濮王也死了。剩下的人也从燕京出发，被迁往了韩州，给了四十五顷田地自给自足。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国皇帝再次下令，迁二帝于胡里改路五国城，跟随他们的只剩晋康郡王赵孝骞、和义郡王赵有奕等六人。五国城也成了太上皇夫妇最后的归宿地。同年九月初五，太上皇皇后郑太后死于五国城，时年五十二岁。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一，太上皇死于五国城。之后少帝又在孤独中活了二十一年，在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六月去世。[44]他去世时，宋金已经议和，他的弟弟宋高宗（康王）已经在杭州当了近三十年皇帝，历史不再需要一位悬挂着耻辱标签的前皇帝了。少帝一共当了一年多的皇帝，却用一生作为代价，留下千年无法洗刷的耻辱。

赵氏的宗室，除了已经死亡的，也都慢慢融入了金人的血液。他们有的生活悲惨，但也有人逐渐适应了金人的生活。

在所有的帝姬之中，既有洵德帝姬、茂德帝姬、惠福帝姬（珠珠）这样嫁给了王子的，也有荣德帝姬、宁福帝姬、华福帝姬、庆福帝姬这样嫁给了皇帝的，前者后来封为夫人，后者更是被封为次妃。[45]

赵氏宗族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游牧文明的转型，但原本游牧的金人却又转向了农耕文明。大金皇帝们不仅习惯于接受宋朝的文化，更乐于接受一个庞大的后宫。

【注释】

[1]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2] 参考《中兴遗史》。

[3]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4]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5] 《南征录汇》引《毳幕闲谈》。

[6] 参考《南征录汇》。

[7]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大金武功记》。

[8] 《三朝北盟会编》引《靖康遗录》。

[9] 《南征录汇》引《大金武功记》。

[10] 参考《靖康纪闻》。

[11] 《南征录汇》引《行营随笔》。

[12] 参考《靖康纪闻》。

[1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4] 参考《靖康纪闻》。

[15] 《南征录汇》引《寿圣院札记》《毳幕闲谈》《行营随笔》。

[16] 《南征录汇》引《青城秘录》。

[17] 参考《靖康纪闻》。

[18] 《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七九篇。

[19]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0] 参考《靖康纪闻》。

[2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北记》。

[23] 参考《北狩行录》。

[24] 金人的记录包括《青宫译语》和《宋俘记》。宋人的记录包括《呻吟语》《北狩行录》《北狩见闻录》《燕云录》等。

[25] 参考《宋俘记》。

[26] 根据《宋俘记》整理。

[27] 参考《南征录汇》。

[28] 成棣著书《青宫译语》。

[29] 《青宫译语》载第七批次也赶到了，但考虑到第七批次是由粘罕单独率领，走山西，于四月初十由巩县渡过黄河（《呻吟语》引司马朴言），所以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30] 关于张叔夜还有一种说法：他是第七批次与宋钦宗一道取道山西到云中，再往燕京的。四月初十，在渡过白沟后，他自杀身亡。见《呻吟语》引司马朴言。

[31] 参考《宋史·张叔夜传》。

[32] 参考《续资治通鉴》。

[33] 参考《宋史·何㮚传》。

[34] 参考《宋史·孙傅传》。

[35] 参考《呻吟语》。

[36] 参考《中兴遗史》。另外根据《呻吟语》，提辖沙贞（即沙振）杀守将投降，与《中兴遗史》说法相反。

[37] 《呻吟语》引《燕人尘》。

[38] 《呻吟语》引司马朴言。

[39] 《呻吟语》引《燕人尘》。

[40] 参考《续资治通鉴》。

[41] 参考《呻吟语》与《燕云录》。

[42] 《燕人尘》记载刘彦宗死前曾经下狱，但不可考何罪。

[43] 参考《宋俘记》与《呻吟语》。

[44] 参考《宋史·钦宗纪》。

[45] 参考《宋俘记》与《呻吟语》。

画外音
百姓真的在乎帝王吗？

当赵氏皇室对徽、钦二帝的悲惨遭遇哭天抢地，当那些爱国将领信誓旦旦要雪耻时，宋朝的普通人民又做何感想？

在上千年大一统集权思想的教导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百姓一定也悲伤欲绝，如丧考妣？错。

事实是，百姓将二帝的遭遇编成了段子，生怕皇帝们还不够悲惨。

由于文化发达，大臣和文人习惯于做笔记记录历史，而市井小民阅读的却是虚构性的小说。宋代早期小说话本比较著名，还有比话本更早，仍然属于文言文的长篇小说《大宋宣和遗事》。

现代的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小说，是因为它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宋江之乱的来龙去脉，并记载了宋江等三十六天罡的名字，为后来的著名小说《水浒传》打下了基础，人们研究《水浒传》，往往要先读此书。

但宋江的事迹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只是一小部分，《大宋宣和遗事》所记载的故事要比宋江的事迹丰富得多。既写了王安石，又写了宋徽宗任命的几大奸臣，从皇帝崇信道士，到汴京热闹的元宵灯会都有描写。北宋的传奇妓女李师师的故事也来自这本书。

但到了这本书的末尾，作者却笔锋一转，开始写金军的进攻，以及二帝的北狩。[1]在书里，作者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将两位皇帝所受的侮辱又翻了好几倍，想尽花样地折磨他们，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曾经是大宋的领导人。

这样的书只能出现在宋代，在其他任何封建王朝，调侃本朝的皇帝都是死罪。但这本书却在民间堂而皇之地流传，南宋的皇帝也拿它无可奈何，明知其中编造了许多对皇室的侮辱，却无法禁止。

如果要考察书中情节的来源，又可以追溯到另外几本书。在南宋中期，就已经流传着几本传言是辛弃疾所写的著作，分别叫作《南烬纪闻录》《窃愤录》和《窃愤续录》。当然，辛弃疾是作者这件事只是一个传说，后人认为，这些书更可能是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写的，只是假借了辛弃疾的名头。[2]

这几本书专门描写两位皇帝北狩的遭遇，表面上是要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但背地里却更像是对北宋皇家的报复，让他们也尝一尝耻辱的滋味。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几本书是怎样编排两位皇帝的遭遇的。记住，下面的故事并非史实，却反映了普通百姓的一种情绪。与史实中记载两位皇帝是三月末四月初起行不同，《南烬纪闻录》将皇帝的离开定在了三月十七。在三月十六，北国皇帝的圣旨到了，将南朝皇帝们一通臭骂，传旨将他们带到燕京。从当晚开始，皇帝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喝一次水，几个侍卫也非常丑陋。第二天，太上皇的郑太后生了病，肚子疼得要气绝身亡，少帝哭着向侍卫讨药吃，却只能得到一碗热水而已。这一天，他们被逼着上路，睡在了野寺里。

在实际中，皇帝们（特别是太上皇）北行仍然受到了金人不错的照顾，并且是随大部队一起行动的。太上皇跟随斡离不从河北路北上，少帝跟随粘罕走山西。但在小说中，皇帝们起行却简单得多，金人只是牵了四匹马，分别给二帝二后，再加上几个押运官，这就是队伍的全部了。父子俩也没有分开行走，而是一同上路，都从河北入燕京。当然，皇后们骑马会被磨破屁股，于是只好找人骑马将她们夹在腋下，这就有了猥亵的意味了。

在小说中，好色的千户国禄也出现了，这时他的名字叫骨都禄。一路上他不断地威胁少帝把朱后让给他，甚至趁朱后得病时，帮她摸肚子治病，眼看他就要得逞了，却在过黄河时被元帅的弟弟泽利（即盖天大王赛里）杀死。看到这一段，心怀不轨的读者一定替死去的千户有些惋惜，毕竟好戏看不成了。

但泽利在小说里继承了骨都禄的角色，继续对两位皇后进行猥亵，还对皇帝们百般侮辱，甚至不给他们饭吃，将他们绑在柱子上过夜，只有对朱后稍微好一点（当然也是有目的的）。

三月二十七，朱后想投水自杀，泽利命令将她和郑太后绑在一起，牵在马后赶路。当晚，由于下雨，睡在野地里的帝后们被淋得精湿，浑身烂泥。三月二十九，泽利把自己的脏衣服脱下，让朱后帮忙清洗，两位皇后只能遵命。

到了四月初二，帝后们远远地望见其他皇族，包括柔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国公等，他们被押送着北行。

某一天，帝后们到达了一个县，这个县的县官（是一位金人）备上酒食，好好地招待帝后们大吃了一通。原来这位金人中了好运，他的哥哥是一位万户，押送俘虏到此，把肃王的女儿珍珍送给了当县官的弟弟，这位县官将北宋帝后当成了自己的老丈人家族，所以才会好好伺候。在这个县还有十七位皇室女子，都已经被分配完毕。当晚，泽利专门把这些皇室女子召集起来，让她们劝酒陪唱。为了更加侮辱皇帝，他们当着女人的面把帝后绑起来，让士兵对着他们撒尿拉屎。

又一天，经过一个荒凉小县，一个女子在路边求金人把她带上。原来，她也是一位皇室女子，因为生病被抛弃在这里。泽利将她带上路，夜晚乘喝醉了的酒兴，将她奸淫了。皇帝们一晚上听着宣淫声，连眼都不敢睁开。之后，泽利还嘲笑朱后，表示“你不如她”。

到这时，“辛弃疾”在这一方面已经对赵宋进行了最深入的侮辱。接

下来就要对皇权进行嘲讽了。

某一天，北方有文书传来，原来是请皇帝们写降表的，泽利逼迫皇帝们写了最卑贱的降表。又一天，二帝碰到了辽国的亡国之君天祚帝耶律延禧，几位前皇帝讨论了当俘虏的心得。耶律延禧的妻妾、女儿都已经被金人瓜分完毕。

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皇帝皇后们终于到达了燕京，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了人形，满身腥臭和虱蚤。在史实中，燕京是二太子斡离不的大本营，金国皇帝此时还在东北地区的上京。但在小说中，金国皇帝却已经在燕京等待徽、钦二帝了。

在燕京，帝后们继续受到侮辱，他们住在元帅府左廊的一个小屋子。屋里没有桌椅，只有几块砖。他们有时一天只能喝一点水，有时能吃上一顿粗饭。有时去见金人时，女人已经病得起不了身，就有人来背着她们强行前往。

经过十天的折腾，六月初二，朱后病死。历史上朱后自杀于上京，但小说家却迫不及待地让她病死于燕京这个对宋朝更有意义的地方。

朱后死时，少帝在屋里恳求说："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在他的哀求下，来了几个人，用草席将朱后拖走。

这已经是人间极大的悲剧，但小说家还嫌不够，于是第二天又让活着的三人（父母和儿子）从燕京离开，前往安肃军居住。押送者以一位叫作阿计替的人为首，多亏了他怜悯帝后，让他们多休息了几天，郑太后才没有死在路上。

六月十二，帝后们到达安肃军，进城门前搜身。小说家特别指明，郑太后的脐腹间也被搜过，太上皇又增加了一份羞辱。

在安肃军，他们被关押在小屋子里。这时，安肃军有一群契丹降将突然举事，要杀掉金将，却差点将赵氏父子烧死在小屋里。他们刚刚大

难不死，但金将镇压了契丹举事之后，又认定赵氏父子也参与了阴谋。于是，少帝先是被鞭抽，牙齿碎裂、口吐鲜血，接着被捆绑关押一夜。金人最后商定，再抽少帝五十鞭，之后将他们押往云州。

在云州，他们最初被关在土围子里，后来才有了一间房子。他们又活过了一场叛乱，突然间迎来了好日子。这时，盖天大王突然出现了。在历史上，金人的盖天大王名叫赛里，也就是小说中曾经出现的泽利。但小说家显然把盖天大王和泽利当成了两个人，于是，泽利成了坏人的典型，而盖天大王扮演起了好人的角色。盖天大王娶了太上皇的一位妃子韦妃，也就是康王（宋高宗）的母亲。这显然不是史实，但在小说家看来，宋高宗赵构的母亲成了金人的妾，也是一种新奇的设想。

盖天大王到了云州后，两位皇帝的生活有了改善，他们顺利活过了冬天。但第二年正月二十三，盖天大王与韦夫人离开了云州，皇帝们的待遇又急转直下，重新恢复了囚徒的身份。

二月，有一个新同知到了云州，他的父亲死在了与南宋的战争中。他决定虐待死二帝，为父报仇。但在二帝被折腾死之前的三月初九，金国皇帝突然下诏，将二帝调往更北方一个叫作西汙州的地方。

此后二帝在云州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上垂死挣扎，日期已经不再有意义，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最后来到了西汙州小城，这里残破到只有三百余人。二帝在西汙州度过冬天后，再次被调往五国城。

在去往五国城的路上，郑太后也禁不起折腾死了。仓促之际，押送官员只能在路边用刀掘了个坑，连新衣服都没有，就穿着时服埋掉了。

五国城只有五十户到七十户人家，二帝被放在一个土坑里养了起来，他们都成了没有老婆的光棍。五国城的生活一日一顿饭，一年一顿酒一餐肉。皇帝们在这里凄惨度日。[3]

这篇小说夹杂了百姓对赵宋官家的幸灾乐祸，以及对金人的想象。事实上，金人并不想折磨赵氏，只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将南方的皇帝全

家迁走，让他们到北方自食其力、自生自灭。金人对于赵氏女性也并非完全迫害，只是按照游牧民族的规矩占为己有。但在宋人的想象中，金人却显得更加穷凶极恶、有意迫害。不过，宋朝“小说家”是欢迎这种迫害的，在虚构中将迫害更加强化，丝毫不在意赵氏的面子。

关于两位皇帝的死法，小说家也极尽铺陈。太上皇和少帝在五国城居住日久，又被移到了一个叫作均州的地方，住在土坑里。太上皇在这里得病死去。就在少帝大哭的时候，阿计替突然赶来，叫他别哭，赶快将太上皇埋到土坑里。少帝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死人埋在活人的住所，阿计替解释，均州没有坟地，人死后都是用火烧，烧掉一半之后，用木杆挑到城内北部一个大石坑里去，大石坑有一种水，比南方的油还稠，可以用来点灯，就是由尸体产生的。

从这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宋代人对于地下露出的石油的想象，以及对于火葬习俗的恐惧。把太上皇烧掉变成灯油这个想法，是对死人最后的侮辱。

就在他们说话间，突然来了一群人将太上皇尸体抢走，他们赶到石坑前，将尸体架在野草中放火，烧到一半，用水浇灭，用木杆把尸体穿透，拖行扔进坑里，直坠坑底。[4]

由于少帝活的时间较长，关于他的行踪和死法如下：太上皇死后，少帝被迁往条件稍好的源昌州居住。后来，又经过鹿州、寿州、易州，前往燕京。在这里和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关在了一起。

史实上，天祚帝病死于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但小说中他活到了与少帝齐寿。之所以设计这个情节，可能是为了显得更富有戏剧性：宋辽两代亡国之君再次相会了。

少帝在燕京的日子时好时坏，金国与宋朝议和时，他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但金海陵王完颜亮篡位后，海陵王一直想攻打南方，于是少帝又变成了囚俘。

完颜亮让天祚帝和少帝练习骑马与战斗，少帝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得了手足颤抖的病，可还是被逼着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完颜亮将他们带到了演武场，大阅兵马，由宋朝辽国两位皇帝各率领一队人马参与演习，他们得到的都是瘦弱的马匹。

在演习中，突然间有一队人马杀出，一个身穿褐色衣服的人一箭射向天祚帝，天祚帝穿心而死。少帝吓得从马上掉落，但一个身穿紫色衣服的人仍然一箭将少帝射死。随后在万马奔腾中，两位皇帝的尸体被踩入烂泥，无处寻找。[5]

这个段子非常符合汉儒的天罚观念，充满了巧合，将宋皇室的尊严扒得一点不剩，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怨恨与诅咒。在中国古代史中，赵宋王朝是最宽容的朝代，皇帝却仍然受到了如此的诅咒。百姓不是用同情的语调去传言两人的遭遇，而是写出如此恶毒的段子，可见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有多大。

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在一个巨型的钟摆中震荡。在钟摆的一端，是“忠君爱国”式的教导，并将爱国扭曲成对权力的无限服从，不准反抗，百姓全都浑浑噩噩地活在蝇营狗苟之中。这时，皇帝的权威是无限的、不容怀疑的。可是一旦皇权倒台了，百姓立刻就变成了最恶毒的诅咒者，恨不能对以前的权力进行无休无止的侮辱与谩骂，如果有可能，甚至不惜直接动手将前皇室撕成碎片，这就到了钟摆的另一端。

在这两端之间，却缺乏中间状态——“家国情怀”。所谓的“家国情怀”就在这忽左忽右的不成熟中震荡了两千年。

皇帝大都也知道自己享受的无限服从，不是来自爱戴，而是来自武力，因此在任上时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权力牢牢控制，试图让人们明白不忠诚的下场，用暴力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的刚性稳定，将脆断的那一天尽量往后延。

大多数情况下，被统治者永远只能用背地里的牢骚发泄不满。在现

实中，即便统治者如此无能，百姓仍然无法摆脱。于是，在金人离开之后，赵宋皇室再次变成了统治者……

【注释】

[1] 《大宋宣和遗事》“利集和贞集”的一部分。

[2] 周密《齐东野语》。

[3] 以上内容皆出自《南烬纪闻录》，《大宋宣和遗事》也有引用。

[4] 参考《窃愤录》。

[5] 参考《窃愤续录》。

第十八章
还政赵氏

孟后听政

金人退军后，在汴京城内还剩下一个当皇帝张邦昌。张邦昌到底是做王莽还是霍光呢？

四月初二，金军刚离开一天，张邦昌一面派人修城械，一面派人去查看金军营地遗留物品。另外，他还想做一件事——大赦天下，想赶快让人们知道，在灾难中不管他们做过什么，都已经被赦免了。

但在与官员们讨论大赦时，吕好问却问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只有皇帝才有权大赦天下，张邦昌大赦，难道真的把自己当皇帝了？如果康王的军队赶来，这会不会成为一条罪证？

吕好问的问题让张邦昌感到害怕，他连忙问应该怎么做。吕好问于是抬出了一个人来，表示张邦昌应该首先把这个人迎到宫廷。只有这样，康王到来后，张邦昌才能摆脱嫌疑。这个人叫作元祐太后。[1]

关于元祐太后，也是宋代的一个传奇，她曾经两次被废，却三次被封为皇后，并成功地躲过了靖康的灾难，成了唯一一个留在了汴京的皇后。[2]

元祐皇后姓孟，是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四月，由太皇太后高氏立为宋哲宗的皇后。高太后是宋英宗的皇后、宋神宗的母亲。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时期，高太后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支持司马光。但由于宋神宗已经亲政，高太后没有足够的政治

影响力去反对。可宋神宗一死，他的儿子宋哲宗年幼，高太后立刻参与了政治，进行垂帘听政。

这一时期的年号是元祐，在高太后的主持下，元祐时期采取了司马光等保守派的主张，恢复了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小盛世。

正是在这个时期，高太后选择了孟氏作为小皇帝哲宗的皇后，并告诉哲宗，孟皇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贤内助。可是，背地里高太后又感慨孟氏的福相不够，未来可能要经历波折。

孟氏被立为皇后一年，高太后就去世了。亲政的哲宗立刻开始了急转弯。权力欲很强的他对高太后非常不满，不仅想废掉高太后的称号，还将元祐时期的政治策略彻底改变，重新采纳他父亲神宗的激进思路。由于孟后是高太后立的，哲宗也看不上，在宠妃刘婕妤的帮助下，罗织罪名将她废黜了（绍圣三年九月，公元1096年）。

宋代虽然也存在宫斗，却没有杀人的传统。孟后被废黜后，被送入瑶华宫当了女道士，皇帝赐给她的称号是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孟后在道观里孤独地度过了四年，突然转机来了。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死去，没有留下孩子。权力突然落到了他的母亲——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手中。向太后立了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为皇帝，是为徽宗。

向太后执政期间，首先将孟后重新立为皇后，哲宗已死，即便做皇后也只是个寡妇，但从名义上她又是皇后了。

但不幸的是，一年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公元1101年）向太后也死了，孟后又没了靠山，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再次被废黜。

宋徽宗也醉心于神宗的改革，对高太后和向太后不满，两位太后推崇的孟后自然也成了徽宗的发泄对象。孟后被废黜后再次回到瑶华宫，

加称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

徽宗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废黜孟后，实际上是帮助了她。他和孟后的形象在历史上正好相反，徽宗成了亡国之君的代表，而孟后则象征着希望。

靖康初年，瑶华宫大火，孟后搬迁到了延宁宫。延宁宫又出现了火灾，她只好搬到了相国寺前的私人宅子里。金军围城时，宋钦宗正试图纠正他父亲的错误，重新立孟氏为皇后。不过幸亏金军来得快，皇帝还没有来得及下令，汴京城就失陷了。

金军采取的是搬迁整个皇室的政策，六宫有尊号的一个都不能落下。偏偏失去了尊号的孟氏逃脱了皇室遣送名单，加上年纪大了，姿色不在了，金军看不上，她就成了侥幸留下的人。[3]

张邦昌进退两难时，吕好问认为，只有把孟氏迎接进宫，才能显示出诚意，也让人们看到他已经还政于赵氏了。

四月初四，张邦昌下令册封孟氏为“宋太后”。但吕好问一听“宋太后”这个称谓，就知道坏事了。原来，宋初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的皇位，也把后周的符太后迎接到西宫居住，对外号称“周太后”。人们自然会想，张邦昌迎接元祐太后，按照先例也只是尊崇一下，但不会还位给赵氏。

果然，孟后一听张邦昌的封号就表示拒绝了。幸好，迎接她的人带了张邦昌的书信，其中提到要推戴大元帅康王，孟后这才同意了。[4]

四月初五，张邦昌把孟后迎入延福宫。四月初六，孟后在延福宫接受百官朝贺。这时，胡舜陟、马伸又提议，以后的政事都应该以太后的名义发布。四月初九，张邦昌给孟氏上尊号“元祐皇后”，让她居大内，垂帘听政。[5]

到这时，汴京城又回到了赵氏的手中，虽然只是个女人代为掌权。

四月十一，张邦昌退居资善堂，收回大赦，算是退位了。他拾起当皇帝之前的官职：太宰。从他登基，到太后垂帘听政，张邦昌一共当了三十三天的皇帝。[6]

迟来的康王

就在张邦昌让位给孟后时，康王的军队也在迅速行动。

金军刚刚离开时，康王的左膀右臂——知信德军黄潜善——曾经派一位叫作张宗的人来汴京打探过这里的情况。探子带回了张邦昌的僭号文、金人的诏书、张邦昌的大赦文告，以及迎立孟太后的手书，康王才确信金军真的撤了。[7]张邦昌由于立孟氏及时，才逃避了僭伪的嫌疑。

就在四月初五迎接孟太后入延福宫的当天，张邦昌还派了一个叫蒋师愈的人前往济州、郓州一带寻找康王。蒋师愈在济州找到了康王，将张邦昌迫不得已当皇帝的事情叙述一遍。[8]四月初七，张邦昌再次写信给康王，表达了对康王的拥护。初八，他又派人送去了玉玺，表达了请康王当皇帝的意图。

康王听说徽、钦二帝都已经被金人抓走了，试图亲自去截击金人，却被臣下劝住。最终，他只是号召大家抗击金军，自己却没有什么行动。

既然金军已经撤走，占领汴京还是必要的。但康王还不敢亲自前来，他本人从河北地区先到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市），因为从应天府有路直接去往江南地区，比起汴京更加便捷，是个可进可退的安全城市。

他虽然不敢亲自来，却派了兵马过来收复汴京。四月初四，勤王之师已经到了汴京不远处。四月初五那一天，统制官王渊领兵到了汴京，驻扎在通津门外。

四月初七，宗室敦武郎赵叔向率领七千人马也到了，驻扎在原金军大本营青城，但他们还都摸不清情况，暂时不敢进城。

四月初八，张邦昌下令打开诸城门，这意味着城里和城外恢复了沟通，也表明自己没有心思做抵抗。

四月十二之后，随着更多勤王的大部队到来，汴京城人来人往也热闹了很多。到这时，城内的人们终于相信，金军的占领已成了过去，宋朝的军队又回来了。

但在表面平静之下，却还有一个待解的难题：人们都在等待着康王的表态。在金军围城时，不管是宋朝的文武大臣，还是汴京城的士人，都表现得极不符合儒家标准。武将们没有守住首都，甚至在战场上表现得很窝囊，导致两位皇帝都成了金军的俘虏；文臣们也没有殉国自杀，甚至亲手（虽然是被迫的）选出了一个新皇帝，还当着金人的面向这个新皇帝磕头；新皇帝虽然退了位，却嘴里振振有词说是为了保护一城的生灵；士人也没有表现出气节，需要他们贡献金银救出皇帝时，他们纷纷把金银藏起来，他们还不断地在城里闹事对抗命令，可是金人一来，又格外的听话。

这样一个首都，康王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呢？是将每一个不合格的子民都治罪，还是法不责众就算了？张邦昌当了三十多天皇帝，放在任何朝代都是死罪，康王应该怎么处理他？范琼、徐秉哲等人与金人打得火热，为了救自己的家族，不惜把皇帝的家族搜查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康王是否需要惩罚他们？

这些问题不解决，汴京城就永远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

当然，康王本身也并不干净，宋钦宗封他为兵马大元帅，是希望他能够肩负大任，率军勤王。但事实上，康王虽然组织了不少军队，却极少和金军打仗。知道金军已经离开，两位皇帝被抓走，虽然信誓旦旦地要和金军决战、救出二帝，可实际行动上却还是不紧不慢，总是跟不

上。对于汴京城，康王也没有救助，如果不是汴京城的百姓和大臣们服软自保，单单依靠康王，可能汴京城内已经被杀得片甲不留了。

人们都知道康王不是什么英雄，康王也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变成豪杰。可是，到底谁先让一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汴京城显然不准备让第一步。四月十七，它还给帮助金人最得力的范琼升了官，当上了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兼四壁都巡检使，专门负责首都保卫工作。他的升官表明城内亮出了态度，如果康王不赦免城市，就不会轻易得到城市的顺从。这一点，是孟太后和张邦昌都无法控制的。

好在康王是明白人，第二天就给开封府送来了文书，要求开封府张贴。在文书中，他没有追究城内的责任，也给自己打了圆场。按照他的说法，不是人们不拼命，而是金军太狡猾，以及奸臣的误国。正是童贯、蔡京等人的误国，让金军打了过来。金军总是摆出一副要谈判的姿势，让两位皇帝一步一步陷入了圈套。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汴京城本来是可以抵抗的，只是被金军骗了，才导致失陷，所以责任不在汴京城的人民和官员。

金军的狡猾也成了康王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他虽然组织了很多勤王军队，本来是可以打过来的，但因为金军不断摆出谈判的架势，导致宋钦宗不下令动武。康王无法违背宋钦宗的命令，勤王的军队也都没用上。直到金军撤退后，王师追也来不及了。

在这封文书中，康王恢复成了英明的统帅，汴京城的臣民也纯洁得如同天使，天天盼着康王的到来。既然双方都这么热切，那不如尽快结合吧。[9]

文书的到来，解开了双方最后一个结，也表明康王暂时赦免了所有的人，就连张邦昌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从四月十九开始，首都的气氛彻底松弛了下来。赵叔向甚至能够派

人到城内，以解救二帝的名义招兵买马了。汴京城的市井游民也再次活跃了起来，纷纷加入了康王的部队。当然，这样的部队的战斗力，是值得怀疑的。

四月二十二开始，孟太后屡次派人前往康王所在的南京，请他回到首都。京城的人们都翘首以望，盼望着康王回来，但他们失望了。

康王决定留在南京，对他来说，汴京城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两次围城战已经将这座城市的缺点暴露得一览无余。由于缺乏天然险阻，金军每次都能渡过黄河直抵城下。康王可不想步他父兄的后尘，在下一次战争中沦为新的俘虏。再说，虽然他赦免了这座城市，却并不信任这里的人，不想将自己投入到不确定之中。但在南京，周围都是他信任的大臣和将军，即便金军入侵，也可以抬脚就走，向江南转移。

到了四月二十五，孟太后见康王不想回来，只好下令派遣车驾、法杖等去南京迎接康王。这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就是欢迎康王成为新皇帝。汴京城的大臣们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守，另一部分前往南京。

次日，太宰张邦昌作为迎驾的首席大臣，坐船顺着汴河而下，前往南京。徐秉哲、王时雍已经提前出发表示效忠，接着太学生们也都纷纷出发去迎接康王，官吏们络绎不绝，汴河再次热闹了起来，船来船往，如同回到了两年前的“盛世”时光。

虽然所有的人都盼望着康王即位，但还有一个障碍必须克服：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位皇帝都还活着，却要选出新皇帝的情况。康王要想名正言顺地即位，必须获得两位皇帝的赞同，可是皇帝们都被抓走了，到底谁来同意他呢？

历史大凡到这种节点，总会跳出来一个人将难题解开。这时，一位叫作曹勋的人适时出现了。曹勋作为阁门宣赞舍人本来应该随太上皇北行，却突然出现在了济州康王的大元帅府里。曹勋带来了太上皇的御笔，纸条上还有太上皇的画押。

为了不使人怀疑，曹勋还说了几件太上皇夫妇和康王之间的小事，这些事只有康王和太上皇夫妇知晓。曹勋知道这些事，表明他的确是从太上皇那儿来的。

根据曹勋的讲述，太上皇亲自拿出一件御衣，拆开领子，在领中写字，重新缝上，让曹勋寻找空当逃走，将消息传给康王。曹勋还叙述太上皇后将康王的名字贴在象棋的“将”上，投入棋盘，象棋恰好落在了棋盘的主位上，太上皇后看见了喜极而泣。[10]

这些事情不管真假，却解开了康王即位的最后一个结，让他当皇帝变得顺理成章了。

五月初一，康王在南京即位。为了纪念两位注定回不来的皇帝，康王按照朱胜非的建议，在南京修筑了一个高坛，名为“中兴受命坛”。康王登坛向北方远望，大哭一场，下坛后进入南京府治的正衙。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一直跟随康王的新贵们首先上殿，接着张邦昌率领旧官僚上朝祝贺。康王在一片祝贺声中成了新皇帝，是为宋高宗。[11]他改元建炎，从五月起，宋朝进入了建炎时期，短命而又耻辱的靖康时期只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连这一年都没有过完，就迫不及待地跳入了另一个时期。[12]

康王登基的同时大赦天下。张邦昌、徐秉哲、王时雍、范琼等官员都没有被追究责任，只有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的子孙没有获得赦免。[13]康王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他的前任们开脱。在未来的史书中，这些没有被赦免的人将作为北宋亡国的罪人被后人所熟记。后世人们被告知，是这些奸臣误国，才有了靖康之耻。在口诛笔伐时，那最大的罪人却成了受同情的对象了。

回归均势

康王登基后，伴随着宋朝历史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再次回来

了。此时主战的是宗泽、李纲等人，主和的则是两位入了《宋史·奸臣传》的大臣黄潜善和汪伯彦。

事实上，金人退军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掌握在宋朝手中。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北京大名，全都没有丢掉。

金国实际控制的中国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在北方，当年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归了金国；在山西，宋朝丢失了太原（含）以北地区；在河北，金国借助占领燕京的势头，逐渐南向渗透，但实际控制地依然只有北京以南数州，其余地区要么依附于宋，要么处于半独立状态。

宋朝仍然控制了山东、河南全部，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其北部是西夏控制），所失去的领土并不多。

在高宗君臣的讨论中，贯穿着如何利用大半河山完成抗敌，甚至收复山西、河北北部地区的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是否迁都。由于北方领土的损失，汴京已经无险可守，太容易受到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迁都。可是如果真的迁都，又太影响士气，不利于收复国土。

围绕着迁都问题，主战派、主和派吵成一团。宗泽主张不要迁都，以东京为基地进行抗战。[14]李纲借鉴了种师道的主张，认为可以迁都，但最好迁往陕西地区，利用陕西的天险与金国抗衡。[15]还有人主张迁都应天府，应天府是宋高宗即位的地方，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仍然属于北方地区，迁到那儿不至于影响士气。

这些人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皇帝不要离开北方。不管是东京汴梁、陕西长安、南京应天府，都在抗金的前线。皇帝只要留在北方，那么未来收复失土就是有望的。

在朝廷中还有另一派人主张南迁，他们有的主张前往东晋南朝的首都建康（现江苏省南京市），有的主张前往湖北的荆州。但主张南迁的人始终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当朝廷距离北方边境过远时，很可能就意味着北方领土的永久丢失。一旦皇帝离开，金国将重新蚕食北方，宋

金将形成以淮河流域为边界的新格局。到那时，所有的北伐都会成为空谈。

在中国历史上，到宋朝为止，当出现以淮河为界的南北对峙时，还没有一个南方的政权能够反攻北方、统一全国的。[16]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退往南方，可能意味着北方再也回不来了。

但南迁派手中又有一个王牌：皇帝的安全。宋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经过靖康之变后，皇帝首先要防止的是自己成为下一个宋徽宗、宋钦宗。

争执过后，宋高宗决定迁往南方，他首先退到了扬州，将扬州建成了暂时的首都（在宋代，皇帝暂时驻扎的地方称为行在所，或者简称行在）。[17]这次搬迁也决定了宗泽、李纲等主战派被皇帝逐渐疏远。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于金国在汉境扶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退位，处于军事极盛期的金军再次南下。

此刻，更加了解南方地形的金军兵分三路，对长江以北三个最重要地带进行打击：西路军从山西进入陕西，试图征服这个地处西北的战略要地；中路军在元帅完颜宗翰（粘罕）的领导下，从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向洛阳进军；东路军在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和他的弟弟完颜宗弼（即著名的金兀术）领导下，从燕京出发，向河北、山东地区扫荡。东路军和中路军又负有另一个使命：南进后，他们将合势再次进攻宋朝的东京汴梁。

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西路军攻克了长安，中路军攻克洛阳后，继续南下到达襄阳、房州、邓州，向长江流域施压，东路军则掳掠了山东地区。但在东京汴梁，老将宗泽却成功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阻止了金军的继续南下。由于金军的后勤出了问题，三路军都不得不退军，将所侵略的领土尽数让出。

战争以宋军的战略胜利而告结束。

这也是金军第一次显出了疲态。由于金国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女真族人口不多，这支武装具有足够的锐度，却缺乏厚度，可以迅速奔袭，却无法维持占领。当宋高宗撤到南方后，在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留下了庞大的空白地带，从河北地区直到黄河，再到淮河、长江之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金军每一次发动袭击都必须首先跃进一千多里，才能抵达宋代的新政治中心。完成跃进后已经开始疲劳，进入了衰竭期。

要想克服此种不利，金国必须将前进基地迁往南方靠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但由于金国的政治过于落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来控制黄河、淮河地区。

金军唯一的机会就是实行闪电战，派出军队千里跃进，进攻宋朝皇帝，迫使他迅速投降，让全国归顺。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守卫东京的老将宗泽去世，金军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南侵。这次南侵除了与第一次一样兵分三路，分别进攻陕西、河南和山东之外，还增加了机动性要求，在各个将领分兵掠地时，东路军的完颜宗弼则率领人马直捣扬州，试图在宋高宗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兵围扬州，擒获皇帝。

但金军并没有抓住皇帝，高宗在金兵到来之前仓皇逃走，渡过了长江，避免了被俘的命运。由于金兵没有准备好，缺乏渡江器械，只得第二次撤军。

但是，此次偷袭扬州将宋高宗吓破了胆，他不仅不再考虑迁回北方，收复旧土，甚至连长江沿岸都认为不再安全，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遥远的杭州。

宋高宗迁都杭州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金军的作战臂长很难到达杭州，这也决定了宋金战争将演变成长期的对峙；二、北宋的彻底灭亡。随着皇帝南迁杭州，北方领土由于过于遥远，相继沦陷。

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南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河北、山东全境，逐渐被金国占领。双方对峙线向淮河地区南移，形成了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新防线。

在宋金局势转化成长期对峙之前，金军还做了一次尝试。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兵下寿春，向江南扑来。到达寿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江西境内扑去，追袭位于洪州（现江西省南昌市）的隆祐太后（即元祐太后——孟太后）；另一支则走传统的巢肥故道，兵下采石矶，渡过长江后进攻建康，再从建康向高宗所在的临安地区进军，意图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完颜宗弼在采石矶渡江，击溃了建康的防务后，迅速南下。一路上由于进军太快，守将根本无法完成防务。

但由于路途遥远，金军还是没抓住高宗。他们到达临安，皇帝已经逃走，到了东海边上的定海（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在这里，他乘船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第一次为了逃难而到了海上。

这次著名的逃亡，成了南宋挫败金国速胜企图的最后努力。如果金国失败，必定无法再组织起下一次如此巨大规模的远征，双方将进入均势状态，以淮河为界各自统治一半中国。

完颜宗弼撤退时，在如今南京附近的黄天荡遭到了韩世忠的阻击。韩世忠以八千人围困了金兵十万人达四十八天之久，金兵由于另掘新的河道才得以逃走。这次战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不仅破除了金军不败的神话，也终结了金国军事的上升势头。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以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为代价，与金朝议和，维持了以进贡换和平的传统。到此时，宋金之间的拉锯战已维持了十几年，淮河成了双方较为稳定的新国界，这是两国军事实力再平衡的产物。一旦进入均势，双方均很难再打破此种局势。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夺取帝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侵，试图从采石矶过江灭南宋，却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海陵王也在兵变中身死。这时的金国已经如同当年的辽国一样，无力对南宋构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注释】

[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张邦昌事略》。

[2] 元祐太后经历来自《宋史纪事本末》。

[3] 参考《宋史·皇后传》。

[4]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张邦昌事略》。

[5] 参考《宋史·皇后传》。

[6] 参考《靖康纪闻》。

[7]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9] 参考《靖康纪闻》。

[10] 曹勋《北狩见闻录》。

[1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2] 参考《靖康纪闻》。

[13]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

[14] 参考《宋史·宗泽传》。

[15] 参考《宋史·李纲传》。

[16] 直到明朝开国，才出现了第一次由南向北的统一。

[17] 参考《宋史·高宗纪》。

尾声
消失的艮岳

公元1127年春，就在北宋徽、钦二帝带着全家老少在金人的胁迫下北迁之时，一位蜀地的僧人祖秀却再次来到了艮岳，欣赏他心目中的仙境。

祖秀，字紫芝，是一个在当时有名望的僧人，混迹于首都汴梁的文人墨客与官员中。[1]他曾经写过欧阳修的小传。[2]欧阳修是一个尊崇儒教、排佛的人，在撰写《新唐书》时将许多佛教的资料从史书中抽出。但在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往滁州，经过九江时，在一位高僧的指点下，发现佛教理论中的宽仁与他心目中的政见吻合，排佛之心大大消散。[3]

祖秀最佩服的是他的四川老乡苏轼，他认为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贤人，超乎蜀地五杰（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代的李白、陈子昂），是一位通古今、六艺俱全、佛儒全通的人物。[4]

北宋首都被围时，祖秀也被困在了汴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当金兵攻陷城池时，皇帝将皇家禁苑开放给受难的百姓，百姓跑到艮岳的园子里避难，这座常人难得一见的皇家园林终于露出了真面容。

祖秀也在这时第一次来到了艮岳。当时天刚刚下过大雪，放晴后，

避难的人们都在山间哆嗦着为性命担忧，但祖秀却被这如同图画的美景吸引住了。他流连于艮岳中，认为天下所有的美丽、古今所有的名胜，都集中在了这个园中。

那位下台的皇帝不仅享有了自然界的盛景，还创立了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美。这座园林是人工的，是由最懂艺术的皇帝设计，再由天下能工巧匠创造的。[5]

我们根据祖秀的记载，加上宋徽宗本人所写的《艮岳纪略》，或许可以将这个最著名的皇家园林进行还原。[6]

按照规划，园林模仿了天下最美的山水，一草一木一石都是有出处的，就连堆积成山的土壤也来自南方的名胜之地。在院子里，种着枇杷、橙、柚、柑橘、荔枝、榔栝等南方水果，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等著名的草本植物，它们都被成功地移植到了这里。还有许多珍禽异兽在山野间生活。

艮岳一圈有十余里，主体是三座山、三个池塘。在东北方是最高的万岁山，也叫作艮岳山，山顶上有一个小亭子叫介亭。万岁山之南是寿山，寿山有东西两个山头。万岁山和寿山之间有一块巨大的盆地，盆地中间是平静的雁池，雁池北岸有着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群，包括萼绿华堂、绛霄楼、书馆和八仙馆等。雁池的东西两面，是两列不高的小山岭（不算在三山之中），将寿山和万岁山连接起来。经过人工引水，有一条瀑布从寿山落下，流入雁池。

园林里的第三座山在万岁山的西面，叫万松岭。万松岭以南，也是雁池的西北角，是另一个池塘——大方沼，大方沼的西面连接着第三个池塘——凤池。在大方沼里，有两个人工小岛，分别叫作芦渚和梅渚，小岛上各修亭子。

万岁山和万松岭之间，从护城河里引来了一条流水，形成了幽深的峡谷。峡谷的水最终流向了大方沼。

三座山之间有路相通，上山的路怪石嶙峋、腾云架栈，故意造得曲曲折折、充满艰辛，仿佛天然却处处带着匠心。走在山里，古树参天、鸟鸣兽啸，根本想不到这是在首都的内城中行走。但在不经意间，又会走到一座座精心设计的亭台楼阁，随处可以休息。

在万岁山之北，还扩建了大量的阁楼，突破了内城的限制，直到外城城墙。

那块由朱勔运来的盘固侯神运石，则放在了西面的正门阳华门附近。[7]从阳华门进入园林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八十棵夹道的荔枝树。从荔枝树中穿过，就来到一株来自南方的椰树跟前。椰树后面的平地上，就是放在亭子里的神运石了。

皇帝带大臣游园，喜欢在亭子里赏赐他们吃荔枝。比神运石稍小一点的奇石有两块，一块放在寰春堂，叫作“玉京独秀太平岩”；另一块放在萼绿华堂，叫“庆云万态奇峰”。

细心的祖秀还记下了其他数十块石头的名字，有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扪参、衔日、吐月、排云、冲斗、雷门、月窟、蹲螭、坐狮、堆青、凝碧、金鳌、玉龟、叠翠、独秀、栖烟、鼾云、风门、雷穴、玉秀、玉窦、瑞云、巢凤、雕琢浑成、登封日观、蓬瀛、须弥老人、寿星、卿云、瑞霭、溜玉、喷玉、蕴玉、琢玉、积玉、叠玉、从玉、翔麟、舞仙、玉麒麟、南屏小峰、伏犀、怒猊、仪凤、乌龙、留云、宿雾、抱犊天门等。

祖秀还记录了园内不少的名胜，有在嶙峋的怪石上堆土形成的飞来峰，虽然看上去是山，但由于故意不将土堆满，露出了下面的怪石；有一座小山上种了上万棵梅树，称为梅岭，梅岭的边上，是另一个种满杏树的山坡，被称为杏岫；园子里还有种黄杨的黄杨，植丁香的丁香嶂，错植着椒兰的椒崖，种着大量侧柏的龙柏坡，养竹的斑竹麓。这些地方不仅以各色的植物著名，更重要的是讲求形胜，土下的石头，土上

的植物，山的形状，地的坡度，尖角的位置，洞穴的尺度，都必须表现出独具一格的轻灵。

瀑布是由人工背水上山，再让水直流而下形成的，这个瀑布叫紫石壁。有一条通往最高峰的阶梯是用温润的石头凿刻而成，叫作朝真磴。小岛上种满了海棠，称为海棠川。山间还有精心构造的三个山洞，呈品字形排列，山洞里设有厅堂，中间建有亭子，山洞的所有门窗都使用玛瑙雕琢，这个洞群称为碧虚洞天。

祖秀在皇家园林徘徊许久，才唏嘘离开，将他的所见记载下来，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巨大的园林有清晰的认识。

几个月后，当金人们忙着带赵氏皇家人员北返，当所有的大臣都忧心忡忡，既为逃脱了当人质的命运而庆幸，又担心未来的危险时，宋徽宗打造的艮岳再次陷入了没人管的境地。祖秀回想起艮岳的美丽，又来到了这里。

他试图重新搜寻艮岳的美，却发现所有的珍禽异兽都不见了踪影。那些水鸟都在宋徽宗的命令下被投入护城河放生了，走兽则成了围城时期人们的盘中餐。那些珍稀的草木也不见了，大树被砍了取暖，竹子被拿走编了篱笆。至于那些花费了无数人力运来的石头，都变成了抵御敌人的炮弹，发射到了城外。公卿达官们的题碑，被人们用斧头凿掉了文字，扔在沟里。就连“石头侯爷”肚子里的雄黄和炉甘石，也都被一个回纥人买走了。[8]

宋徽宗建立这个“天下盛境”花费了六年时光，动用了全国的财力。但人们毁掉它，只用了几个月而已，与其一同毁掉的，还有那个繁荣的帝国。

随着时光的飘逝，在本书中出场的人物也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张邦昌到达南京应天府时，曾经伏地痛哭请死，但康王出于团结所有人的目的，原谅了他，还让他继续担任太保。

但自从康王即位，情况却出现了变化。高宗皇帝选择了李纲做宰相，张邦昌只得到了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等没有实权的职务。皇帝不便于处理张邦昌，但为人苛刻的李纲却没有这个顾虑，他上书皇帝，认为张邦昌不能与君共荣辱，反而借着皇帝受辱而获益，应该弃市，作为乱臣贼子之戒。

高宗还是下不了决心处理这个当过皇帝的人，李纲乘机又戳了一下他的痛处，说以后如果继续把张邦昌留在朝廷，人们见了，会说这是那个“故天子”。这句话触动了皇帝，于是将张邦昌降为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市）安置。这其实就是宋代的断崖降级，将官员发配到边远地区。

此刻，张邦昌的命运就注定了，只要他离开皇帝身边，就丧失了活路。谏官们会一刻不停地寻找他的错处，直到皇帝同意将他杀掉，而由于他身在远方，所以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

最终，皇帝寻找的借口是：张邦昌玷污了皇家的女人。在太上皇的女人中，有一位华国靖恭夫人李氏由于不想离开汴京，一直对张邦昌示好。在一次喝酒后，李夫人拥抱着张邦昌说：“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他们一同进入内廷福宁殿，李氏将养女陈氏送给了张邦昌。

皇帝听说了这事，将李氏下狱，逼迫她将张邦昌牵连出来。[9]

虽然宋徽宗的无数妃子、女儿已经成了金人的“囊中之物”，但宋朝的臣民玷污皇家的女人却是大罪，这足以让张邦昌丧命。

高宗皇帝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九月，怀着轻松的心情签发了张邦昌的死亡令，逼迫他自缢于潭州平楚楼。[10]这位对汴京城“保护最大”的人最终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

曾与金人合作的人中，除了张邦昌之外，还有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和范琼等人，对这些人的处理早于张邦昌。高宗即位六天后，

就将王时雍贬为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其他在楚国担任过官职的人也开始感受到压力。

例外的是吕好问，他虽然在张邦昌手下担任高官，但由于劝说张邦昌迎回元祐太后，受到了高宗的表彰，被提升为尚书右丞。

五月初八，王时雍再次被贬为安化军节度副使，黄州安置，降低待遇被流放了。大家一看王时雍的境遇，立刻心里有了数。吴幵赶快上书请死，被贬为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莫俦也上书请贬，被封了个述古殿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

五月十三，徐秉哲也被贬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六月初二，高宗想了个处置徐秉哲的方法，派他出使金国，想借助金国的手杀掉他。徐秉哲拒绝了，于是被贬为昭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梅州。

六月初五，皇帝再次下令，王时雍安置高州（张邦昌被赐死时，王时雍也被诛于高州）、吴幵安置永州、莫俦安置全州。到这时，除了范琼之外，其余的人都被发配了。

范琼由于手中有兵权，比起几位文官要难处理得多。他一看事情不好，也心情忐忑，皇帝反而安慰他，作为武将并没有大错，不用担心。

由于朝廷正是用兵之时，范琼被委以重任。但事后，范琼依然展现出对外战争的无能，和对内斗争的擅长。他在与金军作战时，被人嘲笑“此将军岂解杀敌，唯有走耳”。但他又拥兵自重，甚至参与了反对宋高宗的苗刘兵变。宋高宗只好让大将张浚将其杀掉。

由于范琼手握兵权，张浚无法直接下手，只能事先埋伏了士兵，借邀请其谈事，突然将他杀死。[11]

在所有需要为僭伪承担责任的人中，宋齐愈是最倒霉的。当金军逼迫众人选举张邦昌，而大臣们扭扭捏捏不肯第一个说出名字时，宋齐愈

为了避免僵局，向王时雍打听出张邦昌的名字，第一个签了名。就是这一次冲动之举要了他的命。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七月初三宋齐愈被罢职。宋齐愈留了一手，将当初另一位官员李会写的劝进草稿藏了起来。他以为自己罪不至死，想靠检举立功，将草稿捅了出来。但审判他的人却与李会勾结起来，将其判死。

即便这样，宋齐愈还可以不死，因为判案的法寺（大理寺）认定，他虽然该杀，可恰逢高宗皇帝大赦，不需要执行死刑。不想事情捅到皇帝那儿，皇帝说了一句："如果张邦昌（在宋齐愈的帮助下）真的成了皇帝，又置朕于何地？"法寺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图，杀掉了宋齐愈。[12]

在宋徽宗所有的妃子中，只有韦妃一人回到了南方。宋金议和时，作为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妃也成了议和的筹码之一。和议完成后，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四月，韦妃带着宋徽宗的棺材踏上了归乡之路。她在南宋又活了十七年才去世，那时已经八十高寿。[13]在官方的记录里她成了贤后的化身，但在民间，却传说她在金国已经失节。[14]

民间和官方的认知差异，也不能全怪民间的恶毒。事实上，南宋时期建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就和靖康之耻有关。

靖康时期，金人俘虏了那么多年轻的女人，几乎包括了整个徽宗家族。按照汉人的观念，这些女人都被不纯洁的血统玷污了。从这时开始，道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道学家们意识到必须进行更大力度的灌输，提倡以后妇女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必须全力抵抗，直至死亡。

道学家的灌输又反作用于靖康时期被掳的女性们，人们带着新的观念回头再看，更加认为她们被抓走是耻辱的，而韦妃不幸也在这个群体之中。

靖康之耻之所以给了道学一统天下的时机，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

之前，北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朝代，皇帝对大臣并没有过分强调忠贞，只要求大臣在能力上能够胜任。一时间实学盛行，人们普遍不重视空虚的泛泛之谈，而是对政治学、工程学、经济学更加看重。

但靖康年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故，却很少有大臣表现出忠心，反而有很多人配合金军将皇帝送走，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宋朝朝野。

从此之后，整个社会气氛加大了道德观念的灌输，要求人们重新树立忠于朝廷的价值观，道学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了主流。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提倡，对灭人欲的推崇，都一股脑儿变成了人们必须接受的“天理”，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愚忠，束缚了中国近千年之久。

在高宗时期，还有一个从北方放回来的重要人物——秦桧。

秦桧被金人掳往北方，最初跟随太上皇，后来被金太宗赐予了弟弟挞懒。挞懒很信任秦桧，让他在南侵时当参谋。[15]不想秦桧和妻子王氏抓住机会，杀掉看守，逃回了宋境。

关于秦桧的归来，日后人们猜测纷纷，许多人怀疑他是金国放回来的奸细，否则为什么那么多被抓往北方的高官，只有秦桧回来了？更何况还是和他的妻子一同回来，金人竟没有用他妻子做人质。[16]

但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李回选择了相信秦桧。日后，秦桧成了高宗朝的宰相，以及主和派的领袖。在秦桧的主导下，高宗在经过多年的战争后，选择与金军议和。为了扫除议和的障碍，秦桧排挤了主战派的将领，并将其中最坚决的岳飞构陷杀死，压制了反对的声音。

根据他后来的作为，人们怀疑他真的是金国的奸细。但也有可能，秦桧与岳飞的对立只是宋代主战派与主和派争斗的继续罢了。主战派看到了金国并非不可战胜，主和派却担心宋朝承受不了战争的影响，即便打几个胜仗，但沉重的财政负担会将国家压垮。只是这时的党派斗争已经失去了北宋初年的优雅，必须以杀人为结局罢了。

与秦桧类似的主和派还有宋高宗的两位宠臣黄潜善和汪伯彦，只是这两人没有秦桧走运。秦桧是在金军进攻力竭之后才掌权的，所以长期把持大位，安然善终。而黄潜善和汪伯彦却不幸赶上了金军势头最盛时，他们主张求和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还耽误了宋军的防卫，导致宋高宗差点被金军抓住。当金军攻克扬州时，两人都成了替罪羊被免职。但黄、汪的和平理想却被秦桧继承下来，也算后继有人了。

黄潜善死得早，没有看到后来的和平，而汪伯彦熬到了秦桧当政时期，再次起用。但后人对三人的评价却定了格，《宋史》将黄、汪、秦三人并列，写入了《奸臣传》。

秦桧等主和派掌握了南宋的政局，那些主战派的结局却并不好。李纲在高宗初期曾经短暂担任了宰相，[17]但作为书生的他很快就暴露出领导力的不足，在如此纷纭复杂的环境中无法施展有效的领导力。在黄、汪的排挤下，李纲执政了七十几天就被边缘化，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

与李纲类似的还有官职更小的马扩。马扩长期在河北地区抵抗金军，当金军占领了河北之后，马扩只好来到了江南。他担任过一系列的小官，都没有受重用。秦桧当朝时，马扩辞官离开了南宋的官场。[18]

李纲和马扩虽然被边缘化，却没有性命之忧。同属于主战派的太学生陈东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陈东在靖康、建炎时期是学生中的意见领袖，曾经上书要求“诛六贼”，在第一次汴京围城战中，李纲被宋钦宗罢免后，陈东又领导了汴京城哗变，逼迫宋钦宗恢复了李纲的职位。

金人解围后，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学生领袖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大臣提议将他们抓起来，有的提倡重用他们。但学生领袖们最大的问题却是：他们是和平时代好的“看门狗”，但在战争时期却应付不了复杂的局面。

陈东在第二次汴京围城战时已经辞职回家。到了高宗时代，李纲第

二次被罢职后，陈东又上书要求给李纲复职，贬斥黄潜善、汪伯彦。

高宗皇帝不打算学北宋的祖先们容忍言官的传统，决定采取严厉的手段制裁他们。黄潜善乘机劝说皇帝杀掉陈东。

陈东的死刑令下发给了府尹孟庾，孟庾想以请陈东商议事情为借口，将他诱捕。府尹派出的小吏到来时，陈东已经有了预感，他表示吃过饭再动身，并写了一封家信交给朋友，好传给他的家人。吃完饭他去了一趟厕所，请他的小吏有些为难，怕他乘机跑掉。陈东看在眼里，连忙安慰小吏："我陈东如果怕死，当初就不敢说话了，既然说过，难道还怕死？"

当天，陈东被斩于市，与他同死的还有另一位市民领袖欧阳澈。[19]高宗对于意见领袖的杀戮，也成了后来杀害岳飞的先声，亦表明南宋不准备像以前那样过于宽容。

在宋朝的叛臣中，还有一个人引人注目，他就是"常胜军"首领郭药师。郭药师在燕京投降金国后，在第一次汴京围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军事情报是二太子斡离不成功的保障。

之后，郭药师的官职却并没有更上一层。金军慢慢抽走了他的常胜军，仍然让他负责守卫当初的营、平、滦地区。金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时，郭药师是平州守将。与之相比，常常出使宋朝的金国使者萧庆已经成了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

不过，这一年郭药师和萧庆都被粘罕元帅抓起来关进了监狱。史书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只说他们很快又获释了。萧庆之后仍然是粘罕的嫡系。可是元帅却拿走了郭药师庞大的家产，只是没有要他的命。在金人看来，失去了家产的郭药师也就失去了聚众的能力，没了后顾之忧，就可以让他安度晚年了。[20]

与郭药师死在床上相比，另一个原宋朝大臣宇文虚中的命运就要悲惨得多。[21]宇文虚中曾经反对宋徽宗的"联金灭辽"政策。第一次汴京围

城战时，他又参与了与金国的和谈，竭尽全力争取不割三镇，却没有成功。

金军退军后，宇文虚中成了替罪羊被贬职，却幸运地躲过了靖康之祸。

但到了第二年（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高宗征求使者出使金国，请求归还二帝，宇文虚中应征前往，被金人扣留了。一年后，金人将其他使者放回时，宇文虚中却决定不回来，他表示自己的使命是请回二帝，这个使命不完成，就不回去。

金人很看重宇文虚中的才华，重用了他。在高峰时期，金人甚至把他当作“国师”看待。宇文虚中担任了金人的高官，却并没有背叛宋朝，他一方面与二帝取得联系，另一方面联系北方的宋朝人，帮助他们寻找南归的机会。他成了北方汉人的领袖。

他还想办法帮助南宋迟滞金军的进攻，不停地劝说金军，江南太荒僻，打下来没什么用处，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钱财。此外，他偷偷与南宋取得了联系，不时写密信将金国的情况告知南方。

但宇文虚中没有想到，他在不知不觉间得罪了一个远方的人——秦桧。秦桧不怕南方的人，却怕北方的人将他在金国时期的事情透露给南方。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宋金终于议和，金国乘机向南宋索要在北方当官的宋人的家属。秦桧一看是个机会，连忙将留在南宋的宇文虚中家族全都抓起来，送给了金国，这就断绝了宇文虚中归宋的道路。

数年后，宇文虚中与北方宋人的联络被发现，他被下狱判死，一家百口被金人烧死，这在宋金时期是少有的灭门惨案。

除了宋朝归降金国的人都有了结局之外，辽国归降之人也都有了结局。

在金国的契丹族大臣中，伐宋最得力的两位是刘彦宗与耶律余睹。

刘彦宗死于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由于死得早，受到了金人的优待。耶律余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作为渔猎民族，女真人善于运用被征服者的大臣，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女真太落后，不依靠于契丹和汉人，就不可能建立起正规的政权组织。

可是一旦金国的政权稳定了，在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之间就出现了深刻的隔阂，并在日常交往中逐渐放大。久而久之，金国政权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契丹人的派别——女真民族派。而契丹人为了自保，也被迫结成一派，以对抗女真民族派。

两派中，女真民族派的首领是一位叫作兀室（完颜希尹）的人，而契丹派的领袖则是耶律余睹。

有趣的是，两人都来自粘罕元帅的西路军，曾经长期共事，彼此相互了解。在金国伐宋时，耶律余睹就已经是西路军的都监，也就是仅次于元帅粘罕和监军兀室的人。但之后的几年间，他再也没有升迁。他一直在西路的云中地区担任守将。金人为了防范他，甚至还把他的妻子当了人质。

金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作为女真民族派首领的兀室发起了一场运动，将耶律余睹推向了深渊。[22]

一天，兀室在居庸关附近打猎时，看到山下有两个骑马的人在交谈，他们谈了许久，沿着不同的方向离开。兀室乘机将其中一个人扣留，进行了长期的盘问。最后认定，这两人都是契丹族的使者，他们在策划一场叛乱。

按照兀室的说法，两位使者一个由云中的守将耶律余睹派出，另一位由燕京的守将槁里（也是契丹人）派出。两位守将派出使者接头，准备策划燕云地区叛离金国。

这个说法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因为它来自兀室的讯问。但不管怎样，兀室以此为借口策划了一场反对契丹人的大屠杀。首当其冲的是燕京的守将槁里。其次，兀室将运动扩大化，命令燕京地区的兵马开始清理契丹人，将他们全都杀死。一时间契丹人纷纷逃亡，前往西方和北方。

兀室在清理完燕京地区之后，率军前往云中地区，准备将契丹人最后的依靠耶律余睹拔掉。余睹事先听到了消息，带着亲兵向西夏逃去。到了金夏边境，西夏人问余睹带了多少人马，余睹回答有三百人，西夏人以人少为由拒绝他入境。

余睹只好再次向北方的鞑靼地区逃窜，却被鞑靼人诱杀，并将他的首级献给了金国。

契丹人在金国的影响力灰飞烟灭。

云中地区除了是余睹的驻扎地，也是元帅粘罕的势力范围，粘罕娶了辽国天祚帝的元妃萧氏做妾，而萧氏就住在云中。兀室到了云中后，一不做二不休，闯入萧氏的府邸将她杀死。事后，兀室向粘罕汇报，表示萧氏作为契丹人可能会危害兄长的性命，作为预防手段，他已经将萧氏杀死了。粘罕对于既成事实无可奈何，还得拥抱兀室，感谢他的关心。由于兀室是粘罕的左膀右臂，他的重要性显然高于一个女人。

但粘罕和兀室也并没有笑到最后。作为新兴民族，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分配不平衡。在进攻北宋的两位元帅中，斡离不由于死得早，没有参与权力斗争。

粘罕和兀室两人却无法避免政治斗争。同样是公元1132年，粘罕和兀室请求金太宗立太祖的嫡孙合剌（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也就是太子。

女真最初采取的是兄终弟及，两年前，前任谙班勃极烈斜也（完颜杲）死了，斜也是太祖和太宗的亲弟弟。兄弟一脉上已经没有人了，接

下来即位的应该是子辈。太宗的长子完颜宗磐希望成为继承人，但粘罕却推荐太祖的嫡孙合剌，挤掉了太宗的亲生儿子。

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合剌即位成了金熙宗，粘罕和兀室作为拥立者，本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不想，熙宗皇帝却采纳了养父完颜宗干的建议，重用完颜宗干和完颜宗磐，将粘罕一系的兵权逐渐收回。

熙宗借鉴了汉人的官僚体系，改革了官职，废除了勃极烈制度，采取三省制。他封粘罕为太保、领三省事，晋封国王，却将他兵权剥夺了。此外，粘罕一系的人也都免去了地方大员的身份，改授中央文官，比如兀室就被改授了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高庆裔为左丞，萧庆为右丞。

太宗时代，粘罕是说一不二的权臣，但熙宗时代，除了粘罕被授予太保之外，还有皇帝的养父完颜宗干被授予太傅，曾经与熙宗竞争帝位的完颜宗磐被授予太师，他们并领三省事。而实际上，后两人的权力已经在粘罕之上了。[23]

两年后，熙宗继续拿粘罕系开刀，将尚书左丞高庆裔找罪名杀掉了。粘罕无法保护自己的亲信，他本人也抑郁得病，在风雨飘摇中又熬了一个月就去世了。[24]

粘罕死后，金熙宗用太祖第六子完颜宗隽（讹鲁观）取代了兀室担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但不久，宗隽、宗磐等人的擅权让熙宗感到难受，皇帝再次起用兀室，借助他和宗干，将宗隽和宗磐杀死。

但随后，兀室又和金军元帅完颜宗弼发生冲突，这次，皇帝与完颜宗弼联手杀死了兀室。至此，西路军的“三驾马车”粘罕、兀室和余睹都死在了权斗之中。

金国之所以勃兴，很大程度上在于太祖、太宗兄弟和亲戚的团结一致，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次次发起战争。相比较而言，辽国和宋朝却内斗不断，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行动。

但女真兴起太快，在瞬间获得了太多的资源，又由于分配不均迅速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和纷争。到了熙宗时期，女真的对外扩张冲动已经让位给了内斗的狂热。

皇统九年[25]底，熙宗皇帝本人死于一次宫廷政变，上台的是太师完颜宗干的次子完颜亮，史称海陵王。海陵王想结束内斗，将女真的精力再转向对外。他发动了一次南侵，却在长江边上遭遇了军队哗变而被杀（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26]即位的金世宗完颜雍结束了战争状态，金国也开始了难得的和平时代。

当本书中所有的主角都死亡后，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一月，南宋又派遣生辰使试户部尚书张子政、明州观察使赵士褒前往金国首都燕京，祝贺金国皇帝的生辰。

他们的行程被一位叫作周辉的随从记录了下来，[27]其中关于金国宫殿的描写，可以和当年许亢宗出使时看到的上京附近的“土围子”做一个对比。

此时金国的政治中心搬到了当年争夺的焦点：燕京。南宋使团十一月接受任命，于第二年正月初七离开国门，二月二十七就到了燕京。

如今北京城内靠南的位置，还有一片遗址区是当年的金中都遗存。现在的人们到了那儿，除了能看到几条土墙之外，几乎看不出任何当年的模样。但在金代时，这里却有着大片的琼楼玉宇。

宋朝使臣来到后，首先在城外的燕宾馆停留，在这里接受招待吃饭。吃饭完毕，被引入城内，首先经过的是端礼门，其次南门，再入丰宜门，接着过一个特殊的建筑：龙津楼。龙津楼是一个直接架在道路上方的阁楼，在楼下，三条大道并行穿过，道上的扶栏用类似玉石的材质雕刻着婴儿的图像，工巧万分。

过了龙津楼，再过宜阳门，然后才由驰道进入了金国的国宾馆——会同馆。这一路上的繁华与奢侈，与许亢宗当年住的三十余间的大茅屋

简直是天壤之别。

从会同馆到接见宫的行程是这样的：出了馆，有一条通往宫殿的驰道，驰道两旁是叫作御廊的建筑群，东西曲尺各有二百五十间。御廊尽头是百官下马的掖门，从掖门经过专德门、会通门、承明门、左嘉会门，向南行，才到了接见使者的宫殿。宫殿里铺着巨大的毛毡，毡上绣着无数的鸾凤。到了接见时分，使者还必须穿过宣明门、行政门和一个隔门，才能站在这数百人的大毡上。

大殿有九根巨大的雕花柱子，前面设有露台，两廊各有三十间的规模，中间有两个钟鼓楼，外面有绣花的金漆帘子遮挡。

殿门外有两三百卫士站立两旁，都穿着锦袍，戴金花帽。宣明门外到外廊之间站满了甲士，左面是青绦甲持黄龙旗，右面是红绦甲持红龙旗。外廊都是银枪卫士，左掖门内都是金枪卫士。

宫殿的瓦都是琉璃制作，映日辉煌。从描述来看，金中都的宫殿比南宋临安的宫殿规模大。南宋皇帝一直声称临安是临时首都（行在），不肯大规模修缮宫殿，显得捉襟见肘。金中都除了辉煌之外，还透露出极强的军国色彩，带着军事化的仪仗，与文人治国的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辉感慨说，燕京宫殿的构造是按照金东京的模型修建的，在建设时用了一百二十万人，花了数年时间才修好，死者不计其数。

这个宫殿，和当初的“土围子”，同样天壤之别。周辉的记述也让后世的读者知道，女真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里，已经从一个原始的部族，成长为有着极强物质追求的新兴民族。

金国走到这一步，也逐渐丧失了当初的冲击力，这个国家正在变得衰老，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罢了。

在面对南宋时，它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是，在面对更新兴的马

背民族时，它已经无力抵抗。

金国虽然衰落，但在遇到那个捅破窗户纸的民族之前，它继续存在了五十年。之后，就像当初辽国遇到的那样，它也走向了被征服的命运。

【注释】

[1] 晓莹《云卧纪谭》。

[2] 残篇见《佛祖统纪》。

[3] 见《佛祖统纪》。

[4] 《云卧纪谭》："（祖秀）后归老蜀山，翕然燕处，一话一言未尝忘卫宗护教，既福不逮慧，为时论所惜焉。"

[5] 《阳华宫记》，亦有版本称为《华阳宫记》。在本节中，所有称为"阳华宫"和"阳华门"的地方，在《华阳宫记》中都被记为"华阳宫"和"华阳门"。

[6] 《汴京遗迹志》收录了几篇艮岳的介绍，本稿件中的描述是综合几篇文章后得到的。

[7] 参考《铁围山丛谈》。

[8] 参考《癸辛杂识》。

[9] 参考《宋史·张邦昌传》。

[10] 参考《大金国志》。

[11] 以上均出自《续资治通鉴》。

[12]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3] 《宋史·韦贤妃传》，万俟卨《皇太后回銮事实》。

[14] 见本书前文。

[15]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秦桧主和》。

[16] 参考《宋史·秦桧传》。

[17]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李纲辅政》。

[18] 参考《茅斋自叙》。

[19] 参考《宋史·陈东传》《宋史·欧阳澈传》。

[20] 参考《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纪》。

[21] 参考《宋史·宇文虚中传》《金史·宇文虚中传》《大金国志·宇文虚中传》。

[22] 参考《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纪》。

[23] 参考《金史·熙宗纪》。

[24] 参考《金史·完颜宗翰传》，《大金国志·粘罕传》。

[25] 皇统九年是公元1149年，但熙宗遇刺的十二月初九却已经是公元1150年1月9日。

[26] 参考《金史·海陵纪》。

[27] 参考《北辕录》。

附录

表 宣和靖康年间宰执变动[1]

年　代	变　动	在位宰相	在位执政
宣和元年正月	（宰）余深加太宰兼门下侍郎 （宰）王黼加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蔡京、余深、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范致虚、邓洵武
宣和元年三月	（执）张邦昌除尚书右丞，后迁左丞	蔡京、余深、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范致虚、邓洵武、张邦昌
宣和元年八月	（执）尚书左丞范致虚丁母忧	蔡京、余深、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邓洵武、张邦昌、王安中
宣和元年一月	（执）王安中除中大夫、尚书右丞	蔡京、余深、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范致虚、邓洵武、张邦昌、王安中
宣和二年六月	（宰）蔡京以太师、鲁国公致仕	余深、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邓洵武、张邦昌、王安中
宣和二年十一月	（宰）余深以少傅、镇江军节度使出知福州	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邓洵武、张邦昌、王安中
宣和二年十二月	（执）郑居中权领枢密院事	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邓洵武、张邦昌、王安中、郑居中
宣和三年正月	（执）邓洵武卒	王黼	童贯、白时中、冯熙载、张邦昌、王安中、郑居中
宣和三年十一月	（执）冯熙载以资政殿学士出知亳州 （执）李邦彦除尚书右丞	王黼	童贯、白时中、张邦昌、王安中、郑居中、李邦彦
宣和五年正月	（执）王安中以庆元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	王黼	童贯、白时中、张邦昌、郑居中、李邦彦

年　代	变　动	在位宰相	在位执政
宣和五年二月	（执）赵野除中大夫、尚书右丞	王黼	童贯、白时中、张邦昌、郑居中、李邦彦、赵野
宣和五年六月	（执）郑居中致仕、卒 （执）蔡攸领枢密院事	王黼	童贯、白时中、张邦昌、李邦彦、赵野、蔡攸
宣和五年七月	（执）童贯致仕	王黼	白时中、张邦昌、李邦彦、赵野、蔡攸
宣和六年九月	（宰）李邦彦加银青光禄大夫、少宰兼中书侍郎、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宰）白时中加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郎、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执）宇文粹中除尚书右丞 （执）蔡懋除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王黼、李邦彦、白时中	张邦昌、赵野、蔡攸、宇文粹中、蔡懋
宣和六年十一月	（宰）王黼致仕	白时中、李邦彦	张邦昌、赵野、蔡攸、宇文粹中、蔡懋
宣和六年十二月	（宰）蔡京落致仕，依前太师领三省事、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蔡京、白时中、李邦彦	张邦昌、赵野、蔡攸、宇文粹中、蔡懋

宣和七年四月	（宰）蔡京致仕	白时中、李邦彦	张邦昌、赵野、蔡攸、宇文粹中、蔡懋
宣和七年十二月	（执）吴敏加中大夫、门下侍郎 （执）耿南仲除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白时中、李邦彦	张邦昌、赵野、蔡攸、宇文粹中、蔡懋、吴敏、耿南仲
靖康元年正月	（宰）白时中以观文殿大学士领中太乙宫使 （宰）张邦昌加少宰兼中书侍郎、神霄玉清万寿宫使 （宰）吴敏迁太中大夫、少宰兼中书侍郎 （执）李梲除同知枢密院事 （执）李纲除尚书右丞 （执）王孝迪除中书侍郎 （执）唐恪除同知枢密院事 （执）路允迪除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执）种师道除同知枢密院事	李邦彦、张邦昌、吴敏	赵野、蔡攸、宇文粹中、蔡懋、耿南仲、李梲、李纲、王孝迪、唐恪、路允迪、种师道

年　代	变　动	在位宰相	在位执政
靖康元年二月	（宰）李邦彦以观文殿学士领太乙宫使 （执）李纲被罢，寻复职 （执）徐处仁除中书侍郎 （执）宇文虚中除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执）蔡懋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执）王孝迪以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 （执）种师道以检校少傅领中太乙宫使 （执）蔡攸责授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 （执）宇文粹中罢尚书右丞	张邦昌、吴敏	赵野、耿南仲、李悦、李纲、唐恪、路允迪、徐处仁、宇文虚中
靖康元年三月	（宰）徐处仁加通奉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 （宰）张邦昌以观文殿大学士领中太乙宫使 （执）何㮚除中大夫、尚书右丞 （执）许翰除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执）李悦以正奉大夫、资政殿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 （执）宇文虚中以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出知青州	吴敏、徐处仁	赵野、耿南仲、李纲、唐恪、路允迪、何㮚、许翰
靖康元年四月	（执）种师道除同知枢密院事 （执）赵野以资政殿学士出知襄阳府	吴敏、徐处仁	耿南仲、李纲、唐恪、路允迪、何㮚、许翰、种师道
靖康元年六月	（执）路允迪以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	吴敏、徐处仁	耿南仲、李纲、唐恪、何㮚、许翰、种师道
靖康元年八月	（宰）唐恪加少宰兼中书侍郎 （宰）徐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领中太乙宫使 （宰）吴敏以观文殿大学士领醴泉观使 （执）陈过庭除尚书右丞 （执）聂昌除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 （执）李回除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执）许翰以延康殿学士出知亳州	唐恪	耿南仲、李纲、何㮚、种师道、陈过庭、聂昌、李回

年　代	变　动	在位宰相	在位执政
靖康元年九月	（执）王寓除尚书左丞[①] （执）李纲以观文殿学士出知扬州	唐恪	耿南仲、何㮚、种师道、陈过庭、聂昌、李回、王寓
靖康元年十月	（执）冯澥除中大夫、知枢密院事 （执）王寓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②] （执）种师道卒	唐恪	耿南仲、何㮚、陈过庭、聂昌、李回、冯澥
靖康元年十一月	（执）曹辅除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执）冯澥除资政殿学士、太子宾客 （执）李回除提举万寿观 （执）何㮚除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后再次拜门下侍郎	唐恪	耿南仲、陈过庭、聂昌、孙傅、曹辅、何㮚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	（宰）何㮚加通奉大夫、右仆射、中书侍郎 （宰）唐恪以观文殿大学士领中太乙宫使 （执）孙傅除中大夫、尚书右丞，后除同知枢密院事[③] （执）冯澥除尚书左丞 （执）张叔夜除签书枢密院事	何㮚	耿南仲、陈过庭、聂昌、孙傅、曹辅、冯澥、张叔夜

① 《宋宰辅编年录》记载为十月。之所以任命，是因为要让他出使金国。他拒绝后被罢免。

② 《宋宰辅编年录》记载为十二月。

③ 《宋宰辅编年录》《宋史·宰辅表》记载为十一月。

【注释】

[1] 根据《宋史·宰辅表》《宋宰辅编年录》《宋代官制辞典》。在宰执官员中官职也有变动，比如，从尚书右丞晋升尚书左丞等，但在执政内部，或者宰相内部的变动，本表不再列出，如果是从执政晋升宰相，本表予以列出。

后记

1

2013年底，我在大理洱海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居住了三个月。其间，除了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一稿（这一稿没有用上，后来废掉重写）之外，几乎没做任何别的正事，也很少和熟人接触。

为了活动一下手脚，每当写作的空闲，我就到住处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帮忙刷碗。老板娘梦舞君是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姑娘，原本是教师，辞职后在这偏僻的小村子里开了个小店，养活自己的同时，也希望继续绘画的梦想。我有幸成了这家小店的编外洗碗工。

三个月后的2014年春天，我决定去中东看一看硝烟的颜色，离开了大理。

据说，当我离开的那一天，姑娘痛哭了一场，但当时我并不知情。最初，我们还有联系，随着我的手机坏了，联系中断。

所幸的是，半年以后，我回到了国内，再到大理，将她捞上了我的“贼船”。我们找到了彼此有生之年的依靠。

她继续经营小店，我继续漂泊。其间，我去了阿富汗的战地，差点儿被劫持，当头破血流的我确信安全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她报平安。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心中有根的感觉。

又过了两年，大理市政府对当地民营经济进行了管控，梦舞君的小店也受到了影响。我乘机劝说她将店关掉，既然喜欢绘画，就不要再走弯路，向着理想去拼搏吧。

于是，我们买了一个小屋，有一间属于她的画室，也有一间我的书房。屋外风总是很大，我给小屋起了名字，叫“风吼居”。

2

这是我成年后的漂泊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我和梦舞君都相信人可以不依赖于任何组织而活着。我们坚持这样做，才感觉无愧此生。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家的最大用处就是藏书。在前半生中，我购书无数，但这些书却都随着我的漂泊而散落全国各地。这一次，我终于可以把心仪的书籍重新搜集。

之前，我写书的资料大都是临时购买，或者在图书馆拍照，或者下载电子版，书一写完，资料早已散尽。写书的地点也五花八门，比如最早的小说《告别香巴拉》，构思于西藏的无人区，动笔于云南的文山，在北京写作期间，还换过两个住处，修改地点在杭州和越南的沙巴小镇，最后又封稿于云南的文山。另一本书《穿越百年中东》的最早章节是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写作与修改的，完成地点是在广州。其余几乎每一本书都经历过类似的动荡，才得以完成。

当有了家之后，创作环境终于得到了改善。《汴京之围》是我的第一本在同一个地方构思、写作和完成的作品。

在风吼居，我几乎将所有的参考资料都备齐了。在本书所列的一百多本参考书中，除了《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由于暂时购买不到，只能使用电子版之外，其余的书籍我都买来放在案头，边

写边查。

《汴京之围》也因此成了写作最从容的一本书。

3

为什么要写《汴京之围》？

当我写作《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时，强调的是军事地理对于战略的重要性。但在写作过程中，却有一个时代让我如鲠在喉，这个时代就是北宋末期的靖康时期。这个时代的战争已经超越了军事本身，变成了政治、经济、外交的大拼盘。在《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一本书中，不可能将如此丰富的内容展现，于是我将它单独抽出来，写一本专著，来解剖这个时代。

另外，靖康时期那段历史对于现代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设想回到北宋——三年前，整个社会铺天盖地在宣扬一场盛世，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国力富强，经济繁荣；但三年后国家却灭亡了。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三年，这一时代境况让我有一种去一探究竟的冲动。

它提醒我们居安思危，在任何时候，危机和盛世只差一步而已。和平并不是一种必然，它要求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学习世界所长的同时，避免自大与狂傲。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意识地避免战争，谦卑不是错，错判了形势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形势都是环环相扣的，一旦迈出了第一步，不仅无法回头，而且也无法把握未来的走向了。

由于研究战争和财政，我也知道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破坏性。一旦战争出现，引起的财政失衡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如今，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正处于一个爆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更需要我们随

时警醒。

4

在书中，我还写了大量的外交活动。

随着世界的复杂化，外交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常态。其实在宋代，由于数国并立，国家的外交早就摆脱了中央帝国的心态，与辽国、金国的外交活动已经很现代了。

但宋代的外交却显得异常混乱。北宋政府有着强烈的历史屈辱感，这种感觉来自辽国占据着燕云十六州。于是，北宋末年外交的出发点都落在这片北方领土之上。由此产生的不计后果的外交策略，最终不仅没有拿回燕云十六州，反而丢掉了更多的土地。

北宋君臣由于缺乏固定的原则，在外交上走入旋涡无法自拔，让每一个看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扼腕叹息。而这，也正是现代外交所必须避免的。

另外，在军事战略、政治上，这段历史都可以给我们太多的启发，这本书不是为了回顾一段千年前的历史，而是为了让当代人有所领悟。

这不是《岳飞传》那种让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书，而是一本令人深省、思考历史教训的书。不鼓动任何情绪，却总是想给文明冲突找到合理的解释。

5

感谢梦舞君的陪伴。

感谢当年给了我理想，教导我不要合群的祖父母郭宝成、李玉萍。

感谢文学锋、周杭君、谷重庆、秦旭东，你们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

给了我重要的帮助，这才有了我今天的成就。

感谢我的编辑团队，也是国内最好的编辑团队。

本书构思、写作、修改于大理风吼居。但愿我未来的作品都出自这个四季听风的小屋。

参考书目

聚合类

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大化书局，1979年。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陈述、朱子方主编：《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

［宋］李心傅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年。

龚延明编：《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

［宋］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8年。

［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2011年。

［元］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

［宋］李，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

［宋］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华书局，2006年。

［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4年。

［金］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中华书局，2017年。

［宋］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中华书局，2014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中华书局。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鹭江出版社，2018年。

周勋初主编，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编：《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岳麓书社，2002年。

［宋］王称：《二十五别史·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

［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地理军事类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

［清］顾炎武撰，黄珅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清］顾炎武撰，王文楚等校点：《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

［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中华书局，2013年。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

［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中华书局，1999年。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

笔记类

［宋］赵甡之撰，许起山辑校：《中兴遗史辑校》，中华书局，2018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华书局，2010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瓮中人语》，中华书局，2010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中华书局，2010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南征录汇》，中华书局，2010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中华书局，2010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中华书局，2010年。

［宋］確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中华书局，201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邵氏闻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避暑录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一编·涑水纪闻》，大象出版社，2003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二编·后山谈丛》，大象出版社，2006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二编·东轩笔录》，大象出版社，2006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二编·侯鲭录》，大象出版社，2006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泊宅编》，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墨庄漫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铁围山丛谈》，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松漠纪闻》，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靖康传信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建炎进退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建炎时政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建炎复辟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靖炎两朝见闻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朝野佥言》，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三编·北狩见闻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独醒杂志》，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华阳宫记事》，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避戎夜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北狩行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靖康纪闻》，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南烬纪闻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窃愤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四编·窃愤续录》，大象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五编·能改斋漫录》，大象出版社，2012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五编·容斋随笔》，大象出版社，2012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五编·裔夷谋夏录》，大象出版社，2012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五编·云卧纪谭》，大象出版社，2012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五编·老学庵笔记》，大象出版社，2012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六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象出版社，2013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六编·挥尘录》，大象出版社，2013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六编·玉照新志》，大象出版社，2013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七编·桯史》，大象出版社，2016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七编·齐东野语》，大象出版社，2016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八编·梦粱录》，大象出版社，2017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八编·癸辛杂识》，大象出版社，2017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九编·宗忠简公遗事》，大象出版社，201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九编·秀水闲居录》，大象出版社，2018年。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笔记第九编·皇太后回銮事实》，大象出版社，2018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使北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燕云奉使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茅斋自叙》（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靖康城下奉使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辕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北征纪实》，大化书局，1979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陷燕录》，大化书局，1979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南归录》，大化书局，1979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金虏节要》，大化书局，1979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燕云录》，大化书局，1979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北记》，大化书局，1979年。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宣和录》，大化书局，1979年。

［宋］汪藻原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金元日记丛编·长春真人西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评考类与虚构类

［清］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

［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03年。

［明］洪楩等编：《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岳麓书社，1993年。

［明］施耐庵：《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88年。

丝绸之路大历史
Somewhere beyond the Central Earth
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A HISTORY ON HOW CHINA MEETING THE WORLD
郭建龙 著
一部中国视角下的两千年丝路兴衰史
知名历史作家 郭建龙 2021年重磅新作！
中西之间的地理通道如何塑造世界格局，影响文明走向？
从中国出发抵达世界，从历史着眼预见未来
刘擎 张宏杰 罗振宇 施展 马伯庸 李硕 一致推荐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9-01

ISBN：978754556468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信息
楔子 一个僧人踢开的百年外交
戒日王遣使
吐蕃王朝
吐蕃-尼婆罗道的开通
一人救一国
“高速公路”的关闭
哈里发帝国
最后的西域朝圣者
海上朝圣的僧人
两个帝国的兴衰对比
第一部 征服时代
第一章 西汉：突然扩大的世界
失败的开拓
西汉时的西域地理
难以到达的印度
第二章 征服和反抗
针对西域的三种策略
不两属无以自安
和亲的公主
当宝马成为祸患
遥远的国度
第三章 外交时代的纵横家
再建西域都护
艰难腾挪
三通三绝
扩大的视野
海外异草
第四章 海洋时代的前奏
东南亚的客观世界
南大门并入中央政府
更遥远的外国之地
西方眼中的东方世界

第二部 信仰时代
第五章 一千多年前的背包旅行记
古代背包客旅行记
一千多年前的阿富汗
第一次详细的南海记载
法显的印度世界
法显的旅友们
第六章 分裂与信仰
分裂的内亚
万里远征为高僧
佛教东来
佛教化的首都
宋云、惠生历险记
嚈哒、柔然和高车
海上之路
第七章 唐代的信仰旅行和异域想象
大唐僧人上天竺
神秘的《大唐西域记》
玄奘时期的印度世界
文学中的舶来信仰
唐人的异域想象
第八章 传入中国的世界信仰
两个帝国的相遇
苏莱曼和马苏第
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第三部 贸易时代
第九章 从南海到非洲的开拓
远至非洲第一人
唐代对外的七条道路
蜀身毒道和南诏重塑缅甸
唐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
王延德：最后的西域使臣
第十章 贸易立国的王朝
外国人行刺引起的贸易变革
贸易立国
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之争
从丝绸到瓷器

唐宋时期的舶来品
文学中的外贸
西欧苏醒了
第四部 帝国时代
第十一章 帝国的使者们
马可·波罗的世界
前往蒙古的修道士
鲁布鲁克东游记
一位国王出访蒙古纪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
第十二章 海洋时代的冒险家
伊本·白图泰眼中的蒙古与世界
印度抵御蒙古人
鄂多立克东游记
一个中国人的吴哥观察记
第十三章 融入世界的中国人
巴琐玛：中国人欧洲行
汪大渊的海上世界
中国终于落后了
第五部 帝国依旧，中央已失
第十四章 利玛窦：敲开封闭之门
获得南方的立足点
传教士进军北京
解开契丹和“蛮子”的谜团
第十五章 对外关系变形记
帖木儿宫廷的使者们
被死亡解除的东征计划
中国与中亚的新均衡
赚钱的外交团
第十六章 郑和下西洋：官方垄断的高潮
陈祖义事件：明初的对外干涉
代表秩序的大舰队
下西洋时期的世界
逝于中国的外国国王
第十七章 明末开关：最后的回光返照
佛郎机进入亚洲
第一次致命接触

封疆大吏之死：对外贸易的胜利
隆庆开关与西荷到来
第十八章 重归闭关之路
“弃文从武”的传教士
西方人眼中的明清换代
逃不脱衰亡的事业
前往欧洲的中国人
第十九章 敲不开的大门
贸易与叩头
小斯当东的选择题
两个帝国的相遇
受阻的俄国使者
尾声
丝绸之路大事年表
后记
参考书目

致梦舞君

这是我们共同完成的第一本书

依然记得你抱病批阅草稿时的辛劳

你认真地订正着每一个字词

因你的意见才有了本书的终稿

楔子 一个僧人踢开的百年外交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一位汉地的僧人从大唐都城长安出发，开始了一场穿越万里的大冒险。这位叫作玄奘的僧人从长安出发后，躲避着官府的堵截，经过河西走廊、瓜州，九死一生穿越了大戈壁北上高昌，在那儿得到了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

逗留之后，麴文泰送给玄奘许多金银物资，并派人护送玄奘一路进入现代的新疆境内，到达位于中亚素叶城[1]的西突厥叶护可汗[2]处。叶护可汗又担负起接下来的行程，派人将玄奘一路护送，南下穿越了如今的中亚地区，直达位于现代阿富汗境内的迦毕试国[3]。之后，迦毕试国派人与玄奘继续随行，将他送入了北印度，到这时，一路上的护送才告结束。

玄奘进入印度后，穿越了如今的巴基斯坦北部、印度的西北部和北部，最后到达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那烂陀寺，开始了在印度的学习经历。

这一段历史是国人无比熟悉的，也创造了西天取经的神话。然而，即便是熟悉的历史之中，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节。

人们通常认为，玄奘的旅行只是一个宗教事件，或者一个文化交流事件，却忽略了玄奘旅行的另一面：正是他，一不小心踢开了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国际大外交活动。这场大外交以大唐和印度的相互试探开场，伴随着尼婆罗（今尼泊尔）、吐蕃、东南亚海岛等地的卷入，却以强势崛起的“第三者”阿拉伯人占据中亚作为结局，在中国古代地理认知的最

大宽度上，见证了三个巨大帝国的起起落落。为了理解这场外交运动，还需要回到原点，从那位僧人开始述说。

在玄奘私自前往印度的同时，一场不经意的外交试探，让唐太宗在玄奘还没有回国时，就知道了这个身在佛境的东土僧人……

戒日王遣使

玄奘还在印度活动时，整个北印度恰好进入了印度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统治北印度的戒日王也被认为是笈多王朝之后最著名的国王。

在世界史上，亚洲两个巨型帝国印度和中国通常是作为两极存在的，然而两者又截然不同。其中中国在200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统一的，而印度却相反，大部分时间内都分裂成众多的小国。

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印度是分裂的，但在它的古代史上也出现了三大古代王朝（帝国），在这三大王朝期间，印度的大部分领土都被纳入了统一皇权之下。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孔雀王朝，这个王朝在时间上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和秦汉早期，孔雀王朝在著名的阿育王的统治下皈依了佛家，促进了佛教在印度的繁荣。孔雀王朝崩溃后，一个外来的民族贵霜（与曾经居住在中国西北部的大月氏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占据了印度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超强王朝——贵霜王朝，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人从人种上说并不属于印度人，但在文化上继承了对佛教的尊崇，深受印度本土文明的影响。[4]贵霜王朝衰落后，则出现了使印度教迅速发展的笈多王朝，也是印度文化的最高峰，时间在中国的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另一个著名僧人——东晋的法显去往印度时，就见证了这个辉煌王朝。

玄奘去印度时，笈多王朝也已经衰落了。但另一个著名的国王却和这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戒日王（本名曷利沙·伐弹那，号尸罗逸多）从世系上来说，是笈多王朝公主的孙子。[5]笈多王朝末年，中亚的一支游牧民族“白匈奴”（嚈哒）进攻印度，强大的笈多王朝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小王国。在诸多小王国中，有一个叫塔内萨尔（Thanesar）的小王国盘踞在以现代德里为中心的区域内。公元606年，由于兄长的去世，年轻的戒日王继承了王位，他一生中南征北战，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靠东的曲女城，并将北印度在名义上统一起来，这也进入了古代印度的回光返照时期。

戒日王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不如说是一个“帝国”。在庞大的疆域内，是许多各行其是的小国家，他们都愿意承认戒日王的首领地位，却又独立行使统治权。但戒日王的威望又很大，影响力足以达到印度南部很远，以及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让自己超乎于其他国王之上，每次出行，都要带上数百面金鼓，走一步敲一下，号称节步鼓。[6]

戒日王除了令人称道的武功，在文学上也颇有造诣，他写过若干剧本，同时更尊重学者，将笈多时期的优良传统延续了下来。他本人和他的国家一样都信奉印度教的湿婆神，但他性格宽厚，对所有宗教都很尊重，甚至有些偏袒佛教。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秋末，戒日王见到了玄奘。对玄奘的学识感到震惊的同时，国王对于大唐这个东方的大国更是充满了好奇心，他几乎是立刻决定派人前往大唐，[7]打探一下虚实，看这位中土的和尚言行是否有所夸大。

决定派遣使者之后，接下来国王和使者面临的问题是：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再绕行中亚，最后到达印度，在路上一共花了三年时光。印度的使者如果也走这条路，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唐朝的土地，一路上，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玄奘虽然被高昌、西突厥和迦毕试一路护送过来，但不管在戈壁，还是在北印度期间，也都遭遇过极大

的危险。印度使者如果得不到这些国家的配合，那么去大唐将更加麻烦。是否有其他路径能够连接起两个庞大的帝国呢？

恰好这时，一个新兴国家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

吐蕃王朝

根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族人来自一个叫雅砻的部落，最早的王叫聂赤赞普，是天神的儿子，之后经过了天赤七王、上丁二王、中烈六王、地德八王、下赞三王，一共27代王约500年的统治，到了第28代拉托托日宁协[8]时，佛教第一次传入了吐蕃，又经过了四代约110年，到了朗日松赞时代，雅砻部落在赞普（国王）的领导下，灭亡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苏毗。著名的松赞干布，就是朗日松赞的儿子。[9]

这些传说诸王虽然无法一一验证，但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已经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强权。之前，除了建立吐蕃的雅砻部落，在西藏北方还有苏毗人，西方还有象雄人。[10]至今，在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还有不少的象雄遗址[11]。到了松赞干布时代，吐蕃（雅砻）人已经从位于现代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谷地出发，征服了苏毗、象雄，成了广大藏域的主人。

根据史书，松赞干布[12]出生于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义宁元年），13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新的赞普。在他当政期间，吐蕃进行了大量的改革，除了统一藏域，还迁都拉萨，创造了文字，并进行了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改革，将吐蕃从部落变成了一个集权式的国家。

对现代西藏人而言，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松赞干布的两次婚姻。他首先从尼婆罗迎娶了尺尊公主[13]，又从汉地迎娶了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表明了吐蕃的身份：夹在南方印度（包括今天的尼泊尔）和北方汉地之间的强权。

但这两次娶亲与其说是友好，不如说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和权衡。以尼婆罗为例，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14]前往尼婆罗求婚时，尼婆罗人并不愿意。直到吐蕃威胁发兵5万摧毁尼婆罗，对方才不得不同意出嫁女儿。[15]尺尊公主出嫁不久，尼婆罗发生了内乱，老国王被弟弟杀害，王子那陵提婆逃亡到吐蕃接受庇护，在吐蕃军队的护送下夺回了政权，[16]从此以后，尼婆罗成了吐蕃的附庸。尼婆罗的归附，意味着从吐蕃到印度通道的畅通。尼婆罗在文化和政治上一直受印度的影响，这条路的畅通，也为吐蕃最终皈依佛教创造了条件。

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的婚姻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公元634年（贞观八年），玄奘已经在印度游历时，唐朝的宫廷里也第一次迎来了吐蕃的使者，唐太宗随即派遣了一位叫冯德遐的人跟着去往吐蕃抚慰。在两个文明的第一次交往中，双方往往都带着一定的优越感，当松赞干布听说游牧民族的突厥和吐谷浑等都有过娶唐朝宗室女子的经历，决定派人去下聘礼，但这一次，唐朝拒绝了。

松赞干布大怒，认为是横亘在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吐谷浑在挑拨，攻打了吐谷浑，随后又进攻唐朝的边疆，被唐朝的三路大军击败。

这时，松赞干布才放下了傲慢的架子，派遣使者谢罪的同时，又派他的大论（国相）禄东赞（噶尔·东赞）到长安再次请求联姻，这一次，唐太宗选择了一位宗室女子，封为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这位女子就是文成公主。[17]

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正式上路，在著名将领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文成公主经由青海前往拉萨。在如今的青海和西藏之间，靠近东部还有一条专门的道路叫唐蕃古道，这条路从西安出发，经过青海省西宁，在西宁西部翻越日月山进入青藏高原，再向南经过共和、玛多、称多、玉树等地，进入藏区。[18]这条路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曾经是文成公主入藏时行走的路线，以后又成为沟通唐朝和吐蕃的交通要道。

当公主到了黄河源头附近的柏海，也就是现在黄河上游附近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时（这里现在还属于青海省境内），公主一行扎营等待，松赞干布亲自从拉萨出发，来到了数千里之外迎接公主。[19]他见到江夏王李道宗，用女婿对岳丈的礼节拜见。当文成公主到达拉萨，松赞干布在这座建立不久的小城里为她修宫建庙，一股“华风”开始成为当地的潮流。

吐蕃-尼婆罗道的开通

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经历暂且不表，且说就在松赞干布迎亲之时，从印度来了一批戒日王的使者，他们正要前往唐朝。

这些使者可能是前一年末出发，第二年就完成了使命，带着唐朝的使者一同返回了印度。从时间上看，印度使者走的不可能是玄奘的西道，只可能是经过拉萨，再经由刚刚开通的唐蕃古道前往长安。甚至有另一种可能性，当印度的使者来到了热闹非凡、张罗着迎亲的拉萨，或者到达柏海时，就碰到了护送文成公主的唐朝使者，唐朝的护亲队伍临时推选了一个人作为使节，跟着印度使者回到了戒日帝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带回了唐朝使节。

跟随印度使者前往戒日帝国的唐朝使节叫梁怀璥，官职为云骑尉。[20]唐朝使者这么快出现在戒日帝国首都曲女城，不仅让人民感到吃惊，而且连戒日王都没有想到。他询问大臣以前是否有来自摩诃震旦（即中国）的使者到访本国，大臣们回答没有。戒日王于是决定出城迎接使者，按照唐朝人的记载，戒日王采取了“膜拜”接受诏书的礼节，将诏书顶在了头上。

虽然两个遥远国家之间是否有一方会主动称臣，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但由于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唐朝一方的记载，我们只能权且接受这种说法。

历史也没有记载梁怀璥是否与玄奘相遇，但梁怀璥到达的这一年，恰好是玄奘在印度最为风光的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办了“无遮大会”[21]，将玄奘访印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第二年初，玄奘就离开了印度，继续顺着他来时的路线，经过西域向大唐进发。[22]他之所以选择继续从西域这条遥远的道路，而并非从尼婆罗新开辟的近路走，可能与他和高昌王麴文泰的约定有关，[23]麴文泰在玄奘去印度时帮助过他，并希望他在回程路过高昌时，将佛法带到这座西域小城。

梁怀璥成功完成外交使命后，带着印度的使者再次回到了大唐。唐太宗见到印度使者后，再次派出团队前往印度，此时，已经是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

这次出使的主使是卫尉丞李义表，随行共22人。而在后世看来，更加著名的反而是团队中的副使王玄策，并由此演出了一场中外关系史上的传奇。

先不说王玄策此后更加传奇的经历，单说李、王使团的出行。使团于公元643年三月出发，到了年底的十二月，就到了戒日王所在的国家。[24]戒日帝国虽然是个新兴的帝国，但它所在的土地却继承了一个更古老的国家的名字：摩揭陀。这就像人们当时生活在大唐，却也将大唐首都所在地称为关中或者秦地，将大唐称为中国，是一样的道理。

使者们去往摩揭陀仍然使用了吐蕃-尼婆罗道，在尼婆罗停留期间，还见到了尼婆罗的傀儡国王那陵提婆。[25]

到达印度后，唐使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游历，这花了他们一整年的时光。当唐使在印度停留时，玄奘已经翻越帕米尔高原，于公元644年三四月间回到了今天新疆地区的于阗[26]，并在这里上书皇帝，请求皇帝原谅他私自前往印度，并等待皇帝的消息。

直到第二年（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获得了皇帝恩

准的他才到达了长安。在玄奘到达长安20天后的正月二十七，李、王使团也到达了印度佛教圣地之一——灵鹫山（也叫耆阇崛山）。

印度北部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和它的北方，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但在菩提迦耶的东面，却突兀地耸立着一列陡峭的山峰，这些山峰如此奇形怪状，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神造之物。更奇怪的是，在这些山峰的中间竟然围着一块平地，这块平地上有一座城市叫王舍城，就是古代摩揭陀国最初的都城。[27]而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佛教的另一个圣地——灵鹫山。

灵鹫山上遍布圣迹，更有佛陀当年说法的地方，这里也是碑塔林立，令使者们触摸到了佛陀灭度千年来的沧桑，他们决定在这里也刻一段铭文[28]。

十几天后的二月十一，他们来到了位于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这里是佛教最大的圣迹，也是佛陀悟道的地方，于是，使者们再次立了一个碑，由团队中一个叫魏才的人书写了碑文。碑文中谈到了此次出访的目的，并附上了碑铭[29]。

这两处石刻虽然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却仍然被视为中国与印度交往的关键性文件。

但由于无法找到这些碑铭，所以对现代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面前：既然缺乏实物证据，到底怎样确认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唐代使节到底有没有经过尼泊尔前往过印度呢？这个问题留在下文解答。

一人救一国

李、王使团大约在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五月回到国内，因为根据史书记载，这时有一个来自印度的使团到来，很可能这个使团是和

归国的唐使一起回来的。[30]

随后，唐太宗再次派出使团前往印度，此次的正使已经变成了王玄策，副使是蒋师仁。这一次出使，让大唐的威望骤然提高。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使团从长安出发，第二年五月，当他们经过尼婆罗前往印度时，却发生了意外。[31]

原来，温文儒雅的戒日王已经去世了，随着他的死亡，北印度陷入了一片混乱，戒日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那伏帝阿罗那顺，他试图乘机攫取统治权，听说唐使来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出兵袭击唐使。

在阿罗那顺的攻击下，这个十几人组成的唐朝使团几乎全军覆没，一路上带的各种物品全部被掠夺。幸运的是，王玄策和蒋师仁逃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尼婆罗，向尼婆罗和吐蕃借兵。

吐蕃出兵千人响应，而尼婆罗则出了七千骑兵。获得了兵马之后的王玄策向印度进军，在茶镈和罗城大战三日，大破敌军，斩首了三千级，溺死在水中的有上万人。阿罗那顺带着残兵逃走，一路上纠集了散兵准备再战，却被蒋师仁俘虏，与他一同被俘或者杀死的还有千余人。

剩下的残兵又聚集在阿罗那顺的妻子旗下，依托于一条叫乾陀卫的江水进行防御，但这一次，又被蒋师仁击败。第二次战役俘虏了阿罗那顺妻儿士兵等1.2万余人，获得牲口3万，投降的城镇共有580所。[32]

王玄策的胜利震惊了整个印度，许多国王都送出礼物，祝贺王玄策的大捷。使团将阿罗那顺等人带回了长安，这件事成了唐朝最远的用兵战例。

可是，这件事在印度并没有记载，到底怎样才能证明王玄策这个人的存在呢？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57年（显庆二年），王玄策第三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33]）奉旨前往印度，他这次的使命是将佛袈裟送往印

度。[34]与他第二次出行的丰功伟绩相比，这次的出行显得轻松和微不足道。但正是这次出使，却让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他存在的证据。

在现在西藏的吉隆县城以北4.5公里的阿瓦呷英山嘴，这里是古代从西藏通往尼泊尔的交通要道，从北方越过附近的宗喀山口，就进入了一条长长的谷地，现在叫吉隆沟。过了吉隆沟，就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进入现代尼泊尔的地界了。

在山嘴附近，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唐碑，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这块碑现在仅存两百多个可辨识的文字，却幸运地保留了标题，以及正文中的“王玄策”这个名字，还有刻碑的年代：显庆三年六月。

这块碑并没有被史书记载，它蛰伏千年之后重新被发现，为王玄策其人提供了物证，也证明了历史上有一条路从唐朝首都长安出发，经过唐蕃古道，在吉隆沟进入尼泊尔和印度。这条古道在一个时期内将连接中印的陆上道路缩短一半以上，成了一条便捷的高速公路。这条路上也曾经发生过血雨腥风，战争、背叛、征服、和平、外交、朝圣，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

回到大唐之后的玄奘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次个人冒险，竟然演变成数个强国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史，并开创了一个时代。但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个情报人员。在公元19和20世纪，许多西方的旅行者虽然名义上是旅行，但实际上都起到了情报人员的作用，当他们去往中亚、西域、非洲等偏僻地区进行旅行时，回到国内写的考察笔记往往成了最高质量的情报，为政府了解世界提供了参考。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终于完成了。[35]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旅行书，但事实上，它也可以起到一份情报书的作用。围绕着玄奘西行，一共有两本纪实性的名著流传了下来，一本是传记性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称《慈恩传》），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玄奘的行程单，而更加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却并不是为了写三藏法师的经历，而是写成了一本地理书，将亲历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进行整理，将它们的山川、地理、道路、民情一一列出，由于唐代对西域和印度缺乏了解，玄奘的书籍就成了中国政府了解西方的最佳资料。

不仅是玄奘，王玄策也写了10卷《中天竺国行记》，[36]这本书虽然已经失传了，但在唐代时，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情报集。

“高速公路”的关闭

当吐蕃-尼婆罗道开通后，不仅中国和印度使节都利用了这条高速通道，就连部分朝圣者也转移到了这里。在近代之前，一个消息的传播速度并不快，新路的开通也并非一蹴而就。

一般而言，一条新道发现后，接踵而至的总是那些旅行者，接着才是商人，最后才是普罗大众。唐代的旅行者主要就是僧人群体，在玄奘开辟了朝圣之旅之后，僧人们前仆后继前往心目中的圣地，按图索骥地穿梭于各个圣迹之间，最后再到那烂陀寺进修一下。但他们最初大都走玄奘的西域道路，直到后来，有人开始尝试新道。

最先尝试新路的朝圣者是僧人玄照。[37]玄照于贞观年中前往印度，他最初也像玄奘一样通过西域前往印度。他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进入新疆，然后跨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再经过铁门进入阿富汗，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这时的印度已经近在咫尺了。

但就在这时，不知何种原因，玄照却突然转向了。人们猜测，最可能的原因是戒日王死后帝国局势混乱[38]，导致玄照受阻于印度的西北方边境上。

玄照只好从阿富汗向东移动，翻越巨大的喀喇昆仑山，进入了西藏

高原，也就是当时的吐蕃。这时的吐蕃恰好处于文成公主时期，她见到了唐朝的僧人后，帮助玄照向南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北印度的阇兰陀国。

但离开了吐蕃之后，由于印度已经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玄照又被贼抓住，他趁贼睡着时逃走，才到达了北印度。

进入北印度之后，由于印度秩序的崩溃，朝圣者举步维艰，经过了四个冬夏，玄照才到达了著名的摩诃菩提寺，而在和平时期，这段行程本来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在菩提伽耶住了4年，又在那烂陀住了3年，再受人供养了3年，这才碰上了王玄策的第三次出访，决定回国。

玄照的归程采取了标准的尼婆罗-吐蕃道，这条路从印度到洛阳只用了5个月，在中古时期可谓神速。

与玄照同行的还有僧人玄恪，他死于印度。另外，贞观末年还有僧人道生选择了吐蕃道，他在去程中经过吐蕃，回程中到达尼婆罗后一病不起，在那里去世了。

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又有僧人玄太和道希各自经过吐蕃前往印度。僧人道方、玄会等，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僧人，也都选择了吐蕃-尼婆罗道。[39]

吐蕃-尼婆罗道本来应该在中国对外交往史特别是中印交往史上享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将两到三年的行程缩短到了只用半年。

但不幸的是，这条路的开通充满了偶然，它的封闭也充满了偶然。就在道路开通11年（公元652年）后，它就开始慢慢地关上了大门。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的儿子唐高宗继位。第二年（永徽元年），吐蕃的松赞干布也去世了。继任赞普的是他未成年的孙子，而权力则落到了禄东赞的手中。

公元652年（永徽三年），由于唐朝接受了吐蕃的敌人吐谷浑的附庸，吐蕃决定对吐谷浑开战。如果说战争在禄东赞掌权时期还是有节制的，那么不久禄东赞死后，唐蕃之间的战争就越打越激烈了。[40]

即便吐蕃-尼婆罗道不是瞬间关闭，随着双方摩擦的升级，通行难度也越来越大，最终被人们放弃了。

到了麟德年间（公元664—665年），玄照第二次前往印度，当他想返回时，却发现尼婆罗-吐蕃道因为吐蕃与大唐的战争已经关闭了。与此同时，玄奘当年开辟的西域道路也出了麻烦，大食国兴起后，已经打到了阿富汗北部，导致道路无法通行。这位出生于东土的僧人最后终老于印度。[41]

哈里发帝国

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大食（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向大唐派来了使者，[42]此时，应当是先知穆罕默德死后的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期。但这次来的使者到底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人们却并不清楚。唐朝对于大食的认识也极其模糊，比如，当时的文献记载大食王叫𢿱密莫末腻，应当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音译，使者还宣称大食已经传了两位国王，经历了34年。

事实上，伊斯兰教国家普遍采用的回历是从公元622年开始计算，到唐永徽二年，一共才过了30年而不是34年。它们在先知之后经历了三个哈里发，而不是两位国王，从这里，表明唐朝对于大食的了解还只是来自道听途说。

关于大食国与唐朝的时间线对比是这样的：

公元622年（武德五年），就在玄奘西行之前五年，一位叫穆罕默德的人逃离了故乡麦加，去了另一座城市麦地那。

八年后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也就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的同一年，从麦地那出发的穆罕默德又征服了故乡麦加，从这时开始，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奇迹出现在了世界上。[43]

伊斯兰教扩张之迅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比之后的蒙古人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继任者也就是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他虽然只在位短短三年，却将阿拉伯半岛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随后，他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所辖的叙利亚的进攻，这场进攻持续了八年，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公元634—644年在位）时，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此时，玄奘仍然在印度，正准备和戒日王的第一次会晤。

继叙利亚之后，大食人对于波斯的征服持续了十几年，到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完全结束，最后一个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Yazdagird）在波斯帝国的东疆、古城木鹿（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附近被杀。此刻，也恰好是大食使者第一次访问唐朝之时。玄奘也已经归国，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已经完成了五年。但没想到，五年后，西方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中记载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他的情报过时了。

总结起来，在玄奘出发之前，在西方世界还没有伊斯兰教的影子。到玄奘归国不久，西方已经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经过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

玄奘所走的从西域前往印度的道路也开始受到大食人的威胁。

最后的波斯王被杀了，但他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这个儿子叫卑路斯，他逃到了一个叫吐火罗的地方（今阿富汗北部），希望在这里继续反抗大食人。[44]

吐火罗在玄奘的书里叫“睹货逻”[45]。今天的阿富汗的中部被一条东西向的山脉分隔，这条山脉叫兴都库什山。兴都库什山北侧，与阿姆河

（Amu Darya）之间，形成了一片较为平坦的土地，现在在这片土地的西端，是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Mazār-e Sharīf），东端则是另一个中型城市昆都士（Kunduz）。

在现代的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是阿富汗北部最重要城市，而在古代世界，马扎里沙里夫却并不出名，反而是它旁边的另一座城市巴尔赫（Balkh）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驿站之一。

如果要从中国经过西域前往印度，巴尔赫和它代表的吐火罗地区几乎是必经之路。玄奘就是从北方的撒马尔罕南下，经过铁门到达吐火罗，再翻越兴都库什山前往印度的。

卑路斯逃到吐火罗之后，意识到仅仅靠这里是无法打败阿拉伯人的，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向遥远的东方帝国大唐求救。

唐高宗收到波斯王子的求救信之后，与大臣们进行了分析，认为吐火罗距离大唐过于遥远，即便派兵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拒绝了。

公元652年到653年，大食大军进攻吐火罗，征服了整个地区。但幸运的是，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时期，大食陷入了内乱，吐火罗又争取到了独立，并把卑路斯接过去建立了统治。[46]

公元661年（龙朔元年）前后，大食人卷土重来，占据了吐火罗。

卑路斯再次向唐朝求援，这时的唐朝行动起来，宣布建立波斯都督府，府衙设在了一个叫疾陵城的地方，位于现在伊朗境内，并宣布卑路斯为都督。

唐朝建立波斯都督府并不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到达了伊朗。事实上，唐朝实行羁縻制度，在事实上管辖不到的地方，为当地的统治者分封一些无用的称号，就好像对方接受了唐朝的官职一样。但事实上对方是独立的。

波斯都督府也并没有给卑路斯带去任何的好处，事实上，大食人很

快占领了这里，将他赶走了。卑路斯继续他的流亡生涯，最后来到了长安，接受了右武卫将军的官职，最终在长安去世。

大食人对吐火罗的征服，掐断了朝圣者的通路，使得人们发现，当吐蕃-尼婆罗道关闭之后，传统的西域道也变得更加困难了。

更麻烦的是，大食人征服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公元8世纪初，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开始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在河中地区有两座千古知名的城市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大食人公元709年（景龙三年）夺取了布哈拉，公元712年（先天元年）征服了撒马尔罕。在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和714年，大食军队甚至接近了位于现代中国新疆境内的喀什噶尔（今喀什），也就是大唐王朝的外围。[47]

此时，唐朝正好处于开元盛世的初期，唐朝的人们享受着盛世带来的满足感，却忽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到达了边界，而通往中亚和印度的道路也几近中断。曾在太宗、高宗时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西北道路上的朝圣者不见了，历史也产生了大片的空白。

最后的西域朝圣者

朝圣者最后的西域记忆由一个叫慧超的僧人所填补。从严格意义上说，慧超并不是中国人，他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48]

慧超的出行时间较晚，在公元8世纪上半期才出发。他回到大唐境内已经是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在这之前，大食人已经开始向印度进军。

他们进攻印度的缘起是这样的：由于大食人的一艘船曾经遭到过印度海盗的袭击，他们以此为借口，公元710年（景云元年）起，伊拉克总督派侄儿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攻占莫克兰，越过俾路支，进攻如今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地区（当时称为信度国）。国王达希尔英勇抵抗，712年（先天元年）被杀，国家沦陷。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大食人又夺取了木尔坦，完成了对信度国的征服。随后，他们停止了进攻，双方进入了休战期。

慧超将信度国称为西天竺国，他到达时，恰好是大食人入侵之后，城市的一半已经毁灭了。另一个叫新头故罗的国家也因为入侵而处于半崩溃状态。

当慧超从犯引国[49]穿越兴都库什山，来到吐火罗国的时候，他看到的更是一片凋敝的景象。吐火罗国的首都叫巴尔赫（慧超称之为缚底耶），已经被大食兵马占领，而原来的国王已经向东逃窜，到了巴达赫尚地区（慧超称之为蒲特山）。吐火罗以西的波斯国已经被大食所征服。波斯国的船队曾经远达整个印度洋，最远到达中国的南海地区，现在却成了大食国的疆土。

吐火罗以北的粟特地区（Sogdiana），也就是河中地区，分布着一些小国，比如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50]虽然各有国王，却都已经臣属于大食国。

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费尔干纳地区，即古代的大宛，慧超称之为跋贺那国。在谷地中，向西流淌的锡尔河（Syr Darya）从中穿过，在锡尔河的南岸和北岸各有一个王管辖，河南岸的王已经臣属于大食，但河北岸的王还属于突厥。在跋贺那国东面还有一个小国叫骨咄[51]，也已经归属于大食，这里也就成了大食国所占据的边界。

在这些国家南面，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地区（即阿富汗与中国接壤的“舌头”部位），还有一个叫胡蜜国的国家，也已经属于大食国，从瓦罕继续东行翻越喀喇昆仑山，就是大唐的势力范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唐与大食已经隔着世界屋脊相望了。

慧超的记载，是唐代西域和平时代的最后一瞥。之后，西域就进入

了连绵战争的节奏，与大食的冲突、与吐蕃的冲突接二连三，唐朝对西域的主导时代永远地过去了。玄奘没有想到，他开辟的道路在仅仅过了一百年之后，就成了一条死路。

当时也没有人知道，“西域”这个概念不是暂时性而是永久性地退出了历史的中心舞台。从唐代直到现代，西域地区都再也没有取得过当年的辉煌，而是永远成了世界闻名的背水洼，虽然后来的人们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但漂亮的词语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从丝绸之路所产生的贸易量是很有限的，同时，西域道路对于外交和政治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在元代时，丝绸之路在和平时期有过复苏，但它的吞吐量还是完全无法与东南部的海运相媲美。

丝绸之路褪色之后，唐代的贸易、外交和朝圣是否就终止了呢？答案是：不仅没有终止，反而更加扩大了。因为，人们发现海路不仅可以弥补陆路的运量，还增加了来往的便捷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更加前进了。

海上朝圣的僧人

公元671年（咸亨二年）一位在唐代名气与玄奘不相上下的僧人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这位僧人叫义净，时年37岁。

义净从位于山东省境内的齐州南下，在扬州停留三个月，度过了夏天，再前往广州，并从这里出发去往印度。与他同行的是一位晋州僧人善行。当年十一月，两位僧人登上了波斯商人的货船，开始了印度之旅。

当顺风时，海上的交通非常迅速，不到两旬，他们就到了室利佛逝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室利佛逝是古代南海

交通的巨型中转港，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声明（语言）。善行由于染了病，从这里折返回到了国内。接下来的路，就只剩下义净一个人前行了。

义净获得了当地王侯的支持，将他送到了末罗瑜国，这里也是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又译“末罗游”“摩罗游”“无来由”等。当义净返回时，这里已经被室利佛逝吞并了。

在末罗瑜停留两个月后，他转向了羯荼国[52]。当年腊月，他再次登船，十几天后，到了裸人国。我们无法考证裸人国的具体位置，但从义净的描述看，这里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这里男人不穿衣服，女人用少量叶子遮体；这里不产铁，但有椰子、槟榔、芭蕉和藤竹；这里的人善用毒器。此外，义净听说从“蜀川”（实际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地区）向西南走，就能到达这里。如果是这样，裸人国就可能位于东南亚的半岛地区。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半岛东南亚在唐朝时已经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区域文明，很难找到不穿衣服的野人了。反而是在一些岛屿，比如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上，还存在这样的原始部族。而该群岛也恰好处于从印度到中国的航道上。

从裸人国继续向西北前行半个月左右，就到了耽摩立底国[53]，这里就是玄奘记录过的区域了，也是东印度的南界。[54]耽摩立底国位于现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那波（Midnapore）的塔姆卢格（Tamlūk）附近，古代时恒河从这里入海，因此也是航海的交通要道和起点（或终点）。两百多年前，东晋僧人法显也是从这里踏上归国行程的。[55]

义净到达的时间是公元673年（咸亨四年）二月初八[56]。在这里，义净遇到了一位玄奘的弟子叫大乘灯，大乘灯也是从南海方向进入印度，说明即便是玄奘的嫡系弟子，也已经放弃了西域道，改走海道了。他们相约从这里经陆路去往那烂陀，有六十几个驿站的路途。在路上，义净得了病，又遭遇了贼，险些无法到达那烂陀。

义净在印度待了十几年，遇到了不少唐土的僧人，比如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人。这也表明，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自助游”团体，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学习，与现在的背包客有不少共通之处。

到公元685年（垂拱元年），义净才又按照原路回到了室利佛逝。与玄奘直接归国不同，之后的义净实际上将室利佛逝当作自己的根据地，他不仅在这里居住多年，而且往返于广州与室利佛逝之间，之后才回到中原。

这种经历让他与玄奘相比具有更多优势，可以将诸多僧人的事迹进行整合，于是就有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唐朝许多前往印度朝圣的僧人，将他们作为一个群像呈现给世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早期僧人大都走西域，之后大唐和印度使节，以及玄照等人所走的吐蕃道兴盛了数年。当这条路关闭后，人们就都改走南海道了。

南海道的繁荣，标志着唐朝和印度的外交高潮已经成为过去，也表明大食人在西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还说明唐朝和吐蕃走向了对抗。然而，南海道却又开创了另一个时期，表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目的从政治变成了商业，它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创了唐朝中后期和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高峰。

两个帝国的兴衰对比

回顾历史，玄奘出发时，中国和西方的大食国都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刚刚经过了南北朝和隋代内乱的土地上，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崛起，而大食国也处于一个宗教理论已经形成，正准备伸出对外探索的触角之时。

玄奘经过西域漫长跋涉到达了印度，中印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唐和

吐蕃之间的结盟，又让大唐、印度和吐蕃之间更紧密的联盟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阿拉伯却必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打出天下，它最初的两大对手是叙利亚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

此时，在南海上，掌握了海运主动权的除了印度，还有更加遥远的波斯人。波斯船队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中国南部的港口，是整个南方海路上名副其实的主人。

但经过了几十年之后，虽然唐帝国还是显得足够强盛，甚至将影响力传到了西域，却从来没有将影响力变为实实在在的疆土，反而是生活状态更加落后的大食国击败了东罗马，获得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又击败了中东的主人波斯，最后进入中亚、印度，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

由于波斯归顺了大食，就连波斯的海上优势，也变成了大食人的海上优势，使伊斯兰教不仅传入了印度，还传到了东南亚。在此之前，东南亚一直是印度和中国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却出现了一个个伊斯兰教的海洋国家。

在中亚，唐帝国先是被吐蕃人夺去了新疆的部分地区，又在怛罗斯[57]败于大食联军，加上“安史之乱”的内乱，不得不退出了对中亚的争夺。从此，中亚的佛教世界逐渐褪色，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当人们谈论明清时期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时，总是认为汉唐时期代表了中国的强盛。实际上，到了唐代，中国已经显示出一定的颓势，它可以整合所谓的中央之国，却无力扩张到中央之国以外的地区去了。那所谓的天可汗，那一直设置到波斯境内的羁縻州，都更像是一种对唐王朝的嘲弄，它的统治者只醉心于这样冠冕堂皇的称号，却缺乏实现它的手段和雄心。宋朝更是变成一个内敛的王朝，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再感兴趣，除了南海的贸易让宋朝必须对海洋世界有所了解，宋朝对于西域已经不再有任何企图，这种态度，让突厥人和蒙古人在中亚有了扩

张的基础。

对中国而言，“中土”之外的土地永远只是别人的土地，它虽然会带来不少的奇技淫巧，却不是人们好奇心的重心所在。对于中土之外的观察永远只是附属性的，不会成为主流。二十四史正史里记载的大都是王侯将相，只是在每本书的最后，会留一点儿篇幅简略记录那些中土之外的地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好奇心、更加注重本土的思维习惯呢？是因为中国文化上的儒教和科举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丧失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是因为中国的集权制度，让皇帝只关注于维持统治而无法去探索新的疆域？

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然是开放式的，没有标准。但一个可能的解答，反而隐藏在中国得天独厚的幸运条件之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学界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出现之前的旧大陆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

与之对比，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非洲，都缺乏如同中国的地理完整性，在历史上充满了分裂倾向，小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支离破碎和战争状态。

正是在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中国人建立了数个富裕的朝代。

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其本土比周边更加富裕的现状，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过于关注本土，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好奇心，也形成了所谓“中央之国”的世界观，更进一步束缚了中国人的脚步，让

我们很少能走出国门，探索世界。

可以说，地理单元的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了幸运，但这种幸运又变成了一种锁链，让中国无法突破旧有的边界，从东亚帝国变成世界性国家。

本书并不打算将读者的思维限定在这样一个可能的范式之中。事实上，它不是一本试图解答问题的书，而是通过阅读古代的记载，对中国人海外探索的过程进行整理，并探讨海外对中国人生活和认识的影响，为读者自己思考结论留下充分的资料。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中国更加需要融入世界，读者可以根据材料自己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对世界的好奇心，从而错过了更大的地理发现和经济发展？在未来，我们能否打破这种幸运带来的锁链，还是又回归到两千年形成的惯性之中，继续在“中央之国”的阴影中徘徊？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加关注于现实，去思考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问题。

注释

[1]又名素叶水城、碎叶城，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8公里处，现代被称为阿克-贝希姆（Ak-Beshim）。

[2]《慈恩传》（全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旧唐书》中称统叶护可汗。

[3]位于今天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

[4]也正因为此，有的人认为贵霜王朝不属于印度朝代，而是外来入侵者建立的政权。

[5]有关戒日王生平，参见［印度］R. C.马宗达、H. 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合著，张澍霖、夏炎德、刘继兴等合译：《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6—186页。

[6]参考《慈恩传》卷五。

[7]戒日王的使者于次年到达，算上路上时间，可能派出于前一年。

[8]又译为拉托托日宁赞、拉托托日年赞、拉托托日赞、佗土度等。——编者注

[9]参见索南竖赞著，刘立干译注：《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8页。

[10]参考《红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

[11]本书作者早年曾经骑车去过位于西藏中部大湖当惹雍错旁的象雄遗址，以及西部的象雄都城穹隆银城遗址。

[12]参见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3页。

[13]又译为赤尊公主、墀尊公主。——编者注

[14]藏族语言文字家、翻译家，藏文创造者。

[15]参考《智者喜宴》，转引自《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

[16]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17]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

[18]古代道路与现代道路在玉树之后分离，现代道路向南汇入川藏北道，而古代道路向东翻越唐古拉山直插那曲以东，由于没有人走，已经不存在了。

[19]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

[20]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21]佛教用语，原指布施僧俗的大会，后来指不分僧俗贵贱，任何人都可以来探讨佛教教义的大会。——编者注

[22]玄奘的回程路线虽然也选择了西域道，但和去印度时的路线相比，在进入阿富汗之后也是有区别的，见本书下文。

[23]参考《慈恩传》。

[24]参见《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25]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26]又作于寘，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一带。——编者注

[27]本书作者对这里进行过考察，参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28]耆阇崛山铭："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其一）道法自然，儒宗随世。安上作礼，移风乐制。发于中土，不同叶裔。释教降此，运于无际。（其二）神力自在，应化无边。或涌于地，或降于天。百亿日月，三千大千。法云共扇，妙理俱宣。（其三）郁乎此山，奇状增多。上飞香云，下临澄波。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经过。存圣迹于危峰，伫遗趾于岩阿。（其四）参差岭嶂，重叠岩廊。铿锵宝铎，馥馧异香。览华山之神踪，勒贞碑于崇岗。驰大唐之淳化，齐天地之久长。（其五）"（《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引《王玄策传》）

[29]摩诃菩提寺碑铭："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犹尚北勒阗颜，东封不到。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愍

其忠款，遐轸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摩诃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观严饰相好，具若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所未见，史籍所未详。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石者也。乃为铭曰：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威棱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斯道场。金刚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模。灵塔壮丽，道树扶疏。历劫不朽，神力焉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引《王玄策传》）

[30]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31]关于王玄策的考证，可以参考法国人列维的《王玄策使印度记》，以及冯承钧的《王玄策事辑》。

[32]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33]亦有人认为他曾经四次出使印度，但有争议，见《王玄策事辑》的讨论。

[34]参见《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35]参考《慈恩传》。

[36]参考《新唐书》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艺文二。

[37]参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38]参考《王玄策事辑》。

[39]参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各自的本传。

[40]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

[41]参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42]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

[43]［美］菲利浦·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2页。

[44]参考《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西域下。

[45]又作睹货罗。——编者注

[46]参见［俄］B. A.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2—389页。

[47]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440—465页。

[48]参考［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49]又名梵衍那国，今阿富汗巴米扬地区。

[50]这些国家被唐代人归为“昭武九姓”，包括康国、安国、曹国、石国（又名石骡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编者注

[51]《大唐西域记》中称珂咄罗国，在今天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东南。——编者注

[52]又译为哥罗国、个罗国，位于今马来西亚吉打州。——编者注

[53]又译为耽摩栗底国、多摩梨帝国。——编者注

[54]参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55]参考《法显传》。

[56]参考《南海寄归内法传》。

[57]又名怛逻斯、呾逻私，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编者注

第一部 征服时代

第一章 西汉：突然扩大的世界

失败的开拓

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1]，一个百余人的汉朝使团在一位郎官的率领下，从首都长安出发，经过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向着西北方向走去。他们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去西域寻找一个叫大月氏的民族。

这位郎官叫张骞，在他出发之前，中国人对于西域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

汉代时期，在北方最大的威胁是一支叫匈奴的游牧民族。匈奴在战国和秦朝时已经成为北方的豪强，与东面的东胡、西面的月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三股蛮族力量。

到了西汉初年，在匈奴的冒顿单于在位时，匈奴吞并了东胡和月氏，并征服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以及旁边的26国，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2]

匈奴统一北方后，立刻成了汉朝的大患。由于汉高祖刘邦决定剪灭异姓王势力，北方的韩王信（西汉诸侯，不是军事家、淮阴侯韩信）担心自己被灭，投奔了匈奴，于是刘邦决定亲征。不想，刘邦的军队被匈奴用诱敌深入的计谋，以四十万骑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的白登山。从白登山向下望去，匈奴骑兵群集，在北方都是黑马，西方全是白马，东方是白面青色马，南方都是棕红色马。七天七夜后，刘邦性命危急，只好贿赂了匈奴的阏氏（相当于王后），在阏氏的说情下，才解了白登之围。[3]

刘邦去世后，匈奴还写了一封信来调戏太后吕雉，表示单于和太后都丧偶了，不如互相照顾。吕雉大怒，却由于实力不足，只能咽下这口气。[4]

为了保持和平，汉朝只能将宗室女子嫁给单于，才换来对方暂时的善意。

到了汉文帝时代，冒顿单于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更加骄傲，不仅继续娶了汉宗室公主，还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在汉朝皇帝之上的。汉文帝写给匈奴的信用的是一尺一寸的木简，而在原为汉朝宦官、后投靠匈奴的谋士中行说的劝说下，老上单于改用了一尺二寸的木简。汉朝书信的措辞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匈奴书信却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到了汉武帝时期，也是匈奴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的儿子）时代，随着汉朝国力的强盛，汉武帝终于不愿意再忍耐了，他决定采取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

但此时，汉武帝对于直接打仗还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在出兵之前[5]，他决定先采取外交手段，实行合纵连横夹击匈奴。

在派出使者之前，汉朝对于西域近乎无知，他们只知道，之前有一个叫月氏的部落曾经称雄于西方，后来被匈奴打败，逃往西域了。如果

能够找到这个部落，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匈奴。

那么，这个月氏部落到底是什么来历，又在哪里呢？

月氏人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所代表的祁连山以北、天山以东地区，位于匈奴势力的西南方。大约在公元前176年（前元四年）之前，月氏突然遭遇了匈奴的攻击。

匈奴之所以进攻月氏人，除了游牧民族的争霸，还与单于的私人恩怨有关。冒顿单于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因为喜欢小儿子，不喜欢他，将他送到了大月氏做人质。为了除掉冒顿，头曼单于等冒顿到达月氏后，发兵攻打月氏，试图让月氏人杀掉冒顿。月氏人也的确按照头曼的预期行动起来，可冒顿却先行一步，乘机逃走了。

后来冒顿杀掉了父亲头曼单于，继承了王位，接着发动了对月氏人的战争，击败月氏后，将月氏王的头砍下来做了酒器。

游牧民族有将对手的头颅砍下来保存头盖骨的习惯，这不一定意味着侮辱，可能只是一种习惯。[6]

月氏人失败后，选择了西迁避开匈奴人的控制区，他们除了一小部分（小月氏）向南进入群山（祁连山），大部分人都向西进入了现在新疆的西北部，位于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

汉代在新疆地区，以天山为界，居住着两种不同的人，在天山以北，是许多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在这些民族中，除了月氏和匈奴，还有一个复杂的族群，人们称之为“塞人”，这种人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典籍，还出现在海外的典籍中。[7]此外，还有一种与匈奴有着相近血缘的乌孙人。

而在天山以南的各片绿洲里，却生活着一种古印欧人，他们可能与伊朗人同源。古代亚欧草原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雅利安人大迁徙。一种称为雅利安人的白人（印欧人）群体从这里向四面迁移，他们一部分进

入印度，成为印度白人的祖先，他们征服了早已在印度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建立了新的国家和种姓制度，并维持了数千年。印度至今依然是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可能是建立了印度河文明的后代）混血和杂居，特别是印度南方皮肤更加黝黑的人们，大都更接近于原始印度人的特征。

雅利安人的另一部分进入了伊朗，成了波斯人的祖先。

中国新疆和中亚也有一部分与波斯人相近的人种保留了下来。在新疆，他们分布在各片绿洲，成了绿洲上的定居人口。在中亚，这部分伊朗种人（即雅利安—伊朗亚种）也一直是河中地区的主要人口，直到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兴起，这些伊朗种人才逐渐被突厥人取代，退入了帕米尔的高山之中，成了现代塔吉克人的祖先。

只是，在张骞出使之前，汉朝人还并不知道天山以南的这些部族和道路，也无法利用这些绿洲。

月氏人为了逃避匈奴，从河西走廊退入了天山以北，将当地的塞人赶走，占据了伊犁河谷，以及位于中亚的楚河河谷一带。这里位于匈奴人的西北方向。

张骞的目的就是要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聚居地，和大月氏人约定从北方和南方共同夹击匈奴，完成复仇。

但这条路也意味着，张骞必须穿过匈奴控制的地界，才能到达位于匈奴西北方的大月氏。

张骞在经过匈奴地界的时候果然遇到了麻烦，他被匈奴人抓住后，送到了军臣单于处。单于表示：月氏在匈奴西北，汉朝怎么能越过匈奴，向月氏遣使呢？如果匈奴穿越汉朝，去和位于汉朝以南的南越勾搭，你们会同意吗？

单于将张骞留在了匈奴达十余年，并没有证据表明匈奴曾经虐待张

骞，反而给他娶妻，还生了孩子。但张骞倔强地将汉节（使节的信物）保留了下来。

十年后，大约是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乘着匈奴把守松懈，张骞终于找到了机会，带着他的人逃走了。他们继续向西，向着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进发。

但不幸的是，在张骞滞留的十年间，西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月氏消失了！

大月氏的消失与一个叫乌孙的部族有关。[8]乌孙最早时也和大月氏一样位于祁连山和敦煌之间，这个部落比较弱小，受制于大月氏。在一次进攻中，乌孙首领难兜靡被大月氏人杀死，他的儿子昆莫率领人民逃到了匈奴的领地避难。

当张骞还在被匈奴羁押时，昆莫已经说服匈奴允许他去报仇，然后出兵将大月氏从伊犁河谷赶走了，从此以后，乌孙占领了伊犁河谷和楚河河谷。在现在新疆西部的天山之中，还有若干条乌孙古道将天山南北两侧沟通起来，成为人们探险的乐园，这些古道就是当年这个部族穿越天山的道路。

大月氏离开了伊犁，又去了哪里呢？

张骞从月氏故地向西南方走，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叫大宛的地方。[9]对当时的汉人来说，大宛犹如一块世外桃源。

在张骞之前，汉朝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有一片土地叫大宛。这里即便到了现在，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带，有一个巨大的盆地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在中亚地区，有着数个较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如果按照富裕程度进行排行，大宛盆地是仅次于河中地区（即粟特的所在地，也就是中亚两条母亲河锡尔河与阿姆河的中间地带）的富庶之地。它由于地理位置封闭，易守难攻，是个良好的居住地。这个地方现在叫费尔干纳谷

地。苏联时代讲究对加盟共和国分而治之，苏联政府就将这片地区分到了三个国家之中，所以现在有乌属费尔干纳、吉属费尔干纳、塔属费尔干纳。但事实上，由于费尔干纳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历史上又有独立的传统，这里对三个国家的离心力都很大，成了一块很难管理的土地。

汉代时，属于伊朗种的大宛人早已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汉代人虽然不知道大宛，但大宛人却听说过大汉，也知道那儿的富裕，只是因为匈奴的阻隔，无法到达。现在大汉的使者不请自来，大宛人自然很高兴。

大宛对张骞的作用，是让他重新确定了大月氏的方位。

原来，在被乌孙击败后，大月氏只好继续向南，经过康居、大宛，向南方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地带逃亡。

如今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有一条界河叫阿姆河，它是中亚的两条母亲河之一。阿姆河以北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河的南面属于阿富汗。在阿富汗境内，阿姆河以南到兴都库什山以北，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山脚地，这里的中心是一个叫巴尔赫（Balkh）的城市。

巴尔赫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从西方的伊朗进入东方的中国、北方的中亚和南方的印度，几乎都要经过这座城市。据说，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公元前334年到前324年，比张骞出使西域早了大约200年），这座城市就已经很有名了。

以巴尔赫为中心的这片地区有着许多名字，在西方，被称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一直打到了中亚和印度境内，但当他死后，中亚和印度都没有保住，希腊人反而在巴尔赫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巴克特里亚，这里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最前沿。

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被人熟知，就是吐火罗。顾名思义，就是吐火罗人居住的地方。那么，什么又是吐火罗人呢？

在八百多年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两个叫吐火罗的地方，第一个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玄奘称之为“睹货逻国故地”（即吐火罗），之所以称为故地，是因为在玄奘时代，这里已经被突厥人占领了。除了这个故地，西域记中还有另一个更奇怪的地方，位于现在的新疆南部，且末以西600余里，那里被玄奘称为“睹货逻国故国”[10]。

“睹货逻国故地”和“睹货逻国故国”之间相距数千里，一个在阿富汗，另一个在新疆，中间隔着巨大的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到底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玄奘并没有说明。

根据后人的推测，作为印欧人种的吐火罗人曾经在新疆的塔里木居住，一度可能到达过河西走廊。但在月氏时代，吐火罗人被迫撤离，向着伊犁河谷和楚河河谷方向移动。随后，月氏人到达伊犁河谷时，吐火罗人再次迁移到了巴克特里亚地区，并永久性地将这里变成了家乡。[11]在塔里木地区还可能有少量的吐火罗人遗留，于是，造成了相隔数千里的两地都有吐火罗人的景象。

吐火罗人也是一个迁移的民族，但历史更多记住的，却是他们位于阿富汗的最后的家乡，并将那儿称为吐火罗。中国对吐火罗还有另一个叫法——大夏。

张骞时代，这片叫吐火罗的土地上除了（吐火罗人到达之前的）原住民和吐火罗人，还有亚历山大大帝带来的希腊人，以及最后到达的月氏人。

月氏人来到阿姆河北岸定居了下来，并征服了阿姆河南岸的吐火罗。张骞到达大宛之后，听说了月氏人的方位。他立刻表示，未来可以请求汉朝赠送给大宛许多财宝，以此要求大宛将他送往月氏。

大宛人立刻答应下来，派人将他送出。在大宛和吐火罗之间还有一片土地，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中亚最重要的土地，位于两条

河流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历史上称为河中地区，两河中心地带还有一条扎拉夫尚河（Zeravshan），这条河周围又被称为粟特地区。此时的粟特地区居住的是伊朗种的居民，也称为粟特人。在张骞时代，这里的定居民族大都称臣于另一个游牧民族：位于更加北方的康居人。

大宛将张骞送到了河中地区，再由康居人将张骞送到了阿姆河北岸的月氏人居住地。张骞从北岸转到了南岸，查看了月氏人的新领地。

他发现，吐火罗是一个富庶的地区，月氏人到达这里后，已经不再怀念位于伊犁河与楚河的故地，更是忘了河西走廊那个更早的故乡，他们也不愿意回去与匈奴作战。更重要的是，由于吐火罗与匈奴并不接壤，其中隔着粟特、大宛、康居、乌孙人，即便想联合，也已经没有进攻基础了。

简单说，在经过了十年的跋涉之后，张骞的使命失败了。

但是，这次失败的使命却又成了一个新的契机，彻底改变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汉帝国的命运。

那么，到底张骞的哪些发现，让中国的命运有了改变呢？

西汉时的西域地理

张骞回程的时候，为了避开匈奴人，采取了另一条线路。在汉代时，从河西走廊穿越新疆到达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走天山北麓，从伊犁进入巴尔喀什湖流域的北道，另一条是走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南道。

北道在现代又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竞逐的地方，南道却要经历一系列的绿洲，这些绿洲上居住的大都是伊朗种人，他们大都采取了定居生活。张骞出使时还不知道南道的存在，但返回时，由于已经从当地人那里了解了西域地理，于是他知道可以从大宛（费尔干纳

谷地）直接进入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并入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且末等绿洲向东，从而避开匈奴人。

不幸的是，南道到了最后，要重新在楼兰附近并入北道，而楼兰已经被匈奴控制住了，由此就卡住了南道的咽喉。张骞到达楼兰附近时，再一次被匈奴人抓住，滞留了一年多，等到军臣单于死后，才找到机会逃回了汉朝。也正因为这一次滞留，张骞反而找到了去程中在匈奴娶的妻子，把她带回了长安。[12]这时已经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去程走北道，回程走南道，让张骞基本上摸清楚了西域的虚实。虽然这里还处于不断的小型变迁之中，但大的格局在整个汉代都没有出现巨变。

总结起来，张骞了解到的汉朝以西是这样的：

首先，匈奴人占据了中国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及河西走廊，直到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它仍然是汉朝最强大的对手，但汉武帝已经开始对匈奴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匈奴人的西面，是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人，他们占据了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谷和中亚的楚河河谷。乌孙人原本是匈奴的附庸，在匈奴的帮助下赶走了月氏人才占据了这里，但随着乌孙的强大，它已经不再甘心充当匈奴的小兄弟，独立性越来越强了。

乌孙的西南面，现在的费尔干纳谷地内，住着定居民族大宛，这些人会耕田，种稻子和麦子，酿造葡萄酒。大宛最重要的特产是一种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马匹，据说它们的汗水是红色的。这种马在汉朝的对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武帝后来为了获取宝马，还对大宛发动了进攻。

大宛以东的山脉就是重要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的河流向西流，再进入西方的沙漠或者咸海之中，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汇入新疆境内的河流，最终消失在楼兰附近的罗布泊。

另外，张骞时代还将一个神话传说发扬光大了。在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黄河的发源地，于是将河水神化了。按照《山海经》里的说法，[13]黄河发源于昆仑山[14]，之后潜入地下，再从葱岭[15]以东冒出来，变成河流注入罗布泊。古人认为罗布泊是个神奇的湖，湖下有个大洞，将黄河水再次吸入地下。黄河水在地下奔腾数千里后，最后再从青海境内的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冒出来，变成了人们所熟知的黄河，一直流到大海。

张骞考察了西域的地形之后，更加证实了这个传说。他亲自见到了罗布泊，由于罗布泊没有出水口，张骞只好相信罗布泊有个大洞，河水潜入地下。他还亲自考察了罗布泊的源头，也就是著名的塔里木河，塔里木河上游有两条重要水源，一条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中的叶尔羌河，另一条是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16]，这两条河流合并成为塔里木河，之后注入罗布泊。[17]

经过西域的考察，黄河水数次潜行的传说仿佛就落实了，直到北魏[18]和隋唐时期[19]，这个传说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昆仑山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天上来到了地上。在汉代之前，人们一直传说有一个昆仑仙山，战国时期的一部小说中写到，周代的周穆王（西周第五位君主，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曾经周游世界，到达过昆仑山，在那儿和西王母喝酒。[20]根据传说，昆仑山的另一个特征是黄河的发源地。但传说中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却并没有人知道。这一次，既然张骞确定了黄河发源地是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汉武帝就决定把塔里木河源头（其实是塔里木河的支流和田河的上游）、在西域南部的一列高山命名为昆仑山，久而久之，昆仑山就从神话落到了实处，直到现在，人们虽然已经知道黄河并不发源于此，却仍然把这列位于西藏和新疆交界处的高山称为昆仑山。[21]

在大宛的西北面（乌孙的西面），是另一个叫康居的游牧民族建立

的国家，它的风俗与大月氏相近，位置大约在现在锡尔河的北岸、咸海以东。在张骞时代，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主要是撒马尔罕地区和布哈拉地区）也是臣属于康居的。康居本身是游牧民族，但粟特地区的定居人口也从属于康居。康居对粟特地区而言算是大国，可是国力比大宛小一些，夹在了大月氏和匈奴之间，采取了两头讨好的政策，既承认匈奴，也承认大月氏的领导地位。

在康居的西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奄蔡，也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奄蔡的地理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咸海沿岸，在南宋时期，这里属于一个叫花剌子模的国家。奄蔡并不在张骞途经的路线上，他只是道听途说，奄蔡在后来与中国的联系也并不密切。

除了大宛、康居、乌孙、奄蔡这几个中亚国家，接着就是占据了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了。阿姆河在汉代被称为妫水。张骞时期，大月氏的主体还在阿姆河以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南方是被称作大夏的吐火罗。大夏人口很多，但不善于打仗，首都在现在的巴尔赫，《史记》中称之为蓝市城。大夏人从属于大月氏，却并非同一个人种。

大夏是张骞到达的最远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听说了不少国家，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就构成了汉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最远端。

如果改用世界坐标系，那么，张骞了解到的西方世界是一个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或者“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世界。

事实上，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地来到了中亚和阿富汗地区。早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世纪，位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东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在此时期迅速崛起，它武力强大，征服了古希腊地区，却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西方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马其顿主导的时期。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方的波斯、埃及和印度发起了远征。[22]之前，亚洲的霸主是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曾

经数次入侵希腊（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进攻，可以看作西方帝国对东方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行军中，亚历山大相继征服了位于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挥师南下征服了埃及，并到达了沙漠深处的绿洲锡瓦。之后他继续东进，灭亡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烧毁了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这座城市的遗址至今仍然屹立在伊朗高原上，诉说着当年的战争灾难。

虽然灭亡了波斯帝国，但亚历山大显然也低估了世界的广阔。他最初的目标是击败波斯，但灭亡了波斯之后，却发现在波斯的背后（东方）还有那么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他继续东进，进入了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吐火罗），以及中亚的河中地区（粟特）。后来又挥师南下，翻越了位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从古代著名的开伯尔山口进入了西北印度（现代的巴基斯坦境内），但由于军队的哗变而终止。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回师后不久就去世了，其身后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也随即解体。解体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成了许多小政权，大都是由马其顿人（广义的希腊人）控制的，政权形式也是希腊化的，这就将希腊文化和制度传遍了这些地区，所谓希腊化时期就指的是从亚历山大去世到罗马崛起这两百多年的时光。

汉帝国和西方帝国在中亚的存在仿佛是一种东西方关系的预演。中亚地区距离东方更近，但西方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反而比汉帝国提前两百年率兵到来，并且在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长期政权。这种关系恰好说明，中亚虽然距离中国更近，却由于有着沙漠和高山的天然屏障，使中国人前往中亚并不容易，反而是西方世界更容易侵入这里，只要它们从南方借道波斯，或者从北方借道俄罗斯，就可以进入中亚了。地理上的封闭性，是中国文化中天生具有内敛性的原因之一。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中亚地区又变成了许多波斯人的小国。在阿

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火种保留得最长久，建立了一个由希腊人控制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一直存续到大月氏人迁徙到这里之前不久，可能是被比大月氏人先一步到达的塞人或者吐火罗人灭亡的，吐火罗人随即又被大月氏人征服。[23]

而在原本波斯的土地上，一个游牧民族却乘机夺取了政权。这个新的政权叫帕提亚帝国，被中国人称为安息。在伊朗，人们经常提到的古代波斯人的帝国有两个，分别是古代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被亚历山大所灭），以及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在这两个帝国之间，还存在过一个国家就是帕提亚帝国，但这个帝国在伊朗本土很少被提及，这是因为它是由一支叫帕提亚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波斯之后建立起来的。

帕提亚帝国虽然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历史上却很强大。它不仅是从希腊化的废墟中重建，而且到了罗马共和国时代，著名的“罗马三巨头”之一——将军克拉苏，就是死在了进攻帕提亚的战争之中。克拉苏被帕提亚击败于公元前53年，已经是张骞出使西域八十多年之后了。

张骞的记述中提到安息是一个大国。而在安息的远方，还有两个国家被张骞提到，他们都是西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遗存。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国家分成了三个主要部分，分别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位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又称塞琉西王国），以及位于欧洲的安提柯王国（又称马其顿王国）。欧洲的王国由于离亚洲较远，消息传不到中国，但剩下两个王国却被张骞听说了。[24]

张骞时代，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被称为黎轩，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被称为条支[25]。张骞对这两国的印象是，它们都有一种巨大的鸟类，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鸵鸟；另外，两国人都善于表演杂技。[26]

难以到达的印度

在张骞的记述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叫“身毒”，现在我们称这个国家为印度。张骞并没有去印度，却因为在大夏的一件物品，对印度印象深刻。

他在大夏时，看到了一件产自蜀地（今四川省）邛崃山的竹杖。在西汉时期，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偏远地带。现代人们要进入四川可以有许多路选择，既可以从陕西，也可以从甘肃、湖北、湖南等地，但在汉代要想从中原去往四川，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先到长安，再前往长安西面的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从那儿有一条路到汉中，从汉中向南，过剑门关，走一条遥远又艰辛的道路，人们称之为蜀道（最早开通且最重要的一条称“金牛道”），才能到达四川。[27]那么，如此遥远的四川的物产，怎么会出现在更加遥远的大夏呢？

当地的原住民告诉他，这件竹杖是从东南面的身毒运过来的，身毒是一个热带国家，人民喜欢乘坐大象打仗。

张骞计算，大夏距离汉地西南方1.2万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方数千里，这样算下来，应该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从蜀地前往身毒，并且不算太远。

从汉地经过西域到大夏实在太难走了，如果能发现一条好走一点儿的从蜀地到身毒再到大夏的路，就可以取代西域道。

张骞没有到达身毒，这使他和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失之交臂。在当时，印度已经是佛教的天下。据文献记载，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印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的孔雀王朝时期，将佛教立为国教，并传播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东南部，却没有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兴都库什山以南，人们信奉的是佛教，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由于是希腊人建立的王国，信奉的是希腊教，巴克特里亚王国被大月氏人取代之后，佛教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这里。

如果张骞能够越过兴都库什山，就可能遇到佛教，从而让中国接触

印度佛教的历史提前一两百年。张骞时代，孔雀王朝刚刚灭亡（公元前184年）不久。在张骞走后，贵霜王朝时期，佛教才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进入了中亚，更有了进入汉地的基础。

张骞的一切目的都是外交与合纵连横。当他回到长安，也是从外交的角度，请皇帝考虑打通从四川前往印度的通道，这件事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

汉武帝听了汇报，决定派人从西南方寻找前往印度的通路，让张骞负责此事。由于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张骞采取了广撒网的做法，以蜀地的犍为（大约在现在的四川省宜宾市一带）为中心，派遣了四路使者去寻找通路。

这四路分别是：从駹地出发，从冉地[28]出发，从徙地出发，从邛地和僰地出发。駹地、冉地在成都西北的茂县、汶川一带，徙地在成都以南的汉源一带，邛地和僰地位于四川南部及云南北部。

四路使者出发了一两千里，却都受到了阻挡。北面的使者被堵在了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羌地，无法通行。根据现代的地理可以知道，四川向西就进入了青藏高原的地界，在汉代是没有条件穿越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的，这一条路显然不通。

向南的使者则进入了现在的云南省境内。但在汉代，这里也并不好走，使者在“昆明”受到了阻隔。汉代时“昆明”这个词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当时并不指现在的昆明市，而是指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的交界地区居住的一个少数民族。汉代使者在这里曾多次被当地昆明人杀害，于是这条路也没有走通。[29]

不过，汉朝并非毫无收获，因为这些探索将西南夷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纳入了汉朝的视野。

战国之前，西南的云南地区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土著文化。[30]但它进入中原视野，还是从楚威王时将军庄蹻的进军开始。[31]庄蹻是

楚庄王的苗裔（后代子孙），他率军顺长江而上，经过重庆，到达了滇池。他征服了周边的部落，获得了数千里的富饶土地，于是准备回楚国报告这个消息。但当他回国时，恰好是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此时的王位已经移交给了楚威王的孙子顷襄王。这一年，秦国大将司马错从巴蜀出发，攻克了楚国的黔中郡，[32]这就隔断了云南地区与楚国首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的交通联系。庄蹻只好回到了滇池，在这里他受到众人拥戴，于是他改换了服饰，自称滇王。

秦朝时，在滇国的东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云南昭通一带，开通了一条小小的栈道，称为五尺道。这表明滇国已经和秦朝有了一定的隶属关系。但秦朝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控制滇国，就灭亡了。

汉代建立后，一直没有重视西南夷。直到汉武帝上台之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张骞滞留在匈奴时，由于闽越（今福建省一带）进犯南越（今广东省一带），汉武帝发动了对闽越的战争。大行令王恢派遣了一位官员唐蒙前往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地才产的枸酱，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得到的，这才知道，从蜀地到南越有一条通路，经过一条叫牂牁江的江水进入珠江水系，可以直达南越。

汉武帝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谁给他提供征服性的建议都会被采纳。唐蒙连忙上报皇帝，请求借此机会探查西南地区。

汉武帝果然大喜，拜唐蒙为郎中将，率领士兵千人，辎重万余人，前往牂牁江探访。唐蒙的这次探访发掘出一个位于现在贵州境内的夜郎国，并连哄带骗让夜郎国签订了归属盟约。与此同时，蜀人司马相如也劝说皇帝探查四川西部，同样花费不菲。

获得了对方名义上的归属，接下来就是修路。但汉朝的道路修了十几年，花费了很多金钱，却并没有起到作用。同时，西南夷也理解了汉朝的意图，开始反抗。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尝试之后，汉朝不仅没有控制西南地区，反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此时，汉朝在北方与匈奴的战争也打起来了，西汉的国力不足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汉武帝不得不收缩战线，在公孙弘的劝说下，于公元前125年（元朔四年）战略性地放弃了西南地区。

汉武帝第一次战略放弃西南时，张骞已经从西域回来了。在张骞的劝说下，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33]，汉武帝决定再次派人去西南寻找通路，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分四路寻找西南道路。

其中派往南部的一支使团，是由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率队，他们并没有打着皇帝的旗号，而是装扮成商人。他们来到了滇国之后，滇王尝羌把他们留下，派出了十余人去寻找西道，却仍然没有找到。

使者们回到了长安，为了掩饰寻找道路的失败，反而不断地称赞滇国是个大国，这更加勾起了汉武帝的征服欲。

到了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由于南越国发生了叛乱，武帝决定派兵镇压，有一支军队准备从牂牁江方向进攻南越，却在这条路上被一个叫且兰的小国挡住了去路。汉军在平定南越的同时又将且兰夷平，借以震慑西南夷。

这次震慑的效果是夜郎国投降了汉朝，接受了汉朝的分封。随后，西汉在西南进行了一系列的用兵，灭亡了几个小部落。

到了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军开始对付滇池旁的古滇国，它灭掉了滇国东北方的两个小国劳浪、靡莫，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和滇王同姓，到这时，滇王知道已经没有别的出路，才举国投降了汉朝。

虽然汉朝获得了西南地区国家的归顺，但事实上，滇王和夜郎王都还继续存在，只是接受了汉朝的分封。不管怎样，云南、贵州地区的打开，使得西南地区进入了汉朝的视野。

滇国归顺后，汉武帝继续派遣使者去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仍然以失败告终，还葬送了不少使者的性命。[34]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35]，汉武帝为了报复阻碍汉朝通往印缅的滇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再次发动了进攻，斩首数万人，之后再派出使者，却仍然无法到达印度。

这件事也表明，在西汉时期，从云南到达印度还存在着诸多不便，在中印之间还隔着缅甸密林，以及印度东部的崇山，这里除了当地原住民之间小规模的流动，还不具备商路和外交通路的价值。

汉人想到达印度，必须等待西域或者南海道的开通，才具备可能性。

汉武帝寻找印度通路，征伐西南夷，还给现代的北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汉武帝以对滇国开战需训练水军的名义，在长安开挖了一个巨大的湖，由于针对的是昆明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湖的名字就叫“昆明池”。[36]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修建颐和园时，为了追随汉代的传统，也将这里的湖命名为“昆明湖”。于是，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名字，就和北京的皇家园林联系在了一起。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抵抗匈奴，但这个使命从他到达阿姆河流域，见到这个乐不思蜀的民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幸运的是，他出使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和民族打开了汉朝的视野，从此之后，这个刚刚步入统一的集权大国，就从封闭的东亚国家变成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在这里，就产生了关于不同文明接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或者说一个悖论：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是充满好奇心而又友好的，然而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却表明，不同文明的接触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暴力，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道之后，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充满了血腥和强迫，而西班牙人对于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文明接触事件。

在古代史中，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征服也是充满了杀戮。如果

说，他对波斯的进攻还是为了给希腊报仇，那么征服波斯之后继续向东进攻中亚和印度（这些地区和西方无冤无仇），就只能说是一种征服欲和野心的膨胀了。

文明接触经常以悲剧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功利心和征服欲的人，即便双方在最初接触时带着好感和好奇，但征服欲本身很快就会将双方的不同习俗演变成摩擦乃至战争。只有在战争之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判断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均势，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就必然以征服为结局。

在张骞发现西域时，西汉政权也恰好处于最具有野心的皇帝统治之下。西汉建国时期的战争早已远去，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平，恢复了繁荣富强，此时的皇帝不满足于当一个守成的统治者，渴望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发现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新方向，在他的主导下，这个后来被定义为丝绸之路的地区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时代。

第二章 征服和反抗

针对西域的三种策略

公元前141年（后元三年），西汉的汉景帝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此时，距离西汉建立已经60多年，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足，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没有经历王朝早期困苦的皇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既没有汉高祖的开国功业，也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盛世的不世之功。在历代王朝发展史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对外扩张型或者消耗型的皇帝，他既不知道战争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也不知道人们吃不上饭的滋味，他将社会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希望借助这种繁荣建立属于自己的功绩，而对外扩张就是最好的方向。此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对外扩张的时期并不多，它们大都集中在王朝的这个时期。

汉武帝的对外扩张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南越、闽越和西南夷用兵，在北方最大的敌人是匈奴，西汉与匈奴由此进行了长期的缠斗。而张骞发现的西域恰好在此时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加大了汉武帝的扩张冲动。

张骞本人也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从西域回来后，他首先参加了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此时，汉匈战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从山西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斩杀数千人。[37]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张骞熟悉道路和水源，参加了军事行动，成了引路人。回军后他被封为博望侯。但第二年，张骞跟随李广出战，由于不能按时抵达，导致李广失利，张骞的侯爵身份也被免了。[38]

张骞失势的几年中，汉匈战争继续进行，形势变得对汉朝越来越有利。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连续两次获得大捷，逼迫匈奴撤到漠北地区。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了汉朝，导致匈奴撤出了河西走廊直到罗布泊一带，使这里短暂成为汉匈之间的权力空白区，然后逐渐被汉朝所占据。

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非常显著，之前匈奴占据河西走廊，就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联系阻断了，随着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中国就拥有了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个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都以这四座城市为基础。

这时，失去了侯爵身份的张骞再次出现在汉武帝面前，向后者建议，以河西走廊为基础，进一步征服西域地区。西汉王朝对西域的政策由此确立。那么，张骞向汉武帝提出的具体策略又有哪些呢？

总结起来，西汉王朝最早的西域策略是：在与匈奴作战时期，联合弱小的西域国家，反对匈奴；但当匈奴被击败，暂时撤退后，西汉王朝就从这些弱小西域国家的朋友变成了征服者。

西域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与汉朝离得最近，位于现代新疆地区的绿洲小国，这些国家的大小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绿洲的大小，最小的只有200多人，最大的也只有数万人；另一种是更加遥远的定居大国，由于过于遥远，汉朝很难和他们经常进行实质性的交往，这类国家以安息、大夏等为代表；还有一种是比较远的游牧大国，却由于他们的游牧属性，可能与汉朝发生更多的联动。

根据这三种国家，张骞以及他的后来人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第一，对新疆地区的绿洲小国，这些国家只相当于城市国家，地域面积小，抵御入侵的风险能力弱，同时又靠近汉朝，是需要通过武力控制的国家。

第二，对大宛、大夏和安息这三个距离遥远的定居国家，它们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采取了农耕模式，物产丰富，且许多东西都是汉朝所没有的。但张骞认为，这些国家还有另一个特点：兵力弱，又贪财。[39]汉朝应该采取措施，让它们从表面上依附于汉朝，并向汉朝进贡一些“奇技淫巧”，以满足皇帝的欲望。[40]

第三，对大月氏和康居、乌孙这样的游牧强国，出于对抗匈奴人的需要，应当采取赠予财物甚至联姻的方法，控制他们为汉朝服务。

帮助汉武帝确立了战略之后，张骞又进行了一次西域的出使活动，这次他的身份是中郎将，时间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到前116年（元鼎元年）之间。[41]这一次，他率领三百人出使游牧民族的乌孙，希望与之联合抗击匈奴。乌孙曾经是匈奴的盟友，但张骞第二次出使时，乌孙人已经有了与匈奴分庭抗礼的趋势。而匈奴的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位于河西走廊以西、新疆北部的土地空旷无人，张骞希望把乌孙人吸引到这里居住，与汉朝一起挤压匈奴的生存空间。

除了随访的三百人，他们还带了大约六百匹马，数以万计的牛羊，以及价值数千亿五铢钱的金帛等。这三百人中，除了张骞，还有许多人也持有汉节，以便于在路上派往其他国家出使。

张骞到了乌孙后，将汉朝的公主许诺给乌孙，希望乌孙能够迁移到浑邪王故地，但乌孙并没有同意。

他们不同意的原因在于，乌孙王昆莫已经年老，有十几个儿子。他的太子死了，希望长孙岑陬[42]继承王位，但他的另一个儿子大禄却非常强悍，不仅有万余的私人部队，还试图造反夺取王位。昆莫怕儿子大禄把孙子岑陬杀掉，于是把岑陬派到了外地，岑陬也有万余骑兵，同时昆莫还有万余骑兵，这样一个国家就分成了三处。

昆莫即便答应汉朝内迁，也无法得到其他两部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张骞的使命自然无疾而终。

张骞出使失败，却并非毫无收获。虽然对乌孙不得要领，但他派出了副手们前往各个国家出使，这些国家包括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还有位于南道上的于阗、扜罙等。

在这些国家中，除了张骞已经去过的，还有安息、身毒以及去往身毒途中的罽宾等，它们可能都是第一次与中国使者接触。

张骞归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建议皇帝采取的策略却被保留了下来。接下来，汉朝就进入了一个与西域冲突、联合、征服的时代，我们不妨分别叙述这三种类型的国家。

根据《汉书》的说法，[43]汉代认识的西域国家一共36个，后来分裂成50多个，除了张骞提到的那些大国，还有不少位于现在新疆境内的绿洲小国。这些小国又分别位于南北两条西域的主道上，南路是在昆仑山北麓西行到莎车，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去往大月氏和安息，北路是经过车师前国[44]，顺着天山南麓前往疏勒，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往大宛、康居和奄蔡。

而这两条路的起点都必须经过一个叫楼兰的国家，于是，小国楼兰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争夺点……

不两属无以自安

张骞之后，随着对于西域地理知识的增加，汉武帝派出了大量的使团前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最多可以有十几拨人。[45]

这些使者从河西走廊出发后，却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楼兰。楼兰位于罗布泊的西面，在汉代，从敦煌直接北上的道路（玄奘去印度的路）

还没有开通，只有先向西经过楼兰，从楼兰再分成南北两路，走南路是沿着昆仑山北麓去往于阗，走北路则沿天山南麓首先到达车师国，

再沿着罗布泊的源流、塔里木河的支流孔雀河西行，去往乌孙等国家。

那么为什么人们必须经过楼兰？这就和楼兰旁边的大湖罗布泊有关。人类最早开发的道路往往都是沿着水前行的，罗布泊几乎就是南疆地区水的象征。在南疆主要有三条大河，这三条大河最终都汇入罗布泊，第一条是从西方来的塔里木河，这条河最主要的支流是从喀喇昆仑山流出的叶尔羌河，以及从昆仑山中流出的和田河（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汇合形成的主河道）。第二条河是从北方来的孔雀河，这条河现在下游已经断流，但在古代却是罗布泊重要的河流之一，对人类的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条是从南方而来的车尔臣河。

此外，在河西走廊古代还有一个叫冥泽的湖泊[46]，在冥泽和罗布泊之间曾经有一条河相连接，西汉称为籍端水，后世称为冥水，也叫疏勒河。在西汉时，疏勒河已经流不到罗布泊了，但这条古代的河床是指引人们前进的天然通道。

由于这些河流和古河道的存在，从河西走廊前往新疆的天然道路就是：首先顺着疏勒河的古河床前往罗布泊，到了罗布泊和楼兰之后，又可以顺着新疆三条河道前行。

由于塔里木河过于遥远，人们从罗布泊出发前往西域，往往选择孔雀河与车尔臣河，于是围绕着这两条河形成了所谓的西域北道和西域南道。

西域北道沿着孔雀河向北延伸，进入轮台、龟兹（今库车市）、阿克苏等地前往西部。西域南道则顺着车尔臣河前往婼羌（今若羌县）和且末，再前往于阗。这两条路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河流的存在；而河流汇集点就是罗布泊和楼兰的所在地。

楼兰作为交通要道，是一种大幸但也是一种不幸。由于派往西域的汉使太多，每一个汉使都要在这里获得补给，到最后，本来物资就称不上丰富的楼兰已经供应不了这么多外人了。由于地处偏远，国家的生产

力是有限的，很难大规模帮助那些来往的使者。楼兰王因而对汉朝逐渐离心离德并采取了敌对行动，一方面袭击、劫掠汉使王恢等人，另一方面给匈奴人做耳目，希望匈奴人进攻汉人。

除了楼兰，顺孔雀河的北道上还有一个车师国，它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汉武帝如果想继续派人，就必须解决楼兰和车师问题，才有可能获得道路的控制权。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47]，数次为楼兰所苦的王恢劝说汉武帝采取了行动，他告诉汉武帝虽然楼兰有城池保护，但它的军队非常弱小，很容易攻打。汉武帝派出了从骠侯赵破奴率领数万人去袭击车师，顺便解决楼兰问题。王恢由于数次出使西域，熟悉路况，又同楼兰有仇，也跟随着赵破奴前往。

在大部队之前，赵破奴首先带了七百个轻骑兵在前面，袭击了楼兰，将其攻破。大部队到后，再攻破了车师国。此战俘虏了两位国王，两位将军也分别封了侯。[48]

这次进攻使得楼兰不得不投降了汉朝，开始对汉朝进贡。由于过于遥远，汉武帝无力建立直接统治，于是让原来的居民继续自我管理。汉朝出兵换来的是臣服而不是并吞。

楼兰投降汉朝又惹怒了原来的宗主国匈奴，匈奴立刻发兵来攻。楼兰王没有办法，只好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往匈奴做人质，另一个儿子送往汉朝做人质。通过分别送质子的方式，来换取双方的承认。

与此同时，车师国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它的人民选择了让出通道、迁往更北方的方法，避开了汉朝。

事实证明，要想伺候好两个主子是非常困难的，特别两个主子在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伐大宛，从楼兰路过。匈奴人想袭击李广利，却又苦于兵力不足，于是逼迫楼兰协助匈奴截留汉军的殿后部队。不想这件事被汉军

镇守玉门关的部队知道了，报告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下令进攻楼兰，再次俘获了楼兰王，将他带往长安。

汉武帝怒气冲冲质问楼兰王，楼兰王只能回答："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49]

这句话道尽了小国的心酸。在军事上，有一个词叫"四战之地"，指的是非常具有军事价值却又易攻难守的地方。楼兰地处沙漠之中，由于地方贫瘠，养活不了太多人，组织不起强大的军队，却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是各大强权觊觎的对象，因此，从张骞打通西域道路的那一天，它的命运就注定了。

汉武帝也体谅到了楼兰的难处，虽然楼兰王要求迁徙到汉地居住，但汉武帝还是把他放回。这次之后，匈奴人不再亲近楼兰，楼兰虽然两属，却比以前的地位有了改善。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瞄准了逃往北方的车师，派兵进攻。这一次与以前不同的是，楼兰王也被要求出兵协助汉军，这是汉朝第一次从楼兰征兵。之后，当汉武帝出兵西域时，楼兰被迫出兵协助成了常态。

但这还不是楼兰的最后结局。公元前92年（征和元年），老楼兰王去世了，按照长幼秩序，轮到送到汉朝的质子当王。当楼兰人来请王子回去时，汉武帝却支支吾吾不肯遣送回去，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王子，楼兰人还是立别人当王算了。

汉武帝的支吾是有原因的，原来，这个王子由于触犯了汉朝的法律，已经被阉割了。楼兰使者只好回去汇报，让国内另立了国王。

汉朝又叫新国王送来一个儿子当人质，新国王服从了。不想新国王很快也去世了，又牵扯到了立王的问题。这时匈奴人捷足先登，将楼兰送往匈奴的质子送回，成了国王。

汉朝听说楼兰国王又换了，派人通知新国王前去长安入朝。新国王将要动身时，却被他续娶的妻子（也是他之前的继母[50]）拦住了。新王后劝他：先王已经派了两名质子去汉朝了，都没有回来，你还敢去入朝吗？

一句话让新国王醒悟过来，从此也疏远了汉朝。

作为小国，摇摆于两大强权之间的代价是，当你讨好其中一个时候，必然无法同时满足另一个。汉朝不断地要求楼兰向它的使节提供物资，给楼兰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汉朝如果打仗，楼兰还必须出兵。另一方面，匈奴又逼迫楼兰倒向自己。到最后，楼兰又不得不在匈奴的主导下，对汉朝的使者和西域前往汉朝的使者发动了袭击。

这时已是汉昭帝时期，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此时大将军霍光终于决定解决楼兰问题。他派出了一个叫傅介子的人前往楼兰，刺杀了楼兰王。[51]

楼兰王被刺后，汉朝连忙将在长安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尉屠耆送往楼兰，立为国王。

由于尉屠耆在自己国内没有根基，害怕受到伤害，他和汉朝商量了一个办法，楼兰管辖着一片叫伊循城[52]的土地，楼兰将它送给汉朝，请汉朝到伊循城屯田，从这里既可以牵制匈奴，又可以保护新楼兰王的安全。汉朝派遣了一名司马和40名兵丁，管理当地人进行屯田，这是汉朝在西域建立机构的开始。

在汉朝的要求下，楼兰也改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从此倒向了汉朝。

楼兰倒向了汉朝，车师的经历却更加曲折。当汉朝俘虏了车师王之后，它的人民选择了北迁，避开汉朝的锋芒。但事实证明，面对强大的敌人时，躲避永远不是出路。

车师的新首都设在了如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中的交河故城。从楼兰出发后，顺着北道的孔雀河前行，到达的是一个叫焉耆的盆地，这里有一个大湖叫博斯腾湖，也就是孔雀河的发源地。从焉耆继续向西可以到达库尔勒、轮台，以及著名的龟兹。这是汉代时西域北道的正道。

但在孔雀河还没有到达焉耆盆地时，在它的北方有一条荒凉的东西走向的山脉，这就是库鲁克塔格山脉，这条山脉可以看作塔里木盆地的东北沿，和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一同包围着巨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如果从孔雀河畔直接翻越库鲁克塔格山，就到了一个叫库米什的小盆地。这个盆地以北，是一道小一些的山梁，呈西北—东南走向，叫觉罗塔格山，在觉罗塔格山的东北方向，就是著名的吐鲁番盆地。

在汉代，吐鲁番盆地并不在西域北道的正道上，而是处于更加偏北的位置。汉朝势力大都在天山以南活动，车师国退到了吐鲁番盆地，本以为已经避开了汉朝的锋芒，不幸的是，紧跟着车师国的迁移，汉朝也紧随其后来到了这里。原因在于，汉朝人很快发现，吐鲁番盆地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吐鲁番盆地是沟通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如果一个人想去往天山以北，不管是从东面的哈密盆地，还是从西南的焉耆盆地，都必须首先到达吐鲁番盆地。在吐鲁番盆地北面是著名的博格达山，博格达山的西侧，和天山主脉之间有一道缺口，称为白水涧道，这条道通往现在乌鲁木齐所在地，就到了天山以北。

由于天山通道的存在，在汉代，这里是沟通乌孙、匈奴和南疆各地的关键性区域，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因为从这里出发，很容易去进攻西域北道上的焉耆，形成侧翼攻击。同时，由于这里距离匈奴更近，是匈奴重要的屏障，如果被汉朝控制，就成了进军西域的先锋地区。

于是，车师撤到了这里不久，楼兰便投降了汉朝，吐鲁番盆地就成了下一个被汉朝进攻的地方。车师可以说是除匈奴之外，受到汉朝进攻

最多的国家。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首次征召楼兰兵士，与汉军一起进攻车师，这一次汉军无功而返。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派军进攻匈奴，迂回到了车师的北方，与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共同进攻车师，降服了它。

但到了昭帝末年，匈奴又降服了车师。于是汉宣帝继位后，派出五位将军共同进攻匈奴，再次夺回了车师。但汉军撤离后，车师再次倒向了匈奴。

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汉军再次进攻车师，攻克了车师首都交河城，但没有抓住车师国王，当粮食耗尽后，汉军撤离。

第二年，汉军再攻车师，车师王投降汉朝。匈奴到来后，车师王害怕受到报复，逃到了乌孙。汉朝将车师王的妻子送往长安，待遇优厚地供养起来，接见外国使臣时请其登场，以显示大汉的优待。与此同时，汉军发兵三百人在车师屯田，准备持久战。

下一年，匈奴将车师残部召集起来，另立国王，迁往东部，这是车师的第二次“搬家”。

汉军在车师的屯田也进行得不顺利，只过了几年，就在公元前64年（元康二年）放弃了。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投降了汉朝，汉军又一次发动攻击，击败了车师。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下，车师再次成了碎片，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分成了八个国家。在车师国的首都，是一个叫车师前国的国家，而在吐鲁番盆地以北的博格达山北麓，分布着车师后国，以及所谓的“山北六国”[53]。车师分裂后，各个国家时而依靠汉朝，时而投往匈奴，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车师国的消失，让这个碎片化的地区不再对汉朝

构成明显的威胁了。

表1 《汉书》记载的西域国家[54]

名　称	人　口	兵　力	名　称	人　口	兵　力
婼羌国	1 750	500	疏勒国	18 647	2 000
鄯善国（楼兰国）	14 100	2 912	尉头国	2 300	800
且末国	1 610	320	乌孙国	630 000	188 800
小宛国	1 050	200	姑墨国	24 500	4 500
精绝国	3 360	500	温宿国	8 400	1 500
戎卢国	1 610	300	龟兹国	81 317	21 076
扜弥国（扜罙国）	20 040	3 540	乌垒国	1 200	300
渠勒国	2 170	300	渠犁国	1 480	150
于阗国	19 300	2 400	尉犁国	9 600	2 000
皮山国	3 500	500	危须国	4 900	2 000
乌秅国	2 733	740	焉耆国	32 100	6 000

续表

名　称	人　口	兵　力	名　称	人　口	兵　力
西夜国	4 000	1 000	乌贪訾离	231	57
蒲犁国	5 000	2 000	卑陆国	1 387	422
依耐国	670	350	卑陆后国	1 137	350
无雷国	7 000	3 000	郁立师国	1 445	331
难兜国	31 000	8 000	单桓国	194	45
罽宾国	多	强	蒲类国	2 032	799
乌弋山离国	多	强	蒲类后国	1 070	334
安息国	不详	不详	西且弥国	1 926	738
大月氏国	400 000	100 000	东且弥国	1 948	572
康居国	600 000	120 000	劫国	500	115
奄蔡国	不详	十余万	狐胡国	264	45
大宛国	300 000	60 000	山国	5 000	1 000
桃槐国	5 000	1 000	车师前国	6 050	1 865
休循国	1 030	480	车师后国	4 774	1 890
捐毒国	1 100	500	车师都尉国	333	84
莎车国	16 373	3 049	车师后城长国	960	260

共计54国，受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共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都被授予汉朝的官爵，共376人。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等国因为距离遥远，不在统计之内。

在西域，除了几个大国，其余大都是楼兰、车师这样的小国。它们虽然号称“西域三十六国”，但《汉书》一共记载了西域54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小相差巨大，除了几个大国，其余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个村子。人口最少的只有194人（单桓），兵力最少的只有45人（单桓、狐胡）。可见，所谓的西域国家，有许多只是一个绿洲附近形成的居民点而已。它们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只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村庄，只是幸运地占据了一片绿洲和草场，才被当作一个国家对待。

但西域国家中也有一些大国，包括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奄蔡、大宛、乌孙。它们的人口大都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55]是典型的占据了广大土地的大民族。

除了这些大国，小国人口最多的是龟兹（81317人），其他大部分小国的人口都在几百到几千人之间。在西汉政府的西进政策下，到最后，这些国家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对西汉政府的臣服。于是，西汉政府在西域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所辖的国家包括了所有的小国，外加大宛、乌孙两个大国，至于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可能还有奄蔡，由于位置偏远，连隶属关系都不存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区域大致在现代中国边境以内，只有大宛（费尔干纳谷地）、乌孙（首都赤谷城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南面，已经出了现代的中国边境）和奄蔡（花剌子模地区）在国境之外，但它们的情况在后面还会提到。

西域都护府建立的时间是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56]，首任都护是郑吉，最初只是有职无府，后来在乌垒城[57]设立了官府。

在西汉时代，西域都护共有18人。除了特殊情况，可能采取了三年一任的做法。[58]但西域都护府并不是一个容易稳定的机构，这里的人员只有数百人，却必须维持如此庞大的地域，与其说是依靠强力，不如说是依靠外交手腕。一旦外交失控，都护们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

比如，王莽时期的都护但钦，就是由于西汉末年无暇西顾时，西域诸国纷纷重新投靠匈奴，焉耆等国家叛离后攻陷了都护府，将他杀死的。[59]

表2 西域都护表[60]

人　名	任　期
郑吉	地节二年（前68年）—初元元年（前48年）
韩宣	初元元年（前48年）—初元四年（前45年）
佚名	初元四年（前45年）—永光二年（前42年）
佚名	永光二年（前42年）—永光五年（前39年）
佚名	永光五年（前39年）—建昭三年（前36年）
甘延寿	建昭三年（前36年）—竟宁元年（前33年）
段会宗	竟宁元年（前33年）—建始三年（前30年）
廉褒	建始三年（前30年）—河平二年（前27年）
佚名	河平二年（前27年）—阳朔元年（前24年）
韩立	阳朔元年（前24年）—阳朔四年（前21年）
段会宗	阳朔四年（前21年）—鸿嘉三年（前18年）
佚名	鸿嘉三年（前18年）—永始二年（前15年）
郭舜	永始二年（前15年）—元延元年（前12年）
孙建	元延元年（前12年）—元延四年（前9年）
佚名	元延四年（前9年）—建平元年（前6年）
佚名	建平元年（前6年）—建平四年（前3年）
佚名	建平四年（前3年）—元始元年（1年）
但钦	元始元年（1年）—始建国五年（13年）
李崇	天凤三年（16年）—地皇四年（23年）

既然仅仅依靠强力不足以维持对西域的控制，那么另一个策略就是控制几个大国，让它们成为小国的榜样，从而归附汉朝。

其中最大的榜样，就是拥有63万人口和18.88万兵力的乌孙……

和亲的公主

在所有的大国中，位于伊犁河谷与楚河流域的乌孙是距离匈奴和汉朝都最近的一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汉朝能够得到乌孙的帮助，就可以牵制住匈奴的侧翼，形成战略上的优势。

天山是一组庞大的山系，由许多条次级山脉组成，这些山脉大都东西走向，根据南北位置，又可以分为南天山、北天山和中天山。在如今新疆的西部，北天山和中天山之间形成了一个谷地，这个谷地东面狭小，越向西越宽阔，如同一个喇叭，这就是伊犁河谷，是乌孙人的主要领地。这里是水草丰美的草场，也是北方通往中亚（今哈萨克斯坦）的重要通道。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以乌孙为目的地，由于乌孙早期曾经在河西走廊以西、新疆北部活动，张骞希望乌孙东迁回故地，同时将汉朝的公主许诺给他。但乌孙王昆莫拒绝了，乌孙人已经更加习惯于肥沃的伊犁河、楚河河谷。

张骞出使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起到了改变乌孙人认知的作用。乌孙王的使者跟张骞到达长安后，知道汉朝是一个不比匈奴差的大国，与汉朝建立关系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平衡汉朝与匈奴的关系。

乌孙的做法又激怒了匈奴，后者采取了压迫政策，想让乌孙回到之前的依附状态。与此同时，汉朝则展现出友好姿态，加上汉朝的使者在乌孙以南不断地出使西域，就连大宛、月氏等国家也采取了对汉和好的态度，这一切促使乌孙王决定正式与汉朝结盟，以牵制匈奴，避免被匈奴打击。他派使者进贡马匹的同时，请求娶汉朝公主为妻。

根据汉朝的礼节，娶妻必先下聘。乌孙王于是送了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汉武帝寻找了一位宗室女子——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封为公主（后世称为细君公主或乌孙公主），并赏赐了大量礼品作为嫁妆，随嫁的人员就有百人之多，送到了乌孙与昆莫成亲。[61]

在汉朝送公主之前，匈奴企图攻打乌孙，但听说乌孙王娶了汉朝的

公主为妻，立刻改变了政策，也送了一个女儿过来嫁给了乌孙王。这样，乌孙从被两方夹击的被动局面，突然变成了双方的女婿，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匈奴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要求乌孙王立自己的女儿为左夫人，立汉朝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地位在左夫人之下。这表明在乌孙的外交关系中，匈奴仍然是在汉朝之上的。

在中国对外和亲史上，细君公主可能是最悲惨的和亲公主之一。她去往乌孙应不晚于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出嫁时，昆莫已经是个即将入土的老人，出嫁不久，昆莫决定在自己活着时就给妻子找个“下家”，这个“下家”就是他的继承人、孙子岑陬。公主不能接受，连忙写信给汉武帝要求解救，不想汉武帝回信说，公主应该服从于大局，嫁给自己的继孙。[62]

细君公主改嫁给岑陬后不久，昆莫就去世了，细君公主与岑陬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少夫。不幸的是，少夫出生不久，细君公主就去世了，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后人已经不可能知道她的死因，但她的一生仿佛只是为了政治，在乌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起到了一个人质的作用，嫁给了爷孙两代，生了一个女儿，仅此而已。

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为了他的霸业，立刻又选择将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封为公主（后世称为解忧公主），嫁给了岑陬。楚王刘戊是“七国之乱”中的叛乱诸侯之一，汉景帝时期就已经身亡，他的孙女本来是罪人的后代，却由于带着宗室的血统，还是有价值可以利用的，这时被选出来送往了乌孙。

解忧公主嫁给岑陬之后，岑陬似乎也没有活多久。[63]他死后，由于儿子泥靡（其与匈奴夫人所生）年幼，乌孙的王位交给了他的堂弟翁归靡。

翁归靡号称“肥王”，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这个王

后。他和解忧公主生下了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次男万年，三男大乐，长女弟史，次女素光。

这一次，汉武帝的联姻策略终于起到了作用。元贵靡被立为太子，万年后来成了莎车王，大乐当了左大将，弟史成为龟兹王后，素光也成了若呼翕侯（相当于诸侯王）的妻子。

放下解忧公主的孩子们不表，且说到了汉昭帝时，匈奴联合了车师等国大举进攻乌孙，乌孙发精兵抗击的同时，连忙让解忧公主写信给汉朝皇帝求救。

公主的信到来时，汉昭帝已经去世了，于是公主再次给汉宣帝写信催促发兵。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汉朝征召五路大军前往解救乌孙，大军于第二年正月出发，到了五月就已经回军。击败匈奴的同时，也让乌孙彻底倒向了汉朝一边。

但这时，乌孙还是与汉朝并立的兄弟国家，它们的地位更多是平等的，而不是臣属关系。在汉人的世界中，除了中央帝国，其余的一切国家都应该是附属性的，都属于“蛮夷”。与一个“蛮夷”平起平坐，显然不符合汉朝的胃口。恰好这时，乌孙国内的一场纷争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公元前64年（元康二年），解忧公主所生的长子元贵靡到汉朝求亲，汉朝选择了解忧公主弟弟的女儿相夫，准备嫁给元贵靡。送亲的队伍到了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64]才出发，不想走到边界时，乌孙王翁归靡去世了，乌孙人选择的继位者不是元贵靡，而是前任王岑陬的儿子泥靡。

相夫也由此没有被送往乌孙，反而是解忧公主再次改嫁给了泥靡，生下了一个儿子鸱靡。泥靡脾气暴躁，号称“狂王”，解忧公主便对汉朝使者抱怨泥靡，并声称他在乌孙不得人心。

五凤年间（公元前57—前54年），汉朝使者擅自发动兵变，试图在酒会上杀掉泥靡，不想只把他砍伤，泥靡骑马逃走了。

泥靡的儿子细沈瘦将公主和使者都围困在了乌孙首都赤谷城，多亏了首任西域都护郑吉率兵赶到，才解了他们的围。这件事情直接影响了汉朝和乌孙的关系，汉宣帝下令追责，将发动兵变的使者杀死。在调查过程中，车骑将军长史张翁抓着解忧公主的头发大骂，但汉宣帝认为这件事情和公主无关，将张翁杀死了。

既然泥靡没有被杀死，对泥靡还必须予以安抚，汉宣帝还派遣了一名医生张遵去给泥靡看病。张遵将泥靡治好之后，回去反而被施行了宫刑。原来，汉宣帝并不想让泥靡恢复，更希望医生把他治死，又不便明说，才导致张遵遭受了如此荒唐的惩罚。

汉使刺杀事件本来可能对汉乌关系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但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公元前53年（甘露元年），乌孙内部再次发生了对泥靡的行刺，这次的主谋是先王翁归靡与胡人妇女所生的儿子乌就屠，乌就屠杀掉了泥靡，自立为乌孙王。汉朝听说后，立刻派遣1.5万精兵前去声讨乌就屠。

在汉军压境的压力下，乌就屠听从了解忧公主的前侍女，也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冯夫人的建议，选择投降了汉朝。

汉朝于是乘机将乌孙一分为二，设立了两个王，元贵靡称大昆弥，乌就屠称小昆弥。大昆弥统领6万户，小昆弥统领4万户。通过这种方式，汉朝就把乌孙分而治之了，这时乌孙虽然还是汉朝的同盟国，却已经降到了属国的地位，一个大国就这样被降服了。

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元贵靡也去世了，年届七十的解忧公主上书请求回到汉地，汉宣帝同意了。回到长安后，她两边的家都已经不存在了。皇帝赐给她田宅奴婢让她养老，两年后，她在汉地病逝了。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牧民族的土地上度过，见证了一代游牧民族被征服和同化的全过程。

将乌孙拆分成大小昆弥之后，是不是事情就简单了呢？并不是这

样，事实上，乌孙的内斗加剧，反而让汉朝更加殚精竭虑，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出手干预。[65]

大昆弥是汉朝公主的子孙，汉朝自然要多帮持一把，但小昆弥却更受乌孙人的认可，这一点让汉朝忧心忡忡。

汉朝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小昆弥乌就屠去世后，他的儿子拊离继位，但拊离被弟弟日贰杀死了。汉朝遣使者立拊离的儿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逃到了南方，阻断了康居的通道。安日派人以诈降的方式刺杀了日贰。

随后安日也被刺杀，弟弟末振将代替了他。此时，随着小昆弥一系的钩心斗角，大昆弥雌栗靡（元贵靡的孙子）却获得了乌孙人的尊重。

雌栗靡得到了人心，却仍然无法阻挡刀剑，末振将害怕自己的实力受到削弱，派人刺杀了雌栗靡。汉朝中郎将段会宗立雌栗靡的叔父（也是解忧公主的孙子）伊秩靡为大昆弥。就在汉朝想讨伐小昆弥时，汉军还没有行动，大昆弥的手下难栖又杀死了末振将。接替末振将小昆弥之位的是安日的儿子安犁靡。

但小昆弥的内乱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部族中，末振将的弟弟卑爰疐由于参与了刺杀大昆弥的阴谋，担心被追究，带着8万余人叛逃到了康居，想借兵重新兼并两个昆弥。两个昆弥由于担心他的实力，都更加依赖于汉朝。元始年间（公元1—5年），都护孙建终于杀掉了卑爰疐，才解除了两昆弥的警报。

随着乌孙逐渐被汉朝肢解和归顺，新疆北部伊犁河谷这片肥沃的土地第一次成了中原王朝的附属地。到这时，现代新疆除极北地区之外，都出现在了汉人的视野之中。然而，在汉朝与乌孙打交道并逐渐将后者蚕食和肢解时，汉武帝也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的心又跑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将下一个目标瞄向了另一个更加遥远的大国，这个大国已经超出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它就是盛产宝马的大宛。

当宝马成为祸患

在乌孙的南面，位于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交界地带，是张骞最先发现的大国大宛。[66]

大宛虽然也是大国之一，却又不够大，人口30万人，只有乌孙的一半，兵力6万，只有乌孙的1/3。但它的人口又是普通小国的10倍到几十倍。在地理位置上，大宛又不像大月氏、安息那样距离汉朝足够遥远，让武帝无法起吞并之心。地理上紧挨着新疆的费尔干纳谷地是汉军可以到达的地方，于是，大宛就成了汉朝的练兵场。

大宛之所以遭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出产的马匹。

在了解大宛之前，汉武帝认为最好的马匹是来自乌孙的，因此称为“天马”，等他看到大宛的马之后，立刻改变了看法。大宛产一种据称跑起来能够流出红色汗液的宝马，史称“汗血宝马”。汉武帝看到后把“天马”的名号又送给了大宛马，而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

汉朝最重要的军事资源是马匹，历代皇帝都对马匹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汉高祖刚刚建立汉朝时，甚至皇帝出行都凑不够四匹同色的马，将相们只能坐牛车，[67]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让皇帝丢脸的问题，在打仗时还无法满足军事需求。汉初经过休养生息，终于获得了足够的马匹，但汉武帝针对匈奴发动的战争中，却导致大批军马死亡。中国古代作为战略品的马匹数量一直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而汉代的一场战役，所损失的马匹就能接近这个数字。比如，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联军直捣漠北，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一击，两位将军斩杀的匈奴合计有十万人。但此役战死的马匹也有十多万匹。[68]

为了弥补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短时期内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

补贴。

既然张骞发现这里有宝马，这立刻提升了大宛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出使最频繁的国家就是大宛，原因就在于汉武帝喜欢汗血马，不断地要求对方提供。

最初，汉朝的使节在大宛所得到的待遇是和匈奴不一样的，由于当时大部分西域国家仍然属于匈奴，匈奴的使者只要持一封令信就可以通行无阻，并且受到很好的待遇。汉朝的使节却往往被当作商人对待，如果要得到补给，必须出钱购买而且价格不菲。

这些事情长期积累下来，就产生了众多的矛盾。当汉武帝攻克了楼兰和车师之后，随着汉朝实力的增强，矛盾终于爆发了。

冲突的焦点仍然是马匹。在现代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费尔干纳谷地的东端，有一个城市叫奥什（Osh），在汉朝时期，它被称为“贰师”。有人告诉汉武帝，大宛地区最好的马匹出产于贰师。可是，每一次汉武帝要求大宛送马，大宛总是把别的地方的马送来，却不肯贡献贰师的马。

汉武帝听说之后，决定派一位叫车令的壮士，带上千金和一匹黄金做的马，前去交换贰师的宝马。车令到了大宛之后，不仅没有得到宝马，反而送了命。当大宛王表示拒绝交换后，车令一怒之下砸碎了金马，并说了一些过分的话，使大宛王感觉受了羞辱。于是大宛王要求其东部城市郁成（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市，在奥什东北50余公里外）埋伏杀手，等车令返回路上经过这里时截杀他，并抢走他的财物。车令就在这次袭击中被杀死了。

使节被杀的消息传回了长安，汉武帝立刻派遣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领属国的六千兵马，又在郡国招募了数万当地的剽悍之徒，组成军队前去讨伐大宛。由于出兵的最终目标是前往贰师城取得宝马，所以李广利就得了个“贰师将军”的封号。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贰师将军率军出发。[69]出发前，将军从以前出使过西域的使节口中获得了情报，使节声称大宛是一个小国，兵力不多，只要汉军出三千兵马，利用强弩射杀对方的军队，就很容易取得胜利。

汉武帝以前也曾经派七百人进攻楼兰而获胜，他也认为大宛是小国，利用一部分兵力进攻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但事实上，大宛的兵力虽然比不上乌孙等更大型的国家，却几乎是楼兰的20倍。巨大的差距，以及错误的情报，使得汉朝的军队患上了轻敌的毛病。

贰师将军出发后，事情就开始变得不顺利。过了楼兰，他们先沿西域北道前行，经过孔雀河一路向西。数万人的军队需要给养很大，但在经过路上各个小国时，这些小国纷纷紧闭城门，不肯贡献补给。贰师只好命令士兵攻打这些城池，如果能攻克就吃一顿，但万一攻克不下，几天之后汉军缺乏补给，也只能被迫离开。这种方式导致汉军名声扫地的同时，还造成了大量的军士流失。

当他们穿过了新疆，到达了大宛东部的郁成时，情况更糟了，军队就从数万人降到只剩几千人了。郁成是此行惩罚作战的目标之一，因为它曾经攻杀了汉朝使者。但是，这座小城显得非常顽强，不仅坚守城池，还在作战中打败了汉朝军队。

由于作战失败又缺乏补给，贰师将军只好率领军队一路又穿过整个新疆，逃回了汉朝的西大门敦煌。到达敦煌时，人马已经只剩下了百分之一二十。

在敦煌，贰师将军派人向汉武帝汇报失败的经过，并请求暂时罢兵，等以后兵马充足的时候再前往讨伐。汉武帝听了大怒，派人把守住玉门关，下令只要有人敢进入玉门关，立刻抓住斩首。贰师将军只好停留在敦煌，既不敢打仗，也不敢回来。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汉朝与匈奴之间发生冲突，损失了两万多人马。这时公卿们商量是否要在西域收缩战线，全力对付匈奴，而这就意味着要把进攻大宛的部队撤回来。

但汉武帝却认为，在取得胜仗之前不能撤回，否则，会让整个西域轻视大汉。于是，一场为了得到几匹马的小冲突演化成了国家战略。那些劝说撤兵的人也由此被抓了起来。

既然是国家战略，那么成本就已经不是问题了。汉武帝四处征兵，其中将一些二流子也编入了部队，七拼八凑地征集了6万名士兵，10万头牛，3万余匹马，其他牲口还有几万头。在天下骚动之中，大部队出发，指挥部队的校尉达到了50余人。而指挥官还是正在敦煌等候的贰师将军李广利。

从敦煌出发时，由于人数太多，贰师将军意识到如果和上次一样走北道，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供应得起这么庞大的军队，他决定将军队分成几部，分别从南北两道前往。

这一次，由于兵力充足，路上的小国再也不敢和汉军抵抗，纷纷敞开城门，供应补给，只有一个叫仑头的小城市不识抬举，贰师将军下令攻克该城，将市民屠戮殆尽。这里以后成了汉军一个屯驻与屯田的地点，以轮台闻名于历史。

汉军到达郁成，这次郁成也没有抵挡住攻势，城破，城主逃走后被追杀。

当大军西进到大宛都城时，还剩下3万多人，大宛整个国家最大兵力大约有6万，但分散在各处。大宛军队与汉军接战后，战况不利，只好退回城市死守。汉军将大宛城围困了40多天，将水源断掉，又毁掉了它的外城。最后，大宛城内的贵族造了国王的反，将国王杀掉，投降了汉军。

投降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大宛将马匹开列于前，让汉军自行挑选。

贰师将军负责挑选了数十匹上等宝马，再挑了其他等级的马三千余匹。

吃住过后，汉军撤退，临走前从大宛的贵族中选择了一个新国王。这一次贰师将军终于可以回国了，武帝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宝马。但汉军调动产生的财政负担却是沉重的，为了获得数十匹宝马，以及三千余匹其他的马，汉军却调动了6万人、10万头牛和3万余匹马。虽然缺乏具体的损失数字，但根据汉军6万只剩下3万的比例来估算，马匹的损失也应该在1万匹以上，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面子工程。

大宛的新王并没有坐稳位置，老王的弟弟联合其他的贵族杀掉了新王，自己当了国王。汉朝与大宛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表面上，大宛每年向汉朝进贡两匹“天马”，[70]同时在名义上成了汉朝的属国。但事实上，由于距离太远，花费太大，汉武帝也知道不能再组织另一次远征，他采取了贿赂的办法，也就是以赏赐的名义贿赂国王，让他乐于维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国王仍然保持着完整的独立性。但毕竟，大宛已经是汉朝权威能够到达的极限了。

汉朝与大宛关系的建立，也为中央帝国与属国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蓝本。事实上，截至清代的历代政府与海外打交道，往往是一种亏本买卖，也就是用丰厚的赏赐和贸易机会，吸引对方表示臣服。大宛用每年两匹马，换取西汉提供的大量的赏赐。到了明清时期，皇帝的赏赐同样是对方进贡的数倍，也正因为此，几乎所有的小国都争先恐后来中国进贡，使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财政负担，并不时引起一次次灾难。

比如，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和倭寇，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由于进贡产生的矛盾，瓦剌人和日本人为了获取中国物资，过分热衷于进贡（事实上是变相的不平等贸易），导致与明朝产生冲突，并演化为战争。[71]

遥远的国度

除了乌孙和大宛两个大国，其余的大国由于距离遥远，汉武帝鞭长

莫及。但汉朝仍然希望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干涉。

最明显的是位于现代克什米尔地区的罽宾国。

大月氏撤离河西走廊一带时曾经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谷地区，原本有一群塞人居住，大月氏到来后，塞人不得不南下来到了吐火罗人居住的大夏（吐火罗）地区。但不久，大月氏又被乌孙人从北方赶走，让乌孙人永久性占领了伊犁河谷。大月氏人则开始了南下行程，最后也来到了大夏。在大夏的塞人只好再次迁徙，继续向东南方，越过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在这里建立了罽宾国。

与其他更遥远的国家相比，罽宾国与中国仍然容易发生联系。在如今的新疆塔什库尔干，有一条著名的中巴友谊公路（也称喀喇昆仑公路），这条路现在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带的主要载体，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出发，经过崇山峻岭直达中国边界的红其拉甫口岸，再从红其拉甫到达塔什库尔干，翻越西昆仑山到达喀什。[72]

这条路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人们从塔什库尔干进入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地区（也就是难兜国所在地），再走几天就可以到达罽宾。

另外，罽宾也是古代交通的一个重要岔路口，除了通往中国，还可以向南去往身毒（印度）、向西去往安息（波斯）等地区，同样也可以北上大月氏（阿富汗）。不管是法显、玄奘还是后来的马可·波罗、奥雷尔·斯坦因等人都利用过附近的通道来往于周边地区。

罽宾虽然与汉朝有交通，但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由于与汉朝之间隔着著名的关口悬度[73]，汉朝几乎不可能攻克这里，也就无法得到罽宾。正因为这样，国王乌头劳有恃无恐，数次杀死汉朝使节。

但他的儿子称王时，又决定向汉朝派遣使者，赠送礼物。汉朝也派遣使者文忠回访。但文忠到了罽宾后，国王突然又想害死他，文忠察觉后，联合一个叫阴末赴的人进攻罽宾，杀死了国王。阴末赴原本是罽宾

属国的王子，统治着叫容屈的地方，杀死了罽宾国王后，阴末赴就此成了罽宾国王，暂时接受了汉朝的印绶。

不想，汉元帝时期，汉朝使节赵德访问罽宾时，与阴末赴产生了冲突，阴末赴囚禁了赵德，杀死了剩下的七十多人，并派使者带书信来汉朝谢罪。汉元帝意识到罽宾太遥远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法追究，决定放回罽宾的使节，不再交流。

与罽宾类似的国家还有远在河中地区的康居，以及更加遥远的安息。在与汉朝的交流中，康居若即若离，总是扮演着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汉朝征伐大宛时，它企图帮助大宛。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汉朝军队攻打匈奴郅支单于时，康居又袭击了汉朝盟国乌孙，与汉朝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整体上，汉朝有意避开与康居的冲突。

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的安息，是一个位于欧亚中心的大国，其实力不下于汉朝。大约在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或稍后，张骞出使乌孙时，曾经派遣副手前往各国，也到达了安息。为了显示大国地位，安息王米特拉达梯二世[74]派遣了两万名骑兵在边界处迎接汉使。这里距离首都有数千里，一路上经过了数十城，整个国家人口众多。

但是，对于汉武帝而言，安息却只代表着两种事物：第一个是鸵鸟蛋，第二个是变戏法的魔术师。安息曾经将这两样东西带到汉朝，跟随安息使者前来的还有众多的小国，汉武帝对于安息的“忠心”感到非常愉悦。

亚洲的两大强权在蜻蜓点水的接触之后，便停止了进一步的交流。

西汉模式的西域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花费太高、利益太小。由于西域地区过于辽阔，交通不便，不利于人类的交流，使得几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是非常有限的。最重要的中国、印度和波斯之间的通道都还没有打开，甚至中国和中亚也只是零星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皇帝发动的几场战争，几乎不可能对地区

的整合产生推动作用。汉武帝为了少量的马匹、鸵鸟蛋发动的出使和战争也没有收回成本，反而耗费了大量的军费，进而对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这样的局面并非汉朝一方的问题，汉朝对西域北方巨大的匈奴帝国也一直存在心理阴影。匈奴与汉朝的争霸，使得各个国家之间是以武力而不是以信任相联结的。

到了汉武帝末期，他也曾经反思过他的西域政策。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当大臣桑弘羊提议在轮台以东屯田备战时，汉武帝才意识到，西域消耗的军费已经太高了，经过他多年的铺张浪费之后，汉朝的国库和社会已经禁不起折腾了。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又称《轮台罪己诏》），表示要改变政策，不再策动新的战争与兼并，与民休息。[75]

但事实上，改变政策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时期，继续了进取的政策，西汉政权继续以威慑加合纵连横的方式对待西域，并发动过数次大的战争。

直到汉元帝时代，汉朝的政策才真正转向。新的政策是：对西域都护府管辖以内的区域进行维持，但不扩大，同时不再接触那些更加遥远的区域。

但随着西汉的军事政权对于社会的破坏作用，财政和行政上要维持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了，一旦退缩，就会引起正反馈效应，西域国家会自动地反抗汉朝的统治，于是这种统治就进入了土崩瓦解的节奏。

到了西汉末年，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已经衰微到连政府官员都无法获得安全感的程度了。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西域第18任都护但钦被焉耆杀害。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焉耆联合姑墨、尉犁、危须等国袭杀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到王莽死时，李崇也消失在历史中再

无痕迹，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以失败告终。[76]

第三章 外交时代的纵横家

再建西域都护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一位41岁的中年将领崭露头角。

这一年，也是东汉对外关系史上著名的一年。东汉自从建立后，开创者汉光武帝就采取了一种消极无为的做法，在内政上尽量宽大仁厚，在外交上不求扩张，也不多投入武力，甚至西域小国专门来大汉要求提供帮助，皇帝也无动于衷。

对东汉来说，在处理西北关系上比较有利的一点是，匈奴也恰好处于分裂期，分裂成了南匈奴和北匈奴，其中南匈奴投靠了汉朝，只有北匈奴仍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但到了汉明帝时，汉明帝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在担任皇帝16年后，决定对匈奴和西域都采取更为进取的政策。公元73年就成了东汉外交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首先，汉明帝派军队兵分四路进攻北匈奴，这四路大军从东面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直到西面的酒泉塞。其中三路大军都无功而返，但由窦固、耿忠率领的从酒泉塞出发的大军却取得了重大胜利。

窦固大军中首先出天山（当时应指祁连山）攻击匈奴的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又分兵攻克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追到了蒲类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湖）。[77]在战役中，41岁的班超也战功显赫，正是他率领兵马进攻伊吾和蒲类海，斩杀甚丰。[78]

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都必须经过鄯善（楼兰），从鄯善要么顺车尔

臣河南下，经过且末、于阗、莎车、疏勒等绿洲进入新疆西部的山区，再前往大宛（费尔干纳谷地），要么走今天塔什库尔干一带经过帕米尔高原前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另一条路从鄯善顺着孔雀河河谷前行，进入焉耆盆地，或者向北翻越库鲁克塔格山和觉罗塔格山，进入吐鲁番盆地。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发现了一条不用经过楼兰，直接从敦煌向西北穿越戈壁到达哈密盆地，再从哈密盆地向西进入吐鲁番盆地的道路。[79]这条路和现代入疆的道路基本吻合，从甘肃进入新疆的公路和铁路大都选择了这样走。

哈密盆地虽然在新疆的最东部，距离现代甘肃更近，但在西汉之前，这里却是最难到达的地方。西汉时的人们要去往西域，会顺着疏勒河的古代河床、罗布泊、孔雀河前行，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在这条安全道路上，要想去往哈密盆地，需要先从罗布泊绕到吐鲁番盆地，再向东进入与之相连的哈密盆地。之所以必须绕路，是因为在哈密盆地与敦煌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其间只有几处泉水作为补给，而在西汉时期，人们还没有找到穿越这片大戈壁的方法。

但随着几个泉眼的位置被发现，逐渐形成了一条道路，东汉时，人们已经可以借助几处泉水直接北上到达哈密盆地，再从哈密盆地前往吐鲁番盆地，这样就出现了一条不经过罗布泊的道路。走这条路到达哈密，比原来的道路缩短了大约3/4，如果去往吐鲁番，也缩短了大约1/3。

新道的出现，使得原本不重要的哈密盆地（在当时称为伊吾）突然间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哈密盆地的东面和南面是戈壁，北面则是巴里坤山和哈尔里克山，这两列山的背面有一个小型的盆地，盆地内有一个著名的湖泊，称为巴里坤湖，在古代则称为蒲类海。蒲类海所在的盆地以北则是北天山山脉，山脉之外，就是新疆与蒙古国交界的大戈壁了，这里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在汉代时是匈奴人驰骋的疆场。

正因为哈密盆地变得日益重要，窦固才派遣班超从这一条路西进，将伊吾掌握在手中。

由于班超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受到了窦固的器重，窦固决定派遣他和另一位叫郭恂的人一同出使西域，试图恢复与西域的交往。

在东汉时期，位于现在新疆的西域国家已经和西汉时有了不同。由于缺乏大国的制衡，各个小国之间互相进攻与合并，产生了一些较大的国家。

最早称霸的绿洲国家是莎车，在国王贤当政时期，莎车成为一代霸主，贤自称单于，先后攻克了拘弥、子合，把他们的王杀掉换上自己人，又打跑了最东面的鄯善王，杀掉了北道上的龟兹王。莎车的势力甚至超出了新疆地区，直达现在的中亚一带。他杀死过阿姆河流域塞人的国王，兼并了对方的国家，接着进攻大宛并获胜。

在莎车旁边的另一个大国于阗先是被贤所灭，但由于不满贤的暴虐，于阗的人民集结起来造了反，最终战胜并杀死了贤。

莎车之后，在西域南道上，最终形成了于阗和鄯善平分天下的局面。鄯善借助距离汉朝较近的优势成了大国，它将周围的小宛、精绝、戎庐、且末等国家吞并。于阗则吞并了渠勒、皮山，在它的极盛时期，曾经让西域南道从精绝到疏勒的13国都服从它的领导。

在西域北道上的国家大都在吐鲁番盆地内外，这里也展开了激烈的吞并运动，其中车师最大，将郁立、单桓、狐胡、乌贪訾离等国家吞并。

但是，西域上的国家大都是绿洲国家，疆界都是由地理决定的，今天你服从我，明天又重新独立，即便合并，也很难长久，无法形成更加稳定的政治结构。[80]

班超首先到了与汉朝最接近也最友好的鄯善，[81]鄯善王广最初对

汉朝使团很热情，但随后冷淡了下来。班超旁敲侧击从侍奉使者的胡人口中得知，原来匈奴也派了一个使团前来。班超于是秘密召集了36个成员商议，决定用武力解决匈奴使者，逼迫鄯善王放弃与匈奴结交的想法。可能是与郭恂的意见不一致，班超率领随从背着郭恂在当晚发动了进攻。当天正好大风，班超带人先放火，再冲锋，他亲自杀死了3人，剩下的随从共杀死了30余人，还有百余人被烧死。

次日，郭恂听说了他们的行动，非常害怕，担心有性命之忧。但班超却径直去见鄯善王，将匈奴使者的首级扔给了他。本来鄯善就不想和匈奴站队，是整个西域地区最不肯服从于匈奴的。鄯善王见匈奴使者被杀，没有回头路了，更佩服班超的勇气，于是与汉朝结盟，将儿子送往汉朝为人质。

在西域诸国中，鄯善和伊吾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两个国家，鄯善的价值在西汉时期就很明显。北部的新道开通后，伊吾也成了汉朝的门户之一。至此，这两个国家都被班超拿下。获得了鄯善的归顺后，窦固更加欣赏班超的能力，随后，又派他出使西域，希望他多带一些人去。但班超认为，再多的人也没用，还是带了三十几个人前往。

在西域南道上，除了鄯善，唯一的大国就是灭亡了莎车的于阗。由于距离汉朝更加遥远，于阗与匈奴人已经有了结盟关系，匈奴派使者前往，宣称监护其国。

班超到了于阗之后，于阗王对他很冷淡。由于于阗人普遍相信巫术，宫廷的巫师也表示神不支持他们转向汉朝。同时，巫师要求国王将汉使的一匹黑嘴的黄马（骒马）牵来交给他。班超表面上答应将这匹骒马交出来，但必须巫师自己去牵。巫师到了汉使的营帐，班超立刻将他斩首，拿着首级去质问于阗王。由于于阗王也听说了班超在鄯善的作为，感到很害怕，于是攻杀了匈奴的使者，投降了汉朝。

于阗归顺后，在它的西面就是著名的疏勒了。当时的疏勒首都盘橐

城位于现在的新疆喀什，是南道和北道的交汇点。喀什对于新疆，就如同敦煌对于汉朝，起到的是门户作用，汉代时从中亚进入中国的道路大都要经过这里。

不过在班超到达时，疏勒却并不算是一个大国，它已经被纳入了北道上龟兹的势力范围。龟兹杀掉了原来的疏勒王，立了一个龟兹人当新王。班超到了距离盘橐城90里时，派遣一个叫田虑的手下带人前往劝降。田虑到了城里，发现疏勒王无意投降，于是乘其不备，将他抓了起来。由于这个王是龟兹强加给疏勒的，疏勒人民知道他被捕后反而非常高兴，于是班超立了老王哥哥的儿子为王，将龟兹废王释放了。

攻克疏勒之后，班超实际上就打通了原来的西域南道。在西汉时期，汉朝的势力继续向前，翻越了喀喇昆仑山进入了费尔干纳（大宛）地区，但东汉却并没有继续向外扩张，而是以占领到疏勒为满足，并没有超出现代新疆的范围。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也传来了好消息。在新道上，由于汉朝占据了伊吾和车师这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于是在西域丢失了65年后，东汉再次设立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82]这两个在西汉时就设立过的职位。其中西域都护是一个叫陈睦的人，治所可能设在乌垒城[83]；而戊己校尉分成了两个，一个给了后汉开国元勋耿弇家族的耿恭[84]，治所设在了车师后王部的金蒲城[85]，另一个给了谒者关宠，治所在车师前王部的柳中城[86]。

到这时，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第一次达到了最盛。但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最盛时期，也只是依靠少数人的腾挪，完成了对西域的控制。在西汉时，汉武帝动不动就派出大军，对西域小国进行碾轧式的进攻。但东汉皇帝派出的兵力非常有限，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使团而已，不过皇帝给使团授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见机行事。

西汉注重武力，东汉注重外交，这又和两个朝代的国力相对应。西

汉经过了“文景之治”之后，国力达到了巅峰，汉武帝完成集权之后，能够动用极其庞大的财富用于军事，这是支持了他派出大部队征服远方的资本。但是，经过了汉武帝的挥霍、王莽的乱政，整个中国的财政已经支持不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加上东汉光武帝性格随和，没有过分清理他的功臣集团，让这些集团成长为与皇帝分享政权的世家大族，这些世族手中掌握的资源过多，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更加不足，这一切导致皇帝即便想要征服西域，也拿不出太多的本钱发动大规模战争了。

可以说，东汉的对外扩张，除了与匈奴发生过重大的战争，在西域地区只投入了很少兵力，它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已经是非常不易了。

但是，依靠纵横之术获得的西域，东汉又能守得住吗？

艰难腾挪

事实上，东汉控制西域的第一次高峰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北单于派遣军队两万骑进攻车师，耿恭派三百人去救援，却在路上遭遇了匈奴，全军覆没。匈奴军队杀死了车师后王安得，并开始围攻戊己校尉治所金蒲城，在耿恭的英勇反击下，东汉军队勉强保住了金蒲城。[87]

与此同时，焉耆和龟兹也选择了造反，他们杀掉了西域都护陈睦，匈奴也将另一个戊己校尉关宠围在了柳中。车师一看大事不好，也投降了匈奴，又和匈奴人杀了个回马枪，再次将耿恭围困。

当西域都护被杀，两个戊己校尉被围时，在首都洛阳，恰好锐意进取的汉明帝也去世了。继位的汉章帝性格温和，不思进取，也不愿意为了遥远的地方而用兵。[88]在他的宫廷上发生了一场争论，焦点是：要不要为了远在天边的少数人，派出大部队去救援。最后，在主战派的据理力争下，汉章帝派出了七千人前往救援。

这七千援军到达了西域，先解围车师前王部的柳中城和前王首都交河城，当他们攻克交河时，发现戊己校尉关宠已经死了，于是想当然认为在金蒲城的另一个戊己校尉耿恭也不在了，权衡之后，大军决定撤回到汉境。

援军撤走后，在金蒲城困守孤城的耿恭失去了救援，陷入了死地。正当他们感到绝望时，突然听说城外又来了一支部队，以为又是匈奴人，大惊失色，都觉得自己的死期到了。但这支部队走近后，却大声喊："我们是来接你们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匈奴援军，而是汉朝的军队。

原来，耿恭曾经派出一个叫范羌的人去敦煌取士兵冬天的衣服。范羌到达敦煌后，听说耿恭被匈奴围困，于是请敦煌守军派兵支援。敦煌守将虽然害怕，还是拨给了范羌两千人马。范羌带着人，踩着一丈多深的大雪，硬是闯了过来，营救自己的上级。

范羌率领敦煌援军到来后，耿恭和他的手下开始准备撤离。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雪。撤离时，除了敦煌援军，追随耿恭的还有26人，到了玉门关，只剩下13人活着。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但至少回到了汉朝的地域。

为了区区几十人，汉朝用了将近一万人去救援，这几十人中，关宠一支已经全军覆没，耿恭一支最终只救回来13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多数援救少数的例子，也表明了东汉政府对于人的重视。但这样的壮举却无助于维持东汉和西域的关系，万里救援让谨慎的汉章帝选择了撤出西域，不仅撤出了车师国的吐鲁番盆地，第二年又从伊吾所在哈密盆地撤出，回到了敦煌作为前线。匈奴则占据了伊吾地区，将北道（即东汉开辟的新道）封锁了。

与北道的车师相比，南道上的疏勒、于阗等地更是距离遥远。汉章帝撤出了北道后，北道上的龟兹、焉耆、车师都已经成了匈奴的天下，

南道事实上已经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北道尚且无法防守，更何况南道？这时，汉章帝认为南道除了撤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下令班超撤走。

命令到达时，龟兹、姑墨已经发兵进攻汉军和他的同盟，班超和疏勒王忠死守了一年，等来的却是撤退的消息。疏勒的人听说汉使要撤走，大惊失色，甚至有人不甘于重新做龟兹的臣民而自杀。在一片惋惜声中，班超离开了。[89]

当他退到于阗时，于阗的王侯号泣着请求他留下，抱住马腿不让他走。班超也不想放弃亲自打拼的天下，在人们的哀求声中决定留下。他带领部下再次回到疏勒。此刻的班超已经不再是汉朝使节，只能靠个人的力量去打拼了。

班超回到疏勒时，疏勒已经投降了龟兹。在龟兹一方还有一个叫尉头的小国，疏勒已经被迫与尉头联合。班超入城后，杀掉了带头投降的人，并率军击败了尉头，杀死了600余人，重新使疏勒安顿下来。

到了公元78年（建初三年），班超不仅稳定了当地，还以疏勒为基地，和西方的康居取得了联系。这一年，他联合疏勒、于阗、拘弥，加上从康居借的兵共1万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斩首700级。

稳定住局面后，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朝廷派救兵。此刻，汉朝宫廷内最初的慌乱已经过去，班超的功绩已为人所知，有一位叫徐幹的人由于和班超志向相同，请兵千人前来助阵。公元80年（建初五年），他赶到了战场。公元84年（建初九年），汉章帝又派了一个叫和恭的人率领800人前往。

在徐幹与和恭的帮助下，班超不断地合纵连横，粉碎了莎车的反叛，到了大约公元86年（元和三年），已经打通了南道，甚至可以直通康居、大月氏等地。

公元87年（元和四年），龟兹王率领温宿、姑墨、尉头士兵5万

人，与班超和于阗士兵2.5万人对垒于莎车。班超假装撤退，偷偷释放龟兹的被捕人员，让他们把错误的消息传回。龟兹于是决定伏击，位于莎车的本寨却空虚了。班超乘机进攻莎车，杀死了5000人，这场战斗迫使莎车投降。

公元90年（永元二年），远在西域的贵霜王朝副王谢带领7万人进攻班超，被班超击退，从此贵霜不敢小觑东汉。

到这时，班超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与此同时，东汉朝廷上的和战势力也再次出现逆转：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去世，继位的汉和帝在窦宪的主持下重新对西域采取了进取的行动。

窦宪的行动从对北匈奴发动战争开始。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率兵越过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的大戈壁，直捣蒙古国境内的北匈奴，歼敌1.3万。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窦宪请班超的哥哥班固写了一篇铭文《封燕然山铭》，刻在了一个叫燕然山的小山上。公元2017年，人们在蒙古国境内杭爱山的一个余脉上发现了这篇铭文，也由此确定了历史上的燕然山所在。[90]此前人们长期争论燕然山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否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有人将它定位在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也是成吉思汗起家的地方），有人认为它是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内蒙古境内寻找。

2017年发现的《封燕然山铭》实际的位置的确已经进入了蒙古国，却并没有深入蒙古国北部和中部，而是在蒙古国偏南的地方，这里接近于南面的戈壁，充满了沙地，小山虽然属于杭爱山的余脉，但事实上距离杭爱山主体已经很远，只是杭爱山东南方沙漠中凸起的小山丘而已。

燕然山就是汉代军队所能到达的最北端，表明中国在两汉时期，对北方的涉足依然是不足的。

第二年，窦宪再次出击，大败北匈奴。

东汉对匈奴的连续胜利，再次将匈奴赶出了伊吾一带，将哈密盆地

控制在了手中，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国也投靠了东汉王朝。

接下来就轮到班固最顽固的对手龟兹了，很快，它也根据利害关系做出了选择。公元91年（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宿敌纷纷投降了汉朝。到这时，就只剩下焉耆、危须、尉犁三国没有投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杀害了前任西域都护陈睦，不相信能够得到宽恕了。

也是在这一年，汉和帝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其中班超担任西域都护，驻扎在龟兹国的它乾城[91]，徐幹为长史，驻扎在疏勒。

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决定解决焉耆问题，发动了龟兹、鄯善等八国的七万人出兵三国，将三国平定。到这时，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所有西域国家都已经内属，在新疆地区以外的国家虽然鞭长莫及，却都向汉朝纳贡。第二年，汉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班超的功绩达到了顶峰。

班超给中国留下的最后一项遗产，是于公元97年（永元九年）派遣一个叫甘英的使者出使遥远的西方。甘英出发后，经过安息、条支（今叙利亚），到达了地中海岸边，[92]在海岸的另一边就是著名的罗马帝国，恰好也处于鼎盛时代。

当地人对他说，在地中海内行船，即便是顺风，也需要三个月才能到达罗马本土，如果不顺利，则可能需要两年，所以必须携带三年的干粮才算保险。甘英听后放弃了继续西行，止步于条支。但即便如此，在很长时间内，他一直保持着“中国西行第一人”的头衔，直到唐朝时期才有人超过了他，到达了更西的地方。[93]

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年迈的班超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就去世了。他给东汉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西域。

西汉的西域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计成本的财政开支堆砌起来的，东汉的西域政策却是精打细算，最初只动用了数百人，后来多不过两千人，就控制了庞大的西域，从这个层面看，东汉的西域政策更加理

智和成功。

但是，班超时期也已经是东汉西域最辉煌的时代。班超死后三年，汉和帝去世，他刚满百日的儿子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夭折了。汉安帝继位后，由于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段禧等人不得人心，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汉安帝选择放弃了进取的西域政策，再次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又丢失了西域。

三通三绝

东汉对于西域的政策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在历史上称为“三通三绝”。从汉光武帝时期休养生息、不开西域，到汉明帝后期第一次短暂开通之后断绝，只剩下班超一个使团在苦苦支撑，这是第一通和第一绝。汉和帝时，在班超、窦宪等人鼓舞下再开西域，到汉和帝去世后撤出西域，这是第二通和第二绝。

第二次断绝还有另一个因素。可以说，东汉对西域政策的不稳定，还和国内羌人问题有关。在西汉时主要的对手是匈奴人，但在东汉中后期，羌人成了王朝的心腹大患。由于与羌人频繁作战，东汉的国库消耗很大，不可能同时应付多场战争。[94]

羌乱最早是一支叫烧当羌的部族发动的叛乱。烧当羌在汉明帝时期就和汉地发生了战争，而战争的高潮是在汉章帝时期，直到汉和帝时才得到了控制。

“烧当羌之乱”结束后，接下来是先零羌的作乱。“先零羌之乱”直接和出征西域有关，公元107年（永初元年），正是由于征发羌人前往西域，引发了羌乱。为了对付羌人之乱，西域的官员当年就被召回，西域正式进入了第二次断绝时期。

公元123年（延光二年），当羌乱暂时处于低潮时，敦煌太守张珰

上书，请求重新启动西域战略，认为要防御匈奴，必须以动态防守代替静态防守，汉安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第三次开启了西域的门户。这时，就轮到班勇出场了。[95]

班勇是班超的小儿子，事实上，在第三次开通西域之前，班勇就已经展现出了战略才华。在公元119年（元初六年）时，敦煌太守曹宗就曾经派长史索班带领千余人到伊吾驻扎，曹宗这样做，是因为汉军一旦撤离了西域，匈奴就会借助车师、鄯善等地，骚扰汉朝的西部，造成较大损失；只有派兵驻扎在伊吾等地，采取前置防御，才能阻止匈奴祸害汉朝的边境。

索班驻扎后，车师前国和鄯善都来投诚。这件事引起了匈奴的警惕，于是派兵联合车师后国将索班军队攻没，赶走了车师前王。鄯善王急忙向敦煌太守求救，曹宗向朝廷请求派兵五千人进攻匈奴。

这件事传到了朝堂上，当时掌权的邓太后召集群臣讨论，公卿们大部分都认为国库无法应付西域的军费，应该将玉门关关闭，与西域断绝联系。

班勇却主张必须进行前置防守，才能避免匈奴的破坏，只要派人前去实行羁縻政策，也就是召集亲汉的当地人加以武装，汉朝不用出多少人力和物力就能起到防守作用，这样的做法花费最小，却可以减少大量的边境损失。

邓太后最终采取了折中的做法，给了敦煌郡三百人，设置了一个西域副校尉的职务。但是，西域副校尉驻扎的地点不是在西域，而是在敦煌。这样，实际上起不到防守作用，之后匈奴的破坏也印证了班勇的判断，汉朝的西境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公元123年，朝廷重新采取进攻姿态，班勇立刻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担任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出屯柳中。

第二年正月，他到楼兰取得鄯善王的归附，再从楼兰经过西域老北

道（孔雀河道）到达龟兹一带，龟兹王率领姑墨、温宿投降。到这时，汉朝的势力就从东面和西面同时夹住了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班勇发兵万余骑攻击占据了车师前国的匈奴军队，赶走了匈奴，收复车师前国五千余人，打通了北道。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兵马六千骑，加上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兵马，向车师后国进攻，将其击败。这次胜利获得了八千名俘虏，加上五万多马匹。班勇将车师后王和匈奴使节押往索班战死的地方斩首，算是报了仇。

第二年（永建元年）吐鲁番盆地内外的车师六国全部平定。当年冬天，班勇和诸国兵马出击匈奴呼衍王，除呼衍王逃走之外，他的部下两万余人全部投降。北单于率军亲自来攻，也被班勇击退。

到这时，北道上近处，不肯降服的只有焉耆这一个国家了。

第二年，班勇请求出兵进攻焉耆。除班勇之外，敦煌太守张朗也派了三千兵马，班勇走南道（实际上是西域老北道孔雀河道），张朗走北道（哈密吐鲁番道）。但这次立功的却是张朗：由于他曾经犯过罪，是戴罪之身，要想逃脱惩罚只有立功一条路。为了立功，张朗虽然与班勇约定了时间，却故意提前发动了进攻，拿下了焉耆。

由于是张朗攻下的焉耆，他可以逃脱前罪的惩罚。但守时的班勇却吃了亏，被认为没有按时到达约定地点发动进攻，于是被免了官并投入监狱；虽然他后来被赦免，但不久后就在家中去世了。

班勇离职时，西域的局面已经打开，随着鄯善、车师、龟兹、焉耆等大国投降汉朝，在更西面的于阗、疏勒、莎车等也纷纷上表，表示效忠。而西面更远处的乌孙、大宛等地则无法恢复了。

公元131年（永建六年），东汉政府再次在伊吾屯田，这也标志着东汉最后一次开通西域的活动达到了高峰。

但接下来，随着国内政治的衰落，东汉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制衡西域。与此同时，匈奴也衰落了，于是西域再次陷入了各自为政的状态。

到了公元152年（元嘉二年），于阗反叛，杀掉了西域长史王敬。公元153年（永兴元年），车师反叛，将伊吾屯田处攻没。到这时，东汉王朝再也没有力量控制西域，它在西域的影响力就这样瓦解了。[96]

扩大的视野

东汉王朝虽然是一个地域性的国家，其统治疆域在西方没有超出过现代中国的边界，但是，比起西汉来，东汉对于西方的地理认知却更加明晰。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统治到大宛以外的地区，但对于这些地区的地理却有了一定了解。西汉王朝以军事为主，皇帝动不动就派出大军前往征服，但在出兵过程中，对目标的地理信息却知之甚少。东汉则以外交战代替了大规模的战争，对于情报的要求反而更高，而班超等人对西域的经营也带来了大量的情报并汇聚成册，成了人们了解西方世界的蓝本。[97]

在东汉时期，西方是由两大帝国控制的。

在近处，一个叫贵霜帝国的巨型国家已经形成。

所谓贵霜帝国，是从原来大月氏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大月氏来自中国境内，后来迁徙到那片叫吐火罗（大夏）的地方安顿下来。但是，在他们到达时，吐火罗地区并非空无一人。

事实上，在大月氏到达之前，另一支到过中国的族群——吐火罗人也刚刚迁徙到这里。吐火罗人后来又和塞人混合在一起。

关于吐火罗人和塞人的关系依然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塞人和吐火罗人都属于印欧人种，而塞人先于吐火罗人在伊犁河谷游牧，而吐火罗人则曾经在中国新疆地区活动，后来一部分吐火罗人继续留在今天中国

境内，形成了小国婼羌，他的首领被汉朝人称为“去胡来”[98]。还有一部分分布在丝路北道上，比如根据现代人分析，龟兹语就是吐火罗语的一个分支，表明龟兹也与吐火罗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一部分吐火罗人来到了中亚伊犁河、楚河河谷，将塞人赶到了南方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岸，这里被称为巴克特里亚。而吐火罗人又被月氏人从伊犁河赶走，也向南来到了阿姆河岸的巴克特里亚，逼迫塞人再次南迁到克什米尔地区（罽宾）。巴克特里亚由此变成了吐火罗地区。最后，月氏人又被乌孙人赶走，也来到了吐火罗，将吐火罗人征服。

而还有人认为，其实吐火罗人就是塞人的一支。[99]吐火罗人迁往伊犁河谷时，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同族属的部落，有名字的包括了Asii、Gasiani[100]、Sacarauli等，其中Gasiani就是“贵霜”。由于其中的吐火罗部落可能人口最多，我们可以将他们都称为吐火罗人。

不管吐火罗人属不属于塞人的一支，当吐火罗人到达巴克特里亚（后来的吐火罗地区）时，这里已经存在着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即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个王国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留下的最后成果，它也是一个复合体，王族是希腊人的后裔，而下层民众却是当地人。吐火罗人的到来灭亡了这个希腊化国家，重新建立了上层统治。

但是吐火罗人的统治也不长久，大约只有10年时间，[101]大月氏就在乌孙人的压力下也来到了这里，并击败了吐火罗人成了主人。

大月氏的到来，给这片地区增加了复杂性，除了最初的人种，这里还有希腊人、塞人、吐火罗人，现在又加上了大月氏人。

在吐火罗地区，作为统治者的大月氏人只是少数，他们位居社会上层。至于下层，由于人口众多，不好管理，大月氏人只是亲自管理了吐火罗的西半部，也就是山麓平地和河谷部分，这部分以巴尔赫为中心。在东部则是逐渐增高的山区，直到帕米尔高原，大月氏人将这片地区的管理权授予了塞人（可能是与吐火罗人一同南下的部族），然后在这片

地区出现了五个翕侯（诸侯部落），这五个翕侯可能是按照塞人的原族群划分的，但由于历史的模糊性，我们很难将名字与族群一一对应，只知道这五个翕侯分别叫休密、双靡、贵霜、肸顿和都密。[102]

这些事都发生在西汉时代，延续了百年之久。但随着时间推移，大月氏统治的国土之下，强弱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其中贵霜翕侯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代霸主。到了翕侯丘就却时代，他攻打并灭亡了另外四个翕侯，自称贵霜王。他把势力扩展到了如今的阿富汗中部，之后又向西进军，将原来的主人大月氏打败，成了整个吐火罗地区的霸主。时间大约在东汉早期。[103]

之后，丘就却开始扩张帝国，继续向西进攻安息，而他收获最大的方向是南边，他侵入了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地区，将白沙瓦、克什米尔（罽宾）等地都收入囊中。

丘就却去世时80余岁，之后到了他的孙子阎膏珍[104]时，将印度（时称天竺）击灭。除了巴基斯坦，他还掌控了印度整个北部地区。贵霜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

在阎膏珍执政时期，公元90年（永元二年），贵霜曾经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地区，对班超所在的西域都护发动了进攻，但以失败告终。[105]不过这场战役并非决定性的，因为贵霜的主要精力并不放在东面，而是放在西面和南面，主要原因是：印度和波斯的经济更加富裕，而地理难度更小，贵霜在已知得不到太多利益的情况下，犯不着花如此大的力气去进攻现代的新疆地区。

阎膏珍去世后，他的儿子迦腻色迦成为贵霜王，贵霜的国运也达到了顶峰。在印度古代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分散的，但只有三个王朝接近于帝国模式，一个是公元前4世纪到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一个被认为是印度古典主义艺术和黄金时期的笈多王朝；在两个王朝之间，还有一个疆域巨大的贵霜王朝，却由于是外来人统治，很难被印度承认。

但从疆域上来看，贵霜王朝虽然没有深入南印度，只占据了北印度，但它的疆域却包括了阿富汗和中亚的很大一部分，其整体面积并不比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的疆域小。

贵霜王朝采取了双首都制，其中一个位于现代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另一个位于现代印度的马图拉。贵霜王朝灭亡之后，印度人对贵霜的遗迹进行了系统性的清理，所留下的很少，但在马图拉的博物馆里，依然有大量的贵霜石刻存在。从贵霜石刻人物的面部来看，他们属于印欧人种，却又比普通的印欧人面部更加扁平，表明了他们的特殊性。

在博物馆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无头武士雕像，被人认为是迦腻色迦王，他穿着的衣服、皮靴和佩带的巨大宝剑仍然带着草原民族的粗犷，也表明了他的外来属性。[106]

贵霜王朝对中亚和南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处于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往来的商人们更便于进行长途旅行，于是，丝路经济的繁荣就在这时打下了基础。布路沙布逻（即白沙瓦）作为贵霜首都，也是一个巨大的贸易中转站，将印度和中亚连为一体，再通过中亚前往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

同时，贵霜还有另一个巨型的贸易中转站，在如今的土库曼斯坦境内，这里有一座城市叫马雷（Mary），在古代称为木鹿，是从波斯的丝路西段到中段和南段的必经之路。只要同时控制了布路沙布逻和木鹿，就等于控制了丝路的核心路段，既可以繁荣帝国的贸易，又有了征税权的优势。

其次，贵霜人还成了佛教的传播者。在贵霜之前，佛教只是一个印度的地方教派，虽然孔雀王朝大力推行佛教，但佛教还是仅仅局限于现代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很难向外传播，更跨不过兴都库什山。

到了贵霜王朝时期，当贵霜人皈依了佛教之后，利用他们在中亚的

地位，将佛教推广到了兴都库什山以北，传播到了中亚，并顺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

在佛教雕塑中，有一种最美的雕塑风格称为犍陀罗风格。犍陀罗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混合风格，之前，印度的佛像和神像大都显得呆板狰狞，但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被称为犍陀罗（以现在的白沙瓦和塔克西拉为核心）的区域内，由于吸收了亚历山大大帝所带来的希腊式风格，创造了一种飘逸、美感十足的佛像新风格，这种风格正是在贵霜人的传播下传到了中亚，再进入了新疆以及中原地区。如今，人们看魏晋时期的佛教雕塑，总觉得人物造型飘逸，充满了灵动性，就来自犍陀罗风格的影响。

贵霜王朝一直存在到东汉灭亡后，才由于萨珊王朝的崛起，在萨珊人的攻击下而衰落，至于它完全消失，要到公元5世纪嚈哒人兴起时，这一天才会到来。

表3 鼎盛时期的贵霜诸王[107]

汉文名称	西文名称	在位年代
丘就却	Kujula Kadphises	最早于公元 78 年去世
“无名王”	Vima Takto	不详
阎膏珍	Vima Kadphises	去位不晚于公元 129 年

续表

汉文名称	西文名称	在位年代
迦腻色迦	Kanishka	公元 143—165 年 或公元 131—153 年
胡维色迦	Huviska	公元 170—204 年 或公元 158—192 年
波调	Vasudeva	公元 206/209—240 年 或公元 194/197—228 年

除了印度北方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贵霜王朝的出现，东汉对于印度其余地区的了解也加深了。在西汉时，张骞只是听说了“身毒”的存在，却并没有去过，到了东汉时期，“天竺”或“身毒”不再只是抽象的符号，而变成了具体的地理概念。

东汉人已经知道，天竺/身毒指的是从月氏到位于今天缅甸的磐起国[108]之间数千里的区域，这里信奉佛教，不讲究杀伐，但打仗的时候却有一项秘密武器：战象。

同时，东汉还知道天竺/身毒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不是具体国家名称，这个地理名词由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城市组成，每个国家都有国王，每个城市都有城市长官（称为城长），它们都称自己是身毒。[109]在东汉时，身毒的大部分是属于贵霜的。

除了贵霜控制的北印度，东汉人还知道了南印度的存在。在当时所谓天竺/身毒多指北印度。这主要是由于印度南北的人种有着巨大的差异，北方人中雅利安人（印欧人）比例较高，而在南方，肤色更深的早期印度人（达罗毗荼人）却占了主导地位。在人类历史早期，雅利安人从北方地区来到印度，之前印度存在着分布在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河文明，也就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雅利安人到来后，印度河文明被压缩到了印度南方，形成了如今的达罗毗荼人社会，而北部则由肤色更浅的印欧人（雅利安人）统治，形成了分化。

另外，北方由于平原多，主要是陆地模式；而在南方，中间是高原，人们大都生活在海岸两侧，所以成了海洋文化的代表。

在东汉时期，身毒南方的东海岸有一个大国叫朱罗国[110]，首都是沙奇城，也就是现在著名的甘吉布勒姆（Kānchīpuram）。朱罗国是一个主导了印度洋贸易的国家，在与东南亚地区乃至中国南方的海洋贸易中，朱罗国是一大中转站。

在印度东面的缅甸也已经进入了东汉人的视野，缅甸当时的人种是

骠人，他们在伊洛瓦底江河谷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磐起国，首都可能位于现代城市卑谬附近，称为室利差旦罗。

在更远的西方，东汉所在的大部分时期里，波斯地区仍然是安息帝国（即帕提亚帝国）的天下，但安息之外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汉时，整个叙利亚、埃及和欧洲地区还没有合并成同一个国家，其中叙利亚属于塞琉古王国，埃及属于托勒密王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从亚历山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分别被中国人称为条支和黎轩。但到了东汉时期，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都不存在了，崛起的是位于欧洲的罗马帝国，东汉称之为大秦。于是，条支和黎轩都不再具有政治意义，而是变成了地理名词，条支指的是叙利亚地区，而黎轩变成了大秦的同义词。[111]

东汉时期，班超曾经派甘英出使西方，甘英到达了叙利亚海岸，没有渡过地中海，但他带回了不少关于大秦的消息，使得中国人对大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信息包括：与中国的城池不同，大秦的城池都是石头的；大秦有着完善的道路系统和邮传系统；大秦的国王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这一切都和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也表明，到了东汉时期，位于欧亚大陆南北两端的两个超大帝国的确相遇了。

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据称有大秦使者从南海过来进贡，送来的东西包括玳瑁、象牙、犀角等物。这件事显得非常蹊跷，因为罗马帝国的使节竟然会走海路过来，送来的东西还大都是海道上的寻常物品。

但是，这件事似乎又不可完全否认，因为史籍上记载了大秦王的名字叫安敦。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当时，罗马帝国恰好处于巅峰时期，在经过了建国初期的内乱之后，先后出了五位贤帝，即所谓的“五贤帝”，最后两位被称为“两个安东尼”，老的叫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38年到161年在位，小的叫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12]，是老安东尼的养子，又被称为小安东尼，在位时间是公元161年到180年。[113]

大秦使节到来时，恰好是小安东尼执政时期，所以，不管来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大秦使节，进贡的事是一定发生过的，确实有人以大秦的名义到过中国。

这也证明，在东汉时期，从地中海经过西亚陆地，再通过海洋到达中国，即便不是有船只直达，经过数次转运之后，也已经有一条开通的道路了。

海外异草

张骞通西域之后，除了汉武帝主导的马匹、宝物和鲜血交流，虽然西域的贸易量并不大，但民间的各种交流却在快速地进行着，这就产生了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物品大交换。

在这次交换中，除了丝绸作为汉朝的主打产品，也有一系列的农产品传到了西方和印度，最著名的就是桃和杏。[114]在张骞之后，这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水果被丝绸商人带到了西方，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一说公元1世纪）进入伊朗，之后又经过亚美尼亚、希腊到达罗马（公元1世纪）。

与此同时，在公元2世纪的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中国的梨和桃传入了印度。关于中国的梨和桃如何传入印度的故事，竟然是由玄奘记录下来的。[115]根据玄奘的记载，由于迦腻色迦声名远播，位于现代中国河西走廊以外的国家纷纷送出人质前往贵霜。迦腻色迦王厚待了这些人质，每年给他们换三次地方以应付寒暑变化，并派遣了卫兵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人质的冬日居所被称为“至那仆底”，也就是“汉封”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演变成了这个小国的国名。这里原本没有梨和桃，正是这些

人质带来了这两种水果，并传入了印度。所以，桃被称为“至那你”，也就是“汉持来”的意思，梨被称为“至那罗阇弗呾逻”，意思是“汉王子”。

中国人将桃、梨、杏传往西方的同时，西方的大量植物也随着商业交流而遍布中国的土地。这些植物许多都带有“胡”字（如胡桃），也有直接带“波斯”两个字（如波斯枣），或者“安”字（表示中亚，如安石榴）。

当汉武帝到大宛寻求宝马时，使者们还把一种专门给马吃的食物带回了汉地，它就是苜蓿。苜蓿的原产地可能在波斯一带，当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大流士发动希波战争时，这种植物也随着军队传入了希腊，之后进入欧洲其他地区。苜蓿向东传播途径是从波斯进入了中亚地区，在大宛广泛种植，到了张骞时代，又被中国人发现了，跟随西域宝马一同来到了中国。[116]汉武帝由于喜欢马匹，也将苜蓿种满了各种离宫别苑。[117]

苜蓿只是动物的食物，而另一种水果则代表了享乐精神。尼采认为希腊精神有两种代表，一种是代表了理性的日神精神，另一种则是代表了狂欢的酒神精神。欧洲之所以多酒，是因为欧洲人很早就使用葡萄酿酒。葡萄酒可能是人类最容易获得的一种酒，只要把葡萄汁放在容器中，不再需要放其他任何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发酵成酒。但希腊、罗马等地的葡萄也并非原产，它们可能来自中东或者埃及。埃及人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时候就有了葡萄酒。葡萄在中亚地区也分布广泛，张骞去往中亚时，发现那儿有很多葡萄酒。比如大宛就以酒闻名，富人们以储酒为乐，最多可达万余石，放十几年都不会坏。

这种酒和中国的米酒比起来，度数更高、更稳定，口感也更好。在政治上总是找不准方向的张骞，在物种引进上却拥有超前意识，在他的努力下，葡萄也引入了汉地。

除了这两种明确为张骞带回的植物，还有许多植物被认为与张骞有

关。比如，果仁长得像人大脑的“胡桃”（就是现在的核桃），就被认为是张骞引进的。[118]胡桃的原产地可能在波斯的北部，但除了传闻，并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证明是张骞带入中国的，只能认为，胡桃的引进可能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不知名的商人慢慢地带到了中国。[119]在汉代，皇帝的上林苑里已经种上了胡桃树。[120]

另一种重要的产物，最早被中国称为“安石榴”（就是现在的石榴），也是来自伊朗地区，它也被冠以张骞引进之名，[121]但同样没有证据，只能说可能是由汉代不知名的商人传入。从“安石榴”这个名字来看，它可能是从“安国”和“石国”引进的。

除了这四大作物，在这个阶段从西域引入的作物还包括胡麻、藏红花、芫荽、胡葱、胡瓜（黄瓜）等，都被和张骞挂上了钩，却一直缺乏可靠的证据。

除了在植物上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西方还带来了许多文化方面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受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是唐代，但在汉代张骞之后，一种叫胡笳的乐器已经传入了中国，由此带来了胡乐。汉武帝时期的李延年更是根据传入中国的一首胡乐，创作了28首曲子。[122]汉代有名的蔡文姬创造了《胡笳十八拍》，就是在胡笳的伴奏下演唱的一首乐府诗。

另一个对中国有趣的影响是马戏和戏法。中国人对西域传入的这项奢侈运动一直兴趣十足。从南方的印度到西方的罗马，对戏法都情有独钟，只有中国缺乏这样的传统。公元120年（永宁元年），西南方的掸国（位于现代缅甸）进献了一批变戏法的高手，他们所做的表演和现代的表演几乎毫无区别，节目包括：1.吞吐火焰；2.大卸八块，将人头换成牛马的头。在这些魔术师的表演下，汉安帝兴趣十足，在第二年春节宴会时，还专门请他们出来表演，皇帝和大臣们济济一堂，欣赏着这不可思议的“骗术”。[123]

事实上，从张骞开始，使者们就不断地向皇帝汇报西方的戏法高手，《汉书》更是总结了戏法的所有形式，如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等。[124]

这些异域的文化，加上舶来的植物、马匹，共同丰富了汉代的社会，也表明，即便皇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征服，可一旦大门打开，民间的交流就自动开始，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开始时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佛教的到来，中国舶来文化的引进便形成了第一次高峰。

西汉的首都选在了内陆的长安，这里远离海洋，同时由于与匈奴的拉锯战，使西汉对西北地区更加熟悉，也因此对西域更加重视。

与此同时，西汉时期东南方向的沿海还处于整合的过程中，不管是南越还是闽越都刚刚加入中国的版图不久，又距离长安过于遥远，皇帝对于东南沿海之外的关注是比较有限的。这导致西汉对东南亚缺乏足够的认知，虽然有一定的接触，却始终是小规模且代价巨大的。“一带一路”中，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带”已经打开，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路”还处于初步摸索阶段。

当然，这个阶段官方联系不多，并不代表民间毫无联系，事实上，西汉时与东南海外民间的贸易已经有所发展，只是因为民间贸易缺乏必要的记录，显得更加模糊。

到了东汉时，随着皇朝将首都迁往了更加东面的洛阳，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开发，东南沿海的稳定，东南亚海外与汉朝官方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到这时，“一路”就慢慢成了一条与“一带”并存的海外通道。

因此，在叙述完两汉时期的西域世界之后，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汉代时东南方向的海外世界……

第四章 海洋时代的前奏

东南亚的客观世界

当汉代的人们习惯于西域的时候，在另一侧中国南方的海洋上又发生过什么呢？到底汉代对于海洋的了解有多少？

西汉时虽然对东南海外缺乏了解，却并非毫无接触。事实上，此时中国至少有一个地区是与海外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赵眛（公元前137—前122年在位）[125]墓中，出土了不少可能来自海外的陪葬品，其中，一个白色的花瓣银盒带着明显的波斯风格，几块蓝色的平板玻璃可能同样来自海外。此外，还有一批金带钩、金花泡等饰物，也明显不像中国制造的，五支巨大的象牙可能来自印度或者非洲。

这证明，广州作为中国南海重要港口，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和海外有了频繁的交通联系，中国人由此可以从海外获得不少奢侈品。

但是，在西汉的史书中，关于海外联系的记载却并不多。人们谈起南方，大多是指位于广东的南越，这已经是中国的南端了。

作为例外是越南北部，这主要在于，从广东、广西进入现在的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并没有高山大川阻隔，因此，首都位于广州的南越国早已将越南北部纳入了统治，之后又并入了汉朝。

在叙述汉代中国对于东南亚的认知之前，不妨先去了解一下当时东南亚半岛上存在的文明。[126]

与现代东南亚半岛地区分成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六个国家不同，在古代，这个地区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形态，

一种是以农业为主的陆地文明，另一种是以经商和航海为主的海洋文明。

在陆地文明中，东南亚地区的不同文明大都以一条河流所产生的谷地和三角洲进行分布。在东南亚半岛上主要有五条大河流经，分别是：从中国云南出发，经过越南北部入海的红河；从云南经过缅甸、老挝、泰国，在越南南部入海的湄公河；泰国的湄南河；从中国西藏、云南流经缅甸入海口萨尔温江；缅甸的伊洛瓦底江。

现代的越南国土狭长，在南北两部各有一个河流三角洲，形成两个比较宽阔的部位，两者之间由一条狭长的海岸相连接，如同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粮筐。其中北面是红河三角洲（首都河内所在地），南面是湄公河三角洲（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胡志明市所在地，胡志明市也称西贡市）。但在历史上，越南的南北差异却非常大，长期都不属于同一个国家。

北部的红河三角洲由于距离中国太近，在宋代之前大都是中国的领土，被越南人称为“北属时期”。在汉代，这里也属于中国的中央王朝。这里的人以骆越人为主，属于百越族系，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京族，这也是越南的主体民族。在红河三角洲之外的山区，则生活着在中国广西、云南也有的瑶族等民族。

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湄公河及其支流流经的内陆地区，却是由与京族完全不同的民族占据的。

在汉代，越南南部与柬埔寨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它们都属于湄公河流域，因此，湄公河三角洲和湄公河谷居住的人种叫高棉人，也就是现代柬埔寨人的祖先。

高棉人所活动的区域也比现代柬埔寨大得多，包括了越南南部和泰国东部地区，也包括了湄南河谷（位于今泰国中部）的一部分。高棉人建立的国家叫扶南[127]和真腊[128]，其中最早出现的是扶南，可能是和

与印度的贸易有关，扶南灭亡之后成立的真腊国已经是一个陆地大国。

从真腊往西，进入了现代泰国的湄南河谷，但在当时，泰人还在云南某地，没有出现在泰国，当时占据湄南河谷的，东面是高棉人，西面是一支叫孟人的部族。孟人分布在泰国的西面和缅甸的东面，如今这个民族依然存在于缅甸东部的孟邦，这是现代缅甸国家（主体民族已经变成了缅族）给孟人设立的自治邦。

不仅泰人没有出现，就连缅甸的主体族群缅人也没有到来，在缅甸的主体伊洛瓦底江流域，占据这里的是骠人。如今骠人已经不知所终，但在古代，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缅甸的优势民族。当现代缅甸摆脱了孤立状态，参加了联合国的世界遗产项目，缅甸加入世界遗产的第一个项目不是著名的蒲甘，而是更加久远的骠人遗址，表明这个消失的民族曾经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两汉时期，分布在东南亚半岛上的几个农耕民族是：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越人（从属于中国），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的高棉人，泰国西部、缅甸东部的孟人，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骠人。

直到后来，随着泰人和缅人从中国境内进入东南亚，将高棉人、孟人和骠人的地盘压缩，才形成了现代国家的格局。

除了这四大农耕民族，在越南的中部，也就是细长形的海岸上还有一种特殊的人，他们可能与遍布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的人是同源的，来自海上，是典型的海洋民族，这种人称为占婆人（占人）。

占婆在陆地上的领地不大，只是贫瘠的海边地区，但占婆一直是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出现的，它时常与北方作战，又经常参与到高棉的事务之中，一直存在到近代才被整合到了越南民族国家之中。[129]

占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从印度尼西亚前往中国的海道上，当时的海道从印度出发，经过斯里兰卡中转后，往往经过马六甲或

者巽他海峡进入通往中国的航线，由于路途遥远，很可能会选择在占婆等地停留，再前往中国的广州。正是这种路线，使得占婆也成了重要的港口地区。

总结起来，两汉时期的中南半岛上，有占婆人的海洋文明，加上越人、高棉人、孟人和骠人四大陆地文明。这些地区都已经有了密集的人类存在，并形成了民族国家。

不过，虽然东南亚文明已经存在，但汉代时的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又有多少了解呢？

南大门并入中央政府

自古以来，中国在东南亚的交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行政直辖，第二种是朝贡，第三种是民间贸易。前两种在史书中记载比较明确，但是最后一种往往只有零星的记录。

贯穿中国古代的始终，行政直辖区域大部分时候只有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也就是现代越南首都河内的所在地。

越南北部和南越一起纳入中国的疆域，和一项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关。

秦代时，监御史禄（史称史禄）[130]开凿了一条运河，这条运河位于湖南和广西交界处，极大地降低了中原和两广地区联系的难度。

在这条运河出现之前，从中原前往两广地区必须翻越南岭，[131]交通非常不便。翻越南岭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湖南沿着湘江向南方的上游进发，到达南岭后，再翻山进入广东（或者广西）地界；另一条是从江西沿赣江向上游南进，再穿过梅关进入广东地界。这两条路在到达湘江和赣江源头之后，都必须改走陆路翻山，再沿着北江（或者西江）水系进入珠江。[132]

但人们发现，从湖南境内沿湘江向上游南进，在湘江源头不远处，还有另一条河流的源头，这条河从北向南流，可以直达广州。这条河就是漓江，在下游又汇入珠江的西支（西江），前往广州。如果能把这两条河打通，中原的货物就可以不下船，从水路经过湘江、漓江、珠江，直达两广的重要区域。史禄修建的灵渠就是将这两条江水沟通起来的。

灵渠位于现广西兴安县境内，是从北流的湘江上游修建一条人工运河，将一部分湘江水分流，经过运河进入东面向南流的漓江水道。由于湘江上游引水点海拔比漓江入水点稍高，这样就利用水的落差，不需要任何外力抬升，就完成了两大水系的沟通。

灵渠建成后，秦朝征服了南越地区，建立了三个郡，分别是位于番禺（现广州）的南海郡，位于广西的桂林郡，以及更加靠南，深入越南北部的象郡。

秦末时，由于天下大乱，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乘机断绝了与中原的通道，先是代行南海尉，后来并吞了桂林、象郡，自称为南越武帝。南越国共存在了近百年[133]，最初是独立的，后来承认汉的正朔，以汉为皇帝，自己称次一级的王，作为一个异姓王存在。

到了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南越再次和汉朝起了冲突，汉武帝派出了四路大军共十万人马进攻南越。其中第四路又分成了两支，也可以认为是五路。[134]

这次进攻利用了几乎所有的入粤路线。其中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从桂阳郡（今湖南省郴州市）出发，进入湟水（即连江），再并入珠江水系。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从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出发，翻山后进入横浦（今浈水，即珠江的北江）。有两个投降了汉朝的粤侯，被封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他们沿着湘江—漓江通道，进入漓江后，这路大军又分成了两支，一支直接沿漓江直下，另一支先进攻苍梧（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驰义侯何遗则将巴、蜀地区的罪犯集

合起来，加上夜郎国的援军，从牂牁江直下。

五路大军的目标都是南越国首都番禺。虽然是五路大军，但事实上起到了作用的只有前面两路。首先到达战斗位置的是楼船将军杨仆，杨仆在第二年冬天先到达了韶关以北的石门，大破越军，得到了南越的舰队和粮草，在这里等待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到来。伏波将军带领的军队也是以罪犯为主，到达时只有千余人。两路大军会合后，向番禺进军。在番禺驻扎时，楼船将军选择了城市的东南面，伏波将军选择了西北面，将城市合围。在攻城战中，两位将军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楼船将军采取了直接进攻的战术，而伏波将军则以怀柔为主，到最后，南越害怕汉军的武力，选择了向伏波将军投降。

首都投降后，南越国其余辖区也纷纷投降，就连最南面深入越南境内的瓯骆国四十余万人也选择了投降。

伏波将军路博德等攻破了南越之后，将它并入中央政府的管辖，并设立了九个郡，分别是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和交趾。[135]其中日南、九真和交趾三郡可能都已经深入了越南境内，日南更是直达越南中部，可能已经超出了红河三角洲的范围。

这次战争将番禺（今广州市）变成了中央政府永久性的辖区。在这之前，番禺虽然承认中央的权威，但在行政上却是独立行事的。从这时开始番禺就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官府了。番禺的获得也打开了中央与南海交通的通道，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在未来的中西交流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更加靠南的越南北部地区，这场战争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此以后，越南北部开始了漫长的北属时期，直到唐末五代时，方才趁乱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在这段北属时期，只有两次短暂的起义打断了统治的连续性。其中一次发生在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136]由交趾郡人征侧、征贰两姐妹发动，这次起义只延续了三年

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因此根本算不上一次中断，只是由于越南民族主义的需要，才重新将这次起义提了出来。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541年（大同七年），[137]一个叫李贲的人乘梁朝虚弱和官吏暴虐，发动了起义，三年后建立万春国，史称前李朝。但不久，李贲就被陈霸先率领的梁军击败，失去了地盘。随后南朝进入混乱时期，李贲的后人重新夺取了交州（南朝时越南北部一带的行政区划），直到公元602年（仁寿二年），交州才再次被隋朝代表的中央政府征服。

除了这两次中断，越南北部一直属于中国的中央政府辖区。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岛屿也是在这时被人们知晓：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雷州半岛南端）出发，可以到达一片巨大的陆地，这片陆地现在叫海南岛。在汉武帝时，在岛上建立了儋耳和珠崖两个郡。当时这里已经是化外之地，人民的穿着与汉地完全不同，衣服就是一块布中间挖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这里没有马匹和老虎，只有麋鹿、马鹿之类。兵器大都是木头、竹子或者骨头做的。纳入中央政府之后，由于民风原始，政府派来的官员常常与当地人发生矛盾，这里也是几年就造一次反。到了汉元帝时，统治者就放弃了这里。[138]

再继续往南进入占婆，以及广阔的海洋区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外国。外国和汉朝的关系，往往就是进贡和民间贸易之类。那么，到底有哪些外国曾经来过中国？东汉和西汉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

更遥远的外国之地

西汉时期，虽然民间贸易已经兴起，但人们对于越南北部之外的地理认知还是非常有限的。根据《汉书》的记载，中国南部海岸上交易的主要海外物品包括犀角、象牙、玳瑁、珠玑、银、铜、水果、布匹之类，已经有一批人因为海外贸易而发财了。[139]

交易的最大港口就在曾经的南越国首都番禺，此外，在雷州半岛和日南郡也有港口。

如果从雷州半岛或者更南方的日南郡坐船出海，5个月之后可以到达都元国。从都元国再船行4个月，可以到达邑卢没国。再船行20多天，可以到达谌离国。

从谌离国下船步行10余天，可以到达夫甘都卢国。从夫甘都卢国船行两个多月，可以到达黄支国。

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基本的共识是从马来半岛到缅甸之间。[140]

但对黄支国的异议却较少，一般认为是位于南印度的甘吉布勒姆，这里曾经是南印度一代霸主帕拉瓦王朝的首都，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建志补罗。

在汉代，甘吉布勒姆是一个大的贸易点，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还有很多宝物，更重要的是，从汉武帝开始，黄支国的人就经常到中国来献宝。

这就有了另一个汉代和外国交通的第二个途径：朝贡。

汉武帝时期，除了向西域派出使团，求取宝马和宝物，在南海地区也派人前往搜寻各种奇珍异物。派出的使者叫黄门译长，出海的最远目的地就是黄支国，购买的商品有明珠、玻璃、奇石异物，有的大珍珠直径在2寸上下。黄门译长来到港口，会招募一些人，再带着黄金或者绸缎前往。他们一路上乘着海外商人的船只，辗转于南海。由于海盗盛行，风大浪急，危险很大，即便没遇到意外，也要几年时间来回。

汉武帝高峰过去之后，到了汉平帝时期迎来了另一个高峰。

当时王莽已经开始执政，并为自己篡夺汉朝江山做准备。王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相信谶纬和祥瑞的时期。所谓谶纬，指的是他们相

信每一本儒家经典都是一本预言书，其中的话都暗含着对未来的预言。为此，王莽时代也伪造了许多书（称为纬书），并在书中隐藏了许多宣扬他将会登上帝位的预言。所谓祥瑞，指的是由于“天人合一”，任何人间发生的喜事，上天都会降下一些喜庆的物品来对应，不管是奇怪的鸟儿还是古怪的石头都被认为是祥瑞。[141]

除了全国各地都向王莽进献各种祥瑞之物，这些物品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海外市场。由于汉武帝对于黄支国的开发，王莽也派人前往黄支国，带了大量的礼物，为的是请黄支国进献犀牛角作为宝物。

除了黄支国，在它的南方还有已程不国，有人认为是埃塞俄比亚国，则恐怕过于遥远了。[142]

从黄支国回程，海路8个月可以到达皮宗[143]，从皮宗两个月海程回到日南境内。

黄支国和中国的联系虽然主要是靠“进贡”（实际上是购买），但由于黄门译长们乘坐的船只都是商人的船，这意味着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打开了，只是由于中央政府对它缺乏控制，就没有记录，从而淹没在了历史之中。

西汉时期，由于地理知识的缺乏，很难将南海和西域的地理联系起来，也一直不知道黄支国就在印度次大陆的南部，与北方的天竺/身毒已经很近。到了东汉时代，随着地理概念的加深，人们已经知道从西域出发可以到达的大秦、安息、天竺等国，从海路也一样可以到达。这就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地理环线，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人已经知道大秦、安息和天竺之间有着频繁的海上贸易网络，通过这种交易，商人可以有10倍的利润。但是，大秦人又非常正直，市无二价。邻国的使者到了大秦的边境，就可以乘着驿马到达首都，大秦国王将会赏赐他重金。[144]

大秦国王一直想和中国打交道，但是在陆路上却受阻于安息，因为

安息要从贸易中赚取差价，不会允许两方使者自行交流。

这一段记载与西方历史中记载的罗马帝国喜欢中国的丝绸，不惜以重金购买的说法相吻合。

到了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国王安东尼的使者才从海上经过日南到达了中国，这一次到达也并非没有疑点，这些人到底是安东尼的使者还是商人假冒的，我们都无从得知。即便是大秦国王派来的，也是仅此一次而已。

至于天竺[145]，也曾经在和帝时期数次遣使到达东汉，最初他们走的是西域道。但当西域交通断绝后，天竺又在公元159、161年（延熹二年、四年）频繁地从海上前来出使。

这两种记载在地理上有它的特殊意义，它们都是在史书的“西域传”（记录中国西部的陆路国家）中记载的国家，但是，它们到中国却是从海上过来的。这意味着，在东汉时期，陆上交通已经出现了萎缩，而海上交通却仍然处于上升期。

南北印度长期处于分裂，虽然北印度被贵霜等外来族群掌握，但南印度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类似于海洋文明的传统；尽管邦国分裂，却由于贸易发达而延续了数千年。

在东汉时期，已经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南部的“朝贡”群体，很难说远方的国家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朝贡，但东汉的皇帝却一厢情愿地授予他们一定的职衔标志，表明他们的身份。汉朝对南越国、滇国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在“朝贡国”中，除了大秦和天竺，还有两个小国在《后汉书》中被提到，它们是位于缅甸的掸国，以及可能是位于爪哇岛的叶调国。掸国曾经进献过变戏法的“幻人”，叶调国进献了什么没有载明。在东汉皇帝眼中，叶调国和掸国是同样级别的国家，都被赐予金印紫绶，相当于国内的丞相和太尉级别。[146]

此外，一个当时中国人并不知晓的事实是：根据考古观察，也是在公元1世纪，随着印度商业的扩张，东南亚出现了第一批印度化的国家，它们往往采纳佛教或者印度教作为信仰。在众多的国家中，也出现了第一批东南亚的霸主：扶南和占婆。[147]

扶南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也就是东汉的前半期。扶南出自高棉语Phnom，意思是“山”。扶南王国是由一位叫混填（又称憍陈如）的印度婆罗门，娶了当地的女王柳叶（又称索马）建立的，[148]但他的臣民大都是高棉人。憍陈如去世后，他的儿子混盘况继位，其去世后由儿子盘盘继位。盘盘在继位三年后去世，大将范蔓（又称范师蔓）被推举为王。范蔓开疆扩土，将扶南打造成东南亚霸主。[149]

除了扶南，还有占婆人建立的林邑，也就是占婆国的早期形式。林邑出现在公元2世纪末，恰好是东汉末年。[150]林邑占据了越南中南部的海岸地区，由一个叫区连的人建立。林邑以及后来的占婆共延续了上千年，一直是越南南部控制海道的霸主之一。

西方眼中的东方世界

到了汉代，中国除了知道中亚诸国、贵霜、身毒、波斯，还模糊地知道了亚历山大帝国的残余（黎轩和条支），以及后来出现的强大的罗马帝国（大秦），虽然对于黎轩、条支和大秦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但依然可以说，汉代对当时与它同等重要的远方的罗马帝国是有所认知的。

既然东方对西方有所了解，反过来说，西方有是否意识到东方了呢？特别是西方比东方更早涉足中亚和印度地区，那么它对更加遥远的中国又知道多少呢？

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进军直到中亚，但他并没有翻越庞大的喀喇昆仑

山和帕米尔高原，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他对于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战国时期）的中国有所了解，反而是由于印度与波斯和中亚的联系，亚历山大对于早已听说的印度更感兴趣，于是选择了挥师南下。[151]他对亚洲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只知道中亚北部的斯基泰人和塞人的程度。

而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前425年）在他著名的《历史》一书中，提到了亚洲诸多的民族，有人认为这可能包括了中国人，但从亚历山大后来的远征看，当时欧洲人对于亚洲的认知并没有超过中亚，局限在了新疆西部高山以西。[152]

虽然对于中国尚没有认知，但在希罗多德时代，中国的丝绸却可能已经通过贸易到达了希腊地区，这就是著名的“赛里斯”织物。

希腊之后的罗马时代，直到公元前1世纪，也就是西汉时期，罗马人才知道了远东地区的存在。当时也恰是张骞出使西域不久，因此，可能汉朝的外交活动也有利于罗马人了解到东方。由此，罗马人知道了东方的“赛里斯人”，也就是中国人。但他们并不知道丝绸是如何生产的，于是产生了“丝绸来自树上”的传说，认为赛里斯人从树叶上采集出非常纤细的类似于羊毛的物质，织成了丝绸。[153]直到罗马帝国“五贤帝”的最后一位皇帝马可·奥勒留时期（公元2世纪），西方才知道了丝绸是来自一种小虫子。[154]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时期（公元527—565年在位，中国南北朝中后期），几个在中国住过的印度僧侣，终于将蚕卵带到了东罗马，使得中国丝绸的秘密大白于天下。[155]

此外，西方还总是认为中国人相当长寿，能够活到200岁。[156]

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在中亚的东部有一座高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他们称这座山为塔比斯山，在山的西面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东面就是赛里斯人的领土。而赛里斯南面有一座陶鲁斯山和印度相隔，可以认为就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山。

西方最早对中国的认知是从陆路而来，也就是从罗马经过波斯进入

中亚，再到达中国。但他们也认识到既然中国和印度只隔着一座山，既然可以从海路前往印度，自然也可以从印度经过海路到达中国。有人设想在印度东部的恒河出海口附近，有一个地方叫“黄金之地”，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157]

这样的猜测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世纪，一位不知名商人终于记录了从印度到中国的完整航程。[158]根据他的记载，从印度的东岸先到达恒河河口附近的“黄金之地”（现代人认为可能在缅甸仰光西南方的孟加拉湾海岸上），在“黄金之地”不远处有一个海岛（可能是印尼的海岛之一），从海岛向北方航行，就可以到达赛里斯国的土地，而这个地区有一个叫“秦尼”（Thinai）的城市。至今印度依然将中国人称为“秦尼”，而波斯将中国人称为“秦”，可以表明历史的继承性。

虽然从记载的粗略来看，这位作者似乎并没有亲自从海路到达过中国，但他显然听到过某些到达过中国的水手的传说，表明在当时，从印度洋西部经过印度到中国已经有了海上交通。

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也有人通过陆路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中国。然而这个人却并没有留下名字，而是被一个叫马埃斯的人记录了下来。[159]马埃斯是一个马其顿商人，他自己没有到达过中国，手下却有一批人经过位于现代阿富汗的巴尔赫，顺着阿姆河前行，之后转移到瓦赫什河谷，在那儿，有一个神秘的地点，马埃斯称之为“石塔”，显然是有一个建筑物坐落在那儿。翻越石塔，就到了疏勒与和田，也就进入了赛里斯人的土地。这样的穿越整整花了7个月的时间，还经历了骇人听闻的风暴。

到这时，罗马帝国对于中国的地理几乎了解清楚了，甚至有人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了中国的长城。[160]

虽然罗马帝国和大汉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由于双方距离遥远，作为人类早期帝国模式开创者的两大强权并没有能力进行更

多的接触。双方更多的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和了解，搜集有关对方的情报，建立起地理模型，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之中。不管是大汉还是罗马，更关注的是眼前的政权，当完成了本土的统一之后，罗马需要对付的首先是迦太基、高卢、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及，之后是位于西欧的日耳曼人，而大汉则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对付匈奴上。至于更加遥远的地方，当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整合。

对东方的汉朝来说，贵霜、波斯以西的土地只是传说，它感兴趣的还是征服近处的那些弱小国家。但由于技术和财政的限制，即便想征服位于现代新疆的西域小国，也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军事行动高昂的花费必然将财政拖垮，造成帝国的消化不良，一旦到了汉朝本土内乱时，首先丢失的就是西域。

随着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中国针对西域的第一个时代——征服时代也宣告结束，幸运的是，武力虽然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果，但接下来的另一个时代却将中国和丝绸之路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它是靠共同的信仰来凝聚的，有时候信仰的力量远超过武力。

注释

[1]这个时间是推算出来的，根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张骞出使西域花了13年时间，返回时恰逢匈奴单于（军臣单于）死亡，可以确定年代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从而推知他出发的年份是公元前139年。

[2]参考《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3]参考《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4]参考《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5]张骞出使是在公元前139年，大规模汉匈战争开始于公元前133年（即“马邑之谋”），那时张骞还没有回来，战争就已经展开。13年后，张骞回到中原，汉匈战争方才进入高潮。

[6]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中也提到过。

[7]班固的《汉书》、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古希腊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都提到过这个族群，“塞人”又被译为“塞卡人”“斯基泰人”等。

[8]本段叙述参见《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而《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

宛列传第六十三中称，难兜靡是被匈奴所杀，但根据后来匈奴人收养昆莫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可靠。

[9]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0]参考《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

[11]最典型的意见可参考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2]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3]参考《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

[14]中国早期传说中的“昆仑山”并不是现在的昆仑山，而是神话中无法确定具体地理位置的神山。

[15]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编者注

[16]和田河的上游又有两个分支，分别是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合并之后成为和田河。

[17]此处作者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塔里木河最早曾注入罗布泊，后来改道流入台特玛湖。——编者注

[18]参见《水经注》对黄河的描述。

[19]参见《大唐西域记》。

[20]参考《穆天子传》。

[21]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22]参考《亚历山大远征记》。

[23]参考［匈］亚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勘、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24]关于黎轩和条枝的考证，可参考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5]《史记》中多作“条枝”。——编者注

[26]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27]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鹭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3—49页。

[28]“冉”（rǎn）通“冉”。

[29]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0]参见滇池周边的古滇国遗址，以及大理祥云境内的大波那墓地。

[31]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32]参考《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33]日期参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34]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5]参考《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36]参考《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37]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38]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39]这一点张骞可能是错误的，安息的兵力并不弱，且当时正处于强盛期，就在张骞出使之后几十年内，安息还打败了罗马克拉苏的军队。

[40]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41]张骞此次归国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而元狩四年由于汉军打跑了匈奴，西域的路途才畅通，由此推断出以上时间。

[42]此为《汉书》中的写法，《史记》中作岑娶。

[43]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44]车师又名姑师，汉宣帝时被分为前后两部（国）。前部治交河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后部治务涂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南山中）。——编者注

[45]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46]该湖泊在清代干涸。

[47]此时间根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标注，因赵破奴封浞野侯在该年。

[48]《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载，此战俘虏了楼兰王；《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载，此战俘虏了车师王。

[49]出自《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50]此处应该沿袭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常见的“收继婚”制度，即女子可以在丈夫死后改嫁给丈夫的兄弟或者（非该女子亲生的）儿子甚至孙子。——编者注

[51]参见《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52]即若羌城东80公里处的米兰古城。

[53]包括蒲类前国、蒲类后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卑陆前国、卑陆后国。

[54]根据《汉书》卷六十九上/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下整理。

[55]《汉书》没有记录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和奄蔡的人口数目，但这些国家的人口预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56]《汉书》中记载了几个不同的年份作为都护府的建立年份，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称“神爵三年”，卷八·宣帝纪第八称“神爵二年”，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称“地节二

年”。现代发现的居延汉简中，元康四年即有“都护”一说。综合来看，最早的“地节二年”是最有可能的年份。见余太山《两汉西域都护考》。

[57]参考《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58]《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提到边吏“三岁，更尽还”，即三岁一更。

[59]参考《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60]根据余太山《两汉西域都护考》整理制作。

[61]《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载，乌孙娶亲的时间在元封年间。根据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推测，应不晚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62]《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63]《汉书》没有记载岑陬去世的年份，但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将岑陬之死紧跟在他娶解忧公主之后，似乎表明他活得不久。

[64]此年份根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汉纪十八及《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四十八推定，认为是神爵二年才出发的。

[65]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66]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67]参考《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8]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69]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70]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71]参考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

[72]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这段公路，并对它的险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3]又称县度，塔什库尔干以西诸山口，通往现代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

[74]《汉书》并未指出是哪位国王，此处是根据安息王世系推算出的结果。

[75]参考《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76]参考《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77]参考《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

[78]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79]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80]东汉对西域各国的并吞局面有更精确的描述，也表明东汉人对西域更加了解，不像西汉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去想象各个国家的关系。同时，西域各国在东汉时期更加活跃，也在于匈奴帝国的衰落，使得它们身边缺乏一个绝对的霸主。

[81]关于班超的故事，大部分引自《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82]戊己校尉最初设立于西汉时期的公元前48年（初元元年），为驻扎在车师的屯田官。与西域都护为汉代在西域的两大地方官，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83]位于今新疆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

[84]参考《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85]位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

[86]位于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

[87]参考《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88]《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89]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90]地点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西南，具体位置是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

[91]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西南玉奇喀特古城。

[92]也有人认为，甘英到达的是波斯湾，但从古代丝绸之路西道的道路情况判断，甘英要想去往大秦，并不需要过波斯湾，而是从波斯经过伊拉克和土耳其，即可到达叙利亚。

[93]指唐朝旅行家杜环，其游记《经行记》的部分内容曾在杜佑《通典》中被多次引用。杜环最远曾到达过北非地区。

[94]参考《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95]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96]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97]根据《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书中有关西域的内容大都来自班勇的记载。

[98]《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载："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

[99]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余太山《贵霜史研究》。

[100]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将此部落名记载为Pasiani，但据考证应该为Gasiani，见余太山《贵霜史研究》。

[101]塞人（吐火罗人）征服巴克特里亚发生在公元前140年前后，他们被大月氏征服的时间是公元前129年前后。

[102]此为《后汉书》中的记载，在《汉书》中五翕侯记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

[103]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104]《后汉书》称阎膏珍为丘就却的儿子，但根据新发现的铭文显示，他们之间还有一位

被称为“无名王”的贵霜王。

[105]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106]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马图拉和拉合尔的雕塑，其中马图拉部分见作者已出版的《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107]根据余太山《贵霜史研究》整理。

[108]《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载：“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磐起国又名骠国（Pyu），是缅甸的早期王国。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其首都遗址室利差旦罗（Srī Ksetra），位于现代缅甸城市卑谬（Pyè）。

[109]《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载：“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置国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

[110]又称车离国。《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中有“东离国”，一说为“车离国”之误。——编者注

[111]这个说法采纳了余太山的意见。

[112]一般称为马可·奥勒留。——编者注

[113]参考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114]《中国伊朗编》详细讨论了桃和杏在西方著作中被记录的情况，得出结论：在亚历山大时期西方还不认识这两种水果，但罗马时期已经传入了西方。

[115]《大唐西域记》卷四·十五国的“至那仆底国”部分有相关记载。

[116]参考《中国伊朗编》的“苜蓿”一节。

[117]参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18]《博物志》卷之六载：“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119]《中国伊朗编》的“胡桃”一节，以及《中西交通史》第一编第七章都明确反对胡桃最早是由张骞引入中国的说法。

[120]《西京杂记》卷一载：“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桃十：秦桃、榹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樱桃、含桃。”

[121]《齐民要术》卷四·安石榴第四十一载：“陆机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

[122]《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乐下载：“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123]参考《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124]参考《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125]南越王的名字在《史记》中记为赵胡，但他墓中印玺上的名字是赵昧。

[126]本节对于东南亚民族的叙述，参考了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三千佛塔烟云下》。

[127]扶南国位于今天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编者注

[128]真腊国曾经分裂为北部的陆真腊和南部的水真腊，其中水真腊首都可能位于吴哥保铃（Angkor Borei），陆真腊首都可能位于三坡波雷古（Sambor Prei Kuk）。

[129]占婆首都在越南中部会安附近的美山，之后向南移，最后定在南部的藩朗-塔占，如今，越南的占婆后裔已经成了很小的族群。

[130]《史记》记载为“监御史名禄”，也就是一个叫禄的监御史，其姓已经不可考，一般称史禄或监禄。

[131]另一条路是从贵州走牂牁江进入珠江水系，前文已述。但这条路地理条件更为复杂，并不利于行军。

[132]参考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鹭江出版社，2019年版。

[133]《汉书》称南越延续了93年。

[134]参见《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135]参考《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和《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136]参考《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和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大越史记全书》等书也提到过，但由于成书太晚，已经很难作为信史来使用。

[137]参考《梁书》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

[138]参考《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139]《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140]比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谌离国是位于现代缅甸的骠国悉利移城，夫甘都卢国指蒲甘城。参考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141]王莽时期的谶纬和祥瑞，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

[142]另有说法认为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编者注

[143]可能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香蕉岛（Pulau Pisang）。

[144]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145]此处主要指北印度诸国，而不包括南印度，见下面讨论。

[146]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及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147]参见［法］G.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蔡华校：《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8—83页。

[148]《晋书》等中国文献记载为“混填”和“柳叶”，但在目前发现的东南亚碑铭上则为“憍陈如”与“索马”。

[149]参考《南齐书》。

[150]有关林邑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

[151]参考《亚历山大远征记》卷四。

[152]关于希腊人对亚洲认知的讨论，见《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

[153]出自维吉尔《田园诗》，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4]出自包撒尼雅斯《希腊志》，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5]出自赛萨雷的普罗科波《哥特人的战争》，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6]出自斯特拉波《地理书》（又译《地理学》），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7]出自老普林尼《自然史》，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8]出自《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159]托勒密在《地理志》中记载了马埃斯的故事，李希霍芬考证了马埃斯所提及的地点。

[160]出自阿米安·马尔塞林《事业》，转引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第二部 信仰时代

第五章 一千多年前的背包旅行记

古代背包客旅行记

公元399年（弘始元年），一位僧人开创性的旅程将印度的完整风貌展现在了中国人的面前。[1]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背包客，他们在路上聚聚散散，一路上向着某个目的地前行。有时候吵架了就散开，过几天又在路上不期而遇，相逢一笑，继续结伴而行。也许某些人中途就已经撤出，有些人却又中途加入。旅行结束后，他们的做法也不一样，有的人出了书，有的人只是把这当作一种过程，回归了正常生活。

在古代的旅行，实际上跟现代的背包客很相似，他们也是聚聚散散，回去后各有生活，却又对共同的经历怀念不已。[2]

这位僧人叫法显，但事实上，前往西域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只是这个团队的成员并不固定，在路上也和背包客一样分分合合罢了。这个团队中有的人中途掉队了，有的人走到了印度却决定留下，还有的死在了路上，除了法显，还有其他人也回到了中土，成了高

僧大德。

法显时代恰好处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是分裂的。法显生活在北方的后秦，作为僧人的他对佛教中的律藏（也就是戒律）非常感兴趣。公元399年，由于感叹国内佛经中律藏残缺，法显与几位僧人相约前往天竺寻求戒律。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中，人们非常看重“法”，也就是佛教理论，对戒律却不甚在意。而在印度，有一个支派却非常强调戒律，这一支在中国也有传播，被称为“律宗”，人们熟悉的民国时期的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就是属于律宗的。

最初与法显同行的有四位僧人，分别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现代背包客往往知道，在路上遇到的旅伴是最好的，而提前约好的旅伴却往往出问题，那么，与法显同行的这些提前约好的旅伴又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行进路线。

从长安出发，翻过长安以西的陇山山脉（陕西与甘肃的界山），他们首先到达了位于今天甘肃省兰州市附近的乾归国（当时又称金城），也就是西秦在乞伏乾归统治时的都城。[3]由于处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南方只有东晋一个国家，而北方却处于分裂状态，往往数个国家并立，每个国家的面积都不大，从今天的西安到兰州已经相当于出了国。只是由于每个统治者都对僧人怀着崇敬，才让他们的旅途少了很多危险与麻烦。

按照印度佛教徒的规矩，每年夏天三个月（五月十六至八月十五，或六月十六至九月十五）有“夏坐”的习惯，即此段时间在寺庙中安居，因为印度夏天是洪水季，夏天不外出可以避开洪水。汉地僧人虽然不用担心洪水，但也把夏坐的习惯带来了。[4]法显在乾归城进行夏坐，三个月后，他们继续前行，到了耨檀国，即南凉首都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也就是说，从今天的兰州到西宁，这一段路坐高铁只用两个小时，而在东晋时期，却需要走三个月才能到达。

事实上，几个月后，由于后秦的进攻，西秦王乞伏乾归也将踏上这条路，他是去流亡和投靠南凉的，可见当时各个小国的脆弱。

法显到达南凉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后凉的张掖，这又是另一个国家了。

在如今的西宁到张掖之间，已经修了一条穿越祁连山的高铁线路，铁路在白雪皑皑的山口穿行，窗外风景壮美。但在古代，这里却是一条连接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天路。从西宁向北，经过祁连山，从一个被古人称为“大斗拔谷”（今称扁都口）的谷地进入河西走廊，[5]这条路偏僻、充满了危险，曾经让人谈之色变。法显就是走这条路翻越养楼山（即祁连山）进入张掖的。

他们到达张掖时，这里正经历一场大乱。张掖属于后凉王吕光[6]，但在一年多前，一个叫段业的人夺取了张掖，和后凉对峙。北方的敦煌太守李暠又叛变了张掖，建立西凉，自立为凉王。于是张掖内外交困，道路不通，段业只好将法显等人留下供养起来。

在这里，法显等人遇到了新的旅伴，他们认识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这些人也是要去往印度的。于是他们一同完成了公元400年（隆安四年）的夏坐。整整一年时间，他只是从兰州移动到了张掖，而如果现在的人坐高铁，只需要四个小时而已。

夏坐完毕，道路已经通畅，于是法显等人又向前挪到了西凉的敦煌。在这里他看到了汉代以来修筑的长城，这段长城直到今天仍然保存着，并与明长城一起形成了平行的双城墙结构。[7]

在敦煌停留一个多月后，背包客的习惯来了：法显和最初一起出发的四人决定先走，剩下的人却要继续停留一段时间。先行者和宝云等人依依告别，踏上旅途。他们在刚刚自立为西凉王的李暠的帮助下，进入了西方的沙漠之中。

在晋代时，由于兵荒马乱，东汉时期开辟的新道似乎走的人不多，

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依然要从敦煌前往古楼兰所在地。在两地之间，到达楼兰之前，有一个叫白龙堆的沙漠，由一道道露出白色地皮的沙梁组成，在当时称为沙河。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当地人将这种恶劣的环境人格化，认为这里充满了恶鬼、热风，人只要遇到就会死亡。法显等人只能以死人枯骨作为标志，渡过了沙河[8]。

经过17日的行走，他们走了1500里，才到达了古楼兰，这里在当时被称为鄯善。现在人们去往罗布泊和楼兰遗址，大都从北方进入罗布泊沙漠，但东晋时期，从敦煌西进到达楼兰后，人们反而更愿意选择西南行，沿着车尔臣河走南道，到达位于若羌县的米兰古城（前楼兰首都伊循城），然后汇入塔克拉玛干南沿的诸绿洲。

法显时期的鄯善已经是佛教国家，有4000余小乘僧人，但土地很贫瘠。[9]从这里向西，每一个小国都差不多，他们每个国家说的胡语不同，但有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也是学术语言，叫天竺语（梵语），僧人们依靠天竺语进行交流。

作为对比，在张骞时的汉代，西域绿洲的语言却多是类似于伊朗语的吐火罗语，可见在短短两三百年时间里，印度的佛教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进行了重新塑造。

法显等人在鄯善住了一个月，继续出发。不过，这时的法显却走了一条有些奇怪的路，按照东晋时的情况，离开鄯善之后，应该向西南方进入塔克拉玛干南沿的若羌、且末一带，但法显等人却选择了北道，北上穿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到了沙漠北沿、天山南麓的焉夷国，可能位于现在的新疆焉耆县内。[10]

焉夷国有4000多小乘僧人，对待法显等人很戒备，供给也不足，法显等人得到了一位姓苻的人的资助，住了两个多月。与此同时，宝云等人也从敦煌来到了这里，背包客们又短暂地会齐了。

不过由于焉夷国的人不愿提供帮助，智严、慧简、慧嵬三人盘缠不

够，无法继续后面穿越沙漠的行程，只好转身向东，去往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吐鲁番市东边的高昌古城）寻找资助。高昌在焉夷之东，十六国时期的前、后、西、北凉都建立了高昌郡，是大乘佛教基地。也就是说，同样信奉大乘的汉僧可以在这里寻求帮助。

慧嵬是从长安就跟随法显的僧人，而智严、慧简则是在张掖时遇到的，这时，两拨僧人已经混在了一起，不管是西行的还是东行的，都包括了两拨僧人里的一部分。

离开焉夷，法显等人再次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经过了一个月零五天，到达了于阗。[11]

这样，法显实际上两次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第一次从南向北，第二次从北向南，比起从楼兰直接到米兰的路远了不少。在古代，人们要么走南道，要么走北道，以减少穿越沙漠的难度，却几乎没有人会这样选择在北道和南道之间往返，仿佛故意寻找沙漠去穿越。很有可能第一次穿越只是虚构的，是法显等人汇集了其他人的资料，而后人在写传记时又将这些记载归到了法显头上。

于阗在西域是一个大国，这里物产丰富、人民安乐，僧众有数万人之多，也以大乘学为主。现在的于田县清真寺林立，而在法显时代，却是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小佛塔，有的高达两丈多。[12]

法显等人在国王的安排下，住在了一个叫瞿摩帝的大乘寺庙，寺庙里供养着三千僧人。这座寺庙现在遗址尚存。[13]法显印象最深的是三千人一起吃饭的场景，人们进入食堂次第而坐，一切寂静无声，不准说话，放碗筷都没有声音。要求加饭也必须用手指，不能动嘴。

在于阗，背包客们再次分道扬镳。法显待了三个月，而慧景、道整、慧达先出发去往竭叉国[14]。其中慧景、道整属于与法显一同从长安出发的，而僧人慧达是何时加入的，书上没有写，变得不可考了。

法显还特别写了四月初一的迎佛仪式（即“行像”）。从这一天开

始，于阗国内14座大寺庙将佛像（高3丈多）放在四轮车中，从城外送入城内，城门楼上的夫人、宫女等纷纷撒花。国王脱去冠冕，换上新衣，到城外迎接佛像。由于每一个寺庙选择不同的日期进行行像，一共要热闹14天才告结束。

四月行像之后，僧绍也出发了，他跟随一些西方的僧人直接向罽宾出发，从于阗去往罽宾，也可能要经过前三人去的竭叉国，但也有可能直接选择捷径，绕过竭叉国去往如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带。

剩下的法显等人则向子合国前进。子合国又叫朱驹波、朱俱波等，可能位于如今新疆叶城县西南的棋盘乡一带，已经靠近西昆仑山区，这段路走了25天。

朱驹波有千余大乘僧人。法显等人在这里住了15天。之后向南行走4日，就进入了茫茫的葱岭之中，在一个叫于麾国的地方完成了公元401年（隆安五年）的夏坐。这一年，法显等人穿越了整个新疆，从张掖到达了叶城，将无数的沙漠甩在了身后，速度也比前两年快了很多。

接下来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之一。

在新疆的西南部，首先是巨大的西昆仑山，这里有著名的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公格尔九别峰三座7000米以上的巨型雪山。过了西昆仑山，就是更加著名的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后者更是拥有数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就在其中。

夏坐完毕，法显等人用了25日穿越了西昆仑，到达了竭叉国，与惠景、道整、慧达会合，背包客的主体又会合在一起了。竭叉国位于昆仑山西脉、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之间的一个谷地，如今也是通往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门户。在竭叉国以东，人们的穿着还像汉地，竭叉国以西，不仅衣着变了，连生活习惯、食品、植物也都变了，只有石榴、甘蔗和竹子这三样与汉地相同。这里也可以看出，汉代从西方引进的石榴已经被当作汉地的水果，入乡随俗了。

在竭叉国，法显赶上了五年一次的大法会。国王请了四方的僧人前来，他们坐在金银莲花座上，接受国王的供养。国王供养僧人大都在春季，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一般1—3个月。国王供养完毕，再由群臣把僧人接走继续供养，但这一次的时间多为1—5天。然后国王和众人对僧人进行布施，最后恭恭敬敬送走。

法显等人在经历了这繁华之后，就要面对着更加艰难的葱岭山路了。

一千多年前的阿富汗

离开了竭叉国，他们向着谈之色变的葱岭进发。

作为葱岭重要组成部分的帕米尔山结[15]可以算作地球上一个奇迹。人们谈起山脉来，大都认为山脉是一个条状地带，即便规模如喜马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也都符合这个规律。但在帕米尔，所谓的山脉却并非是条状的，而是如同一团乱麻，是许多个山脉在这里打了个结。

帕米尔山结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与世界上著名的几大山脉有关，这些山脉分别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这四条山脉如同四条飘带，突然在帕米尔打了个结，形成了一片高地。因此，帕米尔才被称为“真正的世界屋脊”，是对生命而言环境最恶劣的所在。人们传说葱岭藏着毒龙，常常喷出毒风、雨雪、飞沙、碎石，将行人害死，[16]事实上，这都是恶劣的自然环境罢了。

事实上，去往“西天”并不一定走葱岭，在新疆西部大致有三条主要通道，可以通往国外，分别是：第一条，从天山以北或者伊犁河谷进入现代哈萨克斯坦境内，这里以草原为主，是游牧民族常选之路；第二条，从天山以南进入现代吉尔吉斯斯坦的道路，也就是进入费尔干纳谷地，从前去往大宛地区的道路；第三条才是翻越葱岭进入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的道路。[17]

比如更早的张骞就走了前往大宛的道路（第二条），这条路在葱岭以北。到达大宛后，就可以绕过葱岭的主体山脉，从中亚的河中地区（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进入阿富汗，再翻越阿富汗境内相对矮小的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

而法显所走的葱岭道是难度最大的一条，却是通往南亚的近路，可以绕过中亚和阿富汗，直接进入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与现代的中巴友谊公路的路线相似。[18]

法显花了一个月，才翻越了葱岭，直接进入了巴基斯坦境内的北天竺。在一条叫达雷尔（Darel）的河流（玄奘称之为达丽罗川）旁，有一个小国叫陀历，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达地斯坦（Dardistan）一带。这个小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曾经是西域道路上一个重要地点。法显来时，这里有一个高8丈、足长8尺的木像，据说是有罗汉将工匠送上兜率天[19]，根据弥勒菩萨真身打造的。根据传说，这个像是在佛陀圆寂后三百多年造的，另一个传说又认为，这个像造好之后，恰好就是天竺的僧人过河到达汉地，将佛教带往中国的时候。[20]

从陀历向西南行15日，在新头河（今印度河）河谷中上下，这里的河谷是河水硬生生在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中劈出来的。在荒凉如同月球的地表上，一条泥水河奔流而下，几乎没有河岸存在。为了顺着河谷行走，人们只能在悬崖峭壁上凿开一条路。如今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公路就修在附近。这条用生命筑起的公路，其实运载能力极其有限，却承担着中巴走廊的巨大重任。

过了新头河，进入斯瓦特河谷，就到了当时人们认定的正宗的北天竺乌苌国。这个国家的首都在现在巴基斯坦的曼格勒（Manglor），距离大城市明格拉（Mingora）不远。[21]如今属于巴基斯坦复杂的西北民族区域，与阿富汗接壤，是塔利班活动的高发区域之一。

乌苌国有500座寺庙，都信奉小乘佛教。据说佛陀当年到北天竺漫

游，到乌苌国就止步了。这里也因此留下了一系列佛迹，比如佛陀足迹、佛陀晒衣石、佛陀度恶龙处等。晒衣石高一丈四，宽两丈许，其中一边是平整的。

到了乌苌国，一路上最艰难的地方也就过去了。[22]

在这里，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再次提前出发，前往那揭国[23]去看佛影神迹[24]。虽然他们的路线绕过了巴基斯坦，不用穿越兴都库什山，也不用前往阿富汗北部，但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也就是现代阿富汗的东南部，也有不少佛迹，其中有的佛迹（最著名的是佛影）是全世界闻名的，在中亚的知名度比菩提伽耶都高。许多西域的佛教僧人去朝圣，就是以看佛影为最高目标。从中国来的僧人自然不会错过，需要绕一点儿路去看一看位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那些景点。慧景等三人先出发，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去，法显等人只不过要先转一转其他地方，再前往那揭国去观赏这些地点。

送走了三人，法显等人在乌苌国完成了公元402年（元兴元年）的夏坐。这一年，法显翻过了死亡之地葱岭，来到了地势较为平缓的乌苌国。最高大的山脉被他甩在了身后。

夏坐完毕，法显等人南下到宿呵多国（在斯瓦特河沿岸）。佛教相信转世轮回，传说佛陀的前世尸毗王曾经来到过这里，帝释天为了试验他的仁心，化作老鹰和鸽子，由于老鹰要吃鸽子，鸽子又向尸毗王求救，尸毗王只好割自己的肉换取鸽子性命。这里也因为割肉救鸽而成名。

从宿呵多国向东行5天，就到达了西域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国家：犍陀罗国[25]。犍陀罗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周边，以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地域广大，拥有多座城市。但白沙瓦在历史上却是著名的贵霜帝国的首都之一，也曾经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区、丝绸之路南线的最重要中转站。法显最初没有进入犍陀罗的首都，而是到了犍陀罗的一个小城

犍陀卫，这里属于小乘佛教区域，有一个金银装饰的大佛塔。

从犍陀卫向东行7天，已经接近现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在那附近的拉瓦尔品第地区有一个国家叫竺刹尸罗国[26]。这里，以及东面两日行程处，分别有一个圣地，前者是佛陀前世月光王将自己的头施舍给人的地方，后者是佛陀前世萨埵那太子将自己喂老虎的地方，这两处都有大塔，各地国王施舍无数。

佛教虽然发端于数千里之外，但当犍陀卫国这个地方皈依了佛教之后，其虔诚程度显然比菩提伽耶等正宗的佛教发源地区还高一等级。在菩提伽耶等地，佛教已经进化到了探讨理论的程度，但在外围区域，人们却将佛教改造成一种以神话传说为主的信仰。于是，佛陀的各种前世身份不得不一次次地来到这里，遭受各种灾难来彰显神迹。

印度佛迹大都是佛陀真的到过并修行过的地方。而巴基斯坦地区由于过于遥远，显然佛陀“此生”没有到过，人们只好宣传他的前生了。

在古代，人们要从今天的阿富汗去往印度，并不经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个首都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是巴基斯坦独立后才建立的[27]。在古代要去往印度，是从犍陀卫向南走，在更南方的位置进入印度。于是法显回到了犍陀卫，向南行4天，到了一个叫弗楼沙的城市，他称之为弗楼沙国。所谓弗楼沙国，就是法显时代犍陀罗真正的首都，也是现代白沙瓦市所在地。弗楼沙国有一个当时举世闻名的建筑：高40余丈[28]的巨大佛塔。这个高度已经将近百米，是乐山大佛的1.5倍高。佛塔一直存在了数百年，直到玄奘时期依然完好。[29]

弗楼沙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圣物叫佛钵，传说是佛陀当年使用的。贵霜王攻取了这里之后，在佛教感召下皈依了佛教，想把这个钵拉走，用了8头大象都拉不动，只好在原地建塔。如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去麦加朝拜一样，佛教徒们也喜欢到弗楼沙国将自己的供养放在钵里，钵的容量大约有2斗，但据说有的穷人放一点儿，佛钵就满了；而有的富人放

了百千万斛，佛钵也不见满。

在中国北方，佛教是从中亚传入的，而中亚的佛教是在贵霜帝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眼中，所谓西天朝圣，不是去往印度的菩提伽耶，而是去往贵霜帝国的首都弗楼沙。在与法显同行的人中，宝云、僧景两人西行的目的就是来供养佛钵，他们并没有想去往中天竺地区。现在，既然完成了任务，他们就要回国了。

慧景、慧达、道整三人本来已经先去了位于阿富汗的那揭国去供奉佛影、佛齿等佛迹，按计划，他们应该回到弗楼沙国与法显见一面，但慧景在路上病了，道整留下照顾他，只有慧达一人回来，在弗楼沙国与法显见面。

见面完毕，慧达、僧景、宝云三人一同离开，踏上了归乡之路，慧应在佛钵寺去世，加上在焉耆失散的智严、慧简、慧嵬三人和在于阗分开的僧绍，背包客们在一番聚散后，终于要分开，各做各的事情去了。法显此时的伴侣就剩下了在养病的慧景和照顾他的道整两人，且还没有会合。

虽然人手越来越少，法显还是决定先不往天竺方向，而是先去那揭国看佛影。

从弗楼沙国向西行16由延[30]，就到了那揭国。这里大约相当于今天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如今是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通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交通要道，也是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和塔利班争夺的中心地区。

在法显时代，那揭国是一个圣物汇集的地方，在它旁边一个小城有佛顶骨，那揭国本身有佛齿塔，城东北还有佛锡杖，而最神圣的则是城南半由延一个石室内的佛影，是古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的一大神迹。

所谓佛影，可能是石头上一块天然的如同佛像的印记，离着十余步

观察，这块印记显得比较清晰，走近了之后，又变得暗淡，若隐若现。

这些神迹在穆斯林到来后全都消失了，换成了现代的伊斯兰教神迹。

法显在那揭国度过了三个月的冬天，与慧景、道整会合后，终于向着最后的目标——中天竺赶路了。他们向南翻越小雪山。所谓小雪山，就是贾拉拉巴德之南的萨菲德山脉（Safed Koh），这里也是塔利班盘踞之地，由于山势复杂，洞穴遍布，美军用炸弹都无法将他们从山洞中炸出来。这里也是罂粟遍地的地方，因为战争破坏了水源，无法种粮食，人们只好种罂粟来解决经济问题。

小雪山对法显等人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山上大雪纷飞，风暴骤起，将几位汉地僧人困住。慧景由于身体弱，终于吃不消走不动了，他口吐白沫进入了弥留状态。他告诉法显：我已经不行了，你快走，不要都死掉。[31]

慧景死后，法显抚尸痛哭，不得不向前翻越山岭。这可能是这位百折不挠的汉子最悲伤的时刻。

阿富汗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地区，它曾经让无数的英雄豪强望峰息心，也曾经葬送了无数的性命和野心，这一次，几位倔强的中国僧人也尝到了这堵世界之墙的冷酷。[32]

第一次详细的南海记载

法显不仅是最早记载了西域详细行程的旅行者，还是第一个留下了文字记录的东南亚海路探险者。“一带一路”这个名词在法显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因此，在叙述法显在天竺经过的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他返回时在东南亚的经历。

在回程中，由于天竺佛教的中心区域菩提伽耶更容易通过恒河与大

海连接，而天竺通过海路与汉地进行贸易交流的经历，在当时已经被广泛认知，法显就没有选择从中亚返回，而是借助了海上的贸易之路。

在中国古代，虽然西域更加“有名”，但事实上，贸易量更大的南海却“有实”。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贸易的南海道，到了魏晋时期更是出现了大发展。而法显就是这种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返回路线是这样的：

天竺最繁华的地区在北部的摩竭提国，首都是巴连弗邑。[33]从巴连弗邑沿恒河向东18由延，经过了恒河南岸的瞻波大国，再继续沿河近50由延，就到了著名的海口地区多摩梨帝国。[34]

多摩梨帝国这个名字还将在中国的史书中无数次出现。它现在只是一个小村庄，但在历史上，却承载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印度文明最丰富的区域在恒河沿岸，特别是古代的摩竭提国，现在的北方邦一带，由于地处内陆，也和中国一样属于内陆文明。

但印度和中国不同，在于印度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文明区域，而是有多个区域中心，这些区域中心有的属于内陆文明，有的属于海洋文明。在天竺东西两侧的沿海地区，海岸上有着与摩竭提不同的文明区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东西海岸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和贸易非常频繁，但天竺内陆的佛教中心摩竭提要想和外界联系，却并不十分方便。[35]

如果要从恒河沿岸的摩竭提核心区前往东南亚，必须顺着恒河而下，到达这个叫多摩梨帝的国家，在这里才能登上海船，开始航海的行程。

从多摩梨帝也有两条海路与外界连接，一条是前往师子国的，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它作为天竺东南的大海岛，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从师子国又有船前往东南亚地区；另一条路是直接从恒河河口坐海船前往东南亚地区，但这条路在东晋时期使用的人少，开发也较晚，很难找到船只。

可以这样形容，头一条路是一条国际通路，除了天竺北方船只，还有天竺南方船只、波斯船只和东南亚船只；后一条路是区域性道路，船更少，受天竺影响也更大。

在法显时期，如果要尽快回国，必须到师子国转船，那儿船更多，更容易搭到船。

但法显到了多摩梨帝国之后，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在那儿住了两年，一方面学习写经和画像，另一方面打探归乡的消息。

公元409年（义熙五年）冬，他终于找到了一艘商人的大船，这艘大船是前往师子国的。由于季风的原因，从天竺东北部海岸要想前往师子国，必须首先等待冬天的到来，再借助吹往南方的信风推动，才更加容易到达。到了这年初冬，法显登上了船，经过了14天的航行，踏上了师子国的土地。

在佛教历史上，师子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从地理上看，它似乎应该拥有独立的文化，但事实上，它却很早就从天竺传入了小乘佛教，因此是一个小乘佛教的重点地区。在天竺本土的佛教势力衰微之后，小乘佛教的传播主要靠师子国完成。更重要的是，现代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作为最主流的小乘佛教区域，它们的佛经都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经过斯里兰卡的航海路线传入的。[36]

印度的小乘佛教也称为上座部，是佛教的早期形式，到了后来才有大乘佛教。[37]在印度，除了著名的梵文，还有一种与梵文有亲缘关系的文字巴利文，大乘佛教使用梵文传播，而小乘佛教却采用了更加大众化的巴利文书写。东南亚上座部佛教使用的经典叫“巴利三藏”，最初是师子国从天竺引入的，后来又传到了东南亚。巴利三藏传入中国的变种，就成了著名的《阿含经》。《阿含经》是佛教早期的结集，更接近于佛陀时期佛教的本意。反而后期大乘佛教的佛经越来越多，呈现失控的局面，与小乘佛教采用少量原典的做法形成对比。

法显时期的师子国以出产珍珠著名，这里草木繁茂，没有冬夏之分，在贸易的推动下，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大国了。[38]

现代斯里兰卡首都是在西南海岸的科伦坡，但在古代，首都却在北部山区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法显称之为王城。这里有高40丈的大塔，也有佛陀的大脚印和佛齿。还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是斯里兰卡当时的国王从菩提伽耶通过压枝的方法移植而来，也就是由菩提伽耶大菩提树的一根枝条长成的。传说，佛陀在菩提伽耶的大菩提树下悟道，因此这棵树对于佛教世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后来，菩提伽耶的大菩提树死了，人们想到斯里兰卡还有这棵树的“一部分”，于是又从斯里兰卡将此树的枝条移回印度，完成了再生。现代人们去往菩提伽耶，还能看到这棵树的存在。

大塔旁有一个巨大的佛寺（无畏精舍），有五千僧人。在佛殿中有一个高2丈多的青玉像。法显突然看到，在佛像旁有商人放的一把中国白绢扇子。离家多年的他看到后潸然泪下，神情凄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除了信仰将中国与印度连接起来，贸易也已经涉足了世界性的交通，将古代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法显在师子国等待的时间里，也游历了岛上其他地区的寺庙。除了首都的无畏精舍，在东边40里山上还有跋提精舍（僧人二千），城南7里的摩诃毗诃罗精舍（僧人三千）。法显还在这里见到了一位高僧大德火葬的场景。

在师子国住了两年之后，公元411年（义熙七年），他再次找到了一艘大商船，决定搭乘它返回汉地。

大船上有两百多人，后面系着一艘小船（救生艇）。出发两天后，大风袭来，大船漏了。人们纷纷上小船避难，但先上了小船的人怕跟着上来的人太多，会导致翻船，于是砍断了两船之间的绳子。

此刻法显还在大船上。大船上的人为了自保，只好将用不着的东西

往海里扔去。法显也跟着将随身的物品扔下船去，但他死死地护着佛经和佛像，不准人们将它们扔掉，他一心念着观世音的名号进行祈祷，希望得到保佑。

仿佛菩萨听到了他的祈求，经过了13天的大风，船终于在一个海岛靠岸了。

从路程上说，这应该是归属印度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中的一个岛，但具体是哪一个，已经不可考了。在这里，人们修理了船底的漏洞，继续出发。

对中国人来说，大海是和沙漠一样恐怖的地方，在大海里除了风浪，危险还有暗礁、迷路，以及海盗。除此之外，一些神奇自然现象也让人感到恐怖，法显看到了夜间水中的荧光，也将其视作一种危险。

又过了90多天，船终于到了一个叫耶婆提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叶调[39]，可能位于现在的爪哇岛。从这些记载上看，这艘船走这段路花的时间太长了。在东南亚海中，有两个海峡可以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门户，分别是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法显的船可能为了避开海盗，绕到了苏门答腊岛的外侧，走巽他海峡进入印度尼西亚的群岛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月，发现这里已经被印度教统治了，是“外道”的天下，佛教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这一点和后人对于东南亚受印度教影响的认知恰好吻合，根据现代人的研究，[40]印度教最早进入马来群岛的时间也恰好是在公元4世纪。

在耶婆提，法显找到了另一艘大船，这艘大船也有两百多人。他们带了50多天的干粮上路，目标是广州。公元412年（义熙八年）四月十六，船出发了。由于与乘船的日期冲突，法显的夏坐就在船上度过了。

一个多月后，大船再次遭到了大风雨，船上的印度婆罗门商议，认

为遇到风雨就是船上有这名佛教僧人的缘故，要想让风雨平息，只有将他弃置在荒岛上，让船上形成纯粹的印度教环境。

在关键时刻，带法显上船的商人帮了忙，他威胁众人说："这位僧人是我带上来的，如果要让他下去，就把我也赶下去！如果不赶我，就把我杀了！否则，到了汉地，我一定向当地国王告状！"[41]

众人感到害怕了，没有赶走法显。而我们感兴趣的则是，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得知，在东晋时期的广州，应该已经有了不少印度教商人的身影。

但这一艘船却没有那么幸运。经过70多天后，早已经过了应该到达广州的日子，干粮吃光了，水也快没了，却还是没有见到陆地。按照正常情况，只需要50多天就可以到达广州。人们开始用海水做饭，留下淡水只供饮用，一人分了两升，就这点儿水也快喝光了。

商人们很纳闷儿，觉察到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向西北方寻找陆地，又经过了12天，他们才看到了陆地。

船只靠岸后，周围没有看到当地人的踪迹，大家还都在猜测到没到广州。他们派了一艘小船顺河进入内地，终于看到了两个猎人。法显表明身份后，用汉话询问这里是哪儿，猎人回答：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界。

他们实际靠岸地点是现在的山东青岛一带，已经偏离了航向数千里。此时，已经是公元412年七月十四[42]。

表4 法显所经的国家和城市[43]

国家或城市	对应的现代地区
乾归国	甘肃省兰州市附近
耨檀国	青海省西宁市
鄯善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罗布泊楼兰古城
焉夷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内
于阗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一带
子合国	又名朱驹波、朱俱波，大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西南棋盘乡
于麾国	大约位于叶城县西南，属于帕米尔高原地区
竭叉国	又名朅盘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陀历国	巴基斯坦达地斯坦一带，达雷尔河旁
乌苌国	巴基斯坦曼格勒一带
宿呵多国	巴基斯坦斯瓦特河沿岸
犍陀卫国	巴基斯坦白沙瓦市附近
竺刹尸罗国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拉瓦尔品第地区
弗楼沙国	巴基斯坦白沙瓦市
那揭国	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
罗夷国	大约位于巴基斯坦罗哈斯（Lohas）
跋那国	巴基斯坦本努（Bannu）
毗荼国	巴基斯坦比达（Bhida）
摩头罗国	印度马图拉
僧伽施国	大约位于印度北方邦法鲁卡巴德市（Farrukhabad）桑吉沙村（Sankisa）
罽饶夷城	又名曲女城，位于印度根瑙杰（Kannauj）

续表

国家或城市	对应的现代地区
沙祇大国	印度勒克瑙旁边的阿约提亚（Ayodhya）
拘萨罗国	印度北方邦及尼泊尔部分地区
舍卫城	印度北方邦北部
迦维罗卫城	又名迦毗罗卫国，位于尼泊尔蓝毗尼附近
蓝莫国	尼泊尔达马里附近
拘彝那竭城	又名拘尸那罗，大约位于印度哥拉克普尔（Corakhpur）以东格西亚村（Kasia V.）
毗舍离国	又名吠舍离，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穆扎法尔布尔地区
摩竭提国	又名摩揭陀国，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以巴特那为中心的区域
巴连弗邑	古称华氏城，位于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
王舍城	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北拉杰吉尔（Rājgīr）
伽耶城	印度比哈尔邦格雅（Gaya）
迦尸国	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Vārānasi）一带
波罗㮈城	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
拘睒弥国	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西南 30 里的柯桑村（Kosam）
达嚫国	印度中部默哈讷迪河及戈达瓦里河上游一带
瞻波大国	印度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市
多摩梨帝国	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德姆卢格市
师子国	斯里兰卡
耶婆提国	大约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

有趣的是，在法显回到中国的三年前，公元409年（义熙五年），东晋权臣刘裕进行了一次北伐，第二年将盘踞在山东一带的南燕灭亡，[44]这时青州才归属了东晋。法显西行时是从长安出发，所属的国家是后秦，他一路上经过了西秦、南凉、后凉，到了汉地以外，返回时的目的地广州属于东晋。然而，他由于偏离了航向，差一点儿和东晋失之交臂进入南燕，却又由于刘裕的北伐，最终还是到达了东晋。到法显去世的公元420年，刘裕终于篡夺了东晋的皇位，中国南方进入了南朝时期。

但不管当时的中国政治是多么复杂，作为僧人，无论在西秦还是东晋，法显都受到了尊重。这表明，东晋十六国时期除了战争，实际上僧人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碎片化的国界，可以方便地游走于破裂的大地上。

法显作为第一个环游了中国和印度（天竺）的人，也表明一带一路的交通已经成形了。当印度不再是传说时，法显在印度又经历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回头再看法显在印度的经历。

法显的印度世界

在到达印度时，法显应该感到幸运。印度的历史总是聚少分多，只有短短的几个王朝代表了它的帝国时代，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代表了位于这片次大陆上的众多小国家。

但法显却赶上了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时期。在印度，除了信奉佛教的孔雀王朝，其次（对于印度教而言甚至更伟大）就是笈多王朝了。[45]

人们常常谈论印度三大古代王朝，其中贵霜由于是外来人建立的，在印度往往不被承认，而信奉印度教的笈多王朝被认为是正宗。

笈多王朝崛起于贵霜王朝衰落之后，在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公元380年开始）达到了鼎盛，而这也恰好是法显到来的时期。

笈多王朝除了留给我们一个帝国的回忆，更发展出了独特的新印度文明。[46]这是一个属于科技、工程、艺术、文学、逻辑、数学、天文、宗教和哲学的时代。在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宫廷里，除了征服者，还有被称为“九大明珠”的学者。他们之中为首的是迦梨陀娑，他写出了梵语文学的最高成就《沙恭达罗》。还有数学家、天文学家阿耶波多，他

的成果如此之多，我们可以把他比作印度的张衡，甚至比张衡还要伟大：他创造了数字“0”，使得印度的十进制计数法趋于完善，当西方人从波斯接受了这套计数法后，印度的数字成就便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他还在圆周率、三角关系式、级数恒等式上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在天文学上，他得出了“地球是圆的”这一结论，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行方式、解释了日食和月食等。

这还是一个属于《爱经》的时代，当西方世界正处于禁欲的挣扎中时，印度人却学会了享受性的愉悦，并把它上升为一种艺术，将人性从冰冷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印度人还发明了国际象棋，这个小小的格子棋盘最终会风靡全世界，成为最流行的棋类游戏。

总之，在印度人的回忆中，灿烂的笈多王朝几乎成了天国的代名词，笈多的宫廷充满着有教养的人，君主进行着贤明的统治，在宫廷之外，各个阶层都安守本分：婆罗门祀奉着那些主宰着天地宇宙的大神，刹帝利维护着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吠舍为整个社会提供着富足和贸易，而在他们之下的阶级，则为治国者和祭祀者提供着食品和其他各种物质享受，这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47]

但笈多帝国又和古代中国的模式不一样。按照古代中国的标准，一个王朝应该是一个集权式的单一国家，但笈多帝国并不符合这个标准。事实上，即便在笈多王朝，印度还是有很多个国家。而其中最强盛的一个是位于印度中北部的摩揭陀国，笈多王朝就是在摩揭陀国基础上产生的。周围其他的国家虽然服从于笈多帝国，却又是半独立的王国。它们只是尊崇摩揭陀国的国王，向他朝贡，但摩揭陀国王却无法插手这些王国内部的日常事务。

所以，法显到来后看到的，依然是众多的城市国家。但帝国架构的存在，使得各地的秩序井然，旅行者能够安然往来。在其他大多时候，

在印度旅行则是危险重重，随时可能遇到强盗或者不服从国际秩序的小国君。[48]

经过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附近的小雪山，法显经过了一次夏坐（公元403年，元兴二年），又过了几座城市国家，包括罗夷国、跋那国，渡过新头河后又有毗荼国，进入了中天竺。[49]

此时，他已经穿越了巴基斯坦中部的平原，来到了印度北部大平原之上。北天竺也由此终结，法显来到了佛陀生活过的中天竺。这里的遗迹不再像之前那样是人们虚构的，而是佛陀真实经历过的。这里曾经是佛教世界的中心，却由于遥远，第一次对中国人掀开了面纱。

关于中天竺的情况，法显做了细致的描写。这里各个国家的国王都信奉佛法，供养了大批僧人。中天竺的气候寒暑调和，没有霜雪，人民殷乐，没有户籍官法，耕种王家土地需要缴税，这些耕种者也是来去自由。刑罚也很轻，大部分依靠罚钱解决，犯下谋逆大罪的惩罚是砍掉右手，不至于死。这里的人们不喝酒、不杀生、不吃葱蒜，这显然与食素有关。

但法显也发现，当地有一部分人是不受此约束的，这部分人叫旃荼罗[50]。当初，来自欧亚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原本居住在南亚次大陆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是白人，达罗毗荼人更接近于棕色人种；雅利安人为了维持统治，实行了种姓制度，其中雅利安人占据了高种姓，而达罗毗荼人则成了不入流的种姓旃荼罗。旃荼罗人不需要遵守婆罗门教的规矩，因为婆罗门教本来就是雅利安人带来的；他们可以饮酒吃肉，但社会地位极低，处处受到歧视。按照法显的说法，旃荼罗人进城甚至要敲击一种木头，让其他人听到了好避开他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了笈多王朝，印度已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印度教国家，佛教已经衰落了。

中天竺诸国不养猪、鸡，不卖牲口，没有屠夫和酒家，货币用一种

贝壳。家家户户供养僧人，信奉佛教。

从这里到离开印度，法显都没有碰到大山，大部分地区很平坦。他还认为，从这里向南直到南天竺和大海，都没有高山存在。[51]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去到印度中部的高止山脉，当然，高止山脉与中亚大山比起来，也只算是小山包而已。

法显在南天竺碰到的第一个城市叫摩头罗，在一条叫遥捕那[52]的河流旁边。在现在印度古都阿格拉（泰姬陵所在城市）的西北方，有一个小城叫马图拉（即摩头罗），小城边流淌着著名的河流亚穆纳河（即遥捕那河），这条河继续流淌，就到了下游城市阿格拉。马图拉现在很不起眼，但在古代，却是贵霜王朝在印度中部的首都。[53]

贵霜王朝除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在印度的马图拉也设立了行政中心，形成双中心。因此，在贵霜王朝以及笈多王朝，马图拉都是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只是到后来才衰落了。即便如此，印度许多著名的贵霜时期的雕塑仍然是出土于马图拉。

法显时期，马图拉（摩头罗）还有二十座寺庙和三千僧人。

从摩头罗离开，向东南18由延，有另一个国家叫僧伽施[54]，这里有僧人千人。法显在这个国家的龙精舍完成了公元404年（元兴三年）的夏坐。

从僧伽施东南行7由延，就是著名的曲女城，法显称之为罽饶夷城。城市挨着印度最重要的河流恒河（法显称为恒水）。曲女城是佛教里一个重要的圣地，是佛陀为弟子说法处。恒河南北两岸都有佛陀说法的遗址。

从曲女城东南行10由延，就到达了沙祇大国。这里位于现在印度大城市勒克瑙旁边的阿约提亚。阿约提亚现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里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地区，被认为是印度教大神罗摩[55]出生的地方。在中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皇帝巴布尔[56]又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清

真寺。随着现代印度教的复兴，印度教徒们在领袖们的号召下，将清真寺拆除，引起了印度国内血腥的种族冲突。在法显时代，沙祇城却是一个大国拘萨罗国的古都。从沙祇城向北8由延，到了拘萨罗国的新都城舍卫城。

舍卫城是法显经过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城，这里有著名的祇园精舍（法显称祇洹精舍）。根据佛教传说，佛陀在这里居住了25年。精舍在城南门外1200步，东向开门，门户两边有两根阿育王石柱，左柱头是法轮形，右柱头是牛形。园内池塘水流清洁，林木茂盛。

在法显时代，舍卫城的宗教关系非常复杂，围绕着祇园精舍有98座佛教寺庙，除了一处空的，其余都住人。但在98座寺庙之外，还有96种“外道”存在。所谓“外道”，就是信奉印度教、耆那教等与佛教有关联却又不是佛教的宗教。

在舍卫城周围，还有不少圣迹，比如城西50里有迦叶佛的诞生地，东南12由延有一个叫那毗伽的地方，是拘楼秦佛（又称拘楼孙佛）的诞生地，再北行不到1由延，是拘那含佛的诞生地等。

印度最早的佛教把佛陀当作一个修行得道的人，以及众人的导师，这个定位与中国的孔子很相似。可是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佛陀被神话成了“佛”，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了。再后来，人们开始相信，佛陀也是有前世的，因为世界经历过多次的毁灭和重生，也就是劫。在每一劫时，都会有一个佛陀来开导（而不是拯救）人类，这些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今世。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已经有六位佛出现过，其中第四、五、六位分别是拘楼孙佛、拘那含佛和迦叶佛。[57]

如果说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是历史遗迹，那么其余诸佛的出生地就来自人们美好的想象了。

从那毗伽东行不到1由延，就是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了，法显称之为迦维罗卫城。[58]城东50里有一个王家园林，这里就是佛陀的诞生

地，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蓝毗尼。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和印度边境附近的平原上，历史上曾经属于印度。但由于已经在边境地区，接近喜马拉雅山系，这里的人口不多，经济也不发达。法显到达时，迦毗罗卫国以及附近已经荒芜，人烟稀少，四处都是大象、狮子等动物。

在蓝毗尼，至今仍然有当初阿育王树立的石柱，宣称这里就是佛陀诞生之处，并宣布对这里免税。[59]

蓝毗尼向东5由延，有一个叫蓝莫（玄奘称之为蓝摩国）的国家，这里有一个供奉佛舍利的佛塔，四周荒无人烟，但有很多大象取水洒扫。继续向东19由延，就到达了佛陀涅槃的地方拘彝那竭城（一般称为拘尸那罗）。这里已经到了现代印度境内，是佛教四大圣地[60]之一。在法显时代，同样人烟稀少。

从拘彝那竭城东南行12由延，再东行5由延，到达毗舍离国（一般称为吠舍离国），这里也是佛教重要圣地之一，佛陀曾经居住的地方。佛陀住在城北的大林重阁精舍。佛陀涅槃前，就是从城西门而出，前往拘彝那竭城的。

从毗舍离东行4由延，有一个五河合口的所在。这里是北天竺交通要道，有五条大河[61]汇聚在附近。从印度北方最大国家摩揭陀（法显称为摩竭提国）前往毗舍离，就要经过这里。

过了河，南下1由延，就到了摩竭提国的首都巴连弗邑。这里有阿育王所建的最高佛塔，并有阿育王所立的石柱。摩竭提国是中天竺的中心，也是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佛陀当年的生活主要就在这个国家展开。巴连弗邑虽然是首都，但在信仰上却没有地位，反而是这个国家南部的区域因为佛陀的圣迹而变得更加著名。

从巴连弗邑向东南行9由延，就到了印度佛教史上最大的圣迹群。首先到达的是一个叫小孤石山[62]的地方。尽管名叫“孤石山”，实际上却位于一片连绵山地的东段，这片山地逐渐过渡成平原，在两种地形的交

接处留了一块孤独的石头，这就是小孤石山了。小孤石山有佛陀修行的石窟，但这个圣迹与周围的其他地方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从小孤石山向西南行1由延，再西行1由延，就到了著名的王舍城。王舍城有新城和旧城之分。先不说新旧城的区别，且说周围的山峰。在周围地区，大部分都是平原，却在一片广袤之上突然耸起了一圈黑白石头的山峰。这一圈山峰出现得如此突兀，不愧为鬼斧神工。人们之所以如此崇拜它，恐怕和山势雄奇也有极大关系。

更神奇的是，这一圈山峰中间围绕着一片平地，将这片平地与周围的平原分隔开来，成了一片易守难攻的所在。按照印度的说法，这一圈山又可以根据几个缺口的位置，分成五座小山脉，因此就有了“五山”的说法。在五山之中，最著名的就是法显下面提到的耆阇崛山（一般称为灵鹫山、鹫峰山）。这座山之所以神圣，也是因为佛陀曾经在此打坐。

王舍旧城就在五山环绕的平地之中，而新城在旧城以北，位于刚刚出了五山包围圈之外的平地上。如果从新城继续向北，就可以到达一个叫那烂陀的地方，这里的寺庙在整个佛教世界首屈一指，研究的理论也是最高深的，是后来唐代高僧玄奘的主要修行地，也是几乎所有唐代高僧前往印度后必到的地方。[63]但在东晋时，这里似乎还没有那么大名气，法显并没有去这个寺庙。

法显到达王舍城时，山内的旧城已经荒芜，人们大都搬到了更加方便的新城。法显专门从新城买了香、花、油、灯，请两位认识的僧人送他上了耆阇崛山。据说，佛陀在这里讲了一篇经文《首楞严经》。法显一边拜佛，一边背诵着《首楞严经》，停了一晚，才回到新城。除了耆阇崛山上的石窟，还有很多高僧大德在五山上留下了印记，不一一叙述。[64]

从王舍新城向西4由延，就到达了佛教另一大圣地伽耶城。城南20里，就是佛陀悟道的菩提伽耶所在。这里有一条小河叫尼连禅河，佛陀

就是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最终悟道，因此，菩提伽耶也可以视为佛教的耶路撒冷和麦加。

法显称佛教四大圣地为“四大塔”。到这时，除了鹿野苑，他已经都到过了。

菩提伽耶有一座巨大的金刚塔，这座塔是印度教风格的，却代表了佛教最神圣的所在。塔旁就是佛陀悟道的菩提树，如前文所述，现在菩提伽耶的这棵树是斯里兰卡那棵树的枝条长成的。

从菩提伽耶向南3由延，就到了迦叶尊者所在的鸡足山。如今，在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有著名的佛教名山鸡足山，就是以此山而得名。云南大理佛教盛行的地区似乎习惯于用印度佛教圣地的名称命名本地景点，于是鸡足山也就从印度到了中国。[65]

法显到达了三大圣地之后，决心要把最后一个圣地鹿野苑也走到。鹿野苑在菩提伽耶的西方，由于他从西方过来时，绕到了更加偏北的蓝毗尼，就把靠南位于恒河边上的鹿野苑绕过去了。要想去往鹿野苑，只好回头向西走，从迦耶回到恒河边的巴连弗邑，顺恒河向西（上游）走水路10由延，在一个叫旷野精舍的地方休息。之后再继续沿恒河西行12由延，就到了迦尸国波罗榇城，也就是今天著名的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

印度人崇拜恒河，而瓦拉纳西就位于恒河边，是印度人理想的葬身之地。但在瓦拉纳西城旁边还藏着一个佛教圣地，在它的东北10里左右，就是鹿野苑。佛陀悟道后，第一次就是在这里讲经，获得了他的第一批信徒，从此佛、法、僧三宝齐全，佛教正式诞生。

除了鹿野苑，法显还可能到达了鹿野苑西北13由延的拘睒弥国（《大唐西域记》中称为憍赏弥），这里也是佛陀住过的地方。

另外，他还记载了一个传说中的达嚫国，距离鹿野苑南200由延，他承认自己没有去到那里。

法显从鹿野苑返回到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伽蓝（大乘寺）得到了一部戒律。他来天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戒律，据说这部《摩诃僧祇众律》[66]，是佛陀在世时实行的，从祇园精舍流传出的抄本。另外，还有一部《萨婆多众律》，有7000偈，汉地实行的大都是这部律法，只是没有形成文字。此外，他还得到了数部经书，这些经书，成了中国人亲往印度取经的起始点。

法显在巴连弗邑住了3年，学习梵文，抄写律法。巴连弗邑也就成了法显在天竺最深入的所在。在这里，跟随法显的最后一个同伴道整感慨终于找到了归宿，决定留下，不再回去。于是法显只能独自上路，经过南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如果比较法显和后来的玄奘，可以看到法显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普通僧人的身份前往印度的，而玄奘除了开始阶段比较艰辛，到了高昌后，则一路上有人帮助，以一个高僧的身份来到了印度。这其中的差别反映在各自的文本上，让玄奘的书看上去更像是学术著作，而法显的书却保留了更多的个人色彩，也显得更加可信。

比玄奘幸运的是，法显到达的印度，恰好处于印度文明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观察对我们了解古印度文化更加有用。

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达到高峰，但此时在印度本土反而是印度教的天下。只是由于印度没有中央集权的传统，使得印度教与佛教、耆那教等长期共存，才有了佛教一定的发展空间。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也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与印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是中国分裂的极致，而笈多王朝却已经是印度统一的高峰，这一点差别，决定了两个国家未来不同的走向。

法显的旅友们

法显去往爪哇和苏门答腊时，发现当地大都信奉“外道”，也就是印度教，佛教在当地几乎没有影响力。

他不知道的是，其实佛教在东南亚的扩张也早已开始。在他之后仅仅过了十几年，爪哇当地就已经皈依了佛教，印度教的影响力在减小，佛教的影响力在上升。

法显所到的国家叫耶婆提，在另一种文献中，它可能被称为阇婆国[67]。阇婆国皈依佛教，和一个叫求那跋摩的西域僧人有关，从求那跋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国僧人是如何在中印之间穿梭的。

求那跋摩是罽宾[68]人，事实上，他是当地一个小国王的后裔，不过这个家族的支系从他的祖父开始就疏离了政治。求那跋摩本人则选择了隐居修行。到了30岁时，由于当时的国王绝嗣，人民希望拥有王室血统的求那跋摩担任国王，而他对王位毫无兴趣，连忙避位进入山野，不与人接触了。之后，求那跋摩也采取法显的线路，穿越了整个印度，先到达师子国，再坐船前往阇婆国。

他到达阇婆国的时间，在法显到阇婆国十多年后。在这里，他首先度化了国王的母亲，让她皈依了佛教。之后，国王也选择了佛教作为信仰。但国王的选择又是世俗的，因为求那跋摩利用信念帮助国王打胜了一场战争，促使整个国家彻底倒向了佛教。国王只皈依能够帮助自己的宗教。当阇婆国皈依之后，爪哇岛的其他政权也纷纷转向了这个更加“时髦”的宗教。

求那跋摩在阇婆国的名声也穿越了大海，一直传到了汉地。这时的汉地已经从东晋进入了南朝的刘宋时期，汉地高僧慧观、慧聪等人请求宋文帝邀请求那跋摩到汉地来。

在宋文帝的邀请下，求那跋摩先是到了广州，公元431年（元嘉八

年）正月，他进入了当时的首都建康。[69]

从求那跋摩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法显时代，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通畅的道路，西域的僧人们宁肯绕远，也要避开帕米尔高原和沙漠地区，选择海路进入中国的南方。

此外，与法显同行的人也并非无名小卒，他们许多人都在后来对汉地佛教的稳固和印度佛学在汉地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法显的同伴中，有两个人更加著名，他们是智严和宝云。

智严是法显在张掖认识的，但智严到了焉夷，就因为盘缠不够，转去了高昌，从此再也没有和法显相见。但智严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去往西域，而是在后来又前往了罽宾地区，并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学习禅法，赢得了当地僧人的尊重。

回到中土的时候，他还带回来一个西域僧人佛驮跋陀罗。当时，在长安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政权。到了公元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大将刘裕灭亡了后秦，在东晋大臣王恢的盛情邀请下，智严又来到了南方的晋地。这样，当初在西域同行的法显和智严就都来到了南方。南朝宋取代了东晋之后，智严一直在南方修行。

到了老年，智严突然决定再次前往天竺，这一次他走的是海路，从南方到了中天竺，再到达了北天竺的罽宾，后来就在那里去世了，时年78岁。[70]

至于宝云，则与法显同行的时间更长，他们一同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之后，宝云返回了汉地，依然是从陆路回来的。与智严一样，后来宝云也来到了南方的东晋和南朝宋，主持了不少译经工作，于公元449年（元嘉二十六年）去世，时年74岁。[71]

除了这些和法显同行的人，事实上，法显开创的旅行传统已形成了一种风潮。在前往印度的道路上，有许多僧人都跃跃欲试。这一点，很像现在的背包客们去往西藏一样，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各显神

通，或者自驾，或者骑车，或者坐飞机，或者搭车，当然，也总免不了出现危险。

比如，公元404年（弘始六年），有一大拨僧人在一个叫智猛的僧人的率领下前往西域，之所以说是一大拨，是因为他们这个僧团有15人。这15人经过流沙、鄯善、龟兹、于阗，在过葱岭时已经有9个人退出了。剩下的6个人在过葱岭时，又损失了一个叫道嵩的僧人，他在葱岭遇难。

剩下的人终于进入了印度的地界，并到达了摩揭陀首都华氏城。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像法显那样走海路回国，而是又从陆路返回了。在陆路返回时，路上又有3人遇难，最后回来的只剩下了智猛和昙纂两个人。[72]

公元420年（永初元年），又有一大拨僧人前往印度，这次的僧团竟然有25人之多，为首的是一位叫法勇的僧人。和其他僧人不同，法勇起了个梵文名叫昙无竭。[73]他最大的功绩就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前往印度，而这些人大部分或死或散。

昙无竭的传记中，对于过葱岭一带的描写可谓最传神。在葱岭上，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在两山之间由于没有通路，只好在半山腰拉绳索当桥。过溜索时，以10人为一组溜过去，到了对岸，要放点儿烟告诉后面的人自己已经过来了，这样其他人才能再过桥。如果久久不见烟柱升起，就知道大风把溜索吹断了，这一批人全都掉到下面的江水里淹死了。

过了三天后，又是大雪封山，这一次悬崖绝壁上无法立足，但古人已经在绝壁上凿了一些孔洞，每排两个孔。每个人要带上四根木棍，在相邻的两对孔洞里插上木棍。当人们踩到上面那对木棍时，就把下面那对拔掉，再插到更上面去，就这样利用孔洞加上木棍，花一天时间才能登顶。

到了顶上，一查人数，发现有12个人不见了踪影，他们或许死了，或许失散了，不管怎样，掉入了历史的黑暗夹缝里，再也不为人所知晓。

到了罽宾国，他们又翻山去了月氏国（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最后又南下去往天竺，到这时，又有8个人遇难，于是25人的大队只剩下了5个人。

历史没有记下其余4个人的命运，只知道法勇（昙无竭）最后通过南海道回到了广州，之后就没有了记载。

法勇的遭遇或许是西域道和南海道最鲜明的对比，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西域道被南海道逐渐取代的趋势。

表5 《出三藏记集》记载的中国去往西域的僧人[74]

姓　名	籍　贯	时　代	去往地域	简　介
朱士行	颍川	三国魏甘露五年	于阗	曾在洛阳讲经，后从雍州去往西域，在于阗求经
法显	平阳②	东晋隆安三年	天竺	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慧景于途中遇难。游历30余国，仅法显经过师子国，从南海返回，在青州长广郡劳山南岸登陆。道整终老天竺
智严	未知	东晋到南朝宋	罽宾、天竺	第一次由陆路去往罽宾，第二次由海路去往天竺，于罽宾去世。弟子智羽、智达、智远归西域
宝云	（据说）凉州	东晋隆安初年	天竺	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
智猛	雍州京兆郡新丰县	后秦弘始六年	鄯善、龟兹、于阗、波沦国③、罽宾、天竺	15人从长安出发，在葱岭9人退出，4人遇难，只有智猛与昙纂回到凉州
法勇	幽州黄龙国	南朝宋永初元年	罽宾、天竺	僧猛、昙朗等25人与行，其中12人遇难（或失踪）于葱岭，另8人于中天竺遇难。法勇从南天竺坐船回到广州

b《出三藏记集》称法显为“平阳武阳人”，但东晋十六国期间平阳郡只有平阳县而没有武阳县，故武阳应为平阳之误。

c 波沦国即勃律国，是大、小勃律的合称，位于今天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内。大勃律位于巴勒提斯坦，小勃律位于吉尔吉特。——编者注

表6 隋以前从中国出访西域的佛教徒[75]

时　代	人　数	姓名可考的僧人
西晋	3	朱士行、竺叔兰（原籍天竺）、竺法护（原籍月氏）
东晋	51	于法兰、康法朗、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法领、法净、昙猛、法显、宝云、智严、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简、僧绍、智羽、智远、僧景、慧达、智猛、慧叡
南朝宋	70 余	沮渠京声、道泰、法勇、僧猛、昙朗、僧纯、昙充、竺道曼、智猛、昙纂、竺道嵩、道普、法盛、法献、法维、僧表
北朝魏、齐、周	19	昙觉、威德、道荣、惠生、宋云、法力、子统、王伏、宝暹、道邃、僧昙、智周、僧威、法宝、智昭、僧律

在中国历史的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代，促使中国、西域、印度、南海地区进行交流的，除商业上的原因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僧人群体。这些人不事生产，却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可以随时获得供养。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不达西天不罢休，还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将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路线、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记录，而获得对一带一路地区的认知。

因此，这一个时代是信仰的时代。我们也有必要追述信仰时代的起源和发展，在最后，随着信仰高峰的过去，它也必然会被更加现代、更加商业化的另一个时代所取代……

第六章 分裂与信仰

分裂的内亚

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

首先，雄踞一时的北匈奴已经不存在了。匈奴最早于公元前44年（初元五年）出现了第一次分裂，从位于蒙古的王庭分裂出一支由郅支单于率领的分支，历史上称为西匈奴。公元前36年（建昭三年），郅支单于败亡。[76]西匈奴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逃出了历史的视野，到了公元4世纪，却突然出现在了欧洲，成为欧洲罗马帝国的劲敌，它的首领阿提拉更是被称为“上帝之鞭”。[77]

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留在东部的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78]其中南匈奴归顺了汉朝，被安排在汉地边境上。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作战，在东汉时期，汉人主要就是和北匈奴对抗。

就好像强劲的对手总是同时衰老一样，随着东汉王朝的解体，北匈奴也进入了衰老期，甚至比东汉王朝消失得更早。大约在公元155年（永寿元年），北匈奴被一支叫鲜卑的游牧民族打败，鲜卑人成了北方草原的主角。[79]

原本在汉地的东北部还有一支叫乌桓[80]的部落可以与鲜卑人竞争，但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乌桓被曹操击败后，北方彻底成了鲜卑人的跑马场。[81]

在北匈奴消失的同时，南匈奴却依然臣服于汉地，并在魏晋时期屡

次内迁，最终分布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地区，成了抵挡游牧民族对汉地入侵的首道屏障。

除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之外，东汉时期在长安的西方，还有另一支羌人，他们曾经是对东汉政权破坏最大的少数民族，贯穿东汉，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对东汉的经济和政治破坏巨大。[82]到了三国两晋时期，羌人依然是活跃的民族。

在甘肃、陕西、四川的交界地带，还有一支氐人存在，三国形成初期，陕西的汉中地区是被一个叫张鲁的人占据，当曹操击败张鲁之后，将氐人迁移到了如今的甘肃省天水市和陕西省汉中市一带。[83]

此外，从属于南匈奴部落的，还有一支可能是由奴隶演化来的族群，称为羯人[84]。

曹魏和西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成了北方环绕汉族的少数民族。在西域地区，由于匈奴的衰败，西域的各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和曹魏、西晋的联系。鄯善、龟兹、于阗、焉耆等大国都有入朝的记载，甚至大月氏、康居、大宛等域外国家也有往来。[85]

不过这时由于缺少了大国的干涉，西域内部的整合加剧，形成了若干国家集团。比如，鄯善征服了且末、小宛、精绝，组成了一个国家集团；于阗征服了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皮山国，形成了另一个国家集团。中道上的焉耆、龟兹、疏勒，北道上的车师后部等，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国家集团。[86]

表7 曹魏时期西域诸道上的国家[87]

道　路	国家或国家集团（括号内为下辖国家）
南道	鄯善（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于阗（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皮山国），大月氏（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临儿国②、车离国③、盘越国④
中道	焉耆（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龟兹（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疏勒（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脩国、琴国）、大宛、安息、条支、乌弋、大秦（泽散王、驴分王、且兰王、贤督王、汜复王、于罗王）⑤
北道	车师后部（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乌孙、康居、乌伊别国、柳国、岩国、奄蔡国、呼得国、坚昆国、丁令国、浑窳国、屈射国、隔昆国、新梨国

b 此为佛陀所生之处，应为迦毗罗卫国，或相近的蓝毗尼地区。

c 即前文提到的朱罗国。

d 又名汉越国，位于印度东部那加山脉与缅甸西部钦敦江上游一带。

e 这些王对应不同的城市，比如，泽散王可能对应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贤督王可能对应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汜复王可能对应今天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等。

在曹魏和西晋初期，由于中央政府还有足够的控制力，这些北方部族还不敢过于放肆，可从公元291年（元康元年）开始，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88]。这场持续了16年的大战乱将西晋王朝搅得四分五裂，外围的游牧部族也不再听从中央，甚至试图取代它。

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地方政权。公元296年（元康六年），氐人杨茂搜在甘肃南部的仇池山建立了仇池政权。[89]公元304年（永安元年），氐人李特和儿子李雄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公元308年（永嘉二年），匈奴人刘渊在北方建立了前赵政权。[90]取代前赵的是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公元319年建立）[91]。灭亡后赵的是汉人冉闵建立的冉魏政权，冉闵于公元350年（永和六年）称帝后，大肆屠杀胡人，试图避免胡人控制中原的局面。但两年后的公元352年（永和八年），冉闵就被鲜卑慕容部杀死，冉魏灭亡。

鲜卑慕容氏更是先后建立了前、后、南、北、西五个燕国。[92]此外，有一支慕容部的人马还从东北地区跑到了青海湖以南，建立了一个

叫吐谷浑的国家。

前燕灭亡于氐人政权前秦（建立于公元350年，永和六年）。前秦曾经短暂地统一了中国北方，却又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击败，北方再次分裂。前秦被羌人建立的后秦取代，法显去往西域时期，就是后秦控制了长安地区。在甘肃地区还分裂出一个由西部鲜卑人建立的西秦，后来被夏国灭亡。

公元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先后灭亡了南燕和后秦。但为了争夺帝位，刘裕选择了南返，于是，后秦所占的关中平原又落在了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史称胡夏）手中。[93]

除了上面这些国家，与西域联系最紧密的河西走廊地区也出现了五个凉国。其中，西晋凉州刺史、汉人张轨在西晋灭亡后，仍然以西晋的名义控制着河西走廊。公元317年（建武元年），他的后代建立了前凉国。[94]

由于前凉的统治区域只限于河西走廊，反而让凉王对西域集中精力，更加具有进取心，试图控制整个西域，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郡治。公元327年（咸和二年）[95]，前凉击败了位于高昌的叛将，在这里设立了高昌郡。这就是法显的伙伴们能够到高昌寻找帮助的原因。之后，前凉先后攻伐龟兹、鄯善和焉耆，获得了西域的控制权。

也是在前凉时代，张骏从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划分出两个州，分别是沙州与河州。其中沙州治敦煌郡，负责西域地区；凉州（剩余部分）治武威郡（也是首都姑臧所在），负责中部地区；河州治金城郡（现甘肃省兰州市一带），负责南方地区。[96]

公元376年（太元元年），前凉被鼎盛时期的前秦所灭。前秦的威慑力维持了西域对中原的臣服。但没有几年，前秦就灭亡了。在前秦王苻坚进攻东晋之前，他派出了一位叫吕光的氐人将领前往进攻西域。前

秦灭亡后，吕光随即占据了凉州，于公元386年（太元十一年）建立了后凉。[97]但这时的凉州已经越来越碎片化，除吕光占据姑臧之外，鲜卑人秃发乌孤在乐都建立了南凉，匈奴支系卢水胡首领沮渠蒙逊建立了北凉（定都张掖，后凉灭亡后迁都姑臧），汉人李暠盘踞酒泉建立西凉。

这四凉中，只有北凉存在的时间较长，公元439年（太延五年）被北魏大军攻破首都姑臧，但还有一支残余势力跑到了高昌重新建国。高昌北凉直到公元460年（和平元年）才被柔然灭亡。在这些凉州政权中，高昌始终是国家的最前线，继续向西，就是由西域当地人掌权的羁縻政权，只有高昌是实际掌握在凉州统治者手中的。

虽然当时的中国是碎片化的，但在这些碎片的缝隙中，佛教却悄然而入，成了许多国家尊崇的信仰。这其中的原因，除印度佛教已经到了门口之外，也和当时中国原生信仰的崩溃有关。由于汉代采取了儒教式信仰，儒教不同于儒家，它不强调个人思考，却只强迫人们服从于“天”这个权威，并把皇帝当作天的代表，从而让人们必须服从于皇帝和政权。这样的做法让汉人形成了集体主义观念。

当统一的国家分裂后，造成的幻灭感让人们不再相信“独尊儒术”这些教条式的东西，他们需要更加思辨、更加个人化的信仰来取代汉代的儒教，在本土产生了思辨性的玄学，而玄学的许多观念又和佛教是暗合的。比如玄学强调“无”，而大乘佛教强调“空”。加之碎片化的政权已经无力再强迫人们回归统一的信仰，于是佛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中国。[98]

万里远征为高僧

公元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九月[99]，一支大军在河西走廊集结，准备出征龟兹。军队共有7万人，指挥官是前秦骁骑将军吕光、陵

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100]这支队伍中除了前秦的士兵，还有西域车师前部和鄯善国的军队。

这支大军的出发，恰好在淝水之战前期。在与东晋的战争中，苻坚四处搜刮人马，派出的大军号称80余万[101]。为了统一中国的南北两部，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的兵力。除了氐人本部，同盟国的军队也几乎被他搜刮一空。但在这要紧关头，苻坚竟然分兵7万去攻打一个西域的小国，似乎表明他对西域的重视。

如果人们知道他出兵西域的原因，会更加吃惊。这次出兵，除了降服西域这个目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去请一位高僧。

这位高僧就成了万里远征的重要目标。但是，苻坚这么重视的高僧到底是谁呢？他叫鸠摩罗什。而苻坚的这次出征，让中国的佛教信徒至今仍然感谢他。

根据传说[102]，鸠摩罗什的家族曾经是天竺某个国家的国相，他的父亲鸠摩炎本来要继承国相的职位，却选择了避乱出家，东度葱岭来到了龟兹。在龟兹，他再次被聘为国相，并与龟兹王的女儿成亲，生下了鸠摩罗什。

在当时，龟兹已经成了西域最强盛的国家，笃信小乘佛教，鸠摩罗什从小就和母亲接受了佛教的熏陶。之后，年幼的他跟随母亲前往罽宾国，拜罽宾国王弟、著名僧人槃头达多为师，学习小乘教法。

12岁，鸠摩罗什回到了葱岭以东，在西域南道上疏勒、莎车等地游学。在莎车，他首次接触到了大乘佛教，并很快被大乘折服，做出了皈依的决定，他也从此将大乘佛教带到了龟兹。他在龟兹名声远播，除了传遍西域，就连东方的长安也知道了他的存在。

在长安，经过了多轮风云变幻，上台的是前秦王苻坚。公元376年（太元元年），苻坚灭亡了前凉，派遣大将梁熙为凉州刺史，负责西域事务，治所定在了姑臧。梁熙随即派人出使西域各国，赐给他们绢彩，

要求他们前来进贡。于是西域国家有十余国前来，奉献了许多西域特产的动植物。[103]

到了公元381年（前秦建元十七年，东晋太元六年），贡献的国家越来越多，累积起来竟然达到了62国之多。[104]在这些国家中，有两个对前秦来说更加重要，他们是南道上的门户国家鄯善，以及北道上的门户国家车师前国。其余的国家只是贡献方物，这两个国家却是国王亲自来朝拜。

苻坚赐给两位国王上朝的衣服，把他们引到西堂进行会见。两王对于前秦宫殿的壮观感到很震惊，主动要求每年都来进贡（这意味着能够获得大量的赏赐），但苻坚坚持叫他们三年一贡，九年一朝。

当礼节规矩制定完，两位王突然提议，表示在西域虽然有62个国家进贡，但大部分国家只是口服却并没有心服，特别是西域大国龟兹，更是成为一方霸主，要想控制西域，首先要降服龟兹。

两王的说法引起了苻坚弟弟苻融的怀疑，他认为西域由于偏远贫瘠，得不偿失，不值得兴师动众。但苻坚坚持出兵，于是就有了吕光等人的北伐。

在吕光出发时，苻坚给他在建章宫饯行，对他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高僧叫鸠摩罗什，是国运的大宝，如果你攻克了龟兹，就立刻把他带来。[105]

原来在五年前，苻坚就已经知道了鸠摩罗什，那一年有太史根据天象认定有大德之人要来辅佐苻坚。苻坚就猜测，所谓大德之人，莫过于北方的鸠摩罗什与南方的释道安。为了与天象合一，他派人去龟兹请鸠摩罗什，却被拒绝了。这次，当鄯善和车师前国怂恿他出兵西域，他立刻想到了龟兹的鸠摩罗什。想要得到这位僧人，是他出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吕光的军队从长安出发，一路集结。大军走西域北道（即《后汉

书》中提到的新道）[106]，从玉门关出发，向北在沙漠穿行。一路上，他们走了300里都没有遇到水源，士兵眼看就要渴死，吕光却还在坚持前行。幸运的是，就在他们陷入绝境时，突然间大雨倾盆而下，平地上都积了三尺水。他们经过高昌到达焉耆，焉耆王选择了投降。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并不好办，他们从焉耆继续前进前往龟兹时，龟兹王帛纯却选择了抵抗。

吕光在城南扎营，五里一营，中间用深沟高垒连接，又用木头刻成人形，在垒中广设疑兵。龟兹将城外的人民全部赶到城内，其他各个附庸城市也都婴城自守。[107]

当吕光进攻急迫时，龟兹王请来了一支叫狯胡的救兵，加上温宿、尉头等国，一共70万人前来救助。[108]这时吕光反而成了少数派。但是这些救援兵力都散在较长的攻击线上，反而是吕光将军队合在一处，进行重点突破，击败了救援的军队。

当援军被击退之后，龟兹王也逃走了，将周边30余座城市留给了吕光。与城市一并被拘的还有那位高僧鸠摩罗什。[109]

在所有的战利品中，有一样东西也很引人注目，那就是葡萄酒。现代人对新疆的葡萄印象深刻，这个特产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一千多年前，龟兹就是产“蒲桃”（葡萄）的好地方，当地人善于做酒，有的人家甚至可以积累千斛葡萄酒。当时的造酒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就像现在一样可以保存十年不坏。吕光的将士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酒，立刻就沉浸在酒缸之中。至于其余的外国珍宝、珍禽异兽，竟然用了两万多头骆驼才拉完，可见龟兹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有多么富裕。

这次出征，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龟兹地方有许多西域的音乐家和表演者，吕光将他们带往内地后，汉地的音乐从此加上了西域的味道，而这种音乐到了唐代更是大放异彩，成了主流。

与此同时，前秦王苻坚却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吃了败仗，吕光攻

克龟兹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向前秦败退的苻坚处，苻坚下令给吕光封官加爵。不幸的是，此刻的前秦已经解体了，苻坚也处在险境中，他的政令已经无法传到西域了。[110]

在西域的吕光也不得不做出决定，到底是留在西域，还是回到中原？

按照他的想法，是想留在龟兹割据一方，又远离汉地，不用再卷入汉地的纷争。但鸠摩罗什却劝说他回去，由于将士们都思乡心切，远在异乡并不是好主意，吕光听从了他的建议，踏上了回程。[111]

不过，与苻坚对鸠摩罗什的敬重不同，吕光却认为鸠摩罗什只是个年轻人（其实他已经年近四十），看不出是高僧大德的样子来。在带他离开前，为了羞辱他，吕光将龟兹王的女儿送给了他。鸠摩罗什不敢破戒，吕光于是将他灌醉，和王女关在一间屋子里，逼迫他们破戒。这也是鸠摩罗什第一次破戒。[112]

大军到了凉州，才听说苻坚已经被杀，在长安已经是姚苌建立的后秦政权。吕光决定割据河西走廊，此时苻坚任命的凉州官员们都已经投降了吕光，于是吕光一方面下令为苻坚三军缟素，另一方面建立了后凉政权。

原本苻坚是要鸠摩罗什到长安去传经，但由这时于长安已经成了敌国城市，吕光就把鸠摩罗什留在了凉州，这一留就是17年，几乎陪伴了整个后凉王朝的始终。

公元401年（后秦弘始三年），随着后秦击败了后凉，后秦主姚兴才有机会将鸠摩罗什迎接到了长安，这里也成了鸠摩罗什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站。

鸠摩罗什到达长安时，恰好也是法显离开不久。法显于两年前刚刚踏上西行之路，为了避开后凉占据的武威（即姑臧），还专门选择了一条从现在的青海西宁翻越祁连山、北上张掖的道路。法显西行是为了取

经书和律藏，这说明当时汉地的佛教正处于纷纭复杂的繁荣时期。所谓繁荣，是指佛教已经成为汉地的显学；所谓复杂，指的是佛教的教义本来就五花八门，又分化出许多门派，各有各的经典。但这些经典虽然都是翻译自印度，由于译师的能力问题，翻译成汉语也是良莠不齐。本来就不容易弄懂，再加上翻译造成的隔膜，僧人们辩经时基本就是鸡同鸭讲。

这种情况下，汉地急需要一位既懂梵文又懂汉文，且具有很高佛学造诣的人牵头将一批梵文经典重新翻译和校对，形成标准文本。各大教派都学习这个标准文本，统一学术术语的前提下，再进行辩经的效率会高得多。

鸠摩罗什最早学习小乘，后来又转入大乘，不仅会梵语，在凉州十几年间对汉语也已经精通，他就成了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

为了让他译经，姚兴为他配备了800余人的庞大的团队，他也不负众望，在11年内共翻译了经论35部294卷。[113]佛教经典中著名的《维摩诘经》《梵网经》《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中论》等都出自鸠摩罗什，从此以后，凡是汉地修大乘佛教的人，都不可能再避开鸠摩罗什的影响，即便到今天也是如此。

在这些经文中，后人尝试过许多次重新翻译，比如玄奘也重新翻译过《维摩诘经》《金刚经》[114]，玄奘的翻译虽然从意思上可能比鸠摩罗什更准确，但从通俗性和文学性上，依然无法与鸠摩罗什相比，现在人们最常用的仍然是鸠摩罗什的经文。

鸠摩罗什虽然弟子众多，但他却很少称这些人为弟子。除了谦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遵守一个僧人的戒律。除吕光强行将龟兹王女儿送入他的房间之外，到了长安，“好心”的姚兴再次故技重施，将10名妓女送给了鸠摩罗什。姚兴虽然信奉佛教，却并不按照佛教的戒律来理解佛教。他认为，鸠摩罗什聪明超悟，天下无二，这样

的人如果没有儿子，岂不是断绝了法种？

鸠摩罗什拒绝时，姚兴不仅逼迫他接受，还让他不要住在僧房，而是单独给他提供了房舍，“供给丰盈”。这样，鸠摩罗什实际上相当于是居士的身份，也就不能收徒了。[115]

公元413年（弘始十五年），鸠摩罗什去世。在他去世后仅仅四年，刘裕的大军就攻克了长安，后秦灭亡了。政权的消失是一瞬间的，姚兴没有想到的是，他对一位僧人的资助，其影响力却穿越了时空，直达此时此地。

表8 西方僧人来华情况[116]

国家 时代	印度	安息	月氏	康居	吐火罗	其他
东汉	4	2	2	2		
三国	3	2	2	2（其中1人世居交趾）		1（龟兹）
西晋	1	1	1			2（西域1、不详1）
东晋	18（其中1人世居龟兹）		2	1	1	5（西域3、龟兹1、不详1）
南朝宋	6					4（西域3、不详1）
北朝魏、齐、周	12					
南朝齐、梁、陈	4					7（西域3、扶南3、不详1）
隋	5					2（西域1、不详1）
唐	20			1	1	7（于阗4、西域1、龟兹1、爪哇1）
合计	73	5	7	6	2	28

鸠摩罗什时代，佛教已经成了许多政权尊崇的信仰，除了北方的前秦、后秦、北魏等游牧民族国家采纳了佛教信仰，就连南方的东晋和南

朝，也有许多皇帝选择了佛教，最著名的则是梁武帝萧衍。作为皇帝座上宾的僧人，从一开始在汉地出现，到成为主流，只用了两百年时间。我们不妨追寻一下这两百年间佛教是如何从无到有，成为中国本土化信仰的一部分的。

佛教东来

相传在东汉时，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经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明亮有光。汉明帝醒后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回答，这是西方的一种神灵，叫“佛”。汉明帝于是遣使到了天竺，问清了佛法的来历，并带回了佛陀的画像。[117]

后人又根据这个传说，将最早到达中国的印度僧人定为摄摩腾和竺法兰，[118]认为给汉明帝解梦的人是东汉文学家傅毅。

根据传说，当傅毅回答之后，汉明帝就派遣郎中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寻找佛法。汉朝的使者遇到了两位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正在天竺的附庸小国游历，于是跟随汉朝使者来到了中原大地的洛阳。

著名的白马寺位于汉魏时期首都洛阳城西[119]，据传就是汉明帝为了两个僧人所建，它也是中国第一座寺庙。[120]而两人携带和翻译的经书中，只有一本流传了下来，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经》。[121]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靠，但在汉明帝时，佛法的传入却已经是事实。公元65年（永平八年），汉明帝下令天下死罪都可以通过进献丝绸赎罪，楚王刘英立刻响应，贡献了30匹丝绸，作为对自己未来可能犯的罪过的赎金。汉明帝立刻写了诏令，表示刘英除了喜欢黄老之言，还喜欢建浮屠祠（即佛寺），斋戒过三个月，[122]哪里有什么罪过？

事实上，刘英一直喜好黄老之术，只是同时对佛教感兴趣。但即便

如此，他所在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地区，还是成了一个佛教中心。到了公元193年（初平四年），军阀笮融在徐州负责漕运，将广陵、彭城等地的漕运私吞，用这些钱大起佛寺，用铜镀金做成佛像，穿上锦缎彩衣，巨大的佛寺可以容纳三千余人。在举行浴佛仪式时，笮融要同时供养上万人吃饭，花费更是上亿钱。[123]

东汉末年，事实上信奉佛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比如汉桓帝就喜欢祭祀各路神仙，同时祭拜佛陀和老子。这件事对道教没什么影响，却起到了宣传佛教的作用，于是民间开始有人供奉，到后来逐渐大行其道。[124]

佛教的兴盛还和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代哲学的主要流派是一种称为儒教的哲学体系。[125]这种哲学体系虽然号称是从东周的儒家脱胎而来，但事实上却是一种新的信仰，和儒家相比，儒教采纳了许多阴阳五行的教条，产生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体的“小宇宙”、社会的“中宇宙”和以“天”为代表的“大宇宙”都是合一的，所有“大宇宙”的规律，对于社会和人也同样成立。所以，人类活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小宇宙”服从“大宇宙”，让“天”感到满意，与“天”的规律相重合。

皇帝作为“天”派到地上的代表，拥有着无上的权威，所以，人们服从于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套理论又通过汉武帝时期创造的学校系统和选官系统强行压给了社会，使得汉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朝代。整个社会不提倡独立思考，只强调服从。这种压抑的状态到了东汉末年，终于导致了巨大的反抗。

在反抗中，最著名的就是诞生了魏晋时期的玄学。[126]玄学针对汉朝主流思想只提倡服从，不提倡思考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反驳，专门强调人必须首先怀疑一切，通过自己的思索，再来决定应该相信什

么。怀疑一切，就是强调“无”这个概念。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更是认为，世界就是从“无”中来的，所以“无”才是世界的本源，这也就否定了汉代的那个无所不能的“天”。

玄学对于“无”的强调，事实上给佛教留下了进入中国的空间。佛教强调的是一个“空”字，这里的“空”和“无”虽然并不相同，却是相似的概念，因此到了三国和两晋南北朝时期，那些谈玄的人大都采纳了佛教的许多概念，这导致了佛教成为中国文人言谈的时尚话语，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另外，佛教传播初期，也有意识地与中国的道教靠拢。汉代末年也是道教的形成时期，最著名的莫过于“五斗米道”[127]和“太平道”[128]这两个道会门。这些道会门都是组织化的，拥有着大量的信众，并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佛教也是组织化的，需要信众，它们借助着与道教类似的手段进行传播，起到了普及作用。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后一个条件，在于印度对西域和东南亚影响的加强，以及东南亚海道的开拓。

这一切还有赖于贵霜王朝的帮助。贵霜进入印度，也将佛教带到了中亚地区，随后佛教传入西域，为进入中国准备了条件。

与此同时，贵霜王朝在印度的存在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它的征服逼迫北印度的一部分人民进入了南印度，并迫使南印度人进入海上，来到了东南亚。[129]虽然在西汉时期，皇帝就曾经派人到达过南海，但直到东南亚皈依了佛教或者印度教，印度僧人们从海上来到中国，才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三国时期到西晋，位于今天柬埔寨一带的扶南王朝频繁地来到汉地朝贡，[130]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林邑也分别向交州和西晋派遣了使团。[131]

与使团同时到来的，还有大批的僧人。从汉桓帝初年开始，西域的

僧人就和汉地有了接触。最早到达的僧人中，有一位叫安世高的人，[132]他被称为“中国佛教第一人”，也开启了佛教的译经事业。[133]当时的中国人习惯给外国人的名字加上一个区分地域的姓，安世高的“安”就表明他来自安息（即帕提亚帝国），传说他是安息国太子，这一点已经无法考证了。安世高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文翻译方面，虽然他的译文质量并不高，却由于开创性而被人们记住。

安世高还带来了另一个传统：佛教徒的游历。汉朝统治者对百姓的管理倾向于将后者固定在土地上，不希望他们四处游荡成为流民。然而，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却要求人们四处游历，僧人们穿梭于不同的寺庙，将各地的先进文化都学到，同时将那些错误的理论驳倒，赢得属于自己的声誉。外来的僧人们把游历的习惯带到了汉地，将汉地的户籍管理方式打破了。从此，中国人特别是佛教徒也有了游历的习惯，这为促进社会哲学的发展和打破政府桎梏创造了必要条件。

安世高本人就曾经在全中国游历，甚至到达了南方的广州等地。虽然并没有明确记载他知道海外的道路，但作为安息（波斯）人，加之广州可能存在波斯商人，表明安世高去往广州也许并非一时起意。

事实上，南方的海道一直对僧人是畅通的，特别到了三国时期，东吴经营江东时，更是必须靠海路与外界交通，促进了海路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法显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南海道，并选择这条道路回国。

安世高之后，大量的外来僧人进入了汉地，于是中国的佛教时代真正到来了。

表9 《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到十五卷记载的西域高僧情况[134]

姓　名	来自国家	何时到达中国	到达过的区域	最初来的目的	备　注
安世高	安息	汉桓帝初	关中、洛阳、江南、广州	游方弘法	本安息国太子。译经 35 部，至灵帝末仍健在
支谶	月氏②	汉桓帝末	洛阳	游方弘法	灵帝光和、中平年间译经 13 部
竺朔佛	天竺	汉桓帝时	洛阳	游方弘法	译经 2 部
支曜	月氏（推测）	东汉桓、灵时期			译经 1 部
安玄	安息	汉灵帝末	洛阳	经商	有功，号骑都尉，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等

②《出三藏记集》中称为月支。——编者注

续表

姓　名	来自国家	何时到达中国	到达过的区域	最初来的目的	备　注
康孟祥	康居	汉灵帝时			先祖康居人（本人可能生于汉地），译《中本起》等
维祇难	天竺	三国孙权黄武三年	武昌	传经	传《法句经》
竺将炎	天竺（推测）	三国孙权时期			与支谦同译《法句经》
康僧会	康居	三国孙权赤乌十年	建业	游方弘法	世居天竺，其父经商，移居交趾。10余岁父母双亡后出家。在孙权支持下建立建初寺。晋武帝太康元年卒。共译6经，注3经
支谦	月氏	汉献帝末	东吴	避乱、弘法	祖父于汉灵帝时期率国人数百归化中国。献帝时与十几人到东吴避乱。译经27部
竺法护	月氏	晋武帝时	长安	弘法	世居敦煌。出家后游历西域，又返回华夏。译经149部。西晋末年战乱中逃往关东，卒于途中
竺叔兰	天竺	西晋末	河南、荆州	生于汉地	祖父死于天竺内乱，父亲逃往汉地，在河南生竺叔兰。经历西晋末年战乱，译经2部
尸梨蜜	西域	西晋永嘉中	建康	传法	传为某国太子。传《孔雀王》诸神咒
僧伽跋澄	罽宾	前秦苻坚末	关中、长安	传法	传《婆须蜜》，与多人共译《阿毗昙毗婆沙》
佛图罗刹	未知	前秦	长安	传法	宣讲并翻译梵文典籍，参与翻译《阿毗昙毗婆沙》
昙摩难提	吐火罗①	前秦苻坚建元二十年	长安	传法	译经数部

①《出三藏记集》中称为兜佉勒。——编者注

续表

姓　名	来自国家	何时到达中国	到达过的区域	最初来的目的	备　注
竺佛念	凉州	苻、姚（前秦、后秦）时期	长安	传法	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汉人，常参与传经，与人合作译经数部
僧伽提婆	罽宾	前秦建元中	关中、庐山、建康	传法	传经，参与并组织译经数部
鸠摩罗什	天竺	后秦姚兴弘始三年	长安	被虏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译经师。家世国相，生于龟兹，早年曾于罽宾、疏勒[①]、莎车等地游学，最后在长安参与并组织译经35部294卷
佛陀耶舍	罽宾	后秦姚兴时	长安	访友（鸠摩罗什）	曾长期在疏勒宫廷，鸠摩罗什拜其为师。前往长安找鸠摩罗什，二人合作译经。后回到罽宾，不知所终
昙无谶	中天竺	北凉沮渠蒙逊时	凉州	逃亡	因得罪国君而逃亡到龟兹、凉州，译经数部
佛驮跋陀	北天竺	后秦姚兴时	青州东莱郡、长安、庐山、荆州	游历	从海路到青州，之后游历了后秦、东晋等，与人合作译经数部
求那跋摩	罽宾	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	建康	避位、游历	本罽宾王族，避王位到师子国，后至南海阇婆国。宋文帝邀请经交州到汉地。传经、译经数部
僧伽跋摩	天竺	南朝宋元嘉十年	建康	传法	从流沙到建康，传经、译经数部。后随西域船队离开
昙摩蜜多	罽宾	南朝宋元嘉元年	蜀、荆州、建康、江浙	传法	从罽宾到龟兹，辗转入蜀，经长江到荆州、建康，译经4部
求那跋陀罗	中天竺	南朝宋元嘉十二年	广州、建康、荆州	传法	经师子国从南海入广州，参与并组织译经数卷

① 《出三藏记集》中称为沙勒。——编者注

续表

姓　名	来自国家	何时到达中国	到达过的区域	最初来的目的	备　注
沮渠安阳侯（组渠京声）	北凉天水	南朝宋	建康	国灭逃难	北凉王沮渠蒙逊从弟，曾游于阗、高昌等地。北凉被北魏灭亡后，逃亡南朝宋，译经数部
功德直	未知	南朝宋大明中	荆州	游历	译经 2 部
求那毗地	中天竺	南朝齐建元初	建康		译经 3 部

佛教化的首都

佛教到达中国后，迅速地繁荣起来，最初还只是悄悄流行，当皇帝认可了佛教之后，这种外来的宗教便迅速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之一。

在全国性的信仰中，又以南朝的首都建康和北朝（北魏）的首都洛阳为中心。北魏人杨衒之恰好就记载了洛阳佛教的繁盛。[135]

根据他统计，在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洛阳还只有寺庙42座。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北魏后期，洛阳内外已经有了千余座寺庙。

洛阳成为北魏首都的历史很短暂，北魏在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才迁都洛阳，在已经荒废的西晋首都的基础上规制了洛阳城。[136]

表10 北魏寺庙僧尼统计[137]

年　代	寺庙数	僧尼数	备　注
公元 477 年（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京内约百所 四方 6478 所	京内 2000 余人 四方 77258 人	太和十年遣 1327 僧尼还俗

续表

年　代	寺庙数	僧尼数	备　注
公元512—515年（宣武帝延昌中） 公元518年（孝明帝神龟元年）	天下13727所 洛阳城内500所	僧侣益重	此时已迁都洛阳
公元534年（魏末）	洛阳1367所（《洛阳伽蓝记》） 天下3万所有余	天下200万人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415部，合1919卷

北魏是个鲜卑族政权，最初时并没有成形的信仰，因此在建国过程中特别注意吸收外族的信仰。它首先重视的是汉朝的儒教，终其一朝，一直在努力重建北方的文化，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138]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修建宫殿和宗庙，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4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139]

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继承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作品，写了一本30篇的《新集》。[140]

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继续了两代的政策，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了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了国家宗教模式。[141]

但北魏的皇帝们在运用儒家思想教化时，并没有忽略佛教。自从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混乱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儿关系，他们认为佛教就是自己的宗教。

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最初对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定了中山（后燕都城），进入燕赵地区，

经过佛寺时都表示敬重，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142]

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143]

太武帝继位后，最初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但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北方大量的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在灭亡夏、北凉（佛教都比较兴盛的两国）后，大量的僧人终于出现在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

在大臣崔浩和道士寇谦之[144]的影响下，太武帝采取了灭佛的做法，佛教受到了一次打击。但崔浩因为得罪了太武帝被杀之后，佛教势力再次抬头。

太武帝去世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但同时加强了政府的控制。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只能有和尚50人，小州40人，更远的地方10人。[145]

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四处游荡，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146]

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60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祇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祇粟”，僧祇户获得的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昙曜还请政府为寺院分配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僧祇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这也形成了北朝的寺院经济。

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团体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团体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天下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3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200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北魏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两个巨型的石窟：都城在平城时期建造了云冈石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则又建造了龙门石窟。

在中国历史上，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建都古城。周代以来，洛阳的古城又分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以东周首都周王城（始建周武王、周公旦，最初称为成周，后称为王城）为代表，[147]位置在现在的洛阳城区；另一个城市则来自公元前6世纪末，东周的王子朝叛乱，在原王城的东面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座城市建立后也被称为成周，而周王城则被称为王城）。[148]到了东汉光武帝建都时，没有选择原来的周王城，而是在王子朝新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这座城就成了汉魏时期洛阳城的基础，位于现代洛阳城东15公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汉魏洛阳城已经在战乱中成为废墟，于是又在原周王城的位置修建了新的洛阳城。这次变化让汉魏洛阳城慢慢地埋入了地下，成了废墟，也让汉魏洛阳城成了在地下保存完整的一座古城遗迹。

北魏时期的洛阳城规制是这样的：它一共有13座城门。东面有三座城门，从北往南分别为建春门（汉称上东门）、东阳门（汉称中东门）、青阳门（汉称望京门）；南面有四座城门，从东往西为开阳门、平昌门（汉称平门）、宣阳门（汉称小苑门）、津阳门（汉称津门）；西面有四座城门，从南往北为西明门（汉称广阳门）、西阳门（汉称雍门）、阊阖门（汉称上西门）、承明门（北魏始有）；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从西往东为大夏门（汉称夏门）、广莫门（汉称谷门）。[149]

建了城市之后，鲜卑人把建造佛像的热情带到了这里。之前，鲜卑人在平城时就已经信奉佛教，建立了云冈石窟。到了洛阳，除了营建龙门石窟，另一大工程就是遍布首都的寺庙建筑群。

北魏首都的寺庙都没有保存至今，但如果要寻找洛阳寺庙的模板，可以在如今缅甸的蒲甘找到。在蒲甘一共有三千多座佛塔，这些寺庙大都是历代的国王、大臣、富翁和普通人所立，信佛的人只要有了钱，就通过建一座塔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他们用金银和各种图画对寺庙进行装饰，互相攀比着，看谁建得更大更美。[150]

当年洛阳的寺庙也是如此，不管是皇帝还是王公贵族都以建设寺庙为荣耀，用大量的金银去装饰，能工巧匠们不愁找不到饭吃。由于佛教来自印度，印度的雕刻和绘画风格，以及印度的文物、佛教的舍利，都成了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151]

在洛阳，甚至还有西域胡人建立的寺庙（如慕义里的菩提寺），城西的永明寺中，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外国僧人三千余人。连外国人供奉的白象和狮子都有专门的饲养场所。这个白象是公元509年（永平二年）乾陀罗王（即犍陀罗王）所贡献的，[152]而狮子来自公元525年（正光六年）嚈哒王的贡献。[153]

在北魏时期，首都中有大量的海外来客。由于北魏只控制了北方，长江地区的南朝被他们称为“岛夷”[154]，南朝来的人在北魏首都也被认为是外国人，这更增加了首都外国人的总人口。为了表明北魏是天下的中心，政府在首都洛阳城内也设了专门容纳外国人的区域，这些地方被称为“四夷馆”和“四夷里”。“四夷馆”分别叫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里”分别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155]

比如，南朝的人如果投奔了北魏，他首先会被安排在首都的金陵馆内居住，三年后，北魏皇帝会在归正里赐一块地作为田宅，让他成为永久性居民，久而久之，归正里也被称为“吴人坊”，居住了三千多家南方

人。

如果是北方夷人来归，就首先在燕然馆给他安排居住，三年后在归德里赐以田宅。

东夷来归，首先在扶桑馆居住，三年后赐宅慕化里。

西夷来归，首先住崦嵫馆，之后赐宅慕义里。

由于北魏实行土地公有制，皇帝在分配土地时掌握了主动权，可以通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地的做法吸引他们留下。于是四个外国人的里坊一共有一万多家归化的居民。

不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宅也并非一种特别的照顾，北魏对儒教提倡的“耕者有其田”非常在意，加之北方战乱导致土地空置，政府一直是主动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要求他们死后必须把土地交回给国家，以便分配给其他人。这种做法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对国家的稳定也是有帮助的。[156]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分出的土地是很难按照规划在农民死后回收的。但在将无主的土地分完之前，北魏就灭亡了，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个王朝。

在寺庙中，规模最大，最能表现人类傲慢的是永宁寺。

永宁寺为公元516年（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的御道西。周围都是衙门、学府和高官显贵的府邸。

永宁寺最特别的是寺中一个巨大的木塔，这座塔有9层，高90丈，上面的金顶又有10丈，一共100丈高，也就是将近300米。[157]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即便按照今天人们对遗址的估算，也认为木塔可能达到了147米。这个高度恰好和埃及最高的大金字塔的原高吻合。金字塔是石头堆砌成的，坡度也相对较小，而永宁寺木塔却是用木头搭建的，坡度也更陡峭，可见难度之大。[158]

这座塔在距离京师百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刹上有金宝瓶，容25斛。

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共11层，金盘的周围都垂着金铎。在塔的四角还有4道铁锁垂下，锁上也有金铎。金铎的大小就像是一个石瓮子。永宁寺塔一共有9级，每一级的每一个角也都有金铎垂下，这样加起来，上下就有130个金铎。塔的每一层都有4个面，每一面设有3个门6扇窗，都用朱漆涂过。每一扇门上也都有5行金铃，一共有5400枚金铃。门上还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159]

到了夜间风高之时，宝铎和鸣，铿锵之声，十余里外都可以听到。

当木塔修建完毕，明帝和太后一块儿登塔，从塔上向下面的宫内张望，发现皇帝的宫殿就如同在手掌中心，一个京城也好像只有一个庭院大小。由于能够看到宫中的一切，皇帝禁止普通人登顶。

永宁寺塔如此登峰造极，但好景不长，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二月，木塔终于被大火烧毁。当时，孝武帝登上宫内的凌云台，望着大火，派遣了千人救火，人们无不悲痛惋惜，含着眼泪奔赴火场。火从第八级开始，在清晨出现，当时还有雷雨，夹杂着霰雪，百姓道俗们纷纷前来观看，悲哀之声振动京师，甚至有三个僧人赴火而死，但仍然无法将火势控制。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都不熄灭，随着塔基钻入地中的火经过一年仍然有烟气。永宁寺塔只存在了18年，就被焚毁了。

规模巨大的永宁寺自然更不走运。由于寺庙的地理坐标太明显，自从寺庙建好之后，就没有脱离兵灾，那些进攻洛阳的大小军阀都喜欢在这里驻军。公元530年（永安三年），叛乱者尔朱兆甚至把孝庄帝囚禁在寺中。

随着北魏末期的内乱，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七月，孝武帝为躲避权臣高欢进攻而逃离洛阳，前往长安。十月，孝静帝继位，迁都于邺城。北魏洛阳就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变成了一片瓦砾。

公元547年（武定五年），《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因公回到

洛阳，发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160]。汉魏洛阳城在北魏的战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它的西面、原来的东周王城附近再建了新城，将汉魏时期的洛阳抛弃了。洛阳内外千余座寺庙都成了废墟，数十万僧众作鸟兽散，去了那些距离权力更近的地方继续发展。

北朝佛教呈现巨大繁荣时，在南朝，佛教的地位也并不比北朝低。

从东晋开始，从皇帝到王公，都逐渐变成了佛教徒。比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恭帝[161]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徒，晋恭帝就曾经为了铸造巨大的金佛像投入了巨资，并亲自到寺庙去迎接。[162]

南朝皇帝中最虔诚的佛教徒是梁武帝萧衍。[163]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南方成就了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164]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编撰了《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600卷的《通史》。后来皈依佛教后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佛学著作。

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165]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在促进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发展的同时，却放弃了国家利益。

公元504年（天监三年）[166]，梁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

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96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正确”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95种“歪门邪道”，并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167]这封诏书的出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除了下诏书，他还曾经数次将自己“卖”到寺庙里。这里所谓“卖”，就是“舍身”。[168]佛教用语中，“舍身”指的是舍去肉体。根据佛教经文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前世中，有一世叫萨埵王子，他曾经为了养活遇到的几只老虎，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去给老虎吃了。之后，佛教徒们将“舍身”用在了更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将自己送入寺院修行也称为“舍身”。

公元527年（大通元年），梁武帝在皇宫旁边建造了一座皇家寺庙——同泰寺，又在同泰寺方向的宫墙上开了一个门，叫大通门，便于皇帝进出。这个寺庙就是他“舍身”的主要场所。同年，梁武帝进入寺庙“舍身”。他剃掉了头发，穿上了僧袍，像和尚一样吃斋念佛。这次“舍身”持续了三天，随后他返回皇宫，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两年后的九月份，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了一次“四部无遮大会”，所谓“四部”，指的是僧、尼、善男、信女这几类人。这次无遮大会上，梁武帝再次“舍身”，他穿上僧袍，住在僧舍里，使用素床瓦器，乘坐小车，取消了宫廷卫士，还亲自向四部大众讲解《涅槃经》。由于梁武帝老是不回宫里，群臣着急了，只好与和尚们协商，由群臣凑了一亿钱为梁武帝赎身。和尚们默许之后，群臣来到了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梁武帝回宫，梁武帝又推辞了三次，他声称自己不是皇帝，而是出家人，在回答群臣的书信中还谦卑地写着“顿首”（这是人们给皇帝上书才用的词），之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169]

这件事一直拖到了十月份，为了庆祝梁武帝还宫，又举行了一次无遮大会，邀请了五万僧人和普通信众参加。大会结束后，梁武帝脱掉了僧袍，登上了御车回宫。梁武帝回宫后，又进行了一次改元，改为中大

通，并大赦天下。

公元546年（大同十二年）三月，梁武帝再次来到了同泰寺。他先是讲解了《金字三慧经》，随后又开始“舍身”。一个月后，皇太子出钱将他赎了出来，出来之前又是法会，出来后又是大赦天下并改元中大同。

但梁武帝回宫的当晚，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为了驱除晦气，第二年，梁武帝再次进入修缮好的同泰寺，照例又举办了无遮大会。梁武帝住在五明殿，穿着僧衣，睡素木床，用葛帐、土瓦器，私人执役。随后，皇帝在光严殿讲授《金字三慧经》。讲授完毕，皇帝正式“舍身入寺”。

一个月后，群臣再次出钱一亿将梁武帝赎了出来，又是三请三辞的旧规矩。回到皇宫后，梁武帝如同新即位一样举行了典礼，并宣布改元太清，大赦天下。

这四次舍身到寺庙，花费了大量钱财，整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在梁武帝的带动下，南朝的佛教极其兴盛，除了大量的寺庙建筑，梁武帝对佛教的礼遇吸引了许多外国高僧从东南亚海道前来，而僧人们的到访也让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由于接待僧人们花费不小，寺庙也积攒了大量财富，使得南朝在繁荣之下已经危机重重。

梁武帝的做法在他的晚年终于遭到了报复。就在他最后一次“舍身”两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170]。由于在几十年的歌舞升平中荒废了军备，皇家军队根本不是野心家侯景的对手，梁武帝被围困在建康。建康城投降了侯景，86岁的梁武帝被饿死在宫中。

梁武帝去世后，“侯景之乱”虽然被镇压，但梁朝的盛世再也没有回来。梁武帝当年建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繁华顶峰。

宋云、惠生历险记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法显等僧人历尽千辛万苦前往天竺，在北魏的洛阳城也有一位旅行家被人们传颂，他就是前往北天竺（今巴基斯坦）的宋云。[171]

公元518年（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北魏胡太后派遣崇立寺的僧人惠生向西域取经，同行的就是著名的宋云。惠生一共取经170部，都是大乘佛经。[172]

此时，经过前秦崩溃的混乱之后，北魏又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通往西域之路又通畅了起来，大量的西域使节重新活跃，前来北魏朝见。[173]这也促使中国的僧人和朝圣客再次前往西域。

宋云的路线又和当年法显的稍有不同。最初，两人从京师[174]出发后，都是先到了青海西宁一带，这一点宋云和法显是一样的。但之后法显是北上去往张掖，而宋云和惠生却选择西行。这源于当时另一条西域路线的打通。以前，去往楼兰一带只能先走甘肃河西走廊，到达敦煌时再西行到楼兰。但北魏时出现了一条直接从青海经过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后进入楼兰盆地的新道，这条道之所以出现，和南朝的发展有关。[175]南朝由于地处南方，一般只能通过海道与外界相连，但为了与中国西北方交流，南朝君臣逐渐探索出一条经过四川西北方，进入现代的甘肃南部山区，再沿着青藏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带，进入青海湖盆地的道路，再从青海湖盆地经过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地区。这条路的开通，使得中国找到了一条绕开河西走廊直达新疆的快速通道。

宋云等人西去就是采用了这条路线。

他们从京师洛阳出发40天到达西宁以西的赤岭，也就是现代青海省日月山一带。

翻越赤岭之后，就进入了吐谷浑的国界。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本是在中国东北部。鲜卑慕容部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建立了多个燕国，但其中一支却在首领吐谷浑的带领下，穿越了中国北方，到了现在青海湖南岸重新扎根，建立了吐谷浑这个国家。[176]至今在青海湖南岸还有着成片吐谷浑王族墓葬，成了现代人写盗墓小说的好材料。[177]

从赤岭西行23日，到达青海湖西南方的吐谷浑国首都伏罗川（现青海省都兰县诺木洪一带）[178]。他们行走在路上时，飞沙走石、气候寒冷，但到达国都伏罗川后，却比其余地区温暖一些。由于是从东北地区迁移过来的民族，吐谷浑衣冠与北魏类似，风俗却又掺杂着许多夷人的习惯。

离开吐谷浑，就进入了青海西部的荒漠地区。继续向前西行3500里，穿越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才能到达当时被称为鄯善的楼兰古国。这一条路与河西走廊路相比并不轻松，但有两个优势，一是路途更近，二是水源供应相对充足。从鄯善开始，他们就进入了西域南道的路线之中。

从楼兰继续向西行1640里，到达左末城，也就是现代的新疆且末。法显路线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来回纵穿，而宋云却基本上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前进，道路也更加合理。

左末城西行1275里，到达一个叫“末城”的地方，再行22里，到达捍麽城[179]，这座城在《汉书》《水经注》中叫扜弥城，在《大唐西域记》中叫媲摩城。捍麽城有上万经幡，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北魏来的人留下的，但也有少数是后秦姚兴时期的。由于法显也到过这里，恰逢姚兴时期，所以，宋云可能见到了法显等人留下的遗物。在十六国和北朝西域历史上，姚兴时期的后秦、诸凉以及北魏是和西域联系较为密切的时期。宋云见到的大量经幡，表明北魏时期有不少人来到了西域。

捍麽城西行878里（事实上只有300多里），到达著名的于阗国。

公元519年（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宋云等人到达朱驹波国，也就是汉代的子合国。[180]此刻距离他们出发只有8个月，而法显却花了两年时光。

他们八月初进入汉盘陀国[181]，即现代的塔什库尔干。法显也曾经到过塔什库尔干，但是当他们继续前进时，宋云又和法显的道路又分开了。在历史上，塔什库尔干是一个著名的三岔路口，在它的西面有数个山口通往不同的国家，如果向正西方，就进入了现代的塔吉克斯坦境内，向西偏南则进入了阿富汗的瓦罕谷地，向着西南方则沿着现代中巴友谊公路进入了巴基斯坦境内。法显选择了一条直接进入巴基斯坦的道路，[182]而宋云则选择了第一条道路。

从汉盘陀国西行6天，登上葱岭，再西行3天，到达钵盂城，再走3天到不可依山。钵盂城和不可依山大约位于通往塔吉克斯坦的山口道上。进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就来到了著名的大龙池。大龙池位于现在的塔吉克斯坦，距离阿富汗边境不远，这里也是帕米尔河的源头。日后，包括玄奘在内的许多探险家都曾经到达过大龙池，从这里翻山进入现在的新疆地区。[183]

在崇山峻岭之间行进时，河流一定是最主要的向导。帕米尔河是瓦罕河的一条支流，瓦罕河又是喷赤河的支流，喷赤河的下游就是著名的阿姆河。于是这里的道路也借助了河道，从大龙池沿帕米尔河向下汇入瓦罕河，从瓦罕河继续向下进入喷赤河，最后进入阿姆河。

但宋云等人却并没有进入阿姆河，因为一旦进入阿姆河，就到了阿富汗的北部，要想去往印度，还要再翻越兴都库什山。

他们只是顺着瓦罕河向下走了一段，九月中旬到达了钵和国[184]。钵和国所在的地方位于今天瓦罕走廊的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地带，可能就是玄奘所称的达摩悉铁帝国。[185]

钵和国的领土仍然在瓦罕谷地之中，如果顺着瓦罕谷地继续顺流而

下，还是在阿富汗北部和兴都库什山以北。而在瓦罕谷地以南，隔着巨大的雪山（兴都库什山），是著名的亚辛谷地（Yassin Valley），这个谷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连接巴基斯坦与帕米尔高原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要从巴基斯坦直接前往塔吉克斯坦或者瓦罕谷地，最直接的路径就是从这里翻越兴都库什山。

宋云等人如果不想去往阿富汗北部，最好的方法也是在这里翻越兴都库什山直接前往亚辛谷地。

几百年后，唐朝有一位将领高仙芝直接翻越谷地南面的雪山，经过一个叫巴罗吉勒（Baroghil）的山口直插巴基斯坦境内的达尔科特（Darkot）和亚辛谷地，完成了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一次奇袭，也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之一。[186]巴罗吉勒山谷就是连接两地的最佳路径。

但宋云等人并没有直接翻越这个巨大的山口，而是选择了绕道前往亚辛谷地。在巴罗吉勒山口以西的巴达赫尚地区，有一条路可以避免翻越常年积雪的山口，只是这条路更加遥远罢了。

宋云等人首先向西走，十月初，到达了嚈哒国。嚈哒国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又神秘的大国，曾经短暂地占领了从中亚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其首都设在了现在的阿富汗巴达赫尚地区。在这里，原本从东向西流淌的瓦罕河突然来了个90度拐弯，向北流去，在拐弯处有一个著名的城市伊什卡希姆（Ishkashim），这里就是宋云所到达的嚈哒国首都。

伊什卡希姆南面的兴都库什山高度更低，宋云等人就是在这里向南翻山，进入巴基斯坦的默斯杜杰（Mastūj）地区。这里也是一个河谷地带，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上有一个小国波知，默斯杜杰附近则有另一个国家赊弥。从默斯杜杰出发，就到达了亚辛谷地所在的小勃律国，宋云称之为钵卢勒。

钵卢勒的中心地区叫吉尔吉特，法显（去程）和玄奘（回程）都应该到达过这里，也就是说，法显和宋云的道路再次交叉了。如今，中巴

友谊公路经过吉尔吉特，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但古人在吉尔吉特之后走的路却并不与中巴友谊公路重合，而是从亚辛谷地翻越一个叫帕勒萨尔（Palesar）的山口，前往斯瓦特河谷，这就进入了著名的乌场国（又名乌苌国、乌仗那国）。到了这里，所有西域旅行家的道路就汇合了。

从乌场国沿着斯瓦特河继续向南，就进入了著名的乾陀罗国（又名犍陀罗国、犍陀卫国等），也就是巴基斯坦境内的北印度的中心地区。

在介绍法显的路程时，我们已经介绍了这里众多的佛迹。宋云与法显一样，在这附近经历了众多的圣迹，包括白沙瓦的巨塔、贾拉拉巴德的佛影等。不过与法显不同的是，宋云和惠生等人最远到达的地方就是这里，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并没有继续向东南行进，到达印度。古人前往印度的旅程一般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印度的菩提伽耶和那烂陀寺，另一个只是到达巴基斯坦，参观佛影之后就回国。法显选择了第一个目的地，而宋云选择了第二个。

宋云等人在乌场国待了两年，就回国了，他们于公元521年（正光二年）回到国内。回到京师洛阳之后，宋云住在了洛阳城北的闻义里。与宋云等人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叫道荣的僧人，也曾经按照这条路来到了西域，并写下了回忆录。[187]他们相似的经历，也表明北魏时期丝路南道的繁荣。

嚈哒、柔然和高车

宋云去往的乾陀罗（犍陀罗）是一个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大国，在历史上一直以犍陀罗艺术闻名于世，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但在宋云时期，这里却被一个叫嚈哒的游牧民族控制着，由此引出了历史上最神秘的民族之一。[188]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至今人们仍然不清楚它的来源在哪儿，到底和哪个民族更接近。有人称他们为“白匈奴”，[189]从名

字上似乎表明来源是匈奴，而“白”字又说明他们的肤色更白皙，似乎和后来的突厥人关系更密切。

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190]嚈哒人是高车人的一个别种。而高车人又是匈奴人的近支，又称铁勒人，以车辆高大著称，高车之名就来源于此。

高车和嚈哒最初都在今天蒙古地区的北方草原上活动，后来双双离开了蒙古，高车进入了新疆地区，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遍布新疆北部。而嚈哒越过阿尔泰山之后却开始了更加漫长的旅程，进入了中亚的河中地区，在扎拉夫尚河流域的粟特潜伏下来。所谓潜伏，指的是在历史之外，很少被人关注。[191]

到了公元5世纪30年代，嚈哒人从粟特地区向南越过了阿姆河，进入了吐火罗地区。在吐火罗地区，盘踞着贵霜人的后裔。贵霜帝国早已经灭亡，位于今天印度地区的疆域被笈多帝国割走，西部地区又被萨珊帝国夺回；贵霜人只剩下在吐火罗的残部，被称为寄多罗贵霜人。[192]

嚈哒人到达吐火罗之后，将寄多罗贵霜人赶走，从而控制了这里。

吐火罗地区位于波斯萨珊帝国的东部，与萨珊接壤，一旦占据了这里，嚈哒人就和萨珊发生了战争。公元453年（元嘉三十年），嚈哒战胜了萨珊，夺取了萨珊东部的部分领土。

同时，嚈哒人还选择了向南侵略，越过了兴都库什山，将巴基斯坦北部的犍陀罗诸国并入版图。宋云去天竺时，犍陀罗诸国还在嚈哒人的手中。

获得了巴基斯坦北部的平原之后，接下来自然是向印度扩张。嚈哒初到时，印度笈多王朝的巅峰还没有过去，扩张的嚈哒没有占到便宜。

在印度暂时没有占到便宜，但在与萨珊的百年战争中，嚈哒却屡屡得手，公元484年（永明二年），嚈哒人杀死了萨珊王卑路斯一世，削

弱了萨珊帝国，从而使得萨珊帝国暂时无法与之抗衡。[193]

到了公元6世纪初，嚈哒人在印度的机会也来了。由于笈多王朝的衰落，嚈哒人的军队从犍陀罗出发，前往摩揭陀国首都华氏城，并攻占了这里。但这时，后方突然出了纠纷，嚈哒人没有实行有效占领，就撤离了。

到了公元531年（中大通三年）前后，嚈哒人卷土重来进攻笈多帝国，但这一次，他们占领了瓜廖尔之后，却被当地武装击败，退回了今天巴基斯坦境内。从此以后，位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就成了嚈哒的南界，它虽然强大，却没有占领笈多帝国。但在嚈哒人的冲击下，印度最伟大的笈多王朝却四分五裂，从此以后，古代印度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笈多那样的统一帝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分裂成许许多多的小国。不管是玄奘还是义净到达印度时，事实上印度都是处于分裂之中，而这都要拜嚈哒所赐。

嚈哒人除了占据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一部分和河中地区，其势力范围还越过了帕米尔高原，扩张到了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嚈哒在巅峰时期曾经到达了于阗、焉耆一线，将疏勒、姑墨、龟兹、钵和、渴盘陀（即汉盘陀）等国都变成了它的臣民。[194]

除了塔里木盆地，它还占据了新疆北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这里曾经是它的兄弟民族高车的势力范围，通过参与高车的内争和立王，嚈哒控制了高车地域，还与北方草原上另一个霸主柔然接触并发生冲突。

在嚈哒成为西方霸主时，在中国的北方却是柔然和高车的地域。

如果说秦汉时期中国北方的匈奴是“草原第一帝国”，那么能够称得上“草原第二帝国”的非柔然莫属。[195]

柔然帝国兴起于匈奴衰落之后，虽然鲜卑人首先继匈奴后崛起，但鲜卑人将精力主要放在了争夺中原上，从早期的鲜卑慕容部建立数个燕国，到后来的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他们更向往的是融入汉地文明之中，离开故地。

鲜卑人忽略了北方时，游牧民族柔然就在匈奴故地兴起。

柔然如同匈奴一样，在马背上打天下，从来没有变成定居文明，在它最强盛时，它的势力范围从今天中国东北部一直到中亚地区。

在柔然和嚈哒的夹缝中，是高车部。高车人占据了今天中国新疆北部，以高昌为中心，却受制于两大强权，没有成为巨头。

但柔然和嚈哒又都是不幸的。除了像北魏这样建立了农耕帝国的游牧民族，其余游牧部落的历史往往通过南方的定居文明记载下来的。游牧的匈奴之所以出名，在于它和强大的汉朝相对立，汉朝文献里将匈奴当作最大的敌人，从而使得这个游牧民族名扬天下。

但嚈哒和柔然兴起时，中原地区恰好处于分裂状态，人们在战争中自顾不暇，也就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那些化外的游牧民族了。

嚈哒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成了最神秘的大国，神秘崛起，在人们注意到之前又神秘消失了。柔然帝国虽然强大，却不幸也处在中华文明的夹缝时期。它崛起时是东晋十六国的乱世，史料稀少，也没人感兴趣。到了隋唐强盛时，它已经消失了，它曾经占据的地方留给了另一个游牧强权，可以被称为“草原第三帝国”的突厥民族。于是，这个“草原第二帝国”就这样低调地兴起，又低调地消失。[196]

就在嚈哒和柔然的势力达到最高峰时，在北方草原的另一支游牧民族突厥也已经兴起。[197]最初突厥是作为柔然的附属存在的。到了公元546年（大统十二年），突厥首领土门帮助柔然击败了草原上的第三势力高车（铁勒），从此高车走向衰落。

土门居功自傲，乘机向柔然可汗阿那瑰求亲，阿那瑰轻蔑地拒绝了土门的提议，于是土门杀掉了柔然的使者，与之绝交。

柔然这才知道，自己树立了一个多么强大的敌人。到了公元552年（废帝元年），突厥击败了柔然，柔然可汗阿那瑰自杀。庞大的帝国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成为另一大帝国崛起的反衬。

突厥消灭柔然之后，与西方的嚈哒已经接壤，下一步要对付的就是这个位于中亚的强权。但是，突厥还没有强大到独自去对付嚈哒，恰好这时萨珊王朝也完成了复兴，萨珊王朝在国王库思老一世（Khusrau I）的改革下，重新成为强权。突厥与萨珊联合后，击败了嚈哒。[198]

与贵霜不同，嚈哒被击败后，它的领土迅速被萨珊和突厥瓜分完毕。嚈哒人留在印度的时间更加长久一点儿，到了戒日王时代才被最终消灭，[199]这也就到了玄奘出使的时代。

海上之路

在北魏时代，除了西北的道路可以通行，在东南的海道也是可以通行的。杨衒之列举的海道国家里，[200]最远的是大秦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

从大秦国经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到了东南亚，首先到达的是歌营国，也叫加营国，[201]这个国家可能在马来半岛的南端。歌营国在汉魏时期都不为人所知，也没有到中国来拜访过，北魏时期，才有一个僧人菩提拔陀（也叫佛驮跋陀罗）从歌营国来到了中原，由此人们才知道了这个国家。

根据菩提拔陀的叙述，人们知道，从歌营国北上一个月，可以到达句稚国，再北行11日，到达典孙国，这两个国家可能都在马来半岛上。

继续北行30日，就到了高棉前身的扶南国。扶南北行一个月，到达

林邑国，也就是著名的占婆国，在现代越南中南部。林邑国继续向北，就进入了南朝萧梁的地界。

除了这些陆路国家，还有奴调国、斯调国等海上国家，可能位于现在的印尼群岛上。

但事实上，海道的开通却比杨衒之记载的时代还要早上200年，在东吴时期，就有一次著名的出使，从而打开了中国人对东南亚的认知。

公元230年（黄龙二年），东吴大帝孙权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了上万名士兵出海，寻找两个传说中的岛屿。[202]相传在东海中有两个岛屿，分别叫夷洲和亶洲。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去寻找蓬莱仙山，徐福就到了亶洲不再回来。[203]

东吴巩固了江东之后，由于地域狭小又无法与曹魏争夺中原，孙权开始考虑向海外扩张，于是，他被有关海外岛屿的传说吸引了。加之海边的渔民常常被风吹到海外的岛屿上，带回来了更多关于岛屿的传说，便促成了这次派兵。

卫温和诸葛直出海后寻找亶洲没有找到，只找到了夷洲，带回来数千人。到底夷洲和亶洲在什么地方，已经不可考，从地理上说，很有可能是台湾到琉球群岛之间的某个岛屿。两位将军的收获并不能让孙权满意，第二年，他将两人以违诏无功的名义杀掉了。[204]

这次出行虽然收获不大，却成了东吴探索东南海域的开端。除了向东海方向寻找出口，东吴还重新占领了海南岛，公元242年（赤乌五年），孙权派遣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三万讨伐珠崖和儋耳，进入海南岛。[205]在越南北部的交州，孙权也派将军吕岱占领（公元226年，黄武五年）。[206]

就在吕岱平定了交州之后，孙吴又派出了使节前往东南亚地区进行宣谕，于是就有了朱应、康泰出使南海。[207]

这次出使虽然记载不详，带来的信息却是决定性的。在汉代，人们对南海的印象还是很浅薄的，只知道天竺、掸国、叶调等少数国家，但到了东吴之后，人们开始对南海上的许多国家熟悉起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地有过接触的国家达到了15个。[208]除了位于印度的中天竺国、位于尼泊尔的天竺迦毗黎国[209]，以及位于斯里兰卡的师子国，其余的12个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

表1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海十五国[210]

国　名	对应的现代地区
林邑国	越南中南部
扶南国	柬埔寨和越南南部
河罗陀国	不详
呵罗单国	可能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婆皇国	马来西亚彭亨州
婆达国	不详
阇婆达国	又名阇婆国，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也可能兼称这两岛
盘盘国	可能位于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
丹丹国	不详
干陀利国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
狼牙修国	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东岸北大年一带，以及马来西亚吉打州
婆利国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或加里曼丹岛
中天竺国	古印度中部地区
天竺迦毗黎国	尼泊尔蓝毗尼附近
师子国	斯里兰卡

这些国家大都分布在一条连接了中国和印度的航线上，从广州或者交州出发后，经过越南中南部、柬埔寨，沿着暹罗湾、马来半岛一直南

行，进入爪哇海，从巽他海峡或者马六甲海峡过境前往印度，也可以从克拉地峡附近走陆路进入孟加拉湾，再走海路前往印度[211]。

这些国家就分布在航线的必经之路上，也就是越南、柬埔寨沿海地区，马来半岛，以及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上。

在这些国家中，占婆（林邑）和扶南依然是两个巨型国家，其中占婆虽然世系更迭，却一直保持着强国的地位，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安南（即越南）独立之后，占婆才逐渐被蚕食。扶南国作为内陆强权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被另一个高棉人的国家真腊所取代。[212]真腊作为扶南的一个内陆附属国，曾经在现代老挝的占巴塞地区活动，[213]随后向南推进，占据了扶南的所有领土，并将首都设在了位于现代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暹粒之间的一个地区，这个叫三坡波雷古的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砖塔，代表着前吴哥时代的建筑巅峰。[214]

扶南由于处于海路交通的要道上，造船业非常发达，他们制造出一种形制独特的船，船头和船尾造成鱼的形状，可以载百人以上。[215]在南海上还有更大的海船，甚至可以装六七百人。[216]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东南亚地区印度化的高峰时期之一。在之前，印度的佛教已经到达了这里，而到这时，印度教也开始遍布东南亚。

印度教在东南亚的到来和佛教的传播，与印度本土的笈多王朝发展有关。东吴时期，扶南王曾经派人前往印度的摩揭陀故地，当时这里还是贵霜帝国的属地，贵霜人赐给扶南王四匹月氏马。[217]贵霜人信奉的是佛教，因此，东南亚这个阶段是佛教化时期。随着笈多王朝在印度的崛起，残余的贵霜人纷纷南下逃亡，甚至来到扶南夺取了王位，统治了一段时间。[218]但随着笈多王朝完成了对印度的控制，印度教也随着贸易活动来到了东南亚，重新影响了东南亚的格局，不管是扶南、真腊还是占婆都变成了印度教的国家。

虽然东南亚普遍信奉印度教了，但是，印度的佛教徒们由于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纷纷到海外闯荡，于是东南亚成了他们的一个跳板，让他们从海路进入中国境内。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记载的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外国僧人有7位，此外，除了法显还有3位中国僧人也从南海道前往印度或者回国。[219]应该看到的是，这些僧人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们比其他人幸运在于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而没有留名的应该也不在少数。

外国7位僧人中，有4人是从天竺经过东南亚过来的，剩下3位是皈依了佛教的扶南人。在外国僧人中，最有名的是拘那罗陀，在汉地，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真谛。[220]他本来是西天竺的优禅尼国人，周游天下后在扶南定居。梁武帝时期，派人送扶南使者回国时，扶南人将真谛献给了梁武帝。于是，公元546年（大同十二年），真谛来到了南海，在路上走走停停，耽误了两年，直到公元548年（太清二年）闰八月才到达京师。梁武帝对真谛宠信有加，但不幸的是，这时已经到了南朝梁的末期，颠覆了整个国家的“侯景之乱”随即爆发，“南朝四百八十寺”都进入了崩塌的节奏。

在“侯景之乱”时，真谛逃离了金陵，向东来到了富春，在那儿翻译经文。之后，真谛经历了梁末的一系列战乱，在侯景、梁陈诸帝的宫廷周游，还曾在东南沿海地区游荡。他试图乘船离开汉地，去往马来半岛上的楞伽修国（即狼牙修国），因为信众的苦苦挽留而留在了南越。他还曾计划坐大船回天竺，却又被海风吹回。最终，在公元569年（太建元年），真谛病故在这片他耕耘了20多年的土地上，目睹了佛教的起起落落。

表12 南海来的僧人群体[221]

人　名	国　家	事　迹
法显	中国	中国环西域—南海第一人
智严	中国	西凉州人。请佛驮跋陀罗来汉地，后泛海重新到达天竺，卒于罽宾
昙无竭	中国	俗名法勇，公元 420 年与 25 人从陆路去往天竺，只有 5 人从海道回广州
道普	中国	高昌人，曾游历西域。南朝宋武帝时期出海，在长广郡卒
僧伽婆罗	扶南	公元 506 年征召进入汉地，译经数部，公元 524 年卒
曼陀罗	扶南	与僧伽婆罗共同译经
须菩提	扶南	在扬州为南朝陈翻译经文
佛驮跋陀罗	迦维罗卫	去过葱岭。在智严的邀请下走海道经过交趾，在青州东莱郡登陆。公元 429 年卒
求那跋摩	罽宾国	曾从师子国到阇婆国。公元 424 年因南朝宋文帝召见，于是前往广州
求那跋陀罗	中天竺	从师子国出发，公元 435 年至广州
拘那罗陀	优禅尼国	南朝梁、陈之际从扶南来汉地，经历了南方的战乱，最后卒于汉地

除信仰以外，贸易也成了南海交通的主流。对于汉地人而言，国外稀奇古怪的国名和人名，以及不同于汉人的肤色和语言，他们乘坐着各式各样的船从海上冒出来，出现在广州和交州的港口，带来了大量的象牙、犀角、翠羽、蛇珠、火浣布[222]，千名万品都是汉地少有的珍宝，让人眼花缭乱，交州和广州也成了整个南朝最富裕的地区之一。[223]

然而，在看到了贸易繁荣的同时，人们又往往忽略了一点：在这个时期进行贸易的船只大都来自外国，不仅有东南亚的扶南，还有印度和波斯的船只，而中国本土的船只却相对较少。这和中国的中央政府注重国内经济、轻视海外贸易有着直接关系。这个时期发展海外贸易的大都是地方政府和民间，由于民间经济实力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展出制造大船的技术，使得中国的造船业一直较为落后，唯一的例外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曾经制造过海船前往海外。但随着西晋的统一，政治重心回到了中原，垄断海外贸易的依然是外国的船只。高僧们也往往乘坐外来的船出入于南海。

直到唐代，随着海外的贸易的发展，中国的造船业才逐渐积累出强大的实力，这种实力到了宋元时期到达顶峰，开辟了一个中国主导的贸易时代。

从这种意义上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只是一个前奏，它将要开启的是唐宋元时期的高峰。

第七章 唐代的信仰旅行和异域想象

大唐僧人上天竺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靠政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还在想方设法巩固政权时，26岁的僧人玄奘就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传奇之路。[224]

虽然从魏晋南北朝进入隋唐，中国来到了另一个统一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隋唐的佛教是另起炉灶。从信仰角度看，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中断，反而带着很大的继承性。在北朝时期，就一直有僧人来往于西域和汉地，甚至在隋朝还有使者去过西域和印度，只是在隋末由于战乱而短暂中断，一旦唐朝控制了局势，去往西域的道路随即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奘只是法显等人的继承人，而不是新的开创者。

与法显一样，玄奘最初的行程是和“背包客”一样结伴前行的。他跟随秦州僧人孝达前往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到达秦州后，又和另一批人结伴前往兰州。到了兰州，他又碰上了从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往内地送官马的人，这些人正在返回凉州的路上，于是玄奘又和他们一起搭伴到了凉州。

但到凉州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一种新的政策开始困扰这位僧人。原来，自从北魏以来逐渐建立的身份系统开始起作用了。北魏为了开发北方荒芜的土地，把人民固定在土地上，想出了户籍制度这种做法，限制人们随便离开自己的家乡。[225]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了将原本东魏、西魏和南方陈朝三方的国土整合起来，进行了严格的土地和户

籍勘察，又加强了户籍的控制。[226]过于严苛的户籍制度和税收制度一起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到了唐初，户籍制度虽然还保存着，但已经开始松动，直到后来逐渐被另一种游历文化取代。

唐太宗初年，在西北的凉州地区，户籍制度还被严格地执行着。于是，对年轻的玄奘来说，出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官方的通关文书才能出境。凉州都督李大亮严格执行了这个政策，由于玄奘没有官方许可，李大亮不仅不放行，还要将玄奘赶回京城。[227]

紧急关头，玄奘却在僧人内部找到了帮手。凉州僧人惠威法师对玄奘照顾有加，为了避免玄奘被抓回去，他派遣了两位弟子慧琳和道整，偷偷地将玄奘送到了瓜州。

瓜州刺史独孤达对玄奘最初也很友好，但没过多久，凉州送来了通缉僧人玄奘的文书，于是玄奘的处境又危险了。

幸运的是，在瓜州首先收到文书的是一位叫李昌的州吏。这位州吏意识到这个玄奘可能就是遭到通缉的那个僧人，暗自将文书扣下，没有交给刺史，而是偷偷展示给玄奘，劝他在事情没有公开之前早点儿离开。

此时，从凉州一直跟随他的道整已经南下去了敦煌，慧琳也被玄奘放了回去。缺少了旅伴，玄奘到底如何穿越瓜州西北的大沙漠呢？

在汉代早期，去往西域必须经过楼兰，可东汉时期，就开通了这样一条路线：从敦煌郡直接穿越沙漠，经过哈密盆地的伊吾到达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取代了楼兰道成了进出西域的主道，而起点也改在了更加靠北的瓜州，不用再经过敦煌了。但是这条道也非常容易封锁，因为一路上要经过巨大的戈壁，只有几个取水点，而这几个取水点都已经被官方设上了岗哨。

具体说来，从瓜州北行50里到达一条叫葫芦河[228]的小河，在葫芦河上就是著名的关口玉门关。出了玉门关，西北方就是巨大的戈壁莫贺

延碛，在戈壁中有五个烽燧（烽火台），各相距百里，每个烽燧下都有泉水，所以，只有经过五个烽燧获得水源补给，才能到达伊吾，进入西域。这条路由于穿越沙漠，如果没有人领路，几乎是死路一条。

在瓜州做准备时，玄奘遇到一个叫石磐陀[229]的胡人，得到了一匹经验丰富、十余次穿越沙漠的老瘦马（白龙马的原型）。在石磐陀的帮助下，他渡过了葫芦河，绕过了玉门关。石磐陀原本是玄奘找来去往西域的同伴，但刚过了葫芦河，他就感觉到此行太危险，不肯前行了。玄奘只好放他回去，自己一个人孤独地上路，踏上了穿越沙漠的行程。

这段行程，如果想要存活，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西北的五个烽燧，这些烽燧都建在泉眼附近，只有在这五个点取水，才能不被渴死。可是，在取水时，又不能被烽燧的守卫发现，否则由于没有任何通关文书，他还是会被抓起来送回内地，无法出境。

玄奘并不是一个善于偷偷摸摸做事的人，他在第一烽燧趁夜取水时就被守军发现了。他被带到校尉王祥面前。不想王祥却对他非常友好，不仅没有将他遣回，反而试图帮助他出境。

在王祥的指点下，玄奘走了一条近路，这条路可以直接穿越到第四烽燧，就避开了第二、第三烽燧，减少了暴露的可能性。第四烽燧是由王祥的老熟人王伯陇把守，在那儿玄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帮助，继续前行。

到了第四烽燧[230]，王伯陇又给他指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前行百余里经过一个叫野马泉的地方，这里可以取水，也不用再经过第五烽燧。一旦过了第五烽燧，玄奘就相当于出了大唐的地界，也就不用再担心通关文书的问题了。

一切看上去非常妥当，但意外却发生了：在抄小路时，玄奘并没有找到野马泉[231]，又不小心打翻了储存的水，陷入了缺水的境地。在西域，一旦缺水，旅行者就必死无疑。玄奘可以选择折回第四烽燧寻求帮

助，但由于缺水，他也很难回去了，剩下的只能拼运气，硬着头皮向前闯。

他在大漠中行进，五天四夜没有进一滴水，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能撑过去的，但玄奘靠毅力却支撑了下来。到了第五夜，他摆脱了失水之后的恍惚，在老马的带领下，终于到达了一处野泉水，才得以活命。

在野泉水休息了一天，又灌满了储水袋行进了两天，玄奘才走出了被称为莫贺延碛的流沙，到达了伊吾。这段路是玄奘一行中最危险的一段，在他日后的回忆中也着重提及。这一点从侧面也证明，唐朝最初对西域门户的封锁还是较为严格的。

接下来，玄奘的好运到来了。伊吾已经属于高昌地界。玄奘到达时，高昌王麴文泰恰好在伊吾，他将玄奘带往了高昌。

在两汉时期，高昌是戊己校尉的属地，东晋时期，在西北出现了一系列的凉国，高昌先后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国家。到了公元460年（承平十八年），柔然灭亡了北凉，立一个叫阚伯周的人为高昌王，高昌得以独立建国。之后，高昌王世系经历了阚氏、张氏、马氏，最后传到了麴氏。[232]到了贞观年间，高昌王麴文泰已经是麴氏王朝开创者麴嘉的第七世孙。玄奘时期，高昌是唐朝的属国，接受唐朝的封号。[233]

由于和唐朝的隶属关系，加之高昌本身信奉佛教，麴文泰对玄奘尊重有加。他不仅给了玄奘许多金银物资，足够玄奘用20年，还给沿途各国写了24封书信，请求各国帮助玄奘，同时还派人跟随玄奘前往高昌的友好国家，以便他及时过境。这些帮助，使得玄奘的旅程与法显有了明显不同，法显一路上是作为行脚僧，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王室帮助，而玄奘在受到麴文泰帮助后，已经成了王室的宾客，一路上都作为各个国王的贵宾和密友，得到了大量的照顾。

玄奘离开高昌后，经过了一系列国家：阿耆尼国、屈支国、跋禄迦

国。[234]

在玄奘之前，中国去往印度的路出现过两次大的调整。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要想去往天竺，是经过大宛（费尔干纳谷地）和中亚地区，南下到今天的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巴基斯坦。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去往天竺往往选择更加近的塔什库尔干道，也就是从今天新疆的塔什库尔干直接进入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地区，从而绕开了整个中亚。这也是法显当时走的通道。但是，到了唐初，人们却又逐渐回到了汉代的道路系统，这和一个新兴民族的发展有关。

随着“草原第二帝国”柔然的衰落，在北方草原和中亚地区出现了第三个游牧帝国：突厥帝国。突厥帝国首先控制了中亚草原，再和萨珊联合击败了嚈哒人，成了整个西域的主宰。[235]在突厥人的统治下，中亚已经成了连接各个区域的便捷通道，由于只有一个总领主，商人们缴纳的税收也是最少的，这使得中亚地区出现了又一次繁荣。不过，中亚地区特别是河中地区的人种仍然没有突厥化，突厥人只是成了统治者，而平民还是伊朗种。

突厥人由于是游牧民族，在去往中亚时往往选择更加靠北的草原道路，也就是从新疆的伊犁河谷进入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绕过西天山进入河中地区，或者在天山以南翻山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地区，再向西进入河中地区。

在玄奘时期，高昌与突厥的关系也很不错，麴文泰的妹妹嫁给了突厥可汗的长子。[236]因此，麴文泰派出的人带领玄奘从跋禄迦翻越凌山，到达清池（也叫热海，即伊塞克湖）。离清池不远，就是著名的碎叶城，这个城市后来出名，是因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的父亲曾经在这里生活，于是人们推算李白可能出生在这里。玄奘时期，碎叶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西突厥的叶护可汗[237]将这里作为驻扎地。

到达碎叶后，高昌的护送团结束了使命，将他交给了突厥人。叶护

可汗也很乐于帮助玄奘，又派人将他一直护送到迦毕试国，方才返回。

玄奘在离开叶护可汗营帐后，穿越了整个中亚地区，经过呾逻斯、飒秣建国（即撒马尔罕）等地南下，穿越了著名的铁门，到达了缚刍河（即阿姆河）边的睹货罗（即吐火罗）。[238]

在唐代的中亚，最令人惊悚的地点是铁门，这是一段深山的峡谷，两侧的山都是铁黑色的，只有一条线状的峡谷绵延向前。这里曾经是从中亚去往阿富汗的主要通道，如今却随着新公路的开通，人们不再需要从这里经过，于是这段著名的峡谷又被历史湮没了。

渡过缚刍河后，玄奘到达了活国[239]，这里是叶护可汗长子呾度设的统治区域，呾度设也是高昌王的妹婿。昆都士是兴都库什山以北、阿富汗东北的重要地区，也是通往中国的瓦罕走廊[240]的重要门户，玄奘回程时还要经过附近去往瓦罕走廊。

从活国出发，玄奘经过缚喝国（现阿富汗巴尔赫市），又在西南的锐末陀、胡实健等小国往返后，再次南下。他经过揭职国，[241]开始向东南翻越兴都库什山，到梵衍那国（今阿富汗巴米扬市）、迦毕试国。到这里，匈奴使者也踏上了回程，由迦毕试国派人继续随行。他们东南行600余里翻越黑岭，进入北印度。

进入印度后的行程将在本书下一节中详细描述，[242]到了北印度之后，玄奘终于失去了各个王室使者的陪伴，又经历了数次遇险，体会到了当时印度的混乱状态。

之所以如此混乱，是因为当时的印度恰好处于笈多帝国崩溃后的碎片化时代，虽然一个叫戒日帝国的国家已经崛起，但它还是比笈多帝国弱小得多。这导致印度存在许多小国，并各自为政，在国家之间的缝隙里，也有不少盗贼，给来往的朝圣者带来了麻烦。

玄奘千辛万苦渡过殑伽河（即恒河），到达阿逾陀国，进入了印度的核心区。他差一点儿在下一个国家（阿耶穆佉国）的河中被杀，依靠

着信仰逃脱后，又经过了12个国家和地区，[243]包括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和死亡地拘尸那罗，才来到了戒日帝国的核心区域摩揭陀国。

在摩揭陀国，他最终落脚在世界佛教学术的中心——那烂陀寺。[244]

“那烂陀”的意思是“施无厌”。按照传说，寺庙南方的庵没罗园中有一个池子，池里有一条龙叫那烂陀，旁边修建了寺庙。还有人说如来曾经在这里施舍，所以号施无厌，这片土地原来叫庵没罗长者园，后来有500个商人用10亿金钱买下，送给了佛陀。佛陀涅槃后，摩揭陀国王铄伽罗阿迭多王（帝日王）在此修建寺庙。帝日王去世后，儿子佛陀鞠多王（觉护王）在南面又修了一个僧院，接着怛他揭多王（如来王）在东面又修了一个僧院，婆罗阿迭多王（幼日王）在东北继续修建僧院，幼日王最终选择了在那烂陀寺幼日王院出家。幼日王的儿子伐阇罗王（金刚王）在位时，继续扩建那烂陀寺，在北方修建僧院，其后又有其他的国王继续在旁边扩建。最终，一共六位国王参与了建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寺院体系。佛寺一共分了八院。今天，那烂陀寺的遗址已经完全发掘出来，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寺院的结构。每一个寺院都是一个正方形的区块，中间是僧人们辩经的广场，周围一圈是僧人的宿舍，每一间宿舍的面积都不大，只够僧人铺一张席子，再放一个灶台。[245]

那烂陀寺的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学习的大乘经典有18部，加上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小学，甚至对印度教的《吠陀经》也有研究。在学者中，学习完经论20部的有1000多人，30部的有500余人，50部的有10人，这10人中就有后来的玄奘法师。但穷尽一切学问的，只有戒贤法师一人。

玄奘到达那烂陀寺后，首先分配了住处。他被分在了东北部的幼日王院觉贤房第四重阁，经过了七日的供养仪式，他的宿舍又被安置在护法菩萨房北。在这里，每日的食谱都是固定的，包括赡步罗果120枚、槟榔子20颗、豆蔻20颗、龙脑香1两，每个月供应1升的大米，再给3斗

的油，至于酥乳等物，每天按需来取，不限量。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旅行者常常会被一种紫色的橄榄状小果子吸引，这种果子带着苦涩，如果手上沾上紫色的浆液，就很难洗掉。这种果子外国人很吃不惯，但本地人却当作水果食用，这就是赡步罗果，玄奘当年每日必用的就是这样的水果。

玄奘在那烂陀寺安顿后，曾经拜访过不远处的矩奢揭罗补罗城（即旧王舍城），也去过鹫峰山等圣迹。这些地方都在距离那烂陀寺数公里到数十公里的范围之内。

玄奘在那烂陀寺修行五年后，有了一次远行，这次远行让他前往了南印度的许多地区，他可能是第一个如此深入南印度的中国人。[246]回到那烂陀寺后，他代表那烂陀寺参加了一场著名的大辩论。

需要说明的，玄奘到达印度时，印度的主体宗教已经变成了印度教，也就是玄奘口中的“外道”，佛教虽然传遍了中亚和大唐，但在印度，却受到了印度教的轻视，佛教僧人常常需要参与印度教的辩论。

就连戒日帝国的戒日王也是一个印度教徒，只是他对佛教比较宽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奘参与了那烂陀寺举行的大辩论。根据记载是玄奘获得了胜利，同时我们能看出这样一个事实：玄奘在印度修行的这些年里，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佛教的教义和梵语，这使得他回国后有了翻译经书的最重要条件。

玄奘还开拓了印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本书的楔子里，已经详细叙述了印度与中国的外交史，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这里只说玄奘结束了在印度的学习，启程回国时，他并没有选择戒日王新开辟的吐蕃—尼婆罗快速道，而是继续选择从西域回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高昌受到了国王麴文泰的礼遇，希望首先回到高昌去见麴文泰。

他不知道的是，在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由于高昌麴文泰与

西突厥结盟，唐太宗派出侯君集率领大军灭亡了高昌国，从此，高昌作为一个国家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唐朝管辖的高昌县。麴文泰也在唐朝进攻之前受到惊吓去世。

玄奘的回程采取了一条前人（法显、宋云等）没有走过的路，却又和他们的路线有重合之处。[247]在现代阿富汗的地图上，可以将整个阿富汗国土看成一只面朝东北方的蛤蟆，除了“蛤蟆”的主体部分，在国土的东北角上还有一长条国土一直延伸，与中国接壤，就像是“蛤蟆”吐出了长长的“舌头”，这条“舌头”就是瓦罕走廊的位置。

瓦罕走廊是沿着瓦罕河延伸的一条谷地，在英国人和俄国人大博弈的时代，英国人从南方的印度北进，俄国人从北方的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南下，他们在阿富汗碰头后，决定以阿富汗为界划分势力范围，两大势力范围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在东北部给阿富汗留了一条长长的河谷，就是瓦罕河谷（走廊）。

在历史上，瓦罕河谷是著名的通道，从中国塔什库尔干向东有三条路，一条（南道）是直接翻越红其拉甫等山口进入兴都库什山南侧的巴基斯坦境内，这一条道也是当年法显的道路。而中道就是走瓦罕河谷进入兴都库什山北侧的阿富汗境内，过了瓦罕河谷就是巴达赫尚地区，继续向西就是吐火罗地区，从中道翻山也可以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巴基斯坦。还有一条北道是在瓦罕谷地以北，翻山进入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南侧，这里可以顺着帕米尔河汇入瓦罕谷地，与中道重合，这条道是宋云曾经走过的道路，也是玄奘的回程道路（只尸罗国）、蓝波国、伐刺拏国、阿薄健国、漕矩吒国、佛栗氏萨傥那国、迦毕试国、瞿卢萨谤城、安怛罗缚婆国、阔悉多国、活国、菩健国、呬摩怛罗国、钵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拏国、达摩悉铁帝国、尸弃尼国、商弥国、波谜罗川、朅盘陀国、乌铩国、佉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勃伽夷城、媲摩城、泥壤城、睹货罗故国、折摩驮那故国（沮沫）、纳缚波故国（楼兰）、沙州。是他是反向从西向东进入中国境内的）。[248]但玄奘

与宋云的不同在于，宋云在进入瓦罕河谷之后，并没有一直沿着瓦罕河行走，也没有到达吐火罗地区，而是翻越了南方的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兴都库什山南麓的亚辛谷地，直接进入了巴基斯坦。而玄奘则首先来到了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地区。

他回程离开印度后，通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地区，在阿富汗穿越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再进入瓦罕走廊，沿着帕米尔河，上到帕米尔高原南侧，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进入中国后，走西域南道回到了唐朝国土，完成了西天取经的艰苦历程。[249]

玄奘的旅途是继承了法显、宋云的传统，从这一点上说是继承性的，但他对唐代僧人来说又是开拓性的。唐代早期继承了隋朝闭关锁国的做法，不让僧人随便通行。经过玄奘的开拓，以及与印度的外交联系之后，唐朝进入了与世界交流频繁的时期，到这时，唐代才开始西域求法的黄金时代。

在唐代，与玄奘齐名的是另一个僧人义净。义净于公元671年（咸亨二年）出发，时年37岁，在他的时代，西域道由于战乱已经不好走了，新开辟的吐蕃—尼婆罗道在开通十几年后就断绝了，已经采取了从南海道来回的方法，一共在印度和东南亚待了二十多年。玄奘的著作以地理和佛经为主，而义净则关注的是人和制度。

义净去往西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学习管理。唐代随着僧人在国内的增多，如何管理也成了新的问题。这种管理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如何管理僧众，另一种是寺庙如何管理自己的僧人。

在唐代，由于僧人是不纳税的，政府为了控制不纳税的人数而实行度牒制，也就是僧道们有许可证才是合法的僧道，否则就是野僧野道，带有非法的性质，政府在一定时间会容忍野僧野道的存在，可一旦缺钱，首先对付的就是这些人。

唐代时，全国的道观一共有1687所，但其实人数并不多，拥有合法身份的道士只有776人，女官有988人。与之相比，佛教的规模却要庞大得多。其中寺庙有5358所，僧人有75524人，比丘尼有50576人。为了管理这些僧道，政府在两京设了一个御史的职位。

僧道的身份每三年在各州、县登记一次，登记完后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留州，另一份收藏到中央备案。在中央备案的文书，佛教的放在一个叫祠部的机构，而道教的再分成两份，一份在宗正，一份在司封。[250]

政府的宏观管理之外，每一个寺庙对僧人的微观管理也很重要，这是义净想要学习的方面，他去往印度，在印度学习了11年，归来到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停留下来，写了一本关于佛教管理的书，介绍了印度和南海地区[251]佛教仪轨40条。[252]

此外，义净时期，去往印度的僧人已经非常多，于是他对这些僧人的事迹进行了收集和整理，记载了有名与无名的僧人超过了80人，正是这本书使得我们现在也能知道，当年大唐僧人的印度旅行有多么繁荣。[253]

当时的唐朝僧人旅行，就和现代的“背包客”一样，在路上络绎不绝，成了一道风景。现代“背包客”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花费少、行动快，而在唐代，要想做这种长途旅行，非僧人莫属，因为他们可以在一路上通过化缘和结交权贵来支撑，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不仅仅是大唐的僧人，就连周边的新罗、高丽和交州，也有不少人前往西域，使得唐代成了国际旅行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僧人们之所以乐于旅行，除信仰之外，还受到了当时社会甚至官府的鼓励。虽然玄奘最初是偷跑出去的，但回来后受到了唐太宗的礼遇，给僧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义净回来后也受到了武则天的重视，到洛阳城外亲自迎接，恩宠有加。这些榜样的作用都让僧人们更加憧憬远方的风景。

不过，统治者们之所以厚待这些僧人，除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偏向于佛教，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僧人能帮他们搜集情报。

表13 大唐早期的西域求法高僧[254]

称谓	籍贯	年代	去程	回程	简　述
玄照	太州仙掌	贞观年中	粟特、吐火罗、吐蕃	吐蕃	遇贼。阇阑陀[2]四年。莫诃菩提[3]四年。那烂陀寺三年。信者寺三年。王玄策奏唐皇将其召回。九月辞印度，正月到洛阳，仅用五月时间
		麟德年中	吐蕃		奉旨去羯湿弥罗国[4]寻找卢迦溢多。在北印度遇到卢迦溢多后，又去往西印度罗荼国寻找“长年药”。路过缚渴罗，至迦毕试国，过信度国，到达罗荼国居四年。后回到那烂陀，决定回国时，吐蕃道已经闭塞，迦毕试道被大食扰乱。60多岁时终老于中印度庵摩罗跋国
道希	齐州历城	永徽显庆年间	吐蕃		到过莫诃菩提、那烂陀、庵摩罗跋国。在大觉寺造唐碑一块。卒于庵摩罗跋国
师鞭	齐州				与玄照同行。与玄照从北天到西印度。在庵摩罗割跋城居住，见到道希。卒于印度，年35岁
阿离耶跋摩	新罗	贞观年中			住那烂陀寺，卒年70多岁
慧业	新罗	贞观年中			住菩提寺，至那烂陀。卒于寺中，终年60多岁
玄太	新罗	永徽年内	吐蕃、泥波罗[5]	吐蕃	到中印度。在土谷浑[6]遇到道希，又一同回印度。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大唐，不知所终
玄恪	新罗	贞观年中			与玄照同至大觉寺，因病去世，终年40多岁
新罗僧二人	新罗		南海道		从长安出发，走南海道，至室利佛逝以西的婆鲁师国，因病去世
佛陀达摩	睹货速利				在益府出家。去印度那烂陀寺，后去北印度，50多岁去世
道方	并州		泥波罗	泥波罗	留印期间在大觉寺居住，后留在泥波罗

b 即阇兰陀国。——编者注

c 即摩诃菩提寺。——编者注

d 又名羯湿弥啰国、迦湿弥罗国、罽宾国。——编者注

e 即尼婆罗，今尼泊尔。——编者注

f 即吐谷浑。——编者注

续表

称谓	籍贯	年代	去程	回程	简　述
道生	并州	贞观末年	吐蕃	泥波罗	到菩提寺、那烂陀寺。归途病故于泥波罗，约 50 岁
常憋及弟子	并州		南海道		先到诃陵国，再往末罗瑜国，从末罗瑜国坐船出发后沉没。弟子一同遇难
末底僧诃	京兆			泥波罗	与师鞭同游到印度，住信者寺。回程时于泥波罗病故，终年 40 多岁
玄会	京师			泥波罗	从北印度入羯湿弥罗国，受宠。后失宠南游到大觉寺。回程中在泥波罗去世，年仅 30 多岁
质多跋摩			西域北道	西域北道	与北道使人同至缚渴罗国，出家。后从北道回
佚名二人			泥波罗		吐蕃公主乳母后裔，在泥波罗国。一同出家，后一人还俗
隆法师		贞观年内	西域北道		至北印度，在健陀罗[1]病故
明远	益州清城		南海道		陆行至交趾[2]，泛舟至诃陵国和师子洲[3]，往南印度。可能卒于途中
义朗、智岸、义玄	益州成都		南海道		经扶南、郎迦戍，到师子洲后失踪，时年 40 多岁。同去智岸卒于郎迦戍。义玄后同失踪
会宁	益州成都	麟德年中	南海道		至诃陵国，住三年。后去印度不知所终，时年三十四五岁
运期	交州	麟德年中	南海道		会宁的小僧。奉会宁之命传送经文。再归南海十余年，还俗住室利佛逝，终年 40 岁
木叉提婆	交州		南海道		游历诸国，到大觉寺，卒于此处，年仅二十四五岁
窥冲	交州		南海道		与明远同舟去南海，到师子洲。向西印度见玄照，通往中印度。在王舍城病故，终年 30 多岁

① 即犍陀罗。——编者注

② 即交趾。——编者注

③ 即师子国。——编者注

续表

称谓	籍贯	年代	去程	回程	简　述
慧琰	交州		南海道		智行弟子，随师到僧诃罗国，留于此
信胄			西域北道		住信者寺，卒于此处，年仅35岁
智行	爱州		南海道		至弥伽河[1]北，卒于信者寺，终年50多岁
大乘灯	爱州		南海道	南海道	随父母至杜和罗钵底国，出家。随唐使郯绪入京，成为玄奘弟子
		约显庆年间	南海道		到师子国，过南印度，到耽摩立底国，遇贼身存，停耽摩立底国12年。与义净相遇，同往中印度。先后到达那烂陀、金刚座、薛舍离、俱尸国。卒于道希法师旧房，年60岁
僧伽跋摩	康国	显庆年内	吐蕃		曾游长安，到印度后返回，后又去往交阯，60多岁时去世
彼岸、智岸	高昌		南海道		长于京师。与唐使王玄廓同行，在海上病故
昙闰	洛阳		南海道		到过交阯，入海到印度，在诃陵国北面的渤盆国病故，年30岁
义辉	洛阳			南海道	回程中卒于郎迦戍国，年仅30多岁
唐僧三人			西域北道		到乌长那国，不知所终
慧轮	新罗	麟德年间			随玄照西行，居庵摩罗跋国信者寺，住10年。后住东边北方睹货罗僧寺。
唐僧二十许人		西晋末，印度笈多时期	蜀川牂牁道[2]		曾居支那寺，去莫诃菩提寺礼拜
道琳	荆州江陵		南海道		到过郎迦、诃陵国、裸国[3]。到耽摩立底国住三年，住那烂陀寺数年。在西印度罗荼国住一年。在西印度12年，后到北印度。到过羯湿弥罗国、乌长那国、迦毕试国。回南海羯荼国。与智弘相随回国时，为路贼所阻，回北印度。终年50多岁

① 即恒河。——编者注

② 即牂牁道。——编者注

③ 又作裸人国。——编者注

续表

称谓	籍贯	年代	去程	回程	简　述
昙光	荆州江陵		南海道		到过诃利鸡罗国（东印度东界），不知所终
唐僧一人					在诃利鸡罗国病故，终年 50 多岁
慧命	荆州江陵		南海道		去程行至占波国遇险，返回大唐
玄逵	润州江宁	咸亨二年	南海道		行至广州染风疾而还
义净	齐州山庄	咸亨二年十一月	南海道	南海道	经室利佛逝、末罗瑜、羯荼、裸人国，到耽摩立底国。到那烂陀 10 年，周游中印度。回程在耽摩立底国前遇劫。过羯荼国，居室利佛逝翻译佛经，后还洛阳
善行	晋州	咸亨二年十一月	南海道		与义净同行到室利佛逝，染疾归国，时年 30 多岁
灵运	襄阳		南海道		到达那烂陀，后回国
僧哲	澧州		南海道		到印度后，在三摩呾吒国住，时年 40 多岁
玄游	高丽		南海道		僧哲弟子，随师于师子国出家，住于该处
智弘	洛阳		南海道		王玄策之侄。与无行在合浦登船，至上景，在交州住一夏。冬末乘船至室利佛逝。到大觉寺，住两年。在中印度八年，后往北印度羯湿弥罗，决定归国，据说与道琳为伴，不知此后行踪
无行	荆州江陵		南海道		与智弘为伴，到室利佛逝国、末罗瑜洲、羯荼国、那伽钵亶那、师子洲、诃利鸡罗国，停一年后，到那烂陀寺。拟取北印度归国，卒于途中，终年 56 岁
法振、乘悟、乘如	荆州/荆州/梁州		南海道		到诃陵国、羯荼国。法振于途中病故，时年三十五六岁。乘悟回程中卒于瞻波[1]，乘如独自回国

① 此瞻波并非法显到过的印度东北部的瞻波大国，此处一般被称为“摩诃瞻波”，位

于今越南中南部，又名林邑、占婆。——编者注

续表

称谓	籍贯	年代	去程	回程	简　述
大津	澧州	永淳二年	南海道		到尸利佛逝洲[1]，天授二年受义净之托回长安
贞固	郑地荥川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	南海道		义净弟子，从广州至室利佛逝。长寿三年随义净返回广州，未经三年卒
怀业	北人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	南海道		与贞固同行，后留居室利佛逝
道宏	汴州雍丘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	南海道		与贞固同行，返回后在岭南
法朗	襄州襄阳	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	南海道		与贞固同行，后往诃陵国，途中病故

① 即室利佛逝国。——编者注

神秘的《大唐西域记》

玄奘回国后，除翻译了佛经之外，还写了两本记载自己旅行的书。第一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即《慈恩传》）是以叙事的形式来记载他的旅程，以及回国之后的活动。第二本《大唐西域记》更加有名，这本书形式上是一本地理书，但又和之前的地理书不同。中国古代有很多地理书，比如唐代就有《括地志》，但这些书大都只记载中国的地理，玄奘的野心却是将世界一网打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载了“整个世界”的书。

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还带有很深的情报特征。

在近代，西方探险者去往世界探险，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是以好奇心为支撑的，但是他们的探险活动往往又被政府所利用，作为搜集情报的一个环节。[255]

《大唐西域记》虽然是地理书，但它是应皇帝的要求写的，目的是了解周边国家的情况。所以，玄奘除了记录每个国家的佛教情况，还详细记载它们的人文物产等。这样的记载，使得这本书又变成了一部实用性的情报书，供皇帝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查阅和参考。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过时得这么快：书籍刚完成几年，就由于大食国的崛起，从波斯到吐火罗，再到中亚的地理，全部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本书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256]

现代人对《大唐西域记》感兴趣，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它是一部完全按照佛教世界观来写的书，不再有中国式世界观的盘古开天辟地，而是根据佛教的生死轮回和地理特征来描述这个世界的，于是，我们可以了解唐代的佛教徒是怎么看待世界的。[257]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首先介绍了佛教的世界观，也就是佛教认为世界是如何组成的，这种世界观在佛教进入中国后，也证明了它比中国原本的世界观更加广博。在中国本土世界观中，是以中国为中心分为九州，[258]九州之外都是蛮夷之地，也就是说，只有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而在佛教体系中，则承认了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已，更谈不上什么中心。这一点，对于一直相信所谓“中央之国”的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承认，世界上有可能存在比中国更加先进（或者重要）的地方。

佛教理论首先认为人们居住的世界不是唯一的，佛陀也不是唯一的，只不过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恰巧出现在了我们所在的世界而已。与我们的世界平行的还有许多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佛。[259]

在我们的世界中，中国也不是中心，其中心是一个叫苏迷卢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须弥山）的地方，苏迷卢山在大海中，而大海又在一个金轮上，这个金轮承载着日月星辰，因此日月星辰围绕着大地转动。

在苏迷卢山之外，一层一层环绕着七重山和七重大海，在第七重山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咸海，将所有的山海包容在其中。在所有大海中，有四块最大的陆地，分别叫东毗提诃洲、南赡部洲、西瞿陀尼洲、北拘卢洲。

其中，南赡部洲的中间有一山一池，山叫香山，靠北方，池叫阿那婆答多池（也叫阿耨达池），在南方。池的南方还有一座大雪山。

根据这样的描述，人们不难发现，佛教的传说是根据印度以北的西藏西部地理创造的，在西藏阿里地区，有所谓的神山圣湖，神山冈仁波齐对应的就是香山，圣湖玛旁雍错就是阿那婆答多池，玛旁雍错南方的大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260]

印度人认为，从阿那婆答多池流出了四条河，分别是孔雀河、象泉河、狮泉河和马泉河。其中孔雀河是恒河的源头，象泉河是印度河最大支流萨特累季河的源头，狮泉河是印度河源头，马泉河是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源头。这和西藏的地理也是可以对应的。

但玄奘由于去过西域，将印度的传说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定的修改。他认为，阿那婆答多池流出了四条河，但这四条河已经不再局限于印度，而是滋润了整个南赡部洲。其中，池东银牛口流出殑伽河，也就是恒河，入东南海；池南金象口流出信度河，也就是印度河，流入西南海。有变化的是剩下的两条河：池西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入西北海。所谓缚刍河，就是中亚最重要的河流阿姆河，在古代叫乌浒水，流入中亚的咸海。池北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入东北海。所谓徙多河，就是新疆的叶尔羌河，下游就是著名的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根据当时人的传说，徙多河不仅仅是流入罗布泊，而是从罗布泊进入地

下，到了甘肃的阿尼玛卿山，又从地下冒出来，形成了黄河。[261]

南赡部洲的四面有四个主宰，南面的南象主主宰的土地（印度）潮湿，多大象；西面的西宝主主宰的土地（西亚）靠海，多宝物；北面的北马主主宰的土地寒冷，适合放马；东面的东人主主宰的土地（大唐）和畅，人民众多。

通过这种方式，玄奘就解释了佛教体系下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虽然没有扩展到非洲、欧洲和美洲，但其视野已经比中国传统的大多了。并且，南赡部洲的地理已经和亚洲的地理有了不错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是佛教和中国地理学的进步。

在介绍完整体的世界观之后，玄奘接下来按照他的游历顺序，开始介绍南赡部洲上的各个国家。

唐代中国的最后一块土地是高昌，[262]出了高昌，就算是外国了。

出了高昌，第一个国家叫阿耆尼国，也就是焉耆，法显称之为焉夷。法显从焉夷直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前往于阗，但玄奘却走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和天山南麓行走。阿耆尼国向西南行200余里，过一个小山和两条大河，再在平川上行700余里，到达屈支国，也就是龟兹国，现在的新疆库车县。

从屈支国西行600余里，经过小沙碛，就到了跋禄迦国。

从跋禄迦国向西北行300余里，翻越了凌山（即天山的木札特山口），直接进入大清池（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从大清池开始，就属于丝绸之路的中亚线路了。

从大清池向西北行500余里，就到了碎叶城，郭沫若认为李白就出生在这里。玄奘时期，周围还有数十座孤城，不过都已经臣服于突厥了。

过了碎叶城，就到了统称为窣利的地区，人们更习惯称之为粟特，

也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领土，这里有一系列的城市和国家。

从碎叶城出发400里，经过一个泉水遍布的地区（即千泉），再行走一百四五十里，就到了另一个著名的城市——呾逻私城。[263]这里之所以出名，也是发生在玄奘之后，唐代著名将领高仙芝在这里被阿拉伯人击败，从而丢掉了中亚。

在呾逻私城南面10余里，还有一个汉人聚集区，叫小孤城，主要是由突厥人的战俘组成的，其中有300多户汉人。

从呾逻私城西南行200余里，有一个城市叫白水城，现在哈萨克斯坦城市奇姆肯特东南的赛拉姆城，这里比呾逻私城还要繁华。

继续向西南行，经过一个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方位的恭御城，再向南行经过一个小国笯赤建国，就到了另一个著名的城市赭时国，[264]唐朝人也称之为石国。也就是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

从赭时国东南行千余里，就到了中亚的一个重要地区——费尔干纳谷地，这里有 捍国。捍国向西，经过一个巨大的窣堵利瑟那国，再穿越一个巨大的沙碛，行走500余里，就到了中亚首屈一指的大国飒秣建国，它更响亮的名字叫撒马尔罕，唐代人将它归入“昭武九姓”，称为康国。

在撒马尔罕周围，如今是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河中地区，还有几个同属于“昭武九姓”的小国，分别是弭秣贺国（米国）、劫布呾那国（曹国）、屈霜尔迦国（何国）、喝捍国（东安国）、捕喝国（中安国）[265]、伐地国（西安国）、货利习弥伽国（火寻国）[266]。

介绍完河中地区，继续回到撒马尔罕，从城市向西南行300余里就到了另一个重要的国家：羯霜那国（史国）。中国的史姓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史国商人到中原后的后裔。[267]史国在未来的名称更加响亮，如今叫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z），是中亚著名军事领袖帖木儿的故

乡。至今这里供奉着帖木儿的众多遗迹，仿佛是专门为他而存在。

离开了沙赫里萨布兹继续向南，经过山脉和荒地，先行200余里入山，再东南山行300余里，就到了中亚著名的门户——铁门。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上有一个城市称为铁尔梅兹（Termez），铁门就位于铁尔梅兹北方的一个山区，这里有一条黑色的峡谷绵延数十里，峡谷很窄，山色如铁，称为铁门。甚至有人专门在两壁之间加装大门，挂上铁铃，形成要塞。

铁门和铁尔梅兹以北是中亚，以南是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北麓平地，这里就是吐火罗地区，也叫巴克特里亚地区，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留下的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希腊化国家，是西方文明传播的最前沿。成吉思汗也是从这里南下进入阿富汗、印度、波斯等地区。而在最近几十年，这里曾经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通道，本书作者曾经在这里从阿富汗北上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处仍然如临大敌，戒备森严。[268]两国的边界有一座铁桥横跨阿姆河，这座铁桥曾经见证了无数的战争，铁桥以北的人们已经世俗化了，在铁桥以南的阿富汗，仍然是保守的伊斯兰教地区。玄奘到来时，穆斯林还没有到达这里，但玄奘离开不久，穆斯林就到了铁门。

玄奘从铁门南下，到了睹货逻国故地（即吐火罗地区），东面与帕米尔高原相接，西面直通波斯，南面大雪山即兴都库什山，翻山之后，就是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面就是阿姆河。在玄奘时代，这里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分裂成了近30个小国家，臣服于突厥人。

如果从北方来，首先到达的是阿姆河北岸的呾蜜国（即铁尔梅兹城），如今的铁尔梅兹城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桥头堡，不过位置已经稍稍北移，而古铁尔梅兹则更靠近阿姆河。

从呾蜜国向东北行进，到达赤鄂衍那国（又名石汗那国），位于今天铁尔梅兹东北的迭纳乌（Denau），继续向东北，又有一个忽露摩

国，位于今天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附近。[269]继续向东是愉漫国，在杜尚别以东的谷地里。

再回到铁尔梅兹，如果不向东北，而是向东，同样在阿姆河以北，有一个叫鞠和衍那的小国，如今叫卡博迪扬（Qabodiyon），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线的塔吉克斯坦一侧，这里曾经发现了举世震惊的阿姆河宝藏。

继续向东，有镬沙国，这个国家得名自一条叫瓦赫什的河流，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汇入阿姆河，国家就在两河汇合处附近。

继续向东，到达珂咄罗国，国家在瓦赫什河与阿姆河上游喷赤河之间，主城在现在的库洛布（Kŭlob）城。

再继续向东，就到达了帕米尔高原地区。这里有一个叫拘谜陀的国家。周边还有许多国家，比如南面的尸弃尼国，渡过阿姆河之后南方有达摩悉铁帝国、钵铎创那国、淫薄健国、屈浪拏国、呬摩呾罗国、钵利曷国、讫栗瑟摩国、曷逻胡国、阿利尼国、瞢健国、活国、阔悉多国、安呾罗缚国等。

活国所在地现在是阿富汗东北方的堡垒，也是北方塔利班争夺的焦点地区，塔利班可以翻山从巴基斯坦进入这里。

昆都士的西南有个叫缚伽浪的小国，继续向南则是纥露悉泯健国，折向西北后，到达忽懔国，这里是一个著名的三岔路口，位于今天阿富汗的霍勒姆（Kholm），西可以去巴尔赫，东去昆都士，南下喀布尔，至今仍然是交通要道。

忽懔国往西就是著名的缚喝国，也就是现代的巴尔赫。按照当地人传说，巴尔赫是世界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吐火罗（巴克特里亚）的政治中心。玄奘到达时，这里的人口已经比之前减少了，但仍然有百余所寺庙和三千多僧人，只是学习的都是小乘佛法。缚喝国有佛澡罐、佛牙、佛扫帚，以及佛舍利等圣迹。

从缚喝国向西南方进入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山麓上的锐秣陀国，该国以西还有胡寔健国，西北又有呾刺健国，缚喝国南方百里还有揭职国，这都是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的小城市国家。

继续向南，就是著名的大雪山兴都库什山了。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与中亚的天山、帕米尔比起来并不算高，但这里一片荒芜，如同月球，其翻越难度并不比前面的山小。走了600多里后，玄奘来到了兴都库什山之中的一个有两座大佛的一个山谷——巴米扬，他称之为梵衍那国。这里有数十座寺庙，僧人数千，采纳的佛教学说是小乘说出世部，但最令人惊叹的还是王城东北山上两座巨大的立佛像，分别高一百四五十尺和百余尺。公元21世纪初，塔利班占领了巴米扬，这两座立佛被炸毁了。[270]

但令世人感兴趣的，是玄奘还记录了在城东二三里一个寺庙中，有一座巨大的卧佛，长千余尺，也就是说，是两座立佛的6到10倍长，这座卧佛至今没有被发现，却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兴趣。

从梵衍那国向东南行200余里，过大雪山，东到小川泽，再从小川泽向东翻越一座叫黑岭的山峰，就到了如今喀布尔北方的重镇巴格拉姆，这里现在是美国的空军基地所在，[271]在玄奘时期被称为迦毕试国。

在迦毕试国有一座著名的“质子伽蓝”，据说有一位汉人地区的皇帝曾经将儿子抵押在这里做人质。当时正是贵霜帝国强大之时，贵霜王迦腻色迦王将这个被称为“汉质子”的王子放在了这座寺庙里，寺名叫沙落迦。[272]根据后人的考证，这位所谓的“汉质子”可能是疏勒王的儿子，[273]所谓“沙落迦”，可能就是“疏勒”的变音。

玄奘时期的印度世界

从迦毕试国东行，翻越巨大的黑岭，就进入了北印度。在北印度首先到达的是滥波国，这个国家在喀布尔河北岸，继续前行百余里，就是著名的那揭罗曷国了。

那揭罗曷国位于现代的阿富汗贾拉拉巴德，是通往巴基斯坦的交通要道。当年法显也曾经到过这里，将其称为那揭国。

法显时期，那揭罗曷国及其附近地区有佛顶骨、佛齿、佛锡杖、佛影等圣迹，玄奘时期，佛齿已经不在了，供奉佛齿的大塔只剩下一个基座。

最神圣的佛影也威力下降，在法显时期人们很容易见到佛影，但到了玄奘时期，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看见了，即便有缘见到的，也只能看个大概形象。佛顶骨和佛锡杖倒是还在（它们可能要到伊斯兰教征服时期，才作为“异教徒的古怪玩意儿”消失在历史中）。

从阿富汗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274]就到了健驮逻国，这也是法显当年到过的地方。健驮逻国当年的佛钵也已经不在了，流落到了波剌斯国（即波斯国）。迦腻色迦王立的大佛塔还在。

玄奘还记述了一条在克什米尔大山里的道路，从健驮逻国往乌仗那国，也就是法显所谓的乌苌国，在斯瓦特河谷地带，以曼格勒为中心。

从乌仗那国都出发，从斯瓦特河谷翻山进入印度河谷，就到了达丽罗川，这里是法显从葱岭进入印度的第一站陀历，法显见过的木刻佛像仍然存在。

如果不从陀历回国，而是向东行，顺着印度河直上，经过500多里就可以到达钵露罗国，他更响亮的名字叫大勃律，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斯卡都（Skārdu）附近。大勃律和小勃律两个国家已经出现在喀喇昆仑山区，与吐蕃的联系更加紧密，到了玄宗时代，吐蕃和唐朝在这里争夺这两个国家的控制权。[275]

再回到健陀逻国附近。法显是向南翻越小雪山，再走巴基斯坦的平原河谷直插印度的马图拉，玄奘却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从巴基斯坦北方直接进入克什米尔。

如果按照玄奘的线路，会首先到达一个叫乌铎迦汉荼的城市，这座城在喀布尔河与印度河汇合处附近，从这里渡过印度河，就到了呾叉始罗国，也就是法显所谓的竺刹尸罗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第一带。

玄奘还记录了一个叫僧诃补罗国的国家，在呾叉始罗国东南700多里。但这个国家他只是听说了，可能没有去到。因为他是从呾叉始罗国向北，再次渡过印度河，再向东南行500余里，到了乌剌尸国，继续向东南行千余里，进入了克什米尔，他称之为迦湿弥罗国。[276]

克什米尔地区在隋朝之前叫罽宾，所以法显所谓的罽宾，指的还是克什米尔。但之后，罽宾就转到了其他地方，隋朝的罽宾指的是阿富汗境内的加兹尼（Ghazni），唐代的罽宾指的是迦毕试国，也就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的巴格拉姆地区。唐代的克什米尔也改成了迦湿弥罗国。

从迦湿弥罗国都城[277]向西南行700余里，就到了半笈嗟国[278]。再继续东南行400余里，到了曷逻阇补罗国[279]。继续东南700余里，到了磔迦国[280]。所谓磔迦国，指的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交界处的旁遮普大平原，这里是北印度巨大的粮仓之一，也是印巴冲突最严重的地区。现代著名的印巴升旗仪式就是在旁遮普地区的印巴边境上举行的。

从磔迦东行500余里，到达至那仆底国，所谓至那仆底，意思是“中国主人”，这里是迦腻色迦王给汉地质子的南方封地。

从至那仆底国都东南行500余里，到达一个巨大的伽蓝：荅秣苏伐那僧伽蓝，再东北行一百四五十里，就到了阇烂达罗国，位于现代印度阿姆利则城东南方的贾朗达尔（Jalandhar）。阿姆利则是整个印属旁遮

普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从阇烂达罗国东北行700余里，到达屈露多国[281]。从屈露多国向北一千八九百里，可以到达洛护罗国。再向北2000余里，翻越喜马拉雅山，就到了秣逻娑国，也就是现在的拉达克地区。但这两国都不是玄奘亲到的，只是作为地理信息记录了下来。[282]

从屈露多国向南700余里，到设多图庐国，继续向西南800余里，到波理夜呾罗国[283]，再东行500余里，到了法显到过的国家——秣菟罗国，法显称之为摩头罗国，也就是现在的马图拉。这里是贵霜王朝时期的一个中心城市，但在玄奘时代已经衰落。

从秣菟罗国向东北行500余里，到达萨他泥湿伐罗国，再东北行400余里，到达阎牟那河[284]边的窣禄勤那国，继续向东，到秣底补罗国。之后又经过了一系列如今已经很难确定地理位置的国家，最后到达了法显曾经到过的另一个国家——羯若鞠阇国，国都就是曲女城。

玄奘时期的曲女城已经与法显时期有了巨大的区别。在法显时期，曲女城虽然繁荣，但重要性并不高。而玄奘时期印度的笈多帝国已经垮台，北印度分裂成一系列的小国家，其中最大的叫戒日帝国，戒日帝国当时的首都就设在曲女城。玄奘曾经在曲女城见到戒日王，并向后者介绍了大唐的情况，又参加了曲女城的大法会。戒日王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向唐朝派遣使者的。[285]

过了曲女城，就到了东面的阿逾陀国[286]。再东行300余里，到达阿耶穆佉国。向东南行700余里，到达钵逻耶伽国[287]，这个国家的都城正好在信度河（即印度河）与阎牟那河（即亚穆纳河）合流处，今天的阿拉哈巴德市所在地。从钵逻耶伽国东行到达憍赏弥国，法显也曾经记载过这个地方，称之为拘睒弥国。

向北行一百七八十里到达鞞索迦国，再向东北行500余里，到达了法显所谓的舍卫城，玄奘称之为室罗伐悉底国。在翻译外国地名时，玄

奘喜欢根据发音进行准确的翻译，却并不看重意思，更早的人们翻译的舍卫城是一种意译，但由于舍卫城的梵文名称就是“Shravasti”，玄奘就准确地翻译成了“室罗伐悉底国”。这个译名延续到后来他翻译的佛经里，人们尽管对其准确性交口称赞，却并未广泛使用这个译名，因为它过于艰深了。中国人习惯于将外国名称简化以便于记忆，但如果玄奘活到现在，可能就会把美国的国名按照读音准确地翻译成“由耐提德斯台茨奥伏厄麦瑞科”。

从舍卫城开始，就是一系列佛教徒熟悉的国家，它们出现在无数的佛经里。[288]这些地方在今天印度和尼泊尔边界上：首先是舍卫城所在的室罗伐悉底国；其次是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国，玄奘称之为劫比罗伐窣堵国，这里有佛陀诞生的蓝毗尼园，玄奘称之为腊伐尼林；再次是蓝摩国；最后是佛陀涅槃的拘尸那罗国，玄奘称之为拘尸那揭罗国。法显来到这四个国家时，就发现这里已经非常萧条，玄奘时期，这里更加空旷了。

法显当初离开拘彝那竭（即拘尸那揭罗）之后，直接去往东南方的毗舍离和摩竭提国（玄奘称之为摩揭陀国）。玄奘却更加有准备，他没有急着去往目的地摩揭陀，而是首先向南前往今天的瓦拉纳西，当时叫婆罗疤斯国[289]，也就是法显时期的迦尸国。婆罗疤斯国最大的圣迹是鹿野苑，玄奘称之为鹿野伽蓝。

从婆罗疤斯国顺殑伽河东下300里，可以到达战主国[290]，从战主国向东北行一百四五十里到达吠舍厘国[291]，这里也是法显到达过的地方。在吠舍厘国的东北方500余里还有一个弗栗恃国，印度史上称为跋耆国，也是印度古代大国之一，玄奘可能并没有亲往，却记录了下来。弗栗恃国西北就是尼波罗国，也就是尼泊尔，玄奘也没有亲到。在他刚去时，尼波罗国还是印度的背水洼，不想过了十几年后，尼波罗国已经成了连接印度和大唐的主干道，在玄奘之后的朝圣者中起到了沟通中印的重要作用。

从吠舍厘向南渡过殑伽河，就来到了法显到过的摩揭陀国，这里也是玄奘之行最重要的目的地。摩揭陀国周围的圣迹和法显当初还是一样的，巴连弗邑[292]、伽耶城、新旧王舍城、菩提伽耶和耆阇崛山[293]各圣迹都还存在。但与法显不同的是，在王舍城旁边的那烂陀寺在玄奘时代已经成了世界佛教学问的中心，也就是玄奘修行的地方。这里有僧人数千人，规模极其庞大。

《大唐西域记》记述到这里，还都是中国人已经记录过的地方，在中亚，汉代的张骞等人就有了记录，至于北印度和中印度的情况，法显等人又做了记录。

玄奘的记录与前人的区别，在于他还记录了印度更加遥远的地方——南印度。玄奘在修行之余，曾经踏遍了当时印度大陆上的主要国家，而南部印度由于更加缺乏史料，今天的印度学者有时也不得不依靠玄奘的书来了解当时的众多小国。不过，也正因为它的独创性，使得许多小国家缺乏其他资料印证，因此它们的地点都是存疑的，至今人们仍然对玄奘的记录争论不休。

那么，这些南印度的国家又有哪些呢？

玄奘记录的南部国家，大致是按他周游的顺序呈现的。从波吒厘子城（即巴连弗邑）顺恒河而下，到达的第一个国家是伊烂拏钵伐多国，位于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芒杰（Munger）。继续沿河而下300余里的殑伽河南岸，就是法显曾经到过的瞻波国。

但接下来就是法显没有到过的区域了。从瞻波国东行400余里，到羯朱嗢祇罗国，位于现代印度恰尔肯德邦萨希卜根杰（Sāhibganj）下辖的拉杰默哈尔（Rājmahāi）小镇，在恒河西岸，距离今天的孟加拉国并不遥远。[294]东渡殑伽河，行600余里后，到达奔那伐弹那国，这个国家已经深入了现代的孟加拉国境内，中心在孟加拉城市博格拉（Bogra）。另外，在奔那伐弹那国如果继续向东900余里，渡过著名的

布拉马普特拉河，就能回到印度东部。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西部，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地带，是另一个国家迦摩缕波国，位于印度阿萨姆邦，都城在今天的古瓦哈蒂（Guwāhāti）。从迦摩缕波国东行两个月，就可以到达蜀地的西南境。

虽然玄奘记录了这些国家，但实际上玄奘第一次巡游时并没有去迦摩缕波国，而是南下到了羯罗拏苏伐剌国[295]。再向南行一千二三百里，就到了入海口附近的大国三摩呾吒国，其都城位于今天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

更重要的是，玄奘还记载了印度之外的六个国家，分别是：室利差呾罗国，位于现在的缅甸卑谬市一带；迦摩浪迦国，可能位于现在的马来半岛北部；堕罗钵底国，位于现在泰国南部湄南河下游；伊赏那补罗国，又名真腊，即现在的柬埔寨；摩诃瞻波国，又称林邑，即越南南部的占婆；阎摩那洲，可能是爪哇或苏门答腊岛。这六个国家就把东南亚的主要地理涵盖了。

再回到印度，从三摩呾吒国西行900余里，到达耽摩栗底国，也就是法显离开印度时登船的地方——多摩梨帝国。在这里，玄奘也想坐船前往师子国，但后来打消了念头，从陆路前往乌荼国。于是，我们就有幸知道了其他南印度的国家。

乌荼国大约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布巴内什瓦尔（Bhubaneshwar）。在乌荼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港口折利呾罗城，现在为印度海港布里城。[296]奥里萨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曾经是羯陵伽国的土地，也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皈依佛教的地方。阿育王前半生曾经发动过很多战争，杀过很多人，直到有一天，他攻下了羯陵伽国，望着遍地的尸体突然醒悟到：我都干了什么？他们凭什么要死于战争？从此之后他皈依了佛教，并使佛教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297]至今，全印度各地还有许多阿育王立下的尊崇佛教的石柱。

从乌荼国向西南森林中行走1200余里，到达恭御陀国。都城在印度著名泻湖切利卡（Chillika）以南的根贾姆（Ganjām）。

恭御陀国西南进入荒野一千四五百里，到达羯陵伽国。羯陵伽原本建都在布巴内什瓦尔附近，被阿育王灭国后，迁到了南方，玄奘时期就成了印度东部海岸偏南的小国。[298]

从羯陵伽国西北行1800余里，回到中印度，就到了憍萨罗国，首都位于印度中部的钱德拉布尔（Chandrapur）附近。从羯陵伽国向西南行300余里，再向南行900余里，到达案达罗国。

在现代印度，有一个邦叫安得拉邦，名称即来自案达罗国，可见梵语发音的稳定性。安得拉邦现在的省会是著名的海得拉巴。玄奘时期案达罗国的首都瓶耆罗可能在海得拉巴东偏南数百公里的埃卢鲁（Elūru），已经靠近海边。从瓶耆罗南行千余里，到达位于克里希纳河口附近的国家驮那羯磔迦国。再西南行千余里，到达珠利耶国，这里已经属于最纯粹的南印度，即著名的朱罗国，它是南印度最著名的国家之一。[299]

从珠利耶国继续向南行一千五六百里，就到了达罗毗荼国。“达罗毗荼”一词来自雅利安人到达印度之前印度本地的人种名称，也表明这里已经是达罗毗荼人的地域。如今这片地区叫泰米尔地区。国都建志补罗，就是现代的甘吉布勒姆，位于大城市金奈的西南方。

玄奘还记载了达罗毗荼国以南的秣罗矩吒国，首都位于现在的大城市马杜赖，也是著名的米娜克希神庙的所在地。从这个国家东南的海边，可以到达被玄奘称为僧伽罗国的师子国。另外，他还记载了海中的马尔代夫，他称为那罗稽罗洲。[300]

从达罗毗荼国向西北行2000余里，到恭建那补罗国。这里可能是印度著名遗址汉比（Hampi）的所在地。即便今天，汉比也以巨大的维查耶纳加尔王朝的神庙遗址群著称于世，成为印度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之

一，也是印度南方最著名的古迹。

从汉比西北行两千四五百里，到摩诃剌侘国。现在印度西部有一个马哈施特拉邦，邦名就是从这个王国的国名继承的。玄奘时期，这个国家也被称为遮娄其王国，王国的首都位于今天的巴达米。如今的巴达米以一个巨大的水库为中心，在南北各有一座平顶小山，山上各有一座巨大的城堡，地势非常险峻。[301]

在此王国的北境，有一座巨大的石窟，至今也是印度仅次于泰姬陵的著名景点——阿旃陀石窟，玄奘称之为阿折罗伽蓝。

根据玄奘记载，伽蓝门外南北各有一尊石制大象雕塑，当地人传说当石象大声吼叫时，连大地都会震动。19世纪，英国人再次发现了这个著名的石窟，他们看见这两头大象，就意识到这就是玄奘笔下所写的阿折罗伽蓝。[302]

到阿折罗伽蓝，玄奘基本上就完成了对南印度的记录，接下来就从西南部回到了北印度和西印度，也就是印度的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以及巴基斯坦的领土。

从阿折罗伽蓝西行千余里，渡过耐秣陀河[303]，就到了跋禄羯呫婆国，位于现代印度西部肯帕德湾旁的珀鲁杰（Bharūch）。继续向东北行2000余里，到达摩腊婆国，位于今天印度的乌贾因（Ujjain）。

到这时，玄奘还记录了一个传说中的地方，由于印度西部是通往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海路通道，从摩腊婆国入海向西北方行两千四五百里，能到达一个叫阿吒厘国的地方，从方位上看，可能位于阿拉伯地区。

回到摩腊婆国，向西北方经过三个国家后，到达苏剌侘国。[304]苏剌侘国现在叫苏拉特（Sūrat），是古吉拉特邦著名的港口城市。但玄奘对这里的记述语焉不详，他又记录，从伐腊毗国向北行1800余里，到达瞿折罗国，也就是现在古吉拉特的地方。古吉拉特是印度教的保守邦，

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在担任总理之前，就长期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首脑。[305]

从瞿折罗国北行1900余里，渡过信度河，就进入了在今天属于巴基斯坦的地方。在玄奘时期这里也被称为印度。首先到达的是信度国，位于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然后东行900余里，渡过信度河，到茂罗三部卢国，位于今天巴基斯坦木尔坦市一带。再向东北行700余里，到达钵伐多国，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哈拉帕市。这里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英国人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文明遗迹，在发现这里之前，世界都以为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带去的，但自从发现了哈拉帕文明遗迹，印度河文明才成了四大文明之一，其年代远早于雅利安人到达印度的时间。[306]

如果从信度国向西南行一千五六百里，可以到达阿点婆翅罗国，位于现代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市。再西行不到2000里，可到达狼揭罗国，位于今天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东南部。

玄奘还记录了更遥远的国度，虽然他并没有去到。从上述国家向西北可以到达波剌斯国，即波斯国。波剌斯国东境有鹤秣城[307]，西北接拂懔国[308]。西南有一个传说中的海岛，上面是西女国。

回到巴基斯坦境内，如果从阿点婆翅罗国北行700余里，会到达臂多势罗国，位于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海得拉巴市。之后，就可以经过阿参荼国、伐剌拏国[309]回到北印度了。

至此，玄奘的印度世界已经建构完成，他描述了众多的印度小国及其风土人情，这一部分是一个中国人对外国最深入的观察。

但是，玄奘的整个佛教世界似乎还不够完整。人们一般对旅行的去程很感兴趣，对回程就兴趣索然了。就连后来的小说《西游记》都是一样，让玄奘在去程时遭受了80个劫难，但回程时只是补了一难而已。

事实上，玄奘回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他从今天的巴基斯坦进入

阿富汗后，从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地区去往巴达赫尚和瓦罕谷地，再沿着帕米尔河北上大龙池，从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边界进入中国新疆地区。

回程中也经过了不少小国，这些国家由于地处偏远，更缺乏记录。因此，这里虽然不再详细介绍回程中的每一个国家，但也把这些国家做成表格，便于查阅。

表14 玄奘回程经过的国家[310]

国　名	行　程	现代位置
漕矩吒国[2]	从伐刺拏国向西北行 2 000 余里	阿富汗加兹尼市
弗栗恃萨傥那国[3]	北行 500 余里	大约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以北
安呾罗缚国[4]	翻越婆罗犀那大岭	阿富汗北部安达拉卜县（Andarab）
阔悉多国	西北行 400 余里	
活国	西北行 300 余里	阿富汗昆都士城
菩健国	从活国向东进入葱岭，东行百余里	阿富汗塔莱坎（Taleqan）地区
阿利尼国	从菩健国向北行	阿姆河两岸
曷逻胡国	从阿利尼国向东行	阿姆河南岸
讫栗瑟摩国	从菩健国东行 300 余里	阿富汗凯谢姆市（Keshem）
钵利曷国	从讫栗瑟摩国向北	
呬摩呾罗国[5]	从讫栗瑟摩国行 300 余里	位于喜马拉雅雪山之下
钵铎创那国[6]	从呬摩呾罗国东行 200 余里	阿富汗巴达赫尚省东部
淫薄健国	从钵铎创那国向东南山谷中行 200 余里	瓦罕走廊入口以西的科克恰河边
屈浪拏国	从淫薄健国向东南行 300 余里	科克恰河上游
达摩悉铁帝国	从屈浪拏国东北翻山，行 500 余里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附近
尸弃尼国	从达摩悉铁帝国翻越大山向北	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舍格南（Sheghnan）
商弥国	从达摩悉铁帝国向南翻越大山	巴基斯坦默斯杜杰和吉德拉尔之间，国境东北方是波谜罗川[7]
朅盘陀国	翻越波谜罗川，东南行 500 余里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乌铩国	出葱岭	可能位于新疆莎车县

② 即曹国。

③ 《慈恩传》中作佛栗氏萨傥那国。——编者注

④ 《慈恩传》中作安怛罗缚婆国。——编者注

⑤ 《慈恩传》中作呬摩怛罗国。——编者注

⑥ 《慈恩传》中作钵创那国。——编者注

⑦ 今帕米尔高原地区。

续表

国　名	行　程	现代位置
斫句迦国①	从佉沙国向东南行 500 余里，过徙多河、大沙岭	新疆叶城县
瞿萨旦那国	从斫句迦国向东行 800 余里	新疆于田县
尼壤城	从媿摩川向东进入沙碛，行 200 余里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睹货罗故国	从大流沙行 400 余里	新疆安得悦（又称安迪尔）古城
折摩驮那故国	从睹货罗故国东行 600 余里	新疆且末县
纳缚波故国	从折摩驮那故国东行千余里	新疆若羌县楼兰遗址

① 又名子合国、朱驹波国、朱俱波国。

文学中的舶来信仰

玄奘取经对现代的最大影响，既不是他取来的经文，也不是他勘察的地理，而是一部新奇的小说《西游记》。

事实上，玄奘翻译的经文过于咬文嚼字，并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使用了大量的音译词，并且认为很多佛教概念不应意译，因此译文显得晦涩难懂。也许佛教学术精英们会欢迎他的做法，但接受者中占多数的还是普罗大众，于是玄奘的辛勤劳动反而被束之高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311]

他的《大唐西域记》也是异常详细，但在此书完成十几年后，中亚部分的内容就由于阿拉伯人的进攻、地理信息的改变而过时，印度部分又过于琐碎，加之没有同期佐证的材料，书中大量的地名都还没有找到现在对应的位置。

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反而是他的传奇经历本身，但又觉得还不够传奇，于是发挥了足够的想象力加以二次创作，《西游记》就这样诞生

了。

在小说中，玄奘化身唐三藏，他有三个徒弟和一匹马，伴随他一起到西天取经。小说是明朝吴承恩创作的，但事实上，它的源流却要早得多。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312]中，《西游记》的雏形就已经大体具备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本小册子中看到学术佛教和大众佛教之间的区别。学术佛教总是研究更加思辨性的世界本源问题，而大众佛教却只是接受一些观念，诸如转世轮回、诸色神佛等。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个类似于孙悟空的角色——花果山猴行者。在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中，有一位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奴曼，曾经帮助过印度教大神罗摩找回他的妻子。学术界普遍认为神猴哈奴曼很有可能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因此，猴行者这个角色也很有可能是受哈奴曼的影响而出现的。

在小册子的一开始，三藏法师带了五个徒弟前往西天取经，他出场不久，猴行者就也出现了。不过小册子中的他不是猴子形象，而是一个白衣秀才。猴行者主动来投奔三藏法师，他对法师的前生今世了如指掌，表示法师已经连续两世前往印度取经，但都因为缘分不够而在途中遇难，现在是第三世了。

此外，跟随法师取经的并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而是另外五个徒弟。他们必须经过36个国家，可以看作汉代以来所谓“西域三十六国”说法的延续，虽然唐代西域国家早已不是36个，但这个数字却深入人心。[313]

猴行者是个年轻人，却表示已经“九度见黄河清”，为了让法师相信，他带着法师去了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的斋宴上，作为凡人的法师还在宴会上给各路尊者讲了一次《法华经》。大梵天王送给他三件宝贝：隐形帽、金环锡杖、钵盂，还承诺，如法师路上有难，只要指着天宫方

向大叫“天王”，就可以获得救助。[314]大梵天王本来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但是唐朝的佛教徒却把他无缝对接到了佛教信仰之中，即便到了今天，梵天王在很多地方也作为一个佛教的神而存在。

回到地上之后，他们经过没有人却很恐怖的香山寺，又过了蛇子国，以及处处是狮子和麒麟的狮子林，然后到了处处是古树怪石的树人国。在树人国，法师请一个徒弟去买菜，很久没回，原来这个徒弟已经被一个会法术的人变成了驴，猴行者找到他们，将这个人的儿媳妇（“年方二八，美貌过人，行动轻盈，西施难比”）变成了一株草，这才逼迫着那人将徒弟变回人形。[315]

之后经过的地方叫火类坳，这一情节的设置可能来自新疆的一种特殊地质现象——地火。新疆许多地方由于地下煤层自燃，形成了数十年不绝的地火。这种自然现象在小册子中化成了火类坳，在两个火类坳之间，还有大蛇岭。在第二个火类坳旁，还有一具40里长的大枯骨（古人记录的这类骨头往往是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被认为是佛教《本生经》里明皇太子换骨的遗迹。

接着碰到的是白虎精，这可能就是西游记里白骨精的原型。白虎精变成女人想要接近法师，却被猴行者看破，将白虎精降服。[316]

在九龙池，猴行者用三件宝贝降服了想要害法师的恶龙，将它的龙筋抽出来给法师做了皮带，系上可以健步如飞。[317]

然后他们在一个叫深沙神的神秘人物的帮助下过了一条河，这个深沙神，可能就是将法师的前两世吃掉的那个妖怪；[318]他还有可能是后来的《西游记》中沙和尚的原型。

他们接着路过鬼子母国，这里满街都是鬼孩子。又路过女人国，这个国家的女王想留下法师，在得知他不想留下之后却并没有为难他，送给他夜明珠和一匹白马后就和他告别了。[319]

在经过王母池时，猴行者透露自己曾在这里偷吃了十个蟠桃，被王

母痛打三千八百铁杖，发配花果山已经两万七千年了。不过这一次他又偷吃了一颗七千年的枣，回到国内将之吐在了西川，这里就成了人参的产地。[320]

接下来到了沉香国、波罗国、优钵罗国。[321]优钵罗国没有黑夜，永远春天，人可以活一千二百岁。

过了优钵罗国，就已经接近西天竺的鸡足山了，这里也称“竺国”。他们到了一个叫福仙寺的寺庙，这里的斋饭都是仙味。

但是，当法师请求福仙寺的和尚们施舍给他大乘经文时，和尚却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佛法，他们的佛性是与天具有的，却并不知道法是什么。至于旁边的鸡足山，也是上不去的，因为看得见，却实际上非常遥远。

法师在猴行者的启发下，只好采取另外的做法——祈祷。他们师徒七人焚香祷祝，精诚所至，加上他们代表了整个东土的皇帝和人民，于是感动了上天。突然间，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等天色再次放亮时，法师所需要的经文已经出现在他的身边了——这就是取经的过程。[322]

在《取经诗话》中还故意留了一个尾巴：唐三藏通过祈祷的方式得到了大部分经文，不过经文中还缺了一种《心经》[323]，在回程时，到了盘律国香林，有神人将这部经给了他。从此以后，《心经》的地位也提升了。[324]

除了像“三藏西游”这种戏剧性的事件会给人们带来想象力，在民间，随着佛教一些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民间文学也丰富起来。另外《心经》还不是中国民间的“第一经”，这个地位应该让给《金刚经》。

从北魏开始，中国人就慢慢形成了几个佛教理念，最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理念是念经可以消灾。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刚经》，又

称《金刚般若经》。唐初人们写了几本关于《金刚经》灵验的小说集，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萧瑀所作的《金刚般若经灵验记》[325]，作为宰相，萧瑀本人笃信佛法，更相信金刚经的“功力”。

《金刚经》是一本大乘佛教的纲领性经文，最著名的译本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其字数只有5000多字[326]，主要阐述的是大乘佛教一切皆空的理念，除实体是空（性空）之外，所有的时间规律包括佛法也都是空的（法空）。短短的5000字阐明主要理论，的确是一篇非常好的经文，但是，经文并没有任何消灾祈福之类的暗示。

《金刚经》传到中国后，由于篇幅适中、道理明晰，很快成了大乘佛教的教科书，和尚们更是背得滚瓜烂熟。于是，《金刚经》就被赋予了另一重重任——消灾。人们认为只要反复不断地背诵经文，就能起到消灾的作用。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提到的《心经》虽然也被人们用来消灾，但由于篇幅太短，只有260个字，很难完整地阐释理论，又缺乏背诵难度，所以排在了《金刚经》之后。

萧瑀的《灵验记》记载了不少背诵《金刚经》消灾的事例，大致模式如下：某个真实人物（必须包含姓名和籍贯，最好有职务）有某种恶习或恶果（如杀生、前世因缘、短命等），在某个特殊时间里经历了特殊事件（如遇到世外高僧、被小鬼索命到地狱判官处等），得到了指点，要求他背诵《金刚经》，他照做了，于是获得了福报（如续命、消灾、不受地狱之苦、得道成佛等）。

第二个理念是地狱之苦。唐人小说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地狱之苦的。[327]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是没有地狱和死后受罚这些概念的，[328]人们虽然也相信往生，但基本上认定往生就是与现代世界接近的另一个世界。汉代之所以厚葬，就来自这个理念，要将财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

到了佛教来临之后，人们开始相信有个地狱了，也就不再考虑将财富带过去，而是讲究修行、积福，通过自身行为来避免在地狱受苦，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依靠财富打通死后的世界这条路上，穷人是没有办法操作的，这意味着此生受穷，死后也一样受穷。可是积累善行，对于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这种平民主义的关怀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推广。

第三个理念是六道轮回。在几乎所有民间佛教故事中，轮回都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在佛教传入前，中国也同样没有轮回的概念，人只是死去，不会再回来，有少数被认为死后复生的，也只是“神迹”。至于道教中的修仙，并不是死后登仙，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就鸡犬升天了，所谓“活神仙，死菩萨”。

佛教到来后的轮回观念是如此流行，已经占据了直到近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将之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佛教在中国的最大成功。

将佛教传入中国前后的本土俗文学做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之前的文学小说中，神怪类大都是道教的产物。比如，干宝《搜神记》等所列的神怪故事都是某种自然界产生的灵异现象，[329]或者符合道教观念的神怪。

到了唐代，这种神怪传统仍然存在，但整体上神怪却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道教神怪，另一种是佛教神怪。道教神怪充满了想象力，如《柳毅传》中的龙王，以及其他故事中的神仙等。在唐代，也有不少续写《搜神记》的作品，[330]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怪脉络。佛教神怪则要比道教神怪系统得多，大都是有固定范式，以人死后受审为大宗，牵出轮回观念、地狱观念、福报观念等。可以说，佛教在唐代起到的作用是迎合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却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

也有不少佛道结合的例子，比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本身就是佛道结合的作品，如法师和猴行者等人来到王母池这样的情节，实际上就

和《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传统观念接轨，而不是从佛经得来了。到了后来，人们才创作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西游记》，将佛道问题融合在一起。

唐人的异域想象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及后来的《西游记》中，唐三藏所路过的国家，与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所列的国家没有任何相似性，反而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那些神秘之地很相似。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人们并不在乎真实的西域世界，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谈资罢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漠视，使得唐人在与大食人的竞赛中迅速落了下风。

但这并不表明唐人对于异域就没有渴望。事实上，唐朝是一个很喜欢谈论异域的朝代。

人们对于异域的渴望，主要放在了西域方向，这主要是由于唐朝对西域更加熟悉，而且西域与唐朝存在政治往来；而南海则是后来才开发出来的，并且南海与唐朝以商业关系为主。总结起来，这种渴望又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唐人认为异域充满了神奇的事物。

唐朝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张说曾经写过一些传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梁四公记》中，将异域的神奇事物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331]如高昌国产岩盐，有的盐甚至是紫色的，这一点非常符合现实，至今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地区产的粉色和茶色的岩盐仍然是当地的特色。[332]

至于其他地方的方物则带上了更多神话色彩。比如扶桑国（今日本）产一种长7尺、粗7寸的大蚕，这种蚕吐的丝坚韧异常，四根丝线就

可以提起一钧（合30斤）的重量。蚕卵大如鸟蛋，但是只要把蚕卵从扶桑国带到句丽国（今朝鲜一带），蚕卵就会变小，变成普通蚕卵那么大。在扶桑国王宫里还有一个方圆一里的、会发光的水晶城，如果水晶城看不到了，就会发生月食。

还有拂林国[333]，故事中将它想象成一个方圆200里的大岛，岛上都是宝树，人也都是能工巧匠，善于制造各种宝物。在岛西北，有一个大坑深千余尺，把肉投进去，就会有大鸟将宝贝叼出来，最大的可达5斤。这个故事就很像是来自《天方夜谭》了。

故事中还提到，在西北方有女人国，在南方的“土人”以虫子蛇蝎为食。南方的海岛上出产一种火浣布，被认为是用火鼠的皮毛制成的。[334]

故事中还描述了北极地区的极昼、极夜现象，认为那里是烛龙的居所。西方有井水中出酒的酒泉，北方漆海可以把物品染黑，西方有奶白色的乳海。在这三个地方之间，则有许多神奇的现象，比如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等。

这些说法有的可能有点儿依据，但更多的只是唐人对于异域的美好想象。虽然西域和南海朝圣之路是畅通的，玄奘等人也已经带回了当地的真实信息，但人们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象力去构造一个幻想的世界。

其次，唐人认为异域的人更加神奇。

比如，在最早的一篇唐传奇《古镜记》（又名《王度》）中，就有对西域胡人的记载。这位胡僧神采不俗，会望气，一眼就看出主人公家里藏了一面绝世宝镜，因为他家里每天碧光连日、绛气属月，这就是宝镜的征象。当然，所谓“望气”是中国道教的特长，但唐代人毫不犹豫地将它放在了佛教徒身上，也表明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化身来安排故事情节，这个化身要求异域感强，并不要求是真实的。

在另一篇早期传奇《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中，一个胡

僧神通广大，而另一个来自蠕蠕（即柔然）的客人通过一种测量工具，就知道一棵枣树上有多少颗果子，其中多少颗有核，多少颗无核。

再次，唐人也喜欢想象唐人在异域的神奇经历。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早期才子张 著名的小说《游仙窟》[335]了，这可能是唐代规模最大的一篇传奇，描写主人翁去往异域（积石山）时，碰到了“一夜情”的故事。

在故事中，主人公在汉地所未见过的高山大川中前行，到了晚上，却来到了一个如同桃源式的所在，他称之为仙窟。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崔十娘和她的嫂子五嫂。两人的丈夫都已经战死沙场，但她们的年龄只有17岁和19岁。于是主人公留宿、诗酒流连，并享受了一个快乐的夜晚，第二天与十娘依依惜别。

这种带着异域风采的艳遇故事让中国文人看了兴奋不已，日本人也迫不及待地将它带回国内。

对于海洋，唐人留下的篇幅相对少一些，但想象力也并不落后。段成式曾经在《酉阳杂俎》中写过一个叫长须国的地方。有一位士人曾经跟随着新罗的使节到了海上，被风吹到了一个人人都有长须的地方。长须国的所在地全称叫“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长须国”。这里地处扶桑洲，人口众多，人们的穿着和居住的房屋与汉地稍有差别，但是人们能听得懂汉语。士人在这里很受尊敬。有一次，长须国王派人召见他，他行走了两天才到达首都。

在这里，甚至女人也都有胡须，所谓“花无蕊不妍，女无须亦丑”[336]。

士人娶了国王的女儿，在这里生活了十余年，有了一儿两女。一天，长须国突然有难，国王请求士人前往龙王处搭救，士人和龙王交谈后才知道，原来长须国的人民都是虾。[337]

而在另一个唐人戴孚所写的故事《宝珠》中，一位士人发现了一颗

巨大的珠子，当他碰到一位胡人时，胡人不仅给了他很高的价格，还把他带到东海上。在那儿，有许多奇怪的人带了很多宝贝前来赎珠子，但胡人都没有同意。原来，这颗珠子是由两位龙女护卫的，当龙女与珠子合一之后，就成了渡世的宝贝。[338]

这个故事说明，唐代时，从西方来的胡人不仅可以通过陆路，也可以通过海路与唐代交通，而唐人也知道这两条路最终可以汇集到一个地方，那就是中亚、西亚的大食和波斯一带。

唐朝虽然是一个尊崇佛教的朝代，但它并非只选择了佛教，事实上，唐朝对于几乎所有的信仰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由于唐朝的皇帝姓李，便认为老子（李耳）是他们的祖先。道教在唐朝尽管不如佛教发达，却依然受到了皇帝的优待，甚至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曾经列入过唐朝的考试科目，而这是佛教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除了本土宗教和佛教，其他海外的宗教也都受到了政府的宽容。在唐代的作品中，经常不去区分海外这些宗教，比如波斯曾经信奉拜火教（祆教），后来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改信了伊斯兰教，对普通的唐朝人来说很难分清波斯人的信仰，他们对于波斯人的想象更多是基于道教对法术的理解。甚至“波斯人”这个概念也和“胡人”混杂在一起，一个胡人到底是波斯人，还是大食人，还是中亚其他人种，已经很难区分了，都被统一在“胡人”的概念之下。在唐朝早期，中亚的“昭武九姓”等小国依然是以波斯（伊朗）人种为主，作为统治者的西突厥只是统治阶层。然而中亚社会也慢慢地开始了换血，最终会变成一个以突厥人为主体的社会。在大食国的影响下，突厥人的信仰也会慢慢地从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等多元宗教变成了伊斯兰教。这一切在唐代都已经开始，而拜火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都从西域或者海上传入了唐代，成了这个复杂的信仰时代的一部分。

在这些不同的信仰中，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由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

第八章 传入中国的世界信仰

两个帝国的相遇

唐代的影响力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建立和扩张之时。

唐代虽然在北方和西南边境上有过不少军事行动，但超越现代中国边境以外的军事行动却屈指可数，最著名的莫过于唐朝对大、小勃律的用兵。

如今从中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经过红其拉甫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如果顺着中巴友谊公路继续向西南方前进，就会到达一个叫吉尔吉特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较大的河谷盆地，称为亚辛谷地，抬头能看到积雪的喀喇昆仑山，但河谷中又足够温暖，适合庄稼的生长。

吉尔吉特还是一个四岔路口，除了前往中国和去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还有岔道可以向西北去往吉德拉尔，或者向东南去往印度河谷上游盆地中的斯卡都。

在唐代，有两个叫勃律的国家，分别是位于吉尔吉特的小勃律，以及位于斯卡都的大勃律。吐蕃王朝崛起后，由于两个勃律都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边缘，被认为是吐蕃人的势力范围，于是吐蕃占领了这里。

两个勃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处在从吐蕃去往西域的路上。从青藏高原可以首先到达大勃律的斯卡都，再顺着印度河而下，来到小勃律的吉尔吉特，再北上向吉德拉尔方向，在去往吉德拉尔的路上，有一个在今天叫默斯杜杰的地方，在默斯杜杰的北方，有一个巨大的山口达

尔科特，从这个山口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了瓦罕谷地。一旦到达瓦罕谷地，就可以顺着瓦罕河或者帕米尔河而上，进入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到这时，就完成了从吐蕃经过两个勃律前往西域的旅程。

公元747年（天宝六载），唐安西副都护、安西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为了抑制吐蕃的扩张，率领兵马从安西的龟兹出发，进入塔什库尔干地区，再沿着塔什库尔干北线进入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南侧，顺着帕米尔河进入了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地区，从瓦罕走廊再经过达尔科特山口翻越了南方的兴都库什山，经过默斯杜杰，如同天兵一样出现在小勃律面前，将其征服。[339]

在西方战争史上，迦太基的汉尼拔翻越比利牛斯山进攻罗马，已经成了西方军事行动中困难最大的行军，而高仙芝的整个行军都在世界屋脊之上，连续翻越了西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等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其中达尔科特山口的海拔更是高达4700米，军队已经是在终年积雪之上行进，其难度远大于汉尼拔的行军，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军事行动。

这次战争成了唐朝扩张的极致，同时也是天宝年间最后的辉煌。然而四年后的公元751年（天宝十载），已经成为节度使的高仙芝却由于用兵过度，失去了西域地区的民心。唐朝北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已经无力供养庞大的军事力量，皇帝建立的节度使制度也腐蚀着帝国的文官系统，导致整个政治和军事体系出现了崩塌的前兆。

而此刻，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却出现了一次改朝换代，自从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帝国为了维持在民间的秩序，设立了一个安拉在人间的代理人哈里发来统治帝国，最初的哈里发是选举产生的。在穆罕默德以后，首先出现的是四个依靠选举上台的哈里发，被称为“四大哈里发”。

“四大哈里发”之后，倭马亚家族通过世袭的方式控制了阿拉伯帝

国，哈里发变成了世代相传的，于是就进入了倭马亚王朝时期。但到了公元750年，另一个家族阿拔斯取代了倭马亚，建立了另一个世袭的哈里发世系，这就是阿拔斯王朝，也是阿拉伯帝国最辉煌的时代。

在倭马亚王朝后期，大食人的扩张已经减缓，但经过改朝换代之后，阿拔斯王朝又发动了一次新的扩张，向着中亚前进，于是唐朝和大食国的军事冲突突然间出现了。

公元751年，高仙芝率领大军西进，与大食国的军队在位于现代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的怛罗斯相遇，双方展开战斗。由于其他游牧部落对唐朝不满，一支叫葛逻禄的部族发生了叛变，导致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惨败逃回。[340]

这一次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唐朝虽然在一次战役中战败，但还保留着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之后发生的“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它使得唐朝为了维持内部秩序而焦头烂额，再也没有了对外扩张的可能，这就将中亚地区留给了大食国。

阿拉伯帝国扩张的同时，在西方世界却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陷入了中世纪的泥沼。公元395年（东晋太元二十年），原本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到了公元476年（北魏延兴六年），西罗马帝国在北方日耳曼人的冲击下崩溃了；东罗马帝国虽然直到1453年才灭亡，但它的国土面积逐渐缩小，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退到了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

罗马帝国的衰落让罗马人无暇顾及东方世界，与中国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稀少。这使得与中国并立的世界性帝国变成了阿拉伯帝国（大食）。世界这个阶段有关中国的记录也主要由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完成。直到公元1095年（北宋绍圣二年）欧洲发动了十字军东征之后，欧洲人才再次对遥远的东方发生了兴趣。

在唐代后期，中亚发生了两种深刻的变化，一直影响到了现代。

一是中亚的人口发生了变化，之前的人口大都是和波斯同源的伊朗民族，其中河中地区“昭武九姓”就是其代表。之后，突厥人逐渐取代了波斯人，成了中亚的主流人口。在阿拉伯人之前，突厥帝国席卷了中亚，但他们只是作为统治阶层存在，而人民仍然是伊朗裔的，反而是在突厥帝国灭亡、伊斯兰世界崛起后，已经成了被统治者的突厥人反而慢慢地开始取代伊朗人。伊朗人被突厥人慢慢地赶向了高处，进入了东面的山区，他们至今仍然有所残留，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341]

中亚发生的第二个变化，是原本人们信奉的佛教和拜火教逐渐被伊斯兰教取代，于是，这个地区变成了最传统的伊斯兰教区，一直持续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前。[342]

不幸的是，在中亚完成这两个转变时，已经进入了后期的唐帝国却基本缺席了，于是，这两个转变是在阿拉伯人的注视和指导下完成的，从此，中亚也就成了伊斯兰教的延伸区域，不仅与佛教绝缘，也与中华文明绝缘了。

元代和清代虽然曾经控制过部分中亚地区，但前提是承认他们的伊斯兰教现实，中亚这部分国家是元帝国和清帝国的属国或者属地，却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

但幸运的是，虽然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接壤，但双方除了怛罗斯之战，没有再发生恶性的战争事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唐帝国的衰落，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阿拉伯的扩张到了自然边界，要想跨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已经非常困难了。

在军事上收敛的同时，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却展开了。

传说在唐太宗时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曾经派出三个人到中国来传教，这三人分别叫吾艾斯、盖斯和宛葛斯。

这三人到底是否真实存在，已经不可考，可是三人在中国的墓葬却

都能找到。在他们来长安的路上，首先去世的是盖斯，他卒于今天新疆哈密市东部与甘肃交界一带，被草草埋葬，后来哈密王派人为其修建了盖斯墓，今天仍位于新疆哈密市。

接下来去世的是吾艾斯，他也没有到达长安，就在甘肃玉门去世了，于是也被埋在了当地，这个墓葬现在还能找到。在明代使臣陈诚的《西域行程记》中，也记载了这个叫“回回墓”的地方。

三人中只有宛葛斯到达了长安，他后来去世于广州，葬在了广州白云区桂花岗，这里至今仍然有“宛葛斯拱北”这个地名。

除了这个传说，在中国其余有穆斯林分布的城市也往往有“圣人传教”的传说。比如在泉州就有伊斯兰圣墓，根据当地的说法，穆罕默德曾经派遣四位徒弟前来中国，其中一贤去往广州，二贤去往扬州，三贤沙仕谒和四贤我高仕在泉州传教，去世于泉州。[343]

这些事件大都只是传说，是否可靠无法考证，但接下来，有文字记载的伊斯兰教徒终于到来了。

苏莱曼和马苏第

阿拉伯人前来中国，一开始就是从两个方向到来的，除了陆上的接壤，阿拉伯人在海路上也迅速地进入了这个东方国家。

在古代社会，波斯人的船队曾经遍布印度洋地区，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以游牧和短途（或者中程）贸易为生的阿拉伯人迅速掌握了航海技术，从一个沙漠民族变成了海洋民族。中国的大海港广州也成了阿拉伯人了解的地区。只是，由于阿拉伯人没有深入内地，他们知道的只是一些沿海地区，其他地方也只是偶尔听闻一些传说了。

现代已知最早记录中国的阿拉伯文献是《苏莱曼东游记》，其中第一部分写于公元851年。当时阿拉伯人的航线是这样的：[344]

他们出发的地点大都在波斯湾里。虽然巴士拉、霍尔木兹这样的港口更加出名，但阿拉伯人却选择了位于伊朗的一个不那么出名的港口西拉夫港（Siraf）。现在，西拉夫是一个只有3500人的小镇，但在当年却是海船云集的地方。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海船叫中国船，意思是前往中国的远洋船。

阿拉伯人之所以选择西拉夫，一是继承了波斯传统，波斯人时期，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找了一个港口，而没有使用其他更加知名的港口；二是因为这里的吃水很深，适合于远洋船队的停泊，而在伊拉克巴士拉和阿曼等地，虽然都是优良的海港，却由于水浅，只能发小船先到西拉夫，再统一装船装水，开启远洋航程。[345]

从西拉夫港到中国的广州港，中间要经过阿拉伯人所说的七个大海。[346]

第一个海是法尔斯海（Fars），指的是现在的波斯湾。当外界称伊朗为波斯的时候，他们却自称为法尔斯，波斯语为Farsi。

第二个海是拉尔海（Larwi），即现在的阿拉伯海。出了波斯湾之后，就进入了拉尔海，这个海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南部，可以看作印度洋位于印度和非洲之间的一个巨型海湾，也是古代世界连接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欧洲的主要海域。

第三个海是哈尔肯德海（Harkand），指的是孟加拉湾，也就是印度东部到泰国之间的海域，也属于印度洋的一部分。在哈尔肯德海和拉尔海之间，则是一连串的岛屿，据称有1900多个岛。这些岛屿就是现在的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在哈尔肯德海之中还有一些岛屿，比如尼科巴群岛和安达曼群岛等。[347]

第四个海是撒拉赫特海（Salahit或Salaht），有可能是现代的安达曼海，这个海位于泰国东侧直到马六甲海峡附近，紧挨着孟加拉湾，也可以看作孟加拉湾的自然延伸。这个海的特点是非常浅，容易出事故，

还是海盗聚集的地方。

第五个海是昆都兰海（Kundurang或Kardang），指的是从马六甲海峡过了新加坡之后，在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马来半岛围成的那片水域，包括现在暹罗湾的南部，以及印尼的爪哇海。这里岛屿众多，城市林立，商业繁荣，是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区。同时，这里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在爪哇岛一带偶尔可以看到海中岛屿上火山喷发的景象。

第六个海是桑夫海（Sanf），在中国称占不牢海[348]，这片水域围绕着越南南部著名的海港国家占婆。

第七个海是桑吉海（Sangi），也就是中国南海。过了这个海，就可以到达中国的大城市广州了。

在苏莱曼时代，其实直接从广州运到阿拉伯的商品并不多，主要原因是：第一，路上很危险，除了自然风险，还有众多的海盗，即便是阿拉伯人，航海也是一项危险的活动；第二，这一路实际上跨越了好几个经济带，每一对相邻的经济带之间都会发生贸易联系，从中国上的货，很有可能到东南亚就卖掉了，印度接收的是东南亚的货，而阿拉伯接收的是印度货。此外，苏莱曼认为还有几个原因：中国广州的房子都是木头和芦苇制造的，一旦发生火灾，商品就都被烧光了，无法运出；另外，海盗非常多，也不适于长途运输。但从情理上讲，这些原因可能是次要的。

在苏莱曼时代，由于贸易的需要，广州的官员甚至专门设立了管理伊斯兰教徒的职位，往往来自伊斯兰教的首领，让他负责伊斯兰商人的事务，包括带领他们唱经。[349]这一点，也表明了唐朝政府的开放胸襟。但唐朝政府却一直没有办法控制海外的海盗，表明他们对海洋的控制力还是极其有限的。

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民族都认为自己的君主是最伟大

的，这一点可能会被视为夜郎自大的表现，但如果从善意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人类的本性罢了。

苏莱曼说，当时的阿拉伯人认为，世界上有四个伟大的国王，其中最伟大的是位于巴格达的哈里发，第二伟大的是中国的皇帝，第三伟大的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第四伟大的是印度的白勒赫拉王。

第二、第三位都是人们熟知的，但为什么印度的是第四伟大呢？这是因为印度和其他地区不同，其他地区只有一个君主，但印度却有许多个大大小小的国王，白勒赫拉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王。

在苏莱曼时期，印度的笈多王朝早就成了往事，就连玄奘见到的戒日帝国也已经解体了。在印度中部偏西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瞿折罗，这个国家曾经抵抗了伊斯兰的入侵。可是苏莱曼并没有把瞿折罗算在内，而是指出一个叫白勒赫拉的国家的王才是印度最伟大的王。那么到底有谁比瞿折罗更伟大，白勒赫拉又是什么国家呢？

按照苏莱曼的说法，白勒赫拉的国境从印度西部直达东部与中国的边界，但现代人却无法在印度历史上找到一个符合这一条件的国家。

也许白勒赫拉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它让人想起了笈多帝国或者戒日帝国的影子，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国家。

这也说明阿拉伯人对于陆地的认知是有限的，不仅不了解中国的内地，就连更近的印度，也认识得并不全面。他们熟悉的是港口和海洋。

关于中国，苏莱曼还有几个有趣的观察。

其一是关于海外商税的，当海外的船队来到广州，中国的官员们就会把船上的货物都搬到仓库里锁好，直到最后一条船进入港口后，再把所有的货物清点一遍，收取30%作为关税。剩下的货物，官方会出面将最好的一部分挑出来，以高价买走，而且支付现钱，其余的才准商人们自己带走买卖。以樟脑为例，官员们最喜欢好的樟脑，他们买过之后，

剩下的樟脑在市面上只能卖一半的价格了。[350]

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也得到了证明，特别到了宋代，依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参与海外贸易，政府既得到了税收，也采购了最好的贸易品。

其二是中国的信用问题。中国人借债时，喜欢写两张借据，一张由债主写，一张由债户写，两张纸都按上手印，再错开卷起来，在纸卷的背上写几个字，这样，这几个字就有一部分在债主借据上，一部分在债户借据上。债主和债户分别把对方写的借据保管好，作为凭据。

如果债主不小心把借据丢了，而债户又不承认了，该怎么办呢？中国人会让债户写一个凭据，发誓自己没有借钱。债主拿走这个凭据，万一某一天他又把原借据找到了，就可以凭原借据和发誓凭据，要求官府将债户打板子。

其三是苏莱曼还发现中国人没有房地产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房地产都是重要的财富，也是政府收税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唐朝只对人头收税，却不收房地产税。[351]

其他的特点还有：中国人没有宗教，即便从印度传入一点佛教，也和印度有派别之分。印度有大量的荒地，而中国却很少有荒地，基本上都被开垦过了。中国的气候适宜，也导致比印度的景致要漂亮。

但苏莱曼了解的只限于广州一隅，至于中国北方和内陆的情况，他一概不知，中国内地对阿拉伯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地带。

不过，苏莱曼对广州的认知也只是片面的，实际上，就在他写书的时候，广州已经处在发生巨变的前夜了。[352]

公元915年（五代梁乾化五年），一个叫哈桑的人续写《苏莱曼东游记》时，又写到了广州的结局。[353]这和一个叫黄巢的人有关。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长期在汉地全境活动。公元878年（唐乾符五

年），他突然从江南地区越过福建和浙江边境上的仙霞岭，进入福建，再从沿海向南进入广东地区，第二年正月兵围广州。

战争破坏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别是桑树，使得中国的物产（特别是丝绸）出现了短缺，于是阿拉伯人控制的丝绸贸易也就不存在了。

黄巢攻取广州之后，顺着漓江、湘江道北上，经过长期的迂回之后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唐僖宗只好逃往了成都。

由于古代的信息传递太慢，直到公元915年哈桑写书时，他还没有得到黄巢被杀的消息，以为黄巢仍然占据着中国。黄巢真实的死亡年份是公元884年（中和四年）。

哈桑之后又有人继续补充，将黄巢的死写入了书中。不过，黄巢死后贸易并没有恢复，主要原因是唐朝皇帝的权威已经没有了，各地的军阀出现了割据的情况，于是中国内部的贸易和交通都出现了紊乱。同时，军阀们都热衷于压榨前来做买卖的外国人，于是随着伟大的唐朝的远去，来到中国的航行暂时断绝了。

阿拉伯人对海上中国的了解如此，对陆地中国的了解又有多少呢？这要靠另一本书来提供给我们答案。

公元10世纪，也就是在唐朝灭亡之后，阿拉伯世界一位著名的旅行者兼作家马苏第写了一本《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354]，其中专门提到了中国的情况。

在唐朝中后期，由于吐蕃入侵了西域一带，加上回鹘[355]从北方南下，进入了现在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使得唐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几近关闭。阿拉伯人对如何从陆路到唐朝疆域的知识少得可怜，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流传着有关中国的如下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传说，诺亚的子孙中，有一支源自阿穆尔[356]，他们从中东向

东北方向扩散，成了现代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原住民的祖先。在中亚，一部分人又扩张到了今天中国新疆地区，也就是回鹘人和其他突厥人。但是，中国人还不是从这些人中分化出来的，而是阿穆尔后裔中有一支到达了印度，成为印度人，还有一支到了西藏，成了吐蕃人的祖先。从印度人中又有一部分沿着海岸线前行到了中国的广州和扬州一带，变成了中国人。[357]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走海路到达中国的。之后，中国人经过了几代王的统治（这些君王大都活了两三百岁），才逐渐扩展到了西部，与回鹘、吐蕃等相接。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城市是成都，而与回鹘相近的是拥有着皇宫建筑的长安。

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却代表了中世纪人种学的最高水平。既然人类是分布在全世界的，而人类又都是诺亚的后裔，就必须依靠一定的路线从中东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种理论很像现代的“走出非洲”学说，虽然“走出非洲”的科学依据更加充分，但基本思路却和当时阿拉伯人的设想惊人的一致。在中世纪《圣经》和《古兰经》就被认为是科学的根本出发点，对当时人们的认识论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虽然这种说法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又有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面。比如，马苏第还记载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一个撒马尔罕人到中国做生意的故事，他因为被广州的总督欺负，到长安去告御状，竟然还获胜了。这个故事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撒马尔罕距离新疆并不遥远，在玄奘时代，人们去往印度都要经过新疆、中亚、阿富汗，撒马尔罕也由此成为中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但是，到了唐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撒马尔罕人要到中国去做生意，竟然要从撒马尔罕先到伊拉克的巴士拉，乘船经过阿曼和马来西亚吉打州，再经过印度走海路去往中国的广州。这样相当于在已知的世界绕了一大圈。

撒马尔罕人之所以走这条路，一是因为阿拉伯人统一了西亚和中亚，带来了超级繁荣，使得从中亚经过伊拉克是有利可图的，撒马尔罕

人将中亚带来的货物先在伊拉克卖掉一部分，再换上伊拉克的货物带到印度、中国，一路换货的利润显然比直接过去更加丰厚。

另外，由于丝绸之路交通的断绝，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陆上道路已经过于危险，生意人也并不想冒这个险。

最后一点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内地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长安是最富裕的地方，到了唐末经过“黄巢之乱”，长安已经残破到撑不起区域经济，更何况是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了。从中亚贩卖商品到长安已经无利可图，反而是到广州能够获利颇丰。广州和长安都经历过“黄巢之乱”，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广州是可以恢复的，长安却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的衰落，使得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当年的商业价值了。[358]

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主人，还可以从另一类书中看出，阿拉伯人征服了非洲、亚洲的诸多地方后，致力于编写地理书籍和税册，由于阿拉伯人是贸易民族，他们对数字异常敏感，对每个地方的物产和税收都很了解。

在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按照以中东巴格达为核心的地理划分，除巴格达所代表的中央区之外，世界还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分别是艾卢法区（Arufa），包括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斯拉夫（东欧）、罗马（南欧）、法兰克（西欧）、坦佳[359]等地，直到埃及边界；卢比亚区（Lubiya），主要是现代非洲地区，以及南方的海洋；伊特尤菲亚区（Ityufiya），这个区域向东直至印度和中国；艾斯固提亚区（Asqutiya），包含了北方的亚美尼亚、中亚和外高加索，直到俄罗斯草原。[360]

这些区域除了艾卢法区的一部分，以及伊特尤菲亚区的印度和中国部分，其余的区域都已经纳入了哈里发的统治之下。既然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就必须设立交通系统，哈里发在帝国疆域内设立了930个驿站，

牲口费、饲料费、驿站维持费用，每年需要花费159100个第纳尔。[361]

帝国的道路系统四通八达，这里不说其他方向的道路，只说和本书相关的通往东方的道路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永远是在新疆地区，但事实上，到新疆的丝绸之路只走了一小部分，出了国的部分更加漫长。

从阿拉伯角度来看，丝绸之路西段的道路是从巴格达向东延伸的。[362]出了巴格达，首先要到达位于伊朗境内的哈马丹（Hamadān），哈马丹是一个枢纽站，可以向四个方向行进，但我们只看向东的道路，从哈马丹可以到达一个叫雷伊（Rey）的地方，也就是现代的德黑兰。从德黑兰继续向东，沿着厄尔布尔士山南麓和沙漠之间的区域向东行，到达丝绸之路西段最重要的枢纽站木鹿，即现在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从木鹿又分成了三条道路（向北、向东和向南），其中北向道路去往布哈拉，再从布哈拉通往撒马尔罕，过了撒马尔罕，又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向北和向东），其中向北的路经过塔什干进入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再经过怛罗斯等地到达西域，也就是今天中国新疆地区，阿拉伯帝国的道路到此戛然而止，不再延伸。从撒马尔罕向东的道路进入费尔干纳谷地，从这里可以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西域地区。

从木鹿向东的道路可以到达今天阿富汗的巴尔赫，从巴尔赫向北可达撒马尔罕，向东可达巴达赫尚，向南可达喀布尔。

从木鹿向南可以到达赫拉特、坎大哈，进入印度境内。帝国在这里的边界已经深入了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的信德地区。

既然有了道路，就可以控制当地。一个政权是否控制了一个地区，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否能从当地征收税款。盛唐时期的唐朝虽然在中亚建立了不少羁縻政权，但这些政权都不属于唐朝实际管辖范围，因为那些国家并不向唐朝政府缴税。[363]

阿拉伯人却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只要他们控制了一个区域，就试图

建立起一套征税系统，于是，税册成了阿拉伯人一项重要的资料性文件。

在阿拉伯的税制中，中亚地区和阿富汗都被划入了大呼罗珊地区，这个地区每年缴纳的税额是3700万迪拉姆[364]。这个数字在所有的地区和省份内排行第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区域划得太大，比起其他地区大很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地区的税收大都是以现金的形式上缴，而这个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允许以战俘和战利品抵冲税金。但不管怎样，缴纳税收，证明了中亚地区已经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中亚地区进入版图，但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却在西域以外，这给西域地区的小政权们带去了一个好处：没有人管他们了。

唐朝时西域地区曾经部分属于唐帝国，也曾经被吐蕃人占去了一部分。但当阿拉伯人完全控制中亚时，唐帝国已经接近分崩离析，而晚唐时期的吐蕃也恰好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吐蕃曾经非常强大，曾经趁着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衰弱进入西域地区，但到了吐蕃后期，佛教和异教的争夺变得白热化了。吐蕃虽然引入了佛教，可是由于赞普对佛教过于推崇，引起了信奉原始本教[365]的老贵族的不满，他们在寻找机会推翻佛教。这时，恰好吐蕃迎来了一个不信佛的赞普朗达玛，他和佛教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还采取了一系列“灭佛”行动，导致了高原国家的分崩离析。[366]

最后，阿拉伯帝国经过扩张之后，也进入了“维稳”时期，自然也无法越过边界上的高山，这让西域小国最后的威胁也解除了。

西域小国享受了难得的不受欺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是：它们既不信奉汉地的道教和儒教，也不信奉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更不信奉吐蕃的本教或密宗，而是继续信奉之前的大、小乘佛教。直到元朝时期，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寺庙和佛像，并拥有众多的佛教徒。与此同时，还有几种特殊的宗教也在这片区域大行其道……

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在佛教之后、伊斯兰教之前，首先到达中国的是来自伊朗的一个特殊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祆教[367]，俗称拜火教。

这个宗教是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初创立，其主要教义是一种二元神论，即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个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与一个黑暗神安格拉·腊曼纽，两者始终处于无限的斗争之中。[368]而人类的最高使命，就是帮助光明神战胜黑暗神。

他们崇尚火，就是崇尚光明神。至今，在伊朗的亚兹德（Yazd）还点燃着拜火教的圣火，据说这个火已经燃烧了数千年还没有熄灭。[369]拜火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则是它将一种善恶相对立的二元论传给了基督教。在之前，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只相信一个神——上帝。但基督教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是既然上帝代表了善，那么恶又是从哪里产生的？自从加入了拜火教元素，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恶来自撒旦，他是上帝的对立面。不过，基督教虽然将撒旦的地位提升，却又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立的神，所以整体上还是一元神论。

拜火教除了崇拜火焰，另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做法，是在人死后将其放到高山顶上修建的开放式高塔中，任由飞鸟将尸体上的肉吃光，之后人们再将尸骨收殓。瑞典著名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为了帮助西方研究人种问题，就曾经偷过波斯高山上拜火教徒的颅骨。[370]

拜火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当时的高昌和焉耆两国就有拜火的习俗，同时，波斯人也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371]到了北齐、北周和隋代，拜火教就名正言顺地出现在汉地，并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372]

唐宋时期，在首都都有祆教的寺庙，唐代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祆教事务的官职，叫萨宝府祆正，是个从七品官职。[373]他管理着首

都长安的四座祆教寺庙。[374]此外在东都洛阳也有三处寺庙。[375]

到了宋代时，开封府也有三座祆教寺庙。[376]不过这时的祆教在伊朗境内已经衰落，那儿已经成了伊斯兰教的天下，由于失去了本土的根，祆教在中国并没有更大的发展。皇帝在对待祆教的问题上，也一直是允许外国人信奉，但对本国人却进行了限制。这种做法导致了祆教在中国的式微。

祆教在中国没有获得更大发展，但另一个已经逐渐消失的宗教却取得了更大的成果，他就是摩尼教。

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公元216—约274年）综合了基督教、拜火教和佛教，创立了一个新的学说。

这个学说的中心，来自拜火教光明/黑暗的二元对立，将之演化为善/恶的对立，他又加入了另一个时间的概念“三际”。在初际中，善/恶、明/暗是分开的，到了中际，善/恶、明/暗被混淆起来，这个阶段也就是现代的人类阶段，到了后际时，经过人们的斗争，善/恶、明/暗还会重新分开。人们就是要在摩尼等导师的帮助下从善弃恶，完成这个阶段。

它继承自基督教的成分是教会组织，通过构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组织，设有12名导师、72名主教和360名长老，完成对“选民”的领导。

它继承自佛教的成分则是不杀生，[377]一天只在日落后吃一顿饭，喜欢吃黄瓜和西瓜，并将这两种水果教义化。[378]

摩尼教在波斯诞生后，一度非常繁荣，甚至影响到了西方的基督教区域，就连基督教著名的学者圣奥古斯丁早期都追随过摩尼教。但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摩尼教在波斯本土衰落了。与此同时，一部分摩尼教徒东迁，在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开花结果，成了主流。

这部分摩尼教徒又向东进入了唐朝。到了武周时期（公元694年，延载元年），有波斯人将摩尼教带到了中国。[379]公元768年（大历三年），“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摩尼教在长安建立了第一座寺庙大云光明之寺，[380]之后开始了快速扩张。最初，皇帝只允许它在长安、洛阳建寺，之后扩张到了扬州、河南府、太原府等地方。[381]

摩尼教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很快，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强大的中间人——回鹘人。

在唐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更迭了好几轮，最初在北方的是突厥，但在公元583年（开皇三年），突厥汗国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西突厥以今天的中亚和新疆北部为基地，而东突厥则横亘在阿尔泰山以东的中国北方，玄奘去西域时见到的就是西突厥的可汗。公元630年（贞观四年），作为正统的东突厥汗国就被唐朝灭亡了。然而，到了公元682年（永淳元年），东突厥的后裔又在如今的蒙古国境内重建了突厥汗国，历史上称为后突厥汗国，也叫第二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存在了60多年，公元745年（天宝四载）时，在唐朝和回鹘的进攻下灭亡。

西突厥汗国被唐朝赶到了中亚，当中亚变成了阿拉伯人的属地之后，中亚突厥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却由于人口的繁衍，逐渐取代了原本的伊朗种人，成了中亚的主体民族，并从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分支，参与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比如，一支叫塞尔柱的突厥人长期控制了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并占据了波斯，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名义上仍然服从位于巴格达的哈里发，但塞尔柱领袖自称苏丹，实际上主导了统治权。

公元1071年，塞尔柱进攻位于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将御驾亲征的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俘虏。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鲁姆苏丹国[382]，这促使欧洲在公元1095年发动了持续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

塞尔柱人在十字军和成吉思汗的打击下衰落了，但蒙古人之后，另一支突厥人奥斯曼人又从中亚出发，以土耳其为中心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几乎可以与阿拉伯帝国媲美。至今的土耳其依然是奥斯曼人的国家，也是当年大帝国的残留。

而在中亚的各个国家，现在的主体民族（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依然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混合种。

在突厥人之后，唐朝疆域的北方被回鹘人所控制。回鹘人占据了如今的蒙古国，他们的统治持续到了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又被一支突厥种的民族黠戛斯[383]击败，逃往今天中国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最后在新疆安顿下来，成了维吾尔人的祖先。

但占据了今天蒙古国中部的黠戛斯人也并未统治多久，就被后来兴起的契丹人赶走了，他们先是逃往了蒙古国西部，那儿现在还有一个大湖叫吉尔吉斯湖。当蒙古人兴起后，他们继续向西北方向逃窜，之后辗转来到了中亚，到现在依然存在。如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就是他们的后代建立的国家。[384]

且不说其他几个民族，只说信奉了摩尼教的回鹘人。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兵力不足以支撑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战争，曾经引进了不少回鹘军队。而回鹘人在公元762年接受了摩尼教，[385]从此摩尼教成了回鹘人的统治宗教，当唐朝不得不感谢帮助他们打败了叛军的回鹘人时，回鹘人趁机要求唐朝接纳摩尼教，从而打开了摩尼教在中国发展的大门。

由于宗教势力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在唐武宗时期曾经发生了灭佛运动，摩尼教和祆教等作为外来宗教也一并遭到了镇压。之后，随着回鹘势力在北方的削弱，摩尼教更是受到了抑制。

但摩尼教的生命力又是非常强大的，到了宋代，随着西北方的失势，摩尼教突然又出现在了中国的东南方，从海上第二次传入，于是福

建成了摩尼教的大本营。[386]这种信仰又从福建沿着海岸线北上到了温州，最后遍布浙江。

宋代人对摩尼教的称呼是“吃菜事魔”，带着嘲弄他们食素、不杀生习俗之意。[387]北宋时期的“方腊之乱”，方腊虽然反对的是宋徽宗的花石纲，但他的信众中，就有很多的摩尼教徒。[388]

摩尼教除了在沿海地区和南方传播，也到了北方地区，却由于金元等外族的统治，没有扩张起来。而在南方，摩尼教的盛行一直持续到元末，并在元末民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支从摩尼教演化来的军队最终赶走了蒙古人，完成了汉人的再统一，只是这时的摩尼教已经改用了另一个名字——明教。当一位出身于明教的和尚朱元璋统治中国时，也就到了明教衰亡之时。

除了祆教和摩尼教两个小教派，在中国最大行其道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景教在西方根据创始人的名字又称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还被称为十字教。

聂斯脱利派之所以诞生，源自基督教内部一个非常拗口的悖论。从基督教将耶稣看成上帝之子那一天开始，这个悖论就产生了，它可以描述为：上帝是唯一的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神还是人？[389]

如果说耶稣不是神而是人，那么神的儿子怎么会成了人？如果说耶稣是神，这又和“上帝是唯一的神”这个原则相矛盾。

为了解开这个悖论，必然不能简单地将耶稣说成是人或者神，而是必须创造新的概念。不同的人们采取了许多种方法创造概念。其中正统的基督徒创造了一个叫“三位一体”的概念。所谓“三位一体”，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也就是只有一个神的“实体”，可是，这个神的“实体”却可以拥有多个形象，这种形象称为“位格”，每一个“位格”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只是实体的一个表象。所以，上帝这个神拥有一个实体，

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分别是“圣父”（上帝本尊）、“圣子”（耶稣）和“圣灵”。所以，耶稣是神，和神是一体的（不违背只有一个神的原则），却又拥有单独的位格。

通过创造出“实体”和“位格”这两个概念，就把这个悖论解决了。

但除了这种“正宗”的解释，还有人采取了其他的解释。比如，另一个派别阿里乌斯教派则认为，圣子不是神也不是人，他次于天父但是比人高。这就在人和神之间创造了一个中间概念，既不是神也不是人。

聂斯托利（大约去世于公元451年）曾经担任过基督教最高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390]，他则认为，圣母马利亚所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上帝只是在她生产之后，将自己的精神注入了这个孩子体内。

在确定教义的以弗所会议上，正统教义确立后，聂斯托利的学说成了异端，他也逃往了波斯。之后，聂斯脱利派在东方大行其道，并在中国以景教之名而存在。[391]

景教到达中国的时间是公元635年（贞观九年），此时玄奘还在印度学习。这一年，一位叫阿罗本的人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出房玄龄迎接。三年后，皇帝允许景教在长安义宁坊建立了大秦寺，有僧人21人。之后，景教在中国传开，最盛时可能在全国上百座城市都建立了景教寺庙。[392]

但景教和祆教、摩尼教一样，到了唐武宗灭佛时期遭到了打击。另一次打击则是唐末的动荡。景教的生命似乎并没有摩尼教强，逐渐在中国出现了断档。到了宋初的公元987年（雍熙四年），最后的在华景教教士归国，从理论上说中国再也没有景教徒存在了。公元1062年（嘉祐七年），苏轼来到长安游览，还能够看到废墟之中的大秦寺。[393]

然而，如果小看了景教的生命力又是不妥当的，虽然在汉地没有蔓延开来，但景教却通过中亚向游牧地区扩张，成了许多游牧部落的信仰。

如果说，当初摩尼教幸运地让回鹘人皈依，成功地在中国站住了脚，那么景教就幸运地让几个游牧部落皈依：汪古人、乃蛮人和克烈部。这几个部落的位置大都在如今蒙古国的西部。在宋金时代，以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为界，蒙古国被分成了东半部和西半部，东半部后来成了一个叫铁木真的首领的天下，而西半部则是几个景教部落把持，这里拥有蒙古最好、最险要的盆地，后来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就建在这里。

几个景教部落虽然被蒙古人并吞，但由于部落之间的婚姻关系，使得蒙古人内部有着强烈的景教情结。到了西方天主教派教士去访问蒙古帝国时，他们发现其实景教已经捷足先登了。[394]

景教的辛勤耕耘使得蒙古人对基督教一直保持着友好，并允许天主教派出传教士驻扎在元大都。景教也由此获得了二次复兴。直到蒙古人再次被赶出中原，景教才最终衰落，并从中华大地上消失了。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是两个既连续又非常不一样的朝代。它们中间只隔了短短五十几年的五代，就又进入了另一个统一时代。宋代的许多制度都继承自唐代，并又做了一定的发挥，避免了唐代后期中央权力不足的弊端。

然而唐宋在气质上又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人将中国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划在了唐宋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唐宋两个不同的特质：唐人重信仰，更加务虚；宋人重制度，更加务实。以唐宋文学为例，唐代的文学大都是天马行空，充满了想象力，而宋代的文学大都是充满了市井气息，更注重实际的生活。李白的诗篇中不停地出现各种道教的仙山、仙岛，神游万仞；苏轼已经算是宋代最浪漫的人，但他的作品中依然有许多实务性的文字。

在信仰上，唐代是各种宗教和信仰交汇的高峰，而宋代却更加注重历史、规章制度，回到了人间。

其实，唐代到宋代的转变，在唐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唐代早期的官僚大都是浪漫化的，但到了中唐就出现了著名的务实派政治家杜佑，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制度之书《通典》。只是浪漫主义情结和信仰依然保留着，直到唐代结束才告一段落。

因此，唐代的灭亡，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信仰时代的落幕时刻。然而，唐代后期的务实已经打开了另一条路，对一带一路来说，就是贸易的繁荣。从信仰到贸易，也反映了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

唐代时，一带一路上的另一个特征，是阿拉伯人碾轧了东西方。在西方世界中由于中世纪的到来，人们变得虔诚而愚蠢，缺乏对外探索的动力。东罗马帝国由于官僚弊端也丧失了扩张能力。东方的唐朝由于财政制度的不稳定，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进行大规模扩张，与此同时，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冲出现代新疆的边界进入中亚。这一切给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留下了很好的空档。阿拉伯人迅速占据了从西班牙、北非到中亚的广大空间，成了一个超级帝国，因此，这个时代可以认为是阿拉伯人主导的时代。

阿拉伯人留给世界的并非只有征服。事实上，幸运的是，阿拉伯人除了擅长打仗，还是一个更加擅长贸易活动的民族，至今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要么靠资源致富，要么靠贸易维持，很少有国家能够产生强大的工业，就和阿拉伯人的贸易特质有关。这种特质是被固化在《古兰经》中的，并且千年不变。

阿拉伯人对于贸易的信奉，使得这个时代也成了阿拉伯人主导的贸易时期。在东亚，它表现为阿拉伯人对印度航线的探索和控制。当唐代摆脱了单纯的信仰，加入了务实的成分之后，也开始跟随阿拉伯人开展贸易，学习造船，探索航线。因此，唐代成了一个技术积累的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贸易冲动，这种冲动在宋代终于开出了花朵，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宋代终于在东亚地区成了具有控制力的贸易大国，宋元时代的造船技术也领先于世界，于是开启了一带一路上属于中国的贸易时

代。这个时代虽然在宋代最为繁荣，却是发端于唐代的。

注释

[1]据《法显传》。

[2]本书作者曾数次骑游西藏，所经历的聚聚散散至今让人回味。

[3]有关乞伏乾归的记载可参见《晋书》卷一百二十五·载记第二十五。西秦建立于公元385年，公元400年灭国于后秦，公元409年复国，公元431年灭于胡夏，共37年，四主。其中乞伏乾归从公元388—412年（除400—409年灭国时期外）在位。

[4]到唐代，夏坐仍然非常普遍。

[5]后来，隋炀帝也是从这里前往河西走廊的。

[6]参考《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

[7]从新疆到兰州的铁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两条并行的长城，在铁路的东侧不远处。

[8]参考《法显传》。

[9]《法显传》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

[10]一种猜测是法显加入了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将听说的和实际到达的地点混淆了，将南北两道上的国家混在了一起。也可能是不同的旅行者走不同路线，将南北两道的情报汇合在了一起。

[11]如果要这样走，只有一种可能，是沿着塔里木河—和田河的河道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于阗。而大部分人会选择从天山南麓、沙漠北沿直接前往喀什。

[12]《法显传》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

[13]新疆和田市南方的库玛提寺庙遗址。这个寺庙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魏书》中均有记载。

[14]又称朅盘陀国，大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15]一般称帕米尔高原，地理学领域习惯称其为"帕米尔山结"。——编者注

[16]不管是《法显传》还是在其他记载中都有提及。

[17]本书作者对这个区域进行过考察，并著有《穿越劫后中亚》一书。

[18]现在通往巴基斯坦需要走红其拉甫山口，但法显和玄奘（返回时）所经过的山口不是红其拉甫，而是在红其拉甫以北。

[19]又称"兜术天"，佛教用语。佛教理论认为天分许多层，第四层叫兜率天。佛陀降生人世前，都要先在兜率天讲说佛法。——编者注

[20]参考《法显传》。

[21]著名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进入中国时，曾经考察过附近地区，参见《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印度西北考察记》。

[22]法显这一段道路与玄奘不同，却更加艰险，玄奘采取了通过中亚的道路，参考本书相关章节。

[23]《法显传》中有“那揭国”“那竭国”两种写法，本书统一写作“那揭国”。位于今天阿富汗贾拉拉巴德附近。——编者注

[24]通往印度道路上的许多佛迹持续了数百年，法显时期看到的遗迹与玄奘时期很相似，直到后来引入伊斯兰教后，许多佛迹才消失，或者转化为伊斯兰教神迹了。可参考本书后面描写玄奘的章节。

[25]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发源于此。

[26]《大唐西域记》中称为呾叉始罗国。——编者注

[27]至今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内还有大量的空地，处于没有建设完成的状态。这是由于规划首都时过于雄心勃勃，最后反而无法用建筑将规划区域填满所致。

[28]东晋时期1丈约合2.445米，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二章。

[29]参见《大唐西域记》，本书后文也有提到。

[30]古印度计程单位，又称由旬。按《法显传校注》记载，1由延大约折合6.5英里，约合10.5公里。

[31]《法显传》载：“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

[32]在近代，阿富汗是隔开了英、俄两个帝国的天然边界线，而在阿富汗中部横亘东西的兴都库什山更像是一堵墙，将中亚和印度隔开，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文明区域。

[33]摩竭提国（即摩揭陀国）最初定都于王舍城，后来迁都到巴连弗邑（即华氏城）。——编者注

[34]瞻波大国位于今天印度帕格尔布尔市（Bhāgalpur），多摩梨帝国位于今天印度加尔各答市西南的德姆卢格市（Tamlūk）。在唐代，多摩梨帝国依然是北印度的出海口，唐代许多高僧都从这里出海返回大唐，见本书后面章节。

[35]本书作者考察过印度的各个文明区域，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36]东南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可参考缅甸官方史书《琉璃宫史》。

[37]参考《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38]参考《法显传》。

[39]《后汉书》中有“叶调国”的记载。叶调是东汉时期与中国通过海洋有联系的四个国家之一，见前一章。

[40]参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84—113页。

[41]《法显传》载："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

[42]《法显传》提到第二天是七月十五。

[43]根据《法显传》整理。

[44]参考《宋书》卷一·本纪第一。

[45]参考［印］马宗达《高级印度史》。

[46]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47]这里所指的就是印度教形成的四大种姓制度，这种制度维持了两千多年，在本书作者2012年到访印度时，感觉随着城市运动的兴起，这种制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松动。

[48]玄奘在印度就遭遇了危险，险些丧命。唐代许多高僧也有类似的经历。

[49]在《法显传》中，这几个国家的位置相对模糊，可能存在偏差。

[50]"旃荼罗"即"首陀罗"的另一种译法。——编者注

[51]《法显传》载："自渡辛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正有河水。"

[52]也有版本作"捕那河"。——编者注

[53]贵霜曾经采取双首都制度，一个是位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另一个则是位于印度的马图拉。参见《中亚文明史》。

[54]可能是今天印度北方邦法鲁哈巴德区一个叫桑吉沙的小村子。

[55]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就是这位罗摩。

[56]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

[57]参考《琉璃宫史》。

[58]迦毗罗卫国在印度境内，蓝毗尼在尼泊尔境内。这里地处偏僻，一直是印度文明的边缘地带，也表明佛陀的家族和国家并不强大。在古代，迦毗罗卫国和蓝毗尼一直人口不多，常常比较荒凉，比如法显时期。

[59]此为本书作者的观察，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60]佛陀生于蓝毗尼，涅槃于拘尸那罗，悟道于菩提伽耶，首次传道（初转法轮）于鹿野苑，是为四大圣地，其余圣迹见下文描述。

[61]五条大河分别为：根德格河（Gandak R.）、卡克拉河（Ghaghara R.）、恒河（Ganga R.）、宋河（Son R.）、拉布蒂河（Rāptī R.）。

[62]一说为今天的吉里也克山（Giriyek Mt.）。——编者注

[63]参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64]详见《法显传》。

[65]参考《鸡足山志》。

[66]《摩诃僧祇众律》又称《摩诃僧祇律》《僧祇律》《大众律》。——编者注

[67]两者可能是“Yavadvipa”一词的不同译法。“阇婆国”的记载见于《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

[68]位于今天克什米尔及喀布尔河下游一带。——编者注

[69]建康即今江苏省南京市。参考《高僧传》卷第三。

[70]参考《高僧传》卷第三。

[71]同上。

[72]参考《高僧传》卷第三。

[73]同上。

[74]根据《出三藏记集》整理。

[75]根据《中西交通史》第一编第十五章第六节整理。

[76]参考《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77]参考《草原帝国》。

[78]参考《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79]参考《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80]《三国志》中称为乌丸。

[81]参考《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82]参考《后汉书·西羌传》，关于羌战对于东汉的破坏，可参考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

[83]参考《三国志》卷八·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84]参考《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第四、卷一百五·载记第五。

[85]参考《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此外《三国志》卷一至卷四以及《晋书》卷一·帝纪第一·宣帝纪也记载了西域国家入朝的情况。

[86]参考《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引用《魏略》部分。

[87]根据《三国志》卷三十中引用《魏略》部分整理。有些国家的名字至今无法对应。另有一些过于接近神话的国家未载。

[88]《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叙述了“八王之乱”的诸王和事件经过。

[89]仇池政权和下面提到的冉魏、吐谷浑，不计入十六国之数。

[90]参考《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

[91]参考《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第四。

[92]西燕不在十六国之数。

[93]参考《晋书》卷一百三十·载记第三十。

[94]参考《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95]《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地舆志》："晋咸和二年置高昌郡。"

[96]参考《晋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

[97]参考《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

[98]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99]参考《高僧传》卷二。

[100]参考《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

[101]其中步兵60万，骑兵27万。

[102]《高僧传》中记载了太多关于鸠摩罗什的神异事件，很多事情很难说是史实，但这些传说又代表着人们对鸠摩罗什的看法，因此本书将之归为传说，并进行适当引用。

[103]参考《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三。

[104]参考《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三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晋纪二十六。

[105]参考《高僧传》卷二。

[106]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做批注认为大军走的是中道，即楼兰北道，但这样就不会经过高昌，因此可能走的是新道。讨论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

[107]参考《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

[108]这个数字很难说是可靠的，但我们目前没有其他证据能够推翻这个记载。

[109]参考《高僧传》卷二。

[110]参考《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

[111]参考《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

[112]参考《高僧传》卷二。

[113]参考《出三藏记集》。

[114]《维摩诘经》玄奘译为《说无垢称经》，《金刚经》玄奘译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115]参考《高僧传》卷二。

[116]根据《高僧传》《中国历代求法翻经传》《中西交通史》等整理。

[117]有许多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事，例如《洛阳伽蓝记》。

[118]参考《高僧传》卷一。

[119]《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载："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编者注

[120]参考《洛阳伽蓝记》。

[121]参考《高僧传》卷一。

[122]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123]参考《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列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124]参考《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125]参见本书作者另一部作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126]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

[127]参考《三国志》卷八·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128]参考《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129]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130]《三国志》记载公元243年朝贡，《晋书》则记载了数次遣使。

[131]参考《晋书》。

[132]参考《出三藏记集》卷六。

[133]参见［荷］许理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20页。

[134]根据《出三藏记集》整理。

[135]主要参考《洛阳伽蓝记》。

[136]参考《魏书》卷七下·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

[137]本表摘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138]参考本书作者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第十二章。

[139]参考《魏书》卷二·帝纪第二·太祖纪。

[140]《魏书》卷三·帝纪第三·太宗纪："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141]参考《魏书》卷四上·帝纪第四·世祖纪上。

[142]参考《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释老十。

[143]《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释老十："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诚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

[144]参考《魏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三·崔浩。

[145]《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释老十："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146]《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释老十："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

[147]参考《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以及《新唐书》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地理一至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

[148]参考《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

[149]参考《洛阳伽蓝记》。

[150]参见本书作者的《三千佛塔烟云下》。

[151]参考《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释老十。

[152]《魏书》卷八·帝纪第八·世宗纪记载同年白象为嚈哒王所献。

[153]《魏书》卷九·帝纪第九·肃宗纪记载同年嚈哒王朝贡，未表明贡献了什么。

[154]《魏书》将南朝各个政权的传记都标以"岛夷"之名。

[155]参考《洛阳伽蓝记》。

[156]参考《魏书》卷一百一十·志第十五·食货六。

[157]北魏时期1尺约等于0.2951米，100丈约等于295.1米，见本书作者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所附表格。

[158]永宁寺木塔塔基遗址至今仍然在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洛阳故城。

[159]引自《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160]引自《洛阳伽蓝记》序。

[161]见《晋书》各自本纪。

[162]《晋书》卷十·帝纪第十："其后复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

[163]参见《梁书》卷一·本纪第一·武帝上至卷三·本纪第三·武帝下。

[164]参见《梁书》卷八·列传第二·昭明第二·昭明太子、哀太子、愍怀太子。

[165]《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166]此日期依据《广弘明集》推测出，此时仍然是梁武帝执政早期。但根据梁武帝崇佛的历史来看，梁武帝最初仍然推崇儒教，在执政中后期开始倒向佛教，所以，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也有可能推后20到30年。

[167]《广弘明集》卷第四记载了梁武帝的《舍事李老道法诏》："道有九十六种，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

[168]关于梁武帝"舍身"的次数，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南史》记载，梁武帝曾经四次"舍身"，而《梁书》则记载是三次。本书根据《南史》的记载还原当时的现场。

[169]参考《南史》卷七·梁本纪中第七。

[170]参考《梁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侯景。

[171]《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宋云完整的故事。

[172]参考《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见《大正藏》史传部·第二〇八六部。

[173]就在神龟元年，《魏书》就记载了嚈哒、高丽、勿吉、吐谷浑、宕昌、疏勒、久末陀、末久半、蠕蠕、舍摩、高车、高昌、波斯、乌苌、龟兹等国的朝见。

[174]宋云时期的京师是洛阳，法显时期的京师是长安，但宋云必须先到长安，再沿着法显的路去往青海。

[175]参考《南史》卷七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夷貊下。

[176]参考《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氐等。

[177]2015年上映的盗墓电影《九层妖塔》中的盗墓行动就是以这片墓区最著名的大墓为目标。

[178]吐谷浑最初首都在伏罗川，后来（公元540年）由首领夸吕迁到了青海湖西岸的伏俟城，在宋云时期，首都应该还在更西面的伏罗川，见《魏书》卷一百一·列传第八十九·氐等。

[179]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以北沙漠中。

[180]根据《新唐书》。

[181]又作朅盘陀国、竭义国。——编者注

[182]法显所翻越的山口未必是现在的红其拉甫，因为周围有数个山口都可以通过。

[183]比如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也曾经到过这里。

[184]参考《洛阳伽蓝记》。

[185]参见《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回程。

[186]见奥雷尔·斯坦因的考证。唐朝将领高仙芝的奇袭参见《旧唐书》《新唐书》中他的本传。本书中在第八章也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这次奇袭。

[187]参考《洛阳伽蓝记》。

[188]参考《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123—151页。

[189]比如公元6世纪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Varahamihira）在著作《广集》中称他们为“白匈奴”，欧洲人也有不少人这样称呼。见余太山《嚈哒史研究》。

[190]参见《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西域。

[191]嚈哒的历史，参考余太山《嚈哒史研究》。

[192]参考《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107—122页。

[193]参考《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107—122页。

[194]参考《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西域。

[195]《魏书》将柔然称为“蠕蠕”，这是北魏皇帝对柔然的侮辱性称呼，见《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西域。

[196]参考《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302—312页。

[197]参考《北史》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

[198]参考《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152—174页。

[199]参考［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0—105页。

[200]参考《洛阳伽蓝记》。

[201]参考《太平御览》引康泰《吴时外国传》。

[202]参考《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203]参考《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注。

[204]参考《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205]同上。

[206]参考《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锺离传第十五。

[207]《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朱应、康泰出使，这次出使散见于《梁书》《水经注》《通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康泰所写《吴时外国传》已经失传，但内容也散见于上述诸书。

[208]根据《中西交通史》第一篇第十四章第四节统计，该书的统计又来自《宋书》、《南齐书》和《梁书》，以及《南史》。

[209]又名迦毗罗卫国。——编者注

[210]根据《南史》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八·夷貊上整理。

[211]关于陆路情况，参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中的描写。

[212]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14—138页。

[213]这里至今保留着占巴塞瓦普神庙群，可能就是当年真腊的首都所在。

[214]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三坡波雷古的建筑群，记录见《三千佛塔烟云下》。

[215]参考《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蛮·东南夷，《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部二。

[216]参考《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部二。

[217]参考《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

[218]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84—113页。

[219]根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统计。

[220]参考《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

[221]本表参考《高僧传》和《续高僧传》。

[222]即石棉布，用石棉纤维纺织而成，具有不燃性，可以用火燃烧去除污渍。——编者注

[223]综合自《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蛮夷和《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蛮·东南夷。

[224]玄奘的经历主要根据《慈恩传》整理。

[225]关于北魏改革的研究和对隋唐的影响，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226]参考《隋书》卷一·帝纪第一·高祖上、卷二·帝纪第二·高祖下。

[227]参考《慈恩传》。

[228]《慈恩传》原文作瓠芦河。——编者注

[229]也有版本作石盘陀、石槃陀。——编者注

[230]第四烽燧即大泉，后来在这里建造了双泉驿。

[231]野马泉的位置在两山环抱之间，很难被发现，这可能是玄奘错过泉水的主因。

[232]参考《通典》卷一百九十一·边防七。

[233]参考《旧唐书》卷八十·列传第三十·褚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

[234]阿耆尼国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屈支国即龟兹国，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跋禄迦国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235]参考《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下·突厥下。

[236]参见《慈恩传》以及本书的下文。

[237]《旧唐书》等作统叶护可汗，见本书楔子。

[238]具体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千泉、呾逻斯城、白水城、恭御城、笯赤建国、赭时国、窣堵利瑟那国、飒秣建国、屈霜你迦国、喝捍国、捕喝国、伐地国、货利习弥迦国、羯霜那国、铁门、睹货罗国。

[239]位于今阿富汗昆都士省一带。

[240]瓦罕走廊也是大博弈时期英国和俄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241]以上国家都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

[242]进入北印度后，经过滥波国、那揭罗喝国、佛顶骨城、健陀逻国（犍陀罗国）、布色羯罗伐底城、乌铎迦汉荼城、乌仗那国，回到乌铎迦汉荼城，南渡信度河（印度河），到呾叉始罗国、僧诃补罗国、乌刺叉国、迦湿弥罗国、半笯嗟国、遏逻阇补罗国、砾迦国、阇耶补罗城、奢羯罗城、那罗僧诃城。再东行500余里到至那仆底国、阇烂达那国、屈露多国、设多图庐国、夜呾罗国、秣兔罗国、萨他泥湿伐罗国、禄勒那国、秣底补罗国、婆罗吸摩补罗国、醯掣怛罗国、毗罗那拏国、劫比他国、羯若鞠阇国，到达殑伽河（恒河）。

[243]包括钵罗耶伽国、憍赏弥国、鞞索迦国、室罗伐悉底国、劫比罗伐窣堵国（迦毗罗卫国）、蓝摩国、拘尸那揭罗国（拘尸那罗国）、婆罗疬斯国、鹿野伽蓝、战主国、吠舍厘国、吠多补罗城。

[244]据《慈恩传》。

[245]本书作者曾经访问那烂陀寺，试图寻找玄奘当年的痕迹，徘徊良久，亦无法确定到底哪一间宿舍属于当年的玄奘。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246]玄奘此次去往的国家包括伊烂拏钵伐多国、瞻波国、羯末嗢只罗国、奔那伐弹那国、羯罗拏苏伐剌那国、三摩怛吒国、耽摩栗底国、乌荼国、恭御陀国、羯陵伽国、南憍萨罗国、案达罗国、驮那羯磔加国、珠利耶国、达罗毗荼国、建那补罗国、摩诃剌侘国、跋禄羯呫婆国、摩腊婆国、阿吒厘国、契吒国、伐腊毗国、阿难陀补罗国、苏剌侘国、瞿折罗国、乌阇衍那国、掷枳陀国、摩醯湿伐罗补罗国、阿点婆翅罗国、狼揭罗国、臂多势罗国、阿参荼国、信度国、茂罗三部卢国、钵伐多国。

[247]玄奘回程中经过的国家包括钵罗耶伽国、憍赏弥国、毗罗那拏国、阇兰达国、僧诃补

罗国、呾叉尸罗国（又名呾叉始罗国、竺刹

[248]参看本书作者的《穿越劫后中亚》。

[249]据《慈恩传》。

[250]参考《新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251]因为义净选择了从南海往返印度。

[252]参考《南海寄归内法传》。

[253]这就是义净的第二本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54]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整理。

[255]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的奥雷尔·斯坦因，以及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

[256]见本书楔子中对于两个帝国的对比。

[257]如果把《大唐西域记》与缅甸的《琉璃宫史》做个对比，会更加有意思，后者是国家的正史，但在开头也有很多佛教的世界观描写，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

[258]参考《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259]比如《阿含经》中提到的过去七佛中的前六佛，分别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第七佛才是释迦牟尼佛。

[260]西藏的神山圣湖至今仍然为佛教和印度教的圣地。印度教传说冈底斯神山就是湿婆神的居所。

[261]类似的描述在《水经注》中也出现过。

[262]玄奘回国后，高昌已经并入了大唐，变成了高昌县。

[263]呾逻私又名怛罗斯。玄奘在这里实际上穿越了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两个国家。

[264]玄奘穿越了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之后直到吐火罗地区，都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265]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

[266]又名花剌子模，位于咸海以南、里海以东。

[267]本书作者与一位叫史伦的建筑师相识，他出自山西，根据DNA测试，父系祖先出自中亚地区，因此，中国的姓氏与地域的联系是有道理的。

[268]参看本书作者的《穿越劫后中亚》。

[269]这里实际上又进入了另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已经属于山区了，继续向东则是帕米尔。

[270]巴米扬现在居住的哈扎拉人与中国人长相相似，有可能是蒙古人的后裔，也说明了阿

富汗社会的复杂性。

[271]这里也是阿富汗战争时期苏联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272]参考《大唐西域记》。其余多种材料也记载了这段故事。

[273]参考《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274]当年法显是反向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的。

[275]参考《旧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五十四·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

[276]在这里穿越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控制线。

[277]迦湿弥罗国都城为拨逻勿逻布逻，位于今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Srīnagar）。

[278]位于今印度旁切县（Poonch）。

[279]位于今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拉约里（Rajouri）。

[280]如果把克什米尔看作冲突地区，那么到这里才进入了现代真正的印度国家所在地。

[281]位于今印度西姆拉市（Shimla）西北。

[282]但后来的唐朝僧人玄照可能就是走拉达克地区进入吐蕃，并得到文成公主的帮助前往印度的。

[283]位于今印度德里到斋浦尔之间的平原地区。

[284]即今天的亚穆纳河，法显称之为遥捕那河。——编者注

[285]见本书楔子部分。

[286]位于今印度阿约提亚。

[287]《慈恩传》中作钵罗耶伽国。——编者注

[288]这里，玄奘与法显的路线是一样的。

[289]今天的印度人一般将此地称为贝拿勒斯，与玄奘的音译相近。

[290]位于今印度北方邦加济布尔（Chāzipur）。

[291]又名吠舍离，法显称之为毗舍离。

[292]《大唐西域记》中作波吒厘子城。——编者注

[293]《大唐西域记》中作栗陀罗矩山。——编者注

[294]从这里开始，许多地方的现代位置都已经有了争议，我们只能将最普遍的说法列在这里。

[295]位于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境内。

[296]布巴内什瓦尔和浦里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佛教时期的遗迹，本书作者曾经去考察过，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297]阿育王皈依佛教的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他需要从战争状态转换到和平状态，而佛教是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宗教。

[298]玄奘所说的羯陵伽国的位置至今无法确定。

[299]见本书汉代部分的叙述。

[300]印度最南端的一些国家玄奘是否到达，还是存在疑问的，有一种可能是他听别人讲述后做了记录。

[301]汉比和巴达米都是本书作者亲自考察过的地方。

[302]参见本书作者的《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303]此河在今天称为讷尔默达河。

[304]从摩腊婆国向西北行三日，到达契吒国，再向北行千余里，到达伐腊毗国，向西北行700余里，到阿难陀补罗国，再向西行500余里，到达苏剌侘国。

[305]玄奘接下来还记录了几个国家，向东南行2800余里是邬阇衍那国，向东北行千余里到掷枳陀国，向北行900余里到摩醯湿伐罗补罗国，由于地理位置难以确定，不再说明。

[306]另一个著名遗址在摩亨朱达罗。

[307]今伊朗霍尔木兹地区。

[308]即东罗马帝国。

[309]《法显传》中称之为跋那国。

[310]根据《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整理。

[311]中国佛教界普遍使用的译经还是鸠摩罗什等更懂得通俗化的译者翻译的版本。

[312]此书作者不详，一般被认为成书于宋代或元代，也有人认为是唐末或五代时期说书的底本。

[313]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314]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入大梵天王宫第三。

[315]参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入香山车第四、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316]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上·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317]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入九龙池处第七。

[318]原册子中有阙文，故无法得知深沙神的前因后果，这条河也有可能是流沙河的原型。

[319]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入鬼子母国处第九、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320]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321]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入沉香国处第十二到下·入优钵罗国处第十四。

[322]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

[32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中记载为《多心经》，疑是原文中多了一个“多”字。

[324]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

[325]简称《灵验记》。除此之外，还有孟献忠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卢求的《金刚经报应记》等。

[326]由于抄本的不同，《金刚经》字数也在变化，唐代柳公权本有5043字，到了明代已经有5169字。

[327]如《冥报记》《冥报拾遗》《地狱苦记》等。

[328]如孔子就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死后尽量不做讨论。见《论语》先进第十一。

[329]这其实是一种早期萨满教的残余。

[330]如句道兴《搜神记》、戴孚《广异记》等。

[331]参考张说《梁四公记》。

[332]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当地人都把贩卖粉盐当作一种生意。粉盐可以食用，但到了近代以来，主要作为一种含有矿物质的浴盐使用。

[333]又名拂菻国，指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编者注

[334]实际上可能是由石棉纤维织成的。

[335]此书在中国已佚，但在日本有流传，后又从日本引入，成为名篇。

[336]此为《酉阳杂俎》中的版本，《太平广记》中作“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编者注

[337]此故事见《酉阳杂俎》卷十四·诺皋记上，《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九·水族六也有引用。

[338]参考《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宝三，引自《广异记》。

[339]参考《旧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五十四·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以及两唐书的“大、小勃律传”部分。

[340]参考《旧唐书》卷一百四·列传第五十四·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

[341]参见本书作者的《穿越劫后中亚》。

[342]中亚地区现在的伊斯兰教并不算强势，与南面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波斯、阿拉伯比起来，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区域。

[343]参考［明］何乔远《闽书》。

[344]引自《苏莱曼东游记》。

[345]参考《苏莱曼东游记》第一部。

[346]参考《苏莱曼东游记》第一部，并参考了《道里邦国志》前言中的说明文字。

[347]苏莱曼描写了哈尔肯德海内许多灾异，很可能是这个区域的飓风引起的。

[348]占不牢即占婆。

[349]《苏莱曼东游记》中提到，中国皇帝派有回教徒一人，办理前往该处经商的回教徒的诉讼事务，每当节期，就由他领导着大众行祷告礼，宣颂呼特哈（Hutha）训词，并为回教国的苏丹向阿拉求福。

[350]《宋史》上记载了详细的海外商税情况，关于唐代的商税，这本书给了很有力的补充。

[351]此处苏莱曼说得并不准确，唐朝政府还对耕地收税。此外，唐朝政府还在“安史之乱”时期推行过房地产税（间架税），但很快就废除了，见《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

[352]中国史料记载在两唐书的“黄巢传”部分。

[353]参考《苏莱曼东游记》第二部。

[354]保存到现在的只有该书第二部的摘要，中译本称为《黄金草原》。

[355]形成于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初名回纥，于唐朝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改称回鹘。本书除必要情况外，大部分使用“回鹘”。——编者注

[356]阿穆尔是诺亚的重孙，这一支的世系为诺亚生雅弗，雅弗生图波尔，图波尔生阿穆尔。

[357]参考［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黄金草原》，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4—85页。

[358]事实上，唐代的国内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扬州，只是政治中心留在了长安，又由于集权政府的庞大，使得首都不得不供养庞大的人口。但为了保证长安的供应，唐代花费了大量资金来维持运河通道，这实际上已经得不偿失了。

[359]《道里邦国志》中提到的地名，所对应的具体位置不详。

[360]参考《道里邦国志》中“四大文明地区”一章。

[361]参考《道里邦国志》中“帝国的邮传驿站”一章。

[362]参考《道里邦国志》中“东方的情形”一章。

[363]唐朝羁縻政权最远在波斯境内，但事实上除了封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364]见《道里邦国志》（附税册）中“税册”部分第六章。注意这里的税款包括战俘和战利品的折算。同书的另一处又说是3800万。

[365]本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前当地人信奉的本土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编者注

[366]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就此结束，到了宋末，藏传佛教后弘期兴起，并随着蒙古人的征服而巩固，形成了现代藏传佛教的起源。

[367]祆教的“祆”字是唐代人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专门创造的新字。

[368]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18—62页。

[369]本书作者曾经考察过亚兹德的拜火教神庙。

[370]参见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

[371]《魏书》中高昌和焉耆的传记都提到了两国崇敬“天神”。从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开始，波斯与北魏之间有了通使关系。

[372]《隋书》卷七·志第二·礼仪二记载了北齐和北周君主拜胡天。《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将胡天神与其他信仰区别对待，将其他废除，却保留了胡天神。

[373]参考《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

[374]分别在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南之西，据韦述《两京新记》、宋敏求《长安志》所述。

[375]分别在会节坊、立德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市西坊（张 《朝野佥载》）。

[376]分别在大内西右掖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宁远坊（宋敏求《东京记》）、城北（张邦基《墨庄漫录》）。

[377]除非是别人杀死或者自然死亡的动物，否则不得食用。但严格的摩尼教徒会选择吃素。

[378]有关摩尼教的基本描述，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390—409页。

[379]参考《佛祖统纪》卷三十九。

[380]参考《佛祖统纪》卷四十一。

[381]参考《佛祖统纪》《唐会要》等。

[382]又译罗姆苏丹国。——编者注

[383]黠戛斯人是今天柯尔克孜族（吉尔吉斯人）的祖先。——编者注

[384]本书作者考察蒙古国时，曾经对蒙古国中部的几个民族的中心区域进行了考察，并来到了西部的吉尔吉斯湖查看了当地的地形。

[385]参见《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390—409页。

[386]《佛祖统纪》卷第四十八引《夷坚志》：“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三山”即福州。

[387]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

[388]《鸡肋编》卷上："事魔食菜，法禁至严，……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

[389]在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390]当时基督教从属于罗马皇帝，教皇还只是以罗马大主教的形式出现。在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是所有主教之首，并服从于罗马皇帝。

[391]景教在唐代的传播，主要依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流传，同时有若干敦煌藏经的写本流传。见《中西交通史》第二篇第二十章。

[392]根据《景教碑》，但言辞可能有所夸大。

[393]苏轼后来写了《大秦寺》诗："晃荡平川尽，坡陀翠麓横。忽逢孤塔迥，独向乱山明。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衮衮尽东倾。"

[394]见本书第四部。

第三部 贸易时代

第九章 从南海到非洲的开拓

远至非洲第一人

唐代虽然是信仰时代，并产生了大量为了信仰而远走海外的人，但唐代走得最远的人却并不是玄奘等僧人，因为他们都以印度为归宿，不肯再前往更西边的土地。

有一个中国人却出于偶然的原因，跑到了更遥远的地方，甚至可能到达了北非的海岸上。这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到达北非的中国人，并长期保持了涉足地区最远的中国纪录，直到蒙古人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这个记录才被打破。

这个人之所以跑得如此遥远，与发生在中亚的一场战争有关。

公元751年（天宝十载）七月，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的双方是唐朝大将高仙芝与大食联军。战争的结果以高仙芝的战败而告终。并且，由于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再也没有实力涉足中亚，这次战争实际上也决定了中亚的归属。[1]

这里先不提唐朝的国运，只提参与战争的一个人。在唐代，有一本可以与后来的《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就是唐朝宰相杜佑写的《通典》。《通典》创造了一种新的体例，从历史中将各朝的典章制度、社会规则总结出来，形成一种通史类的总结，称为“政书”，从此研究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人都必须查阅这部著名的作品。[2]

杜佑有个族子叫杜环，他在玄宗时代参加了镇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远征军。在怛罗斯战败后，杜环不幸成了阿拉伯人的俘虏。在他被羁押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带着他经过撒马尔罕前往木鹿，然后将他编入了阿拉伯军队。[3]

撒马尔罕是中亚第一名城，玄奘等人都到达过这里，并不算最遥远。但木鹿就很少有中国人涉足了。

木鹿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是从中亚去往伊朗地区和伊拉克地区的必经之路，这里在贵霜王朝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唐代时，又是阿拉伯人驻扎的一个中心区域。

在阿拉伯军队服役的过程中，杜环跟随着阿拉伯人南征北战，又去了更加遥远的地方。他去过伊拉克以及更遥远的北非等地区。就这样，在一种非自愿的状态下，他就成了第一个有记载的涉足北非的中国人。

另外，根据杜环的记述，像他这样闯世界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在当时，阿拉伯地区已经有了一批汉人，比如他记载了几位大唐匠人在大食的情况，其中画匠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匠有河东人乐寰、吕礼。这些人从西行距离上说，都已经超出了玄奘走过的路程，但他们西行并非为了信仰，而是为了谋生。由于他们缺乏玄奘那样远大的理想，也少人关注，如果不是杜环的记载，他们就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

杜环比这些人幸运的是，到了大约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在遍游诸国之后，他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获得了自由，于是他乘船经过海路，从西方绕道印度和东南亚，回到了广州。

作为文人，他还写下了一本书《经行记》，这本书是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后最全面的“世界情报书”。《大唐西域记》在写完没过多少年之后就因为阿拉伯人的崛起而过时了，杜环则记录了阿拉伯人兴起之后的世界，与《大唐西域记》是一种承接关系，而不是平行关系。

但不幸的是，这本重要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让我们无法目睹它的全貌，只有一小部分被杜佑引用在《通典》之中，得以保留下原书的一些片段。

根据这些片段，我们可以对杜环时期的西部世界做一个简单的复原：

在杜环被俘前一年，阿拉伯帝国刚刚更换了领袖家族，原本担任哈里发的倭马亚家族让位给了阿拔斯家族。阿拔斯建立的王朝非常长久，一直持续到公元1258年（宝祐六年），才被蒙古人旭烈兀灭亡。

阿拔斯王朝初期，首都定在了伊拉克的库法，这里在杜环的书中被称为亚俱罗。

阿拉伯人和唐朝人的战场在碎叶川[4]流域的怛罗斯城，这个城市在碎叶川的西头，而东头就是著名的碎叶城，但在公元748年（天宝七载），碎叶城已经被唐朝军队摧毁了。

从碎叶城经过石国（现塔什干）和康国（现撒马尔罕），就可以前往木鹿。从木鹿向西南方向，穿过今天整个伊朗，就到了大食国首都库法，这里已经是一派繁荣，恰好处于倭马亚王朝建立的物质繁荣到阿拔斯王朝的精神繁荣的中途。库法也曾经是阿拉伯历史上第四位哈里发阿里（在倭马亚王朝之前的“四大哈里发”时代）的首都，阿里就是在这里被刺杀的。

在库法的西面，就是被称为苦国的叙利亚，古代的大叙利亚范围广阔，涵盖了现代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五个国家，还要加上土耳其东南部的区域。这里是倭马亚王朝的中心区域，而阿拔

斯王朝的中心区域已经东移到了伊朗和伊拉克境内。

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向西南方穿越两千余里的沙漠，就可以到达摩邻国，也就是现代的北非摩洛哥一带。[5]

阿拉伯人在北非的第一个据点是埃及。之后，顺着地中海南岸前行，经过利比亚前往突尼斯。公元665年（麟德二年），阿拉伯大军攻占了突尼斯。五年后，阿拉伯人在突尼斯城市凯鲁万[6]建立了据点，作为继续进军的中转站，并从这儿出发，征服了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直到西班牙的广阔领土。

到了公元9世纪初，随着阿拔斯王朝在非洲统治的衰落，北非的穆斯林迎来了独立时刻。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当时的凯鲁万总督艾格莱卜以凯鲁万为首都建立了艾格莱卜王朝，这个王朝延续到公元909年，是北非第一个独立王朝。[7]

但在杜环时期，北非的地方王朝还没有建立，北非和西班牙都还属于阿拉伯帝国。虽然阿拔斯取代倭马亚引起了一定的混乱，但最后北非和西班牙都承认了新王朝的权威。杜环记载的北非人长得比阿拉伯人更黑一些，对礼节更轻视，缺少米麦，无草木，这些都和北非柏柏尔人的实际情况相符。

杜环去往北非是由于特殊原因，除他以外，唐代可能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去过北非了（至少没有记载）。到了宋代，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宋代人是否去过北非，因为至今没有发现文字记载，但是，宋人由于商业的发达，对北非比唐人却更加了解了，可见，商业才是激发人们对地理好奇心的原动力。

表15 杜环记录的国家和地区[8]

地　名	现代名称	基本状况
拔汗那国	费尔干纳	古称大宛。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两千余里，西去石国千余里。城有数十，兵有数万。大唐天宝十载，嫁和义公主于此。产葡萄、馣罗果、香枣、桃、李
康国	撒马尔罕	一名萨末建。在米国西南三千余里。土沃，人富，国小
石国	塔什干	国都有两个，一个叫赭支，另一个叫大宛。天宝中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归京师。国中有真珠河、质河两条河流，都西北流向。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
碎叶国	阿克－贝希姆	以碎叶城为中心，位于碎叶川的一系列城市。其中碎叶川的位置在：首先从安西向西北行千余里，到达勃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从岭北行千余里到碎叶川。川东头有热海，碎叶城也在热海附近。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摧毁了城市。碎叶川西接石国，长千余里。川中有突厥人，兵马数万。川西头有城市名怛逻斯，隶属于石国，这里是天宝十载战争的发生地。3 到 9 月是旱季。种植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葡萄酒、糜酒、醋乳

续表

地　名	现代名称	基本状况
末禄国	马雷	古称木鹿。在亚梅国[1]西南700余里。城方15里，用铁为门。城中有盐池和两所佛寺。国境东西140里，南北180里。南有大河，是灌溉的水源。有很多雕刻、绘画作品。还有细软叠布、羔羊皮裘，上品价格银钱数百。出产的蔬果有红桃、白榛、遏白、黄李、寻支[2]、蔓菁、萝卜、长葱、颗葱、芸台、胡芹、葛兰、军达、茴香、芨薤、瓠芦、葡萄。家禽、家畜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
大食国	阿拉伯	一名亚俱罗。男女身材高大，衣裳亮丽，容止优雅。女人出门必遮面。一天五次礼拜。斋日食肉，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清真寺可容纳数万人。每七日国王亲自率众礼拜。物资极度丰富，商业发达。大唐匠人中，画匠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匠有河东人乐寰、吕礼。当时已经吞灭了四五十国，处于扩张状态
苫国	叙利亚	在大食西界，周围数千里，有大河流入大食国。有5个节度使，兵马1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更北边还有更加野蛮的突厥人
拂菻国	东罗马帝国（土耳其境内）	亦曰大秦。苫国西，隔山数千里。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琉璃制品神妙。王城方80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百万。与大食为敌。西临西海，南临南海，北接可萨突厥
摩邻国	北非摩洛哥一带	在勃萨罗国[3]西南，渡大碛行2 000余里。人黑，民风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吃干鱼，人吃波斯枣。不吃猪狗驴马肉，不拜国王父母，不信鬼神

① 大约位于今天土库曼斯坦列巴普州土库曼纳巴德市。

②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中有“瓜大者名寻支”，可能是指大西瓜。

③ 位于今天伊拉克巴士拉省。

唐代对外的七条道路

从隋唐开始，随着统一王朝的推进，从中国到西方，一个完整的路线体系已经出现。隋代皇帝由于过分使用了征税机器，使得王朝变成了一个短命的朝代，但在开拓对外路线上，却比后来的唐朝更加进取，也为唐朝的对外交通做出了很多铺垫。

隋炀帝时期，对于中国海外道路的探索是海陆并行的。在海路上，公元607年（大业三年），隋炀帝派遣羽林骑尉朱宽入海，两次前往流求国[9]，第二年派兵击败了流求，焚毁了国王的宫殿，带回了数千俘虏。[10]

就在派遣朱宽的同一年，皇帝派出了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前往赤土国出使。[11]所谓赤土国，是“扶南之别种”，也就是高棉人的一支，虽然现代仍然不能确定具体的方位，但很可能是在马来半岛地区。[12]

在隋代的鼓动下，南方还有多个国家来到隋朝进贡。[13]

除了南方各国，在西北地区，隋代也有着进取之心。由于之前中国支离破碎，对西域疏于插手，隋炀帝派遣了名臣裴矩负责西域事务，掌管在张掖地区与西域的贸易。裴矩一方面鼓励贸易，另一方面通过胡商获得西域的情报，整理成了一本书《西域图记》。[14]这本书可以说是《大唐西域记》的先导，成了《大唐西域记》之前针对西方的最佳“情报书”。

此外，隋炀帝还派人出使西域，行程最远的是侍御史韦节和司隶从事杜行满，他们曾经到达了史国，获得了10个舞女、狮皮和火鼠毛；还到达了罽宾地区，获得了珍稀的玛瑙杯；以及更遥远的印度王舍城，获得了一批佛经。[15]只是由于隋朝过于短暂，这些出使并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成就。隋末战乱之后，唐代重新开辟了这些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唐两代，中国通往海外的道路大致上分成了七条，如果仅仅聚焦到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属于七条中的一条）上，又有三条子通道。[16]

所谓七条道路，指的是：

第一条是从营州入安东道，这条路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国内的通道，

是从河北地区直达黑龙江地区的路。

第二条是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也就是从现代的山东半岛烟台、蓬莱等地区，乘船跨越渤海，前往辽东半岛，再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半岛。

第三条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这条道从陕西北部，经过沙漠地区前往河套，再渡过黄河大几字湾的上面一横，在阴山南麓前往大同和云中地区。

上面这三条道路，大部分路线都已经是在今天中国内部了，第四条道虽然现代依然是国际道路，却也不复杂，是从中受降城[17]前往蒙古国回鹘地区的道路。

中受降城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岸上，在阴山的南侧，而唐代的回鹘所占据的地方，恰好是后来建立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的所在，在蒙古国中部杭爱山东麓，有一个巨型的谷地叫鄂尔浑谷地，这里是蒙古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所在，也成了历代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不管是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回鹘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都曾把宫廷设在这里，就连契丹也曾在这里建城。这条路就是从中国北部穿越大戈壁前往蒙古国之路。

前面四条道都在东北部和北部，而后面三条道才是更加遥远的、覆盖了广大内陆亚洲和海上亚洲的道路，它们分别是：从新疆地区去往中亚的道路（安西入西域道）；从越南境内经过云南、缅甸，从陆路进入印度的通道（安南通天竺道）；以及从广州和交州，通过海路前往海外的道路（广州通海夷道）。

在这里，我们把越南去往印度的通道留在最后，先说南海道。这条道从广州上船经过占婆，环绕越南南部，去往马六甲海峡，再绕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到爪哇，从巽他海峡西行，经过尼科巴群岛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还可以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直接前往印度

的西海岸。这条道在唐代时，依然是被印度、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但唐代人对此已经非常熟悉，除了许多高僧使用，也是商人们最倚重的道路。

此外，更加复杂的是西域道，这是因为西域道又出现了三条岔道，这三条岔道在隋代就已经开通，如果放到现在，三条道去往的中亚地区，恰好对应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道又可以分出去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支线。[18]

根据裴矩的记载，三条岔道都可以以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终点，第一条北道，前面部分是玄奘走的路线，即从瓜州直接过莫贺延碛，经过伊吾前往高昌，之后脱离玄奘走的路线，从天山以北经过伊犁河谷进入哈萨克斯坦，沿着草原一直向西，经过里海的北岸，穿越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甚至有可能绕道黑海北岸），前往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条道是游牧之路，也就是突厥人开发出来的道路。

第二条中道，是走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的北侧各个国家，到达喀什附近后，向西翻山直接进入费尔干纳谷地的道路。这条道是当年张骞走的路，到达费尔干纳后，再沿河中地区南下巴尔赫或者木鹿，进入伊朗境内，沿着里海南侧去往君士坦丁堡。

第三条南道，是从塔什库尔干经过帕米尔高原，到达阿富汗北侧的吐火罗地区（玄奘回程的反向），或者直接进入巴基斯坦（法显和宋云的路线），再从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走海路或者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

这三条路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西域的地理，也就是说，到唐代为止，从新疆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已经被开发完毕了。

蜀身毒道和南诏重塑缅甸

在七条道路中，留在最后的是一条从越南通往印度的陆路。这条路从越南的河内出发，首先通过中越边境回到云南境内，经过云南的南部，回到昆明，再向西经过大理，在大理西部某处（怒江以西200里）一个叫诸葛亮城的地方，在这里道路分了两个岔道，一条岔道直接向西经过腾冲进入缅甸境内，再向西到达印度，另一条路向西南方进入缅甸，先到达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骠国，再向西到达印度。

这条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其实就是西汉张骞当年苦苦寻求的“蜀身毒道”。在汉代，汉武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寻找这条路，却由于要经过太多未开化地区，穿越层层密林而不得不作罢。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被记入了史书之中。

唐代之所以发现了“蜀身毒道”，并不是唐朝人的功劳，而是得自一个新兴政权的努力，这个政权在唐宋时期一直是西南部的一个强权，对世界历史也有很强的塑造作用。如果人们知道，现代缅甸和泰国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就不会再小视它的影响力了。[19]

这个国家就是南诏，到了宋代在同一地区改朝换代为大理。它位于现代的云南大理地区。

在唐代，云南的大理地区环绕着洱海周边，出现了一群种源相近的部落，被称为“八诏”[20]，分别是位于白崖城[21]的时傍诏、位于剑川（现云南省剑川县）的矣罗识诏、位于巍山县北部和漾濞县地的蒙嶲诏、位于宾川县地的越析诏、位于洱源县地的浪穹诏、位于洱源县邓川镇的邆赕诏、位于洱源县青索村（上关镇和邓川镇之间）的施浪诏，以及在最南部的巍山县的蒙舍诏。其中蒙舍诏由于在最南面，也称南诏。

到了公元713年（开元元年），时傍诏和矣罗识诏并入了其他地区，于是大理地区变成了“六诏”。在这“六诏”中，号称南诏的蒙舍诏逐渐强盛，到了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南诏统一了“六诏”地区，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第二年，南诏国王皮逻阁定都于太和

城，也就是现代大理洱海西侧的太和村。

南诏一旦统一，就对在昆明地区建立了地方机构的唐朝形成了威胁。它和吐蕃结盟对抗唐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之后，唐和南诏的战争终于爆发。公元750年（天宝九载），南诏国王阁罗凤与唐朝的云南太守张虔陀发生冲突，于是南诏起兵反唐。为了镇压南诏，位于四川的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军队进攻南诏，却战败损失了6万人马。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率唐军7万进攻南诏，在西洱河前全军覆没。[22]阁罗凤在战后立了一块《南诏德化碑》，这块碑至今依然存在。[23]这块汉文的碑上详细地说明，南诏并不想打仗，却不得不打，完全是被唐朝的地方官吏逼迫的。如果以后唐朝人来到南诏，可以通过这块碑了解，战争的源头不在南诏。在大理，至今仍然有两个巨大的天宝战争将士墓冢，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就是两次战争中死难的唐朝士兵埋骨之地。

唐军在南诏战败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可以说，南诏的天宝战争加速了唐朝的军事和财政困境，当“安史之乱”到来后，更加剧了唐代的灾难。

当大唐无暇顾及西南方的局势时，南诏却继续了它的扩张之路，除了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西部，南诏还将主要的扩张区域定在了东南亚。

当时，南诏西部和南部的缅甸地区有几个国家：弥臣国、弥诺国、骠国和昆仑国。弥臣国和弥诺国的首都在何处仍然有争论，但最著名的骠国却是没有争议的。如今，缅甸脱离了军政府统治之后，也摆脱了当年的光荣孤立，他们申请的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就是骠国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卑谬的骠国首都遗址。

在南诏初期，缅人还只是一个边缘性民族，占据了缅甸主体的是骠人。公元760年（乾元三年）前后，南诏开始对骠人进行打击。在他们的打击下，骠人的国家走向了衰落。[24]南诏对骠人的打击持续到公元

832年（太和六年），这一年，南诏进攻骠国，抓了三千人送往拓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25]

在东方，南诏占领了越南北部和老挝地区。[26]他们扩张的步伐直到海边才收住。在海边的昆仑国（可能是缅甸与泰国交界的海边地区），南诏军队遭遇了毁灭性失败，被人断了后路，饿死万余人，剩下活着的被砍掉右腕送回。在柬埔寨地区的陆真腊和水真腊，南诏军队也是到海边而回。[27]

南诏此次扩张留下了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作为东南亚历史上少有的大国，成了许多国家的精神偶像。直到泰国建立后，泰国王室仍然把南诏作为他们的精神故乡，认为泰人就是从南诏分化出来的。与泰国同源的老挝（泰人建立的澜沧王国和琅勃拉邦王国）也都将南诏人视为祖先。

第二，南诏进攻缅甸的直接影响则是：骠人从此成了传说，缅甸的土地上，兴起了另一个人种——缅人。缅人来自中国西藏与印缅交界地带的山区，如果不是南诏将骠人击溃，那么缅人很难从山上下来，也就很难有后来辉煌的蒲甘城，以及现在的缅甸了。

骠人衰落之后，缅甸的走向是这样的：公元849年（大中三年），缅人在一块叫蒲甘的平原上建立了19个村落。这里除了缅人，还有孟人（更早的人种，位于泰国西部和缅甸东部）居住，但缅人逐渐成了这里的主导民族，到最后，就连在卑谬残留的骠人也搬到了蒲甘。孟人和骠人将宗教和技术传给了后来的缅人，于是蒲甘王国逐渐成长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靠近仰光的勃固也出现了一个孟人王国，就是后来的罕沙瓦底王国。[28]

在唐末到宋初的年代里，缅甸的诸王国一直默默无闻，但他们在积累着力量。[29]

宋代，云南的南诏政权已经被大理政权取代，但是大理地区继续改

变着东南亚的面貌。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蒲甘突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国王阿奴律陀，在他的率领下，蒲甘王朝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30]

阿奴律陀从斯里兰卡引进了大量的工匠，并开始大力发展佛教，他建立了第一批佛塔，之后的诸王继承了他的工程，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蒲甘王国达到了顶峰，直到今天，在蒲甘平原上还留着三千多座佛塔，它们大都是在这一段时间修成的。[31]

蒲甘的高潮过去时，恰好也是南宋将要灭国之时。这时大理国已经被蒙古人灭亡了。蒙古人的到来，使大理不再存在，让云南边境彻底乱了套。蒙古人的行动将再一次改变了东南亚特别是缅甸的社会，他们进攻了缅甸，造成了蒲甘的衰落。

唐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

唐宋时期，除缅甸之外，其余的东南亚地区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首先，曾经作为中国领土的安南地区（现越南北部）在逐渐分离，直到宋初完成了独立。

宋代和唐代在外交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唐代构建的是一种帝国模式，中央是直辖区，外围是边境上的节度使辖区，再外围就是羁縻州组成的名义属地，更外围是属国，最外面是对唐朝完全独立的区域，但也被以“朝贡”的名义记入史册。

唐代要维持这样的帝国体系，却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这意味着除在边境上要养活大量的士兵之外，还要养大量的外国人，在首都长安的外国人群体就更庞大了，到了唐武宗灭佛时期，遣散的外国僧人都超过了三千人，还要加上更多的商人和其他身份的人。唐代的财政一直处于如此重负之下。到了玄宗后期为了解决养兵问题设立的节度使，很大程

度上就是财政出不起钱，就只好让节度使自己筹钱。[32]

唐代末年，岭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松动，到了公元907年（天祐四年），也就是唐朝灭亡的那一年，清海节度使刘隐受封大彭郡王，建立了南汉政权。与此同时，占据了安南的是一个叫曲颢的人，他也自称节度使。曲颢和他的儿子曲承美采取了承认北方的五代后梁作为宗主国，却尽量与南汉拉开距离的做法，所谓远交近攻，避免成为南汉的附庸。但南汉随即发兵攻灭了安南。[33]

虽然可以暂时攻灭，但南汉很难控制安南，于是，一个叫杨廷艺的人乘机占据了这里。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杀死，后者又被一个叫吴权的人取代。公元938年（天福三年）吴权击退并杀死了南汉太子刘弘操，获得了安南事实上的独立。[34]

安南最初的几个小朝代都不够稳固，吴权建立的吴朝只持续了30年，中间还经历了他的妻弟杨三哥的篡位（公元945—950年在位），到了后期，又爆发了“十二使君之乱”，也就是12个军阀的各自为政。这些混乱，实际上是安南从中国的一部分转变成独立国家过程中的艰难整合。

如果这个时期中央政府能够出兵拿回安南，那么安南就和广州一样只是一次暂时的分离，而不是永久独立。

但问题是，继五代而起的宋代所采取的国家策略，已经和唐代有了巨大的差别。宋代由于国内对于财政的需求太大，不敢过于扩张，只能采取割舍的做法。这表现在：第一，在北方，北宋已经不是一个宇宙的中心，而是与辽国建立了平等的国际外交关系，甚至产生了严格又有规律的出使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第二，北宋不建立帝国政治，它采取的方法是，能够得到的领土，就采取中央集权的治理方式；无法得到的领土，就承认为外国。最典型的是对大理的割舍上，宋太祖以大渡河为界划分疆土，大渡河之外的领土都不要了，[35]这种做法减

少了领土维持的成本，却让许多地方比如大理都成了外国，如果不是元代将之重新并入帝国，那么，大理也将永久性失去，变得和安南一样了。

在对待安南的问题上，北宋并没有主动放弃，最初采取了进攻的姿态。在北宋的进攻下，又出现了两个安南的小朝代：丁朝（公元968—980年）和前黎朝（公元980—1009年）。[36]其中丁朝灭亡于北宋，但北宋却无力控制，只能让它复辟。这两个小朝代的意义在于他们继续着制度建设，并在心理上逐渐戒掉了对中原的依赖。

到了公元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一个叫李公蕴的人取代了丁朝，建立了更加稳固的李朝，安南才正式脱离了宋朝的中国。[37]李朝维持了216年，才由于缺乏男性继承人，被陈朝和平取代。陈朝又击败了蒙古人的进攻，进一步树立了安南的民族主义。[38]

安南的独立，影响最大的不是中国，而是南方的占婆。在唐代之前，东南亚陆地上的强权始终是占婆以及扶南和真腊，占婆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于它是一个海洋王国，占据着海路上的关键位置。

但安南独立之后，占婆却发现，与和平主义的中国相比，一个独立的安南更加难以对付。彼时中国虽然庞大，却是笨拙的，安南和占婆对于中国都属于边疆之地，缺乏必要的军事财政，中国对于占婆往往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当中国占据安南时，占婆的主要进攻方向放在了对付南方高棉人，以及海中群岛人上。

可是安南独立之后，情况却出现了变化。首先，中国还是笨拙和友好的，几乎只在每一次朝代更迭时打扰一次安南，[39]之后就会将安南当作属国，认真地履行起和平甚至保护的义务。从这个角度看，安南很少有来自北方的隐忧，它可以腾出手脚来向南发展，这自然就要并吞占婆的领土了。

其次，占婆在南方的战略地理却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它要和高棉

人打仗，另一方面海中群岛上的国家对于海路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也和它发生了冲突。更麻烦的是，北方的安南在属于中国时，与占婆是友好的，可一旦独立了，就会随时随地想着与南方开战。在三方面的压力下，占婆又支撑了数百年，直到12世纪还繁荣了一段时间，并入侵了更加著名的吴哥。但到了公元13世纪，吴哥又反过来入侵了占婆，这也导致了占婆的衰落。安南也趁火打劫向南扩张。[40]从此以后，占婆进入了绵绵的衰退期，并最终被安南吞并。

在占婆衰落的同时，高棉人的世界却出现了一次改朝换代，之后迎来了鼎盛期。

柬埔寨高棉人的国家最早称为扶南。公元6世纪中期，真腊取代了扶南，成了与占婆同等的霸主，领地除了现代的柬埔寨，还包括了泰国的东部、老挝的南部和越南的南部。但到了公元8世纪初，真腊出现了内乱，分裂成了陆真腊和水真腊两部分。[41]

陆真腊又称文单，在唐代时曾经多次进贡，并和唐军联合对抗过南诏。南诏也曾经远征过真腊，却没有形成有效占领。[42]

但后来，随着爪哇岛上的夏连特拉王朝与真腊发生了战争，真腊的王子阇耶跋摩二世被夏连特拉王朝掳走，国家也就衰落了。[43]

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真腊王子阇耶跋摩二世从夏连特拉回到了真腊，建立了政权，这个政权后来被称为吴哥。[44]

阇耶跋摩二世宣告独立时，首都定在了三波坡雷古（Sambor Prei Kuk），但随后，他决定把都城迁往北面的大湖洞里萨（Tonle Sap）的附近，这里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暹粒和吴哥。不过，在阇耶跋摩二世时代，还没有出现现在的吴哥城和吴哥窟，他选择的都城在距离现在吴哥窟东北40公里的荔枝山上，后来又迁到了暹粒以东13公里的罗洛，形成了如今的罗洛建筑群。

在唐末和五代的乱世时期，吴哥却经历着按部就班的发展和繁荣，

国王们在巩固政权，却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建立了一套贵族式的政治体系，并建造了不少吴哥式的建筑。[45]也是在这个时期，吴哥的建筑已经从砖质进化到了石质。现在人们到达三波坡雷古，会看到所有的塔都是砖头的，在罗洛建筑群依然可以看到砖头塔，但在吴哥，石头已经成了主流材料。不过这时，吴哥遗址中最著名的几个建筑都还没有踪影。

北宋早期，吴哥还在不断地扩张着影响力，成了地区性的霸主。

直到吴哥建国两百多年后的苏利耶跋摩二世时代，才开始兴建最为宏伟的建筑吴哥窟（小吴哥），他的时代也是吴哥王朝的最高峰。公元1113年（政和三年），苏利耶跋摩二世登上王位，他和北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于三年后第一次朝贡，这也是北宋和吴哥交往的开始。到了南宋，吴哥继续朝贡，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记载了它最后一次朝贡。[46]

苏利耶跋摩二世除建立吴哥窟之外，也发动了许多对外扩张的战争，到了他统治的末期，这位好大喜功的国王又对占婆发起了一次灾难性的远征，导致他去世后占婆一度占领了吴哥。

但占婆的占领是短暂的，随后的阇耶跋摩七世赶走了占婆，成为柬埔寨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国王。他于公元1181年（淳熙八年）继位，他最著名之处不是打败了占婆，而是建造了著名的吴哥城，也就是大吴哥，并修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寺庙。只是，阇耶跋摩七世的辉煌已经是回光返照，历代国王挥霍无度的建筑作品彻底毁掉了帝国的财力，使得资源错配到了无用的工程之中，吴哥的经济和社会彻底衰落了。[47]

吴哥王朝最后的衰落并不是来自东方和南方，而是在它的西面出现了一群新兴的民族。到了南宋末年，随着蒙古人攻占了大理，引发了东南亚地区一场连锁反应，在现代的云南边境上，有一个叫泰人的民族，

本来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山区，当云南在蒙古人的打击下出现了混乱时，泰人加速向南方移动。

他们首先在泰国的清盛建立了景线王朝[48]。清盛位于泰国北方的湄公河畔，与老挝接壤，距离中国的边境也不远。之后泰人继续南下，占据了整个现代泰国区域和老挝区域。泰人的出现，压缩了东方的高棉人和西方的孟人的地盘。于是，东南亚最强势的两个民族——泰人和缅人，已经直接面对了。[49]

在唐宋时期，东南亚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群岛地区。随着半岛地区政权更迭的，是中国人对于群岛地区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起来，这得自爪哇和苏门答腊岛出现了几个巨型的国家。

隋代之前，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也记录了几个海岛国家，但是由于过于模糊，至今人们仍然对这些国家的位置争论不休。比如，法显从海上回来时，曾经在东南亚转船，停留的国家叫耶婆提，又称叶调，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可能在爪哇岛上，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个国家的具体位置。[50]

但到了唐初，情况终于出现了变化，当义净从海路经过东南亚前往印度时，他的第一站是一个大国室利佛逝。室利佛逝所在的位置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一带。在唐代，从广州乘船，只要不到两旬就可以到达室利佛逝，这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51]除了室利佛逝，在苏门答腊岛上还有国家末罗瑜，位于现代印度尼西亚占碑。这里曾经是独立的国家，但后来被室利佛逝吞并了。

室利佛逝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得益于从中国到印度必经的两个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而这两个海峡分别在苏门答腊岛的两侧，于是室利佛逝在苏门答腊岛上抓住机会，从巨港向两个方向扩张，试图控制航道。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室利佛逝都由于它的远略而得益，甚至扩张到了马来半岛的南部。

室利佛逝使用梵语，信大乘佛教，义净曾经在这里学习梵语，回程时又停在这里写书，表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和宗教中心。

苏门答腊岛是室利佛逝的天下，在南面的爪哇岛上则出现了另一个帝国：夏连特拉。[52]夏连特拉出现于公元8世纪，之前，爪哇岛已经有了一批小的印度教国家，但夏连特拉却是信奉大乘佛教的，在它的扩张下，东南亚的佛教达到了一次巅峰。

夏连特拉是一个有强烈扩张冲动的帝国，它曾经对巴厘岛、苏门答腊、真腊和占婆都发动过军事行动，并一度将真腊灭亡，让室利佛逝从属于夏连特拉。

公元767年（大历二年），它和东南亚诸岛屿的联军一同进攻了越南北部，被当时还属于唐朝的部队击退。[53]

但夏连特拉扩张得快，衰亡也快，到了公元9世纪中叶，它已经进入了衰亡期，随之恢复的仍然是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这个国家继续充当地区霸主的角色。[54]

蒲甘、吴哥、占婆、安南、室利佛逝、夏连特拉，就共同构成了唐宋时期东南亚的图景。它们为中国提供了必要的商品，但是，也如同一把锁一样，将中国的影响力封在了南海……

王延德：最后的西域使臣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一直有一个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唐宋之前印度的影响力可以从非洲东海岸直达东南亚的半岛和群岛，而中国的影响力却无法突破东南亚；波斯的船队可以直达广州，而中国船却始终在中国南海内打转？

在东南亚半岛的五个国家中，除越南北部受到了中国影响，甚至长期属于中国之外，其余地区都主要受印度文明影响，这些区域接受的佛

教和印度教都是从南亚传入的。至于群岛部分，唐宋之前更是清一色的印度文明的天下。

这其实和中国的地理有很大的关系。

本书在楔子中已经提到，长久以来国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悲惨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幸运国家，拥有着天然能够统一的地理环境。它有足够大的华北平原及其附属地（长江流域、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在世界上除了后来的美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广袤的、适合种植的平原地区，这些平原地区是连在一起的，并且周围就是一圈高山，这些山脉将平原保护得严严实实，足够安全。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只要中国恢复了和平，就足以衍生出庞大的国民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是最难以扩张的地区，除了西北地区沙漠和高山组成的障碍，在东南方的海域和岛屿也如同一把锁，将中国封闭了。

和中国相比，东南亚地区是不幸的，因为它的整个地理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半岛地区，由于山脉的阻隔，形成了一个个富裕的河谷地带，但每一个河谷都不够大，于是东南亚只能产生几个寡头性政权，却无法产生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核心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并立的局面。在海岛上，由于苏门答腊和爪哇的竞争，也无法产生出统一的政权。

这种分裂性造成了东南亚的多样化繁荣，却不利于中国与东南亚打交道。如果这里的地理结构更加完整，中国很容易将之并入中央帝国之中。但正由于它的分裂性，使得中国无法将之纳入集权体系之下。

东南亚的结构不利于统一，却很利于贸易，这使得更加擅长贸易活动的南印度捷足先登，借助季风的帮助在东南亚扎根，通过佛教和印度教的传播，将东南亚纳入了印度文明的外围圈。到了伊斯兰教时期，穆斯林也借助贸易征服了部分东南亚国家。

与中国的文明核心区域在内陆相比，印度却是一个多文明区域的次大陆，既有印度北部的陆地文明，也有印度南部两侧海岸上的海洋文明，使得印度和东南亚遥相呼应，率先建立起了联系，并利用强大的文明磁场将东南亚吸附过去了。

由于内地的广阔，中国很难有兴趣去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很难扩张它的文明。但它的经济体量巨大，又会产生一定的向心力，甚至波斯和阿拉伯的船队也会来到广州等地，但中国人却始终没有大规模走向海外。

不过，唐宋时期中国的政策和汉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汉代政策以征服为主，皇帝并不懂得贸易规则，只要对某地感兴趣，就往往采取出兵的做法。但唐宋的皇帝却知道，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征服的，在这样的认识下，他们采取了更明智的做法：鼓励和利用贸易。于是，唐宋反而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贸易时代就是这样到来的。贸易时代到来之后，唐宋在沿海的发展证明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并不弱，奋起直追的结果：到了宋元时期开始主导东南亚，加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在叙述唐宋的贸易之前，不妨看一看北宋的一个西域使团。

公元981年（太平兴国六年），由于高昌派来了使者，宋太宗决定派遣使团前往高昌去答礼，他选择供奉官王延德[55]、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

王延德等人从夏州出发。所谓夏州，最早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胡夏国王赫连勃勃建立的统万城，后来成了党项人的领地。在宋初，党项人是服从于北宋的，于是通往西域的道路暂时打开了。也由于是从夏州出发，这条道就不同于传统从兰州前往河西走廊的路，而是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沙漠地带前行，直插到酒泉附近才并入河西走廊，再沿着玄奘走的西域北道进入伊州[56]，最后到达高昌地界。[57]这一路与河西走廊

道不同的是，它需要经过不少部落地区，王延德还尝试着用羊皮筏子渡过了黄河。

到达伊州后，守卫这里的将领姓陈，他的祖先竟然是在唐朝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被派到这里来的，之后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到了王延德时期，这位陈氏将领又重新掌握了守卫权，并且还保留着当年的任命文书。

到了高昌，当时执政的是一位叫师子王的人，在突厥语中，“狮子”被称为“阿尔斯兰”（这位王被称为阿厮兰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西域已经突厥化了。

从唐代晚期，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几次巨大的人口迁移，最先占据现在蒙古国地区的是突厥人，突厥人衰落之后，兴起了回鹘人。回鹘人又被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赶走，黠戛斯人离场之后，又变成了契丹人的领地。到了宋代，这里又被蒙古人占据。

前面离场的民族大都没有消失，而是不断地迁移。突厥人分布到了整个中亚地区，而回鹘人（作为突厥人的近亲）则迁入了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黠戛斯人选择了北迁，进入中亚，最后来到了现代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并成了这里的主体民族。契丹人占据了中国北方，被金人灭国之后，一部分来到了新疆西北部和哈萨克斯坦境内，成立了西辽国。[58]

这一系列的变动，让整个新疆地区“蛮夷化”了。王延德的出使证明了这个地区变成了回鹘人和突厥人的地域。

北宋和西域打交道必须经过宁夏或者河西走廊地区，在王延德时，由于党项人与北宋保持着友好关系，这里还是开放的。王延德出使三年后，党项人已经与北宋闹翻，经过了数十年的鏖战，建立了敌对性质的政权西夏，从此西域也就被西夏封闭了。

北宋作为一个内敛的王朝，丢失了与西域的联系，并没有让皇帝过

于担忧。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西域给汉地造成的麻烦，远远多于贸易带来的收入。于是，在丢失了西域之后，宋朝将与海外联系的重心放在了南方的海道。在唐代时，海道就已经非常繁荣，北宋的辛勤耕耘更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第十章 贸易立国的王朝

外国人行刺引起的贸易变革

公元684年（光宅元年），一艘外国船只到达了唐朝的广州，它来自海外的海岛上。[59]在唐代时，广州是帝国第一流的港口，与位于现代越南的交州齐名（当时交州属于唐）。但广州开港更早，更接近内地，其吞吐量更是位居全国之首。

但也正因为和海外交往过多，于是产生了另一种现象：对于外国船只的敲诈勒索。广州都督路元叡是一个黯弱之人，对下属管理不力，使得广州地方的官吏更加肆无忌惮。当这艘外国船到港后，官吏们立刻蜂拥而上，想方设法进行盘剥，到最后，外国商人受不了敲诈，只好去找广州都督路元叡，请他主持公道。

但外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路元叡不仅没有主持公道，反而站在了自己的下属一边，要求将外国人抓起来法办。这成了压垮事态的最后一根稻草，外国人大怒，立刻用武力反叛，有人直接抽剑登上大厅，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路元叡，又杀掉了十多个人，他们的首领才率领大家离开广州，登上大船，扬帆而去。[60]

这件事传到了朝廷，引起了轰动，也将中外贸易问题摆在了皇帝面前。它促成唐朝做出了两个改变：第一，向广州等地派遣的官员务必精心选择，在路元叡之后派遣的王 就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他采取了对外国人秋毫无犯的政策，来保证广州本地的繁荣。第二，唐朝政府开始考虑建立新的机构，专门管理外国人，这就有了后来市舶司的形成，这使得唐代成了少有的对外国人实行管理和优待的王朝，也促进了中外贸易

的发展。

唐后期和宋代，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除了首都这样的政治中心，往往还有东南沿海的港口地区。在首都，人们是依靠政治资源而获利，但在沿海地区却是依靠实实在在的商业。

唐代最大的港口有两个，一个是进行内部贸易的扬州，另一个就是进行外部贸易的广州。扬州之所以发达，和它是长江与运河的交汇点有关，在唐代，即便是蜀地的物资要想运往长安，也必须首先顺长江而下，绕到扬州，再走运河系统进入黄河，最后沿黄河而上，进入渭河，才能到达长安，这样的距离比起蜀地和长安之间的直线距离，已经远了五倍以上，但由于是水路，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而在广州，则是针对整个世界的贸易地点。由于阿拉伯人占据了中亚，西域的贸易量逐渐萎缩到微不足道，而海上贸易的规模却要大得多。在广州，除从东南亚来的船之外，还有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船队前来，甚至能看到从非洲来的黑人。

到南北宋时期，广州变得更加发达，成了全国富商大贾的汇集之地。商人们在这里大建公馆，随处可见亭台楼阁、宝马香池，竟然如同化外之地。只要满足了政府的税收，政府倾向于放松行政上的管理，以换取经济上更加繁荣。

除广州之外，唐代还有一个巨型港口交州。交州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它距离中央政府比广州更加遥远，做起贸易来不受干扰，直到宋代交州成了外国，才和中国的贸易有了隔阂。

到了宋代，由于和西北方面的联系更加薄弱，朝廷愈加依赖东南沿海，于是除了广州继续保持繁荣，其他沿海地区也得到了大发展，福建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福建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它北面的浙江和南面的广东都发展更早，但福建在中国体系下却一直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这

主要是广东有珠江三角洲，浙江有浙北平原等富庶之地，而福建虽然靠海，但平地却很少，只有靠海的一小条平原而已，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武夷山将福建与内地其他地区隔开，只有北方一条叫仙霞岭的通道与浙江和江西连接，显得非常闭塞。

直到唐代，福建的大部分山区仍然是未开发地区，即便沿海地区有港口，也很难把物资从其他地区运往福建。唐代后期，才将泉州开放，成为对外港口。[61]唐末五代时期，由于福建变成了割据政权闽国，这里反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当闽国归顺了北宋之后，福建的三大港口泉州、漳州和福州开始了新的篇章。

到了南宋时期，泉州已经成了仅次于广州的大港。[62]这里也成了海外人士聚集之地，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外国人的墓葬，伊斯兰教、犹太教、拜火教的墓碑都可以见到。

从福建再继续向北，浙江地区的明州（今宁波市）、秀州（今嘉兴市）、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等地也都是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活动的地区，甚至作为南宋首都的临安（今杭州市）也有着繁荣的对外贸易。[63]

对外开放带来的是造船业的大发展。中国由于是内陆帝国，在唐代之前，造船业一直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显、义净等僧人，只要从海外回来，就必然乘坐外国船只。[64]

与中国造船业的落后相对的，则是外国造船业的发达。比如，扶南虽然和汉地各时期相比都显得渺小，可是扶南船却一度成了海上的主宰。在三国时期，由于东吴派遣使者去往东南亚，关于扶南造船业繁荣的消息也被使者带了回来。扶南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大者载百人”[65]。船上配备了短桨和长槁，可以应付水深和水浅的情况。[66]

而更加大的是波斯船或者罗马船，大的有四个帆，在海中行走如

飞。[67]与此同时还有南印度地区的船，比如师子国（斯里兰卡）的船，上下楼梯就有数丈长，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船。[68]

到了中唐之后，中国海船开始出海。晚唐时期，中国的海船已经与外国船不相上下，这也可见中国人只要遇到开放的时机，对海外的学习总是非常迅速的。到了唐末，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容纳千石米粟的大船。[69]

宋代的船只更是发达，到了伊本·白图泰[70]访问中国时，[71]记载中国大船有十帆，光是载的水手和士兵就有上千人之多。[72]与此同时，海外的船只最大的也不过是装载近千人，所以中国船已经从载重量上超过了外国船。

船上就如同一个小社会，分工细致，有专门的水手，还有船长、副船长，兵士、杂役等，当然还有商人和货物。中国的船还配备了指南针，比起外国船更加容易掌握方位，成了航海的撒手锏。

宋元时期的船舶工业已经领先于世界，这才催生了明代初期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远远胜于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其秘密不在于明代，而在于宋元时期的积累。事实上，恰好是由于明初的挥霍将海外贸易变成了赔本买卖，使皇帝放弃了海外市场，才导致了中国造船业的衰落，并最终被西方超越。明代可谓享受了技术进步的最后一次辉煌，却最终毁掉了技术本身。

当海外贸易发达之时，在华的胡人也形成了庞大的团体。[73]中国在唐宋时期一直有着发达的外国人社区。看一个社会是否开放，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看它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外国人来，并以平常化的心态看待他们，容纳他们。

从开放心态上看，历朝历代中唐代是最发达的朝代。以首都长安为例，在这里居住着大量的胡人，他们甚至在某些行业内占据了主流，比如珠宝行业和香料行业，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行业——卖酒业。长安城

的卖酒业不仅老板是胡人，要想经营好，女服务员（酒姬）必须也是胡人，被称为胡姬。[74]当唐朝的达官贵人们在小酒馆里吆五喝六时，这些美丽的胡人女子也被视为酒馆的招牌。

胡人来到中国，也大都保持着他们自己的风俗，除了有一个汉化的名字，他们还保留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并拥有着自己的信仰。唐代为了管理小众宗教的问题，比如拜火教、景教等，往往会限制本地人信奉，却不限制胡人，这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度。

在长安之外的海岸地区，胡商更是发达，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75]甚至出现了专门服务于胡商的中国人，比如有人专门开客栈针对胡人，结果也积累了百万家财。[76]到了宋代，胡商在沿海地区也非常发达。

除波斯、阿拉伯、印度等胡商之外，甚至一些“黑人”也来到了中国，他们被中国人称为“昆仑奴”。[77]这些“黑人”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阿拉伯人在北非获得的黑人奴隶，他们大都来自撒哈拉沙漠南北一带，以及埃塞俄比亚所代表的非洲之角上；另一种是“假黑人”，也就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岛屿，或者东南亚岛屿上的人，只是皮肤较黑，所以也被称为“昆仑奴”。

唐宋时期随着外国人的增加，针对外国人的法律也出台了。唐代最初对外国人还是有顾忌的，于是设置了一些限制性的法律。比如，唐代规定，外国人内部犯罪，按照外国人的法律来执行，如果外国人和中国人发生罪案，则按照中国的法律论处。[78]宋代则规定外国人犯罪，由中方审判，但交给外方执行（徒刑以上则由中方执行）。[79]在国内也设置了一些蕃长，这些蕃长由皇帝任命，却由外国人社区推荐，并可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这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将一部分管辖权让渡给了外国人自己。[80]

此外，各个朝代都有法令限制外国人的居住范围，或者限制外国人

和中国人通婚，但由于管辖不严格，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由于唐宋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到了最后，许多外国人的第二代都已经和中国人无异，甚至有的人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得到了官职。[81]

到了宋代，随着中外贸易的进步，还出现了一批海外华人，他们是在东南亚做买卖留在那儿的。元代周达观出使吴哥时，发现那儿竟然有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82]事实上，最早出国的中国人可能在唐代，这就是海外华人社区往往被称为“唐人街”的原因。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地，第一批华人都在逐渐生根，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鼻祖。[83]

唐宋政府之所以对外国人这么宽容，甚至当外国人杀了自己的官员后，不是首先想到报复，而是检视自己的问题，采取了更加公正、包容的态度，在制度上保证外国人的权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要想讨论海外贸易对中国政府的好处，就必须提到一个特殊的机构——市舶司。

贸易立国

在唐宋时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市舶司。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看政府重视什么，往往看它的税收偏向何处。中国政府一直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对于商业非常轻视，所以，它的税收业主要依靠农业。

这里，农业税是税务的大项，并不表明农业受到了轻视，反而证明它的重要性。政府对于商业往往是不收税的，但这并不表明商业享有优势，反而证明政府看不起商业领域。既然不收税，政府就会用各种手段

限制甚至取缔它的发展，或者用官办企业来代替它。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官办企业，大都存在于工业或者商业部门，[84]但它们很少干扰农业，就是因为农业是主要税源，不能干扰，而工商业不是税基，可以取缔改为官办赚钱。

虽然整个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因为轻视商业而不设海外商税，但在唐宋时期却是对海外商品征税的。同样，这不仅不表明唐宋政府对海外的敌视，反而证明它们对海外贸易的支持态度，支持的代价就是缴纳一定的关税，获得的收益，则是政府的保护和承认，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贸易活动。反而是明清两朝的前半期，由于放弃了关税，对于海外贸易是完全排斥和打压的。

唐宋政府征收关税、管理海外贸易团队的机构叫市舶司，这个机构的长官最初主要由宦官担任，后来则成为普通官。

唐代市舶司最早可能出现于玄宗时期或者更早。[85]这和唐早期的海外贸易港缺乏管理有关，本章最初的外国人杀死广州都督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此外，皇帝也希望将贸易正规化，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这些原因综合起来，促进了市舶司的发展。

由于唐代的首都长安距离市舶司所在的广州还过于遥远，到了宋代，随着首都迁到了开封和杭州，市舶司出现了更大的发展。

公元971年（开宝四年），北宋刚刚平定了岭南地区，就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为了吸引海外的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公元987年（雍熙四年），皇帝派了8个内侍，分别带着诏书和金帛，前往海外各地去劝说他们到中国来。为了让这些人便宜行事，皇帝甚至发给他们抬头处空白的诏书，等他们到了海外，只要觉得对贸易有利，就可以自行填写内容，送给各地的国王，请求他们前来进行贸易活动。[86]

到了公元999年（咸平二年），又在杭州和明州设置了市舶司。泉州的市舶司则设于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87]

最初时，市舶司没有专门的官员，而是隶属于地方政府，后来，中央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职位，称为提举市舶司，也就将管理权收归中央了。

不管是否单独设立职位，在宋代，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对海外船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在沿海各省，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来到港口，地方官员立刻蠢蠢欲动，他们向上级申请开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请船长、船员参加政府组织的聚餐，表示欢迎。地方官员与海外商人也称兄道弟，一派祥和的景象。[88]

为了欢迎海外商人，政府甚至出台了法规，保护那些出事的船只。当有船遭遇飓风漂到了海滩，船主不在时，地方政府会负责保护船只的财货。[89]甚至船主死了，他的亲人来认领，也要帮助他们完成交接。

当然，在一片重商的氛围下，政府有着不小的财政利益。

在宋代，海外关税的税率是1/10，一艘船停靠海岸，经过官府登记后，将1/10的货物缴纳给政府，剩下的再展开贸易。[90]

除正常的税收之外，宋代还实行官卖制度，许多海外商品不允许民间买卖，只能由政府收购，比如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物品，都是专卖品。尽管必须专卖，但由于价格较为合理，还是形成了政府与外商双赢的局面。在专卖之外的其余物品，如果政府不打算收购，则由外商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

这种贸易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却由于各级官员的鼓励，运转良好。

到了南宋时期，市舶司的税收已经成了皇帝不可缺少的一笔收入。北宋刚刚灭亡之后，公元1128年（建炎二年）开始的七年间，仅仅泉州市舶司就给皇帝带来了98万缗的财富。[91]就连宋高宗都说，市舶司的

财富只要利用得好，那么人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些。[92]这意味着宋代政府已经意识到贸易的双赢作用。

随着南宋政府敛财倾向的加强，另一种负面的趋势也开始显露。这种趋势是，为了便于管理，政府将外贸向广州、泉州等几个重要港口集中，并禁止其他地区接待外国商船。并且，为了避免本国商人的走私行为，限制本国船只前往海外。不过，在宋代时，这种倾向还不明显，加之继承的元朝同样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王朝，所以中国的宋元时期成了海外贸易最自由的时代。

唐宋时期的提举市舶司有如下几个功能：[93]

一、征税和专卖。这最主要的是抽取1/10的税收，并对那些只允许官卖的商品按照市价收购，并有可能用市价购买一部分允许民间买卖的产品。

二、船舶和线路管理。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发放的出国许可证和买卖凭据。所谓出国许可证（当时被称为“公券”），是指政府为了管理出国的船只发放的出境许可，上面规定了去往的国家和回航的港口等，等船只再回到中国时，凭出发时的许可证进行校验，这就可以管理船只，并获知船只去往的地方和购买的商品。所谓买卖凭据，主要载明政府抽走的税收，以及购买的货物，有了这个凭据，就可以避免船只被重复征税。虽然这些管理职能会导致民间贸易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当时，一件事物要想长期存在，一定要让政府得到足够的好处才行，缴纳的税收本身就是一种投名状，而政府要想获得足够的税收，就必然要进行一定的管理职能。更何况，宋代政府对商人的服务也是非常周到的。

三、对商人的服务。这不仅包括迎送外商，请外商吃饭，政府甚至还承担着保平安的作用，他们负责为商船祈风、上香祭祀等。[94]

由于贸易带来的繁荣，宋代也成了除元代和明清后期之外，中国对

世界了解最多的朝代。即便是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时代，也仅仅是到达和了解了东非地区的某些港口，而唐代所了解的非洲主要就是杜环所去的北非。但在宋代，人们对北非和东非的了解都已经有了完备的知识，比明代郑和时期并不差。

宋代留下的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由一位市舶司的领导人写的。这位叫赵汝适的宗室子弟在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到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间担任了福建路的市舶提举，主要负责的就是泉州的市舶司。[95]

在市舶司任职的这段时间内，他采集了大量的海外资料，写成了一本宋代的贸易资料集，其中上卷记载了海外的58个国家，而下卷记载了海外的47种特产。

这些国家分布非常广泛，除了人们还没有发现的美洲，以及较少到达的西欧，其余的地区基本都囊括殆尽。其中最远的国家包括北非地区的摩洛哥，以及更近一点儿的马格里布地区。

在宋代，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衰落，帝国的许多将军乘机割据了各个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地方性的小王朝。他们的领袖自称苏丹，都承认阿拉伯帝国的宗主权，但事实上却各行其是，不再听从哈里发的领导。最先兴起的是一位将军建立的塔希尔王朝，随后是萨法尔王朝、布维希王朝和萨曼王朝。其中萨曼王朝更是重要，因为它除了占领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还占据了中亚和阿富汗，是一个国际性的王朝。更重要的是，萨曼王朝还是伊朗人在中亚地区的最后存在。在古代史上，中亚曾经遍布着与伊朗同种的民族，之后被蒙古地区兴起的突厥人所取代。萨曼王朝是最后一个伊朗人的王朝，之后中亚进入了突厥时期。

在突厥政权中，最重要的是以阿富汗为主体的加兹尼王朝（定都在加兹尼），在中亚（包括今天新疆喀什地区）的喀喇汗王朝，以及更重要、疆域更广阔的塞尔柱王朝。

塞尔柱王朝是由一支叫塞尔柱突厥人的种族建立的，他们控制了阿拉伯帝国，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最远的是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的鲁姆苏丹国。正是由于鲁姆苏丹国威胁了已经衰落的拜占庭帝国，并阻挡了西欧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导致了西欧十字军运动的兴起。

宋代时，恰好是位于今天土耳其的鲁姆苏丹国以及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加兹尼王朝的高峰时期。

在印度，依然是小国林立。宋代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南方海岸地区。印度的海岸分成了东海岸和西海岸两部分，在东海岸，最大的贸易国家依然是朱罗国；在西海岸的南方是马拉巴尔海岸，北方则是一个叫瞿折罗的国家。后来葡萄牙人初次到达时，就是在西海岸的马拉巴尔地区落脚。

赵汝适对东非的记载也超出了时代，最远处可能在马达加斯加或者桑给巴尔，[96]近处的索马里海岸、更近处的波斯湾地区，在赵汝适的书中都有记载。

从书中也可以看出，在当时，除北非海岸已经伊斯兰化之外，东非海岸上的城市国家也都伊斯兰化了。事实上，在欧洲人去之前，半个非洲都已经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到现在为止，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历了两次文明化，而最早的那一次是伊斯兰教带去的。

表16 宋代对于世界的认知[97]

《岭外代答》记载的国家	安南、三佛齐、占城、真腊、蒲甘、阇婆、故临、注辇、大秦、麻离拔、麻嘉、白达、吉慈尼、眉路骨惇、勿斯离、木兰皮、王舍城、天竺、中印度、细兰、南尼华啰、沙华公、近佛国、女人国、昆仑层期、波斯国、高丽、百济、佛罗安③

③ 故临位于今天印度奎隆。注辇又名朱罗国。麻离拔位于今天印度马拉巴尔海岸。麻嘉即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白达即今天伊拉克巴格达。吉慈尼即加兹尼王朝。眉路骨惇大约位于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勿斯离即今天伊拉克摩苏尔。木兰皮即穆拉比特王朝，位于今天非洲西北部和欧洲西班牙南部。细兰即今天斯里兰卡。南尼华啰又作南尼华罗，位于今天印度卡提阿瓦半岛南部。沙华公、近佛国、女人国具体位置不详，大约位于今天菲

律宾群岛到苏门答腊岛一带。昆仑层期位于今天马达加斯加一带。波斯国此处大约为阿拉伯海中岛国，非波斯帝国。佛罗安大约位于今天马来西亚半岛西岸。

续表

《诸蕃志》记载的国家	交趾、占城、宾瞳龙、真腊、登流眉、蒲甘、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啰安、新拖、监篦、蓝无里、细兰、阇婆、苏吉丹、南毗、故临、胡荼辣、麻啰华、注辇、鹏茄啰、南尼华啰、大秦、天竺、大食、麻嘉、层拔、弼琶啰、勿拔、中理、甕蛮、记施、白达、弼斯啰、吉慈尼、勿厮离、芦眉、木兰皮、勿斯里、遏根陀、晏陀蛮、昆仑层期、沙华公、女人国、波斯国、荼弼沙、斯加里野、默伽猎、渤泥、麻逸、三屿、蒲哩噜、流求、毗舍耶、新罗、倭国[1]
《诸蕃志》记载的商品	脑子、乳香、没药、血碣、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笺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波罗蜜、槟榔、椰子、没石子、乌榄子、苏木、吉贝、椰心簟、木香、白豆蔻、胡椒、荜澄茄、阿魏、芦荟、珊瑚树、琉璃、猫儿睛、珠子、砗磲、象牙、犀角、腽肭脐、翠毛、鹦鹉、龙涎、瑇瑁、黄蜡[2]

① 宾瞳龙位于今天越南藩朗。登流眉位于今天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一带。单马令位于今天泰国南部马来半岛洛坤。凌牙斯加又名狼牙修国，位于今天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带。佛啰安又作佛罗安。新拖国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监篦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岸兰沙市。蓝无里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亚齐河下游哥打拉夜一带。苏吉丹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南毗又名麻离拔。胡荼辣又名瞿折罗国。麻啰华位于今天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那格浦尔一带。鹏茄啰位于今天孟加拉及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层拔位于今天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弼琶啰位于今天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柏培拉附近。勿拔位于今天阿曼西南部米尔巴特一带。中理大约位于今天索马里及也门索科特拉岛。甕蛮即今天阿曼一带。记施位于今天伊朗波斯湾卡伊斯岛。弼斯啰位于今天伊拉克巴士拉一带。芦眉即眉路骨惇。勿斯里即今天埃及。遏根陀位于今天埃及亚历山大。晏陀蛮位于今天孟加拉湾安达曼群岛。荼弼沙一说为古代加纳帝国，位于今天毛里塔尼亚及马里两国中部。斯加里野位于今天意大利西西里岛。默伽猎位于今天摩洛哥。渤泥国位于今天加里曼丹岛。麻逸位于今天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位于今天菲律宾卡拉棉、巴拉望、布桑加诸岛。蒲哩噜位于今天菲律宾波利略岛。毗舍耶一说为今天台湾岛。倭国即今天日本。

② 脑子即龙脑香。波罗蜜即菠萝蜜。乌 子又名乌 木，是一种珍贵木材。珠子即珍珠。腽肭脐即海狗肾。瑇瑁即玳瑁。

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的争执。一方面，

由于皇帝需要从外贸获得收入，希望垄断外贸，而另一方面，靠近西域或者沿海的老百姓出于生活的需要，有展开自由贸易的冲动。

在汉代，外贸活动几乎都由皇家垄断，唐代早期的皇帝不懂贸易，这反而给了民间很大的空间，但唐代早期的户籍制度比较完善，皇帝通过护照制度限制了人民与海外自由交流的权利，但即便如此，唐代后期户籍制度逐渐混乱之后，外贸冲破了官方户籍的束缚，保持了足够的繁荣。

到了宋代，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导致了外贸的进一步繁荣。但是，另一个问题也产生了，那就是宋朝时也发展出一定的朝贡制，当周边国家到宋朝来朝贡时，皇帝必须给予厚赐，价值要超过对方的进贡物品，这就造成了一种变相的、不划算的贸易。与朝贡并行的是自由贸易，这在宋代也很发达。但是宋代政府又很善于利用自由贸易的机会，对一些奢侈品采取官方采购，官府还能在贸易中占有优先权，只有官府挑剩下的物品才可以进入民间交流系统。

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宋代还实行禁运制度，比如对北方的辽金就要实行武器和金属禁运。宋代的出版业也很发达，为了避免敌方获得汉地的书籍，[98]也采取了一定的出版禁运。这些禁运措施又扭曲了自由贸易。

这种扭曲在宋代还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危害，到了明代，由于拙劣地模仿朝贡制，禁止了民间贸易，就形成了实际上的闭关锁国，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宋代贸易的优点与缺点在和高丽的贸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高丽是一个位于特殊地区的国家，在唐代之前，高丽与汉族政权是直接接壤的，但到了五代和宋朝，由于辽国和金国的存在，高丽已经不再是宋朝的邻居，于是，如何与高丽打交道就成了重大问题。

首先，高丽仍然愿意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在公元1031年（天圣九

年）之前，高丽一直在向宋朝派出使者。在朝贡中，高丽人最主要的需求之一，就是希望从宋朝得到书籍，他们希望得到的包括佛教书籍（如《大藏经》《莲华心轮》等）、儒家书籍（如“九经”）、历史书籍（如《国朝登科记》）、医药书籍（如《太平圣惠方》）、阴阳地理历法等自然科学书籍。在朝贡过程中，他们的要求大都得到了满足。[99]

但在公元1031年之后，由于宋朝无力调解高丽与辽国、女真的关系，高丽在接下来的43年内再也没有来朝贡。[100]

朝贡断绝之后，民间的贸易也被禁止了。高丽和宋朝的外交和民间贸易，大都使用渤海内位于现在山东的登州港，这里距离朝鲜半岛更近。皇帝禁止了登州港与高丽的民间贸易。

但当有贸易需求时，皇家的禁令很难执行到位，宋代是一个“令行禁不止”的朝代。既然登州地区严格执行了禁令，那么必然在沿海的其他地区会产生新的贸易基地。北宋后期，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明州的商人们就这样发现了机会，开辟了与高丽的贸易路线。从情理上讲，明州和高丽的距离非常遥远，但这点儿距离在追求贸易机会的商人看来，并不算什么。

事实上，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之后，明州地区产生了一批专门做高丽生意的富商，这些富商的名字甚至都流传了下来，即黄真和洪万。[101]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可以出入高丽王的宫廷。

到了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高丽王请求黄真和洪万带一封信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表示想恢复朝贡关系。两人带着信找到了福建转运使罗拯，罗拯报告给宋神宗，恢复了高丽的朝贡。最初，朝贡仍然走登州路线，但几年后，高丽的朝贡路线也从登州转往了明州。[102]

但是，此时的宋朝已经失去了宋仁宗朝以前的开放性，由于高丽的地位特殊，宋神宗在下令朝贡港转往明州的同时，为了避免高丽与宋朝民间的交往，还下了另一道命令，禁止民间私自与高丽做生意，将交往

限制在官方层面，也就是朝贡层面。这实际上是明朝政策的一种预演，到了明朝前期，与国外的民间交往都成了非法，只剩下官方关系了。

当高丽与宋朝只剩下官方关系时，他们获得物资的能力降低了。仍然以他们最需要的书籍为例，在宋哲宗初年（公元1086年），高丽又来宋朝索要书籍，这一次他们需要的是刑法书，以及《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等书。但宋哲宗经过思考，只给了一套文学性质的《文苑英华》，将其余的书籍都拒绝了。到了公元1090年（元祐五年），高丽再次派人要书，他们开列了长长的书单，但这一次，宋哲宗在苏轼等人的建议下，将这些全都拒绝了。[103]

但幸运的是，宋朝的禁令与明清的禁令执行程度是不同的。事实上，高丽与中国民间的贸易关系一直没有完全断绝，甚至还很频繁。当从朝廷无法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立刻转向了民间，前往明州地区利用市场购买需要的物品。比如，《册府元龟》被皇帝拒绝了，但他们在明州很容易就买到了。

不仅如此，从皇帝处索要的书籍只能要一套，在民间，只要他们肯付钱，甚至还会有人将书版雕好直接卖给他们，回去想印多少都可以。[104]

在北宋后期皇帝的朝堂之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焦虑：要把知识保留在国内，不要轻易送到国外去。持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者，还有许多名臣参与其中。

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都曾经参与了讨论。在高丽问题上，苏轼几次提到不能让高丽轻易获得书籍，代表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思潮。[105]

但苏轼的态度又不能仅仅以民族主义而论，事实上，他看到了宋代朝贡体系的许多弊端，也试图维持一种自由贸易。比如，他在任杭州知州时，就曾经将高丽使团阻拦，不让他们去汴京朝贡。苏轼很早就指出

了朝贡体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使节到来后，一路上的地方政府要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他们送给皇帝的东西大都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却接受了更加贵重的赏赐。因此，苏轼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不能维持的，要想获得更多的好处，就把高丽人限制在明州地区，让他们通过市场去购买需要的东西，这对民间经济有利（加强了贸易），对皇帝也有利（减少了开支）。[106]

但在支持以民间贸易取代朝贡体系上，苏轼也不纯粹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而是希望在某些方面加强管制，包括对书籍的管制。这或许是苏轼的局限性，却也是当时宋代大臣的普遍看法。

宋代的贸易就在自由贸易的海洋中不时地遭遇管制的礁石。但即便是有管制，皇帝的整体态度仍然是支持贸易的。到了南宋，由于财政的需要，皇帝不得不采取了更加重商主义的态度，于是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海洋贸易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宋代的大船在东南亚地区也慢慢地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大船，成了该地区的主宰。

到了元代，随着世界帝国的建立，海外贸易和交往更是在宋代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层次。唐宋元时期贸易和海运的繁荣甚至让封闭的明代获得了好处，如果不是宋元时期积累的航海和造船知识，郑和是没有机会在海洋耀武扬威的。

从丝绸到瓷器

在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中，有一个始终对中国有利的规律存在，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中间只出现过偶尔的中断，那就是：中外贸易始终是用中国的制成品（工业品）去交换海外的资源类商品（原材料和奢侈品）。

唐代有点儿例外，人们既习惯于使用西域的东西，也喜欢从西域进口制成品。同时中国人的仿制能力很强，能很快就将西域风格模仿到

位。公元1970年，在陕西西安的何家村发现了一批唐代的金银器窖藏，共发现金银器一千多件，可能是唐朝中期王府的人逃避战乱之前，将宝藏埋藏在地下的。这些金银器艺术风格异常惊人，大量的器物带着明显的粟特风格。不过经过研究，人们认为这些物品都是在中国国内制造的，要么来自粟特移民匠人，要么来自学会了粟特风格的中国匠人。[107]可见在当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加工制造大国，对于外来的技术吸纳非常迅速。

之所以中国习惯于用加工品换取资源类商品，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人均资源占有量小，但适合于进行生产社会化组织。而在西域和海上，由于人口密度小，不利于组织生产，但资源丰富，适合于采集资源，换取中国的加工品。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加工品主要有以下几种：丝绸、瓷器、纸张和茶叶。此外，铜器、漆器、铁器、货币（铜币）、布匹等，也都在不同的时间里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从海外进口的产品是几乎千年不变的各种土特产，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西域地区，二是东北森林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三是东南亚海上地区。

以唐朝为例，在西域地区，唐朝进口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资源性特产，以珍草异兽、金银珠玉为主，再加上一项重要的商品——马匹。有人根据唐朝与中亚地区的进贡情况，总结了中亚输入的特产，包括：马匹、花草水果（金桃、银桃、郁金香）、其他动物及衍生品（狮子、犬、鸵鸟蛋、羚羊、骆驼、髡、豹子）、宝石（玉、碧颇黎、玛瑙、水晶）、金银及其他矿产（蛇黄、青黛、红盐、黑盐）、人（侏儒、舞女）等。此外也有少量的加工品，比如毛锦、石蜜（糖）、葡萄酒、毛毯等，但在整个进口的商品中份额占比却很小。[108]

在东北森林地区，当地的特产主要是毛皮和中药材。比较特别的是

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奇缺、急需外面输入各种商品的地区。古代日本人渴望各种商品，却拿不出可供交换的产品，这是导致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一直无足轻重的原因。到了明代，政府对日本越发不胜其烦，强行规定日本只能每十年来进行一次贸易活动，或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日本后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的这种进出口矛盾，要到现代才有改变的可能，即通过强大的科技制造能力，弥补资源的不足。

而在南方海域，中国需要输入的物资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香料，二是海洋特产，三是热带特产，四是珠宝。

香料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印尼和菲律宾的群岛上，包括丁香（产于马古鲁群岛北部）、肉豆蔻（产于班达群岛）、白檀（产于小巽他群岛和印度南部）、沉香木（产于越南和柬埔寨）、小豆蔻（产于印度马拉巴尔和东南亚）、肉桂（产于斯里兰卡）、乳香和没药（产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索马里）。[109]由于欧洲人也喜欢东南亚产的香料，这部分贸易更具有全球属性，并最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

海洋特产是中国的皇室和富贵阶层最喜欢的奢侈品，包括：珍珠（产于苏禄群岛、海南岛、马纳尔湾和波斯湾）、玳瑁（产于东南亚、南亚、马尔代夫、亚丁湾和东非）、珊瑚（产于地中海）等。

热带特产包括：象牙（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犀角（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鹦鹉、犀鸟角、翠鸟羽毛（此三种均产于印度尼西亚）、孔雀（产于南亚）、红木和乌木（产于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

珠宝主要有：琥珀（产于波罗的海，经过西亚和海路流入中国）、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后三种均产于斯里兰卡和缅甸）等。

与现代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商品相比，中国古代的出口商品却长期维持在少数几种物品上。在丝绸、瓷器、茶叶、纸张中，纸张的出口时间较短，数量也较少；茶叶是在宋代才开始进入出口名单，最初只是

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直到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始有了喝茶的习惯，时期正是中国的清代，此时茶叶才成了出口的大宗。去掉纸张、茶叶这两项之后，真正称得上大宗出口商品的，就只剩下丝绸和瓷器了。

这两种物资在两条线路上的地位又是不同的。其中丝绸是最古老的大宗出口品，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就已经通过层层转运，接触到了中国丝绸，当时张骞还没有发现西域，中国的物品就先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而到达了西方世界。

古罗马时期，作家老普林尼认为罗马一年有1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流入东方，这相当于帝国全年造币量的一半。[110]

汉代之后，丝绸贸易络绎不绝，到了唐宋时期，虽然西方已经有了养蚕和加工丝绸的能力，中国的丝绸依然是最抢手的商品。

中国丝绸之所以一直是出口的大宗，有两个原因：

一是丝绸是特别适合长途陆路运输的商品。它的质量轻，便于携带，卷起来可以放在骆驼或者马背上，摊开了薄如蝉翼，不占重量。作为日用商品，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做成最高档的衣物。而其他物品，比如铁器甚至瓷器，在陆路运输中就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无法展开。

二是中国的经济制度鼓励了人们大批量制造丝绸，这就给出口留下了空间。从汉代到唐代，丝绸一直是作为向帝国缴纳的税收使用的。特别从北魏到唐代，政府会专门给人民划拨种植桑树的农田用来养蚕，每年每个家庭都需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丝织品作为税收的一项。这使得丝绸具备了一定的货币功能，每一代政府的仓库里都堆满了丝织品。正是由于生产量足够大，使得中国制造丝绸的成本低，相比外国生产的丝绸有着足够的竞争优势。

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丝绸贸易千年不衰，中国与西方的外贸之路

由此也获得了“丝绸之路”的名号。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丝绸贸易的规模。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中，每一个商队进行的往往是小额贸易，他们携带的每一种商品的量都不会太大，从数公斤到数十公斤不等，只能算是小规模商品。[111]

到了唐代之后，随着海路交通的畅通，丝绸虽然也是一种主要商品，它的风头却被另一种后起之秀盖过了，这种新的商品，就是在宋代得以完善的瓷器。

丝绸在陆地上的优势，到了海上却并不那么强。在海上，对于重量的要求并不严苛，因为船的载重量足够大，反而对于耐水性要求很高。丝绸虽然质量轻，但只要水泡过就容易毁坏，在没有塑料袋保护的年代，丝绸并不适合海路运输。东南亚、南亚地区天气炎热，对于衣物的要求也不高，不是很需要过于花哨的丝绸。

与此同时，船只在海上航行，却需要一定的压舱物，这些压舱物要有一定的重量，能够抵御海风造成的船只颠簸。而瓷器恰好是合格的压舱物，同时还是海外需求量很大的商品。它和陆路的丝绸一样是日用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从实用性上来讲，瓷器比普通的陶器更加结实和耐用，从价格上看又比西方的玻璃器更加便宜，在运输中也不像玻璃器那么易碎，这都有利于瓷器成为海上贸易的最佳商品。

事实上，虽然人们将海上的贸易之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在宋元时期，叫它“瓷器之路”可能更加准确，因为瓷器的贸易规模比丝绸要大。

在唐代时，中国人对瓷器的釉质依然把握不好，只能生产半陶半瓷的唐三彩，宋代的瓷器技术革新已经成熟，加上海上贸易量远大于陆路，从此，瓷器取代了丝绸，成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最大宗。

然而，丝制品的地位到了明代晚期又有了恢复，这和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人的到来有关。这些欧洲商人所驾驶的船运载量更大，

明朝末期南方地区的蚕丝更加工业化，产量更大，都促使了大规模丝制品贸易的繁荣。

不过此时人们运输更多的不是丝绸，而是生丝和丝绵，也就是仅仅粗加工之后的蚕丝，至于丝绸反而是排在生丝之后的。

在明代，还有另一种产品也加入了贸易，主要针对东南亚地区，那就是棉布。棉花这种从印度来的商品到了元代以后在中国南方广泛种植，织布技术又经过了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的推广，使得江浙地区成了织布工业的繁荣区域。布匹和生丝、丝绵、绸缎一起，成了从西班牙人手中换取白银的重要商品。

唐宋时期的舶来品

除了直接的贸易交换，还有另一些海外的物品在中国安家落户，慢慢地从进口变成了本地生产。

唐代时，一种非常重要的伊朗休闲食品来到了中国，它叫阿月浑子。大多数现代人对于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但听到它的另一个俗名——开心果，一定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虽然现在进口的开心果大都来自美洲，但它的原产地却是伊朗。至今伊朗也保持着“最大出口国”的名号。伊朗人对于开心果的爱好至今不变，从它还是青果的时候就摘下来生吃，直到成熟后炒着吃。

唐代将阿月浑子称为“胡榛子”，[112]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中国旅行时，也在书中提到唐代已经引入了阿月浑子树。[113]

另外一种食物豌豆，被称为胡豆，也可能是在隋唐时期引入中国的。虽然有人声称它是更早引进的，但更确切的记录却在唐代。[114]

此外，在唐代引入中国的食品可能还有椰枣、菠菜、甜菜、莴苣、巴旦杏、无花果等，它们或者原产于中亚，或者产于更遥远的西方，但

经过中亚传入中国。

到了宋代，一个对中国人无比重要的水果出现了，它就是西瓜。在五代时期，一个叫胡峤的人曾经在契丹居住了七年，他记载了契丹人开始种植西瓜，认为这种瓜是契丹人击败回鹘人之后，从回鹘引进的。契丹人用牛粪给西瓜施肥，形状和中国的冬瓜类似，却异常甜美。[115]

到了南宋时期，一位叫洪皓的使臣出使金国，并在该地待了15年，回国时才将西瓜种子带回了国内，[116]于是西瓜开始在中国种植，至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瓜消费国和种植国。

除植物之外，中亚地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在音乐层面上。虽然汉代就已经有了西域音乐传入，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从北朝到唐朝的龟兹音乐的传入。

即便到了现代，人们一旦听到新疆音乐，也会在第一时间内感觉到它和汉地音乐的不同。那么，龟兹音乐和唐代本土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答案就藏在音调之中。

现代音乐的音调分为七声，但传统的中国音乐分为五声，即宫、商、角、徵、羽，音调的减少必然导致音乐的简单。从西域传入的音乐已经有了七个声调，据称这种音乐是在隋代由龟兹人苏祗婆传入的，他把龟兹音乐的七调按照音译的方式起了名字，分别称为娑陀力（宫）、鸡识（商）、沙识（角）、沙侯加滥（变徵）、沙腊（徵）、般赡（羽）、俟利箑（变宫）。[117]需要说明的是，龟兹七声和现代七声也并非一一对应，这才造成了西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不同。

而龟兹音乐也不是仅限于当地的，而是从印度到西域的广大区域内普遍流行的。到了现代，人们也会对印度和阿拉伯音乐的相似性感到吃惊，那是因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于是龟兹乐成了一种代指，实际上指的是以龟兹为代表的整个西部地区通用的音乐，包括印度、粟特、今天新疆地区，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世界。

与龟兹音乐一同传入的还有西域舞蹈，于是，西域的音乐和舞蹈就取代了原来的汉乐汉舞，成了宫廷之上的必备。

在隋代时，隋文帝在皇家的乐队中设立了西凉、高丽、天竺、安国、龟兹和文康（康国）音乐部门，他的儿子隋炀帝又加入了疏勒音乐，到了唐代，又加上了高昌音乐。这些外国音乐的到来，使得隋唐乐曲得到了大发展。[118]

在唐代时，善于音乐的人已经形成了大的家族，乐谱和技艺在家族内部流传。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提到，作为主角的女子曾经向穆氏和曹氏学艺，[119]所谓穆氏和曹氏，都是来自粟特地方的两个家族，他们几乎成了长安乐文化的代名词。

除音乐之外，唐代的绘画、雕刻等多重技艺也都有西方的影子。特别是在绘画上，唐代的绘画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特立独行的，它大量地借鉴了西洋画法，带着浓浓的立体感，讲究具象而不是神似。到了宋代，才最终形成了追求意境的中国画风格，与世界绘画风格分道扬镳了。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日常使用的物品在唐代也达到了巅峰，它就是铜镜。唐代的铜镜技法高超、背面装饰复杂，已经脱离了纯粹的功能性，而最著名的铜镜图案称为海兽葡萄镜，其艺术风格纯粹是西化的产物。

唐代是一个西化的朝代。到了宋代，人们虽然也在大量接受海外的产品，但是在艺术风格上则产生了一种纯粹的中国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宋韵”。这种新的风格以简洁和意境著称，从此以后外国来的产品都成了原料，必须经过汉风的加工之后，才能在国内流行。

这种内敛性由于经过了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再次被放大，到了南宋显得更加明显。南宋灭亡后，以汉族为代表的开放心态终于被终结。

文学中的外贸

由于宋代的海上贸易发达，海外经商也成了宋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小说集《夷坚志》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此类故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人对于海外的想象和关注点。

首先，海外贸易是可以发财的，于是那些商人（被称为“海客”）往往是以富商大贾的面貌出现的，他们腰缠万贯，有的赚了千万，有的赚了数亿。[120]

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在于他们出海到了国外，去接触到了那些奇特的地方和奇特的财物。于是这些富商大贾导致了宋人对于海外的想象也异常丰富。

宋朝出口的大都是工业品，比如瓷器、丝绸等，而进口的却大都是产于各地的奇珍异宝，于是，如何发现宝贝成了宋代商贾生财的主题之一。

比如，一个叫张愿的商人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121]他偶尔漂到了一个海岛上，砍了十根竹子，在海上用掉了九根，还剩一根带了回来。不想在港口上却被一群日本人（倭客）和南方的黑人（昆仑奴）围住，要求他把这根竹子卖给他们。张愿一开始出价两千缗，对方毫不还价，他又加价到五千缗，对方还是一口答应。张愿把竹子卖掉之后，才知道这是所谓的宝伽山聚宝竹，只要放在水中，宝物就自动聚集。这根竹子就像蒲松龄笔下那双善于发现宝物的眼睛一样，寄托了宋人对奇珍异宝的渴望。

除了宝物，海外的奇风异俗也成了宋人想象的对象。

比如，金陵商人富小二就经历了一场奇特的遭遇。[122]南宋前期的绍兴年间，富小二随船出海，碰到了大风浪。船沉了，他抱着桅杆漂到了一个海岛。这个岛上是由一种类似猩猩的动物占据的，它们披着很长

的毛发，却又有人类的感情，说话声音像鸟叫，略微可懂，每天以吃生的果实为生。富小二在岛上被猩猩们囚禁在山洞里，洞口用大石头封上，再派猩猩把守起来。不过，除了没有自由，猩猩们对富小二还是很友好的，甚至给他介绍了一个母猩猩成亲，生了一个儿子。当儿子出生后，富小二被允许在岛上自由活动，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一艘船，带着儿子登上了船，回到了国内。

在东南亚海道上一直有裸人国和女人国的传说，其中裸人国确有所指，因为在安达曼等群岛上，人们是不穿衣服或者只有少量遮盖的。显然，富小二的故事就是由这些岛屿的传说，加上中国人的想象附会而成的，却表现了宋人对海外的认知。

与富小二遭遇相同的还有富商杨二郎，[123]他的遭遇更带有神话色彩，也是在船只失事后到了一个海岛，只是这个海岛上已经不是猩猩，而是一种类似于妖魔的人形裸体生物，其首领被称为“鬼国母”。鬼国母甚至可以受到天上仙人的邀请去参加宴会，直到有一次将杨二郎也带去了，杨二郎于是乘机逃离了鬼国母的控制，回到了家人身边。

这些故事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海外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们对大海的恐惧。大海是反复无常的，一个浪头就足以决定人的命运。不管是富小二还是杨二郎，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在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这也表明，那些所谓的财富是多么的脆弱。

到底是什么支配力量，决定了某个人应该去世，而某个人却可以活下去？答案是：神灵。于是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有萨满教特征的各种自然神也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也都保留了下来，不管是澳门的妈祖庙，还是潮汕的三山国王，都是人们对自然崇拜的证明。

宋代时，人们只要出海，也必须对这些神灵进行祷告，献上自己的礼物，祈求平安。如果不这么做，就要受到惩罚。就算是皇帝的官员也无法逃脱。

一个叫赵士藻的人曾经担任过代理广东东南道税官，[124]在离职后，跟随另两个官员刘令和孙尉包了一条船。他们不是去做生意，而是通过海路回临安。按照当地的习俗，不管什么原因出海都应该去一个叫广利王庙的地方祭拜。赵士藻本来是想去的，但另两人不想去，最终三人都没有拜。于是三人的命运就有了区别，在乘船时他们遇到了一条黑龙，激起的巨浪将船弄沉了。赵士藻由于动过祭拜的念头，活了下来，其余的人却都死了，包括赵士藻的妻子都没有幸免。这说明，即便是官员，在海洋面前也并没有享受特权，海外的主宰不是皇帝，而是更加恐怖的自然界神灵。

不仅官员，再富有的人，他的财富也仅仅是命运给他的，而命运也可以随时将财富收回。比如泉州杨客积攒了两亿的财富，他也知道敬畏大自然，每次出现风浪，都会指天立誓向神灵做出许诺，可是一旦危险过去了，他就把事情忘记了。

最后一次，他想干一票大的就回去养老，但是在临安却遭遇了火灾，平生财富付之一炬，他也凄凉地自杀了。他曾经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最终却证明了时人的观念，这些财富只不过是神灵暂时给他的，随时可以收回。[125]

在海上进行贸易活动时，也有许多规矩，比如其中一条就是：快死的人必须及时送走，不能死在船上。当有人快死时，其他人就必须找一片陆地或者荒岛，将他放下，留一些米菜、灯烛和药品，给他搭一个茅棚送进去，任其自生自灭。[126]一个叫余观音的人就这样被送上了岸，但由于他笃信观音，得到了神灵的照顾，最终痊愈了。这也说明，人们认为只有相信神灵，才能得救。

另外，丈夫出海之后，常常一两年不回家，在家的妻子到底如何生活，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叫王彦太的人就向人们展示了商人的贞操观念。当他出海后，妻子在家被一个妖魅缠上了，不得不委身于他。王彦太回来后，将妖魅赶走，并不以妻子的失身为意，反而相待如初，

毫不在意。[127]

南宋时代，由于北宋末年的“汴京之耻”，许多赵氏皇家的女子被金人带走，强迫嫁给了蛮族，这导致宋朝社会舆论出现了极大的反弹，更加强调贞操观念，提倡三从四德，饿死也不能失节。但在商人们看来，这一切道德观念并不实用。他们不像士大夫那样在乎女人的贞操，反而更看重女人的持家能力。因为男人长期出海之后，家中的一切都要女人负责。

最后，还有一种极端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海外贸易的风险不仅仅在于大自然或者外族人，还在于同一艘船上的水手。由于利润丰厚，水手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又该如何对待呢？

虽然市舶司可以管理这一类的案件，但是船上发生的事情，在港口的官员们是很难侦查出真相来的，这时，人们就只能求助于“鬼”了。《夷坚志》记载的王元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128]王元懋年少时当过僧侣，跟随师父学会了东南亚的语言，还俗后成了海商，甚至娶了占城国王的女儿。回到国内后，他成为巨富并与官员结了姻亲。

有一次，他组织了一次出海经商活动，但自己没有去，而是叫一个吴大的人当负责人。十年后船队回来，经过惠州罗浮山时，还是出事了。由于船队的利润达到了数十倍，船上两个水手带头杀掉了一半多的人，带着剩下的人回到了泉州。王元懋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却选择了隐瞒，因为一旦被官府知道发生了血案，那么货物会被没收。

但随后，一个险些被杀的水手奇迹般逃脱了，并且回到了家乡，导致事情败露。但王元懋还是得到了当地官员庇护，其中就包括泉州市舶司的头目们。

最后的正义姗姗来迟，是靠着那些死去的鬼魂将凶手抓住，送给官府绳之以法。王元懋也被鬼魂索取了性命。

这个故事说明，在海上，政府的法律已经很难执行，即便有犯罪行

为，政府也很难查明真相，更不可能做出相应的惩罚。在海上，人们有自己的规矩，而这一点却是中央政府最害怕的。他们害怕一个自治性的团体产生。如果人们想要自己立法，那么政府宁肯禁止出海，也不想丧失管理权。

宋代的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容忍他们，但到了明代和清代，进入更为集权的社会后，皇帝就不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了。于是，海商在政府眼中就变成了海盗，成了政府的打击对象。事实上，所谓海盗，有时不过是一些人因为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满足，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贸易权和生存权罢了。

西欧苏醒了

当中国的唐宋与中东的阿拉伯帝国、突厥帝国频繁互动时，西方曾经的大国罗马帝国却进入了蛰伏状态。公元395年（东晋太元二十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首先衰落，最终在公元476年（北魏延兴六年）灭亡于“蛮族”日耳曼人之手。之后东罗马帝国也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最初还可以与波斯萨珊帝国相抗衡，阿拉伯人兴起后，东罗马逐渐被压缩到了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区，变得无足轻重了。

罗马帝国后期采纳的基督教（天主教）也成了文明的障碍，曾经繁荣的希腊罗马文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此时也让位给了极其朴拙的原始基督教艺术。最初的基督教由于强调虔诚而放弃了逻辑，使得欧洲进入了科学文化欠发达的中世纪。虽然现代人们反对将中世纪说得一片黑暗，但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西欧当时已经被东方的两大强权（中国和中东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不过，灭亡西罗马帝国的“蛮族”日耳曼人也在慢慢地文明化，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被罗马当年的荣光所吸引。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法兰克人查理曼大帝在名义上统一了西欧之后，宣称重建了罗马

帝国，并和罗马的教皇联手，建立了庞大的查理曼帝国。查理曼死后，帝国分崩离析，在分裂的碎块上，慢慢地诞生了法兰西王国，再加上岛屿上的英格兰王国，这两个民族国家逐渐成形。但今天的西班牙地区却由于穆斯林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北非入侵，变成了穆斯林的国土。而意大利半岛由于罗马教皇的介入，没有整合成一个民族国家。查理曼帝国剩余部分（以现在的德国为主体）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下，变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体，共尊一个皇帝，但实际上却并不听皇帝的话。这个皇帝还是选举产生的，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是子承父业，但由于选举制的存在，世袭并非天经地义，每一次老皇帝的去世都意味着剧烈的政治斗争和利益交换的出现。

西欧依然是四分五裂的，且内部不断地进行战争，在这种战乱的笼罩下，似乎看不到西欧崛起的希望。在这种氛围下，西欧连内部事务都自顾不暇，自然也没有心思关注外部的情况。在当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是阿拉伯帝国，西欧虽然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却对阿拉伯人都不了解，更何况是更加遥远的中国、印度等。

然而，到了宋代，东方发生的变化却让西欧逐渐苏醒了。这时距离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有近300年时光，整个欧洲依然处于宗教的压抑之下。然而，在中东地区的变动让欧洲人莫名其妙发动了一场场军事远征。这一系列的十字军远征显得粗鲁，带着些许野蛮人的精神，对于相对文明的伊斯兰世界，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径。但有趣的是，这些远征虽然一开始是受到了信仰的蛊惑，但在远征过程中，却打开了“欧洲野蛮人”的视野，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世界，这么舒适的生活，以及这么多未知的学问。从此，来到了东方的欧洲人再也不愿意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了。他们沾染了太多享乐主义的毛病，这些毛病首先腐蚀了教皇，由此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奢侈浪费运动，继而引发了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追慕，这一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对于物质的享受又促使欧洲人对外扩张，于是有了后来的大航海运动。

公元1095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是穆斯林（塞尔柱突厥人的鲁姆苏丹国）已经占据了小亚细亚地区，将东罗马压缩成了一个迷你小国，同时也阻断了基督徒去往耶路撒冷朝圣。而间接原因，则是因为欧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经得起对外战争的阶段，随着政治的整合，大大小小的领主们也渴望用外部的一场战争来释放掉内部的战争冲动。

十字军运动从西欧发端，目标是夺取圣城耶路撒冷，他们曾经成功地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地区建立了几个小国家，但在接下来近200年，基督徒和穆斯林对这些地区展开了争夺，期间一共发生了9次十字军东征，直到公元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将最后一个据点阿卡输给了穆斯林。西方虽然在东方经营了近200年，却什么也没有剩下。

但这些对外战争却彻底改变了西欧的社会。除上面提到的使欧洲人打开了视野、变得更加奢侈、放弃了虔诚之外，在社会层面上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随着人们流动性的增加，许多人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这促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于是，在西欧出现了许多贸易市场，最著名的是位于现代法国的香槟集市。[129]全欧洲流动性商人一年一度聚集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为了管理这些商人，显然不能再像以前管理农民一样，以土地为基础进行管理，必须以商品为目标进行管理，这就产生了商业税，并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形成。

其次，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也发展了起来。城市的发展除了得益于商业，还是原来的领主的财富欲望使然。这些领主时常需要军费去中东冒险，他们把城市管理权作价卖给了商人阶层，使得许多城市获得了独立性。城市为了更加稳固权力，也会采取进一步的联盟措施，组建了诸如莱茵同盟、施瓦本联盟、汉萨同盟等一系列的商业同盟，它们在商业上的话语权甚至超过了领主、国王或者皇帝，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夺权

打下了基础。[130]

再次，除了城市慢慢地游离于封建领主，教士们也慢慢游离于教皇之外了。在耶路撒冷时，教士们不仅是教士，也是武士，他们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带有武装性质的教士团体，比如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以及北方的条顿骑士团等。之后在欧洲也有不带武装性质的方济各、多明我等教士团体产生。这些团体虽然表面上服从于教皇，但经常脱离教皇控制，使得教皇的权威也不再是天经地义了。[131]

最后，由于长途旅行的需要，金融也发展了起来。首先是圣殿骑士团等教团发展了金融产业，由于从耶路撒冷到欧洲的路线过于危险，人们可以找到圣殿骑士团，在耶路撒冷将钱交给他们，空身回到欧洲，在欧洲的城市里提取现钱。这就成了一种汇兑方式，并由此发展出了金融产业。除了教团，商人们也需要大规模的资金转移，这就促进了更加正规的银行的发展。

这些发展都导致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出现。虽然在中国的宋元时期，西欧依然是以封建制为主，但这些新兴事物的萌芽可以被视为一种缓慢的苏醒，让西欧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沉沦之后，正在积攒着新的力量。

可以说，虽然在这个时期，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依然是世界的主导，但欧洲所发生的变化已经预示着它们未来的强势崛起，只是这样的整合过程还需要数百年的积累。

当欧洲人正在逐渐苏醒时，一个外部力量的冲击突然加速了这个过程，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将世界的窗口向着他们打开了，这个外部力量就是蒙古人。

注释

[1]关于这场战争的描述详见前文。

[2]《通典》之后，又有宋元时期的马端临编撰了著名的《文献通考》。

[3]参见杜环《经行记》残稿。

[4]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楚河。——编者注

[5]现代人将除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称为马格里布，一说为摩邻国的音译。

[6]当时的凯鲁万还是森林密布，如今那里已经没有森林了。

[7]参考本书作者的《穿越非洲两百年》第二章。

[8]根据《通典》中所引《经行记》片段整理。

[9]流求国在今天的位置存在争议，一说即今天的台湾岛，一说为今天的琉球群岛，一说为泛指台湾岛、琉球群岛等一众岛屿。——编者注

[10]参考《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

[11]见《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七·南蛮，赤土国东面是波罗剌国，西面是婆罗娑国，南面是诃罗旦国，北面是大海。

[12]见冯承钧的分析，《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五章。

[13]根据《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七·南蛮，南方进贡的国家有林邑、赤土、真腊、婆利、丹丹、盘盘等国。此外东海中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靺鞨、流求、倭国等前来进贡。

[14]参考《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二·虞世基、裴蕴、裴矩。

[15]参考《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西域。

[16]《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记载了唐朝宰相贾耽总结的这七条道。《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二·虞世基、裴蕴、裴矩则记载了三条子通道。

[17]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

[18]参考《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二·虞世基、裴蕴、裴矩。

[19]缅人和泰人之所以能够取代原来的骠人和高棉人，成为缅甸和泰国的主宰，与南诏关系密切，见下文。

[20]参见《蛮书》卷三。

[21]白崖城遗址在最近才被发现，位于云南省弥渡县红崖。

[22]参见两唐书的“南诏传”部分。

[23]在大理太和城遗址。

[24]参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39—168页。

[25]参考《蛮书》卷十。

[26]参见本书作者的《三千佛塔烟云下》。

[27]参考《蛮书》卷十。

[28]参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69—190页。

[29]参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91—231页。

[30]参考《琉璃宫史》，以及《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232—261页。

[31]对于佛塔建设年代的叙述，可参见《三千佛塔烟云下》。

[32]参见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二部。

[33]参考《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五·南北纷争纪。

[34]参考《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五·吴纪。

[35]参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36]参考《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一·丁纪、黎纪。

[37]参考《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二·李纪。

[38]参考《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五·陈纪。亦可参看本书作者的《三千佛塔烟云下》。

[39]比如元代、明代初期。

[40]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261—322页。

[41]根据两唐书和《文献通考》。

[42]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39—168页，并见《蛮书》第十卷。

[43]夏连特拉王朝见下文。

[44]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69—190页。

[45]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建筑是巴肯山上的巴肯寺。

[46]见《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中国一直将吴哥称为真腊，表明了其继承关系。

[47]参见本书作者的《三千佛塔烟云下》第九章。

[48]景线即清盛（Chiang Saen）的古代译音。根据泰族传说，泰人最初在景线建立城市所用的土地，是从一对高棉老夫妇手中买来的。

[49]参见本书作者的《三千佛塔烟云下》第十四章。

[50]法显在东南亚的停留见本书的第二部。

[51]参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52]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69—190页。

[53]见《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之五·属隋唐纪。夏连特拉被称为阇婆，诸岛被称为昆仑。

[54]参考《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第169—190页。

[55]参考《宋史》卷三百零九·列传第六十八。

[56]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

[57]参考《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

[58]见两唐书、《宋史》相关传记，外国文献参考《草原帝国》。

[59]《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列传第四十一称之为昆仑舶。

[60]参见《资治通鉴》则天光宅元年。

[61]《唐会要》卷一百记载有外国人访问福建，但这时已经是唐末。

[62]《梦粱录》卷十二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

[63]参考《梦粱录》《宋会要》等书。

[64]见本书上一部。

[65]引自《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部二。

[66]参考《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部二引《吴时外国传》。

[67]参考《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舟部四引《南州异物志》。

[68]参考李肇《国史补》卷下。

[69]参考《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懿宗。

[70]14世纪摩洛哥学者、旅行家。——编者注

[71]见第十二章。

[72]参考《伊本·白图泰游记》。

[73]《中西交通史》第二编第八章第四节，有一张由叶德禄编写的表格，记载了40多个胡人的事例，他们有的选自小说，有的选自史料，可以作为当时胡人数量众多的证据。

[74]李白诗"风送酒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就是指的这件事。

[75]《太平广记》记载了大量的故事。

[76]参考《朝野佥载》。

[77]最著名的是乐工康昆仑，见《乐府杂录》。

[78]参考《唐律疏议》卷六。

[79]参考《萍洲可谈》卷二。

[80]参考《萍洲可谈》卷二和《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

[81]《全唐文》第八部·卷七百六十七引用了陈黯《华心》一文，记载了一位叫李彦升的大食国人中了进士。

[82]参考《真腊风土记》，见下文。

[83]参见《诸蕃志》各国传。

[84]如盐铁和流通领域等，宋代还有茶、香、矾等多重领域，见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85]《唐六典》卷二十二·少府军器监记载了一个叫互市监的机构，主官官职是从六品下，就是市舶司的前身。《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列传第三十七记载周庆立曾任“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唐会要》卷六十二称周庆立担任市舶使的年份为开元二年。

[86]参考《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87]参考《文献通考》卷六十二·职官考十六。《宋史》记为元祐初。

[88]本段可参见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第十三章。

[89]《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

[90]唐代记载不详，但情况应与宋代类似。

[91]参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

[92]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宋高宗说这话时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

[93]本部分内容参考了《中西交通史》第二编第四章第二节。

[94]从明代史料《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的记载中可见，宋代的石刻上仍有关于祈风的内容。

[95]赵汝适本人的传世资料并不多，但他的墓志已经出土，其任职年代可从墓志中查到。

[96]最远的一个国家叫昆仑层期国，据推测大约位于今天的马达加斯加或桑给巴尔。

[97]本表参考《诸蕃志》和《岭外代答》。

[98]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都参与了出版物禁运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书作者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99]这些书籍大都记载在《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中。此外，他们还需要宋代编纂的大型类书，比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

[100]参考《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

[101]《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都提到过此二人，卷三百三十一中将“黄真”记作“黄谨”。

[102]参考《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

[103]参考《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

[104]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中提到了杭州商人徐戩卖给高丽人《夹注华严经》雕版的罪状。

[105]参考《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三。

[106]参考《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

[107]美国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在《丝绸之路新史》中得出以上结论。

[108]参考了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史地丛考》第四章，作者根据《册府元龟》整理了唐朝的进贡情况。其中“騕”指驴或骡，“碧颇黎”指绿色的玻璃。

[109]德国汉学家罗德里希·普塔克在《海上丝绸之路》附录一中做出上述总结。下文中对海洋特产与热带特产的总结也参考了本资料。

[110]参考［英］彼得·弗兰科潘著，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111]参考［美］芮乐伟·韩森著《丝绸之路新史》结论部分。

[112]参考《酉阳杂俎》。

[113]参考《苏莱曼东游记》，约公元851年。

[114]参考《中国伊朗编》。

[115]参考胡峤《陷虏记》，见《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第二。

[116]参考洪皓《松漠纪闻》。

[117]参考《隋书》卷十四·志第九·音乐中。

[118]隋文帝置七部乐，除了上面提到的六部，还有清商，也就是中国本地曲。唐代设立十部乐，除了上面提到的八部还有清商和宴乐。见《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一。

[119]《琵琶行》又名《琵琶引》，诗前小序中提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

[120]《夷坚志补》卷二十一·鬼国母中，主人公杨二郎家财千万。《夷坚志》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中，主人公杨客的家财达到了二万万。

[121]参考《夷坚志》夷坚支丁·卷三·海山异竹。

[122]参考《夷坚志补》卷二十一·猩猩八郎。

[123]参考《夷坚志补》卷二十一·鬼国母。

[124]参考《夷坚志》夷坚乙志·卷四·赵士藻。

[125]参考《夷坚志》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

[126]参考《夷坚三志》己卷·第二·余观音。

[127]参考《夷坚志》夷坚支乙·卷一·王彦太家。

[128]参考《夷坚三志》己卷·第六·王元懋巨恶。

[129]参考［美］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9—241页。

[130]参考《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137—173页。

[131]同上，第242—303页。

第四部 帝国时代

第十一章 帝国的使者们

马可·波罗的世界

公元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蒙元中统元年），蒙古还没有灭亡南宋时，两个威尼斯居民尼古拉·波罗和马窦·波罗（Nicolas Polo & Matteo Polo）开始了一趟意想不到的神奇之旅。[1]

他们首先从威尼斯来到了曾经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不过，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并不在东罗马手中，而是在一个叫作君士坦丁堡法兰克帝国[2]的政权手中。公元1095年，从西欧兴起了一系列的所谓十字军东征行动，东征的目的地是位于亚洲的耶路撒冷。

要从欧洲去往耶路撒冷，一般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经过君士坦丁堡，穿越东欧、现代土耳其、叙利亚的陆路；另一条是从威尼斯等意大利港口上船，穿越地中海的海路。

在九次东征中，每一次十字军都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中[3]，他们都走的陆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于兵力充足，采取了海陆并进的策略[4]。到了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第四次十字军

东征则完全采取了海路。

这一次东征中，既然要走海路，就必须要得到威尼斯人的配合，因为其他西欧国家大都没有足够的船只运送兵力，只有作为海洋帝国的威尼斯才有这种能力。但作为资本主义的老手，威尼斯并不愿意为了所谓信仰去做没有利益的事情。于是双方陷入了僵局，十字军付不起钱，威尼斯不愿意放弃利润。

最后，解开僵局的方法是，威尼斯劝说十字军，首先帮助威尼斯攻打同属于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用自己的武力劳动当作运输费用。等威尼斯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再帮助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5]。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虽然是基督教国家，却是威尼斯的竞争者，此刻恰好处于王位争夺之中，一位潜在继承人求助于威尼斯，给了它干预东罗马政治的借口。

就这样，十字军于公元1203年和1204年两次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原本将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只好逃到了小亚细亚[6]。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法兰克人（即西欧人）的王国。由于获得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巨型城市，十字军也没有再继续进军耶路撒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在一片乱糟糟的局面下落幕了。

由于威尼斯主导了海洋，并协助法兰克人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他们也就垄断了君士坦丁堡的海上贸易。波罗兄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威尼斯贩卖商品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国王叫作博杜安（Baudoin）。

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波罗兄弟决定继续前行，他们北上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了黑海，再穿越黑海，来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苏达克（Sudak）[7]。

需要说明的是，在他们离开后的第二年，君士坦丁堡就被卷土重来的东罗马帝国攻克了，存在了50多年的法兰克王国也就此灭亡。

我们将君士坦丁堡的易手和法兰克王国灭亡的谈论搁置，现在来谈谈更北方的情况。公元2014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了克里米亚半岛掀起了一场国际风波，以俄罗斯强行侵占克里米亚为结局。但在800年前，这里既不属于俄罗斯，也不属于乌克兰，而是属于新的征服者蒙古人，西方又称为鞑靼人。鞑靼人控制克里米亚半岛达数百年之久，直到沙皇俄国时期，这里的主要居民仍然是鞑靼人。到了苏俄时期，民族成分才有了新的变化，并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争执的焦点。

波罗兄弟到达克里米亚时，鞑靼人的统治中心并不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而是在更北方。他们从苏达克北上，骑行多日，到达了金帐汗国的鞑靼君主别尔哥汗住处。[8]

金帐汗国的开国君主是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之后传给了术赤的长子拔都汗，拔都汗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短暂占据了汗位，最后，拔都汗的弟弟别尔哥汗夺取了汗位，政权才再次稳定了下来。

别尔哥汗的牙帐[9]（即宫帐或宫殿，是游牧民族君主所居之宫帐。蒙古人称斡耳朵、斡鲁朵）有两个，最早的牙帐在不里阿耳（位于伏尔加河中上游），由于不里阿耳太靠北，于是又在撒莱（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新建了一个新的牙帐。

波罗兄弟两人在金帐汗国居住了一年后，就想返回欧洲。但当时，别尔哥汗的金帐汗国正在与旭烈兀汗的波斯汗国（现在伊朗境内）发生内战[10]。旭烈兀属于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一系，是拖雷的儿子、大汗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他进行的第三次蒙古西征攻克了波斯、伊拉克等地区，灭亡了阿拉伯帝国的残余，处死了最后一个哈里发，建立了波斯汗国。但由于蒙古人的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在各个汗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金帐汗国与波斯汗国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11]。

战争以别尔哥汗战败为结局。由于战争的缘故，夹在两大势力之间

的黑海和克里米亚已经不再安全，兄弟二人不能按照原路返回，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他们从不里阿耳出发，先到了一个叫作乌迦克（Oukak）的城市，这里靠近伏尔加河，是别尔哥汗国土的尽头。渡过伏尔加河后，他们在沙漠中行走了17天，没有城市村庄，只有帐篷，之后就到达了中亚的名城布哈拉（Bukhara）[12]。

布哈拉此时有一个蒙古人的小君主八喇，此人是成吉思汗的曾曾孙子，从世系上属于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蒙古人最后一个大汗（即获得共同承认的共主）忽必烈任命他担任布哈拉的小君主，这个小君主是听命于大汗的。

与此同时，旭烈兀建立的波斯汗国与忽必烈大汗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都属于拖雷系。当波罗兄弟在布哈拉居住了三年之后，恰好遇到旭烈兀[13]派往大汗宫廷的使臣，使臣见到两个西方人，感到很惊讶，决定将他们带到忽必烈大汗的驻地。

于是，波罗兄弟在阴差阳错中继续远离欧洲。他们在使节的引领下，先向北行，再向东北方骑行，整整一年后，才到达大汗忽必烈所在的元上都。

在忽必烈之前的诸位大汗主要的驻扎地在现在蒙古国境内的哈拉和林。由于忽必烈在登位大汗之前负责的是中原片区，使他对于中原充满了感情，就在中原北方的草原地带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元上都[14]。元上都的遗址目前在内蒙古境内，在一处叫作金莲川的河谷地带，两面是不高的山丘，中间水草丰美，既靠近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又仍然属于草原地带。从元上都南下，一天的骑程，就可以到达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水岭——野狐岭。野狐岭位于现在的张家口市和张北县之间，站在岭上向北望，是一片茫茫的草原景色，向南望，却是不高的山峦，山峦外就是整齐的田地。

波罗兄弟前往元上都，按照蒙古人的行程，很可能是从中亚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再经过新疆北部进入蒙古草原，穿越蒙古后，再南下到达元上都，这就绕过了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的茫茫沙漠，也是游牧民族最常使用的一条道路。

与中原人不同，新兴的蒙古人是一个好奇的民族。忽必烈大汗听说来了远道的外国人，立刻接待了波罗兄弟。他向兄弟俩详细打听了西欧的情况，但仍然感到不满意，于是命令波罗兄弟担任蒙古人的使者出使欧洲。在波罗时代，欧洲缺乏一个有权威的共主，对出生于意大利的人来说，只有教皇还有一些共主的性质，于是，出使的对象就定为教皇[15]。

既然是使节，必然要由大汗亲自写信给教皇，这封信是什么样的呢？按照波罗兄弟的说法，这封信的内容是：第一，请教皇派100个人来帮助蒙古人，这些人要通晓教义，并熟知多种语言；第二，如果这些人能够证明基督教与其他教相比是最优的，那么大汗可以率领臣民改信基督教，甚至去耶路撒冷朝圣。

不幸的是，这封信已经找不到了，这种说法成了孤证，我们只能权且相信。但幸运的是，人们的确找到了另一封蒙古大汗写给教皇的信，时间甚至比波罗兄弟更早，内容有可能推翻波罗兄弟的说法，让蒙古人不再是一副卑躬屈膝的形象。关于更早的信，在后面还会提到，不妨在这里看成是一个伏笔。[16]

与波罗兄弟同行的还有一位鞑靼男爵豁哈塔勒（Cogatal）。为了便于他们行路，大汗赐给了三个人金牌，可以一路通关，使用驿站的马匹。但出发没多久，男爵因为生病不能继续前行，于是波罗兄弟二人只好离开了他，独自上路了。

他们利用三年时光，才穿越了茫茫的欧亚草原。三年后，他们到达亚美尼亚的拉亚斯（Layas）。这里所谓的亚美尼亚并不是现代的国家

亚美尼亚，而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方。拉亚斯是海边的一个小城，在现代港口城市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附近。伊斯肯德伦是伊斯兰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叫法，在历史上，有很多个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它在伊斯兰教内部的称呼也是伊斯肯德伦。不过，波罗兄弟去的伊斯肯德伦并不位于埃及，而是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的亚历山大湾附近。

公元1269年（咸淳五年）4月，兄弟俩从拉亚斯出发，抵达位于巴勒斯坦的著名海港阿卡（Acre）[17]。阿卡是基督教十字军在亚洲最坚固的据点之一，也是基督教驻埃及的大主教的驻地。当时的埃及已经是穆斯林的天下，但在基督教传统上，埃及就是一个巨大的主教区，于是，教皇只好掩耳盗铃般让埃及大主教在阿卡驻跸。

波罗兄弟到达时，恰逢教皇的空当期。教皇克莱门特四世（Clement Ⅳ）死了，由于教皇是靠选举产生的，新的教皇还没来得及选出来。兄弟二人见到了埃及大主教帝博（Thibaud de Plaisance），将他们出使的任务说明，主教请他们等到教廷选举结束之后，新教皇才能答复蒙古人的请求。

兄弟二人于是决定先回威尼斯等待，他们经过希腊海岛奈格勒彭（Negrepont）回到了故乡，见到了尼古拉15岁的儿子马可。

他们在威尼斯等待了两年。由于教皇迟迟选不出来，兄弟二人只好带着马可回到阿卡，再到耶路撒冷朝圣。朝圣完毕，他们担心耽误时间太长，只好让帝博写了个证明，表明兄弟两个已经到了欧洲，只是由于教皇没有选出来，无法完成任务。拿到了信，他们就想回鞑靼土地上去。

然而，就在他们刚出发时，事情又出现了变化。他们刚到拉亚斯，突然听说教皇已经选举出来了。新教皇不是别人，恰好是埃及大主教帝博。成了教皇后，他号称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X）。[18]于是波罗一

家又返回阿卡，请格里高利十世重新写了信。教皇并没有答应蒙古人的请求派遣上百人的传教团，只派了另外两位教士与波罗一家一起出发前往东方，查探情况。

波罗一家和两位教士刚刚抵达拉亚斯，又出现了状况。此刻，蒙古人的波斯汗国（旭烈兀汗国）一直打到了叙利亚境内，但接下来在向埃及挺进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问题。他们的敌人是在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

马木留克王朝又称奴隶王朝。在此前，埃及有一个由萨拉丁（Saladin，AnNasir Salah ad-Din Yusuf ibn Ayyub）建立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19]，萨拉丁是基督教的大敌，也是十字军的最主要对手。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萨拉丁脱颖而出，将十字军赶出了耶路撒冷，并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成功地守住了耶路撒冷。[20]但阿尤布王朝末期，权力却落入了另一个军事集团——马木留克集团手中。他们本来是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伊斯兰有蓄养奴隶的传统，这些奴隶大都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其他蛮族，他们在埃及被驯养成战士，掌握了军队，并形成了相对封闭、靠新奴隶供应新鲜血液的特殊机制，最终，他们中的佼佼者登上了王位，形成了马木留克王朝。[21]

在当时，马木留克苏丹叫比巴斯（Bibars），外号奔多达里（Bondokdari）。他率军入侵了亚美尼亚，与蒙古人对峙。两位教士不敢前行，回到圣殿骑士团护卫的地区去了。波罗一家不想回去，就只好独自上路了。

从马可后来的记述中，可以还原出波罗一行的路线，从其中也可以看出元朝前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路线。

从小亚美尼亚的拉亚斯出发后，波罗一行首先到达土库曼[22]的科尼亚（Konya）、锡瓦斯（Sivas）。这两个城市至今仍然属于土耳其。之后，他们再去往大亚美尼亚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这里是土耳

其东北方的重要城市，在重重群山包围之中。

从埃尔祖鲁姆继续向东，就到了格鲁吉亚境内，也就是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山以南、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但波罗一行并没有从黑海和里海之间北上，而是沿着现在的土耳其和伊朗边界，进入了大不里士（Tabriz）地区——这里属于现代的伊朗。

他们还有可能去过位于现代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但由于摩苏尔并不在线路上，也有可能只是听说，不一定去过。另外，马可还记载了巴格达和巴士拉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听说的。[23]

公元1258年（宝祐六年），旭烈兀攻克了巴格达。据当时的传说（也是马可的记载），当巴格达攻陷后，哈里发被带到了旭烈兀的面前，他还有整整一座塔的黄金珠宝，旭烈兀问他：你为什么不把黄金散给士兵，好让他们保护你？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些宝物，我就把你和它们关在一起，你就吃它们维生吧。哈里发被关在塔里四天后饿死，这就是伟大的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的命运。阿拔斯王朝从唐代崛起，建立了璀璨的文化，统治着亚欧非广阔的土地，直到蒙古人崛起后才灭亡。

波罗一行进入了波斯的地界，从大不里士向南，经过德黑兰附近的萨巴（Saba）城，继续向南，经过亚兹德（Yazd）、克尔曼（Kerman），穿越沙漠到达小城忽必南（Cobinam），继续穿越沙漠到达呼罗珊地区，也就是伊朗的东北方。

此外，波罗叙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阿拉穆特城堡[24]。在如今伊朗北部靠近里海厄尔布尔士山上，有一个叫作阿拉穆特城堡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伊斯兰教刺客派（也叫阿萨辛派，Assassins）的大本营。刺客派可以看作什叶派的一个小分支，其最初的首领叫作哈桑·萨巴赫（Hasan bn Sabbah），他的教派以一种激进的策略对付他的对手：将他们刺杀。在十字军时代，刺客派发起了多起刺杀，暗杀对象十分广泛，从而使得阿萨辛之名广为传播。[25]

刺客派存在了两百多年，最后在旭烈兀的西征中，被列为主要对手之一，将其歼灭。[26]马可时期，刺客派已经不存在了，但关于它的传说仍然如缕不绝。最著名的传说之一莫过于刺客派豢养了一批年轻人，将他们麻醉之后送入一个如同天堂的花园，让他们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又将他们带出来，只有完成了刺杀任务才准他们返回“天堂”，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大批年轻人成为刺客[27]。

到达呼罗珊地区，这是波斯设在丝绸之路上的主体和中转站。离开之后，波罗一行进入了今天的阿富汗地区。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中转站，由于被成吉思汗屠过城[28]，波罗到来时巴尔赫已经残破不全。

波罗一行从巴尔赫继续向东，到了塔里寒（Taloqan），位于现代阿富汗的昆都士以东，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盐，也就是岩盐。他们继续向东，进入了阿富汗东北的巴达赫尚地区。

到这时，人们就可以将波罗之路与当年的玄奘回程相提并论了。波罗一行经过瓦罕、帕米尔，进入了现在属于新疆的喀什噶尔地区，然后再经过叶尔羌、和田、佩恩（Pein，可能是玄奘的睹货逻故国）、车尔臣（且末）、罗布城、沙州（唐古特州，敦煌）、肃州、甘州，进入了河西走廊。

不过，他们这次并没有顺着河西走廊去往中原，而是北上亦集乃，穿越大漠前往蒙古的哈拉和林，也是整个大蒙古帝国的首都，之后，再经过北方草原到达元上都，觐见大汗。[29]

忽必烈专门派人到四十程之外迎接他们，并大开宴席，庆祝他们的归来。年少的马可由于学会了鞑靼话，深受大汗的喜爱。

之后的年份里，大汗数次派遣马可到全国出使。马可获得了大汗的欢心，于是，一直在蒙古人的宫廷中任职了17年。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程，由于他待的时间太久，并且经历了

多次派遣任务，很难追溯。但经过猜测，他曾经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山西、陕西、四川、云南一线，并有可能到过缅甸、越南。另外，他在西北的甘肃也曾停留过[30]。同时，东部各个省份也都涉足。马可·波罗也听说了蒙古人远征日本的情况[31]。

马可的记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被称为“汗八里”的元大都，以及中国南方的繁荣。

关于汗八里城，除描写它的广大之外，对于大汗的宫殿，马可印象深刻，称这座大殿可以容纳6000人，房屋之多可谓奇观。在皇宫之外，还有一个山丘，上面种植了树木，四季常青，并盖上了宫殿。这个山丘，就是后来的北海白塔所在。

除宫殿之外，汗八里城内的老百姓也很多。一个特殊的例子是，由于人口众多，对于娼妓的需求旺盛，整个汗八里的娼妓数目就已是两万有余。

关于南方的富裕，马可·波罗也着墨甚多。比如，南宋首都杭州[32]被他称为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马可·波罗以夸张的手法，称这座城市有12种大的职业，每一种职业有1.2万户，每户至少有10人。由于在水上，桥也有1.2万座，每座需要10人守护。城内有大街160条，每街有房屋1万，一共160万房屋，还夹杂着壮丽的宫室，甚至包括一所景教的教堂。

需要指出的是，马可到达中国时可能是公元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这时南宋还没有灭亡，直到四年后南宋才正式消失。所以马可在中国时，蒙古人正忙着把南方地区纳入到帝国之中，马可也就看到了蒙古人统治早期的南方情况。

除了杭州，南方最富裕的地区还有扬州和福州。扬州是大运河的交通要道，而福州，特别是旁边的刺桐城[33]，则是海外贸易的通道。

对西方来说，大汗之国最令人感兴趣的事物，一个是驿站，另一个

是纸币。这两者对当时的西方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当西方的人们读到一张纸竟然可以当钱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定会对书中的记载提出质疑，但这却是事实。虽然纸币给东方社会带来的灾难也是有的，它不断地制造通货膨胀，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34]马可由于来得早，纸币还在社会中发挥效力，事实上，到了忽必烈晚期，纸币已经贬值到让人生厌了。

马可在忽必烈朝待了17年，才终于获得了和父亲、叔叔回国的机会。

他们的机会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一年，波斯汗国君主阿鲁浑的妃子布鲁罕（Bolgana）死了，死前说只有自己部族的人才能成为阿鲁浑的新妃子。于是波斯汗王派人前往大汗处求婚，请求赐予一个妃子[35]。

大汗派遣布鲁罕同族的女子17岁的阔阔真（Cogatra）去当阿鲁浑的妃子。马可正好从印度回来，大汗觉得他是很好的护花使者人选，于是三位波罗就有了回国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事件，看一下“一带”和“一路”的对比。对蒙古人来说，作为马上民族，显然走陆路更符合蒙古人的性格。但是，在护送女人这件事情上，他们却选择了海路。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路对男人来说还可以，对女人来说就太辛苦了。当蒙古人占领南宋之后，他们发现从海路出发的行程反而更加轻松一些。于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海洋，开始了新的扩张。

但这些扩张对军事行动来说都不算成功，不管是进攻日本，还是出征占婆和爪哇，都以失败而告终，反而是以商业和外交为目的的远洋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6]

以马可的护花团队为例。护花团队乘坐13艘船，每艘4桅，可张12帆，带着两年的粮食，从刺桐城登船出发。他们花了3个月时间，经过越南南部的占婆国，到达爪哇岛。

之后又经过一系列海岛，到达锡兰岛（斯里兰卡），再绕行印度次大陆。之后，经过亚丁、阿曼，最后在霍尔木兹[37]登陆。舰队在印度洋上一共航行了18个月，到达波斯。登陆后，他们又经过卡玛迪（Camadi）、克尔曼，到达波斯汗国的王庭。

不过，根据马可的记载，如果不算水手只算随行人员，入海时一共有600人，到达时只剩8人。由于是孤证，我们姑且对这样的死亡率存疑。

他们到达时，阿鲁浑已经死了，于是阔阔真嫁给了他的儿子合赞汗。

到这时，波罗的使命也完成了，到了离开蒙古人的时候了。阔阔真送给波罗一家四面金牌，即两面鹰牌、一面虎牌、一面净面牌，有了金牌，可以给他们提供沿途的供应。

他们骑马到了土耳其境内的特拉布宗（Trabzon），黑海东南角的一座城市，至今仍然是土耳其黑海内的主要港口。波罗从特拉布宗登船，就可以经过黑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经过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最后到达威尼斯。这时是公元1295年（元贞元年）[38]。

马可还记载了非洲的岛屿，比如马达加斯加、桑给巴尔等，并记载了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但这些地方来自他的道听途说，而非真的去过。

马可·波罗在历史上一直受到质疑，但是人们还是承认，他的记载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事实。主要原因是：这本书记载得实在太详细了，许多内容如果没有亲自去过，很难写得出来。加之蒙古人有在全世界选择人才的习惯，波罗一家在蒙古人处受到重用，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事实上，从西欧的法国人，到北欧的俄罗斯人，再到中亚的伊斯兰教徒，蒙古人总是将一切他们可能得到的人才都网罗起来，为己所用。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波罗父子三人的奇遇。

不过，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马可夸大了他们一家三人在蒙古人中的作用——他们很可能只是服务于蒙古人的数千个外国人之一罢了。

此外，波罗一家的经历之所以显得可信，还因为他们的经历并非孤例，事实上，还有许多同时代的欧洲人的观察记述也都流传到了现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蒙元时期的一带一路图景。

前往蒙古的修道士

在叙述马可·波罗的父亲第一次回欧洲时，本书曾经提到，他们带回的蒙古大汗写的书信并没有留存下来，反而是更早的书信留到了今天。那么，比波罗一家更早到达蒙古的欧洲人又是谁呢？

这个人叫作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两位波罗第一次的行程是公元1260年（景定元年）开始的，而柏朗嘉宾却是公元1245年（淳祐五年）启程。

在公元1238年（嘉熙二年）时，蒙古人在第二次西征中打败了俄罗斯人，建立了金帐汗国，甚至蹂躏了大半个东欧，并曾进攻波兰和波西米亚。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4月，蒙古人扫荡了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拔都甚至率军进入了匈牙利。[39]

对西欧来说，蒙古人的到来是突然而又令人担忧的，特别是蒙古人在俄罗斯草原上烧杀掠夺的消息传来，更是增加了恐怖的气氛。但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Ⅸ）决定发动一次圣战来保卫西欧。但就在这时，教皇死了，圣战没有发动起来。幸运的是，蒙古人的窝阔台大汗也死了，为了选举新的大汗，蒙古军队只好撤了回去，这给了西欧喘息的时间。

两年后上台的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Ⅳ）[40]决定采取新的策

略，他一方面继续准备圣战，另一方面又试图派人去了解蒙古人，甚至联合蒙古人。

在蒙古人之前，欧洲一直将伊斯兰教当作最大的敌人，甚至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约翰长老，可以帮助欧洲人打败异教徒。这个约翰长老在哪里呢？曾经有人认为他在非洲之角上的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自古以来一直是信奉基督教的[41]。但蒙古人兴起之后，又有人认为约翰长老就是蒙古人。

教皇需要使者去联系蒙古人，探明他们的信仰，看有没有联合价值。他选择了传教士柏朗嘉宾前往蒙古。[42]

公元1245年（淳祐五年）复活节（4月16日），柏朗嘉宾从法国的里昂出发前往蒙古。从遥远的西欧怎样才能到达蒙古呢？好在蒙古人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在第二次西征中，他们曾经利用俄罗斯草原，从欧洲北部进入欧洲，柏朗嘉宾就可以反过来行进。他的路线是这样的：首先，经过波西米亚（现捷克）、波兰，到达当时俄罗斯人的首都基辅。在波兰境内时，他找了一位波兰的教友同行，一路上充当翻译。[43]

基辅现在是乌克兰首都，在当时却是整个俄罗斯的中心，同时，这里也遭受过蒙古人的残酷围城[44]。到达基辅前，柏朗嘉宾刚生过一场大病，这导致他们继续向前时，已经是公元1246年（淳祐六年）2月3日，也是圣母净礼节的第二天。

接下来柏朗嘉宾一行到达一个叫作卡诺夫（Canove）的村庄，这是蒙古人直辖的第一个地方。2月23日，他们到达了蒙古人的一个驿站，并第一次和蒙古人有了接触。双方的接触显得很滑稽，一群蒙古人张牙舞爪冲了过来，质问他们是谁，当听说是使节后，就收了些礼物，消失得无影无踪。

驿站长将柏朗嘉宾等人送往一个叫作阔连查的将领那儿，他管辖着6000名士兵，是金帐汗国主管西部的将领。阔连查又将他们送到汗国的

汗王拔都那儿——拔都是汗国的第二个汗王，也是术赤的儿子[45]。

为了到达拔都的营帐，他们穿越了四条大河，分别是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当时称为Iaec），于4月4日（圣周星期三）抵达拔都的营帐。拔都看了翻译过的教皇信件，决定将使者送往蒙古大汗的营帐，也就是哈拉和林的所在。

于是，柏朗嘉宾等人于4月8日复活节那天又出发了。在出发时，使者还生着病，面对着茫茫前途，不知未来是死是活。一路上他们只有水、盐和小米饭，所谓水还主要是雪水。所经过的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是尸骨遍地，可见发生过残酷的大屠杀[46]。

蒙古人之所以催着他们一天换好几次马拼命赶路，实际上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一年的8月，新的大汗要举行典礼，而作为远方来的使者，蒙古人希望他们能在登基时赶到现场，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

当时，蒙古人的第一代大汗铁木真（成吉思汗）和第二代大汗窝阔台都已经去世，窝阔台的妻子运作儿子贵由当上了第三代大汗。

6月中旬，他们到达皇帝（大汗）的第一个营帐（斡耳朵），这个营帐应该位于新大汗的大本营，即现在新疆西北部的伊犁一带。

之后，他们穿越了蒙古西部乃蛮人[47]的故地，于7月22日到达了贵由汗的主营地，不过他们待在距离哈拉和林半日程的失剌斡耳朵，据说是太后的营帐。

在这里，他们加入了狂欢的行列，大家每天穿的衣服颜色都不一样，第一天是紫红缎子，第二天是红绸缎，第三天是绣紫缎的蓝衣，第四天是华盖布服装。除衣服之外，就是拼命喝酒，蒙古人喝马奶酒，外国人喝啤酒，直到喝醉为止。

外国人的使节大概有4000多人，包括苏兹达尔的俄罗斯大公、数位

契丹和肃良合的大首领、格鲁吉亚国王的两个儿子、巴格达哈里发的使者、十多位其他伊斯兰苏丹等。当然也包括教皇的使节柏朗嘉宾。

由于东西方不同的记述风格，中国人的史籍对于周边民族的记述总是过于简略，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书籍了解事件，却很难看到详细的场景描写。多亏了柏朗嘉宾的记载，我们才在今天也能看到蒙古人选举大汗的场景。

登基日本来是8月15日，但由于下冰雹，日期改为8月24日[48]。柏朗嘉宾等人在15日已经被带到了哈拉和林。到了24日这一天，蒙古人成群结队聚在一起，面向南方跪拜祈祷，然后，再到大帐里，把贵由扶上宝座，对着他跪拜。

各地的使节们也被带上来，首席书记官镇海念着名字，让他们四次单膝跪拜。各种礼物多得无法数清，金银珠玉，各种珍贵皮毛，停放了500多辆马车。

在喝酒吃肉的同时，也不乏血腥。比如，与皇帝争夺权力的一位婶母（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女儿）就被判处死刑，完成了一次权力的交替。同时，苏兹达尔俄罗斯的一位大公也可能死于蒙古人下的毒，这样做是为了控制俄罗斯。

柏朗嘉宾的和平使命并没有完成，因为贵由汗正在准备下一次西征，而不是希望和平。教皇的使节们被要求详细叙述西方的情况。他们一直留到了11月份，皇帝才交给他们一封信，将他们打发走了。

于是，他们在大冬天里又穿越了整个欧亚草原，于第二年5月9日回到了拔都汗的营地。6月9日，他们已经抵达基辅。年底的11月，柏朗嘉宾等人回到了里昂。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帮助蒙古人完成了一次帝王登基仪式的装点[49]。

那么，蒙古人给教皇写的信里又说了什么呢？这封信的拉丁语译文被传抄了下来，到了近代，人们又发现了它的波斯文本。于是，蒙古大

汗给教皇的内容得以被现代人所了解。

贵由大汗并不认为教皇是和自己平等的，所谓信，实际上是一道圣旨。蒙古人信奉长生天，认为大汗的力量得自于天，于是那封信的开头是：长生天气力里，大民族全体的海内汗圣旨。

内容大致如下[50]：

首先，你借着我登基的机会来表示归顺，如果你真的想归顺，就不应该只派个使者前来，而是应该率领诸王一起来朝见，到时候我再宣旨接受。

其次，你老是说要我接受洗礼，改信基督，说“这是多好的事情”，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再次，你说我们杀害波兰人、摩拉维亚人、匈牙利人，问我：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我还是很不理解。他们敢于杀害我们的使臣，对我们不逊，这就是对不起长生天（因为我们蒙古人就代表了长生天）。所以，杀他们是来自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不是长生天的旨意，谁又能杀害他们？

你们一直说你们相信天主，你们是基督徒，蔑视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天主到底想加恩给谁？

真正的天主把整个大地上的生灵都交给了我们蒙古人支配，你如果真的信奉天主，就应该率领你的诸王，赶快来归顺。如果不这样，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如果违反天主的意思不肯归顺，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天主会知道的！

这封信怎么读，都是一封宣战书。这是因为贵由就要率领他的人马再次西征了。但贵由西征的首要目标不是欧洲——欧洲太远太弱小，暂时不入他的法眼。他首先要打的是他的叔伯兄弟、金帐汗国的拔都

[51]，因为拔都不听从他的指挥。

贵由汗为西征准备了两年，随后出兵。但当他走到位于现在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附近的横相乙儿时，却突然去世了。因为他的去世，蒙古内战得以推迟，西方也暂时安全了。

如今，三道海子附近最著名的，莫过于一座巨型的石堆大墓，曾经有人认为这座墓可能就是贵由汗的，但更进一步的考古将它定在了更早的史前草原时代。

但西方和蒙古人的交往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鲁布鲁克东游记

柏朗嘉宾去往哈拉和林拜见蒙古大汗贵由的同时，教皇还派出了一位叫作阿思凌的人去波斯地区的蒙古人营地，拜见那儿的蒙古军领袖[52]。

阿思凌不辱使命，到了位于大不里士的蒙古人营地，但接下来却并没有完成任务。他受尽侮辱回到了欧洲。与阿思凌同行的，还有一位叫作安德烈的修士。

他们虽然没有完成任务，却在东方接触了一个叫作列边阿答（Simeon Rabban Ata）的景教徒。列边阿答去过蒙古本土，据他所说，在蒙古本部已经有了基督教，也有部分蒙古人接受了基督教。这样的消息给西方提供了进一步幻想的依据，认为蒙古人的确就是帮助他们和穆斯林对抗的约翰长老。[53]

与此同时，公元1247年（淳祐七年），在欧洲又组织了一次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的首领是虔诚的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54]当圣路易来到塞浦路斯时，遇到了蒙古人的一个使团，这个使团据称是由波斯地区的蒙古人首领宴只吉带派来的。使团宣称蒙古人

将同西方一同解决穆斯林问题。

事后证明，这个使团并不是宴只吉带派出的。但被蒙蔽的圣路易却欢欣鼓舞，向蒙古派出了一个使团，首席使者就是曾经和阿思凌一起去过大不里士的安德烈修士。[55]

安德烈从安条克出发，先到达了在波斯的宴只吉带的营帐，再顺着里海南岸横穿波斯，进入中亚的奇姆肯特（Chimkent）和塔拉斯（Taraz）[56]，最后来到了如今新疆境内的叶密立[57]，这里是窝阔台系的大本营。

安德烈到来时，贵由汗已经去世了，摄政者是他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她接待了使团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法国国王派来的使团。

当时，恰好有几个西方国王在皇后的营帐，他们并不愿意臣服于蒙古人。皇后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展示法国的使团和礼物，告诉他们：看哪，法国国王都来称臣了，如果你们不称臣，我就派法国去打你们。

在皇后的软硬兼施之下，有几个国家臣服了。

利用完使者之后，皇后写了一封傲慢无礼的信让他们带回。事实上，这个使团的任务还是失败了。

安德烈使团的失败，并没有让圣路易失去信心，相反，由于了解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蒙古人的消息——甚至有人说，拔都的儿子、未来金帐汗国第三任大汗撒里答都改信了基督——圣路易决定再派一个使团，这一次，他派了一位叫作鲁布鲁克的人前往。

公元1253年（南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5月7日，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

鲁布鲁克去时的行程很像波罗兄弟的第一次旅程，即从君士坦丁堡坐船出发，穿越黑海到达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苏达克，再走陆路前往拔都

的儿子撒里答的营帐。当时拔都还没有死，撒里答又把使者送到了拔都的营帐。[58]贵由汗去世后，拔都参与并推选了他心仪的人选：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做大汗，金帐汗国与大汗之间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高峰。而贵由系（即窝阔台系）已经失势，许多窝阔台系的亲王贵戚都遭到了清洗。

一路上，鲁布鲁克都对蒙古人的风俗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从蒙古人的婚葬风俗，到马奶酒的做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59]而让他最感兴趣的是，他发现其实蒙古的地盘上确实有了不少基督徒的身影。

根据他的总结，基督徒包括如下两部分：

首先是景教徒。这些景教徒在唐代就已经很流行，西安甚至成了一个著名的景教中心。在蒙古人中，也有不少景教徒。比如，蒙古人的最大对手乃蛮人和克烈部都是信奉景教的[60]。成吉思汗有一个父执叫作王罕，曾经在早期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他的重要对手之一。王罕占据了哈拉和林所在的平原，后来这里成了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首都。王罕信奉的就是景教，由此，鲁布鲁克认定王罕家族就是东方约翰长老传说的来源[61]。

王罕虽然失败，但他弟弟的女儿嫁给了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生下了蒙哥、旭烈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等兄弟。也就是说，当今大汗的母亲就是一个景教徒。于是可以认为，东方约翰长老（王罕）灭亡后，他的正统性已经通过女儿传给了成吉思汗的拖雷一系，也就是掌权担任大汗的一系。

其次，则是蒙古人进攻俄罗斯、东欧时抓获的基督教俘虏。这些俘虏有的信东正教，有的信天主教，甚至也有从德国、法国等地来的人。这些人中出了一些能工巧匠，是蒙古人离不开的。

不过，蒙古人虽然熟悉基督教，身边也有不少景教徒，但他们并没有信奉基督教，只是把这些外来的宗教当作一种装点。在他们身边，还

有不少伊斯兰教徒，甚至来自中原地区的佛教徒、道教徒（鲁布鲁克称为偶像教徒）。蒙古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多宗教的氛围内，谁对他们有用，就宠爱谁。

公元1253年（宝祐元年）12月27日，在拔都派的人的护送下，鲁布鲁克来到了距离哈拉和林不远的蒙哥汗的营帐，几天后，他见到了大汗。

大汗的宫廷已经很时尚了。鲁布鲁克就记录了一棵由巴黎匠人威廉制作的巨大银树。这棵银树的根部是四只银狮子，各通有管道，可以喷出白色的马奶。树内有四根管子，通到它的顶端，向下弯曲，每根上还有金蛇，蛇尾缠绕着树身。这四根管子里，一根流出酒，另一根流出哈拉忽迷思，即澄清的马奶，另一根流出布勒，即一种用蜜做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米酒，叫作特拉辛纳。树下各有一个特制的银盆，接受每根管子流出的饮料。树上有枝条、叶子和果实。顶端这四根管子之间，有一个手拿喇叭的天使，而在树的下部，有一个穹隆，里面藏有一个人。有一根管子从树心通到天使。藏着的人通过管子吹响喇叭，宫殿外一个储存饮料的窖里的仆人就把饮料注入饮料管子里[62]。

关于中国区域内纸币的应用，鲁布鲁克的记录也要早于马可·波罗，他从一位工匠那儿听说，契丹地区[63]通行的一种钱币是绵纸，上面印着几行字。

由于教士比较关注宗教信仰，他就记录了不少关于此类的见闻。

在蒙哥汗的宫廷里，鲁布鲁克见到了一次所谓的大汗受洗。这次受洗是由景教徒完成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受洗是人一生只有一次的大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但对于蒙古人来讲，他们只不过是请景教徒跳一场大神，算是一种吉利。景教徒也将错就错，将受洗变成了一种随时都可以表演的喜庆活动。在那次景教徒为大汗受洗之后，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又分别去为大汗作法，表明了蒙古人三教通吃的开阔胸怀。

在哈拉和林，鲁布鲁克还参加了一次由三个教派参加的大辩论。但是，他发现，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中，除他怀着认真的态度去做了准备之外，其余的人，不管是景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佛教徒、道教徒，都不把辩论当回事，他们更注意的是辩论之后的大吃大喝。辩论开始后，既然鲁布鲁克这么认真，其余人就赶快认输，去参加宴请了。

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反映在蒙哥汗最后接见鲁布鲁克时的话语中。他表示：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的，我们也诚心信奉他。但是，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信仰途径[64]。

赐给基督教徒的是《圣经》，而赐给伊斯兰教徒的是《古兰经》，至于蒙古人，还是更愿意信奉他们的长生天。

在回信时，蒙哥再次催促西方的国王遵循老天爷的教导，教导他们要臣服于蒙古人，因为蒙古人是天选的。

鲁布鲁克的回程采取了与来时不同的线路，他到达拔都的营帐后，经由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陆路，翻越了高加索山，到达了波斯地界。

他的使命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记录，让我们知道，蒙古时期已经有大量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在宫廷中活动，即使是远在巴黎的能工巧匠，也来到了遥远的哈拉和林为大汗服务了。

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允许所有信仰同时存在，可以说，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这是信仰的黄金时代。蒙哥之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选择了不同的信仰，这个黄金时代就过去了。

一位国王出访蒙古纪

远方的人来到蒙古宫廷，这件事还可以从另一个人的经历中看出。这个人就是小亚美尼亚的国王海屯。

小亚美尼亚在地中海东北角，包括那里的海岸和山区，现在属于土耳其。

海屯的都城在西斯城（Sis），位于今土耳其西部大城市阿达纳（Adana）旁边的小城科赞（Kozan）。这里距离蒙古的本土非常遥远，几乎在亚洲的边缘，但就算这样，海屯还是必须听蒙古人的，因为蒙古人已经打到了他国家的旁边。

海屯前往大汗宫廷的时期是公元1254年（宝祐二年），在那里待到第二年，这恰好是鲁布鲁克拜访的下一年，表明西方去往蒙古的连续性。

早在贵由汗登基时（公元1246年），海屯为了表示尊敬，就派遣他的兄弟仙拍德（Sempad）前往祝贺，因此，仙拍德应该和柏朗嘉宾同时在蒙古出现过，也许他们还见过面。但海屯的兄弟回来不久，贵由汗就死了，接下来登基的是大汗蒙哥。这时，位于俄罗斯草原的金帐汗国拔都汗给海屯送来消息，请国王本人前往蒙哥大汗的宫廷去朝拜。[65]

于是，海屯这个对蒙古人来说已经位于天边的小国国王就开始了长途跋涉。

在小亚美尼亚的西边，是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鲁姆苏丹国，它曾经是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借口，但到这时依然存在。鲁姆苏丹国的人们对海屯帮助蒙古人耿耿于怀，为了避免突厥人趁他不在发动进攻，海屯只好偷偷地出发。

他们首先向西北前行，花了12天抵达现在位于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交界地带的城市卡斯（Kars），在那儿驻扎着一支蒙古人的军队，统帅是拜住那颜。海屯拜见拜住那颜将军之后继续前行。

他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著名关口打耳班（Derbend）通过，前往拔都的营地会见拔都，也包括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拔都之子撒里答。黑海和里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上，有一条东西向的高加索山脉，它也是亚洲和

欧洲的界山。这条山脉恰好截断了两海之间的通道，终年积雪，看上去高不可攀，但在打耳班却有一条通道通过。

到了北方，拔都对海屯非常友好，把他送往蒙哥汗的营地，也就是哈拉和林。

公元1254年5月13日，海屯离开拔都的营地，经过额尔齐斯河和新疆北部，进入蒙古西部，到达哈拉和林。9月13日，海屯见到了蒙哥大汗。海屯一行一共在哈拉和林停留了50天，之后蒙哥汗将他们遣返。回程出发日是10月1日。

海屯的回程和现在的交通路线有了很深的交集。如果现代人从蒙古出发，经过新疆前往土耳其，最便捷的道路是这样的：首先翻越阿尔泰山，从塔克什肯口岸进入中国新疆的青河县，再向西南方向，抵达乌鲁木齐。之后，沿着天山北麓进入伊犁河谷。到了现代，这里建设了通往伊宁的公路。接着可以沿伊犁河谷在赛里木湖附近进入哈萨克斯坦，经过阿拉木图、奇姆肯特，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从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直接进入土库曼斯坦的马雷[66]，从木鹿进入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再穿越里海南岸，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从德黑兰向西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直达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这就接近土耳其边界了[67]。

海屯所走的路几乎和这条现代道路完全重合。他经过的重要地点有横相乙儿[68]、别失八里[69]，之后进入经过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直达赛里木湖。当他们到达塔拉兹时还见到了旭烈兀，当时的旭烈兀还没有建立波斯汗国，依然是蒙古人的王子。

旭烈兀正在为西征做准备工作，海屯回国后不到一年，西征军集结完毕。公元1256年（蒙古蒙哥汗六年，南宋宝祐四年），旭烈兀围攻撒马尔罕。公元1258年，他灭亡了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70]。

放下旭烈兀不提，在离开蒙哥汗8个月后，海屯国王回到了小亚美

尼亚。由于回程时没有经过金帐汗国的土地，海屯还不忘立刻派出使团前往拔都汗的营地，向他汇报国王已经回来，见过大汗了，一切都很完美。

海屯到这时还将拔都汗视为自己的领主，但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后，另一个庞大的蒙古汗国旭烈兀汗国（波斯汗国）控制了西亚，之后，又与金帐汗国发生冲突。而亚美尼亚一带由于在高加索之南，也被划入了波斯汗国的势力范围。

作为一个国王，万里迢迢亲自赶去拜见大汗，说明蒙古人的威仪已经到了万里之外。如此遥远的人都来了，那么近在中国的人又怎样呢？

于是，一位来自山东的道士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

自从金庸的小说风靡全国，一位叫作丘处机的道士已是尽人皆知。在小说中，丘处机是一位正派的一等武林高手，却总是在反衬那些武功更高的邪派高手。在现实中丘处机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现实中的丘处机显然没有那么高的武功，也并没有心怀反金的壮志。

金代时，由于中原的铁马兵戈，过惯了太平日子的中原人再次体会了幻灭的滋味。一位叫作王嚞的陕西人出现了，他自号重阳真人，住在一个自己挖的墓穴里，号称活死人墓。在如今的陕北地区还有许多窑洞，在河南三门峡地区也有朝下挖的地坑院，这两种在黄土上挖掘的住处，或许给王嚞以启发，他的活死人墓或许就是一个窑洞或者地坑院。

王嚞虽然中过进士，但他的文采还是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写诗像顺口溜。由于王嚞疯疯癫癫，当时的人们给了他另一个名字——王害风[71]。

王嘉后来去了山东，在那儿招了几个徒弟，创立了全真道。徒弟中最有出息的是长春真人丘处机。

如同中国所有的道会门一样，全真道追求的也是养生和长生，为此，丘处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写了一些歌谣[72]，却始终没有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

不过，人们却都相信丘处机有长生不老之法，这个名声竟然在北方的金朝和南方的宋朝都传开了。金朝皇帝想要请他去，却由于有别的事情而搁置了。[73]

宋朝也派人来请他，他同样不去。

由于丘处机的名声太大，蒙古人也听说了他的名声。攻下金中都（今北京）之后，蒙古人控制了山东部分地区，成吉思汗从首都哈拉和林以西的乃蛮国故地派出了一位官员刘仲禄，让他打听：第一，到底有没有丘处机这个人；第二，如果有，就带他来见。[74]

刘仲禄到达北京之后，那儿的道士告诉他：并不确定这个人是否存在。

不过刘仲禄是一个勤劳的大臣，他继续东行，到真定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确定有这个人，并确定丘处机在蓬莱。刘仲禄立即决定带五千人马去接丘处机，却被告知蒙金战争刚刚告一段落，如果他兴师动众，会让地方百姓害怕，也会让丘处机闻声远遁，反而见不到了。

刘仲禄最终带了二十人的小队伍来见丘处机。在他们的“护送”下，丘处机带着徒弟李志常仓促起行。出发时，长春真人已经70多岁，却依然跋山涉水，不畏艰险，他的旅行家身份远比道士身份更值得人们尊重。

在旅途中，他们先是从山东到了燕京，在燕京待了一个多月，才再次启行。

中国历史上，通往西方最常用的道路是新疆南部和中部的丝绸之路，但在蒙古时代，却有另一条更加快速的高速公路。之所以说高速公路，是因为这一条路全程可以骑马，都是在草原河谷中前行，比起沙漠来更具有机动性。这条路就是从中国北方直插蒙古，再从蒙古进入新疆北部，直达哈萨克草原的道路。[75]

丘处机走这条路带着很偶然的成分。由于成吉思汗的大本营在蒙古，他们最初的目的也是去往蒙古境内。但他们到达蒙古时，成吉思汗却已经出发西征了，于是丘处机只好又从蒙古赶到中亚地区。就这样，长春真人也成了少数涉足蒙古和中亚的中国人。

从北京出发后，他们首先过居庸关，经过现在的宣化、张家口。在张家口以北，有一个叫作张北的县城，在张家口和张北之间，是中国地理上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北方是茫茫塞外，南方则是地理上的中原。两座城市相距不过二三十公里，中间横亘着一座野狐岭。当地人又把这座山叫作“坝”，从张家口往张北走叫作“上坝”。长春真人也到了野狐岭，登高一望，发现向南可以“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向北，只有“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76]。再加上附近战场上留下的累累白骨，更增加了这里的凄凉。

进入塞外后，丘处机从内蒙古进入现在的东北地区，直上东北与蒙古交界的贝尔湖，再向东进入蒙古。以蒙古现在的首都乌兰巴托为界，东部是茫茫的草原，西部则是山区和草原的混合体。

在世界上，中文以简洁著称，记录长春真人西游的这篇游记也很简练。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传统，都喜欢以大段的文字描写场景，可是中国人却总是寥寥数笔。从好处讲，这样的文字给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从坏处讲，由于缺乏细节，这样的记录使得许多历史素材从此缺失。

比如，西方人鲁布鲁克的书里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记载蒙古人的马奶

酒的做法，现代人都可以通过他的描述还原当时的制作方法。可是，丘处机的游记只记载了喝马奶酒，至于怎么做，就不是他关心的事情了。

在刚进入蒙古不久，他们就目睹了一次蒙古贵人的婚礼。蒙古人的喜庆事总是热闹非凡，数百里内的人们骑马赶车，组成一个帐篷城，在一起喝酒、吃肉、竞技比赛。鲁布鲁克也用大段文字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可是，到了丘处机这里，却只用了短短20个字：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湩（即马奶子、马奶酒）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77]

进入蒙古西部后，丘处机所见景色越来越壮观。当他们在杭爱山中行进时，丘处机把这里称为大寒岭。李志常写道："凡遇雨多雹，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泠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皆十余丈。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78]

在蒙古，至今还有许多特有的游牧民族的石堆坟墓，以及山上的敖包。这一切也被他们记录了下来。

在一个现代叫作白湖的湖岸边，他们见过了成吉思汗的后妃，继续西行。最令人纠结的是到达一座叫作八剌喝孙的城市之时。这座城在乌里雅苏台的西南方，由成吉思汗时期的名臣镇海驻守，所以又称作镇海城。

在这里，长春真人见到了来自汉地的工匠。令人吃惊的是，这里还有金章宗的两个妃子，她们在中都失陷后被抓来。另外还有一位金朝和亲公主的母亲。

也正是在这里，他们得知成吉思汗已经出发西征。这就是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进攻的是中亚强国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是一个名义上属于阿拔斯王朝，实际上却是独立的新兴伊斯兰国家，建国并不久，也处于

扩张期。它和新兴的蒙古相遇后，必然产生一场战争，并只会有一个胜利者，以决定谁是中亚和北亚的共同霸主。而最终胜利的是蒙古人。

丘处机并不想继续前行，镇海为了劝说他走下去，亲自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他们继续西行翻越了阿尔泰山，进入了现在的新疆境内。在新疆，他们通过了白骨甸[79]、经过别失八里[80]、昌八剌[81]、阿力麻里[82]，进入中亚，又经过大石林牙[83]，到达河中名城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是花剌子模国的最重要城市，已经陷落，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向南去追击花剌子模的残军去了。这时是公元1221年（蒙太祖十六年），此时，金国虽然丢失了北京，却依然存在。

休息一个冬天后，长春真人等人又从撒马尔罕出发，经过渴石[84]，过铁门到达了位于前线的巴里黑[85]，又翻越了兴都库什山，来到了一个叫作八鲁湾的地方。这里也就是长春真人西行的终点，应该在今阿富汗巴米扬或者喀布尔附近。

当长春真人到达时，巴里黑在一年前刚刚经过了蒙古人的大屠杀。在战争中，蒙古人习惯于采取震撼战术，如果一座城市投降，蒙古人不仅不杀人，还可以保证该城市的政治连续性，只派一个蒙古的长官[86]，其余的政府机构还是当地人控制，不做改变。可是如果抵抗的话，一旦攻克，蒙古人就进行屠城。在他们发动的所有战争中，又以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中对中亚的屠城最为恐怖[87]。

比如，在花剌子模的中心玉龙杰赤[88]，蒙古人进攻时，一面摧毁建筑物，一面杀戮居民，直到整个城市最后落入他们之手。接着，他们把百姓赶到城外，把为数超过10万的工匠艺人跟其余的人分开来，再把孩童和妇女虏作奴婢，其余的人分给军队，让每名军士屠杀24人。

据记录这件事的志费尼说，由于蒙古人在玉龙杰赤杀人太多，他甚至不敢相信听说的数目，所以就不记载具体的数目了。

在南方的忒耳迷[89]，由于当地人不肯投降，进行了抵抗，城破后居民悉数被杀，无一幸免。

在长春真人抵达的巴里黑，居民虽然投降，但成吉思汗不信任他们，于是下令把巴里黑人统统赶到旷野，按惯例分为百人、千人一群，不分老少、男女，尽行屠戮。

成吉思汗继续进攻到白沙瓦，当他回师时，又发现巴里黑有许多幸存者藏身于角落、洞穴，于是下令再次屠杀。

在以大佛著名的阿富汗名城巴米扬，该地居民在抵抗时杀死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成吉思汗下令把所有生物——从人类到牲口——杀个精光，不许留下俘虏，哪怕孕妇腹内的胎儿也不得饶过。很久之后，巴米扬还是连动物都没有。

在哥疾宁[90]，由于是成吉思汗的死对头、花剌子模国王沙-摩诃末的儿子扎兰丁的根据地，这里的百姓自愿投降，但窝阔台还是命令把他们全赶到城外，除工匠之外，全被处死，城镇也遭摧毁。

在所有的屠戮中，以位于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交界地带的呼罗珊地区受到的破坏最严重。这里的人遇到了蒙古最能杀人的魔头拖雷，于是富裕的地区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呼罗珊的大城市木鹿，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枢纽，不管丝绸之路如何兴衰更替，几乎所有的路都要经过的城市就是木鹿。在木鹿附近，人们袭击了一支800人的蒙古军队，拖雷来到后，尽管木鹿在围攻之下献城投降，拖雷仍然只留下了400名工匠，其余的人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每个蒙古兵要杀300～400人。

拖雷大军走后，那些逃走的人中大约有5000人又回来了，他们遭遇了另一支殿后的蒙古军队，于是又发生了一次屠杀。剩下的人还没有绝迹，当哲别西征归来时，再次对幸存者进行了屠杀。据记载，木鹿的居民被屠杀了130万以上。

但木鹿的劫数还没有结束。各地的百姓因为木鹿的富庶，在形势安定后，纷纷到木鹿来谋生。但这里恰好又被某支游击队用来当作反抗蒙古的大本营，于是蒙古大军如旋风一般赶来，百姓再次遭到毁灭，10万人以上遭到屠杀。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木鹿接下来又遭到过一次洗劫。经过四轮屠杀之后，城内除十几个住了10年的印度人外，无一活人。

呼罗珊另一座名城尼沙不尔[91]之所以倒霉，是因为他们在反抗中击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婿。结果，拖雷在攻下城池后，下令连猫狗都不得留下。

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记载中，都有大量的屠杀记载。但在长春真人的行程中，即便到了一个刚刚经过屠杀的城市，他还是言简意赅，心无旁骛，平和安详。他的游记中记载了不少风景，却很少记载当地的政治。

成吉思汗终于见到了长春真人。他真正关心的是长生不老，对身为蒙古人的他来说，宗教的作用如同萨满一样，就是提供对于事件的预测，并给人以不死的希望。

丘处机并不知道长生不老的药方，当别人询问他时，他还可以不断地打岔，避免正面回答，但当大汗询问时，他只好如实回答："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按照《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在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成吉思汗仍然对长春真人礼遇有加，称他为神仙。当年见过面之后，成吉思汗让他先回撒马尔罕，但第二年，再次把他召到了营内。此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回到了巴里黑。之后，长春真人再次伴随成吉思汗回到了撒马尔罕。

长春真人对记载杀戮不感兴趣，却是少有的到达中亚的中国人，他

不仅记载了一部分风俗，还亲口品尝了当地的瓜果粮食。他还见到了当年玄奘经过的铁门——这段峡谷颜色黝黑，如同铁色的大门，在当时是从撒马尔罕通往巴尔赫的必经之路。阿富汗的地形险峻也给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趣的是，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等地的山区产一种岩盐，这种盐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粉红色的，看上去像石头吃起来却是盐。即便到了现在，岩盐也是去这些地方旅游的优质纪念品之一。长春真人也看到了这种盐，并亲自品尝过。

长春真人回到燕京是在公元1224年（蒙太祖十九年）春，他在燕京待了三年，就去世了。在他死后，他的弟子李志常将这一趟经历写了一本书，这就是后来流传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在书中，丘处机简直是个完人，成吉思汗对他也充满了尊敬。

他的形象本来塑造得非常成功，但另一个人却打破了这个精心塑造的形象，这个人就是耶律楚材。当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会面时，他也在场，并负责照顾这位道士。当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时，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也恰好完成。

不幸的是，耶律楚材是一位佛教徒。于是，从他的眼中看去，这位道士的经历就带上了浓重的滑稽色彩[92]。

与长春真人出身草根不同，耶律楚材出身世家。他的八世祖是契丹的王室，金灭亡了辽国之后，耶律家族又在金国做官。

公元1215年（蒙太祖十年），蒙古人攻克了燕京。三年后，出于西征的需要，成吉思汗将耶律楚材征往蒙古。第二年，耶律楚材随蒙古大军出征。长春真人是公元1221年（蒙太祖十六年）从内地出发的，时间在耶律楚材之后。

他们走的路线也不一样：长春真人是从北京北上，直到极北的贝尔湖，才转向西方，横穿了整个蒙古。耶律楚材却选择了一条近路，他从

北京出居庸关后，没有北上，而是直接向西去往大同，再继续向西北行，经过武川，北渡阴山，越过重重大戈壁，前往蒙古。在这里，他与成吉思汗会合后，一同西征。

从蒙古翻越阿尔泰山之后，他们在额尔齐斯河驻夏，之后经过著名的赛里木湖前往阿力麻里[93]，进入了中亚地区。

耶律楚材记载了中亚的许多地方，比如伊犁河畔的西辽首都虎思斡耳朵[94]、塔拉兹、苦盏、讹答剌、玉龙杰赤、布哈拉、巴尔赫等。而他本人在撒马尔罕待的时间最长。

也正是在撒马尔罕，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相见。由于都是来自汉地，他和丘处机往来应答，好不热闹。但在背地里，耶律楚材却对丘处机评价不高。他表示，自己善待丘处机，只是因为主客之礼而已。

耶律楚材还揭开了丘处机被征召的原因。原来是刘仲禄举荐了长春真人，刘仲禄告诉成吉思汗，丘处机已经300岁了，有长生不老的方子，于是成吉思汗决定按照医科类特殊人才予以引进。

丘处机被征召后，到了德兴[95]就不想走了，赖在那儿好长时间，于是成吉思汗请耶律楚材下诏，好言好语把他劝来，这才有了长春真人的西游。

那么，长春真人见到成吉思汗之后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呢？

公元1222年（蒙太祖十七年）冬，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长生之道，丘处机回答平平，无非是精、神、气之类。此外，丘处机不知为什么以宋徽宗所宠的道士林灵素为例，开导成吉思汗。

林灵素号称神仙，并宣称天有九霄，最高的叫作神霄，神霄之王是上帝的长子，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长生大帝君就是宋徽宗。宋徽宗听到林灵素的恭维之后，对道士宠爱得超出了一个帝王的分寸，大修道观，自己号称“教主道君皇帝”，但由于他是亡国之君，自然也没有长

生。

林灵素虽然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但在道家的世界里，他仍然是个厉害角色，传说他曾经在梦里带宋徽宗神游过神霄宫。丘处机就举了这个事儿说明道家的厉害。

此外，他还不断举师父王害风和大师兄马钰的例子，说他们都会在梦里遨游异域。这件事也让耶律楚材感到可笑。

接着耶律楚材列举了丘处机的行为和观点，意图说明他的装神弄鬼。丘处机见面后装作记不住岁数了，这是那些装作长生不老的人常用的招数。接着是举宋徽宗的例子显得不伦不类。他把做梦这件事当作一个神奇的事情，表示人的许多本事都是靠梦里完成的。特别是圣贤，他们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可以在梦里遨游异域。至于丘处机诋毁佛教和儒教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

由于耶律楚才是佛教徒，佛教讲逻辑，道教讲信仰，从这个层面上说，丘处机的理论的确入不了耶律楚才的法眼。

但至少，我们通过这对佛道冤家的西游可以了解到，蒙古人时期，已经有不少中原人跟着蒙古人来到了西域。在丘处机的游记中，在中亚还有不少汉姓的人，就是明证。

事实上，除中原人之外，突厥、波斯、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文人都在拼命地为蒙古人服务。在蒙古人划定的四个等级的种姓制度中，这些人排在蒙古人之后，构成了第二个等级——色目人[96]。

前文提到的叙利亚人列边阿答就是当时冒险家的代表人物[97]。

列边阿答是一个出生于叙利亚的景教徒，他曾经游荡于中亚各地，并为克烈部的王罕[98]服务。因为克烈部信奉景教，列边阿答也成为了王罕的心腹。克烈部被成吉思汗吞并后，人民却受到了优待，列边阿答也借机成了成吉思汗的座上客，参加机密会议。列边阿答离开蒙古时，

把徒弟爱薛推荐给大汗，后者成为元朝一代名臣[99]。

列边阿答回到叙利亚，帮助基督教徒避开蒙古人的残害，让蒙古人善待基督徒。由于他的身份，他甚至试图调解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的纠纷。

只有在蒙古人时期，才会出现列边阿答这样在亚欧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都有涉足的人。蒙古人统治下的亚欧大陆，方便了他们的往来。由于政权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又让人们更有可能涉足多个地方的政治事务。

再比如西藏的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叔侄，他们出身西藏，而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西藏，使得蒙古本部和元帝国暂时皈依了佛教。[100]

克烈部的镇海，足迹从中国到阿富汗。他是成吉思汗的总文案，负责着各种命令和文书的撰写。蒙古人由于没有文字，最初不得不借用畏兀儿文，使得掌握了这门文字的镇海成为了文人中的佼佼者。

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通过对西夏、金和宋的征伐，以及对西方的三次西征，成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在西方，它直抵西欧的边界，东方则深入了东南亚和日本，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蒙古人在起用人才上也不拘一格，甚至更加优待那些来自先进地区的人才。每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即便要屠城，蒙古人也会将有用的人挑选出来，将剩下没有用的人杀死。

这些为蒙古服务的人将他们对世界的知识带到了哈拉和林和汗八里[101]的宫廷之内，使得蒙古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超越了几乎所有的朝代和国家。在唐代之后，陆路的丝绸之路已经在衰落之中，由于海路的运力过大，陆路在海路的对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是蒙古人的征服，让如此广大的疆域统一在同一个民族之下，也让人们穿越丝绸之路众多的地区变得更加容易。这种便捷性推动了地理知识的普及，不仅让中国人跨出了固有的边界，也打开了西方人的视野。

但另一个问题是，蒙古人是一个在草原上诞生的马上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也是基于陆地的。在重新开通和发展了陆地的道路之后，这个典型的陆地文明对海上的认知又有多少呢？

幸运的是，蒙古人在东方和西方都恰好继承了最开放的文明，不管是南宋还是阿拉伯帝国，对海洋的经营都是他们的国策之一，而这种开放性也影响了蒙古人。

第十二章 海洋时代的冒险家

伊本·白图泰眼中的蒙古与世界

蒙古人时代，除陆地（特别是亚欧大陆）大幅度整合之外，他们还成了海洋上的一极。由于控制了中国和波斯的海港地区，也就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终点，于是蒙古时期的海洋也变得更为人熟知，出现了世界级的冒险家和旅行者。

这些探险家从西欧或者北非出发，穿越了整个世界，来到了蒙古人控制的海洋，最远的到达了中国。

在现代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老城中，密布着蛛网一样的街巷，在街巷的深处有一座不起眼的墓葬。与中国人习惯将死人葬在城外不同，许多穆斯林地区习惯将亲人埋葬在城市当中，他们在空地上建一座带顶的建筑，里面作为坟墓之用。

在丹吉尔城中的两条小巷交叉处，有一个低矮建筑，建筑的下部刷成了摩洛哥常用的浅蓝色。建筑内部有一个简单的墓穴，他的主人叫作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02]。

在哥伦布之前，如果要寻找一个比马可·波罗更伟大的旅行家，那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穆斯林本来就是商业民族，人们早已习惯于四处旅行，但伊本·白图泰却太能奔波了，他几乎跑遍了除西欧之外的整个已知世界。他的旅途中还充满了奇遇，带着时代的特征，从蒙古已经征服的土地到未征服的土地上，都有他的身影。

伊本·白图泰出生于公元1303年（大德七年）7月17日，这时中国的

南宋已经灭亡，而西欧的十字军也成了过去，蒙古人带来的整合与和平还在继续着。

蒙古人的杀戮往往只在征服的初期，针对那些不肯投降的城市。一旦他们完成了征服，人们服从蒙古的统治，他们立刻就变成了好的统治者。蒙古人很少干预本地的生活和贸易，他们只要求征服地缴纳税赋，同时，由于地域广阔，商人们开始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地方做生意，于是，世界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在伊本·白图泰不满22岁时（公元1324年，泰定元年），他选择了离家出游。最初，他的目的只是去麦加朝圣[103]。

他从家乡丹吉尔出发后，经过了北非海岸上的城市阿尔及尔[104]、突尼斯城、斯法克斯[105]（Sfax）、的黎波里[106]。在的黎波里，他还娶了一位当地女子，并把她带上了路。一路上随遇而安，如同风中的种子，飘散到何处就在何处发芽，这也是穆斯林传统。

他带着家眷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时的亚历山大依然保持着繁华，是地中海南岸的巨型港口，伊本·白图泰甚至认为它是与印度的卡利卡特[107]、克里米亚的苏达克、中国的泉州（刺桐）并列的大型港口。

在亚历山大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这个奇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穆斯林的城堡，但灯塔当年的石头还深深地躺在海底。伊本·白图泰第一次去往亚历山大时，灯塔还在，只是一边已经塌了，等到公元1349年（至正九年）他回程时，灯塔已经全部倒塌，剩下一堆乱石。

在埃及，白图泰沿尼罗河而上，从亚历山大前往开罗（当时称为米素尔）[108]。

由于马木留克王朝成功地抵御了蒙古人的进攻，将蒙古人的势力范围限制在亚洲边境，因而作为其首都的开罗成为世界伊斯兰教的堡垒和

中心。现在的人去埃及，会看到许多庞大的历史建筑，不限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还包括许多著名的清真寺。比如埋葬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人头的那座清真寺，至今依然是埃及最神圣的地点之一。此外，还有萨拉丁[109]建设的著名的城堡。这些建筑大都在白图泰时期就存在了。

经过开罗之后，伊本·白图泰继续沿着尼罗河向上游进发，最远到达卢克索（Luxor）以南的伊斯纳（Esna）和伊德富（Edfu），这三个地方至今都还存在着大型的古埃及神庙，是尼罗河游船必到的景点。之后他离开了尼罗河流域，穿越东面的沙漠，到了一个叫作阿扎布的地方，再沿原路回到了开罗。

从开罗，他经过西奈半岛前往加沙，并到达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曾被基督教征服，但在萨拉丁的努力下已经重归伊斯兰，被西方十字军控制的时间不过只有几十年而已。

从耶路撒冷短暂向内陆行进后，白图泰重新沿着地中海的东海岸前行，经过一系列城镇，到达现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和北部城市的利波里[110]。

如今的的利波里有一条翻山进入叙利亚北部的道路。伊本·白图泰也是顺着这条路东行，到了霍姆斯（Homs）、哈马（Hama）、阿勒颇（Aleppo）等属于今天的叙利亚的城市。

从阿勒颇起程，白图泰再次向西，进入了今土耳其在地中海东岸的那一小块区域，这里最著名的城市叫作安条克（Antioch）。接着，他到了伊斯兰教在叙利亚地区的中心——大马士革，并参观了著名的伍麦叶清真寺。这里至今依然是叙利亚的首都，以阿拉伯语的标准口音而闻名。

在大马士革，白图泰参加了一个朝觐团。他们向东南方前行，穿越沙漠进入麦地那和麦加，这是他第一次朝觐圣地[111]。白图泰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朝觐时的热闹。等朝觐结束后，他并没有按照原路返回家

乡，而是继续随着一群伊拉克朝觐者穿越了整个内志地区，也就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中部的大沙漠，进入了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在伊拉克，他首先抵达著名的圣城纳杰夫（Najaf），这里据说埋葬着伊玛目阿里，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创始人，也由此，纳杰夫成了什叶派的圣城，直到今天仍然是最重要的什叶派圣地。伊朗领袖霍梅尼在取得政权之前，曾经被伊朗国王驱逐而离开伊朗，他来到了伊拉克地区，住在纳杰夫。之后，由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继续驱逐他，他不得不前往欧洲，开始了流亡之旅，直到伊朗人民推翻了国王，将霍梅尼请回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从纳杰夫起程，白图泰并没有先选择北上巴格达，而是向东方前往位于波斯湾犄角上的城市巴士拉，从巴士拉越过阿拉伯河，进入了现代伊朗的胡泽斯坦地区，再前往伊朗著名的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胡泽斯坦地区是伊朗最重要的油田区，当年伊拉克发动两伊战争，就是为了和伊朗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而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则是伊朗历史上著名的古城。

游历完设拉子，白图泰再回头西向，回到了伊拉克境内，前往著名的库法和巴格达。库法是阿拉伯帝国的早期首都，之后，阿拉伯人才在库法旁边兴建了新的城市巴格达，让这里成了帝国数百年的首都[112]。

需要说明的是，伊本·白图泰离开麦加，进入伊拉克和伊朗时，就已经进入了蒙古人的势力范围。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113]首都在现代伊朗西北部的苏丹尼耶（Soltaniyeh），但汗王却喜欢住在巴格达这个曾经的哈里发之城。伊本·白图泰作为伊斯兰教徒，进入蒙古人掌控的地区，难道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吗？

答案是：没有不适。这是因为伊尔汗国的蒙古人此时已经改信伊斯兰教。

早在蒙古合赞汗（公元1295—1304年在位）时期[114]，波斯汗国的蒙古人就改信了伊斯兰教。据说，合赞汗的坟墓就在巴格达。之后的汗王完者都[115]葬在了苏丹尼耶，那儿至今仍然伫立着一座巨大的伊斯兰教风格的坟墓。

伊本·白图泰到达巴格达时，虽然蒙古人还在统治这片地区，但就连统治者的名号都已经伊斯兰化了——这时的汗王叫作阿布·赛义德，也称不赛因汗[116]，从名字上已经看不出他是个蒙古人。不赛因汗是伊尔汗国统一时期的最后一个王，他死后，公元1335年（元惠宗至元元年），伊尔汗国就分裂成了一地碎片，所谓的汗王接近无人理睬。又过了20年，这个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国家就彻底灭亡了。[117]

不过，伊本·白图泰在伊拉克时，不赛因汗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威严，显示出这个蒙古国家最后的回光返照。

离开巴格达，他又顺着底格里斯河逆流而上，去了一趟现代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Mosul），这里有古城尼尼微的遗址。从摩苏尔继续北上，就进入了现代土耳其境内，到了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地区，这里有一座名城叫作马尔丁（Mardin），就成了他溯河而上的最远去处。这一片地区现在住着一个特殊的民族——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民族，既不是波斯人，也不是阿拉伯人，更不是突厥人。他们很早就占据了一片叫作库尔德斯坦的地区，这个地区位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交界地带。虽然库尔德人很古老，但他们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总是从属于这个或者那个帝国。直到近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后，西方主导了中东地区的独立，让一些民族单独建立了国家。比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库尔德人不仅没有获得西方支持、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反而被分割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四个国家中。这四个国家都压制着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而库尔德人在四个国家都制造着不稳定，等待机会，寄希望在未来有独立的机会。

库尔德人也有自己的英雄人物，最著名的就是抵御了西方十字军、在埃及建立阿尤布帝国的英雄萨拉丁，即便到现在，四个国家中的库尔德人都还将萨拉丁当作他们的独立的象征。

白图泰从马尔丁回到巴格达，再次前往圣地朝圣，并在麦加居住到公元1328年（泰定五年）。

在麦加旁边的港口城市吉达（Jeddah）[118]，他第一次登上了船，开启了海路行程。他首先到了位于红海另一侧的非洲沿岸，再继续南行，经过一个叫作萨瓦金的岛屿，到了现代也门境内的地方。也门的首都萨那（Sana’a）是一个颇具风味的古城，而亚丁（Aden）则是位于红海海口附近著名的港口城市。

从亚丁出发，他再次回到非洲海岸——这次是在非洲之角上。他们到了一个叫作泽拉的城市，之后前往著名的摩加迪沙（Mogadishu）。这里也是现代索马里的首都。从摩加迪沙继续向南，白图泰到达蒙巴萨（Mombasa）[119]和库洛瓦[120]。

伊本·白图泰之所以能够从阿拉伯半岛如此容易地去往东部非洲，也有一个客观条件：在当时，非洲的东岸是由阿拉伯殖民者控制的，这些殖民者来自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曼[121]。或者说，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们早就知道航行非洲的奥秘，后来的郑和只不过利用了阿拉伯人的发现罢了。

从非洲回来后，白图泰又回到了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在佐法尔（Dhofar）停留之后，去往令现代人谈之色变的霍尔木兹。现代人之所以对这个地方感兴趣，是因为它所在的海峡是波斯湾石油的必经之路。古老的霍尔木兹[122]是一个岸上的港口城市，后来由于遭到了大陆上国家的袭击，迁到了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上充斥着各种颜色的粉状土壤，还有大块的结晶盐，非常不利于生存，却是紧急时刻的避难之地。[123]

伊本·白图泰经过巴林，再次前往麦加朝圣（公元1331年）。这次朝圣之后，他又开辟了新的旅行地。

他从麦加坐船到达红海的埃及海岸，穿越沙漠，经过尼罗河到达埃及的地中海海岸，上船后，沿着海岸到了现代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在现代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上，他首先经过的是一个叫作阿拉尼亚的城市，然后到了大城市安塔利亚（Antalya）。

伊本·白图泰称土耳其为罗马人的土地，因为这里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的腹地。但在他去时，土耳其却处于伊斯兰教的管辖之下。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西部，是一系列当地苏丹的势力范围，这些苏丹属于突厥人。在东部，则是巴格达的蒙古人直辖区域。他去了东部的锡瓦斯、阿玛西亚、埃尔祖鲁姆，以及西部的科尼亚、伊兹密尔、帕加马、布尔萨、伊兹尼克等地，最后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来到了黑海海岸上的锡诺普城，从这里上船穿越黑海，到达克里米亚半岛。

从克里米亚半岛向陆地方向，有一个大城市艾扎格。从艾扎格继续东行到达马哲尔，从马哲尔再东行四天，就到了一个对未来历史颇具影响的地方——乌兹别克汗的营帐[124]。

乌兹别克汗是金帐汗国第九代大汗，汉语也称为月即别汗。他是金帐汗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同时也是推动金帐汗国改信伊斯兰教的关键人物。另外，到了后来，在中亚有一支蒙古化的突厥人，号称是乌兹别克汗的后裔[125]，于是就有了乌兹别克人的说法。当乌兹别克继续分裂时，就分成了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他们都承认是乌兹比克汗的后裔。

伊本·白图泰将乌兹别克视为全世界的七雄之一，这七雄分别是摩洛哥苏丹[126]、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苏丹、伊尔汗国大汗[127]、金帐汗国大汗[128]、察合台汗国大汗[129]、印度苏丹和元朝皇帝。这七雄中，蒙古人的后裔占了四个，除了元朝皇帝，其余六个都是伊斯兰教徒，可

见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繁荣。作为对比，局促在西方一隅的西欧世界甚至连诸强名单都上不了，东罗马虽然曾经强大，到了白图泰时期却已缩成蕞尔小国。

由于金帐汗国靠近极北方，当地人都知道北极地区的极夜情况，伊本·白图泰想走40天的路程去探寻一下北极，却失败了。这表明中世纪再厉害的旅行家也不是万能的，他们还无法到达北极圈以内。

乌兹别克汗有四个老婆，其中第三个是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的女儿[130]。当乌兹别克汗的这位老婆回乡探亲时，伊本·白图泰又跟着她回了一趟君士坦丁堡，之后再次回到了乌兹别克汗的大帐。

正是从乌兹别克汗处，伊本·白图泰开始了另一段——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行程：他从北方的俄罗斯草原，经过金帐汗国管辖的花剌子模，察合台汗国管辖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穿越了玄奘等人走过的铁门，到达现代阿富汗境内的巴尔赫。虽然距离蒙古人屠城已经过去了100年，但巴尔赫这座历史名城还是一片荒芜。那里原有一座宽阔的城池，清真寺、学校遗迹历历在目。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不仅破坏了城墙，还破坏了大清真寺的三分之一，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美的清真寺之一。

离开巴尔赫之后，白图泰进入呼罗珊地区，经过赫拉特、贾姆、图斯、尼沙卜尔等呼罗珊名城。随后，他可能是走中线，经过喀布尔、昆都士、加兹尼等地，前往印度。从呼罗珊前往印度主要有三条路，北线是经过吐火罗斯坦，翻越兴都库什山，前往喀布尔，再进入北印度[131]，南线则是向南经过阿富汗与伊朗、巴基斯坦交界的沙漠地区，经过现代城市坎大哈，前往巴基斯坦。除南北两线之外，还有一条中线，是紧贴着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山脚，顺着一个个谷地，经过巴米扬峡谷，直接到达喀布尔。这条中间的线路可能就是白图泰所走的路。

他到达印度旁遮普地区时，是公元1333年（元统元年）1月。

印度抵御蒙古人

当伊本·白图泰到达印度时，印度恰好处于德里苏丹国时期。

当印度教的笈多王朝（也是印度古代的鼎盛期）垮掉之后，印度经历了嚈哒人的冲击，分裂成许多小国，与此同时，西亚的伊斯兰教开始影响这里。

在中亚，伊斯兰教从伊朗进军河中地区，将现在中亚五国所涵盖的地域尽数纳入控制之中，并从中亚五国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境内，在中原也进行了有限的传播。

从公元712年（先天元年）开始，伊斯兰教开始影响印度，首先在如今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地区建立了桥头堡。当一艘运送伊斯兰教儿童的船只在信德海岸线上遭受海盗的袭击后，巴格达的哈里发要求信德的印度教王公对此负责，但印度人拒绝了他。于是，伊斯兰教徒就如潮水一般从开伯尔山口涌进了印度河流域，占领了信德，建立了伊斯兰教政权。之后，他们又跨越了大海，从信德经过海路传播到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132]。

然而，由于印度是分裂的，所以，伊斯兰教很难在短时期内控制印度的主体部分。印度虽然是分裂的，但恰好有几个颇具实力的大国。在印度北部有强大的瞿折罗-波罗提诃罗王朝，在印度西北的拉贾斯坦地区，还有众多的拉其普特人建立的王朝，再往南，是遮卢迦王朝和取代遮卢迦的拉什特拉库塔王朝。这些王朝大都处于鼎盛时期，它们将伊斯兰教的影响推迟了近300年。

与此同时，在阿拉伯帝国内部，伊斯兰教的权力也正在从阿拉伯人转移到突厥人手中。在伊朗，一股突厥人建立了加兹尼（Ghazi）王朝[133]。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加兹尼王朝的国王马哈茂德（Mahmud）突然开始进军印度，短短的25年里，他一共发起了17次入

侵，并曾经占领瞿折罗-波罗提诃罗的首都卡瑙季（Kannauj）[134]。

然而，正当整个印度为伊斯兰的入侵感到不安时，马哈茂德死了。他的继承人并没有继续进攻印度。印度又获得了一个多世纪的休息时间。

公元1151年（绍兴二十一年），加兹尼王朝被另一个政权古尔王朝灭亡[135]，古尔人在首领穆罕默德的带领下，又开始大举进攻印度。这是印度境内臣服于伊斯兰教的起始点。

穆罕默德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奴隶将军，叫库特卜-乌德-丁·艾巴克（Qutb-ud-Din Aibak），他是进攻印度的总指挥。当1206年[136]，穆罕默德遇刺身亡后，作为奴隶的库特卜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脱离了古尔王权，选择了一个小小的要塞（德里）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宣布成立德里苏丹国。

至今，德里仍然保存着一个石柱，叫作库特卜石柱，就是当初库特卜修建的，位置在当年他建立的城堡上。

德里苏丹国虽然换了几批统治家族，但控制印度却长达300年之久[137]。

到了国王阿拉-乌德-丁（Ala-ud-Din）时期，德里苏丹国成了世界强权，原因是他战胜了蒙古人。阿拉-乌德-丁于公元1296年（元贞二年）登位，从1299年（大德三年）到1307年（大德十一年），蒙古人与阿拉-乌德-丁展开了一系列战争。曾经令西方人谈虎色变的蒙古铁骑在这里碰到了对手，几年的鏖战之后，他们留下了上万的尸体和俘虏，逃回了中亚的根据地。印度暂时得到了和平。俘虏的蒙古人在德里苏丹的注视下被大象踩死，他们的头颅被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堆成了金字塔[138]。

阿拉-乌德-丁死后几年，一位叫作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Ghiyasud-din Tughluq）的人篡夺了王位，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在

现代德里城的南部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堡。这座城堡就是伊本·白图泰来时所见到的。

白图泰不吝笔墨描写了吉亚斯-乌德-丁的首都的辉煌：那里有用鎏金砖修建的巨型宫殿。太阳初升时，金光耀眼不可直视；那里藏着众多财宝，据说还建有一座金窖，熔金注入其内，形成一整块金块[139]。

然而，旅行家并没有见过吉亚斯-乌德-丁，因为白图泰到来前，他就已经被自己的儿子害死了。旅行家见到的就是吉亚斯-乌德-丁的儿子穆罕默德·图格鲁克（Muhammed Tughluq）。

根据记载，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统治时代维持了27年，伴随着各种战争、内斗和杀害，而白图泰赶上的就是这样的人和时代。他到达印度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穆罕默德·图格鲁克执政时期，从西北方信德地区的木尔坦城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位穆斯林申请进入印度国境，请求苏丹的批准。

当时的国境穿越也如同现在一样，需要有批准和文书，然而，苏丹的答复却让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按照现代人的看法，在批准一个人入境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他会离开，免得造成新的社会负担，也免得他来抢现有的资源。然而图格鲁克苏丹却答复说：这个人可以入境，但白图泰一旦入境，就必须发誓留在印度不再离开。

其实游牧部落和穆斯林地带都有重用外来人的传统。比如，成吉思汗就曾经重用大量外地人当官，缓解自己的人才不足。而穆斯林的苏丹们不仅让客人当官，还给奴隶封官换取他们的忠诚。穆罕默德·图格鲁克不相信近身的人，反而将大批的客卿带到了朝廷，也是遵循了这个传统。

白图泰为了入境，答应下来，成了德里苏丹国的一名官员。他的命运在未来的几年里随着苏丹情绪的阴晴不定而沉浮，直到寻找到出使中国的机会离开了印度。

在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时代，德里苏丹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穆斯林政权始终只控制了印度北部，虽然有时也会控制一部分中南部，但大部分时间里，中南印度都有不少印度教的地方政权存在，与穆斯林政权相抗衡。

苏丹认为除武力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都城没有选好：与南方比起来，德里太靠北了，无法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起到作用。他在中部的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建造了一个新的都城，为此，大动干戈将德里城的居民都赶到道拉塔巴德去，不想却造成了严重的反抗。

道拉塔巴德在印度马哈施特拉邦的城市奥郎加巴德（Aurangabad）郊区，这里有一座石头的小山，如同金字塔一般挺立。这座小山的整个山体四周都被重新开凿成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以通往山顶。这条小路时而是陡峭的阶梯，时而是深邃的洞穴隧道，只需要几个人把守，就可以守住上万的大军。道拉塔巴德的卫城就建在山顶之上。

搬迁几年后，图格鲁克又将首都迁回了德里，于是人们不得不忍受第二次搬迁之苦。道拉塔巴德虽然坚固，也是征服南方的好基地，图格鲁克却忽略了一点：德里虽然不利于征服南方，却有利于震慑北方。

当他把首都迁往南方之后，北方各地造反的消息频频传来，焦头烂额的图格鲁克不得不承认，迁都是失败的。他的后半生都在为这次错误的迁都买单，他在德里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堡，四处出击镇压着各地的反抗。

当白图泰到来时，恰好是苏丹将都城迁回德里后不久。这个反复无常的苏丹显然被他面临的巨大困境害得精神错乱。他疑神疑鬼，动辄杀人。白图泰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苏丹杀人的过程[140]。

在继续叙述伊本·白图泰之前，我们先把德里苏丹国后来的命运做个简单回顾。

图格鲁克死后，经过了几十年，在中亚，一位仅次于成吉思汗的征服者出现了，他就是突厥人跛子帖木儿[141]。

蒙古人没有攻克印度，但帖木儿做到了，他的铁骑蹂躏了印度首都德里，在高高的城墙之外堆起了标志性的人头金字塔。在突厥人的攻势下，德里苏丹国瓦解了。城市完全毁坏了，留下的居民也都死光了，两个月当中，德里城飞鸟绝迹。

十几年后，一个叫赛义德王朝的小朝廷在德里的荒草中复辟，赛义德王朝又被一个叫作洛迪的家族取代。然而，孱弱的小朝廷已经无力维持北印度的统一，各地的藩王各自为政。到最后，从中亚来了一支突厥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首领巴布尔的父系是帖木儿，母系来自成吉思汗，他率军从阿富汗进攻到德里，将洛迪王朝灭亡，建立了英国人占据印度之前最后一个著名的帝国——莫卧儿帝国（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

伊本·白图泰显然看不到德里苏丹国的结局，他在变幻无常的宫廷里待了几年，找到了一个出使中国的机会，这让他可以取消自己的誓言，离开印度。公元1342年（至正二年）2月17日，他就和使团上路了。

不过，他们走的海路已经与当年法显等人走的有了区别。在唐代以前，印度的中心在北方恒河流域，顺流而下可以到达东部的加尔各答附近，人们选择从那儿上船去往斯里兰卡，再转船经过东南亚到达中国。到了德里苏丹国时期，政治中心已经西移，也不再靠着恒河，与印度联系更多的是来自西部的穆斯林区域，所以入海口也选择了西部的海岸。

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千辛万苦，向南经过苏丹国的南部都城道拉塔巴德，再向西到达可能是孟买以北的某处海岸，从那儿登船，经过卡利卡特，绕过印度大陆最南端，再前往东方。

在卡利卡特，有13艘中国船在等待着他们。这些船可能是在广州制

造的，按照他的说法，每一艘可以装1000人，其中海员600人，战士400人。船高4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是套间带厕所，可以带女眷。水手也可以带上老婆孩子，在船上还可以种菜。

这些船说明，明朝初年的郑和船队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实际上，在元朝时，中国的造船业就很发达了，这可能是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最发达、最接近世界主流的时期。

一路上，他们经历了战争，礼品被毁，也看到了马尔代夫神奇的珊瑚岛。经过锡兰岛[142]、印度东部的孟加拉地区，再驶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最后到达中国的刺桐。

刺桐城（今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之一，大船就有百艘，小船更是不计其数。在这里，由于商人众多，穆斯林已经单独形成了片区。之后，他们前往广州，从广州，又到了以前南宋的首府杭州。从杭州，经过64天的运河行程，就到了元朝的首都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当他到达时，已经是元顺帝的末期，距离元朝的灭亡不远了。

北京是伊本·白图泰到达亚洲的最远端。当他回到祖国后，他又做过两次旅行，分别到达了位于西班牙的格拉纳达，以及位于西非的尼日尔河谷地区[143]，其中尼日尔河谷的旅程在当时也处于已知世界的边缘地带，对亚洲、欧洲来说，都只是传说中的土地了。

白图泰的旅行中，除看到蒙古人统一带来的好处之外，也看到了蒙古人带来的灾祸，比如瘟疫。

公元1348年（至正八年）4月末，当伊本·白图泰旅行到大马士革时，一场瘟疫袭击了这里。全城人都虔诚地祈祷了整整三日，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不管他们是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祈祷的结果是，每天死亡的人数降到了2000人[144]。他没有说祈祷前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只说以前在埃及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是24000人。

鄂多立克东游记

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对印度之前的行程记述都很详细，而对印度的记述尤其详细，但中国行程的记述却显得比较简略。这或许是因为书的篇幅原因，因为中国行程在他的记述最后，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也有可能是因为记录者对中国不熟悉，产生了记录偏差[145]。还有人认为，他可能没有到过中国，是根据他的耳闻整理出来的。

但另外一个同时代的人，甚至比他还要早一些，却的的确确到达了中国，并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这至少证明，在蒙古人时代，这条海路是畅通的。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叫作鄂多立克。

在叙述鄂多立克之前，先看一下更早的基督徒通过海洋来华的情况。

公元1289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罗马教廷曾经派意大利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da 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他经过海路于公元1291年到达刺桐，公元1294年抵达大都，受到了元成宗铁穆耳的欢迎。

由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不仅在内陆地区，就连海岸地区也有了不少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社区，而基督徒，不管是哪一支，在蒙古人口中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也里可温[146]。

孟高维诺于公元1299年和1305年在大都建立了两个教堂，1307年7月23日担任大都总主教，成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在他的运作下，公元1313年，教皇同意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前往大都。公元1328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147]。

孟高维诺去世之年，也是鄂多立克在中国之时。

鄂多立克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地区。他于公元1318年（元延

祐五年）从威尼斯出发，于公元1321年到达印度西部，大约公元1322年到1328年间，在中国漫游。

他从威尼斯出发后，坐船直接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并来到了黑海东南角上的城市特拉布宗。特拉布宗曾经是中世纪一个主要的贸易城市，因为从这里有一条山路可以直接去往伊朗或者伊拉克，也可以沿着黑海海岸去往格鲁吉亚等地。

在特拉布宗登陆后，鄂多立克向南经过枢纽城市埃尔祖鲁姆，擦过据称诺亚方舟所在的亚拉腊山，来到了伊朗境内的大不里士，又向东南方向，到达了伊尔汗国的都城苏丹尼耶。

他来到这里时，蒙古人的汗王是不赛因汗，不过，鄂多立克应该能够看到苏丹尼耶新建立的完者都汗的壮观陵墓。当时完者都汗才死了不久，他的巨大陵墓至今仍然在苏丹尼耶耸立。

鄂多立克继续南下，经过卡善、亚兹德，并经过了古老的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自从被亚历山大毁灭后，它的废墟在一块山脚台地上矗立了近两千年。

为了搭乘海船，他折往西方，经过伊朗与伊拉克边境的胡泽斯坦地区，到达伊拉克的巴格达。他还不忘记录了比波斯波利斯更加古老的通天塔，也就是巴别塔。

坐船后，他首先经过了霍尔木兹岛。霍尔木兹城原来在大路上，是一个港口城市，但由于蒙古人的进攻，霍尔木兹已经把城市迁到了一个荒岛上。这个岛上没有淡水（需要从陆地上运输），也没有树（现在已经有了低矮的灌木），却是个抵御敌人的好地方。

乘坐着不用铁钉、利用榫卯结构制成的船，鄂多立克跨越了大洋，来到了印度西部的塔纳。这座小城现在已经不出名，但在更靠南的孟买发展起来之前，却是印度西部主要的港口。鄂多立克到达印度时，德里苏丹国的苏丹就是伊本·白图泰所见的同一个苏丹图格鲁克。

伊本·白图泰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区域内看不到基督徒的存在。鄂多立克作为基督徒，却发现在印度已经有了基督教的痕迹，并且由于图格鲁克排斥基督教，甚至出现了殉道者[148]。

他坐船继续南下，经过马拉巴尔和现在喀拉拉邦海岸上的诸城市，抵达印度东海外的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坐船经过尼科巴群岛前往苏门答腊、爪哇[149]，再经过占婆到达中国。

在中国，他首先到达海港城市广州，这是一个比威尼斯城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数量也非常庞大，整个意大利的船都没有这一个城市多。鄂多立克被这里的鲜姜（一个银币能买300磅）和大白鹅（一只就有欧洲两只那么大，洁白如奶）吸引住了。

广州人喜欢吃蛇，如果一个宴席上没有一道蛇菜，就显得很没面子。鄂多立克看到的广州绝对不是一幅受剥削、受压迫的景象，而是和现代生活没有区别的祥和之景。这也表明，在蒙古人时代，南部中国虽然政治地位低下，却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

离开广州，他们沿着海岸到达了刺桐。刺桐城除有伊斯兰教徒之外，还有基督徒的组织。当然和尚更多，一座寺庙就有3000名和尚和12000座佛像。由于物资过于丰富，鄂多立克感慨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从泉州前往福州，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公鸡。他翻越了武夷山，从现在的仙霞岭到达了杭州。当年黄巢也是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的[150]，当然，黄巢带来的是屠杀，而不是和平。

广州、泉州都让鄂多立克称赞不已，那么作为南宋曾经的首都的杭州又怎样呢？鄂多立克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杭州方圆足有百英里，有12000多座桥。这个数据和马可·波罗的记录相吻合，表明杭州有12000座桥应该是当时一种流行说法，并非是作者有意夸大。

这座城市既有僧、道，也有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鄂多立克还在一个寺庙中发现了3000多只灵长类动物，这些动物都会表演节目。

从杭州出发，到达金陵[151]，这里有360座石头桥。渡过长江后，他们来到了扬州，扬州有景教徒的寺庙。鄂多立克最感兴趣的是扬州的餐馆。这个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事物对西方人来说是新鲜事儿，他们没有听说过独立的餐馆。欧洲还处于封建时代，贵族们请客都在家里请，平民们请不起客，而中国人却跑到餐馆里，请餐馆做饭宴请朋友[152]。

从扬州沿着大运河北上，一路经过临清、沧州等地，渡过黄河，到达了此行最大的目的地——汗八里。

无疑，汗八里最吸引人的除了大汗的宫殿，就是宫墙内那座湖上的小山，也就是现在北海的琼华岛。这座岛同样记载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

鄂多立克在汗八里住了三年，周围有大量的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道教徒，显然，蒙古人即便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汉化，保持着与世界的交流，重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忽必烈时期，统一的蒙古大帝国就变成了四个汗国，但每一个汗国的精神仍然是帝国式的，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

离开汗八里后，鄂多立克选择了陆路离开，他经过甘肃，又进入了藏区，观察了当地的天葬习俗[153]。蒙元时代，可能是西藏自唐代以后最为开放的时代。由于西藏从属于蒙古，他们的大门没有对外来人口封闭，这是鄂多立克能够进入的原因。明代、清代直至民国时期，西藏封闭了，很少有人能够进去，许多探险家都在西藏严密的防范下无功而返。

到这时为止，元代时期对于海路的观察都来自外国人，那么，是否有中国人也观察到了外面的情况呢？当然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元朝人对一个东南亚国家最详尽的观察。

一个中国人的吴哥观察记

唐代玄奘的详细记录，让现代的人们能够恢复对古代印度的认知。在玄奘死了数百年之后，元代一个叫作周达观的人又让世界吃了一惊。

当欧洲人发现吴哥时，一开始不相信这是本地文明建造的，他们总认为如此杰出的建筑只可能出自欧洲人之手，于是设想了欧洲文明中某个神秘团体曾经来过东南亚，修建了吴哥[154]。但是，随后发现的一个中国人的记载，却让欧洲人不得不信服，吴哥的建筑群就是本地人的产物。

周达观，字草庭，浙江温州人。在元朝，东南亚是一块特殊的地方。当蒙古人完全占领了中国之后，广东、云南和西藏就成了它的南部边界线。西藏的地理过于特殊，不需要做说明，但广东、云南和东南亚之间，并没有过于险要的地理特征相阻隔。

但蒙古人却在越南、印尼、泰国等地接连吃了败仗。在越南，一个叫作陈朝的小国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越南的民族英雄陈兴道用武力击败了蒙古人的进攻。[155]蒙古人从海路进攻占婆[156]和爪哇也不顺利。

特别是在爪哇，在公元1292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之前，是一个叫作新柯沙里的王朝统治。到了王朝末年，发生了内乱，而恰好这时蒙古人发动了远征，于是一位叫作韦查耶的将军表面上与蒙古人联合，对抗其他的篡位者，当蒙古人把其他人打败后，韦查耶反过来进攻蒙古舰队，逼迫他们意识到无法完成征服，只好离开。[157]

在蒙古人的“帮助”下，一个叫作满者伯夷的国家就这样建立了起来，直到西方人到来之前，满者伯夷才终结。不过，它并非亡于西方天主教徒，而是在穆斯林的冲击下垮台的。[158]

蒙古人虽然击败了缅甸的蒲甘政权，并进攻泰国，却无法建立有效统治，使得东南亚的国家继续保持了独立性。对蒙古人共同的抵抗，还

有助于产生东南亚的民族主义。

柬埔寨由于与元朝不接壤，更是逍遥于化外。但蒙古人还是希望获得宗主权，即表面上的臣服。在周达观之前，蒙古皇帝向吴哥派遣了一个千户长和一个万户长，让他们去宣旨，逼迫对方臣服，不想两人一去不返，再无消息。

于是，蒙古人只好再派使者，这就轮到周达观出场了。

公元1296年（元贞二年），周达观接受了朝廷的命令扬帆出海，前往吴哥的土地，历时一年半，对吴哥进行了详细的观察。[159]

他坐船从温州离开中国，经过福建、广东外的海洋和港口。在当时，从广东往外的海洋叫作七洲洋，从海南岛往越南方向则是交趾洋。他经过交趾洋到达占婆。现代的越南在当时是由占婆和南越两个国家组成的，其中南越以红河三角洲为中心，而占婆占据了中部的顺化和中南部的芽庄一带。至于现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和湄公河三角洲，还属于柬埔寨（真腊、吴哥）的势力范围。

当时的占婆在北方的压迫下已经衰落，却还存在着。周达观从占婆再次出发，到达了一个叫作真蒲的地方，这里周围的海洋称为昆仑洋。在越南的南部海洋中有一片群岛称为昆仑列岛，昆仑洋指的就是周围的海域。

到了昆仑洋，距离湄公河三角洲就很近了。湄公河入海口有许多条支流，形成多个海港，周达观的船是从第四港进入内河的，其余的支流都因为沙多水浅而无法通大船。

进入内河行驶半个月，他们在一个叫作查南的地方换了小船，再前行十余日，渡过洞里萨湖（周达观称为淡洋），到达一个叫作干傍的地方，这里距离吴哥只有50里陆路了。

周达观是这一年二月二十日从温州离开，三月十五日抵达占城，由

于不顺风，到了七月才到达吴哥。他的目的是让吴哥臣服，吴哥也的确表示要服从大国。但人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外交，而是他看到的风土人情。

柬埔寨的土地上，早期是一个比较靠近大海的扶南国，之后扶南国被真腊国取代，真腊又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分别在海边和陆上建立首都。

之后，由于真腊与爪哇岛上的室利佛逝王国发生冲突[160]，被对方灭亡了。残余人士跑到了远离海边的三波坡雷古建立了新首都，这里至今还有一片寺庙群。之后，他们把首都迁往了更靠北方、靠近洞里萨大湖的区域，这里也就是后来吴哥的所在地。

建立两百多年后，吴哥文明达到了高峰，苏利耶跋摩二世和阇耶跋摩七世分别建立了小吴哥和大吴哥。但到这时，也就是吴哥文明走下坡路的时候了。由于花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去建立寺庙，这个文明的衰落是必然的。

周达观到来的时候，吴哥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正因为如此，那些辉煌的作品都已经完工，周达观看到的吴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哥已经很相似了。

他的记述中让现代人最感兴趣的是，除这位元朝的使臣之外，吴哥还有一批中国人在那儿做生意，当地人把这些人称为“唐人”，这表明当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为了贸易移居东南亚了。

通过一年多的观察，加上在唐人群体中四处打听，周达观的书将一个真实的吴哥反映给我们。

对一个游客来说，感受最深的也许是吴哥王权的威严。国王出行时，除前面的军马和旗帜鼓乐之外，还有宫女三五百人穿花执烛，自成一队。又有宫女带着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还有宫女手执标枪、标牌作为内兵，又成一队。

后面是羊车、鹿车、马车，以金为饰。大臣、皇亲骑象，红凉伞不计其数。国王妻妾，或轿或车，或马或象，用的是销金凉伞。

接着才是国王的仪仗，他本人立于大象之上，手持金剑，象牙套着金子。国王用销金白凉伞20余柄，伞柄都是金做的。国王四周簇拥着许多大象，大象之外是军马。

对于吴哥的等级制度，周达观也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建筑，他不吝笔墨地叙述了国王宫殿的奢华，然而，国君以下的房屋却显得简陋无比，甚至大臣的房屋也不允许全部使用瓦片，而寻常百姓人家更是片瓦不留，只准用草盖上屋顶。

在服饰上，这里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国王可以戴金冠，穿花布，但普通人只能缠一块围腰。

从周达观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制国家。

在柬埔寨所有的风俗中，最令周达观感到有趣的，是一种破处的仪式。在汉地，由于孔孟儒教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对于处女看得非常重。汉地的周达观来到吴哥，却发现这里的风俗不仅不看重结婚时是否是处女，还刻意要在女孩小时候找来僧道把她的处女膜刺破。[161]

当然，现代人最关心的还是周达观看到的建筑。

现代保存的吴哥核心区域，是由北面的吴哥王城（大吴哥）和南面的吴哥窟（小吴哥）组成的。所谓小吴哥，指的是一个带着城墙和护城河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由于雄伟无比，成了吴哥形象的代表。小吴哥的建造者是苏利耶跋摩二世[162]。周达观见到小吴哥时，称之为鲁班墓，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

为什么把吴哥窑称为鲁班墓？这与当地的传说有关。相传建造这座神庙的是一位仙女的儿子，曾经在大神因陀罗[163]天上的宫殿学习技艺，他也是柬埔寨人尊奉的建筑之神。这个传说到了居住在柬埔寨的唐

人口中，就把当地的建筑之神与中国传说中的鲁班相比。

至于为什么将吴哥窟说成是墓地，也可能是有道理的。吴哥窟建于吴哥王朝鼎盛的苏利耶跋摩二世时期，这位国王死后，遗骨可能就葬在了吴哥窟之内。

唐人们将这两个传说综合起来，将吴哥窟附会成了鲁班墓。

从吴哥窟西门出来，渡过宽阔的护城河，向北走半里许，在路的西侧有一座小山，这小山叫作巴肯山，是整个吴哥片区的制高点，也是看日落的最佳地点。山上也有一座寺庙。周达观称它为石塔山，当地传说这是鲁班——自然也指柬埔寨的建筑之神——一夜造就的。

从巴肯山东面的道路继续向北半里，就是著名的吴哥王城，也就是大吴哥了。如果说小吴哥只是个庙，那么大吴哥就是个典型的城池，是吴哥王的首都。

根据周达观的观察，大吴哥城墙周长20里，有5个城门，每个门都是两重。东墙上开有两个门，其余的几面各只开一个门。城墙之外是巨大的护城河，护城河上，在城门的位置架着壮观的石桥，桥的两侧有54个石头雕刻的神祇，规模巨大，面目狰狞。桥的栏杆做成蛇的形状，每条蛇都是9个头，54个神祇好像是在用手拉住蛇，防止它逃走。城门上有5个巨大的佛头雕塑，面向四方，中间一个用金装饰。门的两侧雕成石头大象。城墙用石头垒成，高约二丈。

这一段叙述非常精准，除了装饰用的金子不见了，现代的人们看到的城墙、城门、桥还是和当年一样壮观，不管是蛇状的栏杆、石头神祇，还是城门上的佛头，都还保留着。

那所谓的佛头其实是一张张的巨型脸庞，这是阇耶跋摩七世的创造，他在主要神庙和城门上都刻上了巨型的人脸（有可能有一部分是根据他的形象塑造的），现代人称之为高棉的微笑。

过了城墙，在吴哥王城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叫作巴戎寺。巴戎寺上也雕刻着200多张石脸。这些石脸和众多的塔尖，将巴戎寺塑造成世界上最诡异、最神秘的建筑。周达观将之称为金塔，这说明当时巴戎寺的主塔曾经用黄金包裹，但周围的20余座副塔却仍然是石头的。

根据他的叙述，巴戎寺的东大门外有金桥一座，金桥左右有金狮子两个。在旁边的石屋里还有金佛八个。这些黄金制品，以及桥梁的痕迹，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至今没有找到。

在巴戎寺的西北方向是巴方寺。从规模上来讲，巴方寺的高度是超过巴戎寺的，周达观称巴方寺为铜塔，表明当初寺表面覆盖着铜。

再往北就是吴哥王的宫殿了。由于宫殿是木制的，现在除巨大的石台之外，什么都没剩下。但在宫殿的园子里有许多土黄色的陶片，或许可以证明周达观称只有国王宫殿和大臣的主屋才能用瓦覆盖的说法是正确的。

虽然木质结构无存，但在王宫的花园中，也有一座石头的塔，这座塔保留了下来。周达观也称这座塔为金塔，表明当初它也覆盖了黄金。

在吴哥王城之外，还有三个巨大的池塘，分别叫作东池、西池和北池。周达观也记载了其中的东池和北池。

在历史上，许多国家由于文献不全，其历史和建筑往往要从中国文献中寻找痕迹。人们对于中国文献的重视，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之外，就属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了，其记载之详细和准确，让人们完全可以对号入座，一一寻找到吴哥周边的建筑。《大唐西域记》对于印度的部分记载得还不够详细，常常让人们猜测不已，但《真腊风土记》这本书即便现代人都可以作为旅行指南使用。从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蒙古帝国时代中国人对外部观察的一大成就。

然而，周达观只是作为一个使臣去往海外，他的使命是有期限的，他生活的区域也主要是在国内。他虽然记载了吴哥地区生活着一些唐

人，却并没有更详细地去考察这些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在元代，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住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真的移居海外了呢？

这个问题更加全面的答案也许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但根据流传下来的资料，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人不仅移居了海外，他们在海外的事迹还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只是，他们传奇的遭遇也只能在蒙古帝国时代才有可能发生……

第十三章 融入世界的中国人

巴琐玛：中国人欧洲行

直到公元1887年，人们在伊朗发现了一本书，才将一个中国出生的景教徒带回了历史的视野。这本书用古叙利亚文写成，记载的却是一个从中国直到西欧的真实传奇故事。[164]

故事的主人公叫作巴琐玛（Sawma）[165]。他可能是生活在汉地的维吾尔人或者汪古人，他的父亲叫示班（Shiban），母亲叫黑也姆都（Keyamta），生活在元朝帝都汗八里。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在他的教导下，琐玛也成了汗八里景教教堂的看守。[166]

与此同时，在山西的霍山，一位叫作马可斯（Markos）的人出生了，他是蒙古族，父亲叫伯颜尼勒（Bayniel），马可斯是他的第四个儿子。

成长为青年后，马可斯从霍山来到了大都。此时，琐玛已经成了汗八里的景教法师，他收留了马可斯，并度化了他。[167]

几年后，大约是在公元1278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也是蒙古灭南宋的前一年），两人相约一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蒙古人之前，由于地理知识的陌生，从中国到耶路撒冷的朝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蒙古时代，不仅道路已经畅通，还由于蒙古和周边民族中景教信徒很多，许多人都来自西方的中亚甚至更远方，使得中国对耶路撒冷的知识也很完善了。

两人从北京出发，首先到达马可斯的家乡霍山，再继续西行到达唐

古特，也就是西夏人的地域。当时西夏已经被蒙古人灭亡，只留下了以西夏命名的地方，包括从现代宁夏到敦煌的广大区域。离开唐古特之后，两人花了两个月穿越大沙漠，到了一个叫作老屯[168]的地方。再继续西行6个月就到了喀什噶尔（Kashgar），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

然而，他们在这儿遇到了麻烦。在蒙古大汗忽必烈称帝后，蒙古内部发生了分裂。首先是忽必烈和亲弟弟阿里不哥争位，后来则是窝阔台系的海都和忽必烈的长期战争，从公元1268年（元世祖至元五年）一直打到公元1301年（大德五年），才由于海都的死亡而告终。[169]老屯和喀什噶尔都是战场区域，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一路上由于战争的原因，显得萧条与混乱。在从老屯前往喀什噶尔的过程中，琐玛和马可斯遭受了兵灾和盗贼的威胁，却最终逃脱了。

从喀什噶尔继续向西，他们到了海都汗位于塔拉斯（Talas）河畔的营帐。海都汗给了他们必要的协助，下发了通关文牒，让他们可以绕道中亚，到达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在呼罗珊首都图斯（Tus）休整后，跨越伊朗到达伊朗西北的阿塞拜疆[170]。他们准备从这里去往曾经的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巴格达（报达）。

之所以去巴格达，是去见景教长老马屯哈（Mardenha），这个职位相当于是景教中的教皇，他的驻锡地就在巴格达。幸运的是，马屯哈当时没在巴格达，而是在伊尔汗国的都城马腊格[171]，比巴格达近了很多。于是，两位教士前往马腊格见到了教长。[172]

景教最神圣的教堂在巴格达旁边的泰西封，叫作柯克教堂，是历代教长登基的地方。两人见过教长之后，最终还是抵达巴格达，并参观了教堂，又拜访了周围的一系列圣迹。两人游览时并不知道，景教教长此刻已经在计划利用他们两人的身份了。

当两人来到西方时，景教教长马屯哈正在想方设法处理教会与蒙古人的关系。听说这两个人是从大汗国来的，其中一人是蒙古人，另一人

是和蒙古人比较亲密的维吾尔人或者汪古人，马屯哈认为在伊朗的蒙古人应该会尊重这两个从高贵之地远来的同族人，于是请求他们帮忙，向当时的伊尔汗阿八哈[173]索要赐封文书。这封文书可以将景教与蒙古政权挂起钩来，获得政权的保护。

两位教士欣然从命，于是从巴格达回到了马腊格。果然，蒙古汗王阿八哈对他们表现得非常尊重，将证书发给了景教教长。

完成任务后，他们接下来的使命就是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去看一看当年耶稣受难的地方以及犹太人的圣殿遗迹。当他们经过阿尼城[174]，到达格鲁吉亚时，却被盗贼堵住了去路，只好回到了教长身边。

教长劝他们暂时放弃耶路撒冷行程，回到汉地去帮助景教的发展。他授予马可斯大主教职位，琐玛也被授予巡查总监。马可斯改名为雅八剌哈（YahbhAllaha），成为契丹与汉地大主教。[175]

但是，从西方又如何回到汉地去呢？这又成了下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中亚的阿姆河地区，是波斯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分界线，波斯汗国支持元朝的忽必烈，而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金帐汗国则与波斯汗国为敌，于是双方在阿姆河分界点展开了战争。由于这次蒙古内战，琐玛等人回程的路被阻断了，他们只好在当地住下，等待机会回国。

就在这时，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景教首领马屯哈教长突然去世了。和天主教的教皇一样，景教教长也是选举产生的。在选举新的教长时，人们考虑到现在世界的统治者是蒙古人，在主教级别中，只有雅八剌哈一人是蒙古人，了解统治者的习俗和语言，于是雅八剌哈这个外来户突然成了景教新的教长。在得到伊尔汗阿八哈的祝福之后，雅八剌哈于公元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成了景教最高首领。

即便到现在，雅八剌哈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担任过基督教某派别全世界最高领袖的中国人[176]。

但这个职位并没有给这两个中国出身的人带来好运，却让他们在操

劳中度过了一生。

雅八剌哈担任教长不久，公元1282年，伊尔汗阿八哈就去世了。他的弟弟阿合马（贴古迭儿）继承汗位。与前两任伊尔汗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不同，阿合马崇信伊斯兰教，采取了迫害景教的政策。在阿合马时代，景教教长雅八剌哈有过短暂的入狱经历。[177]

幸运的是，阿合马在位的时间很短，两年后（公元1284年），在与阿八哈之子阿鲁浑的战斗中，阿合马身死，阿鲁浑成了新汗。[178]

阿鲁浑上台后，立刻改变了前任的政策，采取了联合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做法。他甚至想进攻耶路撒冷和埃及的伊斯兰教徒。[179]作为蒙古人，阿鲁浑深知联合的作用，于是，一次世界上最大胆的外交行动形成了：阿鲁浑要联合西欧的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作战。

蒙古人要和基督教合作，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这次行动能够成功，那么基督教将获得巨大胜利，甚至赢得蒙古人的皈依；而一旦丢失了埃及最后的据点，伊斯兰教则可能从世界上消失。

但问题是：到底谁能够帮助阿鲁浑出使欧洲呢？最合适的自然是同样信奉基督教的景教徒。于是阿鲁浑找到了教长雅八剌哈，而雅八剌哈推荐了他的同伴琐玛法师。

于是，风云际会中，在中国出生的琐玛法师，又有了向更西方前进的理由，他向阿鲁浑汗请求了书信和路条，以及送给各国君主的礼物，加上2000米斯科勒（Mathkale，每米斯科勒等于4.68克）的金子，出发了。[180]

从伊尔汗国出发后，琐玛法师从伊朗穿越北部区域，经过现代伊朗和土耳其的边界，到达土耳其境内的黑海沿岸，在这里登船前往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

在君士坦丁堡，他见到了东罗马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Andronicus Ⅱ）[181]，拜访了东罗马的众多圣迹，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路加所做的圣母像，施洗者约翰的手，拉撒路和抹大拉的尸骨，放置耶稣尸体的石头，耶稣用来把水变成酒的石碗，一位圣女的骨灰匣（用来治病），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大帝的墓，等等。

可惜的是，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衰落，很难与伊斯兰教抗衡，因此它也只是个出访的中间站，琐玛法师的最终目的地是意大利。

离开了君士坦丁堡，琐玛乘船进入爱琴海和地中海，前往意大利，他见到了著名的维苏威火山，最后在那不勒斯上岸。

那不勒斯的国王查尔斯二世对琐玛法师以礼相待。在这里，琐玛在城市屋顶上看到了一场海战。事情要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恩怨说起，这两处现在虽然都属于意大利，但在历史上，却曾经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这个国家最初由北欧的维京人控制，这些维京人从大西洋南下，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在西西里岛站稳脚跟后，又控制了那不勒斯。维京人之后，这个国家先后被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室和法兰西的王室控制。但在公元1282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由于来自法国的国王查理横征暴敛，西西里岛爆发了叛乱[182]，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中分离了出去。查理只控制了那不勒斯，却丢失了西西里，从此只能号称那不勒斯国王了。

分裂出去的西西里则邀请来自西班牙半岛的阿拉贡王室担任首领。在当时，西班牙也不是现在的西班牙，而是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南部是穆斯林控制区，北部有数个基督教的国家，阿拉贡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阿拉贡王室控制了西西里之后，原本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变成了法兰西控制那不勒斯，阿拉贡控制西西里。双方陷入了连绵的战争。

公元128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6月24日，阿拉贡和西西里的军队来到了那不勒斯海外，将那不勒斯击败，杀死了1.2万人。双方打仗时，市民们就在屋顶上观看，打胜的一方绝不袭击平民。这场战争恰

好被在那不勒斯的琐玛法师看到了，他对双方的绅士风度敬佩不已。

离开那不勒斯，琐玛选择了陆路去往罗马。在他前往罗马时，教皇洪诺留四世[183]突然去世了。枢机主教们忙着料理后事和选举新教皇，无法处理蒙古人的请求。琐玛与枢机主教们辩论了一番教义，之后参观了罗马圣地。

每一个宗教在历史上，都离不开对圣人的崇拜。对圣人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他们使用过的物品，甚至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进行崇拜，这就是圣物崇拜。欧洲的中世纪是圣物崇拜最盛的时期。在这个充斥着稀奇古怪物品的年代，罗马的圣物自然比君士坦丁堡更加丰富，琐玛瞻仰的圣物包括：圣彼得的尸骨，耶稣的裹尸布，使徒保罗的尸骨，保罗行刑前的铁链，圣司提反的头颅，为保罗施洗者的手，保罗的权杖，各种殉道者和神父的尸骨，耶稣的外衣，君士坦丁大帝受洗的盆，圣母的衣服，耶稣诞生时睡过的木头，使徒马太的头，腓力的脚，西庇太之子的手臂，等等。

琐玛的参观结束后，教皇还是没有选出来。枢机主教们让他先去别的地方参观，等新教皇选出后再回来。

于是琐玛去了位于现代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又去了热那亚，领略了热那亚的民主共和国。虽然是共和国，但也不乏各种各样的圣物，比如施洗者约翰的尸骨，耶稣用过的圣餐盘，等等。

之后，琐玛离开意大利，去了法国，见到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184]。腓力四世是一个强势国王，致力于扩大法国的影响力，对教皇也毫不手软。他统治的后期，曾经令和他敌对的教皇惊吓致死，在法国境内立傀儡教皇，于是教会的统治中心被迫离开了罗马，在法国城市阿维尼翁驻留了半个多世纪，才又迁回罗马。在会见琐玛时，国王对他的提议很感兴趣，承诺与蒙古人联合打击伊斯兰教。

琐玛在巴黎住了一个月，与巴黎的学者们见了面，又参观了历代国

王的墓葬。法国国王向他展示了耶稣受刑前的荆棘冠，受刑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并送给琐玛许多贵重的衣服和礼物。

离开巴黎，琐玛去了加斯科尼，在当时，这里是英格兰国王的领土，琐玛在波尔多城[185]见到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86]。英格兰国王也送给他许多礼物。

从加斯科尼返回热那亚，琐玛遇到了一位教皇的使者，他是由前任教皇派去给德国皇帝鲁道夫加冕的。琐玛向他抱怨，由于教皇未定，他不知道如何回国复命。使者答应帮助他打探消息。使者回到罗马，发现新教皇已经选出来了，称为尼古拉四世（公元1288年6月当选）。尼古拉教皇决定优先处理蒙古人的问题，于是将琐玛接回到罗马。

在罗马，景教徒和天主教徒怀着好奇心，互相进行了充分的试探。这两支分裂近千年的基督教分支再次重逢了。由于赶上了复活节，琐玛按照景教徒的方式领了圣餐，周围的人们都在观察着他的做法，最后得出结论：虽然语言不同，但教仪却是一样的[187]。

复活节过完，琐玛谢绝了教皇的挽留，决定回国。他带了一堆圣物回去，包括：一小块耶稣的衣物，一块玛利亚的头巾，一些其他圣骨，等等。另外给亚巴拉哈也带了礼物：一顶缀着珠宝的上等金冠，一些绣金的红色圣袍，缀着珍珠的鞋袜，教皇的一枚戒指，一封任命他为东方教长的书信（琐玛被任命为东方监察总监），当然还有1500米斯科勒金子。教皇甚至给蒙古汗王阿鲁浑汗也送了一些礼品。

但是，基督教和蒙古人的大联合却并没有达成。由于西欧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没有人能够代表欧洲，也就没有人能够与蒙古人展开谈判。蒙古人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总揽全局的人，他们总是从东方式思维出发，以为西方也有这样的一位领袖。但琐玛却只看到了一摊混乱，法国人、英国人各有盘算，而教皇却处于衰落的前夜，很快就连罗马都保不住，再也不是当年十字军东征时的一呼万应了。

这次出使的政治目的毫无成效，唯一成全的却是中国人在中世纪走得最远的旅行家。琐玛从北京出发，经过中亚到达了中东，再经过地中海前往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直到19世纪，才又有中国人超过了他的纪录，到达了更远方。[188]

琐玛回到伊尔汗国不久，阿鲁浑汗去世了（1291年），到了公元1294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月，琐玛也去世了。他的死亡正是时候，景教在伊尔汗国仍然位于高峰，他死后，由于蒙古人转向了伊斯兰教，景教迅速衰落。

死在他后面的雅八剌哈教长不幸地经历了更多的波折。阿鲁浑之后，继承王位的乞合都和拜都两王都死于被弑，随后上台的合赞汗已经是个穆斯林了[189]。合赞汗在伊斯兰教大臣的鼓动下，开始拆毁教堂，暗杀教士，雅八剌哈作为教长也受到了暴民的威胁。就在帝国的国都内，他被阿拉伯暴民们抓获，九死一生，数次逃脱又数次被抓，侥幸捡回了一条命。[190]

合赞汗后期，由于将信奉伊斯兰教的权臣铲除，为了稳固统治，开始对雅八剌哈给予一定的宠幸。但这种宠幸是有限度的，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为了权力平衡。[191]

合赞汗死后，即位的完者都（1304—1316在位）是个完全的穆斯林，他对于基督徒只是容忍。不幸的是，雅八剌哈的寿命竟然比完者都还长，又熬到了下一位皇帝不赛因时期。[192]

随着伊斯兰教的完全得势，在伊尔汗国内部发生了对基督徒的大屠杀。在一个叫作埃尔比勒[193]（Erbil）的地方，公元1310年（至大三年），伊尔汗国王室军队和库尔德人联手，将基督徒守卫的城市攻克，所有守军都被杀死。教长且哭且号，肝肠寸断，踩着尸体下山质问为什么基督徒受到这样的对待，并发誓再也不侍奉蒙古人（也就是他的本民族）。

由于他本人是蒙古人，即便信奉景教，国王也不会杀了他。蒙古人的身份又让他活了7年。到了公元1317年（延祐四年），这位来自遥远北京的教长终于死在了伊朗的土地上，随着他的死亡，景教在蒙古的黄金时代正式落幕。[194]

随着景教黄金时代一同落幕的，还有那个基督教与蒙古人联合对付伊斯兰教的梦想。这个梦想最早发端于西欧，西欧认为蒙古人就是传说中的约翰长老，会帮助他们一同进攻穆斯林。在一厢情愿下，他们派出了众多使者，去说服蒙古人，但这时候的蒙古人正处于征服世界的亢奋中，并不把这样的提议当真。

虽然没有当真，但蒙古人天生的宗教宽容却容忍了基督教在内部的发展。得益于这种宽容，即便在遥远的大都，教皇也建立了传教组织，对中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到了明清时期又被遗忘了，直到近代才又恢复。

蒙古人唯一一次将大联合当真，是在伊尔汗国的阿八哈汗时代。但是机会摆在面前时，这时基督教主导的西欧却由于过于分裂，并没有准备好。最后的机会就这样白白流逝。

最后，当罗马教皇和西欧的国王们终于意识到这样的联合大有好处时，蒙古人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转头选择了伊斯兰教。于是，西欧在短时期内联合蒙古人，压倒伊斯兰教的梦想破灭了[195]。

表17 巴琐玛的旅程[196]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	自大都西行前往圣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	在巴格达任景教协会总视察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	奉伊尔汗命出使欧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	旅行拜占庭、罗马、法、英、意等国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因年老，请在马腊格筹建教堂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	教堂建成。赴巴格达襄助主教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	带病往埃尔比勒公干时去世

汪大渊的海上世界[197]

除了琐玛这样的信仰者，在中国的商人中也有人长期漂泊在外。比如，在公元1304年（大德八年），就有一位叫作杨枢的人从中国出发，乘船前往波斯湾内的霍尔木兹，来回共用了五年时间。[198]

而更加著名的则是一位叫作汪大渊的人，他不仅两次乘船前往海外，在海外停留了数年[199]，回来后，还将自己的观察整理了一本书，并流传到现在[200]。

这本书与宋代流传的海外见闻不同，宋代的书所记载的内容大都是文人们从商人处打听到的消息，而作者本人并没有出过国。汪大渊的书记载的却基本上都是作者本人去过的地方，因此，它很少引用外来的资料，只是记录自己的观察，价值也更加显著。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跟随郑和的马欢更是肯定了汪大渊描写的准确性[201]，使得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践行者，而不仅仅是资料收集人。

汪大渊可能生于公元1311年（至大四年）[202]，到了公元1330年（元至顺元年），刚刚成年不久的他第一次随船出海。这一去就是数年。他的第一次出海也是选择了当时的主流区域，也就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的线路，他从中国出发后，经过了东南亚前往印度，

再从印度去往中东地区，最后可能到达过非洲海岸。

回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到了公元1337年（元惠宗至元三年）冬，汪大渊第二次出海，这一次以东洋为主，也就是在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海洋上，向菲律宾、文莱等地航行。他可能于三年后返回国内，在海外停留时间一共可能达八年之久。

除时间长之外，由于大部分地区都属于亲自前往，他记载的地点也是最多的。在宋代的几本著作中，最多记载了五十几条地名[203]，而记载郑和下西洋[204]的三本书加起来一共只有46个地名。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由于是官方行为，他的舰队实际上忽略了许多地方，特别是东洋地区，更是他航行的空白点。汪大渊却一共记载了99个地名，由于许多条目下都有更多的附属地名，全书中异域地名的总数加起来，有220个以上[205]。

汪大渊的海上行程从泉州出发后，经过两昼夜的航行，首先到达的是澎湖。这里还属于元朝管辖的地界，隶属于泉州晋江县，每年的税收只有盐税一项，税额是中统钱钞10锭25两。[206]一个地方是否属于某个国家，其重要标志是：它是否向这个国家纳税。从这个角度说，虽然税额很少，只是象征性的，但依然可以证明澎湖列岛早在元朝就已经属于中国。

接下去，他详细记载了台湾在原住民时代的情况。到了清代，中央政府从郑成功开创的郑氏政权手中接管了台湾，将之完全纳入中国版图。在之前的三国时期、南宋和元代，虽然中央政府也曾经出兵台湾，但台湾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原住民文化，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影响区域。

在汪大渊笔下，台湾岛与已经属于中央政府的澎湖，在民俗上是有差异的。这里的土地肥沃，适合种植。但这里的人还不会制造舟楫，只有简单的筏子；不管男女，都把头发盘起来，穿着花衣服。他们懂得煮海为盐，也会用甘蔗制酒。这里也有长幼尊卑，但对外来人却并不友

好。如果有人在这里犯法，很可能会被吃掉。[207]

离开台湾后，他们去了菲律宾，再从菲律宾外海前往占婆等地，这样的道路使得汪大渊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走遍，没有遗留，这一点甚至是郑和都做不到的。郑和的航线更加偏西，对于台湾以东、菲律宾以外等东洋地区并没有覆盖。

在旅途的最远处，越过印度之后，汪大渊也到达了中东和非洲海岸上，他记载的最遥远的一批地名是麻呵斯离、甘埋里、马鲁涧、层摇罗、天堂、哩伽塔、阿思里等。[208]这些地方让他成了海外航行最远的中国人之一。

然而，汪大渊的旅程并没有像马可·波罗那样，在故乡激发起更强烈的好奇心，反而慢慢被遗忘了。他记录的那些地名甚至现在都充满了争议，需要人们不断地考证。他的书在明初还有人读，并被郑和的船队验证，但后来则被认为是如同《山海经》一样的神话，不予理睬。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中国人就失去了对外的好奇心了呢？为什么东西方在都出了探险家之后，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不幸的是，东西方在好奇心上的分道扬镳，也恰好发生在元朝。

中国终于落后了

蒙古人的统治从东方的中国，到西南方的伊朗、叙利亚，再到西北方的俄罗斯，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由一个民族进行统治，对现代世界的影响自然不容小觑。但蒙古人也给世界留下了两个谜团。

第一个是关于蒙古帝国本身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在蒙古人之前，唯一能够和它媲美的帝国是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从西面的西班牙和南面的北非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跨越了亚、欧、非三个大洲，足以和蒙古帝国最大的疆域媲美。在阿拉伯帝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曾经如此广大；在蒙古帝国之后，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控制过这么多的土地和人种。

阿拉伯帝国灭亡后，他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遗产——伊斯兰教。这种宗教直到现在仍然强势，在阿拉伯帝国倒台之后，伊斯兰教仍然在扩张，它继续传播到了西非、东非沿海地区、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可以说，伊斯兰教已经脱离了阿拉伯人的掌控，变成了一种自我生长的宗教。

然而蒙古帝国灭亡之后，却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除了在各地留下不少蒙古人后裔[209]，大部分地区的人们对蒙古统治时期缄口不提，尽量将它忘掉。在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汗国中心地区，人们宁肯相信蒙古人打扰的那数百年时光是一段历史的弯路，既然是历史弯路，就赶快忘掉算了。中国虽然把蒙古人的帝国纳入了中华文明的体系之中，但对于元朝的研究也同样薄弱，到了明代更是将蒙古人的遗产当作垃圾全部清除。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把打败蒙古人的日子当成了节日，埃及人、印度人、越南人、日本人、印尼人都分享着这份荣光。

那么，为什么蒙古帝国没像阿拉伯帝国一样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呢？为什么他们的统治曾经让人们穿行世界变得更加容易，但人们却不感恩呢？

答案或许在于：蒙古人由于过于注重物质，缺乏产生一种思想体系的能力。他们将征服的关注点放在了物质需求上，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化，更倾向于让各个归顺的地方各自为政，保留自己的信仰传统，只要求他们缴纳一定的税收，并且这个税收也不算高[210]。这样的做法使得帝国内部充满了矛盾，无法整合为一个整体。在帝国中，蒙古人一直是高人一等的，其余民族想要分享政权变得困难重重，而通婚带来的同化速度又满足不了人们的渴望。

阿拉伯人却利用伊斯兰教对每个地方的人都进行了思想格式化，在

经过两三代人之后，这些人都以成为穆斯林为荣。穆斯林这个身份成了人们共同认同的标签，并让国家更加稳定。

此外，蒙古人由于缺乏信仰，在每个地区的汗国必须选择一个和当地匹配的信仰，于是中国部分选择了佛教，而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选择了伊斯兰教。在选择外来宗教的过程中，皇族内部也出现了分裂，更增加了帝国的不稳定性，于是，巨大的帝国维持了100年左右就崩塌或者分裂了。

一旦帝国消失，由于缺乏文化特征，蒙古人的遗产几乎瞬间消失殆尽，蒙古民族又变成了蜷缩在北亚的一个小民族。

蒙古人留下的第二个遗产是关于中国的。人们一直怀有疑问，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世界。许多人将年代定在了明代。但事实上，从元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颓势。首先是在好奇心和地理探索上被西方超越，其次，随着西方发现了工业生产的秘密，中国的经济也自然就落后了。

在唐宋时期，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是低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因为伊斯兰世界恰好位于已知世界的中部，起到了连接点的作用，对东方和西方都有所了解。但如果把中国和西欧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至少比西欧国家对于世界的了解还是多一些。唐宋时期就已经知道了非洲的存在，对于欧洲的罗马更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所了解。唐宋时期中国人在海外贸易上和造船技术上也已经赶上了阿拉伯人，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但是，到了元代时，西欧世界开始发力超车了。由于蒙古人将东方的碎片整合在一起，欧洲人开始穿越欧亚大陆直达东亚，并启动了对东亚的探索。不管是马可·波罗还是传教士都将东亚的知识带了回去。虽然这些知识有的并不确切，却激起了西方的好奇心，加上东方产品对西方的冲击，使得欧洲人一直有着进入亚洲的中国和印度的渴望，这种渴

望造成了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并推动了工业革命。

与之相反，元代的中国却变得更加保守。这主要是因为北宋和南宋两次亡于游牧民族的冲击，中国人对此做出的典型反应是排斥而不是融入世界。这影响到元代统治者对世界的态度。

其次，元代对于中国南方的整合也一直没有完成。南方虽然并入了元帝国，却处处受到歧视，尽管保持了繁荣，在社会地位上却是低人一等的，因而缺乏政治、经济统一的内在需求。

在元代，除少数如汪大渊这样的人愿意走出国门，去海外看一看或者生活一段时间之外，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对外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大量外国人却借助蒙古人来到了中国，他们惊叹于中国的富庶之余，也将冒险的渴望种入了文化的基因之中。

所以，蒙古人的冲击给西方带去了想象力，促进了他们的探索和地理大发现，与此同时，却激起了中国人的排斥心理，让他们将首要目标定在了维持现状，而不再是向外探索。这种差异，使得明代变成了一个故步自封的帝国，并迎来了中国最保守的时期。

一句话，蒙古人把世界主义带给西方的同时，却给中国留下了唯一的选项——民族主义。

在这个时期之前，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现代对许多周边文明的知识是依靠中国的典籍记录下来的。但从明代开始，中国的史料编撰也变得更加故步自封，随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反而是欧洲对东方和中国的记录越来越多，也更加多样化。这使得我们在后面部分对一带一路的考察，不仅不能只依靠中国的史料，反而更多依赖于外国人的记录，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了。

注释

[1]参考《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一章。

[2]所谓法兰克，是中东地区对于西欧人的称呼。

[3]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于公元1096年（绍圣三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于公元1147年（绍兴十七年）。

[4]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这次十字军的规格最高，德国皇帝、英国和法国国王都参与其中。

[5]参考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6]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7]这里从古希腊开始就是欧洲文明影响的地区，后来被东罗马、土耳其殖民，最后变成了俄罗斯的领地。

[8]参考《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二章。

[9]参考［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4—514页。

[10]此时波斯汗国的领袖仍然是旭烈兀，《史集》第三卷中的旭烈兀汗传记载了此次战役。

[11]据《多桑蒙古史》，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1262年11月。

[12]参考《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三章。

[13]如果波罗兄弟的回忆准确，这一年也应该是旭烈兀死亡之年。

[14]也叫开平，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

[15]参考《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七章。

[16]可参考道森编著的《出使蒙古记》。

[17]阿卡在十字军时代发生了很多次战争，包括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著名的阿卡围城战。

[18]当选的时间是1271年。

[19]蒙古人时期，阿尤布王朝除了埃及，也包括了叙利亚，甚至将首都设在了大马士革，但丢失了叙利亚之后，阿尤布王朝名存实亡。

[20]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萨拉丁的对手是著名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

[21]参见本书作者所著《穿越百年中东》。

[22]不是现在的土库曼斯坦，而是土耳其东部的山区。

[23]参考《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二三到二八章。

[24]马可·波罗叙述的阿拉穆特城堡地点并不准确，所以，他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而非亲往。

[25]目前一款著名的网络游戏《刺客信条》的最初情节，就是和这个组织有关。

[26]［伊朗］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也叙述了旭烈兀对刺客派的征服。

[27]参考《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四〇到四二章。

[28]参考［伊朗］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第二十一章。

[29]参见《马可波罗行纪》，至第一卷结束。

[30]参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

[31]参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初。

[32]他称之为“蛮子国都行在城”，因为南宋人称杭州为“行在”，也就是皇帝暂时的居所。“蛮子国行在”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一百五十一章。

[33]即今福建省泉州市。

[34]纸币的情况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九十五章。纸币的危害，见本书作者所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35]阿鲁浑已经是波斯汗国第四代王。《史集》第三卷的阿鲁浑传记载了他的六个王后和四个妃子，其中有两个王后叫布鲁罕，一个先阿鲁浑去世，另一个死在阿鲁浑之后。马可提到的应该是第一个。

[36]蒙古人对海洋诸国的进攻，可参考《元史》，以及《草原帝国》。

[37]现代的霍尔木兹在一个小岛上，但古代最早的霍尔木兹却在大陆上，现在被称为阿巴斯港。

[38]参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十八章。

[39]参考《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纪。

[40]两人之间还有一个西莱斯廷四世（Celestine Ⅳ），在位不到二十天。

[41]参考本书作者的作品《穿越非洲二百年》。

[42]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43]这位教友叫班努瓦（Benoit），见《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44]参考《史集》第二卷的窝阔台合罕传。

[45]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九章前十节。

[46]这是蒙古人第二次西征留下的尸骸。

[47]乃蛮人曾经占据了蒙古西部，是成吉思汗的劲敌，后成吉思汗将其击败，统一了蒙古地区。

[48]前一个日期为基督教的圣母升天节，后一个为圣巴尔泰勒米节。

[49]参考《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九章剩余四十二节。

[50]参考［法］伯希和撰，冯承均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2页。

[51]拔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贵由是另一个儿子窝阔台的儿子。

[52]在阿思凌之前，可能还有一位叫作劳伦斯的僧侣奉命前往，但他不一定抵达，也有可能是缺乏资料。见《蒙古与教廷》《鲁布鲁克东行纪》。

[53]参见［法］伯希和撰，冯承均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72页。

[54]这是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55]参见［法］伯希和撰，冯承均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2—234页。

[56]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

[57]现新疆额敏县附近的额敏河南岸。

[58]参考《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一章。

[59]参考《鲁布鲁克东行纪》第四章。

[60]见本书第三部。

[61]参考《鲁布鲁克东行纪》第十七章。

[62]参考《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三十章。

[63]即中国北部。

[64]参考《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三十四章。

[65]参考《海屯行纪》。

[66]也就是古代的木鹿城。

[67]这也是丝绸之路的正线之一。

[68]贵由汗死去的地方。

[69]即北庭，在现新疆吉木萨尔县境。

[70]参考（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

[71]参考《西游录》。

[72]录两首丘处机的歌谣为证：还丹要妙筑基先，筑得基牢寿命延。延寿须饮延命酒，饮将一得返童颜。（其一）月在当头星在天，阴阳妙处岂言传。人将纸上寻文字，看尽丹经也罔然。（其二）

[73]事实上，公元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丘处机曾受金国皇帝邀请去过燕京。他拒绝再次去见皇帝发生在公元1216年金朝灭亡前期。

[74]蒙古人请长春真人丘处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有使用外国人的传统，但本节所述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

[75]这条路和马可·波罗的父亲所走的道路有所重合。

[76]参考《长春真人西游记》。

[77]本书作者去往蒙古时，曾赶上他们的那达慕大会，现在蒙古人赶那达慕大会的情况，与古代毫无二致，只是现代人已经不再骑马，而是驾车前往，使得会场突然聚集上万辆汽车，异常壮观。

[78]本书作者曾于2013年7月15日到17日从这里路过，所看到的景象与李志常描写的非常接近。文中出现的所谓石河和峡谷，就是我所看见的楚鲁特峡谷，海子就是人称白湖的查干湖。

[79]即今准噶尔盆地中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部。

[80]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81]即今新疆昌吉。

[82]在今新疆霍城县东。

[83]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

[84]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

[85]即今阿富汗的巴尔赫。

[86]即达鲁花赤。

[87]以下内容引自《世界征服者史》。

[88]位于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地带，咸海以南，现在称为库尼亚-乌尔根奇。

[89]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

[90]即今阿富汗加兹尼。

[91]位于现在的伊朗。

[92]参考耶律楚材《西游录》。

[93]耶律楚材称为阿里马城。

[94]即大石林牙。

[95]即今河北省涿鹿县。

[96]参考《元史·选举志》。

[97]参见［法］伯希和撰，冯承均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72页。

[98]其领地在蒙古西部。

[99]参考《元史·爱薛传》。

[100]参考《元史·释老传》。

[101]即元大都。

[102]本书作者亲自去丹吉尔拜访过白图泰的墓地。丹吉尔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南，距离白图泰墓地不远处，就可以隔着海峡望见西班牙的土地。

[103]参考《白图泰游记》上册，“从马格里布出发旅行”。

[104]位于现代阿尔及利亚。

[105]位于今突尼斯。

[106]位于今利比亚。

[107]这个港口出现在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记载中，是当时的主要港口。

[108]对传统穆斯林来说，至今开罗仍然被称为米素尔，而亚历山大被称为伊斯坎德里亚（或伊斯坎德伦）。

[109]马木留克王朝之前的阿尤布王朝的开国者。

[110]注意，这是黎巴嫩北部的的利波里，不是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他们的阿拉伯名字是一样的。

[111]参考《白图泰游记》上册，“圣寺和圣陵”。

[112]参考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

[113]即波斯汗国，旭烈兀汗国。

[114]合赞汗是波斯汗国第七代大汗，见《史集》第三卷。

[115]波斯汗国第八代大汗，见《多桑蒙古史》第七卷第一章。

[116]波斯汗国第九代君主，见《多桑蒙古史》第七卷第三章。

[117]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0—493页。

[118]也是现代沙特阿拉伯通往朝觐地的主要港口。

[119]现位于现代肯尼亚境内。

[120]现在是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

[121]参考本书作者所著《穿越非洲两百年》。

[122]现在叫阿巴斯港。

[123]本书作者对这里进行过考察。

[124]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08—510页。

[125]事实上，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都是蒙古化的突厥人，并非乌兹别克汗的直系后裔。

[126]这是因为白图泰是摩洛哥人。

[127]他称为伊拉克苏丹。

[128]即乌兹别克苏丹。

[129]突厥斯坦及河外地区苏丹。

[130]乌兹别克汗将妻子称为哈同。《白图泰游记》上册，“第三哈同”。

[131]即现代的巴基斯坦。

[132]参考本书作者所著《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133]参见［塔］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4卷（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3页。

[134]玄奘称之为曲女城，见《大唐西域记》。

[135]参见［塔］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4卷（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143页。

[136]南宋开禧二年，也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那一年。

[137]参见［塔］M.S.阿西莫夫、［英］C.E.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4卷（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223页，以及本书作者所著《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138]参考本书作者所著《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139]参考《白图泰游记》下册。

[140]《白图泰游记》下册，从“苏丹的残酷无情”一节起，作者用了许多章节描写他杀人的故事。

[141]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15—582页。

[142]即今斯里兰卡。

[143]即当时的马里帝国。

[144]《白图泰游记》下册，“巴格达苏丹”之后的“故事”。

[145]《白图泰游记》和《马可波罗行纪》一样，不是他本人记录的，而是由他口述，一位叫作伊本·朱赞的人记录下来的。

[146]《元史·百官志五》还提到了一种管理也里可温的官员——崇福司。

[147]参考《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148]鄂多立克花了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记载这里的基督徒殉道情况。

[149]鄂多立克书中的顺序有点乱套。比如，他记载的是先到达苏门答腊，才到达斯里兰

卡，这可能是编辑者搞错了顺序，因为鄂多立克记载得很详细，很难说是他编造的。

[150]参见两唐书的《黄巢传》。

[151]即今南京。

[152]参考《鄂多立克东游录》第二十九到三十五章。

[153]参考《鄂多立克东游录》第四十五章。

[154]发现吴哥的是法国人穆奥。他认为这些庙宇足以和所罗门神庙相比，是古代的米开朗基罗建造的，并认为这些建筑太先进，而当地生活太落后，很难说是他们造的。之后，欧洲人试图寻找依据，从希腊的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图拉真皇帝寻找可能性。

[155]参考《大越史记全书·本纪陈纪》。

[156]即今越南的南部。

[157]参见［法］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蔡华译校：《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31—336页。

[158]参见［法］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蔡华译校：《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97—402页。

[159]根据《真腊风土记》转写。

[160]真腊转换成吴哥的过程本书前文已经叙述，这里根据阿拉伯人艾布赛德·哈桑的记载再次简述。

[161]周达观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这个仪式，见《真腊风土记》。

[162]小吴哥和大吴哥的建造年代和建造人，见本书第三部。

[163]印度教神祇。

[164]这本书是由库尔德斯坦的迦勒底人所罗门在德黑兰发现的，原持有人是一个景教青年，人们根据书中的主人公定名为《巴琐玛西行记》。

[165]也叫拉班·扫马，拉班是叙利亚文教师的意思。

[166]参见《巴琐玛西行记》第一章。

[167]参见《巴琐玛西行记》第二章。

[168]可能是和田发音的误写，从和田到喀什噶尔用6个月的原因是因为战乱，见下文。

[169]参见《史集》第二卷，《草原帝国》第七章第四节。

[170]并非现代国家阿塞拜疆，而是指地理上的阿塞拜疆，包括了伊朗西北的阿塞拜疆省，以及阿塞拜疆整个国家。

[171]位于现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

[172]参考《巴琐玛西行记》第三章。

[173]他是波斯汗国的第二任君主，也是首任君主旭烈兀之子。

[174]现土耳其境内，原亚美尼亚巴格拉提德王朝首都阿尼（Ani）。

[175]参考《巴琐玛西行记》第四章。

[176]参加雅八剌哈登基大典的有七位大主教和二十四位主教，见《巴琐玛西行记》第五章。

[177]参考《巴琐玛西行记》第六章。

[178]参考《史集》第三卷，阿鲁浑汗传。

[179]参见《出使蒙古记》道森的导读。

[180]琐玛法师出使的内容摘自他的传记第七章。

[181]公元1282年到1328年在位。

[182]即著名的西西里晚祷事件。

[183]公元1285年到1287年在位。

[184]公元1285年到1314年在位。

[185]当时波尔多属于英格兰的领地。

[186]公元1272年到1307年在位。

[187]在第一次过罗马时，他们还进行了信条的比较，见巴琐玛的传记。

[188]见下文谢清高（《海录》）和樊守义（《身见录》）事迹。

[189]参考《史集》第三卷，合赞汗传。

[190]参考《巴琐玛西行记》第十一章。

[191]参考《巴琐玛西行记》第十二章。

[192]参考《多桑蒙古史》第七卷第一章和第三章。

[193]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

[194]参考《巴琐玛西行记》第十九章。

[195]参考《出使蒙古记》道森导读。

[196]根据《巴琐玛西行记》制表。

[197]本节参考了杜君立关于汪大渊的文章，感谢文章作者主动提供资料。

[198]参考《岛夷志略校释》引言，引《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

[199]根据推测，可能有八年之久，但由于资料缺乏，事实上有多久已经不可考。

[200]即《岛夷志略》。

[201]参考马欢《瀛涯胜览》序。

[202]由于中国人不喜欢记载年份和经历，除汪大渊第一次泛海的年份公元1330年之外，其余的年份大都是推测得到的。

[203]参考《诸蕃志》。

[204]参考《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205]参考《岛夷志略校释》序言。

[206]参考《岛夷志略·彭湖》。

[207]参考《岛夷志略·琉球》。

[208]见《岛夷志略》各自章节。麻呵斯离即今伊拉克摩苏尔，甘埋里即今霍尔木兹岛，马鲁涧即今波斯汗国早期首都马腊格，层摇罗即今东非桑给巴尔岛，天堂即今麦加，哩伽塔可能在今也门亚丁，阿思里即今埃及红海海岸。有的地名与今对应是有争论的，比如哩伽塔，就有人认为是北非（马格里布），阿思里也有人认为是在今印度半岛西部沙漠地区，但考虑到作者航海的性质，似乎没有可能前往地中海。

[209]比如，在阿富汗地区的哈扎拉人就是蒙古人的后裔。

[210]日本人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讨论过蒙古税收的问题。

第五部 帝国依旧，中央已失

第十四章 利玛窦：敲开封闭之门

获得南方的立足点

公元16世纪末，一批欧洲的传教士在东方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依然是那个中央帝国，伊斯兰教在中亚和印度依然占据主流，但在欧亚大陆的一个角落里，接连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已经悄然改变了世界各地人类的命运。

这里不提文艺复兴，单说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人已经经过非洲、印度进入了东南亚，并来到了中国的家门口[1]。

然而，与西方的世界主义相比，中国的明代却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朝代，坚持封闭，对外界的事物既不感兴趣，也不让它们进入国内，对人的管控更是严格。虽然人类的命运已经进入了不可逆的全球化轨道，但对于不同地方的人的影响，却并非是同步的，不同的地方对于影响的感知可以相差数百年。在美洲，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的印第安人迅速体会到了全球化的苦果，军事征服、古怪的疾病接踵而至，让他们毫无准备的时间。而在中国这样的最东方，本来是最晚受到

影响的地方，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去应对这样的冲击，然而不幸的是，明代的皇帝和官员对于世界的改变竟然毫无所知，依然按照数千年惯有的节奏去理解这个世界。

在这个节奏中，外国人都被称为蛮人，是不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以免造成血统污染和管理难题。欧洲的传教士们就受制于明朝皇帝的这种认知，被挡在了大门之外。

但最终，传教士还是想方设法进入了中国，并登堂入室，甚至成了官场达人，获得官方的认可。

那么，这些传教士们是如何让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们放下戒心，接纳了他们呢？本章就详细考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过程，他如何从一文不名的传教士，在处处设防的中国社会突围，并获得皇帝的认可[2]。

在明代时，第一个想要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虽然元代时在中国曾经有传教团体，但随着蒙古人的撤出和中国的闭关锁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已经有200年的时光，想要回来并不容易，沙勿略就是第一个尝试的人。

在印度果阿的一个教堂内，至今存放着沙勿略没有腐坏的尸体[3]。沙勿略死后，人们根据他对天主教会的贡献要把他封为圣徒，但要封圣，必须有一定的神迹才可以。沙勿略的尸体是装在一口棺材中，经由海上从中国送回印度的，当人们打开棺材时，发现他的尸体没有腐坏，认为这就是神迹，于是给了他圣徒的称号。

沙勿略最早听说中国是他在日本传教时。当时，耶稣会在亚洲传教的中心设在了印度的果阿（Goa），这里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的大本营，负责印度和印度以东所有地区的外交、贸易和军事行动。而耶稣会是一个隶属于教皇的传教组织，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虽然教士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以葡萄牙人为最多。加上葡萄牙人是早期的海洋霸主，耶稣

会也将中心设在了果阿，在东亚其余地方的传教行动大都隶属果阿的天主教中心。沙勿略也不例外，他是从果阿被派往日本去传教的。从日本回来后，他向果阿的葡萄牙总督和主教申请前往中国，并获得了允许，在商人的资助下组织了一个传教团。

但从果阿出发后，这个传教团却受到了重重阻碍。首先是在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他受到了当地葡萄牙总督的阻挠，这是因为总督与资助教团的商人之间有矛盾。摆脱了总督之后，沙勿略来到了距离中国大陆30海里的上川岛。从日本回果阿时，他曾经在上川岛停留过[4]。在当时，澳门还没有成为葡萄牙人的贸易点，中国与葡萄牙（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都是在上川岛上进行的。

虽然明朝政府拒绝民间与外国人贸易，但随着朝代的延续和海上贸易的兴起，这样的禁令已经无法阻止民间自发的贸易了。于是地方政府只好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将外国人的贸易限制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即便这样，政府还不放心，为了避免外国人得寸进尺，又对上川岛进行了严格的防范。首先不允许海岛上有永久性建筑，只准建设临时性的棚子。其次，明朝的水军对海岛进行了严格的监视，防止外国船只向大陆进发。在大陆上河口附近的港口，也是命守军严格封锁，防止外国人登陆。[5]

在这样的防守之下，沙勿略要想进入中国可谓困难重重。他设想过几种方法，包括：第一，让中国人带他偷渡上岸，上岸后就去找中国官府说明来意，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善意，见到官员后，可以获得他们的准许；第二，就在他到达上川岛的当年，还有一个暹罗[6]的使团要前往中国，这个使团是得到皇帝允许的。根据中国的政策，这些使团除正使之外，往往还可以带一定员额的商人一同前往，这些员额是可以买卖的，是使团捞取外快的方法之一。沙勿略联系了这个使团，希望能给他留一个位置，让他跟随进入中国[7]。

但这些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沙勿略突然死了。他死于公元

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2月2日，死后尸体被运回了果阿。他倾心于中国，却始终被拒之门外。

沙勿略死后，随着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发展，欧洲的一次机会到来了。

在明代历史上，有一次著名的事件叫作“隆庆开关”。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老皇帝死了，继位的隆庆帝性格仁厚，在位时间也不长。[8]但他在位时期，致力于改变前朝的对外政策。他对北方扰乱中国的蒙古俺答汗采取了和平姿态，而在南方，则废除了明代从成祖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部分放开了民间对外贸易。[9]

这次政策调整的成效是巨大的，不仅让中国得到了海外输入的巨量白银，也为中国东南部的工商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清代1840年之前的铁板一块不同，明代晚期由于隆庆开关的作用，事实上放松了对外国人的管制，也给外国人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对葡萄牙人来说，好处是，明朝政府终于允许外国人在一个叫作浪白澳的地方停留，之后又迁到了更加方便贸易的濠镜澳，这里后来以澳门这个名字闻名于世。上川岛只是一个岛屿，澳门却与大陆相接，且就在珠江口附近，距离欧洲人进入中国更靠近了一步。[10]

几年内，葡萄牙人就霸占了澳门的经商权，把澳门建设成了一座小城的规模，耶稣会也乘机在澳门建立了一座教堂，形成了一个永久性据点[11]。

这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作为视察员巡视印度教团时，提议在澳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区。之前的传教士直接归果阿管辖，设立教区后，果阿虽然还是东亚传教最后的管辖中心，但一般的管理事务则转移到了澳门。于是，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成了澳门教区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随着广东当地官员尝到了贸易的好处，对葡萄牙人的禁

令也进一步放松。葡萄牙人获得允许，在一年里有两次机会离开澳门，到省城广州去参加集市。两次集市的时间分别是一月末和六月末，一月主要销售印度产品，六月销售日本产品。

到了集市时间，葡萄牙人被允许乘船到广州，白天在集市上卖东西，晚上回到船上休息，每次集市的时间大约是两个月。

借助集市，传教士罗明坚伪装成商人，不仅混进了广州城，还由于和海道副使黄应甲[12]建立了联系，获准不用回到船上居住。广东的官员由于接触海外贸易最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中央政府保守风气的倾向。他们注重镇压叛乱和保护当地安宁，但对贸易却往往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结交了海道副使之后，接下来，罗明坚要攻克的是两广总督陈瑞，也就是两广的最高长官[13]。当时两广总督府并不在广州，而是在两广交界处的肇庆，这里更加安静，也便于协调广东和广西的问题。

借助良好的学识和礼物，罗明坚获得了陈瑞的应允，要在广州划一片土地给传教士们，让他们得以永久性居住。如果这片地真的划给了他们，这将是西方人在明朝获得的第一个定居点。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陈瑞突然因为其他原因被朝廷免职了。新任总督郭应聘是一个长期征战在南方剿匪第一线的军事官员，为人正直廉洁，但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排外。[14]广州本来就是对外的商业中心，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郭应聘担任总督后，在减少了腐败的同时，却也让许多灰色地带也消失了。按照规矩，传教士是不允许进城的，但传教士们刚刚利用前任总督的关系获得了许可，他们希望后任总督能够承认自己前任的政策。罗明坚等人想方设法拿着前任总督的命令，进入广州去见郭应聘，不想郭应聘却铁面无私，按照规矩办事，将他们赶走了。[15]

这样，刚刚获得的许可就作废了。

正在传教士们失望时，却突然从肇庆传来好消息。原来是肇庆知府王泮来信，请他们前往肇庆，为他们提供了一块永久土地。

原来，传教士们在被新任总督赶出来时，无意中贿赂了一位总督的仆人，让这位仆人向总督求情。由于总督已经拒绝了他们，不便改口，只好授意手下肇庆知府，为传教士们提供一块土地。

这个事件的解读也是多方面的。有人将之解释为：彼时中国的官场上，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但任何事情又都是可以通融的，即便拒绝了，也可以想别的办法去做，哪怕是廉洁的官员也必须学会此道。

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郭应聘之所以也和前任一样容忍了外国人进入自己的辖区，也是因为广东地区已经在对外贸易中开化了。人们虽然轻视外国人，却也知道外国人的价值。加上明朝的官员比起清朝的官员有更大的自由度，总督知道，自己有权力划一片地方给外国人，也不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

在传教士后来的经历中，我们还会无数次看到，正是明朝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让明代后期形成了半开放的社会，容忍了西方贸易和科技的到来，从而产生了像徐光启这样坚持西方学问的高级官员和科学家。

正是在自由裁量权、广州的开放气氛以及官场规矩的多重作用下，西方传教士在肇庆获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大陆的立足点。

传教士进军北京

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明朝最著名的阁揆张居正刚刚去世一年[16]。张居正的变法已经是明王朝最后一次修修补补的改革尝试，与此同时，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到来：西方人正式进入了中国社会。

9月10日，传教士罗明坚和他的副手利玛窦到达肇庆。知府在西江

边上为他们划了一片土地，建设了明代中国的第一座教堂，这个教堂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仙花寺[17]。

教堂建好后，罗明坚回到澳门，将管理教堂的责任交给了利玛窦，这也让利玛窦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与他的上级比起来，利玛窦熟悉汉语，又有非常好的科学教育背景，正是他的拓展让基督教从肇庆出发，直达北京。

利玛窦除了写过一些关于基督的小册子，制作的最著名的产品是一份地图，叫作《坤舆万国全图》。虽然明朝在官方体系上仍然把中国当作世界的中心，但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下，有不少人开始理解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许多稀奇古怪的国名开始出现在人们耳中。官员们甚至以得到一份《坤舆万国全图》为荣耀。

利玛窦的另一个利器是一种三棱镜，这种物理学上的简单仪器能够将白光分成不同的颜色呈现。中国人由于缺乏玻璃，把这种透明的三棱镜当作稀有宝石，甚至认为是女娲补天的宝镜，争相参观。

利玛窦在肇庆的日子里，邀请他前来的肇庆知府王泮也升任了岭西道[18]官员，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传教士们甚至去了一次王泮的家乡浙江绍兴，并做了一次前往广西南宁的远行，试图扩大影响力，但都由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谨慎，没有获得成果，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误会。[19]

传教士们的命运转折点，发生于两广总督换人之时。批准他们住在肇庆的两广总督郭应聘把职位让给了一位叫吴文华的人。吴文华离职后，广西巡抚吴善升任两广总督。与前任相比，吴善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而更麻烦的是下一任总督刘继文[20]。

刘继文在明史上号称与海瑞齐名，也和海瑞一般有洁癖、刚愎自用。他上任后，认为允许外国人进入国内是违反纪律的，下令传教士撤离肇庆。

不同官员的不同做法，也可以看作明朝官场管理更加宽松的体现。在之后的清代，皇帝的意志可以一贯到底，不允许有任何违背，但明代的官员管理虽然也比前朝更加严格，却仍然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传教士们是否留下都在地方官员的手中掌握着，并不需要皇帝的批准。

利玛窦等人撤离肇庆时，本应该被押解回澳门。但他们经过数年的耕耘，获得了更多基层官员的宽容。由于基层官员的巧妙斡旋，总督最终让步，表示只要他们离开作为两广总督驻所的肇庆就可以了。恰好广东北部的韶州愿意接收他们，于是，韶州光孝寺就成了利玛窦传教的第二个地点。[21]

与肇庆比起来，韶州虽然在广东省内的政治地位低一些，却是中原通往广州的必经之路。于是，利玛窦在这里反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结交来往的权贵。在韶州，对传教士们最重要的人叫作瞿太素[22]。他是当朝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由于与嫂子通奸被逐出家门，他四处游荡，结交权贵。在韶州遇到传教士之后，瞿太素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对西方科学充满了好奇心。于是，中国有了第一个西方科学的门徒，瞿太素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系统地学习了欧式几何学，并写了教科书。[23]

在这之前，西方传教士往往被当作一种僧人，穿的是僧袍。正是在瞿太素的要求下，利玛窦从僧袍换成了儒服，更加融入中国社会。换装后，上流社会对他的接纳度也大幅提升。

由于远离了政治中心，韶州的当地官员也显得更加随意，甚至周边的县官也邀请传教士前往做客。[24]

随着结交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机会出现了。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导致了一场中日战争[25]。在战争中，明朝官员发现他们的地理知识都无法应付战争的需要。

在韶州见过利玛窦的兵部侍郎石星由于负责日本战事，急忙联系传教士，希望借助他们的地理知识来制定战略。石星甚至决定将利玛窦从

韶州带往明朝的都城南京。

明朝实行双都城制，除了北京顺天府，在南方还有一个首都即南京应天府。

南京是明朝建立时由明太祖朱元璋定的首都，当明成祖朱棣在家族内战中战胜了侄子（朱元璋的孙子），就把首都迁至他的根据地北京。但他不敢废除南京的都城地位，于是明朝成了双都城。

在中国，历史上采取多都城的朝代并不少。比如，北宋就有四个都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商丘）。但是，北宋虽然有多个都城，却只有一套官员班子，而明朝却有两套官员班子分驻两个都城。其中驻北京的是实官，真正掌握着帝国的权力，而驻南京的一套班子虽然领俸禄，却不负责实务，是拿钱不做事的虚官。

这种设置，使得南京成了虚官遍地、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最佳地点，也是全国的时尚中心。

接受石星的邀请后，传教士利玛窦按照从广东去往南京的传统线路，从现在广东的韶州前往南雄，在广东、江西的交界地带，翻过一座叫作梅岭的界山，进入赣江谷地，顺赣江而下，经过赣州、吉安、南昌、鄱阳湖，入长江前往南京。

如果传教士能够征服这个中国的“次都”，那么距离成功就不远了。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明朝政府的排外传统已经影响了大部分的官员，南京的官员也绝不像广东那样包容。

利玛窦到达南京后，按照之前总结出来的经验，先去拜访在广东结识的老熟人。他首先去看望了曾经在广东任职的工部侍郎徐大任[26]。徐大任在广东时与利玛窦熟识，且曾经有意帮助他。

但利玛窦不曾想到，离开广东后，升为中央官员的徐大任变得谨小

慎微，生怕触动了其他官员的排外情绪，影响了自己的仕途。他不仅不敢帮助传教士，还利用权力逼迫传教士离开南京，回韶州去。

徐大任把这一切做得非常有策略，他不是直接针对传教士，而是针对传教士租住房屋的房主，威吓他，让他把利玛窦赶走。

此刻，中日战争已经议和，利玛窦的地理知识也没有用了。虽然不情愿，他也只好承认失败，踏上了向广东方向的回程。

但传教士是否真的失败了呢？

对利玛窦有利的是，明朝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对社会的控制也并没有后来的清朝那么强。官员们虽然谨小慎微，但还有一个阶层更加自由一些，这就是朱姓的藩王阶层。在明朝，全国各地都分布着不少朱元璋的后裔组成的藩王集团，他们人数众多，没有实权，却拥有不少资源。

利玛窦在回韶州的途中经过南昌，依靠船上乘客的帮助，在南昌登陆，租下了房子。与南京相比，南昌是个很好打交道的城市，没有南京的狭隘和防备。这里也有一批韶州的熟人，利玛窦利用这些熟人给他引见，进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结交了在南昌的建安王朱多爀和乐安王朱多㸕[27]。这两个王爷的自由度比起普通官员来大了很多，当他们决定与外国人交往时，官员们的反对声就小了许多。

果然，在王爷们的影响下，利玛窦获得了江西巡抚陆万垓的同情，有机会开展传教事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朝的官员虽然接受中央领导，但一定的自由度还是有的。

在南昌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又遇到了之前认识的吏部尚书王忠铭。王忠铭对利玛窦的天文、地理知识印象深刻。由于数学不发达，中国的天文知识一直是落后于阿拉伯人和西方世界的，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短板，即便是坚持中国领先论的人也都承认这一点。在中国人对知识的划分中，天文、地理只是属于“小学”，比起儒家的社会大科学来不算

什么，承认西方人领先也并不要紧。

由于天文学的落后，中国的历法总是不够准确。王忠铭希望利玛窦随他去北京，帮助朝廷修订历法。于是利玛窦就有了第二次机会前往南京，再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此时已经是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

当他们到达南京时，这里的气氛更加糟糕了。公元1597年，由于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导致中日对抗全面升级。在战争中，朝廷倾向于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当作敌人，四处捉拿奸细。

王忠铭虽然能够保护利玛窦，却无法让他被南京接受，于是，只好以给皇帝送礼品的名义将他带往北京（他们带了两个大型的钟表做礼物）。

不过，虽然无法被南京接纳，但利玛窦在南京的名声却逐渐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科学家”，地理知识丰富，又有着三棱镜这样的宝石。

北上途中，驻扎在句容的南京总督赵可怀给王忠铭送了一份礼物，是一个木刻的世界全图，他立刻认出来，这幅地图就是利玛窦做的。于是利玛窦被王忠铭拉出来，与南京总督相见，获得了对方的礼遇。

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虽然利玛窦暂时还无法被南京接纳，但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也逐渐适应了他的存在，还知道他要去北京见皇帝。到这时，排外的高墙已经有了小小的松动，只是还没有裂开缝隙罢了[28]。

利玛窦第一次去北京，仍然以失败告终。由于中日战争的继续，王尚书发现带一个外国人进京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于是在利玛窦进北京不久，就安排利玛窦回了南京。

在回南京时，利玛窦决定先不去还敌视他的南京城，而是先去周边

更加自由的地方。他认识的熟人中，最热情的莫过于瞿太素。这时瞿太素正在苏州，利玛窦于是前往苏州与瞿太素等人相见。在瞿太素等人的热情吹捧下，江浙一带慢慢地适应了外国人的存在，这时才是利玛窦再回南京的机会。

这一次，南京终于敞开大门接纳了他。

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结出了硕果，人们将他看成是一种传奇，浑身贴满了神奇的标签。他去北京的使命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给皇帝送了礼物，这就是一种成功，也成了传奇的一部分。以前反对他的官员也都默不作声，不再干扰那些热情的人。

带利玛窦去北京的王尚书也回到了南京，到了自己地盘上的他热情地欢迎了利玛窦的到来。

吏部尚书的接纳让其他官员都趋之若鹜，刑部尚书赵参鲁、刑部侍郎王樵、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等人纷纷前来拜访。利玛窦突然成了南京城的名人，他也顺势留在了南京，继续经营他的传教事业。

南京正式接纳了他，也表明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已经向他敞开。这时，利玛窦再次去北京也是迟早的事。

他所带来的科学知识也生根发芽，除瞿太素对数学的爱好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的天主教科学家徐光启[29]。与瞿太素的平民身份（虽然是官僚子弟，但本人没有官职）不同，徐光启最终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他和利玛窦共同翻译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写成了《农政全书》，研究过天文学。

当南京的基础已经牢靠，利玛窦在即将告老还乡的王尚书的推荐下，带上礼物，再次向北京进发。一路上，他受到各种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照顾。但到临清时，利玛窦被一位在运河上收税的大太监马堂扣留了。

当时的皇帝由于花钱太多，为了税收问题焦头烂额，派出太监四处收税，马堂因为利玛窦不带礼品给自己，擅自将他扣留下来，关入天津监狱，还拿走了送给皇帝的礼品。

好在利玛窦的名声已经通过官场传入皇帝的耳中，由于他迟迟没能出现，皇帝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过问，马堂才不得不将利玛窦释放，送往北京。

公元1601年1月24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终于来到了北京。这一次，机会没有再溜走，他很快见到了皇帝。尽管有人不喜欢他，希望他献完礼物后就离开北京，但最后皇帝一锤定音，给了他们留在首都传教的权力。[30]

天主教在元代之后，再一次回到了久违的北京城。

但这一次回来，却比元代困难了很多。在元代由于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传教士们来去更加自由，不受限制。明代，即便传教士被允许留下，但他们的活动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到了清代，传教士们更加成为权力的附庸，离开了皇帝的命令，连四处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了。

明代，利玛窦还能在官员的庇护下，自由行走于广东、江西、南京和北京。到了清代，地方官员们都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奴才，批准外国人自由行走的权力也不在官吏手中了。这种铁板一块的局面，直到1840年之后，才再次被打破。

解开契丹和“蛮子”的谜团

利玛窦到了中国，还为西方解决了一个长期疑而不决的困惑。这个困惑是由马可·波罗引发的。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他区分了东方的三个民族国家：第一个叫作鞑靼，也就是蒙古人的国家；第二个叫作“契丹”，契丹指的是原为契丹控制后为金朝占领的区域，这个区域也

较早地被蒙古人征服，由于这一区域更早是契丹人的领土，所以马可·波罗称之为契丹；第三个叫作“蛮子”，是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马可·波罗以为这就是南宋的国名，因此叫它“蛮子国”。[31]

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契丹地域内有不少基督教信徒，而“蛮子国”内却少有基督徒。于是，西方人对契丹就抱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同情。

即便到了大航海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却仍然对中国地理非常无知。他们认为，所谓的“蛮子国”就是后来的明王朝，因为“蛮子国”极其富裕，又有海滨大城市作为出海口，这和明朝南方的繁荣状况是相近的。

可是，契丹又是哪里呢？西方人对明朝的接触只限于南方，并不了解北方的情况。而南方由于缺乏基督徒，显然不是契丹国。他们设想在中国以北，还有一个叫作契丹的国家，这里是有基督徒的。他们希望能找到这些基督徒，却不知道，随着明朝取代元朝，基督徒已经在中国的北方绝迹了。

利玛窦到达北京后，已经知道在中国的北方不再有另一个契丹国。所谓契丹国，只是中国的另一个别名而已。或者说是因为中国此前南北分裂而造成的误会。

可是，利玛窦的说法传到了印度，却没有被普遍接受。这时，人们突然想到了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让人按照马可·波罗的路线，从中亚地区向东行走，迟早会进入当年契丹国的地域。如果契丹国还存在的话，那么这次旅行就一定能够找到。如果契丹国不存在了，那么这人将直接进入明朝疆域内。

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一个叫作鄂本笃（Bento de Goes）的传教士。当时，印度恰好在莫卧儿王朝君主阿克巴（Akbar）大帝的治下。

与中国的历史相反，在大部分时期，印度次大陆都不是统一体。自

从笈多帝国消失后，印度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伊斯兰教到来后，印度的北部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到了公元16世纪初，一位叫作巴布尔的中亚军阀突然崛起。

巴布尔从父系上说是中亚突厥人引以自豪的君主帖木儿大帝的后代，从母系上说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本人原是费尔干纳公国的王子，由于中亚的战乱，他被迫离开了中亚故地，反而在阿富汗建立了政权[32]。之后他开始向印度扩张，占领了位于巴基斯坦的信德、木尔坦等地。

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巴布尔进攻北印度，在德里以北的帕尼帕特击败了德里苏丹国洛迪王朝最后的君主伊卜拉欣，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由于印度人认为巴布尔是蒙古人，于是这个政权就叫作莫卧儿王朝（即印度语的蒙古王朝）[33]。

这个王朝传了三代后，到阿克巴大帝时，达到了鼎盛。[34]然而，莫卧儿王朝也没有统一印度，它控制的核心地区是从北印度到阿富汗的领土，而在南方特别是海岸线上，却有许多小的政权游离于帝国之外。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到来，在海岸地区也有了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身影，他们甚至建立堡垒，控制了部分城市，最重要的就是葡萄牙控制的果阿。[35]

西方人由于没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印度，倾向于与内陆强国莫卧儿帝国保持和平关系，而莫卧儿的重心在内陆，也乐于与掌握了海洋贸易的西方人和平相处。这一切对于将要出发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鄂本笃都是有利的。

阿克巴大帝本人也与传教士的关系很好，而莫卧儿王朝统治区域直达中亚的阿富汗地区，这意味着在第一段行程中，莫卧儿王朝可以帮助传教士安全到达他们的统治边界。

耶稣会请求阿克巴发出敕令，允许鄂本笃经过莫卧儿帝国的辖区，

进入中亚，再进入中国北方，探查所谓的契丹国。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

鄂本笃是个西班牙人，但为了路上方便，他称自己是亚美尼亚商人，名叫阿卜杜拉（Abdula），这样的身份和伊斯兰化的名字更容易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中亚。

鄂本笃带着一个叫以撒（Issac）的亚美尼亚仆人，从莫卧儿第二首都拉合尔[36]（Lahor）出发。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个同伴，分别是一个商人和一个传教士。

与这一群特殊使命的人一起出发的，还有大约500人的商队，但他们并不去中国的北京，最远只是去往喀什噶尔，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这个商队带着大量的骡子、骆驼和车辆[37]。

从拉合尔到白沙瓦大约有210公里，却因为匪徒和等候过河的船只，鄂本笃等人一共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在白沙瓦休息了20天后再次启程，这次又走走停停，60多天后才到了距离白沙瓦160多公里的喀布尔，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首都。

白沙瓦到达喀布尔最险要的路段在开伯尔山口附近，即便在莫卧儿帝国的巅峰时期，这里也时常有歹徒出没。为了保护财产，商队还从当地统治者那儿弄了400名士兵保卫他们前行，但还是没有阻挡住劫匪的出没。一路上，劫匪造成了许多人的伤亡，鄂本笃等人也逃到了树林里，才保全了性命和财物。

当时的喀布尔还属于莫卧儿帝国境内。即便有莫卧儿皇帝的谕旨保护，还需要花如此大的精力才挪动了不到400公里，可见当时中亚的交通（也就是丝绸之路）几近断绝的情况。

在喀布尔，鄂本笃开始遇到更大的麻烦。首先，在他的小团队中，那个商人同伴因为要做生意，决定不再前行，而另一个教士同伴也转身回了印度，接下来就只剩下他和亚美尼亚仆人两人前行了。为了等待其

他商队结伴一起走，他们在喀布尔等了整整8个月。

不过鄂本笃又是幸运的。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位女士，她叫阿智哈伦，刚刚到麦加朝圣回来。她是喀什噶尔国王的妹妹，也是和田国王的母亲。这位女士到达喀布尔时已经将身上的钱花光了，四处找人借钱。鄂本笃借给了她600枚金币，她答应等鄂本笃到了喀什与和田会归还这笔钱。这件意外的事情让鄂本笃在未来获得了巨大的帮助。

离开喀布尔，鄂本笃采取了先翻越兴都库什山，再走瓦罕谷地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当年玄奘的回程，以及马可·波罗的线路是重合的。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行程，他们到达了塔里寒（Talhan），这里仍然属于现代阿富汗的版图，却已经出了当时莫卧儿王朝的管辖区，而是进入了位于中亚的布哈拉的统治者的辖区。

在中亚，随着蒙古人和帖木儿王朝的衰落，一支叫作乌兹别克人的民族兴起，他们建立了数个汗国，[38]最著名的是定都于布哈拉的布哈拉汗国。

鄂本笃到达塔里寒时，这里正在内战，他们在这里耽搁了一个月，才前往一个叫作契曼（Cheman）的城市，这里归撒马尔罕的阿卜杜拉汗管辖。

在契曼，一群叛匪攻打了这座城市，城市的官员逃走了。与鄂本笃同行的商人们被迫组织反击，但还是被叛匪打败了。叛匪抢劫了一些东西，却并没有伤害商人们。鄂本笃更是幸运地几乎什么都没有损失。继续上路后，他再次遭遇了劫匪，却又幸运地化解了。

8天后，他们进入了阿富汗东北的巴达赫尚地区，这就进入了整个旅程中最困难的一段路。他们要翻越巨大的葱岭[39]，进入新疆境内。这段行程充满了高山、险途、大雨、毫无人烟的旷野、匪徒。他们花了至少46天，才到达了可能是朅盘陀，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40]。这里已经是葱岭的东面了。

但这并不是困难的结束，事实上，从塔什库尔干到喀什，还必须经过茫茫的昆仑山西段，这里有三座7000多米的高峰，包括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41]。

鄂本笃和商队在昆仑山中被冰雪围困了6天，冻死了不少人。他的亚美尼亚仆人掉入河中，救上来后大约有8个小时不省人事。他们的马也被冻死了6匹。经过无数磨难后，他们于公元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11月[42]到达了叶尔羌。

对鄂本笃来说，幸运的是，叶尔羌与和田的君主都是阿智哈伦的儿子，而喀什噶尔君主是阿智哈伦的哥哥。在这里，鄂本笃收回了他借给阿智哈伦的600枚金币。不过收回的不是现钱，而是玉石。这些玉石的价值远高于金银，也让鄂本笃赚得盆满钵满。由于结交了君王，他也获得了更大的便利。

在这里，鄂本笃还揭开了明王朝的一个秘密：在史书中，明王朝总是强调在西域有多少国家向它朝贡，但事实上，为了诱惑这些国家朝贡，是要花费极大代价的。这些所谓的朝贡团，其实都是商人出身。明王朝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几乎一切外贸，但是，允许外国朝贡团携带一定数量的商品“进贡”给皇帝，皇帝再把几倍价值的物品“赏赐”给朝贡团，由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这样，对明王朝来说是完成了一次朝贡，而对外国使团来说，则是完成了一次贸易，而且非常赚钱（数倍的利润）。[43]

对明朝来说，这种贸易其实是亏本的，因为从进入边境那一天开始，政府就要负责朝贡团的衣食住行，这牵扯到一路上的马匹和运输，以及在各地的住宿和吃饭。最后，皇帝赏赐的价值还总是要高于进贡价值的几倍。由于亏本太多，明政府为了控制损失，对每个国家进贡团的人数和次数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44]。在这种体系下，西域国家根据规定，大都是6年朝贡一次。

某个国王被允许朝贡，就是拥有了经商权。由于每个朝贡队伍的人数是有限制的，所以，每一个名额就相当于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席位，这些席位会以高价卖给出得起钱的商人们。而且，一个国家的朝贡团不是只由这一个国家的人组成，而是采取了国际主义原则，不管商人是来自哪个国家，谁出得起钱就卖给谁。

鄂本笃由于与国王的关系，幸运地买到了这样一个席位，于是随着朝贡团从喀什噶尔出发，经过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前往明朝的边关嘉峪关。

在焉耆时，上一批朝贡的团队恰好回来，与这一批的人遇到了一起。鄂本笃由此得到了在北京的利玛窦的消息，知道在北京已经有了传教士团体。他也终于确定了所谓的“契丹”就是“蛮子”，也就是当时的明王朝。

朝贡团进入中国境内，到达了肃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酒泉市，在这里，商队又要进行一次筛选。按照明王朝的规定，每隔6年，中亚七八个国家的使团会集齐了，要从这些使团中选择72个人前往北京。这72人都是大商人，携带的货物也多。他们到北京一路的吃喝拉撒都由皇帝负责，还有大量的赏赐，“进贡”给皇帝的商品也会以几倍的“赏赐”发还。

这72人之外，剩下的人只能在肃州将自己的货物卖掉，这相当于一种自由贸易，价格自然不如赏赐的高。所以，能否成为72人之一，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财运有多大。

鄂本笃到肃州时，证明了自己是个好商人。一路上，他的财富竟然增值了，拥有13匹马，5个仆人，2个从奴婢中买来的孩子，还有大量宝石，全部价值2500个金币[45]。由于财富众多，他成功地被选为了72人之一。

但就在这时，他的好运却到了尽头。眼看就要上路时，鄂本笃的身

体却突然垮掉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人去了北京，自己留在肃州养病。

在肃州养病期间，他再次得到了利玛窦的消息。据另一批从北京回来的人说，利玛窦不仅在北京，还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礼遇。于是鄂本笃请人给利玛窦带去信息，请求利玛窦想办法把他接到北京去。

与此同时，利玛窦也得到了从印度海路传来的消息：一位叫作鄂本笃的修士从陆路出发前往中国。他也在不断地向商队打探信息。当收到鄂本笃的信后，他立刻安排人员前往肃州去接鄂本笃。

不幸的是，当利玛窦派出的人到达肃州时，鄂本笃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穿越中亚带来了成果，却再没有机会回到西方，甚至连踏入北京城都做不到了。

利玛窦的使者到达11天后，鄂本笃去世，永久地留在了酒泉的沙漠之中。[46]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让西方世界了解到，在东方存在一个国土面积巨大的国家，名叫中国。它曾经被蒙古人称为“蛮子”，也有另一个名称叫作“契丹”，这个国家虽然曾经分裂，但统一的历史却更加漫长。

到了利玛窦和鄂本笃时代，经历了地理大发现的西方人终于驶入了快车道。他们不仅到达过亚洲的所有国家，也将马可·波罗以来传说中的地理知识都一一发掘了出来，亚欧大陆这块巨型的土地（除东北角上一块之外）对他们几乎没有了秘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利玛窦之前，是东西方竞逐的时代，双方虽然已经听说了彼此，却都是雾里看花，无法看清。但利玛窦之后，东方对西方已经变成了透明的，从此东方发生的事情都会传到西方世界，并成为他们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当西方人不断地尝试进入中国，打探中国的消息，并获得了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信息时，东方的明朝却对西方世界表现出巨大的冷漠。到

了清初，人们整理《明史》时，关于西方世界的消息仍然极端落后，《明史》记载的欧洲国家只有葡萄牙（佛郎机）、荷兰（和兰）、意大利（意大里亚），以及早已经消失的东罗马（大秦）。至于英格兰、法兰西等强国，仍然处于中国的视野之外。[47]而对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即便到了清代整理四库全书时，依然被认为荒渺莫考。

这种对世界的漠视态度，与西方人的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一部中已经提到，中国和西方世界在世界观上的差距主要发生在蒙古人时期，蒙古人刺激了西方的好奇心，却将中国变成了一个保守的自保型国家。在本书的最后一部中，追寻的就是中国从明代开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保守，又如何在保守中故步自封，并延续到清代，形成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老大帝国的。这要从东西方之间的连接部——中亚——谈起。

第十五章 对外关系变形记

帖木儿宫廷的使者们

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一支法国军队带着基督徒大军坐船来到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名城君士坦丁堡。这里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是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

法国军队之所以到来，是为解君士坦丁堡之围。这时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存在了1000年，与穆斯林的争斗也已有700多年，疲惫的帝国终于接近尾声，缩小到了极致，仅仅剩下君士坦丁堡这一座城市，加上一点儿附属地区。周围的土地大都被一个叫作奥斯曼的突厥——即土耳其——种族侵占。就算仅剩的君士坦丁堡，也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围攻。当时的土耳其苏丹叫巴耶济德（Bayezid Ⅰ，外号叫雷霆），他率领土耳其军队将君士坦丁堡围困得水泄不通，眼看就要攻克这座千年名城。[48]

法国人成功地突破了土耳其军舰组成的防线，进入了金角湾，并从金角湾的海墙城门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城区。土耳其军队在法国人取得突破后，连忙解围而去。

就在西方世界庆祝君士坦丁堡之围解开时，却过于掉以轻心了，没有料到之后的麻烦。一年后，土耳其军队卷土重来，不仅将君士坦丁堡围住，还将救援的法国人也围在了城中。此时的法国人已经不再指望守城，只是希望保命。他们带着东罗马皇帝突围而去，将这座城市的命运交给了围攻者。

到这时，西方世界已经不再奢望能够救下东罗马这个千年帝国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在远处看着土耳其人如何将城市拿下。

君士坦丁堡在围困中坚持了两年，眼看就坚持不住了。

但就在这时，突然在东方世界出现了转机。在人们等待着土耳其最后的进攻时，却传来了雷霆苏丹巴耶济德死亡的消息。一瞬间，苏丹悲惨的遭遇传得沸沸扬扬。

原来，就在奥斯曼人进攻西方时，从东方却突然间来了一支凶狠的军队，这支军队从遥远的中亚出发，直达伊朗、格鲁吉亚，再进入小亚细亚，在现代安卡拉[49]附近与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遭遇。巴耶济德正在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战事，听说这支军队前来进攻，只好仓促将军队调往东方应战。他在西方是常胜将军，自然也不把东方来的这支装备更加落后的队伍放在眼里。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一战之后，巴耶济德竟然成了这支东方部队的俘虏，获胜者将他关在笼子里裹挟而去，不久他就死了[50]。

欧洲人在瞠目结舌间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于是君士坦丁堡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到了公元1453年（景泰四年）才正式并入土耳其的版图[51]。

这位击败巴耶济德的东方首领叫作帖木儿（Timur，也叫Tamerlane），他是一个跛子，也是一个以屠杀著称的征服者。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是丝绸之路上出现的新一代王者。

帖木儿出生于公元1336年（元惠宗至元二年），出生地是撒马尔罕以南100公里左右的渴石[52]。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中亚和波斯的蒙古帝国已经衰落了，位于中国的元朝也正在解体。

在中亚地区，蒙古人的冲击带来的人种混合也非常复杂。唐宋时，中亚的人种已经从伊朗种变成了突厥种，当蒙古入侵后，突厥种又混入

了蒙古血统，变成了突厥-蒙古的混合人种。帖木儿属于突厥人，却又带着一定的蒙古人血统，他将自己当作蒙古人。

当蒙古人的统治衰落之后，帖木儿乘机通过武力获得了中亚的控制权。一方面，由于只有黄金家族成员可以称“汗王”，他仍然找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人担任没有实权的汗王[53]，但另一方面，他以埃米尔（Emir）的名义进行统治[54]。

在进攻土耳其之前，他已经统一了中亚，平定了伊朗，又扫荡了印度。当时在印度统治的仍然是德里苏丹国，帖木儿攻陷了德里，完成了蒙古人不曾完成的目标，并杀掉了10万名俘虏[55]。然而，帖木儿并没有吞并印度，而是在扫荡之后就退了出来，让德里苏丹国完成了复辟，直到帖木儿的后代巴布尔时期，才彻底灭亡了德里苏丹国，建立了莫卧儿王朝[56]。

进攻印度之后，他转向西方，越过了波斯去进攻土耳其，俘虏了巴耶济德。他的进攻无意中帮助了西方世界。但西方世界在庆幸的同时，也在打量这个古怪的征服者，他到底是朋友还是新的敌人？

事实上，在帖木儿与土耳其人决战之前，位于现代西班牙的国王亨利三世（Henry Ⅲ）就派出了使者前往探查。当时，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还在穆斯林手中，西班牙也没有统一，亨利三世统治的国家叫作卡斯蒂利亚（Kingdom of Castile）。

这位使者出发后，经过塞浦路斯岛，在爱琴海沿岸登陆，进入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来到高原中心的安卡拉，见到了帖木儿。帖木儿也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对西班牙使者颇为优待。使者回去后，土耳其战争已经结束，帖木儿又派人送来了礼物，除珠宝之外，还有两个土耳其军营中发现的基督教女人。这种示好的表示，促成了亨利国王决定再次派人前往帖木儿宫廷探查[57]。

国王第二次派去的使者有三人，为首的一位是叫作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的宫廷大臣。

使者们接受指令后，从大西洋岸边的卡斯蒂尔港出发，经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当他们还在地中海时，突然听说帖木儿正在进攻埃及，这个传闻让他们踌躇于到底要去哪里见这位中亚的统治者——是按照原计划去土耳其，还是根据新的传闻前往埃及。

在他们犹豫时，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说帖木儿并不在埃及，而是在一个叫作卡拉巴赫（Karabakh）的地方。如今的卡拉巴赫是一块位于现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飞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由于苏联解体后留下了严重的种族和领土争端，这两个国家都声称对卡拉巴赫拥有主权。国际上承认它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但在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的支持下，卡拉巴赫又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两个国家甚至因为卡拉巴赫问题发生了战争。但在帖木儿时期，这里是由亚美尼亚人控制的半独立国家。

克拉维约等人决定前往卡拉巴赫。他们经过君士坦丁堡，从海路进入黑海，到达位于黑海东南角的特拉布宗（Trabzon）。如果他们能够较早到达特拉布宗，再前往卡拉巴赫，那么他们还能见到帖木儿，但由于事故，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多待了一个冬天，等准备好时，帖木儿已经从卡拉巴赫返回中亚了[58]。

这样，使臣们的小任务拖成了大任务，原本指望在土耳其觐见帖木儿，之后是亚美尼亚，现在则必须前往中亚的撒马尔罕了。

特拉布宗这座城市也已经投降帖木儿。使臣们从这儿上路后，经过山路，前往位于现代土耳其东北部的爱洛遵占[59]（Erzincan）。爱洛遵占是帖木儿帝国的事实边界，从这里往西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据的锡瓦斯，当年帖木儿与巴耶济德的战争就曾经在这条边界线上拉锯。帖木儿虽然战胜了土耳其人，却并没有实施有效占领，使得爱洛遵占以西依然是土耳其人的领土。

克拉维约等人从爱洛遵占出发，经过埃尔祖鲁姆、亚拉腊山、胡叶、大不里士——这时他们已经穿越了现代土耳其和伊朗的边界。越过大不里士，他们到达当年蒙古人的首都苏丹尼耶，位于现代伊朗境内。

从苏丹尼耶，他们横穿了整个伊朗大地，来到了位于伊朗东部的马什哈德。这里也是离开伊朗边境的地点，从马什哈德继续向东，就进入现代阿富汗境内。他们到达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城市巴尔赫，再渡过阿姆河向北，经过铁尔梅兹、渴石，终于到达撒马尔罕。[60]

由于是帖木儿帝国首都，撒马尔罕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大都会，全世界的使臣都往这里聚集。克拉维约等人在路上就遇到了埃及使臣，和他们一起来到撒马尔罕。

我们不去说撒马尔罕的繁华以及帖木儿对使臣的尊重，在克拉维约的记载里，却有一件事情让人警醒，这件事是关于中国的[61]。

公元1404年（永乐二年）9月8日，克拉维约在朝廷上见到了帖木儿。当他以使者的身份拜过君王之后，帖木儿让他起身，命令他坐在自己的右侧首位。这个位置原本是给中国使臣准备的，按照规矩，克拉维约的地位应该在中国使臣之下。但帖木儿强行打破了规矩，把他抬到了中国使臣之上。

不仅如此，帖木儿好像还怕中国使臣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专门派人去跟中国使臣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帖木儿帝国和西班牙人更加亲善，却视中国人为仇敌，帖木儿本人也绝不会再向中国纳贡了！

在一个公开的外交场合羞辱一个国家的使臣是非常不礼貌的，那么，为什么帖木儿要这样羞辱中国使臣？这些中国使臣又是谁呢？克拉维约都没有记载。

但幸运的是，人们翻遍当时的史书后，还真的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被死亡解除的东征计划

帖木儿和中国明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这一年，在中亚称雄的帖木儿派遣使节进贡了驼马，明太祖朱元璋也厚厚回赠了他。

之后的洪武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和二十七年，帖木儿都曾进贡。明朝则于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派遣使节前往撒马尔罕。使臣是给事中傅安和郭骥，他们带了1500名士卒前往，不想两人一去不返。[62]两年后，朱元璋又派了另一个使节团，由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率领，前往撒马尔罕，不想，这个团队也没有回来。[63]

傅安、郭骥和陈德文率领的两个使团，就是克拉维约在撒马尔罕遇到的中国使团，他们都被帖木儿扣留了。

可是，帖木儿为什么要扣留中国使团呢？

按照克拉维约的记载，中国使团的使命是要求帖木儿前往纳贡，而帖木儿显然不愿意再纳贡，显得低人一等。

另一个德国人也曾经到过帖木儿的宫廷，他记载明朝皇帝派人前往责备帖木儿不纳贡的事情，帖木儿告知对方，将带兵马前往中国，让明朝皇帝纳贡。[64]这句话代表了帖木儿的野心：如果要想取得和成吉思汗等蒙古人同等的成绩，必然要获得中国，帖木儿已经在北方、南方和西方都打了胜仗，东方这颗明珠是他最后的渴望。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如果缺乏了中国这一环，帖木儿帝国的成就就永远比不上蒙古帝国。

但帖木儿又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人，由于和中国之间隔着广阔的新疆大沙漠，过了沙漠，还有漫长的河西走廊和北方的蒙古大草原，在军事后勤和军事组织上，对军事将领的要求非常高。再者，如果他的后方在进军过程中出了问题，要想迅速回军也是做不到的。

为了巩固后方，帖木儿早年并没有立刻东向，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做法：故意向明朝纳贡低头。当然这只是为了在对付最强大敌人之前，将其余地方平定，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事实上，他向明朝进贡的使节都是带着了解中国的目的前往，在实际用途上是一种间谍。

随着帖木儿实力的增强，他才走出了扣留中国使团这一步。但扣留中国使团之后的这几年，帖木儿还是在为进攻东方做准备。他攻打了印度和西方的土耳其，解决了后顾之忧，又和更加遥远的欧洲维持了和平（在他看来，欧洲并不在征服计划之中），之后才开始策划对东方的进攻。

克拉维约出使时，帖木儿认为他已经解决了西方问题，在他死之前，是时候进攻东方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克拉维约等人面前对中国被扣留的使团越来越不客气。

在帖木儿准备进攻之前，恰好又有一个来自中国地区的庞大商队到来，有800匹骆驼。帖木儿也将他们全部扣留，通过这些人，专心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形势。[65]

当克拉维约离开时，帖木儿已经组织了180万人的大军，准备东征。公元1404年（永乐二年）底，帖木儿终于率领大军迈出了东进的步伐。

中亚的军队从撒马尔罕向东北方向进入现代哈萨克斯坦境内，再到新疆境内的别失八里[66]，这里距离明朝的边境已经走了一多半路程。

当时的明朝刚刚经过靖难之役，明成祖永乐帝在战争中战胜了自己的侄子，结束了内战。他虽然当了皇帝，但北方在战乱中的破坏还没有恢复。边境地区将帖木儿进攻的消息传给永乐帝，皇帝立刻命令甘肃总兵宋晟加强防备[67]。但是，仅仅靠一个地方总兵能够抵御帖木儿的大军吗？

就在紧急关头，一件对中亚军队来说十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

件事对明王朝来说却是巨大的幸运。在进军的路上，由于天寒地冻，帖木儿这位征战了一生的老战士突然生病了。不要忘记，他已经是70岁的年纪了。由于主帅生病，帖木儿的军队只好回军，在到达撒马尔罕之前，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1月19日，帖木儿死在讹答剌。[68]

帖木儿死时，克拉维约还没有回到西班牙，刚刚到波斯境内的苏丹尼耶——这座当年蒙古人的都城。[69]

帖木儿的死亡，给了后人很大的遐想空间。有的人认为，如果帖木儿多活几年，那么他的大军将如同横扫西方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驰骋。与此同时，中国的明王朝恰好处于最低谷，靖难之役刚打完没有几年，整个东部因为战乱而缺乏人口，甚至不得不从山西调人来填补华北平原的空白，这就有了山西洪洞大槐树大移民的传奇。另外，由于缺乏骑兵，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有问题的，能否抵挡帖木儿铁骑的冲击，恐怕很值得怀疑。

按照这个思路，如果帖木儿不死，中国很可能迎来另一个类蒙古政权。

但是，当人们仅仅局限于一个人的年龄分析时，却忘了考虑另一个问题：战略地理。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落之所以对中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于它总是从距离中国本土不算太远的北方边境发起进攻。比如匈奴和突厥从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对陕西、山西进攻时，距离不过只有两三百公里而已。辽、金对宋朝的进攻发起于北方，这里与宋国的繁华地带是紧密相连的，而宋朝首都开封府又在平地上，没有高山的保护，使得铁骑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突袭。元朝吞并中原采取了步步蚕食的做法，首先蚕食的是北京一带，之后南下将金国剪灭，最后才灭亡了南宋，这个过程也持续了几十年。

所以，如果要打击明朝，必须首先占据北方的草原地带，在地理上获得突袭的机会，才有可能完成灭亡明朝的目标。

不幸的是，帖木儿所在的中亚却不具备这样的地理优势，中亚和明朝本土隔着巨大的新疆盆地，四周有雪山，中间是巨大的沙漠，和明朝本土之间相隔数千公里，几乎无法完成快速袭击。

这样的地形同样不利于明王朝出兵中亚。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几次袭击中亚，但最终只能满足于纳贡，无法建立直接统治，原因也在于战线距离太远，无法实施有效占领。反之，从中亚来的力量也很难通过一次战役灭亡中国，毕竟中国的地理范围太大了，即便输掉一两场战役，也可以通过退缩建立第二条防线。

帖木儿如果要占领中国，更可能的战略是首先迂回占领蒙古草原，缩短作战臂长，之后，才有可能利用新的基地对中国实行更近距离的打击。但这样的作战需要更长的时间，帖木儿发动进攻时已经是近70岁的老人，他已经没有时间完成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的目标了[70]。

帖木儿死亡后，他的继承人立刻改变了策略。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出使撒马尔罕的使臣们终于回来了。帖木儿之后的撒马尔罕被他的孙子哈里控制，哈里面临的是一个可能分崩离析的帝国，首先需要提防的是虎视眈眈的叔叔和兄弟们，于是开拓变成了守成，为了减少外部的敌人，他选择把明朝的使节放了回来[71]。

根据傅安等人的叙述，帖木儿曾经把他们带到帝国的各个地方，展示帝国的强盛。当放他们回来时，陈德文又在西域游历，劝说各个地方向明朝朝贡，却没有人响应。

跟随傅安等人到来的还有哈里的使节，拜见过皇帝后，明成祖再次派傅安等人随着使节回访，并拜访了位于赫拉特[72]的哈里的叔叔沙哈鲁，建立了联系。帖木儿将他的儿子分封到帝国各处，其中封到赫拉特的沙哈鲁将在未来起关键的作用。从此以后，明朝与西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73]

人们总是认为，明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封闭的。但事实上，明太祖

和明成祖时期的对外政策却又足够进取。比起从不扩张的宋朝皇帝，明太祖从建国开始，就派人到西域和南洋各地，宣示改朝换代，招募各个小国的人前来朝贡。明成祖更是派遣了大量使节与外国交往。[74]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明朝应该是一个进取的朝代，可是为什么这样的政策没有继续下去，反而变成了最封闭的朝代之一呢？

我们不妨去看一看历史是如何转换的——

中国与中亚的新均衡

明朝一建国，明太祖朱元璋就派人到四方宣谕，请周边的国家前来朝贡。对周边的小国来说，在中国，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与掌权者的关系。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引下，他们大多遵从了明太祖的旨意。

比如朝鲜，明太祖在他登基的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就派人到朝鲜，赐给朝鲜国王印玺和封书，第二年朝鲜国王就派人前来进贡了。[75]

同样属于比邻国家的安南在听说明太祖继位后，也是在当年就想派人过来，但由于云南仍然是蒙古人统治，离安南太近，他们没敢来。12月，当明太祖的宣谕书到了之后，安南国王不再犹豫，派人到南京进贡，于第二年6月到达。

明朝对外政策的进取，还表现在朱元璋父子对越南的攻势上。当安南与南方的占婆发生战争时，明太祖写信斥责了双方，让他们重归和平。当安南的陈朝被权臣胡季犛篡夺时，明成祖又以惩罚乱臣的名义出兵灭亡了安南，实行占领统治达十年之久，这就是安南历史上的明据时期。虽然十年后安南复国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成祖在对外政策上是希望有所突破的。

其余国家大都顺其自然地接受了明王朝的宗主地位，即便是撒马尔罕这样难以对付的角色，在帖木儿死后表面上也向明王朝进贡。

这时，在明朝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外交家，而最著名的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位叫作陈诚的人。

陈诚生于元末，成长于明初，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进士。虽然是文章出身，但他最大的成就却是在外交上。当时，恰好是明王朝外交最进取的时代，需要专门的人才，陈诚最初担任了一些国内的使职，到了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由于安南和明王朝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归属上产生了纠纷，安南占据了思明府[76]南境，陈诚作为明王朝的使节出使安南。

思明府问题和现代世界经常发生的边境问题是类似的，这个府设于元朝时期，与安南之间有着明确的边境。但到了元末，由于中国的疲弱，安南乘机将边境向北移动了200余里。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想让安南归还占据的土地，不想安南也恰好处于改朝换代的时刻，权臣胡季犛篡夺了陈朝的权力，边境问题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陈诚出使时，由于胡季犛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让陈诚的出使并没有获得成果。明太祖也因成本太高，没有动用武力去夺回。[77]

此外，公元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三月，陈诚还作为使者前往一个叫作撒里畏兀儿的地方出使。[78]这个地方位于现代柴达木盆地西北一带，[79]居住着畏兀儿一些弱小的部落，时常受到蒙古流寇的骚扰。他们愿意归顺明朝，陈诚作为使者，携带了58颗铜印前往安抚，并在这里设立了安定卫，将其纳入辖域。

这两次出使一次成功一次失败，但整体上使陈诚获得了明王朝专业外交家的身份。

到了公元1401年（建文三年），陈诚第三次出使，这一次去的是蒙古境内，安抚当地的鞑靼部落。第二年，建文帝倒台了，陈诚由于属于

建文帝派系，被冷落了一段时间。

事实证明，明成祖朱棣是比他的父亲朱元璋更加雄心勃勃的皇帝。在对外政策上，朱元璋除对北方的蒙古人之外，对其他地区很少使用武力，即便安南这样和明朝发生了边界纠纷，明太祖也还是选择了忍让。

但作为第二代皇帝的明成祖却知道，父亲已经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自己如果想要比肩父亲，必须在外交上做出更多的成绩。

在明成祖时代，中国对安南采取了攻势，短暂地灭亡了这个国家[80]。他还发动了数次针对蒙古的亲征，暂时获得了北方边境的安全[81]。为了巩固周边，他在边疆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在西北设立了哈密卫，西南则设立了几个宣慰司。另外，贵州的级别也提升了，之前，贵州只被看成一片乱山加上两条沟通云南和内地的道路，现在成了一个承宣布政使司辖区，相当于一个省。

但朱棣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展现明王朝的伟大。这需要外国的配合才能做到。既然要外国配合，就必须让它们明白皇帝的意图，于是，对外使节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种。

被冷落的陈诚就是这时又被提拔了起来。

此时，明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也在发展。

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陷入了内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帝国过于庞大，他在生前就把国家分开，给了他的儿子和孙子，每个人相当于一个省的省督，同时，享有撒马尔罕的省督将成为他们共同的主人，也就是帝国的主人。这一点很像当年成吉思汗的做法，将征服之地分成四部分，留给四个儿子。

帖木儿的长子死得早，帝国的继承人就成了长孙皮儿·马黑麻·伊本·只罕杰儿，这位长孙同时还是东阿富汗斯坦（统治巴尔赫、喀布尔和坎大哈）的主人。但不幸的是，当帖木儿去世时，皮儿·马黑麻还在阿富

汗南部的坎大哈，无法及时赶回撒马尔罕，登上王位的是帖木儿的另一个孙子，即他的三儿子米兰沙的四子哈里。

哈里封在塔什干，距离撒马尔罕不远。他立刻获得了军队的拥护，从塔什干向撒马尔罕进军，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3月18日，他占领了撒马尔罕，自己登上了王位。

由于面对着帖木儿指定继承人（皮儿·马黑麻）的竞争，哈里立刻改变了政策，采取了对明朝友好的做法。与此同时，帖木儿的指定继承人皮儿·马黑麻也选择了向撒马尔罕进军，但在进军途中被哈里击败。退回阿富汗后，皮儿·马黑麻被他的大臣杀害。

指定继承人的死亡，给了哈里正统性，但由于他过于年轻，缺乏执政经验，最终被手下废黜了。废黜哈里的人选择了帖木儿的第四子沙哈鲁为王。沙哈鲁的封地在位于伊朗、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呼罗珊地区，首都在赫拉特[82]，于是，帖木儿帝国的首都也从撒马尔罕迁到了赫拉特。[83]

沙哈鲁采取了与侄子一样的政策，和明帝国保持了友好状态。不过，首先踢开这扇门的还是明王朝。

哈里在撒马尔罕执政时，就把扣押的明朝使者都放了回去，并派出使臣虎歹达护送使者回去。但此刻，西域对明王朝仍然是有戒心的。比如陈德文就晚回来了一段时间，到西域诸国去劝说各国入贡，却没有效果[84]。可明成祖却抓住了哈里派遣使者的时机，不仅厚待了使者，还再次派傅安等人跟随使者回到西方进行回访。甚至派了一位叫作白阿尔忻台的指挥去祭祀帖木儿，赐给他们礼物和银币。

除了去往撒马尔罕，傅安还顺便去了赫拉特等西域城市。这一次，明成祖的做法终于让沙哈鲁看到了皇帝的心思：明朝只想要和平和表面的归顺，并不想采取敌对措施，只要能满足明王朝的最低要求，就可以获得不小的利益。在这样的判断下，沙哈鲁派遣使节跟随傅安来到了中

国。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沙哈鲁的使节第一次到达北京。[85]

永乐帝对沙哈鲁也很重视，当年，又派人跟随对方的使节再次回访。第二年，沙哈鲁的使节又来到了北京，表明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

这一次，沙哈鲁已经确立了中亚盟主的地位，但他与侄子哈里（也是前盟主）之间的关系并不好，永乐帝觉得作为东方的首领，有资格去劝说一下双方和好，于是写了一封信，交给白阿尔忻台，让他作为使节，跟随对方的使节前往哈烈（赫拉特）。这封信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表明作为国主，如果连亲戚都反目，又怎么要求臣民和谐？[86]

白阿尔忻台带着这封信去了赫拉特，顺便对撒马儿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实哈儿这些国家都进行了访问，不仅赠予礼物，还劝说他们快快朝贡。

到这时，明朝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朝贡关系。这些国家得到礼品之后，果然很高兴，纷纷派人随着赫拉特的使者一同前往北京，进贡的有狮子、马匹、豹子等珍奇物种。

到了永乐十一年，使节们到达北京，永乐帝终于感受到了万国来朝的气氛，欣喜地大肆赏赐。

等这些使节回去的时候，明成祖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使团再次前往西域，这一次派出的人中，就有陈诚。

关于这个使节团的成员，现在知道名字的有九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的职业使节。[87]

这个使团于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九月离京，第二年正月从肃州出发西行，在西域诸国连续访问，四处赏赐，直到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十月才回到北京。[88]

具体的行程是，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正月十三日，他们出了肃州城北门。四天后过嘉峪关。如今从酒泉到嘉峪关只有二三十公里路

程，他们走了四天，这个速度并不快。

过嘉峪关的次日，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回回墓的地方。这个墓葬就是本书第八章提到的吾艾斯墓，也就是伊斯兰教早期进入中国时，前往内地传教之人的墓葬。这座墓存在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依然是当地的路标[89]。

过了回回墓，他们一路上在各地安营扎寨，直到二月初九日方才到达哈密。

二月十五日，他们再次出发，于三月初五到达吐鲁番。吐鲁番盆地是新疆东部少有的休整地，他们在吐鲁番住了17日，才于二十四日再次启程。启程时，使团分成了南北两路，陈诚带领南路前行，北路则由一位叫李达的人率领。

五月十五日，两路使团在伊犁河边会合，但随后又分道前行。南路使团折向西南，绕过热海[90]，六月二十九日，到达塞蓝城[91]，再度与北路使团会合后，一同前往帖木儿汗国。

之后，他们经过塔什干前往撒马尔罕。到达撒马尔罕是七月二十一日，住了10天后再次出发，前往沙哈鲁所在的赫拉特。他们到达赫拉特时已经是闰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从肃州前往赫拉特，他们一路上共行走了200多天。

在行程中，使者一路上都是住在营地，即便到了城市，也只是在城边扎营，一路上奔波劳苦自不待言，还要携带大量的礼物分送各地，拜访各地的城主百姓。

从中亚回来，除许多使团跟着回访之外，使团的主要成果是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由陈诚写的，在陈诚出发之前，大学士胡广曾经嘱咐他要观察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帮助国家了解西域[92]。陈诚于是将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了《西域行程记》一书，又把西域按照国别分类，写成了《西域番国志》一书。

我们可以把这两本书与唐玄奘的两本对比，《西域番国志》对标的是《大唐西域记》，《西域行程记》对标的是《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然而如果仔细比较，就会发现，陈诚的书所记载的范围比起唐玄奘记载的要小得多，玄奘书中除对中亚的描写之外，对印度、帕米尔高原等地都有详细记录，而陈诚出使的范围只是新疆北路、中亚，以及阿富汗的一部分，其余都没有涉及。他对于西域历史地理的叙述也比不上《大唐西域记》。可以看出，明朝即便在高峰时期，在西域的影响和了解也是有限的。皇帝对西域和中亚的要求仅是让他们纳贡，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表18 陈诚《西域番国志》中提到的国家[93]

名　称	现　名	现在隶属国家	性　质
哈烈	赫拉特（Herat）	阿富汗西部	帖木儿汗国首都，国王沙哈鲁
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Samarkand）	乌兹别克斯坦	帖木儿汗国属地，沙哈鲁儿子和继承人镇守
俺都淮	安德胡伊（Andkhoy）	阿富汗西北部	帖木儿汗国属地
八剌黑	巴尔赫（Balkh）	阿富汗北部	沙哈鲁儿子镇守
迭里迷	铁尔梅兹（Termez）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	撒马尔罕管辖
沙鹿海牙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西南的锡尔河东岸，曾称为费纳客忒（Finaket）	乌兹别克斯坦	因沙哈鲁而得名，即“沙哈鲁克亚（Shahrokia）”，属于帖木儿汗国
塞蓝	Sayram，在奇姆肯特（Chimkent）东南	哈萨克斯坦	
达失干	塔什干（Tashkent）	乌兹别克斯坦	
卜花儿	布哈拉	乌兹别克斯坦	
渴石	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abz）	乌兹别克斯坦	帖木儿的出生地，其西南有铁门关
养夷	可能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	哈萨克斯坦	年久湮灭，数百人守孤城
别失八里	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附近	中国	
土尔番	吐鲁番	中国	

续表

名　称	现　名	现在隶属国家	性　质
崖儿城	吐鲁番市西 20 里亚尔乡的交河故城	中国	
盐泽城	崖儿城西南，距离吐鲁番 30 余里	中国	
火州	吐鲁番市东南哈拉和卓西南高昌故城	中国	
鲁陈城	鄯善县鲁克沁镇	中国	
哈密	哈密	中国	

陈诚使团归来后，双方进入了一个强化联系期。随明朝使团一同前来的还有西域各个国家的使团，这些使团都受到了皇帝的礼遇。

但沙哈鲁似乎还不满意，于是又在第二年再次派出使团前来，这一次，明朝皇帝只好派陈诚等人再次出使哈烈[94]，负责把对方的人护送回去。这是陈诚第三次出使西域。

双方的关系好到了这种程度，沙哈鲁甚至写信劝说永乐帝改信伊斯兰教，永乐帝自然回避了这个提议。[95]

公元1417年（永乐十五年），陈诚等人回来，又带来了对方的使节。可第二年，沙哈鲁的使节又到了，皇帝只好再次派李达、陈诚等于公元1418年再次出访。这是陈诚第四次出使西域。

除此之外，公元1420年（永乐十八年）和1422年（永乐二十年），沙哈鲁都派了使节前来，他的使节第一次携于阗和巴达赫尚两个国家的使者前来，第二次又与于阗使者一并前来[96]。

双方互访的频率超出了外交和友谊的需要，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失控。遥远的国家本来没有多少瓜葛，却几乎一两年就互相访问一次，这样的次数已经超出了外交的需要。可是，为什么沙哈鲁要不断地派人来拜访呢？如果仅仅看明朝的记载，是看不出所以然的，但幸运的是，恰

好在沙哈鲁的使团中，也有一个人记录下了路上发生的一切，也让我们豁然开朗，找到了沙哈鲁不断派人前来的秘密……

赚钱的外交团

沙哈鲁在位的时间是公元1404年（永乐二年）到公元1447年（正统十二年）[97]，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与明朝和印度交好，是执政的主题之一。他曾经在公元1442年派遣使者到了印度，至于中国，更是出使了十次之多。[98]

其中公元1419年（永乐十七年）到1421年（永乐十九年）这一次，由使节团中的一位画师记载了下来，让我们对明朝的对外交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时，整个中亚地区直至伊朗西部，事实上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沙哈鲁是这个政权的首领。但是在明朝的记述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它仍然把每一个地区当作一个国家，沙哈鲁的各个儿子分别领有中亚不同的地区，他们统领的地区都被视为一个与明朝交往的国家。于是，沙哈鲁的出使团队中除国王的使节之外，还包括他五个儿子的使节。记录这个事件的画师叫火者·盖耶速丁，就属于三王子派出的使节。[99]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要分别派出使节？这里先埋一个伏笔，谜底在后文揭晓。

这个使节团于公元1419年11月24日离开沙哈鲁的首都赫拉特，于第二年12月14日到达北京，公元1421年5月18日离开北京，公元1422年8月29日回到赫拉特。下面就详细看一下他们的行程：

使团刚刚出发，离开赫拉特后，于11月27日到达巴尔赫，因为冬季的严寒停留了超过50天，才继续向撒马尔罕前行，到达时已经是第二年2月7日。

2月25日从撒马尔罕出发后，与他们同行的是一个中国使团。这个中国使团之所以到撒马尔罕来，是因为之前曾经有一个沙哈鲁的使团去中国（公元1418年，永乐十六年，八月），皇帝派遣太监李达和官员陈诚率领一个中国使团陪着回到中亚[100]，这次，又由中亚使团再把中国使团送回去。

由于路途耽误，他们到7月11日才赶到吐鲁番。吐鲁番在当时还不是一个伊斯兰教城市，这里大部分人还是佛教徒，有一些寺庙，其中的佛像非常壮观。这说明，新疆地区到明朝时依然有不少佛教徒存在。

7月16日，他们到达火州[101]，这里已经有中国官员了。官员们迎接了使者们，并给他们做了登记。16天后，他们到达哈密。哈密是一个奇怪的城市，一座巨大的佛寺和一座宏伟的清真寺面对面耸立着。

之后，他们穿越了新疆和甘肃之间的大沙漠，到了一个距离肃州[102]只有10天路程的地方，这里有中国第一个城市和前哨。许多官员专门跑到这里来欢迎使团，他们搭上了帐篷和高台，摆上桌椅，摆出鸡鸭鱼肉和水果，当然还有酒水，使节们都喝醉了。

不要以为中国人跑这么远去欢迎使团是因为好客，这其实是他们的职责。除摆上酒肉欢迎客人之外，更要紧的是对他们进行登记，一个人都不能漏掉。

或者说，自从外国人进入中国的边境，皇帝的官员就要随时随刻掌握他们的动向，每一个人每一刻都不能失联。

酒足饭饱之后，中国人按照人头开始开单子。除了要知道每个人的名字，还必须确定使团的人数。

这时，我们可以揭开为什么沙哈鲁和儿子要分别遣使的秘密了。所谓使团，其实大部分都是商人组成的，这些商人并不是从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路上“捡”来的。由于明朝不让商人入境做生意，他们只有加入使团，才有资格进入中国境内。

当然，商人们加入使团是要付出代价的，必须花钱向使团隶属的国王购买名额。所以，一个国王被允许派出使团，本身就有巨大的利益。他们也总是往使团里塞入更多的商人。

当然明朝官员也不是傻瓜，作为对策，就是限制使团的人数，每个使团的人数都有个额度。比如，正牌国王沙哈鲁的使团规模可以有200人，而其他小地方的使团人数只有几十人而已。[103]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把整个中亚都作为一个国家，那么沙哈鲁派出的使团就只有200个名额。可是，如果中亚可以在花名册中拆散成许多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独立的名额，那么整个中亚的使节名额就会扩张到几倍的规模。

沙哈鲁虽然是中亚的共主，却也懂得贸易实惠比面子更重要的道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领土被遥远的明朝登记为不同的国家，只在意能否把更多的名额卖给商人们。

中国官员登记造册完毕之后，甘州总督王大人请使节们吃饭。席上除琳琅满目的食品之外，还有杂技表演。同时，为了将他们带到甘州[104]，还给他们提供了10天的伙食。

他们先经过嘉峪关到了肃州，在嘉峪关又登记了一遍。到了甘州之后，使者们用不着的行李都留在了这里，等回来时再取。除礼物之外，其余一切都由中国人供给，包括马匹、食品、住处，一概不再花使团自己的钱。每个驿馆准备的是450匹马或者骡子，50到60辆车，每辆车配备12个人拉。送来的吃的包括牛肉、鹅肉、鸡肉、米、面、蜂蜜、酒、泡菜等。

每到一个城镇，城镇的官员都要设宴，设宴时官员和使节们都要对着一个帘子跪拜三次。越是离北京近了，宴席的内容越丰富。

12月14日，他们终于在中国人的“伺候”下到了北京。到这时，中央

政府的面子工程所产生的花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在北京，各种赐宴和赏赐的花费更是无法计算，不说别的，就说每10个人一天得到一只羊、一只鹅、两只鸡，就足够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羡慕的了。这意味着这个使团一天就需要51只羊才能满足需求。

离开北京后，使团又被按照同样的礼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传递着，他们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由巨大的明帝国买了单。

明帝国追求的，只是在他们离开时，能够和入境时的花名册对上，这就表明没有一个外国人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到了他们离境时，官员们才可以松一口气，去等待下一个使团的到来。

这种规矩从明成祖和沙哈鲁时期定下来，一直维持到明帝国灭亡都没有走样。当明朝晚期的西方传教士鄂本笃来到甘肃时，中国官员们依然如同明朝初年那样，完成所有的手续，在西北的陆路上为入境的外国使团提供着从衣食住行到娱乐安全的一切，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就是中国境内在陆路方向上不能有一个外国人在自由行动。[105]

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陈诚奉命第五次出使西域，刚走到肃州，突然被召了回来，原来，明成祖朱棣归天了。继任的仁宗皇帝随即放弃了成祖的政策，不再派遣使节前往西域。[106]

这项花费巨大的活动由此而停止，明朝最具进取心但也最花钱的活动就此终止了。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一个个以赚钱为目的前来中国的使团，以及皇帝的面子。

在陆路上，明朝将外交做成了赔本买卖，并阻止了双方正常的贸易往来，让丝绸之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面子工程，那么，在海路上，他们是否又能明智一点儿呢？

不幸的是，海路上出现的，是另一个更加庞大的面子工程……

第十六章 郑和下西洋：官方垄断的高潮

陈祖义事件：明初的对外干涉

在如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南部，有一个叫作巨港（Palembang）[107]的城市。它是古代“群岛东南亚”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有着光辉的历史。

从唐代开始，这里就有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古国室利佛逝（Sri Vijaya），宋代以后，中国人将之称为三佛齐。与室利佛逝长期竞争的是位于爪哇岛上的诸政权。也是从唐代开始，爪哇岛上先后兴起了夏连特拉王朝（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马打兰王国（公元8世纪到10世纪）、谏义里王国（公元1049年到1222年）、信诃沙里王国（公元1222年到1292年），这些王国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竞争着海上贸易。在元明时期，爪哇岛又崛起了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帝国满者伯夷，将三佛齐兼并。[108]

元朝末年，随着中国南部的叛乱愈演愈烈，当时在南部称雄的豪强们大都带着匪徒或者海盗的痕迹，这些海盗除中国本部之外，还向海外移民，形成了历史上较早的一次华人移民浪潮。他们的目的地大都在东南亚的海岛上，移民的来源地大都在广州、漳州、泉州一带。[109]

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一支广东人的移民队伍来到了旧港，其核心是一个叫作陈祖义的人和他的家族势力。[110]陈祖义等人到了旧港，发现这里是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于是停留了下来。与陈祖义同时在旧港的华人首领，还有一位叫作施进卿的广东人，以及另一个叫作梁道明的人，他来自广州南海县，手下有数千人之多[111]。

在中国人刚到的时候，旧港还有三佛齐的旧王在统治，虽然它已经臣服于爪哇，但仍然有单独的王存在，只是这个王必须听命于爪哇。三佛齐的王在洪武年间还朝贡过明朝，也表明它依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到了洪武晚期，三佛齐就彻底被爪哇灭亡，不存在了。

爪哇虽然灭亡了三佛齐，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控制力，这给了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机会，他们乘机将旧港占据，控制住这里[112]。

中国人控制时代的旧港是一个良港，南面是大山，北面是海洋，一条河流穿过城市，岸上保留着许多室利佛逝时期的印度教砖塔。旧港的港口叫作淡港，这里有一个小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形成小海峡，对港口起到了保护作用。

除了是良港，这里的土地也非常肥沃，适合种稻谷。但旧港也有一个问题：海拔太低，水多地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首领的房子建在地上，普通人的家当都在船上。这种船屋可行可住，平常就漂在水上，不会被淹没，想走时起锚就可以离开。由于人们习惯在水上生活，所以也擅长水战。

旧港也有不少土特产，最奇特的是一种叫作金银香的香料，这是一种树上分泌的胶液，香气非常浓烈。还有一种头部巨大的犀鸟，人们杀死这种鸟，只是为了要它角质的顶骨，称为鹤顶。[113]

这群中国人占据了旧港，但由于中国人来得太多，地域紧张，为了争夺土地，他们分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以陈祖义为一派，而南海县的梁道明则是另一派的首领，施进卿的情况不明，可能和陈祖义曾经是一派。[114]

在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招募海外诸国前来入朝，没有完全采取闭关锁国的态度，但他本人对海外扩张的兴趣并不大，甚至主动确定了许多“不征之国”[115]。由于担心海外的骚扰，到了朱元璋统治后期，已经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时期，情况更加异化。明成祖除继承了父亲的海禁政策之外，又加强了官方的海外联系，将对外关系变成了一种官方垄断的行为。

在这种官方垄断中，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姿态，要求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明成祖就派遣了使臣前往南海出使。不过，这些使臣不是郑和，而是以一个叫作尹庆的太监为首，尹庆使团出使的地方是满剌加（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琐里、柯枝、古里[116]等地。

之后，又派出了一个叫作孙铉的使团去南洋[117]，在回程时，孙铉碰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听说了旧港的事，他将梁道明的儿子带回了国内。

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明成祖听说了旧港的情况，专门派了一个使团前往旧港招募这些中国人。使团的正使谭胜受也是广州南海县人，与梁道明是同乡，此外还有一位叫作杨信的人一同前往。梁道明和他的党徒郑伯可见到了使者，亲自前来朝贡。明成祖为此赐给梁道明等人代表了社会等级的衣冠，以及150锭宝钞、20表里文绮、70匹绢。[118]

由于皇帝招募的只是梁道明，在旧港另一帮派中担任头目的陈祖义感到被区别对待了。第二年，陈祖义和梁道明分别派人来朝贡，陈祖义派的是儿子陈士良，梁道明派的是儿子梁观政。

到了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旧港又迎来了一位中国使臣，他的名气在将来会远超其他的使臣，也给旧港的一部分中国人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个使臣叫郑和。

表19 成祖时期的南海使臣[119]

郑和前	尹庆、闻良辅、宁善、马彬、孙铉、杨信、谭胜受
与郑和一起	杨敏、王景弘、王贵通、李兴、李恺、朱良、周满、杨真、张达、吴忠、马欢、费信、巩珍
与郑和同时代但不相交	吴宾、张原、张谦、周航、甘泉、洪保、侯显、郭文、林贵、倪俊、黄原昌

表20 郑和七次下西洋[120]

次数	奉诏日期	回京日期	到达地点	备　注
1	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	永乐五年（1407）九月二日	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古里	根据《明史》，此次生擒旧港首领陈祖义
2	永乐五年（1407）九月十三日	约永乐七年（1409）夏	爪哇、暹罗、锡兰、柯枝、古里	南山寺碑与锡兰郑和碑有记，《明史》与《明实录》与第三次混一
3	永乐六年（1408）九月二十八日（次年九月出发）	永乐九年（1411）六月十六日	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八里、锡兰	根据《明实录》，生擒锡兰王亚烈苦奈儿
4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十五日	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八日	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麻林、木骨都束、不剌哇	根据《明实录》，生擒苏门答剌伪王苏干剌

续表

次数	奉诏日期	回京日期	到达地点	备　注
5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十日	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十七日	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沙里湾泥、彭亨、旧港	根据《明史》，回京日期见陈鹤《明纪》
6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三十日	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十八日	苏禄、祖法儿、阿丹等	根据《明史》
未完成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十六日			根据《明史》，永乐帝崩，任务取消
7	宣德五年（1430）六月九日	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九日	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不剌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八里、阿丹、佐法尔、竹布、加异勒等二十国	根据《明实录》，出海与回京日期并见祝允明《前闻记》

与尹庆一样，郑和也是一位太监，他来自明朝的边缘地区云南昆阳州。不过这里并不是他的祖籍，他的祖先来自西域。在元代，蒙古人为了统治巨大的中国疆土，引入了许多西域地区的回族人到各地落户，而云南就是回族落户的重要地区，他们形成了现在的云南回族群体。郑和家族就是在元初来到云南的。他的曾祖采用了蒙古人的名字，叫拜颜（伯颜），父亲随了祖母的姓，称为马哈只。郑和年幼时，明军征服了云南，搜刮了一批幼童进入宫中当太监，郑和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郑姓是皇帝后来赐给他的。[121]

与其他太监相比，郑和幸运地分配进了燕王的府邸，当燕王成了永乐帝，郑和也就受到了重用。明朝初期有派遣太监当使臣（明朝叫行

人）的传统，在宫中当太监的郑和恰好搭上了这一波顺风车，成为使团中的一员。

在明成祖时期，还有许多使团分布在从西域到南海的广大区域内，他们有的比郑和资格还老，甚至郑和前几次下西洋的路径和国家，都已经有人去过了。

不过，郑和与其他使团的不同在于，其余的人大都只是使团，而郑和率领的却是整整一支海军。根据记载，他带去了27800余人，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多。船的数目有63只[122]。这样的军队数量已经超过了许多小国家军备总数。

皇帝给予郑和的命令也是一种炫耀式的，除让他带很多钱去之外，还要求他必须对着这些国家的国王宣读天子的诏书，再赏赐他们财物。如果这些国王承认明朝的权威，就炫耀一番后离开，如果不承认，就用武力解决他们[123]。

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出发后，先经过占城，然后过爪哇、苏门答剌、阿鲁[124]（Aru）、满剌加[125]等地，最后到达印度的小葛兰[126]（Quilon）、古里[127]（Calicut）。

古里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最远端，不过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已经被他之前的使臣考察过了，因此他第一次航海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地理知识。

在这一路上，庞大的军队也没有耀兵的机会，只是在爪哇岛可能有一次小冲突[128]。在当时，爪哇岛上分成了两个王国，东王和西王相互残杀，最后西王灭掉了东王。当中国使节经过东王原来的治所，登岛贸易时，被西王的军队误杀了170人。西王听说后连忙派遣使节到中国来谢罪，并赔偿黄金6万两。这个使团应该是搭乘郑和的船队前来的，与船队同时到达中国。

除了这一件事，没有记载任何别的冲突。如果这样空手而归，那么

如此庞大的军队就显得徒劳无功，对于郑和后来的职业发展也没有好处。

但到了旧港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129]，当郑和回程经过旧港时[130]，听说陈祖义依仗强权，劫掠商旅，所以要求他投降。陈祖义选择了诈降，同时阴谋劫掠船队。这时，有一个叫作施进卿的人[131]，也是陈祖义的同乡，前来告密，使得郑和有了准备。

当陈祖义果然前来偷袭时，郑和将计就计将其抓获。在这次战斗中，郑和军杀死陈祖义同伙5000余人，烧毁战船10艘，缴获另外7艘，抓获了陈祖义等三人，还缴获了两颗铜印，据说这是他称王称霸的证据。

陈祖义被郑和带回了中国，皇帝下令将其杀死。同时，告密的施进卿受到了优待，继承了陈祖义的地盘。皇帝同时宣布设立一个名义上的机构，叫作旧港宣慰司，施进卿就这样成了名义上的明朝官员。

虽然表面上明朝政府控制了旧港，但这实际上只有羁縻属性，明朝无法干预旧港内部事务，与旧港联系更加紧密的爪哇才是它真正的主人。明成祖死后，旧港的朝贡就变得稀少，到最后不了了之了[132]。

郑和擒陈祖义，成了他第一次下西洋最大的功劳，他率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经历了两年航行，四处宣旨和赠送礼物，最后剿灭了一处中国人的“海盗”，这就是第一舰队的作为。

但如果仔细推敲，陈祖义事件却是有疑问的。首先，陈祖义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人，很难说会去袭击一个比他强大许多倍的朝廷舰队。如果从海盗的常理讲，他更应该避开，而不是袭击。因此，这种指控是否站得住脚，是可以合理质疑的。

另外，郑和舰队是有理由将事情扩大化的。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

郑和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很知道每次出征都制造一些话题性事件，在尤其重要的第一次出行中，如果只是率领庞大的舰队，走一圈其他使臣已经走过的道路，很难体现这个舰队以及郑和的价值。必须利用舰队在海外发生一定的冲突，才能说明皇帝权威满溢八荒。从这个意义上，回程时的旧港是制造话题的最佳地点。

旧港由于是由中国人把持，也给了郑和更方便下手的机会和更完美的理由。其时，中国人将海外的移民当作抛弃了家园的不肖子孙，这些人即便被镇压，也不会引来国内一丝一毫的同情。

同时，旧港还存在着几股势力的争执。除陈祖义之外，还有皇帝更加喜欢的梁道明，以及主动投靠的施进卿，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打击一方，扶持另一方，是最容易表现权威的方法。

综合这些角度，陈祖义事件的真相，可能只是郑和参与了旧港的内争，而并非是一次对海盗的剿灭。但是，由于有限的史书只提供了孤证，因此无法推翻对陈祖义的指控了。

在历史上，知道陈祖义的人非常少，但人们却记住了郑和的丰功伟绩。人们只是不知道，郑和功劳的第一块砖，是由不幸的陈祖义奠基的。

代表秩序的大舰队

除了对陈祖义的干预，郑和舰队在接下来的历次下西洋中，还以宗主国的身份对东南亚和南亚的当地事务进行了两次干涉。

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410年（永乐八年）或者1411年第三次下西洋时[133]。这一次，郑和舰队在去程时到达锡兰山国。这个国家位于现在的斯里兰卡，国王叫亚烈苦奈儿，他不仅对皇帝的舰队侮慢不敬，还试图谋害郑和。郑和察觉后，选择了离开。据称，亚烈苦奈儿是这个区

域一霸，不仅对郑和舰队不好，还与邻国不和睦，常常袭击来往的使臣，周围的国家都敢怒不敢言。

郑和回程时，再次经过锡兰山，亚烈苦奈儿将郑和诱骗到国中，令他的儿子向郑和索要金银珠宝。郑和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亚烈苦奈儿就暗地里准备了5万兵马去洗劫郑和的舰队。这时郑和还在城中，为了斩断他和舰队的联系，锡兰山王伐木断绝了道路。

郑和发现他的阴谋之后，连忙带领下属回船，却发现道路已经中断了。看到这种形势，郑和决定将计就计，一面派人绕路回到船上，叫大家拼死抵抗，另一方面，自己率领剩下的2000人进攻锡兰山王的都城（是一座土城），将城攻破，生擒锡兰山王。

在海边的敌人一听说国王被抓，连忙回师猛攻郑和，明军顽强抵抗，让他们无法得逞。最终，战斗以锡兰山王被抓而结束[134]。

这件事同样没有锡兰山一方的记述，只有明朝的记载。如果仔细推敲，仍然可以发现，也许事情并不像记载中那样非黑即白。不管记载怎么掩饰，但显然，郑和是带了至少2000人进入锡兰山首都的。当一个外来的舰队带着数万人来到海岸，它的首领又带了两千兵马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不管怎么说都称不上友好。即便不是敌对，这也是一种来自中央帝国的傲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都会认为对方是一支入侵部队。如果是弱小的国家，很可能不得不屈服，如果是当地的大国，则可能采取敌对的军事行动。

在这里，不应该忘记明成祖给郑和的命令：如果对方屈服，就宣读圣旨赏赐对方，如果不服，就动用武力。[135]

郑和的第三次军事行动发生在他第四次下西洋时，时间是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地点在苏门答剌国。在郑和去往苏门答剌时，该国正在经历一场无法分清是非的内斗。

之前，苏门答剌国曾经被那孤儿国侵略，那孤儿国的人民都有在脸

上刺青的习惯，因此被称为花面国。这两个国家都位于现代的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区域，是邻国。在争斗中，苏门答刺国王在战争中被毒箭射中身死，他只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显然无法率领大家抵抗侵略。这时，国王的遗孀站出来发誓：谁能打败花面国为丈夫报仇，就嫁给谁让谁当国王！

有一个渔翁听说后，率领人马打败了花面国，杀死了对方的国王。于是，前王的遗孀就嫁给了渔翁，让他成了国王（渔翁被当地人称为老王）。[136]

在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这位老王亲自到中国进贡，三年后才回到苏门答刺。这时，前王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暗地里纠结了一帮人杀死了老王，自己当上了新王。

老王的儿子叫作苏干刺，带领家口逃往山上，建立了一个新寨，与新王结成了世仇。双方时不时发生战争。[137]

到了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郑和来到了这里，于是新王与郑和取得了联系，请求郑和将苏干刺消灭，郑和发兵将苏干刺生擒，带回了中国。

苏干刺与新王之间的战争本来只是内斗，但是到了郑和汇报工作时，却是另一番说辞。根据郑和的汇报[138]，他前往苏门答刺赐予国王财宝时，前伪王的儿子苏干刺正在阴谋夺取国王之位，又对郑和不赐给他礼物（而是赐给国王）不满意，发兵袭击了郑和，于是郑和率领舰队和苏干刺手下士兵发生战斗。苏干刺逃走后，郑和追击直到南渤利国，才将他抓住。

就这样，原本是王族内部的纷争，在郑和的汇报之下就变成了苏干刺对明朝舰队的攻击，也是苏干刺对明朝地位的挑战。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占据了道德优势的苏干刺反而成了乱臣贼子，于是明成祖将其名正言顺地处斩。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的曲直，是因为这件事不再只有孤证，而是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方面，是郑和的随从中一个叫作马欢的人留下的比较详细的记载，另一方面有《明实录》和《明史》中简略的更加形而上的记载。通过对这两个版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明朝人善于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装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这个框架就是：你是否愿意朝贡？你是否承认明王朝的宗主地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明朝政府的判断。

这个模式也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方式，他虽然率领着如此庞大的舰队，却极少表现出对世界的好奇心，只是依仗着火与剑，到西洋上的各个国家耀兵一番，获得对方表面上的尊重。

在这里，对中央朝贡秩序的维持，是舰队出发的主要目的。明朝将自己定位为现有儒教秩序和宇宙观的维护者，而不是新世界的发现者，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解开郑和下西洋的许多谜团。

人们常常询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郑和的舰队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了近百年，为什么这个舰队的规模比西方还大，却没有产生出与之匹配的成果？

答案就在于双方的目的是不同的。郑和的目的不是想发现新的事物，他只对表面上的臣服感兴趣，维持的是皇帝脑子里想象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他所去的地方并没有任何一处是未知的，对阿拉伯人来说，郑和经过的地区就是阿拉伯人都到过的地区，不管是东南亚群岛，还是印度，还是阿拉伯半岛地区，以及东非，郑和一路上搜集的都是阿拉伯人早已经知道的信息，再将它重走了一遍，要求对方臣服。

至于那些已知世界之外的东西，不是他感兴趣的。

就连那巨大的宝船，也并不是明朝人创造的。事实上中国的造船技术从唐朝开始就有了巨大的突破，到了宋朝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元朝更

是加入了波斯、阿拉伯的造船技术，达到了第二个高峰，之后就陷入了停滞。明成祖时期虽然造出了如此庞大的航船和舰队，却只不过利用了元朝的现成技术，没有任何改进。

郑和舰队的技术没有任何改进，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秩序和耀兵，航行的地点只是重复阿拉伯人的线路，一遍一遍重复着，直到把明朝的财政耗空，维持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的航行不是为了发现新世界，只是为了印证旧世界的回光返照，其意义也就小得多了。

下西洋时期的世界

如果将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件拆开来看，又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他的第一次下西洋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称为尝试期。此时明成祖多次派遣使节前往西洋，郑和只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之一，并非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行程也中规中矩，如果不是发生了陈祖义事件，激发了皇帝的雄心，很难说会有后来的六次航行。

在这一次航行中，舰队出发后，首先到达了越南南部的占城国，再从占城国经过东南亚，最远到达了印度的古里。[139]

这一段路其实已经被郑和之前的使者考察过，并未超出明朝政府的认知。这条路的重点地区包括几个：

第一个是越南南部的占婆，占婆作为中国南部的守卫者和受益者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

如果继续向南，在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穿过，就到了著名的爪哇海。爪哇海是东南亚贸易的中心，也是必须掌握的通路。在古代，从爪哇海通往印度洋有两条通路：一条是走现代苏门答腊岛北面的马六甲海峡，这要经过阿鲁、满剌加（马六甲）、苏门答剌等国家；另一条

是走现代苏门答腊岛南面的巽他海峡，这要经过旧港和爪哇等国家。因此，满剌加、旧港和爪哇，或者说苏门答腊和爪哇这两个岛屿，就成了南洋路上的最重要停留站，也成了占婆之外的下一个重点地区。

不管是走哪个海峡，穿过海峡之后西行，都会到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如果走北线（马六甲海峡），还会经过现在的尼科巴群岛；如果走南路（巽他海峡），就直接穿越印度洋到达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几乎是南海商路上必须停留的中转站，因此它是郑和关注的第三个重点地区。

从斯里兰卡继续向西，可以分别到达印度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在东海岸上是大国朱罗的势力范围，在明代时，朱罗国可能被称为琐里。在西海岸上，是一系列国家，最重要的是古里，也就是西方人称为卡利卡特的国家，另一个叫作柯枝（科钦）。古里和琐里代表的印度海岸，就是郑和关注的最后一个重点地区。

奇怪的是，郑和出征的地方大都位于爪哇海的西方，在东方还有无数岛屿，除巨大的加里曼丹之外，还有著名的香料产地马鲁古，以及菲律宾群岛。这些群岛的资源是如此丰富，在未来成了西方人最眼红的地方，因为控制了这些地方，就等于控制了香料产出。但郑和却从来没有踏足过这片地区，可见西方人与东方人的目标是完全对立的。西方人的贪婪让他们追求的永远是利润，而东方人对礼仪和秩序的痴迷，使他们要的是表面上的臣服和进贡。爪哇海以东的地区由于更加落后，甚至没有组织起有形的国家，自然被作为使臣的郑和无视。

经过第一次航行后，由于郑和带来了进贡的使臣，同时又有镇压陈祖义的传奇，皇帝大喜，于是轰轰烈烈的耀兵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第二、第三次下西洋并没有取得太多的突破，可以称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每一次的最远端也都是到达印度的古里。但这两次出使却给现在留下了不少的资料。郑和第二次下西

洋中，到达斯里兰卡后，曾经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至今仍然存在。在两次下西洋中，出现了几位当时微不足道但现在却又很著名的随从，他们是马欢、费信和巩珍，这三人记录下了大量的资料，形成了三本地理书籍。也正因为这三本书，我们才更加清楚地知道了郑和的行踪[140]。

此外，皇帝的热情也在这时达到了高峰。第一次下西洋回来，郑和只待了十天，皇帝就下命令再让他准备出发了。第二次甚至还没有回来，皇帝就又下了命令让他一回来立刻准备第三次下西洋。[141]

到第三次下西洋结束，明朝的无敌舰队一直处于巡游状态，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变成了例行公事。郑和显然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到了第四次，他终于有所突破了。

郑和的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下西洋可以算作第三阶段。

他的第四次下西洋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比起前三次，其突破在几个方面：第一，没有从占城直接驶入爪哇海，而是沿着海岸线前行，顺着东南亚半岛，经过马来半岛，摸索着对陆地和海岸做了探索；第二，在印度南方，郑和舰队探索了如今的旅游胜地马尔代夫，当时叫作溜山国。[142]

马尔代夫是阿拉伯人比较熟悉的群岛，早在伊本·白图泰时期就有了记载，他对马尔代夫的珊瑚礁充满了惊叹。[143]但到了郑和时代，中国人才发现这片土地。

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大的突破——郑和终于冲破了印度半岛上古里这个最远点，穿越阿拉伯海，到了波斯湾沿岸的霍尔木兹岛。这个岛屿荒凉、缺水，却是阿拉伯前往印度的重要基地，显然郑和是从古里的穆斯林处打听到了这里[144]。除了霍尔木兹，郑和舰队还继续向西，到达了非洲东海岸，也是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这里有两个国家叫作木骨都束和不剌哇，前者尤其著名，现在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郑和的

舰队还继续向南航行了一截，到了肯尼亚海岸北部的港口城市马林迪，当时称为麻林地。[145]

这里已经是郑和下西洋的终点，虽然足够遥远，但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却并不算偏僻。在葡萄牙人之前，阿拉伯人已经从非洲东海岸向南，直达莫桑比克海岸，如果他们再继续向南航行2000公里，就可以提前发现通往欧洲的新航道了。[146]

郑和的第五次航行的成就没有超出第四次，但在第六次航行中，又比第四次多了一点点新的发现：他们除访问波斯湾和非洲之角之外，还到达了红海海口的亚丁[147]。

也是在郑和第六次航行时，明朝耀兵的高潮终于结束了。原因很简单：舰队太庞大，但收益不明显。

除耀兵和让远方的国家来朝贡之外，皇帝能够得到的还有一些奢侈品，比如宝石、珍珠、珊瑚、龙涎香、椰子、乳香、没药、安息香，甚至狮子、金钱豹、鸵鸟。这些东西对于民间生活基本需求几乎毫无价值，为了得到这些东西，还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舰队。这种状况在财政充足的时候还可以，但到了财政紧缩时期，舰队必然成为首先要裁撤的财政负担。

就在郑和第六次出发后，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北京故宫里新盖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突然遭到了火灾。随着这次火灾，明成祖调整了财政扩张政策，下达了命令，停止采买奢侈品，并不再造新船。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人的总结非常到位：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在是让中国太疲惫了。[148]

不过，明成祖虽然不再造新船，却允许旧船继续出征，郑和也顺利地完成了第六次任务。

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明成祖又派出郑和执行第七次任务，但不幸的是，舰队还没有出发，明成祖就死了。新皇帝仁

宗立刻在大臣的建议下召回了郑和，这一次出使没有成行。

对于郑和的出行，朝野的意见很大，比如有大臣表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149]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航海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造福人类，但是，一旦航海权被政府垄断，那么原本再大的好处也会消失殆尽，变成得不偿失。反而是西欧更小的船队、更小的花费，一旦采取了自由竞争的态度，就会克服困难，将航行变得有利可图。

郑和下西洋还有最后一个阶段。明仁宗洪熙帝只当了不到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宣德帝继位。宣德五年，由于政府没有再派舰队，海外国家也懒得进贡，皇帝只好再次派郑和出使，希望将外国人带回来。这就有了第七次下西洋。

这一次，郑和除前往前面去过的那些国家之外，还派人去了一个新国家——天方国，也就是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至此，郑和漫长的下西洋活动终于结束了。

由于政府已经越来越严格地禁止民间出海，随着官方出海的结束，中国终于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

表21 郑和三书记载的地名[150]

《星槎胜览》	《瀛涯胜览》	《西洋番国志》	今地名
占城国	占城国	占城国	现越南中南部，明时首都在归仁
宾童龙国			现越南南部、胡志明市以东，顺海省北部和富庆省南部一带
灵山			现越南绥和东南部的嘎那角（Varella）
昆仑山			现越南南部海上的昆仑岛
交栏山			现印度尼西亚寥内群岛
暹罗国	暹罗国	暹罗国	现泰国
爪哇国	爪哇国	爪哇国	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旧港	旧港国	旧港国	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
满剌加国	满剌加国	满剌加国	现马六甲，首都在现马来西亚马六甲市
九洲山			现马来西亚邦咯岛
苏门答剌国	苏门答剌国	苏门答剌国	现苏门答腊岛西北角
花面国	那孤儿国	那姑儿	现苏门答腊岛北部巴塔克人区域
龙牙犀角			位于马来半岛上，称为琅卡苏卡古国，可能位于现泰国北大年

续表

《星槎胜览》	《瀛涯胜览》	《西洋番国志》	今地名
龙涎屿			现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附近海域的布拉斯岛，或者龙多岛
翠蓝屿			现安达曼海上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
锡兰山国	锡兰国	锡兰国	现斯里兰卡
小具喃国	小葛兰国	小葛兰国	现印度西海岸的奎隆
柯枝国	柯枝国	柯枝国	现印度科钦
古里国	古里国	古里国	现印度卡利卡特
忽鲁谟斯国	忽鲁谟斯国	忽鲁谟斯国	现伊朗霍尔木兹岛
剌撒国			可能在波斯湾，也可能在也门亚丁附近
榜葛剌国	榜葛剌国	榜葛剌国	现孟加拉国和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
真腊国			现柬埔寨
东西竺			现马来西亚东岸海中的奥尔岛
淡洋			现苏门答腊岛上的塔米安，位于岛上亚齐省东南部，岛的东侧，现已被拆分
龙牙门			现苏门答腊岛东侧的林加群岛
龙牙善提			现马来西亚兰卡威岛
吉里地闷			现帝汶岛
彭坑国			现马来西亚彭亨
琉球国			现台湾、琉球群岛等地
三岛			现菲律宾群岛
麻逸国			现菲律宾民都洛岛
假里马打国			在现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上
重迦逻			现爪哇岛东部的泗水
浡泥国			现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周围
苏禄国			现菲律宾西南苏禄群岛
大具喃国			可能在小具喃旁，印度西海岸
阿丹国	阿丹国	阿丹国	现也门亚丁港
佐法尔国	祖法儿国	祖法儿国	现阿曼国佐法尔
竹步国			现索马里海岸朱巴河口一带

续表

《星槎胜览》	《瀛涯胜览》	《西洋番国志》	今地名
木骨都束国			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溜洋国	溜山国	溜山国	现马尔代夫
卜剌哇国			索马里南部巴拉维
天方国	天方国	天方国	现沙特阿拉伯麦加
阿鲁国	哑鲁国	哑鲁国	现苏门答腊岛东北岸
	黎代国	黎代	现苏门答腊岛，古花面国以西
	南浡里国	南浡里国	现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亚齐河下游哥达拉夜一带

逝于中国的外国国王

明朝初年的耀兵政策还给中国大地上带来了两个特殊的遗迹。在中国国内，有两个与众不同的墓葬，分别属于两个外国的国王。他们是位于南京的浡泥国王墓，以及位于德州的苏禄国东王墓。

这两个墓葬之所以出现在中国，恰好印证了明成祖时代的外交政策。从他们的遭遇我们既可以看到皇帝的好大喜功，也可以见识其外交政策的花钱无数。

浡泥国位于现代印度群岛的加里曼丹岛上，这里现在也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称为文莱。朱元璋一获得政权，就在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派督察御史张敬之和福建行省都司沈秩前往东南亚招人来朝贡。当两人到了浡泥国，国王马合漠沙对他们非常无礼。于是沈秩开始教训国王[151]：大明皇帝抚有四海，凡是世界上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之地，无不奉表称臣，浡泥是弹丸小国，还敢抗拒天威！

说完这话，他不仅没有被杀，浡泥国王还恍然大悟，举手加额，表示：皇帝是天下的主人，就是我的君父，我怎么敢抗拒？

沈秩继续说：既然你知道人家是你的君父，为什么还不尊敬他？

浡泥国王撤掉了座位，放上诏书，率领群臣对着诏书参拜。沈秩宣读诏书的时候，国王还跪着没有起身。不过这时国王还是嫌路远，不想朝贡，找理由说，最近苏禄国来侵犯我们，我们国家的子女财富都被苏禄国拿走了，等三年后，国家稍微宽裕一点儿了，再造船前往中国入贡。

沈秩表示皇帝登基已经四年了，全世界都赶去朝拜了，还等什么等？针对国王说国小无财，不好意思朝拜的说法，沈秩又说，皇帝富有四海，不指望你的钱，就指望你去磕个头！

到了这个份上，国王还是犹犹豫豫，表示要和大臣协商。沈秩又继续吓唬国相，国相答应他五月五日成行。

但在这时，爪哇国（阇婆）派人来了。浡泥国是爪哇国的属国，爪哇国刚刚帮助浡泥国赶走了苏禄国的军队，就听说浡泥国要到中国朝圣，感到很不满意。在爪哇的压力下，国王又犹豫了，甚至拒绝见明朝的使臣。

沈秩只好再次吓唬国相，表示连爪哇国都朝贡大明，更何况爪哇国的属国？如果不去，哪天大明军队一来，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在连哄带吓之下，国王完成了第一次朝贡。[152]

关于历史记载的沈秩的话语，已经成为孤证，不由我们不信。然而说一个国王在手无寸铁的使者吓唬之下，就从傲慢突然间转变为磕头，依然是太富有戏剧性了。在明太祖时代，说派兵也只是吓唬人，因为皇帝并不主张进攻那些遥远的国家。但在中央帝国的语境下，这种富有戏剧性的转变对皇帝来说却是合情合理的，皇帝并不认为使臣是在说假话，于是堂而皇之写入了史书之中。

如果说明太祖时还不可能派兵，到了明成祖时，派兵就是真实的

了，那就是郑和的“无敌舰队”。但除了耀兵，明成祖还是更喜欢用大把的赏赐，于是就有了浡泥国的另一次朝贡。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决定带上妻子、家属和陪臣，启程前来中国朝拜。朝贡的船一路向北，停在福州港，守臣向皇帝上报。皇帝大喜，连忙派太监去迎接，一路上所有的州郡都要设宴款待。永乐早年，明朝的首都还在南京应天府，浡泥国王到达时，皇帝在南京奉天门设宴招待，之后请他们住在国宾馆里。朝廷每天都为他们供应整头的牲口。赏赐自然也少不了[153]，国王以下都赐给冠带、衣物等，之后又赐给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等。官员见国王要行公侯礼。

就在明成祖不断张罗时，浡泥国王却由于水土不服逝世。于是如何安葬国王又成了一出怀柔远人的大戏。皇帝专门为国王辍朝三日，赐给墓地，加上神道、墓祠，一切都是高规格的。东宫的皇子皇孙们都要去祭祀，而且每年的春秋两次，还要专门去以少牢礼祭奠。国王也有了谥号，叫作恭顺。

最后，皇帝宣布国王的儿子继承王位，临行时又赏赐了玉带一条、黄金百两、银三千两，加上别的各种财物，一路上继续派人护航，将其送了回去。

浡泥国享受了如此待遇，忠心如何呢？最初还是不错的，公元1410年（永乐八年）九月曾经遣使入贡。公元1412年（永乐十年）九月，国王带着母亲再次前来，于是又是一套复杂的礼仪与赏赐。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到1425年（洪熙元年）间，浡泥国还有四次入贡。之后，随着永乐帝的死亡和郑和舰队的停止，浡泥国就很少来了。当然，明朝的大军也并没有如期而至，逼着他们再来入朝，毕竟太远了。

除了浡泥国，满剌加（马六甲）国王也曾经来过中国，事情发生在公元1411年（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的朝贡团非常庞大，达到了540

多人，他们到了京城，又是一番折腾和赏赐，心满意足而回。[154]

与马六甲国王平安归去不同，苏禄国东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苏禄国位于现在菲律宾的苏禄群岛。苏禄国的国土分成三部分，分别由东王、西王和别洞王统治[155]。公元1417年（永乐十五年），三位国王带着妻子、家人一块儿踏上了朝贡之路，这时明朝首都已经换到了北京顺天府，于是三王只好千里迢迢赶往北京。明朝皇帝大肆赏赐之后，将他们送回，不想东王走到德州时就去世了，于是皇帝下令在德州给他修建了陵墓。东王泉下有知，应该庆幸他是去世在归途，毕竟已经见过了最神圣的皇帝。

但皇帝这一番好意也是短暂的。公元1420年（永乐十八年）、1421年、1423年，苏禄国还有进贡记录，之后，明朝一罢舰队，他们就再也不来了。[156]

那么，郑和舰队罢除后，皇家使团不再出行，朝廷又禁止民间出海，明朝是否真的和外界断绝了交通呢？

答案是：政府的意愿与民间的利益相悖时，是不可能断绝民间的尝试的。

到了明代后期之所以倭寇横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间需要贸易。当政府禁止贸易时，贸易就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倭寇就是其中一种。[157]

事实上，即便在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对东南亚的探索比起郑和的官方舰队还是领先的。郑和的舰队所走的线路是相对固定的，除了经过爪哇海到印度，再到非洲，很少旁及其他地方，但这种不灵活性却被民间所弥补。当皇帝下令停止皇家舰队时，民间却一直偷偷坚持着航海，哪怕皇帝打压的高峰期，明朝的海洋仍然是活跃的。

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指南针的普及，这可以让民间用更小的船，来做更复杂的操作。于是，明朝的民间船舶不仅到达东南亚，也去了郑和

不曾去到的日本、琉球、菲律宾，航线也更加多元化，不再是当初的一条主线。

当航行的人多了，民间自发产生了一种航海地图，称之为“海道针经”。根据现存的针经[158]，不仅记载了从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和霍尔木兹的航行指南，还有中国到日本，中国到菲律宾，菲律宾到马来西亚、印尼诸港的指南，其余分支也更加丰富，将马来西亚、印尼与东南亚半岛部分紧密相连，成了复杂的航行网络。

这种指南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活跃程度。它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要比单纯派一支皇家舰队大得多。

但我们提到民间航线的丰富时，也应该看到，政府的禁止的确给民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造船业的衰落。由于民间贸易更多是在东南亚，前往印度以外的远海大船就不再需要了，加之民间造船必须躲开政府的监管，这都造成了中国造船业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突然衰落，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

明朝造船业衰落和采取海禁的同时，在亚欧大陆更加遥远的一端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西欧，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创造的世界帝国所带来的震撼，基督教世界苏醒了。

这种苏醒分成了几个方面，其一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革命，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诞生了一批具有科学精神的哲学家，并导致了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此之前，人们并不注重观察世界，而是以《圣经》为出发点不断地演绎各种奇怪的结论，之后，人们开始学会观察世界，利用自然现象总结（归纳）为更加合理的规律，再用这些规律演绎出的新结论，去和自然现象做验证。“归纳—演绎—验证”这种三段式的研究方法恢复了人们的理性和逻辑，也就有了产生现代科学的基础。

第二方面的苏醒是人们对于此世的关注——不再只关注天国和拯

救，而是想过好这辈子的事，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兴起，却也造成了创造力的大爆发，其中最著名的是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发生。

第三方面的苏醒是理性和逻辑的复活带来的对上帝的怀疑，由此产生了基督教新的分支。宗教革命的结果，是让思想市场产生了竞争机制，也让世俗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第四方面是人们好奇心和贪婪的增加，导致了对世界探索活动的加剧，而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开始用他们的炮舰对全球进行重塑。

当欧洲的各种变化进入加速阶段时，作为传统世界另外几极的中东地区、印度地区和远东地区，虽然诞生了几个超级帝国，却依然是按照传统的轨迹进行着演化和迭代更替。不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还是明王朝，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它们与其他时代的大帝国同样伟大，但如果放在横向指标上与西欧世界对比，却显得过于渺小了。

于是，西方世界终于开始冲击全球了……

第十七章 明末开关：最后的回光返照

佛郎机进入亚洲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归来67年后，公元1498年（弘治十一年），郑和舰队曾经去过的非洲城市马林迪又迎来了另一波不速之客。与郑和庞大又整洁的舰队相比，这次的来访者只有三艘破烂的小船。但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和变化，却是天翻地覆的。

关于“佛郎机人”[159]如何窃取新世界的，我们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公元1488年（弘治元年），一位叫作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的人在葡萄牙王若昂二世（John Ⅱ of Portugal）的命令下，带着两艘船向南行驶。他们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一个叫作牧牛人湾的地方[160]，这是欧洲人第一次从南方进入印度洋。此前，葡萄牙人为发现新航道已经准备了数十年，从郑和下西洋时代，葡萄牙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公元1394—1460年）就组织人马开始探险活动，憧憬着发现新航道前往印度开展贸易，直到几十年后，憧憬变成了现实。

当发现好望角后，葡萄牙人由于内部原因停顿了数年，公元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帮助葡萄牙人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的探险活动才再次启动。不过，等一切都准备好时，已经是公元1497年，领队的人叫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达·伽马舰队由三艘船和一艘补给船组成，这支小小的舰队就担负起了去往印度的使命。11月，达·伽马再次绕过好望角。当绕过好望角

时，他们将补给船烧毁。12月2日，他们到达了迪亚士发现的牧牛人湾。

公元1498年2月24日，达·伽马舰队进入莫桑比克海峡，3月2日，到达一个叫作莫桑比克的港口。在港口里，他们发现这儿的人不是野蛮人，而是开化的人。这里的房屋整洁优美，分布着穆斯林的宣礼塔，人们衣着华丽，穿着丝绸镶边、黄金刺绣的长袍，说着阿拉伯语。港口里停泊着阿拉伯船只，正在卸下黄金、白银、丁香、胡椒、姜、银戒指、珍珠、珠宝和红宝石。[161]也就是说，这支葡萄牙舰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文明区域。阿拉伯人的势力从中东地区出发，在海上向东扩张到了东南亚，向南延伸到了莫桑比克。[162]

从莫桑比克北上，舰队到达现在位于肯尼亚的蒙巴萨，这里是中国人记录的最远之地，名叫慢八撒。

从蒙巴萨继续北上，4月14日，葡萄牙人到达了马林迪，也就是中国史料记载的麻林，或者麻林地。在这里，中国探险家和西方探险家的路程重合了，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亚欧非画卷。不过，中国人的探险到此地结束，欧洲人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在马林迪，葡萄牙人打听到，可以从这里利用季风直接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这条路也是郑和舰队当年利用过的。葡萄牙人决定按照这样的路线航行，果然，他们只用了23天就穿越了北印度洋，5月18日，看到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海岸。

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在这里，他们首先碰到了两位摩洛哥的商人。摩洛哥人竟然会欧洲语言，用混合着的卡斯蒂利亚[163]语和热那亚[164]方言和他们打招呼。对阿拉伯人来说，从北非到印度都是已知的世界，所以有摩洛哥人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要忘记，160多年前的伊本·白图泰也是一个摩洛哥人，访问过印度。

葡萄牙人所到达的卡利卡特，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古里。郑和下西洋

前三次的最远端，以及后四次的中转站都在古里。郑和从古里带回去的只是象征性的进贡，葡萄牙人却看上了这里的贸易机会。如果单纯地寻求让古里象征性臣服，那么只会耗费无数的财力，而西方人利用贸易，却可以在古里赚取大量的利润。

葡萄牙人对于亚洲的征服是充满血腥的，却由于有了贸易的刺激，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在接下来短短的数十年里，葡萄牙人迅速地控制了从中东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

那么，葡萄牙人到来时的亚洲又是什么样的呢？

对葡萄牙人来说，不幸的是当他们进入亚洲时，亚洲的几个巨型帝国都处在或者即将进入强盛期。与欧洲比邻的地方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公元1453年（景泰四年），土耳其人攻克了君士坦丁堡，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之后，土耳其进入了强盛期。到了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土耳其最强大的君主苏莱曼大帝登上了苏丹之位。从君士坦丁堡被攻克，到苏莱曼大帝时代，土耳其一直对东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土耳其控制了阿拉伯地区，也在红海和阿拉伯半岛对刚刚到来的欧洲人产生了影响。[165]

在印度北部，葡萄牙人到来时还是德里苏丹国在统治。但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双重后裔巴布尔在印度打败了德里苏丹国，建立了著名的莫卧儿王朝，印度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莫卧儿王朝也是与古代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并列的强大王朝，控制的疆域从孟加拉直到阿富汗，拥有众多人口。[166]葡萄牙只是一个小国，人口太少，要想征服印度也是不现实的。

在伊朗，从公元1501年（弘治十四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朝：萨法维王朝（Safavid）。这个王朝定都大不里士，信奉什叶派。它也是继萨珊王朝之后伊朗第一个统一的本土王朝，完全摆脱了阿拉伯的影响。[167]这个王朝在波斯湾的东岸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足以抗衡葡

萄牙。

在中国，明王朝恰好处于壮年时期，虽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但也足以抵挡欧洲势力[168]。

除了这四个超级大国，在东南亚地区也有三个区域性的强国，同样是葡萄牙人无法抗衡的。

此时，原来东南亚的强国占婆和高棉都已经衰落，但几个新兴的民族却还在扩张。在缅甸地区，缅人建立的蒲甘王朝在蒙古人的进攻之下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数个地方小王朝，但到了公元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一个位于东吁的小国突然间崛起，统一了缅甸，建立了一个强力的王朝。这个王朝不仅在缅甸称雄，还多次打败了泰国人，成了东南亚当仁不让的霸主[169]。

而泰人从云南进入现代泰国疆域之后，首先在景线[170]建立了兰纳泰王国（景线王国），后来逐渐南移，先后迁都清莱和清迈。到了公元1238年（嘉熙二年），在泰国中部的素可泰建立了素可泰王朝。公元1350年（至正十年）又在距离曼谷以北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大城建立了阿瑜陀耶王朝。阿瑜陀耶王朝并吞了素可泰，统一了泰国，并一直存在到公元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这个泰人的王国一方面将东部的高棉帝国不断压缩，使高棉变成了一个小国；另一方面又为了和缅甸争霸而发动战争。阿瑜陀耶虽然在泰缅战争中一直是弱势的一方，从长期来看，却也顶住了缅甸的进攻，在东南亚形成了缅甸和泰国双雄争霸的局面。[171]

在更加东面的越南，越南的后黎朝（公元1428年到1789年）从陈朝灭亡后的混乱中崛起，虽然后来出现了南北两个权臣对峙的情况，但这两方都足够强大，也没有给葡萄牙人留下太多的机会。

既然亚洲的强国都还存在，葡萄牙人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与后来英国、法国式的强权不同，葡萄牙人并不追求将整个大陆变

为殖民地，它只瞄准这些大型政权最薄弱的地方，为贸易撕开一条缝。

事实上，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都是陆地政权。它们更加关注内地，而忽略了海洋方面的威胁，对于海岸和港口往往是不重视的。葡萄牙人作为一个海洋性政权，偏偏追求的就是这些不受重视的港口。

还没有到亚洲时，葡萄牙人在西非就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当时西非也有不少陆地性的强国，葡萄牙人无法立刻征服，于是他们买通这些政权的国王，要求在海岸上修建一个堡垒进行贸易，一旦堡垒建成了，就和当地人做生意来赚钱。当然他们的贸易是破坏性的，利用廉价的金属或者手工制品，换取奴隶和黄金等高附加值产品，最后破坏了当地政权的稳固性，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化。[172]

在亚洲，他们采取了相同的做法。虽然亚洲有许多内陆强国，有的还是巨型帝国，但这些帝国对海岸地区的控制力却并不强。比如，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之前的德里苏丹国，主要控制区域在印度北部的内陆，但在南方的海岸上却有许多小的港口国家，这些国家无法抵御葡萄牙人，又不受德里苏丹国或是莫卧儿帝国的保护，葡萄牙人针对的就是它们。

此外，印度从德里苏丹国过渡到莫卧儿帝国，恰好有一个空档期。莫卧儿在公元1526年才建国，并逐渐强盛，葡萄牙人在这个时间之前进入南印度，要比几十年后要容易得多。

在波斯和土耳其，葡萄牙人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中也发现了防守薄弱的小岛或者港口，通过在这些地方建立堡垒，他们就可以控制航道。

而更重要的是，东南亚的陆地上虽然有缅甸和泰国这类强国，但在东南亚的海岛上却处于衰落期。东南亚两个最著名的海岛是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在苏门答腊岛上最著名的国家是室利佛逝，它恰好处于衰落期。爪哇岛上的满者伯夷王国到了公元16世纪初也步入了衰落。[173]

其余海岛小国由于过于分散，都很难抵挡西方的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给了葡萄牙机会。这也是海洋国家灵活地从海上蚕食陆地强国的开始。

下面就是葡萄牙人进入亚洲的时间线。

公元1499年（弘治十二年）7月10日，达·伽马舰队回到欧洲。舰队损失了一艘补给船和一艘战舰，船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亡，但他们带回来的肉桂、丁香、姜、肉豆蔻、胡椒和宝石仍然足以赚钱，这就让人们看到了庞大的商业机会。

公元1500年到1501年，葡萄牙国王接着派出了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舰队去往印度。舰队发现了巴西和马达加斯加，考察了红海和非洲东南的黄金贸易港索法拉（Sofala）。在印度，卡布拉尔对西南海岸的港口国家采取了暴力行动，炮轰了卡利卡特，将贸易点转到了南面的科钦，也就是郑和口中的柯枝。这次的远征开启了西方对东方的暴力模式。

公元1502年到1503年，达·伽马再次率领庞大的舰队来到了印度。这一次，他利用血腥的屠杀获取了坎纳诺尔和科钦两个贸易站，并在非洲桑给巴尔以南的基尔瓦港（Kilwa）建立了据点。公元1503年，科钦完成了堡垒化，成了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最大据点。

公元1505年，葡萄牙再次派出一支舰队，由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率领，这支舰队的任务是抢占战略点。6月，阿尔梅达摧毁了基尔瓦，并在废墟上建立了石头堡垒。8月，阿尔梅达洗劫蒙巴萨，这颗东非明珠臣服于葡萄牙的贸易体系。

阿尔梅达来到印度后，先后在安贾迪普岛、坎纳诺尔建立石头堡垒，并将科钦的木头堡垒替换成石头堡垒。

为了截断阿拉伯对手的贸易路线，葡萄牙人还占据了索科特拉岛（Socotra）并驻军，控制了红海和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航道。索科特拉

岛位于阿拉伯半岛以南、非洲之角以东，阿拉伯海和亚丁湾的交界处，是控制红海的最佳地点，却由于在海上而处于陆地强国之外。

公元1510年（正德五年），葡萄牙占领果阿，将这里变成了葡萄牙永久性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才强迫葡萄牙人将果阿还给印度人。

在控制印度海岸的同时，葡萄牙人继续向东扩张。公元1508年，他们在东南亚交通咽喉马六甲建立了贸易站。公元1511年，葡萄牙攻克马六甲，建立堡垒。从此马六甲成了葡萄牙控制东南亚的中心。同时，他们派遣了使团前往缅甸、暹罗和苏门答腊岛。

公元1512年，他们去到香料群岛[174]，那里隐藏着欧洲人垂涎欲滴的香料的最终秘密。公元1513年，葡萄牙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

公元1515年，葡萄牙人攻克霍尔木兹，控制了波斯湾。霍尔木兹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要道上的岛屿，重要性自不待言。

从第一次到达印度到攻克霍尔木兹，短短十六年的时间里，葡萄牙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这个帝国几乎没有侵犯那些陆上强国的势力范围，却由于地点的重要性，几乎控制了最重要的贸易线路，为葡萄牙的商业帝国打下了基础。作为对比，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持续了26年，最终的结局却是黯然撤离。

当葡萄牙人在东方称霸时，在西方，西班牙也消化了美洲。公元1519年，麦哲伦开始在西班牙的资助下进行环球航行。这次航行虽然因麦哲伦死亡而结束，却为西方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在亚洲，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香料群岛产生争执。此时，香料群岛已经被葡萄牙控制。[175]

葡萄牙称霸海洋几十年后，由于国力太小，维持舰队和堡垒的开支太大，衰落了下去。原本在欧洲帮助葡萄牙维持北欧香料市场的荷兰人也乘虚而入，向亚洲扩展。

葡萄牙、荷兰等国接近中国国门时，明朝政府对亚洲的剧变有多大认知呢？可惜的是，明朝政府几乎一无所知。

明代中后期，中国人出于让外国人朝贡的需要，编纂了几部世界地理文献，将他们当时所知的外国都列了出来。不幸的是，这些地理文献表明，他们对世界的变化毫无觉察。在16世纪20年代编纂的《西洋朝贡典录》中，仍然按照100年前的郑和时期记录，没有丝毫变化。16世纪70年代编的《殊域周咨录》中，终于有了佛郎机的记载，却将他们当作不知名的小国。17世纪20年代的《东西洋考》中，才首次出现了被称为红毛番的荷兰，而这时已经是地理大发现一百多年之后了。

表22 明朝中后期对于世界的认知[176]

16世纪20年代[2]	东南亚大陆	占城国、真腊国、彭亨国、暹罗国、榜葛剌国、云南百夷[3]
	东南亚岛屿	爪哇国、三佛齐国、满剌加国、浡泥国、苏禄国、阿鲁国、苏门答剌国、南浡里国
	东亚岛屿	琉球国
	印度岛屿	溜山国、锡兰山国
	印度大陆	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
	阿拉伯区域	祖法儿国、忽鲁谟斯国、阿丹国、天方国
16世纪70年代[4]	东夷	朝鲜、日本、琉球
	东南亚大陆	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榜葛剌
	东南亚岛屿	满剌加、爪哇、三佛齐、浡泥、苏门答剌、苏禄、麻剌
	印度岛屿	锡兰
	印度大陆	琐里[5]、古里
	阿拉伯区域	忽鲁谟斯、默德那[6]、天方国
	西欧	佛郎机、拂菻
	北亚	鞑靼、兀良哈、女直
17世纪10年代[7]	外番	日本、红毛番
	东洋	吕宋、苏禄、猫里务（菲律宾布利亚斯岛）、沙瑶（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呐哔啤（菲律宾棉兰老岛北部达皮丹）、美洛居（印尼马鲁古群岛）、文莱
	东南亚大陆	交阯、占城、暹罗、柬埔寨、彭亨、柔佛（马来西亚柔佛州）、大泥（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
	东南亚群岛	下港（印尼西爪哇万丹）、旧港、麻六甲、哑齐（苏门答腊岛西北亚齐地区）、丁机宜（苏门答腊岛中部英得腊其利）、思吉港（东爪哇）、文郎马神（加里曼丹岛南部马辰）、迟闷（帝汶岛）

② 根据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该书著于16世纪20年代，只记载了西洋的情况。

③ 现在，云南百夷已经属于中国。

④ 根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该书完成于16世纪70年代（万历初年）。该书包括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所有”国家（已知的）。

⑥ 可能是印度的朱罗国（Chola）。

⑦ 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

⑧ 根据张燮《东西洋考》，该书出版于公元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该书只包括了东洋和西洋的国家。

不过，虽然明朝政府对西方世界非常无知，但由于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挑战亚洲的陆上强国，他们也无法对中国构成威胁。甚至在泰国和缅甸这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也只能采取与国王合作的态度，才能获得一定的存在感。

也正是由于他们不够强大，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明朝还是占了上风。

但双方的冲突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明朝依然建立了万国来朝式的世界观，而葡萄牙人却在东南亚地区开始蚕食这些朝贡小国。虽然地理上过于遥远，但这些小国受到葡萄牙人侵略的消息最终还是传给了北京的皇帝。从理论上说，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有义务维持各个朝贡国的和平与发展，既然葡萄牙破坏了这个规矩，就应当受到惩罚。

但下一个问题是：明王朝真的有能力惩罚破坏秩序的葡萄牙吗？恰好在这时，一个叫作马六甲的小国由于葡萄牙人的侵略而向中国求援，考验皇帝的时候到了。

作为东亚秩序的维护者，明朝还真的采取了报复性的手段，要为葡萄牙侵占的那些东南亚小国复仇了！

第一次致命接触

公元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控制了通往印度洋的门户。东南亚小国纷纷谴责却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求援。不过，中国由于缺乏舰队，无法进行远征，只能等待上门的机会。

六年后的公元1517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葡萄牙国王派了一支舰队前去勘察中国的状况，舰队的指挥官叫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跟随舰队同往中国的，还有一支使节队伍，大使是一位叫作多默·

皮列士的人。这也是中西关系史上第一支前往汉人治下中国的正式使团。在汉代，传说大秦王安敦曾派出使节到中国，不过那更可能是商人行为，冒充大秦使节。而在元代柏朗嘉宾等人的出使，去的是蒙古人的政权，而汉人在当时只是蒙古人的臣民而已。直到明代，皮列士才是确定的代表了葡萄牙国王的正式使节。他的遭遇也说明了当时东西方实力的对比，表明葡萄牙人为什么无法取得长期的优势。

舰队于8月15日到达珠江口外的屯门岛，这里是当时明王朝指定的外国人贸易区，从东南亚来的船舶不能进入珠江，只能在这里交易商品。明王朝虽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但是民间贸易又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依然存在，于是，广州的官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划定一块区域让他们进行贸易。

广州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恩赐，但葡萄牙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商船不能进珠江这个制度感到很不解。经过交涉（可能还有误解，因为中国官员一直在阻止他们，但他们却认为可能得到了允许），葡萄牙人的舰队前往广州。

到了广州城外的江面上，葡萄牙人按照惯例鸣放礼炮，并升起了国旗。这些动作吓坏了广州城的官员，他们立刻确定葡萄牙人犯了三重错误：第一，未经允许前往广州；第二，鸣炮相当于宣战；第三，升旗。

葡萄牙人向广州官员解释，这并非是敌意，只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位于广州的布政使接受了这种说法。指挥官伯列士在广州将大使皮列士一行交给了中国人，然后离开，回到了马六甲。[177]

大使皮列士实际上是一个药剂师，平常在印度工作，此次被挑选出来担任国王的大使，是因为他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与人打交道的技巧。

在来中国之前，皮列士曾经写过一本书，其中专门论述了中国这个葡萄牙人都没有来过的国家，他在语气里甚至带着点不屑。皮列士表示，东方的国家谈到中国时，都声称中国是个伟大、富庶、美丽、壮观

的国家，但这显然是夸大了，这些词语如果用来形容葡萄牙，可能比形容中国更加准确。[178]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皮列士来到中国，要展现葡萄牙人的伟大。

到了公元1518年，位于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认为他们的使节也该启程回来了，于是又派出一支舰队，由西蒙·德·安德拉吉（前一位指挥官的弟弟）率领，前去接自己的使节。他们于当年8月再次到达了广州外的屯门岛。

不过，葡萄牙舰队惊奇地发现，皮列士虽然在广州，却不是已经回来了，而是还没有出发！原来广州的官员还在走程序，在程序没有走完之前，使者是不可能北上去见皇帝的。他们的奏章已经来来回回传递了三次，还没有结束。皇帝以前没有听说过佛郎机，这个国家也不在进贡名单上，皇帝必须首先确定是怎么回事，才能下命令。显然，葡萄牙人是低估了中国地域的广大，以对待东南亚国家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必然会大吃一惊。

到了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皮列士一行才终于从广州出发，前往北方。5月，皮列士到达南京。当时，王阳明刚刚镇压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明武宗恰好来到南京[179]，于是皇帝就在南京和皮列士见面了。

在中国史书上也记载了这次会面，提到这些使臣有30多人，为首的叫作加必丹末（即皮列士）。[180]《明史》还记载，在葡萄牙使团中有一个叫作火者亚三的人，他是最活跃的。显然，为了给皇帝留下好印象，皮列士曾经鼓励属下多和中国人接触。这位叫作火者亚三的手下就结交了当时的权贵江彬，江彬把他介绍给皇帝。皇帝很喜欢火者亚三，还不时和他学习外国话，当作一种戏谑。

在火者亚三等人运作下，皇帝决定把使团带往北京。南京的见面是非正式的，皇帝要的是礼仪，不是会谈，只有到北京才能进行正式会

见。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1月，皮列士等人经过千般辛苦，终于到达了大明帝国的正式首都北京。

但是，葡萄牙使节在北京又出麻烦了。原来皮列士带了两封信[181]，一封是葡萄牙国王写的，其中语气非常傲慢，带着西方君主的威严，另一封是首任舰队指挥官伯列士写的，但在请东南亚的译员翻译成汉语时，译员主动翻译成非常谦卑的格式，符合明王朝的胃口，葡萄牙人被蒙在了鼓里。不过多亏了这种语气，皮列士才有了被接见的机会。

国王的信由于是密封的，皮列士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但是当北京方面把国王的信拆开，与伯列士的中文信一对比，就发现原来其中说的并不一致，这给北京方面的印象就是：这个使团是假的。

皮列士只好解释，由于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密封的，他们不知道内容，所以两信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真假使团尚没有分清楚，更大的麻烦来了。这时从其他渠道又来了三封信，第一封是御史何鳌写的，另一封是江南道御史丘道隆写来的，第三封是马六甲国王写来的。[182]

在丘道隆的信中，主要提到佛郎机人竟然敢并吞马六甲，而马六甲是中国的藩属国。丘道隆认定佛郎机人是想取代马六甲称王。明王朝历来不支持篡位者，所以，不应该把佛郎机人当作使臣，而是应该驱逐出去，让他们退还马六甲的领土。[183]

马六甲国王的来信更是充满了控诉，希望中国政府主持公道，同时警告中国人，葡萄牙人之所以来中国，不是为了出使，而是伺机窥探，到最后要像对付马六甲一样动用武力。[184]

更麻烦的是，何鳌的第三封信仿佛证实了马六甲的指控[185]，因为当皮列士离开广州之后，留在广州的葡萄牙舰队已经制造了一系列的入侵事件，表明葡萄牙人来的目的就是武力侵略。

那么，葡萄牙舰队到底制造了什么事件呢？

原来，就在皮列士离开之后，舰队司令安德拉吉回到屯门岛。屯门岛是各国来做生意的地方，却不允许有任何永久性建筑。安德拉吉来到后，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法令，下令在岛上用石头和木料修建一座堡垒，就像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南亚做的一样。不仅有堡垒，他们还把大炮架了起来。葡萄牙人这样做的借口是镇压海盗，因为在这里海盗颇为猖獗，就连明朝官府的船也要敬畏他们三分。

除堡垒之外，仿佛是为了示威，安德拉吉还命令在另一座小岛上树立了一座绞架，甚至用它来绞死了一个犯罪的海员。在绞刑之前，安德拉吉还进行了专门的仪式，找了印度人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接着，有几艘来自东南亚的船到了，这些船按照惯例要在屯门岛交易。但安德拉吉认为，这些船是后来才到的，应该排在自己的后面。可是，在中央帝国的体系中，这些船由于是从中国的纳贡国家前来的，显然拥有贸易优先权，这就发生了冲突。

更令广州官员感到气愤的是，安德拉吉的舰队交易完毕离开后，广州却突然发现少了不少孩子，这些孩子被安德拉吉的舰队买走了。

根据葡萄牙人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买孩子，是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规矩和阿拉伯人的规矩类似，有卖孩子当奴隶的传统。阿拉伯人总是俘获其他地方的人当作奴隶，同时穷人也可以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卖掉换钱，他们的这个风俗又是从罗马人那儿学来的。安德拉吉来到岛上，恰好有人带着孩子来贩卖，葡萄牙人显然想带一些中国孩子回去，就买了下来。[186]

葡萄牙人买孩子这件事，在中国人口中却异化成了另一番模样。他们传言，佛郎机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吃孩子，之所以在海上徘徊不去，就是为了买小孩吃。每个孩子价值100个番钱。广东人还发现，他们的番钱是用黄金做的。[187]中国官员们也不认为佛郎机真的来自一个莫名

其妙的叫作欧罗巴的地方，设想它们以前可能是南渤利国，后来更名为佛郎机。

当这些事情都汇报给皇帝时，皇帝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就改变了。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原本依靠结交权贵，帮助使团讨好皇帝的火者亚三也出了问题。

原来，北京的人们已经打听到了火者亚三的底细：他不是佛郎机人，而是华人，只是他和佛郎机人混久了，冒充是佛郎机人。不过如果仅仅是冒充，中国人也忍了，另一件事情却不可忍。

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礼仪显然是磕头。这个礼仪在西方是单膝下跪，但在中国却是五体投地。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188]，他们遵循了这个礼仪，但火者亚三由于皇帝的宠幸得到了不少特权，见皇帝不用下跪，地位也在普通的外国使者之上。

如果分析一下，也可能虽然葡萄牙人遵循下跪礼仪，却仍然与中国人有一定的冲突，于是被盯上了，火者亚三的行为才引起了群臣的愤怒。虽然他不用跪皇帝，但这个特权却得罪了那些必须下跪的大臣。

有一次，火者亚三见到主事梁绰，也不屈膝，梁绰抓住机会将他打了一顿板子。火者亚三告诉江彬后，江彬将梁绰大骂一通。

如果火者亚三熟悉中国的传统，就绝不应该这么嚣张。果然，这些事情都积累了下来。公元1521年，明武宗去世了，宠臣江彬也被太后诛杀。

没有人罩着，群臣立刻打报告，将火者亚三杀死。加上一年前御史丘道隆和何鳌的上奏，以及马六甲人的控告，广州还不断把葡萄牙人的荒唐事儿传过来，这些混合在一起，让新皇帝痛下决心，下令不要佛郎机进贡，将佛郎机人赶出京城！[189]同时，皇帝还命令断绝一切与葡萄牙人的联系。

朝廷的命令传到广东，中国与佛郎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型的战争。

公元1521年，虽然肇事者安德拉吉已经离开，但是有三艘葡萄牙船却由于来得晚，贸易没有做完而留在了屯门岛。后来，又有两艘葡萄牙船来到，一共是五艘船。

葡萄牙人受到攻击的第一个信号，是留在广州的贸易代表被中国政府扣留了。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扣留屯门岛上其他东南亚船中的葡萄牙人，将他们搜查出来，送入广州监狱。

最后，中国政府派遣50艘船，将葡萄牙人的5艘船团团围住。

经过了40多天的围困，葡萄牙人开始突围，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中，葡萄牙人只能算侥幸逃脱。到达马六甲后，他们甚至在山上盖了一座圣母堂纪念这个奇迹。

中国人的舰船之所以不落下风，在于中国的船上也有火炮。根据记载[190]，佛郎机人的船长10丈、宽3尺，两旁有40余支桨。在当时仍然流行帆桨船，在海上时主要靠风力，但又保留了桨，靠近岸边时用桨划船，增加了灵活性。中国人形象地称这种船为蜈蚣船。除了桨，还有34门大炮。这些大炮大型的有1000余斤，中型的500余斤，小炮也有150斤。炮弹的外壳是铁的，内芯则是更加沉重的铅，炮弹大约有8斤重，能打百余丈。

另有记载[191]，除了船上用的，还有陆上用的陆炮，炮弹小的20斤，可以打600步，大的70斤，可以打五六里远。

最早注意到大炮的是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由于他需要到佛郎机人的船上去抽份子，看到对方船上有两个中国人，杨三和戴明。交谈下来，他发现这两个中国人知道如何造炮。何儒向上级汪 汇报后，汪 命令他把杨三接来，偷偷学会了造炮。所以，当中国和佛郎机第一次作战时，中国也有少量的大炮，这可能有助于中国将佛郎机人赶走。

如果说第一次战斗明朝只是小胜，那么第二次战斗可谓真正的胜利。

公元1522年（嘉靖元年），葡萄牙人的6艘船再次来到了屯门岛，他们被中国船只围困，其中一艘船被炮火击中了弹药库，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而沉没，另一艘在中国人登船后，船上所有的人都被击毙，剩下的船突围而去。[192]

除葡萄牙人的记录之外，这件事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根据中国的记载[193]，公元1523年（嘉靖二年），葡萄牙将军别都卢率领舰队袭击了广州新会的西草湾，中国一方的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将敌舰击退。于是葡萄牙又换了一个地方，到稍州继续骚扰，接下来的战斗中双方各有损失。其中中国一方王应恩阵亡，但中国缴获了对方的两艘船，斩首35级，生擒42人，包括葡萄牙人别都卢和疏世利。[194]

在战斗中，中国人缴获的大炮有20多门。

到了公元1530年（嘉靖九年），汪 升任右都御史，借机上奏，说明了西洋大炮的好处，并请求皇帝下令，在沿海地区的炮台上装备大炮。皇帝应允了，从此中国的海防开始了火炮化。由于这种大炮学自佛郎机，于是火炮就有了佛郎机的名字。

但中国人对于大炮的利用并不好，主要是将士们使用不善，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打起仗来很难通过大炮御敌，这个缺陷一直保留到了清朝，乃至公元1840年。

葡萄牙船逃走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搜捕所有外国船上的葡萄牙人，另一方面决定逮捕从北京转运过来的葡萄牙大使皮列士。

皮列士和葡萄牙人到达广州后，被投入监狱，很长时间内没有消息。直到后来，大约是在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有两封信从中国的监狱中辗转送了出来，人们才知道了这个使团的最终命运：他们大部分被折磨致死或者处死。[195]

使团一到广州，就被送进了监狱。他们先被关了30多天，等马六甲流亡政府的使者到来后，官员们首先讯问了葡萄牙人的情况，接着又让皮列士写了一封信，做成三份，交给葡萄牙国王、果阿总督和马六甲舰队长官，要求葡萄牙人必须退出马六甲。

马六甲使者拿到了信，却吓得够呛，表示如果向葡萄牙人转交了这信，就是他的死期。他在中国官员的逼迫下不得不出发，但他没有去马六甲，而是去了马六甲以北的北大年，将消息传给了流亡在那里的马六甲国王。马六甲国王正在宾坦被葡萄牙人围困，于是使者又回到广州带回了马六甲国王的消息，希望中国出兵。

但广州的官员显然不敢把事情上报皇帝，只是逼迫马六甲使者们离开。使者们都不想走，告诉官员，东南亚已经找不到葡萄牙人没有占领的地方了。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迫上路，在浡泥诸岛当了葡萄牙人的俘虏。[196]

这件事表明，明朝已经没有力量保卫他的属国了，只能捂住耳朵和眼睛，装作不知道。不过，一直被认为是无能的明朝却又有足够的实力击败葡萄牙的入侵，反而是强大的清朝在经过康乾盛世不久，就被欧洲人打破国门闯入。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接下来几百年中国和欧洲的此消彼长。

皮列士的使团成员几乎全部死在中国的监狱中。皮列士本人于公元1524年死在广州监狱。[197]

葡萄牙人使团的悲惨命运与其说是明政府的残暴，不如说是双方文明的冲突。在明政府看来，维持东南亚属国的秩序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中央政府无法做到随时维持秩序，但只要有机会，那么就一定要去做。

在明朝政府的眼中，葡萄牙人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入侵者，所以应当加以惩罚。

葡萄牙人野蛮地入侵了东南亚，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但同时，他们又代表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从此以后，不管明朝皇帝是否喜欢，世界性的贸易必将席卷全球，谁能在这种贸易体系中多参与一分，就能够获得多一分的优势。这一点是明王朝无法看到的。

当葡萄牙人到来后，明王朝不是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而是更加收缩、闭关，试图将这种变化排除在外。在当时，它仍然有实力用武力将葡萄牙舰队赶走，但这是以自己的实力损失为代价的。明王朝的地方官员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封疆大吏之死：对外贸易的胜利

驱逐了佛郎机人之后，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外国商人，而是广东政府。原来，中央政府禁止了佛郎机人的同时，也禁止了其他国家在广州的贸易。

从永乐帝开始，明朝就只准许外国人以进贡的方式进行贸易，进贡之外的其他形式从法律上说都是禁止的。只是后来由于法律松弛了，民间也屡禁不止，政府只好默许了其他形式的贸易，并默认了几个贸易点让人们在其中交换商品。当广州贸易点取消之后，外国的贸易船都跑到了福建漳州，于是两广地区的财政立刻受到了影响，收入变得匮乏起来。

事实上，不仅是广东，中国的沿海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到底是遵守老祖宗的法律，还是变通一点儿允许私下里的贸易，一直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大臣斗争的焦点。

贸易被禁止之后，当有人提出要缓和禁令时，在中央任职的给事中王希文打出了重重一拳，请求继续禁止一切非进贡的贸易，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198]

但真正感受到经济和财政寒冬的往往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地方官员。随着广东财政越来越受影响，巡抚林富又上奏，请求划出一片地方进行互市。这次皇帝支持了林富的请求，允许海外贸易商人在一个叫作香山澳的地方进行贸易。香山澳位于广东省香山县的海岸上，这里属于一片荒地，距离各个城市都很远，也只能通过陆路进入内地。由于地点太远，运输商品不便，外国商人们与地方官员配合，将贸易点移到了另一个叫作濠镜澳的地方，这里距离珠江口更近，便于贸易，所谓濠镜澳，就是后来的澳门[199]。

广东外贸的地点也变了好几次，最早允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等国贸易时，地点设在广州，到了正德年间，又改在屯门岛，之后又改为上川岛，后又移到了香山澳，最后才选择了澳门。

当澳门设立市场后，最初东南亚各国的船只都可以来澳门贸易。按照规矩，这里不允许建造永久性的房屋，船只一旦完成贸易就立刻离开，不允许过久停留。虽然政府禁止葡萄牙人贸易，可是，随着东南亚地区葡萄牙的一家独大，到了后来，如果不允许他们参加贸易，整个贸易链条就中断了，这时官员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他们的参与。葡萄牙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贸易权之后，迅速霸占了市场，其他国家的船只都尽量地避开他们，甚至不得不讨好他们，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国商人的统领。

但是，仅仅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进行贸易还是不够的。事实上，就在朝廷为这件事情争论不休时，民间和外国人都已经在偷偷地推动其他地方和形式的地下贸易了。

这些地下贸易主要牵扯到三方势力。[200]第一个势力是沿海的民众，明代也是海盗为祸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原因就在于政府禁止民间贸易。所谓海盗，最初也只是民间强人甚至乡绅组织的走私船，为的是打破政府的禁令，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到了后来，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他们就不得不走上以武力反抗之路，与能够帮助他们的倭寇和葡萄

牙人相勾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

第二个势力是来自日本的倭寇。由于日本在明朝的体系中是被排斥在贸易之外的，日本如果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只有走私一途[201]。加上日本处于割据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各个地方政府大都与走私团伙有联系，形成了复杂的联动效应。他们和中国的走私团队配合，与中国政府组织的海防势力进行周旋。倭寇不仅参与走私，还直接采取武装行动，不断地攻打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沿海地区民众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倭寇的进攻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另一方面，贸易的需求又让他们不时与倭寇站在同一战线上。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那么人民也会做出选择，帮助政府对付侵略，但由于政府的闭关政策，将人民逼向了对立面。

第三个势力是后起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对日本的发现是比较晚的，直到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才发现。但之后，葡萄牙人成了中日贸易的中间商，由于他们获得了日本的贸易许可，同时又能与中国进行半合法的贸易，所以他们将日本的银锭转卖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和黄金转买到日本。中日之间的不友好成了葡萄牙的机会，葡萄牙人甚至不希望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在这三方势力复杂的联动中，中国的海防力量却显得非常弱小，无法对付无处不在的灰色贸易行为，而这种行为夹杂着合理的诉求与不合理的武力，与正常贸易又难以区分。

公元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在浙江又来了一个严苛的巡抚朱纨。在他的任上，出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这次事件又和内政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让明朝千疮百孔的闭关政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202]

在明朝开明与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朱纨是一位保守却刚直不阿的官员。在他任职期间，福建、浙江沿海有许多强悍的海盗头子，比如李光

头、许栋、汪直等人，他们的活动基地在宁波的双屿。这些人得到当地百姓的配合，与官府对抗。当海盗强大时，官府的海军却非常孱弱，战船、哨船只有定额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负责海防的漳泉巡检司定额是2500人，但实际上只有1000人。

朱纨上任后，决定改变这样的局面。他认为要想清剿海盗，必须首先禁止一切船舶，再在民间采取保甲措施，实行连坐，才有可能根除。在他的费心张罗下，官军的势头得以重整，在一次行动中，将著名的海盗头子许栋擒获。

但就在这时，公元1548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来到宁波试图做生意，遭到严防之后又向南来到了泉州。在这里，他们在官员的默许下进行了贸易。第二年，随着朱纨对海防的加强，贸易已经不再可能，葡萄牙人将没有卖完的货物集中到两艘中国人的走私船上，并留下了30个人，与中国人一起继续贸易，其余的船只都选择了回航。这两艘船属于中国的走私头子李光头[203]。

两艘船在停泊时被中国军队发现，军队的都司卢镗[204]装作要打仗，引诱葡萄牙人先动手。一旦对方动手后，中国的大部队立刻进攻，将两艘船只缴获，李光头也和葡萄牙人一并被抓了起来。

抓获葡萄牙人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是卢镗却选择了一个更巧妙的计策：他逼迫其中四个葡萄牙人宣称自己是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国王[205]。当葡萄牙人和李光头等人被送往朱纨处，朱纨也同意了这种说法，并下令将96个中国人（包括几个孩子）全部杀掉，只留了三四名青年和一个成年男子——这些人是要向皇帝做证的。至于俘获的葡萄牙人，他们则想全部送往京城邀功。

这样，葡萄牙普通人的贸易行为，在朱纨等人的曲解下，就变成了葡萄牙人国王率领的入侵事件。如果这件事得到皇帝的褒奖，朱纨的权力会大大提升，并且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提高海防，到那时，宁波、泉州

一带的自由贸易体系将彻底被切断。

但朝中对朱纨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浙江和福建当地的人们由于做不成生意，对他的意见很大。这些意见通过乡绅与官场的联结，最终传到了北京的朝堂之上。朱纨的政敌陈九德乘机告了他一状，奏他滥杀无辜。

根据明朝的法令，如果要杀人，必须在判了死刑之后，再送往北京备案，只有刑部同意了才能杀。而朱纨一次性杀害了96人，且没有经过正常备案手续，就构成了滥杀。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免除他的责任，那就是：必须证明他杀这些人是由于对方犯有叛乱罪，包括僭号流劫等事件。如果能够证明有这些情况，就相当于发生了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和战争，在战争中的杀戮是可以理解的。

说到最后，事情又回到了起点：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来攻打明朝的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皇帝为此首先停了朱纨的职务，然后派了两个钦差下来，分别是给事中杜汝祯和巡按御史陈宗夔。两人到达后，开始了提审手续。葡萄牙人记载的中国提审手续非常完备[206]，两位大臣并不在一起提审，而是隔绝开来，各审各的，一个审被告时，另一个人就审原告，然后他们再合议，把口供放在一起对比，寻找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推敲，或者再审。最后，还要去现场考察，寻找更真实的证人。

通过这一系列的审讯，两位大人最终认定：这只是一起走私事件，并不是僭号流劫，也没有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皇帝下令将朱纨抓起来，但朱纨却早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他慷慨流涕，说道：我又穷又病，为人又太骄傲，不甘心被人对簿公堂。就算皇帝不想让我死，闽浙地方的人也必然杀我。我死也要自己死，不需要别人动手[207]！他做了一首绝命词，服毒自尽。

朱纨知道闽浙两地人恨他，但他自负是天下人的错，自己严格执法，为了皇帝守卫边疆是无比正确的，不需要道歉。就连《明史》上也惋惜地说，朱纨一死，人心涣散，海寇大作，祸害东南十几年。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之间还有制约作用，在他“严格”执法之下，中国的外贸将彻底无存。不要忘记，那些海寇大都是被逼的。

朱纨死后，那些被俘的葡萄牙人也有了裁定，除个别涉及杀害中国士兵的，继续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之外，其余的51人都流放到广西。[208]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作伯来拉的，趁流放广西的机会细致地观察了这个老大帝国，留下了一本中国观察记[209]。这本书后来又成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材料。他撰写了另一本更加著名的书——《中华大帝国史》[210]，成为当年欧洲争相阅读的中国指南。根据他的记载，中国人对这些俘虏很友好，一路上将他们放在轿子里抬着，通过水路和陆路联运，可能走的是江西赣江经过梅岭，转入北江，再通过西江进入广西的道路。[211]

到达桂林后，这些葡萄牙人每月可以获得一斛大米，被分散在各个城镇，可以自由活动。经过多年，一些人想办法和澳门取得联系，最后偷渡去了澳门。[212]

朱纨之死，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清流派官员们彻底泄了气。他们再也不肯在海禁上下功夫了。浙江、福建的41个卫所和439艘战船都慢慢报废，朱纨在河口和海岛设立的堡垒也都废弃了。海禁再次松弛下来，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了。

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葡萄牙人表示有船毁坏，需要上岸修理，于是获得了在上川岛上岸的权力。三年后，他们开始在澳门建造教堂，高六七丈，异常壮观，之后澳门开始堡垒化，被葡萄牙人据有。

但从形式上来讲，澳门还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归广东省香山县管

辖。双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中国政府很难消灭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也知道中国的广大，很难像东南亚一样吞并，所以满足于占据澳门。

而对中国民间来说，由于官场的放任，使得民间外贸得以存在，这促进了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繁荣，更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工业化，只是这种工业化是政府掌控力不牢的结果，而不是拜政府所赐。明朝晚期的手工业化和资本化萌芽，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隆庆开关与西荷到来

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随着明世宗嘉靖帝的去世，新即位的明穆宗隆庆帝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政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立一个贸易区，中国民间可以从这里出海，但政府保留征税权。月港本来就是海盗的一个大本营，经过改造后成了活跃的经济特区。[213]

隆庆开关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政策的大调整，只不过是在官方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

开关后，民间船只需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这几种。所谓引税，就是船只出海，必须获得政府发给的许可证，称为船引，购买许可证的费用就是“引税”，其中远洋船（东西洋）缴纳三两白银，近洋船（台湾等地）一两。

水饷和陆饷对应着出口税和进口税。水饷（出口税）按照船只大小来征收，以一丈六尺宽的西洋船为例，必须缴纳每船五两白银的水饷。而陆饷（进口税）则按照货物的类别和实际价值征收，比如胡椒的税额定为20%。

如果有的船只出海时携带货物，等回来时不带海外商品，只是带着赚到的白银（货币）回来，就无法缴纳进口税，于是政府改征一种称为加增饷的附加税，每船为150两。[214]这主要是由于到了明末，随着美洲白银的发现，西方从中国购买商品往往直接使用白银，而中国出口远大于进口，导致流入了大量的白银。

虽然政府是从税收的角度考虑，但这个政策又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之前，沿海的地方政府还必须偷偷摸摸地默认民间贸易，这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允许人民出海，海外的船只前来中国也更加方便了。

对西方来说，隆庆开关的好处也是巨大的，其中利玛窦和传教士的到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发生。之前的外国人一旦进入中国，就会受到严密的监视，几乎无法生活，但从此以后，随着官府的懈怠，外国人也慢慢地寻找到了空间，在沿海的港口城市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随着商人、传教士的到来，欧洲除葡萄牙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在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当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时，反应最激烈的是西班牙人。

由于西班牙的重心在美洲，直到公元1519年到1521年的麦哲伦航行，才到达了亚洲地区的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在与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争执中，西班牙也没有占到上风，唯一剩下的就是菲律宾群岛了。

直到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才占领了菲律宾的吕宋岛，在马尼拉设立了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开始探索中国海岸。

刚刚到达的西班牙人没有想到，其实吕宋岛已经是中国海盗出没的场所。就在他们占领三年后的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11月末，一支庞大的配有大炮的中国舰队出现了，它的目标是马尼拉。西班牙人不敢懈怠，击退了这支舰队，抓了不少俘虏（大都是妇女），才知道为首的是一个叫作林凤的海盗头子。

林凤在争夺马尼拉失败后，来到了吕宋岛西部的彭加斯兰湾，在一个山头上扎下了营寨。西班牙人派了一支250名西班牙人和1500名土著

组成的部队围困了林凤。这时已经是公元1575年（万历三年）3月。

几周后，有一支明朝政府的舰队也来到了这里，他们是来剿匪的，指挥官叫王望高。西班牙人乘机和王望高联系，将俘虏送给王望高，取得了他的信任。

经过协商，西班牙人向王望高提议，由他们向林凤进攻，并把林凤（不管死活）交给中国舰队。同时，王望高同意将几名西班牙使者带往福建，去见中国的福建浙江总督。使者的使命除了要求允许传教，最重要的是希望中方提供一个贸易基地。就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西班牙人也希望能在福建浙江沿海划一小片区域作为贸易场所。

中国人带着西班牙使者上路后，留下西班牙人继续围攻林凤。

在西班牙使者中，有一位叫作拉达修士，他乘机观察并记录了此行的经历，以及他眼中的中华帝国。[215]

拉达等人首先到达厦门岛[216]，之后经过同安、泉州到达福州，一路上都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在福州，他们见到了总督，在不断的宴请中，西班牙人一共在福州待了47天，之后总督将西班牙使者到来的事情上报皇帝，同时请西班牙使者返回马尼拉等待消息。[217]

西班牙使者从厦门返航时，中国官员甚至指着某处小岛告诉他们，这就是留给他们未来做贸易的地方[218]。这表明中国有意授予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同样的待遇。

然而，就在西班牙人眼看就要得到一个贸易港时，意外发生了：使者们出使中国时，林凤偷偷地造了33艘小船逃走了。

由于西班牙人无法完成剿匪任务，中国指挥官王望高不敢再继续带西班牙使者回福建，于是这段接触告终，没有任何结果。

失去了这次机会，西班牙人再想进入中国就变得困难重重。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奥法罗试图混入广州城。他

成功地坐小船进入了广州，被中国政府发现后，他表示自己是传教士。不想他的翻译却不敢这么说，而是告诉中国政府他的船只失事了，乘坐小船无意间到达这里。

广州的官员对外国人表现得非常大度，供给他生活必需品，允许他在广州居住。后来，他的行踪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于是他被送往福州进行查问，最后又被送回广州，递解出境[219]。

西班牙人在中国始终没有机会更深一步。在《明史》中，甚至没有记载这个国家，而是登记在佛郎机名下。

虽然西班牙人在国内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在美洲发展出的一种商品——白银——却尽人皆知。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除了流回欧洲，大部分都跨越大西洋送到了中国。由于西班牙在中国国内没有贸易点，他们在菲律宾的据点就成了中国商人最常光顾的地方。隆庆开关后，中国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带着生丝等商品前来贩卖，将一船船白银运往中国。根据估算，明末从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了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这些白银更加促进了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同时，另一个欧洲国家却在酝酿占据台湾。

荷兰人在明代被称为“红毛番”。与佛郎机相比，红毛番更是船坚炮利，他们的船可达三十丈长，六丈宽，厚两尺余，树五根桅杆，后部是三层楼。荷兰的炮也更强大，被称为红夷大炮，在明清时代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世界上，荷兰人和后起的英国人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敌，特别是对葡萄牙来说。葡萄牙曾经占据了世界上不少海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但最后，除了保住了少量港口，大部分都被荷兰人抢占了。

在东南亚地区，荷兰人最早占据了大泥[220]等地，后来为了和中国贸易，公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派船来到吕宋，被吕宋的

西班牙人拒绝后，又来到澳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拒绝了荷兰人[221]。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在几位中国商人的帮助下，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并派遣中国商人前来商讨通商事宜。当地官员几经推脱后，同意与荷兰人贸易。不想在继续上报时，荷兰人遇见了强硬派的都司沈有容，计划被破坏。荷兰人不得不离开澎湖，中国方面则将帮助荷兰人的几位中国商人斩杀。

但这只是荷兰人第一次占据澎湖。之后他们攻破了南洋的摩鹿加群岛，再次前来寻求贸易机会。这次，他们占据了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再次来到澎湖，修筑了堡垒。澎湖的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表示他们必须离开澎湖，拆掉堡垒，才准予贸易。荷兰人听从了指示，拆毁堡垒离开（公元1623年，天启三年）。

但荷兰人的配合并没有换来贸易机会，澎湖的官员失信了。于是荷兰人又回来第三次占领澎湖，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他们被中国军队围困，最后被迫突围离开。[222]

虽然无法占领澎湖，但荷兰人却占据了台湾。台湾直到明末清初的郑成功时期才被中国人重新收复，并永久性地并入了中国。

荷兰人之所以没有葡萄牙人那么幸运，没有获得永久性基地，在于他们来得太晚。对中国的明王朝来说，澳门是一个皇帝恩赐的特区，是给所有的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葡萄牙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至于葡萄牙人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那是外国人内部的问题，中国是不管的。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贸易基地，想要让中国再划另一个贸易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荷兰人过于强硬和直爽的态度也有强烈的副作用，他们缺乏葡萄牙人的低姿态。虽然葡萄牙人也曾经依靠暴力，但学会与明王朝打交道之后，更多采用的是软性策略。荷兰人过于强硬，而西方暂时还无

力对抗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被赶走并不意外。

另外，在贸易战争中，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本地商人大都是愿意帮助外国人的。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可以得到中国民间的谅解与帮助。官府动不动就给他们戴上奸商或者奸民的帽子，但其实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更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规则，不愿意被政府管制。

从明末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还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与西方的葡萄牙、荷兰人相抗衡。正是这种均势状态，使得葡萄牙和荷兰也不敢像在印度沿海、东南亚那样进行血腥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有可能产生出一种较为中立的贸易规则的。这需要中央政府既有强硬的一面保卫领土，又有宽容的一面对待贸易，也需要民间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尽量掌握对方的科技。

曾经有中国官员很好地利用了外国人的武器，也有中国民间人士掌握了贸易和科技的技巧，只是他们都只是少数派。在更多的情况下，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明智，使得这种贸易规则无法建立，一旦到了东西方实力发生逆转时，再想建立平衡，就不可能了。

另外，这些发生在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事实上，亚洲的超级内陆帝国和区域性强国都很少能够适应这次地理大发现的冲击。不管是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包括缅甸和泰国，都不肯接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中心这个事实。这些国家中除了较为弱小的泰国和与西方更近的奥斯曼帝国，其余的国家都无法完成转型，当他们的劣势越来越大时，就会被西方势力所淹没。

第十八章 重归闭关之路

“弃文从武”的传教士

在本部的开头，已经写了利玛窦“征服”中国的故事。在保守的明代，利玛窦所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几乎是唯一一个获得了许可，能够在中国境内停留，并自由活动的外国人群体。这种特权一直保持到利玛窦死亡。但是，在他死后，耶稣会的命运又如何呢？

利玛窦死于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在六年后，情况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223]。

这一年夏天，一位叫作沈漼的官员，职务是南京礼部侍郎，联合其他官员向皇帝递了一份奏章，认为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中国是为了传播邪说，将他们比作白莲教，聚集起上万人是为了反对朝廷，更何况是夜里聚会，白天解散，更像是非法组织。[224]

传教士往往称自己是意大利人，是教皇派来的，但他们的国籍又大都是葡萄牙人，还和澳门打得火热，这也让中国人认为可能根本没有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他们是冒牌货，是商人派来耍阴谋的。

皇帝接受了沈漼等人的看法，下令将耶稣会士们都赶走。南京礼部首先行动，将在南京的23名天主教徒羁押。第二年，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被抓了起来，甚至被戴上了手铐脚镣，朝廷准备将他们装进囚车，送往广州，之后发往澳门。[225]

他们在北京和南京的房子也被拆毁，其中的木头构件卖给了孔庙，以便用来雕像，剩下的给在南京死去的浡泥王修建陵墓。

但事实上，耶稣会并没有被逐出中国。由于明末对社会的管控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皇帝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做到。一方面，传教士们信仰坚定，除了在北京和南京的人被抓了起来，在中国其他地方传教的教士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躲到了中国教民的家里，官府根本找不到他们[226]。就连北京和南京，也一共只驱逐了四个人，且由于官府的惰性，最后还是重新开张，让他们返回。

另外，在中国官场上，传教士们已经有了一批坚定的保护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个，分别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王徵，前两者更是做到了高官。在教案发生之前，四人都已经加入基督教。这些人由于地位的原因，不便硬碰硬去反驳同僚，却会利用官场规则保护教徒。

对明朝官场来说，虽然对西方人非常不屑，有一件事情却是他们承认的，那就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科学技术虽然在明代被称为奇技淫巧，但在某些时候却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打仗的时候。

天启皇帝继位后（公元1621年后），随着东北与女真战事的出现，李之藻乘机上书，表示意大里亚（意大利）人善于造炮，如果要打败满洲，就要借助西方的技术，让他们去当战争顾问。在这样的幌子下，耶稣会又大摇大摆返回了北京。不过他们不是作为传教士，而是作为战争顾问回来的。

关于这次南京事件，外国人的回忆更有价值，也更能说明明朝官场如何漏洞重重，矛盾混乱的命令，反而对传教士们形成了保护。据在南京的曾德昭回忆[227]，北京礼部首先下令囚禁教士，这份命令到达南京是在8月30日。这一天夜里，教士们就得到了从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教团总监龙华民和艾儒略立刻启程去北京想办法，留在南京的是王丰肃和曾德昭。

第二天，兵部首脑派了三个官员来通知要驱逐他们，但兵部的人并不像礼部那么保守，临走时告诉他们，兵部首脑下令不准在途中虐待教

士，甚至还有人告诉他们，上层相信他们是无罪的，不要着急，事情会平息的。

9月1日，沈淮派人来带走教士，并搜查房间。但他们看到曾德昭生病了，就只带走了王丰肃，把曾德昭留下，只是在门上贴了封条。这种做法也表明，礼部的人也不赞成对教士动用武力。

同时，在北方朝廷的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龙华民二人，也在不断想办法软化局势。只是由于沈淮的坚决，才让皇帝签署了驱逐令。

第二年，皇帝的命令才下达。沈淮坚持将两个在南京的教士各打十大板（曾德昭身体不好免打），装入囚笼，花了30天送往广州。一到广州，他们就被放出来自由活动，等北京的两位被驱逐的教士到了，再一起送往澳门。

但是几年后，由于战争的需要，皇帝就下令把他们召回北京去了。这时沈淮已经失势，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些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回归了。皇帝不需要信仰，但皇帝需要打仗。

耶稣会就以这样一种扭曲的形式继续存在，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对基督教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地理知识、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就连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基督徒也对西方的数学、天文等知识更感兴趣。[228]

除了军事技术，耶稣会的另一个让皇帝感兴趣的科学技术是历法。历法作为中国礼制的一部分，是神圣的，但由于欠缺天体运行模型，中国的历法，特别是对日月食的计算却总是不够精确。

在教难之前利玛窦去世那年，由于原来的历官推算日食失败，就已经有人建议将司天监交给传教士，并让他们重新制定历法。到了崇祯年间，徐光启更是建议重新开局，由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制定新的历法，名为《崇祯历》，这部历法已经制好，却由于亡国没有启用[229]。

其余传教士的知识包括如下几类[230]：

数学。在众多科学中，数学是各种科目的基础。中国人虽然在数学上也有不少成就，但在整体上却是缺乏数学观念的社会。因此，不管是徐光启还是李之藻，都首先对数学产生了好奇心。利玛窦在世时就曾经写了《乾坤体义》，上卷论述天文，下卷就是数学。到了后来，徐光启又怂恿利玛窦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出来，这是在国内第一次对欧式几何进行系统性的介绍。除此之外，在测量、三角、圆、对数、代数等多方面，传教士和中国的信徒也都做了译介和研究。

天文学。天文学是几何学的孪生兄弟，对于中国人而言，天文学的日月模型，就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异闻”。但只有在相信这个异闻的基础上，才能对天象做出更准确的预判。利玛窦之后，在徐光启主导下，传教士团队长期把持明朝天文局，到了清朝，皇族换了，但天文科学家却没有换，西方人继续把持中国的历法。这表明中国人是承认西方在天文学上的造诣的。当然，这个领域也是争夺最激烈的领域，接下来还会再谈到。

地理学。也正是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美洲的情况。在之前，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就是亚洲，而传闻范围则可以扩展到欧洲和非洲[231]。传教士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的情况，并加入了对美洲的认知。

这其中的代表作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作于公元1623年（天启三年），也就是南京事件结束不久。全书将世界分成了五个大洲，前四个分别是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非洲）和亚墨里加（美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作墨瓦腊泥加的洲，这个洲位于南美洲之南，是麦哲伦（莫瓦兰）在经过麦哲伦海峡时，看到海峡以南还有土地，便称之为火地，也就是现在的火地岛。由于麦哲伦看到了这片陆地，人们推测，在南美洲以南还有一个大

陆。这个大陆被称为南方大陆，后来欧洲人耗费了无数精力，只找到了南极洲和大洋洲，却都与他们设想的南方大陆不完全吻合。

《职方外纪》详细介绍了前四个大洲上的国家，最后又总括地介绍了四海[232]。

进入清朝后，传教士南怀仁又写了一本《坤舆图说》，这本书除包含《职方外纪》的内容之外，还又加入了许多科学知识，比如地球物理、气候、动物、人文等多方面，他甚至介绍了古代西方的七大奇迹[233]。

这些书籍本来可以促进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不幸的是，它们起到的作用都不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采取了世界视角的坐标系，没有将“中央之国”放在中心位置。比如，清朝人[234]就曾经考证过，《职方外纪》的五大洲来自战国时期邹衍的学说，是诞诳之说。

这种态度导致即便世界已经主动来到了家门口，但中国人还是毫无所知。在少数先知先觉者（如徐光启）死后，人们对于地理知识的漠视，迟早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

军事学。主要就是汤若望所代表的火器制造技术，以及利用火器状况下的排兵布阵。

物理化学。以水利、钟表、冶炼等为代表。

西洋美术。由于中国美术以平面图像为主，而西洋美术却已经进化到立体图像，明末清初也进入了一个利用西洋美术改造国画的时期，最著名的就是乾隆时期的外国画家郎世宁。

然而，虽然总结了这么多，但其实影响又都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奇技淫巧必须装入中国哲学的旧瓶之中才允许发展，但中国哲学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个多变的世界，因此，传教士们即便不谈信仰，在科学上也很难通过那些保守官员的审查。在这些官员的影响下，本来可能加速中国

科技化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慢，直至完全停滞。

西方人眼中的明清换代

公元1650年（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大明王朝最后的皇太后王氏决定孤注一掷，向欧洲求援。[235]

随着清军占领北京，继续向南进军，明朝在中国南部的残部进行了孱弱的抵抗后，被压向了更南方。弘光、隆武二帝相继死难后，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是为永历帝。

到了永历四年，清军攻克韶州，永历帝担心自己的安危，于是逃往两广中间地带的梧州。大明江山仅剩下最南面的一小块，包括现在的广西和云南[236]。

在危机之中，永历帝的太后（嫡母）王氏突然想到了寻找救兵，她想到的救兵是上帝。

原来，王太后在太监庞天寿的引导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她的带领下，永历帝的生母马氏和妃子王氏也都加入了天主教。王太后的教名叫作烈纳（Helene），马太后的教名叫作玛利亚（Maria），王妃的教名叫作亚纳（Anna）。不仅三个女人入了教，就连永历帝的幼年太子朱慈煊也加入了天主教，教名是当定（Constantine）。唯一没有加入的是皇帝，他其实也信奉天主教，没有加入的唯一原因就是妻妾太多，不符合入教条件。

当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王太后突然想到要寻求基督的帮助，请求上帝之子保佑大明江山。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位于罗马的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Ⅹ），另一封给耶稣会的会长，请求他们替大明祈祷，保佑江山稳固。

但是中国与欧洲相隔万里，到底谁去送信呢？太监庞天寿想去，但

由于他年纪大了，太后不放心，于是请欧洲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前往。为此，庞天寿也写了一封信给教皇。

卜弥格拿着三封信前往欧洲，到了澳门耽误了一年才出发，在印度又遇到了阻碍，只好走陆路经过波斯、叙利亚，进入地中海，两年后才到达威尼斯。

当他到达教皇所在的罗马时，英诺森十世已经去世了，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接见了他，并给王太后写了回信，由卜弥格带回。

等卜弥格再次回到中国，距离离开时已经六年多。此时教士才知道，王太后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永历帝也已经逃入云南境内。不管教皇是否替大明江山祈祷，当年传教士们服务的帝国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在明朝灭亡前，为了抵抗李自成，崇祯皇帝派去的军队里竟然有传教士汤若望。其原因在于汤若望会造炮，曾经设立炮厂，铸造过20门大炮。但这些大炮并没有拯救明王朝，于是中国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对传教士来说反而成了机会。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唯一的权威在发号施令，即便下面阳奉阴违，也必然有所忌惮，自从明朝进入垮台的节奏，不仅中央政府，就连地方政府也无法管理民间了。这就是传教士的机会，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沉入社会最基层农村去传教，并且不用担心受到阻碍。

在李自成叛乱和明清更替中，少部分传教士死于战争，但大部分却幸存下来[237]。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是很客气，不管是李自成的军队，还是明军，抑或清军都尽量避免杀害传教士，而是希望利用他们。

这样的待遇给了传教士很好的观察环境，于是，明清更替成了唯一一次具有完整西方记录的改朝换代。在西方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中国人不关注的事情。

首先，由于西方人大都居住在广东，他们对广州城关注最多。这里曾经是南明王朝隆武帝的首都，永历帝继位的肇庆距离这里也不算远。除广州城本身被清军攻克之外，城市之外的水域由于地理复杂，有四大海盗出没。这些海盗虽然是汉人，但在民间的声誉反而不如清军。当南明军队被赶走后，清军反而成了社会的稳定力量，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也一直在观望，不肯倒向任何一方。直到清军获胜之后，才决定与清军建立关系[238]。清军也选择了不进攻澳门，与之和平相处，继续做买卖，于是，澳门并没有在改朝换代中被收回。

清朝初期，在其他国家的商人眼里，清朝也是比明朝更容易打交道的政府。那时清朝的皇帝希望发展这种贸易关系，以便迅速平定社会动荡。在这种政策下，其他国家是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观看大明王朝的倒台的。[239]毕竟明朝时的中国人非常排外，外国人想要登岸，简直困难重重，通往口岸的道路被封锁，传教士们只有把自己装扮成皇帝的宠物才能进入。商人们更是麻烦，必须遵守各种不合理的贸易规矩。清朝一来，大门打开，他们不害怕与外国人打交道，做买卖也更直接，很有欧洲人的气魄。

这时的外国人享受着清朝带来的自由，他们绝对想不到，在未来，清朝会变成一个比明王朝还保守和封闭的政权。

外国人还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支特殊的“雇佣兵”：黑人部队。

事实上，自从葡萄牙人到来之后，整个东南亚地区就有雇用外国雇佣兵的传统。他们最常雇用的是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国家中，总有许多葡萄牙浪子，他们身无分文，却对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了若指掌。东南亚除被西方人征服的港口之外，还有许多较大型的国家，比如陆地上的缅甸、泰国和岛屿上的爪哇。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发现，招募一群葡萄

牙浪人进入军队，能够大幅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些葡萄牙人就是中国太平天国时期洋枪队的先驱。

在中国，最早利用雇佣兵的是南明将领郑芝龙。

根据荷兰人的记载[240]，郑芝龙的军队中有两队黑人士兵，这些黑人士兵原本是荷兰人的奴隶，会使用来复枪和短枪，他们从荷兰人处逃离之后，被郑芝龙招募，组成了郑氏军队的黑人营。当郑芝龙被清军俘虏后，这支特殊的部队又归属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

但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241]，郑芝龙的黑人士兵是由在澳门的奴隶组成的。战争初期，这些黑人有300多人，跟随郑芝龙对抗清军。由于作战英勇，郑芝龙对他们的信任比对中国人都高。黑人部队忠心耿耿地伴随着他打仗，直到郑芝龙被清军击败。好几个黑人一直战斗在他身边，最后用剑自杀。剩下的则跟随郑芝龙投降了清军。当时他们还有200多人，被编入了广州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即便归顺之后，还保留着基督徒的礼节。比如，在四日斋期间不得食用肉类，即便是总督赏赐给他们吃，他们也会拒绝。

在郑芝龙之前，中国人对于雇佣外国人进入军队一直是排斥态度。在明朝，公元1621年（天启元年），在徐光启的建议下，明朝引入了一批大炮对付后金，朝廷曾有引进100名葡萄牙士兵的想法，但是在官员们的反对下没有成功[242]。

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徐光启再次提出引入葡萄牙士兵，还是以失败告终[243]。不过，在对抗后金时，登莱巡抚孙元化却有一支葡萄牙小队。这里由于引进了西洋火器，跟随火器进入营地的还有葡萄牙籍造铳匠和炮手教师一共53人。其中12人在登州失守时殉难[244]。这些人大都是战争的辅助角色，算不上真正的战士。

到了郑芝龙时期，才有了外国人组成的正式部队为中国人效力的记载。

当清朝征服中国后，中国人在海外也遭遇了麻烦。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清朝取代汉人的明朝是一次改朝换代，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亡国，作为亡国之民，是被人看不起的。

中国人在之前已经大量地分布在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其中又以福建人为主。他们把商品运送到日本、朝鲜、占城、柬埔寨、暹罗、北大年、望加锡、索洛、苏门答腊，以及荷兰人设有代理的雅加达。中国人之所以只能走这么远，还和他们的船只有关。在明成祖时代，中国的大船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到了明末，由于担心商人们跑太远，去其他国家移民，政府规定民间不能造大船，这使得中国海上力量变弱，虽然遍布东南亚，却无法与西方海军相抗衡。

但明朝政府又没有力量防止中国人到海外定居。比如，仅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在菲律宾一个与马尼拉相对的岛上，就有四五万中国人，至于全世界分布的中国人更是不下10万[245]。他们许多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有了土地，从事各种行业。

当清朝灭亡明朝后，这些中国人普遍受到了当地社会的排斥，变成了没有国家的二等公民。

在这些国家中，安南国和日本国是排斥汉人最厉害的两个国家[246]。安南乘机在红河入海口处设立障碍，不让中国人进入，借机索要贿赂。而在日本，大量中国人已经娶亲，有了商店和货栈。一旦中国陷落，日本立刻将这些人视为懦夫，开始驱赶他们离开，不管他们在日本是否有家庭。

那些穿着清朝服饰去做生意的人也被禁止，不准买卖。按照西班牙人的看法，大部分邻国是在嘲笑中国人，歧视他们，只有日本人是在虐待他们。

除了远距离观察，还有近距离历险[247]。

当清军进攻南明时，一位传教士卫匡国在南明隆武帝的允许下，居

住在温州的温溪县。这里被清军占领时，卫匡国立刻在门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此屋系欧罗巴人居住，他是传教士。他还把最精美的书、光学仪器、数学仪器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把救世主像放在祭坛上，以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招很管用，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不骚扰这个传教士。后来，攻占该城的清军将领终于把他找去了，问他愿不愿意剃头？

对外国人来说，留着明朝的发型也属于奇装异服的一种，他并不在意换成另一种，于是欣然同意。这位将领当场给他剃了头。卫匡国表示，既然剃了头，就不适合再穿明朝的服装了，将领说对，于是脱下帽子和靴子给了卫匡国，并设宴招待了他，再把他送往更加安全的大城市杭州。

在广州的曾德昭也有冒险经历。他当时负责广州的教堂，城破时，士兵们将他捆起来，逼迫他交出财产。过了好多天，有一位王爷突然来释放了他。

这位王爷不仅不要他的财富，还送给他圣经和祈祷书，又施舍了大量金钱，把房产还给了他，让他安心居住。

这位王爷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曾经是明朝将领，在著名的基督徒将领孙元化手下当过兵。[248]在明朝将领里，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弟子，对西洋科技颇感兴趣，在军事上重视西洋的火炮和军事战术，将之引入到与清军的战争中。在抗清战争中，明朝并不缺乏有名的将领，只是由于制度原因，无法让他们发挥出真正的智慧来为国家服务，这才是一个国家衰老之象。

这位王爷是孙元化的手下，叫作尚可喜，后来被封为平南王，是与平西王吴三桂平起平坐的大人物，也是帮清朝稳定广东的大功臣[249]。

除了这些处在明军清军对阵战场上的人，也有传教士陷入了张献忠所在的叛乱区域：四川省。

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250]，传教士安文思前往四川寻找另一位传教士利类思，恰好赶上了兵荒马乱。不过，他们得到了当地重要官员的保护。不想随后张献忠攻陷了成都，并建立了大西国。不管是传教士的记述，还是民间的传闻，张献忠都以杀人著称，在他的治理下，四川省的土地上铺满了累累白骨，即便是佛教徒也不能幸免[251]。但张献忠对传教士却并没有杀害，只是强迫他们加入了大西国政权，担任天文学家。

在这个政权下，传教士继续工作，甚至将张献忠的一些仆人拉入了基督教。

随着清军的深入，大西国政权倒了台，张献忠率军前往陕西，也将两位教士带往陕西。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无法逃脱。但随后，张献忠被清军击败，两位传教士也被士兵们俘获。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清军的一位指挥官救了他们。

原来，指挥官在北京见过汤若望，知道和他类似长相的外国人都是传教士。

第二年，清军回京师，将两位教士带回了北京，他们才从兵荒马乱中逃脱。此时，已经是大清皇朝统治中国了。

逃不脱衰亡的事业

就在全国仍然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时，传教士已经在清朝的宫廷中找到了位置。最先投下效忠书的就是传教士汤若望。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的当年，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就已经觉察到改朝换代的到来。他不失时机地将在崇祯时期制作的历法《崇祯历》献给了清朝政府，结果这个在明朝没有来得及实行的历法反而在清朝被颁行了。[252]

汤若望也由此当上了清帝国的“天文学家”，掌管钦天监。之后汤若望屡屡升官，担任过太仆寺卿、太常寺卿，赐号通玄教师，通政使，官阶达到了正一品。

在汤若望的带领下，传教团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由于清朝统治者在最初对外国人都较为宽容，基督教眼看就要在中国获得突破。但就在这时，第二次大的灾难到来了。

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清圣祖康熙小皇帝刚刚10岁，这时的清朝正处于鳌拜等摄政大臣控制之下。一位叫作杨光先的历法学家开始攻击汤若望等人。此前已经有人攻击过外国人，但大都被他们化解了。但这一年，摄政大臣们却决定采纳杨光先的意见，将传教士驱逐出官场，让杨光先控制钦天监。[253]

不管是中国的史书，还是外国人的记载[254]，都尽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历法之争。比如，在这件事之前，杨光先和一个伊斯兰教徒曾经控告汤若望等人计算的能看见水星的日子不准确[255]，但经过当天的实测，反而是伊斯兰教徒测量有误。之后，杨光先换了一个新方法：上奏说汤若望的罪过是故意用不吉利的日期来糊弄皇帝。[256]当从天象之争转向吉不吉利这种中国特色的轨道上时，传教士就没有办法了。

恰好这时年迈的汤若望因中风而瘫痪，最严重时甚至不能说话，更不可能写字为自己辩解，于是摄政大臣们决定采纳杨光先的说法，惩罚传教士。

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在深层次上，却是另一个隐忧让大臣们决定这样做。这个隐忧是：传教士本身的传教活动，与中央帝国的统治模式是不匹配的；中央帝国要求世界上只能有一个权威，就是皇帝，但是传教组织实际上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这个权威表面上是上帝，但在人间的代表，却是罗马的教皇和他的传教团。

杨光先在一道奏章中给传教士定了三个罪名：阴谋叛乱、宣传邪教

和历法失误[257]。其中历法失误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却是阴谋叛乱和宣传邪教。

传教士不管怎么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和历法学家，但骨子里的目的仍然是吸引信徒，让这些信徒摆脱帝国的思想控制，依附于遥远的罗马。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信徒从明代的数百人变成了清代的数万人，这样的数量已经足以让中央政府感到紧张。

除皈依人员数量众多之外，还有另一个可怕的事情：中国人的联想能力。一旦一个思想进入中国，在经过最初的休克之后，随后发生的往往是异化，也就是产生中国式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洪秀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借助的是一套带着基督教色彩的说辞，以基督教为外壳，塞上了土生土长的东西，将自己神化成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只要一个思想进入中国，必然会产生这种异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异化之前就掐灭它，不让这种思想进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汤若望被免职，传教士们被抓起来，每人绑了九条链子，三条在脖子上，三条在胳膊上，三条在腿上，然后押入大牢。

除了北京的这些教士，在中国的其余省份，也都下令将传教士扣押。虽然每个地方执行的程度不同，但最终，从各省解来了26名外国传教士，加上京城的4名，一共30名。此外，还有7名中国人被控叛乱罪[258]。

经过审判，汤若望和7名中国人都被判凌迟，另有5名中国人判斩首。这几乎是最严厉的刑罚，而在审判时，传教士们还以为自己是无罪的。

汤若望眼看性命不保，但一件意外却救了他的命：北京发生了一次地震。[259]这次地震改变了汤若望的命运，他被改为流徙，其余被判凌迟的七个中国人中，两人流徙，五人斩首。

在实际执行中，最后流徙也没有执行，汤若望等人被释放了，软禁

在北京。其余的外国人中，在北京被抓的都留在了北京，剩下的被送往广州经由澳门遣送回国。当他们被送到广州后，剩下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这些人很快就能在广州自由活动了[260]。

杨光先虽然可以把传教士告倒，但在实际的数学和天文技术上，他却无法适应，掌管钦天监不久就因为不能胜任而辞职了，于是皇帝只好再找西洋人前来掌管。这一次教案至此落幕。

在清朝的盛世时期，人们常把康乾并提，但事实上，康熙皇帝是一个有着充分好奇心的人，而他的孙子却更加自大，对外来的事物不感兴趣。

康熙皇帝亲政后，传教士们的好日子再次到来。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显得极其宽容，使得中国的基督教出现了大发展。首先，西方人掌管钦天监成了清代的惯例，即便在海禁最严的时候，中国人也承认在天文上是不如西方的，仍然寻找西方人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道光帝时期，才由于中国人已经能够完全胜任，理解西法，从而改由中国人掌管钦天监。[261]

其次，康熙皇帝对于海外的事务同样有好奇心，愿意去了解世界地理和科技知识。这给了外国人一定的生存空间。

最后，康熙皇帝对于他们的传教也采取了一定的宽容态度，使得教会的活动慢慢变得公开起来。

这一个时期是教士们弹冠相庆的时刻，他们以为苦尽甘来，再也不会出现新的波折，中国也终将接纳他们。

但是，在喜庆时他们忘记了一点：中国皇帝与教会之间始终有一个矛盾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是暂时隐藏了，却不会消失。它就是：到底谁才是最后的权威？

在中国，只能是皇帝，但是在教会，必然是教皇。

耶稣会采取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中间人身份隐藏这个矛盾：在向教皇汇报时，故意降低中国皇帝的权威，突出教皇的威仪；但在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他们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员，只有在完成了官员的职责后，才会去做一些传教工作，用对皇帝的顺从，来换取皇帝对传教工作的同意。

这种方法虽然有效，却无法让教会冲破皇权的束缚。当西方另一些新的教团来到中国时，事情就麻烦了。这些教团是后来进入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

在西方天主教内部，也有许多个教团存在，这些教团可以与佛教中不同的小派别做类比。这些教团虽然都遵从教皇，却也有改革和保守之分。教团中耶稣会成立最晚，在公元1534年（嘉靖十三年）才由罗耀拉建立，但从成立之初它就是保守派的代表，强调对教皇的无限忠诚，并迅速铺向世界，成了东方传教的急先锋。

除了耶稣会，成立于公元1209年（嘉定二年）的方济各会是改革性的教派，强调清贫和虔诚。成立于公元1217年（嘉定十年）的多明我会是一个保守性的教条派，对异端最不宽容。这两派在对外传播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信仰的纯粹性和不妥协性。

与之相反，保守派的耶稣会反而更强调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两个教团看到了耶稣会在东方的成就，一方面是妒忌的，但另一方面又带着不屑，认为耶稣会对东方的原始信仰妥协太多，是变了味的信仰传播。他们不断地向教皇告状，说耶稣会采取了变通的做法，这是违背了教会的初衷。同时，这两个教团也在慢慢地渗入东方，和当地政权产生了冲突。

当双方的冲突达到高潮时，教皇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来中国会见康熙皇帝。这个使团把教会与中国皇帝的矛盾彻底揭开了，而这个矛盾已经被耶稣会尽量隐藏了上百年。

公元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4月8日，教皇使节铎罗抵达广州，12月，他见到了康熙皇帝。[262]

铎罗带来的命令是：教皇希望在北京派驻一个教皇的常驻代表，负责督导全国的基督教事务。其中的含义是，从此以后，耶稣会等教团都只能听这个教皇代表的命令，不再听从皇帝的命令，也就是说，教皇通过这个代表控制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

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皇帝竟然答应了下来。原来，皇帝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这个提议。他首先认为，这个代表必须听从皇帝的指令，也就是说，皇帝可以通过这个代表控制全国的基督徒。之前，皇帝还担心中国基督徒太多，又分散在各地，帝国已经无法掌控了，而且这些教徒都不听话。如果教皇让他们必须听从这个代表的，同时皇帝又能控制这个代表的任命，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双方是在自说自话，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冲突。第二年皇帝又接见了铎罗，希望将事情明确下来。这一次双方再也没有误解，皇帝知道了教皇的真实想法，于是下令驱逐铎罗。

铎罗事件将在华传教士的地位彻底改变，从此以后，康熙皇帝虽然仍然宠信这些传教士，却在宠信之外额外增加了一条规定：所有在华传教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皇帝的允许，拿到证书（称为“票”）。这种证书相当于以前朝代皇帝给僧人下发的度牒。

在证书出现之前，传教士是不需要资格的，在这之后，传教变成了许可证制，“自由信仰”变成了“计划信仰”，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高峰过去了。

康熙皇帝始终没有对传教士下手，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雍正帝时期，事情终于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事实上，整个中国都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完成了一次完美转型。政府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当年的开放心态和好奇心，对世界关闭了大门。这是集权模式的通病，在上台时保持了

足够的进取和谦恭，一旦掌权并经过几次皇帝的轮替，新皇帝为了维稳，就不再容忍一切超出控制的事务出现。而那些新鲜事物、能够改变社会和经济的事务，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而禁止了。

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上台不久的雍正帝立刻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传教士还能在官员的保护下暂避风头，但在集权的清朝，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空间。命令下达后，各地耶稣会的建筑都被查封，有的改做粮仓，有的成了书院、医馆、祠堂。

当年，皇帝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少量想办法留下的，也没有能力再发展信徒，随着他们的凋零，天主教在中国大地上近乎绝迹了。

前往欧洲的中国人

在大批的欧洲人想尽千方百计前来中国时，作为对等方的中国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强的好奇心。在公元1840年之前，去往欧洲的中国人非常稀少。即便有少量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到过欧洲，还大都是和欧洲人有关的。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教会开设的圣家书院的学生，而最早的则是一些传教士的中国助理，这些人也可以看作圣家书院的先驱者。

公元1654年（顺治十一年），由于从欧洲派遣传教士成本太高，人员太少，耶稣会决定采取另一个做法：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但是，要想培养合格的人才，意味着中国本土传教士也必须系统地学习教会知识和拉丁文，这必须在一个拉丁语环境中才能做到[263]。这一年，负责中国教区的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决定带澳门青年郑玛诺到罗马学习。郑玛诺就成了中国最早前往西方的天主教徒之一。他在罗马学习了十余年才回国，在北京当教士不久，于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去世。

康熙时期，教会在中国的恩宠达到了高峰，对传教士的需求也更加旺盛。公元1681年，传教士柏应理带了两个青年前往欧洲，他们分别姓黄和沈，目的地是葡萄牙和法国。沈姓青年于公元1693年回国，黄姓青

年则选择留在法国，在巴黎图书馆里，至今留着他在公元1716年的借书条。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决定向罗马派遣使者。不过他仍然采取了蒙古人的做法，用四个西洋教士充当使者。这个四个人分别是薄贤士、龙安国、卢若瑟、艾若瑟，其中艾若瑟带了一位叫作樊守义的中国人一同前往。他们于公元1719年回到中国，1720年到广州，同年见到了康熙帝。

与其他的传教士不同，樊守义留下了一部《身见录》，记载了这次行程，成了中国人去往西欧的重要史料，也是继元代的巴琐玛之后，又一个前往欧洲的中国人[264]。樊守义等人从澳门出发后，经过东南亚直插好望角，绕过好望角之后，他们顺着海流横穿南大西洋，经过巴西的巴伊亚地区，再从中部向东穿越大西洋前往葡萄牙。

他们在葡萄牙待了4个月，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境内，他们经过科西嘉岛，在托斯卡纳城市里窝那上岸，经过陆路前往罗马。在罗马待了5个月后，他们游览了意大利诸城市，经过的地方有拿波里、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摩德纳、帕尔马、帕维亚、米兰、诺瓦拉、韦尔切利、都灵等地，最后回到中国。

表23 樊守义路线[265]

地　　名	现　　名	描　　述
澳门		
巴拉哥亚	巴拉望	
莫尔乃阿	婆罗洲	

续表

地　　名	现　　名	描　　述
玛辣加	爪哇岛	有大府名巴打斐亚（雅加达），是全球性贸易中心
盘噶	邦加	
稣玛尔辣	苏门答腊	
大狼山	好望角	
亚墨里加州巴以亚府	巴西的巴以亚	大船百余艘。此地富厚，地气清爽，天时无寒。教堂众多。学校众多。山顶耶稣会院藏书丰厚
波尔都尔 / 波尔多嘞尔 / 波尔多噶利亚	葡萄牙	修道院、学校多，富裕。见到国王。居国四月
巴斯尼亚国某城	西班牙某城	因风受阻，停留于此
意大里亚某城	意大利某城	由大船换小船
蛇奴划国的属国格尔西加	热那亚（现属意大利）属国科西嘉（现属法国）	灯塔。国家富裕，为西洋之冠
都司格纳诸侯之国里务尔诺府	托斯卡纳城市里窝那	改为陆路
比撒府	比萨	宝塔遗址
西合捺府	锡耶纳	学校，耶稣会院
罗玛府	罗马	见教王。藏书巨丰。宫殿华美异常。罗玛水渠、修道会所不计其数。圣堂前有厄日多（埃及）的石狮。城内学宫众多。居五月
热尔玛尼亚属国挪波里国	日耳曼属国拿波里（现属意大利）	
都司噶纳国都城福乐冷济亚	托斯卡纳首府佛罗伦萨	从挪波里回到罗玛，再去往福乐冷济亚
波罗尼亚大府	博洛尼亚	
莫得纳府	摩德纳	
巴尔玛大府	帕尔马	
巴未亚等府	帕维亚等	
弥辣诺大府	米兰	古时龙巴尔的亚国（伦巴第）。大学宫甚多

续表

地　　名	现　　名	描　　述
诺瓦辣府	诺瓦拉	
物尔车利名府	韦尔切利	
都利诺府都城 / 都林	都灵	
广州		经波尔多喝利亚（葡萄牙）回国

康熙帝之后，虽然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衰落，但中国基督徒去往欧洲的旅程却刚刚开始。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欧洲传教士马国贤返欧时，雍正帝由于刚上台不久，还没有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特许他带5个中国少年出国。

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公元1732年，经过教廷批准，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圣家书院（Collegium Sanctae Familiae）专门培养中国籍教士（兼收土耳其、希腊学生）。到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止，书院共招收中国学生106人。公元1891年（光绪十七年），中国已经被迫打开了国门向海外派遣大使，官派使臣薛福成还在罗马会见了中国书院学长郭栋臣。

这些中国学生就成了见证两个世界的最佳证人。不幸的是，他们却很少有文字保留下来。于是，虽然他们见证了历史，却又把历史带入了深深的墓穴之中。

中国去往世界的另一个人群是商人和水手。由于中国政府限制民间入海，缺乏大型船只的中国商业势力冲不出东南亚，但有少量的人却由于受雇于外国船只或者外国公司而到达了更远处，他们大都从事翻译或者水手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作谢清高的人。[266]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267]金盘堡人。他一生中其他事迹很少流传，却由于一件事情被记载了下来。18岁时，他跟着商船去

往海南，不幸船只颠覆了，但幸运的是，一只经过的外国船把他救了起来，并收留了他。

从此之后的14年，他一直在外国船上当水手。在这14年里，他除在东南亚之外，还去过南亚、欧洲、美洲等地，甚至到过夏威夷和北美靠近北冰洋的地界。他到底是否完成了环球旅行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公元1840年之前，他是在世界上跑得最远的中国人。

表24 谢清高所记诸国[268]

地　　名	现　　名	地　　名	现　　名
越南	越南	龙牙	印度尼西亚林加群岛龙牙
本底	柬埔寨	噶喇叭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暹罗	泰国	万丹	印度尼西亚万丹
宋卡	泰国宋卡	尖笔阑山	印度尼西亚淡美兰群岛
太呢	泰国北大年	咕哒	可能在印度尼西亚爪哇
咭兰丹	马来西亚吉兰丹	吧萨	印度尼西亚南吧哇
丁咖啰	马来西亚丁加奴	昆甸	印度尼西亚坤甸
邦项	马来西亚彭亨	万喇	印度尼西亚默拉维
旧柔佛	新加坡	戴燕	印度尼西亚塔让
麻六呷	马六甲	卸敖	印度尼西亚卡普阿斯
沙喇我	马来西亚雪兰峨	新当	印度尼西亚新当
新埠	马来西亚槟榔屿	马神	印度尼西亚马辰
吉德	马来西亚吉打	蒋里闷	印度尼西亚卡里摩爪哇群岛
乌土	缅甸	三巴郎	印度尼西亚三宝垄
彻第缸	孟加拉国吉大港	麻黎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明牙喇	孟加拉	茫加萨	印度尼西亚望加锡
曼哒喇萨	印度金奈（马德拉斯）	细利洼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又叫西里伯斯岛）
笨支里	印度本地治里	唵闷	印度尼西亚安汶
呢咕叭当	印度纳加帕蒂南	唵门	与安汶同属于马鲁古群岛的某座小岛

续表

地　　名	现　　名	地　　名	现　　名
西岭	斯里兰卡（锡兰）	地问	帝汶岛（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共享）
打冷莽柯	印度特拉凡科	文来	文莱
亚英咖	印度阿特廷格阿尔	苏禄	菲律宾苏禄群岛
固贞	印度科钦	小吕宋	菲律宾吕宋岛
隔沥骨底	印度卡利卡特	妙哩士	毛里求斯
马英	印度马埃	大西洋国	葡萄牙
打拉者	印度代利杰里	大吕宋	西班牙
吗喇他	印度西部的马拉地国，现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	佛朗机	法兰西（原文对应如此）
小西洋	印度果阿	荷兰	荷兰
孟婆啰	印度文古尔拉	伊宣	（暂不确定）
麻伦呢	印度马尔文	盈兰你是	（暂不确定）
盎叽哩	印度 Jangria 岛	哑哩披华	威斯特伐利亚（现属德国）
孟买	印度孟买	淫跛犖	奥匈帝国
苏辣	印度苏拉特	役古	土耳其
淡项	可能在印度达赫	双鹰	又名“一打犖”。意大利某地
唧肚	印度卡提瓦半岛	单鹰	勃兰登堡（现属德国）
柔佛	马来西亚柔佛	埔鲁写	普鲁士（现属德国）
雷里	印度尼西亚廖内省	英咭利	英格兰
锡哩	约在印度尼西亚棉兰	绥亦古	瑞典
大亚齐	印度尼西亚亚齐	盈黎马禄加	丹麦
呢咕吧拉	印度尼科巴群岛	咩哩干	美国
小亚齐	一名“孙支”。约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南行一日船	亚咩哩隔	南美洲
苏苏	约在小亚齐和叭当中间位置的海岸上	卷毛乌鬼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续表

地　　名	现　　名	地　　名	现　　名
叭当	印度尼西亚巴东	哇夫岛	夏威夷瓦胡岛
呢是	印度尼西亚尼亚斯海岛	哇希岛、匪支岛、奄你岛、千你岛、蓦格是岛、哪韦吧岛	可能在夏威夷群岛
茫古鲁	印度尼西亚	亚哆歪	夏威夷岛
旧港	即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巨港	开於	可能在阿留申群岛

谢清高幸运在他留下了一本书，但不幸在这本书在它该发挥作用的年代，就像《马可·波罗行纪》一样被人们认为是小孩子的童话故事，没有人重视。

和谢清高几乎同时代的李汝珍也写了一本书——《镜花缘》[269]，这本书里充满了中国式的奇思妙想，书中的主人公去了许许多多新奇的国家，包括君子国、大人国、聂耳国、无肠国、犬封国、鬼国、毛民国、深目国、黑齿国、小人国、两面国、穿胸国、长臂国、翼民国、女儿国、不死国等33个国家，其中的人要么有两张面孔，要么高大，要么矮小，充满了物理上的奇形怪状。

这本书的影响力要比谢清高的《海录》大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大都把李汝珍书中的描写当作真正的外国，而谢清高笔下的外国只能算荒诞不经的传说。

公元1840年之后，当人们真正开始重视谢清高时，却发现了解外国的国人是那么少，很难改变国人对外国的认知了。

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清代，中国在王朝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地强化着中央帝国的观念。在中国的秦汉时期，这时中央之国的观念刚刚形

成，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正在成型和繁荣，而中东和印度地区也在公元前后各500年里经历了极度的繁荣，形成了位于伊朗的三大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帝国和萨珊王朝）和位于印度的三大王朝（孔雀王朝、贵霜王朝和笈多王朝）。

然而，这些曾经辉煌过的国家最后都崩溃了，罗马（西欧）和印度的世界再也没有统一，它们不得不放弃了作为世界中心的幻觉。但在中东，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继续了这种幻想，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世界一直将中东当作天然的世界中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让伊斯兰教世界失去了领袖。然而，虽然看上去伊斯兰教的世界一直是延续的，但事实上，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导权早已经换了许多茬，从阿拉伯人换成了塞尔柱人，再到奥斯曼人，伊朗人、蒙古的波斯汗国、中亚的帖木儿也都分别竞争过领袖的位置，加上北非和埃及的各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哈里发，伊斯兰教世界实际上自从蒙古人灭掉了阿拉伯哈里发国之后，就也变得碎片化了。

在这些已知东西方世界中，只有中国没有放弃，一次次顽强地重建着中央之国的梦幻，并以此建立了一套宇宙观，要求周边国家的臣服。至于更强大却更遥远的国家，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其实也想成为太阳一样的恒星。

经过了数次重建之后，清代是中国的中央之国观念最为强化的时代，甚至超过了汉唐时期。清代的满族人除继承了明朝的江山之外，还通过武力和权术征服了蒙古人和西藏人。在清代初期的新疆有一个庞大的准噶尔部落，也在康乾盛世的压迫下被消灭殆尽。可以说，清朝让中国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其影响力远达中亚地区，成了东亚世界的“共主”。

正是在这足以和蒙古人相媲美的武功之下，清代强化了汉人的“中央”观念，建立了最为复杂的集权机器，对于臣民的威压和控制力都远超明朝。但任何一个集权社会在经过最初的扩张之后，接下来都会发展

成一个内敛的社会，在这个新的阶段，政府关注的不再是扩张，而是束缚住臣民的自由思想，避免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听到不该听的话，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性。而这种束缚和超稳定所产生的反作用，就是整个国家都失去了好奇心和创造力。

当西欧世界在贪婪和好奇心的驱使下走向世界时，中国却在属于自己的体系中进化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极端保守和极端排外。当政府的“良苦用心”作用到社会的最深层时，这已经不再是皇帝或者官员排斥外国人，而是整个社会都变得带有民族主义思想和短视，甚至人民比政府更极端。到这时，代表了社会思潮两个极端的西欧和中国的相撞，就不可避免了。

第十九章 敲不开的大门

贸易与叩头

雍正帝下令禁止与西方接触70年后，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一个特殊的使团再次来到中国，敲响了中国的大门。这个使团来自英国。

当中国人仍然不知情时，欧洲和亚洲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其次，在亚洲，葡萄牙也萎缩成微不足道的存在，它的殖民地大都消失了，印度被英国人占据，印度尼西亚群岛正在被荷兰人吞噬。西班牙虽然还占据菲律宾，但对局势的控制力也非常弱。

与此同时，亚洲的陆上国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在印度。英国和法国取代葡萄牙成为印度沿海的主要势力，最后英国又击败法国独占了印度。这时，原本统治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却处于衰落之中。

莫卧儿王朝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拼盘，在中央有一个皇帝，但在地方上，却有许多小的领主存在。随着莫卧儿皇室的衰落，这些小领主慢慢地脱离了中央，有的成了独立的小邦，有的则依附于英国人。久而久之，英国人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三大殖民地，分别是位于东北部的加尔各答、位于东部的马德拉斯（现在叫金奈），以及位于西部的孟买。

英国人以这三个殖民地为依托，逐渐联合其余小邦，压缩莫卧儿的领地。于是印度变成了一个混合体，有的部分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有的部分是依附于英国的各种小邦，而莫卧儿皇室则变得微不足道了。

直到公元1857年（咸丰七年），印度发生反英大起义，英国人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才最终灭亡了莫卧儿皇室，并成为印度毫无争议的霸主。[270]也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人对亚洲才拥有了足够的优势，可以将亚洲的某些地区完全殖民地化。

在印度东面的缅甸，情况又有所不同，缅人的最后一个王朝贡榜王朝于公元1752年（乾隆十七年）建立。贡榜王朝是一个强大又自傲的王朝，虽然采用了不少西方的武器，也雇用了葡萄牙的士兵，政策上却一直是排外的。它不断地和邻居泰国发生冲突，甚至灭亡了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直到公元19世纪初，缅甸还足够强大，能够抵御西方的势力。然而，到了公元1824年（道光四年），缅甸和英国人的冲突爆发，英国用了60多年时间，发动了三次战争并吞了缅甸。[271]

越南自从独立之后，就和中国一样处于王朝循环之中。公元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越南的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初创。阮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借助了外国人的力量。公元1787年，阮朝首任国王阮福映为了对抗敌对性的地方王朝西山朝，让他的太子阮福景在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去寻求帮助。这位越南太子一时间成了法国的焦点，法国也决定派兵支援阮朝。然而，到了公元1802年越南统一之后，阮朝却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才想办法用武力撬开了越南的大门，将它慢慢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272]

除了越南，原来东南亚的强国占婆已经被越南完全吸收，而柬埔寨被泰国和越南压缩成了小国，也被法国人纳入势力范围。

在缅甸和越南之间的泰国由于缅甸贡榜王朝的入侵，离开了大城，在现代的曼谷建立了曼谷王朝。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泰国之所以幸运地保持了独立，在于它的国王们采取了中立的政策。他们敏锐地发现，虽然泰国的西方（缅甸）和南方（马来）已被英国占据，东方（越南和柬埔寨）和北方（老挝）被法国占据，但英国和法国并不希望彼此对抗，也不希望两者的殖民地接壤，而泰国就恰好可以作为一个缓

冲区存在，隔开英法的势力范围。泰国唯一需要的，就是做到在英法之间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让两大强权放心。正是因为这种中立和缓冲的策略，使得英法都承认了泰国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泰国也迅速开展了西化和工业化策略，加强自己的实力，成功地保持了独立国家的地位。[273]

但在局势变化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却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不了解葡萄牙人的衰落，也不知道英国的霸主地位，仍然通过广州口岸与葡萄牙等国家保持贸易，却对后起之秀的英国采取了比较冷漠的态度。[274]

在对另一个后起之秀荷兰人的态度上，清政府还表现得比较灵活，这主要缘于荷兰人曾经帮助清政府对付郑成功。清政府由此对荷兰产生了好感。据英国人称[275]，清代第一任皇帝（顺治帝）曾经邀请荷兰人访问过北京[276]。

不过，英国人却一直是渴望接触中国的。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公元1558—1603年在位），葡萄牙才刚刚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点，女王就曾给明朝的皇帝写过信，但因为船只在海上遇难，没有送到。

查理一世国王时期（公元1625—1649年在位），英国商人得到了特许到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群岛）贸易，商人们与葡萄牙果阿总督达成协议，获得在中国以及葡萄牙人居住地区进行自由贸易的许可。葡萄牙人虽然答应了，可英国商人在一个叫作温德尔的船长指挥下来到澳门时，葡萄牙人只允许他们在澳门修船，不同意贸易。葡萄牙人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方面不允许。

为了获得贸易权，温德尔决心探寻去往广州的水路，他们准备了一艘驳船和一艘帆船，共50多人，负责人是一位叫作卡特的船长。然而卡特在进入珠江之后，在广州口外遇到了清朝广州官员派出的阻挡他们的舰队。在这里，双方发生了不少误会和冲突。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接上了头，就可以获得贸易执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希望完全禁止他们

的贸易，并且不准他们进入珠江。

双方如同鸡同鸭讲一样耽误了几天时间，之后，广州官员调集了46门铁炮，每门炮重六七百磅，向英国船队开火。英国船立刻予以还击。之后，英国船只直达广州，向广州官员按照中国的礼节（也就是磕头）递上了贸易申请书。他们仍然不敢采取完全对立的姿态，希望通过配合而获得贸易权。

这件事标志着英国势力的到来，最终，广东政府也允许英国人建立了商行，表面上让英国与其他国家取得了平等的贸易地位。[277]

但事实上，英国一直是在华西方势力中比较弱势的一个。清朝政府一方面对他们不甚重视，另一方面认为他们很会找麻烦。加上皇帝对贸易都一无所知，官僚系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拒绝就拒绝。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英国水手与中国民众之间也时常有纠纷出现，甚至出过人命官司。

如何调整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双方的误会？英国人认定必须见到北京的皇帝，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并达成新的协议。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官僚层面上，皇帝是开明的。但是，中国的政策是不让外国人进入内地的，如何才能见到皇帝呢？

英国人也想过其他办法，他们找了一位会英语的中国人前往北京，但中国人似乎倾向于惩罚一切帮助外国人的本国人，这人不仅无法完成任务，反而被治罪了[278]。种种迹象表明，必须由英国国王派出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才能完成这个使命。

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派遣使团的动议开始付诸实施，使团的大使叫作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副使是斯当东爵士（George Staunton）。他们乘坐的船队是由高厄船长指挥的，旗舰号称狮子号。

英国人对这次出使是非常认真的，从人员配备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

科学精神。除政府大使和船员之外，船上还有一系列特殊人才，比如他们带上了科学家、画家、工程师等，以便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但使团队伍中，最重要的却是翻译。如果他们到亚洲现找翻译，应该可以找到，但他们希望在欧洲就把事情办好，这就有了很大的麻烦。在英国本土，之前只有一个人学会了中文，并私自到过北京，他叫洪任辉，不过他曾经私自闯入宁波和天津，被判定有罪后驱逐出境了[279]，在马戛尔尼出使时，他已经死去。另一个叫加贝尔的法国人久居广州，会中国话，英国使团本来指望找他做翻译，不想他也死了。

由于英国本土缺乏汉语人才，他们只好前往欧洲大陆去寻找。他们首先于1792年1月出发前往法国巴黎，请当地的教会推荐。当地教会说有一个人20多年前去过中国，但年纪太大了，早就忘记了当年学会的语言；但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开了一个中国学院，即前文提到的圣家书院，有一些中国人在那儿学习拉丁文。

于是英国人继续前往罗马，得到了一位罗马的红衣主教的帮助，这人首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同时又写信给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

在中国学院里，果然有几个中国年轻人懂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更巧的是，他们有的正准备回国。英国人和其中两人谈好，让他们充当翻译。就这样，传教士马国贤在雍正时期费心创立的中国学院，到了乾隆晚期竟然结出了硕果，成了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接下来使团考虑的是送什么礼物。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人喜欢外国钟表，这种东西是在中国国内制造不出来的。在清代，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以拥有一块钟表为荣。[280]但随着中外贸易的持续，至少对于皇帝而言，这种奢侈品的需求可能已经饱和了。英国人三思之后，选择了同样有弹簧齿轮和镶嵌珠宝的八音盒，广东人叫它新桑（Sing Songs）。

为了展现英国的科技实力，加上听说中国人重视天文，英国人又弄了几架大型的天文仪器，都价值不菲。当然还有英国人最骄傲的枪炮。另外，礼物里还有许多英国制造的日用品，是准备通过献给皇帝，产生广告效应，达到慢慢在中国市场铺开的目的。[281]

接下来，就是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了。这个工作由位于广州的英国商会负责。这一次，当申请书递上去，乾隆皇帝竟然对英国人展现出了巨大的仁慈，答应英国人可以不按照普通进贡的路线进入北京。

之前所有的外国（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南亚的）使节团，都必须按照中国惯例，从广州登陆，之后由中国政府负责，将他们从陆路和运河一路颠簸着送往北京觐见，之后再折腾回广州，才准坐船。[282]这是为了让中国只有一个港口和外国人打交道。

但这一次，英国人告诉皇帝，他们的礼物太贵重，禁不起颠簸，请求皇帝允许他们在距离北京更近的天津登陆。这个要求是极其荒谬的，连清朝的地方官员都没有把握，不想乾隆皇帝为了怀柔远人，竟然同意了，这是多大的恩赐！可以说，从出发开始，英国人就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乾隆皇帝的人情债，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公元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英国向遥远的中国进发，经过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圣地亚哥岛，穿越赤道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绕过好望角，经过东南亚的群岛和交趾支那（越南的南部），再经过澳门外的万山群岛，浙江的舟山群岛，于公元1793年7月21日，在天津外的庙岛泊锚。[283]

把他们一路上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记述和利玛窦当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与明朝相比，清朝是一个对官员管控更加严格的集权社会。在明代，官员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地方官府就可以决定是否接纳外国人，甚至在不经汇报皇帝的情况下，自主在管辖地给外国人划定住宅。但清朝经过了雍正帝的集权，以及密奏的推

广，皇帝近乎掌控了所有官员的动态。官员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以皇帝的命令为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必须上报，等待裁决，不准私自决定。

利玛窦还可以与官员们成为朋友，但是英国人碰到的却只有奴才，接待官员们几乎只是传声筒，帮不上任何忙。

在天津，负责接待的钦差是长芦盐政徵瑞，他又派遣了两位官员：天津道台乔人杰和通州协将王文雄，两人全程跟随使团，负责陪伴使团从天津登陆直到从广州离开。两位官员虽然表面上与英国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但他们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听从皇帝的领导，交往中时时刻刻显得战战兢兢。

回到英国人登岸之初，使团在天津上船后，负责运送他们的舰队率先离开，返回到海上，前往南方去等待使团的回程。[284]由于回程时已经没有了大件礼物做借口，使团也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安排，从陆路行走到广州，才能登船了。

但就在英国人刚登陆时，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直隶总督欢迎英国使者时——按照中国规矩，一旦使者上岸，就由当地的总督请客吃饭，但在吃饭前，必须到一间挂着皇帝画像（或者放着御座）的屋子里，让使者对着皇帝画像磕九个头。

总督接见那天，英国人记录的场景是这样的：欢迎英国人的队伍由直隶总督和钦差带队，在他们的身后，有一队士兵，分别是三个武官。他们来到了一个帐篷，帐篷外有一组军乐队，其中有三个军号喇叭，还立着一个牌坊，牌坊旁有几组巨大的旗帜：其中有四面绿色的大旗，每面大旗中间另有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着一些弓箭手；还有六面红色大旗，每面大旗中间有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着一些火绳枪手；两面绿色大旗，每面大旗旁站着一些大刀手。英国人看到，清军队伍的纪律性很差，由于天气很热，有的士兵手里除武器外，竟然拿着扇子。

总督将马戛尔尼引到大厅最深处，那里摆着皇帝的御座。马戛尔尼向着御座深鞠一躬，并没有下跪，这就违背了中国的规矩。不过这一次，总督认为是外国人不懂规矩，不跟他们计较，将他放了过去。[285]记住，这是英国人第一次遭遇磕头问题。

使团经过通州，穿过北京城，被安排在圆明园中的宏雅园中，而礼物则被布置在圆明园的大殿。在这里，马戛尔尼经历了第二次磕头事件，钦差希望马戛尔尼对着大殿内皇帝的宝座磕头。马戛尔尼又如何应对呢？

马戛尔尼在来之前做足了功课，知道一位俄国特使曾经拒绝磕头，但仍然签订了条约（可能与《尼布楚条约》[286]有关）。而另一个荷兰使节17世纪来到中国时，贪图小便宜，委曲求全磕了头，但最终一无所获。他由此判断，磕不磕头和签不签协议没有必然的联系。

他不知道的是：俄国人之所以拒绝磕头还能获得协定，是因为有战争做后盾，同时，清初的康熙时期，皇帝还没有僵化到需要磕头来彰显权威的地步，所以更加注重实质而不注重礼节。荷兰人只是为了贸易，没有战争做后盾，所以不管磕不磕头，都不可能让清政府签协议，清政府只是把他们当作朝见而打发走了[287]。马戛尔尼显然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只是简单认定不需要磕头。

但他还是做了一步退让，表示他可以向皇帝座位磕头，但必须有一个同等级别的中国官员对着英王的画像磕头，以示平等。他这样一提，对方觉得向外国人画像磕头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也不再坚持让马戛尔尼磕头了。他的第二关也混过去了。

在对圆明园的记载上，也可以看出双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圆明园是一个优雅、充满了情趣的皇家园林。但英国人却很不注重所谓的禁区和威严，而是从舒适角度考虑问题，在他们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住着非常不舒服、陈旧、偏远的园子，他们住在这里相当于被软禁

了。安德逊甚至认为它不配作为一个伟大君王的住所，是一座不实用的建筑，没有一间房超过一层。[288]

他们认为，宫殿处在两个死水塘之间，地势低洼潮湿，从湿地发出恶臭的水汽，让卫生条件堪忧，看上去并不配做伟大君主的代表的住所。这个住所有一种最粗野而荒芜的景象，长期以来是蜈蚣、蝎子和蚊虫的住所[289]。

由于对圆明园不满，马戛尔尼甚至抗议了好几次，请求回北京城内住下，离开这个偏远的乡下。这一次，皇帝再次展现出了仁慈，允许他们回到北京，占据了一个广东总督（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府邸。这个府邸看起来才像样一些。

英国使团在北京城内又住了几天，就上路去热河拜见皇帝。

到了热河，马戛尔尼的第三次考验到了，磕头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马戛尔尼仍然要求按照对等原则，要么自己磕头的同时，请中国官员对英王画像磕头，要么自己行单膝跪礼。大臣们上报皇帝裁决时，一个个胆战心惊，对使团的态度也变得不再友好。但最后，皇帝大度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单膝下跪，解决了这次纷争。

不过，这次纷争仍然显得迷雾重重，到了下一个英国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时，清朝官员想说服阿美士德下跪，举出的例子就是马戛尔尼。清朝的记录显示，马戛尔尼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行了磕头礼，也就是九次双膝下跪。但中国的记录又被英国使团的记录所否定，马戛尔尼一行人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显示使节行的单膝下跪礼。到底谁是谁非，还是有争议的。

但不管怎么说，乾隆时期的中国仍然足够大度，到了他的儿子嘉庆时期，随着帝国权威的衰落，下跪就成了更加急需的礼节了[290]。

觐见完毕后，由皇帝的重要大臣和珅带着使节们游山玩水一番，打发他们回了北京。而此时，英国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们

是来和皇帝谈判贸易条约的。

按照英国人的看法，他们代表英国国王前来和中国谈判，中国应当派出对等的大臣进行磋商并形成文本性的协议。英国人事先准备的主题有几个：第一，允许英国派遣一个常驻北京的使节，解决有可能发生的贸易纠纷；第二，在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和广东三处，给英国划几个地方做买卖；第三，仿照俄国人，让英国在京城有一个商馆。

英国使臣还在精心准备着下一步的磋商，但皇帝回到北京后，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英国人的礼品，并送出一堆赏赐，就打发他们踏上了回程，至于预想中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发生。

英国人到离开时，还在思考到底哪里错了，也许是葡萄牙人说了英国的坏话？也许是那位叫作福康安的大臣曾在西藏和英国人打过交道，在背后向皇帝说了坏话？

从天津去往北京的路上，马戛尔尼就得到过消息，由于中国刚刚在西藏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打了一仗[291]，在战争中，英国殖民的印度是帮助尼泊尔的，由此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敌人。中国这一方参战的将军就是福康安，他对英国人非常不满，而马戛尔尼在热河也遇到过福康安。

但实际上，乾隆皇帝并没有不高兴，他对英国使团不远万里前来朝觐感到很满意，可也仅此而已。外国人无权与天朝上国谈判，只配进贡。

事实上，英国人虽然没有谈判，但他们的问题都已经通过书信交给了皇帝，皇帝也都认真考虑过。

在回信中，乾隆皇帝一一驳斥了英国国王的请求：

你恳请派一个人住在天朝照顾你们的买卖，这不合天朝的体制。以前西洋各国来服务天朝的人，来了就必须遵守天朝规矩做官，永远不准

回去了。将心比心，假设天朝也派一个人到你们国家的首都居住，你们不也不能忍受吗？

至于在浙江、天津和广东设立洋行，自古以来（其实是明朝的惯例由清朝继承），外国人都在澳门设立洋行，你们最好也遵守这个规矩。如果准许你们四处经商，其他国家也都会跟进，提出这种无理要求，那天朝不就乱套了？

像俄国人那样在北京设立商行更不可行，俄国之所以这样，是早期战争导致的特殊情况，不是惯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292]总之，一切要求都被拒绝了。[293]

当清朝皇帝的官员都忽略了英国时，英国人却在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的一切，并做成报告发回国内，这些报告就成了英国逐渐积累的知识，将在几十年后反作用于中国。

在去往热河的路上，他们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城。在西方的典籍里，中国的长城一直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在葡萄牙人早期的著作中就提到了长城[294]。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长城，本来应该很激动，但是，冷静的英国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使团中的帕里什中尉对长城进行了详细的测量，认为这堵墙可以抵挡小型火器，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墙牢固，现在却挡不住普通炮火的攻击了。虽然挡不住普通大炮，但能够抵挡小型火器这件事情也说明，中国人认为自己发明了火器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否则不用修这么牢固的墙[295]。

马戛尔尼勋爵本人也写了私人日志。只是这份私人日志没有任何情节，看上去更像是一份严肃的科学考察报告。[296]

在日志中，马戛尔尼从风俗和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语言等几方面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情况。这些信息来自他一路上的搜集，包括陪同使臣的清朝官员主动提供的资料。

比如在财产一节中，马戛尔尼注意到中国没有长子继承权，在子女幼小时，丈夫死后可以将财产传给妻子。中国的合法利息是12%，但一般可以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即便到了今天，中国法律支持的最高利率也是36%，可见古老中国法律的继承性。

马戛尔尼注意到，中国的税收大约是大不列颠的四倍，也是革命前法国的三倍，主要包括土地税、盐税、海关税和其他小税。其中三分之一多的财政收入是用于军费的。

北京有两个财库，其中一个是国库，另一个是皇帝的私库。这项制度在汉代就确立了，一直延续到清代依然如此。

中国的科学此时已远远落后于欧洲，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事实上，中国人已经承认外国人在天文学上更加优秀，其他部门绝对不允许外国人任职，但是在制定历法时，却常常任用中亚或者欧洲人。比如，马戛尔尼时代，虽然如此防范外国人，但历法上仍然不得不使用外国人。

中国的历法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推算星辰和日月的位置；另一部分是根据星象解释吉凶。前一部分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技术活儿，交给了三名欧洲传教士负责，即钦天监正索德超、钦天监副教汤士选，以及安东尼奥神父（Padre Antonio），三人都是葡萄牙人。而后一部分才是有关国运的大事，自然只能交给中国人了。

中国的官员对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毫不关心，对地球仪、行星仪、气压计看不懂也不在意，却对漂亮的欧洲钟表充满了兴致。

使团的医生也评估了中国的医学水平，得出结论[297]：中国医学水平非常低，很难说是一门科学。这里没有公立医学院或者教师，没有相关科学教授，全国没有正规的医师联合团体或协会。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从未做过人体解剖，也没有丝毫概念在治疗中使

用这些知识。他们的病理知识（如阴阳理论和脉象等）和治疗方法必然极端缺乏，而且大都是错的。他们的药物极其有限，几乎全都来自植物界，除驰名的驴皮胶外没有直接或间接用任何动物做药用[298]。

中国人最擅长的手术只有几种：针灸（姑且算是一种手术）、修鸡眼、清耳朵、贴膏药，以及阉割（这才算一种真正的手术）。

医生还记录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中国存在大规模的梅毒患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护送英国人去广州的四位官员都患有梅毒，其中乔大人（乔人杰）和王大人（王文雄）在杭州嫖妓染上了这种病，武官王大人先向医生求助，被治好了，文官乔大人不好意思，就偷偷地请求王大人给他带药剂。另外，南昌府武将托大人和两广总督长麟也都有这种病，可见这种从美洲传入的疾病在中国传播之广，比例之高。

另一位使团成员巴罗[299]除记载一部分亲历事件之外，主要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宗教、仪式、农业、外贸、政府、法律、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等都在考察范围内。巴罗记录得如此细致，甚至将几首中国歌曲用五线谱进行了标注，并用英语模仿中文发音进行了注音，并在注音之下列出了翻译文本。其中最著名的歌曲就是至今仍然在传唱的《茉莉花》。

一路上，随行的画家亚历山大[300]也作了许多水彩画，从皇帝到官员，从贩夫走卒到囚犯，加上无数的风景和建筑，如果将之整理出来，细致程度和信息量恐怕不亚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狮子号大副艾尼斯·安德逊的观察带着一位军人的冷静与严肃，他对于那些浪漫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只关注实用性。

他观察到，中国人没有玻璃，平时窗户只是用油纸糊着。他对北京的城墙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专门提到北京城内的房屋虽然雅致，却由于低矮和面积小，并不适合居住，很少超过一层。

对于人们日后念念不忘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安德森也并没有表现出

尊重，直斥它不适合居住。当他们前往热河时，经过长城，安德森也对长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当清朝入关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用。经过长城时他还默默地将中国军队的阵形和人数做了估算，显示出一位军事人才的素质。

他甚至度量过一个年轻女子的脚，不到20岁，脚长只有五英寸半。

小斯当东的选择题

在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一个孩子，他的经历代表了未来数十年中英关系的走向。他就是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乔治·斯当东爵士成名于印度。在印度人抗英的斗争中，西南部印度有一个国家叫作迈索尔（Mysore），如今著名的科技城市班加罗尔就位于当时的迈索尔境内。迈索尔的国王是一位虎将，名叫提普苏丹（Tipu Sultan，公元1750—1799），曾经是印度南部反抗英国的先锋和主将。英国人数次与提普苏丹讲和，但最终依靠武力将其战胜。斯当东爵士曾经组织过与提普苏丹的谈判，并以此成名。

后来，他参加了马戛尔尼的使团担任副使，把自己的儿子小斯当东也带来了。小斯当东当时只有12岁，在路上他不仅学会了中文，还担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抄写工作。虽然使团中的中国翻译可以直接写出汉文文书，但由于中国翻译害怕得罪皇帝，所以这些文书都会由小斯当东抄写一遍，让他们看不出字迹。

在觐见皇帝时，乾隆帝询问使团中的外国人有没有能讲中文的，他发现小斯当东可以讲点中文，很高兴，将一个荷包解下赐给了小斯当东。御赐荷包算不上华贵，黄色丝绸上绣着蓝色刺绣，还有几个鞑靼字，但这代表了一种荣誉。事实上，那时这个12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五种语言，分别是英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中文。[301]

小斯当东随父亲回英国后，父亲又给他申请了一个驻广州的文书工作。公元1800年（嘉庆五年），小斯当东到达了广州。此刻恰好发生了英国水手打伤中国人的案件，英国人发现除雇佣华人翻译之外，最好需要一个英人翻译，才能更加代表英国人的利益。小斯当东恰好派上了用场，他很快成了英国人中的中国通，并翻译了《大清律例》，因为只有了解了对方的法律，才有可能在打交道时不吃亏。

除法律书之外，由于西方已经有了牛痘接种技术，小斯当东也将这类技术资料翻译成中文，帮助中国人对抗这种疾病。但在清朝灭亡之前，中国对牛痘种植一直不看重，导致小斯当东的努力没有太大效果。

由于英商只能同广东政府打交道，公元1809年（嘉庆十四年），小斯当东提议再组织一个使团，希望能与中央政府直接建立联系。他的提议受到了好评，但没有付诸实现。

在公元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之前，他一共到中国四次，并获得了两广总督松筠的友谊。松筠三次会见小斯当东，还有一次一起用餐。但松筠调回北京后，广东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302]

公元1816年，英国政府终于在小斯当东的呼吁下再次派出使团，使团的首席使臣叫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副使就是小斯当东。

这一次，他们仍然坐船来到了天津。接待使团的是天津兵备道张五纬和长芦盐政广惠，还有副将寅宾。

他们于7月28日在庙岛下锚，但经过长时间等待，到了8月9日才在塘沽登岸，进入北河。与马戛尔尼时代不同，此时的清帝国更加虚弱，其一个表征就是更要面子，于是华夷之间的礼仪冲突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

8月13日，接待使团的钦差大臣工部尚书苏楞额召见了阿美士德，表示要求行三拜九叩大礼。

阿美士德坚持按照20年前马戛尔尼使团的做法来。双方于是对马戛尔尼当时的礼节产生了争执。清朝大臣坚持认为，马戛尔尼当初行了九叩大礼，英国人则根据马戛尔尼的记述，认为他只行了单膝下跪的礼节。

另一个问题更加棘手，苏楞额不仅要他对皇帝下跪，还必须对着皇帝的画像下跪。在双方正式会晤之前，阿美士德被带到皇帝画像前行礼。但他坚持，对画像连单膝下跪都不行，只能鞠躬。作为让步，清朝大臣磕多少个头，他就鞠多少躬。

意外的是，苏楞额不想找麻烦，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在一张没有生命的画像前，中国的朝廷大员们纷纷跪下磕了九个头，阿美士德鞠躬九次。[303]

阿美士德小胜一场，暗自得意的他决定即便见了皇帝，也绝不下跪。这一方面是由于小斯当东的劝说，小斯当东认为，即便下跪也不会让中国皇帝更看得起他们，更不会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反而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另一方面，在十几年前刚刚有俄国人因为下跪问题与清朝发生了争执[304]，英国和俄国是大博弈时代的竞争对手，阿美士德认为俄国人不跪，英国人也绝对不会跪。

一路上，苏楞额、广惠两人还不断地引诱他们接受下跪的要求，因为如果不下跪，皇帝可能就不会接见。

8月20日，到了通州后，接待大臣换成了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和世泰，以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如果说之前的苏楞额和广惠是以温和的态度引诱英国人，那么和世泰和穆克登额则是以冷淡和威胁的方式要求英国人磕头。但英国人同样没有屈服，不过，从和世泰等人的态度判断，英国人是见不到皇帝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节发展下去，那么，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因为不愿磕头而见不到中国皇帝的使团。事后，人们也常常认为阿美士德是因为

磕头问题而出了岔子，但实际上，这个使团真正的毛病出在了另外的地方。

就在英国人都担心接见无望时，最强硬的和世泰却突然亲自拜访，告诉他们立刻去往北京参加觐见，于是，英国人又稀里糊涂地在夜间从通州被送到了北京。

8月28日，他们连夜赶路，在29日凌晨到达海淀，本来应该安排他们去一个叫作松筠的官员的府邸休息，但突然间，他们被告知皇帝要立刻接见他们。

原来，大臣与皇帝之间缺乏沟通，大臣不敢把英国人不想磕头的事情上报给皇帝，如果报告了，皇帝也就不见了。但另一方面，皇帝因为要离开北京去北方度假，想提前接见使臣。皇帝下了命令，大臣们只好照办，也不敢再提对方还没有答应磕头，只好赶快将阿美士德使团送往北京。至于其他的，只好看临场发挥了。

这本来是阿美士德捡了个便宜，不想阿美士德却并不领情。阿美士德对于提前接见没有准备，加之走了一夜，身体太狼狈，而送给皇帝的礼物却还没有送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不具备觐见的条件，请求将觐见改期。他指望着改期之后能够和皇帝好好谈一谈双方的关系，却并不知道皇帝根本就没有准备和他们谈，只是想赶快见一面就打发他们回去，自己好去北方度假。

就这样，一方面，皇帝的仪仗都已经搭好，英国使臣都被送进了觐见等待厅，和满朝文武大臣们杂处一室；另一方面，使臣竟然不愿意见皇帝。大臣们轮番劝说使臣接受接见，但阿美士德就是不为所动。

使团的三把手亨利·埃利斯记录下了这令人惊叹的一幕[305]。

首先是直接负责他们的大臣张五纬出面请阿美士德觐见，阿美士德以没有准备好为由拒绝了。张五纬不敢以这样的理由汇报，阿美士德只好改口说自己不舒服，张五纬不得不去汇报了。阿美士德周围围绕着大

批清朝官员，好奇地看着这个外国人到底想干什么。

接着，张五纬请求阿美士德去和世泰的房间商量，阿美士德觉得自己还是装病更好，于是不进房间。

和世泰只好亲自前来劝说阿美士德，为了说动他，和世泰保证只要用英国礼节就可以了，不用下跪。阿美士德竟然还是拒绝了。

和世泰见文的不行，开始生拉硬拽，想把他拽到殿上，但没有成功。

和世泰最后的努力是劝说阿美士德进自己的房间去商量，但阿美士德只想回住处休息，不肯进去。在一番争执后，和世泰离开，向皇帝承认实情，于是皇帝永久地取消了觐见。

对英国人来说，清朝的大臣做事显得极为不确定，一会儿威胁不磕头见不到皇帝，一会儿又求着他去见皇帝，但只要理解了所有大臣都是围绕皇帝转的，这一切就都不难解释了。

那么，按照中央帝国的政治哲学，一路上使节和大臣们到底犯了多少错误呢？皇帝的一份文件揭示了问题的所在[306]：最初苏楞额和广惠在天津会见使团，赐宴时，就必须让使臣磕头，只有磕了头，才准予进京，否则直接赶回去。但苏楞额和广惠却没有做到，还隐瞒了真相，这是一错。

到了通州，和世泰和穆克登额本应该让他们事先排练磕头，使臣没有答应，但他们并没有如实报告皇帝，让皇帝错误地下令让使臣进京，这是二错。

皇帝决定接见使臣时，和世泰和穆克登额终于将使臣还没有同意磕头的事告诉了皇帝，这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好问他们，他们回答，只要接见了，使臣应该会磕头，这是三错。

接见当天，皇帝已经上殿，只等使臣前来磕头，但和世泰第一次奏称，使臣不能快走，要等一下；第二次奏称，正使得了腹泻的毛病，需要稍微等一下；第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了，不能见了。皇帝下令让正使回去，只见副使，但和世泰第四次奏称，副使也病了。

这四次错误让皇帝感觉受了奇耻大辱，在清代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使团给皇帝造成了这么多难堪，这才取消了接见。

阿美士德离开后，皇帝得知使臣是连夜从通州赶来，甚至连朝服都没有拿到时，立刻原谅了使臣，更加怪罪和世泰，表示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必定会允许改期。既然使臣已经离开，不便叫回来，于是，皇帝下令一路上给予使臣良好的待遇[307]。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皇帝给了自己一个面子，否则即便使臣走了，他还是感觉下不来台。

回过头来说，即便阿美士德获得了接见，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期待改善贸易，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帝只不过是按照朝贡国来看待他们，让他们磕几个头，赏赐一些东西，再吃几顿饭，参观一下万寿山。他们的朝贡，除仰慕德化之外，其他的要求都是僭越的。[308]

阿美士德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从陆路离开，坐船经过京杭大运河，最后到达广州。不过，马戛尔尼是坐船直接到达杭州之后，再沿钱塘江上行到浙江江西交界，走一段陆路，再进入赣江水系。阿美士德没有到杭州，而是从扬州进入长江后，顺着长江和鄱阳湖进入赣江，再翻越梅岭到广东境内。一路上，各地政府纷纷下令，不准人民与英国使节有任何的接触，特别是女性。英国使臣完全被隔绝在中国社会之外，这和当年马戛尔尼还可以与人民有一定的接触又形成了对比。

这次出使的经历，让小斯当东从一个中国爱好者转向了中立。回到英国后，他在国内当选议员。[309]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又对中国怀有一定的感情，小斯当东的选择可

谓时代的缩影。当英国商人将鸦片输入中国时，小斯当东明确反对鸦片贸易。英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使得英国当局在林则徐禁烟过程中采取了中立的立场，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甚至鼓励商人将鸦片上缴给广东政府，并许诺给商人以补偿。

当义律无法兑现许诺的补偿时，小斯当东又认为既然当初答应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他支持商人对英国政府的索赔要求。

但随后，广东政府不断施压，让除鸦片之外的正常贸易也接近中断时，小斯当东支持了英国的军事行动，从而利用炮舰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市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认定除了武力，已经无法在中国进行合法的贸易了，这也是他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总结。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除谴责英国人的侵略之外，更应该明白，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即便没有公元1840年的战争，也会有其他的战争出现，并将中国的国门打开。因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全球贸易时代，这种贸易带着很多血色的成分，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免卷入其中，不是作为开拓者，就是被动地接受。

两个帝国的相遇

英国使团不是唯一被要求向清朝皇帝磕头的使团，事实上，这个问题在1840年之前已经成了中外关系中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而最受困于这个问题的，竟然是英国人当初羡慕的俄国人。

公元1805年（嘉庆十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一支蜿蜒数公里的队伍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在隆隆的礼炮声和200名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离开了俄国边境要塞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经过清国一侧的恰克图，进入了清朝控制的蒙古地域。

俄国使团冒着寒风一路赶来，在公元1806年1月2日，赶到了库伦，

也就是现在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前往北京去觐见大清国皇帝（他们称之为博格达汗）。

但就是同一支队伍，在一个多月后，却又灰溜溜离开了库伦，他们并没有南下北京，反而是向北回到了俄罗斯境内，使团的任务失败了[31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雄心勃勃的访问团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呢？到底是俄国人放弃了，还是清政府拒绝了？这个使团本来认为自己可以名留史籍，却静静地躲到了历史的角落里，没有人愿意再提。

要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要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谈起。

俄国人与中国人的初次接触尚属于蒙古时期，在元代时，蒙古人曾经把俄罗斯俘虏运到中国充任守卫北京的禁卫军。[311]之后，俄罗斯人领袖、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了取得蒙古汗对基辅公国的封诰，也于公元1247年（南宋淳祐七年，蒙古贵由汗二年）到达过哈拉和林。他为了让蒙古人停止招募俄罗斯人参加蒙古军队，还于公元1263年（南宋景定四年，元中统四年）到过金帐汗国。

为了保证收入，蒙哥汗下令在俄罗斯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大概有汉人官吏参与了调查，因为蒙古人公元1269年（元世祖至元六年）之前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使用畏兀儿文字或者汉字。

但随着蒙古人金帐汗国的衰落和分裂，俄罗斯人的世纪到来了。金帐汗国在公元16世纪初灭亡，在它的身后分裂成了三个小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312]。蒙古人的分裂给了俄罗斯人机会。

公元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到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俄罗斯征服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313]，由此开辟了一条新的商路：伏尔加商路。这条路利用伏尔加河，将俄罗斯北方的货物输送到里海，再利用船队穿过里海到达伊朗地区[314]。

俄罗斯的扩张还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英国人致力于寻找一条陆地上的水路从欧洲到达亚洲，他们认为应该存在这样的一条路，可以利用鄂毕河南下，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鄂毕河上游就是额尔齐斯河，被称为中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在伏尔加商路开通之前的公元1553年8月，英国人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就率领一艘英国海船到达俄国北方，试图探索这条道路，但没有达到目的。

公元1557年，当俄罗斯人开辟了伏尔加河道之后，英国人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获准通过俄国寻找通往中国（和印度）的道路。公元1558—1559年，詹金森开始了自己的长途旅行，英国人的做法引起了沙皇伊凡四世的警觉，拒绝了英国人在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建立商站和贸易的请求。

这段时期，也是俄罗斯人扩张的时期，除占领欧洲地区之外，俄国政府还致力于开发位于亚洲的外乌拉尔地区。在开发这个地区时，由于土地过于辽阔，人口稀少，沙皇采取了鼓励一批精力旺盛的拓荒者强行推进的策略，依靠个人能力去突破。只要他们能够征服新的土地，就授予他们管理权，沙皇只保留名义上的所有权。等到开疆完成，建立了行政机构之后，沙皇再慢慢落实更广泛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外乌拉尔地区，得到授权的最大的家族叫作斯特洛甘诺夫家族。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伊凡四世给他们特权证书，恩准他们在乌拉尔山东麓、托博尔河及图拉河地区占有土地，并在额尔齐斯河、鄂毕河等地建立要塞。

与此同时，金帐汗国分裂出的另一个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也被俄罗斯人并吞：公元1581年（万历九年），一支哥萨克队伍在叶尔马克的率领下战胜了西伯利亚汗国的君主库丘姆汗，攻占了首都喀什雷克（西伯利亚城），又于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在巴拉宾彻底击败库丘姆军队。

在俄罗斯人的经营下，西伯利亚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就成了沙皇控制北亚的钉子。

表25 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的城市群[315]

城　市	年　代	城　市	年　代
秋明	1586	托博尔斯克	1587
别廖佐夫	1593	苏尔古特	1594
塔拉	1594	奥布多罗克	1595
纳雷姆	1596	曼加泽亚	1600
托木斯克	1604	图鲁汉斯克	1607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628	雅库茨克	1632
巴尔古津	1648	阿尔巴津	1651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这座城市位于叶尼塞河边，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枢纽。在建立了这座城市之后，俄国人已经形成了一条横贯西伯利亚，通过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贝加尔湖、色楞格河，把北冰洋和蒙古边境连接起来的水路大干线。借助这条干线就可以到达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

三年后，另一座城市雅库茨克建立，位于西伯利亚的腹地，在勒拿河边。

从纬度上，它在贝加尔湖遥远的北方，从经度上看，它已经深入到了贝加尔湖的东面。

借助在亚洲东北部的扩张，公元1644年，明王朝灭亡的那一年，俄罗斯人已经到达黑龙江支流结雅河上游地带，接着又进入了黑龙江。公元1651年，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一座城市，叫作阿尔巴津，而在中国，它的名字是雅克萨[316]。

雅克萨之所以会被俄罗斯人占据，很大原因在于中国发生的明清换

代。之前这里是满族人的外围区域，但自从满族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内地，无暇顾及这里，导致俄罗斯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雅克萨地区的控制权。阿尔巴津（雅克萨）建立后，清政府仍然在忙于镇压中国国内的反抗，对如此辽阔和遥远的边境地区也无力守卫。

但到此时，俄罗斯人距离中国又足够近了。之前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扩张，由于地理位置遥远，无法惊动中国政府，但在黑龙江地区的扩张势必会传到位于北京的清政府耳中。公元1652年（顺治九年），当俄罗斯人继续扩张时，清朝将军宁古塔章京海色与俄罗斯人发生冲突，将其逼迫回阿尔巴津。

但短暂的失利并没有削弱俄罗斯人的胃口，从公元1658年（顺治十五年）起，俄国人依托于涅尔琴斯克（中国人称之为尼布楚），对黑龙江发出新的威胁，这导致了中俄之间的进一步冲突。

公元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在俄罗斯人的多次骚扰下，康熙帝终于下令清剿位于雅克萨的俄罗斯人，雅克萨之战爆发。这次战争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双方由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俄罗斯人称之为《涅尔琴斯克条约》），以外兴安岭确定了俄罗斯和清朝的边境。

这次战争和条约虽然将贝加尔湖地区划归俄罗斯，但对清政府有利的是，至少双方形成了明确的边境，可以依靠条约的效力，将俄罗斯人限定在外兴安岭之外，不要过线。

但清政府遇到扩张型的俄罗斯时，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之后双方不同的做法决定了东北地区的命运。

首先看俄罗斯人的做法，为了从边境地区继续外扩，俄罗斯人不断地向东方移民，进行开发，利用人民的力量形成实质性的占领。

而清政府却并没有意识到边境人口的重要性，反而为了避免边境人民与俄罗斯人联系，将边境地区的人民都撤往了内地。于是，在中俄交界地带，形成了中方一侧的人口真空。俄国一方不断地移民增加人口密

度，清朝一方却形成人口真空，这样的人口压力差必然导致清朝的收缩和俄国的扩张。

当清政府势力在东北地区停滞不前时，俄罗斯人却越过了中国北方，继续扩张到亚洲直达太平洋的边境，并越过白令海峡将北美的阿拉斯加收入囊中。

事实上，清政府在前期并不是一个保守型的政府。几朝皇帝虽然在海外贸易上做了不少限制，但在陆路上却采取了扩张的政策，将原本明朝无法控制的许多地区实质性地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中，比如新疆、蒙古和西藏的广大地区。

为了看清中俄双方的局势，还应该从中亚和新疆方向看一下两者的进展。在中俄扩张之前，随着蒙古帝国和帖木儿帝国的衰落，在新疆和中亚也都出现了新的霸主。中亚地区崛起的是一支自称为乌兹别克人的人种，他们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混合种。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定居下来，形成了三个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和希瓦汗国），而那些在北方没有定居的乌兹别克人，后来就成了哈萨克人的祖先。除了乌兹别克人，还有一些小的种族。比如，唐朝以前中亚的人种主要是伊朗种，他们被突厥种取代后，残余的伊朗种人口被慢慢地赶入山区，形成了现在的塔吉克人。而吉尔吉斯人在唐代时曾经在蒙古地区活动，后来长期游荡于蒙古、北亚和中亚地区，直到在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定居下来。

而在新疆地区，则是一支称为准噶尔人的天下。准噶尔人是非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人，它所在的大种群被称为卫拉特人[317]。当黄金家族衰落后，卫拉特人取代了黄金家族成了北方霸主，卫拉特人中的准噶尔部占据了新疆地区。

东方的准噶尔人和西方的乌兹别克人，就成了中俄两大力量没有到来时的内亚霸主。之后，随着清朝和俄国人的到来，双方开始在内亚进行竞争。从时间上来看，清政府在竞争的过程中是占了先机的，一百多

年后，俄国人才最终完成了对中亚（哈萨克人、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的并吞，从这个角度看，清政府前期是一个进取型的政府。

先来看清政府对准噶尔人的控制。

在明代，瓦剌人曾经是北方霸主，并在“土木堡之变”中击败了明朝军队，俘虏了明英宗。[318]

但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人衰落了，从如今的蒙古国迁移到了新疆北部，并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起初和硕特部最强盛，但随后被准噶尔部取代。准噶尔部逼走了土尔扈特部，降服了杜尔伯特部，并将和硕特部赶到了如今的青海省境内。随后，准噶尔人又控制了南疆的维吾尔人，将整个新疆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其影响力直达中亚[319]。

准噶尔和清朝分别占据了中国北方的东西两端，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更大的帝国。当清朝占领中国内地时，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不仅获得了新疆，还与西藏相联合，并试图进攻蒙古。如果他将蒙、疆、藏三部都控制在手中，那么从土地面积上足以和内地的清朝中央政府相媲美，并从三方面向中原施压，形成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又一次包围。

但对清朝来说，由于准噶尔控制了新疆和西藏，这又孕育着极大的机会，一旦击败了准噶尔，就获得了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权。而准噶尔对蒙古的入侵又导致蒙古投向了清朝。如果能够拿下蒙、疆、藏，相当于清朝稳固控制的国土面积迅速扩大了一倍。

公元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借口清剿位于蒙古的喀尔喀人（以黄金家族为代表的蒙古人），从新疆经过蒙古到达呼伦湖，从呼伦湖南进，越过贝尔湖，进入察哈尔部的属地。他击溃了内蒙古的部落联军，向北京前进。

为了抵御噶尔丹，康熙皇帝派遣大军从喜峰口和古北口北进，迎击

噶尔丹，双方相遇在如今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320]

之前在与明军的交战中，清军已经火器化了，在清朝的部队中有了专门的火炮部队，使用的是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噶尔丹由于地处内陆，仍然以传统的骑兵和骆驼兵为主。

双方交战的结果是，清朝获胜，将蒙古纳入有效控制范围，并在之后的战役中逼迫噶尔丹自杀。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西藏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结果清政府击败了准噶尔人，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最后，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又击败了位于新疆本部的准噶尔人[321]。

而在西方的中亚地区，俄罗斯人对中亚的控制却并不顺利。

乌兹别克人形成了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布哈拉汗国[322]、希瓦汗国[323]和浩罕汗国[324]。

俄罗斯人在进入西伯利亚的同时，也开始对中亚进行考察。公元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一个叫作贝科维奇（Alexander Bekovich-Cherkassky）的人率领数千人远征希瓦汗国，由于路途过于遥远，缺乏补给，还要穿越沙漠地区，整个远征队全军覆没。

之后，俄罗斯人集中精力经营北方地区，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首先侵吞位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堡垒。公元1743年（乾隆八年），他们建立了奥伦堡（Orenburg），这里成了对中亚发起进攻的据点。

然而征服中亚三大汗国却要比进入东北亚地区更加艰难，在奥伦堡建立一个多世纪后，俄罗斯人才真正控制了中亚。

从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俄国人在20

多年的战争中，才最终将三大汗国降服，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

从这种对比的角度看，在陆地扩张的早期，清政府并不比俄国人做得差，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帝国维稳成本的增加，才逐渐采取了封闭的做法，从而导致了衰败，让俄国人获得了优势。这个转化的时期恰好是在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

在公元1803年（嘉庆八年）时，虽然清朝已经开始衰败，而俄国人的优势已经在逐渐积累，但对于两个国家而言，却还都没有意识到胜负手的变化，于是就有了这次著名的出使事件——

受阻的俄国使者

公元1803年，俄罗斯恰好是野心勃勃、虔诚又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of Russia）执政。在当时，法国的拿破仑已经崛起，整个欧洲都在想办法遏制这个新兴的主宰。不过，俄国仍然有工夫关注东方的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鲁缅采夫[325]，他提出要送一个外交使团到中国去谈判，解决一系列的东方问题。那么，鲁缅采夫要解决的东方问题有哪些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当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俄国和蒙古边境的恰克图[326]进行。恰克图虽然是边境小镇，却承担了中俄贸易的所有功能，也是俄罗斯帝国东方贸易的中心。

但对俄国人来说，恰克图有着无数的缺点，它地处内陆，运输不便。特别是在俄国人获得了哈萨克草原以及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恰克图口岸了。

他们希望至少能够为俄国再增加两个口岸，其中一个位于新疆，希望在布赫塔尔玛地区[327]开辟一个新的口岸，接纳中亚的贸易。之前，清朝政府禁止新疆与俄罗斯直接贸易，但是允许哈萨克等与清朝有宗主

关系的民族在边疆做生意，于是哈萨克人成了俄国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有些人大发其财。俄国自认为是哈萨克人的主子，希望改为由中俄直接贸易，绕开哈萨克人[328]。

另一个口岸是海路的广州。此刻的广州对葡萄牙、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已开放，但清政府依然遵循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口岸的原则，既然俄国有了北方的恰克图口岸，清朝的广州就对俄国人封闭了。清朝皇帝不明白，北方的俄国人为什么要绕远到南方的广州去做生意，他更不知道，自从俄国人占有了阿拉斯加和北方岛屿，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毛皮资源，通过海路运往广州进行贸易反而是更加便捷的方式。[329]俄国人有千百个理由，但这对于不懂地理的清朝皇帝却是说不通的。

此外，中俄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麻烦：边境问题。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已经将两者的边境划清了，不存在太多的模糊性，但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满意。加上清政府迁出人口的做法，让两国边界的中方一侧成了真空地带，俄罗斯认为在没有人居住的地区，所有权是有争议的。

俄国人最大的觊觎之处是黑龙江这条河流。黑龙江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随着俄国人对远东的开发，他们需要一条河流将内地与海洋连接起来，而黑龙江作为该区域最大的河流，是最适合航行的。

《尼布楚条约》中，将黑龙江流域都划归了清方，但清朝政府却并没有利用这条河流，反而将居民撤出，形成了政治空白区。俄国人由此下了赌注，强行说这是一片需要重新划分的领土，希望清政府同意以黑龙江为界重新划界，并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航行[330]。

根据《尼布楚条约》，双方的划界是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起源的外兴安岭向东北方延伸，直达黑龙江入海口地区。黑龙江在外兴安岭以东，所以整个属于中国，不仅是河流本身，还包括它的流域所在[331]。但俄罗斯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外兴安岭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山脉，在地图上极其不起眼，强行将这条小山脉组成的边界划成了有争议

地区。

从客观上来说，黑龙江属于中国是毫无争议的。如果黑龙江属于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库页岛[332]也必定属于中国。到了后来，由于清政府对西方战败，俄国才成功地将黑龙江以北拿走，更甚者又向南沿乌苏里江拿走了大片土地和库页岛，并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变成了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与战败有关，也和清朝早期的糊涂政策有很大关系。

根据鲁缅采夫的命令，使团的最主要使命有三条：1.广州通商；2.新疆通商；3.东北边界问题。[333]

在这三大问题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要将两国的交往集中在贸易领域，那么贸易的多元化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甚至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可以防止俄方对领土的觊觎。至于第三条则属于无理要求，但需要清政府正面回应，形成可以援引的先例，避免由于模糊性造成的后续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由于俄国与英国竞争阿富汗，俄国希望清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藏，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考察队；由于康熙时期的政策，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会，每隔10年就有一次教士的调动，新任教士将随着使团前往，等等。

俄国人派出的使者叫戈洛夫金（Yury Golovkin），而清朝方面负责接待的，是驻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阿尔达西[334]，其中又以蕴端多尔济为主。

此时，中国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在位60年的乾隆帝终于退位了，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老人不可能在坟墓中再干涉他了。

但由于生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太久，嘉庆帝是个典型的守业型的皇

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叛乱等问题。[335]

守业，决定了嘉庆帝对外政策上的两方面特征：第一是不添事，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由于强调权威，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被更加凸显出来。他之前的几任皇帝不那么强调礼仪，允许变通，但到了嘉庆时期，皇帝对于礼仪的遵守到了痴迷的地步。

不巧的是，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帝与蕴端多尔济两人就形成了绝配，让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防御。

但对于戈洛夫金的访问本身，嘉庆帝又是感兴趣的。由于他每年都要举行生日大典，如果让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大典上，增加万国来朝的气氛，对于这位亲政不久的守成皇帝树立权威是有帮助的。

当清朝做出了愿意接纳的回应之后，俄国人开始耐心地准备起人选、礼物和行程。他们准备了太多的礼品，加上路途过于遥远，这一准备就是两年时间，公元1803年提出动议，直到1805年使团才成行。

既然俄中两国都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双方是否能把这良好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友善呢？不要忘记，两者的根本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公元1805年9月，当“花枝招展”的戈洛夫金带着242人的外交团队抵达蒙古[336]与俄罗斯的边境时，首先吃了第一闷棍：中国方面拒绝他们入境，表示由于使团人数太多，必须缩减到100人以下方才接待。[337]

原来，蕴端多尔济听说戈洛夫金来了200多人，不想准备这么多马匹。按照中国传统，使臣从进入边境开始，一切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接待方负责，作为库伦地区的负责人和接待方，蕴端多尔济偷懒了。

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

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皇帝定调后，接下来是理藩院的职责了。理藩院查了以前的旧档案，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康熙十五、三十二、五十九年，雍正五年来朝。顺治朝和康熙朝三十二年档案不见人数记载，康熙十五年使团共由156人组成，五十九年有90多人，雍正五年数量相当大，曾经令其缩减，最后到京的只有120人。由此可见，俄国使团的人数从未超过200人，而此次已经超过240人，故必须缩减。[338]

理藩院查证后，事情就传到了军机处。不过，军机处为了坚决贯彻皇帝的精神，不提康熙十五年有156人团的先例，而是一口咬定没有超过100人的先例，要求俄国使团必须把人数削减到100以下。[339]

军机处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既然它已经下令缩减到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就有了执法的借口，如果俄国人不缩减规模，就拒绝入境。在之后的谈判中，他不断向皇帝汇报俄国使者不遵守规矩，如果不是皇帝想要让外国人在他生日上朝拜，这样的谈判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

关于人数问题，双方又争执了很久。在经过权衡之后，戈洛夫金同意将人数缩减到130人，但蕴端多尔济却强行要求对方缩减到70人方才准予入境。北京的军机处也在继续制造障碍，由于获得了蕴端多尔济的信号，他们决定将使团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从不超过200人，到不超过100人，到70人，再到40人，可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在宁左勿右的指引下层层加码的水平。

谁也不敢质疑一下，40人已经太低了，如果只有这一点儿人，使团很难完成正常的出使任务。这时就该由皇帝最后拍板了，他亲自指出，40人是不现实的，决定将额度恢复到100人，众人连忙欢呼皇上英明。[340]

但这仍然不是争议的结束，双方为了人数问题又扯皮了两个月，才最终确定人数为124人，再次上报后，嘉庆皇帝又一次仁慈地同意

了。[341]

年底，威风凛凛的戈洛夫金终于跨过了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第二年的1月2日，他抵达库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如何到北京与皇帝谈判。但就在这时，第二记闷棍来了。

1月4日，蕴端多尔济等人在库伦宴请戈洛夫金，当他们进入庭院准备吃饭时，蕴端多尔济突然带着戈洛夫金到了一个香案跟前，要求戈洛夫金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戈洛夫金没有料到这个礼节，拒绝行礼。双方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宴会也没有举行成功[342]。

戈洛夫金一定认为是蕴端多尔济捣了鬼，从中作梗不让他顺利前往北京，但实际上，这道命令的确是皇帝所下。皇帝给蕴端多尔济下了圣旨，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343]

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尊严没有信心。在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容忍了。

但嘉庆帝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人们都知道和珅的下场。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嘉庆帝更加在乎礼节，谁也不敢变通。胆小的蕴端多尔济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他奉行的原则是：紧紧跟随皇帝的指示，不做任何变通，以免引起麻烦。这几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戈洛夫金的噩梦。

戈洛夫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必将找到一个顾全双方颜面的办法，或者嘉庆皇帝最终会宽容地对待他们。不想，嘉庆帝本人是同意蕴端多尔济的看法的，表示如果使臣不叩头，就直接遣返回去。

得到了指令的蕴端多尔济再也不犹豫，在俄国使团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令他们离境。于是，戈洛夫金满怀着为国立功的豪迈，却无处施

展，连北京都没有到就灰溜溜回了国。他带的贵重礼物不仅送不出去，反而由于笨重连拿回去都困难。这个使团成了出使中国最窝囊的使团[344]。

在整个事件中，除看到礼仪之争外，还要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俄国使团其实是很重视的，为了迎接这个使团，皇帝与大臣之间的通信来回折腾了十几次，还动用了理藩院、军机处等机构。不仅如此，皇帝还给所有位于使者道路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察哈尔等）都打了招呼，一一指导他们怎么对付这些路过的外国人[345]。

为一个使团动用如此众多的官僚力量，的确是得不偿失，但这就是明清时期皇帝对使团的本质：接见使者绝对是赔本买卖，但为了皇家的威仪，接见使者是必需的。只是这个俄国使者太不懂事了，因此赶回去予以惩戒。

但惩戒过后，皇帝又有些意犹未尽，毕竟这些黄发、高鼻子的外国人无法出现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了。于是，他又下令，等下一次使者再来时，降低他们的礼遇等级，不再给他们赐宴，但也不用他们叩头了。

嘉庆皇帝在盼着俄国人还会回来，但俄国人却并不接招了。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接，而是拿破仑在欧洲引起的破坏终于波及俄国，他们应对拿破仑已经精疲力竭，没有精力再派使团到中国了。

但俄国人对中国的愤恨一直保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与这个老大帝国谈判，不管是合理的要求还是不合理的要求，几乎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于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连哄带骗地将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都拿走了。[346]清朝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付账，也是为自己的傲慢买单，它虽然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却没有引起丝毫的同情。当然，通过武力打开国门之后，外国使臣也不再对着皇帝三跪九叩，只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夜郎自大的例

子加以引用。

注释

[1]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2]参考《利玛窦书信集》《利玛窦中国札记》。

[3]本书作者曾经去果阿参观过，对沙勿略的事迹记忆犹新，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4]上川岛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西南部的南海中，在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中外贸易地点。

[5]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138页。

[6]即今泰国。

[7]《明史·暹罗传》记载，沙勿略死后的第二年（嘉靖三十二年），暹罗国进贡白象，由于大象死在了路上，使者只好把象牙用黄金包裹，和尾巴一起进贡。沙勿略要加入的应当是这个使团。

[8]参考《明史·穆宗纪》。

[9]参考《明史·鞑靼传》。

[10]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1]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9—146页。

[12]根据《明史·黄应甲传》推算。

[13]陈瑞事亦见《明史·黄应甲传》。

[14]参考《明史·郭应聘传》。

[15]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7—156页。

[16]《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改革述评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7]至今利玛窦建立仙花寺的地点仍然可以在肇庆找到。

[18]肇庆府属于岭西道，岭西道属于广东布政司。

[19]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7—219页。

[20]《明史》中吴文华有专传，吴善和刘继文只能得知其职务。

[21]《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卷第一章。刘继文驱逐传教士时试图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补

偿，利玛窦没有接受这笔钱，这样的做法让廉洁的刘继文吃惊，于是将驱逐改为离开肇庆，到辖区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居住，利玛窦选择了韶州。

[22]名汝夔，太素是他的字。

[23]《明史·瞿景淳传》并未记载瞿太素，其原因可能在于他已经被逐出家门了。

[24]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2—274页。

[25]《明史·日本传》。

[26]徐大任曾在广东任职广东兵备道。

[27]乐安国1451年（景泰二年）封，建安国1481年（成化十七年）封。利玛窦时期的两王分别是第四代和第五代。见《明史·诸王世表第三》。

[28]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9—327页。

[29]参考《明史·徐光启传》。

[30]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22—427页。

[31]参见《马可波罗行纪》。

[32]至今巴布尔的墓葬仍然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本书作者曾经去拜访过他最后的栖身之所。

[33]参考《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34]参见［法］阿德尔、［法］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5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6—257页。

[35]参考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36]位于现代巴基斯坦。

[37]鄂本笃事迹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十一到十三章。同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第六章第二十六节。

[38]乌兹别克人的情况见下一章。

[39]即今帕米尔高原。

[40]鄂本笃称之为Sarcol，或者Sarcil。

[41]另两座是公格尔峰和公格尔九别峰。

[42]按照书中的说法，鄂本笃启程于这一年的1月6日，到达喀什是11月，但这和书中所说的时间无法对上。比如，他在喀布尔就等候了8个月，再加上路上行程显然不对。本书只说他到达喀什的日期，不提他出发日期，就在于原书日期有问题。

[43]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44]这样的体系还引起了数次战争，因为日本非常喜欢朝贡，明政府限制日本十年朝贡一次，导致日本人对华商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得不进行海盗行为，造成了倭寇的泛滥。而瓦剌人对朝贡体系的不满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见《明史》相关传记。

[45]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5—219页。

[46]至今，鄂本笃的墓仍然在嘉峪关的沙漠之中。

[47]见《明史·外国传》相关传记。

[48]参考［英］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二章。

[49]现代土耳其的首都。

[50]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虽然西方传说巴耶济德遭际的悲惨，但帖木儿对他却是优待的。不过他仍然于被俘几个月后死亡。

[51]参考《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三章。

[52]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萨布兹。

[53]属于察合台家族。

[54]参见《草原帝国》，第515—518页。

[55]参考《草原帝国》引《帖木儿武功记》。

[56]帖木儿不止在印度杀俘，事实上他在许多次战役中都有杀俘行为，参见《中亚文明史》《草原帝国》等。印度德里苏丹国的情况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57]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0页。

[58]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59页。

[59]现在翻译为埃尔津詹。

[60]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124页。

[61]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5—134页。

[62]参考《明史·西域传·撒马尔罕》。

[63]参考《明史·西域传·哈烈》。

[64]德国人Johanan Schitbargar游记，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2。

[65]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2—167页。

[66]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

[67]参考《明史·撒马尔罕传》。

[68]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69页。讹答剌即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

[69]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8—187页。

[70]参考《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71]参考《明史·撒马尔罕传》。

[72]即今阿富汗北部。

[73]参考《明史·哈烈传》。

[74]参见《明史》中的外国传和西域传诸国。

[75]参考《明史·朝鲜传》。

[76]即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77]参考《明史·安南传》。

[78]参考《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

[79]《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其地广袤千里，去甘肃一千五百里，东抵罕东，西距天可里，北迩瓜沙洲，南界土番。

[80]参考《明史·安南传》。

[81]参考《明史·鞑靼传》。明成祖以燕王扫北闻名。

[82]明朝称为哈烈。

[83]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0—575页。

[84]参考《明史·西域传》。

[85]参考《明史·哈烈传》。

[86]信的全文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87]根据王继光的考证，九人为：李达，职业外交家，长时间活跃于西域；杨忠，出使过

别失八里；李贵，屡次出使西域；哈蓝伯，《明史》作“金哈蓝伯”；帖木儿不花，出使过别失八里、火州、柳城；马哈木火者，哈密卫指挥使；哈三；李暹，户部主事；陈诚。见《西域行程记》前言。

[88]《明史》西域诸国传中多次提到这个使团。

[89]参考《西域行程记》。

[90]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

[91]即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

[92]参考《西域番国志·送陈员外使西域记》。

[93]本表根据《西域番国志》整理。

[94]即今阿富汗城市赫拉特。

[95]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

[96]参考《明史·哈烈传》。

[97]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0—575页。

[98]《明史》记载为九次，《明实录》为十次。

[99]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100]这也是陈诚第四次出访中亚。

[101]即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

[102]即今酒泉。

[103]根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这批使团来自几个地方，人数分别为200人、150人、60人、50人、50人。盖耶速丁所属的三王子可以派出150人。

[104]即今甘肃张掖。

[105]事实上，明朝晚期，从另一个方向——海路已经有了外国人的身影，比如利玛窦，但在陆路依然是禁止的。

[106]参考《西域番国志》。

[107]巨港原称旧港，明朝时此处建有旧港宣慰司。

[108]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相关章节。

[109]根据《东南亚华人史》第四章，更是认为早在此200年前华人就已经移民三佛齐。

[110]《瀛涯胜览·旧港国》记载了施进卿和陈祖义。

[111]《明史·三佛齐传》记载了梁道明和另一个叫作郑伯可的人。

[112]参考《明史·三佛齐传》。

[113]根据《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综合。

[114]参考《明史·三佛齐传》。

[115]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印度的朱罗，Chola）、爪哇、溢亨（彭亨）、白花（即花面国）、三佛齐、浡泥，见《东南亚华人史》第四章。

[116]琐里、柯枝、古里位于印度。

[117]孙铉在历史中只出现了一次，可能是尹庆使团成员，也可能是单独出使，时间不晚于永乐三年。（《明史·三佛齐传》）

[118]参考《明成祖实录》卷四八。

[119]根据《明史》各海外传记整理。

[120]根据南山三峰塔寺《天妃灵应之记》碑文、《明史》、《明实录》制表，参考《中西交通史》考证。

[121]见《中西交通史》第三篇第十三章第二节考证。

[122]船只数目根据《瀛涯胜览》，余根据《明史·郑和传》。

[123]参考《明史·郑和传》。

[124]即今苏门答腊岛东北岸阿鲁港。

[125]即今马六甲。

[126]即今印度西海岸的奎隆。

[127]即今印度卡利卡特。

[128]《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五年他来朝谢罪，可能是跟随郑和舰队到中国的，谢罪的内容，可能是针对郑和使团。

[129]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七一。

[130]之所以认为是回程，在于《明成祖实录》卷五六中，提到永乐四年七月陈祖义进贡，郑和是永乐三年出发，永乐五年回，显然，陈祖义事件发生于永乐五年回程时。

[131]根据《明史》与《瀛涯胜览》。

[132]参考《明史·三佛齐传》。

[133]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一一六。

[134]该事件同样记载于《明史·郑和传》，可与《明实录》相对照。按，锡兰山王最后没有被杀，而是送回了国内。

[135]《明史·郑和传》：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136]参考《明史·苏门答剌传》。

[137]参考《瀛涯胜览》。

[138]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一八六。

[139]参考《明史·郑和传》。现代人分析资料见《中西交通史》第三篇第十三章第三节。

[140]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

[141]参考《中西交通史》第三篇第十三章第四节。

[142]参考《明史·溜山传》。

[143]见《伊本·白图泰游记》。

[144]参考《明史·忽鲁谟斯传》。

[145]见《明史》各自本传。

[146]参见本书作者所著《穿越非洲两百年》。

[147]《明史》中称为阿丹。

[148]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一一九、一二零。

[149]《殊域周咨录》引刘大夏的话。

[150]本表原见于中华书局本《西洋番国志》附录三，本书对今地名一栏做了一定的修改。

[151]参考《殊域周咨录·浡泥》。

[152]这个故事同见《明史·浡泥传》，但可能是根据《殊域周咨录》摘抄的。

[153]参考《明史·浡泥传》。

[154]参考《明史·满剌加传》。

[155]参考《殊域周咨录·苏禄国》。

[156]参考《明史·苏禄传》。

[157]关于倭寇的叙述见下一章。

[158]现存针经有两份，叫作《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见中华书局《两种海道针经》。

[159]即葡萄牙人，“佛郎机”是“法兰克”的中文对音，不是“法兰西”。

[160]即今南非莫塞尔湾。

[161]参考［英］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第四章。

[162]参考本书作者所著《穿越非洲两百年》。

[163]卡斯蒂利亚王国是现代西班牙的一部分。

[164]热那亚位于意大利。

[165]参考《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三章。

[166]参考［法］阿德尔、［法］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第236—257页。

[167]参考［法］阿德尔、［法］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第189—211页。

[168]明王朝的做法见本书的下文。

[169]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三千佛塔烟云下》第十六章。

[170]即今泰国清盛。

[171]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三千佛塔烟云下》第十五章。

[172]参考［英］托比·格林《一把贝壳：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西非的金钱与权力》。

[173]参考［法］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蔡华译校：《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91—411页。

[174]即东印度群岛，欧洲国家对东南亚盛产香料的岛屿的泛称。

[175]参考［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三章。

[176]本表根据《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殊域周咨录》整理而成。

[177]参考［葡萄牙］若昂·德·巴罗斯《亚洲》第三卷书，卷一，第八章。

[178]参考皮列士《东方志》，转引自《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

[179]参考《明史·武宗纪》。

[180]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81]若昂·德·巴罗斯《亚洲》认为是三封，但这里采取了《广州葡囚书简》的说法，至于《亚洲》所说的第三封（广州官员的信），在下文也会出现。

[182]参考《广州葡囚书简》。

[183]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84]参考《广州葡囚书简》。

[185]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86]参考［葡萄牙］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六，第二章。

[187]参考《殊域周咨录》。

[188]参考［葡萄牙］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六，第一章。

[189]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90]参考《殊域周咨录》。

[191]参考《明史·佛朗机传》。

[192]参考［葡萄牙］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六，第五章。

[193]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94]葡萄牙人记载两艘船的船长分别是迪奥戈·德·梅洛和伯德罗·奥蒙。

[195]《克利斯多弗·艾维拉的信（广东，1524）》，出自《广州葡囚书简》。

[196]《克利斯多弗·艾维拉的信（广东，1524）》第二一、二二、二三节，出自《广州葡囚书简》。

[197]《克利斯多弗·艾维拉的信（广东，1524）》第二五节，出自《广州葡囚书简》。

[198]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99]澳门同属于香山县管辖。关于香山澳到濠镜澳的迁移，具体的讨论可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小节。

[200]据《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201]日本有十年一次的进贡额，但对日本的贸易需求来说是杯水车薪。见本书作者所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202]关于朱纨事件的中国记载，参考《明史·朱纨传》《明史·日本传》《明史·佛郎机传》。

[203]根据《明史·朱纨传》确定李光头的名字。

[204]葡萄牙人称之为大队长Luthissi，根据《明史·朱纨传》确定他的汉文名字叫卢镗。

[205]克路士《中国志》第二十四章记载，是四个马六甲王，而根据《明世宗实录·二十八年七月》记载，是三个佛郎机国王。

[206]参考《中国志》第二十五章。

[207]《明史》本传：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208]参考《中国志》第二十六章。

[209]参考伯来拉《中国报道》。

[210]准确地说，《中华大帝国史》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西班牙人拉达的出使记录（在本书后文还会谈到），一是克路士的《中国志》，而克路士的《中国志》又参考了伯来拉的《中国报道》。

[211]也有可能从江西进入湖南，经过灵渠转漓江。

[212]据《中国志》和《中国报道》。

[213]如朱纨时期，月港就是海盗和倭寇的双重营地，见《明史·佛朗机传》。

[214]关于隆庆开关税收的更详细讨论，见《晚明大变局》第一章第五节第四小节。

[215]参考拉达《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以及《中华大帝国史》第二部第一卷《福建行纪》。

[216]当时称为中左所。

[217]参考《出使福建记》。

[218]参考［英］傅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引自洛阿卡《实录》。

[219]参考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二部第二卷《奥法罗中国行纪》。

[220]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

[221]参考《东西洋考》，引《广东通志》，这一年为万历二十九年。

[222]参考《明史·和兰传》。

[223]参考《明史·意大里亚传》，万历四十四年。

[224]根据《明史·意大里亚传》。

[225]参考《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第二章。

[226]《明史》也承认有传教士变更姓名重入南京，官府就没有办法了。

[227]参考［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二部第九、十、十一、十二章。

[228]参考《明史·徐光启传》。

[229]参考《明史·意大里亚传》。

[230]以下部分参考《中西交通史》相关章节。

[231]也有少数人可以冲破这个限制，比如郑和舰队就到达过东非，而蒙元时期也有人到过欧洲，所以欧洲和非洲偶尔也超出传闻范围，进入活动范围。

[232]根据《职方外纪》总结。

[233]根据《坤舆图说》总结。

[234]参考《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

[235]王太后致信教皇之事，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第六章二十七节，此节又引自《东方杂志》第八卷五号。

[236]见《南明史》各帝本纪。

[237]《东方之旅》记载，1642年，为了抵抗李自成，明朝军队扒开黄河导致开封成为废墟，传教士费乐德死于水灾。1644年，山西蒲州的传教士万密克被当成皇室后裔死于乱兵。1647年，清军攻占南昌时，传教士谢贵禄和梅高被杀害。

[238]参考［西班牙］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第十三章。

[239]参考［西班牙］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二十三章。

[240]荷兰在台总督揆一《被遗误的台湾》，转引自［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十六章注。

[241]参考［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十六章。

[242]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四章第二节。

[243]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四章第三、四节。

[244]《崇祯长编》记有对12名西人的请恤疏，余见《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四章第五节分析。

[245]参考［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二十三章。

[246]参考［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二十三、二十四章。

[247]以下三则均参考卫匡国所撰《鞑靼战纪》。

[248]参考卫匡国所撰《鞑靼战纪》，以及《清史》本传。

[249]参考《清史稿·尚可喜传》。

[250]本段内容根据《东方之旅》第三章改编。

[251]关于张献忠的杀戮情况，《鞑靼战纪》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描写，依据的材料就来自两位传教士的记载。

[252]参考《清史·汤若望传》。

[253]参考《清史·杨光先传》。

[254]参考鲁日满所撰《鞑靼中国史》。

[255]《鞑靼中国史》记载是预测金星的晦暗。

[256]参考《清史·汤若望传》。

[257]参考鲁日满所撰《鞑靼中国史》第三章。

[258]根据《鞑靼中国史》。另根据《清史·汤若望传》，7人是：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他们的刑罚是凌迟处死。除此之外，还有5人被判斩首：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宋可成子哲、李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但在执行时，杜如预、杨宏量由于勘定陵地有功，被免死改为流徙。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从凌迟改为斩首。至于原判斩首的5人没有再提及。如果他们也按原计划被斩首，则受难人数实际为10人。

[259]参考鲁日满所撰《鞑靼中国史》第三章。

[260]参考《东方之旅》《鞑靼中国史》。

[261]参考《清史·南怀仁传》。

[262]根据《东方之旅》整理。

[263]参考《东方之旅》。

[264]参考樊守义《身见录》。

[265]本表根据《身见录》进行整理。

[266]参考谢清高《海录》。

[267]即今梅州。

[268]根据谢清高《海录》整理。

[269]参考李汝珍《镜花缘》。

[270]参考本书作者所著《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第二十六、二十七章。

[271]参考《琉璃宫史》《三千佛塔烟云下》。

[272]参考《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一章。

[273]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三千佛塔烟云下》第二十三章。

[274]《清史稿·邦交志二》记载了英吉利初到时双方的交往情况。

[275]这种说法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276]《清史稿·邦交志七》记载为顺治十年。

[277]《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一章详细叙述了冲突的整个过程。

[278]《清史稿·邦交志二》提到此人是徽商汪圣仪。英国人则说是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员工，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一章。

[279]见《清史稿·邦交志二》，洪任辉和汪圣仪一同被判罪。

[280]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有一个常设馆叫钟表馆，所展出的钟表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皇帝从海外收到的礼物。

[281]参考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二章。

[282]这条路线主要是为东南亚国家设计的，见《明史》和《清史》的外国传。

[283]参考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三章到第十章。

[284]这次使团共产生了如下的记录：马戛尔尼本人写的私人日志、副使斯当东的谒见乾隆纪实、团队成员巴罗的中国行纪、基兰医生的医学和生化观察、狮子号大副安德逊的记载。

[285]参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一章。

[286]《尼布楚条约》签订于康熙二十八年，见《清史稿·邦交志一》。

[287]康熙时期，荷兰被当作入贡国对待，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磕头，但由于是入贡国，意味

着只准进奉贡品，无权贸易。但到了乾隆初，荷兰已经获得了贸易权，见《清史稿·邦交志七》。

[288]参考《在大清帝国的航行·圆明园的宫殿》。

[289]参考《在大清帝国的航行·圆明园的宫殿》。

[290]有人认为，马戛尔尼由于随着许多人一起觐见，的确下跪了，但他们的记录故意模糊了自己的下跪，见《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三十七章。

[291]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见《清史稿·廓尔喀传》。

[292]参考《东华录》。

[293]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清代档案，见《清代档案史料汇编·乾隆朝·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

[294]参考［葡萄牙］巴洛斯、［西班牙］艾斯加兰蒂等所著《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

[295]参考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三章。

[296]参考《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一部分。

[297]医生日记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一部分附录。

[298]关于中国古代的医药知识，这里的评论均是马戛尔尼使团医生的结论，是否偏颇，还须读者自行判断。

[299]参考《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二部分《巴罗中国行纪》。

[300]使团画家叫亚历山大，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301]参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四章。

[302]参考《小斯当东回忆录》第二十一章。

[303]参考《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二章。

[304]在本书的后节还会谈到这次出使。

[305]参考《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三章。

[306]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邸报，引自《清实录·嘉庆朝》卷三二〇。

[307]1816年10月8日，皇帝给两江总督的谕旨，见《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附录。

[308]阿美士德使团的清代档案见《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嘉庆朝·英使来聘案》。

[309]参考《小斯当东回忆录》第四十章。

[310]《清史稿·邦交志一》提到了这次出使，但语焉不详，要想考察此次事件，必须借助俄罗斯文献，主要参考资料是《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311]参考《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第二章。

[312]参考《草原帝国》第十二章。

[313]克里米亚汗国在公元1783年才最终灭亡。此外，西伯利亚汗国也是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它灭亡于公元1598年，见下文。

[314]参考《俄罗斯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第二章。

[315]根据《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整理。

[316]参考《清史稿·邦交志一》。

[317]卫拉特在明时被称为瓦剌，清朝称卫拉特，后也称漠西蒙古。

[318]参考《明史·英宗纪》。

[319]参考《清史稿·藩部传一》。

[320]参考《清史稿·圣祖纪》。

[321]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52—665页。

[322]占据了河中地区，首都在今中亚名城布哈拉。

[323]占据了花剌子模地区，首都在今乌尔根奇和希瓦附近。

[324]占据了费尔干纳谷地，首都在今浩罕。

[325]尼古拉·彼德罗维奇·鲁缅采夫，Nikolay Rumyantsev，1754—1826。

[326]位于蒙古国北部与俄罗斯接壤处。

[327]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

[328]鲁缅采夫1805年1月16日给沙皇的奏章，见《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53第三条。

[329]鲁缅采夫1803年不晚于2月13日的奏章已经提到了广州开市的情况，见《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1。

[330]戈洛夫金1805年5月10日给副外务大臣的报告，见《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93。

[331]《清史稿·邦交志一》：一，循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上游之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讷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尽属俄。

[332]位于黑龙江口南方。

[333]参考《俄中关系》文献53。

[334]后来接替的是玉衡，再后来是福海。

[335]参考《清史稿·仁宗纪》。

[336]当时属于清朝。

[337]1805年9月25日，蕴端多尔济致信戈洛夫金，见《俄中关系》文献173。此前6月14日，已经提出过类似要求，见文献109。

[338]参考理藩院奏折见《俄中关系》文献103。

[339]军机处文见《俄中关系》文献102。

[340]参考《俄中关系》文献186、187、204、208。

[341]参考《俄中关系》文献218。

[342]戈洛夫金的说明，见《俄中关系》文献245。

[343]嘉庆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皇帝的诏书，见《俄中关系》文献218。

[344]蕴端多尔济要求使团返回，见《俄中关系》文献273。

[345]嘉庆皇帝的谕旨也都收入了《俄中关系》之中。

[346]参考《清史稿·邦交志一》。

尾声

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本书所描写的时段也截至这一年。

但本书将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苦难是否是可以避免的？从公元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的中外冲突，之间隔了漫长的三个半世纪。人们常常误认为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已经比中国强大，但事实上，在明代晚期和清代康熙时期，中国由于幅员广阔，足以保持对西方势力的威慑力，直到乾隆时期，中国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又过了半个世纪，西方才利用他们的优势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明代，随着欧洲人来到东南沿海，以广东、福建和浙江为代表的东南地区在贸易的刺激下，产生了经济的大发展，并催生出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工业化现象，特别是在瓷器和丝织品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产品带来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使得明代后期的社会呈现出典型的商品经济特征。

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也在国内产生了一批醉心于西学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人就是徐光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当时，徐光启等人开启的道路能够继续，中国可以花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完成西方的科学革命。一旦开足马力学习西方，中国人的勤劳刻苦会产生强大的动力，迅速缩小双方的差距。

当技术和资金都不成问题时，中国是否有可能抓住这次机会？如果

通往科学革命的这条路成立，那么公元1840年时的中国也就会足够强大，可以抵御外来的入侵了。

事实上，这样的道路的确是可能的，在中国的邻居中，泰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在西方势力的夹缝中完成了政治、技术和经济的转型，一直保持着光荣的独立。而日本开国比中国还晚，却在朝野上下的努力下，开足马力完成了工业化和技术化的转型，这都给中国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同时也表明转型的国家并不是必然会遭受到西方入侵。

然而，如果了解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人们又会意识到完成国家转型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无法成为事实。从明代开始，中国就已经丧失了转型的能力，从而必然导致1840年的结局。

事实上，葡萄牙、英国和俄国人都曾经试图利用外交手段打开中国的国门，却发现毫无用处。最后的军事手段带着很大的非法成分，也是唯一能够让中国开关的方法了。

本书已经提到，从元代开始，中国社会就变得足够保守，丧失了与世界正常交往的能力。明清两朝皇帝变得自大，他们一方面拒绝了一切正常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周围的国家进贡，又以赏赐的手段，用极大的代价将外国人吸引到朝堂之上——他们需要的只是让这些人磕头。

元代之所以成为分水岭，在于蒙古帝国对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蒙古帝国横跨了整个亚洲内陆，西方人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过蒙古人领地，从西欧直达中国，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知识震撼和好奇心，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可是，蒙古帝国作为外来势力对中原的入侵，却让此后的中国变得更加保守。南宋的理学本来就是一种保守的哲学，遇到蒙古入侵之后，整个中国南方排外的风气达到了顶峰，这种风气又经过朱元璋渗入了明朝统治者的血液之中，最后又传给了清朝统治者。

可以说，当西方地理大发现之时，中国人想的却一直是如何保持东方的卓然独立，将一切外来的干扰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这种心态才是地理大发现之后350年中西方此消彼长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再拉长时段，会发现另一个隐藏在人们普通观念之外的事实，这个事实也在本书中数次强调，那就是：现代人往往认为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换个角度你也会发现，中国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国家之一。

在发现美洲之前，欧亚非大陆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中国的核心区域是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关中平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两湖盆地和赣江谷地，这些平地是完全连通在一起的，它们如此广袤又彼此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型国家。在欧亚非大陆上其他地区，那些国家的区域大都支离破碎，没有统一的基础。

更难得的是，如此庞大的疆域在周边又受到了完整的山脉和海洋的保护，任何外部民族想要进攻这些平地，都必须翻越巨大的山脉或是跨越海洋才能到达。而北部中国的游牧民族，又受限于浩大的长城屏障。因此，中国的疆域相对而言对外是易守难攻。一个王朝只要用适量的军队就可以保证如此巨大的国家的安全，这使得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建立起来，并维持足够长的和平与稳定，就必然产生一个令世界感到羡慕的盛世时期。

在秦统一之后的2000年历史中，中国的大部分历史都是统一、和平和繁荣的历史，与之对照，不管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它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分裂的，即便在某个时间段拥有辉煌的文明，但放在2000年之中，大部分时期却不得不忍受分裂带来的混乱。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最幸运之地。

但是，最幸运之地也有不幸，正因为地理条件过于优厚，也出现了

两个缺陷：

第一，地理条件总是相互作用的，外来民族不容易打进来，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不容易出去。于是，新疆西部成了中国的天然地理边界，历代王朝最多控制新疆地区，偶尔有王朝控制了再往西的费尔干纳谷地和伊塞克湖盆地，但这两个地方都无法长期固守，只要盛世一过，就会收缩防线回到新疆境内。

这主要是由于中原王朝的兵力大都受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大沙漠的阻隔，无法保证在新疆以西的人员、物资补给。

此外，在北方，中原王朝很难突破大漠，只有元代、清代这样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所建的朝代是例外。

在南方，由于海岛的限制，中国的船只很难突破东南亚的两个海峡，于是将马六甲以西的海洋让给了印度人和波斯人。

第二，优厚的条件养成了中国人保守、缺乏好奇心的性格。

在历代王朝，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探索外在世界，而是守住已有的江山。他们缺乏对外部的好奇心。在2000年时间里，中国人只有少数时期选择了对外探索，大部分时间要么在政治中钩心斗角，要么不断地探索内心世界，与外界断了联系。

这种保守心态使得中国产生了特有的王朝循环，但每一个朝代与之前的王朝都是大同小异，缺乏经济和技术进步。

也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保守性，使得每一次外来的冲击，都让社会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虽然足够幸运，但是在以统一王朝为主流的历史中也有几次大的中断，以及外族入侵。每一次历史中断或者入侵都会给后来的社会造成持续的影响。

最早的例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末年的战乱，让南朝变成了一个文化上保守的王朝序列。但这一次，中国却足够幸运，因为最终统一了中国的是从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中诞生的“北魏—隋—唐”序列[1]。作为这个序列开创者的北魏王朝实际上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鲜卑人保持着足够开放的心态，并乐于接受汉人的文化，这种杂交性造成这个王朝序列抛弃了汉人的保守特征，建立了一个具有世界精神的王朝序列。更幸运的是，鲜卑人完成了如此重要的使命之后，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了中国人的一部分，这导致汉文化群体慨然接受了北魏王朝的所有遗产。

唐代，中国的世界性达到了顶峰。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看到，即便唐代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开放，但和同时代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相比，依然是保守的、封闭的。

中国最不幸的王朝更迭来自宋代，宋代本来继承了唐代的开放性，又保留了更多的中华特色，在平等的贸易体系下和海外打交道。然而，由于异族入侵，北宋和南宋的两次灭国过于悲惨，使得中国文化中排外的一面成为了主导，这就是明代形成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频发的原因。

正是因为明代民族主义的爆发，使得明清成了中国最保守的时期，不幸的是，这个时期也是西方世界最开放的时期。

到了清代末年，由于清朝也是一个外来政权，随着中国人推翻了清朝，很有可能复制明代在赶走蒙古之后的一幕，迅速进入下一轮的闭关锁国。

但幸运的是，此刻已经是西方技术和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刻。仅仅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朝，只有借助西方技术和政治，才能获得成功。所以，赶走清朝的政权是受到西方观念武装的人建立的，于是在政治上，他们向现代国家理论靠拢，在民族思想上放弃了一味的汉人政权，而是强调五族共和与民族团结，在技术上则更采取了激进式的学

习态度。

这种幸运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不管是民国，还是后来取代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建国理论都是世界性的，更强调借鉴世界的先进经验，而不是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政权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开放的好处，融入世界的尝试带来了累累硕果。

然而，在这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我们的政权基础是开放式的，但近2000年的封闭传统还是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于是，随着经济的好转和盛世的到来，在改革开放之外，另一股思潮——民族主义也随之到来，这一思潮重新拾起了民族情绪的武器，不断强调2000年的伟大与光荣，而实际上却可能孕育出另一次封闭的种子。这颗种子是否会在未来生根发芽，目前来说还是不确定的。如果开放取得了更大的成果，足以抵御民族情绪对于人们的诱惑，那么我们就度过了危险期。如果此刻不幸发生一次外来冲击，又激发起了人们心底隐藏着的那种骄傲，就有可能产生另一次保守和封闭。

我们可能暂时无法看透未来的走向，但我们需要保持一份警惕心，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开放之果。

在最后，我们回顾一本一百多年前写的小说。在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已经跌到了谷底，许多志士仁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未来将往何处去，他们中有的人选择了变法图强，有的人倾心于革命。但还有一派，我们可以称为坚信派，他们虽然不知道手段何在，却坚信在未来有一天中国依然能够统领全球，号令世界上各个国家特别是白种人的国家。

一本现代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说就代表了这种理想。这是一位叫作碧荷馆主人的作者写的一部叫作《新纪元》的小说，憧憬了一百年后，

也就是公元1999年时的世界秩序和战争。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一年到达了20年后，不妨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人是如何设想1999年的。

作者描写1999年的中国有10亿人口，250万常备军，加上后备军共600万人。

在西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是特殊的，它就是匈牙利。匈牙利自称为匈人（也就是西匈奴人）的后代，因此可以视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合体，受到了西方的排挤。西方开会之后，匈牙利国家内部的白种人造了反，并向西方求援，当西方白种人国家决定干涉匈牙利时，匈牙利的黄种人向中国求援，于是中国介入了这场冲突，派出了远征军。

在战争中，以西方白人世界为一方，中国领导的亚非拉国家为另一方，甚至在澳洲和美洲，也都有华人建立的共和国存在了。

远征军的首领叫作黄之盛，是一个科技主义的信徒。在他的斡旋下，中国的盟友埃及和土耳其封锁了苏伊士运河，而美洲的华人共和国抢占了巴拿马运河，形成了对西方的封锁。但西方舰队也在斯里兰卡到越南之间的海域封锁了通道，使得中国的救兵无法乘船前往欧洲救援匈牙利。

之后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离奇。首先，黄之盛通晓各种科技，从电气到光学再到毒气和低温技术，制造了诸如潜艇、飞行器等先进的武器系统。然而，作者的铺陈下，读者始终感觉是在《封神榜》的圈子中打转。每当遇到险情，在科技的外衣下就会有一种威力巨大的法宝出现，将中国军队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如果读者仔细思考，才会发现问题的实质：虽然这本小说的作者口口声声信奉科技，但它只是将科技作为幌子，骨子里却依然是《封神榜》的底色。作者关心的不是科技原理，而是讲述离奇的幻想故事让读者感到心满意足。他所谓的高科技武器，和姜子牙借来的各种法宝一

样，都不遵循事实上的物理规律，只服从于作者的想象力。

故事的结局是中国军队一路推进，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大败欧洲军队，逼迫对方缔结城下之盟，将一百年前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给了欧洲。

本书之所以以这个故事作为结束，是为了提醒读者，由于2000年帝国体系的影响，始终有一些人认为，与世界相处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世界臣服。从汉代开始的大一统和集权主义，让人们很难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拒绝以平等的身份融入世界。即便清末社会已经衰微到了极致，人们不得不去学习西方技术，但学习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战胜他们。

在这种思潮下，中国的民族主义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次泛滥。在泛滥时期，虽然科技和社会实力还不足以与世界为敌，但人们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太想获得尊敬，但采取的行动却是以伤害好不容易建立的开放态势为代价的。每一次这种泛滥都会造成一次严重的社会退化，将之前的社会积累消耗殆尽，中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新开始新一轮循环。

如今，又经过了上百年的颠簸，我们似乎已经走出了这样的循环，但依然不断有类似于这篇小说的呼声杂音泛起，希望将中国拉回到这部小说中所设想的结局，去医治那数百年技不如人的心灵创伤。

但幸运的是，至少现在的主流人群依然能够意识到，即便公元1999年过去已经20余年了，我们依然离不开世界，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共处的伙伴。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不是为了重建过去那过时的秩序观，而是为了让每个人过得更加幸福和富足。

随着中国的发展，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一次经历民族情绪的泛滥，那可能导致我们再一次丧失掉最佳的融入世界的机会。

如今，随着COVID-2019病毒的肆虐，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这时，我们更应该意识到：中国依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技术水平还很欠缺，并且，即便我们更加强大，还是需要学会与世界共处。

能否和平融入世界，是决定我们能否走出治乱循环的关键要素之一。

注释

[1]之所以称为朝代序列，是因为这些朝代有明确的制度和社会继承性。详细讨论可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丝绸之路大事年表

（以下皆为公元纪年）

前550年（东周灵王二十二年） 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崛起。

前334年（东周显王三十五年）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前330年（东周显王三十九年） 阿契美尼德帝国被亚历山大所灭。

前323年（东周显王四十六年） 亚历山大去世，西亚和阿富汗等地进入希腊化时期。

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 楚国将军庄蹻征服云南后，由于秦军阻断了回程，只好在云南建立滇国。

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 帕提亚帝国（安息）在波斯建立。

不晚于前176年（西汉前元四年） 匈奴进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迁。

前139年（西汉建元二年） 张骞出发出使大月氏，被匈奴羁押。

前135年（西汉建元六年） 汉武帝发动对东越王（位于福建和浙江）的战争。唐蒙发现牂牁江道直通广州。

约前129年（西汉元光六年） 张骞逃离匈奴控制，继续西行，经过大宛前往大夏。

前126年（西汉元朔三年） 张骞回到长安。

前123年（元朔六年） 大将军卫青进攻匈奴大捷，汉匈之战进入高潮。

前121年（西汉元狩二年） 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

约前119年（元狩四年） 张骞出使乌孙，并派人出使了西域多国，此次出使事件持续多年。

前112年（西汉元鼎五年） 汉灭南越。

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 滇国降汉。

前108年（元封三年） 汉军破楼兰和车师，俘虏了两位国王。

不晚于前107年（元封四年） 细君公主出嫁乌孙王昆莫，被乌孙王嫁给了孙子岑陬。

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 细君公主去世。贰师将军出发征伐大宛，败绩。

前102年（太初三年） 贰师将军李广利再征大宛，获宝马以归。

约前101年（太初四年） 解忧公主出嫁乌孙王。

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 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楼兰改名鄯善，完全依附汉朝。

前72年（西汉本始二年） 在解忧公主的请求下，汉军出兵解救乌孙，并导致乌孙彻底投靠汉朝。

前68年（西汉地节二年） 西域都护设立，最初有职无府，后来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

前60年（西汉神爵二年） 汉击败了车师，车师破碎成为八国。

前51年（西汉甘露三年） 解忧公主年老归汉，两年后去世。

前44年（西汉初元五年） 匈奴第一次分裂，分裂出郅支单于率领的西匈奴。

前36年（西汉建昭三年） 郅支单于败亡，西匈奴西迁，公元4世纪出现在欧洲。

13年（新莽始建国五年） 西域第18任都护但钦被焉耆杀害。

16年（新莽天凤三年） 焉耆等国袭杀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

40年（东汉建武十六年） 南越征侧、征贰起义，后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

48年（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 班超出使西域，利用合纵连横之术，逐渐控制了西域地区。

75年（永平十八年） 北单于进攻车师，围困东汉戊己校尉治所金蒲城。焉耆和龟兹杀死西域都护陈睦。

78年（东汉建初三年） 班超留守西域，保住了东汉在西域的声名。贵霜王丘就却最早于本年去世，他是贵霜王朝崛起的第一代国王。

86年（东汉元和三年） 班超打通了南道。

88年（东汉章和二年） 汉章帝去世。汉和帝重开西域。

89年（东汉永元元年） 窦宪深入戈壁击败匈奴，燕然勒铭。

90年（永元二年） 贵霜副王谢进攻班超，被击败。

97年（永元九年） 班超派甘英去往西方，可能到达了地中海岸边。

102年（永元十四年） 班超年迈回到长安。

105年（永元十七年、元兴元年） 汉和帝去世，东汉改变西域政策放弃西域。

107年（东汉永初元年） 羌乱爆发，汉安帝放弃西域。

123年（东汉延光二年） 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重开西域，获得汉安帝同意。班勇打通北道。

125年（延光四年） 班勇出征西域，在三年内击败匈奴，开通西域。

126年（东汉永建元年） 贵霜王阎膏珍或于本年（最迟不晚于129年）去世。

131年（永建六年） 东汉政府再次在伊吾屯田，标志着东汉最后一次开通西域的活动达到了高峰。贵霜王迦腻色伽可能于本年继位，贵霜王朝达到顶峰。

152年（东汉元嘉二年） 于阗反叛，杀死西域长史王敬。

153年（东汉永兴元年） 车师反叛，将伊吾屯田处攻没。东汉王朝的西域影响力瓦解。

155年（东汉永寿元年） 北匈奴被鲜卑人击败，匈奴退出历史舞台，鲜卑人成为主角。

159年（东汉延熹二年） 北印度频繁从海上前来出使。

166年（东汉延熹九年） 疑似大秦使者从南海前来进贡。

224年（曹魏黄初五年） 波斯萨珊帝国建立。

226年（黄初七年） 萨珊帝国取代帕提亚。孙权派吕岱平定交州。

230年（东吴黄龙二年） 东吴大帝孙权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出海寻找传说中的夷洲和亶洲，两人可能到达了琉球群岛一带。

242年（东吴赤乌五年） 孙权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讨伐珠崖和儋耳，进入海南岛。另有朱应和康泰出使南海，时间不详。

291年（西晋元康元年） 西晋“八王之乱”，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失控。

304年（西晋永安元年） 氐人李特和儿子李雄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

308年（西晋永嘉二年） 匈奴人刘渊在北方建立了前赵政权，十六国时期到来。

320年（东晋大兴三年） 前凉国建立，之后一百多年，在甘肃地区先后出现了5个凉国。约在该年，笈多帝国建立，印度古典时期最后一个王朝到来。

350年（东晋永和六年） 氐人政权前秦建立，前秦曾短暂统一中国北方，却被东晋击败，导致北方再次分裂。

380年（东晋太元五年） 旃陀罗笈多二世称为笈多王，印度古典文化达到鼎盛。

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 前秦大将吕光进攻龟兹，获得高僧鸠摩罗什以归，鸠摩罗什滞留凉州十几年。

399年（后秦弘始元年） 法显踏上西行旅程，前往天竺。

401年（弘始三年） 后秦主姚兴接鸠摩罗什到长安，鸠摩罗什在此译经，成了中国译经第一人。

402年（弘始四年） 法显翻越葱岭，到达乌苌国。

404年（弘始六年） 法显进入印度佛教核心地区。

409年（弘始十一年） 法显到达师子国。

411年（弘始十三年） 法显到达东南亚耶婆提国。

412年（弘始十四年） 法显回国。

413年（弘始十五年） 鸠摩罗什去世。

417年（东晋义熙十三年） 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先后灭亡了南燕和后秦。

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 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从南海进入中国，并到达南朝首都建康。

453年（南朝宋元嘉三十年） 嚈哒人战胜了波斯。此后数十年嚈哒人多次战胜波斯，成为中亚霸主。

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 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洛阳佛教大盛。

504年（南朝梁天监三年） 梁武帝下诏，将佛教定为唯一“正道”，南朝佛教达到顶峰。

516年（北魏熙平元年） 胡太后立永宁寺。

518年（北魏神龟元年） 宋云、惠生使西域求佛经。

521年（北魏正光二年） 宋云、惠生自西域还。

531年（南朝梁中大通三年）前后 嚈哒人进攻印度，却未能有效占领。

534年（北魏永熙三年） 二月永宁寺浮图为火所烧。北魏迁都邺城，洛阳衰落。

约540年（南朝梁大同六年） 在嚈哒人的攻击下，笈多王朝衰亡，印度从此进入一千多年的分裂时期。

541年（大同七年） 南越李贲起义，三年后建立万春国。

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 突厥首领土门帮助柔然击败了草原的第三势力铁勒（高车），此前，公元4世纪崛起的柔然已经是草原霸主。

552年（西魏元钦元年） 突厥击败了柔然，成为新霸主。

602年（隋仁寿二年） 交州（越南北部）再次被征服。

606年（隋大业二年） 印度戒日王即位，印度进入了古典时代的回光返照时期。

607年（大业三年） 隋炀帝派遣羽林骑尉朱宽入海，两次前往流求国，第二年派兵击败了流求国。同年，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前往赤土国。

617年（大业十三年） 松赞干布出生。

619年（唐武德二年） 罽宾遣使入唐。

622年（武德五年） 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伊斯兰纪元开始。

626年（武德九年） 中天竺沙门波颇入长安。

627年（唐贞观元年） 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始西行。

628年（贞观二年） 玄奘离开高昌。

629年（贞观三年） 松赞干布任赞普。

630年（贞观四年） 玄奘抵那烂陀寺。穆罕默德征服麦加。

632年（贞观六年） 穆罕默德去世，阿拉伯“四大哈里发”时代到来。

634年（贞观八年） 松赞干布遣使提亲被拒。

635年（贞观九年） 景教进入中国，景教徒阿罗本到来。

638年（贞观十二年） 景教在长安义宁坊建立大秦寺。景教最兴盛时在中国上百座城市都有景教寺庙。

640年（贞观十四年） 戒日王见玄奘。阿拉伯帝国征服叙利亚。唐灭高昌。

641年（贞观十五年） 戒日王遣使长安。太宗命梁怀璥出使戒日帝国，吐蕃-尼婆罗道开通。唐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

643年（贞观十七年） 李义表、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李、王十二月至摩揭陀国。玄奘启程回国。

644年（贞观十八年） 三四月间玄奘抵于阗，上表太宗。

645年（贞观十九年） 正月初七玄奘抵长安。正月二十七李、王于王舍城登灵鹫山勒铭，二月十一日于摩揭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

646年（贞观二十年） 五月李、王使团回到国内。《大唐西域记》完成。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 王玄策、蒋师仁再使印度。王玄策讨伐阿罗那顺。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 五月王玄策献俘。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 沙门道生经吐蕃至印度。

650年（唐永徽元年） 玄照经吐蕃由文成公主送往印度。

651年（永徽二年） 阿拉伯帝国（大食）第一次向大唐派遣使者。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萨珊帝国。

652年（永徽三年） 唐蕃因为吐谷浑问题开战，之后吐蕃道逐渐关闭。

657年（唐显庆二年）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并于第二年在西藏吉隆

沟附近刻石，文字至今犹存。

约661年（唐龙朔元年） 阿拉伯帝国占据吐火罗地区。

671年（唐咸亨二年） 义净从广州出发去往印度。

673年（咸亨四年） 义净自室利佛逝至东印度。

684年（唐光宅元年） 外国人在广州杀死广州都督路元叡，制造了少有的中外冲突事件。

685年（唐垂拱元年） 已经返回室利佛逝居住、写作、译经。

689年（唐永昌元年） 义净自室利佛逝返广州，因经卷留在室利佛逝，十一月初一重返室利佛逝。

692年（唐天授三年、长寿元年） 义净返长安。

694年（唐延载元年） 摩尼教进入中国。

709年（唐景龙三年） 阿拉伯帝国夺取布哈拉。

710年（景龙四年、唐隆元年、景云元年） 阿拉伯人在此后四年进攻今天巴基斯坦信德地区。

712年（唐太极元年、延和元年、先天元年） 阿拉伯帝国夺取撒马尔罕。

713年（先天二年、开元元年） 阿拉伯帝国在这一年和下一年接近喀什噶尔，这是帝国到达的最远端。

727年（开元十五年） 新罗僧人慧超回到大唐，目睹了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势力。

738年（开元二十六年） 南诏统一六诏地区，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747年（唐天宝六载） 高仙芝征服小勃律，大唐影响力达到巅峰。

750年（天宝九载） 南诏国王阁罗凤与唐朝的云南太守张虔陀发生冲突，起兵反唐，击败唐军。

751年（天宝十载） 高仙芝兵败怛罗斯，大唐影响力高峰已过。杜环在战争中被阿拉伯人俘虏后，成了进入非洲第一人。

754年（天宝十三载） 剑南留后李宓帅军7万进攻南诏，在西洱河前全军覆没。

约760年（唐上元元年） 南诏进攻骠国，导致骠人衰落。

762年（唐宝应元年） 回鹘人皈依摩尼教。杜环从南海方向归国。

768年（唐大历三年） 摩尼教在长安建立了第一座寺庙大云光明寺，之后快速扩张到全国。

802年（唐贞元十八年） 真腊王子阇耶跋摩二世建立吴哥政权。

832年（唐太和六年） 南诏进攻骠国，俘虏3000人送往拓东城（昆明）。

849年（唐大中三年） 缅人建立了蒲甘城。

879年（唐乾符六年） 黄巢攻陷广州。

907年（唐天祐四年） 唐亡。广州节度使刘隐称王，建立南汉政权。曲颢占据安南，自称节度使，安南开始远离汉地控制。

938年（后晋天福三年） 安南实际控制者吴权击退并杀死了南汉太子刘弘操，获得了安南事实上的独立。

968年（北宋开宝元年） 安南丁朝建立。

971年（开宝四年） 北宋在广州设立市舶司。

980年（北宋太平兴国五年） 安南前黎朝建立。

981年（太平兴国六年） 王延德出使高昌。

987年（北宋雍熙四年） 最后的在华景教教士归国，景教在汉地消失，却在西域继续存在。北宋皇帝派遣8个内侍到海外招揽贸易。

999年（北宋咸平二年） 在杭州和明州设立市舶司。

1000年（咸平三年） 加兹尼王朝的国王马茂德进军印度，25年里发起了17场战役，并曾经占领了瞿折罗-波罗提诃罗的首都卡瑙季。

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 安南李朝建立，李朝维持了216年，彻底巩固了安南的独立性。

1031年（北宋天圣九年） 高丽在此前一直都遣使赴中国，但随着辽国的封锁，高丽此后43年一直与北宋断绝联系。

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 蒲甘国王阿奴律陀即位，蒲甘进入黄金时代。

1049年（北宋皇祐元年） 爪哇岛谏义里王朝建立，此前，爪哇岛上已经诞生过夏连特拉王朝（8世纪末到9世纪）、马打兰王国（8世纪到10世纪）。

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 高丽请求恢复联系，之后与北宋的联系港口从山东的登州转到了南方的明州。

1087年（北宋元祐二年） 在泉州设立市舶司。

1095年（北宋绍圣二年） 西欧开始兴起十字军东征。

1113年（北宋政和三年） 苏利耶跋摩二世登上吴哥王位，他和北宋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于三年后第一次朝贡。

1151年（南宋绍兴二十一年） 阿富汗的古尔王朝灭亡加兹尼王

朝，并开始进攻印度。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 阇耶跋摩七世登位，他击败占婆，建立了吴哥城，吴哥达到了顶峰。

1200年（南宋庆元六年） 吴哥最后一次朝贡。

1203年（南宋嘉泰三年） 第四次十字军两次攻陷君士坦丁堡。

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 库特卜-乌德-丁·艾巴克建立德里苏丹国。

1219年（蒙太祖十四年） 耶律楚材随蒙古人出征。

1221年（蒙太祖十六年） 长春真人丘处机到达中亚拜见成吉思汗。

1222年（南宋嘉定十五年） 爪哇岛新诃沙里王朝取代谏义里王朝。

1224年（嘉定十七年） 赵汝适担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其间写下名著《诸蕃志》。丘处机回到燕京。

1238年（南宋嘉熙二年） 蒙古第二次西征，打败俄罗斯人，建立了金帐汗国。泰国素可泰王国建立。

1241年（南宋淳祐元年） 蒙古人扫荡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

1245年（淳祐五年） 柏朗嘉宾从法国的里昂出发前往蒙古，成为早期进入蒙古的西欧人。

1246年（淳祐六年）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派遣弟弟仙拍德给贵由汗朝贺。

1247年（淳祐七年） 蒙古波斯地区首领宴只吉带派人出使法国国

王圣路易（路易九世），希望联合对付伊斯兰教。

1253年（南宋宝祐元年） 法国国王圣路易派遣鲁布鲁克出使蒙古，见证了蒙哥大汗的登基仪式。

1254年（宝祐二年）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前往蒙古朝贺蒙哥汗。

1258年（宝祐六年） 蒙古人旭烈兀攻克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灭亡。

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蒙元中统元年） 波罗兄弟从威尼斯出发，开始了前往亚洲的旅程。

1269年（南宋度宗咸淳五年） 波罗兄弟作为忽必烈的使者回到欧洲见教皇。

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 马可随父亲和叔叔上路，前往中国。

1275年（至元十二年） 马可到达元大都。

1278年（至元十五年） 中国的景教徒巴琐玛和马可斯前往耶路撒冷朝圣。

1281年（至元十八年） 马可斯被选为景教最高首领，改名雅八剌哈。

1282年（至元十九年） 伊尔汗阿八哈去世了，弟弟阿合马（贴古迭儿）继承汗位，采取了崇信伊斯兰教的做法。

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 阿鲁浑成为伊尔汗，扭转了前任的做法，联合基督教。巴琐玛出使西欧，成为第一个出使西欧的中国人。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 罗马教廷派意大利教士孟高维诺前往中国。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 孟高维诺到达泉州港。

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 波罗一家作为波斯汗国妃子的护送团队，经过东南亚海路去往波斯。蒙古入侵爪哇，新诃沙里王朝灭亡，满者伯夷王朝兴起。

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 孟高维诺抵达大都。

1295年（元元贞元年） 马可回到威尼斯。

1296年（元贞二年） 阿拉-乌德-丁登上德里苏丹国王位。周达观出使吴哥，历时一年半。

1299年（元大德三年） 此后八年，蒙古入侵印度，被阿拉-乌德-丁击败。孟高维诺在大都建立第一座教堂，六年后建立第二座。

1304年（大德八年） 完者都继承波斯汗国汗位，汗国完全伊斯兰化。杨枢从中国出发，前往霍尔木兹，来回五年。

1307年（大德十一年） 孟高维诺成为汗八里总主教，也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

1318年（元延祐五年） 鄂多立克从威尼斯出发开始全球旅行。

1321年（元至治元年） 鄂多立克到达印度。

约1322年（至治二年） 鄂多立克在随后六年在中国旅行。

1324年（元泰定元年） 伊本·白图泰从摩洛哥开始全球旅行。

1328年（泰定五年） 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

约1330年（元至顺元年） 汪大渊第一次出海，前往非洲海岸。

1333年（元元统元年） 伊本·白图泰进入印度。

1336年（元惠宗至元二年） 帖木儿出生。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约1337年（至元三年）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去往东洋。

1342年（元至正二年） 伊本·白图泰从印度出发前往中国。

1348年（至正八年） 伊本·白图泰回到大马士革，见证了蒙古人带去的瘟疫。

1350年（至正十年） 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建立。

1368年（明洪武元年） 明太祖派人到朝鲜赐印，次年朝鲜朝贡。安南入贡。

1369年（洪武二年） 广东人移民在陈祖义率领下，在苏门答腊岛旧港定居。

1370年（洪武三年） 督察御史张敬之和福建行省都司沈秩前往东南亚招人朝贡，两人强迫浡泥国朝贡。

1387年（洪武二十年） 帖木儿遣使进贡驼马，之后又接连三次进贡。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明朝派遣使节前往撒马尔罕，被扣留，两年后又派使团，再次被扣。

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 陈诚出使撒里畏兀儿。

1397年（洪武三十年） 陈诚出使越南。

1399年（明建文元年） 法国解君士坦丁堡之围，使得君士坦丁堡推迟了半个世纪陷落。

1401年（建文三年） 陈诚出使蒙古。

1403年（明永乐元年） 明成祖派遣尹庆前往南海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琐里、柯枝、古里等地。

1404年（永乐二年）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使者克拉维约到撒马尔罕

访问帖木儿，见到了中国使团。帖木儿入侵明朝。

1405年（永乐三年） 帖木儿死亡，入侵明朝失败。帖木儿孙子哈里登上王位。明成祖派人前往旧港招募中国人，次年旧港陈祖义和梁道明派人朝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于1407年回国。

1407年（永乐五年） 哈里放回明朝使节。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时，在旧港擒陈祖义。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在锡兰立碑，1409年回国。

1408年（永乐六年） 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来中国朝贡，死于南京，此后，渤泥国王还数次朝贡，1425年后断绝与中国关系。

1409年（永乐七年） 帖木儿帝国首领沙哈鲁遣使明朝，此后双方使节不断。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生擒锡兰山王，1411年回国。

1411年（永乐九年） 满剌加国王亲自朝贡。

1412年（永乐十年）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远达非洲，生擒苏门答剌伪王，1415年回国。

1413年（永乐十一年） 陈诚出使沙哈鲁，两年后回，写作了《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

1416年（永乐十四年）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远达非洲，1419年回国。

1417年（永乐十五年） 苏禄国三王朝贡，东王死于回程，埋葬在山东德州。苏禄国此后数次朝贡，于1423年后断绝与中国联系。

1418年（永乐十六年） 越南后黎朝建立。

1419年（永乐十七年） 沙哈鲁遣使中国，这次遣使产生了名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1421年（永乐十九年）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1422年回国。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 永乐帝去世，明朝外交政策从激进变成极端保守。郑和下西洋前被召回，任务取消。

1430年（明宣德五年）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1431年回国，下西洋至此终结。

1453年（明景泰四年） 君士坦丁堡陷落。

1486年（明成化二十二年） 缅甸东吁帝国建立，之后成为东南亚霸主。

1488年（明弘治元年）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好望角。

1492年（弘治五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1498年（弘治十一年） 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

1500年（弘治十三年） 葡萄牙卡布拉尔舰队去往印度，发现巴西和马达加斯加，炮轰了卡利卡特，在科钦建立贸易点。

1501年（弘治十四年） 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

1502年（弘治十五年） 达·伽马再往印度。金帐汗国分裂成三个小汗国。

1505年（弘治十八年） 葡萄牙控制非洲海岸。

1510年（明正德五年） 葡萄牙占领果阿。

1511年（正德六年） 葡萄牙攻克马六甲。

1513年（正德八年） 葡萄牙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

1515年（正德十年） 葡萄牙人攻克了霍尔木兹，控制了波斯湾。

1517年（正德十二年） 葡萄牙遣使中国。

1519年（正德十四年） 麦哲伦开始全球航行。

1520年（正德十五年） 土耳其最强大的君主苏莱曼大帝登上了苏丹之位，奥斯曼帝国达到顶峰。

1521年（正德十六年） 中葡海战。

1524年（明嘉靖三年） 葡萄牙大使皮列士死于广州监狱。

1526年（嘉靖五年） 巴布尔在印度北部和阿富汗建立莫卧儿王朝。

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 葡萄牙发现日本。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 浙江强硬派巡抚朱纨上任。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 朱纨由于在对外政策上滥杀无辜，被迫自杀，他死后明朝海禁略微松弛。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 传教士沙勿略进入中国失败，死于上川岛。此后数年，俄罗斯征服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 葡萄牙获得在上川岛登岛的权力。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葡萄牙人在澳门建造教堂，将澳门占据。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 英国人詹金森经过俄罗斯出访中亚。

1567年（明隆庆元年） 隆庆开关，允许人民出海贸易。

1571年（隆庆五年）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吕宋，在马尼拉设立了殖民地。

1574年（明万历二年） 海盗头子林凤进入吕宋。下一年西班牙帮助明政府抓林凤失败，未获得贸易权。

1578年（万历六年） 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奥法罗试图混入广州

城，失败。

1579年（万历七年） 那不勒斯人罗明坚成为耶稣会澳门教区负责人。

1583年（万历十一年） 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获得立足点，天主教在明代首入中国。

1592年（万历二十年） 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 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汗国。

1601年（万历二十八年） 利玛窦被允许在北京传教。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 鄂本笃从印度走陆路到达叶尔羌，证明“契丹”和“蛮子”是一个国家。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 荷兰人占据澎湖，后被驱逐。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 利玛窦在北京去世。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 南京吏部侍郎沈淮请求皇帝驱赶传教士，获得批准。

1621年（明天启元年） 荷兰人占据台湾。传教士再次被允许在中国居住。

1628年（明崇祯元年） 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建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形成了一条横贯西伯利亚，通过叶尼塞河、安加拉河、贝加尔湖、色楞格河把北冰洋和蒙古边境连接起来的水路大干线。

1631年（崇祯四年） 俄罗斯建立极北城市雅库茨克。

1644年（清顺治元年） 清军入关。汤若望投靠清政府。俄罗斯人到达黑龙江支流结雅河上游地带。

1650年（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 明王朝最后的皇太后王氏写

信向欧洲教皇求救。

1651年（顺治八年） 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建立阿尔巴津，即雅克萨。

1654年（顺治十一年） 澳门青年郑玛诺在传教士卫匡国的带领下去欧洲学习，十余年后回国在北京当教士，1673年去世。

1664年（清康熙三年） 杨光先攻击传教士，导致汤若望等人被囚。

1681年（康熙二十年） 传教士柏应理带了两个青年前往欧洲。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雅克萨之战，以签订《尼布楚条约》（俄罗斯人称之为《涅尔琴斯克条约》）为结果。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乌兰布通之战，清朝击败噶尔丹。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 教皇使节铎罗抵达中国，经过多轮会见，与皇帝不欢而散。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 康熙帝向罗马派遣使者，四个西洋教士充当使节，其中艾若瑟带了一位叫作樊守义的中国人一同前往，后者于1719年回国后，写了一本《身见录》。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 俄罗斯人别科维奇远征希瓦汗国，全军覆没。

1723年（清雍正元年） 传教士马国贤返欧，带五个中国少年出国。

1724年（雍正二年） 雍正帝立刻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1732年（雍正十年） 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圣家书院，专门培养中国教士（兼收土耳其、希腊学生）。

1743年（清乾隆八年） 俄罗斯人建立奥伦堡，获得了对中亚发起进攻的基地。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清政府击败位于新疆本部的准噶尔人，获得整个新疆的控制权。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越南的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创立者阮福映在嘉定称王，1802年自称皇帝。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谢清高在海上遇难，被外国船只救起，环游世界，后写《海录》一书。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俄罗斯征服克里米亚汗国。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阮朝国王阮福映派太子阮福景访问巴黎寻求帮助。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一无所获。

1802年（清嘉庆七年） 越南闭关。

1805年（嘉庆十年） 俄国戈洛夫金使团进入蒙古，后因为不肯磕头，被赶走。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 英国人阿美士德使团在中国一无所获。

1824年（清道光四年） 缅英战争爆发，英国人用60多年时间，分三次战争并吞缅甸。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中英战争爆发。

后记

1

我把每一本书的后记当成展示情感的舞台。这一次要谈的题目是友谊。

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是一个“拧巴”的作者，没有按照传统的规矩长起来，不出身于文学和历史专业，而是学习理工出身。到2006年时，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人士，曾经学习过机电，后来则是做软件，但在那一年，我却走入了死胡同。

我一直想写作，却一个圈内人也不认识，甚至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说我喜欢写作，结果把自己逼得差点得了抑郁症，找不到任何出路，感到绝望。

那时候相信我有写作天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他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却无法提供帮助；另一个是我的同学文学锋（文子）。那时候，不管我写了什么，都会给文子看。在学校时他就是著名的才子，而我却一直不学无术。可是，在毕业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无条件地相信我的写作才能。那时我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只有两位读者，父亲和文子。文子给我的每一篇文章写评论，不在意我没有读者，也不敢把作品给其他人看。

直到最后，就算在文子面前我也装不下去了，我已经接近崩溃、认

命了，甚至都不再相信自己的天赋，只想把这一生混过去。我想跟文子承认，我已经放弃了，但面对他时我说不出口，因为他还在认真地评价我的每一篇文字，逼着我演下去。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真的相信，还是在逼迫我继续努力。但我不敢问他，我不想让他失望。

最后，他似乎也发现我进了死胡同，劝我去找一份和文字相关的工作慢慢尝试。可是我找不到，也不认识人，真的一个人也不认识。文子想把我介绍给某报纸的编辑，让我写点评论，可实际上我写不出来。但我又不能这么说，只能找别的借口拒绝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实在没办法了，文子才将我推荐给他的导师：中山大学的鞠实儿教授。在文子的鼎力推荐下，教授决定给我一个机会，将我“转手”给他的另一个学生、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的编辑戴志勇，戴志勇再转手一道，将我推荐给报纸的科技版主编卢爱芳。

就这样，完全没有文字工作背景的我摇身一变，进了全国最好的财经类报纸。

10年后，当我再见到《21世纪经济报道》前主编刘晖时，他提到了当年决定招我的过程。我才知道，到底要不要我，曾经在报纸的产业经济版（科技是产经的子版块）掀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实在没有看到我有任何文字工作背景，但最后担任负责人的刘晖却决定给我机会：因为只有让一个人尝试，才知道他适不适合。

《21世纪经济报道》多年来一直秉持丛林原则，它给了许多“拧巴”人机会，体育生、医生、程序员、爆破员等都能得到机会进入这家最好的报纸，在这里得到锻炼。然而它又是严酷的，对于不合格的人就坚决淘汰，哪怕是科班出身，也不管靠什么关系进来的，只要不合格都一样赶走了事。

到了报社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浅薄，一篇合格的稿子都写不出来。那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让文子看不起，于是咬牙坚持着，前几个月常常在办公室睡到天亮，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一遍遍改，又一遍遍被编辑骂。

到了转正的那天，我终于有了第一个文字工作者身份——记者。这不仅是一个身份，还意味着巨大的锻炼和学习机会，使得我学会了对文字的敏感、对读者的尊重，以及谋篇布局的考究。

但我从来没敢去问文子，当初他凭什么这么相信我，特别是在我自己都已经暗中放弃了的时候。信任，即便对于现代人也是一个略带玄学的问题，为什么你会信任这个人，却拒绝了另一个？我担心一旦问出这个问题，他会给出一个非常普通的答案，我宁肯相信他的信任是那么伟大，让我明白了相信自己的朋友是多么重要。

好朋友的标准，不仅是生死场上的两肋插刀，还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都坚定地相信你，甚至比你自己都相信你，并在最关键的时刻，提供给你展示才华的机会。

也正因为《21世纪经济报道》给我的机会，我绝对相信刘晖和出版人沈颢，相信他们的清白、担当和勇气。

2

我从这份报纸离职后，仍然追寻着我的写作梦。但这时我却发现新闻写作和书籍写作还是有区隔的，我有了记者的身份，但仍然不认识出版圈的人。于是，又有一群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我没有收入的时候，好友周杭君常常以各种名义给我送东西，既不让我感到难堪，又让我能够接受。她向我传达的信息也是：因为相信一个人的才华，才会提供帮助。直到现在我已经不再缺钱，但还是会收到她的“物质关怀”。

当时的网易科技主编帅科听说我离职了，二话不说让我隔三岔五帮他写稿子，给稿费又不用坐班，于是我有了一份糊口的活计。现在，帅科已经成了一家估值数百亿人民币的科技公司的元老，他也是一个肯于拼搏的人，到了收获的季节。

在众多的人中，有两个人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在我联系不到出版社，也缺乏作品的时候，我的前同事谷重庆正在为台湾前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戴立宁写传记，为了给我认识出版社的机会，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写作，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本书《一以贯之》（合著），我习惯上称之为“戴立宁传”。靠着这本书，我结识了位于杭州的蓝狮子出版公司的副主编王留全，我最初的几本书都是在他那儿出版的。

在没有名气的时候，出书并不赚钱，不得不靠做影子写手赚钱，又是谷重庆将他最重要的关系介绍给我，让我获得一定的收入坚持下去。

我最怀念的时光之一，就是那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要去谷重庆的家里，他的妻子李超给我们做着精美的晚餐，我们则商谈着写作的规划。那段时间虽然辛苦，却由于有他们，我体会到了一种家庭温暖。

几本书之后，我决定将出版关系迁到北京。我的朋友秦旭东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离开杭州之后的第一本书放在了中信出版社出版。

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能体会到他的关心。秦旭东的帮助是全方位的，他曾经数次帮我卖过稿子，在出版之前先在杂志或者网络上发表，获得足够的收入，在出版成书之前，我的创作成本和生活费都已经有了保障。当我的新书需要推荐人的时候，也是他奋力地帮忙联系推荐人。由于当记者的时间很长，他的圈子简直涵盖了中国最有理想的那批新闻人，而他将这些人完全开放给我，让我尽情地糟蹋。

在秦旭东的帮助下，我从一个没有信心的叫花子慢慢被包装成一个

颇具自信的写作者，这种心态的调整，和他的帮助有很大关系。

我也同样不知道谷重庆和秦旭东为什么这样帮助我，我能想到的，也许只是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当你表现出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时，总会有人愿意无私地相信你、帮助你。不管是对文学锋，还是对谷重庆、秦旭东，我都没有任何办法进行物质上的回报，唯一可能的，就是在每一本书的书后，都写上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也想通过我的经历，向读者传达一种信念：只要你在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并坚持下去，到最后，总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愿意提供帮助。吸引他们的不是你能带来多少回报，而是他们看到了你的理想，并愿意帮助你发光。

3

《丝绸之路大历史》是一本综合的作品。之前，我的作品大都分成了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研究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为此我走访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我认为，除欧美之外，中国人对世界其余部分并不了解，比如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下一个梯度的印度，以及中国的近邻东南亚、中亚、蒙古，加之更遥远的中东、非洲。当我访问过这些地方，惊奇地发现，它们恰好就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区。

第二条线是研究现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为此，我从财政、统治思想和军事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解读。

当两条线的研究做完之后，一个现成的题目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在中国古代，人们是如何认知世界的，这既牵扯到世界，也和历史有关。

如果没有走遍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那么研究这个题目是不够深入的，只有看到世界的多样化，并了解了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站在当年的废墟之上，才能更加深刻地去看它们和古代中国的互动。

中国是一个史料丰富的国家，在对外交往方面的史料虽然不如内政丰富，但仍然是外交史料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因此，要写这样的书，也必须将和丝绸之路有关的古籍通读之后，才能写出来。

去过相关国家，通读相关古籍，是两个并行的要素，恰好我都已经接近完成，因此，这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此外，在我的规划中，本书也是另一个三部曲（丝绸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

《丝绸之路大历史》以写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以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为主，这部书现在已经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第二部中，我将以“剩余的世界”为题，主要写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状况，以及探讨它们的近现代史，它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当人们言必称欧美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欧洲之外，剩余的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大都受到过殖民统治，现在又都独立了，却又伤痕累累，带着各种问题。这部书是我周游一带一路国家的总结之作，之前，我曾经写过六本观察性记录，分为“亚洲三部曲”和“穿越三部曲”，其中五本已经顺利出版，“穿越三部曲”中的一本（《穿越劫后中亚》）则由于某些原因折戟沉沙。“剩余的世界”不是一个新的题目，而是对我过去观察的总结，也希望读者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看到我观察的视角。

至于本系列的第三部，也是最艰难的一部，我想写中国人在海外的闯荡，因此书名暂定为“龙的闯荡”。当在海外旅行时，我最感慨的还是勤劳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打拼，随着中国开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涉足世界性贸易，然而他们当年都经历过极端的艰难。因此，如果说丝绸之路，那一定离不开叙述中国人的海外事迹。从目前来说，或许我是

最有条件写这样作品的人，但是，必须承认，我到现在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材料，也许必须等我写完第二部，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主题的搜集。至于写作和出版周期，现在还不能预期。

4

除上面提到的朋友之外，我还想对以下朋友表达感激之情：

生活中的朋友：沈碧芸、李岷、洪波、张蕊、屈波、卓巧丽、张赋宇、王力、黄一琨。

工作上的朋友：董曦阳、雷戎、李杰、陈德、刘浩冰、李博、赵娜、张根长、李栋、王宏丹。

对我有帮助的同道：林达、羽戈、王小明、*烈山。

以及我的妻子梦舞君，我的父母郭连生、张桂琴。

我要特别感谢长期合作的插画师张菀蕾、责任印制董建臣和封面设计师刘军，我近几年出版的书在装帧效果上有赖于你们专业认真的工作，并为书籍本身添彩不少。

在我一生中，对我性格的塑造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父母郭保成、李玉萍。他们在做人上对我严格要求，在兴趣上却永远支持我的选择，不施加任何的压力。他们给了我最自由的童年，陪伴我直到成人，但在我上大学之后不到半年就相继去世。他们离开时，我没有守在身边。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也是我此生最愧对的人。

本书草稿、初稿、终稿作于大理风吼居，最后修改时，恰值2020年COVID-2019病毒肆虐之时。

参考书目

在正史中，大都有《西域传》等专传记载海外与中国的交往史。

在编年类史书中，也往往会列出中外交往情况。

根据正史和编年类史书改编的纪事本末体，也含有部分外交材料和外国地理情况。

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会要类书籍以及以《通典》《通考》为代表的政书中，大都有关于四夷的专章。

在部分中国地理书籍中，也将西域、南蛮和东夷群体包括在内。

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古代的佛教典籍和佛教记载，由于僧人是最活跃的古代旅行家，他们的见闻也构成了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

此外，外国人的见闻和回忆录则弥补了部分中文文献的不足。唐代同期的阿拉伯世界崛起，给我们带来了一批优秀的国外作者的史地作品。元代之后西方的复苏和崛起，使得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记载在数量上超越了中国的史料。

在写前几本书时，我刻意避免参考现代人的作品，并拒绝使用他们现成的观点，将参考书的年代大都截至民国以前，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将一些僵硬的史观带入我的作品之中。但在写本书时，由于现代人研究成

果的丰富性，我不可能不使用现代文献，特别是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余太山等人的译著或者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了丝路研究绕不过去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和政书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6

［南朝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96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97

［唐］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

［唐］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97

［唐］李延寿. 南史.中华书局，1975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

［元］脱脱等. 宋史.中华书局，1985

［元］脱脱等. 辽史.中华书局，1974

［元］脱脱等. 金史.中华书局，1975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

［民国］柯劭忞.新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民国］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

［清］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

［清］官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中华书局，2008

［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清］韩善徵.蒙古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王贵民，杨志清.春秋会要.中华书局，2009

杨宽，吴浩坤.战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孙楷.秦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朱铭盘.南朝宋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朱铭盘.南朝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朱铭盘.南朝梁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陈述，朱子方.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2016
［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
［宋］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2016
［唐］李泰.括地志.中华书局，1980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8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清］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清］顾炎武. 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郭院林主编.清代新疆政务丛书.凤凰出版社，2019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中国古代地方史籍

［唐］樊绰.蛮书校注.向达校注.中华书局，2018

［元］佚名.元朝秘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元］佚名.圣武亲征录.中华书局，2019

［元代西藏］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元代西藏］蔡巴·贡噶多吉.红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明代蒙古］佚名.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明代中亚］米尔咱·海达尔.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清］阿桂等.满洲源流考.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清代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清代西藏］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吴彦勤校注.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王叔武编.云南古佚书钞合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李拂一编译.泐史·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中国古代地理笔记

［先秦］佚名.山海经笺疏.中华书局，2019

［先秦］佚名.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中华书局，2019

［汉］刘歆.西京杂记.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晋］张华.博物志.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3

［唐］杜环.杜环经行记.见：海录（附三种）.岳麓书社，2016

［宋］赵汝适.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

［宋］孟珙.蒙鞑备录笺注.见：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中华书局，2019

［宋］彭大雅.黑鞑事略笺注.见：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中华书局，2019

［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

［元］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

［元］周致中.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元］王恽.中堂事记.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元］刘郁.西使记.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元］徐善明.安南行记.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元］萧泰登.使交录.见：金元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元］巴琐玛.西行记.见：海录（附三种）.岳麓书社，2016

［元］佚名.回回药方考释.中华书局，2000

［元］张德辉.塞北纪程.见：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中华书局，2019

［元］朱德润.异域说.见：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中华书局，2019

［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华文出版社，2017

［明］马欢.瀛涯胜览校注.华文出版社，2019

［明］费信.星槎胜览校注.华文出版社，2019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

［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2000

［明］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

［明］罗日聚.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中华书局，2017

［明］李言恭，郝杰同.日本考.中华书局，1983

［清］樊守义.樊守义身见录.见：海录（附三种）.岳麓书社，2016

［清］谢清高.谢清高海录.见：海录（附三种）.岳麓书社，2016

［清］大汕.海外纪事.中华书局，1987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

［清］徐松.西域水道记.见：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

［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见：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

［清］徐松.新疆赋.见：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

［清］和宁.回疆通志.中华书局，2018

［清］和瑛.西藏赋笺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韩琦，吴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钦命传教约述·正教奉褒.中华书局，2006

［清］张喜.抚夷日记.南京出版社，2018

［清］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中国古代佛教典籍

［晋］法显.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南朝梁］宝唱.比丘尼传校注.中华书局，2006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国书店，2018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

［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

［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

［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中华书局，2018

［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2000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

［唐代新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华书局，2006

［唐］道宣.续高僧传.中国书店，2018

［唐］道宣.广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唐］道世.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国书店，2018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校注.中华书局，2015

［宋］志磐.佛祖统纪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宋］正受.嘉泰普灯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宋］普济.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

［明］如惺.大明高僧传.中国书店，2018

［清］彭绍升.居士传校注.中华书局，2014

外国丝绸之路相关历史典籍、回忆录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

［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79

［古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人民出版社，2013

［阿拉伯］苏莱曼.苏莱曼东游记.刘半农，刘小蕙译.华文出版社，2016

［阿拉伯］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新译本）.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局，2001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华文出版社，2017

［阿拉伯］艾布·法尔吉·古达玛·本·贾法尔.道里邦国志（附税册）.宋岘译.华文出版社，2017

［波斯］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

［波斯］尼扎姆·莫尔克.治国策.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13

［波斯］火者·盖耶速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9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04

［叶尔羌汗国］沙-马赫穆德·楚剌斯.编年史.魏良弢，万雪玉译.商务印书馆，2018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华文出版社，2015

［亚美尼亚］乞拉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9

［西］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杨兆钧译.商务印书馆，1982

［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

［西］艾斯加兰蒂.中华帝国概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

［西］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8

何高济编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3

何高济编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2019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2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2012

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2013

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2017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2010

［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文铮译.商务印书馆，2018

［意］卫匡国.鞑靼战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8

［意］柏朗嘉宾.柏朗嘉宾蒙古纪行.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

［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9

［法］鲁布鲁克的威廉.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13

［法］加略利.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谢海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比］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8

［德］阿尔伯特.耶路撒冷史.王向鹏译.大象出版社，2014

［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吉林出版社，2011

［英］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席文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英］艾尼斯·安德逊.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费振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英］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钱丽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里.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

［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商务印书馆，2013

［英］奥雷尔·斯坦因.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张嘉妹译.中西书局，2016

［英］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商务印书馆，2013

［英］奥雷尔·斯坦因.斯坦因西域游历.方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俄］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83

［印度］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商务印书馆，1997

［越南］黎文休，范孚先，吴士连，范公著，黎僖等.大越史记全书.人民出版社，2016

［缅］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道加彬大法师，摩诃达马丁坚，吴耀

等.琉璃宫史.李谋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广陵书社，2010

［新罗］崔致远.崔致远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外国丝绸之路相关研究

［法］勒内·格鲁塞.东方的文明.常任侠，袁音译.商务印书馆，2017

［法］勒内·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

［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1

［法］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剌古国考.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法］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远东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

［法］布哇.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法］沙畹等.大月氏都城考.冯承钧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法］伯希和等.蒙哥.冯承钧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法］列维等.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8

［法］葛乐耐.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毛铭译.漓江出版社，2016

［法］赛代斯.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蔡华，杨保筠译.商务印书馆，2018

［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英］巴克尔.鞑靼千年史. 向达，黄静渊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英］斯特兰奇.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韩中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英］杰文斯.富国养民策.西学启蒙两种.岳麓书社，2016

［英］罗杰·克劳斯.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李申，王遵仲，张毅译.中华书局，2004

［英］穆尔.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

［英］拉乌尔·麦克劳克林.罗马帝国与丝绸之路.周云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德］夏德.大秦国全录. 朱杰勤译.大象出版社，2009

［俄］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一卷（1803—1807）.徐昌翰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俄］巴透尔德.七河史. 赵俪生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 张草纫，浦允南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俄］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 梁园东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俄］马尔夏克.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毛铭译.漓江出版社，2016

［苏］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美］丁韪良.西学考略（附二种） 岳麓书社，2016

［意］毕达克.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沈卫荣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意］康马泰.唐风吹拂撒马尔罕.毛铭译.漓江出版社，2016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比］南怀仁.坤舆图说：［美］丁韪良.西学考略（附二种） 岳麓书社，2016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周云龙等译.人民出版社，2013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美］艾约瑟.西学略述：西学启蒙两种.岳麓书社，2016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15

［美］帕克.匈奴史.向达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美］乐仲迪.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毛铭译.漓江出版社，2017

［美］柏理安.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毛瑞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

［美］白桂思.丝绸之路上的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付马译.中信出版社，2020

［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吴小安、孙来臣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 傅勤家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日］小谷仲男.大月氏——寻找中亚谜一样的民族.王仲涛译.商务印书馆，2017

［朝鲜］李能和.朝鲜道教史.孙亦平译.齐鲁书社，2016

［越］黎崱.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1995

［埃及］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忠等译.商务印书馆，2019

［乌兹别克斯坦］瑞德维拉扎.张骞探险之地.高原译.漓江出版社，2017

［印］辛加尔.印度与世界文明.庄万友译.商务印书馆，2019

［印］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张澍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芮传明等译.中译出版社，2017

中国现代丝绸之路相关研究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华文出版社，2018

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

冯承钧.冯承钧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冯承钧.冯承钧学术著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冯承钧.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

余太山，李锦绣.丝瓷之路1—6.商务印书馆，2011，2012，2013，2014，2016，2017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

余太山.古族新考.商务印书馆，2012

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

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余太山.嚈哒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

林幹.匈奴史料汇编.商务印书馆，2017

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商务印书馆，2017

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2017

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2017

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3

汤开建.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商务印书馆，2013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

杨铭.氐族史.商务印书馆，2017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陈戈.新疆考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7

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17

孟凡人.尼雅遗址与于阗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

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

马世长.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史地丛考：以唐代文献为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2015

蓝琪.中亚史.商务印书馆，2018

蔡铁鹰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2

洪勇明.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考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

中国文学类书籍

［晋］王嘉.拾遗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唐］佚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2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13

［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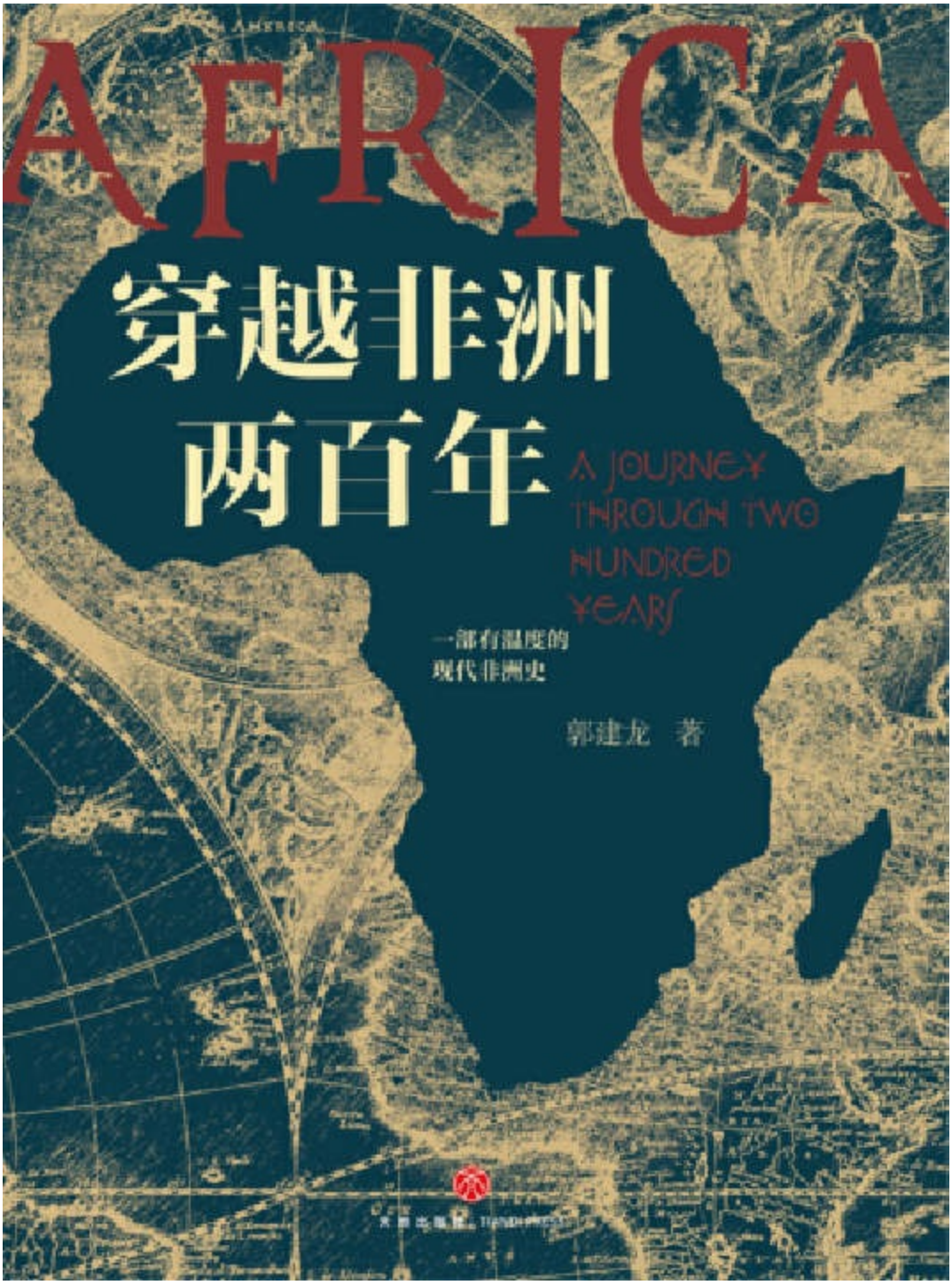
［明］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1994

［清］曹雪芹.红楼梦.岳麓书社，1999

［清］李汝珍.镜花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清］张星曜.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齐鲁书社，2016

［清］碧荷馆主人.新纪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AFRICA
穿越非洲
两百年
A JOURNEY
THROUGH TWO
HUNDRED
YEARS
一部有温度的
现代非洲史
郭建龙 著

版权信息

书名：穿越非洲两百年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ISBN：978754555391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序言 非洲已到发展的大门口
殖民体制结束：熬过尝试期
非洲已经进入发展期
非洲与中国是互惠的
我们了解非洲吗？
引子 通往世界边缘的非洲之船
你将成为廷巴克图唯一的外国人
慢船通往黄金之都
贫穷之船
来自北方的马依噶
疾病之船
战乱中的航船
穿越非洲两百年
第一章 基督文明在非洲
雅各布：当社会养活不了人民
所罗门后代保佑埃塞俄比亚
基督教的非洲
第二章 穆斯林的非洲世界
半个非洲属于穆斯林
马格里布：曾经的绿色威胁
萨赫勒：越过撒哈拉
东非：有种文明叫斯瓦希里
第三章 欧洲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动荡
“2C”与“2S”的竞争
不平衡的新秩序
“回到非洲”运动
第四章 独立了：烟花之下，问题重重
谁是恩克鲁玛？
“日不落帝国”解体了
法兰西帝国的“器官”们
卢蒙巴：第一位殉道者
南部非洲的僵局
第五章 第一代的梦想家

加纳的“传道士”下台了
伟大导师的乌托邦
那一条沟通亚非的铁路
肯尼亚：永远混乱，永远增长
西非的现实主义者
“泛上校”的大联合
第六章 利维坦狂欢
苏格兰国王和奥斯卡影帝
博卡萨：“中非的拿破仑”
赤道几内亚：石油成为救世主
民主明灯换不来经济发展
第七章 第二代领导人的试验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门格斯图的实验室
桑卡拉：非洲的切·格瓦拉
第八章 最残酷的兄弟战争
索马里：散架的国家
卢旺达：兄弟民族的冤冤相报
蒙博托和卡比拉
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
超级大国的内战旋涡
第九章 新一代的务实派
约韦里大叔喊你去投票
卡加梅：和解的智慧
独立是好的选择吗？
西非：艰难的政党轮替
第十章 白人的天堂结束了
世界英雄穆加贝
逼上梁山的穆大叔
最后的白人堡垒
南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第十一章 革命后的北非
自由的小贩，追求尊严的小贩
北非强人倒台了
力挽狂澜的四重奏
撒哈拉的恐怖分子之家
第十二章 缓慢形成的非洲之核

第二个肯雅塔和变魔术的中国人
瑙莱坞和尼日利亚黑帮
尾声 最后一次冒险
大事年表

提到非洲总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我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我认为非洲是整个世界良知上的一块伤疤。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序言
非洲已到发展的大门口

由于我曾对非洲进行过考察，人们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在谈到非洲时，讲述了太多的混乱与落后，那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们对于非洲的投资和帮助是有意义的吗？

我的回答出乎他们的意料：那些说法大都是真的，但它们只代表了非洲刚刚过去的一个阶段，而如今非洲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的大门口。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总是滞后十几年的时间。最早面对这个问题的国家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已经变得富裕，但世界以为它还停留在二战的水平；到了80年代末，世界才终于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国。同样地，十年前人们以为中国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谈起中国还认为它是一个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人都很贫穷的国家，但十年后的现在，一些人可能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实力。

对于非洲，世界（包括我们）的认知也是落后的。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世界首先表现出欢欣鼓舞，甚至幻想它们一夜之间就会走向繁荣。然而事实却是冷冰冰的，非洲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立刻取得发展，反而进入了衰退和混乱。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对于非洲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特别是卢旺达大屠杀和刚果内战之后，

许多人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但事实上，非洲的整体情况却开始出现好转，社会的稳定度也提高了。许多国家已经成功克服了最初的混乱，进入了发展时期，只是这时的世界还没有反应过来罢了。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那些关于非洲混乱的说法是真的，即便现在许多地区还不时发生冲突，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却已经显现出有生机的一面。

客观地说，因为整个大陆都是从殖民地转化而来，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各种不均衡必然导致新独立的国家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大多需要数十年时间去克服。非洲人的问题更多是殖民体制造成的，这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至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帮助，当一些人还在探讨意义时，事实上，那些已经嗅到了机会的商人却早已做出了选择。我在非洲碰到了大量的中国商人，他们虽然有不少来自国企，但更加灵活的私企也早已在非洲布局。他们出现在非洲的各个行业，除采矿、建筑等传统工业之外，甚至连农业领域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比如，我就碰到过到赞比亚去租地的中国人，由于土地便宜，完全可以利用非洲的土地来缓解国内土地缺乏的状况。非洲的面积是中国的三倍，但人口却比中国还少，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土地和资源都还没有达到最大产能，聪明的商人早已先于我这样笨拙的研究者做出了选择。

殖民体制结束：熬过尝试期

非洲为什么会经历几十年的混乱？答案要追溯到非洲独立之初。

在世界范围内，如同中国这样自古以来就有统一传统和统一意识的国家只是少数，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是分裂时间远长于统一时间。这一点，在非洲反映得尤其明显。

在非洲地区，除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这四个国家一直以来有着统一的传统之外，其余国家的疆界都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才形成的。

以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为例，在古代它实际上存在着数百个部落和民族，以及许多种宗教，北方是穆斯林区域，南方是原始信仰区域。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尼日利亚的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们之间虽然有着贸易关系，却从来没有在一个国家框架之下生活过。

直到欧洲人来后，他们才在漫长的殖民过程中，将尼日利亚诸多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部落整合起来。但在整合还没有完成，政治机构还不稳定时，尼日利亚就在国际形势下匆忙地完成了独立。在这种情况之下，诸多的民族如何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如何保证？国家与民族、民族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协调？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摩擦时期。这种摩擦时而表现为在宪法框架之下的争斗，但有时也会演化成更加激烈的战争形式。只有在摩擦中，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虽然这看上去残酷，却是非洲许多国家真实的命运。

可以说，非洲人最初几十年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是

在殖民时期就已经被决定了。从一定程度上说，那混乱的年代是他们学着自己掌握命运的过程。

由于在殖民期间，非洲存在不同的宗主国，每一个国家整合的难易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其中英国人将每一个殖民地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允许它们拥有独立的议会机构和经济形态。这样，独立之后的这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就可能遭受较少的颠簸。而法国人将每一个殖民地看成只是法兰西帝国的一个“器官”，它们没有权利独立生长，只能在帝国框架之内被指定发展某些门类，有的只种花生，有的只种可可。这些“器官”被设计成要依附于帝国，因此当它们争取到政治独立之后，要想真正达到经济独立，付出的代价就要更加巨大。至于比利时人所留下的烂摊子更是无解，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刚果的内战，都要追溯到比利时人的统治。

当我们看到非洲的混乱时，不能不想到这种混乱背后的真实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非洲只是一个受害者，它不得不忍受数十年的颠簸。

在我写的书里，我并没有回避非洲的混乱，但又要不时地提醒读者，几十年后的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稳定性已经得到了加强，进入了建设时期。这可以避免读者犯本文开头的错误，而能将非洲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地区。

非洲的混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领导人的雄心勃勃所带来的问题。当一个新国家建立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首先应该有的不是雄心壮志，而是尽量少骚扰民间，让民间经济得以自由发展。但独立之后的领导人往往采取大包大揽的经济政策，插手过多，希望通过政府的控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建立了一系列低效的政府企业，从而造成了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

第二种是领导人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过分地使用了武力，从而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程度，最终出现了脆断的情况。

第三种是各地区或者各民族之间，因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引起了社会的分崩离析。

本书将这些状况都做了梳理，另外也仔细分析了混乱的原因，希望通过我的实际观察能让读者明白，长期以来非洲的命运并不是由其自身掌控的，而是受外界驱动的。

另外，人们感觉非洲冲突频发的另一个原因是非洲国家众多。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实在每一个时期，发生战乱的国家都是少数，大部分国家都处于较为平静的状态。但由于国家数量太多，而外界又不去区分具体的国家，只是将它们笼统当作非洲这个整体，于是，不管哪一个国家发生了问题，人们都以为是非洲整体发生了问题，长此以往，就好像非洲天天在打仗。事实上，在任何时段，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平静的。

即便到现在，非洲的冲突还是时有发生，但事实上，不管是它的频度还是烈度，都已经呈下降趋势。从这个角度看，非洲已经逐渐熬过了独立之后的余震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发展期。发展这个词，已经代替了混乱，成了非洲的关键词。

非洲已经进入发展期

21世纪的到来，意味着非洲最混乱时期的结束。卢旺达种族屠杀曾经被认为是非洲混乱的顶峰，但是屠杀发生的二十年后，卢旺达已经成了整个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经过了种族屠杀的卢旺达人摆脱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种族梦魇，新总统卡加梅也意识到，种族冲突虽然是个社会问题，但根子上还是个经济问题。只有经济大发展，才能让人民摆脱对于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愤怒，抛弃掉为了生存而引发的焦虑，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

卡加梅是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提倡者，他带领的卢旺达也走出了一条相似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卢旺达首都中心地区已经高楼林立，进入了建设时期。当初的流亡者已在国外生根发芽，积累了资金和技术，现在大都回到了国内参与建设。于是，这个曾经不稳定的火药桶，现在成了地区的稳定剂之一。

和卡加梅类似的新型领导人在非洲也形成了规模，世界也给了他们新的名号：新一代。

事实上，他们已经是第三代领导人。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由于知识结构有缺陷，虽然可以带领人民闹革命，却不懂得搞建设，导致非洲社会生活出现了衰退。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军人出身，受到的教育更少，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第三代领导人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于非洲问题也就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正是在这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非洲艰难地度过了独立初期，进入

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这一代领导人也是最务实的，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试图什么都做，他们大都将目光投在了发展问题上。他们得出结论，要想让非洲迅速同时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阶段，精力更多要放在经济上。只有经济好了，人们才会对国家产生足够的向心力，不再分崩离析，只有到那时，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民主、自由，才有建立的基础。

这一代领导人大多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但又暂时软性冻结了这个制度。由于他们大都曾经力挽狂澜将国家从混乱中救出，国家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如果离开了他们的领导，国家可能再次陷入一定程度的争夺和混乱。正因为这样，延长他们的任期有很强的群众基础。

但这也蕴藏着新的风险，即他们死亡之后如何结束这种软性冻结。也许国家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的答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度过，但有的国家或许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混乱程度在降低，恶性事件发生的概率比以前小多了。

我去观察非洲时，发现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虽然腐败、抢劫、盗窃、暴力时有发生，但大部分人已经有了安全的感觉，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稳定了。

在这种稳定之下，社会开始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中国的手机、电器、工业品都已经遍布了非洲市场。在土耳其、摩洛哥、印度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甚至中国，都有着大批的非洲人存在，他们大都是去做生意的商人。在广州，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我曾经遇到了几家进货的非洲人，他们穿着从中国购买的服装，对我倾诉着他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已经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加工业，而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则以商业立国。卢旺达这样的国家甚至想在高科

技上做文章，抢占非洲的信息高地。

如果要从世界经济的梯度转移来考虑，非洲仍然处于最底层。二战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在逐渐转移的，在那些后进国家和地区中，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日本。当日本发展已经定局，世界经济的梯度随即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作为下一个梯度接力了最近二十多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接下来，印度也进入了这一梯度，与东南亚一起开始接纳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能。非洲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还无法与印度竞争，其发展虽已启动，但也许要等到二十年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才会更加显现。

之所以仍然处于发展的最底层，重要的原因除需要时间来彻底稳定政治之外，还有人才和知识积累、产业积聚等，而更重要的却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已经成了非洲绕不过去的缺陷。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大国，由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那儿的人们一直渴望着经济发展。最近由于政府发展低端制造业，大量的人有了工作。埃塞俄比亚周边是拥有石油资源的苏丹和南苏丹，以及更加富裕的肯尼亚，他们都可以大量吸纳埃塞俄比亚制造的产品，但条件是埃塞俄比亚的交通设施必须进行更新。

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对于交通的依赖的问题同样突出，但仅仅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解决。依靠西方的援助，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由于资金下拨得缓慢，也不能完全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资金的进入的确可以帮助非洲发展。

但是，中国的援助是不是意味着非洲受益、中国损失呢？答案并非如此：在非洲受益的同时，中国也在双方贸易中获得了足够的利益。

非洲与中国是互惠的

当中美贸易战起，中国企业华为成了美国人相中的目标之一，但华为与当年日本企业、法国企业，以及2018年的中兴，表现得都不一样。其余的企业大都低头认输，而华为却显得胸有成竹，不肯屈服。华为的底气何在？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的占有率。

在十几年前，华为作为后来者，在国际电信市场上受到的歧视并不比现在少，当时的欧美市场大都采取了闭关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企业华为与中兴。中国企业突破欧美歧视的关键，在于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开花。利用价格优势，华为和中兴（特别是华为）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锋，不管是在印度、南美、东南亚，还是在非洲，几乎总是能找到华为的身影。

在占领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后，华为才最终挤进了欧美市场，成了世界的主流品牌之一。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华为必须在更早时就与西方企业竞争，其难度可能要大得多。

当贸易战发生后，也正是有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支撑，华为才有底气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不担心美国的封杀会断绝它的所有市场。如果不是这样，华为可能早已不得不妥协了。

更重要的是，华为因为其国际化路线使其成了中国企业向外走的黄埔军校。由于华为要求国内的管理层必须在某个时间段去驻外，这使得华为的员工大都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具备的。

我在非洲考察时，也数次接触了华为和中兴的员工，了解到他们艰

辛的同时，也增强了信心：中国对非洲的帮助和投资绝没有浪费，而是对于双方都有利。

在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对抗时，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产品的缓冲市场，有了它们，不仅是华为，中国的其他企业所受到的冲击也会小很多，出口压力也会削减。国内的媒体总是在讨论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却没有意识到，欧美之外的其他市场给中国提供了足够大的“气囊”，使中国能够在冲突中避免硬碰撞，不轻易屈服于发达国家的逼迫。

不可否认，投资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损失，但这种损失与跑到欧美花大量资金购买房产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在考察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于非洲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西方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化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已经过渡到了环保、生活质量等议题，而非洲还处于解决温饱时期，西方的援助将大量的后现代议题带入非洲，这显得过于超前。在某些地区，人还吃不饱饭时，西方的青年人却在号召人们保护动物，甚至为了动物，鼓励人们保持原始生活，不要修路，不要建设城市。

虽然动物需要保护，我却知道，一条柏油路对于一个急需融入世界的社会是多么珍贵！中国带给非洲的恰是其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入非洲，对于当地的物价也是救命性的。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中国、土耳其和印度制造的商品进入之前，非洲不得不将大量的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再进口昂贵的工业品，其中价格差别之大令人惊讶。中国产品的进入，使工业品的价格在非洲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也让人们享受了更多的物质文明。

与此同时，印度廉价医药的进入，也让非洲人的寿命大幅度提高。在印度之前，西方虽然援助了不少药品给非洲，但非洲药品的价格仍然居高不下，甚至成了奢侈品。只有印度的廉价药品以市场的方式进入，才将药价彻底降了下来，普通人也可以买得起药了，这相当于完成了一

次非洲版的医药革命。

我们了解非洲吗？

非洲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市场，中国是非洲发展的重要投资方。这种互利的关系是否能促进双方的了解呢？

不幸的是，虽然非洲对中国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以中国为榜样发展经济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人对于非洲的了解却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这又应了我在本文开头的观点：人们对于外国的认识总是滞后的。

至今，大部分中国人对于非洲的印象无非以下几种。

有的人认为整个非洲是一片黑暗的大陆，充满了无序、混乱和战争。这个印象是错误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和平的，而混乱更多是在二三十年前，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对的平静期和发展期。

有的人将非洲渲染成一片充满了原始趣味的猎奇地。事实上，非洲人虽然仍很贫穷，但他们也在追求现代化，他们希望人们帮助他们脱离原始，走入现代。

有的人将非洲的动物看得比人还重要，这大都是受到了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影响。人们不应该为了动物而牺牲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后在尽量保护动物的同时，更注重人的发展。

有的人完全以歧视的眼光看待非洲，用脏乱差概括那儿的一切。但事实上，非洲普通人的善良和乐观，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非洲的精英阶层也已经形成，他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所掌握的知识也并不比中国人差。

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考察，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非洲。那儿的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过数十年的战乱，有的甚至至今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更多的国家虽然还带着贫穷的痕迹，但人们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混乱期，开始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

本书希望向读者讲述当年发生的悲剧，同时还要将现在已经隐约可见的光明告诉读者，将他们对非洲的认知提到现在。

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追溯了非洲过往的历史。读者会发现，非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大洲，它的许多地区其实都已经走向了文明，特别是北非和非洲之角的基督教区域更是在罗马时期就有了很成熟的文明。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前，整个非洲北部和东部又在伊斯兰教的照耀下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并被纳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

第三章简要地回顾了欧洲人进入非洲以及对非洲的瓜分。这是现代非洲的起点，一系列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并一直影响到了现在。

第四章回顾了非洲各国的独立过程。人们常说，非洲的独立可能太早了，以至于社会和政治都还没有准备好。但事实上，即便更晚独立，非洲还是不可能准备好，因为在殖民体系下，许多地区是没有机会去做准备的。本章介绍了非洲第一位为了独立事业而牺牲的殉道者卢蒙巴，从他的遭遇或许可以看到非洲国家与宗主国复杂的关系，以及非洲人的无奈。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聚焦于非洲国家的三代领导人。第五章中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任务就是领导大家走向独立，但这一代人由于知识的缺陷往往对经济建设的认识不足，加上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这些矛盾都来自殖民地时期的积累——使得非洲国家纷纷进入了颠簸状态。但这些领导人又各个不同，有的人将国家带入了混乱，有的人痛定思痛，主动放弃了权力，让国家在稳定中步入了发展的轨道。

非洲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最复杂的，由于他们在殖民地时期无法受到

良好的教育，又是靠武力上台，他们给非洲带去了更大的混乱。但也正是他们的存在，让人们意识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从而强化了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非洲社会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混乱的顶点，接下来就要走入秩序和发展了。本书并没有回避这个时期非洲的问题，正是要提醒读者，这只是非洲历史的一部分，对非洲的认知必须跨越这个时期，而不是永远停留在那儿。

非洲的第三代领导人大都已经具有了国际视野，这一代领导人务实的态度，让国家有了新的进步。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非洲国家也大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分别谈论了非洲的几个主题。第七章谈论非洲特色的理想主义问题，这种理想主义既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灾难，但在另外的层面，又成了非洲理想的源泉。

第八章讲非洲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复杂问题：种族冲突。非洲国家的边界都是由欧洲人确定的，在边界内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种族问题，有的国家比较缓和，有的却很激化，非洲最大的几场灾难大都与此有关。

第十章讨论了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人们常常谈论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却很少知道，他曾经是一个独立英雄，并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许多尝试，虽然最终国内复杂的黑白问题让他的尝试没有成功，但这些经验教训却可以用在南非，避免它重走弯路。

第十一章描写了最近几年发生的北非的阿拉伯革命，及其带来的许多后果。作为革命策源地的突尼斯侥幸逃脱了革命的负面后果，但许多其他国家仍然在颠簸之中。到底如何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性，是非洲国家仍须时时警惕的问题。

本书的第十二章，总结了非洲数十年的发展情况。希望读者能够看到，那些作为非洲发展核心的国家已经产生，它们代表了非洲的希望，

也能在未来与整个非洲一起步入发展之门。

引子
通往世界边缘的非洲之船

我永远会记得那一艘非洲之船。那是一艘航行在战乱国家深处的船。那是一艘通往曾是古代文明中心，如今却是世界边缘的船。

在短暂而又漫长的十几天行程中，我在船上目睹了贫穷，经历了疾病，看到了战乱的影响，甚至差点遭遇绑架。在登船前，我是一个充满了乐观和冒险精神的青年背包客，但下船时，我成了拖着病后残躯的“老者”，甚至一个台阶就可以让我摔倒，我对非洲这块饱受劫难的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为它的命运感到惋惜。

在船上，我还体会到了怜悯和友谊，我的新朋友照顾患病的我，甚至救了我的命，但他们传达给我的最主要信念，却是对于这块黑色大地的深深热爱。不管它遭受多少劫难，它的人民始终善良、乐观，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这种信念让我更加迫切地去追溯非洲社会的来龙去脉，感同身受地写出我的所见所思。

就让我从那艘慢船谈起……

你将成为廷巴克图唯一的外国人

“这是战乱之国，每年都有外国人遭到绑架。你就是外国人，却正要去往风暴的中心！”

在西非国家马里的小城库利科罗，我的朋友贾鲁这么告诉我。

他这么说时，我正要去往一个叫廷巴克图（Timbuktu）的城市，那座城市处于马里的北部，也是马里战争的中心地带。

贾鲁的西班牙文名叫Diallo，从字面上看，应该是狄亚罗，但当地的发音却类似于英文的Yellow。在非洲，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都带着很浓的本地口音。比如，我要去的城市廷巴克图，这是欧洲人的叫法，当地人称它为通布图（Tombouctou）。

当我认识贾鲁时，恰好马里的反恐形势进入了一个微妙阶段。2017年，美国和俄罗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反恐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曾经猖獗一时的恐怖组织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吃不住劲儿，士兵们纷纷逃往世界上那些政府控制薄弱的国家。他们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是阿富汗，这里有的省份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一去就填补了政治真空，成了理所当然的“坐寇”；二是非洲的撒哈拉和周边地区，这里的国家很贫穷，政府无力控制局势，也无法剿灭以沙漠为基地的武装分子。马里不幸成了ISIS喜欢的国家之一，于是原本就复杂的战争形势突然间变得更加错综。

在ISIS去往马里之前的2012年，这里就爆发了北方穆斯林反抗南方政府的分裂战争。在法国的帮助下，中央政府本来已经取得了胜利，但2017年ISIS落脚之后，北方的枪声再次响起。北方反叛的中心城市，就

是我要去的廷巴克图。ISIS以北方为基地，还时不时跑到中央政府控制的南方来搞爆炸和袭击，让政府紧张不已。

贾鲁所在的小城库利科罗，就在首都巴马科的旁边。这里原本是宁静祥和之地，此时也不时受到首都局势的影响，但比起廷巴克图，库利科罗仍然安全得如同天堂一样。

他试图劝阻我，不断地举着例子：一年多以前，就在首都最安全的地方，恐怖分子袭击了一个大酒店，一共死了20个老外，包括3个中国人；半年前，一辆在南方行驶的国际长途大巴遭到了袭击，也是20多人死亡。这些袭击都是发生在公认比较安全的地方，小的袭击更是不计其数。

“可你说的袭击都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我要去的廷巴克图！”我争辩说。

“那只有一个原因：廷巴克图没有外国人存在了。”贾鲁很快地反驳，“如果有，过不了一个星期，就被绑架勒索赎金去了。赎金，知道吗？100万美元起价，一般是500万，1000万，或者，咔——”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他继续解释说，在马里战争开始之前，廷巴克图的确不错，那里是整个西非最受外国嬉皮士欢迎的目的地，许多人都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廷巴克图是一个怀念非洲辉煌和控诉西方殖民的好地方，是许多左翼青年的圣地。可战争一来，只要来不及逃走，左翼青年们就成了移动的钱包，被叛乱分子挨个儿抓起来勒索赎金。当然，他们大多穷得叮当响，靠四处忽悠抽大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打那之后，廷巴克图就没有外国人了。

“如果你去廷巴克图，将是那儿唯一的外国人，不管走在大街上，还是旅馆里，当地人的目光始终都会注意着你。你不知道谁是眼线，也不知道谁把你报告给‘那些人’，他们总能知道去哪儿找你。”

他指了指外面的船（这艘船正是我要进入廷巴克图的工具，因为没有其他的交通方式能让我安全到达那儿）说道：“看这艘船上的人们，他们看上去都是普通人，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如果你和他们同船的话，也许他们会偷偷用手机和极端分子联系，告诉他们船上来了个外国人……你还准备去吗？”

我望着贾鲁点了点头：“我要去。”

做这个决定时，是2017年8月。我距离廷巴克图只有几百千米的水程，为了这趟旅程，我已经准备了数年。这座城市象征着非洲的命运，它曾经那么辉煌，现在却又如此落寞；它曾经被非洲人称为“宇宙的中心”，现在却是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座不安定的小城。

可是，为什么我给这座小城赋予了这么多的意义呢？这就要从世界对非洲文明的认知谈起……

慢船通往黄金之都

我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廷巴克图，在于它曾经是探险家们梦寐以求的所在。在中世纪，人们一谈起神秘的非洲，不是想起摩洛哥或者埃及，而是在关注一座叫廷巴克图的城市。这座城市位于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腹地，被描绘成黄金遍地，如同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那么诱人。

它曾经是一代非洲伟大帝国的首都，也出过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在14世纪时，中国处于元朝，欧洲处于中世纪晚期的泥沼之中，俄罗斯还属于未开化的状态，欧洲人还未殖民美洲，非洲却出现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坎库·穆萨。他居住在廷巴克图，被称为全世界最富有的统治者。他是一个黑人，财富却傲视所有的白人、黄人和棕人。

坎库·穆萨有多富有？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1324年，作为虔诚穆斯林的坎库·穆萨决定去圣城麦加朝拜，生活于西非的他必须穿过整个撒哈拉沙漠，经过埃及，前往位于沙特的圣城。为此他带了6万人开始旅行。其中专门携带黄金的奴隶就在1万人以上，每人都带有近2公斤黄金。除了奴隶之外，据说还有100头专门驮黄金的骆驼，每头都带有几十到上百公斤的黄金。如果这些数字属实，即便按照保守的计算，他携带的黄金也有20吨，折合人民币在50亿元以上。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黄金，是因为他统治的地区恰好处于一个产金地带。中世纪时就已经有商路从西非出发，穿越撒哈拉沙漠，经过北非，把黄金送往欧洲和其他地区。正是由于这种贸易，西非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马里帝国。

坎库·穆萨到达埃及后，整个开罗的金价立刻掉了10%。但这并不是他财富的全部，只是他为了一次朝圣所付出的施舍和供奉而已。

与非洲大部分黑人王朝都湮没无闻相比，坎库·穆萨足够幸运。他经过埃及时，那儿已经有西方人出没，于是他的阔绰和大方被西方文献记载了下来，他的名字才流传到了今天。廷巴克图也因此成了一个遍布黄金的传说之地。

但可惜的是，西方人虽然对廷巴克图的名字早已熟知，却很少有人能够进入那座伟大的黄金之城。要想去往那里，他们必须首先越过地中海，来到摩洛哥或者突尼斯所在的北非，再沿着两条只有个别人知道路线的主要商道（还有无数小道）纵穿撒哈拉大沙漠，才能到达廷巴克图。由于路线是商业秘密，贸然出发不仅找不到路，还会被困在沙漠渴死。

到了近代，西方探索非洲的热情高涨，探险家们开始把廷巴克图当成主要目标。这时，由于大西洋航线的打通，已经有了另一条路可以前往，那就是走水路。

廷巴克图在西非最大河流尼日尔河的河岸北方，距离河干十几千米。这条河整体呈一个巨大的弧形穿过非洲西部，从西向北、东、南，顺时针转一个大圈流入几内亚湾。廷巴克图就在河流弧形最靠北的位置上。欧洲的探险家选择从大西洋坐海船，在西非的西海岸登陆，找到尼日尔河的上游，再登船顺河而下到达廷巴克图。

我最心仪的探险家之一叫芒戈·帕克，他就是走的这条路线，这也是我选择的水路。

帕克坐船经过了廷巴克图所在的河段，但由于土人划了很多小船对他围追堵截，他不敢登陆去往十几千米以外的廷巴克图。就这样，他跨越了半个地球，却受阻于十几千米的道路。他继续顺流而下，企图一直漂流到大西洋去，却最终被土人困住，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之后，当欧洲人最终到达廷巴克图，却大吃一惊：这里没有所谓的黄金之城，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城市。事实上，在很久以前，廷巴克图被北方的摩洛哥人攻克和洗劫后，它就成了世界最偏远之地，也是最落后的地区。

我的这趟行程也带上了象征性意义，表明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也表明人类对于过往文明的怀念。

现在的旅行虽然比芒戈·帕克时期便捷，却也并不容易。因为廷巴克图所在的国家马里已经成了战乱之地。原本有一条简单的土路沟通廷巴克图和南部，但现在已经不再安全，剩下的唯一办法，只有像芒戈·帕克一样坐船了。

当我在马里的邻国毛里塔尼亚时，就不断地向人询问马里的安全情况。

毛里塔尼亚最近几年也曾经发生过对外国人的劫持，但那儿的人总是骄傲地告诉我：毛里塔尼亚别提多安全了，只有邻国马里才是最危险的地方。你要去那儿吗？那可要小心了！

为了避开危险的毛里塔尼亚和马里边境，我选择了先从毛里塔尼亚进入塞内加尔，再从不那么危险的塞内加尔和马里边境（位于南部）过境。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是西非混乱的城市之一，中国人聚居的地方是其抢劫的高发区，有人拿着早餐出去都会被抢，劫匪翻遍身上没钱，就把早餐拿走吃了。这儿的人也告诉我：塞内加尔实在是和平的好地方，真正可怕的地方是马里，那儿打仗呢！

在达喀尔旅馆里，我碰到几名西方游客，看上去都是四处游荡的老油条。他们谈到马里时，都摇着头告诉我不能去，听说我不仅想进马里，还想去廷巴克图，更是脸色苍白，劝我不要去冒险。

然而在几年以前，西方游客说起廷巴克图时却是另一种表情。2012年之前，他们对这座小城趋之若鹜，将它称为“世界边缘的天堂”。城市不如中国的村庄大，却保存着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图书馆，馆里有许多当年的羊皮抄本。这些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坎库·穆萨时代，国王朝贡回来，带回来许多穆斯林学者，让这里成了尊重知识的地方。从此以后，家家户户以收集书籍为荣。数百年来，廷巴克图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宝藏，并吸引了许多西方的左翼人士，他们前来膜拜手抄本，从中寻找非洲曾经强大的证据。

战争爆发后，西方人成了人质，他们被绑架，或者遭受死亡威胁。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廷巴克图从令人向往的天堂变成了令人不安的地方。

到了马里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打听那艘传说中去往廷巴克图的航船。马里是一个严重缺乏道路系统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南部与廷巴克图之间只有一条土路相接。战争中，各种军阀在土路上设伏，他们不骚扰当地民众，却对外国人和政府人员形成了巨大威胁。

如果实在迫不得已想出入廷巴克图，只有两条破旧的老船往返于尼日尔河上，可以将人们带到那块边缘之地。理论上，每个星期有两艘航船从首都旁边的小城库利科罗出发，前往下游的城市莫普提，再继续航行到达廷巴克图，最后前往马里与尼日尔的边境城市加奥。

在首都巴马科，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两条船。他们纷纷劝说我打消这个念头。“你为什么要去廷巴克图？”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不在南方安全的地方转一转？”

可我想确定那条船到底有没有。

“就是有船，你也会被别人发现，有人拿着枪把你劫走。没有人会救你的，兄弟，所有的人都不敢救你。”

在首都一无所获的我只好前往几十千米外的小城库利科罗。出了首

都，几乎找不到会英语的人，在库利科罗，一番寻找之后，一个当地人终于恍然大悟地说："科曼纳夫，你要找的是科曼纳夫！"

科曼纳夫不是俄国人，而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它们的业务就是经营河上的两条船。当我跟随当地人来到科曼纳夫时，我认识了贾鲁，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终于，我找到了那条穿越在时光之外的航船。

从贾鲁这儿，我知道了航船的确凿消息：的确每个星期有两班船穿梭在尼日尔河上，连接着冲突的南北两方。但这两艘船不是整年通航，只是在夏天的雨季通航，到了冬天旱季就停航了。原因出在一个叫代博的湖上。过了莫普提，尼日尔河穿过这个湖泊，在湖泊的入口处有一片狭窄的、满是沼泽的低地。只有在雨季，河水漫过了这片低地，轮船才能通过；旱季时，代博湖就像是一个得了食道癌的消化系统，那一小点的障碍就让整条航道失去了通航功能。

"幸好你是雨季来的。"他说。

"可是，冬天时人们是怎么去往廷巴克图的呢？"我好奇地问道。

"冬天时可以坐飞机进去。（廷巴克图有个简易机场，每个星期有一趟小飞机）如果不坐飞机，就坐吉普车。当地人不怕，武装分子也不抓当地民众。（偶尔会抢他们的钱，但不抓人）政府的人坐车必须配备荷枪实弹的士兵，结成车队。联合国和法国士兵坐飞机进入，他们怕陆路的地雷。其他的人，谁会没事儿往那儿跑？"

贾鲁不断地试图告诉我，那儿很危险，不要随便去，但见我坚决要去，便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人面前。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职务为公司的调度经理，名字叫索博巴。我们三人认真地讨论了去廷巴克图的可能性。

"如果你非要去廷巴克图，我建议你只待一个晚上。"索博巴建议说。

他告诉我，廷巴克图的确很危险，但我可以打个时间差。武装分子并不住在廷巴克图城里，而是在城外的沙漠里，城内名义上由政府控制。当恐怖分子的眼线发现有外国人到来，他们必须把消息传递出去，沙漠里的人再做好准备在晚上实施绑架。要想策划好，需要的时间绝不止一天。

到了廷巴克图后，找当地最好的酒店居住。头一天进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就可以赶在他们准备好之前安然逃脱。

“记住，安全的地方只有船上。”索博巴继续说。

由于这两艘船成了连接中央政府和叛乱地区的最主要工具，政府会派出军队保护。航程的前半段，从库利科罗到莫普提，是航行在中央政府控制区，不需要特别保护。到了莫普提后，将会有一支十几人的部队携带武器上船，护送船只到达廷巴克图。

“你很幸运，今天是发船日，晚上就有一艘船发往廷巴克图。”索博巴查了查时间表，告诉我。

之前，两艘船除了到达廷巴克图，还会继续向前，到达马里与尼日尔边境上的城市加奥，这是一个比廷巴克图还要遥远的城市。但由于年久失修，一艘船已经到了故障频发的时期，这艘船只能承担从库利科罗到廷巴克图的航程，发往加奥的船就只剩下一艘了。

我要乘坐的就是那艘故障频发的旧船。按照计划，旧船到了廷巴克图，将进行简单的检修，在第二天开始回程，一来一回恰好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记住，只在城里待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回船上等待发船。”索博巴说完，让贾鲁带我去购买船票。三等舱船票的价格在85美元左右，包含了一日三餐和简陋的双层床铺，没有被子。

贫穷之船

直到上船，我才知道，这艘船的二三层甲板只有我一个乘客。

船停在科曼纳夫旁的码头上。这里是尼日尔河边的一片平地，搭建了简易码头，恰好可以停泊一艘船。我乘坐的船叫“坎库·穆萨号”，以那位伟大国王的名字命名。它是一艘三层旧船，底舱放货物，也是穷人们睡甲板的地方。底舱的后部是轮机室，前部有一个不大的驾驶舱，驾驶舱后部是提供给客人用的厨房设备。中间一层是二等舱和三等舱所在的位置，尾部设有厕所和淋浴室。上层的前部是餐厅，后部是头等舱。

所谓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的区别，在于一个房间内有多少张床。头等舱两张床带室内卫生间，二等舱四张床，三等舱四张床八个铺位。二等舱和三等舱都没有室内卫生间。不管是几等舱，都不提供卧具。由于已经服役了很久，整艘船显得脏乱且带着异味。

出发时，二三层甲板上的头、二、三等舱全都空着，在底层的统舱却挤满了当地人。这艘船是去往廷巴克图的主要交通工具，当地人买不起昂贵的舱位，只好出少量的钱（十几美元）购买统舱，睡在甲板上。

出发前，科曼纳夫码头上人山人海，底舱堆满了货物、牲畜。人们在货物的夹缝中、牲畜的排泄物上随便铺点东西，便睡在上面。他们必须在船上待好几天，吃自己带的东西。食品大都是豆子、粗粉之类的素食。在非洲旅行多了，就会发现，不管乘坐火车还是轮船，人们都成堆地挤在一起，互相踩踏拥挤着，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况。

底层拥挤成地狱，二三层甲板上却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位游客。船员们悠闲地在三楼餐厅喝茶、抽烟，我在两楼层之间游荡，直到一群孩

子发现了我，跟着我来到了二楼。由于他们是孩子，所以我并没有赶走他们。

这些孩子小的只有三四岁，是战乱之后出生的，他们对外国人充满了好奇，又有些害怕。大一点的有十几岁，经历过和平时代的游客盈门，显得更加大大咧咧，想从我身上找点补贴。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晃着刀，向我要烟抽。我没有烟。

“Fuck，你要不要fuck？”他继续问道。他指了指周围的几个孩子，有男有女，最大的不过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Boy还是girl？都可以。”

非洲是卖淫和恋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许多非洲国家我都碰到过类似的场景。本来应该习惯了，但每一次遇到，还是会让我感到心疼。西非作为非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更是猖獗。卖淫往往和偷盗、绑架一同出现，我决定不再和他谈话。

在我请他出去之前，他继续伸出手来：“Money，dollar，one hundred。”夹杂着听不懂的当地话，大意应该是，如果不给钱的话，他会打电话通知廷巴克图的人把我抓起来。

到了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底舱的男人女人都被吸引到二楼来了，船员想赶他们走，却做不到。

船长是一名30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白色制服，显得英姿飒爽。他建议我到餐厅待到开船。

餐厅在三楼，在开船之前，不允许底舱人进入。这座曾经豪华的餐厅还保留着当年旅游业繁荣时期的痕迹，墙壁上贴着廷巴克图的景点介绍以及旅馆推荐，但纸片早已经发黄、局部脱落。索博巴也在餐厅，开船前，他下了船，临走时再次提醒我，不要在廷巴克图久留。

开船后的第二天清晨，是这一路旅程中最惬意的一天，我已经忘记了开船前的不快，也感受不到任何的风险。我和船员们混熟了。船长是科班出身，还是年轻人，他的副手（大副）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人。大副吩咐船员带我四处走动。当地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下层甲板，也就是统舱所在的位置。统舱的人可以去三楼点餐喝酒，但被禁止进入头、二、三等舱所在的区域。

大副几乎不会英语，他带我到统舱区域走访。经过一夜，统舱的位置已经充满了人体和牲畜的异味。大副不断地指着人们告诉我："Good people... Good... Hungry... Good people... Hungry..."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说：这些人都是好人。大副不断说这些人hungry，但他说话时，大部分人都在吃早餐。虽然吃得很糟，但并没有挨饿。我猜，他想说的是这些人太贫穷了，却无意中用错了词……

从视觉上说，尼日尔河并不漂亮，它只是一条充满了浑水的巨大条带。但正因为这条河的存在，马里才成了西非的文明中心。当年，芒戈·帕克也和我一样坐船直下。他所看见的风景和我看见的不会有太大区别。直到现在，岸边还是那些低矮的民居，以及用泥土建成的宗教建筑。许多村子里都会有一个不大的泥塑清真寺，表明这里已经是伊斯兰教区域。当地人的风俗仍然保持着原始特征，在河边常常能看到少男少女们光着身子洗澡。少女的乳房已经膨大，当船开过时，她们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躲避的意思。

河里偶尔能看见船，大部分还没有加装动力系统，只有一小部分带上了象征文明的发动机，表明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在和船员用单词和手势聊天时，我专门询问了航道的安全情况。他们大都回答：放心吧，到达莫普提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到了莫普提，就有军队保护了。

他们示意我，岸边的确可能存在零星的武装分子，但武装分子的小

船动力不够，吨位太小，都无法靠近我们的大船，所以我们是安全的。

古老的“坎库·穆萨号”最初行驶得非常快，但接着就出问题了。过了一个城市塞古之后，船在经过一道闸门时撞上了岸边的水泥墩，我听见了巨大的响声。从这时开始，船上的抽水机几乎就再也没有停止工作，动力系统似乎也出了问题。

我上蹿下跳地看船员们修理这艘老船，好让它恢复一点动力，不要再慢吞吞上路，这引起了船长的注意。

在我睡午觉时，船长终于派人把我叫去了。

船长室是一个不大的小房间，船长让我坐下，他的英语勉强能够进行简单交流。他建议我：“到莫普提之前，请不要再去底舱，就在你的房间和餐厅之间活动。”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他强调说。

“人们告诉我，在莫普提之前是安全的。”我说。

“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船长回答道。在这一段的岸上，最近出现了一个武装团伙，为首的人是一个叫阿玛鲁·孔发的家伙，这是我听船长说的发音，但具体怎么写，我不确定。阿玛鲁·孔发和他的同伙有枪，他们劫持过车辆。如果我们的船没有坏，他们也没有办法，但既然船坏了，他们用普通的小艇就可以登船了。

“到了莫普提，就有军队保护了，但在这之前，船上没有能力抵抗他们。”船长说。晚上是最危险的，我应该把门锁好。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在其他人面前露面，因为我们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许早就有人打电话把船上有外国人的消息告诉了武装分子。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担心。从那时开始，每到晚上，我都会把门从里面闩上，并祈祷着早一点到莫普提。

船走走停停，走一段，就不得不停靠在岸边抽水。一停到岸边，不管是白天黑夜，我都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将门闩好睡觉。什么时候到莫普提？没有人能够回答。按照计划，当晚就可以到，但不管我问谁，他们都耸耸肩，摊开手，告诉我无能为力，并示意我不要出现。

直到出发后的第三天深夜，我们的船才终于出现在了莫普提码头上，但我被要求不要出门，只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在我的舷窗外果然有了士兵的身影，他们大都穿着迷彩服，斜挎着冲锋枪，头上包着头巾，警惕地望着所有人。

从这时开始，三等舱已经有了其他的客人。我的房间里来了两个去往廷巴克图的当地人，一个是商人，叫马依噶，另一个是一名教师，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交流也不多。

来自北方的马依噶

马依噶的全名是穆罕默德·杜·马依噶。教师是悄无声息独自进来的，马依噶的阵势却很大。有三四个士兵帮助他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和箱子，进门放在一张床边。马依噶熟练地数着钞票递给士兵们，把他们打发走。

他50岁左右，身材高大，几乎剃光了头发，面容严肃。他穿着西装，看上去像中国的乡镇企业家，但言谈举止却又有点知识分子气质。他的英语比船长要好，我们沟通更加方便。

次日和他混熟了，发现他熟练地和士兵们聊天，给他们发烟，有时还把枪借过来摆个造型。我好奇地问他和这些士兵以前认识吗。

“不认识。但他们多重要啊！”马依噶说。他告诉我，最近几年，他已经被抢劫过两次了。“有了士兵，就不会被抢劫。他们是朋友。”和士兵搞好关系，已经成了他本能的一部分。人们的言行总是因为环境逼迫而形成的。

马依噶是北方人，有着一个穆斯林的名字，却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每天的祷告时间，与我们同住的那位教师都会铺上席子，在地板上面朝麦加方向祷告，但马依噶从来没有做过。一次他避开教师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宗教人士，他相信有一个神，但不相信这个神符合任何一个宗教的定义。

他也曾经当过教师，但后来成了商人。即便在北方战争时，他也没有停止过在火线之间穿梭。那两次抢劫都发生在冬天，由于冬天河上没法航船，只能冒险坐越野车穿越不同的控制区。

他讲述了其中一次的情况，我记不清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了。

“连接廷巴克图和莫普提的是一条土路，他们把车一横挡住了路，我们的司机减速绕过时，他们用枪把车逼停。

“一个人问：‘车上都是干什么的？’

“车上一共五个人，他们不抢司机。剩下四个能坐得起吉普的都不是穷人。他们挨个问：‘你是做什么的，去廷巴克图做什么？’

“轮到我，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商人，要到巴马科去。如果不说实话，怕更吃亏。

“‘哦，那你一定带了钱去进货。’他们从我身上搜出70万西非法郎（大约1400美元）。他们想都拿走，我和他们争论说：‘如果你们都拿走了，我就没钱进货啦。我破了产，下次你们抢什么？’他们听我说得有道理，给我留了20万，拿走了50万。其实我更多的钱都没有放在身上，而是电汇走了。其余的人也都交了钱，劫匪都没有全搜走，给他们留了一部分。这还得谢谢我呢！

“他们从来不杀当地人，只要你配合他们，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你只要大胆一点就可以和他们说说笑笑，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心疼钱，好好配合他们，他们也会照顾你。”

如今的他住在首都巴马科，但父母仍然在老家的村子里，这个村子距离廷巴克图还有2个小时的船程。也就是说，他下了这条船，还必须打一艘“船的”才能到村子。带上船的东西并不是他要贩卖的货物，而是带给父母家用的。

我问他：“他们真的不伤人吗？”

“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他们抢劫，是因为这个国家失去了稳定，他们吃不上饭了。”

他显得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感情，慢慢地和我聊开了。

“你现在看到的全是混乱，你也许不相信，十年前，马里是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它曾经被独裁过，但已经实现了民主。它种族众多，但种族之间的冲突并不多。十年前，人们安居乐业，十年后即便陷入了战乱，但人民还是这些人民，他们即便铤而走险，却并不是坏人。”

马依噶的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路上，我所听到的都是谈论马里的凶险，马依噶却告诉我，这里曾经是非洲的和平天堂。

“可我眼里的马里却遍地是失业、贫穷，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是战乱国家。它怎么会从你口中的天堂，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问道。

“你听说过卡扎菲吗？”马依噶反问。

卡扎菲是利比亚的领导人，2011年死于“阿拉伯之春”运动。利比亚与马里之间隔着巨大的撒哈拉沙漠，并不接壤。我点点头表示听说过，但不解卡扎菲怎么会和马里联系在一起。

马依噶继续说：“正是利比亚的革命导致了马里的叛乱。”

“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于北方的突尼斯，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利比亚是运动爆发最激烈的国家之一。经过了卡扎菲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各个部落突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反抗精神，共同反对他。但把卡扎菲推翻之后，人们才发现，所谓的部落力量并不是民主的象征，他们之所以推翻卡扎菲，只是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许多反叛组织随后激进化了，成了“基地”组织与ISIS的外围组织，这些激进组织随后开始了扩张，影响到周围国家，比如埃及、苏丹、乍得等。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人穿越了撒哈拉沙漠，来到了南面的尼日尔，又从尼日尔扩散到了马里。

但导致马里叛乱的直接原因还不是这些武装分子，而是利比亚战争传播的思想：每一个部落都可以独立。这个思想到了马里，让曾经的部

族观念复活了。

在马里，南方居住的是以班巴拉人为首的黑人群体，其中班巴拉人占人口总数的30%还多。在北方，却有一支特殊的人种。马依噶曾经指着船上的一个青年让我看，第一眼看见他时，我大吃一惊。青年人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卷发，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是西方人，之后意识到他应该是阿拉伯人。

马依噶告诉我："他就是图阿雷格人。"图阿雷格人带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血统，只占人口的10%，却分布在广大的北方和东方，这里是大片的沙漠，人口稀少，而南方领土虽然人口占了90%，土地面积却小于北方。

在近代马里，图阿雷格人与班巴拉人已经学会了和平相处。另外，马里还有许多小种族，也都呈现出复杂的杂居状态，但它们一直是温和的。马依噶就属于桑海人，人口比例大约只有5%多一点。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思想中民族独立的产物，却演变成部落之间的混战。这种思想到了马里，让曾经的民族团结消失了。在非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民族混合体，如果实行民族自决，立刻会变得四分五裂。

图阿雷格人和利比亚人一样，有着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双重血统。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民族运动突然间复活了，让马里所有人，包括政府，都没有做好准备。

2012年，图阿雷格人在北方宣布独立。北方的独立让南方政府措手不及。南方政府担任首脑的是阿马杜·图马尼·杜尔总统，这位总统受人尊敬，他执政的时期至今被怀念为马里的黄金时代。他遵守宪法，本来已经处于执政的最后一年，也宣布不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北方的独立突然间打乱了政府的政治进度，政府也无力镇压。于是，南方突然发生了军事政变，将这位已经计划下台的总统赶走了。南方的政变，北方的分裂，让和平的马里突然成了战乱之地。

更麻烦的是，北方的图阿雷格人突然发现，由于人口稀少，要想保持独立，必须依靠外来力量。他们向阿拉伯世界发出了呼吁，请求帮助。于是，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极端武装分子闻风而动，来到了这个不设防的国家，将它变成了一个军事训练营地。

在非洲，最主要的极端组织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简称AQIM）。所谓马格里布，是伊斯兰世界对北非（特别是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的称呼。AQIM的中心在撒哈拉北面的阿尔及利亚，但随着组织的发展，也向着撒哈拉以南任何中央政权薄弱的区域扩张。

极端分子的到来，让马里曾经的宗主国法国也坐不住了，法国人选择了出兵，帮助马里政府击败了北方军。但法国人能镇压明的叛乱，却无力扑灭暗的反抗。于是，马里陷入了一种低烈度战争：恐怖分子在沙漠中扎营，北方的图阿雷格人虽然被镇压，却与极端分子藕断丝连，等待机会。马里骤然从被人称道的黄金之地变成了人心惶惶的动乱之地。

失去稳定的政局后，马里经济也一落千丈，它是一个对旅游业依赖很重的国家，随着大量的游客遭到袭击和绑架，旅游业很快就崩溃了。由于部族之间的裂痕无法修补，物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不可能了。

“你根据现在的马里，无法想象十年前马里的和平与稳定。”马依噶总结说。

不过，他认为马里眼前的混乱仍然只是事情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在更深处。事实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在非洲，我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痛心地说。在他看来，非洲的每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被迫的生活，他们的命运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每一个部族都曾经是独立的，并没有想到要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生活。但欧洲人来了，将非洲带入了现代文明的纷争之中。

马依噶不认为欧洲人是坏的，他们带来了汽车、轮船和药品，让人们更容易生存。同时，他们还将国家这个超越种族的概念传授给了非洲人。现在，不同的种族必须学会在同一个国家架构之下生存。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不同的种族。他们的国界都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欧洲人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划定好的，非洲人只有乖乖地继承下来，没有任何重新划分的机会。

如果欧洲人仅仅带来了团结与和平共处的观念，还是有利的。但他们还同时带来了另一个观念，那就是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这个观念甚至影响着欧洲人本身，不管是苏格兰还是加泰罗尼亚都试图独立。对于非洲人来说，更难以把握到底是国家重要，还是种族重要。

按照前一个原则（不同种族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内），大家应该组成同一个政府和平相处；按照后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大家应该散伙，各自组成国家。马里的南方政府秉持前一个原则，而图阿雷格人坚持后一个原则，要求独立建国。西方人在两个原则之间也不停摇摆，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坚持支持种族自决，但在伊拉克、马里，则支持种族联合。

非洲最新的国家叫南苏丹，它原本是苏丹的一部分。英国人在建立苏丹这个国家时采取了前一个原则，把南北两部分不同的种族合在一起，建立了苏丹这个国家。可是后来欧洲人又开始支持民族独立，苏丹在新思潮下又分成了两个国家，结果两个国家都乱了套。

在这两种原则之下，非洲的国家和种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纷争不断，从独立之初持续到现在。马里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曾经是表现不错的，但最近十年重新坠入了这个陷阱之中。

“班巴拉人、图阿雷格人、桑海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组成一个国家，又如何在一个国家下分享权利。他们只知道他们从生下来就是被决定的。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这也是外面传来的。”马依

噶总结说。

关于非洲与马里，从历史到现代，他还和我讲了很多，但我的记忆却越来越模糊，因为我遭遇了非洲的另一种危险：疾病。

疾病之船

到代博湖的那天，我们的船终于熄火了，在浩瀚的湖水中缓慢地漂荡着。抽水机一刻不停地从底舱向外抽水。到了夜里，风雨大作，紫色和绿色的闪电不断地在船的四周落下。大风、暴雨，船摇晃着嘎吱嘎吱响。我们足足耽搁了20个小时，才重新龟速上路。

但我已经来不及关心风雨，因为我被疾病击倒了。

对于旅行者来说，非洲的疾病一直是最大的杀手。19世纪之前，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死亡率超过了50%，他们大都被各种古怪的没有听说过的疾病击倒。到了现代，不仅外来人口死亡率低了很多，就连本地人由于医疗水平的进步，对疾病也更加具有抵抗力。

但对于旅行者来说，非洲的疾病仍然是对生命最大的威胁。

在莫普提，马依噶上船之前，我只是稍微感到喉咙发干。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受凉，并没有太在意。但随后，除了喉咙不舒服之外，我还感到浑身无力，关节痛，有些低烧。我吃了两片随身带的安乃近，感觉烧退了。

同屋的教师似乎看出我不舒服，他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病了？"

我摇头表示没事。

但接下来一天，症状却越来越明显。白天，我能感到体温在升高，到了夜间却被冻醒，这可是在非洲的夏天啊。我心里知道坏事了，但仍然抱着侥幸心理。

在代博湖的那天白天，症状终于掩盖不住了。身体机能衰退得非常

迅速，早上还能走动，到了中午，我感觉腿发软，头晕，不想下床。我躺在床上闭目休息，一只手突然伸到了我满是汗水的额头。是马依噶。

“朋友，你得了疟疾。”他肯定地对我说。

事后确定，我得的是一种叫恶性疟的疟疾。疟疾一般分为三日虐、间日疟和恶性疟等。三日虐以三日为周期，身体反复发热和发冷，间日疟将周期缩短到两天，恶性疟则在一日内反复发作。

以我的疟疾为例，每天中午过后，身体会准时发热，在下午3点左右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一个平稳期。每天晚上睡着时还正常，但半夜却总是被冻醒，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

疟疾的传播者主要是携带了疟原虫的蚊子。非洲是疟疾的高发地带，但不同地域又泾渭分明。在北非几乎没有疟疾，但进入与北非摩洛哥比邻的毛里塔尼亚，蚊子突然多了起来，而住宿条件却跟不上。在毛里塔尼亚首都，我住的房间屋顶的木梁突然掉了下来，吓得我半夜跑出去，蚊子飞舞着形成一张网将我罩住。

也许在上船之前，我已经感染了疟原虫，十几天后恰好在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发病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疟疾如果及时治疗，通常不会致死，但会把人搞得非常脏。除了定时的发冷发热之外，每天都有擤不完的鼻涕，汗臭熏人，眼睛发红，让人隔着老远就能看出来。

但这是建立在及时治疗之上的，如果不治疗，死亡率会立刻飙升。在塞内加尔时，我曾经买了一板治疗疟疾的药，一直没有用上。在登船前，我将部分行李寄存在旅馆里，这板药也放在其中，没有带上船。我以为在船上只待几天就可以回去，疟疾不会这么凑巧在这几天找上门。真得了疟疾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是在最缺乏治疗条件的地方——一艘移动的船上——发病的。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马依噶却开始在他庞大的行李堆里翻了起来。他在一个箱子里翻出了一个巨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许多药品。事后我才知道，药品是世界对非洲最大的改变。现代药品的普及使非洲成了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

非洲人对药品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出行时行李中总是或多或少放一些药品。非洲的药品大都来自印度。事实上，印度正在成为全世界仿制药品的天堂，这些药品价格便宜，效果也不错，让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迅速将昂贵的欧洲药挤出了市场。欧洲药失去市场之后，非洲人的寿命却大幅度延长了，这可以视为印度对非洲的最大贡献之一。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与我们同屋的教师也总是在偷偷吃药。马依噶告诉我，这位教师并没有得病，而是出于习惯吃药。有些中国人即便没有病也喜欢胡乱吃中药，到了现代，又总是随时吃几片抗生素。由于药品价格下降，非洲人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把吃药当成一种生活习惯。至少在现阶段，对于药品的滥用还没有表现出多少副作用，反而大幅度延长了非洲人的寿命。

马依噶的药品是带给父母的，他把药品摊开，竟然铺了一床。等我能下床时，查看那满床的药品，能够辨认出治疗发烧的药、拉肚子的药。马依噶还指着一个小盒子神秘地告诉我："这是治疗埃博拉的药……"

马里西南方有三个国家，分别是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2014年，这三个国家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所有病例（包括疑似的）一共28000多人，确诊15000多人，死亡11325人。这还不包括在乡村许多因没有及时送诊而致死的人。当地人传说病人一被送到医院就会死，所以故意不把他们送去医院。当然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死亡。

作为三国邻居的马里战战兢兢，最终躲过一劫。大概这次事件给人

们留的印象太深，所以马依噶给父母的药品里都有专门防治埃博拉的药。但恐怕只是心理安慰，因为据说埃博拉疫苗并没有面世，所有的药品都很难治疗这种病毒。

不管怎么说，满床的药品都彰显了一位孝子对父母的爱，也表明马依噶的确不是穷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药能够救我的命。马依噶从他储藏的药品里挑了两种出来。第一种是我熟悉的阿司匹林——退烧药。他递给我阿司匹林时，示范性地往自己嘴里也塞了一片，嚼碎咽下，告诉我这会让药品生效更快。

接着，他把一个小盒子递给我，上面写满了法文，产地却是印度。事后，我知道这款药叫蒿甲醚，是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的变种。

盒子里只有六粒药片。马依噶示意我一天吃两次，每次一粒，分三天吃完。这是一个疗程的量。他储藏的药品里也只有这一盒，没有更多了。

我看着这盒药，又发愁了。在中国，吃药往往是成把吃，即便是小小的感冒也会吃好几种药，每一种都是两粒、三粒、四粒，很少有一次一粒的。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疟疾的折磨，远超感冒数倍。但一个疗程只有六粒药，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

马依噶并不知道我的担心，他叫我吃了第一粒，把盒子塞给我，提醒我不要忘记吃。

从那时开始，我就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每天中午和深夜都等待着，看疟疾是否还会准时到来。

当天晚上风雨交加之时，发冷准时到来，而且更猛烈了，我在床上打着哆嗦吃下了第二粒，心中更加忐忑。除了担心身体，更担心到了廷

巴克图之后怎么办。在到达码头时，我的身体是否允许我进城，又能否按时出来？会不会病倒在城里，无法出城？我又想起了索博巴的话，如果停留超过一天，危险程度会迅速增加。

从当晚开始，我的症状又增加了一条：每次睡着后都会做同样的梦，在梦里我离开了大地，在空中翱翔，俯瞰大地，将地面上的每一个地理元素都尽收眼底，不管是树木、河流还是房屋都显得那么逼真，就仿佛是实际存在的。我的灵魂仿佛早已经脱离了引力，在非洲的大地上空四处游荡。

在梦中我总是睁大眼睛，想看清楚地面上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我似乎看见了一艘被围追堵截的小船，它努力地在河中避开那数十条想把它逼到岸边的独木舟。我知道，那就是两百年前帕克的船。帕克到达了距离廷巴克图只有十几千米的河边，却无法上岸，只能随波而下，被土人逼死在河中。

在病痛中，我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非洲的苦难。这片大地虽然富饶，却隐藏着太多的危险，人们要在这里生存，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其他地区的好几倍。从这时开始，我乘的这艘船仿佛具有了象征意义，它就是整个非洲。我要在十几天时间里，看到和经历贫穷、战乱和疾病带来的所有的苦难。

发病之前，我坚持到餐厅用餐，但发病后身体的虚弱让我很难下床，是马依噶和那位教师轮流将我的饭带回来。几天前我总是将食物吃得精光，但现在病痛让我没有胃口，往往要剩下一大半，被他们倒入河中。我的身体消瘦得非常快，几天时间，大腿已经细了一圈，背包行走积累下的肌肉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两条无力的麻秆。当我拿出手机做镜子照一下时，深凹的两颊吓了我一跳。

第二粒、第三粒、第四粒，药物似乎没有办法阻止疾病，每天我的身体仍然在按时发热和发冷，下床费力，关节疼，头晕。

在外面，船员们在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船能动起来。期限一再拖后。按照计划，船应该在四天后到达，但到了第五天、第六天，它仍然在河流上缓慢地漂荡。

我甚至祈祷这艘船再慢一点，因为我的身体吃不消。如果过几天，我的身体能恢复一点，也会更加有勇气进入那座城市。但是，万一身体无法恢复呢？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过了代博湖，下一个城市是尼亚丰凯。船在距离尼亚丰凯几千米时，终于失去了动力，船长在当地找到了一条机动船，将古老的“坎库·穆萨号”拖到了尼亚丰凯。我们在尼亚丰凯休息了半天，船员们到岸上去寻找工具对船进行修理。

由于停留时间较长，马依噶和教师都下船了。我拖着患病的身躯也想下船看看。

但就在我走到三等舱的大门口时，门外却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看到我走来，他伸手阻止了我，示意我回房间。

我吃惊地望着他，却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士兵看上去很坚决。

直到马依噶回来，我才知道士兵为何有此举动：两天前，廷巴克图发生了枪战。

战乱中的航船

马依噶带着船长走进了我们的舱房。他们向我简单讲述了枪战的经过。在廷巴克图附近驻扎着一支政府军，并有一支法国军队协同。由于这里曾经是叛乱的核心区，平常士兵都待在营地里，不敢随便活动。

叛乱分子和外来的武装人员则占据了沙漠区域。这里已经是草原区域的最北部，出了廷巴克图市区，立刻进入沙漠，也就离开了政府军的控制范围。

随着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败退，非洲的极端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之前，双方还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冲突，政府军满足于控制城镇的幻觉，而极端分子满足于有个巢穴。

但就在我们在代博湖经历风雨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极端分子却袭击了一支政府军部队，双方展开了枪战。从规模上来说冲突并不算大，不管是马依噶还是船长都无法说明参与军事冲突的具体人数，只是说没有多久就结束了。

但冲突本身却让中央政府紧张不已，也让船长充满了警惕，他担心恐怖分子会袭击船只，下令船上的十几个军人都荷枪实弹，进入警戒状态。士兵们用头巾包着头，穿着迷彩服，枪不离手地四处巡逻。作为唯一的外国人，我也受到了士兵的特别照顾，不允许下船。

但这还不是全部，船长之所以前来，是来劝告我不要去廷巴克图。由于他担心自己说不清，所以叫马依噶充当翻译。

马依噶让我相信，船上有外国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廷巴克图和极端分子耳中。城市距离码头还有十几千米，这条道路上的防范并不严密，

极端分子可以在许多路段截住车辆将我带走。

这意味着，我千里迢迢坐船到距离廷巴克图只有十几千米的地方，却无缘进入。我想到了当年的芒戈·帕克，他也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国度，却在距离十几千米的地方擦肩而过。

“可是，船到了码头之后我该怎么办？”我问道。

“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靠港后，士兵全员在船。”船长说。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极端分子大都信奉严格的伊斯兰教义，廷巴克图已经没有了娱乐活动。马里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宗教国家，人们饮酒、娱乐，显得很世俗。以前士兵们到了廷巴克图，会进城消遣，但叛乱之后，船上已经成了唯一可以娱乐的地方，士兵们也不再被允许下船。

马依噶告诉我，到达廷巴克图后，船会在第二天往回走，开回库利科罗。船长将允许我在船上过夜。我在船上待一晚上，再跟着船回去。如果我不想回库利科罗，可以在莫普提下船，只要到了莫普提，就进入了政府控制区域。

“想一想你的身体，想一想你的命！”马依噶警告我说。

我决定不与他们争辩，心想到了地方再根据我的身体情况，以及局势的变化来做打算。他们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同意。内心里，我并不想像帕克一样，距离廷巴克图十几千米，向北望着那条红色的土路，遗憾终生。

我最担心的还是疟疾。我已经吃了六粒药片中的四粒。马依噶一直告诉我会有效的，他有经验，这是最好的药品。但毕竟只剩下两粒了。

我的习惯是等病症出现时再吃药，冷时一粒，热时一粒。就在我准备吃第五粒药时，突然意识到，病症虽然还在，但汗出得没有那么多了。也就是说，我终于看到了好转的迹象。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依噶，他显得很淡定，意思是他早就知道会

见效的。

到了夜晚，发冷第一次缺席了，或者说，即便还有些症状，但我已经不哆嗦了。我把第六粒药吃下。药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能寄希望于我身体的抵抗力了。

疟疾曾经是一种致死性疾病，发病后，人体在冷热交替中消耗致死。到了19世纪，人们发明了奎宁，疟疾才逐渐成为可以治疗的疾病。真正让非洲战胜疟疾的却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我吃的药就是青蒿素的变种。

遗憾的是，屠呦呦虽然发明了青蒿素，但占据非洲主流市场的并非中国药品，而是欧美的原创药和印度的仿制药。

从这天开始，我的身体的确在恢复，虽然喉咙仍然发干疼痛，关节仍然不舒服，鼻涕还很多，但周期性的冷热逐渐消退后，身体已经不再那么虚弱，吃饭时胃口也好了一点。马依噶让我继续吃阿司匹林，以及另一种消炎药，治疗喉咙痛。

在尼亚丰凯的修理确实有点作用，船航行了八天后，我们终于停靠在廷巴克图的码头上。十几千米之外，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我的身体也已经好转，我却犹豫不决。

我到底该不该进城呢？

事实上，廷巴克图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市。当欧洲人进入这里时，失望地发现，曾经的世界首富居住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充满了沙尘的小镇而已。镇上的房屋大都是土制的，更显得不起眼。我去了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红土房子和破破烂烂的街道。

但那毕竟是我的目标啊！

由于下船的人很多，码头上有几辆小皮卡等待着接客，我可以和当地人一起乘车，也许就不会有危险。第二天一早，我可以坐车回来登

船，时间也是允许的。

但不知为什么，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让我迈不开步子。万一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呢？万一我回不来了呢？

在库利科罗，贾鲁就曾经告诉我关于赎金的事情。在我和马依噶聊天时，他说得更详细。马依噶告诉过我，土匪虽然不杀本地人，却总是绑架外国人，因为可以把外国人卖给极端分子。他的原话是："绑架不都是DAESH（阿拉伯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称ISIS为DAESH）干的，这里的土匪就会绑架。他们把欧洲人卖给DAESH的价格是100万美元，DAESH买走后，会要2000万美元的赎金。如果是个穷白人，DAESH会降价，1000万，500万……如果再卖不出去，DAESH就砍掉他的头，这100万就算没有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马依噶却替我做出了决定。他并没有离开，而是决定陪我待到第二天早上。

不由我分说，他已经告诉我他的决定："明天早上我离开，中午开船，你独自在船上的时间不长，就更安全了。"

我怀着复杂的感情默许了他的陪伴。也许在离开非洲后，我会后悔遇到他。但此刻，我却暗自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纠结了。

马依噶仿佛看出了我的不高兴，他建议我上码头走动一下。不过，必须戴上头巾。他委托一名士兵给我买了一块当地人的头巾，要求我只要离开房间，哪怕是去船尾的厕所，都必须把头巾戴上。只有把额头、耳朵和下巴全裹起来，只露出双眼和鼻子，才算是达到了当地人裹头巾的标准。到后来，船上的士兵们见了我都会竖起大拇指，夸奖我裹得好。到离开马里时，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像当地人一样裹头巾了。

回到中国，这块头巾也成了我永久的纪念品。

第二天早上离开时，马依噶深情地指着岸边的土地说："看那儿，

马里在远古时代曾是个富裕的大国，我们有伟大的坎库·穆萨王。到了现在，我们仍然是西非的大国，可变得越来越贫穷。非洲的资源并不少，我们却依然贫穷，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以为他会控诉西方的殖民体系，但他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非洲缺乏稳定的社会。

他对中国了解不多，却羡慕中国拥有稳定的社会，这几乎是他对中国最大的了解。“非洲的命运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当我们试图拿回决定权时，不是想团结一致，反而是想分裂。于是，和平没有到来，非洲反而成了战乱之地。”

一个地方只有恢复了长期和平，人们不再担心安全，放心地过日子，才能为将来的生活做出长远的打算。失去了和平与稳定后，无法建立经得起考验的政治架构，才是马里、西非，乃至非洲最大的悲剧。我同意他的说法。

马依噶指望船第二天就离开，但他走后，事情却起了变化。

他刚离开不到1个小时，一名黑人青年就叫开了我的舱门。他穿着时髦的衬衫，头发很干净，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他告诉我，他是调度经理索博巴派来的。索博巴给他打了电话，对我做出了安排。

“船改期了，后天才会离开，还有两个晚上。”他用不熟练的英语告诉我。

我心里暗暗叫苦，这意味着我还要在这百无聊赖中耽搁两天。马依噶已经离开，船长和大副也不在船上，守卫船的士兵都不会英语。

但突然间，青年的话似乎又给了我希望：“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城一趟，哪怕当天就回来，不在城里住宿。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

青年打断了我的遐想：“索博巴让我来安排你。”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在码头上一定有一辆摩托车。他告诉我，索博巴要求他带我去廷巴

克图，住在科曼纳夫提供的住处，后天早上再把我送回船上。

这可太好了，我默默地感激着索博巴的好意。船长不在，我想等船长回来，向他说明之后再离开。青年表示他可以打电话告诉船长，我不用等待。

就在我想跟他走的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马依噶告诫的眼神。

我暗自责怪自己太胆小了。但我仍然告诉那个青年：我决定等船长回来再走，或者明天过去，在城里只住一天。劝说无效后，青年礼貌地告诉我他就在岸上等我后，便离开了。

事实上，这艘船在中午时就离开了。就在我躺在床上等船长回来时，船身突然一震，起航了。如果我跟着青年离开，或许就永久地留在了廷巴克图的土地上。

当我再见到船长时，对方斩钉截铁告诉我：调度经理索博巴不会找人关照我，他们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推迟两天再走。

那一刹那的犹豫让我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我才知道，马依噶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地照顾我了。

马里只是非洲的一个特例，却反映了整个非洲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人们将非洲当作混乱大洲不同，事实上，在同一时间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大部分都是处于和平之中，但非洲国家的稳定性确实又不如其他地区。

非洲人民大部分都希望和平，但他们却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非洲仍然在承担别人给他们带来的苦果。

马依噶说的没错，在欧洲人到达之前，非洲并不是一个文明荒漠，它不仅有国家雏形的部落，还产生了若干以贸易起家的巨大帝国。即便不提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西非，也以现代马里为中心先后出现了加纳、马里和桑海三大帝国。在非洲中部的大湖区，虽然国家制度没有西非先进，乌干达历史上却也出现过布干达王国，以及卢旺达、布隆迪王国。在南部的津巴布韦，一个名叫大津巴布韦的文明留下了巨大的石头建筑，给当年发现遗迹的欧洲人留下了难题，他们想否认这是非洲本土文明，却又找不到证据支持他们的移民理论。

即便不说国家，从更大层面上，世界三大宗教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直在非洲传承，从来没有断绝。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文明已经有了近两千年历史，他们的信仰更接近早期纯粹的基督教，而不是后来被改造过的欧洲基督教。

人们也许不知道，在欧洲人去之前，非洲一半左右的土地已经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这个当时席卷世界的强大宗教给非洲带来了先进文明，也让他们有了反抗西方入侵的思想凝聚力。

但这一切文明的因素在西方入侵之后开始彻底洗牌，原本形成的部落和国家疆界被强行抹平，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被拉入了没有共同渊源的政治架构之下。

不可否认，西方入侵给非洲带来了现代生活，当地人也开起了汽车，用起了手机。在非洲的任何角落，都已经有了现代科技的痕迹。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医药技术让非洲的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即便面临着严重的艾滋病威胁，人们的平均寿命仍然大幅度增长。不管走到哪一个非洲国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批的青年人和儿童，他们虽然生活艰辛，却都坚强地活了下来。

西方殖民体系虽然离开了非洲，却给这儿留下了一个最大的包袱：西方人统治时期任意划分国界，强行把不同的民族拉在一起；到了非洲独立时代，非洲人继承了这种疆界和政治架构，产生了巨大的磨合成本。非洲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法建立一套稳定的政治秩序，让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巨大的摩擦几乎让非洲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强烈的颠簸。

马里曾经是颠簸较少的国家，但在几十年后，随着应力的增大，终于产生了强震。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更是造成了巨大的悲剧。非洲人在一次次尝试着将西方人留下的不平衡释放掉，但这释放的过程，却如同一次次超级地震，将无数的生命埋葬。

在另外一些国家，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强人们开始上台维稳。他们上台的初衷并不是暴政，只是为了维持住殖民体系留下的不稳定架构。但维稳产生的高压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统治成本，让政权本身也难以维持。在扎伊尔（即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强人蒙博托成了非洲形象的代表。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他们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只能依靠条件反射式的高压进行统治，将国家变成了超级监狱。

最近下台的穆加贝声名狼藉，但他也曾经被尊为民族英雄。他既完

成了从白人到黑人的改朝换代，又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社会结构的稳定。但最终他维持不下去了，必须依靠高压进行统治。在前半段世人将他捧得过高，在后半段又将他贬得太低，但他其实是连贯的人。他曾经努力维持，却又被他维持的社会体系拖住，要想继续下去，只能更加强硬，否则，这个社会依然会崩塌。

要想了解非洲的问题，不能仅仅了解那一个个貌似可笑的将军、领袖、独裁者，而应该了解决定了他们“表演”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当西方殖民体系撤出非洲时，由于国家结构天生的不稳定，必然需要很长时间的局部“地震”，才能出现稳定的国家。如何带领人民度过这个不稳定阶段，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需要时间去解决。

更麻烦的是，这个难题留给了本来知识就不足的非洲人。他们在殖民时期就没有接受过足够的宪政教育，缺乏政治架构能力，当被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时，他们只能依靠权力本能地去构建更加稀奇古怪的政府。于是，非洲成了人类政治的试验田，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方案，有的选择社会主义，有的选择资本主义，还有的选择威权或者独裁。加上国家之间、部落之间的摩擦，非洲变得错综复杂。

不过，当我们这样泛泛谈论时，又错过了非洲每一个国家的独特性。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试验，现在的非洲已经开始分化。有的国家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正在步入稳定期，而有的国家却陷入了更大的不稳定状态。

将非洲看成铁板一块是错误的，非洲的政治领袖也在一代一代演化，从最初的知识不足到如今大多具有全球视野。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斗争起家，他们相信人定胜天，强调国家控制。

由于第一代领导人无法率领非洲步入发展轨道，第二代领导人依靠政变上台，开始了另一次蛮横的试验，依靠强力、封闭来维持政权的稳

定性。著名的非洲独裁者大都出自这一代。

当非洲人理解了独裁的危害时，第三代领导人上台了。他们以反对独裁起家，却又明白非洲的离心力太强，暂时无法过渡到西方式的民主，他们往往建立了民主架构，却又采取威权统治的方法长期执政。这种方法还算不上民主，但比起前两代领导人，这种执政方式已使国家变得更加稳定。

当第三代领导人下台后，有的国家会保持威权制，另一批则会转向更加民主和灵活的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迟早会和美洲、亚洲一样，产生一批明星国家。

从2014年开始，到2017年，我曾经两次前往非洲考察那里的社会和政治演化，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它追述了非洲文明的发展轨迹，从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非洲开始，到西方人对非洲的影响，当然更主要的部分留给了非洲独立后的自我挣扎。

在非洲，基督教是最早落地的现代宗教，除了埃及之外，最著名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于是，我们的故事从埃塞俄比亚开始讲起。

第一章
基督文明在非洲

偷渡客雅各布决定在离境前找个姑娘度过最后一夜。

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边境附近，许多准备去肯尼亚讨生活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最后一项支出是，跑到小酒馆里再亲近一次本国的姑娘。

他们之所以这样，源于两国社会触目惊心的差距。

在肯尼亚，卖淫在法律上是禁止的，虽然在地下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子并不少，但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在东非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殊服务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异乡的打工仔舍不得把钱投入到这昂贵的欢愉之中。

而在埃塞俄比亚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国家地处内陆高原，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加上历经数十年的战乱，如今是非洲东部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灾荒年里，女孩子被迫卖淫补贴家用，据说最便宜的时候每次的费用只有1美元。也正因为贫穷，卖淫目前在埃塞俄比亚也是合法的，政府曾经数次讨论要废除卖淫的合法化，但都由于社会反弹而作罢。

2014年，我在埃塞俄比亚时，由于那几年经济发展不错，一夜风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00比尔（人民币65元左右）。对于即将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这个价格仍然是值得的。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侧的小旅馆

里，整整一夜紧紧搂抱着姑娘，恨不能将她们的每一寸肌肤都探索清楚，将每一丝感觉都纳入长久的回味之中。他们第二天就要到达异国的土地，也许几年内都无法亲近女人。

雅各布也遵循着这个规律，找了一个女人。

雅各布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在埃塞俄比亚的小城和乡下，大部分的旅馆都兼做妓院生意。这种小型的旅馆一般都有一个院子，院子周围是几间客房，在临街的一侧有一个小餐馆，餐馆白天卖饭，晚上做酒吧。穿着廉价鲜艳衣服的姑娘们就在酒吧里和客人谈生意，然后入住后面的房间。

我和雅各布是在离境前的那一天，在从迪拉到亚贝洛的车上认识的。那一天，我从沙舍默内出发，换了三趟车才到达亚贝洛。到达时天已经黑了，我邻座的青年建议我和他一同寻找住处。他就是雅各布。

跟随着他，我找了一家便宜但是典型的小旅馆住下。为了表达感激，我请雅各布吃了顿晚餐。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偷渡客，准备去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讨生活。

他的英语很不流利，但加上手势可以交流。

吃完饭，雅各布决定去找姑娘度过出国前的最后一夜。那时已经是晚上9点前后（北京时间凌晨2点），旅馆的餐馆已经改成了酒吧，雅各布点了两瓶啤酒，坐下望着角落里几位绚丽的姑娘。

从长相上看，姑娘们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下。埃塞俄比亚人种介于白色和黑色中间，是一种美丽的咖啡色，带着一种安于天命的善良表情。埃塞俄比亚的男人带着些许阿拉伯人的特征，显得英俊挺拔。比如雅各布，他高高瘦瘦，戴着墨镜，一副摇滚明星的模样。

在我离开酒吧回去睡觉时，雅各布看上了一个身材微丰的年轻女孩。与其他姑娘不同的是，这个女孩还在酒吧兼职做服务生，一眼看不

出她是妓女。她美丽的面容甚至让我也感到心动。

但不管她长得怎样，价格都是固定的——每夜200比尔。

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里洗漱时，看到姑娘从雅各布房间里出来。她看见我，莞尔一笑，又显得有些羞涩，转身回屋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雅各布出来了："哦，纯正的埃塞俄比亚姑娘！来自贡德尔的小甜心！我一夜都没有睡！"他张着手臂动情地对我说，满怀着对夜间的留恋和对白天的憎恨。

我们在他的絮絮叨叨中上路。但慢慢地，雅各布对姑娘的感觉变了，最初他不断地用回味的语气表达着对姑娘的爱慕之情，可后来又忍不住开始贬低她。

"她只是个妓女，跟很多人上过床，她太熟练了，太没有羞耻感。"他总结说。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我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我是个男人，不能离开女人。"

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抱怨，却不忍心戳穿他的真实感受：这个马上就要去往陌生国度的青年在怀念即将离开的祖国。他多想留下，找个女人过日子，可是祖国却养活不了他，逼着他去别人的国家，还必须偷渡过去。他试图贬低祖国的一切，为自己的离去提供正当性，但却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雅各布：当社会养活不了人民

从亚贝洛去往边境莫亚莱，我们又换了三次车，一直折腾到下午才过境。在旅途上，我了解了雅各布更多的身世。

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那儿的人普遍都信奉基督教，所以他有了这个基督教意义的名字。基督教在四五世纪就已经传到了埃塞俄比亚，被当地人普遍接受。

雅各布所在的村子依靠种地为生，而最近这些年，年轻人纷纷外出，去找事做。在路上，他不停地诅咒着祖国。这个国家号称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非洲仅次于埃及），却养不起它的人民。

随着这几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埃塞俄比亚国内也有了不少工厂可以打工，但由于尚处于发展初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工资低，二是吸纳不了这么多工人。所以许多人还是得跑到邻国肯尼亚去打工。在大街上还有不少无业的青年。特别是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许多人变成了小偷。虽然埃塞俄比亚很少有恶性案件，但却是小偷小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在首都时，曾经有一天已经碰到了两个小偷和两个骗子，当第三个骗子的搭讪被我拒绝时，那人就开始威胁我，让我滚出他们的国家。

雅各布曾经走遍了埃塞俄比亚的大小城市，希望找点事做，却并不顺利。他偷渡去过索马里兰，那儿有一个叫柏培拉的港口，雅各布希望从那儿倒腾点东西做点小买卖，但还是失败了。

恰好在这时，在肯尼亚的一位堂哥叫他去内罗毕帮忙，至于去做什么，雅各布没有说清楚。于是，去肯尼亚就成了这名青年的渴望。

但最现实的问题是：他没有护照。在埃塞俄比亚，办理护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试图让我明白，他根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拿到护照，要想去往肯尼亚只能靠偷渡。

至于如何偷渡，我并没有概念，但雅各布却试图让我相信，偷渡是可能的。这个国家一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肯尼亚打工，他们大都没有合法证件，只能依靠偷渡、行贿等手段。只要进入肯尼亚就安全了。

雅各布甚至指望我能够帮助他。

“我能帮你什么？”我好奇地问道。

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如果有人盘查他，让我替他说句话，证明我们在一起旅行。

我对非洲的偷渡还完全没有概念，害怕这个青年给我添麻烦，影响行程。但好奇心又让我不肯离开他，想更多地观察这个青年的生活。我打定主意，在不影响我的情况下，我会帮他说话，一旦情况有变，我会立即把实情说出来自保。

就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这名偷渡客到达了口岸城市莫亚莱。

在莫亚莱下了汽车，雅各布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这座位于埃肯边界的小城只是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懒洋洋地趴在非洲东部的红土地上。小城周边方圆几百千米都是稀疏的林地，半干旱的红土充满了蚁穴。由于缺水，这里很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果不是因为它是边境，也许住户不会超过一百家。

小城的中心被一座小桥一分为二，一半属于埃塞俄比亚，一半属于肯尼亚。平常，这座桥上都会有人把守，一条绳子拦在中间。雅各布所谓的偷渡，是趁桥上的人吃饭、上厕所或者偷懒的时候，悄悄从绳子下钻过去。雅各布的命运将在桥上被决定。

与中国不同，在非洲过境时人们所持的证件五花八门，拥有正式护照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都是由不同部门签发的临时通行证。只要给钱，许多部门，都会随便找张纸写几个字充当通行证。边境官员在检查这些纸时，仿佛是掷骰子般决定哪张纸管用，哪张纸不管用，持哪张纸可以直接过，持哪张纸需要付多少钱。

但大部分人好歹还有张纸，而雅各布连这样的纸都没有。

雅各布甚至连埃塞俄比亚的身份证都没有带，他持有的是不知道从哪儿捡的一张苏丹身份证。这张身份证曾经过塑密封，但已经被水泡成了两片。身份证上模糊的照片显然不是他本人。

他的指望是：如果能够悄悄过关最好，万一被抓，就用这张苏丹身份证冒充，希望边检不熟悉这张纸，在迷迷糊糊中放他过关。

快走到桥头时，我找到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局办公室去盖出境章，雅各布在门口等我。10分钟后，我拿着盖了章的护照从办公室出来，却发现雅各布已经闯了大祸。

原来，桥头没有穿制服的守卫，只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大大咧咧坐在地上，看上去像是偶尔坐下来休息的闲人。雅各布一看是个机会，便从绳子下面飞快地钻过去，向肯尼亚一侧跑去。就在刹那间，两个便衣突然弹起来，向这个可怜的偷渡客扑去，将他按在身下。他们就是守卫，而雅各布没有认出来。我出门的时候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雅各布被扭到了桥边，他看见我出来，用英语大声地朝我呼救。

两个守卫也挥了挥手，示意我过去。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向他们走去。他们用当地语言审问着偷渡客，并不时地用比雅各布更熟练的英语同我核对。

从他们的问话里，我知道雅各布把自己描述成中国人的小跟班，陪着我从苏丹前往肯尼亚。我一面思考着如何自保，一面小心翼翼地回答

着守卫的问题。

“你真的认识他？”

“是的。”我回答，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昨天才认识。

“你和他一起旅行？”

“是的。”

“在哪里认识他的？”

我沉默了。如果我说是在亚贝洛认识的，他们立即会知道我们只不过刚认识不久。这时雅各布救了急，他喊出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苏丹地名，意思是我们是在那儿认识的。他说，我们一同从苏丹进入埃塞俄比亚，打算过境去往肯尼亚。

“是吗？”守卫反问我。

我避免直接回答他，而是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对方将这个表示看成是我默认了。

“这就是说，你们在南苏丹就认识了。可你没有去过南苏丹。”守卫翻着我的护照说。

原来，雅各布说的地名在南苏丹，而我的护照上只有苏丹的签证章，我不可能跑到南苏丹与他认识。2011年，南苏丹就已脱离苏丹独立。雅各布的谎言被识破了。

我低下头，开始考虑如何自保。显然，保护雅各布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如果他们继续问下去，我们的话将更加漏洞百出。我们甚至没有事先对一对台词，这注定我们会被识破。

然而就在这时，守卫不再问问题了。他们直视着我，指着雅各布，一字一句严肃地说：“我们可以把他放过去，但是，以后不管再出什么事，只有你和他能负责了，记住我的话。”

在我和雅各布还在发愣的时候，他们挥了挥手，让我们过了关。

就这样，雅各布过了第一关：埃塞俄比亚边检。接下来，在桥的另一边还有一关：肯尼亚边检。

过了桥，我们战战兢兢等待着被肯尼亚边检拦截和盘问。最初，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经过肯尼亚移民局办公室时，我走进去申请肯尼亚的落地签，雅各布把箱子往门口一放，借口找厕所，却不知道钻到了哪里去等我。

这次办理签证花了将近20分钟，从移民局走出来时，雅各布的箱子还在，但人不知在哪儿。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也许他又出事了。

经过了桥头的折腾，我对这个偷渡客产生了好感。他已经来到了肯尼亚的土地上，我希望他能够到达目的地，而不是被遣返回家。我深深地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存权，每个人都应该自由迁移。巴菲特讲过所谓卵巢彩票，即一个人的出生决定了他的命运，我知道这是事实，却并不想承认它的合理性。

我已经决定，只要能够帮助他，就一定会帮他。

就在我着急四处寻找他时，雅各布却突然出现了。原来，他一直躲在旁边的旮旯里，避免被人看到。见我出来了，他才回来。

事情变得无比顺利。前面还有一个关卡，应该有警察，但我们过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看来，肯尼亚的边境管理比埃塞俄比亚松得多。

我们大摇大摆地到了镇中心的车站，买好了第二天清晨去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汽车票，又找了个住处。雅各布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歌。他已经安全地踏上了肯尼亚的土地，虽然没有合法的证件，但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游走。

他总是跟我说："我的中国朋友，谢谢你帮我来到了肯尼亚。"

他又开始向我抱怨昨天没有睡好觉，说那个女孩真折腾，不像是妓女，反而像是女朋友一样贪得无厌。他要好好睡一觉，等到了内罗毕，好精神抖擞地去见亲戚。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去往内罗毕的一批班车便在颠簸的道路上出发了。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望着外面的风景。这条路在不久之后将由中国人铺成柏油路，但在我们经过时，还是颠簸的土路，一路下来可以将人颠散架。

汽车开了1个小时，突然在路边停下了。

上来几个人高马大、拿着枪的士兵，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军哥哥，看上去是士官，说话如同英国人一样彬彬有礼，不带任何杂音。

“把你们的护照、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拿出来！”他对满车乘客说。

我和雅各布对望了一眼。雅各布还没有从兴奋和憧憬中回过神来。我们知道路上会有检查，但既然边检都过了，检查应该不会太严格。另外，我们都认为肯尼亚的检查也许比埃塞俄比亚要松，所以都没有太在意。

士官挨个儿检查着人们的证件。随着他们走近，我开始为雅各布担心。可雅各布本人看起来很放松，他的情绪带动了我，我将心放回了肚子里。

检查到雅各布的时候，雅各布终于亮出了他的终极武器：那张泡裂了的苏丹身份证。在桥上的边检他都没有拿出过这张纸，这是第一次使用。

“这是什么？”士官带着惊奇的语气问道。

“这是我的签证（Visa）。”

“你的签证？”士官被搞蒙了。

“苏丹签证，我是苏丹人。”雅各布说。

士官和我突然都明白了，可怜的雅各布连签证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把身份证说成了签证。士官没有说什么，继续检查别人的证件。我和雅各布一度认为他已经过关了。

但是，当士官把车上其他人的证件都检查完了之后，又走了过来，望着雅各布。

雅各布再次把纸片挥了挥。

士官从雅各布手中抢过纸片，向车窗外扔了出去。他继续问道：“你到底有什么合法的证件没有？”

雅各布张了张嘴，想讲故事，但士官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道：“你的合法证件！”

雅各布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叙述他是苏丹人。士官回头唤了一声，一名手持步枪的士兵走了上来。他反转步枪，用枪托朝着雅各布头上敲了下去。

“拿上你的行李跟我走！”士官命令说。

雅各布叹了一口气，顺从地站起来，从货架上拿下了自己的箱子，跟在士官身后走下了车。他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直到车又上路了，我才看见过道里有几滴血迹，那是雅各布留下的。我没有帮他说一句话，当士兵打雅各布时，我却在想桥头守卫的话：“以后不管再出什么事，只有你和他能负责了，记住我的话。”

我知道，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说不清自己是怯懦，还是过于明智。我仿佛在看着纳粹带走了一个犹太人，而我却一言不发，保持沉默。

雅各布走后，我才知道，从莫亚莱到内罗毕的道路是肯尼亚政府特别关注的一条路。由于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接壤，索马里的恐怖分子、埃塞俄比亚的偷渡客都从这里乘车前往肯尼亚的中心地区，所以政府对这里的检查力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雅各布下车后，一路上我们又被查护照不下十次。也就是说，即便他躲过了第一次检查，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只要坐公共交通，就免不了会被查到。而在肯尼亚的其他地区，我从来没有被查过护照。

也许，雅各布唯一的机会，就是在过境后不要乘坐公共交通，而是打听清楚关卡后，分段赶往内罗毕。但前面的顺利让我们太大意了，以为已经没事了，哪知立刻受到了惩罚……

我再也没有见过雅各布，那名对我炫耀风流一夜的偷渡客。我不知道他是已经回到了祖国，还是仍然被关在肯尼亚，抑或已经到达了内罗毕。

当一个国家让他的人民被迫背井离乡时，它的国民会遭受多少歧视？那些离乡的人即便在异国他乡，也仍然被自己的国家所拖累，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强加给他们的规矩。他们是一群无处可逃的偷渡客。

所罗门后代保佑埃塞俄比亚

雅各布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在近代经历过两次政治失败，1973年和1984年又相继发生了总共上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即便到了现在，干旱和歉收依然隔三岔五来访。但埃塞俄比亚人民却是非洲最骄傲的国民，因为他们是《圣经》里大富翁所罗门王的后代，他们的女性祖先则追溯到了《圣经》里的大富婆希巴女王。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仅存的信仰基督教的政权国家，沉浸在基督的仁慈保佑之下。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一直流传着东方约翰王的故事。由于伊斯兰教的崛起，西方世界最初无法抵抗伊斯兰教的冲击，他们开始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住着一位基督教的国王——约翰王。

至于约翰王在什么地方，人们一时无法确定，但他们却认定某一天，约翰王会在东方攻击伊斯兰教，与西方一起形成夹击，挽救基督教。

当蒙古人横扫欧亚时，有人相信东方的约翰王就是蒙古人。即便发现蒙古人是异教徒，他们仍然寄希望于帮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将他们的首领“变成”约翰王，带领他们去攻击伊斯兰教徒。但可惜的是，当时的蒙古人对宗教并不关心，用现代观点来看，也可以说蒙古族是一个宗教宽容的民族。蒙古帝国的第四代大汗蒙哥曾经在宫廷组织宗教辩论大会，允许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公平地竞争。辩论完毕，蒙哥总结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信奉的神，蒙古人也有自己的腾格里大神，这些神或者就是一个，或者不是一个，但何必去强迫他人改信别人的神呢？

到了后来，蒙古人的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反而都改信了伊斯兰教。位于伊朗的伊利汗国改宗之前，汗国的大汗们曾经与西方恢复了联系，试图联合西方进攻伊斯兰教地区，但西方没有回应。等西方明白过来时，蒙古人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

既然约翰王不是蒙古人，那么东方约翰到底在哪儿呢？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那么必然是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地区唯一一直保持基督教信仰的古国。当然，它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所区别，是从埃及传过去的，而埃及的基督教被称为科普特派。

如今，埃及仍然保持着一定比例的科普特人口。在开罗，他们居住在特定的科普特区，拥有自己的教堂。由于千百年来的不安全感，科普特区一直有堡垒化倾向。区域外围是一圈围墙，围墙内划分的街区又由许多小门隔开，道路很窄，便于防守。

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埃及的恐怖行动大都针对这个少数派基督徒们。2017年，我从开罗市中心坐车前往机场，看到路边一个巨大的科普特教堂正在修缮。旁边的人告诉我，几个月前，就是这个教堂内的爆炸，造成了数十人死亡。

在从埃及去往利比亚的路上，有一个美丽的小港马特鲁港，这里有埃及最漂亮的海滩之一。这座小港曾经是埃及人到利比亚打工的必经之地。当利比亚进入战乱时代，利比亚的恐怖分子把埃及的打工仔都抓起来，鉴别出科普特教徒，让他们并排跪在海边实施斩首，这成了埃及科普特教徒永远的痛。

科普特教徒与普通基督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教义说基督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所以他们被称为一性论者，而普通基督徒认为耶稣同时具有人性与神性。这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导致了两派一千多年的分裂。科普特人有自己的教皇，说着古老的埃及语（现在叫科普特语）。破译埃及

象形文字的语言学家商博良就是学会了科普特语，才成功释读了那些古怪的符号。

在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苏丹境内，原本还有不少基督教国家，有的甚至存活很久，但最终都被伊斯兰教同化了。只有埃塞俄比亚保留了基督教信仰。

去埃塞俄比亚旅行后，会对它现在保留下来的巨大文明纪念物感到震惊。当埃及处于新王朝时代，埃塞俄比亚已经有了文明的迹象，当时的文明被人们称为D'mt。这个文明继续发展，形成了伟大的阿克苏姆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延续了将近一千年，才彻底衰落。

在埃塞俄比亚城市阿克苏姆，耸立着许多几十米高的巨大纪念碑，它们如同巨剑插向天空，碑身上刻着现代已经无法释读的符号。如果不是因为埃及有了金字塔，那么阿克苏姆石碑完全能够成为非洲古代世界的第一大奇迹。

阿克苏姆依靠贸易立国，当时的埃塞俄比亚还有海岸线，它处于红海的南端，控制红海海口，成了红海贸易的关键一环。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随着贸易来到了阿克苏姆，并成为统治性的宗教。埃塞俄比亚人的信仰非常虔诚，他们不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还认定自己就是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国王，示巴女王是某个南方王国的女王，曾经去耶路撒冷见过所罗门王。埃塞俄比亚人就对号入座，认为这个南方王国就是阿克苏姆，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发生关系后回到埃塞俄比亚，后代形成了稳定的族群。

埃塞俄比亚人的皮肤是棕色的，比非洲黑人白一些，明显带有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同属闪族人）的面貌特征，这也被他们用来证明自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

伊斯兰教进入非洲后，阿克苏姆与海逐渐隔离了，信奉基督教的他

们与外界隔绝开来。于是，他们只好从《圣经》里寻找心灵依托，这使得他们的信仰更加虔诚了。

现在的阿克苏姆已经退变成一个小城镇，但仍然教堂遍地，人们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基督教礼仪活动，成了当地著名的文化标志。

阿克苏姆王国后来被扎格维王朝取代，而扎格维王朝给世界带来了另一大奇迹。他们把首都定在了阿克苏姆以南数百千米的拉利贝拉，在那儿挖了一系列的岩石教堂。这些教堂不是在山体上，而是深入平地之中。从远处看，那只是一片平地，走近了，才会看到人们已经把脚下的岩石凿开，下面变成了教堂。

去往拉利贝拉，会对教堂巨大的规模，以及匪夷所思的设计感到震惊。在古代这需要多少工作量才能做到啊。

由于扎格维王朝已经不再占有海岸线，他们占据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又实在易守难攻，当穆斯林占领了周围的土地，反而把埃塞俄比亚这片地区遗漏了，这是他们能够长期保持基督教信仰的关键。

扎格维王朝后期，一位自称所罗门王后裔的人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所罗门王朝。由于皇族成了“名正言顺”的所罗门后代，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更加有了仪式感，人们把信仰它与尊崇皇帝等同了起来，上帝与世间的统治者合一了。

所罗门王朝的寿命极其漫长，从127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当它建立的时候，还是中国的南宋末期，到它灭亡时，中国已经跨越了元、明、清和民国，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之所以残存如此长久，不是因为它的强大，而是地理上的孤立，这使得它易守难攻，让外界觉得没有必要打扰这个沉睡的王国。事实上，到了近代，意大利人曾经试图占领埃塞俄比亚，却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地理因素造成的进攻困难。

但长久的独立却让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产生了幻觉，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强大，以及上帝的保佑。于是，皇帝的统治是以绝对的集权为特征的，没有想过要搞改革，更没有打算施行君主立宪制。非洲联盟的总部也设在了埃塞俄比亚，这是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争取来的，因为毕竟它曾经是两个非洲独立国之一（另一个是利比里亚），非洲都承认它是最强大的。表面的强大与人民的极度贫穷，构成了埃塞俄比亚的两极。

由于社会没有经过人文主义运动，皇帝被推翻后，另一个统治者门格斯图上台了，人们只是把门格斯图当作另一个皇帝来供奉。这种逆来顺受的特征带给人们极大的悲剧，他们吃苦耐劳，很少反抗。也就是说，只要让他们活着，谁在台上他们并不在乎。

基督教的非洲

虽然埃塞俄比亚是近代非洲唯一的基督教国家，但在古代，基督教也曾经在非洲繁荣过。

人们到达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埃及人称之为伊斯坎德里亚），会发现这里和埃及其他地区风格迥异。这里濒临地中海，即便到了夏天也是凉风习习，与炎热的开罗形成鲜明对比。这座城市之所以叫亚历山大，是因为它是位于希腊地区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时建立的。亚历山大从建设之初，就带上了浓厚的欧洲风味。至今，人们还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就埋葬在这座城市的某处。

在基督教得势之前，亚历山大是世界的学术中心，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以研究希腊哲学著称。希腊本土衰落后，大量的希腊著作都被转移到了这里收藏。

但是，亚历山大的学术地位却随着基督教的得势而告终。这座城市突然间变成了世界迫害异教徒的中心。由于图书馆保存的是异教徒的思想，所以它也被付之一炬，所有的文献都化为了灰烬。

城市里曾经住着一位美丽的女哲学家希帕提娅，她信奉从希腊流传下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基督徒得势之后，暴徒们将希帕提娅从车上拉下拖到教堂里，剥光衣服，将她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就这样残忍地把她杀害了。

亚历山大城的人们在信仰上表现得非常极端，却对基督教的思想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基督教诞生后，人们对于耶稣和上帝的关系一直争论不已。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悖论：第一，上帝是唯一的神；第二，耶

稣是上帝的儿子。请问：耶稣是不是神？

如果回答耶稣是神，那么就有了耶稣和上帝两个神，违背了上帝是唯一的神的论断。

如果回答耶稣不是神，那么作为神的上帝，怎么会生出一个肉眼凡胎的儿子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分成了两大派别，这两派别的学术带头人都和亚历山大城有渊源。其中一派的带头人叫阿里乌斯，他虽然不是埃及人，却在亚历山大担任过长老。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神，就是上帝，耶稣不是神，只是神的创造，所以才会经受那么多苦难，最后被杀死。另一派的带头人叫阿塔纳修斯，他在亚历山大担任主教，官职比阿里乌斯大。阿塔纳修斯认为耶稣是神，但是耶稣这个神和上帝这个神是同一个神，他们是神的不同化身，这就是所谓的同一“体”格，不同的“位”格。到后来这个理论发展成了三位一体理论。

双方斗争得极其残酷，动不动就要置对方于死地。最初得势的是阿里乌斯派，但后来阿塔纳修斯咸鱼翻身，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阿里乌斯派则成了永久的异端。

由于信仰的坚定性，亚历山大城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一直非常崇高，最初仅次于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比罗马城都高，到后来影响力小一点了，但也仅次于罗马。以亚历山大为中心，埃及的开罗也被波及，它抛弃了原本的信仰，转变成了基督教城市。

但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亚历山大的基督教终于成了少数派。伊斯兰教统治者允许基督教徒保持信仰，只是要交一点税。但不管怎样，随着伊斯兰统治的加固，基督徒的人数在逐渐减少。

一直到现代，亚历山大和开罗仍然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已经当了一千多年的被统治者，但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信仰。我们曾经感慨犹太人能

够在一千多年里一直顽强地保持信仰，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强信仰的宗教组织都有这种能力。埃及的基督徒由于足够极端，上台后凶狠地迫害异教徒，下台后拼命反抗，他们的信仰才得以长久保持；而伊斯兰教也有不少人特别极端，因此他们能够抵制现代社会的世俗化潮流，并成为信仰的堡垒。

除了埃及之外，北非的其他地区也曾经有过基督教的传播。

北非国家突尼斯有许多罗马时期的遗迹。在首都突尼斯城的旁边，就是著名的迦太基遗址。这里在古代世界的名气比现在要大得多，因为它曾经是罗马最大的敌人。迦太基的将领汉尼拔曾经从突尼斯出发进入欧洲的西班牙，再从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数次将罗马打得大败，一度差点儿攻入罗马城，但罗马将领西庇阿最终击败了迦太基人。

这座迦太基古城位于突尼斯城旁的海岬上，居高临下监视着地中海海面。在城市南面，有一个巨大的潟湖，可以容纳一支超级海军。虽然迦太基的名气很响，但现存的遗址却比较零散。除了个别的墓葬之外，大部分的遗存都是罗马人留下的。

当罗马终于费力征服迦太基之后，他们将城市全部破坏，将城市的土地撒上盐，防止人们再次移居到这里，可见他们对于迦太基人的仇恨之深。但是，由于迦太基的地理位置太好，他们平静下来之后，决定在这里殖民，这才有了后面的大浴室、剧场，以及依山而建的别墅群。

与罗马人后来的殖民一样，迦太基本来就是外来人建立的城市，建立城市的人种叫腓尼基人。他们来自亚洲，基地建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黎巴嫩的比布鲁斯还残存着当年腓尼基人的海港，他们就是从那儿出发横渡地中海，来到了突尼斯。

腓尼基人到来之前，突尼斯已经有了不少当地人，被称为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本身就是一个混血人种，他们与亚洲人、欧洲人的血缘更

加密切，与其余非洲人已经有了区隔。对于人类来说，北面的地中海是容易跨越的，而南面的撒哈拉才是真正的死亡之海。

在罗马与迦太基争斗的时期，柏柏尔人被称为努米底亚人，时而为迦太基的臣属，时而为罗马的盟友。罗马得胜后，北非成为罗马属地。于是，在如今突尼斯的土地上保留了众多的古迹，是整个罗马世界保留最好的古迹之一。

突尼斯的杜加保留着世界上最完整的罗马古城之一，在埃尔·杰姆也有一个庞大的角斗场。罗马人入驻后，把他们喜欢的杀戮游戏立刻引入非洲，多少非洲的战士在这里丧命，只是为了让那些所谓的上等人开心一会儿。

如今，迦太基和罗马早已尘封，柏柏尔人却仍然存在。当阿拉伯人从亚洲过来后，柏柏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伊斯兰教扩张的先锋，并在非洲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

除了突尼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境内也有罗马时期的遗迹。只是由于突尼斯与意大利距离最近，所以这里的遗迹最多。而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还属于边区。

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北非地区也基督化了。

摩洛哥的基督化没有亚历山大彻底，因为罗马帝国在皈依基督不久就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存在时间很长，直到一千年后的1453年才最终灭亡。亚历山大属于东罗马，有几百年时间巩固其基督信仰。而西罗马帝国很快就被从欧洲北方来的野蛮人打败了，这些野蛮人就是如今的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祖先。

一支叫汪达尔人的野蛮人从西班牙渡过海峡来到了非洲，破坏了北非的基督教文明。从此，除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外，基督教在非洲走向了衰落。

非洲基督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只在撒哈拉沙漠以北传播。埃塞俄比亚由于处于非洲之角的高原，受红海贸易的影响，算是一个例外。由于基督文明穿不透死亡沙海，上帝对于撒哈拉以南的地区也无可奈何。但有一个宗教却穿透了死亡沙海，成功地将影响力扩展到了撒哈拉以南，并使半个非洲都皈依了它，这个宗教就是伊斯兰教。

第二章
穆斯林的非洲世界

从摩洛哥的城市丹吉尔的老城区向北方眺望，近处是一片蓝色的大海，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条黑色的痕迹，那就是欧洲西班牙的高山了。

只有站在这片非洲边缘的土地上，才知道非洲与欧洲离得多么近。一个人只要体力好，依靠游泳都可以越过这段距离。

丹吉尔距离欧洲还算是直布罗陀海峡中比较遥远的，从丹吉尔往西可以到达一个叫休达的地方，它的对面十几千米外，就是著名的直布罗陀山。在古代，这座岩山被称为赫拉克勒斯石柱，被认为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留下的。石柱以内是便于航行的地中海，从史前开始人们就已经熟悉了地中海的环境，而石柱之外，就是浩瀚的大西洋，直到15世纪末才被人类征服。

海峡周边的政治关系也比较奇特。北面的直布罗陀山挨着西班牙，却属于英国人。南面的休达已经在非洲，紧挨着摩洛哥，却属于西班牙。由于英国人实力最强，他们占据了海峡最好的位置。直布罗陀在历次战争中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即便现在英国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却仍然誓死捍卫这片巴掌大的土地。西班牙人打不过英国人，却可以欺负摩洛哥人，于是占领了位于非洲的休达。

休达与非洲其他地区用铁丝网隔开，在铁丝网外，居住着大量的非

洲难民，他们只要爬过铁丝网，从理论上就到达了西班牙国土。再把带有身份标记的证件烧掉，西班牙就很难把他们遣返回去。因为遣返必须知道他们的国籍，只要他们不说，西班牙就不知道该把他们送回哪儿。

除了翻越铁丝网，另一条途径就是坐上快艇越过海峡到达欧洲大陆。偷渡的主要是以尼日利亚人为代表的西非人，以索马里人为代表的东非人，以及中部非洲战乱地区的人们。最近几年，甚至有许多亚洲人偷渡来非洲，他们来自从阿富汗到叙利亚的漫长战争地带，从亚洲先跑到埃及，再从埃及进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利比亚和摩洛哥是难民的主要渡海地区。这些难民为了进入非洲，相当于绕过了整个地中海。

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选择这样的道路，是为了利用北非国家之间边界的漏洞。不管是埃及与利比亚之间，还是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之间，以及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之间，都有着大片的沙漠，边境线又漫长，几乎不可能防住偷渡。

偷渡客们最难通过的地方位于亚欧分界线附近。从西奈半岛来的汽车到达非洲大陆之前，乘客必须都下车，手提着行李站成一排，警察牵着警犬挨个儿把所有的包都检查一遍，并把可疑的人盘查完毕，才准予通行。这是在非洲大地上接受的最严格的检查，检查过程也严禁拍照，任何多余的举动都可能导致乘客被扣留。

警察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除了西奈半岛是传统的恐怖主义势力渗透区域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苏伊士运河。当汽车再次上路，走上一分钟就会进入隧道，从隧道出来，苏伊士运河就被抛在身后了。如果汽车中带有炸药，并在运河下方引爆，将会给埃及的经济命脉造成致命的打击。

虽然现代检查如此严格，但对古代人来说，从亚洲到非洲却是那么简单，他们甚至感觉不到穿越了什么界线，就已经站在了非洲的土地

上。

正因为从欧洲和亚洲到达非洲都不算困难，所以非洲从古至今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都不算陌生。关于古埃及人到底是本地人还是从亚洲回迁的（当然他们最早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一直争论不休。即便是进入有确凿记载的时代，亚洲和非洲之间也有着频繁的交流。埃及的新王朝不仅占领了非洲，还曾经统治了亚洲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与土耳其的赫梯人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并签署了最早的和平条约。所谓“和平条约”，往往意味着双方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当他们实在打烦了，才会签订条约。

波斯人也曾经入侵过埃及，波斯王的大军以为世界上最凶险的地方莫过于位于伊朗的盐漠，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更大的撒哈拉。他们对付得了盐漠，但入侵埃及后，却消失在了撒哈拉之中，再也没有走出来。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借道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欧洲入侵过埃及。他直达埃及的最西面——撒哈拉沙漠里遥远的锡瓦绿洲。亚历山大的将领们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

除了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也曾经从属于罗马帝国。但真正对现代北非造成持续影响的，却是阿拉伯人的征服。

阿拉伯人从沙特出发，经过巴勒斯坦、西奈进入埃及，顺着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到达了摩洛哥，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横扫了西班牙。直到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才最终把阿拉伯人政权赶回非洲。

从这时开始，北非的重心从突尼斯转移到了摩洛哥。突尼斯之所以成为欧洲文明在非洲的中心，是因为它距离罗马更近。但从突尼斯到欧洲的地中海却很宽阔，不容易通过。等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建立帝国时，摩洛哥作为更容易与欧洲沟通的地区后来居上。

突尼斯与摩洛哥的竞争一直持续到现代，作为非洲发展最好的国

家，它们在工业、交通等各方面都存在竞争关系。突尼斯工业更加发达，但摩洛哥商业领先。随着2010年突尼斯革命引起的混乱，摩洛哥立刻感到了机会的到来，开始更加卖力地招商引资，加大出口力度，沟通欧洲与非洲。

去非洲之前，我以为非洲的伊斯兰世界只限于北非，到了那儿才发现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比我想的要大得多。到底有多大？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一大半的土地都有伊斯兰的痕迹，受影响的人口更是占了一半多。即便到现在，那些曾经被伊斯兰文明影响过的地区也是非洲最发达的地区。从这个角度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就是一个穆斯林的大陆。”一位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的学者这么告诉我。

现在，这个穆斯林的大陆还剩下多少呢？

半个非洲属于穆斯林

“我们是一群没有祖国的人，但我们有真正的伊斯兰信仰。”穆罕默德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英语告诉我。

那一天，我从西撒哈拉的城市达赫拉坐车前往毛里塔尼亚边境城市努瓦迪布，车上正好遇到了这位名叫穆罕默德的人。

穆罕默德是西撒哈拉人。我们车上坐了六个人，分别是毛里塔尼亚籍的司机，一位在毛里塔尼亚颇受尊重的歌手，一对西撒哈拉的小夫妇，以及西撒哈拉人穆罕默德和我。

歌手是应邀到达赫拉为一个庆祝仪式献歌的，现在已经结束，正要回家。西撒哈拉的小夫妇要经过毛里塔尼亚前往阿尔及利亚。

穆罕默德的路线最怪，我需要做一下说明。

穆罕默德其实是想去往西撒哈拉东边的一个边境小镇探亲，本来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旅行，但他却不能直接前往，必须首先坐汽车到另一个国家毛里塔尼亚，再挤上火车，在两国边境上的毛里塔尼亚境内绕上大半圈，到一个叫祖埃拉特的小镇，再重新想办法越过国境线，回到西撒哈拉，才能到达他要去的小镇。

他之所以必须这么走，就因为他是西撒哈拉人。当地人往往直接称自己是撒哈拉人，连“西”字都不要。

对于非洲来说，最困扰的问题之一是：西撒哈拉是一个国家吗？

它位于摩洛哥南面、毛里塔尼亚北面、阿尔及利亚西面，在地图上，它与摩洛哥的边界画的不是代表国境的实线，而是一条虚线。

实际上，这是一个西班牙制造的“国家”。如果没有西班牙人，谁也不会想到这片荒漠一般的土地竟然能捏合出一个国家。它的面积并不小，有26万平方千米，比英国还大，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它除了沙漠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即便它拥有很长的大西洋海岸，但大海并没有带来雨水，在离海岸几百米的地方，就已经满眼荒漠。在蓝色与黄色之间，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

西撒哈拉以南是法国人曾经占领的毛里塔尼亚，北面则是摩洛哥王国。如果没有西班牙人，西撒哈拉将成为摩洛哥王国的自然延伸。但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这片不毛之地上的人们竟然产生了民族感情。西班牙人撤退后，西撒哈拉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实体，不愿意并入摩洛哥，而是要求独立。

现在，西撒哈拉的大部分（特别是海岸地区）由摩洛哥占领，只有东面少数的沙漠地带由当地的游击队占据。即便这样，非洲也有一半的国家承认西撒哈拉的独立。

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不幸的是他所居住的大城市阿尤恩（西撒哈拉首都）位于摩洛哥控制范围内，而他要去的小镇则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两者之间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差别还好说，更重要的区别是交通上的。摩洛哥控制区内修了几条柏油路，已经现代化了；游击队控制区内却基本上没有交通，仍然是土路和牲畜的天下。如果直接前往，反而不如绕路来得快。于是，只有两三百千米的距离反而要绕行一千多千米才能到达。

当然，绕路也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证件。穆罕默德，以及同车的小夫妇都给我看过他们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是由西撒哈拉政府发的，上面写着“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持有身份证并不能让他们出国，他们必须申请护照。而护照却是摩洛哥发的，上面写的国籍是摩洛哥。

他们到底是西撒哈拉的公民，还是摩洛哥的公民，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只知道如果不持有这个写着“摩洛哥”的护照，就无法出国。而他们去往的国家毛里塔尼亚，是承认西撒哈拉独立的，同时也接受摩洛哥护照。

毛里塔尼亚城市努瓦迪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在这里，有一列据说是世界上最长的火车，它通往西部的矿区祖埃拉特。矿石和海产品是毛里塔尼亚仅有的出口产品，它们肩负着换外汇的重任。

列车车厢一共有110节。其中有108节是拉铁矿石的，剩下两节一节是火车头，另一节是客车车厢。

由于毛里塔尼亚严重缺乏公路，这列一天一趟的火车已经成了连接毛里塔尼亚北部几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在等车时，我看到了更多来自西撒哈拉的人。他们有的是借道邻国去串亲戚，有的则是去铁矿区打工。

年轻人扎堆，有说有笑，看不出与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直到太阳落山，我都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就在太阳落下的一刹那，伊斯兰世界熟悉的召唤人们礼拜的声音响起，突然间，人群安静下来。女人们默默地坐着，不再说话。男人们如同听到了口令，全都站起来，朝着旁边的空地走去。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

接着，他们排成队，所有的人都面朝麦加跪下，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站着。我仿佛成了这个星球上的异类，孤立无援。

就在这时，一群小伙子站起身朝我逼了过来。“你为什么不跪下？”为首的一个人义正词严地问我。

看到他们愤怒的眼神，我才知道，作为异教徒的我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的群体。由于常年行走于中亚—中东—非洲的伊斯兰区域，我对每个

地方世俗化的程度都有所体会。

最世俗化的是中亚，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这里的穆斯林经过苏联时期的统治已变得更世俗化。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花衣裳，露着头发和脸蛋，在街头偶一回头，让人心都融化了。男人们饮酒作乐，不遵守礼拜规矩。

其次是土耳其和突尼斯。由于与欧洲接壤，土耳其当年的开国者阿塔图尔克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崛起，强行开展了世俗化运动。虽然这几年社会在回潮，但仍然保持着中东世界世俗化标本的地位。突尼斯也是伊斯兰国家，但世俗化程度与土耳其接近。

再次则是伊朗等什叶派的区域，以及北非明珠摩洛哥（它属于逊尼派）。在历史上，什叶派本身不是一个古板的教派，善于变通。在伊朗，虽然经过了霍梅尼革命，但在民间仍然保持着比较开放的心态。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们的世俗化。摩洛哥的现任国王比较开明，社会也很宽容，甚至比伊朗更加世俗化一些。

传统上最保守的地区包括这几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阿拉伯地区。巴基斯坦原本已经开化，但由于国内危机不断，人们回到宗教去寻找寄托，加上政府的鼓励，使得国家日益回到宗教轨道上。阿富汗的中央政府曾经追求过极度世俗化，却由于保守势力的敌视、外国的干涉，重新变得保守起来。至于阿拉伯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拥有一半基督教人口的黎巴嫩既有极度自由的一面，也出了最保守的真主党武装。沙特则是保守和宗教主义的大本营。埃及有一个试图世俗化的政府，却又有非常保守的民间。

那么，除了这些区域，非洲的穆斯林到底处于世俗化坐标的哪一个点上呢？在努瓦迪布，我在内心里给他们定了位：即便在最虔诚的巴基斯坦、埃及，也不会强迫异教的朋友下跪。但在这里，如果我不跪下，很可能会被他们痛打一顿，甚至有生命危险。

如果不是穆罕默德，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尴尬的局面。在我手足无措时，他已经靠了过来。

“快喊‘安拉至大’！”他低声对我说。

按照伊斯兰教传统，所有喊“安拉至大”的人都被视为穆斯林。我一边喊“安拉至大”，穆罕默德一边帮我向青年们解释。我看到青年们的脸色缓和下来，才敢确定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了。让我再背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这句真言，他们才最终放过了我。

事后，穆罕默德告诉我，他向青年们解释：这是中国的穆斯林，那儿的规矩和非洲略有不同，出门在外，就不用礼拜，只须回家把礼拜补上即可。

礼拜结束后，青年们再次恢复了活泼与和蔼，只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围上来时那愤怒的目光。

当我把这种感觉告诉穆罕默德，他叹了口气：“你一定以为他们都是“伊斯兰国”那样的极端分子，对吧？”接着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只是借此作为反抗的手段。因为只有信教这件事，是不会被管的。”

穆罕默德继续举例说，从达赫拉到努瓦迪布，一路上经过了三个摩洛哥的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的士兵们都渴望着钞票。司机每一次在驾驶执照中夹上钞票，都会在心里祈求安拉给这些士兵惩罚。

在过关时，填写入境单也要收费，我们的费用是那位歌手帮我们交了，但其他人都不得不交钱，他们边交钱，边祈祷着安拉惩罚收钱的人。

安拉是青年们心中的寄托，被用来对抗世间的不公。穆罕默德总结说，实际上，越不公平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信仰越强大。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名懂得历史的英国人告诉我：其实西非

的伊斯兰教是到了近代才巩固的，西方人的到来帮助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之前伊斯兰教只是一种外来的信仰，但西方人的到来让伊斯兰教成了团结当地人抵抗入侵的武器。人们突然意识到团结在安拉的旗帜下，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并能找到抵抗的力量源泉。

事实上，在非洲的许多伊斯兰教区域，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的控制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特别在那些贫穷的地区，清真寺是穷人们能够得到安慰和帮助的唯一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的，外国人也提供不了帮助，但在清真寺中，穷人和富人一起朝拜聊天，不分你我。清真寺还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医疗，这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它们。

因此，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依然影响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区域，并没有萎缩，它抵抗住了现代文明的“侵蚀”。

马格里布：曾经的绿色威胁

在世界穆斯林地区中，除了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的主流区域，还有两个重要的连接部，离开这两个连接部，就无法了解穆斯林的全貌。这两个连接部分别是中亚和北非。

所谓中亚，除了现在的中亚五国之外，还包括阿富汗全部、伊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这里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地区，却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伊斯兰教征服了中亚，就此打通了更广阔的传播道路，从中亚五国进入了中国的新疆，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进入了广袤的印度次大陆。从印度出发的伊斯兰教继续扩张，传播到了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其穆斯林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阿拉伯本土。

除了中亚之外，北非是另一个重要的连接部。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之后，顺着地中海岸继续前进，占领了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是一条地中海和撒哈拉的双重走廊。伊斯兰教从摩洛哥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占据了西班牙，同时越过了撒哈拉，将撒哈拉以南地区也伊斯兰化了。如果没有北非，就没有另外三分之一的伊斯兰世界。

在历史上，穆斯林把北非地区称为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日落之地”。马格里布也是我国古代记载中离中国最遥远的所在。南宋时期，朝散大夫、福建路市舶提举兼权泉州市舶史（掌管对外贸易的官员）赵汝适写了一本《诸蕃志》，介绍海外各国的情况，其中提到了一个叫默伽猎的国家，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现代人根据描述和读音，认定它就是马格里布。

赵汝适写道："默伽猎国，王逐日诵经拜天，打缠头，着毛段番衫，穿红皮鞋。教度与大食国（阿拉伯哈里发国）同。王每出入乘马，以大食佛经用一函乘在骆驼背前行。管下五百余州，各有城市。有兵百万，出入皆乘马。人民食饼肉，有麦无米，牛羊骆驼果实之属甚多。海水深二十丈，产珊瑚树。"

宋代时，马格里布仍然处于发展的高峰时期。那时，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已经衰落，十字军东征已经开始，但北非的伊斯兰教势力仍然很强大，而且脱离了巴格达的管辖，成了一代豪强。

在突尼斯旅行时，我总是听到人们不断地提到一个城市，它不仅在本国是所谓的圣地，也是整个北非的圣地。他们甚至告诉我，在穆斯林世界，除了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第四大圣城就是这里。

这个城市叫凯鲁万。把它称为第四大圣城，中亚的撒马尔罕，伊朗的库姆和马什哈德，伊拉克的纳杰夫或许都不会服气，但从国际上的认同感来看，凯鲁万却不可小觑。北非穆斯林认为如果无法去麦加朝圣，可以到凯鲁万朝圣七次作为替代，两者的功效是一样的。由于麦加距离太远，不是谁都能去成，作为替代品的凯鲁万声名大噪。

凯鲁万之所以出名，首先是因为它曾经是阿拉伯人征服北非的过程中，除了埃及之外的第一大站。665年，阿拉伯大军从埃及过来席卷北非，攻占了突尼斯。五年后，阿拉伯人在凯鲁万建立了据点（当时凯鲁万还是森林密布，而现在，所有的森林都已消失），把它作为继续进军的中间站，并征服了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直到西班牙的广阔领土。

在摩洛哥的城市非斯，老城区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清真寺，叫凯鲁万清真寺，就含有怀念凯鲁万之意。

到了9世纪初，随着位于巴格达的正统王朝的衰落，北非的穆斯林迎来了独立时刻。800年，当时的凯鲁万总督易卜拉欣·伊本·艾格莱卜以凯鲁万为首都建立了艾格莱卜王朝，这个王朝存在到909年。这个时期

是凯鲁万的黄金时代。

如今凯鲁万仍然保存了许许多多的清真寺，老城区里人山人海，没有停歇的时候。在北非，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会有一个老城区和一个新城区。新城区已经与世界上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老城区叫“麦地纳”，保留着传统的街道和房屋，也是一座城市的商业中心。在这里，小商小贩千百年来就占据了街道和路边的小店铺，传统的手工艺品、食品与从中国淘来的便宜皮鞋、布料随处可见，和谐共存。

在世界上，有两种城市现代化的策略。一种是苏联式的，将原来的旧建筑拆光，建立一座灰色的水泥新城，以彰显现代风格的摧枯拉朽。另一种是传统转移式的，保留老城区，只是在老城旁边建立一座新城。老城保持着城市的商业繁荣，新城显现了现代科技的进步。伊斯兰世界大都会采取第二种策略。

古代伊斯兰国家大部分是逊尼派国家，但在909年的北非，却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它就是法蒂玛王朝。法蒂玛王朝的首都最早在凯鲁万附近，并横扫了北非，最后首都迁移到了开罗，成了一个埃及王朝。

凯鲁万和北非在一位叫齐里的将军的带领下，表面上遵从于法蒂玛王朝，但实际上保持着独立性。齐里王朝又存在了近两百年，持续到1148年。但它的疆域越来越小，而突尼斯的主导地位也让给了更加西面的摩洛哥，它逐渐成为埃及、摩洛哥和意大利争夺的对象，而本身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被位于亚洲的土耳其帝国吞并。

摩洛哥则是另一番景象。如今去往摩洛哥的游客，仍然以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为目标。这四座城市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简单的摩洛哥史。

摩洛哥的独立，是以一场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的大起义作为开篇的。这场发生在739年的大起义摧毁了哈里发在北非西部的统治。柏柏尔人反抗阿拉伯人，主要原因是他们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但表现出来的

原因则是经义上的。由于阿拉伯执政的是正统的逊尼派，柏柏尔人受到压迫时，伊斯兰教的另一派乘机来到了这里，他们吸引了大量的信徒。这个派别叫哈瓦利吉派。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围绕着谁应该继承他的位置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法蒂玛王朝由此分出了两派，一派是正统的逊尼派，而另一派则是拥护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什叶派。在阿里一派中，又分出了一个小分支，他们原本支持阿里，后来又不满阿里，并将他刺杀了，这一派被人们称为哈瓦利吉派。

哈瓦利吉派受到了什叶派和逊尼派双方的排挤，却吸引了柏柏尔人的皈依。在哈瓦利吉派的号召下，柏柏尔人举行了大起义。

起义最终没有成功，哈里发击溃了起义军。但哈里发只收复了突尼斯、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东部，至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摩洛哥，则散了架，成了军阀角逐的战场。

在北非四国中，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以沙漠居多，他们的历史往往附着于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却走在了摩洛哥之前，建立了北非西部第一个地方王朝——罗斯图姆王朝（776年建立）。十一年后，摩洛哥建立了信奉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的伊德里斯王朝。在摩洛哥西部，还有不少地方政权。

罗斯图姆和伊德里斯王朝与突尼斯的艾格莱卜王朝的区别在于，后者仍然把巴格达的哈里发当作名义上的主子，而前两个王朝已经不承认哈里发的统治了。

伊德里斯王朝是摩洛哥独立史的第一章，由于它定都于非斯，也让非斯成了四大皇都的首位。

但此时的摩洛哥还属于部族时期，即便伊德里斯王朝更强，仍然无法统一全国。在它衰落后，摩洛哥全境更是陷入了纷争之中。

直到1042年，一个叫穆拉比特的王朝建立了起来，才形成了真正的霸权。王朝不仅统治了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区，还占据了西班牙南部和阿

尔及利亚的一部分。鼎盛时期，它还向南越过撒哈拉占据了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流域。这个王朝选择了更加靠南的马拉喀什为首都。

穆拉比特王朝之后，穆瓦希德王朝（定都马拉喀什）、马林王朝（定都非斯）、瓦塔斯王朝（定都非斯）相继崛起。后两个王朝已经丧失了西班牙的土地，却占据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甚至撒哈拉以南的部分领土。

萨阿德王朝再次把首都选择在了马拉喀什。到了1666年，阿拉维王朝建立，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阿拉维王朝的首都选择过梅克内斯，后来则是现在的首都拉巴特，它们和非斯、马拉喀什共同构成了四大皇城。

摩洛哥历史上真正能够称得上帝国的只有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这两个王朝不仅占据了本土，还在东南北三个方向都进行了扩张。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都在帝国的版图之内。在穆瓦希德王朝后期，随着势力的衰落，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虽然仍臣属于王朝，却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三个国家的现代雏形已经悄然发育。只是，突然到来的奥斯曼人占据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再次打断。

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三个国家由于伊斯兰教传播时间较长，信仰比较稳定，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传统社会。这使得北非的历史与非洲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其他很多国家从来没有过独立统治，也缺乏现代文明的熏陶，因此建国后变得更加艰辛。但北非三国特别是摩洛哥与突尼斯，却并非从一张白纸上开始建设，哪怕没有西方的冲击，它们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到了今天，这里的人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这生活带着传统的痕迹，又有着现代的烙印。

萨赫勒：越过撒哈拉

1076年，位于现在毛里塔尼亚、马里境内的加纳帝国遭到了致命一击。

从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穿越撒哈拉，到达沙漠南侧，就到达了真正的非洲，我们称之为“西非”。欧洲人到达之前，西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大本土帝国，加纳帝国就是第一个。

古代加纳帝国与现代加纳共和国在地理上并不重合。现在的加纳曾经被英国人称为“黄金海岸”，在西非的南部与大西洋相邻，而古代的加纳帝国则更靠北，位于毛里塔尼亚和马里的边境地区，属于内陆，没有延伸到南面的黄金海岸。

在加纳帝国统治的后期，撒哈拉的北面已经是穆斯林的天下。这时的伊斯兰世界是分崩离析的，摩洛哥境内处于部族时期，许多部族各自为政，互不隶属，没有能力对外扩张。直到一个名叫伊本·雅辛的人出现，形势才有了变化。

在现代沙特的历史上，它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得益于一个叫瓦哈比的教派。这个教派提倡艰苦朴素，战斗力强。沙特王室皈依了瓦哈比，突然爆发的战斗力让它成了中东豪强。

瓦哈比式的爆发在伊斯兰世界其实并不少见。11世纪的摩洛哥恰好就经历了一次。

伊斯兰教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大法学学派。伊斯兰教采用教法制，也就是说，人间的法律都是根据《古兰经》来的，不管是判决人们结婚离婚，还是惩罚杀人偷盗，都要从《古兰经》中寻找依据。如果《古兰

经》中找不到依据，世间还流传有许多先知穆罕默德当年说过的话（叫圣训），也可以用来做法律。与中国的典籍作对比，《古兰经》相当于中国的五经，而圣训则相当于中国的《论语》。

但由于人间事务过于复杂，必然还有很多情况是《古兰经》中没有提到，并且圣训中也没有说过的，这些事情该怎么判决呢？

围绕着这个问题形成了两大派别：意见派和圣训派。意见派是温和派，认为如果找不到依据，就由教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类比，或者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进行判决。圣训派则是死硬派，认为经文和圣训中必然包括了一切情况，因此必须紧扣圣人言，不准发挥。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伊拉克人艾卜·哈尼法，后者代表人物是沙特人马立克。意见派演化成了哈乃斐派，圣训派演化成了马立克派。

后来，围绕着这个问题又形成了四大派别，按照从保守到自由的程度分别是罕百里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哈乃斐派。

最温和的哈乃斐派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派别，作为斗争失败者的马立克派却保留着强硬的姿态，他们来到了非洲，开始传播。

伊本·雅辛就是一个马立克派。他是一位学者，却投靠了一位摩洛哥的酋长雅西雅·伊本·易卜拉欣。学问和政治联姻了。

在伊本·易卜拉欣的帮助下，伊本·雅辛开展了穆拉比特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推广马立克派的教法统治，采取的手段则是武力。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开始向南扩张。在撒哈拉北部，有一座叫西吉尔马萨的小城，这座小城现在已经成为废墟。但在历史上，它却是南北纵穿撒哈拉沙漠的起点。从这里出发，伊本·雅辛开始了征服萨赫勒之路。

在非洲，萨赫勒是一个特殊的名词，指的是撒哈拉以南的草原地带。这里紧邻着沙漠，却已经适合人类生存。这里的人种和撒哈拉以北

的人种不同，在北方以阿拉伯和柏柏尔等浅色人为主，而在萨赫勒区域，却居住着黑人。历史上，北非人与欧洲人、亚洲人的联系更加便捷，而与萨赫勒区域的黑人却隔着巨大的死亡之海，只有数条商道可以贯通。人们必须带上数十只到数百只骆驼，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到达沙海的南岸。

伊本·雅辛的圣战队伍前来，终于打破了西非的孤立状态。在经过了最初的屠杀之后，萨赫勒区域的人逐渐开始改信伊斯兰教。

加纳帝国衰落后，被马里帝国取代。西非三大帝国的后两个：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都已经是伊斯兰国家。他们信奉的是马立克派教义，这个严格的教派在原产地式微后，却意外地在非洲找到了知音。

在现代的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马里，都能找到许多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严格遵守礼拜规则和各种教义，严肃程度让阿拉伯人都感到汗颜。马立克教派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之中。我在努瓦迪布碰到的那群青年人，遵循的就是马立克派的规矩，但他们虽然遵守，却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马立克派，他们只是从小就被教导着怎么做罢了。

当我从边境坐车去往塞内加尔城市圣路易时，碰到的另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西非人对教义的尊重。那天本来车已经晚点，但太阳落山时，车上的人突然间如暴动一般集体要求司机停车。司机只好将车停在了路边，人们蜂拥着下车，奔到旁边的泥地上，开始磕头，生怕时间晚了。即便是阿拉伯人，也允许在行进途中暂时搁置礼拜，但在非洲的角落却仍然保持着最虔诚的姿态。

虽然征服的过程不免血腥，但是随着商道的打通，西非被纳入伊斯兰世界贸易体系之中，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不管是毛里塔尼亚还是马里，甚至尼日尔，都保留着不少沙漠古城遗址。这些遗址当年都是撒哈拉之中重要的贸易站点。

比如，我曾经前往的廷巴克图以富有著称，这里的黄金产出如此之

多，使得人们相信马里帝国的国王坎库·穆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毛里塔尼亚有古城欣盖提和瓦丹，马里有古城廷巴克图和加奥，尼日尔有古城阿加德兹和津德尔，这些古城构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让死亡之海不再成为隔绝之海。更难得的是，古城中都有不少图书馆，保存着大量的古代《古兰经》和圣训，表明了当初人们的虔诚和博学。

在西非的国家中，随着地区的不同，虔诚程度也不一样。北方的毛里塔尼亚、马里是重要的伊斯兰教区域，而南方靠海的加纳、利比里亚则已经看不出太多的伊斯兰痕迹了。有的国家北部和南部差别都很大，比如尼日利亚的北部是伊斯兰教区域，出了著名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南方则已经是基督教区域了。正因为南北差异太大，尼日利亚有着强烈的离心倾向，这导致了内战与混乱。

宗教这个因素在影响了人类数千年之后，至今仍然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东非：有种文明叫斯瓦希里

在中国15世纪的《郑和航海图》中，记载了东非地区的两个地名：麻林地和慢八撒。熟悉非洲地理的人一眼就看出了这部书的真实性。

如今，在东非肯尼亚的境内，印度洋的海岸上有两个著名的城市：马林迪和蒙巴萨，它们就是地图中的两个城市所在。这两个地名可能证明了郑和到达的最远所在。据记载，郑和七下西洋中，走得最远的可能是第六次。在这之前，他到达了索马里境内的木骨都束，也就是现在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第六次则完成了超越。

虽然我们不知道郑和在马林迪、蒙巴萨看到了什么，但根据当时欧洲人的记载应该可以猜到：船员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来到的不是一片蛮荒之地，而是颇具规模的文明城邦。

这里以黑人为主，大部分却带有伊斯兰传统，居民的皮肤并没有像其他地方的黑人那样黝黑，海岸上的语言也相对统一，一种叫斯瓦希里语的语言成了当地的普通话。

如今的斯瓦希里语仍然是民间的通用语言，如果一个人会斯瓦希里语，就可以通行东部非洲的几个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以及乌干达、赞比亚、马拉维、布隆迪、卢旺达、莫桑比克。所谓斯瓦希里语，本来是属于非洲人的班图语，阿拉伯人来到后，又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形成了一种混合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代表着阿拉伯的影响力。

至于建筑风格，也与郑和一路上经过的印度、阿拉伯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这里有很多的阿拉伯、印度商人存在。

在蒙巴萨，城市里最雄伟的建筑是一座葡萄牙人留下的堡垒，叫耶稣堡。这座堡垒建设在城市南部的一块靠海的岩石之上，从下面望去雄伟壮观。修建城堡的岩石采用的是当地的珊瑚礁。即便到了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岩石上珊瑚的花纹。数门大炮耸立在城堡四周，透露出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

郑和来到这里时，耶稣堡还不存在，又经过了一百多年，当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决定寻找一个东岸的基地，便于向印度航行，蒙巴萨才开始进入葡萄牙人的视野。

1593年，葡萄牙人占领了蒙巴萨，开始修建耶稣堡。以耶稣堡为中心，葡萄牙控制了周围海岸约一百年的时光。随后，他们尝到了穆斯林的厉害。1696年，位于亚洲的伊斯兰国家阿曼开始进攻葡萄牙人，双方经过两年多的争斗后，最终葡萄牙人被赶走了。

在东非的历史上，阿曼苏丹家族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在陆路上被沙特与其他国家分开，显得与世隔绝，但历史上的阿曼在海外却是一大豪强，影响力从印度海岸一直到东非。

到了1840年，阿曼人甚至把首都从阿拉伯半岛迁到了东非海上。在东非，除了蒙巴萨，阿曼的另一个（也是更加重要的）主要据点就是桑给巴尔，阿曼人把首都就迁到了这里。

桑给巴尔位于坦桑尼亚外海上，是一个小群岛，拥有桑给巴尔和奔巴两座主岛，以及周围的一些小岛。桑给巴尔岛曾经是东非最富庶的地区，因为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阿拉伯人就把这座岛作为基地开展贸易，整个贸易网络辐射东非区域，甚至远达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海岸，在亚洲方向则直达阿拉伯和印度。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白色沙滩，整个沙滩纵向长达数千米。涨潮时，海水从数千米外追逐着人的脚步，直到把沙滩全部淹没；退潮时，海水又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后退数千米。

桑给巴尔的首府是著名的石头城，大片的古老建筑足以媲美欧洲，让人不敢相信它是非洲的一部分。

但桑给巴尔的名声并不好，原因在于奴隶贸易。如今，欧洲人对当年的非洲政策进行反思，最主要的落脚点是奴隶贸易。但非洲的奴隶贸易并非从欧洲人开始，而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就很兴盛了。

古代阿拉伯人有贩卖奴隶的传统，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把战争中的俘虏当成奴隶来买卖。阿拉伯人的奴隶来源极其丰富，从北欧的俄罗斯人、欧亚草原上的钦察人、中亚的突厥人，到印度人、西欧人、非洲人，无所不有，只要能获得，都可以贩卖。在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市场上，即便再正直的人也不认为买几个奴隶有什么不好。

但阿拉伯人也不是始作俑者，他们买卖奴隶的习惯又是从欧洲的罗马学来的。罗马人对待奴隶更是一绝，不仅用奴隶来干活儿，还让他们互相厮杀，血溅角斗场。

阿拉伯人对待奴隶也并非一味虐待。一名奴隶如果有头脑，他便有很大的机会升入其他社会阶层。许多大臣都是奴隶出身，甚至在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连统治者都是从前任统治者的奴隶中升上来的。

阿拉伯人在东非的贩奴基地就在桑给巴尔，即便到了现在，人们仍然可以认出当年贩卖奴隶的地点。那儿盖了一座教堂，教堂所在的讲坛，就是当年奴隶的拍卖台。在院子里，还有当年关押奴隶的地窖，狭小的空间和生锈的脚镣诉说着奴隶们的苦难。

19世纪，欧洲人都停止了奴隶贩卖，桑给巴尔却仍然保存着这种交易，英国人甚至不得不依靠武力威胁，才将它取缔。

桑给巴尔除了奴隶之外，提供的主要是黄金、象牙、宝石，以及非洲的其他特产。它们被卖给阿拉伯的王公贵族，以及从亚洲到欧洲的有钱人。它的进货渠道位于东非大地的内陆地区。

桑给巴尔富起来之后，带动了整个东非的发展，也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内陆地区。另外它也影响到了许多还没有伊斯兰化的区域，文化暂时没有传播过去，贸易却已经打了头阵。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津巴布韦。

1868年，欧洲人亚当·伦德尔在非洲展开了一次狩猎之旅。他来到了如今的津巴布韦境内，发现了一片鬼斧神工的建筑遗址。这片遗址规模之大，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三年后，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一位德国探险家卡尔·毛奇。毛奇参观后，立刻认定这个建筑是当年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留下的。他之所以到《圣经》中去寻找依据，是因为他不相信落后的非洲人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毛奇不知道，伦德尔和他的发现只能算是重新发现。实际上，在16世纪，就已经有葡萄牙人来到过这里，并留下了相关记录。

经过后人的研究，这片被命名为大津巴布韦的建筑的确是非洲人建立的，不过这得益于阿拉伯穆斯林与非洲人的贸易。

穆斯林最远到达了坦桑尼亚南方的海岸上，并在那儿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城邦，他们做生意的对象，就是内陆的黑人。在津巴布韦历史上，它有着丰富的黄金资源。10世纪的阿拉伯人马苏迪的名著《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就已经记载了非洲南部的黄金。到了12世纪，阿拉伯人已经与黄金产地的非洲民族取得了贸易联系，形成了丰富的贸易链条。

大津巴布韦恰好处于这条黄金贸易的通道上。他们将西部的黄金转运到海岸卖给阿拉伯人，赚取中间的差价，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当海岸上的伊斯兰王国大修宫殿时，大津巴布韦的领袖们也按捺不住争胜之心，开始大肆建设。他们的建筑与伊斯兰风格迥然不同，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南部非洲奇迹。

在伊斯兰的刺激下，东非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层次，最外层靠近海岸的是以伊斯兰信仰为主的社会。但并非只有穆斯林，在和平年代里，许多印度人借助信风的帮助来到东非安家，他们大都是买卖人，经营着各种各样的商店。

即便到了现在，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的许多百货店仍然是由印度人经营的，他们从印度进口廉价的商品，再卖到当地。有的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非洲待了好几世，甚至亲戚中都有了不少非洲人。唯一让他们区别开的是，他们保持了印度教的信仰。

这里还有许多印度教的神庙，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庙宇比邻而居。有人告诉我，在这里基督教是上等人的信仰，伊斯兰教是大众的信仰，而印度教则显得粗俗，这大概是因为印度教庙宇过于花哨，又由于财力不足而显得有些粗糙。

再往内陆走，随着伊斯兰教影响的减弱，基督教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基督教是西方殖民非洲时留下的，在许多当地人心中已经扎了根。非洲的伊斯兰教是一种个人化的宗教，人们以礼拜的方式与安拉沟通，基督教反而成了一种集体化的宗教。教堂里，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极具非洲特色。这或许与传教士们的努力有关，为了传播信仰，他们改造了基督教严肃的一面，将非洲的歌舞成功地引入其中，形成了快速的传播。但即便这样，伊斯兰教仍然遍布于富有的精英阶层，并传遍了大半个非洲的土地。

伊斯兰教从北非、东非向其余地区扩展，已经占去了半壁江山。如果再有几百年时光，也许整个非洲就会变成一片绿色信仰的天地。但这个进程却突然被打断了，因为欧洲人来了。

第三章
欧洲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动荡

在非洲旅行时，即便这些国家已经独立，但还是能感受到曾经的宗主国对原来的殖民地意味着什么。

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规模相当于中国南方的小型城市，街道大都是土路，两旁以平房和两三层的小楼为主，整个首都只有一家大型超市。

走进这家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但价格上却透露出一丝古怪。比如，1升牛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不过六七元，但一小杯（150毫升）的酸奶却价值10元以上。为什么两者的差别这么大？原因在于牛奶是本地产的，而酸奶则是从法国或者西班牙进口的。

这样的价格差异随处可见，当地产的袋装水1升折合人民币不到1元，而外国产的瓶装水1升则高达6元。罐头的进口来源有两个，分别是欧洲和同属于非洲国家的利比里亚，前者价格是后者的三到四倍。

布基纳法索缺乏许多必要的轻工业，如果酸奶能做到国产化，就能把价格大大降低，但当地的轻工业不发达，只能承受高昂的进口成本。

以饮用水为例，一位超市经理告诉我为什么当地生产不了瓶装水，不是水的问题，而是当地生产不了合格的塑料瓶。就因为瓶子的问题，瓶装水只好进口。整个超市的商品，在国内生产的不会超过10%，大部

分都要从原来的宗主国法国进口。

这些年进口商品的价格已经降了不少，原因不在于法国的慈悲，而在于亚洲国家的崛起。以前电器都必须从法国进口，现在改为主要从中国进口。以前的药品更是普通人吃不起，自从印度药崛起之后，整个非洲都成了印度药的天下。一家药店的驻店医师告诉我，如果没有印度药，整个非洲每年都会多死数百万人。西方虽然每年都援助非洲大量的药品，但这些药品不是被浪费了，就是被政府官员拿走卖了高价；印度不会免费给非洲药品，但由于价格低廉，普通人买得起，反而让非洲的普通人得益。

除了亚洲的一些国家之外，供应非洲便宜货的国家还有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等，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它们成了非洲的主要商品供应国。

“中国和印度，是我们的指望，他们是非洲的朋友。”店员感慨说。

但即便已经有了不少中国和印度的便宜货，超市也不是当地的普通人能随便进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折合人民币每天两三元就可以吃饱，他们也许一年也不会进一次超市。

布基纳法索只是非洲国家的一个样本，许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个国家越缺乏工业，进口的工业品越贵，当地产的初级品越便宜，两者的差价越大。

如果这只是经济学的一个现象，那么还可以通过贸易拉平。但对殖民地时期的非洲来说，更不公平的是，它们的贸易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强迫的。

比如，法国殖民时期，许多殖民地是没有办法从英国购买商品的，更别提从亚洲国家购买，它们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农业品应该卖给谁，只能被强制性地卖给宗主国。

正是靠这种强制性，宗主国能够从殖民地体系中吸纳大量的资本，以供养宗主国的人民。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宗主国所得，就是殖民地所失。

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回顾欧洲对非洲的影响时，会发现奴隶贸易虽然被不断批判，却并非影响非洲最深远的事件。真正影响非洲社会结构的反而是不那么起眼的边界的划分，以及普通商品的贸易剪刀差。欧洲人到来之后，非洲人发现自己被卷入了现代的大旋涡之中，失去了回到从前的那条道路。

“2C”与“2S”的竞争

即便到了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欧洲对非洲瓜分的痕迹。

2014年，我访问了苏丹。当时南苏丹刚刚独立不久，苏丹仍然沉浸在领土分裂的伤痛之中。

苏丹除了首都之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干净的饮用水。由于是伊斯兰国家，人们喜欢在家门口放一个陶罐，装水供来往的行人饮用。但在苏丹，这些陶罐中的水大都是浑浊的，外人喝了会拉肚子。

在我访问时，苏丹首都喀土穆还只有一栋高楼，剩下的都是泥泞的村庄。由于社会资源太匮乏，教育自然也无法保证。但我在通往埃塞俄比亚的边境地区，却遇到了一位英语流利的苏丹商人。他穿着衬衫和笔挺的裤子，显得文质彬彬，与我遇到的大多数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我把这一印象告诉他时，他谦虚地说：“这没什么。其实有一段时光，我们苏丹人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只是现在消失了。年龄大一点的人都享受过那段时光。”

我想他指的可能是苏丹独立之前的那段时光，那时候英国和埃及共同管理苏丹，没有战乱，也没有分裂。

果然，谈到现实，他的眼光暗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继续说，“为什么好好的国家必须分成两个，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结果南边也完蛋了，北边也完蛋了……难道这样就叫好日子？”

南苏丹拥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炼油厂和通往海边的管道却在苏丹境内。南苏丹与苏丹交恶后，南苏丹不供给苏丹石油，苏丹不准南

苏丹使用管道和炼油厂，结果立刻形成了双输的局面：北方陷入了贫困，南方进入了战乱，当非洲的其他国家大都慢慢进入了稳定期，曾经稳定的苏丹却变成了最新的战乱区。

到底为什么要分裂？也许根子不在苏丹本身，而在于殖民地时期的遗留问题。其实苏丹本身就是一个依靠宗主国强行捏合的国家。

19世纪，欧洲对非洲采取殖民竞赛时，存在着两个特殊的名词，一个叫“2C”，另一个叫“2S”，也代表着两个国家的野心。

所谓“2C”，指的是英国人对占领非洲的规划。非洲是一个庞大的大陆，英国人不可能占领全部，但它希望有一条贯穿非洲大陆的轴线，这条轴线南北绵延数千千米，从北面埃及的开罗（Cairo）一直延伸到南面南非的开普敦（Cape Town）。这条轴线包括了现在的埃及、苏丹、南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莱索托等十四个国家。除了这条轴线，英国人还占领了一些其他区域的零星国家，如西非的尼日利亚、冈比亚、加纳、塞拉利昂等。

当英国制定了“2C”战略时，法国作为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也相应地制定了“2S”战略。既然英国人从南向北寻找轴线，法国人就要从东向西寻找轴线。法国在非洲最重要的领地，亦即“2S”战略的西端包括两块：第一块是阿尔及利亚，这里距离法国只隔着一个地中海，已经被当作法国本土的延伸；另一个则是塞内加尔（Senegal），它位于西非的大西洋海岸，是法国在西非最早的立足点。塞内加尔就是“2S”的西端。

塞内加尔有一个叫圣路易（Saint-Louis）的城市，这座城市建在一座小岛上。在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两国之间，有一条叫塞内加尔河的界河。当这条界河来到大西洋海边，向南拐了个弯，河流距离入海口还有几千米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岛，就是圣路易了。

这个小岛保存了完好的殖民地建筑，带有浓厚的欧洲风格，可见法

国当初多么用心于建设。

除了圣路易，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则是法属西非的政治中心，也是整个西非地区（除了尼日利亚）唯一具有大都市风范的城市。

“2S”的另一端在遥远的非洲东海岸，也是著名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Somalia）。在这两个遥远的“S”中间，则是一连串的国家，它们横贯了西非、北非和中非。现在西非的国家中流行一种叫西非法郎的货币，这些国家当初都属于法国殖民地，它们是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贝宁、多哥、尼日尔、科特迪瓦。另外，还有已经退出使用西非法郎的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曾经也是法国殖民地。在中部非洲，还有一群使用中非法郎的国家，也曾经臣属于法国，他们是加蓬、喀麦隆、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布）。另外，有一个小国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现在也在使用中非法郎，它是赤道几内亚。

北非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摩洛哥成了法国的保护国，阿尔及利亚则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

从面积上说，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比英国还要大，但法国占据的大都是穷山恶水之地，特别是在撒哈拉周围，许多地区都没有禀赋单独成立国家，却被法国强行分割开，成了单独的殖民单位。这些殖民单位分别独立后，成了一个个先天不足的国家，由此带来的问题一直困扰到今天。

英国和法国都想打通大陆，但“2C”和“2S”实际上是有冲突的。双方都希望贯穿非洲，但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必然交会于一点，这一点到底属于谁呢？

现实中，这一点就位于现代国家苏丹（包括后来分离的南苏丹）的境内。谁占领了苏丹，就意味着谁的战略得到了实现，失败一方的轴线则会被分割成两部分。

1898年，一支法国的探险队从大西洋海岸的法属刚果，即现在的刚

果（布）出发，穿越非洲来到如今位于南苏丹北界内的法绍达小镇（现在称为科多克）。法绍达小镇位于尼罗河的正源白尼罗河河边——英国人“2C”战略的必经之路上。法国人的占领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在英国著名将领基钦纳的率领下，一支舰队顺河而上来到法绍达，双方形成了对峙。偏远小镇上的对峙轰动了世界，人们以为两国会大打出手，但法国却在衡量了利弊之后让步了。这次让步也注定了法国人无法实现它的“2S”战略。

这次让步导致法国人在苏丹以东只占领了如今属于吉布提的法属索马里。吉布提是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只有一个港口以及一点附属地。如果当初法国人占领了苏丹，很可能会通过对吉布提与苏丹的双重施压进攻埃塞俄比亚。法国人的失利，让埃塞俄比亚成了少数保持独立的非洲国家之一。

法国的失利，还让苏丹成了一个古怪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北部，是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区域，它的居民大都是伊斯兰教徒，而南部（法绍达以南）是伊斯兰教没有影响到的区域，以当地的巫术信仰为主。英国人为了统治方便，将南北两部分合并成了一个政治实体，由英国和埃及共同管理（埃及又由英国控制）。苏丹独立后，南北双方的差异越来越大，最终造成了分裂。

在瓜分非洲的欧洲国家中，还有一个小国参与颇深，它就是葡萄牙。

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是最主要的角色之一，它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并首先到达了印度的西南沿海。它在中国和印度都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在中国是澳门，而在印度则是著名的嬉皮士圣地果阿。

葡萄牙在非洲的势力虽然已经衰落，但仍然保留了三块殖民地。一块在西非，是夹在法属殖民地中间、靠近大西洋的一小块土地，叫几内

亚比绍。另两块更靠南，分别位于大陆两侧，靠近大西洋的现在称为安哥拉，靠近印度洋的称作莫桑比克。这三块土地的地理条件都称得上得天独厚。

欧洲人经手的奴隶贸易最早发源于西非，几内亚比绍就是一个不错的奴隶贸易站。后来，西非奴隶资源枯竭，贩奴船渐渐南去，才在刚果河口附近形成了新的贩奴聚集地。

非洲是一个气候复杂的大洲，除了北方的沙漠区、南方的稀树草原区之外，中部还有一大片密林区，这块密林区分布在巨大的刚果河流域。这里外人最难进入，却是养活黑人的一片沃土。在这里，欧洲人与当地的酋长勾结，获得了大批的奴隶。

刚果河流域也因此被三个国家瓜分：法国抢占了北部，形成了后来的刚果（布）；比利时抢占了中部，形成了后来的刚果（金）；葡萄牙获得了南部，也就是现在的安哥拉。

莫桑比克是印度航线的补给站。当绕过好望角的船到了印度洋需要补给时，往往会选择两个地点：第一个是大陆上的莫桑比克，另一个是大岛马达加斯加。葡萄牙人占领了大陆，法国人则占领了海岛。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最大的竞争对手西班牙在非洲的地盘相对要少一些。西班牙曾经是最有条件占领非洲的欧洲国家。穆斯林曾经从摩洛哥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大半个西班牙，随即西班牙的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欧洲。他们本来可以一鼓作气杀向非洲，将北非收入囊中，但西班牙将穆斯林彻底赶离欧洲不久，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从此西班牙就将重心放在了美洲。在非洲大陆上，它只占领了摩洛哥邻近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一些领土和岛屿。另外，在如今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有一块叫西撒哈拉的沙漠地带，也成了西班牙一块用处不大的占领地。

在赤道附近的大西洋海岸上还有一个叫赤道几内亚的国家，它是非

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也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殖民时代，赤道几内亚是一块鸡肋，独立后却发现了大量的石油，成了巨富之国，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按照人均收入算，它已经是世界富国，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民仍然生活在温饱线之下。

当别国忙于瓜分非洲时，南欧三雄的最后一位——意大利也在非洲试图抢占领土。意大利瞄准的是与之隔海相望的利比亚，以及非洲之角地区。

非洲大陆在东方的红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角，人们习惯上称之为非洲之角。这里现在以索马里海盗闻名于世。之所以海盗们能在这里聚集，是因为它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旁边就是红海，而红海的顶端就是著名的连接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大量的船只都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非洲之角海域成了海盗们的狩猎场。

2017年，中国的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设在了非洲之角的吉布提，也是看上了这里的重要战略地位。

意大利当初也看上了非洲之争的战略地位，才决定对它动手。意大利抢占了非洲之角北岸的厄立特里亚，以及东岸的索马里。

现代索马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离心力，就是因为当初意大利抢占的只是东部地带，而靠北的另一块土地索马里兰是由英国人占领的。独立后的索马里是由这两块分别属于意大利和英国的殖民地拼接而成的，因此形成了政治上的离心力。

加上法国占领的巴掌之地吉布提（当时叫法属索马里），非洲之角的海岸就被分成了四个碎片：意属索马里、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和意属厄立特里亚。

在瓜分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非洲之角的主体国家埃塞俄比亚。之前的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有海岸线的国家，也曾经在贸易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但当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将非洲之角的海岸占领后，埃塞俄比亚变

成了一个彻底的内陆国家。特别是法属的吉布提和意属的厄立特里亚，它们原本是埃塞俄比亚与外界沟通的必经之路。

获得海岸之后，意大利人并不满足，他们要占领的，除了厄立特里亚之外，还有整个埃塞俄比亚高原。1894年，意大利以不到2万人的兵力入侵埃塞俄比亚。他们打了三年，大部分军力都消耗殆尽，最终不得不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这一次入侵，也让欧洲其他国家看清了意大利的孱弱。德国首相俾斯麦嘲笑说：在瓜分非洲的餐桌上，意大利人有个极大的胃口，可惜牙齿却坏了，吃不进去。

到了1935年，意大利已经进入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时代，它再次获得了好机会入侵埃塞俄比亚。为了对付纳粹德国，同盟国想拉拢意大利，不得不对它采取宽容政策，以免它彻底倒向德国。这次入侵的结果与世界局势有关：最初意大利占了先手，世界都在默许它胡作非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彻底投靠了德国，盟军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帮助埃塞俄比亚打败了意大利。

对于西欧的国家而言，非洲的国家只是一粒棋子，它们没有思想、没有尊严，到底怎么用它们，完全看西欧人的心情。

埃塞俄比亚的两次抗意战争也注定了这个国家的悲剧。在抗意战争中涌现出的偶像就是它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他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也看清了欧洲人对非洲的蔑视。他想尽一切办法加强非洲的实力，联合非洲兄弟国。但他的轻举妄动也耗干了国家财政，从此埃塞俄比亚陷入了二十多年的混乱之中。

在所有瓜分非洲的国家中，有一个成了失败者。它曾经占据了不少土地，却由于成了战败国，不得不把殖民地交给别人。它就是德国。

历史上，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是中世纪最强大的帝国，但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民族国家的形成，松散的帝国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到了19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破碎的躯体形成了两个核心：

普鲁士和奥地利。最终普鲁士利用普奥战争将奥地利排除在了联盟之外，又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阻挠德国统一的法国，建立了新的德意志帝国。

当德意志帝国形成时，非洲的瓜分已经开始，德国人匆匆上阵，在“争夺日光下的地盘”这一口号下，占领了几片非洲土地。

德国占据的地方以东非的土地最为优越。在英国人的“2C”计划中，从南部到北部的连接点位于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英国人早已占有了肯尼亚，德国人却抢走了坦桑尼亚。

现代坦桑尼亚的国名Tanzania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坦噶尼喀（Tanganyika）的Tan和桑给巴尔（Zanzibar）的Zan，以及代表土地的nia。它的国土也由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大陆部分的坦噶尼喀，以及印度洋靠近大陆的岛屿桑给巴尔。其中坦噶尼喀的名字又来源于国土西境的大湖坦噶尼喀湖。桑给巴尔则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苏丹国。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国家是1964年的事。在19世纪，德国并没有占领岛屿桑给巴尔，而是占领了大陆部分的坦噶尼喀。

坦噶尼喀德国殖民地的存在，将英国人的“2C”计划打断了。

在庞大的坦噶尼喀旁边，还有两个小国布隆迪和卢旺达，曾经也是德国的殖民地。这两个小国曾经位列东非最强大的部族国家，它们的疆域在所有的东非部族中排进前三（最大的是乌干达的布干达王国，它是英国的保护国）。由于它们的强大，所以没有被整合进入其他更大的殖民地之中。但时过境迁，其他经过整合的殖民地打破了部族界限，形成了更大的国家，这两个曾经强大的部族反而成了弹丸小国。

在非洲西南部，德国还占领了如今属于纳米比亚的土地。而在西非，德国获得了喀麦隆和多哥兰两片殖民地。

从面积上说，德国能在短时间内抢占几大片土地，已算反应很快。但随着一战中德国的战败，战胜国强迫德国交出殖民地，转手给另外的国家。

德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是坦噶尼喀，转给了英国。英国人终于彻底打通了“2C”，控制了非洲的大动脉。

两个小国卢旺达和布隆迪转给了比利时。从此，在比利时的统治下，两国进入了黑暗时期。

在西南非洲，纳米比亚被送给了英国人控制的南非联邦，直到1990年才获得独立。

西非的情况更加复杂，德属喀麦隆被分成两半，分别给了英国和法国。英国人又将它的那部分一分为二，一部分并入了尼日利亚，另一部分与法国部分一起，形成了现代喀麦隆的疆域。

德属多哥兰也被分成两部分，英国占领的部分并入了旁边的英属殖民地黄金海岸（也就是现在的加纳），法国部分则成了法属西非的一部分，独立后成为多哥。

在所有殖民地中，最糟糕的莫过于比利时人控制的殖民地。不管是比利时国王主动去抢的，还是一战后从德国人手中继承的，都变成了非洲最黑暗之地。比利时继承的卢旺达和布隆迪，由于比利时人不断挑拨民族对立，民族伤疤至今无法愈合，在1994年更是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种族灭绝事件。

而在比利时国王直属殖民地刚果（金），从它成为殖民地的那一天开始，就遭受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压榨。

所谓殖民地，所有权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法国殖民地都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英国的殖民地就更加多样。以印度为例，在1857年之前，印度殖民地属于东印度公司所有，直到后来印度人反抗太激烈，公司统

治太霸道，英国女王才将殖民地的统治权收归英国政府。

而比利时的刚果殖民地更加特殊，它并不属于比利时政府和人民，只属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19世纪后半期，利奥波德看到其他国家都纷纷瓜分世界，也按捺不住寂寞。但比利时在欧洲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实力并不足以分一杯羹。

利奥波德采取了投机取巧的方法，他首先将自己装成非洲的爱好者和保护神，以私人的名义资助了著名探险家亨利·斯坦利。斯坦利恰好在“非洲的亚马孙”——位于赤道上的刚果河流域考察，这一片土地由于没有探查清楚，还没有进入欧洲的瓜分版图。

斯坦利考察完毕后，利奥波德以慈善和保护当地人的名义，请他继续在这里修建道路，并带上了一大摞协议，哄骗各村的酋长在协议上按了手印。非洲人在按手印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纸上写的是什么，但利奥波德获得了这些手印后，随即宣布刚果河流域是在他保护之下的。

甚至欧洲人瓜分非洲的高潮也是由这个利奥波德促成的。为了让他的鲸吞合法化，1876年，他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名义上是探讨如何开发和帮助非洲，实际上却是在划分势力范围。会议过后，欧洲强国已经获得了伙伴们的谅解，名正言顺地将非洲变成了殖民地。利奥波德也如愿以偿地将对刚果的占领“合法化”了。这片土地是比利时本土的70倍，利奥波德称它为刚果自由邦，他本人任国王。

在非洲地图上，任何人只要望一眼，就会对非洲中南部一片巨大的领土感到吃惊。它横亘在中部，仿佛是非洲的中心，那么巨大。它还是非洲最大的雨林区，矿产资源也极其丰富。

这片土地如此富饶，却被称为“黑暗之心”。这是英国作家康拉德一部小说的名字，这部小说虽然意在冒险，却也写出了比利时人对刚果的

敲骨吸髓，让利奥波德声名狼藉。

国王本人总是以慈善示人，谈起刚果自由邦，始终满怀善意地表示自己是在尽心尽力帮助非洲人。在“善意帮助”的同时，大量的非洲物资被运回了比利时，不是交给比利时人民，而是交给国王本人。

直到后来，人们才逐渐查到国王到底怎么帮助刚果的：他建立了比美国奴隶制黑暗百倍的奴隶制度，依靠强制劳动，让人们帮助他搜集象牙、矿产，到后来种植橡胶和可可。只要一个黑人无法完成割胶任务，或者无法缴纳足够的橡胶税，比利时人不仅惩罚他本人，还要砍掉他家人的手臂。许多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因为父亲无法缴税而失去了双臂。

杀人更是家常便饭，白人监工体会到了作威作福的乐趣之后，将这里变成了地狱一般的存在。据统计，在利奥波德统治期间，刚果（金）有1500万人被杀。

但不管怎么揭露，刚果（金）仍然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充其量不过是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了政府手中，残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二战之后。

不平衡的新秩序

在非洲，至少有三个人向我讲述过世界的不公平。他们认为，造成现代非洲诸多问题的原因是欧洲当年的殖民政策。正是他们随意划分国界、挑拨民族关系，才造成了这些新兴国家独立后的四分五裂和战乱不断，但欧洲人却并没有为他们当年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反而是让非洲人承担了所有的后果。

一个索马里兰的居民举例说，这就像是欧洲人偷了东西，可是真主没有惩罚他们，反而把非洲人的手砍掉了。

在非洲人看来，他们的一切命运都是被动承受的。以苏丹为例，从建立苏丹这个国家开始，苏丹人就无权参与这个进程，他们只是被装在了一个国家的套子里。英国人决定把南北苏丹合并时，只是图方便，却没有想到，南北双方本来就是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信仰，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纷争不断，但两个地区间已经生长出一定的有机联系，在经济上互相依靠，有的人已经开始将统一的苏丹当成了事实。就在这时，世界却突然说，苏丹还是分开好，免得打架。这样分开的结局，也不是苏丹人自己决定的，而是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完成的。

到底是当初的合并错了，还是后来的分裂错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欧洲人建立新秩序带来的不平衡随处可见，在后来的冲突热点地区，几乎都有着明显的源头。不平衡又可以总结为三类。

第一类，原来是一个种族，但后来被不同的殖民者占领，被强行分

成了两块。二战之后独立时，人们将这两块重新合并在一起，却发现他们已经过不到一家去了，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厄立特里亚的种族与埃塞俄比亚北部是近似的，也都信奉基督教，但厄立特里亚被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却一直保持着独立。二战后，人们终于决定要让非洲独立时，埃塞俄比亚领回了厄立特里亚，却发现这儿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回来了，于是厄立特里亚爆发了反对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斗争。

索马里也有着同样的情况。占领索马里的分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意大利的统治很混乱，却占了人口的多数，英国的统治更有秩序，但人口稀少。当他们再次合并到一起独立之后，意大利占领区成了主导者，但英属索马里（即索马里兰）却并不愿忍受对方蛮横的命令，一直寻找着独立的机会。

第二类，原来是许多个种族，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将它们合并成一块殖民地。当这块殖民地独立后，各个种族都无法在这个国家框架之下找到舒服的位置，于是斗争迭起。苏丹就是这样的例子。

除了苏丹，在西非的尼日利亚，是由三块原本没有隶属关系的区域拼凑而成的，北方是伊斯兰教区域，南方分成东西两部，都是更加开放的沿海种族。如果不是英国人，这三块区域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一个国家。英国人撤出后，这三个民族之间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斗，他们都试图争取国家的控制权。控制权只有一个，民族区域却有三个。这种斗争的离心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利比亚、马里、尼日尔、乌干达、刚果（金），也都有同样的问题。

除了这两类之外，还有一类更糟糕的情况。这类情况是：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国家内部就有着不同的种族，种族之间有激烈的矛盾。殖民者来了之后，不仅没有设法消弭矛盾，反而借助一方打击另一方，更加

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当殖民者撤出后，这样的国家必然陷入内战的泥沼。

这类国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爆发了种族灭绝的卢旺达和布隆迪。

在欧洲人去之前，卢旺达和布隆迪有两个分界不是特别明显的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他们有着共同的来源，只是社会地位不同，两个种族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严谨的德国人到来后，种族界限加深了。那时的德国对于人种论的崇拜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在国内区分优劣人种，在海外也推行这套理论。德国将卢旺达和布隆迪交给比利时之后，比利时人更是加强了这方面的灌输，用来分化两个民族的关系。胡图族和图西族在错误理论和政治阴谋的指引下走向了血仇的不归路。

“回到非洲”运动

在非洲的大片附属国与殖民地之间，还有几个特殊的国家（地区）显得与众不同。

在拥有漫长历史、较为发达的几个国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都已经成了欧洲人的保护国，但是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却保持着独立。

与埃塞俄比亚一样独立的，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利比里亚。

说到利比里亚，就不得不提到发端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回到非洲”运动，以及在运动中分别产生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加蓬三国。

1787年，两艘特殊的船驶向非洲海岸。这两艘船上的乘客非常古怪，其中包括340名黑人和70名妓女。船的航行目的却很人道：与之前流行的把非洲人绑架离开非洲不同，这两艘船要把黑人送回非洲定居。

19世纪，随着贩奴高潮的过去，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探讨由此造成的社会和人权问题。当时社会普遍的心态是：贩卖黑奴、以人为奴隶是极其不人道的行为，应该绝对禁止，必须将现有的黑奴都解放掉；但即便再开明的人，也不敢否认，如果解放黑奴，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在大部分社会，外来人种不管以什么方式融入社会，都会造成原有社会的恐慌。在英国，随着自由黑人出现在伦敦，人们首先感到担忧的是在家庭道德上。

虽然很少有证据证明黑人对白人妇女有过骚扰和强迫，哪怕是双方自愿的婚姻都很少，但英国人还是担心社会中如果存在大量的黑人，会

污染他们纯净的血统。

1772年，英国的一个小册子这样写道：英国的下等妇女特别喜欢黑人，其中的道理下流得让人难以启齿；只要法律允许，她们甚至不惜与马或驴结合。这些太太一般都给那些黑人生下了一大窝崽子。照这样下去，只要再过几个世代，英国人的血液就要被这些混血儿搞得污秽不堪了；再则由于各种机缘以及人生的盛衰变迁，这种血统混杂还可能散播得更广泛，甚至波及人民中的中等以至更高等的阶层，直到整个民族都变成像葡萄牙人和摩尔人一样的肤色，一样的思想卑鄙。

以人为奴不人道，需要将其释放，但同时不能让自由黑人生活在欧洲，这两种想法结合起来，就产生了让黑人回到非洲的思潮。

最先行动的是英国人，他们在西非的大西洋海岸上找到一片土地，准备把在英国获得自由的黑人送过去建立新国家。

1787年，英国人弄了两艘船，将400多名乘客送往非洲海岸。其中包括300名男黑人、40名女黑人，还有几名白人工匠、职员和他们的家属。在船上，竟然还有70名妓女，据说是被骗上船给未来定居点的居民提供人道服务的。

也许后来的人们都会温情地提起这次回乡之旅，但真实的情况却让人感到吃惊。实际上，在离开英国之前，乘客人数还要更多，但在等待时已经出现了大批的死亡。一次热病流行，死亡人数就达50人以上。当船到达西班牙时，又死了14人。

到了塞拉利昂海岸，他们为新家园选择了一个具有诗意的名字——“自由城”。但第二年，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130人。几年后，不堪其扰的当地土著黑人终于一把火烧掉了自由城。剩下的人四散奔逃，很多人变成了职业捕奴人，抓捕新的黑奴卖给那些还没有禁止奴隶贸易的国家。

英国人并没有放弃建设塞拉利昂，但从来没有成功地将这里变成黑

人的天堂国度。到最后，塞拉利昂成了英国的一片殖民地，他们带着理想而来，最终却妥协于现实。

英国人在建设塞拉利昂的同时，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各自推出了不同版本的黑人家园，这就是后来的加蓬和利比里亚。加蓬并没有坚持下来，成了一块再普通不过的殖民地，并入了法属中非。由于美国人没有殖民统治传统，利比里亚因此坚持了下来，成了非洲少有的独立国家之一，也是唯一纯黑人统治的独立国家。

“回到非洲”运动由于利比里亚的存在而留下了成果，甚至成了黑人们向往的地方。它如同一盏明灯，打破了人们所认为的黑人没有能力组建国家的偏见。利比里亚一直有着正规的选举制度，宪法从美国借鉴而来，国名利比里亚（Liberia）来自“Liberal”（自由）这个英文单词，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来源于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

利比里亚参与政治的黑人大都来自美国。这些黑人的祖先来自非洲的四面八方，他们的老家或许在刚果河，或许在遥远的东非。他们都被送到了利比里亚这个地方，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非洲合众国”。

虽然利比里亚是非洲自由的灯塔之一，但它的建立过程却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从美国而来的黑人已经适应了新世界的气候，重新回到非洲，来到这个热带的森林地区，必须再次适应。更难的还不是气候原因，而是和当地土著黑人打交道。对于土著黑人来说，美国黑人是比欧洲人更加麻烦的入侵者，欧洲人尚且是实力更强的白人，当地土著黑人已经承认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但这些新来的黑人有着和他们同样的黑皮肤，却一口英语，带着白人的格调，这让当地土著黑人更加受不了。双方随即陷入了冲突之中。

这种冲突让利比里亚从建立之初，就没有很好的扩张基础，也没有将民主扩大到所有人，而是只局限在了移民黑人的内部。当美国的援助

逐渐断绝之后，几个大的移民家族控制了利比里亚的政治，将之变成了一个由寡头控制的国家。

由于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周边关系的紧张，利比里亚的经济也没有打开局面。美国人发现，虽然利比里亚成功地建立了国家，有了和美国类似的宪法，但是宪法是很难移植的。即便到现在，很多人仍认为，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采用与美国同样的宪法，就能达到美国式的繁荣，但利比里亚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国情，这些国情决定了哪怕是想进行制度平移都很难做到。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两个在“回到非洲”运动中建立的政治实体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导致他们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他们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整顿内部秩序上，错失了成为区域性大国的良机。此时这两个国家之外的西非，已经是法国的天下。当法国人将它们周边地区变成法属西非的领土后，这两个国家变得与世隔绝，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在西非，其他法语国家沟通频繁，国与国之间有着较为便利的交通，但这些国家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边界却非常偏僻，至今仍然是泥土路，一到雨季就无法通行。更不幸的是，2014年，这两国加上旁边的几内亚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周围的国家对它们更是谈之色变，甚至不惜与之断绝往来以避免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但无论如何，当非洲其他地区在19世纪经历了欧洲瓜分的狂潮时，利比里亚仍然保持着独立性。到了20世纪，正是因为这少数独立国家的存在，才让其他的非洲地区有了信心，选择了独立。在漫长的一百多年里，利比里亚虽然也经历了疾病、贫穷、封闭，却顽固地坚持着选举制度，这种制度虽然不完善，却证明黑人也是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现代国家的。

第四章
独立了：烟花之下，问题重重

数年之间，加纳突然从欢迎中国人的国家变成了对中国人限制最多的国家。

加纳出了一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也养成了相对开放的心态，欢迎天下朋友的光顾。但是，从北非开始直到西非，我费尽心机想拿到加纳签证，却都以失败告结。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加纳大使馆里，一位微笑的女士接待了我，但当她发现我是中国人时，立刻皱起了眉头，告诉我无法办理。“你们中国人太多了。”她委婉地说。

“我不是去工作，我是去旅游。我知道加纳是最早独立的非洲国家，也知道恩克鲁玛……”我试图让她看出我是一个旅行者。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你没有办法证明你不是去淘金的。”

在塞内加尔、马里，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遭遇，他们无不暗示我，他们无法确定我不是去加纳打黑工的。

一名在加纳打工的中国人告诉我他的遭遇。那天半夜，他和二十几个中国工人睡在屋子里，突然间，门被踹开了。土匪来了！有人从梦中坐起来喊道。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硬邦邦的枪管捅到了下巴。中国人也有两把枪，但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根本来不及反抗。

一个人想逃跑，有人在他的背后开了一枪，他扑倒在地上。“我以为他死了，可是他不停地喊，老子不敢了，不敢跑了，别开枪！还问我们英语的投降怎么说，有人告诉他之后，他就一遍一遍趴在地上喊‘Surrender’（投降）。他被踹了几脚，又被拎起来扔回我们堆里。”

所有的人都被揪出来，由于天太热，有的人习惯不穿衣服睡觉，他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身子就被扔进了车厢。

在他们身后，屋子里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最重要的是那包黄金，有几公斤重。为了防盗，带头大哥睡觉时将黄金放在被子里，也被翻出来拿走了。

卡车上路后，他们回望住处，那里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将他们在加纳的一切都烧光了。

抓他们的人不是土匪，而是加纳的军人。军人们是在捣毁非法淘金的窝点，二十几个中国人都是非法进入加纳淘金的。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加纳，没有具体数据可查。加纳的金矿非常丰富，一个小矿有时候一天就出产好几百克黄金，简直比抢钱都快。

不仅是中国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到这个“黄金海岸”（加纳独立之前的名字）来碰运气。他们之所以能来，也和加纳本地人的配合有关。有的警察为了赚钱，只要有贿赂就网开一面。海关有时也会将非法劳工放入境内，当地的酋长也默许外国人开采。军人抓他们，也带着利益的因素。这个在加纳打工的中国人虽然被抓了，但当他支付了2000美元后，就被释放了。

作为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加纳曾经是非洲的骄傲。几十年后，经过了动荡的它仍然贫穷。但在这些混乱之外，人民的生活其实又有了改善，大的动荡已经结束了，国家已经更接近一个整体，人们更加务实。虽然淘金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但为了让国家在未来走向更快的发展通道，黄金所换来的资金被用来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

这样的局面，虽然与当年开国者恩克鲁玛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这是一个后殖民国家从独立过渡到发展阶段必然经受的颠簸。

谁是恩克鲁玛？

谁是恩克鲁玛？

在西非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一定会受到嘲笑。但在七十多年前，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困惑这样提问。

1947年，黄金海岸的一个傀儡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简称UGCC），请回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担任秘书长，这个人就是恩克鲁玛。

UGCC的成员主要是黑人，却是一个与英国人合作的党，他们寄希望于在宗主国的帮助下获得自治，却又不离开宗主国的怀抱。但请回的秘书长却把事情带离了既定轨道。十年后，恩克鲁玛已经取代了UGCC，还让加纳完全脱离了英国人的控制，成了二战后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

一时间，恩克鲁玛成了非洲的象征，世界的聚光灯都打向了这位微笑随和、文质彬彬的黑人领袖，他被塑造成了一位新的英雄。

美国作家约翰·甘瑟在他的书《非洲内幕》（Inside Africa）中这样记载恩克鲁玛：他是个单身汉，也喜欢同妇女（包括白人）在一起，他没时间结婚，总是说黄金海岸每一个妇女都是他的新娘；他不抽烟不喝烈酒，偶尔喝一点香槟，还是个素食主义者，连咖啡都不喝；他对那些浪费时间的体育活动、名利和琐事毫无兴趣；他喜欢一点古典和当地音乐；他是个工作狂人；他被称为“非洲的尼赫鲁”“非洲之鹰”。

但对中国人来说，最感兴趣的还不是恩克鲁玛本人的活动，而是英国人怎么会让一个殖民地独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领土问题寸步不

让，一旦获得，绝不可能让出来。英国人既然已经将非洲、亚洲的大片土地占去了，怎么又会同意它们独立呢？这要从英国人二战后的政策说起。

领土问题，对于中国人是个是非问题，但对于欧洲人来说，却是一个成本问题。

19世纪，英国人吞并了整个印度，达到了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巅峰，但也从这时开始，他们发现维持殖民体系的成本太高昂，小小的岛国承受不起了。

付不起维持殖民体系的成本，当初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有过体会。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主导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为了保住航线，它占领了一系列的战略要地，从西非到东非，再到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西南海岸，都有葡萄牙人的堡垒。为了保住这些战略要地，葡萄牙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养一支庞大的舰队。小小的葡萄牙根本拿不出这么多人和钱来，只能眼睁睁看着战略要地一个个被英国人、荷兰人夺走。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看起来很成功，但为了把殖民地黏合在一起，必须动用大量的船只。狡猾的英国人利用海盗抢劫和绑架西班牙的货船，就可以让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交通瘫痪。最后美洲殖民地独立的呼声一起，西班牙根本没有能力来维持殖民体系。

英国旗插满全球之后，也发现面临着同样的陷阱：殖民地越来越不听话，为了镇压它们，投入的资本日益增加，超过了英国本土获得的好处。

最让英国人头疼不已的是印度。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为本土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是英帝国贸易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1857年印度人发动了反英大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英国人意识到，如果出现第二次起义，英国动用武力也没有用了。

从这时开始，英国人开始考虑走另一条路的可能性。这条路是：让印度的精英阶层加入殖民政府，教会他们治理国家，并让印度逐渐走向自治。如果这条路足够平稳，英国就不会和印度走向对立，印度即便自治了，仍然会停留在英国的贸易体系之中。这样的做法既可以减少英国的统治成本，同时也保证了贸易往来。

英国人在印度的试验步履蹒跚，他们时而想放手，时而又舍不得放权；印度人时而配合，时而开始另一波反抗。二战后，由于英国人从印度征了许多士兵，当这些军人复员时，英国人突然意识到，如果再不放手，这些杀过人的士兵将有可能率领印度人采取激进的行动。印度的独立事业随之加速，并于1947年实现了独立。

印度的独立是一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示范。对英国人来说，他们提出的逐渐独立、维持贸易关系的做法是可以实现的，不仅对宗主国冲击不大，对殖民地的冲击也不大。

印度的独立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一方面是印度独立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美国是唯一不要殖民地的西方强国，它本身就是殖民地出身，对于由别的国家控制一个民族带着天生的反感。二战结束后，在规划国际秩序的纲领性文件《大西洋宪章》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宪章不仅适用于战胜国，也适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殖民地。在他的鼓动下，世界进入了一个争取独立的时期。英国、法国等拥有殖民地的国家虽然不赞同美国的说法，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准备后事。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继印度之后，独立事业轮到了非洲的黄金海岸。

在英国人统治时期，黄金海岸并不贫穷。这里曾经出产黄金，又引进了可可种植作为支柱产业。英国人也有意识地吸引当地的精英阶层进入政府。这种做法，使得黄金海岸比英国其他的非洲殖民地拥有更多独

立的条件。

1947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黄金海岸的精英们组织了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党领袖是一位叫丹夸的人，正是这个人，提出将具有殖民地色彩的黄金海岸改掉，他选择了西非三大帝国的首位——加纳——作为这个未来国家的名字。实际上，当年的加纳帝国主要在现在的马里境内，并不包括现在加纳的土地，但这个国名能够鼓舞整个西非的独立事业。

丹夸做过政治领袖，也创立过黄金海岸最早的报纸。他选择了与英国人配合。在求得谅解的情况下缓慢独立的这条路，与英国人的想法一拍即合，这也是最稳妥的道路。作为早期的政党，统一大会党需要正规化，于是丹夸在别人的推荐下，决定聘请一个全职的秘书长，这个人就是恩克鲁玛。丹夸没有想到，这项任命不仅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差点毁掉了加纳和平独立的进程。

与丹夸的合作主义倾向不同，新秘书长恩克鲁玛是个十足的斗士。

恩克鲁玛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当过小学教员，之后去美国留学。当时世界正处于一个革命化的时代，恩克鲁玛在美国用黑格尔、尼采、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武装到了牙齿，并组建了非洲学生联合会，开始了政治尝试。

离开美国后，他前往英国攻读法学博士，又组织了西非学生联合会，还有一系列争取西非独立的斗争机构。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是恩克鲁玛最强大的两张牌。

丹夸和统一大会党希望同英国人合作，让政权和平过渡，恩克鲁玛却认为离开了斗争，就无法独立。他回到黄金海岸后，领导了大量的群众运动，一会儿要求增加工资，一会儿要求抵制外国货。在他的感召下，黄金海岸的社会情绪一天天向着激进化奔去。两年后，丹夸受不了这个精力无限的秘书长，两人分道扬镳。此后，恩克鲁玛组织了自己的

政党——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

在黄金海岸自治的过渡议程中，宪法是一个主要问题。英国人决定召集一个由当地人组成的委员会，编写一部新宪法。宪法中将授予当地人更多的权利，逐渐过渡到独立。

丹夸等温和派都被邀请加入宪法委员会，恩克鲁玛却被排除在外。英国人的举动惹恼了恩克鲁玛。为了证明人民大会党的力量，他发动了一次全面的罢工，这场罢工以暴力收场。得到了口实的英国人立刻行动，将恩克鲁玛及其同伴逮捕，判刑三年，让他进监狱织渔网去了。

英国人是一个守规矩的民族，他们原本以为，恩克鲁玛进了监狱，就不会干扰他们举行加纳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选了。按照法律规定，只要刑期超过一年，就不具有代表资格，不能参加选举。

但恩克鲁玛是学法律出身，他找到了法律的漏洞。他声称自己的刑期虽然是三年，却是由三个不同的判决、各判刑一年凑出来的，如果单独衡量每一次判决，刑期都不超过一年。英国人还没反应过来，恩克鲁玛已经报了名。英国的监狱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小纸条和传话人，恩克鲁玛在监狱里发动了竞选攻势。

选举结果一出来，英国人大吃一惊：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占据了总共38个议席中的34个，成了绝对的第一大党。

英国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到底承不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如果承认，意味着恩克鲁玛将上台，并必然被议会选为政府总理，一个在监狱里的总理将成为世界的笑柄；如果不承认，那么人民大会党已经通过选举显示出了民心向背，整个国家将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经过衡量，英国人决定接受选举结果，抛弃了更加温和的丹夸，选择了恩克鲁玛。他从监狱里出来后，走上了总理的宝座。

恩克鲁玛当上总理虽然并不意味着独立，但是意味着准备工作的加

速。

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加纳虽然有恩克鲁玛的激进运动，但英国人还是耐心地做着准备工作，将所有的制度搭建好。直到恩克鲁玛实在等不及了，一次次利用民意驱赶他们，英国人才在六年后让加纳获得了独立。

这是非洲第一个从殖民地转化为独立国家的例子。十年前，恩克鲁玛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在英美混日子的穷孩子。十年后，他已经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非洲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传奇人物，他们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突然成名。这种想法有励志的一面，也带着急功近利的因素，由此带来了一出出悲喜剧。

在恩克鲁玛的鼓舞下，全非洲进入了独立时代。

“日不落帝国”解体了

在所有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中，在治理上以英国人留下的遗产最丰富。

殖民地管理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以及如何处理殖民地政府与位于本土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英国人摸索出了一套“联邦制”的架构，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国王和议会派出总督作为殖民地的行政领导。可另一方面，总督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却也不是大权独揽，殖民地往往会设立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力也许没有真正的议会大，但总督必须尊重它，从而对总督形成一定的制衡。

在这个类议会机构中，最初的成员往往都是英国的白人，到了一定时候，会逐渐吸纳当地的精英分子参加。这种方法很适合培养出一批懂政治和行政的当地人，直到他们能够担负起行政重任，殖民地才不会在独立后退化回更加落后的形态。

在印度，英国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尼赫鲁一代的精英分子，从而完成了无颠簸的独立过程。在缅甸，由于这个培养期比较短，加之担当开国元首的昂山将军意外被刺，因此缅甸在独立后进入了混乱时期。

而在非洲，英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地人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迫切地希望独立，根本没有考虑政治条件是否成熟，是否有足够多的行政官僚来接管政府。非洲的教育也比印度落后得多，许多国家连识字的人都凑不够，又如何谈建立有效的政府。

英国人的自私也帮了倒忙。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所谓当地精英指的

是印度人。可是，在英国殖民地肯尼亚，所谓当地精英，却是已经扎根在非洲的白人，黑人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

按照英国人的计划，加纳独立是因为这个国家独立的条件已经相对成熟。这个相对成熟的国家却被恩克鲁玛搅了局。英国人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之前，就被迫放手了。那些还没有达到独立条件的国家又该如何？

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分成了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西部非洲的零散殖民地，这包括了最早获得独立的加纳，以及尼日利亚、冈比亚、塞拉利昂等国。这一类国家最早进入英国人的独立规划，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第二类是英国的保护国埃及，以及英国和埃及的双重保护国苏丹。这两个国家不算完全的殖民地，它们早就存在着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只是这个政府必须受英国人制约。他们拥有很强的独立倾向，但英国人在埃及有着重要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很难下决心放手。不过，埃及人帮助英国人做了了断。1952年，对英国人软弱的埃及国王被推翻了，发动政变的是埃及的英雄纳赛尔。纳赛尔推翻了埃及的国王统治，建立了表面上的共和制。在一次次的争执之后，埃及人强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结束了英国的特权。

埃及独立后，纳赛尔认为要将英国人赶出苏丹，唯一的办法是宣布苏丹从埃及独立，结束托管。于是，苏丹也于1956年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苏丹是英国人拼凑的国家，北方信奉伊斯兰教，属于阿拉伯文化圈，南方则属于非洲文化，更加原始，独立后长期受到北方压制。在西部，还有达尔富尔区域。这里曾经是独立的达尔富尔苏丹国所在地，苏丹国被英国人征服后，将这一区域并入了首都位于喀土穆的苏丹国家，但达尔富尔的独立倾向一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达尔富尔问题。

第三类是英属东非，这包括了英国殖民地肯尼亚、乌干达，从德国手中得到的坦噶尼喀，以及位于海中的保护国桑给巴尔，再加上更靠南的尼亚萨兰（现在的马拉维）、北罗德西亚（现在的赞比亚）。

这些地区不仅更加原始，而且英国人也舍不得放手。以肯尼亚为例，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定居的英国人，他们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开始了农耕生活。如果从经济角度看，肯尼亚农场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加纳。如果从黑人教育角度看，它的起步很晚，黑人中缺乏与上层沟通的政治人士，政治上更加不成熟。这两点决定英国人并不想从这里撤出。

可是，随着加纳的独立，肯尼亚的黑人也开始骚动，这让英国人不得不迫于压力，做出一些让他们独立的承诺。

南部还有几个小国，被称为“女王毯子上的跳蚤”。这几个小国嵌在南非的中间和周围，分别是贝专纳兰（现在的博茨瓦纳）、巴苏陀兰（现在的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在南非，最早来的白人是荷兰人，他们占领了南非后，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布尔人（荷兰人的后裔）。这些“小跳蚤”就是当年布尔人没有征服的小硬块。当英国人打败布尔人获得南非后，也顺便把这些小国收入囊中。它们对于英国没有什么重要性，英国人也并不在意他们是否独立。

第四类是最复杂的，有两个地区虽然是英国的保护国，却是由当地白人统治的，它们是南非和南罗德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

南非的白人是布尔人，英国人依靠武力成了布尔人的主子，布尔人又是当地黑人的主子。

南罗德西亚的白人是英国人的后裔。这里与相邻的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不同，后两个地方白人还没有建立起更加稳固的社会结构，独立后就是黑人的天下。但由于南罗德西亚的白人来得早，他们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便英国人撤出，这里的白人也可以迅速接手政

权，形成一个类似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国家，由白人进行统治，控制经济命脉，但社会主要构成还是黑人。

南非除了本土之外，还有一块殖民地叫纳米比亚。这里原本是德国的殖民地，由英国人交给了南非。一旦英国人撤出，纳米比亚必然会成为南非独立控制的附属区域。

在英国人的四类领地中，他们打算放手第一类，但不幸的是，当第一类放手之后，第二、第三、第四类也全都跑出了笼子。英国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也收不住了。

紧随加纳之后，第二个独立的是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民族构成非常复杂的国家，从传统上它可以分为三大民族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北部，属于伊斯兰教区域，占据了全国领土的一半多，人口也在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分成了两个族群：豪萨族和富拉尼族。两大族群之间存在着斗争，但在对付非伊斯兰教地区时却团结一致。这一区域与外界接触较少，宗教信仰又不相容，文盲程度很高，也更加排外，即便是周围的西非国家也对这个区域敬而远之。我在西非旅行时，一提起尼日利亚，其他国家的人都会首先提醒我不要去北部。这里出现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博科圣地”组织，它是世界著名的恐怖组织之一。

而尼日利亚的西南部是另一个拥有独立传统的区域。这里居住着约鲁巴人。由于开化较早，城市发展有基础，首都拉各斯（后来迁到了阿布贾）就在这个区域。拉各斯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一度号称世界前三。它建立在拉各斯岛上，贫民窟林立，街道混乱，却拥有无限的活力。

第三个区域是东南部。这里居住着一个拥有商人传统的民族——伊博族。伊博人没有形成更大的政治实体，却由于四处流浪，足迹遍布尼日利亚几大地区，控制了各地的商业。他们和欧洲人接触后，也迅速接

纳了欧洲文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尼日尔河入海的三角洲所在地。这个三角洲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存储地之一，伊博族居住的地区也一跃成为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区。

英国人要将这三部分捏合到一起，必然会产生磨合问题。如何在政治架构上考虑三者的利益，让他们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厮杀？

之前，虽然北方的人口更多，但由于北方的经济和教育比较落后，导致懂政治的精英十分缺乏。在设计制度时，英国人出于人口因素，让北方地区占的政治比重最大，甚至超过了南方两区的总和，这就给后来的不稳定留下了口子：北方的穆斯林酋长只要掌握了本区的选票，就能左右南方两区的政治。

为了防止一方独大，英国人还设立了半自治体制，三部分都是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在此基础上组成联邦。这种结构或许可以防止一方独大，却增加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离心力。

一个国家的宪法架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才能最终稳定。但英国人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尼日利亚去磨合了。1960年，在加纳独立三年后，尼日利亚也独立了。

英国人最难以抉择的是以肯尼亚为代表的第三类殖民地。在这些地方，白人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经济生活，如果要把政权交给黑人，势必意味着白人要放弃大量的财产和土地。

英国人希望，殖民地即便要独立，也是一种围绕着白人的独立，在当地落地生根的白人仍然可以控制土地资源以及政治资源。在达到这个效果之前，英国人不想放手。

在东非，对英国人最重要的殖民地有六个：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南罗德西亚、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而在六个殖民地中，又有两个白人最密集的核心，分别是北方的肯尼亚和南方的南罗德西亚。

在肯尼亚，英国人已经控制了最好的土地，土著基库尤人被赶走。这些白人的身家性命已经押在庄园上，他们是反对脱离母国的死硬派。另外，这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印度人，他们甚至比英国人来得都早。印度人肯服从英国人，但绝对不会服从黑人。

在南罗德西亚，同样存在白人阶层，他们不愿放弃利益给黑人。而在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由于白人少，问题反而简单得多。

按照英国人的打算，他们想建立两个联邦国家。其中一个围绕着肯尼亚建立，包括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由白人作为政治主体，同时在印度人的帮助下，又照顾一定的黑人利益，形成一个国家。

另一个围绕着南罗德西亚建立，将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合并，形成另一个国家。

这种模式让英国人的损失最小，又满足了殖民地的独立要求，可能是调整最小的方案，也是最能保护各方利益的方案。但事与愿违，英国人建立这两个联邦的过程都不顺利，反而激发了两地的独立意识。

首先表现出暴力独立诉求的是英国人在东非最大的据点肯尼亚，这里的白人最多，占据的土地也最多，引起的民族冲突也最激烈。肯尼亚也出了一位独立领袖，他是现在肯尼亚总统小肯雅塔的父亲老肯雅塔。

老肯雅塔并不是一个如同恩克鲁玛那样严肃的领导人，他本人是个花花公子，乐于享受，还曾经到过莫斯科接受过世界革命的培训。实际上，他对于惬意的英国式绅士生活充满了向往。

肯雅塔曾经在英国生活，二战后，突然决定回家乡闹独立。他本人并没有多少暴力倾向，但不巧的是，回到家乡时，正碰到了肯尼亚历史上最血腥的自发性叛乱——茅茅叛乱。英国人认为这次叛乱是肯雅塔组织的，他因此走了霉运，被抓起来判了刑。

茅茅叛乱事实上是当地被剥夺了土地的基库尤人自发组织的、以杀

害英国白人为目的的运动，这次运动给英国人在非洲的统治留下了一缕血腥的记忆。最终死亡的白人平民是三十几个，英国人杀害的黑人却有一万多。

肯尼亚危机过去后，尼亚萨兰突然间也闹了起来。领导尼亚萨兰独立运动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黑人医生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

班达本来已经在英国定居，当北罗德西亚、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合并的消息传来，他突然间拍案而起，回到故乡。英国人合并三个殖民地，是为了把南罗德西亚的白人样板强加给黑人主导的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这引起了后两者的极大不满。

班达回国后号召人们反抗英国人，他也因此进了监狱。但英国人经过了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两场抗议运动，已经心灰意冷。他们匆匆地决定让这些殖民地尽快独立。

一旦决定了，剩下的事情就不再纠缠。曾经肯尼亚白人的利益是英国政府考虑的重心，现在他们只能自求多福。

南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的联邦也解体了，三个国家各自独立。对于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没有什么问题，但南罗德西亚则问题重重。当地的白人不想失去权力，宣布建立白人控制的国家，于是这个国家的黑人继续闹革命，争取把白人推翻。

从1961年到1968年，英国的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不仅是西非和东非的各个国家，就连南部的几个“小跳蚤”也都被授予了独立地位。

1961年，英国人控制的南非也脱离英联邦独立了。只是，这时的南非是一个由布尔人控制的国家。为了防止人口占大多数的黑人来抢夺白人的利益，这里实行了严格的种族隔离，直到三十年后才得以取消。

法兰西帝国的“器官”们

在非洲殖民地历史上，法国是唯一一个与英国同等量级的国家，它的殖民地从面积上讲超过了英国，人们也总是拿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作对比。

与英国的间接管理不同，法国推行的是直接管理。英国的每一块殖民地都是一个拥有健全功能的小政权，有一个总督代表着行政分支，也有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负责立法事务，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法国的殖民地却和法国本土的其他地区一样，是法兰西帝国里的一个不能独立运行的零件。

如果用人体来比喻殖民地和帝国，那么英国的殖民地就是一个个单独的小孩，英国是这群小孩的托管人；法国的殖民地却只是法兰西这个庞大身体里的一个个器官，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身体，共同维持法兰西的运转，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

在殖民地管理上，法国也比英国严格得多。一个殖民地只具有单一的功能，它们为帝国生产某种单一的原料，有的甚至连原料加工都不会做，只能送到母国去加工，完了之后再运回殖民地。

这种单一模式，使得法国的殖民地都不具有独立成长的条件。法国人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是集权式的，早已习惯了集权思维。但另一方面，这也是防止殖民地脱离帝国的一种措施。

即便到了现在，殖民地已经脱离了法国几十年，许多国家仍然不得不服从于这个体系。它们生产单一产品，缺乏加工业，忍受着法国强加的高价。

可是，当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原本安静、缺乏条件的法国殖民地也突然要求独立，法国政府无力镇压殖民地的呼声。

法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这里由于靠近法国，居住了大量的法国人，一直被认为是法国的本土。阿尔及利亚在独立之前人口是800万左右，其中法国人占115万左右，虽然只有百分之十几，但在整个非洲地区，已经算是殖民化最彻底的。如果要将这里放弃，意味着这100多万法国人都要回到法国本土。但他们在法国已经毫无财产，不可能回去了。

第二类是北非的其他两个保护国：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两个国家有自己的统治者，但法国作为宗主国拥有极大的权力。

第三类是法国在西非、赤道非洲的两个殖民地联合体：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其中法属西非包括八块殖民地：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贝宁、尼日尔、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法属赤道非洲则包括了另外四块殖民地：加蓬、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布）。此外还有从德国人手中获得的两块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这些地区受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它们甚至在法国议会中也有代表，少数精英分子甚至能在法国国内担任部长职务。

第四类是东非的零星殖民地，主要包括吉布提（法属索马里），以及印度洋上的大岛马达加斯加，还有若干小岛，比如留尼汪岛。这些小岛如今仍然掌握在法国手中，但马达加斯加却早已分离。

随着英国人在加纳的独立试验的展开，法国殖民地也进入了骚动期。法国人明白他们的殖民地政策必须调整，如果不主动调整，那么就必然要被动等待暴动。

法国人的计划是这样的：在北非，由于阿尔及利亚已经深深地法国化，因此，阿尔及利亚必须作为法国的本土对待，并逐渐在政治架构上

融入法国本土政治；至于其余两个保护国摩洛哥和突尼斯，则允许它们在与法国友好的基础上，逐渐实现独立。

在东非和印度洋的零星殖民地中，马达加斯加曾经武装反抗过法国的统治。其统治成本太大，法国无法维持，它的独立似乎无法避免。吉布提的地方不大，只是一个港口国家，比较容易控制。它于1957年就获得了半自治的地位，但到1975年才真正独立。它在法国的殖民地策略中只处于从属地位。

法国看重的，还是西非和中非连成片的广大区域。法国人一直在培养当地精英分子，培养他们的爱（法）国热情，试图将这片区域同化，让它们在一定的政治安排下并入法兰西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法国并不想看到西非和中非独立，但必须授予它们更大权力。法国希望安排一种“邦联”结构，让它们满足于一定程度的自治，又在外交和经济上听从法国的领导。

那么，法国的目标可以实现吗？

首先遇到问题的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两个保护国。法国在退出摩洛哥之前，希望扶持一个亲法的国王。于是军队出面将原本仇视法国人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废黜，另立了一个听话的国王。不曾想，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摩洛哥人的反抗。法国人觉得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在，只好恢复了穆罕默德五世的王位。

在突尼斯，一个叫哈比布·布尔吉巴的人脱颖而出。虽然突尼斯也有国王，但国王对法国人言听计从，并不符合突尼斯人的胃口。这里的国王正式称号叫贝伊，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形成的，但其威望并不强。布尔吉巴借机成为领导独立的领袖。

在数次逮捕布尔吉巴之后，法国也认定不值得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维持一块迟早要分离的土地。

1956年，法国人允许突尼斯和摩洛哥双双独立。一年后，已经是王

国首相的布尔吉巴主持制宪会议，废除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至今，摩洛哥仍然是一个王国，而突尼斯则保持了共和国的地位。

两个保护国的问题解决后，最让法国人头疼的还是阿尔及利亚的问题。

2013年，我曾经在老挝遇到过一位法国青年尼克，他的祖父母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

由于老挝曾经也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自然谈到了法国殖民地问题，由此引出了二战英雄、法国总统戴高乐。尼克义愤填膺地告诉我，虽然世界把戴高乐当成英雄，但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后代永远不会原谅他。

他回忆起祖父母说过无数次的故事："在阿尔及利亚局势最紧张时，戴高乐跑到了阿尔及利亚，安慰那些移民说：'法兰西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大家都相信了他。但是，他离开一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法兰西已经准备放弃阿尔及利亚。这表明那100多万法国移民已经失去了家园。"

严格地说，为了将阿尔及利亚变成本土，法国人拿出了巨大的诚意。按照法国中央议会（国民会议）的规定，阿尔及利亚可以在议会中占据27个席位，其中大约一半给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另一半给土著穆斯林。在阿尔及利亚的地方议会中，一共120个席位将在穆斯林与法国人之间平分。

但这样的诚意远远达不到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期望。法国议会总席位是577席，即便将27席全都分给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撼动法国人的整体优势。更何况是对半分，让在人口比例上少得多的白人与穆斯林享有同等待遇。

更不合理的地方在经济和社会上，法国人几乎控制了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命脉，给穆斯林留下了大量的贫困人口。阿尔及利亚的地理条件并

不优厚，本来就养活不了太多人口，当法国人拿走过多，穆斯林自然会变得更加贫困。

面对法国人的同化，穆斯林以起义来做出反击。领导穆斯林起义的，是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的艾哈迈德·本·贝拉。1947年，本·贝拉成立了一个武装斗争组织，并在两年后开始实施恐怖行动。他被捕后，被判处了八年徒刑。

不想，本·贝拉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变得更加激进。从1954年开始，他领导的“民阵”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法国作为回应，也派出了大量的军队对“民阵”实行报复。到了高峰时期，法国有50多万军队停留在阿尔及利亚，相当于两个法国平民就要受到一个军人的保护。这种过度的武力使用，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法国政府的不稳定。因为在亚洲的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老挝）吃了败仗，法国政府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了1958年，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法国政府却倒台了。新的中央政府迟迟组建不起来，没有人愿意接手。“民阵”也在这时故意制造对军人的处决事件，这件事扩展开来，又让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总督倒了台。从中央政府到阿尔及利亚地方政府，他们都无所作为，这让法国人意识到共和国已经接近失败了，他们选择了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戴高乐出来收拾残局。

法国人选择戴高乐，是希望他表现得足够强硬，打胜对本·贝拉的战争。戴高乐最初也希望这样做，但他是个务实的人，当他明白已经没有胜算时，骤然间转向，法国人开始逐渐退出阿尔及利亚。

1962年，阿尔及利亚在经过了八年战乱，失去了50万条人命之后，终于赢得了独立。

尼克的祖父母曾经在阿尔及利亚奋斗了大半生，但阿尔及利亚一独立，狂喜的穆斯林开始疯狂庆祝和驱赶。法国移民只好扔下一切，跑回

了法国。

回到法国后，作为外来户的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容身的住处都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同胞的欢迎，反而被本地人欺负、嫌弃。他们只能从头开始打拼，对于这些从殖民地回来的人来说，重新生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殖民地政策在创立时给当地人带来了不平等和压迫，在结束时，又给白人移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西非，我曾经碰到过另一名法国人，他去过除了阿尔及利亚之外的所有西非、北非国家。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阿尔及利亚时，他回答，因为阿尔及利亚对法国人进行了严苛的限制，所以他几乎不可能拿到签证。看来，双方的恩怨至今还没有化解。

与阿尔及利亚的血腥冲突相比，法国其他非洲殖民地反而更加容易获得独立。既然连最舍不得的阿尔及利亚都守不住，其他地区更是无可留恋。

但与阿尔及利亚有石油资源、足以自立不同，法国西非和中非的十四块殖民地却都是典型的“器官式”穷国。这给了戴高乐足够的信心，他认为这些地区离开了法国根本无法生存。

二战之后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组成了一个以英联邦为模板的体系——法兰西联盟（French Union）。这个体系以法国本土为核心，其他殖民地和海外领地可以派出少量代表参加议会，却必须接受法国的全盘领导。

戴高乐上台后，试图改进这个体系，创建了另一个叫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的组织来取代法兰西联盟。从联盟变成共同体，其核心是在保留法国本土与殖民地纽带的前提下，给予殖民地更多的自治权。在起草宪法时，他甚至邀请了一部分愿意配合的非洲人士来起草。

根据新宪法规定，法国在非洲的两大殖民地联邦政权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十二个小的政治实体，这十二个政治实体直接受共同体领导，没有中间阶层。

共同体有一个总统，由法国总统担任，并负责处理司法、金融等事务。同时建立一个共同体会议机构，充当共同体立法的角色，只是这个机构从来没有起过作用。

戴高乐对法兰西共同体信心十足。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每一个小殖民地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每个殖民地只生产一两种初级产品，缺乏工业条件，它们离开法国几乎不可能生存。法国还培养了一批亲法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甚至被邀请去制定宪法。他们一旦回到家乡掌了权，必然对法国忠心耿耿，帮助维持新的政治架构。

但戴高乐的政治安排却在一个“调皮孩子”的手中毁于一旦，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

塞古·杜尔是一名坚定的非洲本位主义者，又是恩克鲁玛的强烈支持者。戴高乐为了表现出各个殖民地是自愿加入共同体的，在宪法的条款中规定，每个殖民地都可以举行全民公决，选择是否批准共同体宪法。如果批准，就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如果不批准，这块殖民地就将独立出去。

为了避免大家选择独立，法国在投票前加了许多威胁：如果选择留在共同体，就可以继续享受法国的补贴与帮助；一旦选择独立，法国将立刻撤走一切人员和资本，不再对独立国家提供任何帮助。

绝大部分殖民地都明白，一旦法国人撤离，当地连会写字的人都找不出几个，更何谈组织政府？他们都乖乖地投票留在共同体。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

几内亚投票前，戴高乐亲自跑了一趟，做最后的努力让他们留下。

但他看见的却是几内亚对法国深深的敌意，他知道大势已去。公决中9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

几内亚独立的当天，除了少数自愿留下的，法国人几乎全部撤离，他们说到做到，将所有能移动的、有价值的物品全部带走，无法移动的就砸烂。法国人一离开，几内亚的政治、经济、金融完全瘫痪。独立让几内亚付出了倒退十年的巨大代价。

法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杀鸡骇猴，避免其他殖民地选择独立。

事实证明，这种威胁在短期内的确有用。在法兰西联盟改变成法兰西共同体的过程中，除了几内亚和从德国接手的多哥和喀麦隆独立了出去，其他十一个都留在了共同体之内。

但长期来看，几内亚的独立又的确瓦解了法兰西共同体。虽然法国人撤离了，但几内亚并没有屈服。塞古·杜尔成了非洲人的英雄，是不屈服于强权的典范。非洲人为他欢呼的同时，苏联也对它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一旦苏联插手几内亚，美国人立刻不甘示弱地跟进了。塞古·杜尔拿着苏联和美国的钱，将国内的反对派一一镇压，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六年的执政生涯，直到去世。

他的境遇似乎给非洲的政治家指明了另一条出路。于是，法兰西共同体很快就解体了。在共同体成立两年后，十一个殖民地先后宣布独立。戴高乐本来试图挽救法兰西帝国，不料却加速了它的解体。

非洲国家虽然独立了，却并没有摆脱法兰西的阴影。

即便现在，这些非洲国家对法国的依赖仍然很严重。它们缺乏工业，必须从法国进口大量的加工食品、机械，并支付高昂的价格。它们出产的初级产品也主要销往法国，或者通过法国转运。

随着最近几年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非洲可以把初级产品销往中国，也有了更加廉价的工业品。这对于法国的地位是一种严重的冲击，

但仍然不足以解决西非对于法国的依赖。

西非和赤道非洲对法国依赖的另一种表现在于金融。至今西非仍然在使用一种叫西非法郎的货币，而赤道非洲则使用中非法郎。

使用西非法郎的国家一共有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尔、多哥、贝宁、几内亚比绍这八个国家。其中多哥是德国殖民地，后来被法国托管，虽然提前独立，但加入了法国的货币联盟。几内亚比绍是葡萄牙殖民地，也选择了加入货币联盟。在法属西非中，几内亚没有使用西非法郎，毛里塔尼亚曾经加入过货币联盟，但后来退出了。

使用中非法郎的国家有赤道几内亚、刚果（布）、加蓬、喀麦隆、乍得、中非共和国这六个国家。其中喀麦隆是德国殖民地，后来被法国托管，而赤道几内亚原本是西班牙殖民地，后来加入了中非法郎货币联盟。

这两种法郎对法国法郎（以及后来的欧元）的汇率是固定的，任何国家不能随便调整。它们都出现在欧元之前，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统一货币。

人们对于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认为，货币联盟是法国继续遏制非洲国家独立的表现。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法国要求各个国家必须将出口换汇的大部分外汇放在法国控制的银行之中。在许多人看来，一个国家无法支配自己的贸易收入，就意味着主权的不完整。许多泛非主义者也将两种法郎视为新殖民主义的表现。他们说由于法国撤退时砸烂了几内亚的一切，其他国家为了不让法国破坏，不得不加入货币联盟，让渡经济主权，以换来法国的援助。

但两种法郎的好处也是巨大的。任何新兴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的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总是偷偷加印钞票。但是西非和中非却由于使用了非洲法郎，政府无权加印钞票，反而幸运地

避免了恶性膨胀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法郎保护了这些国家的币值稳定。

不过，反对者又可以说，法郎币值的稳定造成了新的问题。比如，我发现西非的物价比其他非洲地区偏高，这就是由于使用了不能随意贬值的非洲法郎。物价的昂贵，让这些国家的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间接地造成了社会的贫困。

孰是孰非可以一直争论下去，但即便是最反法的人，当看到另一个国家的惨状，也会承认法国人能够让殖民地顺利独立，已经算是一种成功。在比属刚果，由于宗主国的罪孽，人们哪怕想要和平都是一种奢望……

卢蒙巴：第一位殉道者

1961年1月17日晚上9点41分，一支小型的行刑队带着三名囚犯来到了刚果（金）城市伊丽莎白维尔附近一片与世隔绝的丛林地带。三名囚犯都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跟着行刑队一起的还有几名浑身酒气的人，他们是宣布从刚果（金）独立的加丹加共和国的总统冲伯和他的几位部长。还有几名白人，分别是一名比利时的警察署长和三名军警。

这些人将三名囚犯领到已经挖好的墓坑边，依次枪决。最后一名戴眼镜、身材瘦长的囚犯仿佛至死也不相信现实，还在问行刑人："你们打算杀掉我们？"他得到了确认的回答。

他们死后，尸体先是被埋葬，随后又被挖出来切成碎块，扔进强酸里溶解掉，剩下的骨头被研磨成粉抛撒掉，从此人们再也找不到尸体的痕迹。

最后一名死去的人叫帕特里斯·卢蒙巴，他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为利奥波德维尔，现称为金沙萨）的首任总理，也是领导这个国家取得独立的人。在半年前，他才兴高采烈地宣称，刚果（金）这个巨大的国家终于摆脱了欧洲的那个蕞尔小国——比利时。但半年后，在比利时人的推动下，刚果（金）已经分裂成三块，卢蒙巴也死于非命。

卢蒙巴作为非洲独立的第一位殉道者被记入了历史。如今，连他死亡的城市，也都改了名。最早时，这个城市叫伊丽莎白维尔，为的是纪念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的王后伊丽莎白。卢蒙巴死后五年，这座城市更名为卢蒙巴市，只是卢蒙巴的尸骨已融入刚果（金）的大地之中。

非洲殖民地中，最糟糕的是由比利时控制的。它们在独立之前遭遇了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留下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结构失衡的局面。比利时人不情愿地离开后，留下的仇恨立即毁掉了这几个国家。

比利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包括一个巨大的殖民地（比属刚果）和两个保护国（卢旺达和布隆迪）。

两个保护国是从德国手中继承来的，由于国土面积较小，它们并没有成为比利时关注的焦点。但比利时人仍然把仇恨注入这两国的不同民族之中。

在两国执政的是一个叫图西族的少数民族，而被统治的多数是胡图族。比如在卢旺达，胡图族的人口大约是图西族的四到五倍。

非洲的种族界限大都是模糊不清的。也许在几百年前还是同一个部族，只是后来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者生活环境，形成了较为（不是完全）封闭的通婚圈子，分化成了不同的种族。

以图西族和胡图族为例，他们的肤色、语言都没有太大差别。在非洲历史上，有一个超级种群班图人，他们从中西部非洲出发，横扫了整个非洲，取代原来更加黝黑和瘦小的俾格米人成了非洲的主流人群。图西族和胡图族其实都是班图人的后裔，血缘上没有太大差别。

两个种族在婚姻上和社会地位上也并非完全封闭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两个民族来往密切，可能只是因为政治地位的不同，他们才称自己是图西人或者胡图人。

但自从欧洲人进入卢旺达、布隆迪后，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对立突然加剧了。在19世纪的欧洲，一股极其可怕的暗流涌动着，它叫人种学。人种学家们走到哪儿都喜欢带上尺子，将当地的土著人测量一遍，根据体貌粗糙地划分出人种，至于这些体貌是不是遗传得来的，则很难证明。

人种学发展到后来，成了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重要依据。二战之后，人们决定将人种学冰封起来，避免它再兴风作浪。但在欧洲之外，人种学却阴魂不散，成了种族冲突的助推剂。

德国人到来后，经过测量，他们认为图西人是高大瘦弱的，拥有更高的智商，胡图人则较为矮胖，且智力低下。自从欧洲人这么说了之后，当地人也逐渐接受了这种荒唐的理论。

德国人退出后，比利时人由于与这两个保护国更加疏离，决定采用制造分裂的方法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在初期，他们依靠图西族人来统治。在允许两国独立之前，布隆迪仍然维持着图西人的统治。卢旺达由于采取了民主制，人口众多的胡图族人突然成了统治阶层。

由于胡图人长期处于社会劣势，在经济地位、教育背景上都较为落后，无法实现有效治理，他们统治的方法也只好越来越依赖仇恨和民族主义，将美丽的千山之国卢旺达变成了冲突频发之地，注定了后来的悲剧。

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两个小国，比利时人并不十分上心。但对于面积巨大的比属刚果（面积为比利时本土面积的70倍），比利时人则倾注了无数的心血。这些心血包括：统治刚果（金）的第一任君主利奥波德二世杀害了数百万刚果人，虐待致残的人不可计数，从刚果（金）掠夺走的财富都变成了利奥波德的私人财富。国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富豪，与之相比，比利时本土反而只是国王财富的添头。

利奥波德的统治在西方殖民圈里引起了巨大的反感，康拉德的小说将这里描写成地狱，各个国家也纷纷指责他的罪恶行径。他死后，继承人终于将刚果（金）从私人领地改为由比利时政府管辖。但这时刚果（金）又发现了巨大的矿产资源：钴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铜矿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这些矿产资源加上丰富的橡胶资源、钻石资源，使得比利时继续从刚果（金）抽走巨额财富。

在比利时抽走财富的同时，刚果（金）却依旧贫穷。刚果（金）人缺乏教育，加上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们成了比利时人利用的工具。

就在独立之前两三年，比利时还不曾有让刚果（金）独立的想法，他们仍然躺在这巨大的血腥财富之上做着春秋大梦。但独立的声音却从英国和法国殖民地悄然传来，而刚果（金）独立的吹号手，就是比利时人恨之入骨的卢蒙巴。

事后，人们总是指责卢蒙巴有性格缺陷，只能革命却不懂得治理。但如果放在大背景中看，卢蒙巴却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他是被逼的。比利时从来没有想过要教给黑人怎样统治，他们的暴行又激起了黑人的普遍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出现一个尼赫鲁式的调和者。

在比属刚果，黑人只能读小学，没有机会上中学和大学。卢蒙巴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接下来做过店员、推销员，逐渐积累下了口才和演讲技巧。工作和生活中的遭遇，让他对比利时统治的实质看得一清二楚。他身材瘦长，带着一种魅力型领袖的气质，这让他脱颖而出，成了黑人中的佼佼者。

在刚果（金）独立之前两年（1958年），卢蒙巴发起了刚果（金）民族运动，并从加纳取来真经，开始在社会层面上与比利时人对着干。抗议声此起彼伏，暴力冲突也时常出现。在卢蒙巴的带动下，刚果（金）各地也涌现出许多政治团体，并逐渐在全国层面上联合起来，向着独立努力。

也许卢蒙巴和其他独立领导人都没有想到，比利时人是这么不堪一击。刚果（金）的骚动传到比利时国内，引起了比利时人普遍的担忧。他们担心会发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或者英国在肯尼亚（茅茅运动）的遭遇。担忧的结果是比利时人准备撤了。

于是，民族运动刚刚兴起两年，比利时人就匆匆撤出了刚果（金）。这样的胜利来得过于简单，卢蒙巴显然还没有做好从革命思维

向统治思维转变的准备。

比利时人虽然准备撤，但是面子还是要的。1960年6月30日，刚果（金）独立这一天，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专门从比利时飞过来，要参加这个隆重的庆典。庆典在上午9点开始，在黑人歌手的助唱下，杀人者和被害者在一片和谐声中济济一堂。

11点是讲话时间，博杜安作为长者做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讲话，他纪念了他的祖父、老暴君利奥波德，并赞扬了比利时在刚果（金）的统治多么崇高。但博杜安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他提醒刚果（金）独立后不要急于做社会改变，而是要保留原有秩序，直到对政治有了足够的了解，确信能做好的时候，再更改不迟。

博杜安坐下后，由刚果（金）首任总统（也是象征性的国家领袖）约瑟夫·卡萨武布讲话。总统很有涵养，他没有指责比利时人。按照计划，这个环节并没有安排总理卢蒙巴讲话，虽然他才是实际掌权人。

但会议的主持却突然邀请卢蒙巴上台讲话，人们有些奇怪，他们不知道，其实是卢蒙巴自己要求主持人打破程序留给他一点时间。他的时间并不多，只能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这篇发言后来被称为比属刚果的《独立宣言》。

卢蒙巴首先感谢了刚果（金）人民，他说刚果（金）独立是民族运动抗争获得的，并不是比利时人的恩赐。

接着他开始历数刚果（金）人民在殖民制度下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强迫劳动，种族迫害，被掠夺土地和资源，以及肉体摧残。

接着他转向了对未来的展望：独立已经将所有的伤害消除了，在民主的制度下，刚果（金）人将拥有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薪金，种族歧视不会再有，刚果（金）人将成为非洲的骄傲和样板。

这篇讲话过后，卢蒙巴为自己树了一个永恒的敌人：比利时人。国

王博杜安强压怒火，维持到了庆典和宴会结束。

事实证明，卢蒙巴说的是实话，只是过于张扬了。虽然独立了，但刚果（金）还有大量的比利时人，他们充斥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军队之中。这篇讲话让比利时人认定卢蒙巴是必须除去的角色，他们不能容忍一个不感谢前主子的黑人。

与此同时，由于比利时人在刚果（金）不发展教育，黑人的文化水平还不足以单独管理国家。刚果（金）独立之初，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不超过30人，完成初中教育的只有100多人。有文化的黑人数量不足，使得政权操纵在各色比利时雇员手中。比利时人实际上是给了刚果（金）二选一的选项：要么继续让比利时人控制政府的行政工作，从而继续把持刚果（金）的资源；要么让这个国家毁灭。

事实上，这样的冲突也必然会发生，只是由于卢蒙巴刚强的性格，本土黑人与比利时人的矛盾提前爆发了。

起初，在首都军营里一名比利时指挥官与黑人士兵发生冲突，引起了哗变。如果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首先会选择稳定局势，等事态平息下来之后，再逐渐地培养本土官员，撤换比利时人。但卢蒙巴并没有压制士兵，而是决定将首都军队中的比利时军官全部替换，将总参谋长也换成了他的心腹蒙博托。

卢蒙巴的强硬给了黑人更大的勇气。于是，对比利时人几十年来的愤怒突然间在整个国家爆发，士兵们伙同普通民众一起对比利时人采取行动。比利时人在作威作福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羞辱的滋味。

但这种报仇的快感却是一把双刃剑。社会乱套之后，卢蒙巴开始感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国外，比利时人卷土重来，他们以卢蒙巴无力保护比利时人为借口，迅速出兵，占领了机场等战略要地。卢蒙巴不懂谈判和争取时间的重要性，立刻宣布断绝与比利时的外交关系，将比利时的出兵视为武装入侵。

但比利时人仍然有牌可打。在比利时人到来之前，刚果（金）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无数个部落。在传统上，刚果（金）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靠近大西洋的以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现在的金沙萨）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东南部的加丹加区域，以及靠近卢旺达、乌干达的东北部地区。

加丹加地区是刚果（金）的矿物中心，也是比利时人最舍不得放弃的地区。为了继续保留利益，比利时人在这里扶持了军阀冲伯，并向这个区域派来了军事援助团，而且带来了财政援助。冲伯于是宣布建立加丹加共和国，从刚果（金）独立。

在中央政府控制区和加丹加之间，还有一小块盛产钻石的地方叫南卡塞，也乘机宣布脱离刚果（金）。卢蒙巴一面求助于联合国向比利时人施压，一方面着手对付分裂主义者。

在联合国的压力下，比利时人决定撤出军队，采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支持分裂势力，不管是加丹加还是南卡塞，背后都有比利时人的影子。

就在这时，卢蒙巴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采取武力镇压南卡塞，这造成了众多平民的死亡，给外界留下了口实；第二，当西方国家都无法提供帮助时，他决定向苏联求助，因此惹恼了美国人。美国立刻将之纳入冷战思维中进行考虑。于是，一场“阳谋”发生了。

这场“阳谋”的目标就是除掉卢蒙巴。事后，人们发现卷入其中的势力有很多，除了比利时人之外，参与者中还有美国人的身影。其他国家，甚至联合国也知道这件事必然会发生，却都袖手旁观，等待着“阳谋”成为现实。大部分人之所以默许，是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解开刚果（金）之结的办法。或者说，比利时人离开时设的局，已经决定了这个国家必将付出血的代价。

最先出手的是名义上的总统卡萨武布，他宣布解除卢蒙巴的职务。卢蒙巴也针锋相对地宣布卡萨武布被解除了职务，刚果向着更加混乱的

局面滑去。这时，卢蒙巴任命的参谋长成了“阳谋”的主角。他在比利时和西方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宣布暂时由军队托管政权。

此时，卢蒙巴在首都仍然受到联合国的保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另一件事情却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首都乱成一团时，卢蒙巴派遣他的一名追随者基赞加前往东南部地区，以城市斯坦利维尔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基赞加取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土，建立了一个叫刚果自由共和国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出现引起了首都政治家和军阀，以及西方人的恐慌。他们认定，只有卢蒙巴死去，才有可能解开刚果（金）的乱局。

11月27日，卢蒙巴躲在汽车里逃出首都，想前往东部的根据地，这使他离开了联合国的保护范围。他被捕了。

比利时人一直躲在幕后，蒙博托也不愿意脏了手。他们将卢蒙巴送给东南加丹加地区的军阀冲伯，这就有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卢蒙巴成了非洲独立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殉道者。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纪念他，在非洲的许多城市里都有叫卢蒙巴的街道，这象征着殖民地人民对殖民主义的反抗精神。

当然，人们仍然可能争论说，如果他更有技巧，而不是一味蛮干，也许通过灵活的手段能够解开这个死结。但更可能的是，刚果（金）在比利时人统治之后，就已经没有了避免暴力的可能性。

比利时的几个殖民地和保护国后来的命运，也证明了卢蒙巴的无辜。

卢蒙巴死后，刚果（金）在独裁者蒙博托的手中暂时被捏在一起。加丹加的冲伯几经起落，最终还是逃往了西班牙。他被戏剧性地绑架到阿尔及利亚，死在那里。基赞加则继续从事政治，并在2006年至2008年担任了刚果（金）总理。蒙博托成了西方世界的宠儿，他的政权是世界

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比利时人已经淡出，法国人成了他的新靠山。直到20世纪90年代，原本比利时势力范围内的另一场危机导致了他的下台。

刚果（金）的国名改成了扎伊尔，后又改回刚果（金）。为了去除殖民地的痕迹，首都的名字从利奥波德维尔改成了金沙萨，斯坦利维尔改成了基桑加尼，伊丽莎白维尔改成了卢蒙巴。

刚果（金）由于疆域太大，民族过多，独立之前比利时人留下的基础太差，成了非洲国家悲剧的代表。但从另一面看，这样的悲剧并不由非洲人所决定，在非洲众多国家独立之前的殖民地时代就已经注定了。不管是卢蒙巴还是蒙博托，以及后来的卡比拉，都只是为了将这个庞大的国家捏合成型，让四分五裂的疆土上成长起民族主义的凝聚力；不管是用鼓动的方法，还是暴力的手段，都是为了塑造所谓的民族性。刚果（金）虽然经历了战乱，但并没有分裂，这本身就是一定程度的成功。

当然最好的塑造方法还是利用经济，只有当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日子好过了，才能避免分裂和战乱。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之后，刚果（金）也走上了这样的一条发展之路，尽管比别国走得要慢，因为它有太多的历史缺陷要靠时间去弥补。如果卢蒙巴能知道他的时代之后的国家走向，也许会感到一些安慰。

南部非洲的僵局

在非洲所有地区中，除了最混乱的刚果（金）之外，南部地区的局势也较为复杂。

南部非洲局势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里的殖民活动发展较早，已经有大量的白人在此定居。别的国家往往能够将国家独立和民族独立一次性完成，但在南部非洲，国家独立并不等于民族独立。这一地区的国家独立，往往是土生白人从外来白人手中接过政权。但是，土生白人对于当地黑人的压迫可能更加严重。

在南部非洲，主要矛盾爆发在两个地区：南非与后来成为津巴布韦的南罗德西亚。这两个地区的白人已经在此生活了数百年。

南非的白人主要是来自荷兰的殖民者。在英国人来到之前，荷兰人已经建立起了属于白人的共和国，他们从黑人手中夺取了土地。这些土生白人被称作布尔人。到了19世纪末，英国人与布尔人发生了战争，这就是英布战争。英布战争的结果是布尔人战败，南非成了英国的保护国。

而在南罗德西亚，白人人口达到了20万以上。1953年，英国人试图把南罗德西亚和周围的两块殖民地北罗德西亚及尼亚萨兰合并，称之为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南罗德西亚的殖民政权更加稳固，而其他两个地区则以黑人为主，白人控制力较弱，形成联邦后，通过南罗德西亚的政权来控制其他两个地区会比较容易。

但这个试图稳定三方的做法不仅没有奏效，反而造成三方都脱离了

英国。首先，以黑人为主的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选择了独立；其次，就算是以白人为主的南罗德西亚也不再愿意忍受英国人的支配了。

英国人在退出之前，设计了南罗德西亚的政治框架：南罗德西亚的议会一共65席，其中白人占据50席，剩下的在愿意参与政治的黑人中进行分配。这样，当地的白人就控制了政治，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变成了点缀。

1961年，首先是南非从英联邦退出，成立了南非共和国。虽然名为共和国，但它只是白人的共和国，对于黑人来说，则意味着比英国人统治时期更加严苛的种族隔离。

1965年，南罗德西亚也宣布独立。

在南部非洲历史上，出现了两名不屈的黑人斗士，他们共同作为反抗白人统治的象征，激励着黑人为了自由而奋斗。在南非，这个人是纳尔逊·曼德拉；在南罗德西亚，这个人是罗伯特·穆加贝。

2017年11月，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原来的南罗德西亚）的统治告终，已经93岁高龄的他在军事政变后怆然下台。他的身后则是命运未定的津巴布韦。

但年轻时的穆加贝却是南部非洲的民族斗士，他不仅激励着南罗德西亚人民寻求自由，还是种族隔离更加严峻的南非人民的一盏明灯，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种族和解的榜样。

穆加贝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也反映了世界思潮的变迁。二战之后，人们强调的是民族独立，那些领导民族独立的人受到了全世界的追捧。这些人包括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埃及的纳赛尔、利比亚的卡扎菲、越南的胡志明和朝鲜的金日成。

但随后，世界潮流转向，人们更加强调民生，那些能搞好经济的人得到了赞扬。非洲第一代领导人往往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在经济议题

上普遍缺乏必要的技巧，鲜有成就。如果他们活得更久，到了老年，又会被世界过度丑化。

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当初世界把他们捧得过高，后来又贬得过低。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太多改变，改变的只是世界潮流，以及人们对于人权和主权矛盾的困惑。

第五章
第一代的梦想家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困惑。我们可以称之为“皮埃尔之惑”，其典型代表来自一本小说。

在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描写了一位内心充满了矛盾的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他一方面向往民主与自由，崇拜法国革命；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根植于俄国的背景之中，当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后，他逐渐被卷入俄国民族主义的高潮。

简单说，皮埃尔所困惑的是，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人权，是指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权利；而主权，则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民族的权利。这两者有时是相辅相成的，但有时又是互相抵触的。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到底是人权优先还是主权优先。

在小说开头，刚从法国回来的皮埃尔更加向往自由、民主，重视人权，对于以沙皇为象征的主权主义嗤之以鼻。但当法国皇帝拿破仑入侵了俄国，皮埃尔发现，虽然他仍然爱好自由、民主，希望人权优先，却不由自主地参与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与他曾经向往的法国为敌，站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牺牲掉人权诉求，满足于国家独立和主权优先。

向往人权优先，却为现实所迫，不得不首先拥抱主权，这就是“皮埃尔之惑”。

这种困惑不仅出现在俄罗斯，在所有落后、遭受过殖民与侵略的国家，都会发现这一对矛盾。在它们还没有独立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是外来民族的不公平政策，于是寄希望于抱团，扩大实力，争取整个族群的独立。从逻辑上讲，当整个族群独立后，国际地位会随之提升，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地位也会更加有保障。

但是，当国家取得独立后，主权已经成了事实和基础，如何行使主权就成了大问题。如果行使不好，不仅不能保证人权，还可能对人权造成进一步的践踏。

而要合理地行使主权，保卫人权，就不是革命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理论支撑，而这却是那些争取独立的梦想家所缺乏的能力。

由于带领人民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往往都很强势，他们对于人权这个概念并不特别看重，反而更加乐于操纵政权这个概念。这些人的思维不可能立刻转变，于是曾经的功臣迅速成了民主和自由的障碍。这个问题在非洲国家尤其突出。

平心而论，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并非阴谋家，他们大都带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决的行动力。他们和当年世界其他地区领导了独立的领导人一样，希望在短时间内以显示出殖民地独立之后的优越性。就像当年卢蒙巴在独立讲话中所说：是时候团结起来大干一场了，让世界知道我们不仅能够独立，也能建设好家园。

但是，他们到底能否解决这个“皮埃尔之惑”呢？

加纳的“传道士”下台了

1966年2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突然出现在北京。准确地说，他只是借道中国，并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他的目的地是越南，去会见胡志明，调解愈演愈烈的两越问题。他得到了越南战争参与方美国的认可，美国甚至停止了轰炸北越，以给他的访问留出时间。

与此同时，在加纳国内北部，大约有600名士兵突然接到调往首都阿克拉的命令。士兵们得到消息，调动他们是因为恩克鲁玛即将在越南与胡志明达成协议，他们会被派往越南参加战争。还有人被告知，他们不是前往越南，而是去南部非洲的南罗德西亚，去帮助那儿的黑人游击队抗击白人政权。

士兵们忐忑不安，怪罪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领导人。在他们看来，恩克鲁玛上台后，并没有给士兵好日子过。一个国家建立后，本来应该把重心放在国内建设上，但恩克鲁玛却选择了首先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国家自身资源的不足。他喜欢作为世界领袖之一，代表非洲不断地参与各种外事活动。他还组织各种类型的泛非主义大会，试图在非洲成立联盟。同时，他深知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破坏，继续指责欧洲的新殖民主义者换了一种方式（即在经济上）继续掠夺非洲。为了表达支持，他还资助各国的游击队对抗白人，甚至在周边国家（加纳周围都是法国殖民地）培植反政府武装。这些举措虽然对于反殖民地斗争是有利的，却恶化了加纳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使得加纳经济不堪重负。

加纳本身是一个还算富裕的小国，但当它扮演了如此众多的角色之后，财政破产了，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就连保卫政权的军队也对恩

克鲁玛不满，认为他在军费上过度偏向人数不多的首都卫戍部队，至于其他士兵却因军费不足而忍受着贫穷。如今，又要将他们丢进海外战场上，士兵们的怒火越来越大。

到了首都，当他们的怒气已经高涨时，指挥官突然告诉他们，与其忍受恩克鲁玛的种种乱指挥，不如在首都发起一场兵变。加纳历史上第一场军事政变就这么发生了。

事实上，参与政变的不仅是加纳的军人，还可能包括前宗主国的英国人，以及欢迎他前往越南的美国人。这或许又是一出类似于刚果卢蒙巴式的“阳谋”，大家都知道某件事情会发生，大家都有心促成它，但大家又都认为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参与。

英国人和美国人之所以无法忍受恩克鲁玛，是因为他变得太激进了。恩克鲁玛是一个敏锐的分析家，却由于太超前，超出了世界能够承受的程度。比如，对外，他不断地鼓励所有的非洲国家造宗主国的反，劝它们不要依赖宗主国。这种说法从长期来看是正确的，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自立自强，但是在当时，却很少有国家能够这么做，因为家底太薄弱了。在对内政策上，由于过于急躁地想发展经济，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统购统销制度，企图加大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事实上，不仅仅是加纳，任何一个刚独立的国家都习惯于加强政府指导以加快经济发展，却由于加强了政府权力，不仅经济没有发展上去，反而造成了腐败的出现。

对外政策的强硬和对内政策的失误，让恩克鲁玛落入了前宗主国预设的概念之中。前宗主国将他宣扬成一个无法打交道的人，将加纳宣传成一个贫穷却坚硬的反西方堡垒。

在北京的恩克鲁玛头一天还是总统，第二天就变成了流亡者，他突然变得无家可归了，去越南的任务也不存在了。

更令他感到难受的不是英国人、美国人和加纳军人的作为，而是加

纳人民的反应。当人民听说恩克鲁玛下台后，不仅没有伤心和愤怒，反而自发地庆祝起来。由于恩克鲁玛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推翻了恩克鲁玛，就可以回归到以往的日子。他们以为，伟大领袖下台后，就不用再承担那么多责任，缴纳那么高的税，可以拿回已经国有化的资源和土地了。

加纳到现在仍然在纪念恩克鲁玛，是因为经历了后来更多舛的命运，他们又重新想起了这个领导他们走向独立的人。但恩克鲁玛为什么在当初会落到如此地步？其实他的问题也是非洲第一代领导人普遍遇到的问题。

刚刚独立的非洲，最迫切的不是变革，而是维持稳定。当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撤走后，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地运行？最好让人们感觉不到政权的变迁，该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该教书的继续教书，政府照常运转，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保卫安全的保卫安全。

但由于殖民地政府没有履行让当地人接受教育的义务，独立时非洲黑人中懂得行政工作的人数量不足，要想维持政治的稳定并不容易。英国人虽然也很腐败，但他们至少懂得如何避免任人唯亲、减少腐败。非洲的领导人普遍没有这种意识。当行政人员数量不足时，总统总是倾向于任命大量的熟人，以为靠熟人就可以控制社会，靠人情就能避免腐败。但实际上，在总统身边会迅速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占据了过多的资源，让整个社会对他们感到不满。

同时，熟人在行政治理上也和总统一样毫无经验，当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代替了制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之后，整个社会就进入了衰退甚至崩塌的阶段。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也是最相信人定胜天的一代。他们亲手领导了独立运动，眼看着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从强大的对手手中挣脱而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从这个意义上，他们

不会放权，只会想着抓取更多的权力。

当腐败出现时，他们不考虑建设制度，而认定这是自己权力不够造成的。只要能够控制国家的方方面面，看清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就可以杜绝腐败了。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抓权的举动只会将更多的权力从宪法转移到总统的熟人小圈子，这会进一步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

恩克鲁玛上台后就总感到权力不够，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剥夺反对党的权力，甚至认为反对他就是反对真理，就是犯罪。这种做法使得英国人当年制定的宪法失效了。

在经济上，一个政府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势必要花费更多的钱财，但政府花的钱必然都来自税收。加纳作为小国，能够承受的税收是有限的，如果负担加重，只会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家的税收。

但经济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才能明白，恩克鲁玛对此完全不了解。他浪费了太多的钱在许多不必要的面子工程上，却没有考虑到民间已经不堪重负了。

加纳的主要经济作物是可可，在独立之前，可可农属于加纳比较富裕的阶层，于是他们成了加纳政府主要的征税对象。

为了向可可农征税，政府建立了一套统购统销的制度，可可农不得擅自买卖可可，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后，再卖给海外的商人。按照正常程序，政府应该按照市场价向可可农付钱，但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就故意压低收购价格。于是，在恩克鲁玛执政的五年间，可可收购价格下降了60%，可可农已经接近破产。

黑市横行，农民们不愿把可可卖给政府。恩克鲁玛只好想其他的办法。他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但这些农场随后就陷入了计划经济的通病：岗位上充斥着领导的亲信，却没有人去干活。恩克鲁玛为国营农场

配备了不少进口设备，却没有人会用，也没有人去学。这些人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反而成了社会的负担，只拿工资不干活儿。

当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时，恩克鲁玛不仅认识不到这是因为自己搅乱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反而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弊端，解决方法应该是全盘国有化，实行更多的计划经济。

在这种基调下，他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建立了更多的国有企业，希望通过投资大型项目来带动国家的发展。

不幸的是，他的大型项目大都是没用的。他曾经建设了巨大的总统府，但这带不来效益。他建设了不少炼钢厂、造船厂，但这些工厂从建成的那一天开始，就由于规划不合理、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没有原料等各种原因停工。

更无奈的是，整个政府都缺乏最基本的财务知识。作为一个共和国，连国家财政数据都没有。总统并不知道国库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一年的预算应该是多少。他只管拍脑袋想项目、签字，或者听别人描绘宏大的目标。到他下台时，加纳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甚至在他下台很多年后，不知还会从哪儿冒出来他签过字的项目。

到了1964年，对他的批评声已经不绝于耳。为了压制批评的声音，他取消了多党制，实行一党制，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住反对他的人。但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因为这时距离他下台已经不到两年了。

恩克鲁玛下台后，长期居住在几内亚。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是另一位反殖民的先锋，他对恩克鲁玛充满了敬意，也让这位非洲最大的梦想家没有太过于凄惨。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他死后，加纳人仍然记得这个带领他们去追逐梦想的人。

恩克鲁玛一生的成就在于他是一个梦想家和行动家，能够敏锐地发现机会，帮助祖国完成独立。但他的知识缺陷注定了他无法带领国家完成第二次转型，从独立转到发展经济上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

个政治家的地位，因为他对于殖民体系的认知，对于非洲联合的梦想，至今仍然在鼓舞着非洲人，只能说他过于超前了，超出了时代能提供的舞台，他想做的事也太多了，超出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

并非所有的第一代梦想家都像恩克鲁玛一样是被推翻的，也有领导人在经过无数次尝试和失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将政权让给了接班人后安然退休。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人民的另一位老朋友：坦桑尼亚的尼雷尔。

伟大导师的乌托邦

在坦桑尼亚，除了出入国境有海关之外，在国家内部也设立了海关。

如果从坦桑尼亚的非洲大陆部分前往海岛桑给巴尔，到达桑给巴尔首府石头城时，海关人员会询问游客准备在岛上待多少天，并在护照上写上离境日期，盖入境章。虽然桑给巴尔属于坦桑尼亚，但一切手续都和进入另一个国家一样。

游客离开海岛时，海关人员还要检查护照，看游客停留是否超期。但这一次，他们不会在护照上盖离境章，这是境内海关与境外海关的唯一区别。

海关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桑给巴尔和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曾经是两个国家，合并后，在制度上仍然有许多残留，海关检查就是其中之一。

1964年4月26日，非洲的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就是坦桑尼亚（Tanzania）。

在这之前，地球上存在两个国家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Zanzibar）。坦桑尼亚这个词实际上是由坦噶尼喀的Tan和桑给巴尔的Zan，再加上当作土地讲的词尾nia构成的。

担任坦桑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分别是原来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以及原来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米。

坦噶尼喀曾经是德国人的殖民地，一战德国人战败后，它的殖民地

被转手，坦噶尼喀就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到了1962年，英国人将政权交给了一位名叫尼雷尔的黑人领袖。尼雷尔并不是一个强硬的民族分子，他选择保留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地位。第二年，坦噶尼喀旁边的岛国桑给巴尔也最终从英国独立出来。

桑给巴尔是阿拉伯人在东非的中心，一直由苏丹统治，英国人即便把它变成了保护国，也保留了苏丹的名义。然而独立后，苏丹统治并不长久，两个月后，它被推翻了。

推翻苏丹政府的是一位面目不清名叫奥克罗的乌干达人。由于桑给巴尔几百年来一直是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参加政变的黑人明白，如果想让政变成果长存，除了大规模迫害和驱赶阿拉伯人之外，必须依附于更加强大的黑人政权。

在东非大陆上，有两个黑人“大国”，分别是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坦噶尼喀离桑给巴尔更近一些，但肯尼亚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桑给巴尔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组成联邦政府，才能抵消阿拉伯人几百年的影响力。

奥克罗想和肯尼亚而不是更近的坦噶尼喀联合，但不幸的是，他在一次对坦噶尼喀的访问中一去不复返。坦噶尼喀先是扣留了他，又把他驱赶到肯尼亚和乌干达，他再也没有回到桑给巴尔。

奥克罗亲手扶持的卡鲁米成了桑给巴尔总统。卡鲁米选择了与坦噶尼喀联合，他本人成了联合后的新国家坦桑尼亚的副总统。为了安抚桑给巴尔人，合并之后桑给巴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卡鲁米将岛屿当作自留地，继续驱赶阿拉伯人，实行一党制。直到几年后他被刺杀，坦桑尼亚中央政府才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在合并中，受益最大的是原来的坦噶尼喀总统、后来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他由于使坦噶尼喀从英国人手中和平独立，声名大振。现在又和平地合并了另一个国家，更使他成了地区的领袖人物。

尼雷尔也不愧为领袖，在所有的非洲领导人中，他是最具有理想精

神、最温和又最无私的独裁者。他平易近人、身无余财、善于鼓动，对理想充满了热情。他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显得很温和，即便实行集体主义，也没有和西方政府彻底搞僵，为国家争取了大量的外汇援助。他的改革大业失败后，人们仍然爱戴他，相信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只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的原因让他无法取得成功。

如同在其他地方，伟大领袖常常被称作导师，在坦桑尼亚，尼雷尔也有一个专门的名字：Mwalimu （斯瓦希里语中的“导师”）。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乌托邦理论，在非洲有一个最著名的理论，创造者就是尼雷尔，这个理论叫“乌贾马”。

所谓“乌贾马”，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大家庭”的意思，它是一种集体农庄，象征着非洲特色的集体主义。

1967年，尼雷尔发布了《阿鲁沙宣言》，这份文件探讨了类似坦桑尼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虽然坦桑尼亚与世界关系很好，能够获得大量的援助，但尼雷尔却很清醒地知道，不能对外援形成依赖，因为一旦上瘾，则意味着大量的铺张浪费，以及高额的外债。

既然不能依靠外援，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在非洲，自力更生又必然以农业为主。由于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只有把农业搞上去了，才能谈其他产业的发展。

但是，在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人民的素质都还很低下，如何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呢？显然必须靠政府的指导。于是，一个非洲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就出现了。

尼雷尔的“社会主义”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实行一党制。这一点是为了统一人们的认识，提高政府的效率。为了封住批评的声音，他甚至采取了预防性拘禁的手段，不用等待

问题发生，只要认为你有问题，就可以抓人。

第二，在工业上，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以政府和公有制为主导。他把大量的银行、工厂都变成了国有企业，那些规模小、不重要的企业继续由私人掌握。奇怪的是，当其他国家试图进行国有化时，它们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反抗，但坦桑尼亚进行得却很平静。富人大多数是外来的白人和印度人，他们成了利益受损方，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但同情他们的人却很少，根本掀不起风浪。黑人大都是穷人，这个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坦桑尼亚的工业本身也是小部门，政府的国有工业实际上许多是新建立的，私人感觉不到损失。真正对普通人影响大的是第三项政策。

第三，建立乌贾马。尼雷尔显然听说过其他国家的集体农庄，他的乌贾马也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让农民把土地聚集在一起，实行集体耕种。

有的国家的集体农庄在一两年之内就强行推行下去了，坦桑尼亚的乌贾马却推行了十年，才将人们都赶进了农庄。

不出所料，人们进入乌贾马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后果，社会经济出现了紊乱。成立农庄的目的是增加粮食产量，但尼雷尔显然高估了人心。进入农庄后，反而没有人干活了，偷盗盛行，磨洋工的现象严重。

除了农业，工业国有化也导致了大量的浪费。不管怎么强调纪律性，怎么实行一党制，仍然无法解决效率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看出，所谓的乌贾马和非洲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不仅别人看清了，就连创始人尼雷尔也看出来了。和其他非洲领导人不同，尼雷尔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时，他辞职了。

但尼雷尔的政策是不是一点优点都没有呢？也并不是。

我在坦桑尼亚访问时，发现他的政策遗产至今仍然保留着。

第一，最大的遗产是教育，在非洲，坦桑尼亚的识字率是最高的。

对于后殖民地国家而言，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当地受教育程度太差，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根本没有办法融入现代文明之中。他们只能在家种地，不具有进入工厂的能力。

但在坦桑尼亚，由于采取了强制性的上学措施，集体农庄的孩子必须学文化。坦桑尼亚的识字率达到了90%甚至更高，在街头或者农村随便碰到的人都可以写字和阅读。当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之后，坦桑尼亚人大量涌入工厂和商业部门，他们接受教育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

可以说，虽然乌贾马的教育方式不适合培养大学问家，却很适合培养整齐划一的工人。首先要普及基本教育。当基本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追求多元化，这也许是坦桑尼亚摸索出来的最大经验。

第二，坦桑尼亚的公共设施，包括医院、清洁水设备，甚至包括现在的电信设施，都处于非洲国家的前列。

第三，在尼雷尔的鼓舞下，坦桑尼亚人追求幸福的冲动要比别的国家更强烈。在其他非洲国家，哪怕发展较好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人们也总是抱怨生活的艰辛，更多看到的是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但坦桑尼亚人的精神状态却要好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真诚的、善良的领导人。

第四，尼雷尔给坦桑尼亚留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势。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最麻烦的是第一任领导人往往会长期在台上不肯退位，而以后的领导人又威望不够，很快出现党争，甚至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

但在尼雷尔的榜样之下，坦桑尼亚的政治局势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有着较为正常的政府轮替，给国家的发展留下了好的环境。

它和国外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中国都把坦桑尼亚当作一个重要的伙伴，非洲几个内陆小国也把坦桑尼亚的港口作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枢纽。

1985年，改革失败的尼雷尔主动放弃了总统位置，将执政权交给了他的继任者。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是一个理论家和思想家，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坦桑尼亚重回资本主义轨道，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

经济自由化让坦桑尼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或许是因为尼雷尔时期的经济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稍作改变，就开始了报复性反弹。但问题也随之出现，许多儿童失去了强制性上学的机会，也就不去读书了。少了政府的强制医疗措施，各种疾病也频频爆发。这或许是问题的两极，要发展就必须忍受一定的不平等，而想强行弥补不平等又会阻碍发展。

但不管怎样，坦桑尼亚一直是非洲最令人尊重的共和国之一。也许真相是：对于刚刚独立的殖民共和国，要想完全不衰退是不现实的。政治家们能做的，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加强人才培养，让本国人能够尽快接手政局。只要政局足够稳定，有充足的人才，那么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尼雷尔走了许多弯路，却保持了稳定，没有放松教育。这比起那些虽然有选举，却无法保证局势稳定，只能靠贿选和强迫来维持政权的国家已经好太多了。

那一条沟通亚非的铁路

与尼雷尔的坦桑尼亚一样走计划经济和威权主义的，还有它的邻国赞比亚。它被中国人记住，是因为出了一个对中国最友好的领袖肯尼思·卡翁达，以及一条中国援助的著名铁路。据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在和卡翁达谈话时首次提出的。

2017年，我从西非回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机场转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了中国人前往非洲的最大中转站，不管是去西非、东非还是南非，最便宜的方式都是在这里转机。埃塞俄比亚航空也因此成了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机场里已经写满了中文。有专门的中文服务生帮助乘客，还有中国人喜欢喝的白酒售卖，中国餐馆就开在机场里。处处都是中国人，有公务人员，有民营企业员工。公务人员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方机构的外交人员和研究人员，另一种则是各种国有企业的驻非职工。民营企业主要投资房产、矿产、食品等领域。

在机场我碰到了一名刚刚从赞比亚回来的中年人。他是去赞比亚投资的，目标竟然是耕地资源。

他告诉我，赞比亚的土地很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200元人民币就可以承包一亩生地九十九年。当然，要把生地变成熟地，仍然要花费不少。在赞比亚，最重要的是水资源。土地必须离水源近才有价值，再开挖水利设施保证每一寸土地都得到灌溉，同时还要清除生地上的杂草和树木，施肥、松土，加起来一亩地的改造成本是3000多元人民币。

“算上改造成本，还是很便宜，我们估算，大约两到三年时间就可

以回本。剩下的九十多年都是可以赚钱的。”这名中年人告诉我。

与他的谈话让我感到眼前一亮，这说明了中国投资的多元化。以前中国人认识这个叫赞比亚的国家，只是因为它的铜矿和铁路。

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有一条长长的铁路线叫坦赞铁路，这是中国援助非洲的早期标本工程。

非洲的铁路都有这样的特点：刚刚建成时，铁路可以维持每天跑一趟的频率，但随着年久失修，运行能力大大减弱。从一天一趟，到三天两趟，再到一周两趟，最后一周一趟，直到完全停运。

在西非有一条法国人修的著名铁路，从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开往马里首都巴马科。当我访问时，这条铁路已经走完了它最后的旅程，从一周一趟过渡到了彻底停运。那条锈蚀的铁路线仍然嵌在大地的肌体里，但已经被垃圾填满，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

2014年，我乘坐坦赞铁路时，它正衰退到中途，维持着一个星期两趟的发车频率。由于管理能力和技术实力没有提升，哪怕多增加一趟都很难做到。

我乘坐的是坦赞铁路的支线，从坦桑尼亚西部城市基戈马经过首都多多马，到东部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也是一周两趟。火车没到的前两天，人们已经纷纷往基戈马聚集，有的住在旁边的小旅馆里，有的就直接睡在树下。只有带有卧铺的一等车票和二等车票可以提前订票，如果是坐票或站票，只能当天买。到了火车出发日的凌晨，火车站门口挤满了人，他们是去买票的，稍晚一点，就买不到坐票了。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有忙不完的活儿，从两天前就得开始准备。没人知道他们在准备什么，总之所有人都很忙，一周两趟的火车已经让所有人筋疲力尽。

火车原定下午发车，但是直到傍晚，从达累斯萨拉姆发过来的列车

才到。一时间火车站热闹起来，从反向来的乘客如同蚂蚁一样从车上下来，看到那个场景的人们会以为车上有无穷无尽的人。大约过了2个小时，人们才全部下车。

直到半夜，火车才再次上路，踏上回程。我从基戈马坐到首都多多马，路程大约有700千米，却要跑20多个小时，时速大约在每小时30千米。即便这样，火车仍然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带着一副要脱轨的样子。

列车上所有人都对中国人很友好，都纷纷告诉我，这条铁路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一个服务人员问我："如果在中国，跑这么远（700千米）需要多少时间？"

我回答："如果是高速铁路，2个多小时就足够了。"

那人站起来，带着不相信的表情离开了，他大约以为我在说谎。

据说，这条铁路经历过数次破产。其实人民群众对火车的需求很充分，每一列火车都挤得满满的。当地人把火车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它，生活会倒退很多。即便增加到每天一趟，仍然会供不应求。

但问题在于，如果要增加运行，就必须有更多的车厢和火车头，公司已经没有钱购买了。就算有钱购买设备，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司机和列车员，更何况还有许多不干活的关系户。即便真的能够裁掉那些关系户，引进司机和列车员，也无法排出一天一趟的时间表，因为那牵扯到过于复杂的协同。就这样，这条铁路正在衰落的过程中。

在坦桑尼亚的邻国肯尼亚，一条时速上百千米的新型铁路已经由中国建设完成。2014年，我在进行非洲之行时，这条铁路还没有开工；到了2017年，它已经建成通车了，这就是中国速度。但中国速度放到非洲必然减慢。新铁路的车票供不应求，需要提前很多天订票。即便一天再增加几趟也同样满座，但它仍然每天只运行一趟。

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管理问题就否认了铁路对于非洲的重要性。事实上，一条铁路的出现，是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生活习惯的。它连接的许多小村子在铁路出现之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就因为有了铁路，人们突然间和遥远的大城市联系起来，从最偏僻的地方去往首都最多也就两三天时间，这样的时空转变对于非洲人尤其重要，将他们从遥远的过去拉到了现代化的今天。

至于铁路的退化，也并非永远无解。虽然现在看上去，人们还不得不承受退化，但随着非洲的发展能够产生足够多优秀的工程师时，他们自然能够接手铁路的日常维护和调度工作。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会捕鱼是需要时间的，现在的非洲还处于学习的过程中。

坦赞铁路的建设，和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分不开。赞比亚于1964年从英国手中独立，之后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卡翁达主持了全国的公有化改造，土地属于国家，外资银行被接管，其他大型企业政府都要控股。赞比亚经过改造后，经济一落千丈，但是政府的税收却是有保障的。

赞比亚的税收之所以能保障，靠的是铜矿和钴矿。它是世界第四大产铜国，而钴矿储量达到了全世界的18%，产量为世界第一。

不过，赞比亚在地理位置上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它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港口。它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的转运才能出口，这就使得一条铁路成了必需。

但是，经过国有化改造的赞比亚却拉不到投资。西方国家见识了卡翁达的作为，总是担心钱打了水漂，虽然想要投资，却又不断观望，承诺投资却总是不给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卡翁达找上了中国，于是坦赞铁路风风火火开工，于1976年全线建成通车。

坦赞铁路对于赞比亚的好处是巨大的，可以将本国的资源经过坦桑尼亚的港口达累斯萨拉姆出口到海外。作为回报，中国能够从赞比亚进

口大量的铜和钴。四十年前，因为中国工业没有多少需求，还看不出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到现在人们意识到这是特别好的战略资源。

但是，一条坦赞铁路并不能挽救赞比亚的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仅工业没有发展，就连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卡翁达只好走回头路，重新考虑私有化问题。

在私有化的同时，政治上多党制也在恢复。卡翁达为了保证国家的行政效率，实行了一党制。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一党制弊端凸显，只好改回多党制。第一次多党制选举就使卡翁达下了台。

尼雷尔是主动下台，卡翁达是被动下台，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是有原则的人。卡翁达接受了败选的事实，没有动用权力去改变选举结果，这是非洲少有的和平更替之一。由于尼雷尔和卡翁达的胸襟，这两国也保持了难得的和平，即便它们经历过波折，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势。

私有化运动开展后，由于人们缺乏维护公有铁路的热情，坦赞铁路的运输能力大幅度下降，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后就提前进入了衰退期。但中国与两国已经在谈后续的新铁路修建，相信随着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的铁路样板工程建成，非洲将出现更多的中国铁路。坦赞铁路作为第一条，必将被人们永远铭记。

肯尼亚：永远混乱，永远增长

在东非，有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永远处于混乱之中，却又总是能够在混乱中保持最基本的秩序，不发生动乱。它在政治上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至今没有发生过政变和大的对内镇压。它的官员很腐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但是经济却非常活跃，一直处于增长之中。

它周围的国家中，坦桑尼亚曾经陷入过发展的泥沼，卢旺达发生过种族屠杀，乌干达也发生过内战，苏丹发生了国家分裂，埃塞俄比亚有过两代领导人的独裁，索马里四分五裂，只有位于中央的它泰然处之，在一片混乱之中悠然自得。它的人民似乎永远在吵架，却从来没有大打出手。

这个国家就是肯尼亚。如今，外国资本要想前往东非地区，首选的落脚点就是肯尼亚。虽然人们都知道这里的警察和官员非常腐败，时常要靠贿赂才能通行，但这里至少还有规则存在，只要努力，事情都可以走通。

外国资本在肯尼亚落脚后，再前往周边国家发展。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这样成了东非的经济、金融枢纽。市中心高楼林立，市郊却充斥着世界最大规模的贫民区，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个非洲大都市。

肯尼亚是非洲国家发展最自然的样本。如果一个国家在独立后没有陷入内战、政变和外来入侵，也没有发生分裂，而是按照它自然的节奏发展下去，那么就有可能变成另一个肯尼亚。

肯尼亚今天的特性来自它的国父肯雅塔。1964年，肯雅塔由于领导了对英斗争，成了肯尼亚的国父。这个国家在独立之前采取首相制，英

国女王仍然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独立后转变成了总统制，国家元首变成了黑人总统。

肯尼亚独立后，肯雅塔并没有像邻国的尼雷尔那样立刻开始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计划。由于经过了茅茅运动，肯尼亚独立的过程比坦桑尼亚更血腥。但独立之后，总统肯雅塔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雄心壮志，更没有对英国或者资本主义表现出深仇大恨。

他似乎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他的确在理论上提出，要实行非洲特色的混合经济，即一定的社会主义加上一定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实践时，也许是因为他太懒了，实在懒得将理论变成现实。于是，肯尼亚就顺着原来的惯性向前走。

在独立之前，来自英国的白人控制了不少土地和企业；独立之后，这样的政策照样继续下去。肯雅塔没有想到要去没收这些人的土地，而是仍然坚持着资本主义的方向，继续鼓励他们经营下去。唯一不同的是，鼓励白人的同时，也鼓励黑人开办企业。

另外，肯雅塔对于政府官员也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开办企业，都是允许的。结果，肯尼亚的黑人政府官员、知识阶层纷纷创业，很快开办了一批企业。十年间，黑人开办的企业或者在企业中所占的股份已经占据了肯尼亚的半壁江山。

虽然黑人当官的多了，但是肯雅塔也并没有清理政府中的白人雇员，在技术性的职位上，白人继续干着他们的活儿，与独立之前没什么区别。后来随着黑人竞争力的提升，白人雇员的数量少了下去，但这更是一种自然竞争的结果，政府的强迫性不大。

肯雅塔也曾经想过要通过赎买的方式，将一部分白人土地转移到黑人手中，也的确做了一小部分工作，让一批黑人拥有了土地。但由于行政效率低，做得很不彻底，最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主要靠自然流转而不是行政命令。

当时的非洲国家总是陷入站队的麻烦之中。由于处于冷战时期，它们不是选择资本主义阵营，就是选择社会主义阵营，以期获得更多的援助。肯雅塔虽然在经济上实行放任自由主义，在外交上却保持中立，和哪一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当然，他和英国的关系仍然是最好的，这是因为肯尼亚可以从英国拿补贴。

由于处于东非，与印度次大陆只隔着一片海洋，肯尼亚也是印度人出海闯荡的最佳地点之一。这里的印度人控制了小买卖和一定的金融行业。肯雅塔对印度人的打击让这个阶层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许多人移民英国，离开了肯尼亚。

肯雅塔执政的那些年，人们形容他自由放任，认为总统干活无非是等睡醒了，带着他的班子四处转一转，指点一下，晚上唱唱歌、跳跳舞，结束一天的生活。总统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顺其自然地让肯尼亚人民自己找事儿做罢了。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唱歌过后，肯尼亚的经济就继续发展了。当周围国家一片混乱时，肯尼亚人却享受着难得的和平气息。

当然，对肯雅塔也不能过于神化。实际上肯雅塔的放任自流也带着许多问题。首先，肯尼亚的宪法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肯雅塔不死，他可以一直竞选连任，没有人能把他赶下来。如果他活得足够长，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积累下来，总有一天会造成混乱。

另外，由于他对官员不加限制，肯尼亚的腐败在他的任期内就有了愈演愈烈的苗头。官员们借助权力为自己牟利，由于全国经济处于增长之中，人们也不大在乎。当这种行为成为全社会的风气时，就有可能会失控。

事实上，肯尼亚一直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肯雅塔实行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迟早会爆发，只是被拖到了他死后。

肯尼亚虽然实行多党制，但在肯雅塔时期，一直是执政党一家独大，肯雅塔没有必要对选举做太多限制就可以顺利当选。但到了他执政末期，已经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抨击他的不作为和资本主义倾向，肯雅塔只是简单地将反对者抓起来，不予理睬。他有足够的威望，可以表现得独裁一点，人们仍然爱戴他。但当他死后，继任者如果没有这个威望，就可能将这种独裁倾向变成真正的独裁。

1978年，肯雅塔死了。肯尼亚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保持稳定，还是积弊大爆发？

接替肯雅塔的是副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如果说肯尼亚人对肯雅塔充满了感激，对莫伊的感情则要复杂得多。人们和我谈起肯雅塔，都带着骄傲和感激，但谈起莫伊却总是遮遮掩掩，一副不想提他的表情。但莫伊仍然和肯雅塔一样，他们的头像被印在肯尼亚的硬币上，提醒人们他们曾当过总统。

一句话，莫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塑造了肯尼亚现在政局的人。

在莫伊时代，肯雅塔留下的问题开始爆发。莫伊不具备肯雅塔的威望，无法获得人们无条件的支持。对于反对派，他必须依靠镇压的手段，才能保持自己一直在台上。担任总统四年后，莫伊通过法律规定了肯尼亚的一党制。当时反对他的人正要组织新党参与竞争，却从此成为非法。接着，莫伊通过审查资格的方式，让所有批评他的人都失去了竞选资格，他终于可以长期任职了。

由于没有了批评者，莫伊的亲信集团变得更加腐败和不受控制。肯尼亚的腐败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政府官员公然向外国人索贿，警察随意抓人和勒索，法官们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订立收费标准，中饱私囊。在肯尼亚，没有什么事情是钱搞不定的，从开办企业到杀人脱罪，只要给钱都可以解决。

然而奇怪的是，莫伊政府虽然腐败至极，但肯尼亚的经济仍然是东

非最好的。莫伊统治时期，在整体方针上并没有改动肯雅塔的政策。这里仍然实行重商主义和放任主义，也没有闭关锁国。准确地说，莫伊政府无力控制社会的每一方面，它给民间经济留下了大量的机会，使得肯尼亚仍然一枝独秀。

肯尼亚如同一个现代潮流中颠簸的传统之舟，没有规划，没有助推。掌舵人不仅无力掌控，而且还监守自盗，但这个小舟保持了政权的稳定性，因此躲过了更大的灾难，跟随着潮流漂到了现在。

莫伊虽然也曾经镇压甚至暗杀过反对派，但肯尼亚的反对派一直存在。

1992年，当人们再也不愿意忍受莫伊的独裁和政治高压开始反抗时，莫伊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但随后，国内发生了小规模骚乱。国际社会仍然处于摧毁东欧堡垒的兴奋之中，对一切独裁都表现出不容忍的态度。他们针对莫伊政权进行了制裁，取消了对肯尼亚政府的援助。

作为非洲外向型经济代表的肯尼亚一遭受制裁，莫伊就受不了了，立刻屈服。于是，肯尼亚修改了宪法，将多党制引回到政治之中。肯尼亚总统一直是没有任期限制的，现在这个漏洞被堵上，设立了最多两期制。因为宪法修改不能追溯既往，所以莫伊还可以连任两届，然后下台。

当然，人们知道莫伊是必须再连任两届的，在这过程中他会通过一切手段，作弊也好，胁迫也好，保证自己不会随便下台。

肯尼亚的政治稳定表现在，即便人们对莫伊很不满，即便知道他作了弊，但并没有考虑立刻用暴力推翻他，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十年后。他们阻击了莫伊一切想更改宪法任期制的企图，并认真准备十年后的大选。从这一点看，肯雅塔时期建立的对宪法的尊重已经保留了下来，人们学会了在宪法之下做事情。

2002年，莫伊在徒然挣扎之后，不得不怆然下台。反对派领袖姆瓦

伊·齐贝吉在竞选时差点遭到暗杀，在车祸中受了伤。他竞选获胜后，坐着轮椅参加了就职仪式。内罗毕人山人海欢呼莫伊下台，为这个肯尼亚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画上了句号。

肯尼亚人民并没有形成秋后算账的传统。莫伊下台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还时常出席一些政治性活动。由于他对政治和国际形势都熟悉，还被任命担任过苏丹的和平特使。肯尼亚社会被每一个强人打下了烙印，但不管是好是坏，它都带着这些烙印继续前行，而不是试图将它们擦去。

齐贝吉以反腐的口号上台，但他的第一个任期还没结束，人们就已经知道，依靠他不可能完成反腐的任务。在肯尼亚大酱缸之中，新来者必须先学会同流合污，才能顺利地执政。政客们上台已经形成了一个术语，叫“轮到我们吃饭了”（it’s our turn to eat），这也成了一本畅销书的名字。

由于齐贝吉过于不受欢迎，2007年他在充满争议的第二任选举中勉强获胜。到底他是否真的当选已经不重要，这成了骚乱的契机。在肯尼亚充满了混乱的历史中又加上了一笔，这次骚乱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骚乱的结果是，齐贝吉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分权协议中，让他的对手拉伊拉·奥廷加担任了总理一职。

肯尼亚的政客们熟练地控制着制度平衡，不让这座大厦倒塌，同时又获取各自的利益。至于肯尼亚的社会，在骚乱之后，虽然裂痕加大，但仍保持着足够的稳定。

西非的现实主义者

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虽然和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但在政治上，一般都有一个独立运作的政府，经济上也比较多元化。法国的殖民地却正好相反，由于独立之前它们只是法兰西帝国的“器官”，自给自足能力极差，即便独立后也必须依靠宗主国才能生存。

在法国位于西非的殖民地中，只有一个极端的例外：几内亚。

从独立开始，领导人塞古·杜尔就采取了疏远法国的做法。戴高乐也是火上浇油，在几内亚确定从法国脱离之后，他撤走了一切法国援助和法国控制的设施。不管是资金还是物品，能带走的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砸烂，决不留给几内亚新政府一丝一毫。这种做法消除了法国对几内亚的影响，但也让几内亚人对法国没有了一丝好感。

由于几内亚缺乏必要的资金，疏远法国就意味着必然要寻找其他的金主。塞古·杜尔选择了东方阵营作为靠山，但这仍然无法弥补被排斥在西方市场之外的损失。

为了与西方对抗，塞古·杜尔选择了强调自己作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将的地位，这让他收获了大量的崇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称号，从非洲的伟大领袖到非洲革命的导师，等等。但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是整个国家陷入了浓厚的个人崇拜之中，从立法、司法到行政，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为了防止法国人的破坏，塞古·杜尔还特别注意防范海外势力。他总是担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收紧了国内控制，他的所有对手都受到了怀疑。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几内亚的经济也在骤然滑落。

法国的殖民地大都是沙漠和半干旱草原气候，几内亚却属于雨林地区。这里雨水充足，自然条件比其他国家好，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做到自给自足。可经过独立之后的行政退化，已经很难保证人民的温饱需求了。

塞古·杜尔一直把持着权力，直到1984年去世，才由他的总理路易斯·兰萨纳·贝阿沃吉接了班。之后军事政变这个恶魔又悄然而至，一名叫兰萨纳·孔戴的军官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几内亚继续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飞驰。兰萨纳·孔戴时期，几内亚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由于总统权威已经不如塞古·杜尔，统治也就相对温和。但几内亚的政治一直无法正常化。经济虽然进行了自由化，但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

兰萨纳·孔戴死于2008年，他死后，随即又发生了军事政变。直到2010年，几内亚才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开始了一次较为正常的总统选举，选出了阿尔法·孔戴担任总统。

在这之前，几内亚的行政一直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每一任总统的权力都比前一任小，而社会动荡、种族冲突却处于加深的过程当中。到了这时，国家似乎已经走出了建国之后的磨合阶段，慢慢地进入了稳定期，可以开始建设了，但就在这时，2014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病毒疫情，几内亚作为核心三国之一又遭受了沉重打击。

几内亚选择了与宗主国彻底决裂，但大部分法国殖民地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它们知道在短时期内很难从一个“器官”成长为完整的个体，要想避免独立之后的混乱，就必须与宗主国搞好关系，继续依赖宗主国的输血，直到肌体已经足够强壮，才能脱离宗主国的保护。

在西非，有两个人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以及科特迪瓦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法国有邀请殖民地精英进入政府组织的传统，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法兰西共和国的部长。作为黑人的代表到巴黎任职，这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他们

也尽心尽力地想办法维持法兰西共同体的统一，是共同体的倡导者。

虽然他们都想与宗主国搞好关系，但不同的统治风格导致了国家的不同走向，政治研究者对此颇感兴趣。

人们谈起塞内加尔的桑戈尔，首先想到的不是一位总统，而是一位文学家、诗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黑人院士。他出版了多部诗集，甚至受到过哲学家萨特的称赞。

在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中，最惊险的时刻是在二战中参加法国军队的经历。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桑戈尔和其他非洲士兵一并被俘。在被俘的当天，德国人决定将这些黑人士兵全部处决。行刑队拉开排枪，桑戈尔知道死亡即将降临，连忙大喊："法兰西万岁！非洲万岁！"

这时，法国的白人俘虏中走出来一名军官，向德国人劝说，杀死黑人俘虏有损于雅利安和德国军队的荣誉。战争初期的德国人还保留着军人的绅士风度，接受了劝告，让黑人士兵归队。

桑戈尔临刑前的呼喊代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意识：非洲殖民地已经是法兰西的一部分，殖民地离开了法国，将无法生存。

桑戈尔早年的活动空间大部分在法国本土，之后才回到非洲。而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却是从另一条路走向领导之位的。他出身于酋长家庭，很早就在科特迪瓦进行政治活动，参加了当地议会的选举。法国人早就看出他可以成为同盟者，有意培养他的政治参与度。

两人虽然都赞成与法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想法又有所区别。桑戈尔首先的站位是从法国本土立场上思考，认为殖民地应该与法国成为一体，而不是分成不同的实体。乌弗埃—博瓦尼由于更早就参与了殖民地内部的政治运行，更赞同殖民地首先是独立的实体，然后在更大空间内与宗主国保持联盟关系。

两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还和塞内加尔与科特迪瓦在法兰西共同体

中的不同地位有关。

塞内加尔是法国在非洲的最早落脚点，法国人最早在塞内加尔河口建立了圣路易殖民地，之后又将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作为整个法属非洲的中心。直到现在，达喀尔仍然是西非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这里高楼林立，仿佛是加入了十倍混乱元素的法国城市。著名的达喀尔拉力赛就曾经长期将这里设为比赛的终点，而起点则是法国的首都巴黎。直到最近，由于恐怖袭击的影响，达喀尔拉力赛才转战南美，离开了非洲大陆。

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塞内加尔和达喀尔永远是非洲的中心。只要法属非洲保持在共同体之内，塞内加尔就能够享受足够的优惠政策。法国人的钱要从达喀尔流向非洲的其他地区，而其他地区的物资很大一部分也要经过达喀尔转向欧洲各地。

与塞内加尔不同，科特迪瓦是法国后来才建立的殖民地。这里由于靠近雨林地区，更适合经济类作物的种植。法国人到来后，大量地引进咖啡和可可，使得科特迪瓦的经济突飞猛进。

乌弗埃—博瓦尼深知法国市场的重要性，科特迪瓦的咖啡和可可必须依靠法国才能打开欧洲市场。他认识到必须与法国搞好关系，才能保证科特迪瓦的发展。

但科特迪瓦与塞内加尔的不同在于：塞内加尔是法属西非的中心，法国从其他地区征税，有一部分税收补贴到了塞内加尔，特别是达喀尔；而科特迪瓦作为一个后起的经济新星，虽然富裕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塞内加尔，却要缴纳更高的税给法国。也就是说，科特迪瓦缴纳的税，一部分被法国中央政府用来补贴塞内加尔了。

乌弗埃—博瓦尼希望各个殖民地政府完全掌握自己的税收和财政，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联合。可是，一旦法兰西共同体失去了征税权和财政权，就意味着这个联盟过于松散，没有办法维持。

桑戈尔和乌弗埃—博瓦尼虽然都认同法国的影响力，却又互相指责，加上几内亚等国的示范作用，使得法兰西共同体垮了台。独立后，两国却又要依靠法国的援助来发展经济，它们并没有摆脱法国的影响。

桑戈尔和乌弗埃—博瓦尼是一对现实主义者，他们开辟了一条殖民地独立后也与宗主国保持紧密联系的道路。这条路可能是最为稳妥的，不会给独立后的国家的政治带来太大的断裂，又保持了经济的连续性。但两国的发展又由于两人统治风格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塞内加尔独立后，桑戈尔在经济上也追求社会主义和政府干预，不过他还有另一条原则：独立后不要做出太多改变，继续依靠法国。他甚至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

在其他国家，由于白人撤离，在黑人之中一下子找不到足够的行政人才，从而造成了行政退化。桑戈尔对这种现象很警惕，他宁肯重用合格的白人，也不愿意为了所谓黑人的解放，将职位授予那些没有能力的黑人。他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人们提到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他立刻将这种想法否定了。外国资本在塞内加尔仍然大行其道，法国军队继续驻扎在塞内加尔，法国控制着塞内加尔的银行系统。

这样做的好处是，塞内加尔的行政退化更加缓慢，也没有出现巨大的混乱。但这样做也带来了无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塞内加尔的经济无法独立。

在法国殖民时代，塞内加尔就以种植花生成了法国社会的一个“器官”。独立之后，它没有发展出多样的工农业，仍然依靠出口花生赚取外汇。如果说其他国家往往会陷入过于心急取代海外资本的陷阱，塞内加尔则是行动过慢而造成了问题。

当法国取消了花生补贴，同时国内的旱灾影响了花生的产量，塞内加尔的经济迅速下滑。

另外，由于过于依靠法国，塞内加尔出现了债务上瘾现象。独立后

的二十年间，它的对外债务增长了约20倍。出口一出问题，立刻陷入了偿债危机。

随着经济的熄火，塞内加尔国内也变得更加不稳定。桑戈尔从一个和蔼的受人尊重的老诗人，不得不摇身一变，转换成镇压国内反抗的半独裁者。在此之前，他依靠个人魅力取得选票易如反掌，这使得塞内加尔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当引入暴力之后，塞内加尔眼看就要向着独裁滑去。

但就在这时，桑戈尔诗人的敏锐却突然起了作用。他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也知道自己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局限。1976年，桑戈尔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允许成立三个政党，他自己领导一个中间政党，同时建立了一个左派政党和一个右派政党。

当这项改革取得稳定后，1980年，桑戈尔又做了一项令人震惊的举动：他宣布自己退休，成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主动退休的领导人。1981年1月1日，桑戈尔正式离职，接替他的是他的亲信阿卜杜·迪乌夫。

迪乌夫没有辜负桑戈尔，继续了上一任领导开始的政治改革。在下一次选举中，他进一步取消了政党限制，让所有的政党都合法化了。

迪乌夫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每一次大选都充满了喧嚣，竞争对手互相指责大选舞弊。迪乌夫有时不得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对对手进行打击。但整体而言，塞内加尔的政治已经进入了较为平稳的轨道。

即便如此，人们对塞内加尔的政治仍然有疑虑，因为迪乌夫是由桑戈尔指定的，担任总统的期限达二十年之久。虽然塞内加尔表面上看起来开放了党禁，也有了选举，但如果没有完成一次政党轮替，就不能证明这样的政治是稳定的。

2000年，选举的常胜将军迪乌夫终于失败了。在这一年的大选中，第一轮迪乌夫获得了41.3%的选票，而他的最大对手阿卜杜拉耶·瓦德只

获得了30.1%的选票。就在人们以为这又是一次为迪乌夫举行的大选时，在第二轮，他的竞争对手们突然联合起来，选票都集中地投向了瓦德，最终迪乌夫以41.5%对58.5%输掉了大选。

迪乌夫再次让等着看热闹的人们大跌眼镜，就在人们等待政治斗争时，迪乌夫却宣布接受大选结果，平静地和对手完成了交接。就连对手瓦德也不得不承认，迪乌夫应该因和平交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桑戈尔和迪乌夫的表率作用在塞内加尔树立起了标杆，为接下来的政治家提供了样板。2012年，瓦德在一片争议声中寻求第三任期，但败于他的竞争对手马基·萨勒，他同样迅速地接受了选举结果，完成了交接。

在萨勒之前，塞内加尔总统任期数次改变，从五年改为七年，又从七年改为五年，之后又调回到七年。萨勒竞选时承诺，将总统任期缩短回五年。不管什么情况，总统都只能连任一届。2016年，在塞内加尔的全民公决中，萨勒实现了他的承诺。塞内加尔的民主政治在经过了四代总统之后，变得更加坚定。

塞内加尔在诗人桑戈尔手中充满了颠簸，而科特迪瓦最初的日子却要好过得多。塞内加尔被法国将命运绑在了花生上，而科特迪瓦不仅有咖啡，还有可可、棕榈油、橡胶，它们是法属西非的经济引擎。

独立之后，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认为，民主制只适合于成熟的国家，而对于刚刚成立的非洲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维持稳定性，而这个要求只有一个类似于酋长制的家长式制度才能做到。

与塞内加尔的举步维艰不同，酋长乌弗埃—博瓦尼满手好牌。他也和桑戈尔一样采取了全面靠拢法国的政策，保证法国投资，把与法国的贸易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样，他不信任黑人的治理能力，在政府中大量吸收法国人。在法国的帮助下，科特迪瓦迅速进入了繁荣期。

同样是接受法国的帮助，科特迪瓦之所以走得更加顺利，也是因为

它的资源。在二战后，世界都处于极端繁荣之中，对于经济作物的需求极其旺盛，不管科特迪瓦能生产多少咖啡、可可，都不难找到买主。法国雇员保证了政府的正常运转，生产效率也屡创新高。二十年间，科特迪瓦的农产品产量增加了3倍，科特迪瓦成了世界最大的可可出口国。

由于有足够的外汇，科特迪瓦开始发展工业。在总统的倡导下，科特迪瓦不仅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建立了一系列的现代工业部门，包括公路、电站、港口，甚至把他的家乡——一个小村庄，打造成了雄心勃勃的首都城市。大部分的大型工程是不赚钱的，它们只是为了满足总统的雄心壮志，并没有考虑到运行成本。但是科特迪瓦承担得起这些工程的损失，也没有人在意它们是否有效率。

由于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工程，科特迪瓦的官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

虽然科特迪瓦的政府收入很多，但仍然不够花。于是，政府又通过各种渠道，以科特迪瓦未来的收入为基准，引进了大量的借贷资金。同样没有人在乎怎样归还，他们认为只要经济继续增长，世界继续贪得无厌地对科特迪瓦的产品充满渴望，好运就会继续下去。

但是，突然有一天，好运结束了。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发展突然陷入了停滞，西方人的胃口也缩小了，但非洲的供应还在扩大。几乎在一夜之间，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就从巅峰跌入了谷底，可可的价格只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咖啡的价格也跌了一半。

科特迪瓦的外债是以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作为预期的，一旦价格反转，也就意味着政府不可能偿还得起规模巨大的外债。一旦人们的预期反转，世界资本市场就对这个新兴的国家关闭了。政府收入腰斩，开支却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海量的资金仿佛预感到了危险，开始从各种渠道出逃，更是雪上加霜。

科特迪瓦在挣扎了十年之后，宣布破产。繁荣的奇迹如同幻觉一般消失了。

乌弗埃—博瓦尼对科特迪瓦最大的影响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位老人认为自己还可以扭转局面，不想放弃权力，他压制住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以确保自己每一次选举的胜利。直到1993年他去世，也没有放弃权力。

在塞内加尔，桑戈尔放弃权力的那一刹那，成了政治改革的契机。塞内加尔的资源禀赋比科特迪瓦差很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遇到的麻烦也会比科特迪瓦多很多。但依靠桑戈尔的明智，塞内加尔渡过了建国之后的稳定性危机。

而乌弗埃—博瓦尼死后，科特迪瓦由于没有经过民主的锻炼和真正选举的熏陶，立刻变成了政治角逐的主战场。

接替他的总统贝蒂埃为了保住权力，用各种手段打击政敌。但是，到了1999年，贝蒂埃在政变中被前参谋长盖伊推翻。这一次军人统治时间不长，第二年就让位给了民选总统洛朗·巴博。

2002年，科特迪瓦国内矛盾终于爆发，发生了内战。内战的双方是政府军和北方叛军。由于北方有许多来自布基纳法索的移民，这些移民在乌弗埃—博瓦尼时期受到了总统的容忍，属于总统的铁票。到了新时代，他们受到的歧视越来越严重，于是爆发了内战。

这次内战打打停停，直到2010年，才达成新的协议举行选举。选举中，新总统候选人、来自北方的瓦塔拉与老总统巴博各自坚称自己获得了选举胜利，双方只好再次用战争说话。这一次，瓦塔拉取得了胜利。

瓦塔拉的胜利被视为对乌弗埃—博瓦尼政权的一次清算。在2000年，瓦塔拉就想参加选举，但他的竞争对手却制定了法律，要求候选人父母都是科特迪瓦公民，并且在选举前五年都住在国内。瓦塔拉的父亲来自布基纳法索，瓦塔拉虽然担任过科特迪瓦总理，却在1994年到1999

年期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就这样，他被禁止参加总统选举。2011年，他终于获胜，然而科特迪瓦已经历尽沧桑。

这个西非禀赋最好的国家暂时获得了平静，但它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最新的领导人由于是靠战争上台的，能否将和平持续下去直到完成政权更替，仍然是个未知数。只有一个政权完成了至少一次和平的政治交替，我们才能初步判定它可能已经走出了建国之后的颠簸。按照这个标准，科特迪瓦将在未来数年内获得检验。

“泛上校”的大联合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都是泛非主义者。所谓泛非主义，就是认为非洲必须齐心协力对付世界上的强权，非洲不应该被视为很多个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大洲，发出共同的声音。

在这些领袖中，著名的除了加纳的恩克鲁玛、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之外，就要数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上校了。

卡扎菲不仅是一个泛非主义者，还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凡是和“泛”沾边的，都是他的选择。他虽然已经在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中死去，但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却仍然被视为一个英雄。在乌干达、马里等许多国家，都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或者建筑物。非洲人和我谈起他时，与外界对他的评价大相径庭。外界习惯于将他描绘成一个狂妄的人物，但在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眼里，他却是给世界带来了发展动力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原因在于他在革命之初采取的一项措施。

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推翻了利比亚国王，结束了国王制。他的革命其实是全盘照搬邻国埃及的做法。十七年前，埃及人纳赛尔发动政变推翻了埃及国王，建立了共和国。

正是纳赛尔和卡扎菲两个人，各为发展中国家做出了一项重大贡献。

非洲独立之后，和原宗主国之间最大的分歧是经济上的。原宗主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虽然已经撤离，但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却还存在。大企

业一般控制在欧洲人手中，而矿产资源必须卖给欧洲人。当然价格也是不合理的。以石油资源为例，刚刚结束了殖民地时期，世界的石油合同都称不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殖民时期半强迫的结果。

石油合同的合同期大都是几十年。在签订之初，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宗主国的决定权，收益上石油公司拿大头，产地只能拿小头。大型的石油公司也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西方政府的工具，出产的石油产品必须首先满足宗主国的军工需求。

如果不打碎这种经济绑架，非洲国家就无法做到财政自由。可是要想和平结束经济绑架，需要花费足够长的时间，等到老合同到期了，才能签订新合同做出改变。在到期前的几十年里，必须忍受不平等。

这是发展中国家必然经历的困境，要想改变弱势地位，必须依靠时间、机遇和双方的善意。民国时期，中国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等待了二十年，才终于成功。如果是小国，花费的时间会更长。

纳赛尔的埃及和卡扎菲的利比亚却为非洲指出了另一条更加便捷的道路。

埃及与西方的纠纷主要在苏伊士运河，这条河对英国太重要，英国想方设法不把控制权交出去，而是将运河交给一个公司管理，而这个公司又由英国政府控制。公司甚至拥有驻兵权，在苏伊士驻扎了英国士兵。

纳赛尔上台后，和英国人协商不成，便宣布强行收回苏伊士运河。世界都等着看英国人大发雷霆，但是英国人喷了半天口水，灰溜溜地撤走了。之后英国虽然暗地里支持以色列，但至少不敢明着与埃及人翻脸。

埃及的做法告诉发展中国家：西方已经成了纸老虎，对于新的秩序无能为力。卡扎菲乘机再下一城。

卡扎菲革命成功后，立刻宣布西方给石油的定价不合理。利比亚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油。当时世界上给石油定价的，是西方的大石油公司。西方企业总是联合起来压价，把石油价格压得很低。各大产油国都有心抬价，可是由于西方石油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谁敢闹就封杀谁。

伊朗曾经试图抗击英国人的盘剥，英国人立刻在全球封杀了伊朗的石油。双方几近鱼死网破，伊朗受不了了，请美国出面协商了一个折中的结果，保住了些许面子。伊朗的遭遇让其他国家更不敢这么做了。

卡扎菲却并不信这个邪，他单方面宣布，石油价格不应该由石油公司定，而应该由产地定。为了实现这个原则，他不惜减少产量，以提高价格。世界又等着看西方国家怎么惩治利比亚，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西方又让步了！

从此以后，石油的定价权从石油公司转移到了产油国手中。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从此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产油国发了大财。

这一切都是从卡扎菲上校的抗争开始的，他无意间让世界知道，西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第三世界只要足够强硬就能够夺回商品定价权。从钻石、黄金、铜、钴、铁，到咖啡、可可、花生、象牙，非洲的原材料都曾经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卡扎菲实际上给其他国家指了一条出路：抬高价格以获得更大收益。

虽然实践上大多数国家的抬价行为都失败了，但卡扎菲的成功已经成了神话。人们总是记得：利比亚成功了呀，其他失败的一定是哪儿没有做好。

他的威望迅速提高，成了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世界的双重领袖。他也很享受这样的地位，不断地指导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做，将自己的形象彻底和“反帝”绑定在一起，最后甚至被自己的形象给绑架了，人们一谈起

这位上校，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反帝”角色。

利比亚由于有石油，人口又少，花钱的地方并不多，积攒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钱就被卡扎菲用来支援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兄弟们。

卡扎菲的事业铺得很广，在阿拉伯世界，他曾经支援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还送去了不少武器，对以色列航班搞恐怖活动。他曾经指责埃及在纳赛尔死后变质了，所以支持埃及国内的反对派。他不断地呼吁阿拉伯国家大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以身作则，尝试过不同的合并方案。首先想和埃及、叙利亚联合组建国家，但失败了；又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谈，也没有成功。

在世界范围内，他支持了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武装，从英国的北爱尔兰，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再到菲律宾和泰国。

在非洲，他的活动更加频繁。几乎所有反政府武装都受到过他的资助，区域涉及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地区，埃塞俄比亚控制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西非的尼日尔、马里、乍得。卡扎菲也并不是只支持反政府武装，那些能够和西方对着干的政府也都获得过他的资助，比如乌干达的阿明政府。

第三世界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人，是由于之前他们受到了太多不平等的对待，却又无能为力。当西方世界需要非洲市场时，他们祭出了自由市场理论，可是非洲的市场没有一个是完全自由的，大都是宗主国设定的。这时恰好有一个人打破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他便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在非洲，只有利比亚能承担这个角色，这也和利比亚拥有大量石油却人口稀少的自然禀赋有关，否则，卡扎菲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他的泛联合主义。

但是，第三世界的关注又无法为卡扎菲和利比亚带来足够的利益，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太弱小了，最多只能替利比亚说句话，却帮不上任何忙。直到老年，卡扎菲才意识到他只不过是个被利用的角色。他撒出去

的钞票换来的成果极其有限，即便成功帮助对方上台，但只要一上台，对方就会立刻和他拉开距离。

至于所谓的各种“泛”，也都无果而终。人们谈论各种“泛”，只是为了要他的钞票。阿拉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各打自己的算盘，他们走向了更加分裂，而不是联合。

可惜的是，等卡扎菲认清这一点时，一切都晚了。他开始转型向西方靠拢，不再刻意把自己打扮成反潮流的英雄。但他的钱袋子却扎不住，最初是撒向了第三世界，后来改成了撒向西方的各种体育、慈善活动。

直到他被人民抛弃，死在枪下，他都没有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个没有被世界接纳的孤独者。

第六章
利维坦狂欢

1979年6月，加纳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

在一座位于泰西市的军营里突然之间关押了大量的罪犯，这些罪犯并不是普通人，而是被认为应该对加纳的衰落负责的政客和军人。

其中最显赫的是三位前总统，他们分别是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准将、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将军以及弗雷德里克·威廉·夸西·阿库福中将。与前总统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五位军方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名叫罗林斯的人手中。

裁决最终下来，三位前总统和五位将领都将被判处死刑，他们分别被带出去，面对着行刑队遭受枪决。他们的死为推翻恩克鲁玛后的混乱埋了单。

恩克鲁玛倒台后，加纳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混乱。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加纳经历了两次军政府时期和两次共和国时期，一共七位总统如走马灯一般匆匆走过，以上三位更是在1979年被枪毙。

加纳历史上，将恩克鲁玛时期称作第一共和国。到了1981年，罗林斯终于决定自己干。他换了两部宪法，这两部没用的小册子代表着短命的加纳第三、第四共和国。

如果要总结加纳这段时间的走向，可以归结为持续滑落。恩克鲁玛虽然不懂得治理，却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推翻他的是约瑟夫·亚瑟·安克拉中将，他建立了第一军政府，本人还算正直，也不失理想色彩，却同样无法解决无孔不入的腐败问题。在一次受贿丑闻中，安克拉怆然下台，将位置留给了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准将。

阿弗里法也不是个恋权的人，他意识到无法利用军人统治来发展加纳，必须还政于民选政府。于是，在他的张罗下，加纳第二共和国仓促亮相。阿弗里法在经过了短暂的过渡期后，将政权让出。

但第二共和国只存在了三年时间，就遭遇了连环军事政变。1972年，阿昌庞将军推翻了第二共和国，加纳进入了第二次军政府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时，独立之后所有的理想主义色彩都已经褪尽，参与政权就是为了利益。

阿昌庞执政五年后，再次被推翻，政变的是阿库福中将，但阿库福的位子还没有坐稳，就又遭遇了连环政变，将他推翻的就是罗林斯空军上尉。

罗林斯试图恢复加纳的秩序，除了将三位前总统枪毙之外，他还再次开始了建立民选共和国的尝试。在他的安排下，加纳第三共和国匆忙登场，并有了一位民选的总统希拉·利曼。但他也是第三共和国唯一的总统，这个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比第二共和国更短，到了1981年，罗林斯再次发动兵变，推翻了亲手设立的第三共和国，开始了另一次军政时期。从恩克鲁玛下台到罗林斯上台的十几年间就成了加纳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后才又出现了曙光。

如果要划分加纳的领导人，可以把恩克鲁玛当作第一代领袖，而阿弗里法准将、阿昌庞将军和阿库福中将则可以视为第二代领袖，罗林斯是第三代。

非洲领导人中，有一个规律：那些最独裁的往往出自第二代。第一

代领袖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非洲有一天成为一片人间乐土，只是由于他们的知识不够以及社会还没有稳定下来，理想无法实现。第二代之所以上台，却往往由于人们对第一代不满，让他们钻了空子以政变的形式上台。他们是在殖民地时期长大的，缺乏必要的教育，有的甚至是文盲。上台后，他们最大的诉求是掌控权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只能依靠本能，建立起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政权。非洲就是在这些人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利维坦狂欢的时代。

从政治的发展来看，他们的上台是政治的延续，是无法避免的。也正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折腾，使得人们更加意识到了政治的问题，到了第三代领导人掌权后，非洲才开始认真考虑起发展的问题，从而渡过了这段最危险的时期。

如今，非洲的第二代领导人大都已经离去，非洲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历史的经验往往从失败中获取得更多，回顾第二代领导人的教训，是非洲永远无法停止的课程。只有这样，才能提醒人们稳定和发展是多么重要，所谓“不折腾”这三个字中又藏着何等真理。

苏格兰国王和奥斯卡影帝

在东非国家乌干达，至今人们提起阿明，仍然不知怎么评价。

乌干达是东非的内陆国家，国土面积不大，经济上比起邻国肯尼亚、坦桑尼亚要更加落后。它要从世界进出口，必须依靠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港口。但这里的人们总是乐呵呵的。与肯尼亚、坦桑尼亚有着众多的穆斯林不同，乌干达的基督教更加发达。但人们参加基督教会，更多是为了消遣，一到周末就跑到一块儿敲锣打鼓唱圣歌，显得无忧无虑。只要教会允许他们按照非洲的方式唱歌跳舞，就会获得大发展。

乌干达历史上经过了战争和独裁，好不容易进入了和平时代，所谓“得欢乐时且欢乐”。而所谓的独裁时期，主要指的是阿明时代。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谈起阿明总是带着古怪的成分，将他当成一个怪人。但在乌干达，当我提起阿明时，许多人的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兴高采烈地和我讲阿明时期的逸事，如他如何赶走了不受欢迎的奥博特，如何揶揄西方，他刚上台时怎么样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狂欢情绪。当然，舞会总有结束的时候，由于缺乏治理能力，阿明最终带来的，还是战乱和衰退。

在非洲国家中，乌干达是最能体现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相冲突的国度。

英国人接管乌干达之前，这片土地上存在着数个黑人王国。英国人来了之后，将这些王国都变成了保护国。如果是普通的保护国，那么英国人应该依靠黑人国王进行间接统治。但乌干达的奇特之处在于除了保留了各个国王之外，英国人还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行政系统，这就形成了

殖民地政府与保护国政府同时存在的局面。

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非没有蓝本，最典型的是印度。英国虽然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地政府，但还是保留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土邦邦主，每一个邦主就是一个小国王。印度独立时，英国的殖民地政府把权力交给了尼赫鲁领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可是这些土邦邦主怎么办呢？他们以前是具有实际行政权力的小国王，印度中央政府要想稳固，就必须把他们都废除掉。但如果要废除他们，又会引起普遍的反抗，那建国之初就会充满血腥。

尼赫鲁采取的做法是：允许这些土邦邦主保留财产权和象征性的尊崇地位，但必须让他们交出行政权。这很像宋太祖赵匡胤的政策，你可以当地主，受尊敬，却不能掌权。

土邦邦主这个阶层被解决掉，是印度独立后之所以能够稳固的最大原因。

在乌干达，英国人离开之后，又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上的小国王之间的矛盾呢？

乌干达境内有五个王国，分别是托罗王国、布索加王国、布尼奥罗王国、鲁恩祖鲁鲁王国，以及布干达王国。这五个王国的实力并不均衡，其中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是布干达王国。这个王国占据了最富饶的中南部，靠近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甚至连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都借用了布干达王国的首都。

乌干达独立时，并没有像印度那样，将国王的行政权力剥夺，而是给各个王国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更麻烦的是，乌干达在独立后进行选举时，布干达的国王（国王在布干达当地语言里叫“卡巴卡”，当时的国王是爱德华·穆特萨二世）被选为乌干达的总统。

乌干达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位，但即便是象征性的职位，由一个国王来担任，也会让其他平行的王国感到紧张，它

们害怕自己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受到影响。

与其他国家独立之初就有一个主导性的政党不同，乌干达由于族群关系过于复杂，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拥有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党，总理的地位也不那么稳固。

在独立之初，该国有三个主要政党，分别是支持布干达国王的“只要国王党”，支持世俗中央政府的民主党，第三个政党则是由对布干达不满，想要联合起来避免布干达掌握主导地位的其他地区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号称乌干达人民大会党（Uganda People’s Congress）。

在议会选举中，一共有92个议席，“只要国王党”占据了24个，民主党占据了24个，人民大会党占据了44个，都不够绝对多数。

人民大会党的党首叫米尔顿·奥博特，他将人民大会党和“只要国王党”联合形成了多数派，自己因此成了国家总理。

但在执政的过程中，奥博特发现自己永远处于微弱的摇摆式平衡中。即便布干达是他的盟友，但很多时候却是反对他的，而人民大会党由于是松散的群体，也总是在不断地分裂，使得执政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乌干达政治的另一面——南北问题——显现了出来。在乌干达，南部是和布干达一样的班图人，而北部则是和南苏丹类似的尼罗人，两者的来源是不同的。

布干达在对付奥博特的过程中，总是打南北牌，最后变成了南方的班图人与北方的尼罗人之间的斗争。

由于历史原因，在英国人殖民时期，乌干达的军队就以尼罗人为主。奥博特的政权越收缩，越要依靠军队；越依靠军队，南方人越疏远他。

到了1966年，奥博特的政治平衡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他命令军队袭击了位于首都坎帕拉的布干达王宫，国王仓皇出逃，幸免于难，作为流

亡者死在了欧洲。奥博特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彻底废除了双重体制，解散了各个王国，形成了完整的共和制。

事实证明，在一个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家，表面上的共和制反而不如传统制度。在共和制下，奥博特成了逍遥法外的统治者，他迫害异己，暂停议会。乌干达人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甚至期待有人挺身而出，将他赶走。就连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不介意他倒台。

当人心所向时，必有人为之。这位解救大众的英雄就是阿明。1971年，当奥博特前往新加坡参加英联邦会议时，家乡却传来了政变的消息。奥博特只好逃往与他关系不错的邻国坦桑尼亚蛰伏起来。

阿明上台后，整个乌干达都陷入了狂欢气氛中，人们以为奥博特一走，好日子就会自动到来。阿明最初的举措也让人们吃下了定心丸，仿佛乌干达将迎来一个盛世时期。他把奥博特关押的政治犯都释放了，取消了管制性的法律。由于布干达国王已经死在英国，阿明用盛大的仪式将他的尸体迎回，葬在了乌干达。

在乌干达首都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历代布干达国王安葬之地。国王们都安葬在屋子里，屋子用厚厚的茅草垒成，看上去很别致。但现在的人们只能从照片上看到这些显得有些粗糙又很奇特的建筑了。2010年的一场大火将建筑的主体部分烧毁，可见非洲的世界遗产有多么脆弱，它们大都是由不可持续的材料建成的，如茅草和泥土，需要人们不断地维护。

阿明还撤换了奥博特政府腐败的官员，并向人们保证，军事政变只是权宜之计，很快就会举行选举。于是，全乌干达的人们开着花车，载着阿明，在全国四处巡游。

这个时期也是乌干达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之前，人们总是把自己当作是某一个王国的人，对于联邦国家这个概念的认同感却很弱。虽然民众与阿明的狂欢看上去是一种无聊的仪式，但却给所有的人打上

了乌干达这个标签，让他们有了国民身份的认同感。这一点，可能是阿明留给乌干达的最大的遗产，也是为什么至今当世界对阿明表现出不屑时，乌干达人却仍然对他开着善意的玩笑，并没有过分讨厌的原因。

但巡游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国家是要靠实实在在来治理的。

巡游结束后，到了真正治理国家阶段，人们却发现，作为第二代领导人最典型的代表，阿明的治理能力并不比奥博特高明，甚至更糟糕。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听从领袖的教导，可是领袖本人对于经济问题也并不了解，人们更加不能理解领袖的意图。最后，为了维持秩序和贯彻政策，领袖只好依靠警察和军队。

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秘密部队回来了，反对派继续被清洗。阿明不想承认的事实是：不是人们不理解领袖，而是领袖对治理国家一窍不通，不会算账，不识字，也不懂得放权的道理。人们开始对阿明感到失望。

不过，阿明倒不担心人们的失望，经过了狂欢的洗礼后，他已经发现了保持人们拥戴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继续制造让人们参与狂欢的机会。只要狂欢还没有停止，乌干达人就会团结在他的周围。

在他看来，经济糟糕必然是有外来的破坏，他认定这是控制了工商业的印度人干的。这时的他还不敢拿白人开刀，亚洲人则成了替罪羊。乌干达有一个庞大的以印度人为主的亚裔群体，他们大都有英国和乌干达双重国籍，是全国的经济和技术核心。阿明不断地宣传亚洲人窃取了属于黑人的财富，他限定这些印度人必须在三个月之内离开乌干达。

乌干达人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损失掉一个成熟的商人阶层是多么的危险，反而认为阿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黑人找回了财富。亚洲人背井离乡，将土地、房产都留在了这块他们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他们带走的，除了资本之外，更重要的是专业技能和管理技能。他们走之前，乌干达的财政垮台了；他们走之后，乌干达的经济崩溃了。

乌干达的经济崩溃后，阿明为了获得援助，开始依靠利比亚的卡扎菲、扎伊尔（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以及苏联和民主德国。它们给乌干达带来了大量的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没有形成生产力，大都被阿明身边的人拿走了。

当乌干达人民意识到这一步大错特错时，阿明在国内的地位一落千丈，于是对平民的控制接踵而至，人民开始钳口结舌。

但到这时，阿明的政治资本还没有被他挥霍完。亚洲人被清理后，如果要继续保持国内人民的凝聚力，就轮到了白人被清理。

1977年，英国与乌干达断交。此前，阿明已经无数次挑战英国和英联邦，甚至呼吁由他来取代英国女王作为英联邦的元首。由于他曾经在苏格兰军队中服役，他甚至称自己是“苏格兰王”。到了2006年，好莱坞拍摄了一部关于阿明的影片，名字就叫《最后的苏格兰王》。

英国人和阿明断交后，阿明立刻宣称自己打败了大英帝国，是大英帝国的征服者。

在中国古代，有给统治者上尊号的传统，比如，最爱慕虚荣的皇帝之一宋真宗的全称是：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明太祖的全称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称号更加长：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这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欧洲人也喜欢一连串的缩略字母。

如果一个英国人曾经获得过一枚杰出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他会得意地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DSO三个字母，让人一看就心生妒忌。如果一个英国军人能获得一枚军功十字章（Military Cross），就可以加上MC两个字母。

阿明的尊号把这些都包括进去了，他的全称是：尊贵的终身总统，阿明博士，伊迪·阿明·大大阁下，VC，DSO，MC，全球走兽和全海洋

鱼类的主宰，非洲特别是乌干达的大英帝国征服者（His Excellency，President for Life， Field Marshal Al Hadji Doctor Idi Amin Dada， VC，DSO， MC， Lord of All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Fishes of the Seas and Conqueror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Africa in General and Uganda in Particular）。

其中，在乌干达语里“大大”是对男人的一种尊称，VC则是阿明自创的一枚勋章“胜利十字章”（Victorious Cross），另外，他在国内大学曾经获得了博士学位。

与其他非洲第二代统治者不同，在外人眼里，阿明更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认真地演着正剧，观众却总是笑场。

但他的演技竟然被另一个人弥补，在电影《最后的苏格兰王》中，扮演阿明的是著名的黑人演员福里斯特·惠特克。依靠着对这个独裁者深刻的刻画，惠特克获得了奥斯卡影帝，也算间接地帮助阿明圆了演员梦。

但是，也不要小看了阿明的做法。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喜欢看，主要是因为在貌似滑稽的表演之下，他又带着对世界秩序的敏锐观察。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后，他发去慰问电报，这让那些对美国不满的人捧腹大笑。当巴勒斯坦发生慕尼黑惨案，以色列的运动员被杀害，他向联合国发去贺电，赞扬巴勒斯坦人和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当中苏发生边界摩擦时，他自告奋勇前来调解。这些事件虽然可以看成一个非洲小国的不自量力，却又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事实上，阿明将许多国家在联合国论坛上不敢说的话，以表演的形式说了出来，特别是将非洲人的不满和困惑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因为这种暗含的意义，他的做法让非洲国家趋之若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非洲，他都被看成是一个敢于反抗西方的英雄。于是，一大堆荣誉向他砸了过来。

1975年，阿明当选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为此他专门佩戴上大量的勋章出现在会场上。到了1977年，乌干达进入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也是许多第三世界小兄弟共同努力的结果。

阿明的身份也在非洲和世界上表现得极端分裂。即便到了现在，非洲人也并不十分讨厌阿明，并将他列入当年反抗西方霸权的领袖之列；但在西方，他被宣传成一个滑稽小丑，还是个杀人魔王，甚至吃过人肉。

在乌干达历史上，阿明统治时期是乌干达国际地位最高的时期。即便到现在，乌干达在总统穆塞韦尼的领导下成为地区小霸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比当年小了很多。

但不管阿明怎样提升乌干达的国际影响力，乌干达国内的经济却仍然一蹶不振，哪怕依靠国际补贴也没有什么效果。事实上，即便尊重他的人也知道，问题出在了他本人身上，这个不学无术的人只是一介蛮夫，根本不懂治理国家，却阴差阳错地出现在了领袖的位置上。

1979年，阿明终于碰到了硬钉子，这次他不幸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邻国坦桑尼亚头上。

此时的坦桑尼亚正在尼雷尔的乌贾马集体化中挣扎，也同样受到了世界的嘲笑，看上去是个软柿子。阿明以坦桑尼亚支持反对势力为借口侵入坦桑尼亚，企图吞并历史上有争议的卡盖拉区。不想这次他碰到了强硬派。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早就看不惯阿明的做法，立刻派遣大部队进入乌干达，如摧枯拉朽一般推翻了阿明，将老总统奥博特重新推上了台。阿明的统治在一片瞠目结舌中告终。人们知道他维持不下去了，但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结束。

乌干达面临的问题是，不仅阿明没有行政能力，前总统奥博特做得更糟糕。奥博特之所以下台，就是大家都希望他下台，阿明才乘机发动

了政变。这次，阿明把国家的经济搞崩溃了，再靠奥博特能够救得过来吗？

事实证明，奥博特同样无法拯救乌干达，至少阿明还将乌干达捏成了一个整体，奥博特却只懂得依靠北方的军队，利用强权来镇压国内的动乱。于是，乌干达爆发了持续五年的游击战争，30万人死于非命。直到1985年，一个叫穆塞韦尼的游击队领袖依靠武力夺取了政权，乌干达才在穆塞韦尼的领导下进入了平静期。到此刻，乌干达独立之后的动荡才宣告结束，进入了下一个建设时期。

但在人们赞扬穆塞韦尼的建设时，事实上，也不能完全否认阿明对于乌干达的国民性塑造起到过的作用。

如果说阿明更多表现的是滑稽，那么另一位著名的第二代领导人却让人笑不起来了。

博卡萨："中非的拿破仑"

1979年12月20日夜，一架法国飞机迫降在中非帝国首都班吉的姆波科国际机场。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从飞机上突然下来一队法国士兵，他们没有遭到太多抵抗就占领了机场。

随后又来了两架飞机，数百名法国士兵来到了这个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士兵们确保占领了机场之后，向空中发送了信号。在中非的邻国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另一批法国士兵正在军事基地里待命，收到信号后，他们纷纷登上飞机前往中非。

法国的入侵行动是为了推翻中非帝国的皇帝博卡萨。皇帝把法国人当作长期盟友，和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以及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直都称兄道弟，他怎么也想不到推翻他的竟然是法国人。

法国人的行动选在博卡萨不在国内之时，他正和另一位好兄弟利比亚的卡扎菲见面。法国人甚至都没有给他掩盖罪证的机会。

博卡萨虽然倒了台，却也并不是善主。推翻他之后，法国人扶持了中非的前总统达科上台。达科决定首先去接收皇帝在国内的财产。在博卡萨的住处，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钻石珠宝等奢侈品，当然还有不少色情图片。

最恐怖的是，在博卡萨的一栋别墅的冷藏室里，达科的人发现了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带着头颅，却少了一条腿和两条胳膊，人们辨认出这是一位数学教师。在同一栋别墅的水池里，还有许多白骨碎片，据说这是博卡萨饲养的鳄鱼吃掉的人类的遗骸。

此前，博卡萨曾经在登基当皇帝的宴会上，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参

加仪式的法国合作部部长，他们正在吃人肉，当时人们就怀疑这位皇帝真的吃过。

找到尸体这件事被传了出来，总统达科公开宣称博卡萨吃过人肉。传到后来，又变成了博卡萨曾经用人肉招待过法国的嘉宾，包括一个名叫德斯坦的人。不幸的是，德斯坦正是当时的法国总统。

皇帝吃人肉的传言让法国人吃到了苦头，但这位中非皇帝带给法国的痛苦还不止这些。失去了国家的博卡萨请求到法国避难，最初法国拒绝让他在本土定居，只准许他去往前法国殖民地——科特迪瓦。博卡萨再次抱怨法国人不够义气，他声称送过德斯坦两颗巨大的钻石，竟然换不来法国人的友谊。这件事经过法国报纸的报道，成了大丑闻，德斯坦也因此在1981年的选举中失利下台。

四年后，博卡萨终于被允许居住在法国，因为他曾经在法国军队服役，有权退居法国本土。但即便住在巴黎，他仍然不停抱怨法国人对他太冷淡，自己太贫穷。他决定写回忆录来赚钱。由于回忆录内容太火爆，还没有开卖就被禁止了。德斯坦再次成了受害者，书中不仅重复了送给他钻石的事儿，还继续爆料当他访问中非时，博卡萨甚至给他找过女人。得到好处的不止德斯坦一人，在博卡萨当家的那些年，法国各种部长们都喜欢往中非跑，博卡萨宣称给他们都送过礼。

一个小小的中非人能够在法国政坛搅起这么大的浪花，也反映了法国后殖民地政策脆弱的一面。法国是前宗主国中最舍不得放手的：一方面，前法国殖民地由于缺乏独立的资源，往往走得步履蹒跚，希望与法国维持关系；另一方面，法国也希望继续向前殖民地国家倾销商品。双方的意愿使得法国对于非洲的干预特别多，但也正因如此，法国的政局也受到了非洲的影响。

对于中非而言，在很长的时间内，博卡萨都是这个偏远国家唯一的世界名人。如果没有他，这个国家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就像不存

在一样。

法国的殖民政策造就了许多悲剧性的国家。以中非共和国为例，这片土地在独立之前被称为乌班吉沙里（Ubangi-Shari），地名来自两条河——乌班吉河和沙里河。它位于非洲中部，完全不靠海，是世界上地理最封闭的国家之一。

现代人可能永远搞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要在非洲划出这么多奇怪的行政区，很可能法国人认为非洲殖民地永远不会从法国独立出去，所以从来没有考虑到一旦独立，它们完全没有生存能力。结果，中非共和国从独立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中非的第一任总统达科是博卡萨的表兄，从他上台，他就清楚地知道国家的窘境，也知道为了保持这个新国家的完整性，首先必须要让民众得到一定的好处。中非最大的资源是钻石，这也是唯一能让人民获得好处的东西。钻石矿控制在几家特许公司手中。达科上台后，宣布废除特许经营，允许私人开采钻石。这项政策使得中非的钻石产业急剧扩大，达科也因此获得了足够多的拥护。趁着这段时间，达科巩固了他的政权，为了强化统一性，他打压反对派，将政体改成了一党制。

但接着，这个国家就毫不意外地陷入了停滞。这种停滞可能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要想在这块封闭的土地上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它缺乏资源，又由于太封闭没法发展工业，更由于教育的缺乏，这里几乎没有合格的人才来操纵机器。

当人们不再支持达科，政变就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博卡萨将军上台了。

博卡萨刚掌权时，也得到了不少同情分。他出身穷苦，头脑简单，不管是法国人还是中非国内民众，都对他充满了好感。

但与达科一样，博卡萨对中非的发展也没有对策。经过短期的尝试，他就发现要想留在台上，还是只有两种方法：讨好民众和任人唯

亲。讨好民众的做法都被达科用过了，中非只有钻石，没有别的资源可以利用。博卡萨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集权，在台上留一天算一天。

博卡萨把他的反对派们全都送进了监狱，以折磨他们为乐。当他倒台后，人们发现的那些尸骨，都是他折磨反对派的罪证。他不懂得政治，但知道必须把权力抓在手中。于是废除了正规的政府部门，所有的部委首脑都是他兼任的。在他看来，全国只要他一个人有思想就够了，其他的人只要有耳朵和手就行。

除了抓权，博卡萨也很知道尽快享受的道理。他娶了十几位妻子，有二十几位情人。他有55名登记在册的子女，以及无数的私生子。他的妻子来自不同的大洲，有欧洲的德国人、瑞典人，还有亚洲的中国台湾人、阿拉伯的突尼斯人，还有好多非洲人。

拥有这么多后代，自然要准备足够的资产。博卡萨的资产主要分布在法国，这是他要前往法国避难的原因。

他自己有大批的财富，也必须允许他的党羽各自捞点小钱。于是亲信们占据了各种位置，经营着中非本来就稀少的工商业，赚了钱都转移到国外。

仅仅依靠国内的资源显然不够挥霍，博卡萨对于如何利用“国家”这个招牌也很在行。首先，作为一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必须和宗主国搞好关系。法国是一个很乐于“帮助”前殖民地的宗主国，只要能够扩张法语世界的影响力，与英语世界对抗，法国并不排斥支持一批独裁者。博卡萨和法国的总统、许多部长都是铁哥们，这保证了不管他怎么做，法国都不会轻易批评他。

靠法国可以保证政治稳固，却无法保证资金充足。于是博卡萨转向了东方阵营，捞取援助。当然这钱还是不够用，于是博卡萨盯上了财大气粗的阿拉伯国家。他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打成一片。为了表现自己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博卡萨甚至规定小偷在被抓

住后要割掉一只耳朵。到小偷第三次被抓住时，已经没有耳朵可割了，就砍掉一只手。

到了博卡萨统治的晚期，他突然受到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启发，决定自称皇帝。他准备了昂贵的皇冠和豪华的典礼，并广发英雄帖，请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来参加他的典礼。但典礼那一天，除了法国象征性地派去了部长，其他大国都没有动静。到这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他快撑不住了。

让法国决定放弃博卡萨的是这样一件事。1979年1月，皇帝突然命令首都的全体学生必须都购买新式校服，而校服是由博卡萨的亲信工厂生产的。这实际上又是一次腐败行为。以前人们不得不忍受，但这次因为预感到他统治不会长久了，人们决定反抗。小学生们上街游行，接着青年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也开始上街游行了。

到了4月，形势恶化了。博卡萨开始逮捕学生。许多学生遭受了酷刑。据称，有的学生在监狱里遭到了殴打，有的被博卡萨本人用权杖击碎颅骨而死。

对学生施加的暴行终于让法国意识到必须放弃博卡萨了。于是，这才有了本节开头那一幕。

不过，中非的问题并不在于具体的领导人，而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博卡萨可以被推翻，但是问题依旧存在。法国人可以换一个中非领导人，却无法帮助中非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也不会投入过多的资源去改善遥远国家的民生。

重新上台的达科并没有控制住局面，两年后，人们对达科再次感到失望，安德烈·科林巴将军适时地发动了政变。科林巴将军统治中非共和国达十二年之久。由于前两任都采取了集权主义的套路，科林巴将军决定反其道而行，走经济自由化之路。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到援助。至于政治上，仍然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独裁

制。法国人仍然是将军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非洲，最大的问题是无处不在的腐败。中非共和国经过前两任总统/皇帝肆无忌惮的统治，腐败更成了绝症。科林巴将军治下也无力扭转，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将军的亲朋好友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问题由分配不均演变成族群斗争。到了1993年，将军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举行了选举，他竞选失败了。继任者帕塔塞统治十年后，再次因政变被推翻。

中非共和国进入了十年轮回，每十年左右，老的领导人彻底束手无策了，就会有一个新的领导人依靠政变上台，继续尝试十年。

在新上台的弗朗索瓦·博齐泽·扬古翁达的十年“轮回”期间，中非共和国陷入了低烈度内战之中，这场战争被称为“丛林战争”。叛乱的一方为老总统帕塔塞的支持者。

到了2013年，新总统变成了老总统，再次被推翻。中非共和国又进入了下一个循环，不稳定状态持续到了今天。

在非洲，大部分国家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颠簸之后，往往会找到一条弥合之路。到这时混乱也就过去了，国家将开始另一个建设时期，虽然有的建设慢一些，有的快一些，但整体而言，人民会逐渐感觉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的安定。到这时，国家才算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但中非寻找的过程却更加复杂，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原因就在于这个缺乏资源、远离海洋的国家是如此封闭、隔绝于世，它没有成为一个稳定国家的资源和资本，只能依靠法国的支持勉强支撑着。从这个角度看，博卡萨的出现，也许只是非洲悲剧的一个缩影而已。

博卡萨也成了非洲统治者的一个特例样本，其余统治者，比如阿明，即便在治理上并不擅长，却依然热情地投入到黏合国家的工作中，但博卡萨的统治却很少表现出正面意义；还由于与法国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他不仅将本国折腾得底朝天，还将法国的政局搅乱，让人们看到

了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与前宗主国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

阿明和博卡萨都是非洲第二代领导人里的佼佼者，但当他们面对另一个蕞尔小国的独裁者时，仍然自叹不如。但这个小国却突然间走了运，利用一种全世界都需要的资源获得那难得的发展机会……

赤道几内亚：石油成为救世主

在非洲西部的几内亚湾旁，有一个在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小国，国土面积只有2.8万平方千米，人口122万。这个小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国家之一，它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人均GDP超过1.4万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人均GDP更是将近3.5万美元，绝对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

但平均水平并不能拯救国家的整体状况，它还具有另一个更加极端的特征：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个国家大约有一半的人口甚至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婴儿5岁前的夭折率达到了20%。在世界的人类发展指数排行中，它只排第135位，而在政治自由度、人权指数等排名中，它更是位于非洲的倒数，在世界上也是最后几位。

这个国家叫赤道几内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极端，是因为1996年，美国人在该国发现了大量的油田。在这之前，赤道几内亚一穷二白，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随着石油的开采，它的GDP飙升。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窗口，当一个国家从贫穷突然变得富有时，到底会发生什么。首先，当石油被发现后，大量的石油收入并没有惠及普通人，而是被以总统奥比昂为首的少数人瓜分，这增强了奥比昂对国家的控制力，以及对政敌的镇压。看到了赤道几内亚的情况，才知道所谓国富并不等于民富。

但从长期来看，到了一定程度，石油资源必将有一部分流入民间，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政府被迫将一部分资源使用在民生上。对于赤道几内亚而言，最重要的民生之一就是教育。要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全貌，必须从它建国时开始谈起。

赤道几内亚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当欧洲其他国家瓜分非洲时，西班牙仅仅在几内亚湾附近抢到了一小片土地。宗主国在这里生产咖啡、可可和木材，但由于殖民地体量太小，对宗主国而言一直是个鸡肋的角色。

1968年，西班牙让赤道几内亚独立。为了在其独立后继续控制这里，西班牙人故意选择了一位平庸的人来做总统。他叫恩圭马，曾经四次参加考试，才考取文官资格。西班牙人发现他是个唯唯诺诺、便于控制的人，就一路扶持他，确保他在选举中胜出，成了赤道几内亚的总统。

但西班牙人却忘记了查一查恩圭马的背景。恩圭马的父亲是被西班牙人殴打致死的，他的母亲在父亲死后自杀，9岁的恩圭马因此成了孤儿。有人认为，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不仅是感情和心理上的，还有可能给他的头脑造成了损伤。

独立不到半年，西班牙人就知道自己错了。恩圭马开始煽动全国的反殖民情绪。他宣称，赤道几内亚虽然独立了，但实际上仍然是西班牙的附庸。看哪，西班牙的旗帜还在国家上空飘扬！

在他的鼓动下，黑人们冲向城市里西班牙人的住处，开始了大规模破坏。西班牙人纷纷逃离，赤道几内亚的经济随即垮掉。

恩圭马是靠选举上台的，西班牙人也给他配备了一个官员班子。这批官员中有人认识到不能靠煽动来治理国家，试图扭转全国性的混乱。但他们立刻遭到了恩圭马的镇压，数十人被杀害，有的是被折磨致死的。在恩圭马任职之初，全国有12位部长，其中10人被处决。随着这些理性官员的消失，西班牙人全都撤离了。赤道几内亚当时的人口只有40万，其中西班牙人有7000人，从这时开始，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族群彻底消失了。

在赶跑了西班牙人之后，恩圭马开始对知识阶层下手，除了政府部

长，接下来就是国会代表和高级文官。他们如果足够聪明，就早已逃离出国，只要稍微晚走一点，就进了监狱。

代替知识阶层的，是恩圭马的各种亲戚，以及他的打手。这些人大都是文盲出身，对于治理一窍不通。但恩圭马并不在乎，他把赤道几内亚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文盲国家。这里没有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行长已经被处决了。国库钞票都藏在他的家里，随时可以花。也没有统计局，因为统计局局长也死了。

在消灭了智识阶层之后，恩圭马就成了真理的象征，他自称是“世界唯一的奇迹”，以及“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大师”。

人们普遍怀疑恩圭马的精神出了问题，因为他做了一些极其残忍荒唐的事情。比如，在1975年圣诞节，他将150名政敌赶入体育场，让士兵们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将政敌杀死在体育场之中，屠杀时体育场中还播放着西方的流行乐。

由于原来农场和林场的工人都已经跑光了，恩圭马只好靠抓捕弄来另一批人，强制他们劳动，这又导致了许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

为了防止人们逃离，他不惜闭关锁国，除了海洋之外，整个赤道几内亚只有一条道路通往外界，恩圭马在这条路上埋上地雷，将那些企图逃跑的人炸死。

在他统治期间，赤道几内亚号称非洲的达豪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恩圭马的屠杀比当初纳粹做得还彻底。

1979年，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消失，恩圭马终于把魔爪伸向了他的家族。在这之前，家族是作为他的利益集团存在的。恩圭马这一年处决了他的几位家族成员。其中之一是他的侄子，也是国防部副部长奥比昂的兄弟。这一次，他终于惹恼了家族成员，他们发动了政变，将恩圭马推翻了。

恩圭马早已将他的三个儿子送出了国。在他逃走时，他烧掉了大部分外汇，剩下的带在身边。两个星期后，他被从丛林之中揪了出来。

由于民愤太大，恩圭马家族决定把他牺牲掉，于是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对他实施审判。他被判决对全国8万起屠杀负责，被判处了101次死刑，合并执行死刑。在执行判决的当天，他和另外6名心腹一起被枪决了。

由于恩圭马在文盲国家不断地进行个人神化宣传，全国上下几乎都相信他是打不死的神人，国内的士兵们甚至不敢向他开枪。所以，恩圭马家族只能从遥远的摩洛哥租了一支行刑队过来执行死刑。

到这时为止，赤道几内亚与中非共和国一样，表现的是一种无望，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以及文化储备，这样的国家在短期内是很难稳定住的。在非洲，虽然大部分国家都能趋于稳定，但总有少数的特例由于过于缺乏禀赋，不得不接受更长久的混乱。

但是，赤道几内亚又是幸运的，恩圭马死后，石油的发现给了它一条新的出路。

恩圭马死后，他的侄子奥比昂继承了总统的职位。在奥比昂执政早期，赤道几内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恩圭马时代，总统既是行政首脑，也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掌控一切权力。奥比昂虽然表面上新定立了宪法，但依靠操纵和家族统治，仍然可以牢固地掌握住政权。人们分不清这是一个共和国还是王国。

由于缺乏自然禀赋，世界自从恩圭马倒台之后，也就不再关注这个国家，让它自生自灭去了。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赤道几内亚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再次将这个小国拉回了世界的视野之内。

随着石油的发现，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奥比昂对于国家的掌控力变得更强。一个国家要想在人民的观念内变成一个国家，必然要经历集体认

同阶段，而这个过程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则必然借助于强力。

在牢牢地稳住了国家政权之后，一些变化也随之而来。在恩圭马时期，国内的知识阶层已经被消灭殆尽。奥比昂等人意识到，要想治理国家，就必须依靠文治而不是武功，培养知识阶层已经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奥比昂投入最大的是教育。随着政府收入的增加，奥比昂规定了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作为对比，在恩圭马时代，全国文盲率几乎是100%，而奥比昂却成功地将年轻人的文盲率降到了20%以下。

一旦解决了教育问题，随着石油财富的增加，其余的问题也在缓慢地软化。不可否认，赤道几内亚至今仍然是最腐败的国家之一。2017年，随着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倒台，执政长达三十八年的奥比昂已经熬成了在任时间世界第二长的执政者。在他身前的只有喀麦隆首脑保罗·比亚。比亚从1975年开始任职，已经达到了四十二年。由于喀麦隆与法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他历经风雨和国际批评之后，仍然在任。

赤道几内亚如今仍然享受着石油带来的红利，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一旦石油红利过去，到底它是陷入资源衰竭重新回归贫穷，还是找到其他的出路，但至少它目前已经保持了稳定，并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脱离了当初无望的局面。

民主明灯换不来经济发展

在非洲的利维坦名单中，除了新建立的国家之外，也包括当年的明灯之国。

在1847年独立之后，利比里亚就以世界上仅有的黑人共和国著称于世。它是黑人建国的指路明灯。当其他地区的黑人忍受着殖民主义的奴役时，人们总是能想到，在遥远的西非海岸，还有一个名叫“自由”的国家由黑人进行统治，人们可以行使选举权，从黑人中选择总统。

这个明灯已经维持了一百多年，在它的感召下，非洲终于迎来了大规模的独立潮。然而，在这些独立国家纷纷想方设法搞建设时，却发现曾经的明灯突然间变得暗淡了。

1979年，利比里亚第20任总统托尔伯特迎来了他人生中（也是利比里亚）的一次重大机会。这一年，托尔伯特当选了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利比里亚也将承办该年度的非洲首脑会议。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主持国际会议时，都会在国内大肆铺张，不惜增加人民负担。托尔伯特也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为此，他拨出了年度政府财政的一半用作会议开支。在托尔伯特的大力撒钱下，会议办得非常隆重和成功。

但参加会议的非洲首脑们怎么都想不到，就在第二年，托尔伯特还没有卸任一年任期的主席，以稳定著称的利比里亚就乱了套。

先是爆发了粮食起义，起因在于托尔伯特花钱过量，只好减少财政补贴，提高粮食价格。人们开始四处示威。政府调集军队与人民对抗，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局面。粮食起义让非洲首脑们有些意兴阑珊，毕竟利

比里亚是因为接待他们才大肆花钱的。

但就在首脑们松了一口气时，突然间传来消息：利比里亚发生了政变，托尔伯特总统（也是当年的非洲领袖）被捕后被挖出了内脏和眼珠，他的尸体被扔在了大街上。

民主是否一定会带来稳定和繁荣？在看了利比里亚的例子之后，也许答案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作为由美国释放的黑奴建立的国家，利比里亚的宪法基本上模仿了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之一——美国宪法，也有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总统和议员靠选举上台。

既然和美国的架构类似，那么利比里亚是不是应该成为非洲最繁荣的国家？答案却并非如此：利比里亚一直不温不火，难以步入发展的轨道。它的民主是一种沉闷而缓慢的民主，与非洲急需的经济发展绝缘。

它的国土面积狭小，只有11万平方千米。但想在这狭小的土地上旅行却并不容易，因为利比里亚最缺乏的是道路。现有的道路以土路为主，由于处于雨林地区，一旦到了雨季，所有的道路都会变成烂泥潭，陷在其中几乎寸步难行。

人口只有450万，却分布在十几个部落之中，很难整合进入同一个政治框架之下。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好的政治架构和宪法却没有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呢？答案是：统治者和当地人民是隔离的。

从美国来到利比里亚的黑人只有几百个，他们在首都蒙罗维亚建立了基地。但在蒙罗维亚之外，则是当地部族的地盘。这些部族并不了解美国来的黑人要干什么，美国来的黑人也并不关心当地部族的命运。

在很长时间内，当地部族与利比里亚政府是完全脱节甚至对立的。后来利比里亚政府强行将他们并入了国家之中。可是，当地部族并没有

感到自己是利比里亚人，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的自由。

一百多年来，利比里亚的政治一直控制在美国移民的后代手中，他们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不管是选举还是民主，都局限在这些人内部，其他99%的人只能接受被统治的命运。

由于统治阶层与人民的分离，利比里亚还错过了对外扩张的最佳时期，无法将更远的土地并入国家。利比里亚被法国的殖民地和英国的殖民地环绕，局促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里，也丧失了变得更加强大的机会。

到了1980年，利比里亚的总统已经在移民后代内部传了20任，托尔伯特就是第20任总统。但所有这20任总统又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任总统，因为他们实行的政策是类似的，就是拒绝融入当地，把自己打扮成不伦不类的美国人。不管谁担任了总统，首先想到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如何为家族谋取利益。当地部族也并不在乎谁当总统，千人一面而已。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都被容忍了，但随着非洲其他国家的独立，利比里亚那99%的人被唤醒了。他们突然间意识到，虽然自己的国家一直是独立的，但从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看，反而不如周边那些新独立的国家。

到这时，利比里亚国内开始出现了隐蔽的反对声音，一百多年的统治方式也就不再稳固了。如果把前面20任总统统称为第一代，那么，发动政变的士兵多伊的确可以算是第二代领导人。

与利比里亚历来风度翩翩的政治家族不同，多伊是实实在在的土著出身。他出生于利比里亚土生部族克兰族，中学函授毕业。在发动政变时他只有29岁，是个军士长，连军官都不是。他的出身仿佛是对利比里亚政治传统的嘲讽。

所谓政变，只是一次幸运的胡闹。一天晚上，多伊带着16名士兵爬进了总统府将总统打死，与总统一起死亡的还有27名守卫。政变就这么

意外地成功了。

多伊虽然职位很低，也没有权威，但他很擅长制造群众场面。总统死亡后被开膛破肚，连同其他死难者一起被扔在大街上，让狂欢的人群朝他们扔石头，喊口号。在狂欢中，更多的人开始接纳多伊，听从他的指挥。

多伊带着他的人在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市民已经被吓傻了的首都横冲直撞，将托尔伯特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一一逮捕。这些人被以腐败的罪名审判，并被判处死刑。

为了进一步显示权威，托尔伯特的13名部长被扒光了衣服绑着走过首都的街道，接受人们的戏弄和嘲笑。他们被押到了海边，绑在电线杆子上，遭到行刑队齐射。多伊宣布：遭受那些美国家族压迫了一百多年的人们自由了！

在人们的嘈杂声中，默默无闻的多伊军士获得了足够的权威，成为利比里亚共和国的第21任总统。

与其他第二代领导人的武夫形象不同，多伊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文质彬彬。他自称多伊博士，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留着厚厚的头发，如同从好莱坞电影里跳出来的人物。他信誓旦旦要治理好国家，却由于缺乏治国的必要经验，只能依靠高压和暴力维持统治。他镇压反对派，查封反对派报纸，将大量的职位授予同种族的人。

但多伊的统治又是稳固的，其原因在于他在冷战中摸准了风向，把利比里亚变成了美国人在非洲的冷战伙伴。从很早开始，利比里亚就是美国的情报中心和航空监视基地。多伊上台后，更是允许美国人对几内亚湾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加强了美军的机动作战力量。

美国人虽然与之前的利比里亚政府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经过评估，决定与多伊打交道。大量的美元流入利比里亚，帮助多伊维持政权的稳固。

但另一面，美国人的帮助又总是带一点理想色彩。他们虽然帮助多伊，却要求他进行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改变一党独裁的局面，进行多党制选举；第二，改善利比里亚的经济状况，以免美国的援助都打了水漂。

198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多伊不得不举行多党制选举。为了保证自己当选，他先把竞争对手抓了起来，又派兵开进了校园，将激进的学生控制住。暴力不时发生，失控的士兵甚至强奸了女学生。

不管多伊怎样控制局面，大选还是变成了闹剧。统计选票时，随着形势逐渐明朗，多伊看来必败无疑。就在人们等待最终结果时，突然听说选票已经被封存了，为的是进行“更加公正”的点票。十几天后，多伊宣布自己以50.9%的选票当选总统。这个数字刚过一半，正好可以保证多伊在第一轮胜出。

就在人们纷纷质疑选票结果时，美国政府却称赞这是民主的第一步而接受了选举结果。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选举结束不久，多伊曾经的伙伴、后来的反对派奎翁巴将军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多伊。这位将军从塞拉利昂进入利比里亚，一路杀向首都蒙罗维亚，并控制了电台。就在人们以为政变成功，开始欢呼的时候，多伊却重新控制了局面，将奎翁巴捕杀。

美国人虽然接受了选举结果，却继续施压要求多伊整顿经济。这次，他们派来了一个专家小组，专门帮助多伊整顿政府财政。

专家小组徒劳无功地与多伊政权周旋，最后不得不撤出。他们的报告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对多伊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多伊和他的官员完全没有现代财政观念，是不可救药的。

失去了美国的帮助，利比里亚立刻陷入了内战的泥沼。这次反对多

伊的是军阀泰勒。泰勒得到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他反对美国支持的一切），以及科特迪瓦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布基纳法索领袖孔波雷的支持。

泰勒从科特迪瓦出发进入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第一次内战爆发。在这次内战中，多伊总统被俘，他被审判的录像带成了非洲最热门的录像节目。在录像里，审判者将多伊剥得只剩内裤，边喝啤酒边审讯。多伊在承认倒台后被杀。

利比里亚的第一次内战持续了八年，导致40万人死亡。1997年，双方达成了新的选举协议，选出了泰勒作为总统。但一年多以后，冲突再起，第二次内战持续了四年多，又有15万到30万人死亡。泰勒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流亡，利比里亚才再次举行了选举，暂时恢复了平静。

如果说多伊在利比里亚的政变带来了什么正面效果，那就是打破了原来的大家族统治，让普通利比里亚人意识到了自己也是可以参与政治的。多伊的统治又让人们意识到了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利比里亚是有选举传统的国家，从多伊之后，他们仍然保持了选举的传统。他们再也不希望发生政变，而是希望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解决实际问题。

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利比里亚进入了较为和平的时期，它迎来了一位温和的女性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瑟利夫的领导下，国家恢复了相对宁静，开始了动荡之后的弥合时期，瑟利夫本人也在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瑟利夫担任了两届总统下台后，继任的同样是通过和平选举上台的足球明星乔治·维阿。

这两人都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总统，在担任总统前，瑟利夫长期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任职，而维阿则长期在欧洲踢球，他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有助于帮助这个贫穷的国家。在他们的带领下，利比里亚进入了一个专家治国的时代。三十多年前那场政变更多是作为一场噩梦存在于利比里亚人的心中。噩梦结束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

不是噩梦之前的那种静止社会。

在非洲，流行着四大独裁者的说法，人们习惯于把阿明、博卡萨、恩圭马，以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称为四大独裁者。人们谈起非洲，首先想到的是独裁、落后，这也是这些独裁者留给世界的印象。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所谓的独裁者，只是政治形势的产物，当一个国家国内矛盾找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时，就会出现荒谬的方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合格的人被推向前台。不仅是在非洲，在其他任何大洲、任何国家也一样，一旦出现了政治退化，上台的往往都是庸人。他们手段强硬，善于抓权，对于真正的政治却一窍不通。

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是在发展的，独裁者现象主要出现在非洲的第二代领导人中，这一代由于特殊的环境，缺乏治理能力。当这个特殊的时期过去之后，非洲已经很难再出现这样的人了。当人们谈论非洲时，往往还停留在这些人身上，这样的认知错位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会存在，但在非洲却表现得更加明显，事实上非洲已经走过了这个时期。

在四大独裁者中，博卡萨和恩圭马都是庸人，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国家，却被阴差阳错地推上了前台。为了保住职位，他们只有依靠本能将权力紧紧抓在手中，杀害政敌、冻结选举。那些帮助他们抓权的人成了内部人，立刻陷入了腐败之中。

与博卡萨和恩圭马不同，阿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浓厚。最初，他有心将国家治理好，却由于缺乏能力，只能用古怪的表演吸引人的眼球，希望延迟自己下台的时间。蒙博托则是因为前总理卢蒙巴的失败，而被推向了前台。

这些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在位，还和世界的冷战秩序有关，他们的背后几乎都站着几个东西方强权。蒙博托、恩圭马投靠的是西方，阿明投

向了东方，博卡萨则东西通吃。当人们进入冷战思维后，所谓的道义和真理都被置于一边，全都变成了算计和斗争。即便是现在，在中东、东亚还都充斥着冷战色彩的非道义支持。独裁者们总是善于利用强权之间的夹缝，求得生存环境。

与东西方阵营的算计相比，作为独立力量的中国却表现得更加理智，从一开始中国与非洲打交道，就带着很强的君子之交的成分，不干预对方的政治，却尽量帮助非洲发展。虽然由于对方的政治整合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帮助所带来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但到了今天，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仅帮助了非洲的发展和稳定，还让非洲成了中国的大市场，解决了中国一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形成了互惠。

四大独裁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是为了抓权，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他们不在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宗教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权力本身。

在非洲还有另一类领袖，他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们选择了非洲式的“教条主义”，造成了比四大独裁者更大的灾难。

第七章
第二代领导人的试验

2014年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它如同一个巨大躯体摊在广袤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这里雄伟的现代建筑与破烂的贫民窟共存，中国人帮助修建的铁路和公路旁边就是布满了肮脏水坑的土路。这种景象正好反映出它贫困的过去，更反映出它追赶世界的急切，那些旧的痕迹还没有消失，但新的时代却已经展开了。

在非洲，最重要的机构是一个叫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2002年，它的前身是著名的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成立于1963年。从非洲统一组织转换成非洲联盟，本身就代表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在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时，大家总是热切地盼望着一个联合的非洲，最好变成同一个国家，不管是恩克鲁玛还是卢蒙巴，都认为非洲就是非洲人的非洲，只有联合的泛非主义，才是非洲最终的出路。但是到了21世纪，人们已经承认，所谓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更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互相提供帮助，并在对外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这已经比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退缩了，却更加符合现实。

不管是非洲统一组织，还是非洲联盟，既没有选择加纳的首都，也没有选择坦桑尼亚、埃及的任何一个城市，而是选择了高原城市亚的斯亚贝巴作为总部。

亚的斯亚贝巴是座富裕的城市，世界著名的长跑健将们退役之后投资的高档酒店里，充斥着非洲五十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及其家属，酒店旁边就是花花绿绿的高档夜生活区。但亚的斯亚贝巴也是个贫困的城市，在距离高档酒店不远处，成片的小旅馆里虱子和臭虫随处可见，花上10美元就可以找个廉价的妓女陪睡一晚。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位老人家里，我看见一幅装在镜框里的画像。他告诉我："这是我们的皇帝海尔·塞拉西！"

他把镜框翻了过来，背后装着另一幅画像，老人继续说："这是我们的主席门格斯图。"

我以为这是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但当我们聊起来时，老人才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埃塞俄比亚的两大魔鬼（埃塞俄比亚人信奉基督教，因此常把他们讨厌的人称为魔鬼），你以为我把他们挂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善心？错了，我是为了提醒自己，以前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现在这个时代，家里挂皇帝，已经没人管了，所以我把他放在正面，但是主席还不能随便挂，所以他就只好去背面了。"

老人把镜框挂在厕所边上，原来也是有讲究的："皇帝死在厕所里，所以我把他挂在这儿；至于主席，他杀了那么多人，上帝竟然不管他，让他活到现在。"

厕所打扫得很干净，但显得有些简陋，与寒酸的镜框倒也匹配。

老人总结说："只有随时看到他们，我才能跟孩子们说，现在的日子虽然很苦，可是比起魔鬼盛行的时代来，还是要强多了。孩子们都以为我疯了，甚至不好意思把我挂皇帝和主席像的事儿告诉别人，害怕别人以为我是个坏蛋。但我只是想纪念一下我们可怜的埃塞俄比亚人民，纪念一下我们过去的经历。只有不忘过去，才能珍惜现在的日子。"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苦难最多的国家。其他国家也经历过混乱，但是埃塞俄比亚既经历过独裁，也经历过另一种极权的蹂躏，饥荒、战争、

分裂纷至沓来。

但它又是个骄傲的国家，在非洲，它的历史最悠长，信仰最坚定，即便在西方殖民的年代里，也依旧傲然地保持独立。如果说加纳和利比里亚是独立的象征，那么埃塞俄比亚就是非洲永恒的象征。

埃塞俄比亚人也是非洲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现在的政府开始学习中国，实行工业化革命，建立了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之所以运行得不错，就在于埃塞俄比亚人吃苦耐劳，忍得住工业化的洗礼。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就与以前经历的痛苦有关，当机会来临时，历史提醒他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老人所说的第一个魔鬼——皇帝海尔·塞拉西，并不是一直以魔鬼的形象出现。在几十年前，他是非洲的大英雄。即便到了现在，还是有不少人以同情的语气谈论他，认为他死得冤，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局。现代的埃塞俄比亚，皇帝也不再是禁忌，人们经常谈论他和他的时代。

这位英雄成名时，恩克鲁玛、卢蒙巴、尼雷尔等人还是不出名的小孩子。但是，他为何又成了老人口中的魔鬼了呢？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虽然恩克鲁玛、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象征，但与海尔·塞拉西比起来，他们的地位仍然相形见绌。

海尔·塞拉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意大利人拙劣的入侵行为。在二战前的一百多年间，意大利一直在打非洲之角的主意。他们占领了不少海岸地区，现在的索马里南部、厄立特里亚都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他们最想入侵的，还是古老的埃塞俄比亚。

在近代，埃塞俄比亚一直沉浸在独立的荣光之中，独特的所罗门王朝统治了近千年，皇帝们的政府如同中世纪一般，是绝对集权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由于地势高，即便丢失了所有沿海区域，它仍然能保住高原上的核心区域。

意大利在19世纪末发动过一次入侵，结果殖民者被打败了，意大利军人死得比埃塞俄比亚军人都多。

墨索里尼上台后，再次发动了入侵。在英国等同盟国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再次打胜了。二战后，埃塞俄比亚成了光荣的战胜国。在非洲国家大都没有独立时，埃塞俄比亚就以接连两次打败欧洲强国而闻名。这一点很像当年的阿富汗，虽然阿富汗是一个中世纪的部落制国家，却是各大帝国野心的坟墓。

领导埃塞俄比亚抗争的，就是皇帝海尔·塞拉西。在与埃塞俄比亚距离遥远的美洲国家牙买加，有一个奇怪的基督教分支，叫拉斯塔法里派，这个教派崇拜的核心人物竟然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牙买加人之所以崇拜这位皇帝，把他神化成先知，原因就在于埃塞

俄比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黑人国家，海尔·塞拉西就是这个黑人国家的元首。当全世界黑人需要一个领袖时，他就脱颖而出了。

塞拉西皇帝出生于1892年。

1916年，埃塞俄比亚唯一的女皇佐迪图登上了皇位。之所以第一次选择女皇，是因为所罗门家族出现了继承人危机，从最近支的男性线上已经找不出候选人。佐迪图是一名虔诚的保守分子，但这并不妨碍她先后有四位丈夫。

之前埃塞俄比亚从来没有出现过女性执政的情况，佐迪图虽然登上了王位，但并没有直接执掌政权，而是选了一位摄政王，这位摄政王就是她的堂弟海尔·塞拉西。

摄政王逐渐巩固着自己的势力，被选为女皇的继承人。女皇终于感觉到了危险，叫她最后一位丈夫发动战争反对摄政王。结果，摄政王胜利，女皇连惊带吓死了。1930年，海尔·塞拉西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四年的皇帝生涯，加上摄政王时期，一共统治了埃塞俄比亚五十八年。

他当上皇帝不久，意大利人就开始发动侵略。到二战结束时，埃塞俄比亚皇帝已经名满天下，成了基督教的圣徒。

圣徒也面临着复兴埃塞俄比亚的最好时机。他不仅想要埃塞俄比亚富强，还想把整个非洲之角统一起来。

意大利虽然没有成功获得埃塞俄比亚的核心区，却占领了北部沿海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这里曾经是埃塞俄比亚的势力范围。厄立特里亚在成为意大利殖民地之前，曾经是受奥斯曼的影响，但大多数人口仍然保持着基督教信仰。

意大利在二战战败后，厄立特里亚成了英国的托管地，但海尔·塞拉西却试图根据传统，让它加入埃塞俄比亚。这一次，他成功了。

至于意大利的另一块殖民地索马里，也在非洲之角上，却由于它主

要信仰伊斯兰教，被英国人与英属索马里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索马里国家。

皇帝虽然没有拿到索马里，却已经将疆土大大扩充，是现代埃塞俄比亚面积最大的时候了。埃塞俄比亚虽然是一个国家，架构却是一个帝国。除了皇帝和他统治的核心区域之外，还有许多外围区域，比如厄立特里亚，还有东部的伊斯兰区域、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等。这些区域并没有将皇帝当作理所应当的统治者，而是将其看成是外来人。

帝国模式具有天然的不稳定因素，皇帝应该更加小心，避免过分地收税。另外，统治的重心应该放在国内，维持好国内秩序，而不应该在国际问题上多花钱。

但作为非洲的“领袖”，皇帝却无法收缩自己插手的范围。他本人也把自己当作天然的非洲大统领，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把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争取到了埃塞俄比亚，并且经常出席各种国际活动。

与此同时，本国事务却毫无起色。由于政治架构过于古老，国家缺乏正常的政治运行规则，甚至连国家账本都没有。所谓政治，只是皇帝每天随口下的各种矛盾的命令，而皇帝的信息来源只是周围的亲信。他花钱如流水，慷慨地赏赐给所有的亲信，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库还有多少钱。一旦臣下汇报缺钱了，就立刻向民间索取。

这种统治的随意性终于压垮了埃塞俄比亚，各地纷纷反叛，帝国摇摇欲坠。

接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1974年大饥荒，这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饥荒导致数万人饿死，皇帝却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节省的意思。

最终决定皇帝命运的还是军队。当军队的补给也受到影响时，一场小规模的兵变引起了雪崩效应，全国也开始了针对皇帝的游行活动。

一群下级军官乘机发动兵变，将皇帝推翻，埃塞俄比亚也由此进入

了更深的灾难之中。

门格斯图的实验室

1974年9月11日，皇帝被参与兵变的士兵组成的委员会关押在首都的一座监狱中。士兵们试图让他交出财产，皇帝负隅顽抗。

到了晚上，皇帝突然被带到了电视机前，被强迫坐下，看起了电视。这天电视上播放的是一位英国导演乔纳森·丁布尔比拍摄的纪录片，名字是《被掩盖的饥荒》。

在片子中，埃塞俄比亚北部饥荒与皇帝的大吃大喝被巧妙地剪辑在一起。皇帝看完后，陷入了一言不发的沉思之中。

实际上，这部片子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导演为了突出饥荒的程度夸大了数字。片子原来的名字叫《未知的饥荒》，革命委员会故意将名字改掉，为的是彻底摧毁人们对皇帝的信仰。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虔诚的国家，皇帝虽然好大喜功，却谈不上残暴，对埃塞俄比亚也充满了热爱。即便他被赶下了台，还是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有罪，甚至把他当作埃塞俄比亚独立的象征。委员会需要利用宣传将皇帝的权威彻底打倒，让他变成罪犯。

委员会的目的达到了，皇帝被迫下了台，他的数十位高官被处死。一年多以后，他死了。关于他的死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正常死亡，有的说他是被人用枕头闷死的。他的尸体在多年以后，才在一个厕所里被发现。老人所说的皇帝死在厕所里，指的就是这件事。

推翻他的人用大饥荒的宣传让皇帝声名狼藉，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并没有结束。到了1984年，埃塞俄比亚进入了更大的饥荒之中，也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大饥荒之一。在高峰时期，每周都会有一万多人饿死。

而这一切，都是拜推翻皇帝的人所赐。在他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开始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完全计划经济的试验，国家被引入更大的灾难之中。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最大的广场旁边，有一座庄严的建筑，它以黑色的大理石做墙面，在墙上用金色的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文和英文镶嵌着：殉道者纪念馆。

纪念馆里的陈设并不是从推翻皇帝的门格斯图执政时期开始，而是将时代首先定在了皇帝统治末期。在一张照片上，一位老人伸出双手乞讨着，他的眼神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却还是机械地伸出了双手。他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却通过照片将永恒的控诉传递到了未来。

皇帝的奢华与民间的苦难，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接着，门格斯图政权上台了。在纪念馆中另一张著名的照片上，年轻的领导人门格斯图正把一个红色的瓶子扔向下方的群众。整个照片是黑白的，只有瓶子里的液体是红色的。这是一张戏剧化的照片，门格斯图通过这个动作，让人们明白，所谓革命就是要让一切人都沾染上红色，不是杀人者，就是被杀者。

在随后的展览中，我们回顾了当年的血雨腥风：施暴的刑具，受害者的遗物。如同柬埔寨纪念馆中的照片墙，这里也挂出了大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已经死亡，却留下了最后的形象供人们凭吊。

纪念馆的最后一部分是受害者的尸骨。在展示柜里，不能够确定身份的死者的头骨、肋骨、腿骨被分门别类地堆放在一起。能够确定身份的，就把尸骨单独放在格子里，格子的玻璃门上贴着死者生前的照片，以告诉人们，这些无辜的骷髅当初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的尸骨上还带着行刑的刑具，他们很多人是被绳子勒死的。

从博物馆出来，小院子里立着一尊雕像，三个哀伤的女人或望着远方，或低头垂泪。在雕像的基座上，用阿姆哈拉文和英文双语写着：再

也不要重来。这句话，或许是经历了皇帝和主席双重打击的埃塞俄比亚人内心最深处的呼喊。

埃塞俄比亚的革命领袖门格斯图所在的机构被称为“杜尔格”，在阿姆哈拉语中的意思是“委员会”。在首都市中心附近，还保留着当年杜尔格时期所建立的纪念碑。那是一个金光灿烂顶着红五星的建筑，让人看了肃然起敬，却想不到，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肃杀的政权。

我曾经询问过许多人，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反对皇帝独裁的运动，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政，竟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我却知道，一个饱受独裁奴役的国家，在打碎独裁的过程中，是非常容易堕入另一种极权之中的。

1974年，人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游行试图推翻皇帝，但最终起作用的，却是一群中低层的军官。他们发动兵变推翻皇帝之后，建立的组织就是杜尔格。

即便中低层军官掌了权，埃塞俄比亚也没有立刻陷入灾难。虽然皇帝已经没有了，但社会基础还在。只要不打破这个基础，就不会无休止地混乱下去。

杜尔格在上台之初，实际上也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将精力转向发展社会和经济，那么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不幸的是，杜尔格是由一群不懂得治理的普通士兵和基层军官组成的。按照规定，埃塞俄比亚的40个军队单位，每个单位选派3名代表组成杜尔格。士兵们不信任高层军官，认为他们和旧政权联系过于紧密，而高层军官也不愿意参加由普通低级军官和士兵组成的组织。

门格斯图是埃塞俄比亚第三师的一名普通军官，驻扎在埃塞俄比亚东部的穆斯林聚集区。一天，他的师长突然决定把他送去当杜尔格代表。师长之所以这么决定，是因为他认为门格斯图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把他送走就眼不见为净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决定为埃塞俄比亚制

造了多大的灾难！

杜尔格的成员大都是头脑简单的军人，门格斯图很快就从中脱颖而出，成了主要人物。他开始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蓝图变为现实。在他的鼓动下，首先废除了君主制，软禁了国王，枪毙了国王的大臣们，清洗了军队的高层。强大的社会基础瞬间被打碎，从此埃塞俄比亚成了一盘散沙，只能听门格斯图的了。灾难的条件已经具备。

1975年，门格斯图操纵杜尔格决定：埃塞俄比亚从此要走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道路。于是，原本只是政治斗争，现在灾难突然向普通人逼近。

年初的短短三个月内，杜尔格首先把金融系统（银行和保险业）国有化了，接着又把商业企业也收入囊中，最后杜尔格宣布土地归国家所有。

杜尔格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国内人民的激烈反对。埃塞俄比亚是个帝国，周围的民族都是受奴役而不是自愿加入的。从厄立特里亚到东部穆斯林区域，再到南方的少数民族区域，纷纷开始起义。

即便在主体区域内，人们也不愿意成为计划经济下的沙尘，而是更想守住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

换成其他人，也许会在政治上选择暂时放弃强硬的做法，但这并不符合门格斯图的理想主义。他决定用武力对付反抗。

首先被清除的是杜尔格之中的反对派，他们被关在杜尔格办公的所在地，被机枪扫射而死。接着，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屠杀活动。

屠杀纪念馆的那些尸骨，就是在建立新政权时留下的。那位邀请我去家里的老人回忆说，在屠杀的高峰时期，所有敢于说话的反对派都被屠杀殆尽，不管是否有过反抗的行动。他比画着告诉我，这些人从家里被带走时，不管男女老少，胳膊都被拧到身后捆起来，用纸板写上名字

和罪名，挂在脖子上。首都的街道两边，常有一连串的人坐在街边的地面上，他们都是要消失的人。亲人们被带走，就意味着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能够被辨认出姓名的是极少数幸运者，大多数尸骨都处于无法辨认的状态。

到了1978年，门格斯图终于满意了，埃塞俄比亚已经被建成了他心目中的样子。

但是，这个政权到底怎么样呢？

1985年，歌曲《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席卷了全球，它的制作阵容强大，由天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创作，演唱者更是几乎囊括了美国第一流的歌手，其中独唱者就达到了21人。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慈善曲目，将世界的目光引向非洲的一个国家，它正遭受着最严重的饥荒。但奇怪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却不仅不承认饥荒的存在，还千方百计阻止人们为那些即将饿死的灾民提供帮助。这个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与1983年开始并持续了三年的大饥荒相比，皇帝统治时期的1974年饥荒已经算不了什么。1983年饥荒的主要成因是一场“完美风暴”，任何单独的原因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重大的灾难，必须是众多原因叠加而成。

这些原因是：第一，国有化政策将农民赶离了土地，国家已经一穷二白；第二，四处爆发的小规模叛乱仍然在持续，为了应付战争，政府已经完全破产，无力进行哪怕一丁点儿救助；第三，更为荒唐的是，政府的心思根本没有在灾民身上，而是放在了另一件“大事”——搞庆典上。

1984年，在这个奥威尔调侃过的年份里，埃塞俄比亚是在无数人的死亡和辉煌的庆典中度过的。庆典是为了纪念杜尔格革命十周年。

由于花费过高，必须从农民手中征收更多的粮食。按照计划经济的

做法，粮食征收额是由中央政府先定一个数目，再层层下分至每一个村庄。当征收额度下发到村庄时，却发现村子里早就没人了。在北部区域，人们已经为了食物逃散了。

为了应付粮食征收，加上不能把灾民放到首都去影响各国嘉宾的心情，政府在路上围追堵截，要将他们抓回去，要死也必须让他们悄悄地死在家乡。

当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再也无法掩盖时，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偷偷到了饥荒发生地，发出了无数的报道，但杜尔格仍然否认饥荒的发生。

根据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只要允许信息、物资和人员自由流通，再大的歉收也不会造成饥荒。因为人们可以移居到别处谋生，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就可以调拨到灾区去帮助灾民。饥荒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往往是政府设置了太多的障碍，让想救援的人们得不到足够的信息，也让逃荒的人们无法离开家乡。

在埃塞俄比亚，信息、物资、人员三者的自由流通全部被阻断，造成了这次特大的饥荒。在死了上百万人之后，国内的反对声终于透过了重重阻碍，被门格斯图听见了。他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饥荒。

制止饥荒的方法是：将北方灾区的移民迁到南方的荒地上去。于是，在被阻止了很久不能离开家乡之后，北方的灾民们又突然被政府抓走，匆匆送往了南方。

他们到达南方后，被扔在荒地上，没有干净的水，没有住处，没有种子，没有工具，一切都是那么仓促，等于是把人扔在那儿等死。

杜尔格在饥荒中所表现出的残忍，让埃塞俄比亚人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政权。人们回想起当年杜尔格怎么批评皇帝时期的饥荒，再做一个对比，发现它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变本加厉了。杜尔格批评皇帝铺张浪费，不顾人民死活，但他自己同样大搞没用的工程，把救命钱都浪费掉了。杜尔格批评皇帝把饥荒隐藏起来，但隐藏更深的反而是它自己。

饥荒结束后，埃塞俄比亚的反抗势力突然间得到了加强，杜尔格的财政能力却已经减弱到了无法控制全局的地步。1987年，门格斯图解散了杜尔格，换汤不换药地建立了一个叫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权，执政的还是同一批人。各地的反抗并没有停止。1991年，门格斯图终于倒台了。

门格斯图并没有因为他所犯下的屠杀罪行而受到惩罚。就在政权倒台的同时，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向门格斯图伸出了友谊之手，提供了避难权。当时的津巴布韦仍然是西方的宠儿，为了让穆加贝同意不驱逐白人，西方政权还在讨好着他。穆加贝收留一只丧家之犬，并不足以引起太多的反对。

门格斯图倒台后，人们找到了当年死去的皇帝的尸体，当地的基督教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有一个规律：经过了太多灾难的民族容易变得温顺，带着一点怯懦和听天由命，但它们的生命力又非常顽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生存。

埃塞俄比亚人由于碰到过太多的波折，是非洲人中最有韧性的民族。只要和平一恢复，他们立刻擦干眼泪，开始建设新的生活。虽然仍然有无数的短板，但埃塞俄比亚的恢复速度也是惊人的。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援助的到位，首都的面貌在短期内已经出现了极大的改观；乡村仍然贫穷，却也不会轻易饿死人了。

在与当地人交谈时，我发现即便是穷人，也都带着逆来顺受（或者叫乐天知命）的态度。他们总是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比两个“救世主”时期好多了，虽然人们还是很难找到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工，但和平得来不易。政府只要给他们和平，不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这或许是两位“救世主”留给他们的最大遗产。

在整个非洲的行程中，埃塞俄比亚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国家。这里的

人们为他们的历史而骄傲，为现在的贫穷而羞愧，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在新政府的带领下尽快地实行工业化。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也是多元的，从铁路、公路到工厂。为了吸引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前往，埃塞俄比亚还特别注重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打造成为整个非洲的中转站之一，埃塞俄比亚航空也是非洲最好的航空公司，起到了连接非洲与世界的作用。

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试验以悲剧告终，但在西非，另一场社会试验虽然也失败了，留下的遗产却并非纯粹是负面的。那儿的人们至今仍在怀念大地之子桑卡拉，或者可以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

桑卡拉：非洲的切·格瓦拉

1987年10月9日，在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举行了一场纪念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活动。格瓦拉生前以古巴革命和游击战争出名，甚至到非洲培训过游击队，却无功而返。他提倡暴力，不吝杀人，也死于暴力，可谓死得其所。但不知为什么，世界竟然把这样一个屠夫式的人物捧成了革命与自由的象征，在非洲也不例外。

在格瓦拉死亡二十周年时，布基纳法索总统桑卡拉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在活动上，桑卡拉评价说："格瓦拉教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能力有充足的信心。他激励我们，给我们信念，坚信斗争是唯一的源泉。他是我们正在建造的这座自由世界大厦的公民。这是我们为什么说切·格瓦拉也是非洲人和布基纳法索人的原因。"

桑卡拉这么推崇格瓦拉，事实上，人们已经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与格瓦拉一样，他也信奉社会主义，不拘小节，出口成章，是个偶像级的人物。

这个"非洲的切·格瓦拉"同样也死于非命：纪念活动刚过去一周，一场流血政变在布基纳法索爆发，桑卡拉和他的12名官员一起被杀害。

桑卡拉死后，他的尸体被肢解后埋葬，不准人们纪念。但到了2015年5月25日，非洲独立日这天，他的尸骨终于被发掘出来，成了人们纪念的圣物。据说，在尸骨中发现了十几粒子弹。

杀害他的是他的战友孔波雷。桑卡拉死后，孔波雷担任总统二十七年，才在群众示威后被赶下台。他下台前，整个西非，包括布基纳法索就已经开始纪念桑卡拉。孔波雷只好说桑卡拉是在交火中被误杀的。孔

波雷下台的那一天，就是桑卡拉在国内封圣的时刻。

桑卡拉到底有什么魔力，让布基纳法索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此纪念他呢？

原因在于他给非洲树立了一种理想。

非洲国家大都存在“裙带”式腐败的问题，桑卡拉却是个例外。作为总统，他的月工资只有450美元，家产不过是一套没有还清贷款的普通住宅和一辆最普通的小汽车。即便这点钱，还必须用到他收养的十几个孩子身上。

他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保持廉洁，坐普通车，不准受贿，不准坐头等舱。如果发现腐败，官员的财产会被没收，本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非洲从来都是各种疾病的高发地，许多孩子因疾病而夭折。政客们大都不去关心人们的健康。但桑卡拉是个例外，他在国内大规模推行疫苗计划，为儿童免费接种，并承认艾滋病对于国家的威胁，认真对待这个社会问题。

非洲的文盲非常多，各国政府也无力组织更好的教育。桑卡拉却推出了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非洲的妇女地位非常低，桑卡拉却在每一次演讲中都不忘强调女性的作用。他在政府中招募了大量的女性工作人员，并禁止女性割礼，禁止一夫多妻。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都带着很深的理想主义成分。布基纳法索位于沙漠边缘，他就提倡植树。这里的交通很差，他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修路计划。总之，桑卡拉用他带有鼓动性的声音说出了人们希望的天堂社会，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正是这种理想吸引了全非洲的注意，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理想的异

类，一个圣徒。他身材高大，喜欢穿迷彩服和骑摩托，女性更是为他疯狂。

这个理想的异类虽然想做很多事情，却大都没有做成。如今在布基纳法索，你会发现即便是首都地区，还有很多街道是土路，房子破破烂烂，带着年久失修的痕迹，这和他当初的理想简直有天壤之别。

他曾经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布基纳法索仍然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但他当初的努力又留下了很多成果。比如，布基纳法索虽然贫穷，但整个社会面貌却要比旁边的国家强很多。这里街头很少有乞丐，穷孩子们顶着饮用水、香蕉和鸡蛋售卖，也不愿意直接向行人要钱，这和周围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学校更加干净，我住的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每天传出的读书声、出操声，让我以为回到了中国。

这里的腐败也比其他国家少一些。从马里到布基纳法索的汽车路过边境时，我发现两边的军人面貌差别巨大。在马里出境处，边防官员一看我是个外国人，立刻毫不掩饰地告诉我："给我5000（西非）法郎（折合人民币约60元），我就给你盖出境章。"当我拒绝后，他立刻把我的护照递出来，拒绝盖章。我在窗口央求了半天，他才给我盖了章。到了布基纳法索入境处，情况迥然不同，这里的设施也如同马里一样破烂。由于马里的反恐形势不乐观，边境属于强管控地带，布基纳法索穿制服的官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和签证页，询问了几个问题，随后微笑着给我盖章，并说："欢迎来到布基纳法索！"由于刚在出境时被索贿，在这一侧却遇到如此友好和专业的官员，竟让我有些不适应。

这或许就是桑卡拉留下的那点希望，我边回到车上边这样想。在他之前，非洲被当作一个希望渺茫的大洲，人们最缺乏的是信心。桑卡拉把建设天堂社会的信心教给了当地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桑卡拉的鼓励下，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每个人都勤劳、乐

观，而不是靠天吃饭，懒洋洋地等待着世界银行的援助。

谈到桑卡拉，就必须谈到布基纳法索的前身上沃尔特。它的名称得自于一条河流。沃尔特河从北向南，三条支流白沃尔特、红沃尔特、黑沃尔特都发源于现在的布基纳法索境内。于是，法国人把这里划成了一个殖民地，叫上沃尔特。三条沃尔特支流最终都流入了现在的加纳境内，汇成了沃尔特河主道，流入了大西洋。

上沃尔特属于法属西非的一部分，在1960年与西非其他国家一起取得了独立。首任总统莫里斯·亚梅奥果随即冻结了多党制，建立了一党制，国家陷入了不稳定状态。直到1966年军队发起了不流血政变，放逐了亚梅奥果。但军人也一直无法重新建立稳定的民选政权，上沃尔特又在1980年、1982年相继发生两次不流血政变。

到了1983年，桑卡拉上台了。他属于1982年政变组织全民拯救委员会（Council of Popular Salvation，简称CPS）的左翼，在与党内右翼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理。很快他又在斗争中失势，被逮捕了。他之所以快速失势，是因为他的左倾倾向已经让原来的当权阶层无法忍受。在政治上，他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经济，采取国有化措施；在外交上，他亲近泛非主义者（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排斥原来的殖民主义国家。法国可能也参与了对他的废除行动。

但桑卡拉已经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民众的压力下，他被释放了。1983年 8月4日，他发动了一次新的政变，这一次终于流血了，在交火中有十几人死于非命。布基纳法索对不流血的政权更替早已习以为常，人们这时才知道，原来政变有时候也会流血。

桑卡拉成为总统一年后，将国名从上沃尔特改为布基纳法索，意思是“正直者的土地”，表明要和之前的历史决裂。

桑卡拉之所以民心所向，和这个国家独立后的失败经历有关。亚梅奥果上台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好处。独立后，

国家立刻变成了一党制，加上无数的政变，国家经济被一小撮社会高层所绑架。这样的资本主义没有展现出具有竞争力的一面，反而充斥着许可证制和权贵经济。

法国人虽然让布基纳法索独立了，但仍然控制着西非国家的经济和外贸。法国人始终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这让普通人感觉独立和不独立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原来的路是一条死路，一个人突然提出来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然会吸引人们的注意。

桑卡拉上台后，立刻开始了对于布基纳法索的改造。除了那些提倡廉洁的措施之外，对于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政策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谢绝外援，自力更生。桑卡拉说过："我们国家生产的产品是足够我们生活的。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故而不得不向人家祈求食物。正是这种祈求，往我们的精神里注入了乞丐的基因。"

谢绝外援，自力更生，这看似不合理，但在布基纳法索又带着一定的合理性。殖民地原来的宗主国法国离开后，仍然通过经济联系控制它。虽然法国不能强迫布基纳法索只和自己做生意，但它通过与布基纳法索高层领袖的联系，控制了外贸领域。这使得布基纳法索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贸易自由，它必须把初级产品廉价卖给法国，再从法国进口昂贵的工业品。

桑卡拉提倡自力更生，更多是为了打破与法国以及欧洲的强绑定，降低法国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

当然，为了做到自力更生，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就有了第二条。

第二，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为此，桑卡拉建立一党制，废除反对派，甚至把儿童也组织成少先队进行思想灌输。事后，人们指责他

独裁，主要原因就是他对于反对党和工会的镇压。

在获得了强控制之后，他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全国性扫盲、提升公共健康、与沙漠化抗争、加强女性权利等政策。它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长了，反作用也极其明显。与其他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一样，他的措施无法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反而挫伤了那些最具进取精神的人的积极性。到最后，反而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

以粮食为例，在改革之初，由于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粮食产量立刻大幅增加，看上去布基纳法索距离粮食自足已经近在咫尺。但时间长了，当政治进一步干扰到人们正常的经济行为时，粮食产量又开始下降。

但是，在社会领域内，桑卡拉的教育、健康、反腐政策，又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变革的苗头，这些是桑卡拉改革的好的方面。

第三，在外交上向苏联、中国、古巴、利比亚等国家靠拢，斥责殖民主义。桑卡拉试图实现全非洲的大联合，对那些与宗主国保持强联系的国家都嗤之以鼻。

在西非，大部分原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法国都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一旦国家发生宪政危机，总是要法国来干预。如果有叛乱，法国也会出兵镇压。至于经济联系，法国也插手了很多事务。西非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很弱小，离不开法国的输血。桑卡拉却认为这些国家缺乏骨气，他不断地批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到最后，布基纳法索成了整个西非的异类，受到了其他国家的疏远。

1987年，桑卡拉曾经的战友孔波雷发动了政变，布基纳法索再次流血，桑卡拉死于非命。孔波雷上台后，将桑卡拉的措施一一废除，法国人兴高采烈回来的同时，孔波雷也再次宣称要依靠国际组织的“输血”。在西方看来，布基纳法索仿佛走了三年的弯路，再次回到了正确的道路

上。但孔波雷统治了二十七年，布基纳法索仍然是最贫穷的国家。

也许桑卡拉的经历说明了非洲的悲剧所在：不管采取什么体制，都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如果采取资本主义，在普遍的“裙带”式腐败下所形成的权贵阶层，会将全国的资本留在自己手中，让绝大多数民众无法得益。如果利用集权打碎权贵的束缚，“国家”这个概念又会作为最大的权贵，控制人们的方方面面。

如果桑卡拉不死，也许经过多少年后，他的改革措施仍然不会有理想的结果，但是正因为他适时地死去，他给非洲留下的就只剩下对于美好生活的激励了。

2014年，孔波雷在人们的抗议声中下台。此后，布基纳法索进入了一段过渡时期，并预定于2015年进行一次公平公正的大选。但是，第二年布基纳法索再次发生了不流血政变。

这次发动政变的，是孔波雷曾扶持过的一个特殊部队。孔波雷在普通军队之外，建立了一个总统安全团。安全团的指挥官认为他们在新政府下受到了政治歧视，决定发动政变。

政变的军人很快发现，他们成了全国喊打的落水狗。虽然他们控制了过渡政府的所有高层官员，但是群众却对孔波雷独裁心有余悸，纷纷爆发了抗议。到最后，就连其他正规军队也选择不支持总统安全团，向首都集结施压。

政变军官迅速转变立场，结束了政变。2015年大选照常进行。这一次，人们选出了一个与军队没有联系的人当总统，布基纳法索进入了一段孔波雷离开后的政治蜜月期。

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听着旁边学校里琅琅的读书声，我时常在想，桑卡拉、尼雷尔这样的人到底是帮助还是阻挠了社会的发展。

按照经典的说法，他们实行的计划经济和政府强管制是必败无疑的

政策，只会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从而让社会步入停滞，甚至倒退。

但在非洲这个特殊的大陆，他们却又表现出极强的正面性。换句话说，在同样的国家，即便换上另外的人、另外的政策，恐怕也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后殖民地留下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人们的教育素质仍然太低，“裙带”式腐败问题几乎一直在困扰着非洲。

对于非洲来说，最要紧的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让更多的人读书识字，具备一定的技能。只有达到了这个条件，才能谈下一步的发展。桑卡拉、尼雷尔利用政权的力量强行推广教育，在短时期内提高了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或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

非洲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心太散。一个国家内部部族林立，人们缺乏国家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非洲国家很难一开始就实行完全的民族自决，那样就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这就要求政府比其他地方要更加集权一些，等到国家认同感建立起来，才可能推行更加民主的做法。但如何把握两者的过渡，又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桑卡拉与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用理想鼓舞人，很少动用暴力去惩罚普通民众。在他任内，布基纳法索没有发生过屠杀、监禁事件。正是因为他的谦逊与温和，布基纳法索才有了如今的性格。经过二十多年的颠簸之后，布基纳法索也来到了发展的大门口，人们信奉和平，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以独立自主的态度面对着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桑卡拉留下了一段特殊的红色传奇。

第八章
最残酷的兄弟战争

“这里二十年前才发生了大屠杀，难道如今真的变成了一片祥和？”在卢旺达城市吉塞尼，我带着疑惑向途中遇到的旅行伙伴提出这样的问题。

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事件。只有到了这里，才需要分清Massacre和Genocide这两个词的区别。所谓“Massacre”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大规模屠杀，只要发生了集体处决事件，死难者不管是几个人还是几十万人，都可以使用这个词。

Genocide却是一个新的词语，一战之后才被人们创造出来。Genocide是由希腊词首Geno（意思是种族）和拉丁词尾Cide（来自Caedere，意思是杀害）合成的，指的是以灭亡一个种族为目的的大屠杀。从规模上，Genocide通常也比Massacre更大，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死难人数超过600万人。

除了德国二战时期的所作所为之外，世界上只有少数屠杀事件符合Genocide的定义，不幸的是，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卢旺达的Genocide，是两个兄弟民族之间拼死的搏杀，极为惨烈。

屠杀刚结束二十年，现在的卢旺达却成了非洲发展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的经济增长迅速，政治和解进程也在稳步推进，人们认定它已经

获得了新生。

可是，我又总在疑惑，二十年的时间足够完成这个重大的转变吗？卢旺达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身处于一个小饭馆。饭馆里显得和平、安宁，几名黑人正在吃饭，三个中国人（就是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仿佛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气氛之中。

可是，不到半小时，当我们站起身准备付账时，一位黑人也站起来，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一把抢过一位四川小伙子手中的钞票，向外奔去——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了抢劫。

我们三人尾随着他，眼看就要抓住了。他突然把手一扬，钞票像树叶一样飞散。我们只好停下来捡地上的钞票，等我们捡完了，才发现他只是把小额的钞票扔了出来，大额的都被他带走了。

几个当地人围上来安慰我们："还好，你们只是丢了点钱。这是给你们提个醒，叫你们加强警惕。如果在离开卢旺达之前，你们提高了警惕没有发生其他意外，那这点钱就丢得值了。"

抢劫事件正好回答了我的疑问：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对于一个创伤如此严重的国家是远远不够的。

卢旺达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度之一。它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尸骸。

在旅行圣地基伍湖旁的小城基布耶，湖边的一座小山上风景如画，山顶有一座美丽的教堂建筑，会让游客以为来到了人间天堂。但在教堂前就竖着一座小型的纪念碑，碑旁放着几个人的头颅，告诉人们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大屠杀。在不远处，还有墓地，里面埋葬着更多的受难者。

事实上，全国的基督教堂差不多都发生过类似的悲剧。屠杀发生时，受害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往教堂跑，以为这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庇护他

们免遭于难，但许多人就在教堂被直接砍死。

在卢旺达中部，至今有一个教堂仍保持着屠杀的原貌，那些遇难者几乎铺满了教堂里、院子里的地面，如今早已变成了累累白骨。

但另一方面，人们的和解进程的确早已展开。由于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集体屠杀，这个民族里很大一部分平民（他们在社会中只是普通人）也都参与了屠杀。如果想要和解，就必须宽恕这些曾经的杀人者；如果不宽恕，就会演化成另一次种族灭绝。如何做这个工作，也显示了现任政府的苦心。

和解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还牵扯到种族屠杀最根本的原因：种族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不光是卢旺达，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冲突往往都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均匀。在非洲，资源争夺更是源于贫穷。让国家变得富强，把饼做大，是未来避免冲突的唯一方法。

卢旺达是怎样保证经济发展的呢？

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但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做。作为非洲兄弟战争的代表，我们有必要围绕着卢旺达和非洲的种族竞争问题认真剖析一下。

这就进入了非洲最难以弥合的一个话题：如果仅仅是政治问题，那么和平会来得更加容易，可一个非洲国家一旦由殖民主义带来严重的民族不平衡，就必然产生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残酷的兄弟战争是殖民主义留给非洲的最大的负面遗产。

卢旺达悲剧的起点在哪里呢？答案出乎意料：在索马里。

索马里：散架的国家

2014年的索马里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地方，而2014年的索马里兰却钞票遍地。

非洲之角的索马里曾经是一片商业文明普及的土地，却因为战乱走向了解体。当地人民无法生存时，选择了铤而走险的海盗营生。于是，到了现代文明的21世纪，索马里海盗成了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存在。

当世界各国疲于应付索马里海盗时，我却在2014年来到了一个名叫索马里兰的地方。这里曾经是索马里的一部分，现在是一个自我宣称独立但世界上普遍不承认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

走在大街上，人们首先会被堆积如山的钞票所吸引。当中国史书记载明朝初年的钞票（纸币）成灾时，曾经说，市场里堆满了成山的钞票，人们却连头也不回。我曾经以为这样的说法只是夸张，到了索马里兰却发现它竟真实存在。

在索马里兰“首都”哈尔格萨的中心市场以及附近的大街上，经常能在路边看到大堆的钞票。这里的人喜欢把当地的纸币一沓一沓垒起来，有的垒成正方体，有的垒成金字塔形。大的有一米见方，小的也有几十厘米高。

在中心市场的核心区域，这样的钞票堆竟然相邻着有十多个，人们甚至互相攀比，以堆大为荣。

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路边也总是会碰到这样的换钱商。他们显得很随意，总是愿意向好奇的客人展示。本地人却早已见怪不怪，连

头都不回。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属于索马里。人们敢于把钞票堆在公众的视线之下，说明这里的安全状况很不错。但在外界看来，索马里兰与索马里一样，是极其危险的地方，是海盗所在地。

索马里兰之所以会出现钞票如山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钞票有两个特点：第一，索马里兰钞票的汇率很低，1美元可以轻松地兑换7000多索马里兰先令；第二，索马里兰钞票没有大面值的货币，最大面值是5000先令，但是市面上极其罕见，人们反而不敢使用，市面上铺天盖地的是500先令和1000先令两种面值的。其中1000先令也只不过相当于人民币不到1元钱。

这意味着，在中国，人们只用携带一张张粉红色钞票，但在索马里兰，必须携带如同砖头一样的一大摞钞票。如果将市场里最大换钱商的所有索马里兰先令兑换成美元，也许那一个巨大的金字塔换到的美元，拿在手里就可以轻松带走。

由于携带纸币太不方便，街头的小商贩们往往得专门预备一个车子放钱。比如，卖牛奶的小商人带着一小桶牛奶，在牛奶桶旁边却需要放一个很大的带着防护网的手推车，这个手推车里全是钱。

虽然索马里兰的金融秩序很不规范，人们生活得也很穷苦，但几乎所有索马里兰人都对我表示他们对生活很满意，原因在于：他们至少维持了和平与安定，不会因为战争而死去。他们东南边的索马里，仍然处于战争和恐怖袭击的状态中，人们随时会死。

在这里，我询问了几个人，关于索马里兰与索马里为什么会分裂的问题。

一位年长者告诉我：“索马里兰与索马里其实是一家，索马里兰之所以要分开，是因为我们无力保持整个索马里的和平，只好先自救，在索马里兰区域内保持稳定。”

既然是自救，那么索马里恢复稳定后，索马里兰还会回归吗？

这个问题由青年人来回答，但可惜的是，他们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去。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分裂的种子从西方入侵的那一天起就已经种下了。

在西方人入侵之前，索马里的政治状态是一种松散的部落制。这里的人们将自己称为索马里人，他们共同位于非洲之角，信奉伊斯兰教，与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相邻。他们的南方，是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以桑给巴尔岛为中心的穆斯林苏丹国。

在中国人的航海记事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木骨都束的地方，它就是现在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说明摩加迪沙在很早以前，就是“中国南方—太平洋—印度洋—印度—阿拉伯—红海—东非”这个海上贸易链条的一部分。

索马里虽然是松散的部落制，但在部落之上又组成了五个大的部族，它们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外来干扰，也许非洲之角的伊斯兰部族会向着逐渐凝聚成一个政治实体的目标而演进。

这个演进过程却因为欧洲人的到来而被打断了。由于索马里海岸的重要性，索马里地区被五个政治实体分割了。这五个政治实体是根据欧洲各国的占领情况划分的，与原来的五个部族并不重合。于是，大索马里地区碎片化了。

在北面海岸，现在的吉布提地区，被法国占领后称为法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的东面是英属索马里，也就是现在的索马里兰；英属索马里的东南，则是意属索马里，也就是现在的索马里。除此之外，索马里人还居住在更靠南的海岸部分，这一部分已经被英国人并入到了肯尼亚殖民地。而在不靠海的高原东部，有一块叫欧加登的地区，这里在历史上

也曾是索马里人的居住地，却被并入到了埃塞俄比亚。

二战之后，英国人将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索马里。而剩下的三块，法属索马里成了独立国家吉布提，欧加登和南部则分别属于埃塞俄比亚和新独立的肯尼亚。

索马里成立后，立刻宣称不承认现有国界，要组织军队武力夺回其余三个部分。这种宣称将索马里变成了世界的对立面。比如，与吉布提发生争端，立刻将法国人变成了敌人；与肯尼亚的领土争议，让英国人感到不舒服；与埃塞俄比亚争夺欧加登，令其余的非洲国家与之疏远。

于是西方都不愿意帮助索马里发展军事，反而是苏联人得到了机会。苏联以红海海岸的驻军权作为对索马里的军事援助。索马里缺乏的是耕地，却从来不缺乏海岸，也不会吝啬让别人使用一下。

苏联当初使用的海港恰好位于现在的索马里兰，名叫柏培拉，这里是荒漠与海洋之间的一座小城，即便站在海边，满眼也是荒芜的沙漠景象。

2014年，柏培拉已经成了索马里兰的新希望。据说，中国人也参与了海港的建设，让索马里兰从这里进口海外物资。但即便如此，当地也是以低矮的平房为主。全城大都是平房，只有几栋连体的苏式小楼，有着长长的走廊和低矮的房间，表明这里曾经被苏联援助过。

在苏联的支持下，影响现代索马里最深刻的人物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在政变中上台了。随后，西亚德展开了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准备收复旧土。

但在决定收复另外三块土地时，他却做错了一件事：他首先选择了埃塞俄比亚，认为这个国家没有西方后台，更容易对付。

西亚德没有想到，1974年，埃塞俄比亚通过政变推翻了皇帝，随后建立了一个亲苏的政权。苏联不愿看到两个亲苏政权打仗，对索马里的

支持程度也就下降了。

1977年，西亚德发动了欧加登战争，企图夺回埃塞俄比亚控制的欧加登地区。其实，在1964年，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冲突，以索马里战败而告终。这一次，西亚德抓住了埃塞俄比亚国内不稳的机会。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门格斯图恰好受北方叛乱的困扰，政权看上去摇摇欲坠，西亚德认为门格斯图无力抵御索马里的武力进攻。结果却与西亚德预测的相反，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亚竟然打败了索马里。

索马里的战败成了其解体的导火索，但解体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痛苦的。由于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西亚德转而投靠美国。于是他又将柏培拉港口从苏联手里夺过来，交给美国使用。但此时叛乱已经四起，不仅本国的部族叛乱，就连埃塞俄比亚也支持了一支叛军。

为了杜绝叛乱分子在境外集结，西亚德只好又和埃塞俄比亚合作，双方互不支持对方的叛乱分子。这次合作让门格斯图可以专心对付北部的叛乱，也让西亚德腾出手来对付本国的反叛部落。

不承想与埃塞俄比亚的合作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抗。在大部分索马里人看来，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才是永恒的敌人，结果更多的人加入了反叛的队伍。西亚德的控制区越来越狭小。时间长了，西方国家不敢再支持这样一个人人喊打的政权了。

1991年，西亚德倒台。他倒台时，索马里已经从一个文明时期退化到了蛮荒时代。人们吃不饱饭，也无法种地，贸易也停止了。

西亚德倒台并没有给索马里带来好日子，反而更加乱套了。由于丧失了中央政府，索马里变成了一个军阀遍地的国家。国际上还认为它是一个国家，但在国内，人们早已看不出一个国家的迹象。它再次变成了松散的部落体，今天你我联合，明天你我打仗。国际上花了三十多年，也没有将索马里重新捏合成一个国家。

在索马里一地碎片的基础上，诞生了两个更加稳定的政治实体。其中之一，就是位于西北部的索马里兰。由于这里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人们更加懂得如何组织政府，在当地武装的领导下宣布建国。但国际上仍然尊重索马里的主权，不承认索马里兰的地位。

于是，索马里兰作为不是国家的“国家”而存在着。当我去索马里兰时，必须先到埃塞俄比亚办理签证。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是少数承认它的国家。

除了索马里兰，紧挨着它的东北地区也成立了一个叫彭特兰的政治实体。这个实体并没有宣布独立，却实现了稳定和自治。

彭特兰再往南，则是一片战乱的军阀属地，而最混乱的则是首都摩加迪沙。2017年，当我再次在非洲旅行时，摩加迪沙发生了数次恐怖袭击，让这个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索马里也是美国人的伤心之地。

2001年，美国拍摄了一部电影《黑鹰坠落》，反映的就是维和部队在索马里执行任务的情况。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发生在1993年10月3日。

在“黑鹰”坠落发生的前两年，随着西亚德的倒台，索马里陷入了一片混战。在首都摩加迪沙以及周围地区，战争尤为惨烈，因为战争带来的歉收又引起了大饥荒。联合国也介入进来，组织了对索马里的救助。由于大量的物资被部落武装倒卖，联合国又派出了50人的观察团去监督救灾情况。

这支观察团虽然竭尽全力，仍然不足以保障救灾的顺利进行。联合国决定派出一支维和部队，这支维和部队的主力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的努力下，救灾物资较为顺利地发放到灾民手里，索马里的饥荒得到了控制。接下来，就到了恢复索马里民主政治的时候了。

但联合国显然低估了事情的难度。在救灾阶段，由于所有的部落武

装都需要物资，他们倾向于配合联合国的行动。美国人在此时也采取了对部落武装放纵的态度，只要不影响物资发放，就不去收缴他们的武器，任由他们自由行动。

但到了重建政府阶段，却意味着要解除部落武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中央政府武装部队。到这时，所有的部落都感到不满意了。

最不满意的是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他认为联合国扶持的武装是针对他的。他不仅不肯缴械，还制造了不少对抗，双方的冲突越来越大。

由于艾迪德控制的电台不断地播放反对联合国的宣传，1993年6月5日，一支巴基斯坦部队被派去关闭这个电台。不想艾迪德却命令士兵投入战斗。这次战斗造成了巴基斯坦士兵24死57伤，另外还有1名意大利士兵和3名美国士兵受伤。

这次事件后，美国人主导的联合国军认定艾迪德是和平的巨大障碍，试图逮捕他，但几次逮捕或者清除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不仅没有抓到正确的人，还造成了不少平民的伤亡。此时索马里人对联合国部队的态度再也不是支持或者感激了，民间的敌对情绪也在部落的煽动下越来越盛。

1993年10月3日，美军又等到了机会，他们试图抓捕艾迪德的2名亲信，地点就在摩加迪沙市内。执行任务的共有160名士兵，16架直升机，其中8架是著名的“黑鹰”直升机，而另外8架是“小鸟”直升机，还有12辆军车（其中9辆是悍马）。

军事行动本来预计1个小时完成，但从一开始就碰到了意外。按照计划，直升机先行抵达现场，由直升机上的士兵执行逮捕任务，之后军车装载的士兵赶到，将人员带走。

但直升机到达现场后，却由于烟尘太大，士兵降落过程缓慢，耽误

了时间。由于是在白天行动，直升机吸引了大量的索马里人，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向目标地点跑去，并在路上设置障碍。地面部队虽然只晚了数分钟赶到，但由于路障的原因，在撤离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在行动开始40分钟后，更大的不幸传来：美军的一架“黑鹰”直升机被地面的RPG（火箭推进式榴弹）武器击中坠落。

在这次行动一个星期之前，美军已经被RPG击中过一架“黑鹰”，但他们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仍然让“黑鹰”大白天在低空盘旋，导致又损失一架。

“黑鹰”坠落后，其他直升机立刻展开了对伤员的救助行动。20分钟后，救助仍在进行，突然间，又一架“黑鹰”被击中坠落。

其余的人员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武装分子逼入了巷战之中，他们占据了几处房子，一边还击一边等待救援。四周全是敌人，又到了黑夜，美军就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坚持了15个小时，才脱离了危险。

整个事件中，19名美军士兵死亡，73人受伤，1人被俘，此外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各有1人死亡。

对美国人来说，更可怕的不是人死了，而是当地人对待死者的方式。美国人撤离后，当地人拖着2具没有被带走的美军尸体穿过大街小巷，狂欢胜利。这样的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终于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

美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了这个不知名的穷乡僻壤，投入这么多士兵，还冒着这么大的危险。美国总统克林顿最终做出了撤军的决定。

美国人撤走后，索马里继续成为一团泥沼。只是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插手，他们宁愿让这个地方烂下去。当所有的人都打腻了，也许终究会有和平的那一天。

美国人没有抓到艾迪德，但仅仅三年后他就在内战中死于非命。他

只不过是内战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他的死亡也并不足以让国家走向和平。索马里反而更加分裂。

索马里人也并非对世界毫无影响。随着战乱的持续，人们只好靠古老的营生来赚钱，从索马里出发的海盗几乎成了世界各国船只的噩梦。

索马里对世界和平的另一个影响是，在几年内，维和这个光荣的任务突然间不受待见了。原本对维和最卖力气的美国人首先开始反思，认为并不值得用美国人的命去换取其他国家的和平。更何况，维和部队并不见得受当地人的欢迎，反而成了受攻击的对象。美国人放弃之后，其余国家也不再出力。

两年后，同样是非洲的小国卢旺达发生冲突时，所有的国家都奉行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作为一个偏远的小国，卢旺达在世界的忽略中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

卢旺达：兄弟民族的冤冤相报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一个地方，所有来卢旺达的游客都必然会去拜访。

这个地方位于首都郊区的一座小山上，远远地对着市中心的高楼群，这些高楼大都建于1994年之后。

小山上绿树成荫，种植了许多花卉，显得幽静和平。但安宁之下，墙上的文字却提醒游客，这里是大屠杀遇难者埋骨的所在。

山头上分布着许多集体墓穴，大多数墓穴都覆盖着石板或者水泥，只有少数的墓穴是用玻璃罩住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墓穴内部黑色的布盖。不时有游人带来整束的鲜花放在墓穴旁边。

在墓园的一面墙上，刻着几排遇难者的名字。按照设计的本意，是要把所有死难者的姓名都刻上。但这项工程并没有完成，大概死亡人数太多，搜集人名的工作不易进行。

墓园中埋葬的主要是从首都附近寻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其数目超过了10万。同等规模的墓地在全国还有六处，至于小型的丛葬墓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知道屠杀中死亡的具体人数，但普遍估计死亡人数在80万上下。

墓园里有个关于大屠杀的纪念馆，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不让拍照。里面搜集了许多照片、遗物，讲解着事情的来龙去脉。纪念馆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和解的产物，它的资料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是：杀人者与被杀者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是兄弟，而不是敌人。

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事后粉饰的因素，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两个处于分化初期的族群，还没有成为两个民族，但又有一定的隔离。

人们常常把民族想象成静态的群体，但其实民族是动态的。

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分化的历史。也许几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群体，到了后来，由于他们分布的地区不同，产生了地理上的隔离。这种隔离又造成了各自内部封闭的婚姻，从而有了少量的遗传独特性，加上封闭产生的文化差异，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另外，同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如果中间缺乏婚姻流动性，也会形成一定的差异，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民族。

这个过程是缓慢进行的，很难说哪儿是起点，哪儿是终点。即便进程开始，也很难说结果会怎样。比如在印度，阶层隔离已经数千年，但是上层的婆罗门和下层的首陀罗仍然是一个民族。蒙古人分散在整个欧亚大陆，在阿富汗的蒙古人就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哈扎拉族，但在中国云南的蒙古人还叫蒙古人。云南蒙古人与北方蒙古人的差异，也许并不比哈扎拉人与北方蒙古人小，只是因为习惯问题，人们把哈扎拉人当成外族，却把云南蒙古人当作本族。

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就可能是处于分化初期的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先都是班图人。当班图人到达这个地方后，在习俗上开始和其他地方的班图人有了分化。在这里，统治阶层之间相互通婚，形成了图西人群体，而被统治阶层则被称为胡图人。充其量来看，图西人就如同西方世界内部通婚的贵族和国王阶层，而胡图人就是普通的民众。西方贵族虽然骄傲，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属于一个与普通民众不同的民族。

但西方人来到卢旺达后，却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认为图西人是从北方来的先进民族的后代，而胡图人则是更加落后的当地人的群体。这并不是事实，但当这种理论被灌输给当地人之后，民族的界限就在无意

间形成了。

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理论，也许两者并不会完全封闭，从而可以像印度那样长期共存，有一定的隔离，却又并非完全独立。

西方人到来之前，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的。人们将某家人称为胡图人，而将另一家人称为图西人。但也许过些年，随着社会地位的升降，这种称谓就会改变。但西方人到来后，为了区分民族，采取了更加精确的记录系统。比如，比利时要求他们在身份证上都要写上每个人的民族，一旦身份证件上写上了民族，那么这个人就再也摘不掉被强加的身份了。

20世纪，经过了纳粹德国的人种论，西方已经从根子上开始否认人种有优劣之分，但他们在非洲种下的理论却早已生根发芽，引起了连锁反应。

卢旺达和布隆迪本来是德国的属国，德国在一战战败后，比利时接管了这两个地区。作为保护国，它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国王。

卢旺达与布隆迪命运的不同，源于两个地区的国王对待民族的不同态度。总结起来，就是越开明的国王带来的灾难越大。

卢旺达国王穆塔拉三世（1931年到1959年在位）是一个开明的国王，他是卢旺达第一个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的国王。由于在国王统治的早期卢旺达遭受了巨大的饥荒，痛定思痛之后，他进行了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胡图人更多的政治权利。

如果这个过程能够缓慢地顺利进行，那么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胡图人的政治地位可能会逐渐得到强化，并最终与图西人拉平。但胡图人却等不及了，由于他们人数更多，占了80%以上，便寄希望于通过现代的投票制度来直接获取统治地位。

比利时人在统治初期依靠国王进行统治。到了末期，他们认识到胡

图人的政治意识已经兴起，且胡图人又是大多数，于是立刻转而支持起胡图人来。这一系列的改变最终颠覆了图西人的统治。

1961年，卢旺达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废除了国王，实行民主制。在一个文盲占据了领导层的国家，这等于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判处所有图西人死刑或者流放。

从1959年开始，随着胡图人得势已成定局，图西人开始了大逃亡。他们逃向了与卢旺达接壤的四个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布隆迪和比属刚果。到了1963年，一小支图西武装试图打回卢旺达，胡图人开始了对图西人的第一次系统迫害，这次迫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也是图西人的第一次受难。

而在布隆迪，政治上却要保守得多，统治的图西人时时刻刻以邻国卢旺达为警钟，意识到如果放松统治，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布隆迪的图西人由于没有放松，胡图人一直是被统治阶层。到了独立后，国家先是保持了王国体制，后来则由图西人发动了政变，废除了王国制度，建立了由图西人控制的共和制。

1972年，布隆迪的胡图人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但被镇压了。在镇压过程中，大批的胡图人被图西人控制的军队杀死。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可能在数万到20万之间。

布隆迪屠杀是这两个小国悲剧性种族屠杀的第一幕，被人们称为“布隆迪第一次种族灭绝事件”。屠杀事件发生后，虽然图西人保持了政权，但在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压力下，图西人的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固。

20世纪80年代，对布隆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上台了。皮埃尔·布约亚是军人出身，依靠政变上台。他敏锐地感觉到图西人无法再这样维持统治了，必须做出改变，要在政治结构上反映全国的人口比例。

于是，布约亚大胆地推出了改革举措，决定修改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在他的努力下，1993年，一名胡图人通过竞选成了总统，并组织了一个胡图人和图西人共存的领导班子。布约亚功成身退，但这只是他第一次离开政治舞台。

事实证明，政治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胡图族总统被极端图西人刺杀了，这导致了布隆迪的又一次种族冲突。这一次，是以胡图人屠杀图西人为主，也包括图西人对胡图人的反击。1994年，布隆迪胡图族的第二位总统又死于卢旺达灾难，于是屠杀继续。这一次的屠杀被称为“布隆迪第二次种族灭绝事件”。

虽然也有数万人死亡，但布隆迪第二次种族灭绝与同时期的卢旺达事件比起来，仍然得不到世界的关注。同样是1994年，卢旺达事件终于让世界开始正视起这两个民族数百年的恩怨。

在卢旺达，从1973年开始，就一直是胡图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将军执政。将军依靠政变上台，推翻了另一位胡图人统治者卡伊班达。

哈比亚利马纳在政治上依靠法国，经济上依靠外援，对内则是完全的一党制。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网络状社会控制系统，将每个人都纳入党的掌握之中。这个唯一的党叫全国发展革命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for Development，简称NRMD），掌握着从人的生老病死到选举、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统治下，图西人一直是低一等的存在，不仅受到压迫，还由于党的强控制力，变得无所遁形，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

但这样一个统治者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追捧。最支持卢旺达政府的是法国人。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存在着竞争，卢旺达原本是比利时的被保护国，说的是法语，被法国当作了对抗英国的桥头堡。东非大部分国家都说英语，找到一个同盟并不容易，所以法国放纵独裁政府，并投入

了大量的金钱来维持哈比亚利马纳的统治。

由于得到了高额的援助，卢旺达的经济显得一枝独秀，人口增长迅速。但这样的好日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结束。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则是卢旺达赖以出口的咖啡突然间价格大幅下跌，咖啡农赚不到钱了。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政治上的，这时国际上恰逢一个自由化的时代。随着东欧剧变，国际上出现了一种独裁不再被容忍，并强迫独裁国家转型的潮流。

在多方的压迫下，哈比亚利马纳做了相互矛盾的两件事：第一，同意开放党禁，进行整治改革；第二，由于感到地位不稳，他决定祭出永远有效的大旗——种族主义，宣传图西人的阴谋。

在哈比亚利马纳的鼓动下，“胡图力量”出现了。“胡图力量”是胡图人中的激进派组织，它的唯一诉求就是消灭图西人，防止图西人重新掌权。

这个组织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同时拥有广播、报纸，它们开动一切宣传力量煽动胡图人的恐惧和仇恨情绪。最典型的是，它们的一份杂志发出了所谓的“胡图十诫”。

即便现在“胡图十诫”已经成了禁忌，但偶然遇到年纪稍大的卢旺达人，只要打开话匣子，仍然能够听他们背出其中的一两条。由于当时十诫是被当作真理灌输的，几乎涉及从人际关系到经济、军事、安全乃至政治的各个方面，短短的二十年根本不可能完全将它们从人们的脑海中抹掉。

“胡图力量”大肆活动的同时，一部分图西人也帮了他们的忙。这些图西人来自邻国乌干达。

在乌干达的穆塞韦尼革命时期，有许多流亡的卢旺达图西人曾经加入了穆塞韦尼的起义军。当穆塞韦尼成为总统后，这些图西人受到了优待。但时间长了，乌干达人和卢旺达人发生了冲突，这让军队中一部分

图西族将领意识到，乌干达毕竟不是家乡，只有回到家乡，老死在家乡，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于是，从乌干达南部的森林中，走出了一支图西族的武装，号称“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简称RPF）。他们越过与卢旺达的边界，试图趁卢旺达经济不好、国内动荡的时候抢夺政权。

这支武装本来会成为卢旺达胡图政权的重大威胁，但这时法国人出手了，他们和比利时人、扎伊尔人组成了联军帮助哈比亚利马纳守住了政权，将图西族武装赶到了卢旺达北部的丛林之中。

在卢旺达的北部城市鲁亨盖里以西，有一个著名的火山群，主峰卡里辛比达到了4500米。即便是夏天，山顶上都常常有积雪。火山之下是茂密的热带丛林，这里是著名的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游击队躲在这里，法国人无法进入进行清缴，才让他们得以保存了实力。

图西族游击队RPF的出现，让“胡图力量”等组织更加大肆宣传图西人的威胁。也就在这时，他们开始准备对国内的图西人采取暴力。

图西族游击队总是时断时续地进攻胡图政权。国内的民主进程又迫使总统做出更多的让步。国内的民主反对派又和图西族游击队取得联系，试图建立更广泛的联合政府。国际社会也给哈比亚利马纳施加压力，使得总统与反对武装必须做出妥协。

1993年，各方终于在坦桑尼亚城市阿鲁沙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议》。即便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并没有准备履行这个协议，但他仍然被极端胡图人视为种族的背叛者。

与此同时，邻国布隆迪的第一任胡图族总统被杀，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更让“胡图力量”认为是时候行动了。

1993年，屠杀图西人已经成了一种阳谋。几乎每一个人都预料到这样的屠杀将会发生。“胡图力量”公开呼吁杀人，胡图人开始有计划地下

发砍刀，并统计生活在周围的图西人人数。

基于《阿鲁沙和平协议》，联合国决定在卢旺达驻扎一支维和部队。但这时，索马里维和事件的恶果出现了，美国人刚刚经历过摩加迪沙惨案，对派兵不感兴趣。其他国家也认为卢旺达是个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小国，不愿意出兵。

更麻烦的是法国人对联合国事务的干扰。即便到了今天，卢旺达虽然是法语国家，但几乎所有的民众都对法国人充满了愤恨。在首都基加利，一位商店店主告诉我："法国人是非洲最大的敌人，凡是他们参与的事情，都不会有和平。"

卢旺达人之所以如此怨恨法国，就源于在法国大屠杀中参与的罪恶。除了出兵帮助胡图政权镇压图西人之外，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法国还在联合国负责说服其他国家不要出兵。它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让其他国家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埃及人加利同样不想管卢旺达的事，他也是胡图人的支持者，甚至在做埃及副外长时，曾经与卢旺达现政府存在利益关系。一般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可以任两届，而加利是罕见的只任了一届的秘书长，也是唯一一个被安理会否决连任两届的秘书长。

联合国经过东拼西凑，最终派来了一支1000多人且毫无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主要由比利时人和孟加拉人组成，领头人是加拿大人罗密欧·安东尼厄斯·达莱尔。

即便这样，这支部队也数次受到警告。达莱尔更是直接警告联合国，屠杀已经迫在眉睫。他不断地请求增兵以维持秩序，但他的要求被忽视了，没有更多的士兵被派来。

就在联合国部队一筹莫展之际，情况却突然间恶化：1994年4月6日，在坦桑尼亚参加完会议后，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胡图族）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胡图族）乘坐同一架飞机，同机上还有卢

旺达的7名政府高官。飞机在回到卢旺达上空时，突然一枚导弹从机场军营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射出来，将飞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这件事造成了布隆迪冲突再起，而更重要的则是这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信号。

这枚导弹是谁发射的，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事后看，可能是对于哈比亚利马纳缓和政策不满的极端胡图组织。但在事件刚发生时，不管是胡图人，还是法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是北部的图西族游击队干的。

从这一天开始，卢旺达被淹没在了血泊中。几乎所有的胡图人都成了谋杀图西人的罪犯或者帮凶。他们手持砍刀，有计划地将所有遇到的图西人全部杀害，试图将这个兄弟民族从地球上抹去。

除了杀害图西人，他们还杀害温和的胡图人。当时国家的总理是一位胡图族女性，当她试图恢复国家秩序时，也一并遭到杀害。联合国部队派了10名比利时士兵去保护她，这10名士兵也遭到杀害。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图西人最需要保护的时候，联合国却突然决定撤兵。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士兵的死亡，让比利时政府决定撤兵了。随着比利时的撤兵，联合国认定无法完成维和任务，决定将维和部队全部撤出。

达莱尔徒劳地想留住自己的部队。但联合国在法国和秘书长的影响下，几乎没有人相信这场大屠杀的发生。于是在最被需要的时候，联合国维和部队走了。

世界只是装作不相信罢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大屠杀。最先知道的是法国，就在屠杀之初，法国人立刻派部队空降卢旺达，将法国侨民撤走。与法国人一块儿撤走的还有不少胡图极端分子，他们跑到法国后继续充当座上宾。

西方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西方人撤离后，大批依托于西方人的图

西人都遭到杀害。在法国使馆里也有几名图西族工作人员，他们恳求法国兵将他们带走，但还是被法国人扔下，全部遭到杀害。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一个著名的饭店叫千山饭店。到达基加利后，我的同伴一定要去拜访这家饭店。美国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卢旺达饭店》，原型就是这里。

在屠杀发生时，千山饭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一共保护了1268名避难者，让他们活了下来。他是一位娶了图西女人的胡图男人。

这家饭店极其豪华，有一个庞大的院子，喷水池、高档餐厅应有尽有，是外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屠杀发生时，由于外国人大都在这儿居住，联合国军也驻扎了士兵，许多图西人跑到这里来避难。

但不久，外国人就全撤离了。各国大使馆在撤侨时规定，不允许带走一个图西人。到这时，饭店里剩下的就只是灾民和维和士兵了。

接着，维和士兵也在联合国的命令下撤走了。卢旺达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灾民聚集点，它们大都在军营或者教堂里。但随着维和士兵和外国人的撤走，胡图人立刻进入聚居点，将避难者屠杀干净。那么，千山饭店的避难者如何避免了死亡的命运呢？

路斯沙巴吉那通过贿赂，以及与杀人者的私人关系，加上不断地隐匿避难者，一天一天拖延，直到北方的军队打过来，才让避难者找到机会逃走。

虽然救出了妻子和孩子，但路斯沙巴吉那的岳父一家却惨遭屠戮。妻子的父母、兄弟、外甥、外甥女都遭到了杀害。他的岳父甚至要付钱让杀人者快点把他杀死。如果不付钱，杀人者就先砍掉一只手，然后离开。等受害者受够了罪，再来砍另一只手。如此往复，直到受害者最终死亡。

在联合国部队中，只有负责人达莱尔不死心，他继续呼吁联合国进

行干预。经过他的无数次争取，联合国终于再次决定派兵。但讽刺的是，联合国却发现，虽然通过了派兵决议，却没有国家愿意出兵。决议以无法执行而告终。

图西人受难的日子持续了一百天，才由于北方游击队打过来而告终。

胡图人屠杀图西人时，他们已经无力抵抗北方游击队的进攻。指挥北方游击队的就是后来的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卡加梅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极其复杂。一方面，“胡图力量”还在南方屠杀图西人，他不得不尽快进军，避免图西人被杀绝；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不指责杀人犯，以法国为首的集团反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杀人犯，指责是卡加梅的进攻造成了局势的混乱，辩称卢旺达没有大屠杀，只有战争。

当卡加梅的进攻已经注定胡图人的倒台时，“胡图力量”的主将们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与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胡图族的平民们。此刻的他们手上都沾上了鲜血，害怕图西武装回来后报复。他们将家中的东西席卷一空，开始了逃亡生涯。

在卢旺达与刚果（金）交界的基伍湖北岸，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吉塞尼。在非洲，虽然有无数体量巨大的湖泊，但最漂亮的湖非基伍湖莫属。这个湖的面积不大，只有2700平方千米，与中国第三大湖洞庭湖相当。但由于它是一个高原断陷湖，比其他的湖水更清澈，也更深。在阳光的照射下，它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在基伍湖湖边，有非洲最好的湖岸沙滩。从沙滩向东走，就是现在的刚果（金）的土地。虽然现在看上去如此安静，但在二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兵荒马乱之地。胡图人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地点逃往不远处的扎伊尔。

屠杀开始两个多月后，法国人终于行动了。他们以“人道主义”为借

口，向卢旺达出兵。此刻，联合国正愁没有国家愿意出兵，便做了个顺水人情，给法国军队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但法国出兵，却是去解救胡图族的杀人犯。

这次出兵将法国钉在了非洲的耻辱柱上，也让卢旺达人一提到法国，就切齿不已。法国人的军队从扎伊尔进入卢旺达，一路上，胡图人的逃难者跟随着法国人，挥舞着大小砍刀。在法国军队经过的路上，到处堆满了图西人的尸体。

法国人的到来只是延迟了卡加梅的进攻，却无法阻挡胡图人的失败。屠杀开始一百天后，1994年7月18日，图西人武装占领了卢旺达全境。此时已经有70%以上的图西人被杀死，数量据估计在80万以上。

这次事件中联合国表现迟缓消极。当所有人都期盼联合国出面时，它却毫无作为，甚至撤走了维和部队。当已经不再需要联合国时，它却派来了法国人帮助杀人者。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因为自身的无能，再加上与美国关系闹僵，导致无法连任第二届。作出帮助杀人犯决策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95年下台，但作为欧洲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人能够审判他的罪行，他于1996年死于癌症。

2018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谈到国际法庭时，仍然耿耿于怀地说："国际法庭从来就没有公平，因为它只审判小国弱国的人，对于欧洲的罪犯它永远是无视的。"

卡加梅取得政权后，宣布加入英联邦，向英国靠拢，坚决与法国人划清界限。当然，他还要对屠杀者进行报复，这个报复没有落在参与了屠杀的普通胡图人头上，而是落在了邻国扎伊尔的头上。

在布隆迪，各种过渡政府如同走马灯般轮替，却都无力恢复国家秩序。这时，又是布约亚出手了，他再次通过政变上了台。

由于他是图西人，刚发动政变时，世界感到一阵震惊，害怕布隆迪会再次陷入大屠杀。但随后他们的心放了下来。布约亚第二次执政持续了七年（1996年到2003年），直到再次恢复了秩序与和平，才毫不犹豫地辞去了总统职位。

布约亚选择了一位胡图人副总统共同执政，并恢复了民选政治，促成了民族团结。他辞职两年后，一位父亲是胡图人、母亲是图西人的政治家当选了总统，布隆迪的政治和解进程持续了下去。

但如果认为，布隆迪国内已经走向了稳定，那么这种乐观也许太早。2014年我经过布隆迪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虽然布隆迪采用了民主政治的形式，但人们对于政府和军队的不信任仍然很强。社会秩序也很糟糕，抢劫时有发生。

到了2016年，布隆迪的局势再次恶化。这一次，是因为2005年选出的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不肯下台，寻求第三任期导致的。局势骚动让数十万人逃离，数百人被杀。恩库伦齐扎在争议选举中连任。从表面上看，布隆迪已经从种族冲突变成了争取民主的斗争，但无法判断这种转化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20世纪90年代的大屠杀已经让布隆迪警醒，这也许只是一次长暂停，某一天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会以暴力的形式再次释放。

蒙博托和卡比拉

对所有想去非洲的人来说，刚果（金）都是一个丛林式的存在。这个国家位于非洲的中部偏南，在大湖区的西侧，如同一张巨大的人脸将非洲分隔开来。

这里还是非洲最大的热带丛林区域。当人们提到非洲时，首先想到的是沙漠和草原，但这个面积比中国面积大三倍的大洲却是如此多样，并不乏如同南美洲那样的丛林地带。赤道在刚果（金）、乌干达、肯尼亚一带穿过。这些国家中，其余的地方都处于东非高原上。由于海拔高，气候温和，即便站在赤道上，也感受不到热浪袭来。只有西部的刚果（金）由于地势降低，形成了热带气候。这里丛林密布，水网交织，一直是外来人口的禁区。直到19世纪末，才由美国的探险家斯坦利探出了究竟，并帮比利时把这块区域收入囊中。

比利时人撤退后，比属刚果经过了短暂的卢蒙巴时代，在混乱中落入独裁者蒙博托之手。蒙博托的统治从1965年持续到1997年才告结束，他将国名从刚果改为了扎伊尔。因此，这个时代也被称为“扎伊尔时代”。

在所有非洲国家中，由于整合时间最短，地域最多样化，扎伊尔属于政治最不完善的国家之一。比利时人进入该地区之前，这里一直是比较松散的部落，没有形成统一中央政府的传统。比利时人靠强权将这个庞大的区域捏合在了一起，当他们离开后，这片土地的离心力远大于向心力。只有在蒙博托的铁腕之下，扎伊尔看上去才更像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大片松散的村庄。

但统一的代价是高昂的。蒙博托上台后以强力进行维持，不管是军

阀还是政客，只要不肯听从他的号令，就会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政治控制完成后，接着是经济控制。扎伊尔是个矿产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在蒙博托的努力下，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但奇怪的是，蒙博托执政之初，强权所带来的秩序感却是金光闪闪的。当扎伊尔不再分裂和打仗，人们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扎伊尔的经济立刻开始好转。

国际上似乎也达成了共识，认为扎伊尔的强权好过分裂。既然这里的人教育水平如此之低、分裂倾向如此之强，看来只有强权能够防止扎伊尔崩溃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蒙博托如鱼得水，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讨好般地提供帮助。他是法国人的盟友，也是美国总统的座上宾，同时在苏联也有不少朋友。当然，这些国家一方面是希望他维持地区稳定，因为扎伊尔太大了，只要它一乱套，整个非洲中部都会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则是盯上了扎伊尔丰富的矿产资源。蒙博托对此也心知肚明，将资源牢牢抓在手中。

蜜月期过后，问题接踵而至。虽然稳定与和平能够保证经济发展，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制度的约束就成了主要问题，从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到了乱套的时候了。

蒙博托在维持稳定时需要大量经费，而这些经费浪费严重，大部分都流入了围绕着他形成的小的利益集团。

小集团的抽血、政府的浪费，很快让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对于民间经济的强控制，也进一步造成了民间的萧条。蒙博托统治后期，扎伊尔又回到了贫困状态，即便有工作的人，也因为通货膨胀变成了赤贫。只有围绕着蒙博托的小集团发了大财，他们将外汇转移到国外去，惠及不到本国人。小集团的成员也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他们的命运完全看蒙博托的喜怒哀乐。

即便这时，世界上主要大国的政要仍然是蒙博托的朋友。扎伊尔政

治越腐败，社会越不稳定，这些国家就越担心他一旦垮台，社会会立刻乱套，每个国家的利益都要受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非洲独裁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它们被要求改革制度，走向民主。但扎伊尔却没有受到什么压力，蒙博托继续在他的帝国里花天酒地。

如果不是蒙博托错误地参与了一场争斗，那么他很可能会一直当总统到死，而不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踏上流亡的生涯。这场争斗就是邻国卢旺达的内战。

在卢旺达内战中，扎伊尔和法国人选择了同一条战线，即支持胡图族人。由于扎伊尔是说法语的国家，蒙博托一直把自己当作法语世界对抗英语世界的急先锋。在胡图人屠杀之初，扎伊尔和比利时、法国军队曾经一起帮助胡图人抵抗图西族武装。

到了后来，扎伊尔和比利时军队撤出，卡加梅掌权已成定局。卡加梅并没有建立一个纯粹由图西人掌握的政权，而是组织了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联合政权。胡图人在内阁中的占比甚至更高，担任总统的也是一名胡图人，卡加梅只担任副总统职位。

蒙博托继续反对新政权，向流亡的胡图人提供帮助。

当卢旺达屠杀终止后，那些杀人的胡图组织者小部分跑到了欧洲，大部分则顺着基伍湖沿岸进入了扎伊尔境内。

扎伊尔东部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这里除了刚果（金）的原住民，在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历次迫害中，还有大批的图西人来到了这里落地生根。这一次，又是胡图人蜂拥而至，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屠杀组织者。“胡图力量”以这里为基地开始反攻卢旺达。与此同时，图西移民、原住民和胡图移民之间也不断发生摩擦。

国际社会也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虽然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没能阻止

大屠杀，但当胡图人逃走后，在法国的宣传下，国际上立刻认定胡图人是受害者，他们的流亡是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于是国际社会给他们送来了大批的援助物资，这些物资和援助款就成了“胡图力量”反攻的物质支撑。

随着卢旺达屠杀的真相渐渐为世界所知晓，卡加梅邀请全世界的媒体到卢旺达去，参观那装满了死人的教堂、匆匆埋葬的万人坑，法国自此变得声名狼藉，胡图人获得的援助也大幅下降。

但卡加梅发现，扎伊尔一直是胡图人最大的后台，只要胡图人在扎伊尔一天，卢旺达就没有安宁可言。更难办的是，在扎伊尔的胡图人中，大部分只是平民，他们虽然参与了屠杀，但不是组织者。到了扎伊尔境内，这些平民实际上成了屠杀组织者的盾牌，武装人员藏身于平民之中，让一切和平事业都无法展开。

与此同时，卢旺达的重建也在进行之中，卡加梅希望这些平民回到家乡，在既往不咎的政策下重新过日子。只有这样，卢旺达才能重新走入正道。图西人已经被屠杀了四分之三，胡图人占比90%以上，如果一味想报复，那么只能将卢旺达拖入更深的深渊。

只要扎伊尔和胡图武装存在，卢旺达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卢旺达的邻国乌干达的总统穆塞韦尼也同样看不起蒙博托的胡作非为。于是，卢旺达和乌干达两国联合起来，想了一个计策：在摇摇欲坠的扎伊尔培养一个代理人——卡比拉。

如果不是卢旺达和乌干达，卡比拉早已经成为历史过客，不为人所知晓，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远在蒙博托之前的卢蒙巴危机时期，卡比拉曾经是卢蒙巴在东部的一个年轻支持者，拥有一小支武装。古巴的切·格瓦拉曾经想到刚果（金）发动革命，与卡比拉短暂共事，这次共事让格瓦拉认为卡比拉不可能成事，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刚果。

卡比拉作为小军阀曾经在辖区内推行过格瓦拉的那一套，结果行不

通，只好靠走私度日。他结识了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当和卡加梅商量扶持人选时，穆塞韦尼提到了卡比拉，认为他是一个容易被控制的人。于是，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进程的人又被拉回了舞台中央。

卢旺达支持卡比拉的第一目标，是与扎伊尔境内的胡图人作战，将胡图军队击溃，并把解救后的胡图平民赶回卢旺达境内。到了1996年11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胡图族武装被打得四处逃窜，数十万平民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得到赦免，并开始建设新的卢旺达。

但对于扎伊尔来说，不幸的是，顽固派胡图武装失去了平民当盾牌，继续逃窜，战乱逐渐向着扎伊尔的中部和西部蔓延。此时的扎伊尔如同一栋蛀空了的房子，只要一碰就会倒塌。蒙博托还得了癌症，已经活不了多久，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治病。

卡比拉的队伍沿着巨大的刚果河，从上游向下游前进，蒙博托的部队却陷入了崩溃与哗变。1997年5月，卡比拉攻陷了扎伊尔首都金沙萨，蒙博托正式倒台，卡比拉就任新总统。他将国名从扎伊尔改成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由于首都在金沙萨，人们简称其为刚果（金）。

与刚果（金）隔刚果河相望的是法属刚果，独立后，人们根据它的首都布拉柴维尔称之为刚果（布）。布拉柴维尔与金沙萨只有一河之隔，河南面是金沙萨，河北面是布拉柴维尔。

就这样，在国际社会的瞠目结舌下，一个不起眼的军人在两个小国的支持下，将非洲最大的国家之一推翻了。

人们对卡比拉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认为他得到了邻国的支持，可以控制住纷纭复杂的东部地区，建立更广泛的团结阵线，实现经济发展。

但事实上，当年的格瓦拉并没有看错人，卡比拉只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他毫无统治能力。他无法建立一套新的官僚制度，只能在原来的制度中塞满自己人。他宣布要建设类似于中国的社

会主义，却学不到建设的本质，而是将集体化和收归国有变成了中饱私囊的手段。

更致命的是，他并不想当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小兄弟。从国土面积上讲，刚果（金）的面积是乌干达的近十倍，是卢旺达的近百倍。卡比拉作为大国元首，却听从于两个小国的指挥，这是说不过去的。再说，作为不同的国家，其利益也是不同的，为了邻国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事情对本国人也无法交代。

卡比拉担任总统不久，就疏远了两位大哥。他赶走了本国军队内的卢旺达籍士兵，除了雇用一批本国人，甚至还招募了一批胡图族人。

在卡比拉“背叛”卢旺达和乌干达时，这两个国家却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憧憬之中，寄希望于依靠刚果（金）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卢旺达，由于屠杀造成的混乱，国内经济已经崩溃，需要卡比拉将刚果（金）丰富的自然资源回馈卢旺达，以帮助这个小国渡过难关。

卡比拉的做法惊醒了两国的迷梦。两国元首也拥有反制的手段，他们随即做出决定，开始支持东部的另一支力量，再次发起了对卡比拉的反叛。于是，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内战的刚果（金）随即陷入了第二次内战。

第二次内战的破坏性更大，参与方更多。第一次内战主要是卢旺达和乌干达支持的卡比拉与蒙博托之间的较量。第二次内战，除了乌干达和卢旺达支持的新的一派之外，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也参与了进来，帮助卡比拉守住政权。在乌干达一派，布隆迪为了边境的安全也参加了战争，而安哥拉一派又拉上了纳米比亚和乍得。内战变成了非洲大战，刚果（金）在蒙博托时代好不容易建立的认同感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军阀混战，内部分裂。

卢旺达和乌干达支持的武装控制了刚果（金）的东部地区，这里是矿产最丰富的地带。他们控制了黄金、钶钽铁矿、木柴、野生动物的贸

易，这些资源换来的钱成了卢旺达宝贵的重建资金，也成了乌干达的发展资金。

2001年1月16日，卡比拉在官邸被他的卫兵杀害。关于他的死，仍然有太多不确定之处，人们怀疑是卢旺达指使人干的，却没有充分的证据。后来又认为是几名黎巴嫩的珠宝商人参与了其事，导致了这几名黎巴嫩人被处决。

卡比拉死后，他的儿子小卡比拉继任总统。小卡比拉比起他的父亲更加灵活，放松了一定的管制后，获得了普遍的支持。

在他的领导下，刚果（金）各个派别终于坐到了一起，成立了联合政府。外国军队也纷纷撤离，刚果（金）土地上留下了400万具尸体。

但这个脆弱的国度并没有脱离危险期。一个如此碎片化的国家能够在一套新的民主架构之下存活吗，还是必须靠铁腕来统治呢？

如果依靠铁腕，必然又走入蒙博托循环。蒙博托执政之初，依靠强权和冻结民主程序，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但随着副作用的加大，腐败丛生，蒙博托倒台的那一天，就是刚果（金）再次陷入混乱的时刻。

但如果不依靠铁腕，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向心力维持下去？

从现实来看，小卡比拉放松了一部分管制，但这导致刚果（金）的东部地区仍然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低烈度的战争状态。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影响力仍在，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他们表面上承认中央政府，却是当地的土皇帝，依靠自然资源获得军费。

小卡比拉的执政期也成了问题。按照新的宪法，他只能执政到2016年年底，两届任满就到了下台的时候。但小卡比拉拒绝下台，并擅自将任期延长了两年。

比利时人离开刚果（金）时留下的烂摊子至今仍然在折磨着这个庞大却又充满离心力的国度。此刻，那位让刚果（金）人谈之色变的贪婪

的比利时国王已经躺在坟墓里达一百多年，但他的幽灵仍然弥散在非洲的上空，吞噬着那里的生灵。

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

非洲中东部的大湖区是最大的炸药包，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是另一个种族冲突高发地。

从西非的几内亚向东非的苏丹画一条线，线的北方是伊斯兰教影响区，南方则是非洲原始宗教区域。欧洲人来到非洲后，他们将原始宗教区同化成基督教区域。但在已经被伊斯兰占领的地区，基督教举步维艰、进展不大。于是，这条线的两侧成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最严重的地方。

这条线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是西非的尼日利亚、中部的乍得，以及东部的苏丹。

特别是乍得与苏丹，两国共享国境线，气候也类似，全年高温，降水较少。北方属于沙漠气候，植被很少，南方的萨赫勒地区则以草原和稀树林为主。北方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南方是夹杂着基督教的原始宗教区域。在殖民化之前，南北两方并不属于同一国家，它们各过各的日子，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在殖民地时期，乍得和苏丹却被强行整合进了不同的殖民帝国，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秩序。乍得属于法属中非的一部分，法国人并不喜欢伊斯兰势力，他们将基督教带到南方，再依靠南方的基督徒进行统治。苏丹却属于大英帝国的地盘，由英国和埃及共管，英国人对传播宗教的兴趣不大，总是希望扶植当地势力进行间接统治。由于北方的伊斯兰教区域文明发展程度更高，英国人主要依靠北方的穆斯林来掌管全国的行政事务。

这就造成两个相邻国家的政治情况恰好相反，乍得是南方基督教徒统治北方穆斯林，而苏丹是北方穆斯林统治南方基督教徒。

但不管谁统治谁，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南北矛盾。它们本来就是被殖民体系强行捏合在一起的，独立后，南北的不同宗教立刻展开了连绵不绝的内战和冲突，这些冲突又被周围国家乃至世界强权所利用，变成了更大冲突的一部分。

乍得的首任总统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是来自南方的萨拉族人，他废除了反对党，建立了基于南方的一党制。由于萨拉族是在殖民时期才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状态，治理能力要比穆斯林差，北方的穆斯林在他的统治下起义了。零星出现战争的状态维持了十年，到了1975年，托姆巴巴耶在一次内部的政变中被推翻了，他本人也战斗至死。

继任的军政府仍然由南方人组成，他们试图化解南北矛盾，却发现北方人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善意，一心想要通过武力获得政权。

1979年，一支由侯赛因·哈布雷领导的北方游击队终于攻占了首都，哈布雷本人成了总统。从这时开始，南方人失去了政权，而冲突主要变成了北方人之间的事情。

哈布雷时期，乍得北方的利比亚决定趁火打劫，希望将北方地区合并入利比亚的版图。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是一个泛非主义者，也是个泛阿拉伯主义者，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乍得北方居民充满了不必要的同情，断言他们只有合并进入利比亚，才能享受阳光雨露。在哈布雷上台之前，卡扎菲已经介入了乍得冲突，支持北方军阀中的其他派别与哈布雷作战。

哈布雷上台后，通过与法国和美国合作，花了九年时间将利比亚击退。这是卡扎菲最灰头土脸的时刻。

然而，哈布雷的北方统治同样以高压出名，与托姆巴巴耶依靠南方萨拉族一样，哈布雷主要依靠北方的图布人进行统治，他本人就来自这

个民族。

到了1990年，人们已经无法忍受哈布雷，他的将军伊德里斯·代比发动政变，将哈布雷推翻。

对哈布雷的审判一直持续到2016年，法庭以强奸、贩卖性奴、执政期间屠杀四万人等罪行，判处他终身监禁。

新上台的代比总统同样属于北方人，他来自一个叫札加瓦的民族。他希望缓解民族矛盾，上台之初就开始著手进行多党制的改革，并恢复了民主选举制。然而，乍得的形势过于复杂，代比和他的同僚发现，乍得要想稳定，只有实行高压。一旦代比离职，高压政策出现裂缝，就会陷入另一场乱局。

2006年，代比修改了宪法关于连任的限制，随后赢得总统选举，开始了第三个任期。

但他的连任也改变不了秩序，由于破坏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平衡，冲突还是爆发了。乍得再次陷入了内战的泥沼。这次内战持续到2010年才结束。代比本人仍然是总统。乍得人仍然不知道代比离职的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但他们庆幸又拥有了短暂的和平。

由于政治的混乱，加上缺乏资源，人们生存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祖国，到其他国家去做工。我曾经在中东的几个国家都遇到过乍得的劳工，他们在国外一个月能挣200到500美元，如果留在国内，往往连口饭都混不到。

与乍得相比，苏丹的情况更加复杂。

这个国家独立较早，1956年就取得了独立。从那时开始，北方人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全国近800个文官职位中，只有6个留给了南方人。

苏丹最初采纳的是议会制和总理制。在议会中，南方一直寻求建立一种联邦制，避免被北方主导。由于南方人在议会中的抵抗，北方人普

遍认为议会制是一个软弱的制度，不适合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实行。

1958年，一位叫埃尔费里克·易卜拉欣·阿卜德的将军顺应了北方人的想法，依靠政变上台。他停止了政党和议会的活动，弃用了原来的宪法，将国家体制改为总统制。苏丹从此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鉴于前任政府对南方过于软弱，阿卜德将军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段。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在苏丹这个信仰就是伊斯兰教。他在南方开始通过强力消除基督教的影响，普及伊斯兰教育，强制所有人都必须以阿拉伯语作为母语。

阿卜德的强势非但没有让南方人民臣服，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反抗。苏丹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逐渐演变成了内战。

但阿卜德又没有独裁到随意使用武力，他在经济上的政策曾经帮助苏丹渡过了难关，在政治上也在诚心寻找一种方法，将南北统一在一个架构下。既然依靠强力捏合失败了，就需要寻找其他方法。

为了解决南北问题，阿卜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大研讨，希望各方面的专家都给政府出谋划策，如何才能让南方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如何让苏丹人民找到满意的生活方式。

这次研讨最初在专家之间进行，后来进入了大学。人们一开始还讨论南北问题，随着辩论的深入，就出现了严重的失焦。人们转而批评阿卜德政府的一切，说到激动处，开始上街游行。

阿卜德一看大事不好，连忙下令禁止研讨。但为时已晚，首都的反抗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示威和罢工。

阿卜德没有镇压游行活动，而是决定自己下台，恢复宪法，将总统变成象征性的职位。总理塞尔·哈特姆·哈里发成了实权人物。阿卜德的失败也许说明，当时的苏丹不存在一条和平的联合之路。如果要联合，就必须拥有一定的强力去捏合两个松散的部分；如果过分尊重两个部

分，就必然因为向心力不足而难以捏合。人们赶走了怀有诚意的阿卜德，可能失去了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机会。当他们认识后来的统治者时，会怀念这个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实践者。

哈里发也想认真地解决南北问题，他的政府第一次吸收了南方人当部长。他邀请南北双方展开一系列的圆桌会议，试图通过开诚布公的谈判来解决南北纠纷。

但事实证明，当所有的人都信誓旦旦要为本民族争取最大化利益时，没有武力做后盾的谈判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很快，谈判就进入了死胡同。哈里发也辞职了。

又经过了几任一事无成的政府，人们开始对政治死锁感到厌烦了。于是，1969年，政变再次发生。这一次上台的是影响苏丹最大的领导人之一的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

尼迈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从他前后两次政策变化，也可以看出苏丹这个复杂国家是多么难以掌控。

上台之初，他是一个世俗主义者，推行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却不赞成国家的伊斯兰化。在他十几年的执政生涯前期，他力主放权，让南方实行自治。南方地区合并成了一个邦，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官员，同时他还规定信仰自由，让南方可以选择基督教作为信仰。

尼迈里的政策受到了世界的好评，美国人欢迎他的政策，给了不少帮助。他投桃报李，也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例如实行私有化、吸引外资。

但尼迈里政策带来的好势头又被他亲手毁掉了，其原因则是利益的分配不公。在尼迈里执政时代，苏丹南部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苏丹一跃成了世界产油大国之一。

石油的发现本来是福音，却改变了苏丹国内的政治平衡。由于产油

区在南部，这提升了南方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让南方不再安于充当北方的附庸。

尼迈里为了平衡两部分的经济，力主将炼油设备放在北方。由于北方与海洋相连，南方缺乏出海口，苏丹铺设了石油管道通往红海。这样，南方拥有石油，而北方拥有炼油厂和管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两者的利益。

但这样的平衡却让双方都感到不满意，南方认为自己的资源被北方窃取了，北方却认为政府对南方过于优待。尼迈里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政局的掌握：如果他继续对南方怀柔，势必失去北方的支持，又让南方变得贪得无厌，最终也免不了分裂；如果他采取强硬措施，又是对他早期政策的全面否定。

经过权衡，尼迈里选择与北方的宗教保守势力联合，否定了前期的政策。他解散了南方政府，在全国实行严苛的伊斯兰教化政策。苏丹陷入了内战。

1985年，苏丹经历了战争、饥荒、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尼迈里也在政变中下台。他下台后，事情并没有好转，苏丹从饥荒走向了更大的饥荒。在发现石油十几年后，石油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裕，却带来了造成20多万人死亡的战争和饥荒。

1989年，苏丹再次爆发政变，这次上台的是对苏丹历史影响最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

巴希尔是一个强力型的人物，他之所以世界知名，是因为他对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人们常常提到的恐怖主义大亨沙特的奥萨马·本·拉登，就是在这时候到达苏丹的。本·拉登本来在阿富汗参加反抗苏联的游击队，但后期却将美国人视为最大的敌人。当他离开阿富汗，走投无路时，苏丹收留了他。

巴希尔实行彻底的伊斯兰化，不仅对国内推行极端政策，也将政策

引向了国外，这和本·拉登的想法不谋而合。本·拉登在苏丹国内做了大量投资，作为回报，巴希尔不干涉本·拉登在苏丹的活动。在苏丹时，本·拉登成立了著名的“基地”组织，他将恐怖主义输送到了世界各地。

苏丹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在这里，外国人不仅进入苏丹需要签证，就连离开时也需要申请另一个签证。进入苏丹后三天内，外国人必须去警察局登记，否则就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曾经碰到过在苏丹打工的中国人，因为离境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在苏丹被困几个月，最后通过疏通关系才得以离境。

巴希尔的强硬政策并没有挽救苏丹，反而让苏丹变成了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果说邻国乍得由于缺乏资源而贫穷还可以理解，苏丹坐拥巨大的石油储量，却仍然如此贫穷，这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恐怖主义不仅没有给苏丹带来好处，反而让它成为了世界的对立面。南方的冲突依旧，就连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也陷入了叛乱，造成了20万人以上的死亡。国际社会的压力让巴希尔终于让步了。

2011年，南北苏丹正式分离，最年轻的国家诞生了。到这时为止，南北双方已经付出了200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南苏丹的独立仪式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和非洲30多个国家首脑都出现在了现场，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戴着一顶古怪的牛仔帽出席了庆典。

但后来势态的发展仿佛在嘲笑这个世界，南苏丹独立后不仅没有实现和平，反而立刻陷入了内战。脱离苏丹并没有给它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由于失去了北方的制约，南方各派系的矛盾不断爆发，总统和副总统大打出手，至今又已经造成了十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在世界上，到底是民族联合，还是民族自决，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民族自决虽然让国家更易于稳定，但产生的却是一个个小国，将原本庞大的市场彻底割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是民族联合，那么就意

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磨合，才能让各个民族学会生活在统一的框架之下。在现代，民族自决似乎成了主流赞同的观点，但是从非洲来看，民族自决不仅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反而有可能进一步造成问题。

一位苏丹人怀念地向我谈到当年统一的时刻。他告诉我，事实上，苏丹在磨合了几十年之后，已经慢慢有了“苏丹”这个国家的意识。但当南苏丹独立后，不仅是南苏丹陷入了内战，就连苏丹人也陷入了迷茫，他们仿佛失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感。与此同时，南苏丹的独立并没有让人们的日子好过。当两个苏丹在一个国家内部时，处理起问题来还比较容易；当南苏丹独立之后却发现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超国内，原本依靠北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必须在苏丹、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之间重新磨合，其成本远大于当初未独立之时。

当然，民族联合也有很多问题，因此不同的国家做选择时情况才会更加复杂，无法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对于苏丹而言，分裂带来的后果还在延续着。

超级大国的内战旋涡

如果按人口数量来看，非洲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就是尼日利亚。它的人口总数超过了1.8亿，是世界第七大国家，大约七个非洲人里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曾经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它建于海边的一座小岛上，由几座桥梁与大陆相连。城市里有的区域高楼林立，有的地方却遍地贫民窟。

由于人口众多、贫富不均，尼日利亚成了非洲生存压力最大的国家。人们为了糊口，发明了五花八门的生存之道。比如，世界上有一种著名的电信诈骗手段，就叫尼日利亚骗局。互联网刚兴起不久，人们经常在邮箱里发现一种邮件，声称是尼日利亚一位倒台将军的女儿发出的。信里提到她的父亲在倒台前存了一大笔钱，需要转移出国，请收件人提供一个账号。当收件人信以为真提供了账号，对方又会以检验账号的真实性为借口，或者说是作为启动资金，让收件人给这个“将军的女儿”打一笔款。款项一般不大不小，会让人感到有点心疼，却又认为值得赌一把。收到钱后，“将军的女儿”就消失了。

除了人口多，尼日利亚还是世界上种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全国一共有五百多个族群，信奉不同的宗教，说着各自的语言。正是因为族群的多样性，尼日利亚成了种族冲突的高发地。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发展进程，可以概括为：

一、建国初期的种族冲突期。这段时间，尼日利亚最主要的三大族群为了争夺政治控制权，发动了数次政变，政变又演化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二、当内战结束后，由于尼日利亚的离心力太大，就进入了独裁时期。如果说其他国家的独裁以稳定著称，尼日利亚却以不稳定闻名，独裁者如同走马灯一般上上下下，他们靠暴力上台，又被暴力推翻，周而复始。

三、当独裁时期造成的痛苦超过了人们愿意承受的程度，尼日利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现在的尼日利亚仍然处于不完善的民主之中，人们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好转，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弱，各个地方特别是北方区域内的小军事武装仍然很多，与尼日利亚经济的欣欣向荣并行着。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这个国家是由三个主要部分，以及一些次要的小碎片（少数民族区域）组成的。我们不去看那些更小的碎片，只关注三个主要区域。

北方居住着豪萨族和富拉尼族，他们的居住区域位于不靠海的内陆地区。这里已经靠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带，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传统上属于穆斯林区域。北方的土地和人口都超过了尼日利亚整体的一半，但文盲率也是最高的。

东南部居住着伊博族，这里包含了尼日尔河入海口，是主要的石油产区。伊博人的分布也极为广泛，除了在东南部，也遍布尼日利亚全国。他们是主要的商业人口，教育水平也更高。

西南部是约鲁巴人区域，这里的城市发展是最完善的，最大城市拉各斯就在这里。

东南部和西南部深受基督教影响，与北方伊斯兰教区域形成对立。在建国之初，为了避免地域冲突，英国人在宪法中设立了三个半自治政府，各自管理地方事务。在半自治政府之上，则是位于拉各斯的尼日利亚中央政府。

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采取总理负责制，总统只是象征性的职位。担

任总统的是伊博人纳姆迪·阿齐基韦，他虽然是伊博人，却出生在北方穆斯林区，又在西部接受教育。这种背景让他既会伊博语，也会豪萨语和约鲁巴语。他曾经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深造过，拥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这位总统可谓保持国内团结的最佳人选。

虽然总统是团结型的，但是大权在握的总理却必须出自北方，因为北方拥有更多的选票。总理阿比巴卡·巴勒瓦是个伊斯兰教徒。

尼日利亚建国后，众多的各级政府纷纷开始了行动。对于刚刚当家做主的黑人来说，每一个家庭都不算富裕，做官就是一个致富手段。在这个阶段，贪污受贿都是明目张胆的，每一个职位、每一件事都有价格。

严重的腐败让人们感到不满，民众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充满了怨言。与此同时，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北方、东部和西部一直在争取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最初，北方选择了和东部一起执政，西部成了反对派。但随着人们看清政治是和利益挂钩的，三大派别开始了合纵连横，不断用手中的权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西部和东部认定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北方，却总是由于内部不团结而发生分裂。

在这样的氛围下，尼日利亚历史上第一次政变到来了。

发动政变的是一群军官，为首的是少校恩泽奥古，以及一名前跳高运动员（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大赛金牌的非洲黑人）伊曼纽尔·伊法尤纳少校。尼日利亚的军官阶层大都来自伊博族，由于他们最有文化，因此控制了军队系统。

政变同时发生在全国各地，尼日利亚中央政府总理、西部政府总理和北方政府总理先后被杀。恩泽奥古也公开发誓，政变成功后要铲除腐败。就在人们认为发动政变者将要控制住局势时，一位叫伊龙西的将军发动了反政变，取得了政权。

北方和西部的人们为伊龙西的反政变拍手叫好。但他们很快发现，伊龙西将军本人也是伊博人。日后，北方和西部的人们并不把政变和反政变看成是一场反对腐败的运动，而认为这是伊博人的阴谋。

伊龙西将军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他不仅要反对政变，还要反对腐败，更重要的是反对分裂。他试图将这个已经接近四分五裂的国家捏成团。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得不更加倚重军队。不幸的是，军队高层军官大部分都是伊博人，给了北方更多的口实。

在反分裂上，伊龙西还试图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他想到的方法是，废除联邦体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这样既能遏制地方政府的腐败，又能让中央政府更有控制力。

但这个措施却要了他的命，北方人认定伊龙西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北方的。于是，一群来自北方的军官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了伊龙西。这一次，北方掌握了全国的局势。

代表北方掌权的是高文中校。他出身于北方的一个小部落，处于三大势力之外，是个适合整合全国不同势力的人物。

但高文却和伊龙西一样，看到了联邦制的弱点，试图建立另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他将原来的联邦区域重新编成12个州，将原来的几大势力碎片化。在伊龙西时期，中央政府主要防范的是北方派；到了高文时期，中央政府却主要针对东部派。在东部除了伊博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高文试图提高东部少数民族的地位，以打击伊博族的强势。

高文的做法终于引起了伊博族的反抗，于是政变演化成了更加复杂的内战。

内战以北方控制的中央政府为一派，以东部伊博族为另一派。在奥朱古中校的领导下，东部宣布独立，建立一个称作比夫拉的共和国。

在非洲，尼日利亚也是一个文学大国，除了古老的埃及和白人的南

非，在黑人世界里，最著名的作家几乎都在尼日利亚。最著名的莫过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以及被称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阿契贝。在新生作家群中，女作家阿迪契脱颖而出，成了最重要的代表，她的代表作《半轮黄日》描写的就是比夫拉战争的场景。小说中以伊博人的角度描写了战争之前的安详，以及战争中造成的死亡和混乱，还有战争结束后留下的那道深深的伤疤。

中央政府派和比夫拉共和国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十个月，大约有200万平民在战争中死去。战争还造成了另一个影响：原本伊博族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民族，北方也有大量的生意人是伊博族，但是在战争中，双方煽动的仇恨使得北方地区开始以野蛮的手段清理当地的伊博人。大量的北方伊博人被杀，剩下的逃走成了难民。

尼日利亚也是一个向外移民的大国，其中移民最多的就是伊博人。他们在全世界都有分布，也将北方的暴行曝了光，引起了巨大的同情。但这并没有改变伊博人在战场上的劣势。1970年，比夫拉战败。

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以北方人击溃东部，取得对南方的优势而告结束。在很长时间内，民族矛盾仍将继续。但在短期内，这种情绪却因镇压陷入了低潮。

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央政府整合全国的努力，以及各个军政府的集权行动。

高文并不是一个强硬派，他获得战争的胜利后，并没有大肆宣扬战功，也没有进一步惩罚叛乱者，而是归还了战败者的土地，帮助他们的士兵融入中央军队，表现得非常大度。

在治理国家上，高文也经历了一段好时光。战争结束时，恰好是石油经济繁荣期，尼日利亚是个石油大国，它加入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了重要成员。大量的石油收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让地方主义者处于防守态势。

但高文统治的后期，也是尼日利亚腐败的巅峰时期之一。随着石油经济的持续繁荣，政府收入大增，官员的腐败机会也大增。明目张胆的索贿，明码标价的腐败，使得人们对高文政权怨声载道。

1975年，高文在一次政变中倒台。政变者穆塔拉·穆罕默德表示要结束军政府，还政于民。但一年后他在政变中被刺杀身亡。

新的政变也失败了，接下来上台的，是尼日利亚建国之后最重要的政治家奥巴桑乔。在尼日利亚人眼中，奥巴桑乔的地位如同国父一般，他不仅帮助尼日利亚恢复了秩序，还重新探索了通往民主的道路。

在政变之前，奥巴桑乔是穆罕默德的副手；政变发生后，逃脱了刺杀的奥巴桑乔立刻组织反击，重新控制了局势，并宣誓就任尼日利亚最高领袖。

事实上，在高文时代，尼日利亚人就已经对军政府的统治很不满意。由于经历了分裂，他们更珍惜统一，又因为统一失去了太多的自由，希望恢复民选政府，拿回自由。

穆塔拉·穆罕默德虽然是依靠政变上台，却知道顺应这个潮流，已经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宪法，以便逐渐恢复选举和民主政治。军人是军政府的支柱，穆塔拉·穆罕默德首先从军队开刀，开始了军人复员工作，缩小部队规模，减轻军事负担。之后，他开始解除全国的军事管制，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但就在这时，他被杀了。恢复民选的重任就落在了奥巴桑乔的肩上。

奥巴桑乔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上台后继续前任的政策，推行民主。但在民主之前，必须首先破除掉地方分裂倾向。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地方分成几块互相攻讦，那么也许民选不久，就会再次面临政治斗争乃至政变。

奥巴桑乔时代，尼日利亚被分成了19个州。这19个州中，有4个以豪萨人和富拉尼人为主，有4个以约鲁巴人为主，2个以伊博人为主。三

大族群占据了一半多一点，剩下的9个州分给了其他少数民族。这样，三大族群的政治影响力都减弱了，全国的局势达成了一定的平衡。在19个州的基础上组成了联邦政府。另外，尼日利亚模仿美国体制，形成以总统为主的行政班子，配以参议院和众议院作为立法机构。其中众议院以人口为基础确定代表人数，而参议院以州为基础，每个州不管大小，名额都是一样的，这更进一步避免了某一族群独大。

在奥巴桑乔的引领下，尼日利亚的政治架构设计得很完善，更难得的是奥巴桑乔本人的无私。1979年，他主持了新的大选，这是尼日利亚历史上少有的公平选举。为了更加公平，奥巴桑乔本人并没有参加大选。

这次选举选出了一位来自北方却同时得到南方拥护的政治家沙加里，他打着“同一国家，同一命运”的口号上台。他性情温和，与前面的军政府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沙加里当选后，奥巴桑乔完成了再造共和的重任。他辞去了最高元首职位，又辞去了军职，将政权交付给新当选的总统，心甘情愿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他是少有的不恋权的非洲政治家之一。

但是，奥巴桑乔费尽心力打造的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是否能够帮助尼日利亚度过独裁危机，进入民主呢？后来的发展让人感到吃惊。

沙加里是一个温和的人，并不一定能够适应尼日利亚如此复杂的环境。他担任总统时，尼日利亚在石油经济繁荣的带动下，全国上下仍然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问题在于，由于总统控制力太弱，全国上下充满了各行其是的腐败官员。在非洲，肯尼亚本来是公认的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但人们了解了尼日利亚之后，认为尼日利亚比肯尼亚还要腐败。办同样的事情，在尼日利亚支付的行贿金要比肯尼亚高一倍。

官员的所作所为给经济活动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尼日利亚的经济本来就是不正常的，在上升期还显示不出来，到了下降期，就会立刻变得

严重起来。

1983年，国际石油经济进入了另一个下降周期。尼日利亚的经济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国内生活质量下降，国外债台高筑。政府的财政收入少了一半，外债却达到了180亿美元，外国人纷纷撤资。

这一年也是选举年，沙加里四年前靠人们的普遍支持上台，这一次却只能依靠明目张胆的作弊。到这时，人们已经认定奥巴桑乔的第二共和国失败了，沙加里成了一个腐败、行骗的政府首脑，他迟早会走向独裁，或者被推翻。

年底，布哈里将军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沙加里，也结束了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布哈里上台后宣称大力反腐，削减政府开支，冻结政府岗位，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尼日利亚经济，但这种做法带来的阵痛得罪了更多的人。两年后，布哈里再次被政变推翻，上台的是巴班吉达将军，尼日利亚在经历了短暂的民主和改革之后，又一次迎来了低潮。

短暂的第二共和国似乎说明，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老好人式的团结政府并非一个好选项。它无法摆平复杂的矛盾，也无法约束自己的官员，使得政府无法加强全国的统一，反而向着行政退化和矛盾激化的方向滑去。

巴班吉达政权以独裁、镇压、毒品闻名于世，他建立的国家安全系统拥有任意抓捕、折磨和杀害异见者的权力。尼日利亚的许多反对人士因此而消失。尼日利亚之前的独裁以腐败为特征，而到了这时变得更加残酷和血腥。

奥巴桑乔第二共和国虽然灭亡了，却留下了一个遗产，那就是人们对于自由选举的渴望。巴班吉达执政后期，在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自由竞选。但为了保证自己当选，他又不得不动用作弊的手段。1993年，当一名南方人即将胜选时，巴班吉达出手干涉，不想让权。在全国的抗议下，他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政权交给了一位过渡人

士。

三个月后，一名叫阿巴查的将军发动了政变，尼日利亚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由于民主政治被打断，阿巴查上台之初便遭遇了全国性的抗议，他动用军队镇压了抗议活动。他表示要揪出反对政府的后台，于是将矛头指向了第二共和国的缔造者——奥巴桑乔。在阿巴查的授意下，尼日利亚法庭判处奥巴桑乔三十年徒刑。在尼日利亚民主与独裁的第二回合较量中，独裁再次胜出，反映出了一个新独立国家发展道路的艰难。

第九章
新一代的务实派

在非洲，一切既定政治理论都会被现实击得粉碎。比如，大部分政治成熟的国家都限定了领导人的任期，一般是两届。在发达国家里，任期制已经被视为理所应当。

但在非洲，任期制却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比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已经参加了五次大选，并且次次获胜。这并不是说他有多独裁，而是在他的国家，人民并不愿意让他下台。乌干达曾经饱受独裁和暴政的困扰，穆塞韦尼是一个相对温和，却又有足够执政智慧的人，乌干达的社会和经济在他的带领下突飞猛进，人们的教育水平、认知能力都在大幅度提高。人们担心他下台后乌干达会回归到当初的混乱状态。

穆塞韦尼到底算不算一个独裁者呢？

按照独裁的定义，一个独裁的国家内部应该是没有选举的，但乌干达却有着正常的选举。作为总统的穆塞韦尼不仅不反对选举，还总是鼓励人们行使投票权。乌干达也已经有了反对党，穆塞韦尼修改宪法中任期条款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他之所以连续当选，应该被视为民意。

如果说穆塞韦尼不算独裁者，可他又长期不下台，西方甚至将他和其他长期执政的独裁者相提并论。人们甚至预计他会在总统的职位上待到死。

与穆塞韦尼类似的领导人还有很多。乌干达的邻国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也已经连续执政了二十多年，他也修改了宪法的任期制。在卡加梅的领导下，卢旺达也处于明显的上升期。除了他，在国内还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将大屠杀过后的国家团结起来。

穆塞韦尼和卡加梅都属于非洲的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第三代领导人。除了他们，比较典型的第三代领导人还有埃塞俄比亚的泽纳维、加纳的罗林斯、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等。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是靠激情来引导民众，他们大都选择了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方式将非洲带向了灾难，如果说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能力的强力型人物，靠武力获得了国家，那么第三代领导人却展现了不同一般的独特性。

经过了几十年，第三代领导人大都受过正规的教育，许多人都是大学生。他们有了足够的政治学知识储备，知道选举和民主的重要，也明白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民间而不仅仅是政府计划。从学识来讲，他们已经与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许多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最典型的就是他们普遍废除了任期制。他们认为，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向心力，还处在一个将国家捏合成一体的时期，暂时做不到像西方成熟的政治体那样，每隔几年换一次总统。如果那样做，政客们的争执会毁掉国家的统一。

非洲第三代领导人大都把自己的时代定义为训政时代，也就是训练人民实行民主的时代。穆塞韦尼一方面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倡导人们珍惜手中的选票，就是想趁自己在台上时，训练人们学会利用民主。

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的吸引力。一个政党或者个人一旦有了足够大的权力进行训政，就很难抵挡住权力的诱惑，变得不肯放手。社会虽然有可能在他的手中取得发展，但是另一种可能

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社会在训政中裹足不前，直到崩溃。

非洲国家能否在第三代领导人手中和平过渡到民主政治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教训。因此，考察这一代务实的领导人，就成了理解现代非洲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约韦里大叔喊你去投票

穆塞韦尼出生于乌干达一个牧牛人家庭，他赶上了独立之后的教育大发展，在非洲本土国家坦桑尼亚接受了大学教育。坦桑尼亚独立后，尼雷尔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也开设很多这方面的课程。穆塞韦尼研究的方向就是如何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实行社会主义。

当时全世界涌动着社会主义浪潮，即便到欧洲去学习，也都是以社会主义武装头脑。在非洲就读虽然也学习社会主义，但与欧洲的书本式传播不同，它很贴合非洲的实际情况。穆塞韦尼在大学里没有变成一个食古不化的老学究，反而极具现实精神，愿意依据现实条件做出政策调整。

大学过后，穆塞韦尼还参加过非洲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当时，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还没有完全独立，穆塞韦尼就被派到了那儿去学习游击战。在社会实践中，他熟悉了枪械和战争，这让他从一个大学生转变成了一名战士。

毕业后，乌干达恰好处于阿明的统治之下。阿明主要依靠北方人统治，南方便开始了对他的反抗。乌干达的南方与坦桑尼亚接壤，两国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由于在国内待不住，南方的游击队就把大本营设在了坦桑尼亚境内。

最初，坦桑尼亚对于游击队并不在意，他们没有试图限制游击队发展，甚至还同情游击队，给他们支援。游击队在坦桑尼亚的默许下，向乌干达境内挺进，试图推翻阿明，但吃了败仗。坦桑尼亚遭遇了极大的压力，于是在索马里的调停下，与阿明和解了。

坦桑尼亚开始控制乌干达游击队在本国的活动。游击队没有消亡，却逐渐变成了坦桑尼亚手中听话的工具。坦桑尼亚试图让游击队支持乌干达前总统奥博特，但穆塞韦尼却认为，奥博特也是一个北方人，不算是真正的南方政权。从这时开始，穆塞韦尼脱颖而出，成了游击队中的少数派领袖。

1979年，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阿明入侵了坦桑尼亚，却遭到了坦桑尼亚的报复，最终在战争中倒台。坦桑尼亚扶持了前总统奥博特。奥博特回到国内，建立了一个不受欢迎，特别是不受南方人欢迎的新政权。穆塞韦尼的时机到了。

穆塞韦尼从坦桑尼亚回到国内，立刻在南方组织了一支反政府武装。这支武装与其他的游击队区别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支游击队，而是一个政治与军事的结合体。首先，穆塞韦尼成立了一个党派叫“全国抵抗运动”。在党派之下设立军队——全国抵抗军。这种架构的设置就是告诉人们，武力本身不是目标，目标是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

在政治上，穆塞韦尼提出了十条纲要，包括：第一，将来国内要实行民主，反对独裁；第二，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三，保证安全和发展，必须做到全国的统一和团结；第四，保持全国的独立，不依附于外来势力；第五，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建立一个独立、复合、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第六，加强社会公众服务；第七，消灭腐败和权力滥用；第八，消灭不平等；第九，与其他非洲国家合作共赢；第十，不刻意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展混合经济。

这十条纲要本身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最后一条的不刻意实行社会主义，可以看出穆塞韦尼的现实主义精神。即便他本人是学习马列主义出身，却并不依赖这些教条，而是随时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穆塞韦尼的游击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奥克罗将军推翻了奥博特，建立了新政权。

周围的国家并不喜欢穆塞韦尼，乘机开始撮合，希望奥克罗能够通过谈判将穆塞韦尼引入政府，结束分裂。这其中，坦桑尼亚一直支持奥博特，自然不喜欢穆塞韦尼。对奥博特和奥克罗支持最大的是扎伊尔的蒙博托，他已经感觉到，如果穆塞韦尼夺取了政权，会成为扎伊尔最大的敌人。他帮助穆塞韦尼的反对派训练军队，并提供支援以阻止穆塞韦尼上台。

对穆塞韦尼提供了决定性支援的，反而是一群流亡者，他们是邻国卢旺达逃难来的图西族难民。在这些难民的帮助下，穆塞韦尼取得了政权。这些在乌干达获得了高级军职的图西族人，后来成了推翻卢旺达胡图族政权、结束屠杀的主要人物。

不管周围国家如何不情愿，穆塞韦尼最终还是赶走了奥克罗，成了新的总统。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大都擅长描画美好的前景并做出许诺，但很少考虑如何才能实现许诺。可穆塞韦尼不同，上台伊始，他就把现实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一个国家必须确保国民的安全，他宣称“乌干达人只应该老死、病死，绝不应该横死”。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要维持安全，必须让政府有足够的控制力，而刚上台时这个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有南方和首都坎帕拉，北方大都不听从号令，各自为政。穆塞韦尼发动了数次清剿活动，打死了不少人。

特别是在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阿乔利族，他们组织了一个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与穆塞韦尼对抗。直到今天，“上帝抵抗军”仍然存在。穆塞韦尼对付“上帝抵抗军”绝不手软，这让他受到了很多批评。周围的国家，甚至西方许多组织都指责他屠杀少数民族，甚至有人指责他杀死了10万无辜者。但他没有妥协，直到现在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认定“上帝抵抗军”是一个恐怖组织。

随着政府对国家实现控制，安全果然回来了。乌干达死于横祸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奥博特和阿明时代绝对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也正是靠着这一点，穆塞韦尼终于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除了要让人民不横死，现实主义者穆塞韦尼还是非洲国家中少有的承认艾滋病危害的人。他没有掩盖乌干达艾滋病横行的事实，也没有把艾滋病妖魔化，更没有故作高尚地大肆宣扬家庭忠贞的观念，他深知这些都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

他只是通过宣传告诫人们：政府管不了你们的风流快活，但你们应该对自己负责，在发生性关系时记得戴套。乌干达成了非洲避孕套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也迅速下降。

在解决了最起码的安全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发展问题了。

人们认为，作为一个马列主义的学生，穆塞韦尼会步大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后尘，大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

但穆塞韦尼一上台，立刻来了个华丽转身，比在纲领中提出的混合经济更进了一步。他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赶快进入乌干达，帮助其发展经济。

20世纪80年代，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最活跃的时期。这些机构大力地帮助非洲国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条件，主要是两点：第一，实行经济自由化；第二，实现政府透明化。这两点大都受到非洲政府千方百计的抵制，认为是干预了他们国内的政治。

在乌干达，穆塞韦尼却不等国际货币基金督促，自己就开始了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透明化的行动。穆塞韦尼似乎很清楚应该怎么做。同时，乌干达还大力促进工业发展，促进出口业增长，减少政府审批程序。于是，乌干达在阿明喊过无数的口号之后，第一次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发展的感觉。虽然作为一个内陆小国，仍然受到许多条件制约，腐败

也无法完全根除，但与以前相比，这已经算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为了发展经济，乌干达可谓不择手段。由于乌干达缺乏自然资源，穆塞韦尼打上了邻国扎伊尔的主意。

在这一点上，穆塞韦尼也表现出了一个冷酷现实主义者的本来面貌。扎伊尔曾经支持过穆塞韦尼的对手。穆塞韦尼毫不犹豫地培植扎伊尔国内的反对派，推翻了蒙博托的统治。随后，穆塞韦尼趁着扎伊尔国内混乱之际，将它的资源大肆倒卖，大发其财，在肢解它时毫不手软。

穆塞韦尼的现实主义做法，给非洲的其他国家指明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之前，人们大都向纳赛尔、恩克鲁玛、尼雷尔学习，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结果导致国内经济裹足不前，难以发展。直到穆塞韦尼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还有另一种做法。

穆塞韦尼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自由化。他要求：第一，政府保证对全国的控制力，在达到全盘控制之前，不要屈从于那些要求仁慈的呼声；第二，政府保证人民的安全；第三，政府保证人民发展经济的基本需求，包括对产权的保护，对经商的保护，以及对官僚腐败的打击。

但是，乌干达是否在穆塞韦尼的领导下，彻底脱离了之前的轨道，进入了发展的稳定阶段呢？人们仍然对此不敢乐观。

直到今天，乌干达还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乌干达的政治结构怎样才能更加合理？乌干达虽然是个总统制国家，但在国家之下，还有几个不享有主权的王国。这些王国虽然不是独立的国家，却有一定的自治权。如何协调王国与国家的权力，一直是历届乌干达政府头疼的事情。

奥博特曾经废除了这些王国。阿明时代本来有机会继续推进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但是阿明本人的统治反而让人怀念起

王国时代。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人们更加怀念传统。穆塞韦尼打着南方传统的牌推翻了奥博特，他上台后恢复了乌干达的王国制度。

最大的布干达国王后裔也被请了回来，继续担任国王。穆塞韦尼这样做，一是因为他是个南方人，更尊重传统；二是因为这样能够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

但随着王国的回归，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王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个古老的命题也回来了。穆塞韦尼作为大家都接受的人物，还可以得到王国的尊重，但如果他下了台，其他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威望协调两者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穆塞韦尼恢复各个王国，可能是给将来埋下了隐患。

第二个问题是：乌干达应该选择还是放弃领导人的任期制？按照西方民主制的传统，总统之所以区别于国王，就是因为他是有任期的。自从美国在宪法中设立了任期制，全世界都效仿着为统治者设立了任期。一般是连任两届，每届四到六年时间。

但任期制适合成熟的国家，对离心力很强的起步型国家，却有着天然的障碍。这样的国家本来就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好不容易由某位领袖捏合成型。如果这个领袖任期期满后下台了，其余的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威望摆平各方势力。如果开国者有足够的威望，那么人们就期望他长期任职。到底是遵守任期规则，还是放弃任期规则，顺从民意呢？

穆塞韦尼于1986年上台之后，乌干达首先进入了十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回经济轨道，同时政府还制定了一部宪法，让人们有着稳定的规则可循。

十年后，宪法出台，过渡期结束了。按照新宪法，总统任期每届五年，可以连任两届。由于前面十年只是过渡时期，穆塞韦尼仍然可以根据新宪法参加竞选，并连任两届到2006年。

到了他的第二任期，他的支持者开始寻求重新修改宪法，允许他任

第三届总统。他本人也宣称，之所以要继续担任总统，主要是还有任务没有做完。乌干达仍然有党禁，不能算是完全民主的国家，老天和人民都应该多给他一些时间。

在这种旗号下，乌干达放松了党禁，允许多党派竞争，穆塞韦尼作为其中一党的领袖参加了竞选。他顺利地再次当选。

从这个任期开始，人们对他的批评开始增加，一是因为他长期执政，二是因为反对党更加活跃。人们对他的反对甚至引起了一定的骚乱。

骚乱之后，穆塞韦尼更加认定这个国家离不开他，于是在2011年又参加了竞选并获胜。到了2016年，这已经是穆塞韦尼参加的第五次大选，他还是获胜了。

也许乌干达再度陷入混乱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但到底如何过渡到全民主时代，是在他死前，还是死后？如果是死后，到底谁有威望能够保持乌干达的稳定？

也许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穆塞韦尼能够解决的就是在统一的基础上取得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至于其他的问题，可能就要留给第四代领导人去解决了。

卡加梅：和解的智慧

穆塞韦尼对非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最优秀的学生出现在邻国卢旺达，就是结束卢旺达屠杀的领导人卡加梅。

乌干达的问题主要是和平与发展，而卢旺达的情况却更加复杂，卡加梅上台之初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和解问题。

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但带来的社会问题才刚刚出现。按照中国人的看法，恶有恶报，杀人者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一个民族都变成了罪犯，又该怎么处理呢？

这甚至比二战之后的德国遇到的问题更棘手。二战之前，德国人虽然选举希特勒上台，甚至拥护他的侵略，但普通德国人可以说："我们并不知道希特勒在背地里杀害犹太人；我们知道政府对犹太人不友好，但不知道他们被送进了集中营屠杀。"而卢旺达的胡图人群体却确确实实知道屠杀，甚至许多人都参与了。事后，根据最保守的统计，胡图人中直接参与杀人的，接近了全体人数的五分之一。

到底是追究还是不追究？如果追究，也许没有一个胡图家庭是完全无辜的，这意味着卢旺达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要受到惩罚。如果不追究，那些图西族的受难者等于白白牺牲，哪怕处理得轻了，都可能导致杀人者心存侥幸，在未来继续发动类似的屠杀。

这是最考验卡加梅智慧的时刻。他之前只是一个军事领导人，成功转变成为政治家，是保证卢旺达恢复正常的关键。

卡加梅最初的做法令人感到担忧，却又带着希望。

一方面，他的军队在占领全国的过程中的确杀害了很多胡图人，甚至有人估计遇害人数在10万人上下。当然这可能是夸大的，没有人知道具体数字。几乎每个图西族士兵都与胡图人有血海深仇，当碰到杀害他们家人的胡图人时，他们不免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

如果顺着这条报复的路走下去，那么未来两个民族的冲突还将继续爆发。

这时，卡加梅就显示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在成立临时政府时，他并没有任性地成立单一的图西族政府，而是找了一些具有中立色彩的胡图族政治家出来，把他们拉进了政府。

象征最高权位的总统被授予了胡图人巴斯德·比齐蒙古。没有人比比齐蒙古更适合当总统，他曾经是胡图执政党的高官，后来因为亲人遇害，加入了卡加梅一方的军事组织。他是图西人能够接受的人，也是胡图人的代表。

除了总统之外，其余18名部长中，胡图人占了三分之二。至于军事领袖卡加梅，则只获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当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建立后，人们对于卢旺达继续混乱的担心降低了。

但在扎伊尔，胡图极端组织仍然以上百万胡图难民为依托，准备反攻卢旺达。卡加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扶持了卡比拉，将扎伊尔境内的胡图人赶回了家园，让他们重新投入生活。同时，他又借助扎伊尔的矿产资源暂时稳住了财政，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家水准。

但最棘手的问题还在后面：该如何处理当年的那些屠杀者？

对于煽动、组织的首恶分子，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要严惩不贷，但对于那些跟随者又该怎么处理呢？

最初，卢旺达也曾经试过要严肃处理。于是军队开动，将那些被指

控杀人者全都关进了监狱等待审判，绳之以法。但接着就发现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审判。卢旺达的司法系统已经超负荷运转了。

首先是监狱。卢旺达的19座监狱设计容量最高只能容纳8万人，在一阵抓捕之后，监狱里已经关押了13万人，更多的人还在源源不断地被送来。

如果监狱满了，可以加强流转，快速审判，快速枪决。但问题是，卢旺达的司法系统已经崩溃了。屠杀前，卢旺达有750名法官，屠杀后只剩下不到250名。法官死亡的还是少数，许多胡图族的法官实际上是逃走了，或者无法参与审判胡图人。律师更是少得可怜，全卢旺达一共只有50人。这样的司法系统即便加班加点，从1996年到2000年这五年间也只审判了3343件案子。要想处理十几万件，甚至数十万件，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有人预计要两百年）。

更麻烦的是，卢旺达的司法传统中是不用死刑的。当然，它并没有废除死刑，却已经很多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了。

最初的司法审判是很严格的，3000多件案子中，判死刑的大约占五分之一，监禁的占五分之三，剩下的是无罪释放的。1997年4月，一共22名死刑犯先后在公共场合被枪决。但公开处决引起的兴奋感过后，人们却开始批评政府不应该利用杀人来继续煽动嗜血的情绪。死刑犯们都继续待在监狱里等待接下来的命运，死刑执行实际上又被终止了。

没有审判的人被关押在监狱中，判决过后的大部分人还是被关在监狱中。照这样下去，恐怕监狱永远没有腾空的时候。

卡加梅认识到，当面临种族灭绝事件时，大部分人不可能受到足够严格的惩罚。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哪怕再悲愤，也只能先承认这一点。

在种族灭绝事件后，最重要的不是报复，而是赶紧弥合分歧，避免再一次发生。为此，卡加梅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将人们身份证上的民族信息拿掉。从此以后，所有的卢旺达人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只是卢旺达人，不再区分胡图族和图西族。在他看来，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是西方人强行划分的，他们有相同来源，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只有所有的人都不再提什么胡图和图西了，仇恨才能逐渐消失。

当然，在私下里，人们还是认同自己的民族的。在卢旺达，每个人仍然记得自己是胡图族或是图西族，在大街上就有人告诉我他是胡图人，并教我如何区分图西人和胡图人，当然我没有成功。卡加梅只是希望每一代的人都逐渐淡化这个标签，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人们就会忘记原来的身份。

第二，不能让那些罪犯在监狱里等死。这意味着必须加快审判的速度。卢旺达发明了一种草根法庭。

所谓草根法庭，就是不那么正规的法庭。由于正规法官不足，政府就从群众里选拔出一批人，教给他们基本的法律常识，由他们负责审判。

在实践中，这些“法官”往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中，有许多草根法庭的录像。这些录像中，法庭的地点往往是一小片公共空地，或者村子里的会堂，甚至审判者的家里。

审判是开放的，参加的人除了一名或者几名法官，还有当地的村民。受审的人站在中间接受询问。在录像中，有被审判者正在供述他杀人的场景，不带感情色彩，只是将如何杀人和盘托出，周围的人们认真地听着。

审判完毕，这些杀人者大都得到了轻判。他们或者只入狱数年，或者监外执行。接受宣判的那一刻，杀人者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该惩罚的都已经惩罚过了，从今往后，他可以摆脱那段噩梦般的经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

至于旁边的观众，也在现场又回顾了当年荒唐的一幕。他们的亲人、朋友、邻居或者仇人死于非命，让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

草根法庭的发明，终于解决了监狱不够用的问题，顺便还完成了对杀人者的宽恕，这将卢旺达人团结在了一起。

2012年，草根法庭关闭。卢旺达一共在12000个草根法庭，处理了120万宗案件。它的出现带着很大的争议性，到它关闭时，仍然有人对它非议不休，但大部分人却感激它终于让卢旺达最黑暗的一页翻篇了。

第三，黑暗过去之后，如果要让黑夜不再来临，首要的是发展经济，让人们过上好日子。

卢旺达虽然是全非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密度却很大。两个民族的纷争，一部分原因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对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争夺激化了两个民族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现代化。卢旺达是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国家，要想发展工业也不具备条件。

卡加梅提出，卢旺达要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大力发展非洲的信息服务业，依靠高科技产业从非洲突围。

提是这样提，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卢旺达的基础还很薄弱，能否发展高科技仍然是未知数。可不管怎么说，由于领导人的关注，卢旺达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不是由高科技带动的，主要原因还是黑暗之后的快速恢复。

在历次逃亡中，卢旺达的图西人如同非洲的犹太人，跑得全世界都是。有的已经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有了一定的积累。在卡加梅的邀请下，他们纷纷回国，带回来资金用于建设。首都基加利市中心已经高楼林立，就得益于卢旺达的开放心态。

除了基建，还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传统的咖啡种植和加工上。种族屠杀的悲剧反而让卢旺达的咖啡出了名。咖啡的质量本来就很不错，加上世界的同情，这使得它成了世界著名的咖啡之一。

除了吸引逃亡者归来，卡加梅还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弃条条框框，欢迎一切资本进入国内。鉴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卡加梅甚至宣称，只要能够发展经济，不妨学一学中国的经验。

在一切看上去欣欣向荣时，另一个问题却冒了出来。与乌干达等非洲新兴国家一样，卡加梅下台的时候到了。

他担任过几年副总统，随后由于和总统比齐蒙古闹翻，比齐蒙古辞职后，他便出任了卢旺达总统。

他作风霸道的一面也显示出来。他虽然没有发布党禁，但当比齐蒙古决定另立党派与他竞争时，他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找借口将前总统抓了起来。虽然他最终赦免了前总统，但前总统的几位追随者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至今在押。

说到底，卢旺达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卡加梅是依靠武力上台的，算是最有威望的，也最能获得各方派系支持，可一旦他下台，其他人有没有足够的威信来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呢？

2003年，卢旺达颁布了新宪法，规定总统可以连任一届，每届七年。七年已经属于超长的任期，但是仍然有到期的时候。

2015年，期限将至（2017年到期），卢旺达也果不其然地寻求修改宪法。这一次，他们通过寻求群众签名和公投的方式，决定卡加梅可以继续连任一届总统到2024年。同时他们修改总统任期为五年一届，从2024年开始生效。当新任期开始生效时，前任总统还可以参加竞选并连任两届。也就是说，根据现在的宪法，卡加梅可以任三届七年制总统和两届五年制总统，一共三十一年，到2034年下台。

如果到了2034年，卡加梅还老当益壮，也许还会有别的方法来延长他的任期。从目前看，人们也接受了让卡加梅长期执政，但是下不为例，也就是从下一任总统开始，必须遵守两届五年的规定，这算是给首创者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卢旺达众多棘手的问题。

独立是好的选择吗？

如果十年前有人问我，当一个地区寻求民族独立时，我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会选择支持。我常举的例子是荷兰和比利时。历史上，荷兰和比利时曾经属于同一个政治区域，名为勃艮第尼德兰，或者低地国家。16世纪，荷兰和比利时所属的区域都归属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权。后来，这个区域的北部（现代荷兰区域内）挣脱了皇权，建立了联省共和国，南部（现代比利时区域内）则仍然从属于皇权。经过两百年的变迁，原本属于一个政治单元的两块地方已经生长出不同的性格。

拿破仑战争后，战胜国考虑把两块区域重新合并成一个国家，毕竟在历史上它们曾经是统一的。但合并过日子时，两块区域的人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过不到一起去了，无法建立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政治架构。于是它们再次分了手，成了两个国家。分手过程不免冲突，但仍然是相对高效、具有绅士风度的。分手之后，两国都保持了繁荣，也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

这可以看作一个政治分家的最好例子：分家后，各过各的日子，同时保持了良好的亲戚关系，形成双赢的局面。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分家并不意味着末日，反而能够减少双方的摩擦，保证本区域内政治的稳定。

十年后的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例子仍然成立，可我的看法却有了变化。这个变化，源于我对世界上更多例子的观察，其中最典型的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观察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有着天然的优势和非常明显的劣势。

先说劣势，这个国家地处高原，缺乏令其迅速致富的自然资源。

但它的优势同样明显。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口。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它的人口超过了一亿，具有良好的工业化前景。周围的国家（除了南面的肯尼亚）都是前工业化国家，对于所有类别的工业品都很缺乏，因此只要埃塞俄比亚能够生产出来，就可以销售出去。

作为东非的中转中心，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家也下了大功夫来打造加工制造业，大修公路等基础设施，引进中国资本，一片忙碌的景象。

但在这繁荣之中，埃塞俄比亚却受到了一个重要因素的制约：要发展加工制造业，必须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设备，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海港。可惜的是，埃塞俄比亚是内陆国家，一个海港都没有。它的周围，却有好几个国家穷得只剩下大海了。

埃塞俄比亚的北面是一个叫厄立特里亚的国家，这个国家简直不能称为国家，它的存在仿佛是专门和埃塞俄比亚过不去。它的领土只是一长条海岸，除了海岸啥也没有，也没有耕地，但它恰好把埃塞俄比亚与大海分开了。东面则是另一个长条形国家索马里，在经济上一穷二白时，却拥有大量的海岸线。

这些国家不仅把埃塞俄比亚变成了内陆，而且和埃塞俄比亚冲突不断，绝不允许埃塞俄比亚借用它们的港口设施。结果成了典型的双输：埃塞俄比亚缺乏港口，只能求助于弹丸小国吉布提，才勉强和大海沾了边；而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空有海岸，却没有内陆纵深，只有沙漠没有耕地，照样无法取得经济发展。

如果埃塞俄比亚与其中一个国家（比如厄立特里亚）合并，让人口和资源自由流动，那么埃塞俄比亚得到了港口，厄立特里亚得到了人口和耕地，双方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偏偏是国境的限制，让双方都找不到出路。

这还不是最大的悲剧，如果翻开历史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

距现在仅仅二十多年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竟然真的是一个国家。1993年，厄立特里亚才作为一个国家诞生。

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时，甚至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衷心祝福，双方发誓要像朋友和兄弟一样团结友爱，让非洲之角充满和平与友谊。

这时统治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两个领导人都是武装斗争出身，身上自带光环，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不吝赞美之词，将他们与乌干达的穆塞韦尼、卢旺达的卡加梅并列为非洲的新一代领导人，对他们充满了希望。

然而，五年后，两个兄弟国家突然大打出手，双方一共数十万人死亡。这场战争让当年的兄弟恨不能老死不再相见。更要命的是，厄立特里亚的存在彻底锁死了埃塞俄比亚的前景，让它成为一个内陆国家，想要发展更加困难重重。而厄立特里亚在政治强压下，也进入了历史的停滞时代。回想起当年分家时的快活，人们不禁唏嘘，如果当年不分家多好啊！但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曾经与埃塞俄比亚属于同一个文明，大部分时间还是同一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是个基督教国家，靠海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虽然受到了很深的伊斯兰教影响，但整体上还是基督教更占优势，也就是说，两个地区没有宗教隔阂。

但自从意大利占领了厄立特里亚，这个地区的自我意识就在意大利的有意培养下产生了。二战后，埃塞俄比亚坚持收回厄立特里亚，但这里出现了一股游击队，试图将厄立特里亚分裂出去。它们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边进行游击战争，边等待机会。

如果埃塞俄比亚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那么，厄立特里亚的分裂情绪经过短暂的复苏之后，必然会被统一的好处所取代。如果能够经过两代人的时间，等那些在统一时期出生的人长大，成为社会中

坚，厄立特里亚将不会再想着分家单干。

问题出在了埃塞俄比亚一方。埃塞俄比亚经过了几十年的混乱，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时，不仅厄立特里亚的反叛加剧，就连埃塞俄比亚的其他地区也加入了叛军的阵营。

在厄立特里亚，反叛者的首领叫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阿费沃尔基之所以被列为新一代，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他本人是本土培养的大学生。他就读的大学是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皇帝被推翻后，改称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但在读了一年之后，阿费沃尔基决定加入对埃塞俄比亚的武装斗争，就辍学了。

这位游击队的领袖与中国还有着很深的渊源。1967年，他曾到中国接受了两年的培训，目的是增强他的政治理论与武装经验。

2013年，埃塞俄比亚选出了新总统（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穆拉图·特肖梅，他同样来过中国。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还担任过埃塞俄比亚驻中国大使。相邻的两个兄弟死敌的元首都有过在中国受教育的经历，这也可以看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

在皇帝时代，游击队的影响力还很弱小，也没有多少国家愿意提供帮助。但当杜尔格推翻了国王之后，阿费沃尔基领导的游击队突然间成了香饽饽，他被卷入了世界反布尔什维克的大潮之中。

由于苏联给杜尔格提供帮助，美国人就必须资助反对杜尔格的阿费沃尔基。在西方的支持下，阿费沃尔基将来自厄立特里亚的三支游击队整合起来，形成了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EPLF）。

但EPLF并不是唯一一支反对杜尔格的军事武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还兴起了另一支反抗游击队，这支队伍的士兵大都出自与厄立特里亚接壤的一个地区——提格雷，提格雷地区只占埃塞俄比亚总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却由于出了这支抵抗力量，一跃成了埃塞俄比亚政治权力

最强的地区。

提格雷的反抗军称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TPLF），同样受到了西方的支持，可以说是EPLF的兄弟军队。它们同文、同种、同宗教，唯一不同的只是在地域上一个出自厄立特里亚，一个紧邻着厄立特里亚。

TPLF的领导人叫梅莱斯·泽纳维，同样是一名大学生，就读于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不同的是，当泽纳维就读时，已经是皇帝统治的最后时期。两年后，埃塞俄比亚爆发了推翻皇帝的社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泽纳维组织了一个提格雷人的联合组织，在首都相当活跃。

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成就了杜尔格。当军人出身的杜尔格上台后，泽纳维又将目标变成了推翻杜尔格。这时的组织已经变成了TPLF。

最早的TPLF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与EPLF是一样的，就是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去，成立一个新的提格雷人的国家。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埃塞俄比亚将变成更加零星的碎片。

但TPLF比EPLF更加明智的地方，在于他们很快认识到，如果从埃塞俄比亚的母体之中脱离出去，小小的提格雷将活得更加艰难，最好的办法是推翻统治全国的杜尔格，建立一个由TPLF掌控的埃塞俄比亚。

在与杜尔格的斗争中，TPLF与EPLF并肩作战，最初EPLF更加强大，它把武器送给弱小的TPLF。它们又共同从西方接收武器，与杜尔格政权做斗争。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杜尔格终于支撑不住了。

但这时，TPLF与EPLF的目标分歧显现了出来。

TPLF以解放整个埃塞俄比亚为己任，目标是推翻杜尔格，建立一个民主制的统一国家；而EPLF则对埃塞俄比亚不感兴趣，它们只想获得厄立特里亚地区的独立。随着门格斯图的逃走，双方进入首都，到底

如何协调目标，就成了两支武装最紧要的任务。

美国并不想看到自己支持的两个武装开始火拼。在美国人的调解下，TPLF和EPLF决定妥协，将厄立特里亚问题交给厄立特里亚人自己解决，发起了一场公投决定厄立特里亚是去是留。这次妥协，也是泽纳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争议。

在埃塞俄比亚，泽纳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虽然他是赶走杜尔格、恢复埃塞俄比亚常态化的功臣，但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至少有三名埃塞俄比亚人跟我谈到，泽纳维是一个出卖了国家利益的罪人。其中一个人也说到了泽纳维的难处：泽纳维实际上掉进了自己的立场之中，他依靠美国和厄立特里亚推翻了杜尔格，当然不能和厄立特里亚翻脸，只能眼睁睁看着领土分裂。

1993年，厄立特里亚正式独立，它的独立受到了泽纳维的祝福，双方信誓旦旦要成为好兄弟。

泽纳维和阿费沃尔基两兄弟没有想明白的是：虽然分裂成两个国家，但两国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共同发展；否则，分裂对于两国都是巨大的失败。

厄立特里亚获得了所有海岸地区，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成了内陆国家。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大国，必须发展工业才能取得经济上的持久进步。可是发展工业需要海港，所以，哪怕厄立特里亚独立，埃塞俄比亚也必须使用它的海港设施。

而厄立特里亚除了海洋之外，缺乏耕地和内陆，也缺乏人口。当厄立特里亚守着海洋和荒滩时，也是死路一条。两国必须达成足够的谅解，让国民、物资和资本在两国间能够较为自由地流通，才能使两国经济都得到发展。

如果有足够的经验，双方的政治家应该敲定自由贸易条款后，再庆祝赢得政权，取得独立。但双方都沉浸在战胜了敌人的喜悦之中，谁也

没有关注未来怎么办。结果，更大的敌人反而隐藏在胜利的背后。

首先出问题的国家是厄立特里亚。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民主制已经成了主流，埃塞俄比亚的泽纳维顺应了这种趋势，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试图直接过渡到主流之中。

在厄立特里亚，获得了胜利的阿费沃尔基却对民主毫无兴趣。取得独立，已让他心满意足。于是，一党制、终身制成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基础。厄立特里亚向着闭关锁国滑去，成了最封闭的海岸地区。

在厄立特里亚走向封闭的同时，埃塞俄比亚却经受着另一种阵痛。由于历史上它是帝国模式，围绕着中心民族，有一系列的小民族存在，这些小民族并不希望受到埃塞俄比亚人的统治。在皇帝时期他们反抗，到了杜尔格时期仍然反抗，到了泽纳维时期，他们还不甘于保留在联邦之内。

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是东部的穆斯林，以及南部的奥罗莫人，只要这些地方的反抗不被平息，埃塞俄比亚的离心力过大，就很难形成有效的民主制。泽纳维也逐渐变得大权在握，对于民主的信心正在丧失。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两个兄弟国家之间。1998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冲突终于爆发了。

两国的边境问题原因如下：它们还是一个国家时，由于它们属于帝国的两个省，省之间的界线曾经经过了一些调整和争议。如果还属于一个国家，这都是小事。可一旦独立，原本的省界成了国界，冲突立刻爆发。

如果放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次战争并不是什么大事。简单地说，厄立特里亚侵略了埃塞俄比亚，但被体量更大的敌人击退了。

但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却是两国关系的彻底破裂。泽纳维由于当初同意厄立特里亚独立，在国内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随着厄立特里亚封闭

了边界，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成了一个大问题，国家经济也陷入了困境。

厄立特里亚更是雪上加霜，作为战败国，它不仅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为了封住国内反对者的口，阿费沃尔基向着强权越滑越深，没有人再把他的统治当作非洲新一代的希望，反而是看到了一出老剧本。

2014年，当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大量的厄立特里亚人正偷偷越过边界，来埃塞俄比亚求生。由于厄立特里亚的经济极端困难，它已经养活不了它的人民。但埃塞俄比亚也是移民输出国，两年前刚经历了一次饥荒。在饥荒的最高峰时期，女孩子为了一美元就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饥荒过后，虽然埃塞俄比亚依靠着吉布提和索马里兰接近了海洋，完成了一定的工业建设，但比起它曾经拥有的潜力，显然发展得还不够。如果当初没有分裂，那么它将走得更稳，而厄立特里亚人也能找到一条发展之路。

两个难兄难弟之间的挣扎仍然没有结束。这让我意识到，除了荷兰和比利时这样极少的例子，更多的例子表明，当一个国家分裂后，两个碎片之间的旧有矛盾让它们不可能和平相处，必然会成为敌人。当人员、资金和物资三个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时，分裂所造成的必然是双输的悲剧。

西非：艰难的政党轮替

对于塑造现代加纳来说，空军上尉杰瑞·罗林斯的重要性可能不比恩克鲁玛小。

罗林斯曾经是一位政变专家，也担任过军政府的统治者，但同样是他将加纳带回了多党制民主的轨道，脱离了一次次军事政变的轮回。

1979年6月4日，年仅32岁的空军上尉罗林斯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被军政府判处了死刑，关押等待执行。在这之前，他对加纳触目惊心的高层腐败感到愤慨，试图组织一次军事政变。但政变还没开始，消息就已经泄露，这导致了他被判处死刑。

在法庭上，罗林斯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索性甩开膀子，将加纳独立以来的衰弱、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尽情控诉。他的演讲越过了法庭的高墙，被传了出去。于是，这位年轻的上尉在自己还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成了加纳的社会偶像。

6月4日，在他等待死刑执行时，一群士兵突然闯入了监狱，将他解救出来。罗斯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解救他的人向军政府发起了攻击。于是他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将军政府赶下了台。

此刻的罗斯林是以愤怒的形象示人的，在获得了大权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报复。他将三位前军政府的总统全部枪毙，同时杀死了五位将领。在这次被称为“打扫房间”的行动中，他和士兵们想把所有的贪官污吏都杀光，重建一个新的加纳。

杀人过后，罗斯林表现出了高姿态，一方面重写宪法，另一方面组织选举，将权力还给了民选总统希拉·利马恩。

但新的民选政府只维持了不到两年，就显示出了足够的无能。

让加纳人最感愤怒的是从恩克鲁玛时代持续至今的腐败，罗林斯也为此杀了一批高官。但腐败并不仅是高层的产物，实际上，政权链条里的每一个小虱子都参与了贪腐，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上台，都无法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利马恩政府以软弱和一事无成著称。一方面，各个层级的小官吏都腐败；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甚至连一个小官吏都无法控制。加纳的社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更加瘫痪了。

到了1981年，已经被解职的罗林斯决定再次发动政变，这次他推翻的恰好是两年前他亲手扶上马的利马恩。

在彻底控制住局面之前，罗林斯不再相信所谓的民选政府，他将加纳带入了另一次军人统治时期。

在统治的前两年，加纳的经济继续恶化。为了控制腐败，罗斯林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官僚，但问题又出现在了政府控制上。

从恩克鲁玛开始，加纳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推崇在政府控制下发展大企业、大工程。这些企业没有给社会带来效益，反而侵蚀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造成了腐败和贫穷。当罗林斯反腐时，随着政府对官僚和企业的控制力加强，许多人不敢做事，经济反而更加瘫痪了。

经过反思，罗斯林认定，问题的根源出在加纳采取的计划经济制度上。正是这种制度消耗了加纳的经济活力，给了政府官员过多的控制权，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1983年开始，加纳进行了一次不声不响的经济革命，在大力引进海外援助的同时，接受海外的监督，进行经济私有化、行政透明化、取消补贴和价格管制。

加纳在经过了恩克鲁玛、军政府的二十年混乱后，终于又找到了经

济发展的回归之路。随着自由市场的恢复，加纳也成了西非发展最快的国家。

到了1992年，加纳的社会已经足够稳定，可以举行一次多党制的大选了。罗林斯开始重新制定宪法，这已经是加纳的第四部宪法。

据宪法规定，加纳实行多党制民主制，总统一届任期四年，最多只能任两届。罗林斯作为总统候选人参与了选举，成了加纳新的民选总统。

到了2001年，罗林斯两届任满，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试图修改宪法，而是挥手离去。他指定的政治上的接班人约翰·米尔斯也并没有能够接班，而是败给了反对派候选人约翰·库福尔，加纳完成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罗林斯不恋栈、不贪财，为加纳的政治树立了新的标准，让后来的政治家有榜样可依，共同让加纳度过了独立后最艰难的时期。

1998年的尼日利亚，正在监狱服刑的奥巴桑乔已经心灰意冷。他本来和罗林斯一样，早已经交出权力退休回家，指望在平静中度过一生。他在拉各斯附近拥有一个农场，饲养家畜和家禽。

不幸他却赶上了尼日利亚的乱世时期。阿巴查将军上台后的倒行逆施让奥巴桑乔忍不住站出来批评新政权。尼日利亚的大部分反对派将他看作一面民主的旗帜，虽然他本人并不想当。

1995年，阿巴查认定有一批人正在破坏他的政权。于是他声称发现了一次未遂的政变，而政变的头目就是奥巴桑乔。于是，这位退休的将军被人从家带走，关进了监狱。

与奥巴桑乔一起受审的大约有50人，他一开始被判处了死刑，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最后改为三十年徒刑。

1998年，事情变得越来越糟，野心勃勃的阿巴查将军正在为新一轮

选举如何操纵而奔波。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他必须做出一定的选举姿态，但又必须保证自己不下台。看上去，将军能够成功地操纵局面。

突然有一天，有人到监狱里找到奥巴桑乔，告诉他："你已经被释放了。"也是在同时，阿巴查将军死亡的消息传来。

按照官方的说法，将军死于心脏病突发；但根据小道消息，阿巴查死于两名印度妓女之手。这两名妓女是阿巴查将军从迪拜带来的，她们在将军的饮料中下了毒，将军凌晨4点半感到不舒服，回到床上后，6点15分就已经死亡。

阿巴查的突然去世，让尼日利亚的政坛再起波澜。所幸的是，继任者阿布巴卡尔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尼日利亚的再民主化。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政治犯问题。作为国内最大政治犯的奥巴桑乔就是在这时被释放出来的。接下来就是选举。尼日利亚仿佛在马不停蹄地补偿因独裁而拖延的选举制度。1998年12月，举行的是地方选举；1999年1月，进行了各州的选举；1999年2月，尼日利亚国会和总统选举同时进行。

奥巴桑乔拥有着超高的人气，尼日利亚最不缺乏的是军人统治者，奥巴桑乔也曾经属于其中一员，但他放弃了成为独裁者的机会，将总统职位拱手让给了民选政府。即便这次民选政府失败了，奥巴桑乔也并没有再次干涉政治的意图。到后来，这个没有太大野心的人反而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正是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奥巴桑乔本人来自西部，在监狱里服刑时，还皈依了基督教。但他还是得到了北方穆斯林的认可，他当选的选票占比62.6%，这在民族成分复杂的尼日利亚尤其难得。如果按照信仰划分，奥巴桑乔的选票不会超过一半，因为穆斯林占了多数。

由于刚经过独裁，1999年大选并非毫无争议，许多人声称大选有作

弊行为。但大部分人包括西方观察机构都认为，虽然不排除局部作弊的可能性，但在整体上，这次大选是合法的，无法动摇奥巴桑乔的优势地位。

成了总统后，奥巴桑乔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他的第一次再造共和失败，就是因为尼日利亚太复杂了，除非总统采用强力，否则无法平衡各方的利益。那么他第二次赤膊上阵，真的就能维持尼日利亚的民主和繁荣吗？

尼日利亚还非常贫穷，2000年的人均收入只略高于300美元，只有1980年时的三分之一，5岁以下儿童的夭折率达到了20%。

但对奥巴桑乔有利的是，尼日利亚很大，它可以被称为“非洲的印度”或者“非洲的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只要能够保持足够长时间的和平，社会就能自我发展，尼日利亚的企业家和商人就会遍布全世界，生产出五花八门的产品供应给非洲。

奥巴桑乔上台后，首先要做的是树立人们对民主的信心。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不断地告诉人们，尼日利亚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再走回头路。在非洲，他批评其他的独裁者，并承担着一个大国的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计划，向其他不稳定国家派出维和部队，帮助他们恢复稳定。

他的努力让英美等民主国家相信他是认真的，也开始认真给尼日利亚以帮助。

在国内，奥巴桑乔知道民主还很不完善，各个地方都问题重重。他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全国划一，而是采取了容忍的策略，中央政府遵循在联邦制下应有的权力，同时采取了很务实的态度。

比如，在东方伊博人的土地上，由于经历过战争和镇压，治安很成问题，这里诞生了臭名昭著但是又非常有效的“私法队”。由于公权力迟迟缺位，政府又不可能迅速建立有效的警察队伍，当地政府只好将治安

外包给了一个私人团体“巴卡西男孩”，这个团体以残酷地惩罚罪犯闻名。他们的执法方式是一旦某人犯罪，不管是偷窃还是抢劫、杀人，他们抓住后，不经过审判，就当众砍掉手脚，或者直接杀死。尼日利亚东部死于“巴卡西男孩”的罪犯有数千人到上万人。在严酷的私刑威胁下，这些地区的治安有了好转。

而在北部穆斯林州，州政府则开始推广穆斯林教法，同样用严酷的刑罚来遏制当地的犯罪活动。

奥巴桑乔无力控制这些政府暴力，只能容忍。这些行为对治安是有效的，能够带来经济发展，但同时又损害了政府保护人权的权威性，增加了地方权力，削弱了联邦的稳定性。北方的极端主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在奥巴桑乔统治下，尼日利亚恢复了大体的稳定，但局部又是不稳定的。这给了尼日利亚政治一定的柔性。虽然全国冲突不断，暴力事件还很多，但人们逐渐认同了联邦政府。

奥巴桑乔的幸运还在于，世界又进入了一个石油经济繁荣期。作为产油大国的尼日利亚在石油繁荣中再次崛起，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八年后，奥巴桑乔的两届任期到了。按照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一届。这时传出了有人在推动修宪的传闻，他们试图让奥巴桑乔再任一届。修宪的传闻并没有成为现实，奥巴桑乔没有参加新的选举。2007年，当新总统亚拉杜瓦获胜后，奥巴桑乔将总统职位和平地传给了继任者。选举仍然充满了争吵和指责，夹杂着作弊的指控，但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次选举大体上是合法的。这或许就是尼日利亚的风格：混乱，却又有一定的规则。

这已经是奥巴桑乔第二次和平传位。第一次时，新总统的腐败和无能让尼日利亚的民主遭遇了重大失败，那么第二次呢？

以人们对一个民主制度的评价标准来看，一个国家政治的成熟，必

须经历过几次政党轮替，奥巴桑乔传位给亚拉杜瓦，可以说是第一次轮替。

亚拉杜瓦是北方人，他任期未满就死了。他的副总统，一位南方人古德勒克·乔纳森接任。

2015年，乔纳森在选举中败给了北方人布哈里，他立刻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将总统职位交给了对手。

这次选举过后，人们似乎已经相信，尼日利亚的民主制经受住了最初的考验，即便它问题重重，但已经不能轻易下结论它会失败了。腐败仍然存在，北方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有更加严重的趋势，但尼日利亚一直都是在问题中前行的。

奥巴桑乔活着时，已经看到了政权的数次和平轮替，也许将问题重重的尼日利亚带回和平的轨道，让它在混乱中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演化，要比赖在任上直到死去，却留下一个问题重重的国家，更让他感到自豪。

第十章
白人的天堂结束了

2017年11月，长期在位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终于倒台了。这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参与过津巴布韦援助项目的一位朋友。他去津巴布韦时，那里恰好处于历史性超级通胀时期。

每天早上，他都拿100美元去找当地的华人店铺换成当地货币津巴布韦元，然后去买菜。每天都必须把所有换的钱花光，不能留在手上，否则，第二天钞票就又贬值了。大部分商店的商品价格都是一天一变，如果不及时下手，价格立刻上涨。

后来，当地商店里一天调两次价，再发展到随时调价。商店里的商品日益稀少，政府印的钞票面额越来越大。如果拥有美元，就立刻成了受欢迎的人，所有人都想着尽快把当地货币花出去，换成更加坚挺的美元、南非兰特、英镑、欧元，或者换成商品。留着当地钞票，就如同留着一块冰，眼睁睁看着它逐渐变小，最终消失。

津巴布韦元最终贬值到根本不值得印刷，已经不再是货币。津巴布韦进入了一个货币缺乏的时代，人们将所有能找到的外国通货——美元、南非兰特、英镑、欧元、人民币都拿来使用。这时才能看到钞票的流通作用，没有钞票，人们手里即便有商品也很难定价，即便有定价，也很难完成交易。

当外国钞票不够用时，津巴布韦尝试着发行了一种美元的代金券，规定人们可以用代金券当作等价的美元使用。这是一个解决商品流通问题的应急方法，但人们依然不敢相信这种代金券，因为它本身只是一张纸。当政府已经失去信誉后，谁敢相信政府说的话呢？

不过意外的是，当年一文不值的津巴布韦元却成了游客的紧俏商品。任何一个去津巴布韦旅游的人，都乐于从古董店里买两张印满了“0”的纸片作收藏，这可是人类历史上面值最大的钞票。在通胀最疯狂的时候，津巴布韦发行了面值100万亿的钞票（1个“1”后面14个“0”）。

因为这件事，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也成了人们嘲弄的对象。他接手津巴布韦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非洲位居前列。在白人的统治下，政治虽然不平等，但经济上却井井有条，带着小欧洲的色彩。三十年后，在黑人的治理下，国家破了产。有些人便以此证明非洲离不开欧洲。

这样的对比是有道理的，但我更加关注的是津巴布韦的执政者到底做了什么，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到底他们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哪些是自主选择，哪些又是他们不可控制的命运？只有分清楚了这些，才能将穆加贝大叔从哈哈镜的世界里解救出来，还原他作为一个领袖的是非对错。

穆加贝的命运，或许也代表了南部非洲原白人统治国家的命运，它们想同时做到发展和公平，却发现：要想保持发展，就无法兼顾公平；为了公平，就必然损害发展。津巴布韦是一个例子，南非虽然比津巴布韦做得好一些，却也经历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果南非想在未来避免出现更大规模的退化，那么津巴布韦的例子就是值得它借鉴的。

但不管怎样，这两个兄弟国家的命运暗示着，非洲作为白人的天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其哀叹与诅咒，不如接受现实，尽快处理

具体的问题……

世界英雄穆加贝

与大部分非洲国家不同，津巴布韦的独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控制津巴布韦经济命脉和社会政治的土生白人从英国独立。土生白人不到津巴布韦总人口的5%，却控制了50%左右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最好的。此外，他们还控制了津巴布韦的工商业。第二个阶段是穆加贝和恩科莫领导的反抗斗争。这场低烈度的战争持续了十五年，才在1980年迎来了津巴布韦的二次独立，也就是黑人从白人手中接管了政权。

穆加贝的独立依靠的是谈判，战争只是辅助手段。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黑人和白人达成了一个分享国家的协议。这个协议是：黑人由于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必然掌握政权；但白人由于占据了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如果白人资本撤离，津巴布韦会立刻从南部非洲的小天堂跌入地狱。因此，黑人政权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段内，必须允许白人继续控制经济。

当然，黑人不可能永远处于经济的下层，总有一天，黑人的生活水平会与白人拉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只希望这个拉平过程是和平进行的，不使用暴力，经过自然平衡过程，不让黑人痛苦，也不让白人痛苦。

当时的南非仍然在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津巴布韦和南非是全非洲仅有的两个黑白种族不平衡的样本。如果津巴布韦能够实现和平过渡，那么南非也可以遵循着同样的道路过渡到种族融合阶段。

在津巴布韦，虽然白人在其他经济领域——比如出口和商业——也都占据优势地位，但矛盾最尖锐的却是土地。黑人把白人占据的土地当成殖民时期的痕迹，希望尽快做出改变。但土生的白人已经是非洲人，

他们在欧洲已经没有了家产，必然要靠土地吃饭，他们也是最顽固的抵御黑人政权的阶层。到底如何让他们和平过渡呢？

我们不妨回到土地的源头去看看。

实际上，即便没有白人前去，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仍然会很尖锐。白人是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津巴布韦大规模定居的。在这之前，津巴布韦已经有了两种黑人。

第一种黑人是较早定居于此的绍纳人。他们以实行土地公有制著称。他们没有私人土地的概念，而是以部落为单位占有土地。在同一个部落的土地上，人们都可以放牧，并协作进行耕种。

18世纪，另一种黑人恩德贝莱人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并逐渐征服了绍纳各个部落。恩德贝莱人是有私有观念的，他们更倾向于将土地据为私有。

在西方人去之前，两种黑人的冲突贯穿了津巴布韦的早期历史。白人到来后，两种黑人的争端退居到次要地位。白人建立了殖民地，他们最初的目标不是土地，而是矿藏。津巴布韦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但无法弥补白人的投资。于是，逐渐地，殖民地当局开始把土地分配给白人，这就侵犯了当地黑人的利益。

二战后，津巴布韦（当时叫南罗德西亚）的土地状况，大约是白人占据了其中的一半，而黑人占据了另一半。

对于黑人更不公平的是，白人将土地划成了五等。第一等位于雨水充沛的高地，这里适合种植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第二等同样是高原土地，但雨水比第一等少，这类土地适合种植谷物、烟草；第三、第四等则是半干旱土地，适合放牧或者种植一些干旱作物；第五等是干旱低地，只适合放牧。在这五等土地中，白人垄断了最好的前两等和第三等的大部分，只把后两等以及第三等的一部分留给了黑人。这就意味着，虽然黑人名义上占据了一半的土地，但实际用途上却有天壤之别。

白人占据津巴布韦的优质土地造成了两个影响。坏的影响是，黑白两个种族变得极度分裂。白人社区整洁有序，但这是建立在他们垄断了优质资源基础上的。黑人社区由于人口密度高，土地退化严重，缺乏发展的空间。两者的对立更加严重。

但这样的格局也并非没有好的一面。对津巴布韦来说，好的影响是经济上的，由于白人善于治理，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理念，使得津巴布韦成了非洲的粮仓，城市建筑充满了欧洲风味，土地庄园也有着世界范儿。成熟的治理使得津巴布韦在非洲一直是富裕的国家。

穆加贝掌权后，如何平衡白人和黑人的关系呢？

事实上，穆加贝一掌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赞扬。在与英国人打交道时，他大胆地承诺，津巴布韦在经济制度上十年内不做改变，还给白人保留了一定的政府职位，甚至把两个部长名额送给了白人，这一系列措施给白人吃了定心丸。

在土地上，由于之前过于不公平，必须做出一定的改变。穆加贝的土地政策名为“愿打愿挨”，也就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上。首先，在战争中有一部分白人已经离开，如果有的土地实在找不到主人，就由政府出面分配给没有土地的穷苦黑人。但这部分土地只是少数，更多的土地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

津巴布韦鼓励白人自愿出售土地，白人可以自行规定土地价格，一部分由私人购买，另一部分则由政府出面进行购买。政府购买了土地，再发给没有土地的黑人。在交易过程中，为了避免有任何强迫成分，一切都出于自愿。甚至英国政府也参与进来，它们建立了一个资金池。当津巴布韦政府从白人手中购买土地时，一半的费用出自这个资金池，津巴布韦政府实际只用出资一半就可以了。

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经过十年，白人将手中掌握土地的20%卖给了黑人和政府，保留了其余80%的土地（也就是总量的40%左右）。

在和平、安定的资源环境中，不管是保留了土地的白人，还是新获得了土地的黑人，都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共同创造了津巴布韦独立之后的繁荣，经济增长迅速。当人们谈论起非洲的混乱时，总是把津巴布韦作为一个特例，与别的非洲国家作对比。

津巴布韦作为榜样还刺激了南非，使得人们用它作例子攻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逼迫南非的白人做出了重大让步，直至下台让给黑人。

独立初期，穆加贝作为黑人领袖的地位并不稳固，与他竞争的是一支游击队的领袖恩科莫。由于要整合黑人内部的势力，穆加贝必须获得国内白人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他也的确做到了获得世界的支持，让人们意识到穆加贝才是最好的人选，从而击败了对方，成了津巴布韦的领袖。

在那时，不管是西方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仅没有指责他，还将他称为非洲最睿智的领导人之一。如果顺着当时的轨迹走下去，那么津巴布韦将成为一个黑人白人和谐共处的美好样本，并保持足够的繁荣。

可是，为什么后来的津巴布韦却偏离了这个轨道呢？

逼上梁山的穆大叔

当世界庆幸非洲出了个穆加贝，并盼着他掌控全国局势时，没有了反对派的穆加贝却发现，要想顺着原来的路径走下去，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问题仍然出在土地和财政上。随着穆加贝兼并了反对势力，他的派系中众多的山头需要抚慰，政府对于财政的需求大大增加。购买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也使得政府财政变得入不敷出。

要想摆平国内众多的势力，光靠财政补贴是不够的，必须将更多的土地分配给支持者，才能解决眼前的困难。

在“愿打愿挨”政策下，白人卖出的土地是有限的。当黑人看到白人十年才卖出20%的土地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等不及了。

这并不是穆加贝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社会处于极端不平衡状态，白人占据经济优势，黑人占据政治优势时，社会迟早会进入矛盾激化时期。拥有政治优势的人会学会使用政权工具来解决平衡问题，而拥有经济优势的人一旦有了防卫心态，也会拒绝任何来自政府的善意措施，这就产生了死锁现象。加之白人可以随时将自己的遭遇诉诸海外，穆加贝的形象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角度说，他是被形势逼迫着往前赶，根本停不下脚步。

穆加贝的土地政策进入了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政府被授予了强制力，可以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征用白人的土地。但为了给白人以交代，规定白人仍然可以根据市场价要求合理的补偿。

这个阶段成了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关键时期，之前白人仍然能够保

持对黑人政府的信心，整个经济还可以维持。一旦打碎了白人的信心，那么津巴布韦的经济就会立刻下滑，进入螺旋下降阶段。

白人曾经因为穆加贝的诚意，照常经营着本国的企业。这时，许多人开始怀疑政府是没有底线的。在一个黑人统治的国家，占据经济优势的白人迟早会被剥夺掉财富。他们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减少甚至关闭本国的企业。因此，津巴布韦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那些分给了黑人的土地也并没有被好好利用。土地在白人手里时，白人随时可以通过向银行借钱，购买新设备，维持土地的高产出。但黑人并不懂得农业管理，也无法从银行贷款（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信用），土地虽然分下去了，产量却大幅下滑。他们把土地看成是财富本身，只是守着，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料。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加，围绕着穆加贝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最初的土地分配中，还能考虑到贫苦黑人的利益，尽量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穷人。随着政府权力的加大，土地逐渐从穷人转向了富人——腐败出现了。

在津巴布韦逐渐步入深渊的过程中，穆加贝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如果仔细分析，恐怕任何一个人接替他的职位，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在一个社会构成如此不稳定的国家，衰退或迟或早都会出现。黑人内部争权夺利也是一个新兴政权无法避免的。穆加贝也同样无法防止腐败。

如果不建立纯粹黑人政权，而是建立一个黑白混合政权呢？答案是：在一个黑人主导的民主制国家，根本没有可能建立黑白混合政权，因为政府中的白人迟早会被拥有众多选票的黑人所代替。

津巴布韦内部的混乱还没有结束，外来的打击再次到来：在英国的撒切尔和梅杰担任首相时期，保守党政府还在按照承诺，利用英国的资

金支持着津巴布韦搞土地改革。随着保守党的下台，新上台的工党首相布莱尔认为没有必要再支持一个遥远的国家搞改革了，特别是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听话，英国人的钱都不知道去了哪儿时。布莱尔停止了支付津巴布韦土地补偿金，这让穆加贝的改革必然转向。

在南面，南非的白人已经下了台，津巴布韦这个指路明灯也失去了价值。随着世界关注度的降低，世界援助也少了，大量的钱涌入南非支持那里的正义事业。这种资金的转向，更加剧了津巴布韦的经济灾难。

在英国提供资金之时，津巴布韦政府虽然有钱购买土地，但英国的资金也造成了土地价格过高的局面。随着政府征用土地过多，它已经没有能力按照市场价格给予白人补偿了。随着英国停止支付，穆加贝开始名正言顺地没收土地。于是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政府征收土地，且没有补偿。在这个阶段，土地改革也骤然加速，将津巴布韦的白人阶层迅速消灭。

到了世纪之交，津巴布韦已经破产了。由于白人离开后经济垮掉，一半以上的人失了业，通货膨胀率高达60%， 70%以上的人陷入赤贫。

为了应付局面，穆加贝参与了刚果战争。在战争中，他支持刚果的中央政府和总统卡比拉，与卢旺达和乌干达支持的反政府军打仗。津巴布韦控制了刚果境内的一部分资源，通过走私来解决国内的资金问题。到底是打仗花了更多的钱，还是从刚果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已经成了一堆烂账。人们只知道为了应付大幅度增长的军费，津巴布韦的财政变得更加捉襟见肘，而这时也就是津巴布韦滥印钞票的开始阶段。

随着国内的混乱，对于穆加贝的反抗也越来越多。1999年，全国兴起了一个叫“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简称MDC）的党派。这个党派来势汹汹，在未来的数次选举中让穆加贝吃尽苦头，穆加贝甚至不得不依靠作弊才能当选。

为了应付新来的挑战，穆加贝必须将全民的注意力转移。有钱的白

人不幸成了吸引全民注意的靶子。

2000年，穆加贝修改宪法以巩固权力，却在全民公决中以45%对55%失败了。这次失败成了导火索，十天后，全国突然出现了许多暴力分子，轮番向各地的白人农场进军。他们袭击白人，占领农场，甚至杀害那些为白人干活的黑人。

这次运动之后，津巴布韦残喘的经济彻底熄火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津巴布韦局势的恶化，国际上开始制裁津巴布韦，全世界的资本市场也由于津巴布韦无法还债而向其关闭了大门。一场巨大的“完美风暴”终于形成了。

2002年，穆加贝在选举中遭到了MDC的强烈阻碍。他宣布获胜后，立刻决定在一个半月内解决白人的土地问题，要求白人在四十五天内退还所有土地。

针对白人的土地运动一次接一次，但每一次运动又带着一定的不彻底，总有一部分白人残存下来，成为下一次运动的目标。直到2013年，津巴布韦才将所有的白人土地都剥夺，完成了彻彻底底的土地改革。

与土地改革并行的是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由于世界资本市场对津巴布韦关闭了大门，津巴布韦国内的经济彻底崩溃，原来的非洲粮仓如今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于出口，外汇储备彻底枯竭。而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最后只好依靠印钞来解决。

在1980年刚建国时，津巴布韦元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与美元不相上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仍然在增长，通货膨胀率还不算特别高，最高也没有超过20%，有的年份甚至保持了个位数。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每年20%到40%之间，世纪之交达到了50%以上。

2001年，津巴布韦元开始进入快速贬值阶段。这一年，津元贬值达到了112.1%，第二年就已经接近200%，第三年高达598.75%。这时，津巴布韦元就已经彻底失控了。一旦进入到这个下降螺旋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止货币变成废纸的进程。

2007年，津巴布韦通胀率达到了66212.3%。第二年，穆加贝失去了议会控制权，MDC占据了议会的109席，穆加贝只获得了97席。在总统选举中，穆加贝依靠作弊才拖进了第二轮。在第二轮中，又依靠恐吓和打手的力量，自行宣布获胜。但他不得不与MDC建立了分权制的体系，MDC的人担任了总理，他担任总统。

政治斗争的结果却是金融领域变得更加混乱，穆加贝控制的银行系统发钞也达到了最高级。2008年7月的通胀率达到了231150888.87%，11月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79600000000%。

穆加贝的土地改革和印钞机将津巴布韦从非洲小天堂变成了赤贫和混乱之国。更可怕的是，当人们复盘整个过程时，却几乎找不到避免发生这种悲剧的方法。

津巴布韦国内白人和黑人两极分化，白人占据了土地优势、知识优势、资本优势，人数却处于极度劣势，而黑人除了人口优势与政权优势，极端缺乏治理国家的知识储备，没有资本，也没有土地。

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同时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几乎都要通过一次全盘的洗牌来摆脱困境，而津巴布韦的遭遇，就是这样洗牌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讲，即便津巴布韦没有穆加贝，换成了其他人也很难找到别的出路。

经过了土地改革，黑人已经拿回了土地，津巴布韦终于可以在一块新的画布上开始作画，即便它没有之前那么流畅，必须从拙劣的线条开始，但毕竟是黑人们更加容易操控的局面。随着穆加贝的下台，如果津巴布韦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繁华一梦之后，他们或

许会醒来重新开始生活。

当人们看到津巴布韦的景象，再回头看另一个白人隔离政权时，不由得深深地为它吸一口凉气：难道这也是南非的命运吗？

最后的白人堡垒

1990年是南非最关键的一年。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做了三个决定，让这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再也没有了回头路。

第一个决定是：南非放弃核武器，成为一个无核国家。这意味着南非放弃了野心勃勃的军事计划，不再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敌人，而要向世界潮流靠拢。

第二个决定是：南非放弃对西南非洲的管辖权，让西南非洲独立，这个新国家就是目前非洲第三年轻的国家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问题是在一战时期出现的。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干旱少雨，属亚热带、半沙漠性气候，人口稀少，不适于生存。它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一战后，德国战败，把海外殖民地交给了国际联盟指派的新监护者。南非就成了德属西南非洲的托管国。

在当时，南非还属于英国的自治领，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官员，处于半独立状态。直到1961年，南非的白人政权才宣布从英联邦独立。

南非托管的西南非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微不足道的托管地，但随着西南非洲发现了钻石，南非变得更加积极，不想放手。西南非洲的游击队在国际支持下与南非打了几十年，德克勒克才最终决定放弃西南非洲。

德克勒克第三个决定更加重要：他决定放弃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首先将黑人政党“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ANC，即“非国大”）合法化，再逐渐将黑人参与政治合法化，直至建立

种族联合政府。而他最具诚意的象征性举动，就是释放被关押了二十七年的ANC领导人曼德拉。

在德克勒克作决定时，南非的白人大约有400万人，占南非总人口的不到10%。在历史上，南非是白人耕耘时间最长也最深入的地区。津巴布韦的白人政权不到一百年，而南非从17世纪就已经成了白人定居地。

耕耘南非的主要是荷兰人和他们的后裔，南非白人的主要语言是一种荷兰语的变种。经过数代的沉淀，荷兰人的后裔获得了布尔人的称呼。

布尔人成了南非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类似于欧洲的制度。20世纪初，英国人打败了布尔人，将南非变成了自治领，但实际的行政权却仍然在南非的布尔人手中，他们有自己的议会、总理和法律系统。

在白人政权时代，南非一片欣欣向荣，这里曾是继日本之后全世界发展第二快的国家。但这里的白人总是忧心忡忡，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黑人会毁掉国家的繁荣，以及自己宁静的生活。

白人曾经占南非总人口的20%以上，可不幸的是，白人的出生率永远没有黑人高。到了20世纪90年代，白人人口已经不到10%了。与白人生活的优雅闲致相比，黑人生活却极其清苦，他们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必须做那些白人不愿意做的肮脏活计。

在白人感到忧心忡忡的同时，黑人也怨声载道。在黑人看来，白人之所以能够生活得这么好，是以欺压黑人为代价的。九个黑人的付出，才换回来1个白人的安逸，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黑人的看法有道理却并不全对，白人的确依靠种族隔离和歧视白白占用了不少黑人的资源，但如果没有白人的良好管理，社会经济也不会发展。

双方各执一端，黑人希望与白人平分社会资源，而白人害怕黑人参与管理之后，由于能力达不到，会拖了社会的后腿，造成混乱和衰退，更无法保障白人的安全。这样的疑虑至今仍然存在。

令南非白人政权真正感到头疼的，不仅仅是黑人的暴力，更多的是国际上的压力。当1980年津巴布韦结束了白人统治之后，南非已经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种族隔离政权，人们总是提起津巴布韦黑人上台后是多么平静和繁荣，南非却是多么暴力和糟糕。对比之下，世界忘记了南非已经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经济体，而把它当作落后的象征，施加了一系列的制裁。

在制裁之下，南非的经济终于开始衰退了。随着经济的衰退，黑人的日子变得更加难过，黑人们的反抗加剧。经济衰退也影响了白人，他们预感到，如果不做出改变，世界就会一直让他们难受，好日子将永远成为过去。

但是，如何改变呢？如何既照顾到黑人的利益，提高他们的地位，同时又能够保障白人的安全，不以牺牲白人为代价来换取黑人的幸福呢？白人政权纠结于这个问题许多年，才由德克勒克强行打开了大门，做出了最终的尝试。

在德克勒克决定改变时，津巴布韦的白人和黑人还处于蜜月期。等发现事情不妙时，开弓已经没有了回头箭。如果南非的转变晚上十年，津巴布韦已经开始强行征收白人土地，恐怕南非的白人宁肯守卫财产而死，也绝不会放弃政权。

即便德克勒克已经宣布了政策，但是在白人内部仍然有极大的反对声。在白人看来，外界施加压力都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正要承担后果的是他们。如果失败了，世界上那些曾经制裁过他们的人只会在电视上唏嘘地看着他们的尸体，而不会有任何损失。

1992年，德克勒克为了寻求突破，宣布在白人内部举行一次全民公

决，并开足了马力为公决保驾。当公决以68%的赞成票通过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才终于走到了尽头。1994年，南非的新大选，白人与黑人同时参加投票。不出所料，占据人口90%以上的黑人把曼德拉送上了总统宝座，南非的白人永远失去了政权。

就在南非变天的同时，邻国津巴布韦的巨大混乱也揭开了帷幕。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一个结束种族隔离的引路灯了，对津巴布韦也不用再捧着，批评声逐渐高涨，援助慢慢减少。穆加贝开始加码征收白人的土地，津巴布韦的白人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津巴布韦的遭遇让刚刚放弃了权力的南非白人大吃一惊，南非能够避免津巴布韦的命运吗？

南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比津巴布韦幸运的是：南非有一个曼德拉。

曼德拉虽然是和平的代表，但事实上，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早期，也曾经尝试过武装对抗白人政权。最早时，ANC主要是一个依靠和平手段进行斗争的组织，但在看到和平手段无效之后，曼德拉开始采用一定的暴力进行反抗，这导致他在1962年以颠覆政权的罪名被捕。在狱中，他反思自己的斗争策略，开始重新拾起和平理念，这给了白人政权一个和谈的基础，双方在和平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

与穆加贝一样，曼德拉也有他的劣势，他并不懂经济。他虽然是大学生出身，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斗争上。对经济的管理需要经验和专门的学问，曼德拉最黄金的时代却是在牢里度过的，没有条件积累经验。

另外，曼德拉也曾经信奉计划经济，ANC曾经认为他们奋斗的目标是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达到社会的公平。如果在执政后按照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南非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津巴布韦。

可是，曼德拉却有着一项穆加贝永远不具备的品质：作为第一代领导人，他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儿，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作为一个和解的符号存在，至于更专业的事情，就让后人去做吧。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曼德拉坚持只做一届领导人，当黑人政权稳固后，就把责任交给年轻的一代，让他们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曼德拉担任总统的四年间，主要是解决影响团结的遗留问题，而不是在经济上做太多的文章。南非黑人掌权后，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让

黑人不对白人产生太大的愤怒，以及如何让白人感到放心，不像津巴布韦的白人那样撤离、逃走，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要知道，南非的黑人比起津巴布韦的黑人更有资格仇恨白人。白人的生活质量已经达到了南欧的水平，但黑人却挣扎在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列。大部分黑人还是文盲，在隔离带后面的他们眼睁睁看着白人享乐。不仅这样，白人还镇压他们任何企图逾越差距的努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发生过数次屠杀。至于虐待黑人，更是家常便饭。现在黑人成了掌权者，许多人想加倍地报复白人。如果发展到这条路上，南非占经济总量70%的白人经济将迅速垮塌，南非会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甚至许多白人由于不满意前政府主动放弃政权，早就打算离开了。一旦他们离开，黑人根本没有能力让政府运转起来。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白人政府到最后已经山穷水尽了。这个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被制裁时就已经无力偿还外债，国际信用接近破产。世界虽然大力支持黑人抗白运动，可世界的资本却是更加理智的，投资者不看好黑人政权，害怕借出的钱收不回来。曼德拉政府要想持续下去，不仅要打消世界资本的顾虑，还要让世界对他们比对白人政权更加放心。曼德拉检视国库，发现只够维持三个星期的政府财政，而政府所欠的外债已经达到了150亿美元。在白人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直是在下滑的，南非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处于失业状态。

一切都显得危在旦夕，曼德拉却将南非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他使用的办法是：和解，同时承担责任。

所谓“和解”，指的是黑人与白人不管以前有什么仇恨，都必须和解。曼德拉甚至去白人统治时期最死硬的白人总理遗孀家中做客，邀请曾经暗杀他的警察头子吃饭。他要让人们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和解，没有仇恨。这对于一个前暴力分子是多么困难的转变，但是他做到了。

在和解倡议之下，南非的白人虽然有流失，但大部分都留了下来。那些曾经参与镇压黑人的白人警察继续帮助黑人政权维持着秩序，他们知道时代变了，也知道这个政权是值得尝试的。

但在曼德拉的心目中，和解并不意味着不正视过去。和解，是承担责任的和解。“承担责任”，对外来说，就是黑人政府承担白人政府留下的一切外债和契约关系，让海外资本放心地继续投资南非；对内来说，就是政府承诺在保持现状的同时，要求每一个参与过冲突的人都承认自己的过错，只要承认了过错，就既往不咎。

曼德拉为此组织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TRC），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在种族隔离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暴力事件与错误政策。按照委员会的设计，一个人如果有罪过，可以向这个委员会去坦白，只要坦白过，就不再追究。但如果没有坦白，而是被调查出来，就可能遭到审判。

如果说和解是成功的，那么这个委员会则是毁誉参半的。对于黑人来说，这个委员会做得显然不够多，因为它放弃了惩罚。对于白人来说，他们本想忘掉那个时代，重新开始，只要不再提当年的事，他们会乐于成为新政权下的好公民，这种翻旧账的行为让他们心里感到不舒服、不放心。

但如果从中立角度看，设立这个委员会可能是唯一奏效的方法。如果没有委员会，黑人情绪得不到释放，很可能会产生更加极端的暴力情绪。委员会虽然让白人感到受了伤害，许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揭开了白人政权的伤疤，让黑人更加仇视白人，但实际上却可能起到了保护白人的作用。

另外，委员会不仅针对白人，也针对黑人游击队，甚至曼德拉的副手姆贝基都因为参与暴力活动而受到调查，ANC的其他领导人也受到过指控。只是由于阻力重重，姆贝基拒绝配合，最终不了了之。

调查进行过程中，一小部分白人离开了南非。在独立的前十五年，大约有20%的白人选择了离去，他们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地重新定居，这可能是政权转变必须付出的代价，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轻重，却无法完全避免。

到曼德拉离职时，至少人们认为南非已经超出了预期，一个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政府能够持续存在，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有退化，但顽强地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时刻。

曼德拉不恋栈的举动还为南非树立了一个标杆。正因为他适时地离开了，没有企图长期待在总统的职位上，这让人们更加把他当作种族和解的象征，并真诚地相信和解是可能的，权力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一旦现实中遇到了问题，人们就会想到他，将他变成一种精神激励，告诉自己不要轻易放弃理想。

客观地说，曼德拉如果继续留在台上，的确会面对更多的质疑。他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他的政策也会举步维艰。

曼德拉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实行的政策是资本主义的，更强调自由化，尊重白人的大资本，不触动现有格局。

但这个政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南非黑人地位的改善进展得太缓慢了。白人虽然走了一批，但剩下的仍然处于优势地位。在ANC内部也出现了一批黑人中坚，由于靠近政权，他们已经发了财。但是对于大部分黑人来说，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利，但经济权利却没有太多改变。他们不会长期满足于这样的地位，如果政府不提供帮助，他们就要自己去拿。

南非政府面临着与津巴布韦一样的困境：如果维持现状，那么贫困黑人迟早要用武力抢夺白人的财产；如果政府利用政策扶持黑人，又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把握不好度，就会造成对白人的打压，让白人流失更加严重，从而让经济垮台。

穆加贝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度，一开始过于强调维持现状，后来又想迅速改变，变成了剥夺白人的财产，津巴布韦也因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曼德拉不懂经济，显然不适合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下台后，将任务留给了继任者姆贝基。姆贝基能够完成吗？

与前任在经济上以稳定为目标不同，姆贝基在经济上的政策是“公平”。所谓“公平”，指的是让黑人享有与白人同等的经济地位。这是南非政府正视黑人经济地位低下的开始。

姆贝基推出的计划叫“黑人经济救助计划”。计划本身是要给黑人提供平等的教育、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计划提出了许多量化目标，比如黑人开设企业数量、小企业雇佣黑人人数等。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让黑人能够迅速参与到企业之中。

姆贝基的做法对黑人是有帮助的，但并非没有副作用。

对白人来说，政府的倾斜政策让白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以前企业雇佣工人只考虑技能，现在必须考虑肤色，由于掺杂了其他因素，使得企业反而失去了自主权。

对于黑人来说，政府扶持他们的举动也没有带来平等。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分配权，它总是倾向于分配给熟人和关系户，一批黑人巨富大都是和政府有瓜葛的人，大多数黑人仍然贫穷，享受不到当家做主的好处。

由于政府过多地干涉了企业的经营，南非经济又出现了收缩，经济困难让大部分黑人的生活质量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

在姆贝基时代，曼德拉时期培养的乐观情绪已经逐渐消散，人们讨论的不再是明天，而是今天的不平等和腐败。ANC的高官几乎都涉及腐败，其中包括总统姆贝基、副总统祖马。

南非还成了世界上最排外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南非一直是一个移民目标国，虽然白人政权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由于这里经济发展迅速，总是能吸引非洲其他地区的黑人前往。

到了黑人政权时期，虽然白人在离开南非，但许多国家的黑人却希望到这里生活。最典型的是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曾经也是黑人向往之地，但随着穆加贝改革引起的混乱，大量的黑人逃离了津巴布韦前往南非。此外，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金）等国的历次混乱都造成了大批难民逃往南非。

但黑人掌权后，南非却突然不欢迎难民了。这并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民间的情绪。黑人当家做主后，立刻将狭隘的一面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断地歧视移民和难民，制造摩擦，甚至发生过数次针对难民的骚乱。

他们之所以歧视难民，与国内经济徘徊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关。而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地位不平等引起的。要解决平等问题，势必影响稳定，要维持稳定，黑人的平等问题又会拖下去，到了黑人等不及的那一天，就会发生意外。

姆贝基没有解决黑人平等问题。他的政策毁誉参半，2009年，他被副总统祖马取代了。

然而在祖马时代，行政和社会的退化现象并没有解决。事实上，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南非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黑人正在提高自己的治理水平，但要完全达到以前白人的行政水平，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治理带来的问题，南非社会和经济都在缓慢地出现退化。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南非社会完全退化之前，让黑人的治理能力提高到足以应付局面的水平。这就像是一场比赛，到底是退化占了上风，还是治理能力的提高占了上风，就决定了南非问题未来的走向。

在祖马时代，一个新的现象正在出现。一个叫“民主联盟”的党派已

经取代了原来白人的国民党，成长为南非的第二大党派。与传统的国民党和ANC不同，“民主联盟”的支持者虽然主要是白人，但同样也有不少黑人支持。可以说，“民主联盟”正在成长为一个跨越种族的党派。

在经过了多年的黑人政党ANC掌权之后，人们意识到，问题已经不纯粹是黑白肤色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在经济问题面前，所有肤色的人都是平等的。“民主联盟”要求民主、政治透明，这不只是白人的呼声，也是一部分黑人的呼声。

这个跨种族政党还很孱弱，只能获得超过20%的选票，ANC的选票始终保持在60%以上。但对于南非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当人们还在纠缠于黑白肤色的问题时，新成长起来的黑人精英已经足够强大，能够抵御群氓政治的进攻，提出更加成熟的议题来取代种族问题了。

如果南非能够继续保持相对稳定，时间长到足够淡化黑白对立的情绪，让黑人成长起来，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满足，那么南非将摆脱类似于津巴布韦的困境。

如果没有等到这一天，经济发展缓慢，黑人精英成长不足，最终群众的敌对情绪压过了理智，那么很可能津巴布韦的命运将在南非重演。

2017年12月，丑闻缠身的祖马终于辞去了ANC主席职务。他打算让他的前妻德拉米尼竞选主席，从而在2019年继任成为南非总统。但不幸的是，在当月的非国大主席选举中，祖马力挺的德拉米尼败给了商人拉马福萨。

拉马福萨曾经是ANC中坚，后来借助姆贝基的黑人救助计划成了矿业大亨、黑人首富，也是现政策的得益人。但他本人坚持经济至上，同时大力提倡反腐，人们觉得不缺钱的他应该比前几任总统干净一些，这对于南非的行政能力提高是好事。

从现在的情况看，南非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但新的融合正在

形成，新的更加具备现代知识的领袖还在成长，到底谁的速度快，世界有乐观的依据，但也要警惕悲剧的重现。

第十一章
革命后的北非

在突尼斯的中部，有一个没有旅游资源，也没有什么特色商品的小城市西迪布济德市。突尼斯虽然国土面积小，却有着丰富多彩的文明遗存，这里有非洲保存最完好的罗马时期建筑，也有名震世界的迦太基城。这里还有全非洲最神圣的伊斯兰教圣地，以及摩尔人统治时期的漂亮城堡。

但最吸引我的，反而是这座不起眼的小城。

在城市中心一条最繁华的大街上，竖立着一座简陋甚至显得不伦不类的雕塑，雕塑的主角是一辆小贩的手拉车，手拉车上涂着突尼斯国旗。

这种手拉车在突尼斯显得极为普通，大部分小贩上街时，都会拉上这样一个木制的小车，放着要贩卖的商品。人们一天会看见许多这种手拉车，几乎不会对它有什么印象，因为它太普通了。

但这样一个手拉车为什么会被做成雕塑，放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呢？人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就在我拿出相机给手拉车雕塑拍照时，突然有人走了过来。“你是谁？你的护照！”那人突然拉住我，用仅会的几句英语问道。

“你是谁？”我反问道。

“警察！”这名便衣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了证件。我没有能力分辨真假，却知道这次必须听他的话了。

这种遭遇在突尼斯其他地方是很少遇到的。突尼斯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国家，人们生活得比较随意，乐于给外国人提供方便。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刁难，人们一看老外来了，总是愉快地喊：欢迎到突尼斯！这让中国人有些不适应。但这里却成了例外。

警察把我带到警察局后，让我等了一会儿，才带来了另一个人，看上去是他们的头儿。“你是谁？”警察头目也问道。

当他听说我是个中国人时，表现出了惊讶的神色。但接下去又交流不了了，他们只能再让我等待。不过警察头目不断地暗示我：不要着急，小事情。我的心放下不少。

最后，来了一个会英文的警察，我们可以互相理解80%左右的内容。警察头目关心我是否真的是中国人，接着又通过翻译问我：“你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你不知道这是民主的象征地吗？”

经过一番解释，他们又盘问了不少问题，都记录在一张纸上，又复印了我的护照，让我在笔录上签名。

这一切都做完，又等了一会儿，似乎接到了上面的指示，他们才回来告诉我：“欢迎来到突尼斯，你可以走了。”

走之前，那名会英文的警察专门提醒我不要担心，他们复印只是为了留底，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也请我不要对突尼斯留下不好的印象。“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已经民主了！”他最后说。

当他说出“民主”这个词时，显得有些自豪，又带着无奈。我能理解其中的无奈，那是因为就是他们几年前引发了民主革命，而现在他们却

必须成为民主的守护者。

2010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小贩在这里点燃了自己，以抗议警察和市政官员没收他的商品。这本来是社会底层人群里发生的一桩小事，却骤然间引爆了全国性的抗议，并输出国外，在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地产生了摧枯拉朽的冲击力，将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彻底冲毁，至今仍没有完成重建。

这就是著名的席卷全阿拉伯甚至全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这座城市就是革命的原爆点。

在距离手拉车雕塑不远的中央邮局，仍然挂着印有布瓦吉吉的大幅海报，上面写着：自由与尊严之革命。

警察局所在的大街已经改名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大街，透过警察局的窗户就能看见小贩车的雕塑和大幅海报，仿佛时时刻刻在提醒他们：当初小贩就是因为你们而死的，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警察们现在必须赞同革命，守卫革命成果，却又要小心翼翼地防止人们再革命，这种双重身份，他们已经花了六年时间来适应。[1]

不过他们适应得还算不错。茉莉花革命已经发生了六年多，给世界造成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许多国家都在革命中分崩离析，失去了稳定，只有革命发生地的突尼斯恢复了过来，显得平静而安详，成了世界上少数度过了革命却没有太严重后遗症的国家。

那么，茉莉花革命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革命，除了给阿拉伯世界带去了不稳定之外，对于非洲的穆斯林又有什么影响？突尼斯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又是怎么从革命中痊愈的？

这一切，要从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特质谈起，非洲的穆斯林国家都不例外地拥有这个特质。

【注释】

[1] 茉莉花革命发生在2010年底，作者此次访问突尼斯是在2017年。——编者注

自由的小贩，追求尊严的小贩

2010年12月17日，西迪布济德市26岁的蔬菜水果小贩布瓦吉吉早上醒来时，还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8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如果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这完全是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

这天早上，一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哈姆迪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布瓦吉吉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布瓦吉吉没有这个证件，哈姆迪按照规定扣押了布瓦吉吉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布瓦吉吉花了200美元。

布瓦吉吉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哈姆迪拒绝了他。

哈姆迪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哈姆迪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哈姆迪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布瓦吉吉还是不死心，他跑到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依然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

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布瓦吉吉却突然损失了宝贵的

200美元，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

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为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阿拉伯人的经商传统，以及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

在伊斯兰国家访问时，不管是在阿拉伯，还是在非洲，我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商人的自豪感。比如，在摩洛哥城市非斯，街头的一名商人这么告诉我："对于穆斯林来说，商人是最有尊严的职业，甚至超过了国王和总统。"

在中国古代，商人一直是受到压制的。但在穆斯林国家，却恰好相反。

穆斯林最初的来源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发明这个宗教之前，一直以沙漠地区的中间商自居。由于沙漠缺乏生产商品的条件，他们就把从中国、印度来的货贩运到地中海沿岸，一直把做买卖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先知穆罕默德也出身商人世家，他的老婆曾经是一个有钱的寡妇，也是靠商业而发家致富的。《古兰经》整部书都是以商人社会为底本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言行的。

比如，正是因为经商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所以阿拉伯人不断地向安拉祈祷，祈求安拉保佑。也只有商人能够一天五次向安拉祷告，因为在看店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进行简单的祷告。甚至在有的集市上，一到祈祷时间，整个市场的男人们立刻停下手里的活儿，在德高望重者的组织下就地祷告。如果是农民和工人，由于工作更加紧张，就很难抽出时间来进行五次祷告了。

穆斯林商人的信誉特别高，以突尼斯为例，除了少数以外国游客为目标的商店之外，这里的大部分店铺都是言无二价，不作假，老板也是

只要承诺就一定做到。每个商人都显得如此骄傲，将经商看成天赋人权，没有人也没有政府能够剥夺。

在北非世界，一个传统的城市总是围绕着一个叫“麦地纳”的区域，这里是老城区，或者保留了完整的传统生态的地方。

麦地纳由城墙环绕，城中清真寺点缀其中，城市里处处是蜘蛛网一般的小街道。最大的麦地纳位于非斯和马拉喀什两座城市。在非斯，我和两位日本人曾在城中迷路，转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出路。天黑后，不得不找人把我们带出来。在麦地纳里，每一条小街上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店铺，它们有的卖纪念品，有的卖当地人也需要的传统手工业品，还有的卖从中国进口的各种塑料产品、衣服。从早到晚，城里都熙熙攘攘，让人惊叹于穆斯林的活力。北非的老城保留着传统的模样，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在阿拉伯世界，小贩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别人给的，养活自己在他们看来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每一个小贩都盼望着有成长为大商人的那一天。布瓦吉吉也不例外，即便在他死亡的那天早上，也仍然盼望着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布瓦吉吉在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本·阿里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已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就牵扯到了事件的第二个层面：突尼斯的政治层面。

突尼斯刚刚从法国独立时，是一个国王制国家，但是国王制仅存在了短短一年，就被哈比卜·布尔吉巴废除了。于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两个原本类似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摩洛哥保留了国王，而突尼斯选择了共和。

布尔吉巴类似于土耳其的凯末尔，是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经济上

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强力者。

他通过选举上台，却建立了一党制，把自己改成了终身总统。他在宗教上打击那些伊斯兰势力，明确要求突尼斯变成一个世俗性的国家，同时大力提倡保护妇女权益。今天，我们去往摩洛哥和突尼斯，还能感觉到摩洛哥是一个传统的伊斯兰国家，而突尼斯则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这就是布尔吉巴的功劳。

但布尔吉巴在经济上支持国家控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突尼斯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这时，由于他的身体已经垮掉，医生判断他的精神已经不再适合执政。于是，1987年，总理本·阿里废除了他，接替他担任了总统。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本·阿里已经执政了二十多年。他虽然是一个强权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他在任时，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在布尔吉巴时代好过多了。

但问题出在本·阿里的维稳思路上。本·阿里在威望上已经不如布尔吉巴。突尼斯不是一个适合搞个人崇拜的国度，强如布尔吉巴，最终还不是下了台，更何况第二代的本·阿里？

可是，本·阿里却认为，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的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继续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

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本·阿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

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付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如果要获得更多罚款，那么必须与许可证制相配合。这种制度的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交钱的项目多，一旦没有许可证，就要罚款。

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通过罚款获得足够的“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许多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的状态，而警察可以“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

布瓦吉吉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下。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力量，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获得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将非法变为合法的过程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

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突尼斯虽然经过了世俗化，但仍然是一个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人们心中经商自由的信念还在。而政府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行为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得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超级稳定的假象。

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

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

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也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北非强人倒台了

茉莉花革命从突尼斯开始，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除了突尼斯，还有非洲的利比亚、埃及，中东的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卷入其中。除了叙利亚，其余几国都推翻了原独裁政府，成立了新政权。除了这些出现了革命的国家，其余的君主制和独裁国家都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甚至扩张到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然而，正当人们为阿拉伯革命欢呼时，事情却骤然转向，向着人们始料未及的方向滑去。

亚洲的叙利亚陷入了血腥的内战，大量的难民铺天盖地向周边国家扩散，总统阿萨德仍然当政，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已经边缘化，极端派正在酝酿成立恐怖的哈里发国家。

在也门，虽然原总统萨利赫被推翻，但随后建立的新政权并不得人心，还陷入了教派冲突之中。属于什叶派的宰德派穆斯林在伊朗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开展反政府的内战。而沙特领导的海湾国家则开始空袭也门，将也门内战推向了另一个高潮。2017年12月，正当人们以为原来的统治者萨利赫已经平安远离政治时，他却经受不住诱惑，加入了沙特阵营企图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最终被反对派杀害。

革命在非洲的影响，则是两名北非强人的倒台。

首先倒台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非洲，埃及一直是一个指路明灯式的国家。欧洲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全盘控制的殖民地，另一种则是当地代理人主导的保护国。埃及虽然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却拥有自己的国王，它甚至比保护国的地位都高一等。国王对于

国内的掌控更强，只是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听任英国控制了一部分外交和财政。

二战后，埃及也一直以两个领头羊自居：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和非洲的领头羊。

1953年，埃及军官纳赛尔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实现了完全独立。纳赛尔在革命上很有一套，但在治理国家上，却显得力不从心。

在独立时，为了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纳赛尔与英法等欧洲国家闹僵了，只能依靠苏联等东方国家。这导致埃及在经济上也实行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的经济逐渐僵化、倒退。在军事上，埃及也屡屡被以色列打败。

但由于纳赛尔一直保持着反对西方的姿态，使得他成了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英雄，直到他去世。

纳赛尔靠个人魅力来进行统治，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缺乏这样的魅力，只能靠强力来维持。

突尼斯革命爆发后，埃及人也立刻被唤醒，开始了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2011年，人们纷纷走向街头，通过游行逼迫穆巴拉克下台。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总统已经变得这么虚弱，穆巴拉克竟然无法应付抗议，他试图用武力镇压，但军队在革命的号召中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在一片混乱中被赶下了台。

穆巴拉克下台后，革命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混乱的开始，而不是秩序的起点。

革命成功后，以军人为首组织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带有很大的诚意，决定组织制定新的宪法。当宪法通过后，再组织全民选举，过渡到民选政治。

但组织工作千头万绪，革命的群众又等不及了，军人政府只能在一

片匆忙中，在2012年中期组织了大选。在两轮选举中，宗教保守势力穆斯林兄弟会推出的候选人穆尔西最终获得了多数票，击败了对手当选新埃及第一任民选总统。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民主选举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但事实证明，民主选举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距离胜利还很遥远。

经过长期的高压统治，埃及缺乏合格的尊重民主规则的政治家，而社会也并不真的了解宪政的深层含义。这个缺陷在选举后被无限放大。

首先，那些参与革命的年轻人以为推翻了强权，民主就会自动产生。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街头运动上，在推翻穆巴拉克时居功至伟，但在随后的选举中却显得极其幼稚和被动。作为民主力量，他们本来应该结成更大的联盟参与选举，成为成熟的政治势力，然而庆祝胜利的青年们如一盘散沙，虽然组织了各个诉求不同的小团体，却无力参与全国的政治分配，迅速被边缘化了。

随着这些革命青年被边缘化，他们对政治变得更加不信任，虽然是他们参与投票选出了穆尔西，却缺乏建设性的容忍，随时可能改变立场发动另一场革命。

其次，在穆巴拉克政权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坏人，他们之中有许多懂得政治运作的治国人才，但这些人又和前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利用他们的长处，同时限制他们的不利倾向，是埃及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离开了他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正常运转，过于依靠他们，又会回到旧轨道。

然而，处于革命激情之中的人们并没有容忍的习惯，他们通过选举，简单地将旧政权的人排除在外。这就使得埃及社会中的许多精英分子无法参与到政权之中，他们对新政权阳奉阴违，使得社会经济迅速进入了混乱状态。

再次，当社会精英、革命青年都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时，另一个旧

势力却乘虚而入，这个势力就是宗教保守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

所谓穆斯林兄弟会，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成立的一个宗教政治组织。它的目的是，恢复穆斯林的教法统治，回归到政教合一的状态。这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宪政是背道而驰的。不过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极端，它主张通过参与现代政治，首先是进入议会，成为执政党，然后慢慢地修改宪法，逐渐达成目标，并不想采取暴力手段。

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还是一个慈善团体，在埃及穷人中运营着从医疗到教育的大量慈善机构，这使得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政治真空中，立刻成了埃及政坛第一大势力，在选举中顺利上台。

上台之后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想保持温和的立场，但它的终极目标与民主相悖，这个矛盾被放大。由于缺乏执政经验，穆尔西总统无法治理好埃及的经济，人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想加强权力，却立刻陷入了想搞独裁的指责中。最后，他又想通过回归伊斯兰教法统治来改造政治结构，却让人们担心埃及社会越来越倒退。

结果，上台才一年，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就陷入了危机。当初喜气洋洋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穆尔西下台。

当军队首领、国防部长塞西发动政变时，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强人回归，因为在他们看来，强人至少能够带来稳定，人们的生活至少是确定的。

从整个过程来看，埃及的各个政治势力表现得都不合格。革命者根本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在重建伊始就被排挤走了。他们可以走上街头推翻政权，却不会走进议会建设政权。旧政权精英曾经有意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却由于人们的不信任，加之自己的惯性，发现还是回归原来的模式更省劲儿。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不懂经济建设，也缺乏执政能力，只想尽快实现宗教理想。

由于缺乏成熟的政治势力，埃及的失败并不意外，唯一的意外在于它失败得太快了，没有给庆祝革命胜利的人们留下接受失败的时间。

不过，当埃及人看一看旁边的利比亚时，仍然要庆幸自己是幸运的。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比穆巴拉克晚，但结局却悲惨得多。

在阿拉伯世界里，卡扎菲的名声没有纳赛尔响亮；但在非洲，卡扎菲的势头却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利比亚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一战后成了意大利的殖民地。与它东西的邻国埃及和突尼斯不同，利比亚缺乏水源和河流，一直只是北非的小兄弟，没有当过带头大哥。它的国土也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缺乏统一性，人们更习惯于对部落忠诚，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在这些部落之中，最重要的区域有三部分，分别是西面也是首都所在地的黎波里、东面的昔兰尼加，以及西南部的费赞。

1951年，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利比亚取得了独立。国际社会给利比亚设计的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由昔兰尼加的酋长伊德里斯担任国王。

1969年，一群青年军官模仿纳赛尔的做法，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国王。国王的倒台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这是因为利比亚人本来对国家就没有太多的感情，国王出自昔兰尼加，其余地方的人们更不喜欢他。

卡扎菲上校来自一个小地方苏尔特的贝都因人家庭，与这三个地方联系都不密切，反而让三个区域都可以接受。

纳赛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不断地利用自己的理想感染别人，但最终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是，纳赛尔手中的牌是有限的。埃及是一个复杂的大国，财政没有那么充裕，纳赛尔在做许多事

情时有心无力。

但他的学生卡扎菲却是另一番情况，他花钱大手大脚，缺乏统一的目标，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就在他革命前后，利比亚恰好发现了大量的油田，这使得卡扎菲永远不缺钱。利比亚人口少，社会状况更加落后，卡扎菲的统治是典型的部落制统治，他就是全国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没有人反对，他可以动用全国的财力做他想做的事情。

结果，利比亚的卡扎菲立刻成了西方世界的眼中钉，以及非洲国家的超级英雄。

因为阿拉伯人的身份，他资助了全世界的反犹活动。除了针对犹太人，他还支持世界上各种反帝的活动。非洲国家的强人们大都能领到卡扎菲的经费。

卡扎菲除了支持了许多无用的项目，也有不少有用的。比如，阿明下台后，卡扎菲对于乌干达的支持并没有减少，直到他死后，乌干达人仍然在纪念他。

当他对外大把撒钱时，利比亚人民的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这里远离现代文明，许多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宝贵的石油只属于领袖个人，与普通人无关，也谈不上改善他们的生活。

正是这种与国内利益的脱离，让卡扎菲看不到人民的诉求，而人民也不在乎领袖的高尚目标。

2011年，随着两个邻国发生了革命，利比亚也终于忍不住了。

只是，利比亚的革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不同，它带着深深的部落特征。与其说这是一场民主革命，不如说这是部落借助革命时机，反对卡扎菲的酋长式统治。

卡扎菲一直试图弥合利比亚的部落分歧，利用独裁强行让各个部落听话。在反对他的斗争中，各个部落首先想的不是联合，而是分裂。这

或许是世界人民当初都没有想到的，他们只沉浸在了强人倒台的狂喜之中，却没有想到接下来怎样重建秩序。

如今，利比亚的革命已经过去了六年[1]，然而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在东部支持昔兰尼加派，而欧美在首都的黎波里支持另一派，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也不断。

而最麻烦的就是，许多极端分子利用此机会占领了利比亚的沙漠地区，使得北非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又一个基地。

当革命在全世界制造了巨大的混乱时，革命的原发地突尼斯会变得怎样呢？它会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乱了套？

出乎意料的是，突尼斯却开始拒绝革命了。

【注释】

[1] 本书初稿写于2017年。——编者注

力挽狂澜的四重奏

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的共和国日，议员穆罕默德·布拉米正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开车外出。突然间，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追上了他的汽车，摩托车后座上的人向他连开14枪。当天，这位人民运动党的领袖死在了医院。

这次政治暗杀，与当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另一次暗杀一起，将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推入了危机之中。2月6日，另一个反对党领袖、民主爱国运动党的贝莱德，几乎以一模一样的方式被刺杀。

在两人被刺杀前，突尼斯已经成了2011年席卷阿拉伯的革命的最后样板。穆罕默德·布拉米被暗杀前的一个月，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发动政变推翻了穆尔西，建立了强人政权。突尼斯这个革命的首发地和堡垒，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台上的温和穆斯林政府正在失去耐心，担心它的无能和腐败无法给突尼斯带来安全和繁荣。这两起政治暗杀，更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像埃及人一样，逼迫政府下台。

那么，这块阿拉伯革命最后的热土，也会和埃及一样重走回头路，告别革命，拥抱强人吗？

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当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人们回头看一看突尼斯，发现埃及的问题也恰好就是突尼斯的问题。与埃及一样，在突尼斯执政的竟然也是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出现几十年后，除了在本国发展，还成功地将宗教理想输出到了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这

些机构与埃及本部保持着或多或少、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个分支被称作复兴党（Renaissance Party或者Ennahda Movement，简称Ennahda）。在本·阿里执政时期，这个组织也被定成了非法组织。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原政权被推翻，各地的穆斯林兄弟会纷纷从地下变成了地上。穆斯林兄弟会的突尼斯分支，也摇身一变组织了政党复兴党，并一跃成了突尼斯的最大政治势力。

革命后，突尼斯决定成立一个制宪大会，负责制定宪法和选举临时总统。这个制宪大会有217个席位，由人民选举决定。复兴党一举获得了其中41%的议席（89席），远远把其他政党抛在了后面，第二名的共和党只获得了13.4%的席位。

随后，复兴党和共和党、 劳工自由民主论坛三大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由共和党党首蒙塞夫·马祖吉出任临时总统，而实权则落入了复兴党手中，由该党推出总理并组内阁。到这时，同样是推翻独裁，同样是宗教保守派的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新政权，突尼斯革命与埃及革命的发展惊人一致。

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复兴党也是温和的宗教保守派，并不主张暴力，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慢慢地回归宗教社会。然而当它上台后，宗教主张中与民主政治不协调的因素逐渐凸显出来。

突尼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新宪法。这个宪法如果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就是世俗的；如果加入了太多的宗教成分，必然引起宗教回归。所有的人都知道宪法的重要性，都不想在宪法问题上让步。于是，制宪大会立刻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和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执政困难重重。埃及的穆尔西无法解决这些困难，让埃及的经济举步维艰，渐渐失去了民心。突尼斯也遇到了同样的

问题。

最初，人们预期一年内就能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一年过去了，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世俗左派希望建立福利政府，世俗保守派更强调经济自由，温和的宗教保守派认为宗教化并不妨碍民主，而极端的宗教派则试图否定民主原则。世俗派、温和派的信心都在政治死锁中被消耗殆尽。

这其中，矛盾最为激烈的是世俗左派与极端宗教派，世俗左派希望毫不妥协地把民主原则贯彻下去，并打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依靠穷人和劳动者建立政权，而极端宗教派则把世俗左派当作最大的敌人。

两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属于世俗左派，而制造谋杀的人则是极端宗教派。执政的复兴党政权属于温和宗教派，然而，由于这个政党的群众根基在于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他们不敢对极端宗教派采取措施。

经济政策的无能、社会稳定的逐渐丧失，终于也让突尼斯人民忍无可忍。在埃及人走上街头、协助军方推翻穆尔西统治一个月之后，突尼斯人也走上街头，要求保守的复兴党政府下台。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也将以悲剧告终。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突尼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熟的社会组织。到了他们出手的时机了。

虽然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进程看上去如此相似，但埃及社会是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化的两极中，一方是前政权的既得势力组成的上层结构，另一方是带有宗教化倾向的底层百姓。长期在台上的穆巴拉克不允许任何成熟的反对势力存在，使得人们把执政者及其阶层赶下台后，找不到任何有执政能力的人来接替下台的人。群众只能在推翻还是接受一个政权这个两难选择中做出抉择。

在突尼斯，当政治家们陷入僵局无力解决政治死锁时，一种平行的

权力却在发展之中。首先出面的是突尼斯总工会（Tunisian General Labour Union，法语简称UGTT）及其领导人侯赛因·阿巴西。

在西方世界，工会往往是一个与现有社会结构对抗的角色，他们善于搞罢工和游行。然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会都是世俗派和民主派。当突尼斯进入危急时刻，要么陷入宗教恐慌，要么回归强人政治，工会领导人阿巴西意识到，要保住革命的成果，必须由工会和其他超越党派的世俗性组织联手，来推动变革，避免像埃及那样走回头路。

为什么是总工会？因为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会员有5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深入到了全国各个行业之中，拥有着卓越的动员能力。也只有总工会出面，才足以与复兴党这样同样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组织相对抗。

阿巴西还意识到，仅仅靠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会虽然强大有力，却缺乏足够的财富支撑。阿巴西此刻想到的是另一个组织，也是工会的长期对手：突尼斯工商界联盟（Tunisian Union of Industry， Trade and Handicrafts，法语简称UTICA）。

UTICA的成立只比总工会晚了一年，拥有17个行业联盟、24个区域联盟和216个地方联盟，代表了突尼斯全国15万的工商阶层。

如果说总工会是“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么工商联盟就是“金钱就是力量”。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就有了逼迫政治家们妥协的力量。

但是，总工会与工商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头。总工会代表了雇员，是政治上的左派，而工商联盟代表了雇主，是政治上的右派。突尼斯的企业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这既是一种保护色，也与工会的世俗派倾向相对立。同时工商联盟还与前独裁者政权藕断丝连，其前任领导人与独裁者本人就是亲戚，在革命中被迫辞职。

到了2013年，工商联盟由一位女企业家瓦迪德·布查玛维伊领导。幸运的是，布查玛维伊和阿巴西一样看到了政局的危险。她意识到，如

果现在不出手拯救革命成果，让突尼斯陷入彻底的失序，首当其冲遭受损失的就是突尼斯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以叙利亚为例，当叙利亚陷入内战后，社会已经没有发展经济的空间，大批的工商业人士要么逃离该国，要么被各种军事集团胁迫而倾家荡产。突尼斯绝不能走向这条路。

两个曾经对立的组织决定联手，这是全国对话联盟能够形成的关键性一步。

在获得了工商联盟的支持后，阿巴西将目光转向了两个更加专业的伙伴：突尼斯人权联盟（Tunisian Human Rights League，主席是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以及突尼斯律师联盟（ Tunisian Order of Lawyers，主席是查基·塔比布）。

于是，一名女商人、一名工运分子、一名人权活动家、一名律师，这四个看上去不搭界的人走在了一起，他们联手改变了突尼斯的政治进程。四个组织代表了突尼斯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他们以法律为武装，并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超越了政党的功利性，只想保持住突尼斯的稳定和革命成果。

2012年9月，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成立的时候，突尼斯的政坛正处于危险之中，人们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执政党下台，然而执政党复兴党却坚持不下台。与复兴党对立的大部分是世俗性党派，他们或左或右，但首先防范的是复兴党回归宗教政治。不过，反对派们很难与复兴党达成和平协议，看上去似乎只有学埃及暴力推翻政府一条路可走。

与此同时，反对派42名制宪大会议员辞职，使得制宪大会陷入了停摆状态，政治彻底陷入僵局。

9月17日，对话联盟第一次亮相就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以阿巴西为主角的联盟领导层意识到，以往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人们往往有要推翻的目标，却没有新的建设目标。以此次危机为例，人们明确的目

标就是要推翻复兴党政府，但推翻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政府，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话联盟不想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出现，所以在亮相伊始，就以中间人的身份抛出了一份明确的路线图。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中间人，而要撮合的双方则是执政的复兴党政府以及反对派。在路线图中，他们明确提出撮合的目标有四点：

第一，由于执政不及格，现任政府必须下台，但如何让其体面地下台？不能简单用反对派替换掉现任政府（复兴党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而是要在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让现任政府把权力交给一个重新选举（或推举）的中立政权。

第二，既然要组成新政权，那么必须协商出明确的选举（推举）步骤和日期，并着手组织。

第三，突尼斯的新宪法还久拖未决，双方要求差别很大，对于新宪法制定也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要求。

第四，各方必须做出保证，支持突尼斯民主化转变中要经历的各种步骤和措施。

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和建议都是公正的，对话联盟一炮打响，很快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参加制宪大会的各个党派中，绝大部分都同意支持这个路线图。由于局势恶化得很快，现任政府知道与其等待被推翻，不如体面下台。9月28日，复兴党政府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同意留下三个星期讨价还价的时间，如果三个星期内能够敲定路线图上的各个细节，那么政府将在三个星期后辞职。

绝大部分党派支持路线图，同意谈判，以及政府同意谈判取得成果后辞职，这是对话联盟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三个星期过去了，政府却没有辞职。

问题出现在，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对复兴党来说，他们知道一旦离开了权力，许多政治要求就会被搁置，因此希望趁在台上时把宪法确定，在宪法中可以塞入一定的对宗教进行保护的条款，避免突尼斯走向完全的世俗化。对反对派来说，在自己上台后再制定宪法更加有利，也更能巩固世俗化成果。

双方僵持不下时，以阿巴西为主角的对话联盟作为中间人决定利用场外因素进行施压。10月23日，已经等不及的民众开始了密集的游行，呼吁复兴党政府下台。第二天，总工会号召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来逼迫政府做出选择。

在对话联盟的软硬兼施之下，复兴党政府被迫再次回到了谈判桌。10月25日，谈判继续，人们焦急地关注着谈判的进程。

谈判的焦点仍然在宗教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了信仰自由。作为回报，世俗派也做出让步，承诺给宗教以一定的特权，避免宗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如果仅仅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承诺是一种退步，然而，真正的政治往往就意味着一定的妥协，为了和平地向民主转变，这样的代价有时不得不付出。

到了12月，谈判已经跨过了无数暗礁，如等不及的人们发动的新罢工，极端派别的恶意破坏。此时新的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重大议程出现：复兴党政府辞职后，新的总理人选是谁？

这个人必须是双方都接受的，又能保证政治进程顺利演进的。对话联盟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名叫迈赫迪·朱马的人。

为什么是朱马？因为他是一个参加了复兴党政权的独立派。朱马是工程师出身，一直独立于政治之外。直到2013年初，由于复兴党政府需要一个懂工业的人管理工业，朱马才离开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加入了复兴党政府担任工业部部长。对于世俗派来说，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对于复兴党来说，他曾经参与过复兴党政府，这样的双重

身份保证了他得到双方的承认。

即便朱马当选，也并非没有争议。在参与对话的21个政党中，只有9个政党对朱马投了赞成票，剩下的12票中，有7票弃权，2票选了其他人，还有3个政党没有参加投票。

2014年1月9日，权力终于完成了和平交接，复兴党的阿里·拉哈耶德政府集体辞职，朱马的过渡政府接任。

朱马政府上任后，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继续向前。1月24日，涵盖着妥协精神的新宪法以200票赞同、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宪法的诞生，为新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2014年12月，根据新宪法的精神，突尼斯举行了新的选举，再次完成了权力的和平交接。白发苍苍的老政治家埃塞卜西当选总统，此时他已经88岁了。他拥有几十年的政治经验，为人正直、有责任感。老政治家的智慧让突尼斯渡过了险关。这样的做法看上去不那么浪漫，却足够审慎。这个政权也许并不完美，某种程度上，它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机器，但是，这样做避免了改朝换代时的行政脱节，却又加入了足够的民主色彩，避免重归强人政治。它比革命前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也比其他国家的混乱更可取。

到这时，对话联盟的路线图得以完满实现，而这时也是对话联盟退出历史的时刻。如果不是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个短暂存在的组织，或许人们已经逐渐将它遗忘……

突尼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中东的故事也没有结局。

突尼斯对话联盟并非“阿拉伯之春”参与者中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事实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当年，时年32岁的也门女活动家塔瓦库·卡曼就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四年后，卡曼的家乡并没有如期实现民主化，而是陷入了内战和外国干预之中。推翻了总统萨利赫后，新总统哈迪无法获得全国性

的支持，最后被国内的什叶派推翻。为了防止什叶派扩张，也门的邻国沙特领头入侵了这个国家，开始了无休止的轰炸行动。

新的国内冲突也把卡曼置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想维持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她要反对新总统哈迪对革命的破坏，同时她还要防止什叶派的暴力夺权，甚至有消息说她暗地里希望沙特干预也门的政治。

在埃及，新的强人塞西已经稳定了政局。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埃及的经济开始复苏，害怕了混乱的人们宁肯忍受新的强人政治也不想再革命。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仍在继续。利比亚在经历了内战之后，有了和平的迹象，但稳定何时能到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即便在突尼斯，人们也只能说，它刚刚渡过了一次危机，至于未来会不会有其他危机，并不好说。

实际上，进入2015年后，从政治危机中摆脱的突尼斯刚松了一口气，就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这次经济危机除了政治原因，还和国际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人们对矿业需求下降，矿石价格暴跌，作为矿业大国的突尼斯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除了矿业，旅游业曾在突尼斯位居前三，却因为不甘心退出政治进程的伊斯兰极端派在2015年制造了两次针对外国游客的屠杀事件，将突尼斯的旅游业打入低谷。

人们预计，突尼斯的经济复苏仍然需要许久才能到来。如果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预期，那么民众很可能会把对社会的不满变成对现政府的不满。可以说，突尼斯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不管怎样，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这个在短短几个月内发挥了重

大作用的联盟，向我们展示了突尼斯社会的成熟度，让我们又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希望它仍然能够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样本，告诉人们除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建设。

撒哈拉的恐怖分子之家

革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在环绕撒哈拉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恐怖分子为主的强硬区域。不管是北面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还是南面的尼日利亚、马里、尼日尔、乍得，恐怖分子以绑架、恐怖袭击为武器，试图控制政局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当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正在将ISIS以及“基地”组织赶出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代表的中东地区时，许多恐怖分子逃离了中东，他们背井离乡，选择了更偏僻的沙漠边缘或者高山区域。

目前来看，恐怖分子主要去往两个地方：阿富汗的高山区域，以及北非的环撒哈拉沙漠。2016年和2017年，我先后到达了这两个区域，发现两个地区的局势都有明显的恶化倾向。在阿富汗，恐怖袭击的数量已经达到了阿富汗战争以来的新高。我本人也曾经遭遇了劫匪，头部被砍伤，随身行李全部被抢走。

在环撒哈拉区域中，最神秘的国家莫过于阿尔及利亚。

1962年独立之初，阿尔及利亚就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由于阿尔及利亚是通过一场战争才从法国脱离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反法和反对西方殖民的情绪比北非的其他国家都要强烈。

第一任总统本·贝拉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要求法国人全部撤离阿尔及利亚，同时设立了一党制体制，并在国内搞工业和农业的国有化。本·贝拉执政了三年，就被他的参谋长布迈丁推翻。布迈丁除了继承前任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党制之外，又加了一条：将伊斯兰教立为国教。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往往是和宗教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国

家大都是倾向世俗化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采用了倾向伊斯兰教的政策，将阿尔及利亚变成了一个思想左倾，又带着虔诚的宗教精神的国家。

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和伊斯兰化，但布迈丁执政时代恰好是世界石油的黄金时期。作为产油大国的阿尔及利亚也赶上了好时机，国民收入增长迅速，国家财政丰盈。在政府指导下，阿尔及利亚建设了许多没有用的大项目，外债也迅速膨胀。

当石油经济的泡沫破裂后，阿尔及利亚人突然发现，国内党政要员中出现了一批巨富，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却改善不大，一旦到了危机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开始倒退。阿尔及利亚进入了一个怨声载道的时期。

如果是在成熟的国家，人们会认为这是经济和政策原因造成的，但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经过伊斯兰教洗礼的国家。布迈丁尊崇伊斯兰教的结果，就让很多人认为，社会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人们没有遵循伊斯兰教的教法，只有退回到遵循该教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先知穆罕默德制定的伊斯兰教法中有很强的平等成分。阿拉伯的游牧传统和家族纽带，让家族的富人必须担负起照顾家族穷人的责任。许多人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贫富不均，主要是因为人们舍弃了伊斯兰教的精神，不再以帮助穷人为乐，而是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只有重新回到伊斯兰教法之中，才能恢复人们共同富裕的理念，达到消灭腐败、促进公平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一批经过伊斯兰思想武装的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反对强人统治。此时的总统已经换成了布迈丁的继承人沙德利。沙德利在镇压无效之后，决定走和解的道路。他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伊斯兰教法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他不改变，很可能会被推翻下台。

1992年，经过数次推迟，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拉开帷幕，穆斯林极

端派不出所料，获得了绝大部分选票，阿尔及利亚向着一个教法国家又迈进了一步。但就在这时，军队再次出面干预。

他们推翻了沙德利政府，宣布选举作废。军队寻找了一位开国元老布迪亚夫来担任总统。布迪亚夫上台后，大力推行了两项政策：第一，镇压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第二，反腐。这两项政策都深深地触动了阿尔及利亚社会中一批人的利益。在执政半年之后，布迪亚夫被杀。

他的被杀让阿尔及利亚陷入了内战的泥沼。

阿尔及利亚的内战持续了十年，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而最重要的是，极端分子通过武装威胁，将外国人和外国企业都赶出了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本来就比周边国家更封闭，外国人离开后，阿尔及利亚变得更加神秘了。

虽然政府选择了与穆斯林各派别和解，但这里仍然是最虔诚、最排外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地区，以及与周边国家的交界地区，都是极端分子最容易隐藏的地方。

“基地”组织在北非的最主要分支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其主要活动基地就在阿尔及利亚，并波及周围广大区域，从沙漠之北到沙漠之南都有分布。

在非洲西部国家尼日利亚，隐藏着另一支与ISIS有密切联系的极端武装。这支武装以绑架未成年少女并让其与武装战士成婚闻名于世。

在英国人去往非洲之前，尼日利亚的北部属于伊斯兰教区域。现在的尼日利亚地图如同一个拳头，在东北部也就是拳头的大拇指位置，曾经有一个叫博诺的帝国。博诺帝国的疆土不仅包括尼日利亚的东北部，还有尼日尔和乍得的一部分。尼日利亚的西北部，曾是一个叫索科托的哈里发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国家，在抵抗西方的过程中，信仰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让人们以信仰为基础针对外来入侵者发动圣战。

两个帝国被英法切割后变得支离破碎，散布在法属西非各国和尼日利亚之间，他们虽然已经失去了主权，但伊斯兰的骄傲仍然保留着。

尼日利亚独立后，随着统治的强人化和碎片化，伊斯兰精神在北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重新复活了。

在奥巴桑乔第二次民主时期，由于他对地方自治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北方各州纷纷重新实施了伊斯兰教教法。这是一次从世俗社会向宗教社会的大倒退，但为了保持尼日利亚的统一，这又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在这次伊斯兰化大潮中，2002年，在原博诺帝国的东北部，一个名叫优素福的人建立了一个叫“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组织。从字面意思上来说，豪萨语Boko的意思是“虚假的”，用来指西方世俗教育，阿拉伯语Haram的意思是“禁止”。“博科圣地”的正式名称是传播圣训和圣战的人民军。

在现代伊斯兰教历史上，沙特和埃及是输出极端思想的大本营，优素福就曾经在沙特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过。在那儿，他亲眼见了沙特的先进与尼日利亚的落后，认为沙特所代表的极端精神才是伊斯兰的本质。回到尼日利亚后，他成立了“博科圣地”。正如它的名字“拒绝西方虚假知识”一样，优素福在反对西方上做得很彻底。他宣称，西方的科学是与伊斯兰知识相冲突的，比如，地球是圆的，就与安拉的教导不一致，应该被禁止。为什么下雨？与其说是因为水分蒸发形成的云，不如说是因为安拉的创造。

在奥巴桑乔时代，优素福的组织虽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暴力倾向，但相对温和，甚至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奥巴桑乔下台后，继任者威望不够，各地伊斯兰教徒与政府的摩擦也多了起来。优素福决定发动针对政府的行动，“博科圣地”开始变得暴力。

但2009年的政府行动要了优素福本人的命，他被政府军抓住后，被转给了当地的警察局，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决了。

优素福死后，副手谢考成了指挥官。在他的带领下，“博科圣地”成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心腹大患。

谢考在极端组织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传奇性是政府不可靠的消息源造成的。从2009年到2017年，几乎每一年都会爆出几次谢考被杀的消息，随后又被否认。有人讽刺说：谢考到底有几条命啊？他死得比iPhone充电都频繁。谢考也因此在他的拥趸中赢得了“不死”的名声。

在他的带领下，“博科圣地”的名声越来越大。最初谢考只在尼日利亚一个国家活动，后来在乍得、尼日尔都有了他的身影。再到后来，全世界各国纷纷将“博科圣地”和谢考列为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

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绑架外国人和政府官员，在东北部地区制造恐怖袭击，砸碎监狱释放囚犯，他们的活动范围曾经到过尼日利亚的首都阿布贾。2011年8月，“博科圣地”第一次袭击外国人，他们“志向高远”，直接给阿布贾的联合国总部送去了炸弹，这次爆炸造成了11名联合国人员以及12名其他人员的死亡。

之后的每一年，尼日利亚都会因为“博科圣地”而造成数千人死亡。战乱发生后，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从2014年开始，政府屡次宣称已经将“博科圣地”的大部分军事营地摧毁，但是“博科圣地”的影响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

2015年，“博科圣地”宣布与中东的ISIS取得联系，成为ISIS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这之前，它已经和“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进行了合作。

在北非，除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后，也成了极端组织的聚集地。而突尼斯虽然国内安定，却向外输出了许多失业青年，它

因此成了ISIS成员的重要来源之一。摩洛哥则如临大敌，对沙漠地区的边境加强了防范，但仍然被波及了。

在撒哈拉以南，毛里塔尼亚的东北部由于与阿尔及利亚接壤，已经渗透了极端主义势力，武装分子甚至越过沙漠，进入北方公路对外国人进行绑架。

马里、尼日尔、乍得则是ISIS或者“基地”组织的活动中心地区，这里地广人稀、沙漠纵横，恐怖分子藏身其中，几乎不可能被抓获。恐怖分子也并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与他们相安无事，甚至由于恐怖分子的到来，让当地的物资更加丰富了一点。藏身于沙漠之中，与当地人搞好关系，是恐怖分子的生存之道。

2013年，在西非地区，法国在马里、尼日尔和乍得发动了一场低烈度的战争，帮助当地政府清剿恐怖分子，但效果有限。在我去往马里时，恐怖分子正在北方挑起新一轮的冲突，而在尼日尔，美国的维和人员也遭到了袭击。

从现在的情况看，要想解决极端思想的问题，必须靠经济发展和世俗化，但发展的过程总是漫长的。另外，由于地广人稀，要想清剿他们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绝不是贫穷的西非国家一时能够做到的。而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还在制造大量的武装分子，从美国、俄罗斯运往各个冲突地的武器有一部分都流到了这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要想解决北非撒哈拉地区的恐怖组织问题，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第十二章
缓慢形成的非洲之核

在东非旅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每个国家的危险又有所不同。

在坦桑尼亚，最主要的危险出现在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街道上，这里是抢劫的高发区域。

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的经历：当他前往南非大使馆，试图申请南非签证时，就在使馆区，突然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停下，借助车的掩护，一名黑人用刀逼迫着他上车。

一旦上了车，他就只能听人摆布了。“使馆区并非空无一人，在车外就时常有人走过。但他们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不敢喊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外的人走近了，又走远了。”

在车上，几个黑人叫他打开背包，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检查。这里的抢劫是很有规矩的，比如，笔记本电脑是一个人的重要资产，往往存储了许多个人资料，因此不能被抢。再贵重的相机对于相机里的照片而言，也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黑人示意他把存储卡取出来留下，他们只带走了相机。他们打开钱包后，把所有的卡片（身份证、信用卡、打折卡等）都留下，只拿走现金，给被抢者省去了补办卡片的麻烦。

检查完毕，黑人将其他东西留下，让他把护照、银行卡、存储卡、笔记本电脑，以及其他不值钱的私人物品装入包内带下车。等他下了

车，黑人又甩下几张当地的钞票，供他坐车前往银行取款。

他坐在路边，连报警的欲望都没有，甚至有点“盗亦有道”的感慨。“只要留下了护照、银行卡，能够继续上路，人们就在庆幸活命之余，懒得纠缠下去，与警察打交道也许比劫匪更加麻烦。这群惯犯看来学过心理学，才能做得如此巧妙。”

在坦桑尼亚北方的邻国肯尼亚，除了容易遭遇抢劫，还多了一份警察的威胁。首都警察的眼睛直盯着游客，只要游客犯一点错，他们就会立刻出现，将游客“绳之以法”。我的另两位中国朋友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恰好就遭遇了警察的“打劫”。

当他们在首都用手机拍摄照片时，突然跳出来两个穿制服的人，二话不说就把他们铐在一起。“我们以为遭遇了假警察，立刻高举起铐在一起的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声叫‘Help！’由于是在闹市区，周围的人一下子聚拢过来。我们继续高喊要打电话给中国大使馆。两个穿制服的人在旁边看着我们的表演，大笑起来，把他们的手机递给我们，调侃说用他们的电话打便宜。这一下反而轮到我们语塞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他们不是假警察，而是真警察。”

他们之所以被铐起来，是因为不小心拍到了一栋不知是什么的建筑，这个建筑恰好是警方不允许拍照的。至于哪些建筑不让拍，名单并不公开，游客也不知情，只有警察才能根据名单随时抓住倒霉的游客。

这两位朋友在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付出了几十美元的代价换得了自由。“在这里，司法是没有用的，多如牛毛的规矩如同是一张罗网，你总会不小心触到罗网的某一根线。如果走司法程序，你的损失会更大，大使馆更是帮不上忙。”

就在这两位朋友出事两个月后，我也到了内罗毕。我和两位朋友在车站旁的大街上也遇到了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把我们叫住：“中国人，你们违法了。”

“我们没有违法。”我回答说。

“我看见你们拍了那儿！”一个人指着旁边的一栋建筑说。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连相机都没有拿出来。这时他要检查我们的相机和手机。就在朋友想递给他的一刹那，我突然明白：如果递给他，就麻烦了。他们会扣住相机，逼迫我们留下，直到找到我们的过错。即便我能保证自己足够谨慎，没有留下把柄，却很难保证别人不小心犯了过错。我用手拦住了朋友拿着相机的手。

“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骗子，我们不能给你！”另一位朋友恍然大悟一般说。

穿制服的两人笑了起来，他们邀请我们一同去不远处的警察局，好报警验明他们的身份。不能去，一旦进了警察局，就很难顺利出来了，我心想。

“朋友！”我伸出手，做出和解的姿态和其中一人握了握手，盯着他的眼睛，诚恳地说，“听着，我们是朋友，我们只是路过，去车站赶车，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请让我们走吧。”

两人对视了一眼，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接着笑了。“我们是朋友。”他们心照不宣地说，挥了挥手让我们离开。

在肯尼亚西面的乌干达，问题同样出在军人与警察身上。但乌干达穿制服的人显然没有肯尼亚人那么娴熟，给人留下了更多周旋的余地。

入境乌干达时，刚刚过关还没有走到移民办公室，在边界线上站岗的士兵就先发话了：“中国人，我今天一天又饿又累，你给我点钱买咖啡喝。”

“不，我只是个普通游客，不是商人，游客是不用给钱的。”我回答，并伸出了友谊的手。

他显得有些迷糊，不知道为什么普通游客就不应该给钱。当他还在纠缠于逻辑上的合理性时，我已经走了过去。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辆警车上的两名警察突然让我停下，示意我踩到了旁边的草坪。我才发现，原来当地人走的一条小路本来是一块草坪，现在已经没了草。我以为那是一条路，就跟着当地人走在没草的草坪上。警察准确地从几十个当地人中认出了身为外国人的我。

他们示意我到警车上去说话。有了在肯尼亚的经验，我自然不会上当。一瞬间，我成了不会英语的中国人，微笑着用汉语告诉他们我一天的行程路线，他们无奈地用英语一次次向我讲解，说我违法了，希望我上车。但我总是微笑地用汉语告诉他们：我喜欢乌干达，今天去了国王陵墓。

乌干达的警察没有肯尼亚的蛮横，由于沟通不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我确保没有危险之后，和他们挥了挥手离开。他们在背后无奈地说着："Chinese， no English…"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肯尼亚，也许我就没有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

在乌干达的邻国卢旺达，我和朋友们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抢劫，其经过已经在第八章中叙述过。与其他国家比起来，这个国家的政府更加高效和透明，但民间的贫穷仍然让许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虽然胡图族和图西族目前已经和平共处，但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仍然能够被感觉到。幸存的图西人都受到了较好的照顾，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图西社区的自救，让人们逐渐走出了哀伤。但那些底层的胡图人仍然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也缺乏资金。他们有的不得不给"图西主子"们打工。由于残存的意识形态，开商店、开工厂并不被认为是公平交易，而被认为是剥削工人，胡图人的怨气并没有完全得到消解。

在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情况更加糟糕。

一个中国小伙子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开了一家超市。小伙子曾经是通信公司中兴的员工，被外派到坦桑尼亚和布隆迪几年。由于喜欢上了非洲，辞职后他选择在偏僻的布隆迪开了一家叫“新中国”（New China）的超市。

商品大都从中国进货，从廉价的布料，到便宜的电器，再加上一些从亚洲进口的食品，让这个小超市在物资匮乏的当地显得琳琅满目。

然而，机会往往也意味着风险。就在我见到他的前一天，这个小小的超市刚刚遭遇了一场失败的抢劫。

劫匪非常大胆，在夜间，几个黑人翻进了超市的院子里，拿着大锤，想打开超市朝向院子的门。所谓超市，实际上是当地一家带院子的小别墅，用来开超市的几间房子在院子靠街的一侧，也是通往街上的通道。院子的正中心则是主人住的两层小楼。中国小伙子租下了整个院子，但小楼里只住了他一个人。一个当地的门房住在超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

劫匪在院子里敲击超市的铁门时，黑人门房从小屋里出来，拿着砍刀与劫匪对峙。至于中国小伙子，他只能从别墅的窗户里看着这一幕，不敢出去。因为他一出去，反而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警察局的电话也打不通，在需要时，这里的警察总是找不到。

对峙之下，劫匪选择了撤离，超市里的商品保住了。我去时已经是第二天白天，黑人门房认为这个工作危险大，正准备辞职。也就是说，当天晚上，将只有中国小伙子一人看守整个院子。

但小伙子仍然显得很冷静。他告诉我，他已经找过警察了，警察已经将新中国超市纳入保护范围。劫匪不敢随便抢劫警察保护的目标，这可能意味着超市暂时获得了安全。但这也意味着，“新中国”超市必须向警察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在这里，投保险是没有用的，只有警察的保护才有用。

与其他几个国家比起来，布隆迪至今仍然是政府最弱、安全最没有保证的国家。

虽然混乱，但在旅行中，我又总能体会到非洲的秩序正在形成。非洲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在后殖民时代，虽然它们独立了，但每一个独立的碎片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信仰、种族、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摩擦，非洲的国家不得不花时间来缓解这些摩擦。

但经过了几十年，一些矛盾较少的国家已经度过了摩擦最剧烈的时期，步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将成为带动整个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发挥重大作用。

如果把非洲比喻成一杯水，它最终会凝结成更加稳定的冰，那么在水变成冰的过程中，一定是局部先形成一批小的冰核，这些冰核逐渐扩大，直至扩展到整个水杯。

以东非为例，政治较为稳定的肯尼亚和文化教育水平较好的坦桑尼亚，已经成了区域性的发展引擎。它们都经过了政权的和平轮替，独立后只有小冲突，没有大规模的内战，人民和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较为良性的互动。

肯尼亚已经成了外国资本进入非洲的重要通道，而坦桑尼亚则成为东南部非洲发展的火车头，让东非成了非洲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虽然乌干达、卢旺达也在快速发展，但它们的体量太小；虽然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都很优秀，但他们都长期执政，还无法预期是否能做到政权平稳轮替，因此，东非最有前景的国家仍然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在其他区域内，也各自产生了当地的龙头国家，比如在西非，龙头国家非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莫属。而在非洲之角上，经历过不少灾难的埃塞俄比亚正在全力追赶，它的定位是区域性的加工制造中心，以及全非洲的空中交通中心。在南部，南非仍然是整个非洲范围内的明星，它

可能暂时还处于衰退中，但如果能够度过行政退化期，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度就可能再次崛起。而在北非，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在竞争，古老的埃及虽然处于革命后的虚弱状态之中，但没有人能够小觑。

围绕着这些国家，非洲的发展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未来仍然会有混乱，但比起前几十年，已经充满了希望。

第二个肯雅塔和变魔术的中国人

在肯尼亚，一条特殊的铁路沟通了首都内罗毕和海边城市蒙巴萨。这两个城市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

2014年之前，连通内罗毕和蒙巴萨的只有一条英国时期的旧铁路，由于运输能力非常有限，人们通常乘坐巴士在两个城市间穿梭。两座城市距离约470千米，人们一般选择晚上坐夜班车，在第二天一早到达。

从2014年开始，一条新的铁路如变魔术一般出现了。这一年，趁着中国总理访问的机会，肯尼亚新总统小肯雅塔（首任总统的儿子）与中国签订了修建新铁路的协议。

按照往常的肯尼亚速度，签订协议后的十年内是论证和争吵的时光，如果项目有幸熬过了这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筹款，持续几年的筹款过后，又进入新的争吵，至于开工，可能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由于总统任期只有两届，大部分项目熬到下一任总统，也就无疾而终了。

但这一次情况却起了变化。作为建设民族的中国人让肯尼亚大吃一惊，三年后，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条近500千米长、非洲最快（时速120千米）的铁路已经出现在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高原上。铁路上的每一座火车站也不再是东非标准，而是充满了现代化气息又有些粗糙的综合性站点，虽然不算优雅，但放在非洲已经是超标准。这条铁路将两座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如果开足了运力，人们上午出发到另一个城市去办事，下午就可以回家吃晚饭，这种速度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这条铁路也让肯尼亚的反对派目瞪口呆，他们攒足了精神，但还没

有来得及反对，铁路已经建好了。当蒙内铁路建成后，反对派意识到，要想反对新项目，也必须加快速度，按照以前的非洲速度，吃饱饭先睡个觉，再慢悠悠地发动群众，当群众还没有睡醒、弄清反对的是什么，人家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于是，反对蒙内铁路延长线（从内罗毕到乌干达边界）的抗议活动紧锣密鼓地组织起来，让新项目的难度陡然加大。各种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铁路会损害动物的活动，部落居民认为铁路会促使他们抛弃掉原始的优良传统，延长线建设的速度与主线相比已经放慢了不少，何时完工就不再受控了。

蒙内铁路让肯尼亚人的生活突然加速，与世界接轨。但由于地处非洲，它的运营也并非毫无瑕疵。按照规划，铁路如果要充分运用，需要一天运行数趟，将大部分的汽车客运都改成铁路运输。但蒙内铁路建成后，原本的汽车客运公司立刻感受到了压力，它们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立刻行动起来，意图减少蒙内铁路的冲击。于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线，每天只运行一班客运。火车票成了奢侈品和抢手货，大部分人由于买不到火车票，还是得回去坐夜班汽车，忍受十几个小时的颠簸。

政府虽然推动了蒙内铁路的建设，但他们似乎也不想打破汽车公司的饭碗，于是满足于将蒙内铁路当成一项政绩，解决一部分铁路职工的就业，同时不影响汽车职工的饭碗。蒙内铁路就这样在运输能力不足的尴尬情况下运营着。

这说明，非洲的问题一部分是经济问题，而另一部分还是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在外界给了足够的刺激之后，还需要非洲人的内部消化，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在以前，西方援助甚至连外在的刺激都无法给予，而中国对于基础建设的援助已经可以触动他们的生活，接下来就要靠非洲人自己去努力了。

由于实行选举政治，小肯雅塔之所以建设铁路，也不仅仅是从经济

发展的角度考虑，还有政绩的因素在内。对手之所以反对铁路，也是想减弱他的政绩。所以中国人在外国投资时，除了考虑商业因素，也必须将所在国的政治考虑在内，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2013年，不受欢迎的齐贝吉下台了，小肯雅塔在选举中击败了对手。经过了选举的小骚乱，他通过和平交接上台。但小肯雅塔的地位并不稳固，他获得的选票只有50.07%。由于优势太小，对手甚至指责他作弊。

为了证明自己上台的正当性，并为下一次选举作准备，小肯雅塔必须拿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蒙内铁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上日程的。

也正是因为这是政绩工程，蒙内铁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修建完成，才能赶上第二次投票。为了修路，小肯雅塔大开绿灯，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选址问题、环评问题，将所有争议压下。中国人也不愧是建设的民族，从立项到建设完成通车，一共只用了三年时间，赶在下一次大选之前完成了修建。

2017年的选举再次充满争议。这一次，小肯雅塔的对手仍然是上次的对手奥廷加，在当年8月的选举中，小肯雅塔以54.17%的选票获得了连任。根据肯尼亚法律，总统选举最多进行两轮，第一轮如果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全国选票，同时在全国47个县中，至少24个县每个县获得至少25%的选票，才能当选。根据肯尼亚独立选举委员会点票，肯雅塔获得连任。

但随后，对手奥廷加却以小肯雅塔舞弊为名上诉到最高法院，肯尼亚高法以4∶2判定选举结果无效，必须在六十天内重新举行选举。

肯尼亚再次陷入了混乱。这次混乱的高潮是奥廷加突然退出了重选，他的退选又带来了更大的宪政争议。既然主要对手和上诉人已经退出，这样的选举还需要进行吗？随着人们的争论，独立选举委员会内部

也发生了分裂，有成员在出国后宣称小肯雅塔舞弊。

在一片混乱中，选举再次进行。第一次选举，选民参与人数达到了总选民的近80%，而第二次选举，选民参与人数只有38.84%。小肯雅塔以98.26%的高票再次当选。不过从低参与率来看，小肯雅塔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的总统。

但小肯雅塔并不在乎这些，而且在肯尼亚，一切政治活动都是有争议的，又都会随着时间而平息。他欣然宣誓开始了第二任期。

肯尼亚果然在经过一段混乱后，再次恢复了平静。每一次混乱后，人们都预言这个国家已经快完蛋了，人民已经四分五裂，还不时爆出暴力事件。但每一次混乱过后，人们的生活继续，没有人会因为不公而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人们只是默默等待总统任期到了，再选另外的人来代替他。

肯尼亚仍然会继续发展，不管它的政治还是经济都还在整合与发展的轨道上，它在吵吵嚷嚷中前进。如果单看每一年，它都达不到人们的预期，但如果从长期来看，它又在前进。

小肯雅塔又在讨论把蒙内铁路延长到与乌干达的边界上，但对手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抵制，让修路变得更加困难。

铁路本来是一条可以提升当地人生活质量的好项目，却由于政治争斗而进展缓慢，这也许就是肯尼亚的风格。人们忍受了它几十年，并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可能在某个时段由于某个领导人的推动，突然加快，但随后又会在政治斗争的影响下，回到通常速度，不紧不慢地前行。

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中国人修建的铁路也让当地人感受到了世界速度。这个国家瞄准了工业化，由于没有海岸线，它不得不借助吉布提的港口。于是，连接吉布提和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成了埃塞俄比亚的一号工程和生命线。

这条铁路的修建，让非洲人再次领略了中国工人的素质。事实上，大部分的非洲国家都已经活跃着中国建设者的身影，他们为非洲建设了铁路、公路、桥梁和房屋。这加快了非洲的发展。虽然在未来，中国的许多建设项目也存在退化的可能性，但整体上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全世界最大的。

肯尼亚在东非地区已经开始遇到对手，它的对手就是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曾经因为开国者尼雷尔走集体化道路，将国家搞得一穷二白，但在尼雷尔之后，迅速通过私有化获得了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尼雷尔时期的一个优势也显现了出来。由于尼雷尔重视教育，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强行让孩子们读书，到了经济发展阶段，高识字率和低文盲率让它能够找到更多合格的工人。

肯尼亚的自发性状态造就了一个精英阶层，但底层的民众却由于负担不起孩子的教育，导致文盲太多，这些人很难被整合进现代经济生活之中。坦桑尼亚由于重视教育，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后发优势。当人们再次谈论起东非时，心目中已经不只是想到肯尼亚，也日益看重坦桑尼亚的发展前景。

至于肯尼亚将何去何从，还是有很多人预言，它总有遭遇瓶颈的那一天。当人们无法容忍政客的腐败与低效，当国家没有办法再快速发展时，也许人们会揭竿而起，让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一旦政治和社会失去了长期的稳定，那么经济就会受到损害，从而让肯尼亚进入到一个下降周期。

不过也有乐观的人认为，当人们无法容忍腐败时，的确会揭竿而起，但以肯尼亚的特质，也许并不会出现刚性断裂，而是会通过社会活动逼迫政府变得不敢过于腐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会经历从腐败到廉洁的过程，对于非洲来说，这个过程更加漫长，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非洲无法走出这个怪圈。既然肯尼亚最腐败的老总统莫伊都能在压力下放弃终身制，为什么其他政客不能在压力下变得更加透明一点呢？

到底是断裂，还是改进，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最终的结果，也许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没有最终结果，只有摸索，摸索，再摸索。

瑙莱坞和尼日利亚黑帮

在西非，人口庞大的尼日利亚是一个混乱但是充满生机的地方。

2010年春节，我和一位导演朋友在广州拍摄一部关于黑人的纪录片。由于广东成了世界的小商品制造中心，这里有着庞大的黑人群体，在小北一带形成了“巧克力城”。在广州所有的黑人中，尼日利亚人是人数最多也最活跃的群体。

尼日利亚为人们提供的精神食粮也是最丰富的。几乎每一台黑人的电脑里，都存储着许多尼日利亚拍摄的影片，就如同中国人囤积好莱坞和香港影片一样。

尼日利亚素来有“非洲的好莱坞”之称，人们甚至起了个专有名词——瑙莱坞（Nollywood），它与美国的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一起，成为世界上三大影片制作基地。

以成熟世界的眼光看，瑙莱坞的影片还显得很稚嫩。好莱坞以科技手段著称，宝莱坞则是精美画面的代名词，而瑙莱坞提供的却只是最初级的产品。几栋非洲式的茅屋，几个滑稽演员，就可以凑成一台戏，拍摄机位固定，影片效果更像是舞台剧，而不像是电影。

但非洲人却对瑙莱坞的影片需求量很大，他们崇拜好莱坞和宝莱坞的精美，但更多的笑料还是要到瑙莱坞去寻找。坐车时，司机放一部瑙莱坞影片，就能让整个车厢的人笑成一片。

尼日利亚之所以能够成为非洲的电影中心，既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有关，也和它的多种族特性有关。这里的片子也是各种方言都有，除了英语片，三大族群都能找到自己的拍摄团队，甚至西非、中部非洲方言

也进入了电影。

当尼日利亚电影征服非洲之后，其他国家也开始群起效仿，但由于人口较少，大都只能专注于开发一种语言的电影，比如，加纳是英国殖民地，就以开发英语黑人片为主，加纳的英语片在全非洲都很受欢迎。

穆塞韦尼当政后，确定缺乏海洋的内陆国家乌干达必须走高科技和服务业路线，而电影就是见效快、成本低的典范，乌干达也迅速成了传播斯瓦希里文化的中心。乌干达的斯瓦希里电影迅速打入东非的市场，与肯尼亚的文化产品相抗衡。但它们还是无法与尼日利亚的庞大市场和声誉并驾齐驱。

虽然尼日利亚的北部还存在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叛乱，但南方的巨大财富和石油资源已经让人们看到了经济多元化的好处。它和肯尼亚一样，是一片混乱却充满了生机的土地。

尼日利亚人遍布了全世界。在印度，人们朝我抱怨，尼日利亚黑帮横行已经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控制了毒品、武器市场，并介入洗钱行当，甚至不惜杀人。在所有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亚人数量最多，又相当团结，他们在非洲的角色相当于意大利人在西方世界的角色。

关于尼日利亚黑帮，在著名作家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的小说《项塔兰》中也有描写。在这本写印度孟买的杰作中，尼日利亚黑帮被描写成一个从事非法勾当却重情重义的组织，这样的评价只会出现在小说里，印度人却很难接受对尼日利亚人的赞美。

除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已经形成的“非洲之核”还有非洲之角上的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虽然经历了最多的苦难，但由于人民知道苦难之痛，一旦获得了和平，就会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引进外资、建设基础设施最积极的国家，也成了亚洲进入非洲的交通要道。

北部非洲的埃及已经衰落，突尼斯正在恢复，而摩洛哥却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在开明国王的领导下，扮演了与欧洲沟通的桥梁。

南部非洲的南非虽然经历了经济退化，但繁华的底子仍在，再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也许能够建立起一种黑白混合的文化。

地域宽广、资源丰富的刚果（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核心，但它目前仍然在痛苦地整合之中。然而谁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未来它的命运或许是两种极端：要么成长为地区的核心，要么成为中西部非洲的混乱之源。

其余国家有的因为体量小，有的因为还在整合之中，暂时无法成为区域性的发展核心，但从整体上来看，非洲最混乱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发展成了主旋律。如果不是刻意去追寻历史，走访那些见证历史发生的遗迹，那么整个非洲看上去已经进入了现代世界，他们用上了手机，开上了汽车，与世界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多，即便是小村子里的人也慢慢用上了中国的小商品和印度的药品。非洲从独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它经历了艰难的整合，我相信，在下一个六十年后，一批明星国家将发展起来，整个非洲也会在它们的带动下，成为世界继印度之后的下一个经济增长源。

尾声
最后一次冒险

2018年5月初，我的妻子梦舞君突然在尼泊尔徒步时失联，我乘坐飞机来到了尼泊尔，经过多方朋友的帮助，梦舞君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我的身边。因此，本书的最后两章是在尼泊尔修改完成的。

妻子失联的经历也让我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冒险经历。总结起来，危险总是在你没有防备时突然到来，它的发生只是一瞬间，上一刻还平静似水，下一刻或许就以流血甚至死亡为结局。这个道理在我十几年的游学生涯中数次被证实。

不说早期在西藏碰到的自然风险，仅说国外旅行时的遭遇，我已经遇到过三次突如其来的危险。它们无一例外，在发生前毫无征兆，如同一条平静的河流，偶尔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漩涡，但这个漩涡却可能置人于死地。

第一次是在风声鹤唳的黎巴嫩。2014年，由于邻国叙利亚的战争持续，黎巴嫩国内分成了两派人马，一派支持叙利亚的政府军，另一派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政府军和反对派在政坛上掀起了巨大的风浪。在社会层面，两派的支持者也发生了冲突，街头不时爆发混乱。

在黎巴嫩北部有一个叫的黎波里的城市，它作为黎巴嫩分离主义的大本营之一，成了瞩目的焦点。这里是ISIS进入叙利亚的主要通道之

一，全世界许多逊尼派的极端主义者会首先坐飞机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再向北到的黎波里与组织接头。他们在当地组织的帮助下，东行越过高山，混入叙利亚的乱局，去抗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这里还是什叶派招兵买马之地，什叶派的真主党从失业的年轻人中招揽人手，把他们送往叙利亚的战场，去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正由于双方都在利用的黎波里，这里就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恐怖袭击，人员的死亡、失踪或者被绑架也时有发生。

在的黎波里的大街上，我正从当地的旅游圣地十字军城堡向海边行走。那时一切显得很正常，我经过了一个繁华区，进入一条安静的小街。

就在这时，我突然被人举了起来。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有一双大手突然间把我拦腰抱住，在空中把我转了个个儿，变成了头朝下，之后举过了他的头顶。

由于事情发生得太快，我的身体僵住了，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如果他把我头朝下往地上一掼，即便无法要我的命，也会让我立刻陷入昏迷。

这时，我突然听见一声呵斥。接着我又被转了个个儿，放回了地面。

当脚挨到了地，我才从紧张和木然中反应过来。回头一看，举起我的是一个至少200斤的大块头，他的上臂比我的大腿都粗。大块头显得有些呆板，留着什叶派那种乱蓬蓬的胡子。他撇开我，望着不远处的另一个人，那是一位老人。

老人正向大块头努着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在街角，一辆政府军的坦克露出炮管和一部分履带。也许正是这个炮管救了我的命。

当我惊魂未定时，老人朝我露出了友好的笑容。他走到街边的一个

小店里——这也许是他的店铺——拿出来一罐饮料递给我，仿佛是要给我压惊。我打开，喝了一口。

饮料入口后，我的心咯噔一下，世界在我眼前晃了一下。难道饮料中有安眠药？

我连忙撇开老人和大块头，朝坦克奔去。身后的他们没有跟过来，我的身体也没有进一步的药物反应。快到坦克前，我大声喊着："Excuse me， Sir！"

一个士兵从街角露出头来，好奇地看着我。

我走到了士兵跟前，害怕是自己多疑了，同时也没有证据去告状，只好掏出手机对他说："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Sir？"

士兵拒绝了。我却安全了。

事后发现，那罐饮料毫无问题，甜水全都被我喝掉了。在喝第一口时，也许是身体的紧张让我做出了过度的反应。

但至今我仍然无法搞明白：为什么那个大块头要把我举过头顶？这个暴力的动作和老人的友好笑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没有那辆坦克，我会不会遭到他们绑架？如果他们是无辜的，只是对我开个玩笑，我的举动会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这几个问题也许都不会再有答案，它们也许只是个概率问题。但被举起的那一刻的恐惧却被深深地写入了我的骨髓。

我的第二次遇险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关于这次经历，我已经写入了另一本书《穿越劫后中亚》之中。在喀布尔城外一个山坡的贫民窟边上，我遭遇了三位持刀青年的抢劫。那一刻，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被他们拉走，我死死地靠在一堵墙上，宁愿将一切都丢给他们，但人必须留下。因为人一旦被绑架，接下来的形势将再也无法控制。贫民窟里恰好走出的一个人救了我，青年们担心被他看见，才给我留下三处

伤口，将我抢劫一空后离去。

在遭遇持刀劫持之前，即便这个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也显得足够平静。如果一个人漫步其间，没有遭到危险，他可能认为这里的治安已经好转。但在下一刻，也许他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别人他错了。

在发生这次危险之前，我和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相信自己有幸运加持，危险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即便历险，最终我也会平安度过。也许每一个人都会持类似的乐观观点，直到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危险。

这两次事件让我变得足够谨慎，教会我以后涉足危险地区，绝不能仅仅依靠直觉，而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规避掉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实际上，任何危险地区都有相对安全的区域，即便要到危险区域去，也有比较安全的交通方式。以前的我会毫无顾忌地四处闯荡，现在的我会考虑，除了安全进去，还要活着出来，将观察记录下来。

本书开头记录的非洲之船，已经是我第三次遇险。很幸运的是，由于马依噶等人的提醒，我没有跟随引诱我进廷巴克图的人离开，而是选择了在船上等待。这种谨慎，也来自我前两次的历险。如果没有前两次的经历，好奇心很重的我也许会跟随着引诱者离开，最终可能一去不复返。

《穿越非洲两百年》已经是我穿越亚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穿越百年中东》记载了我在中东的土耳其、阿拉伯地区的游历，并考察了现代中东恩怨的来龙去脉。《穿越劫后中亚》叙述的区域回到了大中亚地区，这个区域涵盖了现代的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伊朗，以及后苏联时代的中亚五国。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从古老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也是受大国博弈影响最重的地区。《穿越非洲两百年》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人古代（有记载的）最远的涉足地——非洲，尽量以全景的方式去考察现代非洲问题的形成、发展和现状。

本书写作跨度较长，东非部分构思于埃塞俄比亚的无名客栈，关于

埃塞俄比亚的部分稿件写于大理走青春客栈，西非部分构思于广州的锋子居，全书的稿件组于大理风吼居，最后两章修改于尼泊尔博卡拉的马尤尔酒店。

写完本书后，我已经离开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几片土地，暂时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这几年，我总是被一种压迫感推动着，从印度到东南亚，从蒙古到非洲，如饥似渴地了解着这个世界，明明知道世界没有所谓的终极答案，却总是去探索未知的问题。我想陪妻子度过几个月的闲暇时光，以弥补我对她的忽略。所谓伴侣，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几十年。希望当垂老的我们与世界告别时，能够坦然，不留遗憾，甚至不用为对方落泪，因为我们活着时尽了力。

即便完成了这个“三部曲”，我也并不会停下探寻的脚步。几本新书的规划已经提上日程。与未知的知识比起来，人生是多么短暂，即便用一辈子去追逐，也只不过如同一片漂泊的树叶在寻找归宿。它从溪流汇入河流，它在寻找归宿，但即便它能够躲过一路的险恶，最终也只会发现一个更大的漂泊之地：海洋。

感谢我的引路人、一辈子最感激的人，我的祖父母郭宝成、李玉萍。

感谢我的父母郭连生、张桂琴。

感谢我的妻子梦舞君。

感谢我的朋友文学锋、周杭君、谷重庆、秦旭东。作为最好的朋友，你们的鼓励一直是我的动力。

感谢谢小珍、万超超，以及那些帮助我寻找妻子的人。

感谢陈德、董曦阳、李栋、张根长、范存榜、雷戎、李杰、赵娜，以及众多无法一一列名的编辑。一本书的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选题到数次审稿，再到设计、印制和营销，当我越来越深入到这个行业之中，更加确定这个行业是理想者扎堆和抱团取暖的地方。我依然相信，保持理想、保持好奇，才是人生的本质。

2012

大事年表

2013

公　历	事　件
1805	7 月，穆罕默德 · 阿里建立埃及阿里王朝。
1806	1 月，英国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南非开普敦殖民地。
1830	7 月，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
1840	11 月，埃及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英埃协定》，标志着埃及逐步沦为殖民地。
1869	11 月，苏伊士运河通航。
1879	7 月，英国灭亡祖鲁王国。
1880	12 月，英国与南非布尔人爆发了第一次布尔战争。
1881	1 月，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
	5 月，突尼斯在法突战争中战败，法国强迫突尼斯签订《巴尔杜条约》，突尼斯因此沦为法国保护国。
1882	9 月，英军进攻埃及，镇压阿拉比反英起义，彻底占领埃及。
1884	11 月，欧洲列强召开柏林会议，商议瓜分非洲之事。
1885	2 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为刚果自由邦国王。
	6 月，苏丹建立马赫迪王国，定都恩图曼。
1890	7 月，英国、德国签订了瓜分东非的协议。乌干达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1894	英国、法国、意大利将索马里瓜分完毕。
1896	3 月，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击败意大利，成为非洲唯一独立的古国。
1898	6 月，英法两国为划分西非地区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
1899	1 月，英埃签署共管苏丹协定，苏丹实际上沦为英国殖民地。
	10 月，英国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布尔人国家宣战，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
1900	7 月，第一次泛非会议在伦敦召开。
1902	5 月，英布双方在弗里尼欣正式签订和约，第二次布尔战争宣告结束。这场战争促使了南非联邦的形成。

公　历	事　件
1908	11 月，刚果自由邦被比利时政府接管，改成比属刚果。
1912	1 月，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后来的非国大）在布隆方丹成立。
	10 月，利比亚在意土战争后成为意大利殖民地。
1914	11 月，由于与奥斯曼帝国 (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宣战，英国单方面宣布了对埃及的宗主国地位。
1922	2 月，英国承认埃及独立，但仍保留了许多特权，如国防、外交、少数民族等问题的处置权。
1935	10 月，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并占领了埃塞俄比亚。
1945	10 月，第五届泛非大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会议选举杜波依斯为大会主席。
1951	12 月，利比亚宣告独立，成立联邦制联合王国，伊德里斯一世成为国王。
1952	7 月，埃及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由自由军官组织改组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了政权。
1953	6 月，埃及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埃及共和国，穆罕默德 · 纳吉布担任第一任总统兼总理。
1956	1 月，苏丹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
	3 月，摩洛哥、突尼斯宣布独立。
	7 月，纳赛尔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为国有。
1957	3 月，黄金海岸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加纳。
1958	10 月，几内亚宣告独立，成立共和国，塞古 · 杜尔担任第一任总统。
	12 月，全非人民大会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
1960	1 月，喀麦隆、毛里塔尼亚独立。
	4 月，多哥、刚果（金）独立。
	6 月，马达加斯加独立。
	7 月，索马里独立。
	8 月，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塞内加尔独立。
	9 月，马里独立。
	10 月，尼日利亚独立。

2016

公　历	事　件
1961	4 月，塞拉利昂独立。
	12 月，坦噶尼喀独立。
1962	7 月，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卢旺达独立。
	10 月，乌干达独立。
1963	5 月，非洲统一组织成立。
	12 月，桑给巴尔、肯尼亚独立。
1964	4 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
	7 月，马拉维独立。
	10 月，赞比亚独立。
1965	2 月，冈比亚独立。
1966	9 月，博茨瓦纳独立。
	10 月，莱索托独立。
1967	7 月，尼日利亚内战，即比夫拉战争爆发。
1968	3 月，毛里求斯独立。
	9 月，斯威士兰独立。
	10 月，赤道几内亚独立。
1969	9 月，卡扎菲发动政变，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成为利比亚领导人。
1970	9 月，纳赛尔去世，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
1971	1 月，乌干达陆军司令阿明发动政变，推翻奥博特政府。
1972	2 月，第一次苏丹内战结束。
1973	9 月，几内亚比绍独立。
1975	1 月，安哥拉独立。
	3 月，埃塞俄比亚的君主制被正式废除。
	6 月，莫桑比克独立。
	7 月，科摩罗、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独立。

2018

公　历	事　件
1976	2月，奥巴桑乔成为尼日利亚领导人。
	6月，塞舌尔独立。
	12月，中非领导人博卡萨宣布，“中非共和国”改名为“中非帝国”，自己则改称博卡萨一世。
1977	6月，吉布提独立。
1979	9月，中非前总统戴维·达科发动政变，推翻了博卡萨政权。
	4月，坦桑尼亚军队攻入乌干达，推翻阿明政权。
	10月，尼日利亚领导人奥巴桑乔主动还政于民，尼日利亚军政府统治结束。
1980	4月，多伊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利比里亚政权，建立独裁统治；津巴布韦独立。
1981	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总统。
1983	5月，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
1988	5月，索马里内战爆发。
1989	12月，查尔斯·泰勒率全国爱国阵线武装攻入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内战爆发。
1990	2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3月，纳米比亚独立。
	9月，利比里亚独裁者多伊被叛军杀死。
1991	5月，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垮台。
1993	5月，厄立特里亚独立。
1994	4—6月，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
	4月，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1997	5月，第一次刚果内战结束，卡比拉在乌干达和卢旺达的支持下推翻蒙博托的统治，改国名扎伊尔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1998	8月，第二次刚果内战爆发。
1999	5月，奥巴桑乔通过直接民主选举，成为尼日利亚总统。
2002	1月，塞拉利昂内战结束。
	7月，非洲统一组织改名非洲联盟。

公　历	事　件
2003	8 月，查尔斯 · 泰勒辞去利比里亚总统职务，把总统权交给副总统摩西 · 布拉。
2010	12 月，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并席卷北非。
2011	7 月，南苏丹独立。
	10 月，卡扎菲及其接班人穆塔西姆死于枪杀。
2012	6 月，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成为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首任埃及总统。
2013	7 月，埃及军方解除了穆罕默德 · 穆尔西的总统职务。
2014	6 月，阿卜杜勒–法塔赫 · 塞西当选埃及总统。
	11 月，突尼斯呼声党候选人贝吉 · 卡伊德 · 埃塞卜西当选总统。
2015	10 月，埃塞俄比亚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自 2016 年至 2018 年。
2016	10 月，埃及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自 2017 年至 2019 年。
2018	3 月，非盟非洲自贸区特别首脑会议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44 国签署非洲自贸区协议，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
2019	7 月，第 55 届非洲联盟峰会在苏丹举行。这次峰会上，非洲大陆自贸区 (AfCFTA) 正式成立。
	9 月，津巴布韦“国父”穆加贝逝世，享年 95 岁。
	10 月，2019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 艾哈迈德 · 阿里。